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非洲通史近代卷



总序

献给大家的这套《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艰苦创业的结晶。

中国人对非洲历史的兴趣，差不多与中国史学传统一样悠久。中国古代史学家留下了研究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大量宝贵资料，但他们受到所接触范围的局限，仅仅描述了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放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全非各国的历史作简洁的介绍，但在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没有条件对非洲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老一代的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开设非洲史课程，培养研究人材，编写资料和专著，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嘎然而止。就在我们止步不前的60—70年代，世界非洲史学正蓬勃发展，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国别史、地区史、专史和多卷集通史，中国与世界非洲史学的差距再一次拉大。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同悠久真诚的中非友谊很不相称。

非洲是世界的第二大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大力量。1990年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大陆争取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非洲正处于路转峰回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同非洲各族人民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互相声援，今天又在为反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强权政治而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殖民剥削和统治的继续。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世界战略格局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趋势，需要搞清非洲政治、经济“热点”的来龙去脉。

非洲的文明史，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统一规律可循，又有许多特殊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可能首先发生在非洲。非洲也是世界史上最先出现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国家组织的一个大洲。但此后，非洲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就愈来愈不平衡。到15世纪欧洲殖民者首途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时，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某些非洲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封建社会阶段，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刚果河（扎伊尔河）、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大湖地区则存在着一系列奴隶制国家，而在赤道热带森林、赞比西河以南，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以及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的人们却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的原始社会生活。在许多奴隶制国家和某些封建制国家内部，次生的、派生的村社——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细胞和家家长奴隶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非洲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来存在着不少偏见和曲解，例如认为“黑人自古天生低劣”的观点，以欧洲模式硬套非洲各族历史的方法论，等等。我们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点，才能从驳杂纷繁的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无可讳言，今日非洲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但这主要不是古代历史遗存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15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留下的恶果。当然，在近代非洲历史画卷

如果不算古代神话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记载非洲国家的史学著作。

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如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张铁生《中非交通初探》等。

杜波伊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5页。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vol. 1, XViii.

上，也不只是书写着屈辱和辛酸，更有不屈不挠的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改革，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民族英雄。如果加以科学的总结，这对于驳斥形形色色的历史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基于上述认识，1984 年在北京召开了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倡议编写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非洲通史。会后确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为项目负责人，成立了由艾周昌、陆庭恩、张文淳、彭坤元、郑家馨、何芳川、宁骚组成的编委会。这一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为了使编写工作扎实地进行，编委会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第一，编译《非洲通史资料选辑》，分册出版，每册约 20 万字；第二，讨论非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非洲社会的演进和变革，撒哈拉以南社会经济形态的嬗变和更替，非洲的政治体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等。这两项工作对集思广益、提高书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非洲通史》全书分为三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古代卷由何芳川、宁骚主编；近代卷由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现代卷由陆庭恩、彭坤元主编。三卷之间，既求互相衔接，又能独立成篇。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以及中联部、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研究非洲史的学者。

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毅然承担了本书及其资料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王少如、陈长华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一切支持和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非洲通史》项目负责人

艾周昌陆庭恩

1990 年 7 月 30 日

导 论

—

《非洲通史·近代卷》叙述 16 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非洲历史。

非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由前资本主义（封建的、奴隶制的、原始公社制的）过渡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非洲各族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由局部、次要的矛盾上升为全局、主要矛盾的时代。不能把欧洲的侵略、统治和奴役仅仅视为对非洲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平衡起作用的“外部影响”，更不应把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同样看作是一种“外部影响”。当一种外来势力奴役和统治另一个民族时，它就失去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互相影响”的含意。实际上，欧洲列强是把一种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非洲各族人民，是近代非洲社会发展的一个恶毒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19 世纪末，殖民主义同非洲人民的矛盾已成为全非社会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当然，就非洲各国而言，其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时间界标各不相同，时距也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非洲国家并未直接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基本上沿着自身固有的历史轨迹运动着。所谓不能以“白人的眼光”而应以“非洲人的眼光”编写非洲史，应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非洲近代史不是非洲各族人民同欧洲殖民者的关系史，而应是非洲各族人民在本时期内各种斗争（生产、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真实的概述；第二，非洲近代史的主体是非洲人民，而不是欧洲殖民者。

非洲近代史是一幅悲壮的画卷。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遭到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时间最长，所受苦难最深。但他们并未逆来顺受，而是在屈辱和悲愤中奋起，进行保卫土地、保卫家园、保卫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浴血战斗。尽管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武器陈旧，尽管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屡遭失败，但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他们的英雄业迹，却铸成了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丰碑。

对殖民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应，除了武装抵抗之外，还有自强不息的改革运动，特别是某些国家（如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近代化的尝试。由于内有保守势力的反对，外有欧洲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迫和破坏，这些改革运动都抱恨终天，但它们毕竟在非洲历史上首先打出了近代化的旗帜，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殖民主义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非洲近代史也是色彩斑斓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一些古国衰落和瓦解了，一些新的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一些部落互相融合，形成新的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日后成为抵抗殖民侵略的重要力量。

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本时期内获得了重大进展，从尼日尔河上游推进到喀麦隆高原，从东苏丹和东非沿海渗透到东非内陆和扎伊尔河流域，在中非获得了立足点。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圣战运动，对非洲许多国家的统一、改革和反殖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近代非洲社会的矛盾运动，本书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6 至 18 世纪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1.

Gideon Swere,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史》), London 1978, .

为第一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为第二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三阶段。但在各章的安排上，并未严格按各个阶段任意割断各个国家的历史，而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前伸后延，左顾右及，企图使非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能顺乎自然，给人以整体和层次分明的印象。

二

16世纪到18世纪末，是非洲遭受殖民侵略、统治和奴役的初期阶段，是黑奴贸易兴盛并对非洲社会带来大范围灾难性破坏的时期，也是非洲古代大国衰落、分裂、瓦解和许多新的国家创立、发展的时期。

列强对非洲的殖民侵略由葡萄牙开其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步其后。到18世纪末为止，欧洲人直接侵占的地区是狭小的，仅及非洲大陆总面积的3%，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印度洋的各个岛屿及其沿海地带，如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马斯克林群岛、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沿海地带、南非开普殖民地等。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有三：第一，当时欧洲殖民者的主要注意力在美洲和东、西印度群岛，仅把非洲当作其开发美洲殖民地的劳动力来源和海上交通的中途站。第二，炎热的气候和热带病的肆虐使欧洲殖民者望而却步，他们认为非洲许多地方不适于白人居住。到179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欧洲居民不超过25000人，其中86%（21746人）在开普殖民地（1798年）。第三，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古国的早期侵略都遭到了失败。1578年葡王塞巴斯蒂昂率军亲征摩洛哥，全军覆灭，宣告建设北非大帝国梦想的破灭。1633年，葡人又被全部赶出埃塞俄比亚，把这个东非古国变成其保护国的企图也成了泡影。西班牙侵占中马格里布和北马格里布的行径遭到了马格里布人民的顽强抵抗，随后在长达60年的西班牙—土耳其争霸战中失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三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说明，在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还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以击败亚非各大国的抵抗，而只能占领一些分裂的弱小的国家和地区。

尽管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占领的地区不大，但他们实行的殖民政策在世界殖民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有影响。由葡萄牙开创的殖民统治制度（领主制、总督制）、经济掠夺制度（奴隶种植园制和大地产制）、土著辅助军制度，后来相继推行到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所进行的黑奴贸易，给非洲带来的巨创深痛罄竹难书。本卷第一章已详为论列。至于黑奴贸易对非洲奴隶制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有待深入论辩的问题。其所以复杂，是因为贩奴地区各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已进入封建农奴制时代，但又保留大量奴隶制残余（如埃塞俄比亚）；许多国家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西非、东非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仍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如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等）。因此，欧洲人贩卖黑奴对各国和各地区的影响也就各不相同，或阻碍其发展，或促进其畸形发展，或在一定时期内促进其发展，而在另一定时期内又阻碍其发展，或延缓其向更高社会形态（封建制）的过渡。但有两点应该而且可以说明。第一，近代的黑奴贸易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兴盛起来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它与世界各国和非洲历史上正常发展的奴隶贸易有着根本的区别。非洲黑奴贸易是一种纯粹的掠夺制度，是非洲自身劳动力的纯粹损失。本卷第一章已经指出，非洲在 400 年间人口停滞不增，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从 1/5 下降到 1/13。如果扣除非贩奴区域（撒哈拉以北和南非）的人口增长，则贩奴区的绝对人口数量也是下降的。因此就整体而言，黑奴贸易使原有的生产条件恶化，使非洲劳动力因外流和非正常死亡而难于扩大。第二，在黑奴贸易期间，非洲的奴隶种植园得到了发展，一部分黑奴被留在非洲劳动。但是，奴隶种植园制度的发展并非传统的奴隶制的高级发展。非洲传统奴隶制的性质至今争论不已，我们认为，它在撒哈拉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具有家长奴隶制（亦称家庭奴隶制）的性质，个别地区（例如刚果王国、豪萨城邦）有劳动奴隶制（也译大奴隶制）出现。家长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奴隶可以成为家庭的成员，可以成家立业，甚至可以同奴隶主家庭成员结婚（特别是女奴），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生活的需求。种植园奴隶制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首先由葡萄牙人在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圣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推行，继而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留尼汪、毛里求斯等地加以推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禁止奴隶贸易之后，非洲人经营的奴隶种植园才在西非、东非沿海各国发展起来。种植园奴隶制的奴隶主不再实行宗族同化政策，而像欧洲种植园主一样把奴隶视为“低等人”，其生产的产品如丁香、棕榈、花生以及谷物，主要不是为了生活的需求，而是为了出卖。这类集约式的奴隶种植园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禁止黑奴贸易以后，西非和东非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奴隶数量迅猛增长。至于非洲是否存在过一次“奴隶制的再版”，尚待商榷。

16—18 世纪是非洲反殖斗争的初始阶段。由于殖民者的占领和统治只局限于沿海地带，因而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具有局部性。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非洲人保卫土地和家园的斗争，由部落酋长及头人组织和领导。南非科伊人和科萨人反对荷兰殖民者掠夺土地的所谓霍屯督—荷兰战争和卡弗尔战争最为壮烈。莫桑比克内地马津巴人的反葡起义也属这一类型。二是反对黑奴贸易和种植园奴隶制的斗争。恩东戈女王领导安哥拉人民保卫国家主权和反对奴隶贸易的近 40 年的战斗，在非洲反殖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佛得角群岛、圣多美—普林西比不时爆发奴隶起义，其中以圣多美岛的安哥拉黑奴起义坚持的时间最长（1574—1596），影响最大。三是传统政权领导的反殖斗争。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除了直接占领和统治的地区以外，还把保护国制强加给刚果和东非城邦各国。这些国家和城邦的君主为摆脱殖民者的控制、欺凌和掠夺，领导了各种形式的反殖斗争。其中较大者有 1665 年刚果国安东尼奥一世领导的反葡战争，1631 年和 1698 年蒙巴萨素丹领导人民围攻殖民据点耶稣堡的战斗。前者因安东尼奥一世战死疆场，刚果王国从此一蹶不振，走向分裂和瓦解。后者则给葡人以沉重打击，并在阿曼素丹的帮助下，把盘踞在鲁伍马河以北的殖民者全部赶走。这一时期的反殖斗争，是近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萌芽，它限于局部地区，规模较小。

从 16 世纪初年开始，尚未被欧洲殖民者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国家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一直走在非洲社会发展前列的北非和东北非国家，进入了封建衰落时期。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从 16 世纪初年起先后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土耳其人和原来各国统治者的矛盾和纷争，

对农牧民剥削的加重，造成内争和起义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衰蔽。摩洛哥打退了欧洲列强（西、葡、英）的侵略，抵御了土耳其的威胁，保持了独立，一度出现繁荣，但终因对西苏丹的长期侵略和统治阶级与地方封建势力的内哄，也变得日趋衰落。东北非的古国埃塞俄比亚在葡萄牙的侵略和得到土耳其支持的阿达勒王国的进攻之下，经历了内战和外战，统一和分裂的长期斗争，终于在 1769 年进入了封建割据的王子纷争时代。这些封建国家在抵御欧洲殖民者侵略的同时，都实行了禁止欧洲基督教传播、由国家垄断和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以保护伊斯兰圣地为名，封锁红海航道，造成了这条古代中西商道的衰落。16—18 世纪是世界历史加速发展的时代，这类闭关政策使这些本来并不太落后的国家闭目塞听，不能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拉大了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这说明，单纯的封建主义自保已应付不了激变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挑战；一旦欧洲列强拥有绝对优势，它们便成了新一轮殖民侵略的首要对象。

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一性派基督教文明在东苏丹的撞击，在 16 世纪以后加速发展，其结果是伊斯兰王国（丰吉、达尔富尔、科尔多凡素丹国）取代了黑人基督教王国（马库拉、诺巴和阿勒瓦）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在居民构成、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发生了从基督教文明向穆斯林文明转轨性的深刻变化。

摩洛哥在打败葡萄牙的侵略之后，挟其军事余威，远征桑海。1591 年汤迪比一役，桑海败北，结束了西苏丹大国称霸的局面，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和混战。随着桑海帝国和马里王国的覆灭，产生了桑海人、弗拉尼人、莫西人、班巴拉人、沃洛夫人、马林凯人众多的王国和酋长国。原来经济繁荣的尼日尔河河曲地区，农工商业因战乱而走向衰落。撒哈拉商道的重心向东西两侧转移，连接内陆和西非沿海的南北商道网逐步形成；伊斯兰教随着政治和商道的变迁而向南渗透和传播，伊斯兰文明和苏丹黑人原始文明碰撞、吸收、融合的结果，产生了混合伊斯兰教，这实质上是伊斯兰教“黑人化”的一种现象。18 世纪下半叶，在富塔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相继发生的伊斯兰圣战，建立了西非最早的伊斯兰教长国，把穆斯林的革命激情传播到西非其他地区，揭开了 19 世纪大规模圣战和改革运动的序幕。

与西非内陆古代强国的衰落相对照，西非沿海地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长途贸易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者的侵略和贩奴，各族出现了联合统一的趋向，相继建立了奥约、达荷美、阿散蒂和开约尔等强国。这些国家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于农业、开矿和运输，并从事贩奴活动。但是，欧洲殖民者的侵略、干预和黑奴贸易，阻碍了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并挑动和助长了本已存在的分裂趋势。殖民者往往从各族内部的纷争中渔利，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刚果河（扎伊尔河）流域内陆，从 16 世纪初开始，西班牙人各支族大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先后建立了卢巴王国、库巴王国、隆达王国。欧洲人在非洲东西海岸所从事的黑奴贸易，逐渐向该地区推进，到 18 世纪上半叶，一条从西海岸罗安达到东海岸基尔瓦的横贯非洲内陆的商道终于打通。商道所辐射的地区成为非洲东西海岸奴隶贩子竞相捕获奴隶的场所，直接造成各部落之间频繁的猎奴战争、政治上的分裂和劳动力的短缺。这些正向奴隶制过渡的国家不免未老先衰。

埃塞俄比亚相对较为松弛。参见本卷第七章。

约在 16 世纪初，一支北来的以养牛业为主的罗族，取代了湖区古国布尼奥罗第一王朝即阿巴支韦齐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巴比托王朝。阿巴支奇韦人向南迁徙，建立了安科累、卡拉圭等王国。1700 年前后，阿巴比托王朝处于极盛时期，除了四周的许多附庸小国之外，其势力南达卡拉圭、卢旺达，东到布干达，甚至远及今肯尼亚西部的一些部落酋长国。但它同内外圈各附庸国之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纽带。随着附庸国的发展，布尼奥罗的霸权也随之丧失，被同属罗族而建立于维多利亚湖区的布干达所取代。

布尼奥罗的衰落与布干达的兴起，和东非内陆与沿海之间商道的形成也不无关系。从 17 世纪末年开始，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和内陆各族商人开辟了三条商道：南路从基尔瓦出发，越过马拉维湖区，进入中非，和以罗安达为起点至中非的商道相接；北路由汤加至乞力马扎罗地区；中路则从巴加莫约通往坦噶尼喀湖区，其支线则从塔波拉经卡拉圭至布干达。持续上千年的相互隔绝状态的打破，刺激了内陆商业的发展，各地联系加强，城镇兴起，生产发展，特别是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各部落联合和统一成国家的趋势加强。当然，这此商道同时用来贩运黑奴。黑奴贸易给一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破坏的负效应。

在本时期内，除了直接受殖民统治的很小一部分地区以外，大部分非洲国家虽受到殖民主义的侵略和黑奴贸易的蹂躏，但基本上仍在按照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独立地向前发展着。优良作物的种植，铁器工具的推广和其他技术的改进，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长途贸易商路的开辟，都表明了非洲内部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弥补了奴隶贸易所造成的人口巨大损失，这为 19 世纪开始的各种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在本时期内建立的各类新的国家，对非洲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如布干达、卢旺达、达荷美、阿散蒂等）成为日后非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反对殖民侵略的凝聚中心。

三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是非洲受到进一步殖民侵略，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非洲人民进行民族自卫战争，进行近代化改革尝试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期。

在本时期内，欧美殖民者对非洲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美的迅速进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促使他们要求实行“自由贸易”、“自由劳动”政策，打破商业资本家对贸易的垄断，把非洲变成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只要商业垄断公司控制的黑奴贸易继续存在，非洲就无法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如果欧洲人对非洲的广阔内陆一无所知，非洲成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地域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和非洲内陆探险便应运而生。19 世纪初年，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黑奴贸易长期禁而不止，走私贩卖几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巴西、古巴、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种植园依旧保存。当 19 世纪 60—80 年代上述几大奴隶输入区废除奴隶制之后，1889—1890 年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才替黑奴贸易打上了句号。非洲内陆探险始于 1769 年布鲁斯考察青尼罗河，到 1876 年布鲁塞尔国际会议进入新阶段。有数以百计的探险家和探险队进入非洲内陆。尽管一些探险家抱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或对非洲人的善意去从事考察，但他们脱离

不了这个时代欧洲资产阶级的总目标，蒙哥·帕克、利文斯顿这些著名的探险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工业资产阶级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活动相适应，基督教提出了“到世界各地去传播福音”的口号，政治家则着手在非洲建立大片殖民地和占领战略要冲，开始了一轮新的殖民征服。

本时期殖民侵略的一个新特点，是打着禁止奴隶贸易和自由的旗号。殖民者在此旗号之下，先后建立了英属塞拉里昂（初名“自由省”）、美属利比里亚（Liberia，1847年宣布独立）和法属利伯维尔（Libreville，意为自由）殖民地，从英美统治阶级的本意来说，在非洲建立“自由黑人殖民地”是为安置本国的获释奴隶，消除所谓“社会威胁”，同时为向非洲内陆扩张建立前哨基地。殖民者在此旗号之下，对一些非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他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对拉各斯、桑给巴尔的侵略便是如此。

本时期殖民侵略的另一个特点，是英法新兴工业国家取代葡荷老牌殖民国家，在非洲殖民舞台上扮演主角。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商品为武器，打开了许多非洲大国、古国和强国的大门。这是葡荷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这类殖民征服战争中最显著者有：1798—1801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争，1830年开始的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807—1874年英国—阿散蒂战争，1868年英国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在非洲南端英国继承了荷兰人的衣钵，继续发动侵占科萨人土地的卡弗尔战争，布尔人的大迁徙与伴随而来的对南班图人的征服战，特别是征服祖鲁王国的“血河之役”（1838年）。通过一系列大小战争，殖民者扩大了在非洲占有的领土面积，到1876年约占全非总面积的10.8%，其中英国占有4.1%，法国为2.8%，布尔人为2.4%，西班牙为0.8%，葡萄牙为0.7%。此外，一系列非洲国家在英法“炮舰政策”的威胁之下，正在变成列强的半殖民地，其中主要有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索丹国、马达加斯加、达荷美等。

爱国主义始终是非洲近代历史中的主旋律。在本时期内，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抗击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而且还包含着实行开放和改革，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这个时期反对殖民侵略斗争是从局部、小规模向全非、大规模斗争的过渡。其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反殖斗争几乎遍及全非所有沿海各国和地区，其中主要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达荷美、黄金海岸、塞内加尔等等。这是同殖民侵略范围的扩大相一致的。第二，反殖斗争的规模日趋扩大，组织程度有所提高，由各国的国王和君主领导的反殖斗争占居主要地位。埃塞俄比亚皇帝西奥多，南班图人新兴国家中的祖鲁国王丁刚、巴苏陀国王莫舒舒，恩得贝莱王国国王姆齐利卡齐，抵抗法国侵略的摩洛哥素丹阿卜杜·拉赫曼，以及坚持不懈地抵抗英国侵略的历代阿散蒂国王，都在反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以身殉国。当一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向殖民侵略者投降，或者无力组织全民抗战之时，反殖斗争便采取了下层群众运动的形式。埃及马木路克集团兵败逃跑之后，埃及人民在伊斯兰教长领导下发动了两次开罗起义；阿尔及利亚贝伊投降法国之后，阿卜杜·喀德尔领导了史诗般的抗法战争（1832—1847年）。非洲各地区反殖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北非和南非斗争最为激烈，形成了反殖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大“热点”。喀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历时15年，牵制了当时法国兵力的1/3，影响波及整个北非，树立了反殖斗

争的光辉榜样。南班图族的祖鲁王国、巴苏陀王国和恩得贝莱王国进行了几十年反对英布殖民者的斗争，长时期保住了国家主权，在斗争中形成了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萌芽。如果说在早期反殖斗争中恩津加提出了“要做命运的主人，不当葡萄牙囚徒”的口号，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应该是“不臣属于葡萄牙的独立王国”，那末现在遭受侵略的非洲各国则把民族独立置于生命之上，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反殖斗争的一面旗帜。布莱登曾大声疾呼：“民族主义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独特有效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有影响的地位。”如果说18世纪末年以前反对殖民者的武器主要是刀、矛、毒箭之类的传统武器，那末现在非洲人开始意识到，反击殖民侵略者“需要现代火器和大炮，并且最好由本国制造”。当一些开明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特别是军事上的落后时，他们就实行了以强兵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而揭开了民族运动的另一重要篇章。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以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为开端，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相继实行了开放和改革。从整个世界形势和欧非关系来看，这些国家的开放和改革很难说是“主动”的。它们不是被侵略战争敲开了大门，就是在侵略战争的威胁下再也不能维持闭关政策和因循守旧的体制。马木路克集团的惨败，阿尔及利亚的亡国，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在16—17世纪打败过欧洲国家的摩洛哥军队，在19世纪已经不堪一击，被欧洲人讥笑为一支拿着打猎武器的表演部队。变则有救，不变则亡。穆罕默德·阿里、西奥多、拉达马二世、哈桑等人正是认清了这种形势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企图通过开放改革，学习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物质文明，振兴军队和国家，以挽救民族危亡。所以，引进欧洲的武器装备、聘请欧籍教官、改革训练方法等强兵措施在这次改革中居于首要地位。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在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各有不同的侧重。例如马达加斯加和埃塞俄比亚的改革重点之一是释放奴隶，因为它们仍保存着奴隶制或者奴隶制的残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次改革已经不是对传统制度的单纯调整，而是多少带上了近代化的色彩，或者说是一次不完全的近代化改革。这些国家向西方学习，都不是仅仅停留在军事方面，而是从军事延伸到经济和文化领域，一些国家甚至波及到政治领域，例如突尼斯的立宪运动（达斯图尔）。在经济领域，他们引进近代的机器设备，开办军用和民用工厂，发展出口经济作物；在文化领域，开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改造旧教育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近代化又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它们没有触动旧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革旧的上层建筑。这就埋下了改革夭折的根子。

由于传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保存，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包括封建地主（奴隶主）、军政官僚和宗教首领在内的顽固集团。他们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1年，第526页。

Robert July, A History of the Africa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80, p.411.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54页。

赖·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三联书店1972年，第61页。

Charles Lndres Julien, Le Maroc Face aux Imperialisme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摩洛哥》), Paris 1978, p.95.

反对一切新事物，抵制各种新措施的推行，甚至不惜上下勾结发动叛乱，形成对改革的集团性抗拒和扼杀。在推行经济、政治和军事近代化措施中，各国又均未形成一个牢靠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依靠少数改革派官僚，这些人难于跳出旧的窠臼。因此，出现了用封建军事办法管理近代化工厂、决策失误（如突尼斯法里纳港的建设）、办事效率低，与外国商人谈判中上当受骗等弊端，乃至贪污腐化、用有限的资金购高档奢侈品、兴建豪华宫殿（如埃及、摩洛哥）等严重腐败现象。人民群众非但不能从开放改革中获得利益，相反改革时期的一切重负却落到他们身上，以致民怨沸腾，政局动荡，财政困难。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改革，实难付诸实施。

非洲国家的开放改革，特别是埃及实行的近代化措施，在东方国家中开风气之先，对土耳其、中国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都产生过影响，开启了一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序幕，也曾一度增强了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至少推迟了这些国家沦为殖民地的进程。尽管就外部环境即国际大气候而言，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还没有达到不容亚非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一例），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殖民列强的干涉和侵略也是这些国家改革夭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一些欧洲列强口头上赞扬、支持非洲国家的开放改革（如法国之对埃及），但他们和非洲国家改革派的目标却是南辕北辙。非洲国家改革派力图通过开放改革，学习、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强兵富国，建立一个强盛繁荣的独立国家。著名伊斯兰教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指出：“摆脱欧洲控制的唯一希望，在于学习西方的方法，获得科学的观点，掌握西方技术，从而增强力量。”而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两国则企图在支持开放改革的名义下，把非洲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法国驻突尼斯领事莱昂·罗什的使命，“是为了保证法国在突尼斯的势力，使二十年以来突尼斯走法国道路的进程加快速度”。他们先是用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如不奏效，便在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发动政变和叛乱（如法国在马达加斯加），而军事侵略和征服则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

在本时期内，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压力、新的挑战，但也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潜力。一些国家抓住了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但没有顶住压力，未能充分发挥新的潜力，在传统制度内部进行的改革尚未完成，就被殖民侵略者所扼杀，机遇丧失了，独立也丧失了。

19世纪20年代以前，非洲是生气勃勃的，除了北非和东非国家的开放改革之外，还发生了两起波及地区很广、历史意义深远的重大社会变革。

其一是伊斯兰圣战。它从1804年奥斯曼·登·福迪奥发动豪萨圣战开始，到1874年萨摩里·杜尔建立瓦苏鲁帝国为止，历时70年，波及从乍得湖到富塔高原、从尼日尔河上游到喀麦隆高原的西非和中非。在圣战期间，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传播，其深度和广度是以前几百年所不可比拟的。广大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特别是卡迪尼亚教派和提江尼亚教派的宣传，积极参加圣战。圣战之后，新政权都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推广伊斯兰教文化，把伊

参见艾周昌、沐涛：《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中国的反响》，载《阿拉伯世界》1987年第1期。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51页。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页。

斯兰教提高到统治阶级思想的高度。圣战不单纯是一次宗教运动，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统一和社会变革运动。经过这次圣战，结束了小国林立的局面，形成了索科托、图库勒尔和瓦苏鲁三大国家。它们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索科托还改革了社会经济制度，不但推翻了豪萨奴隶主的政权，还采取了释放奴隶的若干措施，没收了奴隶主的地产，开始建立以弗拉尼人为主的封建领主经济。

其二是南班图人的迁徙、融合和社会变革。南班图人的支族恩戈尼人在迁居南非的几个世纪中，实行农牧混合经济和锄耕农业，推广铁器生产工具，引进玉米和蚕豆等高产作物品种，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贫富分化，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打下了基础。白人殖民者在开普和莫桑比克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对南班图人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丁吉斯瓦约及其继承者恰卡顺应历史的发展，起而领导恩戈尼人的改革和统一战争。他们改革政治、军事制度，推行同龄兵团制，建立了祖鲁王国。一些不愿臣服的部落分多路向北迁徙，最远者直抵维多利亚湖畔。通过恩戈尼族与其他各族的互相兼并、融合，在南部非洲和东非建立了许多班图人的国家和雏形国家，其中著名的有祖鲁、巴苏陀、斯威士、恩得贝莱、加扎等。他们多采用恰卡所创立的军事、政治制度，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

在这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即使在欧美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面前，非洲人民依然表现了非凡的历史创造力。把近代史上的非洲人民仅仅描写为历史的“被动者”和“客体”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这些新建立的国家还未来得及按照预定的轨道进行改革或巩固改革的成果，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代就来到了，但这些国家在日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时期内，非洲局部地区开始了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在已沦为殖民地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塞拉利昂等），宗主国不仅建立了殖民地政治制度，而且着手破坏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殖民地经济制度。殖民者大肆夺占土地，开办种植园和农场，或者使土地所有制个体化，其目的是摧毁旧的社会基础，使之变成宗主国的附庸。其次，在正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殖民者通过输入工业品、输出廉价的农业原料（棉花、花生、棕榈、丁香等），刺激了一批出口型（外向型）农业生产实体的出现。这是在非洲人原有结构范围之内进行的。再次，机器工厂在一些国家的军事工业、轻工业、加工工业中诞生。非洲的第一批近代化工厂是非洲国家为强兵富国而创办的。随后少数大商人开办一些工厂和手工工场。它们只局限于沿海非洲国家，稀疏存在于旧的经济结构的汪洋大海之中。应当指出，这种变革过程刚一起步就被欧洲殖民者所葬送。

四

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非洲，非洲国家（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沦为殖民地的时期；是非洲殖民地制度初步建立，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反帝爱国斗争遍及全非，民族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初步兴起的年代。

1876年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揭开了瓜分刚果河流域的序幕，也可以说是瓜分整个非洲的序幕。因瓜分刚果河流域而形成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尖

锐冲突，导致了1884—1885年柏林会议的召开，这是瓜分非洲进入高潮的标志。1898—1902年的英布战争是帝国主义再瓜分非洲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它的非洲属地被再瓜分后，非洲政治地理相对稳定下来。帝国主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把非洲瓜分殆尽，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尚保持政治独立之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变成了殖民地和保护国。

这场瓜分非洲领土狂潮的到来，其根源在欧洲，概括地说，就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及其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的结果。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有两对并行的矛盾，即帝国主义争夺非洲领土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矛盾。

索尔兹伯里在1891年回忆道：“当我1880年离开外交部时不曾有人想到过非洲，可我1885年重返外交部时，欧洲国家之间为要得到非洲某块领土而争吵不休。”把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而产生的矛盾说成是“争吵”，未免有点轻描淡写。这种虎狼之争是很尖锐的，经常剑拔弩张，横刀相向，有时则大动干戈，法绍达冲突、摩洛哥危机、英布战争便是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主义之间是以喋喋不休的争吵来达成瓜分协定的，他们拿非洲人的领土主权作筹码，互相“馈赠”山川湖泊。其结果，非洲人民的领土主权被任意买卖，他们原有的疆界被任意割裂，各族的自然联系被切断，埋下了无数的领土、边界纠纷，至今仍困扰着非洲。

列强在瓜分非洲中所能得到的份额，最终是以他们的实力和他们夺占的领土为转移的。因此，帝国主义在瓜分非洲中都奉行“抢先占领”的原则。他们为此而使用各种卑劣伎俩，主要是和平渗透和武力征服，但归根结底还是靠武力。不过在柏林会议后的大角逐中，和平渗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列强向一切尚未瓜分完毕的非洲国家派遣传教士、探险队或特许商业公司，用欺骗的手段同非洲各国的君主、酋长、头人签订协定、条约，以作为“有效占领”的证据。这类协定或条约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政府出面签订的，另一种是私人组织签订的。这类协定便成为列强在会议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当然，这只是侵略非洲各国的第一步，紧随其后的就是步兵、炮兵的血腥占领。

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全非洲，过去从未见过白人的内陆也领教了鼓吹“文明”、“人权”的欧洲资产阶级抢劫、杀人的凶残。因此，殖民主义者同非洲人民的矛盾在非洲每一个地区都上升到主要的地位。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大陆，并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力量和新形式。

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期，由传统政权领导的抵抗运动仍然是反殖反帝斗争的主要形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1882—1885年和1894—1898年马达加斯加的两次抗法战争，萨摩利、贝汉津（格比达西）、腊巴赫分别领导的达荷美、乌阿苏鲁和博尔努的抗法战争，祖鲁王国、马塔贝莱王国、阿散蒂王国（1900年的第八次阿散蒂战争）进行的抗英战争。这些由统一的国家领导的反侵略战争，就其全民性、组织程度和形式以及武器装备而言，都达到了非洲近代时期反侵略战争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在宗教形式下发动的反殖运动。其中一种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苏丹马赫迪起义（1881—1900年）、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索马里圣战（1899—1920年）、塞努西教派在中苏丹和

利比亚领导的抗击法、意的斗争。宗教运动的第二种形式是在传统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反殖斗争，其典型的例证便是坦桑尼亚的马及马及起义（1905—1907年）。起义的组织者金吉基蒂勒不仅宣传祖先在天之灵不死，它会来拯救人们，而且用传统的宗教方法组织和发动群众。第三种形式便是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土著基督教会，例如尼日利亚的土著浸礼会、南非的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尼亚萨兰黑人浸礼会，并由奇伦布韦领导了反英起义（1915年）。这类宗教外衣下的反殖反帝斗争，本质上是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

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开其端。由于非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主要兴起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1879年，埃及成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祖国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领导了埃及的立宪运动和抗英战争（1882）。英国占领埃及后，以卡米勒为首成立了新祖国党，提出了依靠自己力量“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并建立了祖国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用以发动群众。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西非的塞内加尔、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团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成立的南非非洲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改名非洲人国民大会），它是南部非洲第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成为长期领导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核心。这个时期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涌现了一批民族运动的新型领导者和组织者，出现了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抵制运动等新的斗争形式，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口号。这一切表明，非洲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正从自发的旧式斗争走向新的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要求的自觉斗争。

在本时期内，尽管非洲人民进行了十分英勇的斗争，但几乎所有类型的反殖反帝斗争（除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之外）都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非洲民族力量远远弱于帝国主义力量这一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此后，非洲各国的原有统治阶级大都投降和依附于殖民政权，退出了领导民族运动的舞台，旧式的反殖斗争相对趋于平静，而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正处于组织的初期。因此，在近代时期结束之前，出现了新旧两种斗争形式的并存，非洲大陆普遍呈现出暴风雨前夜的相对沉寂。但是，民族仇恨的种子深埋在非洲人民心中，新的阶级力量正在组织起来，这种沉寂仅仅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将点燃更炽烈的火焰，以更新的面貌和力量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帝国主义在瓜分和侵占非洲国家的同时，以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地已建立的殖民制度为蓝本，着手系统地建立殖民统治制度，以加强对非洲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殖民统治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长期的零敲碎打的调整过程，但到近代时期结束前，它的基本特征已经显露出来。各个帝国主义（英、法、德、意、比、葡、西）对非洲国家的统治制度各有其特点，这是由宗主国的不同国情以及各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差异所造成的，但它们仍有共同的特征。

在政治上，非洲各国（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之外，下同）都丧失了主权。主权的体现者不再是非洲国家的君主和酋长，而是欧洲各国的国王或总统，各种政策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欧洲各国的殖民部、外交部或内政部手中。派驻非洲各地的总督及大大小小的行政长官是实际的统治者，他们专横地统治着非洲人民。即使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和国家，非洲的土著统治者也得

唯殖民官吏之命是从。用卢加德的话来说：“土著首领不应作为独立的统治者，而应作为附属的统治者统治其人民。”由于政权的丧失，非洲国家相应地丧失了军权、司法审判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收权。殖民者使用他们掌握的这些权力，残酷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压榨非洲人民的血汗。

在经济上，宗主国垄断资本在非洲各殖民地国家设立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货币，操纵金融和内外贸易，大量掠夺土地，开办白人农场或种植园，把非洲人沦为佃农、雇工或流动劳工。殖民政府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强制，迫使小农种植出口作物（可可、棉花、丁香、棕榈、花生、剑麻等），由宗主国商业公司垄断收购、加工、出口和规定价格，开采矿山，控制交通命脉（内河航运、海运和铁路）。矿山的开采和铁路的修建，如同白人农场一样，主要是靠劳役制度征集来的所谓“合同工”以及流动劳工从事劳动。

在文化上，殖民政府力图泯灭非洲人的民族文化，实行奴化教育制度，向殖民地年青一代灌输种族主义思想。

尽管非洲的殖民统治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最终确立，但其基本特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更加细致和完整而已。

垄断资本为了把非洲殖民地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宣布释放奴隶，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破坏封建的、村社的土地所有制，抢占大片土地，发展出口型农业，把小农捆在垄断组织的经济网络之中；他们修建港口、公路、铁路、市政工程，设立银行、贸易公司，开办加工工厂和矿山。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垄断超额利润所驱使，是以千百万非洲人的赤贫、破产、饥饿和死亡为代价的。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促使非洲旧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推动商品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这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局部地区已经开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继续。

垄断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要把非洲变成资本主义，而是将其变成殖民地社会，因此他们通过垄断信贷和资金，控制市场和价格，掌握技术和设备，以及交通运输，竭力限制、阻挠和打击非洲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加纳民族采金业的一波三折，塞内加尔 500 个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非洲人团体的衰落，埃及棉纺织业的马鞍形发展，都是明证。但是，垄断资本又不可能绝对地和长时期地阻挠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经历了帝国主义占领初期的打击之后，民族工商业依然艰难而缓慢地有所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为之提供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机会。

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初步变化，非洲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封建统治阶级、酋长等等绝大多数投向了帝国主义，成为外国殖民者的附庸，即所谓“效忠型酋长”。在出口型农业发达的地区，村社开始缓慢瓦解，村社社员向两极分化，或者成为小农和富农，或者变成雇工和佃农。在一些国家，奴隶制虽已宣布废除，但奴隶依然存在，数量大大减少了。在白人种植园和农场劳动的非洲人，名为“自由人”，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城镇在本时期内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港口城镇逐渐变为经济中心。在城镇中，正在出现或形成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

Margery Perham, Lugard, *The Years of Authority, 1898—1945* (《当权年代的卢加德》), London 1960, p.469.

Adu Boahen, *Ghana, Evolution in Ninetie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加纳：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演进》), Longman 1975, pp.90-91.

子阶层。随着垄断资本开办的港口、铁路、市政工程、加工厂和矿山的发展，在非洲许多国家开始出现第一代土著产业工人。由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依然严重存在，北非民族资产阶级和南、北非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多，力量较强，而在非洲内陆的许多国家则几乎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的地区甚至尚未受到殖民侵略的影响。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应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加以具体考察。

五

非洲近代文化可以分三方面来考察。

第一，伊斯兰教继续向撒哈拉以南扩展，特别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圣战，不仅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且伊斯兰教的习俗、法规在许多西非、中非国家得到普及。在豪萨圣战中开始形成的阿拉伯——豪萨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豪萨文化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的产物。北非阿拉伯国家仍然受到伊斯兰传统思想的禁锢，文学上墨守成规，摹仿古文，以韵文为佳作，内容贫乏，缺乏生气。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基督教向东方的渗透以及阿拉伯国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革新和论争。这一方面表现为苏菲派、卡迪里亚派、提江尼亚派等激进派别的活跃，另一方面表现为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

第二，在殖民主义入侵以前的黑人国家中，黑人文化继续沿着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雕塑、音乐、舞蹈、口头文学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许多艺术品栩栩如生。在受到殖民侵略的地区，民间口头文学反映了非洲人民对殖民侵略和黑奴贸易的憎恨。近代非洲黑人文化，特别是音乐、舞蹈、民间文学，对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19 世纪初叶以降，由于民族的危亡、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影响，在许多非洲国家先后兴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反对专制，主张改革；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各个民族（或种族）互相平等。这个时期的文学题材扩大了，其内容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民族的感情和作家的亲身感受，吹起了反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

悠久的历史，从 16 世纪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殖民者东侵以后，传统的海上和陆上交通贸易通道遭到破坏，新的海上交通和贸易被欧洲人所控制，过去那种繁荣的直接海上贸易为欧洲商人充当中介的间接贸易所代替。古代独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官方关系也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非洲殖民政府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但是，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不但未曾中断，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反殖反帝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激励、互相支持，成为近代中非人民友谊的鲜明特点。中国人民希望非洲人民早日强盛起来。早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著名学者魏源就曾预言：“焉知异日（非洲）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这一期待正在和将要成为现实。

第一章 黑奴贸易的盛行

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在古代文明发展的多极世界中，非洲占有一席之地。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埃及古代文明。北非沿海曾经是地中海古代文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在北非、东非沿海及西苏丹等地的传播，使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在广大撒哈拉以南地区，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黑人文化。到16世纪以前，非洲跟欧亚大陆一样，已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非洲社会将循着自己的轨迹向前演化发展。

在古代和中世纪，黑人就经由撒哈拉商道、尼罗河及印度洋贩卖到南欧、阿拉伯世界、波斯、南亚等地。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太低，奴隶买卖是普遍现象，而不是黑人所特有的，也有白人被卖给黑人为奴。

但是，近代殖民主义的入侵打乱了非洲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黑奴贸易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被贩卖到美洲以及印度洋、亚洲由殖民者开办的种植园和矿井中工作，另一些黑人在捕奴、掠奴战争及贩运途中死去。非洲人民及其社会经济生活受到空前浩劫。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万恶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却随着贩卖和奴役非洲黑人而兴盛起来。马克思曾指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后来，黑奴贸易以及美洲的黑人奴隶制又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沾满了非洲人民的鲜血。

黑奴贸易大约经历了四个世纪。除奥地利、波兰和俄国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先后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综观黑奴贸易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为第一时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为第二时期，由于美洲种植园的发展，黑奴贸易在这一时期走向高潮；1807—1808年英、美两国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法案以后，黑奴贸易进入第三时期。这时奴隶贸易在法律上已被禁止，但黑奴走私贸易却兴盛起来。直至1890年7月布鲁塞尔会议作出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决议，黑奴贸易才算正式终止。

如果按照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决定的不同贸易性质来划分，那末整个黑奴贸易史也可分成三个阶段：15至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封建王室及随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以特许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黑奴贸易实行的是垄断贸易；18世纪，工业资本冲破了商业资本的垄断，黑奴贸易进入自由贸易阶段；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近代大工业的出现而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贸易，19世纪黑奴走私贸易盛行。

本章叙述16世纪至19世纪初300年间黑奴贸易的盛行，及其对世界和非洲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上半叶的黑奴贸易

1441年，由安陶·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陶率领的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沿海劫掠了10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是为黑奴贸易的开始。在15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从西非沿海贩运黑奴去本国充当家务

和农业劳动力，或贩运至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等大西洋岛屿新辟的甘蔗种植园中工作，每年贩奴大约 500—1000 名。但是，直到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西非的黑奴贸易，其价值远远赶不上黄金、象牙、胡椒等非洲产品的贸易。

1494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的托德西拉斯条约是列强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它确定以佛得角以西 370 里格为西、葡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两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以西经 46 度为界。从此，非洲、亚洲及巴西归属葡萄牙，美洲其他地区归属西班牙。

16 世纪，西班牙人在向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大陆进行扩张掠夺的过程中，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并企图奴役印第安人，但没有成功。西班牙人发现，印第安人不适宜于繁重的田间劳动，一个黑人奴隶顶得上四个印第安人。为了满足那里发展热带作物种植园及开发矿藏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决定从非洲运进黑人。1501 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到 10 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就从葡萄牙运进了第一批黑奴。这是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滥觞，也是美洲实行黑人奴隶制的开端。1518 年，第一艘来自非洲的贩奴船到达西印度，开始了非洲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黑奴贸易。到 1540 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每年运进的黑奴可能已达 1 万人。

16 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的贩奴活动主要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上几内亚，即从佛得角群岛到塞拉利昂沿海。佛得角群岛的最大岛屿圣地亚哥岛曾经是经营上几内亚贸易的中心。一些原在佛得角群岛定居的欧洲人陆续移居到上几内亚沿海，甚至溯冈比亚河而上，在这一带建立了许多小据点，从事贩奴及其他商业活动。另一个是刚果河口及其以南地区。16 世纪初，不仅葡萄牙商人，而且应刚果国王阿方索之邀派去的葡萄牙传教士、教师、工匠（裁缝、制鞋匠、泥瓦匠、制砖工）等，都以帮助刚果发展经济为名而行贩奴活动之实。到 1526 年，刚果国内局势变得很糟，以至阿方索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诉说：“这个国家每个角落都有许多商人。他们将毁灭这个国家。人们每天在遭受奴役和劫掠，甚至贵族和王族成员也不能幸免。”

圣多美岛在 16 世纪成为几内亚湾及刚果至安哥拉沿海的贩奴基地。1493 年，欧洲人开始在该岛定居；1499 年，建立了第一个甘蔗种植园。16 世纪上半叶，这里成为欧洲蔗糖的主要来源。16 世纪 20 年代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葡萄牙商人深入圣萨尔瓦多内地，可能远至扎伊尔河上的马莱博湖及在南方的恩东戈，从事贩奴活动。从贝宁湾、刚果、安哥拉等地运来的黑

Philip D.Curtin & Steven Feierman etc., *African History* (《非洲史》), London 1978, p.217.

League (英文), 葡文为 lé gua. 葡制 1 里格等于 6000 米; 用于航海中计程为 1 里格 (Lé gua Marítima) 等于 5557 米。

Elizabeth Donnan ed.,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Slave Trade to America* (《美洲奴隶贸易历史文件》), Washington 1930, vol.I, p.17.

Jan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萨瓦纳诸王国》),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52.

Philip D.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大西洋奴隶贸易》),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p.115.

即斯坦利湖。

奴，或留在当地种植园工作，或被转运去黄金海岸、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葡萄牙本土，16世纪30年代开始又直接转运去美洲，16世纪中叶成为非洲向美洲贩运黑奴的主要转运站。圣多美岛在1530—1560年间达到繁荣的顶点，是当时葡萄牙主要的海外领地之一。奴隶和甘蔗是其两大财富。柯廷引用N·迪尔的估计数认为，在整个黑奴贸易期间，圣多美运进了10万名奴隶。

1576年葡萄牙人在罗安达湾建立了圣米格尔堡作为基地，从此刚果河口以南的黑奴直接从这里贩运去美洲，而不再经由圣多美岛转运。这里逐步发展成为安哥拉和刚果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

到16世纪最后25年，从非洲直接向西印度诸岛及美洲大陆输出奴隶的南大西洋贸易体系已经确立起来。向欧洲及大西洋诸岛（马德拉、加那利和佛得角诸群岛）输出的奴隶仅占非洲输出总数的17%。1600年以后输往欧洲的奴隶，大部分也是转运去西印度的。同时，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美洲奴隶来源从西非迅速转向刚果安哥拉地区。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值得提及：第一，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面临巴西的竞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逐步衰落，这意味着几内亚湾本身对刚果安哥拉奴隶的需求减少了；第二，从17世纪初起，葡萄牙人开始在罗安达内地诉诸军事行动，或通过直接掠夺，或通过同当地非洲人的贸易而获得了新的奴隶来源。但是，直至17世纪中叶，美洲对非洲黑奴劳动力的需求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贩奴的数量毕竟有限。

二、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黑奴贸易兴盛的原因

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美洲的直接奴隶制曾经是欧洲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17世纪中叶起，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例如，咖啡成为主要饮料、蔗糖消耗量激增等），对热带产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西印度及美洲大陆生产热带产品的奴隶种植园获得巨大发展。这成为黑奴贸易兴盛的原因。

1625年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巴巴多斯，种植烟草、棉花、蓝靛等作物。1641年首次引种甘蔗，巴巴多斯因而被称为“西印度糖岛之母”。这里运进黑奴数量便由此成倍增长。以后，甘蔗种植迅速推广到背风群岛及牙买加、安提瓜等岛屿。在甘蔗引进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后的二十多年，蔗糖占到伦敦从殖民地种植园进口总值的将近一半，超过了烟草。17世纪末18世纪初，牙买加种植园的发展逐渐取代巴巴多斯的地位，其运进黑奴的数量也超过巴巴多斯，奴隶与白人的比例高达10比1。在法属西印度，1635年瓜德罗普岛先引种烟草，17世纪中叶以后又陆续引进甘蔗、咖啡等热带作物。17世纪末，种植园奴隶制已经成为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基础。因此，仅在17世纪后半叶的50年间，非洲大西洋沿岸卖给欧洲人的奴隶数量就超过以前200年的总

Curtin, op.cit., p.20.

Curtin, op.cit., p.116.

K.G.Davis,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皇家非洲公司》), London 1957, p.15.

Daniel P.Mannix, Black Cargoes,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518-1865 (《黑色船货：大西洋奴隶贸易史》), New York 1962, p.52.

和。18世纪是西印度的繁荣年代，也是种植园奴隶制发展的黄金时代。西印度成为欧洲蔗糖的主要供应地以及欧洲列强重要的海外经济支柱。

北美在1619年运进第一批黑奴，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北美的黑人奴隶制没有发展起来。其原因是种植园经济发展缓慢，而且最初的奴役对象主要是贫穷的白人契约奴，直至1661年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才率先通过法案，确定黑人是终身奴隶。到18世纪，英国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大大促进了奴隶贸易，使饲养黑人成为各蓄奴州的主要事业。18世纪后半叶及19世纪，由工业革命引起的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对美国棉花的需求量急剧增长，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迅速从沿海低地扩展到红壤丘陵区，然后发展到亚拉巴马黑土带，并越过密西西比河谷直到得克萨斯。此时，奴隶种植园的重心便逐渐由西印度转移到北美大陆，美国成了黑奴的主要进口国。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奴隶制的发展还成为19世纪黑奴走私贸易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黑奴贸易兴盛的原因，尚有两点需要提及：

第一，美洲的种植园奴隶制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状态中，奴隶才会被大量用于生产领域，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反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这种奴隶制就带有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古代东方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家长奴隶制（又译家庭奴隶制）就是这样。而美洲的种植园奴隶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发达的奴隶制。它不是同一般的商品经济相联系，而是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使它们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因此，它必然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才得以生存。就美洲种植园的经济作物而言，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因此，种植园必须不断向外发展，不断开垦新的肥沃土地，奴隶制才有生命力。如前所述，17世纪中叶以来，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奴隶制正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地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它们也就需要源源不断地运进黑奴，增加劳动力供应。

第二，除了种植园不断扩大更新的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奴隶死亡率太高，需要不断补充。美洲种植园奴隶制既然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意味着在奴隶制的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资本由于无限追逐利润的需要，对劳动者的奴役不仅突破了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肉体极限。经济利益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有些地方，黑人从事过度劳动只要七年就耗尽了生命。也就是说，每隔七年黑人劳动力就得更新一次。而且，由于奴隶价格低廉，农场主宁肯从外面购买奴隶，也不愿让奴隶生儿育女、实现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很多农场主坦率地承认：“购买比繁殖更便宜。”所以种植园中儿童很少，奴隶死亡率往往超过出生率。圣文森特岛有一年黑人出生2656人，而死亡4205人。因此，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奴隶制度的变形：非洲奴隶制度史》), Cambridge 1983, p.46.

Mannix, *op.cit.*, p.52.

度农业，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英国废奴主义者威廉·福克斯在 1792 年向英国人民揭露，在每一磅蔗糖中，他们吃下去两盎司人肉。

以上就是导致非洲源源不断地向美洲输送劳动力，亦即 17 世纪中叶以后黑奴贸易兴盛的原因。

三、大国间的争斗

在整个黑奴贸易时期，大国之间为争夺贩奴垄断权及制海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6 世纪葡萄牙垄断了黑奴贸易。16 世纪末荷兰崛起，击溃葡萄牙，主宰了海上贸易，成为 17 世纪最大的贩奴国。17 世纪中叶是荷兰的极盛时期，这时又开始了英荷间的竞争。18 世纪英国成为海上贸易的霸主，也是黑奴贸易的罪魁。大国之间围绕黑奴贸易的斗争以及大国霸权地位的更替，不只简单地反映了它们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反映。

16—17 世纪，欧洲处于重商主义的时代。商业资本跟国家政权密切结合，垄断了各国对外贸易。这时，黑奴贸易是在欧洲各王室的特许下进行的。

16 世纪西班牙独霸西印度群岛，向美洲贩运奴隶是由西班牙王室向商人颁发特许状的方式进行的。1513 年起，出售进口黑人许可证成为西班牙王室收入的一个来源。当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准许交付 2 达卡 金币运进一名黑人。1528 年，西班牙国王正式颁发被称为“阿西恩托”的著名的贩奴特许状。以后两个多世纪内，这份贩奴特许状一直成为欧洲各国历次战争的争夺目标。

这时，非洲奴隶的输出基本上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的。里斯本是当时世界贩卖黑奴的中心。王室实行承包制。第一个承包合同于 1469 年由国王批给了费尔南·戈麦斯，让他垄断几内亚贸易。另外，国王还发放一种专门的贩奴执照，数量极大。1530 年起葡萄牙先遇到法国的竞争，1553 年开始又遇到英国的竞争。法国的兴趣主要在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1554 年 10 月，英国船只第二次去几内亚航行就运回了一些高大强壮的黑奴。这大概是英国在西非贩奴最早的记录。随后是臭名昭著的约翰·霍金斯在 60 年代三次去几内亚的贩奴活动。葡萄牙为维护其贸易垄断地位，一方面派出舰队去保护本国商船，大多数葡萄牙商船也都有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刚果和安哥拉等沿海设立商站、修筑堡垒。

1580—1640 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给葡萄牙在西非的贸易垄断地位以致命打击。庞大的殖民帝国被其他国家一片片肢解。16 世纪末崛起的荷兰成为葡萄牙强劲的对手。它专门经营海上转运贸易，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177 页。

Ducat，中世纪欧洲国家流通的一种金币单位。

Assiento，即供货合同。关于该名称起用的年代，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一些混乱的说法。一说 1513 年，一说 1518 年，还有更早的说法。拙作《奴隶贸易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世界历史》1983 年第 1 期）也曾沿用“BlackCargoes”一书的说法，以讹传讹。事实上，该名称是 1528 年才正式开始使用的。参见 UN-ESCO，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Paris 1979，p.89。（中译本此处译文不确）。另 Donnan，op.cit.，vol.I，p.17，note77 可资佐证。

E.Donnan，op.cit.，I，p.9.

葡萄牙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敌不过蓬勃兴起的荷兰商业资本的竞争。在经营体制上，葡萄牙由王室垄断、私人承包经营的方式也不是荷兰得到王室支持的合股公司的对手。荷兰在 1621 年组建了西印度公司。这个公司获准垄断全非洲的贸易以及开发新世界荷属领地的权利。1634 年荷兰占领了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从此成为向美洲转运黑奴的据点。1640 年葡萄牙恢复独立后，荷兰的大量非法输入取代了“阿西恩托”的合法贸易，成为美洲奴隶供应的主要来源。它在西非沿海建立或夺取据点，排挤葡萄牙势力。在其全盛时期，它控制了西非沿海 18 个贸易据点。1637 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埃尔米纳，并以此为总部所在地，垄断西非的黑奴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1642 年，荷兰夺取了葡萄牙在黄金海岸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希姆。圣多美岛也落入荷兰手中。从此，葡萄牙主宰西非沿海的时代结束了。

葡萄牙势力被逐出西非后便转向赤道以南，以卡奔达、罗安达、本格拉和莫桑比克等为据点，专门经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与巴西之间的贩奴活动。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贩奴大国。

荷兰在 17 世纪中叶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其贸易投资超过英国的 15 倍，拥有的船只超过英国的 10 倍，商船总吨位占世界 3/4，造船技术和能力居世界第一。它是当时最大的贩奴国，向西印度源源不断地供应黑奴劳动力，成为西印度自 17 世纪中叶起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

除荷兰外，欧洲各国商业资本也纷纷组建得到王室特许的股份公司，从事贩奴及其他商业活动。

英国在 1618 年特许组成第一个从事几内亚贸易的股份公司——伦敦对非贸易探险者公司。1660 年成立英国皇家对非贸易探险者公司。1663 年修改后的特许状第一次提到黑奴贸易作为这家公司合法活动的一部分。这一年它与阿西恩托代理商签订契约，每年提供 3500 名奴隶。但是，直到 1672 年皇家非洲公司成立后，英国才大规模经营奴隶贸易。皇家非洲公司是英国重商主义时期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对非贸易的合股垄断公司，也是拥有最多特权和专利权的公司。该公司获准垄断从布朗角到好望角之间的土地和贸易一千年（到 2672 年！）。公司有权在非洲建立和管理堡垒、商站和种植园；决定与异教国家的和战；征集军队；实施戒严令。公司提到的目标是黄金、白银和黑人。它在西非的活动以黄金海岸为中心，先后在这一带建立了 17 个居留地。1664 年英国从瑞典人手中夺取海岸角后，将它建成为当时仅次于荷属埃尔米纳的西非最强大、守备最好的欧洲人据点，成为皇家非洲公司统率黄金海岸贸易的首府、总代理商驻地。据估计，公司繁荣的头 40 年间（1672—1713 年），派出 500 艘以上的船只运载了价值 150 万英镑的货物去非洲，贩卖了 10 万名奴隶去西印度种植园，铸造了 50 万“几尼”的金币。

古柏尔等：《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上卷第 1 册，新中国书局 1949 年，第 24 页。

E.Donnan, op.cit., vol.I, p.88.

Davies, op.cit., p.43.

Davies, op.cit., p.98.

Davies, op.cit., p.245.然而该书第 247—248 页表仅列出 16 个居留地名称。

Davies, op.cit., pp.345-346。“几尼”（Guineas）是英王查理用西非黄金铸造的一种硬币，与英镑等值，但其含金量极纯，以至于 1694 年其价值竟等于 30 先令白银，最后固定为 21 先令。参阅 Mannix, op.cit.,

17 世纪是法国奴隶贸易的形成期。法国第一次有记载的对西印度的贩奴活动是 1643 年。17 世纪后半叶特许公司才被法国广泛用作组织远洋贸易的方式。1664 年成立的西印度公司、1672 年成立的第一塞内加尔公司都是短命的。后来在法国奴隶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三家公司：1685 年成立的几内亚公司，垄断塞内加尔河以南地区的贸易；1696 年建立的皇家塞内加尔公司，垄断塞内加尔地区的贸易；1698 年成立的皇家圣多明各公司，在非洲沿海没有专利权，但有权在法属西印度出售奴隶。尽管 17 世纪法国的贩奴活动规模还不小，但却是 18 世纪大规模参与奴隶贸易的先声。

从 1640 年起，除荷、英、法、葡诸国之外，勃兰登堡人、丹麦人、瑞典人、热那亚人甚至波罗的海东岸的库兰人都参与了贩奴活动。其中有些还组织了特许公司，如丹麦于 1625 年成立西印度公司（大概在 1642 年才出现在西非海岸），瑞典于 1647 年组建瑞典非洲公司，勃兰登堡于 1682—1683 年组建埃姆登公司等。这些公司在西非沿海设立了少数商站，但影响都不大，未能对荷兰及随后英国的霸权构成实际的威胁。

严格说来，荷兰称霸海上的鼎盛时代只是 17 世纪中叶前后的半个多世纪。它毕竟只是一个专门经营转运贸易、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必然会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而衰落下去。而英国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品更具竞争能力，而且由于生产发展而使国力增强。因此，英国成为荷兰海上霸权的有力竞争者。1651 年 8 月，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英国的一切进口商品只准直接来自商品生产国，而且只能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船只装运。这不啻是对专营转运贸易的荷兰的一个沉重打击。英荷间的矛盾发展到武装对抗，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1652—1654、1665—1667、1672—1674）。结果，英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击败荷兰而成为主要的海上强国。

17 世纪末开始的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过程，不仅表现为英国取代荷兰而成为主要的海上贸易强国，也反映在特许公司垄断贸易的衰落。如前所述，特许公司在 17 世纪欧洲各国对外贸易中起过突出的作用。这个时期，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手段。但到后期，它们遭到本国各种利益集团的责难，以及个体商人（包括无执照经营者、走私船等）愈来愈激烈的竞争。英国政府不得不于 1698 年宣布对外贸易向所有英国商人开放，规定私商需交付 10% 的利润给皇家非洲公司，作为维护和警戒西非商站的费用。从此，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地位结束了。所以，英荷之间斗争的真正胜利者是英国以工业资本为后盾的个体商人。

在 18 世纪，奴隶贸易“成为欧洲各国赖以存在的殖民地工业和商业的基础。它支配着西欧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关系；它是本世纪引起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的内政方面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特许公司逐步衰落并终于解体，个体商人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贩奴者。

荷兰的霸权地位衰落后，它仍在进行一定规模的贩奴活动，也是由个体商人经营的。葡萄牙（包括巴西）仍是重要的贩奴国家，它主要经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到巴西的贩奴活动。英法成为主要的贩奴国家。A.G.霍普金斯估

计 18 世纪英国的船只贩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总数的 2/3 ,法国船只贩运了 1/5 。

在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衰落及个体商人势力的增长,集中反映于伦敦和利物浦在奴隶贸易中地位的倒置上。作为公司总部所在地的伦敦在对外贸易中的领先地位急剧衰落。利物浦以工场手工业及个体商人的发展为后盾,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贩奴港。它靠近工业城镇,邻近的曼彻斯特、伯明翰和约克郡西区的工业品可以通过水路很方便地运到利物浦码头,因此它从事海外贸易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1750 年,利物浦的贩奴船已占英国贩奴船总数的一半以上。1795—1804 年的 10 年间,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三个英国主要贩奴港中,利物浦的贩奴船和贩奴数量都占 85%以上。

法国在 1713 年前贩奴活动主要由塞内加尔公司和几内亚公司经营,不许个体商人组织贩奴远航。1713 年后,法国个体商人大规模参与贩奴活动。1716 年法国开始废除公司垄断,开放卢昂、拉罗谢尔、波尔多和南特四个港口,允许个体商人从事奴隶贸易。南特经历了同利物浦类似的发展过程,成为法国最大的贩奴港。据认为,法国在 1713 年以后的 80 年内派出了 3000 多艘船只去非洲沿海,从佛得角到安哥拉,从莫桑比克到德尔加多角,购买了 125 万名以上的奴隶,其中 100 万转运到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等地,其余的死于贩运途中。南特至少占法国 18 世纪贩奴总数的一半。

四、贩奴体制、商道和航线

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沿海的贩奴活动,大体上是从塞内冈比亚(最早是葡萄牙人以阿尔金岛为据点的贩奴活动,但为时较短,数量不大,没有成为奴隶贸易重要地区)向南向东发展到整个西非沿海,再向南到刚果、安哥拉地区,最后发展到东非。奴隶都由内地商人贩运至沿海,经由沿海商人转卖给欧美贩奴商。奴隶贸易期间,在内地原有商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沿海通向内地的贩奴商道。沿海各地的贩奴体制不同,主要有三类:(1)殖民者直接掠夺的体制,如葡萄牙人在安哥拉;(2)沿海中央集权国家由王室垄断贸易的体制,如黄金海岸、贝宁湾;(3)商人经营的体制,其典型如西非的比夫拉湾、东非阿拉伯人经营的贩奴活动。

塞内冈比亚地区在黑奴贸易的第一个世纪里特别重要。1600 年以前非洲输出的奴隶大约 1/3 来自这里。16 世纪葡萄牙人在冈比亚河及沿海建立了

A.G.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5, p.94. 各种估计数字出入很大。柯廷提供的数字表明,1701—1810 年间运进美洲的奴隶数为 6051700 人,如果加上贩运途中 15% 的死亡率,则非洲输出数约为 700 万人。其中英国从非洲输出 2466800 人,占 35.24%;法国 969100 人,占 13.84%;葡萄牙 2025500 人,占 28.94%。参阅 P.D.Curtin, *op.cit.*, pp. 211, 268.

Hopkins, *op.cit.*, p.95.

Donnan, *op.cit.*, p.623. 这三个城市的贩奴船及贩奴总数分别为 1283 艘、380893 人,其中伦敦 155 艘,46405 人;布里斯托尔 29 艘,10718 人;利物浦 1099 艘,323770 人。

Robert Louis Stein, *The French Slave Trade in the 18th Century* (《18 世纪法国奴隶贸易》),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reface, p.46. 这里估计的贩奴人数与前引柯廷的数字比较接近。

Hopkins, *op.cit.*, p.96.

Curtin, *op.cit.*, p.227.

许多贩奴据点，如吕菲斯克、波尔图达耳、若阿勒、卡旺等。另外，佛得角群岛的一些葡萄牙人来此沿海定居经商，并跟当地妇女结婚。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在沿海及冈比亚河已形成一个专事商业活动的非—葡混血种社会。内地从尼日尔河上游通向冈比亚河口的商道，在 17—18 世纪是由贾汉凯人控制的。17 世纪中叶，欧洲商人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甚至库兰人在这个地区展开激烈竞争。到 17 世纪末形势渐趋明朗，英国人从詹姆斯岛控制了冈比亚河的贸易，法国人从圣路易岛控制了塞内加尔河的贸易。在圣路易，一个法—非混血种社会逐步形成。到 18 世纪后半叶，法国在塞内加尔河上的贸易全部落入圣路易人之手。

1600 年以后，塞内冈比亚在奴隶贸易中的地位下降，但输出奴隶的绝对数量在 18 世纪初达到高峰。这跟富塔—贾隆高原弗拉尼人的伊斯兰圣战有关（参见本卷第八章）。

塞内冈比亚以南是现在的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共和国和塞拉利昂。这里在葡萄牙人垄断奴隶贸易时代曾经是奴隶输出的重要地区之一，16 世纪或许占非洲海上奴隶输出量的 1/3，但很快衰落了。1720—1740 年代及 1780—1790 年代富塔—贾隆高原的弗拉尼人圣战期间，部分战俘作为奴隶从这里输出。但整个来说，18 世纪这里的奴隶输出量也许不到非洲奴隶输出总数的 5%，还不及塞内冈比亚。

或许由于这个地区奴隶输出不大重要，因而并未引起葡萄牙王室以及后来欧洲各国特许公司的注意。这一带的贩奴活动主要是由私商进行的。欧洲私商在这一带沿海定居，跟当地贵族联姻。其混血种的子女成为富商或酋长，甚至一身二任。18 世纪非—葡及非—英混血种人在这里的政界和商界中居于统治地位。这里海岸线曲折，港湾及小岛多，便于隐蔽，因此是 19 世纪奴隶走私贸易的重要地区。

塞拉利昂以东是向风海岸。这里海岸线平直，缺乏天然良港。欧洲人没有在这一带沿海定居。贩运奴隶主要靠许多小港及泊船点进行船上贸易。1770 年代一份法国材料指出，这里至少有 35 个停靠港，其中没有一个每年供应奴隶超过 500 人的。由于沟通阿肯金矿区到杰内的南北商道在 17—18 世纪已向南延伸到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西北部的森林地带，并进一步通至沿海，因此，尼日尔河及富塔—贾隆高原等内地的奴隶也可经由这条商道在向风海岸输出。朱拉人控制了这条商道沿线的许多城镇。

1600 年以后西非黑奴贸易主要转向贝宁湾及其以东地区。黄金海岸和贝宁湾（奴隶海岸）是 17—18 世纪重要的奴隶输出地区，也是欧洲人贸易据点最密集的地区。葡萄牙人早在 1482 年就在圣乔治·达米纳（即后来的埃尔米纳）建立了第一个堡垒。但 15 世纪后半叶及 16 世纪葡萄牙人在黄金海岸主要掠取黄金，而很少贩卖奴隶，甚至曾从贝宁湾和刚果运进奴隶来换取黄金。但到 17 世纪中叶，奴隶输出日显重要，到 1720 年代有时甚至运进黄金来换取奴隶。17 世纪起，荷兰、英国甚至丹麦、瑞典和勃兰登堡等都步葡萄牙的后尘，在这一带建立堡垒和商站。到 18 世纪，黄金海岸沿海已有 25 个石头

贾汉凯人（jahanke），法文作 Diakhanké，因此又译迪亚坎凯人。他们的起源参见本书古代卷第十四章《古代非洲的内陆交通与文化交流》。

Curtin, op.cit., pp.231-232.

Curtin, op.cit., p.226. 一说是 1783 年的材料，参见 Curtin & Feierman etc., op.cit., p.233.

构筑的堡垒，每个间隔平均只有 10 英里，还有许多设防的和不设防的商站。18 世纪后半叶，在西非沿海及各条河流上陆续出现无数由小代理商主持的奴隶屯集站经营奴隶贸易，欧洲人建立的永久性贸易据点（堡垒和商站）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直到 18 世纪末欧洲人在西非沿海尚有 40 个商站，其中 30 个在黄金海岸。不过，欧洲商人在黄金海岸和贝宁湾一带不直接掠取奴隶，而是按照当地官员制定的条件进行贸易。内地的穆斯林商人将奴隶及其他商品通过沃尔特河或陆路商道运到近海地区，一般以奥约、阿散蒂及达荷美北部的市场为限，在那里出售给沿海商人，再购买欧洲舶来品去内地。同欧洲人的直接贸易是由沿海商人控制的。17—19 世纪，这一带出现过一系列中央集权的国家，如阿克瓦穆、胡埃达（维达）、阿拉达、达荷美、奥约、芳蒂等，它们都热衷于由国家管理贸易。各国之间为争夺贸易垄断权、控制商道及沿海港口展开激烈的斗争。18 世纪在黄金海岸内地崛起的阿散蒂王国与沿海芳蒂国家在对欧洲人贸易上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而且这种斗争为英国殖民者所利用。

贝宁湾以东的比夫拉湾，包括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克罗斯河流域，16 世纪初开始输出少量奴隶，18 世纪奴隶贸易高潮时成为主要的奴隶输出地区。由于三角洲地区多沼泽地及不利于健康的气候，欧洲人没有建立固定的贸易据点，而是采用船上贸易的方式，沿海还发展起奴隶屯集站进行贩奴活动。阿罗人（而不像西非其他内地那样是伊斯兰商人）以宗教迷信手段控制了内地伊博和伊比比奥大部分地方的贩奴活动。在这些地方，政治因素如战争、纳贡和讨伐性的劫掠在获取奴隶中的作用不如其他地区那么重要，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村落各自为政。沿海一些村落由于商业繁荣而发展成为城邦。这些地方的贸易不是由政府控制，反之，一些城邦如卡拉巴尔、博尼、阿博等的政治经济是由商人寡头主宰的。沿海商人驾着独木舟（大独木舟可载 120 人）来到内地市场贩运奴隶，并出售欧洲舶来品。阿博和伊达两个港口控制了尼日尔河上的贸易。

从卡奔达到安哥拉是奴隶输出的主要地区之一。据洛夫乔伊估计，1600—1800 年间该地区输出奴隶数量占同期大西洋沿岸奴隶输出总数的 1/4 以上，18 世纪后期占 1/3，有时高达 2/5。19 世纪，它仍是奴隶输出的重要地区。虽然这里的海岸线绵延 1000 多英里，但贩奴活动却集中在少数港口。大约 3/4 的奴隶由北起卡奔达南至罗安达之间 300 英里左右的地区输出。这里主要有三条贩奴商道通向内地：北路从卡奔达、罗安果、马莱博湖溯刚果河而上伸向东北方内地，在 1780 年代已到达乌班吉河下游；中路以罗安达和安布里什为出海口；南路以本格拉为出海口。中路和南路商道都通向当时内地主要的奴隶输出国卢巴、隆达、卡曾贝、洛兹等王国。这些王国位于开赛、宽扎、卢阿普拉诸河流域，包括今安哥拉东部、扎伊尔南部、赞比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 18 世纪末，内地王国已同时向东西海岸输送奴隶，形成

Cutrin & Feierman etc., op.cit., p.235.

Mannix op.cit., p.58.一说这 40 个商站中英国占 14 个，法国 3 个，荷兰 15 个，葡萄牙 4 个，丹麦 4 个。

参见 Donnan, op.cit., vol.2, Preface, note82.

伊博（Ebo），又作伊格博（Egbo）。

Lovejoy, op.cit., p.52.

Curtin, op.cit., pp.260-262.

了贯通非洲大陆的商业网。欧洲人的竞争导致他们直接干预当地政治，其卷入的程度比西非深得多。葡萄牙商人及其代理人庞贝罗曾组织武装捕奴队，直接去内地捕掠奴隶。另外，17世纪后葡萄牙军队对内地的直接军事行动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在非洲人方面，不管是沿海还是内地，奴隶贸易是在王室或政府官员控制下进行的。各地的贡赋是王室获取奴隶的重要来源。一些奴隶以贡赋形式汇集到奴隶市场上来。贩奴市场采用行政管理方式，甚至奴隶从一地贩运至另一地也通过行政系统进行。隆达的奴隶贸易中心就在王室所在地。有些王国还直接组织王室商队，由武装卫队护送进行贩奴活动。

在东非，欧洲人的贩奴活动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1644年葡萄牙人开始从莫桑比克贩运奴隶去巴西。此后，西印度和北美的船只也去马达加斯加和东非大陆沿海贩运奴隶。18世纪法国在印度洋的马斯克林群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给东非奴隶贸易以新的刺激。18世纪后期起，法国、葡萄牙在东非沿海的贩奴活动相当活跃。印度洋的法国贩奴商除了供应马斯克林群岛之外，尚有大约5—10%的奴隶运往大西洋。葡萄牙人将大批奴隶贩运去南美南部。1742—1806年间运进南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奴隶有40%来自非洲东南部。19世纪，葡萄牙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在东非的贩奴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桑给巴尔。阿拉伯商人控制了这里的奴隶市场和商道。这里的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阿拉伯商队深入到对岸大陆内地直至大湖地区。塔波拉和乌季季是内地的奴隶和象牙贸易中心。他们在内地掠取或购买奴隶和象牙后，让奴隶扛着象牙长途跋涉来到沿海市场，然后一起卖掉，因而有“黑象牙”（黑奴）和白象牙之称。另一个是莫桑比克地区。以莫桑比克港为中心，商道通向尼亚萨湖以南及奇尔瓦湖地区。这里专事内地贩奴活动的是瑶人，其活动范围包括南至赞比西河、西至尼亚萨湖、北至鲁伍马河的广大地区。

奴隶被装上贩奴船后，便开始了海上的航程。

按照习惯的说法，大西洋奴隶贸易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欧洲贩奴商从中获得三笔利润：欧洲开出的船只满载消费品来到非洲沿海，换取黑人，先赚得一笔利润，这是起程；然后贩奴船将黑人运到美洲，换取糖、棉花或其他热带产品，又赚得一笔利润，这是中程；最后，船只将美洲的热带产品运回欧洲出售，赚得第三笔利润，这是回程。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说的大西洋三角贸易。例如，艾里克·威廉斯就认为，在17—18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随着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也曾出现过本国与西印度地区之间的直接贸易，以本国的工业品直接换取殖民地的产品。但是这种贸易仅作为三角贸易的补充，从未取代过三角贸易”。但这种论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首先，大西洋贸易不能简单地主要归结为三角贸易。事实上，在三角贸易之外还存在着多种直接贸易的渠道。一种是欧非贸易。欧洲人除了贩运黑人去美洲之外，还在非洲掠取黄金、象牙、树胶、蜂蜜、胡椒、兽皮、棕榈油、红木等直接运回欧洲。17世纪末，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大约2/5的收入来

Curtin op.cit., pp.229-230.

即马拉维湖。

艾里克·威廉斯：前引书，第48页。

自出售奴隶以外的非洲产品。另一种是欧美间的直接贸易。后来这成为最繁忙的商道。例如，1789 年有 116 艘船离开英国港口驶往非洲，而至少有 449 艘船驶离英国港口去西印度。K·G·戴维斯认为，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经营着五条商道，完全意义上的三角贸易只是其中之一。1672—1713 年间公司有 500 艘以上的船去非洲，其中只有少部分从事完全意义上的三角贸易，而同期公司雇佣了 1250 艘船只经营西印度返回欧洲的直接贸易。法国的卢昂、勒阿弗尔、马赛和圣马洛等港口同加勒比地区都有相当规模的直接贸易。再一种是北美、西印度和巴西跟非洲的直接贸易。例如，1703—1709 年间，从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安提瓜开出 31 艘载运糖酒的船去边角堡，换取黑人之后返回西印度。18—19 世纪，葡萄牙人的贩奴活动主要是经营巴西与非洲沿海（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间的直接贸易。

大西洋三角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贩奴船的装备不能完全适应运载热带产品的需要；贩奴船到达美洲的时间不固定，并非刚好是收获季节；三角贸易航程时间过长，对它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从欧洲到加勒比海地区的直接贸易往返大约要六个月，而经营三角贸易却费时一年以上。

其次，除了传统含义上的大西洋三角贸易之外，18 世纪发展起另外两个三角贸易模式。

一个是从新英格兰出发的三角贸易模式。18 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商人开始贩奴活动。他们都是小商人，先运载新英格兰出产的松木和咸鱼等到西印度出售，换取糖浆，有时也带一些奴隶运回新英格兰。这样积累起一笔小小的资本后，便运载糖酒航行去非洲，换取奴隶，然后将奴隶转运到西印度出售，再购买糖浆运回新英格兰，加工制成更多的糖酒，用以购买更多的非洲奴隶。这样便形成了新英格兰—非洲—西印度—新英格兰的三角贸易航程。其运载的货物很简单，基本上是三种物品：糖酒、奴隶和糖浆。

另一个是法国在印度洋进行贩奴活动形成的三角贸易模式。18 世纪法国在印度洋的马斯克林群岛发展奴隶种植园，成为法国在西印度领地之外的又一个热带作物产地。另外，非洲西海岸运出的奴隶有时不能满足美洲的需要。因此，法国在东非开展贩奴活动，发展起法国—东非或西非—马斯克林群岛—法国的三角贸易航程，即从法国启程的船只运载消费品去西非或东非的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换取奴隶，然后将奴隶运至马斯克林群岛，再装运热带产品返回法国。此外，还存在马斯克林群岛与东非大陆间的直接贸易，将东非大陆的奴隶贩运至马斯克林群岛（参见本卷第二章）。印度洋三角贸易的规模虽然比大西洋贸易小得多，但却是 18 世纪法国贩奴活动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五、贩奴人数及非洲的人口损失

关于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奴的数量及由贩奴引起的非洲人口的损失，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估计历来出入很大。柯廷认为，关于运到美洲的黑奴数量，

Hopkins, op.cit., p.88.

Hopkins, op.cit., p.89.

Davies, op.cit., p.191.该书关于五条商道的论述见第 185—191 页。

Davies, op.cit., p.191.

历来的学者较多倾向于两种估计：一种是为我国学者熟知的由邓巴、杜波依斯、费奇、戴维逊等人主张的 1500 万左右，即 16 世纪 90 万，17 世纪 270 万，18 世纪 700 万，19 世纪 400 万，总和将近 1500 万。另一种估计是 2000 万，这同 A.G.霍普金斯的说法比较吻合。后者写道，大多数作者认为有 1500—2000 万非洲奴隶运到美洲，而非洲运出的有 1800—2400 万，其中的差额是贩运途中的损失。当然，也有些估计与此相去甚远。例如，皮埃尔·肖尼在 1964 年估计整个大西洋贸易贩奴数量是 800 万，大约只是传统估计数的一半。唐纳德·维德纳估计运进美洲的奴隶数量在 350—550 万之间。也有人认为 10—19 世纪间从黑非洲运到各接收地去的奴隶总数在 1500—3000 万之间。由于资料残缺，绝对数字恐怕永远无法搞清。

柯廷对贩奴人数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详尽的专题研究。他认为 1451—1870 年间从非洲运到美洲和欧洲的奴隶总数是 9566100 人。如果加上海运途中 15% 的损失率，则非洲运出的人数大约 1100 万。他是根据现有档案材料及各种估计推算出来的。但这个估计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第一，15 世纪后半叶及 16 世纪是葡萄牙垄断贸易时期，17 世纪荷兰成为最大的贩奴国，而控制海上贸易达两个半世纪的这两个国家却很少保存关于奴隶贸易的材料。第二，英国在 17 世纪上半叶对西非的贸易尽管得到皇室的全力支持，参与这种贸易的有特许公司、商人集团和个体商人，但自 1560 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在西非从事掠奴活动之后的一百年间，英国却很少有关于奴隶贸易的报导，早期的议会讨论记录和官方报告中也未提及奴隶贸易问题。但绝不能证明这时英国没有参与奴隶贸易，只是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第三，在整个奴隶贸易期间，自始至终存在走私贸易。有些时期走私贸易的数量很大。这当然是没有记载、查无实据的。因此柯廷的估计数可能偏低。

关于贩运途中的死亡率，一般估计是 15—25%。这只是指大西洋航运途中的损失。黑奴贸易在非洲造成的实际人口损失远不止此。造成人口损失还有许多因素。例如，因奴隶贸易引起的战争中伤亡的人数，在掠捕奴隶过程中伤亡的人数，因负伤或年老体虚而被遗弃致死的人数，从内地长途跋涉去沿海途中历尽艰辛而死的人数，囚禁在沿海商站或奴隶屯集站等待装运而死去的人数，等等。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生命损失更是无法计算的。杜波依斯估计每运到新世界一个奴隶要牺牲五个人，那末非洲的实际人口损失达 1 亿。利文斯敦估计要得到一个奴隶必须牺牲十人。杜加斯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人口 1.5 亿。1978 年在海地太子港召开的非洲奴隶贸易专家会议上，据一些与会者估计，如果把捕获奴隶时的死伤、经非洲各地陆运过程中的损失、漂洋过海时的死亡等因素都考虑进去，在四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可达 2.1 亿。

Roland Oliver & J.D.Fage,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简史》), London 1962, p.120.

Hopkins, op.cit., p.101.

Curtin, op.cit., p.12.

Donald Wiedner, History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撒哈拉以南非洲史》), New York 1962, p.67.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 213 页。

Curtin, op.cit., p.268.

杨人梗：《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运“黑奴”的罪行》，《光明日报》1963 年 10 月 9 日。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 213 页。

尽管各种估计有很大出入，然而一些学者承认，在奴隶贸易的 400 年间，非洲人口毫无增长。一位非洲学者对近四个世纪以来欧、亚、非三洲的人口变化作了如下估计（单位：百万人）：

	1650 年	1750 年	1850 年	1900 年
非洲	100	100	100	120
欧洲	103	144	274	423
亚洲	253	437	656	857

如果这个估计比较接近事实，那末可见，非洲在奴隶贸易期间人口一直停滞在 1 亿左右。直到奴隶贸易终止后的 1900 年，人口才增至 1.2 亿，尽管这时非洲黑人的医疗条件并无多大改善，黑人出生率和自然死亡率高的状况同以前也无明显变化。而在同时期，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分别增长了两倍多到三倍。因此，非洲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1650 年，欧、亚、非三洲人口约 4.6 亿，加上美洲及大洋洲的人口，估计世界总人口接近 5 亿，其中非洲人口占 1/5 左右。到 1900 年，欧亚非三洲人口约 14 亿，加上美洲及大洋洲的人口，估计世界总人口 15 亿左右，其中非洲人口仅占 1/12 或 1/13。1936 年出版的《法兰西百科全书》估计，20 世纪初非洲人口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1/13。两者的估计比较接近。

如果将这几百年间非洲与欧洲人口状况作一比较，那末在 1650 年前后，两洲人口相差无几。此后几百年间，欧洲人口增长至少受下列几种不利因素的制约：(1)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封建制度逐步衰落和崩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总之是欧洲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因此，欧洲各国的内外战争连年不断，因战争而伤亡的人数相当可观。(2)当时欧洲的医学并不发达，还不能抵御天花、鼠疫、霍乱等疫病的流传。史书上关于欧洲瘟疫流行的记载屡见不鲜，流行一次瘟疫的死亡人数总是数万以至十多万。17 世纪欧洲仅因得天花而丧生的就有 4000 万人。当时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不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高。(3)在贩卖非洲黑奴的同时，欧洲也大量向外殖民。大批欧洲人移居到美洲及大洋洲等地。尽管如此，在这期间，欧洲人口还是增长了三倍，而非洲人口则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强烈的反差，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奴隶贸易给非洲造成的人口损失何等惨重！

六、非洲人的反抗

应该说，黑人开始时是怀着善意、以友好的姿态、当然也是以新奇的目光来对待白人的。然而欧洲人对黑人却不怀好意，他们或则掠夺非洲的财物，如黄金、象牙等，或则对非洲人发动袭击，把他们杀死或劫掠为奴。这就导致非洲人的敌视态度。因此，欧洲人到非洲探险往往遭到土著人的袭击。第一批踏上西非土地的葡萄牙船长冈萨罗·迪·辛特拉，就在阿尔金岛附近被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欧洲如何使非洲变成不发达地区》，Washington 1974, p.97.

莫里斯·赫尔瓦斯：《法兰西百科全书》第 7 卷，1936 年。转引自让·徐雷-卡纳尔：《黑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第 148 页。

非洲人杀死。

据佩奇科报道，由于土著人的骚乱，欧洲人的船只往往不能到塞内冈比亚诸河上避难而失事。葡萄牙人建立的堆栈常常受到好战的部落居民的攻击。因此，葡萄牙人跟黑人的关系是导致在非洲沿海建立一系列堡垒的重要因素。这种堡垒建成城堡式样，驻有常备部队。但即使修筑了这样坚固的防御工事，几乎每个堡垒都未能免遭非洲人的围攻和袭击。例如，葡萄牙人1482年在圣乔治·达·米纳建成第一个堡垒后，1503年一些黑人部落就图谋攻击这个堡垒。阿克拉的堡垒在建成后不久，便于1576年被土著人摧毁。在1720年代，阿拉达和维达的商站受到洗劫和焚毁，堡垒也被围攻，于是欧洲贩奴商开始转向巴达格里，到1740年代在那里建成一个重要的奴隶市场。凯塔堡在1847年和1878年两次遭到土著人的围攻，有些堡垒被非洲人攻下并短期占领，有些商站特别是木质建筑被非洲人焚毁。特别是在17世纪下半叶，这类例子屡见不鲜。

一些非洲酋长和国王通过法令，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输出奴隶。例如，直至1670年，阿拉达国王仍然反对无限制地与欧洲人进行奴隶贸易。贝宁奥巴(国王)在1516年开始限制输出男性奴隶，后来这种限制扩大为禁止输出一切成年男性。这个禁令一直坚持到17世纪末。阿方索去世后，继任的刚果国王在16世纪中叶对葡萄牙商人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政策，规定葡商只能在姆宾达一个港口进行贸易；葡萄牙也被迫对从事走私贸易的圣多美居民采取一些限制措施。1548年，刚果国王逮捕了罗安达违反规定的一些葡萄牙人，并竭力禁止葡商深入内地。后来，刚果王国规定自由民不能被出售，并组成一个王室委员会进行检查。

17世纪中叶在荷兰取代葡萄牙海上霸权的斗争中，由于痛恨葡萄牙人的贩奴活动，西非及刚果、安哥拉地区非洲人往往站在荷兰一边反葡。当时刚果国王加西亚二世道出了大多数非洲人的感受，他说：“跟其他地方把黄金、白银或其他商品当钱财不一样，这里是以人当钱财和作交易，……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先辈由于天真无知而在我们的国土上作了许多罪孽，……武器的不平等已使我们到处失去土地。我们的权利正在通过暴力而丧失。”

安哥拉地区的恩津加女王是领导抗葡斗争的英雄。她于1623年继承恩东戈王位后，便要罗安达的葡萄牙殖民当局废除1622年的不平等条约。她给从葡占领土上逃亡的奴隶以避难权，并领导抗葡斗争直到1656年(参见本卷第三章)。

奴隶们总是设法争得自由。在从内陆到沿海的贩运途中，直到装上远洋船之前，他们反抗的主要方式是伺机逃跑。因此，奴隶被带镣上锁，由全副武装的看守或奴隶贩子押送。沿海关押奴隶的屯舍也是戒备森严，以防奴隶暴动或逃跑。被装上贩奴船后，不少奴隶忧郁而死，许多感到绝望的奴隶宁死也不愿为奴，于是在中段航程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反抗形式。有些跳海溺死。

John W.Blake, *West Africa, Quest for God and Gold, 1454-1578* (《西非：追寻上帝和黄金》), London 1977, pp.97-9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244.

Curtin, *op.cit.*, p.240.

Vansina, *op.cit.*, pp.58, 131.

Vansina, *op.cit.*, pp.142-143.

如 1776 年英国贩奴船“希望”号刚驶离黄金海岸，奴隶们便纷纷跳海，28 名男子和 2 名妇女溺死。船长只好返回海岸重新购买奴隶。有些绝食自杀，更有些发起暴动。如 17 世纪 80 年代，一艘英国贩奴船因气候突变返回戈雷岛。非洲人向这艘船和停泊在岸边的另外两艘船只发动攻击，船员几乎全被杀死，只有一名水手死里逃生，所有奴隶均获解放。

1722 年，一艘贩奴船在向风海岸购得 300 名奴隶。当船驶离非洲 10 天后，在一次开午饭时船长走到奴隶跟前，非洲人把他包围起来，用锁链和吃饭用的大碗砸他的头部，把他打死，接着又同水手搏斗，结果死了 80 名非洲人。其余活下来的人，在船只驶抵牙买加途中，还曾两次企图强占船只，开船逃跑。种植园主得知这些奴隶曾三次暴动未遂，都不敢购买。

1738 年 11 月 27 日，一艘法国贩奴船上发生奴隶暴动，2 名白人被杀，10 名黑人遇害，9 名幸免于难。

1759 年，利物浦贩奴船“完美”号在冈比亚河上被非洲人强占，全体船员被杀，船只下落不明。

1774 年 8 月 23 日，法国“迪阿曼特”号贩奴船离开普林西比驶向圣多明各，航行三周后遇风暴和逆流而返航，停泊在加蓬附近的小岛旁。9 月 15 日深夜，发生奴隶暴动，战斗进行了一夜。船长眼看抵挡不住，就带着余下的 14 名船员弃船登岸。但他们立刻被非洲人逮住，并沦为奴隶，后来才被一位荷兰船长赎回。

1831 年，一艘法国贩奴船离开非洲航行八天后，92 名奴隶举行暴动。他们杀死 8 名船员，把其他乘客锁在船舱里，然后把船开往当时已废除奴隶贸易的塞拉利昂。

奴隶反抗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大多以失败告终。他们不但赤手空拳，而且来自各个部落，操各种语言，没有任何组织，开始时只能依靠两三个大胆果敢的领导人独立行动。这样的暴动很容易被武器精良、组织良好的贩奴者镇压。

但发人深省的是，在非洲大陆上频繁发生的掠捕当地居民为奴的行动，并没有引起较大规模的反抗和起义。当时大部分非洲黑人仍处在村社制度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对王国或其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崩溃或分裂漠不关心。只要自己的村社（村寨）完整无损，他们会无动于衷地看着其他村社（村寨）或其他部落的居民被掳掠为奴；而当武装的奴隶贩子来劫掠自己时，他们就无可奈何地成为这些暴徒的俘虏。这样，尽管他们被劫掠后的反抗斗争可歌可泣、充满悲壮色彩，却未能改变其奴隶命运。

七、黑奴贸易对欧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黑奴贸易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自 15—16 世纪起，西方的经济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1500—1870 年间，以大西洋为中心的欧、非、美三大洲贸易体系的形成以及贸易额的巨大增长，是建立在贩卖黑奴和奴役黑人的直接奴隶制基础上的；而且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间的贸易以及欧洲跟东方的贸易，部分地也同对非洲及美洲的贸易有关。

在从 16 世纪发展起来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中，非洲的黑人劳动力帮助发展

了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奴隶贸易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以后，黑奴贸易和美洲的黑人奴隶制又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促进了西欧北美的制造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发展，从而使西欧北美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这个地区曾主宰了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黑人在南美、加勒比地区开发矿藏，发展种植园。欧洲的资本、非洲的劳动力和拉丁美洲的土地三者结合，发展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使拉丁美洲成为当时欧洲主要的海外经济利益所在。

具体说来，黑奴贸易对欧美主要贩奴国家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最早垄断黑奴贸易的葡萄牙，在 15—16 世纪通过贩卖黑奴流入大量人口，弥补了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口流失。一般估计，在葡萄牙各大城市中，输入的奴隶占人口总数的 1/10。于是，葡萄牙出现了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另一方面，通过黑奴贸易及其他海外掠夺聚敛的大量财富并未转化为发展本国经济的资本，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寄生性消费。由此造成了社会各阶级的放荡轻浮和社会道德的沦丧。金银的大量流入造成通货膨胀，生活费用十分昂贵，而本国生产又十分落后，葡萄牙贵族就到法国、英国、尼德兰等地购买商品和奢侈品。虽然西班牙、葡萄牙是 16 世纪海上贸易的霸主，但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却在安特卫普。这样，金银财富就通过葡萄牙源源不断流到欧洲其他地区，为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积累了资金，促进了其他国家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葡萄牙本身的经济发展后来甚至不及巴西。

荷兰是 17 世纪的贩奴大国和海上贸易的霸主。贩奴和海外掠夺的利润曾经使荷兰富甲天下。阿姆斯特丹成为 17 世纪世界金融中心。但是荷兰仅仅停留于经营转运贸易，并未显示出生产上的活力。这种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成反比例的。因此，荷兰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当时反而阻碍了本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及至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荷兰的转运贸易也衰落下去了。不过，这毕竟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黑奴贸易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在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

在英国早期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对非贸易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皇家非洲公司总部所在地伦敦终于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黑奴贸易及美洲的黑人奴隶制对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积累了资金。1750 年以前，英国的每一个贸易市镇或者工业市镇没有不和三角贸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发生关系的。利物浦、伦敦、布里斯托尔等贩奴港口由此得到巨大发展。黑奴贸易给利物浦商人带来的直接利润是每年 30 万英镑，贩运其他商品可额外获得 14 万英镑，西印度的蔗糖贸易可获利 600 万英镑。利物浦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在 18 世纪头 75 年中，黑奴贸易和蔗糖贸易使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黑奴贸易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 146 页。

Mannix, op.cit., p.178.该书第 72 页指出，当时一个人一年只要 6 英镑就能生活，30 英镑可以过得舒适，100 英镑就能过奢侈生活了。

和美洲的黑人奴隶制也为英国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瓦特发明第一架蒸汽机是由富商用西印度贸易积累起来的资金资助的。威尔士的石板工业改进了屋顶建筑材料，这也是用奴隶贸易得来的钱创建的。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英国第一条铁路同样是用奴隶贸易的利润修筑的。布里斯托尔的西印度集团在建造西部大铁路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资金源源流入内地，用来建设纺织厂、铸工场、煤矿、开凿运河、修建铁路等。这是兰开夏、约克郡和米德兰平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提供了市场。生产非洲所需的装饰品、家庭用具、各种服装、铁器和其他金属以及枪械、脚镣手铐等，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截至1770年为止，棉都曼彻斯特出口贸易的1/3输往非洲的奴隶海岸，1/2输往美洲大陆和西印度殖民地。所以，约翰·克拉彭爵士说：“曼彻斯特是靠为黑人制作衬衣而繁荣的。”在整个18世纪，英国制铁业一直从奴隶贸易中获益，贩奴船上需要铁锚铁链，需要脚镣和扣锁，交换奴隶的货物中需要大量金属制品，如铁钉、砍刀、铜锅、铜壶等等。这些都促进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枪支也是交换奴隶的重要商品。当时流行“一个黑奴换一支枪”的说法。非洲每年输入10—15万支滑膛枪。这些枪枝主要是在伯明翰制造的。

黑奴贸易也带动了船舶制造业、海运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709—1787年间，英国从事外贸的海运船只增长了4倍，其中开往非洲的船只增长了12倍，吨位增长11倍。在1791—1807年间，英国建造的船舶吨位中约有15%用于几内亚贸易，其中95%用来贩运奴隶。利物浦许多造船主本人就是奴隶贩子。海员中有一半参与黑奴贸易。

黑奴贸易也促进了银行和保险事业的兴起。18世纪最典型的银行家都是从商人转化而来的。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银行业的兴起都与黑奴贸易或对西印度的贸易有关。如后来在金融界颇有影响的巴克莱银行，其创始人巴克莱家族就是在1756年开始从事黑奴贸易起家的。

第三，美洲黑人奴隶种植园的产品如甘蔗、棉花等，为英国制糖业、棉纺织业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为英国制糖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使制糖业成为英国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部门。18世纪初期，英国从西印度群岛进口了所需原棉的2/3—3/4。1764年，英国进口的原棉总数将近400万磅，其中有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650多万磅，其中由西印度群岛提供的占2/3。众所周知，棉纺织业后来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那时，英国原棉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南方各州。

黑奴贸易对法国的影响同英国相似。一位法国经济史家写道：“18世纪确实可以称为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大西洋阶段。……来自海外的需求既促进了许多种类工业的增长，也促进劳工专业化和分工日益增加。……18世纪的欧洲经济是以若干大海港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其中最发达的就是那些在日益增

艾里克·威廉斯：前引书，第64页。

Oliver Ransford,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ransatlantic Slavery* (《奴隶贸易，大西洋彼岸两奴隶制的故事》), London 1977, p.48.

艾里克·威廉斯：前引书，第54—55页。

《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63页。

艾里克·威廉斯：前引书，第67—68页。

长的殖民地贸易中获得最大份额的海港，如波尔多和南特等；每一个这样的港口，不但有自己的工业，而且因为这类港口都位于河流出口处，所以都有以各自的河流为基础的工业腹地。”18世纪法国最大的贩奴港南特，到1789年不仅贩奴业的投资超过其他部门，而且以这种贸易为契机，南特成为殖民地产品的主要销售者。因此，南特的工厂主直言不讳地承认：“奴隶贸易是我们全部航海事业的基础。这种贸易为我们的（殖民地）岛屿带来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我们的（殖民地）岛屿因此才生产出大批的糖、咖啡、棉花和蓝靛，供应国内外贸易的需要。”黑奴贸易对南特的制造业特别是制糖业、五金器具、造船业及纺织印染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造船业居法国各港之首。纺织业（制作印花布以购买奴隶）成为它最重要的工业。南特的工厂主直接卷入奴隶贸易，到1789年，他们几乎都是贩奴商。

一位法国作家写道：“每个贩运奴隶的船舶返航基地在18世纪建立了许多工厂：炼油厂、棉纺厂、染坊、糖果厂。而且这些工厂的数目不断的增加，证明当时工商业的发达。例如，南特在18世纪建立15座炼油厂，5个棉纺厂……2个大染坊，2个糖果厂，……工业兴起，私人财富增加，国库充实，城市改观，新兴阶级崛起——大商人急于要参加政治活动——这些主要特征说明了黑奴买卖对18世纪法兰西民族发展的影响。”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也得力于黑奴贸易及种植园奴隶制，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直接参与黑奴贸易获得的利润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金，促成了美国工业革命。例如，独立前仅罗德岛经营黑奴贸易汇往英国的钱就达4万英镑。独立后这笔资金就留在本地发展工业。从事几内亚贸易的家族将所得利润投资于酿酒业、纺织业（建造了大西洋西岸第一座棉纺厂）、鲸脑油蜡烛制造业，建造了一座熔铁和铸铁厂，它曾向华盛顿的军队提供加农炮。

第二，大西洋贸易及西印度的奴隶制为美国早期的初级产品提供了市场。殖民地时代，在新英格兰的全部经济活动中，为海外生产的部分18世纪初约占总产量的1/5，到1768—1772年间约占1/6。东北部殖民地供给西印度群岛和南欧的是海运和其他商业服务；中部和东北部殖民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南欧输出粮食、马匹和木材；南部殖民地输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是烟草、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如果没有新英格兰向西印度供给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那末西印度种植园的单一经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反之，欧洲及西印度也为新英格兰的初级产品找到了销路。

第三，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从黑人奴隶制中得到多方面的利益。在美国内战之前，南方奴隶制各州出口原棉是美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首先，奴隶劳动产品的低成本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在美国内战爆发前10年，南方使用奴隶劳动的农场单位投资的产量比雇佣自由劳动的农场大28%，比

《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66页。

《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17页。

雅克·阿尔诺：《对殖民主义的审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62页注。

Mannix, op.cit., p.161.

《15—19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66页。

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北方农场大 40%。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而使产品的价格下降到极低的水平，才使欧洲国家在 17—18 世纪大量进口美洲产品。其次，以南方生产出口棉花为基础的区域分工使美国在 1790—1860 年间得以建立起大规模的工业。因为南方各州集中全部人力物力生产出口原棉，必须从西部购买粮食，从而促使西部定居和专门生产粮食。南方还必须依靠东北各州的运输、财政和商业服务，这构成了东北部地区进口替代工业的基础。东北部地区便从原来的出口南方棉花并进口外国工业品供应南方和西部，逐步过渡到在国内生产这些南方、西部以及东北部本身消费的工业品。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对黑人的直接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

八、黑奴贸易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是以非洲的落后为代价的。黑奴贸易对非洲大陆本身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延缓了非洲正常的发展和进步，使非洲的社会经济关系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第一，对非洲社会生产力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黑奴贸易大量毁灭了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本身，并在非洲内部造成连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动乱，致使社会动荡，农村凋蔽，田园荒芜，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贝宁由一个艺术繁荣的文明古国沦落为四处征战、劫掠的军事帝国，贝宁文明本身也被连续不断的掠奴战争毁灭了。达荷美在 16 世纪还是向今多哥地区输出粮食的富庶地区，但在 19 世纪却出现了饥荒。在冈比亚河中游以及奴隶贸易所及的上游地区，一些小族如坦达人、巴沙里人、科尼亚圭人灭绝了，另一些部落虽未灭绝但已支离破碎，被大部落吞并。在刚果、恩果尤、卡刚果、罗安果诸王国，18 世纪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总人口惊人的下降，这是政治分裂、战争连绵以及奴隶贸易的一个后果。安哥拉是巴西奴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没有糖就没有巴西，而没有安哥拉就没有糖。”在几个世纪内，奴隶贸易成为安哥拉经济的主要支柱。18 世纪最后 10 年，出口奴隶占安哥拉收入的 88.1%。直到 1843 年，即官方宣布废除奴隶贸易之后 7 年，安哥拉仍有 66% 的收入来自各港口贩奴的税收。因此，奴隶贸易给安哥拉造成的破坏特别惨重。到 18 世纪，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据点罗安达周围，农业生产变得无足轻重，以致粮食要从巴西进口，在 1783、1799 和 1816 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大饥荒。甚至安哥拉建筑用的木材也要从巴西进口。在安哥拉实际终止奴隶贸易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一种经济生活能取代原来奴隶贸易的地位，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19 世纪中叶，一些欧洲探险家深入非洲腹地，看到一片因捕奴、劫掠和战争而造成的破败荒凉景象。戴维·利文斯敦不禁哀叹：非洲“内地的劳动

《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第 68 页。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5—146 页。

Lawrence W.Henderson, *Angola: Five Centuries of Conflict* (《安哥拉：五个世纪的冲突》), p.87.

Vansina, *op.cit.*, pp.184-185.

Henderson, *op.cit.*, p.99.

力枯竭了，……非洲每个毛孔都在流血。”横越非洲大陆的第一个欧洲人 V.L. 卡梅伦认为：“奴隶贸易将因（非洲）整个人口的毁灭而自然结束”。

欧洲人在贩卖奴隶的同时，大量运进外地产品，特别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制成品的倾销，破坏了本地工业，使非洲手工业及家庭工业逐步衰落。先是东印度的纺织品，而后是英法及美国纺织品的倾销，使非洲本地纺织业受排挤而衰落下去。由于欧洲铁的大量输入，几内亚湾沿海的非洲工匠逐渐使用进口铁。内地生产的工具和武器也逐渐被伯明翰及欧洲其他地方的产品取代，从而破坏了本地的制铁业。由于欧洲的金属器皿如铜盆、铁锅的输入，非洲本地的制陶业也衰落了。尼日尔河三角洲用海水制取的盐因为无法同利物浦作为压舱货运来的柴郡的盐竞争，本地的盐业生产实际上被迫停止了。

第二，奴隶贸易客观上使非洲东西沿海和近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是西非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由于交通运输的艰难，西非同外界的贸易和交往是极为有限的。当时内地是西非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而大西洋沿岸是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奴隶贸易为主的大西洋贸易的发展扩大了西非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使西非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由撒哈拉商道转向大西洋海上，开始逐渐形成对外依赖的经济布局。

沿海及近海地区以及内陆的一些居民，或为商业利益吸引，或为逃避政治动乱、军事纷争的局面，纷纷离开原来的部落而定居到欧洲人的堡垒、商站附近。于是，城镇在这些欧洲人据点附近发展起来。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对外贸易使沿海一些村落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城邦，成为人口、贸易、财富和权力的中心。17 世纪以后，西非经济就是围绕着一系列海港组织起来的。这些海港城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列强在非洲的第一批殖民地，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吸吮非洲人民鲜血和财富的据点。商路像吸血管一样，从这些沿海城镇伸向遥远的内地，将萨赫勒地区、萨瓦纳草原、森林地带跟沿海连结起来，从而大大扩展了非洲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沿海贸易的扩大，促进了沿海及内地的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出现了经纪人阶层。非洲代理商几乎是和欧洲人对西非的贸易同时出现的。早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奴隶成为西非主要出口货之前，黄金海岸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就已出现了第一批从事海外贸易的代理商，即经纪人。17 世纪中叶奴隶贸易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经纪人的数量及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迅速增大，到 18 世纪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这批经纪人最初来源于两部分人：一部分原先是欧洲人，是贸易公司的雇员，称代理商。以后他们

Mannix, op.cit., p.243.

1750—1776 年间英国出口的棉纺织品中，有 30—50% 是运往非洲西海岸的。18 世纪法国卢昂和勒阿佛尔输往西非的货物中，纺织品占 1/2—3/4。在东非，美国人在 19 世纪大量倾销新英格兰的印花布，用以换取奴隶和象牙，以至直到现在，桑给巴尔和东非一些地区仍把棉织品称为“Americani”，类似于旧中国所称的“花旗布”，足见其影响之大。《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Hopkins, op.cit., p.110；Mannix, op.cit., p.245；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1981，“East Africa, History of”。

G.I.Jones, The Trading States of the Oil Rivers;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 Nigeria（《油河商业城邦；东尼日利亚政治发展之研究》），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89.

在奴隶贸易中聚敛财富，逐步发迹而成为独立经营的批发商。一些欧洲商人在西非沿海定居，同当地妇女结婚，后来西非沿海便出现了一批混血种的代理商和批发商。另一部分是非洲人代理商，其中有些原来是奴隶。他们在欧非贸易中充任翻译或掮客，沟通买卖双方关系。他们凭借其商业才能，摆脱了村社传统的束缚，积累起个人财富。这两部分人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成为欧非商业和文化交往的媒介，类似于远东 19 世纪出现的买办阶级。他们在西非沿海、刚果、安哥拉、东非沿海等地都有，其中以西非的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奴隶海岸和尼日尔河三角洲最多。从塞内冈比亚到塞拉利昂，出现了一个黑白混血种商人阶层。黄金海岸是经纪人最活跃的地区。奴隶海岸有一批经纪人称巴西人，是从巴西奴隶制下返回的一些葡萄牙人后裔，有些是纯血统的非洲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富商往往控制沿海城邦的政权。及至欧洲各国特许公司及其在西非沿海的代理机构相继撤销之后，经纪商便纷纷在沿海设立屯集站，以便储存奴隶直接出售给贩奴船。这种经纪人的商业资本往往通过从官到商或从商到官的途径同政治权力结合，亦官亦商。有些富商的财富和权势堪与传统的土王和朝廷相匹敌。

这个经纪人阶层是非洲人中间最早接触西方近代文明的一部分人。他们本人首先接受了欧洲人的教育和影响，并派子弟到欧洲留学。受其影响，沿海一些酋长的儿子在继位之前也必须到欧洲接受教育。于是，在这些商人和酋长的子弟中出现了第一批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非洲知识分子。

第三，种族歧视是黑奴贸易带来的直接恶果。

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并不存在种族优劣论。直到 17 世纪，在贩卖黑奴的同时，埃及统治者还在欧洲和亚洲购买了成千上万名白人奴隶，转运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尼罗河流域。马里国王的侍从中也有从埃及买来的白奴。黑奴贸易开始后，黑人大量进入葡萄牙境内，导致两个种族融合，所以葡萄牙民族带有尼格罗人种的特征，皇族中也有较多是尼格罗血统的。15 世纪尼格罗血统从西班牙、葡萄牙扩展到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和奥地利等地。

美洲开始使用黑奴劳动是基于经济考虑而不是种族原因。在新大陆最早进行奴隶买卖并沦为奴隶的并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当地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直接取代印第安人的也不是黑人，而是贫穷的白人契约劳工。直至 1661 年，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才通过法案规定黑人是“终身奴隶”。随后，各殖民地纷纷仿效。于是，整个黑色人种的奴隶地位便由法律确定了。以后，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又为种族歧视提供理论。1781 年，荷兰医生、博物学家 P·坎珀认为，非洲人的面部角更接近于猿而不接近于欧洲人。他的追随者 C·怀特声称，欧洲人不但在体质上而且在智力上一般都优于非洲人，企图以此证明黑人是劣等种族，命定要成为优等种族欧洲人的奴隶。由此可见，黑奴贸易和它所产生的种族主义把“奴隶”这个概念从一种社会区别变成了种族区别。种族歧视是奴隶贸易时代最丑恶的遗产。

第二章 荷属开普殖民地和法属马斯克林群岛

开普殖民地位于南非最南端，南临印度洋和大西洋。马斯克林群岛位于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岛以东，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岛屿。开普和马斯克林群岛地处大西洋—印度洋新航路的中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16世纪以来一直是荷兰、英国和法国角逐之所。1578年和1652年，荷兰先后占领毛里求斯岛和开普。1643年法国占领留尼汪岛，1715年法国又从荷兰手中夺取毛里求斯岛，将它们合并为一个殖民地。英国于1806年占领开普殖民地，1810年占领马斯克林群岛。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留尼汪岛归还法国，而开普和毛里求斯岛则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建立开普殖民地后，两洋航线过往船只对鲜肉、蔬菜等日益增长的需求，刺激了殖民者的土地扩张，他们占地建立牧场和农场。在土地扩张的过程中，殖民者对开普的两个土著民族科伊人和萨恩人进行了掠夺和杀戮，消灭了这两个民族。但是，他们在继续向东、向北的殖民扩张道路上遇到了班图人的顽强抵抗，被迫放慢了扩张的步伐。而马斯克林群岛的主要岛屿在殖民者占领时尚无固定居民，殖民者在最初的一段时期是以创造生存条件为主要目的。

荷兰殖民者从建立开普殖民地始就引进了奴隶，从此一切体力劳动均由奴隶承担，奴隶数量激增，到18世纪末便超过了殖民者的人数。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制是与殖民地一起建立的。群岛上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力，大批奴隶从东非、马达加斯加岛、西非和亚洲等地被贩卖到马斯克林群岛。开普和马斯克林群岛成为非洲的两个主要蓄奴区。

一、荷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及其奴隶农场制

荷兰建立的开普殖民地是从好望角开始的。1487年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后，绕经好望角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建立起来。为了垄断东方的香料和黄金贸易，葡萄牙人用武力控制了这条航线。但是，航经好望角的葡萄牙船队和以后的英国与法国的船队都没有重视这个地方。这时往来船只的食品补给站和避风港是设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和东非的莫桑比克沿岸。

17世纪初，世界商业霸权转入新兴的海上强国荷兰手中，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霸主地位受到荷兰的挑战。1602年，经营马来群岛贸易的几家荷兰公司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凭借海上优势，逐渐排挤了葡萄牙、英国和法国在绕经好望角航线上的势力。1619年，东印度公司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了公司的东方总部，驶往印度洋的荷兰船只增加，平均每年都要有2—3支船队经过好望角。1611年，荷兰人发现了一条利用西风和西南季风直通印度洋桑德海峡的航线，而好望角就处在航线的中途。17世纪上半叶，荷兰船只频繁地通过这条航线，往来于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经营东西方商品的转运贸易，由此攫取了巨大利润。新航线对荷兰日趋重要。

1647年，一艘从印度返航的荷兰船只在好望角附近水域遇难，船员们在今开普敦一带上岸，临时在海滩上安顿下来。在当地科伊人的帮助下，这些人一直生活到1649年才搭乘一艘路经好望角的商船回国。好望角沿岸的温和

气候和肥沃土地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这次偶然事件坚定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建立殖民地的信心，它最终决定在好望角建立船只补给站。1652年4月，一支荷兰船队在好望角登陆。船队司令范·里贝克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1652年4月5日，谢天谢地，大约下午5古漏，我们望见了好望角。”

“4月6日太阳落山后不久，驶进桌湾，在水深5呎的沙砾海面上抛锚。”

“7日……傍晚我们登岸观察地形，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

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开辟开普殖民地，看来是由偶然条件促成的，其实并不偶然。17世纪中叶，荷兰正处于它的商业和海上霸权的顶峰，要维系其商业和海上霸权，并迎接日益逼近的英国的挑战，它必须牢牢控制亚、非、美的一切海上交通要地和战略据点。

在占领开普半岛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荷兰东印度公司只把这里作为一个向过往船只提供新鲜牛羊肉和蔬菜水果的补给站，并没急于进行殖民开拓。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公司的雇员及其家属和流放的囚犯，到1657年，总共只有133人。公司曾自行开办一些农场，种植蔬菜和水果，但不久证明此类农场经营完全失败。1657年，公司允许九名雇员及其家属以“自由市民”的身份经营园圃。公司向他们提供劳动工具和口粮，但其生产的产品必须由公司定价收购，转售给商船。这些自由市民成为荷兰在开普殖民地的首批移民，他们侵占了开普斯贝克河畔科伊人的牧地，建立农场，生产谷物和蔬菜，酿造酒浆。由此，补给站逐渐向殖民地发展。

在总督范斯特尔统治时期（1678—1699年），移民开始涌入开普殖民地。1678年，来自荷兰的100多个移民（其中包括一些信仰路德教的德国人）到达开普。1685年，东印度公司又送来一批荷兰孤女。到开普最多的一批移民是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他们是在南特敕令撤销后由法国逃到荷兰去的，1688年大约200多人被运抵开普。这批法国移民最初住在法兰西角新区，但时隔不久就被荷兰移民所同化。由于移民人口的增长，1679年殖民当局建立了斯泰伦博希移民区。1706年，在斯泰伦博希爆发了一次反对要塞司令营私舞弊的移民骚动。这次骚动虽然很快平息，但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也因此决定，禁止再向开普殖民地移民。公司的这个禁令限制了开普殖民地的发展，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很慢。1679年移民的总数是285人，1711年才上升到1756人，到18世纪中叶也仅有5000余人。

18世纪以前，开普殖民地的主要作用仍是两洋航线上的一个补给站，向

欧洲古代航海用计时单位。一古漏约半小时。

Moodie,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档案，或一套关于南非土著部落状况和待遇的官方文件》), Amsterdam 1960, p.9.

Richard Elphick,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克拉尔和城堡，科伊人和白人南非的建立》), New Haven 1977, p.90.

C.W.de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南非社会经济史》), Oxford 1950, p.6.

Monica Wilson & Leonard Thompso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牛津南非史》), Oxford, vol.1, p.196.

Moodie, *op.cit.*, p.369.

Wilson & Thompson, *op.cit.*, vol.I, p.204.

J.S.Marais, *Cape Coloured People* (《开普有色人种》), Johannesburg 1957, p.2.

过往船只提供畜产品、蔬菜水果和谷物。最初，牲畜的来源是公司和私商通过与科伊人“交换”得来的。后来，随着科伊人牲畜资源的日益减少，公司也允许自由市民饲养牲畜。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公司垄断着过往海船需要量最大的牲畜交易，自由市民饲养牲畜的积极性不高。开普地区的自由市民主要是种植谷物和蔬菜水果。据统计，从事农业种植的自由市民占移民总数的 57%。所种农作物既可以维持开普殖民地日益增加的移民的生活，又可以满足过往船只的需要。因此，农业种植在开普发展较快，17 世纪 70—80 年代，开普的谷物已经自给自足。1684 年出口了第一批谷物，到 1707 年开普殖民地开始定期向巴达维亚输送小麦。

种植蔬菜水果虽然也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由于开普地区的土地有限，因此在殖民地建立初期，蔬菜水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移民们通常是把它们间播在粮食作物中间，用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当时在开普地区的农田中，到处可以看到间种在谷物中的葡萄。葡萄产量的增加使开普殖民地出现了酿酒业，开普所生产的酒浆大部分是为了供应往来的船只，但这些船只一般都已在价格更低廉的口岸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酒浆，需要量并不大。东印度公司又把开普的价格卡死，所以，开普殖民地的酿酒业因销路有限，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农牧业的出现，使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但是移民从殖民地建立伊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就荷兰本国而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并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也就没有出现一支破产的农民大军可供移民。靠殖民地为数不多的白人移民的自然增长很难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围绕劳动力问题，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在开普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的争论。一派人主张在开普发展奴隶制，认为使用奴隶劳动力比较合算。因为奴隶劳动力的价格便宜，养活一个奴隶一年充其量只需花费 60 个荷兰盾，而付给一个白人雇工的薪金至少是这个数目的 3 倍。而且大量引进白人移民还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如房屋短缺、酗酒成风、粗笨的体力活无人去做等等。另一派人则主张从欧洲移民，认为奴隶劳动效率低，两个欧洲移民可以干三个奴隶所做的活，而且无需别人监督，还可以服兵役。最终，第二派人的意见遭到否决，奴隶制在开普被确立下来。

开普输入的奴隶主要来自东非、西非和马达加斯加，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印度和中国。在开普补给站刚建立不到五年，1657 年就运进了奴隶。1658—1659 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又有两批 100 多名奴隶运抵开普。这样，在开普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随着移民的到来而输入，而是发展了一种奴隶农（牧）场制。开普殖民地的移民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开拓殖民地的劳动，不仅农业劳动由黑人奴隶承担，甚至高度熟练的手工艺也由马来奴隶操作。白人移民形成了厌恶和鄙视劳动的恶劣传统，他们的后裔也从小沾染了这一恶习。那些没有任何技能又无任何资产的移民无法在城镇谋生，宁愿进入内地抢占土地，利用奴隶牧养牲畜，自己不从事任何体力劳

Richard Elphick & Hermann Giliomeed, *The Shaping of South Africa Society, 1652 - 1820* (《南非社会的形成》), London 1979, p.189.

Wilson & Thompson, *op.cit.*, vol.I, p.197.

Eric Walker, *A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史》), London 1957, p.39.

T.R.H.Davenport,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南非近代史》), Toronto and Buffalo 1987, p.27.

动。在这种情况下，开普殖民地的奴隶人口迅速增长，到 1798 年奴隶的数量已达到 25754 人，超过了白人移民的数量。开普殖民地成为非洲的一个重要蓄奴区。

开普殖民地自始受着东印度公司的严格管理和控制。由公司任命总督（前期称司令，1672 年改称总督），总督听命于公司的 17 人董事会和巴达维亚的总部。它们一般是利用派遣专员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控制。专员的主要任务是对殖民地传达指令，指导殖民当局的工作，进行视察，然后再向 17 人董事会和巴达维亚总部汇报殖民地的情况。专员制度的出现加强了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的控制，但也日渐引起开普殖民当局的不满。因此，派往殖民地的专员逐年减少，1656—1699 年不到 50 年中，公司派往开普的专员是 26 人，可是 1700—1794 年的 90 余年里，派去的专员才 6 人。

开普殖民地的日常工作是由殖民地政务会议处理的，政务会议由总督主持。政务会议的任务是保护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商业利益。它既是制定法令的立法机关，又兼具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职责。政务会议的成员由公司的官员和军事长官组成。如果有荷兰船只在开普停泊，船长也可参加讨论。重大事情一般需经会议全体成员讨论和投票决定。政务会议制定的法律主要是针对公司的雇员、欧洲移民和奴隶。政务会议还具有一项特殊职责，即替公司向移民征税，为移民出售的农牧产品作价。

政务会议的司法职能是通过殖民地的地方法庭体现的。最初，只有政务会议的成员才能参加法庭的审判，后来才逐渐允许普通移民和下级军官参加。1783 年，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殖民地建立了一个高级法院，院址设在开普敦。以后，在斯泰伦博希和斯韦伦丹等地又设立了一些地方法院。殖民地的法律是以荷兰——罗马法为蓝本，法律规定了移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却没有明确的条文对总督权力进行限制，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后果。

殖民地的防卫力量主要靠移民自己。早在 1659 年，移民就成立了自己的武装。1672 年殖民政府规定，移民中 16—60 岁的男子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并承担军事义务。移民武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付土著民族，保卫开普殖民地；防止欧洲其他国家侵略的任务是由公司的正规军担当的。17 世纪 70 年代，开普半岛边区地带的移民还成立了民团。民团采取官助私办的形式，由政府向他们提供枪支弹药。在以后的殖民扩张中，民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殖民地的大多数移民笃信卡尔文教，他们除了卡尔文教经典之外，几乎不读任何书籍。卡尔文教经典中维护奴隶制度的说教对移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滥觞也起了一定作用。在 18 世纪中叶以前，殖民地设有 5 座教堂，每当教堂举行圣典，移民们便乘坐牛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教堂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文化教育的主要机构。在 18 世纪 70—80 年代以前，殖民地仅有一些教会办的学校，教员都是神职人员。当时开普地区也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但馆中仅存一些旧书，报纸和杂志尚未在殖民地出现。在那里甚至连一个供娱乐的剧院也没有，移民们的消闲除了打猎之外就是饮酒、跳舞、玩纸牌或是对坐闲聊。在这一时期，移民中没有出现文学、绘画和音乐。

Elphic & Gilomee, op.cit., p.75.

同期开普殖民地白人人口仅有 20000 人。Richard & Herman, op.cit., p.360.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214.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226.

唯一的建筑艺术也不是移民创造的，它的设计者是欧洲人，建设者是奴隶。这一切使开普殖民地在 19 世纪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默默无闻。

二、布尔人殖民土地扩张

18 世纪以前，荷兰和法国移民中种植谷物和水果蔬菜的农场主大部分是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开普地区活动，并没有大规模向内地扩张。他们所建立的斯泰伦博希新区，距中心城堡的直线距离也未超过 50 英里。但是从 18 世纪初开始，殖民者（以后称布尔人）土地扩张的速度加快。他们沿着布里厄河谷地向北、向东扩张：往北 1730 年到达象河，1770 年代又扩展到伯费尔斯河；往东 1740 年代进抵斯韦伦丹，1770 年代占据了加姆图斯河至大鱼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楚尔菲尔德和赫拉夫里内特边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向北扩张了 400 公里，向东扩张了近 800 公里，侵占了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布尔人迅猛的土地扩张浪潮，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主国荷兰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布尔人人口增长造成的对土地的需求，因为荷兰从来也没有向开普殖民地大批移民，开普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不快。那末，18 世纪开始的土地扩张动力何在呢？

开普殖民地是作为荷兰船只的补给站而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往来船只供应农牧产品，其中畜产品又是最迫切需要的大宗物品。据统计，18 世纪以前每年在开普停泊的荷兰船只平均约 33 艘。在 1658 年，殖民地司令范·里贝克曾计划向每艘过往船只供应 8 头牛和 8 只羊。实际上，往来船只所需的牛羊数并不一致，平均每条船需牛 5.4 头、羊 10.3 只。据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1652—1669 年间殖民地消耗的牛约 4656 头、羊约 18683 只，分配数额见下表：

项目	牛(头)	羊(只)
往来船只	2997	10120
医院	111	3020
公司雇员	511	2864
自由市民	390	383
自然死亡	536	1660
其他	111	636
总计	4656	18683

布尔人是荷兰语 Boer 的音译。18 世纪前意为农民，19 世纪成为南非阿非利卡人 (Africaner) 的总称。英国移民到来后，该词含有落后、无知的贬意。

Graham Parker & Partick Pofukani,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史》), London 1975, p.42.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192.

Moodie, *op.cit.*, p.119.

Elphick, *op.cit.*, p.152.

Elphick, *op.cit.*, p.153.

其中往来船只和为其服务的设施占总消耗量的 2/3 以上。这个资料表明，在 18 世纪以前，殖民地对于牛羊的需求量虽在增长，但总的需求量并不很大。

18 世纪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1713 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东方的殖民防务。此后，荷兰驶往东方的船只大幅度增加，1714 年上升到 46 艘，1739 年前后达 68 艘。1740 年代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四年，英舰不断进驻开普，造成了开普的牲畜供不应求，肉价猛涨。经济学家纽马克在《1652—1836 年间南非边区所受的经济影响》一书中系统地整理了 18 世纪停泊在开普港的船舶数目，结合布尔人土地扩张的情况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每当停泊在开普港的船舶增多，殖民者土地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就进一步扩大和加快。这一现象表明，开普内地土地扩张的一个主要动力是那条通往世界市场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对畜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需求。

最初，畜产品是由南非土著民族提供的。但是经过殖民者几十年的巧取豪夺，很快榨干了距开普较近的科伊人的牲畜。饲养牲畜比种植谷物和葡萄的利润大得多，牲畜市场又比谷物市场可靠稳定，这就促使许多布尔农场主改营牧业，迁入内地占地养畜。东印度公司为了降低肉价，又采取了鼓励布尔人进入内地养畜的措施。1707 年，公司制定了租地农场制，规定农场主只需交付名义“租金”，就可以在内地无限“租地”。布尔农场主一般占地 6000 英亩，有的甚至占地 10000 英亩。实际上，农场主占地并没有严格标准，他们凭借枪械和马匹的优势，随意侵占当地民族的土地，只要不与邻近的农场发生冲突，愿意占多少地就占多少。他们看好一块地，通常是骑马向四方各跑半个小时，插上标志，就建立了新的农场。由于土地可以通过暴力无限取得，所以进入内地的布尔人只要拥有一些花钱买来的奴隶，或拥有靠骗取手段诱来的科伊牧奴，或二者兼有，不用多长时间都变成了大小不同的奴隶主或农奴主。他们靠剥削异族劳动力为生，彼此之间只有富裕程度不同。任何一个布尔男孩一生下来就注定长大后要成为不劳而获的农场主，而这就意味着南非内地又有一块 6000 英亩土地和相应的非洲劳动力将被占有。

另外，布尔农场主并不进行集约式的经营，而是采取十分粗放的方式。这是由于宗主国荷兰流入的资本极少，布尔农场主缺乏资本所致。粗放的经营方式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南非丰富的土地资源正好适应了布尔农场主的这一需要，大牧场成为布尔人利用大面积土地最有利的形式。畜牧农场主只需很少资本和劳动力就可以利用土地优势而获利，他们一般只需购置两辆牛车，“再有一杆步枪、一把斧子和锤子、一支长矛、一台搅乳器和一口煮（羊脂）肥皂的大锅……”，就可以装备一个牧场。畜产品直接与两洋航线挂钩，销路很好。运输也简易方便，靠牧畜就可到达靠近海岸的畜产品市场。牲畜养殖又无需娴熟的技术，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来说也少些。由此，大牧场在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192.

C.W.de Kiewiet, op.cit., p.16.

S.D.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1652-1836 (《对南非边境的经济影响, 1652—1836》), California 1957, p.38.

Walker, op.cit., p.59.

内地纷纷建立，很快便超过了大农场的数量。但是，南非内地的土质十分贫瘠，牧场载畜量很低。为了尽快获益，畜牧农场主让科伊牧奴在同一块牧地上过份放牧，牧草被啃吃过度，许多牧场报废，载畜量进一步下降，平均一英亩只能养一只羊，五英亩才能养一头牛。农场如要维持畜群总头数或更新牧场，只有进一步扩张土地。同时，牧场中使用奴隶或农奴劳动力很难提高牧场单位面积的载畜量和出栏率或培育出优良品种，多产牲畜的唯一方法仍是扩大牧场的土地面积。另外，随着土地扩张的深入，牧场距沿海市场越来越远，运输费用增加，农牧场主只有靠占据更大的土地面积，饲养更多的牲畜来弥补，土地扩张愈演愈烈，掀起了一次次的土地扩张浪潮。布尔农场主在土地扩张中不仅侵占了非洲人的土地，而且占有了他们的人身。南非社会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

三、科伊人在南非历史上的消失和萨恩人的灭绝

荷兰殖民者入侵以前，南非境内已经居住着科伊人、萨恩人和班图人等当地民族。其中科伊人和萨恩人是南非最早的居民。荷兰殖民者入侵开普后，首先遇到的非洲居民就是科伊人。科伊人大部分生活在南非西部地区和小卡鲁地带，开普附近还居住着半岛科伊人。当时，科伊人仍维持着单纯的游牧经济，没有从事任何种植业。野生的块根是他们摄取的主要植物性食物。居住地区土地的贫瘠和周期性的干旱使科伊人的牧场载畜量很低、经营粗放。每一个科伊人家庭公社需要十分广阔的牧场面积才能维持生存，因此科伊人的人口分布十分稀疏。殖民者入侵南非时，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才20万。为了避免部落间的战争，以防人口进一步减少，各部落在迁移时有意在相邻的部落之间隔开广阔的边境地带，这就使科伊人部落之间和氏族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部落酋长的权力很小，部落组织的防御能力也较差。17—18世纪，科伊人从班图人那里学会了冶铁和锻铁，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就在这个时候，荷兰殖民者闯了进来，打断了科伊人独立发展的进程。

在开普地区居住的科伊人有科林海夸（亦称开普科伊人）、科腊舒夸和科乔夸等部落。这些部落与荷兰殖民者接触最早，也最先遭到殖民者的掠夺。殖民地建立初期，往来船只的牲畜供应主要是靠这些部落。对殖民者来说，与科伊人进行牲畜贸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他们用铜块、废铁、小刀、烟草和玻璃珠等饰物就可以从科伊人那里换到所需的牲畜，用0.5磅铜丝外加0.125磅烟草能换到一只羊，用0.25磅铜能换到一只牛犊，用3磅多一点铜就可以换到一头奶牛。半岛科伊人虽然占有开普地区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牧草丰盛的土地，拥有较多的牲畜，但牲畜是科伊人衡量财富的标准，他们不愿过多地出售牲畜。科伊人把剩余牲畜同荷兰人交换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其他方面的需要，所以对荷兰商人所提供的饰物、日用品的需求量有限，很快趋于饱和。

为了得到更多的牲畜，殖民者不择手段，用烈酒诱骗科伊人上瘾，使烈酒成为科伊人大量消耗的物品，然后再通过交换，从科伊人手中攫取大量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4, London 1975, p.449.

郑家馨：《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的扩张》，《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Moodie, op.cit., p.61.

畜。有些殖民者甚至闯到科伊人部落中去，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有一次几个殖民者公开对范·里贝克说，如果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牲畜，就要结伙进入内地去抢；如果霍屯督人（科伊人，下同）不把牲畜交出来，他们就把霍屯督人抓起来。面对这伙强盗，科伊人曾质问道：“假如我们科伊人到你们荷兰去，你们能允许我们像你们那样做吗？”但是，贩卖牲畜的巨额利润已经使殖民者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榨干了一个科伊部落的牲畜，又转向另一个部落，1663年在东南面已经进入卡利登和丹杰角之间钦诺夸人居住区，东西面深入到里弗斯代尔和里菲松德伦德，1670年代又闯入北部纳马人居住区和东部的阿塔夸人居住区。科伊人的牲畜受到了巨大损失。据殖民当局官方文件统计，仅1652—1669年这段时间里，科伊人就失去了15999头牛、36636只羊。经过半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到17世纪末，半岛科伊人的牲畜几乎丧失殆尽。

牲畜是科伊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牲畜的丧失使科伊人部落组织濒于瓦解，丧失畜群的科伊人无以为生，逐渐从部落中游离出来，被吸收到开普殖民地社会的劳动力行列中去，或被迫从事狩猎，变成了专事狩猎的“萨恩人”。东印度公司和私商把开普地区的科伊人部落的牲畜榨干后，从18世纪初开始又进一步深入加姆图斯河以西的内陆，掠夺更远的科伊人部落，向他们的牧区扩张。殖民者凭借火器、马匹和牛车这三件从宗主国带来的东西，用暴力摧毁那里科伊人的村寨，抢走他们的牲畜，霸占他们的牧场。

科伊人对侵占他们土地的殖民者进行过英勇的抵抗。1659—1660年和1673—1677年，以半岛科伊人为主体的科伊人部落同殖民者进行了两次科伊——荷兰战争。科伊人采取游击战的方式对殖民者进行偷袭和骚扰，并经常利用雨天殖民者的滑膛枪不能使用的时候，向殖民者发起了进攻。受到沉重打击的公司雇员和自由市民甚至有半数打算乘过境的船只返回荷兰。但在这两次战争中科伊人的牲畜和土地也受到严重损失，在第二次科伊——荷兰战争中仅科肖夸一个部落就损失了1600头牛和4900只羊。此后，随着殖民者掠夺和土地扩张的加剧，科伊人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的侵蚀，部落组织逐渐瓦解，科伊人已无法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失去牲畜、土地和部落组织的科伊人到处流浪，给布尔农场主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曾经在开普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约翰·菲利普记述了科伊人丧失土地和牲畜、沦为牧奴的过程。他写道：“一个半世纪中，霍屯督人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了，他们的畜群被抢劫，除少数人外，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成了比奴隶更悲惨更可怜的人。”

18世纪残存的科伊人部落又遭到白人殖民者带来的两大灾祸的袭击。1713年2月13日，一只从印度返航的船在开普停靠，船上有几个船员患了天花，病毒很快在开普传播开来，袭击了毫无免疫力和防治经验的科伊人，科伊人大量死亡。1755年的牛瘟又夺走了科伊人剩余的牛群。赤贫的科伊人

Moodie, op.cit., pp.43, 205.

Elphick & Giliomee, op.cit., p.20.

Moodie, op.cit., pp.179, 202, 207.

Elphick, op.cit., p.171.

Heinrich Jaenecke, Die Weiben Herren 300 Jahre Krieg and Gewalt in Siidafrika (《白人统治者在南非的三百年战争和暴力》), Hamburg 1976, p.33.

四处逃散，一部分逃往东部与科萨——科伊人混血部落融合，另一部分科伊人主要是科伊——白人混血种人——格里夸人渡过奥兰治河，迁往北岸地区，只有少数科伊人到达今日西南非洲，成为后来的纳马人。在西开普幸存的科伊人，他们的部落组织已荡然无存，全部生活于开普城镇和白人农场中。到 19 世纪初，南非境内的科伊人只剩下 32000 人。科伊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萨恩人居住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凯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萨恩人是狩猎民族。单纯的狩猎经济使萨恩人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氏族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一直在原始条件下进行，简陋的生产工具使萨恩人无法单个行动，只能在集体劳动基础上进行狩猎。在这种情况下，萨恩人没有发展成较大的血族集团，也没有产生出部落酋长。因此，萨恩人的氏族公社之间极少联系，社会组织极端松散，公社规模狭小，人数较多的氏族公社也不过数十人。由于生产环境的恶劣，萨恩人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人口密度小到平均几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人。据埃伦伯格估计，萨恩人口在任何时候也未超过 4—5 万人。萨恩人的这种落后状况只能勉强维护种族自身繁衍，很难抵御强大外敌的侵略。

18 世纪中期以后，开普在世界重要交通航线中的经济作用日益增强。1756—1763 年，爆发了七年战争。英法在印度展开激战，开普停靠的船只猛增。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曾在开普长期驻扎，消耗了大量的畜产品，开普的牲畜供不应求，牲畜贸易成为最赚钱的生意。为了寻求更多的牲畜和牧场，布尔农场主扩展到内地萨恩人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萨恩人居住区，有许多固定的狩猎场所，它是萨恩人世代游猎的土地。布尔农场主把这些土地一律宣布为“无人空地”予以独占，因此引起萨恩人的强烈反对。面对强大的侵略者，萨恩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反抗方式：他们成群结队地摸进布尔农场主抢占的牧场，把农场主的牧畜劫走。这种反抗形式在当时十分有效，它迫使布尔人放弃斯尼乌山和纽沃尔德山及塔河一带的农场，关闭了朗河河谷地区的牲畜收购站。萨恩人的反抗延缓了布尔人向北部地区的扩张。

布尔农场主对萨恩人进行疯狂的报复。在 1770 年代中期以后，布尔人民团对萨恩人进行了一系列灭绝种族的征剿。1792 年，布尔人司令官范魏尔特起草的一份战绩报告记述了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写道：

“9 月 27 日，进攻第一个营地，击毙 75 名布须曼人（萨恩人），俘虏 21 名，缴获 150 只羊，13 头牛和一支枪。”

“10 月 15 日，又发现一个营地，击毙 85 名布须曼人，俘虏 23 名，缴获 124 只羊。”

“10 月 20 日，发现第三个营地，击毙 11 人，俘 3 人。”

“10 月 24 日，发现第四个营地，击毙 7 人，俘 4 人。”

郑家馨：《殖民土地扩张与南非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344 页。

Moodie, op.cit., p.61.

D.Fred, Ellenberger and Written in English by Macgregor, History of The Basuto (《巴苏陀史》), New York 1969, p.XX.

Heinrich Jaenecke, op.cit., p.33.

从9月27日到10月24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布尔人的这支民团就打死了178名萨恩人,俘虏51人,抢走了大批牛羊。为了灭绝萨恩人,殖民当局甚至出重赏鼓励布尔人民团捕杀萨恩人,宣布凡抓住一名萨恩人者赏钱三镑。这样,从1786—1795年,仅赫拉夫里内特一个区,萨恩人遭杀害的就有2500人,被俘669人。被俘的萨恩人境遇更惨,许多成年人很快遭杀害,儿童大多数被送到布尔人农场作“学徒”,过着比奴隶还悲惨的生活。经过几十年逐山逐洞的清剿,到19世纪初,除一小部萨恩人退到卡拉哈里沙漠残留下来以外,萨恩人已基本上遭到灭绝。据1957年南非的人口统计,全南非境内的萨恩人仅存20名左右。

在布尔殖民者的殖民掠夺和土地扩张过程中,科伊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南非大陆上消失了,萨恩人也最终被殖民者灭绝。这一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出布尔殖民者的残忍,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在早期殖民侵略过程中,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殖民者,那些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由于社会生产低下、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差,很难逃脱被灭绝的悲惨命运。

四、科萨人的反荷斗争

消灭了科伊人和萨恩人以后,布尔殖民者的土地扩张更加迅猛,很快就侵入了科萨人居住的地区。

科萨人与科伊人和萨恩人一样,是南非大陆最早的居民。早在16世纪,科萨人就到达凯河流域,17世纪末又进抵大鱼河,18世纪在布须曼河与大鱼河下游之间的楚尔费尔德地区也已分布着许多科萨人部落。到1770年代,科萨人已经在加姆斯河上游地区和科伊人杂居在一起。这些资料表明,科萨人至少要比布尔人早一个世纪到达南非的东南地区。

科萨人实行的是以牧业为主的牧农混合经济,普遍使用铁制工具,这就使他们的社会生产力要比实行单纯游牧经济的科伊人和狩猎民族萨恩人进步得多。其人口增长也很快,据估计在姆巴谢河以西地区的科萨人就有10万余人,拥有36万头牛。但是,南非内陆地区贫瘠的土地同样对他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得牧场载畜量较低,种植业在科萨人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人口的迅速增长就促使科萨人不断南下寻找肥沃的土地和新牧场。另外,科萨人部落中盛行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往往造成酋长的庶子要比嫡长子年长,实力也大一些。这样,庶子在嫡长子继位后,马上会率领自己的拥护者分裂出去,寻找新区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也是造成科萨人经常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科萨人经济中牧业的比重进一步加大,而人口密度却逐渐缩小,社会分工发展程度降低,部落之间经济联系发展也相对缓慢。

Parker & Pofukani, op.cit., p.43.

Marais, op.cit., p.17.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73.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103.

Wilson & Thompson, op.cit., p.107.

科萨人继承法规定,世袭酋长职位由正妻的嫡长子继承。然而酋长一般要先娶侧室,所以庶子往往比嫡子年长。

科萨人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削弱了部落联盟最高酋长的权力，部落之间为争夺牧场经常进行战争。连年不断的战争使这个拥有众多人口的民族长期分裂，各部落间互相敌视，没能形成强大的酋长国或部落联盟。18世纪沙维家族的帕落继承酋长后，科萨部落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帕落的嫡长子格卡利卡急于继位，曾多次试图篡权，终酿成内战。在这次战争中，帕落战败，遂率支持自己的部落和庶子腊腊布等人渡凯河南下，科萨人分裂成两支。一支以格卡利卡为酋长，继任的酋长卡乌塔、钦察和萨利利都是他的后裔；一支仍以帕落为酋长。帕落死后，酋长由腊腊布继承。1782年腊腊布去世，其嫡长子姆拉乌也于同年战死，长孙盖卡年仅4岁，尚未成年，遂暂由腊腊布的庶子恩德兰比任摄政酋长。按科萨人继承法规定，盖卡成年后，恩德兰比应还政盖卡，但此时恩德兰比羽毛已丰，大权在握，拒绝交出手中的权力，科萨部落再次面临分裂。殖民者到来后，特别是后来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利用了科萨人内部存在的分裂局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让科萨人自相残杀，他们火中取栗，科萨人的反殖斗争遭到严重削弱。

18世纪70年代，布尔殖民者侵入了科萨人居住的楚尔费尔德地区，抢占了这里的大片土地，并企图把科萨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1778年，殖民地总督范普勒莱顿贝强行下令把殖民地的边界定在大鱼河，并在河的沿岸树立界桩，宣称不允许科萨人越过大鱼河。但是此项禁令对布尔农牧场主却从未生效，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越过界河，继续抢占科萨人的土地，致使科萨人丧失了大量的耕地和牧场。科萨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家园，科萨人奋起反抗侵略者。他们在18世纪末与布尔殖民者打了三次所谓的卡弗尔战争。1799年爆发了第一次卡弗尔战争（1799—1781）。科萨人越过大鱼河，用长矛、木棒和牛皮盾打击布尔殖民者。布尔人把牛车连起来组成牛车阵，躲在里面凭借火器优势向科萨人射击。一批批冲上来的科萨人死在殖民者的枪口下，布尔人趁机抢劫科萨人的牲畜。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次卡弗尔战争中，科萨人共损失了5000多头牛。科萨人完全处于劣势，被迫退回大鱼河东岸。

第一次卡弗尔战争后，越过大鱼河抢占土地的布尔农牧场主人数激增。1789年，科萨人再次起来打击侵略者，爆发第二次卡弗尔战争（1789—1793）。这次战争的结局与上次一样，又以科萨人的失败告终。但科萨人的反抗并未停止，1799年又开始了第三次卡弗尔战争。这一次恩德兰比的部落参加了战斗，他们把居住在楚尔菲尔地区的科萨人全部发动起来。在布尔人农场中不堪压迫和虐待的科伊牧奴在克拉斯·斯图尔曼领导下也揭竿而起，要求给予他们土地和解除他们儿女的“学徒”身份。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携带着枪械、骑着马匹加入了科萨人反抗的队伍，带领着科萨人冲进布尔农场主的农场，焚毁房舍，赶走牲畜，沉重地打击了布尔殖民者，使这一地区的布尔人农场在许多年后还未能完全恢复。科萨人的反荷斗争保卫了大鱼河以东的土地，更重要的是遏制了布尔人向东扩张的势头，使布尔殖民者数十年未能越过大鱼河，并迫使他们转往北部奥兰治河方向。

科萨人之所以能够将布尔人堵在大鱼河西岸，这与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有着重要联系。科萨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使它的社会生产力远远高于科伊

卡弗尔，Kaffir的音译，是殖民者对南非黑人的蔑称。

Parker & Pofukani, op.cit., p.51.

人和萨恩人，也使他们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样，科萨人就可以利用在人数上的优势与布尔人抗衡。在政治结构方面，科萨人部落间虽然存在着长期分裂和战争，但是由于布尔人内部此时也不团结，因此无法利用科萨人的这个弱点。而科萨人在反荷斗争中又出现了一些较强大的部落，如恩德兰比的部落，在战争中锻炼得特别能战斗，而此时大鱼河一带正归这个部落所有。这也正是科萨人能够抵御住布尔殖民者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科萨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虽然比科伊人和萨恩人要强得多，但也存在着上面曾提到的许多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在比布尔殖民者更强大的敌人面前将会完全暴露出来。

五、英国人占领开普殖民地

18世纪末期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全面危机，公司经营的开普殖民地也已进入了穷途末路。在1781年的英荷战争中，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船只被英军击沉或劫持，这更是雪上加霜，公司为此债台高筑。1778年，公司欠债750万荷兰盾，1790年更达8100万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开普殖民地统治集团内部挥霍之风日盛。据记载，1785—1791年任总督的范德赫拉夫一人就拥有马车12辆，役使马匹124匹之多。其他官员也竞相仿效，开普殖民地财政入不敷出，所得收入仅够支出的1/5。为了避免彻底破产，公司曾试图进行改革。1791年，公司撤换了范德赫拉夫的总督职位，暂由里尼乌斯替代；1792年后又改任总特派员管理开普行政事务。为了节减开支，公司命令开普停止一切建筑工程，裁减开普的卫戍部队，出卖或出租一部分公司办公用房，并公开拍卖了一部分公司所属奴隶。但是，公司所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不但没能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反而引起开普殖民地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公司与移民的矛盾更加尖锐。

公司与移民的矛盾由来已久，公司允许移民拥有土地，但却把农作物和牲畜贸易垄断在公司手里，常常压低收购价格盘剥移民。在对待土著民族问题上，公司出于保障对两洋贸易往来船只畜产品供应的目的，主张对土著民族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因此对布尔农场主无限制的土地扩张和过份的侵犯土著民族利益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结果，公司和布尔移民之间的冲突不断爆发。殖民地建立初期，移民就曾为反对公司压低小麦价格而进行过一次暴动。18世纪末期，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开普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开始削弱，对深入内地的布尔人鞭长莫及，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

1795年初，居住在边区的布尔人发生骚乱，反对公司的统治。他们赶走了区长迈尼厄，并在赫拉夫里内特地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成立了赫拉夫里内特共和国。这次骚动涉及面很广，甚至距开普较近的斯韦伦丹的布尔人也卷入进去，并成立了斯韦伦丹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在开普的统治已到达崩溃的边缘。

当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殖民地的殖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开始席卷欧洲大陆，东印度公司终于在这场风暴中彻底垮台。1795年，

郑家馨：《论19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载《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75—77页。

路易·约斯：《南非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9页。

法军占领了英国的盟国荷兰，成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英国遂借口保护盟国的海外殖民地，侵占开普。9月14日，英军在开普登陆，开普的荷兰正规军闻风而逃，布尔民团也只是进行了一般性抵抗。英国占领军未遇到激烈反抗，正说明布尔人与公司存在很深的矛盾（此时又因公司增加防务税而更甚）。但是，英国政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开普期间，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块殖民地的作用，仅把这里当成一个海军基地。英国当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取消了赫拉夫里内特和斯韦伦丹两个共和国，并试图加强对开普殖民地内地的控制。为了使这一地区尽快英国化，英国当局取消了卡尔文教作为殖民地国教的地位，确定了宗教自由的政策。1799年英国传教会到达南非，1802年贝瑟尔斯又建立了一个英国传教团，这些措施不但削弱了卡尔文教的力量，而且由于英国传教会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在土著民族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当时英国尚未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块殖民地上。

1802年英法签订了亚眠和约，宣布休战。第二年，英军撤出了开普，开普殖民地由荷兰政府接收。1805年，英法再次交战。次年1月，英军重又占领开普。1814年，拿破仑在欧洲彻底战败后，英国本应把开普退还荷兰，但它此时已经认识到开普殖民地的重大战略地位，于是便支付一笔赔款给荷兰而在开普呆了下来。从此，开普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的垮台和开普殖民地的易手，标志着荷兰垄断公司制度和奴隶制度的终结。开普殖民地的衰落，首先是荷兰商业资本的衰落，而其体现则是东印度公司的衰落。商业垄断公司在荷兰国内已遭到工业资本家的反对，在国际上又无力抵御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的英国，衰落之势在所难免。开普殖民地的衰落也是布尔人粗放的奴隶制农牧场制度的衰落。特别是牧业，开普的短纤维羊毛完全无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单纯依赖向两洋航线上供应牲畜又发展有限，再加上公司与布尔人之间矛盾日甚，终于导致了东印度公司的垮台和开普殖民地的易手。

六、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殖民地及其奴隶种植园制度

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是马斯克林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屿。大约在10世纪前后，阿拉伯航海者首先发现了这片岛屿。16世纪初葡萄牙探险家也曾涉足此地。但是直到16世纪末，这些岛屿仍是无人居住的荒岛，尚未引起重视。

16世纪末，夺得了世界商业霸权的荷兰在东方的殖民活动加剧，迫切需要在驶向东方漫长的航路中途建立补给站。1598年9月，一支由范瓦尔维克指挥的荷兰船队占领了马斯克林群岛中的一个主要岛屿，把它称作毛里求斯。1638年，荷兰向该岛运去了第一批移民，毛里求斯成为荷兰的一个海外殖民地。开普殖民地建立以后，毛里求斯岛屿的行政事务由开普殖民地总督兼管。但是，由于毛里求斯岛远离大西洋——印度洋的主航道，岛上的鼠害又严重地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殖民地发展速度极为缓慢。直到18世纪初，岛上的移民包括公司的雇员和被流放的囚犯，也从未超过300人。

荷兰占领毛里求斯岛以后不久，法国也开始觊觎这片岛屿。17世纪初，法国对东方的贸易额日益增大，为了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法国试图在绕好望角的航线附近开辟一块向东方扩张的根据地。最初，法国东方公司曾在

马达加斯加建立一个据点，由于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激烈反抗，没有坚持多久便被迫放弃。1643年，法国人占领了距毛里求斯岛仅100哩的马斯克林群岛中的另一个大岛，为了庆贺波旁王朝又得到一块肥沃土地，殖民者把该岛命名为波旁岛。1663年，法国向波旁岛运去了第一批移民，以后岛上的移民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初，波旁岛已经成为法国向印度洋地区扩张的一个重要基地。

1710年，荷兰放弃了毛里求斯岛，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普殖民地的经营上。1715年，法国舰队占领了毛里求斯岛，改称法兰西岛，并把它与波旁岛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法属殖民地。

殖民地在建立初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首先是海盗的侵扰。印度洋上的海盗主要来自安的列斯群岛，17世纪末这些海盗把巢穴搬到了马达加斯加，从此，马斯克林群岛便成为海盗经常“光顾”的地方，岛上的一些居民也暗地里与海盗来往，海盗活动更加猖獗。18世纪初，马达加斯加人袭击了建立在本岛的海盗巢穴，海盗把巢穴转移到更靠近马斯克林群岛的圣玛丽岛。为了彻底消灭海盗，殖民地政府一方面采取安抚政策，允许那些愿意洗手不干的海盗到马斯克林群岛定居；一方面对那些继续劫掠的海盗给予严厉打击。1724年，殖民地政府捣毁了圣玛丽岛上的海盗巢穴，抓获了海盗头子拉布兹。1730年，拉布兹被处死，猖獗一时的印度洋海盗活动暂时平静下来。

殖民地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适宜在岛上生长的农作物。在毛里求斯岛，早在荷兰占领时期就曾试种过粮食，但由于经营不善和鼠害成灾，所种粮食颗粒无收，法国占领初期也一筹莫展。波旁岛虽有着肥沃的土地，但也未善加利用。殖民地政府曾多次试图在波旁岛上种植香料，都未获成功。因此，寻找适宜岛上种植的农作物成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18世纪初，一支满载阿拉伯咖啡的商船队在法兰西岛和波旁岛停靠，补充淡水和食物。咖啡船的到来启发了岛上的居民，殖民地政府也看中了这种收益很高的经济作物，决定在岛上种植咖啡。1715年，第一批咖啡苗从也门运抵波旁岛。由于气候适宜，咖啡种植很快在全岛传播开来。到1730年，波旁岛生产的咖啡已经可以满足法国的需要。与此同时，咖啡种植也从波旁岛传到了法兰西岛。但由于管理不善，更重要的是由于波旁岛的咖啡产量日增（1730年代每年仅供出口的咖啡就约有100万公斤），加上其他咖啡生产国的竞争，欧洲市场趋于饱和，咖啡行情疲软，因此咖啡种植业没能在法兰西岛发展起来。1735年，拉布尔多内被任命为两岛的全权总督。他在任职期间，鼓励法兰西岛移民种植甘蔗，并在岛上建立了两家制糖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法兰西岛生产的蔗糖足够两岛居民和往来船只食用，并可少量出口，种植园经济在两岛最终确立。

甘蔗和咖啡种植园的兴起，使殖民地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但是随着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殖民地又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缺乏劳动力。殖民地建立以来，两岛的移民虽在不断增加，但岛上的经济发展更快，劳动力严重缺乏。法国与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相似，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不像英国那样剧烈，未能造成一支破产的农民大军，因此也就没有形成向外移民的大规模浪潮。所以，直到1735年甘蔗种植园出现之前，两岛的白人移民总

亦称留尼汪岛。岛名曾几度变更。

共不超过 1000 人。这时的移民主要是法国公司的退職雇员、冒险家和囚犯，真正想来岛上垦殖的移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岛上的体力劳动主要由奴隶承担，奴隶制是与殖民地一同建立的。

马斯克林群岛上的奴隶主要来自马达加斯加和东非。18 世纪 20 年代以前，贩卖奴隶主要由海盗经营。海盗往往与殖民地官吏相勾结，波旁岛的一个法国总督就曾多次同海盗签订购买奴隶的合同，总督以低廉的价格从海盗手中买下大批奴隶，然后再把他们转卖给他的下属或岛上的移民，转手之间获利甚丰。马斯克林群岛成为印度洋上一个重要的蓄奴区。

18 世纪 30—40 年代种植园经济兴起后，马斯克林群岛上的奴隶便由从事修路、建筑、搬运等体力劳动转向种植园劳动。种植园奴隶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被当作耕作工具——白人移民的牲畜。奴隶们每天天一亮即要下地劳动，日落后很久才能收工休息。种植咖啡和甘蔗都是集约劳动，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很大，奴隶制得以广泛实行。18 世纪中期和后期是马斯克林群岛奴隶制盛行时期，岛上的奴隶超过白人移民和自由市民总数的八九倍之多。现在的巴黎国家档案馆和留尼汪档案馆存有当时马斯克林群岛白人、自由人和奴隶的详细统计数字，下面以有关法兰西岛和波旁岛的数字为例，来观察当时使用奴隶的情况：

法兰西					波旁岛				
年份	白人	自由人	奴隶	总数	年份	白人	自由人	奴隶	总数
1735				约 1000	1708	507		387	894
1766	1998		18100	20098	1725			2000	
1776	3431	1199	25154	29784	1735	580		7573	8153
1787	4372	2235	33832	40439	1779	6464	465	30209	37138
1797	6237	3703	49080	59020	1788	7850	950	37000	458000
1809	6227	7133	55422	68782	1810	12862	2821	50588	66271

从表中可以看出，奴隶的数量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而增长。1735 年法兰西岛尚未大规模种植甘蔗以前，包括奴隶在内，全岛的人口不过 1000 人；30—40 年代以后甘蔗种植园兴起，奴隶的数量成倍增长。1766 年奴隶人口增长到 18100 人，到 18 世纪末已高达 49080 人。波旁岛也是这样，1708 年奴隶的数量还远低于白人移民，到 1725 年咖啡种植园兴起后，奴隶人口猛增到 2000 多人，到 18 世纪末高达 44800 人。

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买卖活动益趋活跃，范围从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扩展到了南亚。18 世纪中期，群岛的殖民政府在圣玛丽岛设立了奴隶贩运站，专门向群岛的白人种植园主提供奴隶。据统计，从 1670 年到 1810 年，马斯克林群岛大约输入了 16 万名奴隶。其中，45% 是马达加斯

于贝尔·热尔波：《印度洋的奴隶贸易》，《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第 197 页。

厄斯诺·巴伯吉：《毛里求斯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19、42 页。

奥古斯特·图森：前引书，第 63、69、597、599 页。

加人，40%来自东非，13%是印度人，2%是西非人。东非的基尔瓦是非洲大陆向马斯克林群岛输出奴隶的主要集中站，1786—1794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奴隶运到这里。18世纪马斯克林群岛的种植园经济处于发展阶段，对奴隶的需求一直呈飞速上升的趋势。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出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793年，国民公会将波旁岛改名为留尼汪岛。1793年7月，法国政府曾试图禁止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贸易，这项决定遭到群岛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为此法兰西岛和留尼汪岛曾一度脱离法国实行自治。1800年拿破仑上台，重新恢复对两岛的统治。脱离法国期间，两岛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英法战争期间，两岛又经常派船队劫掠经过的英国船只，短短几年时间获利250万英镑，这笔投资促进了岛上的经济发展。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后，英法休战，群岛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岛上的经济更加繁荣，1802—1803年贸易总额超出了大革命前的两倍。1803年英法战事又起，但由于群岛的产品价格普遍低于欧洲，美国 and 丹麦等中立国趁机大作转运贸易。据统计，1804年到达法兰西岛的外国船只有50艘，1806年增加到105艘，1807年又增至126艘，两岛的对外贸易额成倍增长。1810年英国先后占领了法兰西岛和留尼汪岛。在英国统治时期，法兰西岛复称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又改称波旁岛（1848年重称留尼汪岛）。1815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波旁岛归还法国，毛里求斯则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欧洲形势风云变化时期，群岛上的种植园经济进入极盛时期，奴隶制经济发展到了顶峰。1807年和1817年英法虽先后作出禁止奴隶贸易的决定，但实际上禁而不绝，对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制度几乎没有任何触动。毛里求斯总督法夸尔还力劝英国政府保护秘密的奴隶贸易，并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在法属波旁岛，甚至连高级官员都参加了贩卖奴隶的活动。由于殖民政府对奴隶贸易的暗中支持，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数额有增无减。1835年毛里求斯废除奴隶制之前，奴隶数量高达65000人，同一时期波旁岛的奴隶人口达71000余人，远远超过了岛上的白人移民和自由民人数的总和。

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制经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1835年英国在毛里求斯废除奴隶制，1848年法国也在留尼汪岛废除奴隶制。至此，公开的奴隶制可以说已在两岛消失，而隐蔽和变相的奴隶制依然存在。19世纪初以来，从亚洲运来的契约劳工在种植园中从事的就是奴隶般的劳动。19世纪中叶以前，马斯克林群岛的发展与奴隶制密不可分，其殖民活动和繁荣发展是完全建立在奴隶制经济之上的。

于贝尔·热尔波：前引书，第198页。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奴隶制度的变形，非洲奴隶制度史》)，London 1983, p.60.

于贝尔·热尔波：前引书，第200页。

同时期毛里求斯的白人和自由人为29612人，波旁岛为37500人。

第三章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葡属殖民地

葡萄牙是最早侵入非洲的国家，到 18 世纪末，葡属非洲殖民地基本趋于稳定。它们包括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其中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最为重要。安、莫两国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掠夺侵略中心。葡萄牙在这两个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侵略和统治中，推行了一系列殖民主义政策，试验了种种殖民统治方式，诸如政治上的领主制、总督制，军事上的黑人辅助军制度，经济上贩卖黑奴的庞贝罗制、奴隶种植园制和普拉佐制，奠定了近代殖民制度的基础。许多制度不仅为后来的殖民国家在非洲所采用，而且扩展到美洲和亚洲。葡萄牙是近代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开山鼻祖。

一、葡萄牙在佛得角、几内亚比绍、 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殖民统治

位于非洲西海岸附近大西洋中的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在葡萄牙入侵前无人居住，是一群火山岛，大多系山地和岩石。几内亚比绍地区则主要居住着曼丁哥人。

葡萄牙在向非洲西海岸扩张和探险过程中，迪尼兹·迪亚斯在 1444—1445 年间到达塞内加尔河口，发现佛得角群岛；次年侵入几内亚比绍的博拉马岛，掳掠当地非洲人运往葡萄牙，卖为奴隶，并占领这一地区。1455 年和 1456 年，为葡萄牙王室服务的意大利人卡伊季·达·达莫斯托和乌索·迪·马雷、安东尼奥·达·诺里，受葡萄牙委托侵入佛得角群岛。1460 年，葡萄牙殖民海盗迪奥戈·戈麦斯伙同安东尼奥·达诺拉占领群岛中最大的圣地亚哥岛和马尤岛。1470—1471 年，葡殖民者侵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群岛。

这些群岛被发现并占领后，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向大陆或向南扩张的基地，也是葡萄牙进一步航向东方的中转补给站。因而，葡萄牙很重视对它们的开发，一方面向这些地区移民，把国内的宗教流放者、罪犯、犹太人以及一些冒险家遣殖到岛上；一方面从非洲大陆主要是从安哥拉和刚果王国运送非洲黑人来开发岛屿。

起初，葡萄牙在这些地区实行领主制，由葡王室委任或特许葡萄牙封建领主在这些岛屿进行统治，领主享有贸易垄断权。在佛得角，迪奥戈·戈麦斯占领马尤岛和圣地亚戈岛后不久，葡王阿丰索五世即把这一群岛封给他的弟弟斐迪南亲王。1460 年，岛上的葡萄牙人又获得了几内亚沿岸的贩奴垄断权。1470 年，群岛又归属曼努埃尔亲王。在圣多美，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也实行领主制，掌握统治权的是费尔南·德·麦罗。随着殖民地移民和非洲黑人奴隶的增多，以及经济价值的日趋重要，葡萄牙政府开始接管统治权。1495 年曼努埃尔亲王继承葡萄牙王位后，佛得角群岛成为葡王室领地的一部分。1522 年，圣多美—普林西比亦收归王室管理。

几内亚比绍很快成为葡萄牙贩卖黑人的重要地区，而佛得角和圣多美—普林西比群岛则成为贩卖黑奴的转运站和贮藏所。通过这些地区，西非、刚果、安哥拉的非洲人源源不断地被装进大西洋运奴船。据估计，15 世纪下半叶，每年有 500—1000 名奴隶被运到佛得角。在圣多美，到 1550 年时，大约

每年至少有 3000 名刚果或安哥拉的非洲人被贩运到岛上。

这些岛屿的气候和土壤适宜发展经济作物，甘蔗和棉花种植园随之发展起来，奴役从大陆运来的黑人奴隶。例如，在佛得角，5—10%的白人和混血种人享有全权，占有土地，奴役 90%的黑人奴隶。16 世纪中期，这些岛屿尤其是圣多美的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1554 年，圣多美已有 60 多个甘蔗种植园。种植园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制糖业的产生和发展。1574 年，圣多美有 60 家制糖厂，共生产食糖 15 万阿罗巴（1 阿罗巴约合 14.7 公斤）；1575—1580 年间，年产量增至 20 万阿罗巴；到 16 世纪末达到 30 万阿罗巴。17—18 世纪时，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走向繁盛和巴西种植园日益发展，圣多美等岛的甘蔗种植园经济受到冲击，殖民地发展变得缓慢下来。殖民首府也从圣多美搬到普林西比。到 19 世纪上半期，大西洋奴隶贸易由盛转衰，而岛上试种咖啡树获得成功，种植园经济才在这些岛屿复兴，但已经不能在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了。事实上，从 16 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大规模入侵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时期起，葡属非洲的统治中心即已逐渐由这些岛屿转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近代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起源于西非的这些岛屿，并从这些岛屿扩展到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奥利佛和费奇指出：“种植园制度是在西非试验的……西班牙把这种制度从加利那群岛移植到了西印度群岛，葡萄牙则从佛得角群岛和几内亚湾诸岛、特别是圣多美把这种制度介绍到巴西。”

遭到残酷剥削的黑人奴隶，在非洲最先发动了反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度的起义。早在 1530—1540 年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圣多美岛黑奴起义。1574 年，爆发了一起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安哥拉黑奴起义。起义者烧毁糖厂，几乎占领了全岛，设司令部于莫坎博山。1595—1596 年，在阿马多尔领导下，攻占了圣多美城。葡萄牙殖民者用计抓住了阿马多尔，大肆报复。安哥拉黑奴撤至丛林地带，继续坚持斗争直至 17 世纪。

连续不断的黑奴起义，是导致圣多美种植园奴隶制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葡萄牙侵略安哥拉及安哥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葡萄牙与安哥拉的官方接触始于 1520 年。当时葡王室派一个传教团到恩东戈王国访问。实际上，葡萄牙人与安哥拉的接触比这更早。此前，在圣多美和刚果王国的葡人就与姆崩杜人有了贸易联系，有的还定居罗安达。1482 年，葡殖民冒险家迪奥戈·卡奥沿非洲西海岸航行到达安哥拉的圣玛丽亚角，曾竖立标柱，宣布葡萄牙领有该地。但 16 世纪中叶前，或者说 1575 年以前，葡—安基本限于维持一种以罗安达为中心、以奴隶贸易为主的商业贸易关系。葡政府与之没有直接联系，因为它的侵略重点在圣多美和刚果等地。当时安哥拉地区的西班牙人（其中以刚果族、姆奔杜族、奥维姆崩杜族、因班加拉族为主）中较强的姆奔杜族、因班加拉族开始建立王国，如恩东戈、利博洛、卡桑热等，较弱的族则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

恩东戈王国大约在 16 世纪初由西姆奔杜族联合组成，位于安哥拉北部登

皮埃尔·古鲁：《非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253 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19 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第 111 页。

Roland Oliver & J.D.Fage,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简史》), London 1983, p.120.

迪河和南宽扎河之间，版图从海岸一直延伸到现今的马兰加城。王国统治者的称号为恩哥拉（Ngola），葡萄牙人多译为安哥拉（Angola），安哥拉之名由此而来。恩东戈最初臣属于刚果王国，16世纪中期乘刚果王国衰落之机宣告独立，并不断扩张势力，开始强大。在它的东部，宽扎河与宽果河之间是卡桑热王国，约17世纪40年代为因班加拉人所建。因班加拉人起源于加丹加，1540年向恩东戈王国地区迁徙，并不断向其进攻，17世纪初定居土壤肥沃、盛产食盐的宽果河谷，中期走向强盛。恩东戈王国之南是利博洛王国，大约在16世纪前由姆崩杜人所建。16世纪初期开始向北扩张，渡过宽扎河，控制了罗安达高原的一部分。在利博洛王国的南边，现今安哥拉的南半部地区，奥维姆崩杜族占据了本格拉高原的大部，16世纪时仍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到17世纪时才逐渐形成一些城邦。

在已建立的国家中，大多实行家长奴隶制，奴隶被当作家族成员看待，主人称之为“儿”、“女”，准许保有和继承财产。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罪犯和债务破产者。土地实行部落或村社集体所有，部落成员或村民耕种土地须向王国或酋长交纳贡税。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一般由酋长议事会选举产生，掌握军政大权。由部落臣民组成的军队保卫王国。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与宗教和宗族的权威紧密结合。王国大多由某一家族建立，社会团体也以宗族集团划分；王国设有专门的神坛，创立独特的仪式，奉祭崇拜之神。例如，恩哥拉的本意即为“神龛持有者”，借以加强王国的凝聚力和国王的权威性。西班牙人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辅以采集和狩猎，几乎所有王国都掌握了炼铁、制陶和织布技术，并已有相互间乃至与外来人的贸易交往。安哥拉的这种分散、落后状态，便于葡萄牙的入侵。

16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在刚果王国寻求贵金属失败，于是将注意力转向赞比西和宽扎河流域。当时有关罗安达内陆有丰富金矿和银矿的谣传和报告接连不断传到里斯本。1560年，葡政府派两个耶稣会教士和两个僧侣到安哥拉游说恩东戈国王接受葡保护，允许葡在安哥拉殖民、掠奴和贸易，但遭到拒绝，其中保罗·迪亚士被囚禁了五年。保罗·迪亚士一回到里斯本，即在耶稣会的支持下，说服王室征服安哥拉，要求任命他为安哥拉的领主，去完成这一使命。1571年，葡王塞巴斯蒂昂授予迪亚士“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塞巴斯蒂昂王国总督和大将军”，命他征服并世袭大片领土，在六年内把100个葡人家庭移殖到征服地，正式确定对安哥拉的侵略政策。1575年，迪亚士率400人的远征队，分乘七艘战船驶向安哥拉，揭开了葡萄牙侵略安哥拉的序幕。

1575年，迪亚士远征队在罗安达岛登陆。由于安哥拉人对葡入侵有所认识，1550年潘德人就曾说过“白人又来了，……他们除了给我们带来战争和苦难外，别无他物”，且恩东戈国王也早有警惕，因此当迪亚士的远征队一上岸即遭到安哥拉人民的沉重打击。他们勉强在岛上站住脚，一年内在岛上建立殖民据点（日后的罗安达城核心），而后沿宽扎河向内地及恩东戈王国扩张，但沿途多次遭到非洲人的袭击。一位耶稣会神父记述说：“我们……见到一个带着儿子逃命的父亲，在他意识到不能把儿子救出去的时候，突然转身向我们扑来，一边跑一边射出所有的箭，直到我们把他杀死。”在安哥

David Birmingham, *Trade and Conflict in Angola* (《在安哥拉的贸易和冲突》), Oxford 1966, p.27.

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拉人民的打击下，葡军伤亡惨重，到 1589 年迪亚士死时共丧生 2000 多人（包括死于热病者）。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 15 年内仅限于罗安达到马桑加诺的宽扎河两岸 70 英里的狭长地带，在宽扎河和卢卡拉河沿岸建立了六七个殖民据点。

1580 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成为西班牙的附属国。然而，葡萄牙对安哥拉的侵略政策并未改变多少，迪亚士的继任者们先后在马桑加诺、穆克希马建立据点，进一步向内陆渗透。17 世纪初，曼努埃尔·福加兹任总督时，向东深入内陆 400 多英里，试图打通横跨大陆直达莫诺莫塔帕地区的交通，未能成功。从 1617 年起，葡殖民者把侵略矛头指向恩东戈王国，向其发动大规模进攻，遭到恩戈拉·恩达姆比国王英勇抵抗，最后靠武器优势才打败恩东戈军队，把征服魔爪伸向丛林地带。次年，葡人向高原进攻，侵入王国心脏地带，恩达姆比再次率众抗击，后因寡不敌众，撤退到宽扎河的一个小岛。殖民者焚毁王宫，惨无人道地大肆杀戮参与抗击侵略的酋长。这时恩东戈王国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女王恩津加，领导人民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反葡斗争。

恩津加·姆班迪生于 1582 年。其父恩哥拉·恩达姆比终生率部顽强抗击葡萄牙侵略者，给恩津加留下深刻印象，她从小在反侵略斗争环境中成长，目睹了侵略者的罪恶行径。1618 年父王去世，哥哥姆班迪篡夺王位，她被迫逃亡到母亲的家乡马坦巴。1622 年，她受命率一代表团到罗安达到葡萄牙总督进行谈判。她顶住了侵略者不给坐椅的恫吓和侮辱，拒绝葡萄牙要恩东戈称臣纳贡的无理要求，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能言善辩，机智沉着，终于迫使葡总督在谈判协定书上承认恩东戈是“不臣属于葡萄牙的独立王国”，放弃在姆巴卡的城堡，从恩东戈撤军，归还所有掳掠的恩东戈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恩津加准许葡萄牙商人、传教士进入恩东戈王国，允许其经由王国前往东部地区从事奴隶贸易。谈判结束时，从策略考虑，她假意接受葡萄牙人的要求，接受洗礼，取教名唐娜·安娜·德·苏姗，改信基督教，但回国后不久即宣布退出基督教。

1624 年，恩津加发动起义，阻止姆班迪投降葡萄牙，并将他处死，自立为王。即位后，她发表宣言，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御敌，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停止各族间的争斗，力求把所有的姆崩杜人联合起来，甚而与宿敌雅加人修好，派人学习其武艺，训练自己的军队。对葡萄牙人则坚持主权独立、平等贸易的原则，使葡萄牙侵略者迟迟不能达到征服该王国的目的。葡人对她怀恨在心，视之为侵略扩张的最大障碍。罗安达总督曾公开宣称，凡臣属葡萄牙王国的部落又承认恩津加为王者则严加惩处，并于 1626 年以武力扶植恩津加的一个近亲阿里·吉奎热为恩东戈国王，借傀儡之手反对恩津加，迫使她迁都马坦巴。

在马坦巴，恩津加建设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武装，以抗击葡军的东向扩张，打垮傀儡吉奎热；同时，扩大反葡联合阵线，继续加强与周围各部落的团结，并派人前往刚果王国进行联络，谋求并肩抗葡。

葡萄牙在西班牙占领时期，国势由盛转衰，海外霸权受到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挑战。1641 年 8 月，荷兰乘刚独立不久的葡萄牙还未能从西班牙占领中恢复元气，攻占葡在安哥拉的大本营罗安达，11 月又占领南部的重要据点本格拉，迫使葡殖民势力沿宽扎河后撤，在沿河两岸与荷兰人展

姆班迪系恩哥拉·恩达姆比的私生子，按规定无权继承王位。

开争夺战。葡萄牙势力一度几乎被赶出安哥拉，此后靠着巴西殖民地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准备才得以反击。1647年，葡政府任命巴西的葡萄牙人大地主萨尔瓦多·科雷亚·德·萨·贝纳威德斯为安哥拉总督，收复安哥拉。次年，他率15艘船、1500人从巴西来到安哥拉驱逐荷军，同年8月夺回罗安达，不久又迫使荷兰人放弃本格拉和圣多美岛，并于1662年和1669年分别与葡萄牙订约，承认葡对安哥拉的垄断地位。赶走荷兰人势力后，葡萄牙又加强对恩东戈王国的进攻。早在1641年荷兰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时，恩津加利用矛盾联合荷军打败葡军，使葡军一度退出恩东戈的内陆地区。现在，恩津加又率众英勇抗击卷土重来的葡萄牙人，使侵略者始终未能攻进马坦巴。此时，恩津加虽已年逾花甲，依然斗志旺盛，率军转战四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出其不意袭击侵略者，使葡萄牙殖民军总是陷入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消耗战中，不得不谋求与恩津加进行谈判。1654年，双方缔结和平协定。从此直到1663年12月7日恩津加去世，葡军未能向马坦巴发动进攻。1664年，恩东戈傀儡国王阿里·吉奎热去世，葡萄牙乘势进攻该王国，占首都蓬戈安东戈；1674—1675年，又在马坦巴发动政变，扶植傀儡，安插殖民官吏从中操纵，基本上征服了恩东戈王国。至此，葡萄牙征服了罗安达以东约150里半径范围和宽扎河下游的主要土著力量。

17世纪80年代以后，葡萄牙的征服由内地渗入改为沿海重点征服，南部从本格拉向东部内地高原推进。1685年，葡人在卡孔达和基伦格斯建立了两个殖民据点。18世纪中叶后，他们加紧向北扩张，1758年征服洛热河，直到安布里什地区；次年，又在内地通往刚果河沿海地区的商道要地恩科热修筑要塞，但不久遭到法国船队的攻击而放弃。此时，英法已在侵略非洲的角逐中不断向葡挑战，抢夺其殖民地。1786年，两国迫使葡萄牙签订马德里条约，葡萄牙被迫承认一切欧洲国家在刚果河以北地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以此换取法国不在刚果河以南的安哥拉港口从事贸易。葡萄牙在该地区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仅保住了在安哥拉的独霸地位。向北扩张受阻后，葡人又转向南方。1785—1786年，总督木萨米迪什派军远征南方，到达本格拉以南约200里处靠近贝罗河口的海湾，开辟新殖民据点，并以木萨米迪什命名。到19世纪初叶，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征服范围已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而葡商人的掠夺范围则远远深入内陆。

从1836年开始到1870年代，葡萄牙殖民当局开始考虑有效占领安哥拉领土。1810年、1815年、1817年，葡萄牙政府先后同英国订约，同意在葡属非洲限制奴隶贸易，并于1830年12月10日正式颁令废除这一贸易。废除奴隶贸易是迫不得已之举，它使葡萄牙丧失了安哥拉掠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弥补损失，葡国政府加强和扩大对沿海地区的占领和控制，增加关税收入。1855年，葡人占领安布里什港，1859—1860年占卡庞贡贝，1840年在木萨米迪什城附近海岸上建立新殖民点，1854年建亚历山大港。同时，他们以沿海港口为基地，加强对内地的有效占领，力图控制内地到沿海的商业通道和商业贸易，扩大贸易收入，寻求新的掠夺资源。1856年，葡人占基巴拉和本贝，1838年占腊甘萨，1857年占马兰热，1850年—1861年征服并占领卡桑热，1856年占卢班戈，1859年占温贝，1874年占古拉。这样，葡萄牙在安哥拉从沿海到内地、从南到北，星罗棋布地设置了殖民据点，但真正有效占领的领土并不大。它的权力范围只限于殖民据点及其周围，在内地并不能行使任何权力，但这些殖民据点毕竟为日后完全吞并安哥拉奠定了基

础。

三、侵略莫桑比克及莫桑比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葡萄牙人最初与莫桑比克的接触是在 15 世纪末。1498 年 3 月，瓦斯科·达·伽马在寻求到东方的航路上首次到达莫桑比克岛。1503 年，他受命征服东非，在莫桑比克岛上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开始了葡萄牙对莫桑比克的侵略和征服活动。当时在莫桑比克地区，古代盛极一时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已经衰落，属邦昌加、索法拉、马尼卡、巴卢伊、太特、马丹达、奇迪马和托格瓦的势力不断加强，拒绝称臣纳贡，谋求独立的倾向日渐明显。尽管中央政府实行年换火炬、年燃新火的办法加强对属邦的控制，但仍无济于事。1480 年国王马托佩死后，王国陷入内讧，昌加首先发难，在阿拉伯商人的鼓动下自称埃米尔，并于 1506 年正式脱离莫诺莫塔帕王国，自立昌加埃米尔王国。随后，马尼卡、巴卢伊、托格瓦等属邦相继独立。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分裂和衰落是其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王国在古代的强盛主要靠有作为的国王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王国的统治并不巩固。它以血缘、宗教为其统治纽带，名为统一的王国，实际上是一个中央与属邦的松散联盟。在这样的制度下，一旦大规模的征服活动停止，一旦有作为的国王不复存在，王国的分裂和衰落就在所难免了。当葡萄牙殖民者来到莫桑比克海岸时，昔日威霸四方的莫诺莫塔帕大帝国已变成了偏安一隅（今赞比西河南岸）的弱小王国。与此同时，在今莫桑比克北部，兴起了三个马拉维人契瓦族国家：一个叫卡伦加，在今马拉维与莫桑比克交界处；一个叫马甘加，在今希雷河右岸，其势力东向直达莫桑比克东海岸；一个叫昂迪，在今莫桑比克西北太特地区。他们大约在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由扎伊尔南方卡坦加（今索巴）地区迁徙到赞比西河北部地区。这些王国的社会发展基本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宫廷中还未形成固定的军政官职，主要靠顾问议事会执政。但地方上已形成酋长制，酋长专门负责调解纠纷，指导宗教祈雨仪式和保卫王国安全等。土地开始分封，酋长将部落土地分封给其忠诚的属下，征收年贡，其中一部分（往往是象牙）送国王。经济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辅以采集和狩猎。此外，在鲁伍马河以南约 100 公里的地区，还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马津巴人国家，但就其性质看，大致属于部落军事联盟制。

起初，葡萄牙的侵略和征服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占领港口和商业城邦，作为控制沿岸贸易的殖民据点和保证印度洋航行畅通无阻的补给站。1505 年，佩德罗·德尼亚亚占领索法拉。两年后，特里斯唐·达·库尼亚占领整个莫桑比克岛。1564 年，洛伦索·马贵斯沿索法拉海岸南下到德拉戈阿湾，与当地酋长签订条约，取得定期访问并自由进行象牙贸易的特权。到 16 世纪 40 年代，葡殖民者基本控制了莫桑比克海岸地带。

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葡萄牙的侵略转向内陆，重点是莫诺莫塔帕王国。当时，葡殖民者不断听说内陆有一个庞大的王国，该国的马尼卡地方蕴藏大量黄金。1511 年，葡政府派遣曾被作为犯人放逐到非洲的葡萄牙人安东尼

每个属邦有一火炬，称地方火炬，它们最初均从中央所在地的王室火焰上点燃，带回各邦，每年年终各藩王都要将之熄灭，派使者拿着它到首府重新从王室火焰上点燃，以示国王权威达及四方和各属邦对中央的臣服。

奥·费尔南德斯前往探查。在随后的四年内，费尔南德斯深入内地，走遍整个马绍纳兰，证实了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存在，还发现了一些产金区。回国后，他即建议葡王征服赞比西河流域。1530年，葡军侵入塞纳，建圣地亚哥要塞；1535年侵入太特。1560年里斯本神甫贡萨洛·达·西尔维亚率一名耶稣会士和一名修道院僧侣到达莫桑比克，向他们认为“心灵孤寂”的莫诺莫塔帕王国进发。他们先在克利马内游说当地的一个小酋长和500个臣民改信了基督教，随后留下两位助手进一步扩大传教影响，西尔维亚独自溯赞比西河而上，来到塞纳镇和太特，在自封为城关长官的葡商人安东尼奥·卡亚多的协助下，于年底到达莫诺莫塔帕王国。在随后的25天内，他诱使国王诺戈莫·莫潘扎盖托、王后及其亲戚、臣民300多人接受洗礼，改信基督教。这一行动引起了斯瓦希里商人的警觉，担心会因此失去他们对国王的影响力和通商权，于是向国王进言说西尔维亚是一个擅于妖术的奸细，其目的是为了控制王国。不久诺戈莫就派人将西尔维亚处死，使葡萄牙的计划未能得逞。

莫诺莫塔帕王国最初对葡萄牙使者以礼相待，对传教士视如宾客，许其贸易、传教，甚至给予马萨巴的葡商收取该地的贸易税、调解纠纷、惩治违法者和管理商业事务的特权，而对他们的要求只限于与穆斯林商人一样每年交纳1000克鲁萨多（约200镑）的经商税。但这种友善的行为换来的却是葡人变本加厉的侵略。这也激起了非洲人民的极大愤怒。1568年，易怒、固执和扩张欲望极强的塞巴斯蒂昂登上葡萄牙王位，幻想从印度洋沿岸进一步深入非洲内陆，驱逐阿拉伯商人势力，控制内陆黄金矿区，为传教士开辟自由传教的道路。次年，他派前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巴雷托率领1000名非洲志愿军从巴西开往莫桑比克，远征内陆。1571年11月巴雷托到达塞纳，以此为据点入侵莫诺莫塔帕王国，但沿途遭到土著人的英勇抗击，伤亡惨重。到1573年，殖民侵略军仅剩200多人，被迫撤退到塞纳，巴雷托本人也毙命于此。次年，巴雷托的助手瓦斯科·费尔南德斯·奥门从南路再次入侵，率400人从索法拉循陆路到马尼卡地区，沿途血腥屠杀反抗的土著居民，焚毁魁特佛的津巴布韦，然后率军北向抵塞纳，企图探查谣传的奇科阿银矿，继而溯河向西北到太特。此时，莫桑比克岛上的马库阿族人民发动起义，反对葡萄牙在大陆上的扩张，挫败了岛上殖民军的镇压，迫使奥门留下200名守军后率军返回莫桑比克岛。1585年，葡军又遭到马库阿人的沉重打击。不久，留在太特的守军被马津巴人全部消灭。塞纳的葡萄牙守军也于1591年被打败，包括司令官安德雷·德·圣蒂亚哥在内的300多人被俘。葡萄牙征服莫诺莫塔帕王国的阴谋失败了。

1598年，莫诺莫塔帕国王诺戈莫死去，格兹·鲁塞莱继任，王国面临危机。首先是1592年马津巴人进攻王国赞比西河谷领土，五年后河谷南部产金地又遭到邻近一个酋长的攻掠。接着王国内部统治阶级就如何对待这一变故产生分歧，鲁塞莱杀死一位与他意见不一的重亲，引起下属酋长和众亲戚的不满，发生了以马图齐尼为首的暴动。以昌加为首的一些属邦也蠢蠢欲动，谋求独立。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此时王室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分成两派，即以格兹·鲁塞莱家族为首的一派和以先王诺戈莫家族为首的另一派。1597年为镇压马图齐尼的暴动，鲁塞莱因自己力量不足，被迫利用葡萄牙人的力量。于是葡军立即从马萨巴、太特和塞纳出发，而后以镇压有功，于1599年诱使鲁塞莱允许葡人带枪进入王国。1607年，鲁塞莱又把金、铜、铁、铝、锡等矿山让与葡国王，并将奇克阿银矿开采权让与葡商人迪奥奇·马德拉。1610

年，新任葡殖民军司令拒绝交纳经商税，使莫塔帕进一步发现葡人的侵略意图，将之驱逐出境。五年后，鲁塞莱派出卡伦加人和通加人的联合部队击败入侵的葡军，并向太特的葡军进攻，迫使殖民者交纳大量布匹作为赎金才保住这一殖民据点，再一次挫败了葡萄牙的征服阴谋。

1628年，鲁塞莱之子恩亚姆博·卡帕拉里兹登基。他对葡萄牙的殖民侵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上台即开展反葡斗争，宣布与阿拉伯商人结盟，对葡人实行贸易没收政策，次年击败葡军的进攻。最后，葡军靠武器先进才于1629年打败卡帕拉里兹，强迫他驱逐阿拉伯人。此时，莫诺莫塔帕王国的王位纠纷再次激化。诺戈莫之子马武拉对卡帕拉里兹即位不满，认为这无异于剥夺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继承权。为夺王位，他与葡人结盟，并在葡人的怂恿下自立为王。1629年5月，他又与葡人签订臣属条约，愿成为葡王的属臣，表示从此以后将给予葡萄牙官员、商人和传教士以崇高的礼遇。1631年，卡帕拉里兹经过两年的准备，再次向葡军进攻，横扫王国各地的葡萄牙势力，一直打到克利马内，消灭了近400名葡军。莫桑比克岛的殖民军司令苏泽·德·梅尼塞斯亲率200人前来增援，于1633年打败卡帕拉里兹国王，将他赶入王国内地，重新扶植马武拉做傀儡国王。马武拉皈依基督教，改名菲利普，再次称臣并保证充分满足葡殖民者、传教士以及商人的所有要求。莫诺莫塔帕从此成为葡萄牙的保护国，赞比西河谷地区也为葡萄牙所控制。但莫桑比克人民的反葡斗争并未停止。马武拉在位的22年间，葡萄牙传教士和殖民者大量涌入王国，到处横行霸道，引起非洲人民的愤怒，他们采取各种形式打击侵略者。当时的莫桑比克总督不得不承认：“这些战争是由于我国国民的强横霸道所引起的，因为那些占有许多卡弗尔人、并掌握权力的人犯下了极大的罪行，以致激怒了（非洲的）国王和王子，到处发生骚乱。”

17世纪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霸权受到荷兰的挑战。荷兰人的注意力最先集中在莫桑比克岛，1604—1607年一度攻占莫桑比克岛，1662年再度进攻该岛失败。18世纪后，荷兰人把注意力转向莫桑比克南部地区，1721年在洛伦索马贵斯设商站，修城堡，建殖民据点；1727年被英国殖民者捣毁后，才被迫于1734年撤离该地区。1776年，葡萄牙还挫败了奥地利一个殖民贸易公司占领该地的企图，重新夺取这一地区，开始贸易点，派兵驻防。与此同时，葡萄牙又进行打通东西海岸殖民地的活动。1798年，塞纳河流域的殖民官弗朗西斯科·拉瑟达率50名士兵、20名葡萄牙人从太特出发，到达卢瓦普拉河谷（姆韦卢湖和班韦乌卢湖之间）的卡曾贝王国，寻求通往罗安达的商路。他们受到卡曾贝路克维萨的接见，许其通商。同年10月，拉瑟达死于热病，探险队不果而返。1802年，两名葡籍混血中介商佩德罗·若奥·巴蒂斯塔和阿马罗·若瑟从安哥拉的卡桑热出发，经隆达王国于1806年到达卡曾贝王国，并在被扣留四年后到太特，第一次完成了横穿南部非洲大陆的探险。1831—1832年，莫桑比克殖民政府派若泽·科雷亚·特蒙罗和安东尼奥·佩德罗索·加米托到卡曾贝王国，探索赞比西河源头及与该王国贸易的可能性，但未达目的。1846—1848年，乔奎姆·罗德里格斯·格拉萨从安哥拉出发，到达卡曾贝与罗安达接壤的地区和赞比西河源头，同当地的非洲人索巴签订条约。1852年，当几个桑给巴尔的斯瓦希里商人出现在本格拉时，葡萄牙人希尔瓦·波托开始穿越大陆的探险。他到达巴罗策兰，碰见从东非探险到达

该地的利文斯敦，然后返回罗安达。这些连接两块殖民地的探险活动，为葡萄牙殖民者日后全面占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做了准备。

四、殖民统治制度的演变

葡萄牙在侵略、统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谈不上十分系统、但较为完整且颇具葡萄牙特色的殖民统治制度。

在政治制度上，与圣多美—普林西比等地一样，安哥拉也经历了由领主制向总督制的演变，同时又创立了辅助军制和流放殖民制。1571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授予迪亚士“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塞巴斯蒂昂王国总督和大将军”，安哥拉领主制由此开端。迪亚士不仅取得了世袭罗安达以南170英里长的海岸线及内陆领土，也取得了对领地的统治权，以及向其他殖民者颁发土地特许权和特许证的权力。1592年，葡萄牙政府任命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担任安哥拉总督，在罗安达建立殖民政府，取消迪亚士颁发土地特许证的权力，改由葡王室颁发，把地方酋长及其臣民置于葡王室保护之下，向葡王室交税纳贡。从此，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统治转变为总督制。在莫桑比克，葡政府起初在莫桑比克岛设要塞司令，负责葡萄牙在东非地区殖民据点的保卫和进行扩张征服活动，行政上归印度果阿总督领导，同时在岛上保留傀儡酋长对土著社会的名义统治权。等到德尔加多角以北殖民地和贸易垄断地位丧失、葡在东非的统治重心转向莫桑比克地区后，莫桑比克要塞司令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加强。他接管了土著酋长的统治权，取得对整个赞比西地区商业贸易的垄断控制权，但仍须听从果阿总督的指挥。在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期间，莫桑比克的殖民统治陷于混乱状态。果阿总督、莫桑比克岛和塞纳的要塞司令三者曾因莫桑比克统治权的归属发生纠葛。1640年葡萄牙独立后，国王若奥四世曾力图放弃皇家海外贸易垄断政策，废除王室代理制，仿效英、荷实行垄断贸易公司的专卖制，但由于封建贵族的反对未能如愿。此后，随着莫桑比克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地位的日益重要，1752年它正式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直属葡萄牙政府管理，与安哥拉一样实行由政府任命的总督制。

在总督制下，总督掌管军事、行政、财政和警察大权，参与要塞司令的任命，在处理诸如殖民地保护及普遍利益时，要征求殖民地议会及葡国王代理人——首席法官的意见。议事会由殖民官员和当地人组成，首席法官由里斯本任命，负责殖民地的司法，是仅次于总督的殖民地官员。各殖民据点设要塞司令，由里斯本和总督选拔任命，负责殖民据点的保护、税收和司法以及侵略和征服活动。

罗安达和莫桑比克岛是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殖民统治的中心，总督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和商业贸易的主要集散市场。为维护殖民统治，在这两地都建立了殖民军，并在征服扩张中发展了辅助军制。起初这两地的殖民军主要是葡萄牙人，他们尽管不断得到增加和补充，但绝对人数一直不多。随着征服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以及土著人民反抗的加剧，白人殖民军力量日显不足。为此，殖民当局开始寻求把非洲土著人作为其侵略的炮灰。它在每占一地、修一座堡垒之后，就千方百计通过利诱、胁迫手段把征服地的部落武装变为殖民军的辅助军，甚至雇佣或强迫土著人到辅助军队服役，靠这些人去攻打其他土著力量，实行“非洲人打非洲人”政策。葡殖民当局称之为“黑色武器”，视之为葡萄牙征服和镇压的有效工具。它先

产生于安哥拉，后被推广到莫桑比克。最初，这种辅助军队没有正规军饷，只发战利品，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到 17 世纪初，它逐渐形成制度，部队军官主要由混血种人担当，也有为数不多的土生白人或土著酋长充任。据估计从 1575—1925 年间，大约有 5000—20000 名这类本地人部队被用来支援在安哥拉不到 2000 人的欧洲人殖民军。19 世纪中叶以前葡殖民者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统治，主要靠这些部队维持。

葡萄牙是近代第一个使用罪犯奴役殖民地的国家。它在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移民过程中，推行“佩纳尔制”（Penal System），即流放殖民制。早在征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前，葡萄牙就不断把在监的罪犯流放到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佛得角殖民地，充当水手、士兵和移民者。当注意力转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后，流放罪犯到这两地成为葡政府殖民的一项主要政策。17 世纪，两地罪犯的移民数远远超过非罪犯移民数，两地因此获得了流放殖民地的名声。特别是安哥拉，从 1498 年迪亚戈·卡奥第二次到东非至 19 世纪初，安哥拉的殖民者中占压倒多数的是葡萄牙罪犯。他们到东非后，与葡萄牙的社会渣滓一起，很快就变成了土著非洲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他们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财产，有的人甚至成了种植园主和普拉佐领主。他们也从事奴隶贸易和掠夺性商业贸易，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为殖民政府服务，充当士兵警察，成为葡萄牙控制殖民地、向内陆扩张的主要力量，又是殖民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和主要社会基础。

在社会经济制度上，葡萄牙先后实行奴隶贸易制（即庞贝罗制）、奴隶种植园制和普拉佐制。在侵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相当长的时期内，葡殖民者以掠卖黑人谋取暴利为主要经济政策，并在掠奴、贩奴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奴隶贸易制度，即庞贝罗制。“庞贝罗”来源于“普姆鲍”一词，原意是“巴武姆布族的国家”，它是内陆奴隶贸易的起点，由此经过姆巴塔省、圣萨尔瓦多，最后到达罗安达，将奴隶出口。后来这一词被葡殖民者转音为庞贝罗（Pombeiro），并赋予特定涵义，专指内地奴隶贸易的中介人。庞贝罗最初是葡萄牙人，后逐渐为土著上层人物或混血种人所代替。他们先接受如何贩奴和带领奴隶商队的专门训练，然后深入内地贩运奴隶，送到沿海奴隶堡的奴隶贩子手中，从中取利。这样，欧洲人基本上不再深入内地贩奴，而只在沿海奴隶商站和奴隶堡等待庞贝罗的到来。它改变了奴隶贸易的结构，变殖民者单一贸易为殖民者与非洲人的共同贸易。殖民者掠卖非洲人，非洲人则掠卖自己的同胞。这一制度的形成，不仅使殖民者避免了在掠贩黑人时遭受非洲人的直接打击，而且削弱了非洲人抗击殖民侵略的力量，把一部分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土著统治者诱入这一罪恶勾当中，从而使奴隶贸易愈演愈烈，规模愈来愈大，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先后成为大量出口奴隶的“黑人母亲”和“黑人工厂”。

18 世纪中叶，当黑奴贸易正兴盛时，有的葡萄牙殖民官员曾对此提出异议。1765 年出任安哥拉总督的弗朗西斯科·德·索萨·科廷霍曾力图改变这一局面，认为奴隶贸易对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和商业发展极为不利，使安哥拉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尽管它有利可图，但也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殖

道格拉斯·惠勒：《葡军在安哥拉》，载《现代研究杂志》第 7 卷第 3 期。

Pumbo，位于今金沙萨地区。

有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贩奴情况参见本卷第一章。

民统治长治久安的良策和主要追求目标。他主张发展殖民地农业的自给自足，兴办企业和地方工业，借此维持安哥拉的活力，消除非洲人的敌对情绪，达到统治的长治久安和掠夺的经久不衰。为此，他在任内采取了某些措施，如在罗安达和宽扎河畔分别建造船厂和铸铁厂，建技术训练学校，将比伊和休伊拉高原地区作为内陆殖民化的核心，把先前在卡帕罗洛河附近建立的一个殖民要塞迁到现今的卡孔达，使之成为该地区殖民和贸易中心，以此吸引周围非洲人进入他们的社会。然而，他的计划和努力最终成为泡影，因为经济落后的葡萄牙的生存离不开巴西的繁荣，而巴西的繁荣又离不开安哥拉的奴隶。葡萄牙殖民主义史学家直言不讳地承认：“巴西的躯体在美洲，而灵魂在非洲，没有黑人就不会有伯南布哥，而没有安哥拉，也就不会有黑人。”

因此，葡萄牙政府根本不理睬科廷霍的建议。

葡萄牙在佛得角、圣多美等地实行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扩大到了安哥拉。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开始办种植园，但主要集中在今安哥拉北部，经营者也多系圣多美的殖民者。17世纪30年代，圣多美的一位名叫加斯帕·阿尔瓦雷斯的殖民者在今安哥拉和刚果拥有100个种植园，数千名奴隶，其规模之大、奴隶人数之多并不比圣多美等地的某些种植园逊色。不过这一时期，葡殖民者在安哥拉推行的经济制度主要不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而是黑奴贸易。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渐转衰后，一些殖民者才纷纷向葡萄牙政府建议在安哥拉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如一位叫洛佩斯·德·利马的殖民者曾建议说：“今天这里（安哥拉）的奴隶中有20—40%的人系长期定居，但随着我们的城市居民和普雷西多们决定开垦和利用土地，奴隶的人数将会飞快增长，尽管这会引来巴西同行们的反对……而且，当那些曾与我们结盟的内陆索瓦（土著酋长）最终确信已再不能向外国贩卖他们的臣民和囚犯的时候，那末，我们最好是雇佣这些人在土地上劳作，通过向市场销售他们在殖民地所生产的商品榨取利润。”¹于是，葡萄牙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注意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很快，罗安达地区和本格拉高原成为葡殖民者开办种植园的中心。1850年，罗安达的种植园内就有6020名奴隶在劳动，且多为女奴，占该地总人口的近一半。到1870年，罗安达至宽扎河地区形成大规模的种植园。10年内，沿河的大部分肥沃土地均落入葡种植园主手中。到1890年代，该地区已有28个咖啡种植园近3800多名奴隶。在本格拉地区，19世纪40年代在木萨米迪什的葡萄牙人始建种植园，种植甘蔗；到60—70年代，随着棉花引种的成功，该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得到广泛发展，在种植园劳作的奴隶估计有2000—4000人之多。他们在监工（往往是奴隶）的监督下，在种植园集体劳作，每天往往从日出一直工作到日落，中间只给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种植

伯南布哥系巴西东北部一州，16世纪30年代被葡萄牙占领，开办种植园。

Boxer, Salvador de Sá and the Struggle for Brazil and Angola, 1602-1686 (《萨尔瓦多和夺取巴西和安哥拉的斗争》), London 1955, p.240.

Paul E.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奴隶制的变形：非洲奴隶制度史》), Cambridge 1983, p.129.

Lovejoy, op.cit., p.231.

Lovejoy, op.cit., p.231.

Lovejoy, op.cit., p.232.

园主或监工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并随时可能被种植园主作为贡品、商品和祭品而被进献、买卖和杀死。

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赞比西河流域实行普拉佐制，产生于16世纪末。当时，侵入该地区的葡商人、士兵、冒险家以及流放犯发现这里的社会与封建制的葡萄牙没有多大差别，土地由酋长控制，酋长有一定的独立性，对国王或大酋长的忠诚体现在纳贡、服军役和效忠誓言上。他们认为这是掠夺土地建立殖民统治的好条件。这一时期正值非洲社会政局不稳，最大的王国莫诺莫塔帕的赞比西河各领土受到马津巴人及其邻近部族的攻击，内部不断发生反莫诺莫塔帕的叛乱，一些酋长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于是，葡殖民者利用这些统治者寻求帮助、摆脱困境的急切心理，乘机凭借其武力和财力，或者支持一方打一方，或同时支持交战双方，然后以功臣自居，通过诱骗或武力征服的手段，从国王或酋长们手中掠取大片土地以及对土地上非洲人的统治权，将其变为普拉佐，他们自己则成为普拉佐的主人。

随着葡萄牙1640年摆脱西班牙而独立，葡政府加快了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扩张，力图将其行政管辖权扩展到赞比西地区。普拉佐的出现，使葡萄牙当局意识到这是实现其愿望的好办法。葡王室把赞比西河南部大部分领土作为未来普拉佐特许地，以每一普拉佐不超过三平方里格的规模特许给对王室有杰出贡献的人，规定受封人须在封地上居住，与封地上的欧洲人结婚，负责普拉佐的经营开发。普拉佐制由此发展起来。然而，在普拉佐的发展过程中，葡政府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有的普拉佐的面积不断扩张，有的特许权已转入投机者手中，有的普拉佐主则与当地非洲人、印度人结婚，形成混血人，且一些贵族、官僚和传教士也加入普拉佐行列。17世纪末，为确保殖民当局的统治权威以及在赞比西地区的白人人数，葡政府对普拉佐重新加以规定，特许的普拉佐的继承权只限于长女，同时她必须嫁给出生于葡萄牙的葡国公民，否则取消其继承权；另外也把一些普拉佐作为嫁妆特许给少量王室仆人和贵族的遗孀、孤女，作为生计补偿，她们同样也须与葡萄牙出生的公民结婚，她们对普拉佐的财产拥有独享权和转让权（限于女性三代，即最初承租人、她的长女和长孙女），可以向普拉佐的土著居民征收年贡，但要向葡政府交纳免役税和什一税。至此，普拉佐最后变成了“赞比西主妇”。葡政府从克利马内到奇科瓦、再到索法拉划界，将其土地划为一块块普拉佐或大地产，面积从3—4平方里格到8—9平方里格不等。到1806年，克利马内、塞纳、马尼卡、太特等地区共有502个普拉佐庄园，而且出现了大普拉佐吞并或控制小普拉佐的局面。1801年，赞比西流域有14或15个大普拉佐控制了约112个小普拉佐。

关于普拉佐的社会性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多认为是奴隶制，也有的认为是葡—非封建制。实际上它是欧洲封建制与非洲奴隶制的混合物。从它的发展过程及普拉佐主与葡萄牙和非洲人的关系看，它带有封建性，某种程度上仿效了葡萄牙的早期封建制。形式上，获得普拉佐要经过葡王室的特许，普拉佐主对葡王室有一定的封建义务，这类似欧洲早期的封建领地制。而普拉佐主则是通过土著酋长向以部族或村社为社会单位从事农业

Prazo，葡在莫桑比克建立的庄园。普拉佐制，有人译为葡非封建制。

Leroy Vail & Landeg White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zambique :A Study of Quelimane District (《莫桑比克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克利马内地区研究》)，London 1980，pp.8，12.

生产的非洲人（在普拉佐上称科洛诺，Colonos，即佃农，tenant farmers）征税，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的人头税或地租。所征多为实物，起初主要是象牙，有时奴隶也可顶替，到 19 世纪上半叶奴隶逐渐成为主要的贡纳物。此外，这些科洛诺人也要随时准备为普拉佐主进行无代价的工作。但从普拉佐的整体发展来看，它又体现了很大的奴隶制性质，它不仅带有非洲固有的奴隶制的痕迹，而且受奴隶贸易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奴隶制因素。

在普拉佐社会阶层中，除了科洛诺和普拉佐主，还存在着一个伊斯科拉沃阶层（escravos），即奴隶阶层，他们是一些被买来或是被掠夺来而没有被卖掉的非洲人。关于奴隶的人数，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到 1806 年在赞比西地区 502 个普拉佐共有奴隶 21827 人，有的则说 1759 年有 1 个普拉佐的奴隶就达 6000 人，有 10 个超过 1000 人，有 11 个有 500—1000 人，甚至还有有的普拉佐拥有 33500 名奴隶。总之，这个阶层的人数较多，主要从事采矿、贸易（贩卖黑奴和象牙）、狩猎、普拉佐主的家内仆人、士兵以及种田。他们几个人编成一队或一组，在监工的监督下为普拉佐工作。1831 年，一位意大利籍的代理商曾观察赞比西河一个普拉佐组织奴隶开采黄金的情形，他记述道：“受雇在矿上工作的奴隶通常被分成若干因沙卡（Insakas），每一因沙卡由六名女黑奴组成，而且只有妇女进行开采工作，她们由一个女恩亚科达（Nyakoda）负责。她每次向属下下达一个星期的工作任务，一周劳动四天，每位女奴一周必须为普拉佐主取得六坦加（Tangas）的黄金，其余的归自己。一般女奴往往在第一天就完成定额，出现这种情况，其余三天也不会再增加定额。巴雷斯的矿主们一般都有进口的布和串珠，他们把这些东西以高价卖给奴隶。另外，奴隶们也秘密地从过路商人那里购买他们所需的東西。”由此可见，奴隶被集体组织来为普拉佐工作，而且与当地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家长奴隶制的影响有关。但她们的人身并不自由，不能随意离开普拉佐，更不得逃跑，甚而劳作时也被绳索连结在一起。19 世纪末，约翰·威洛比在访问赞比西河流域一个庄园时看到有两队奴隶（每队有 12 名妇女组成）正在从河岸向农场搬运东西，其中大多数妇女背负婴儿，每个人都脖套铁环，相互间有一根连结铁环的重链子将她们拴在一起，以防逃跑。普拉佐主也可以将他们重新卖掉，不论是从事什么样工作的，即使是颇受主人赏识的奴隶也避免不了这种命运。这种现象到 19 世纪东非奴隶贸易兴盛时尤为明显，以致于普拉佐由于劳动力缺乏而造成农业和采矿业凋敝，许多普拉佐因此而衰落。

此外，普拉佐制从一开始就未能触动非洲社会的基本制度，保留了非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如家长奴隶制、村社制，利用其为殖民统治服务。普拉佐主与领地上的一般非洲人发生关系主要是通过酋长或头人，传统的酋长和头人对非洲人仍起着支配作用。在有的地方，有的部族甚至仍然维持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由此可见，普拉佐是一种混合物，主要由早期欧洲封建制与非洲奴隶制结合而成。

Leroy Vail & Landeg White, op.cit., p.12.

M.D.D.Newitt,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on the Zambezi(《赞比西地区的葡萄牙人移民》), London 1973, pp.177, 200-201.

Lovejoy, op.cit., p.229.

Lovejoy, op.cit., pp.229-230.

17 世纪中叶以后，普拉佐成为葡萄牙掠夺莫桑比克的重要手段。在赞比西河沿岸，它主要以农业为主，种植油棕、玉米、稻米等；在太特地区，它以黄金开采和象牙贸易为主。18 世纪时，赞比西河口的普拉佐卢阿博已成为莫桑比克整个地区的粮仓，不仅向塞纳、太特和莫桑比克岛提供稻米，甚至输往葡属印度果阿。进入 19 世纪，随着东非奴隶贸易的兴盛，普拉佐的主要经济生活转向掠卖奴隶和象牙。普拉佐主凭借豢养的由奴隶组成的私人军队，不仅对土著居民和奴隶进行掠夺和剥削，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也因本身坐大而不时抗拒葡殖民当局的命令，引起葡政府的不安。殖民当局开始寻求办法，维护其在该地的权威。1832 年里斯本宣布普拉佐为非法，1838 年又颁令停止对普拉佐特许权的延续，规定普拉佐将只被允许对土地租赁三年。另外，鉴于从 18 世纪起出现“在外普拉佐主”（他们脱离普拉佐，居住在莫桑比克岛或里斯本、果阿进行遥控），以及普拉佐不经营农业、专事奴隶贸易的现象，规定租地在三平方里格以上者必须在租地居住，并在一年内保证土地得以耕种。1854 年，葡萄牙再次颁令废除旧普拉佐制，实行新制。新的普拉佐有一定租期，规模也不超过三平方里格，承租者在五年内必须使租地得以耕种，并直接向政府交纳收入 10% 的租税；昔日的普拉佐被改为定期租赁制，并必须办理租赁许可手续，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将由政府予以补偿。但由于普拉佐领主的阻挠，这些条令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一直到 20 世纪初旧普拉佐制才被真正废除。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是葡属莫桑比克特别落后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强制推行基督教，将它作为侵略的工具。1506 年（或前一年），一些教区神父和教派代表从葡萄牙来到索法拉和莫桑比克岛，开始传教。安哥拉大致在同一时期也传入基督教。安哥拉的传教士主要是多明我会教士，他们除传教外，也狂热地参加奴隶掠夺和贩卖，认为只有把黑人卖到美洲种植园才有可能使之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参与黄金及象牙贸易，掠夺土地，经营种植园或庄园，甚而直接卷入征服活动，致使非洲人民对之深恶痛绝。由于其教义远离非洲现实，葡萄牙的宗教侵略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在莫桑比克，马津巴人 1590 年在对塞纳和太特进攻时处死几名传教士，其余的也撤离了这些地区。从此，葡萄牙在内地的传教衰落，到 1630 年整个殖民地只有不到 50 名传教士；18 世纪末，基督徒总数也不过 2141 人；1825 年，传教士仅有 10 人，其中 7 人还是果阿人。安哥拉的传教活动在 18 世纪也呈衰落之势。1716 年，主教的驻区已从圣萨尔瓦多移到罗安达；1800 年时，安哥拉仅有 9 个或 10 个神父、25 个教区牧师，其中半数以上是非洲人。天主教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罗安达成为其活动中心，很少到内地传教了。由此可见，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由于葡萄牙人的传教活动与奴隶贸易纠缠在一起，葡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文化侵略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五、安哥拉、莫桑比克的社会变化和早期启蒙运动

到 19 世纪中叶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葡萄牙 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下，社会的正常发展被破坏，只能沿着畸形的殖民化道路发展。

奴隶贸易不仅使两地的强壮劳力被掠卖出口，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凋蔽，而且因其获利既快又易，把许多非洲人卷入脱离生产、专事掠奴的活动之中。19世纪中叶，利文斯敦探险到赞比西地区时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当奴隶贸易开始时，对许多商人来说，似乎卖掉奴隶成为较快的致富手段……而且他们在继续出口奴隶，直到连为之劳动和卖命作战的人都没有了，就像杀鸡取卵的故事一样。咖啡、甘蔗种植园和金矿开采也都被放弃，因为劳工被出口到了巴西，许多葡萄牙人那时都在掠奴。”

奴隶贸易特别是庞贝罗制的形成，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奴隶制沿畸形方向发展。一方面，大量的黑人被作为奴隶出口，瓦解了两地固有的家长奴隶制，阻碍了原有奴隶制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被掠卖出口又使农业及正常贸易遭受破坏，其结果，非洲社会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严重威胁土著王国和部落的生存发展。然而奴隶贸易获利既快又大，引诱许多酋长、国王等土著上层人物相继卷入，这又极大地刺激了非洲各王国之间、各部落之间的相互攻掠，以求将对方掠卖为奴。这种恶性循环既加深了非洲人之间的敌对，又改变了非洲传统奴隶制发展的轨迹，掠奴、蓄奴和贩奴则成为土著王国、部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种畸形奴隶制支配下，一些王国或部族的势力在激烈竞争中衰落，另一些则在角逐中崛起或强大。这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远比人口的丧失深远得多。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两地区社会的内聚力，破坏了非洲人民抗击殖民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进程，也使非洲的部落和村社制度得以长期顽固地存在和发展。

大规模的种植园和普拉佐制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瓦解和破坏了传统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引入了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私有的观念与制度（尽管理论上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均系葡王室所有，但实际并非如此）。这对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本应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它们在这两个地区的出现是建立在殖民掠夺基础之上的，主要是以封建的甚至是奴隶制的手段进行掠夺，因而土地制度的变化给两地带来更多的是灾难，更加有利于葡萄牙的掠夺。后来在葡萄牙掠夺莫桑比克中起重要作用的三大公司（莫桑比克公司、尼亚萨公司和赞比西公司），就是在普拉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奴隶贸易以及黄金、象牙贸易的发展，引起两地区（无论是殖民占领地或非殖民占领区）某些地方的经济由昔日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殖民商业贸易为主。它刺激一些旧王国变为与之相适应的商业王国，如马塔巴、卡桑热以及几个奥维姆崩杜王国；同时崛起了一批新的以贸易为主的强大部落和王国，诸如安哥拉高原上的姆维拉族的胡伊拉国、恩加乌国，奥维姆崩杜人的比赫王国、恩杜卢王国和贝隆杜王国。它们在奴隶贸易中充当庞贝罗角色，并组织象牙、橡胶商队与葡人贸易，控制内陆商路，从中获利，维持国家和政治组织的生存。它们的发展、繁荣及至衰落均受制于葡萄牙殖民掠夺，一旦丧失了对商业贸易线的控制以及与殖民者商人贸易的机会，王国的发展就受到影响。如安哥拉的卡桑热王国，19世纪以前一直是葡商人与内地隆达王国进行奴隶贸易的中介，并因此成为一个较强大的王国。19世纪初，葡殖民商人面对禁奴运动的发展，非洲西海岸奴隶贸易利润日渐下降，对卡桑热充当奴隶贸易中介商不再感兴趣，寻求与内陆的直接奴隶贸易。为此，1806年殖民当局派使者到隆达王国，探讨直接贸易的可能性。两年后，隆达使者到

罗安达与葡殖民当局达成直接奴隶贸易协议，开辟了穿越因班加拉人领土不受卡桑热控制的新奴隶贸易商路，结果卡桑热王国因此由盛转衰。等到奴隶贸易大范围废止后，这些王国愈益走向衰败。

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经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除种植原有的作物如小麦、稻子外，还引进了一些美洲作物。在安哥拉，大约从17世纪起，在殖民据点周围开始种植玉米、木薯。此后，玉米、木薯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的重要粮食作物。西红柿、烟等产品也相继传入。19世纪巴西独立后，许多葡萄牙人纷纷逃亡安哥拉，他们将咖啡、棉花、甘蔗种植技术带到沿海地区。到19世纪中叶，在宽扎、邦戈和登迪河谷，非洲人已小规模种植棉花、咖啡、蜂蜡和棕榈。内陆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一些来自葡萄牙阿尔加沃省的渔民率家眷来到这里，开辟了安哥拉的渔业。在莫桑比克，类似的变化也在发生，但没有安哥拉明显。

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尽管1820年以后葡萄牙法律已明文规定，所有安哥拉人都是葡国公民，但在两地区依然存在等级差别悬殊的不同阶层。葡萄牙白人逐渐成为两地区社会的最高统治阶级，他们人数不多，但占据主要的统治职位。他们之下是混血阶层。由于殖民者尤其是移民来到两地时大多系男性，这给殖民地的白人繁衍带来困难，虽经殖民当局多次努力，输送白人妇女（多为妓女）到殖民地，但成效不大。因此，殖民者和移民纷纷与当地女奴同居，产生了一大批混血儿。到18世纪时，他们的穿着仿效欧洲人，既会讲土著语，也会讲葡萄牙语；他们受过教育，其中有的人还到葡萄牙留学，并信奉天主教。他们追随白人殖民者，充当殖民官员，也狂热地从事奴隶贸易，占有种植园和普拉佐庄园，与白人一起压迫剥削土著非洲人，有时甚至自恃土生土长，是天然的统治者，与葡政府和殖民当局对抗。他们之下是非洲人的上层，包括国王、酋长及其属下官员。普通非洲人和奴隶构成社会的被统治阶层。土著上层具有二重性，他们一方面被迫向殖民者称臣纳贡，充当殖民统治的御用工具；另一方面继续利用传统权力压迫和剥削自己同胞，充当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甚而从事掠夺同胞的奴隶贸易勾当。黑人奴隶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来源主要不再是因债务、犯罪或交战被俘，而是专门掠夺而来。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包括农作、开矿以及商业运输，充当掠奴工具和殖民辅助军炮灰，并随时有被主人买卖和杀死的危险。

进入19世纪后，葡萄牙本国经历了拿破仑入侵和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造成殖民地统治的不稳。继巴西1822年脱离葡萄牙独立后，在安哥拉产生了以土生白人和混血人为首的分离主义思潮。

19世纪，土生白人尤其是混血人的势力在安哥拉社会中得到加强，他们在殖民政府中占据相当地位，往往以安哥拉人自居，其中有的对葡萄牙的腐败衰落深表不满。他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安哥拉传播共和主义，并把共和与脱离葡萄牙统治相联系，形成分离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维护土生白人和混血儿利益的团体、俱乐部，如1851年前不久成立的罗安达安哥拉省商业利益促进委员会和后来的罗安达商业协会等。报刊成为其宣传共和与分离思想的喉舌。1842年，安哥拉发行了最早的刊物《黎明》文学杂志；三年后，又出版了最早的报纸《总督官方公报》。这些报刊大多由欧洲人或土生白人及混血人经营，不仅成为表达这些人自由思想的神圣工具，而且也是揭露不公正和虚伪的武器。其中《南方十字星》报最著名，它

创刊于 1873 年，由欧洲人、非洲人共同写稿，积极鼓吹用共和方式解决安哥拉问题，要求彻底变革安哥拉殖民统治，在当时影响很大。

19 世纪 60—70 年代，安哥拉逐渐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由土生白人和混血儿组成，大多在本地接受过欧洲初中等教育，有的甚至到里斯本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纷纷给报刊撰写文章，或者宣扬共和主义，反对葡萄牙的专制主义；或者揭露葡殖民统治的腐败和不公正，甚至宣扬安哥拉自治和脱离葡萄牙的分离主义。混血人记者、作家兼律师若泽·德·丰特斯·佩雷拉（1823—1891）曾发表大量文章，抨击葡殖民统治。他写道：“事实证明，除了奴隶制的欺骗和镣铐这种葡萄牙人仅有的残酷对待和压制土著人的手段外，我们不能指望从葡萄牙得到任何东西。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宣布，我们既不相信葡萄牙殖民者的好意，也不相信它的诚实，它的成员只不过是引诱其受害者而哭叫的鳄鱼。我们太了解他们了！让他们滚蛋吧！”他的不屈精神使他死后赢得了“安哥拉新闻事业的先辈”和“斗争最力、斗志最旺”的安哥拉作家的称号。

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人主要是从维护土生白人及混血人的利益出发，他们所讲的安哥拉人主要是指受过欧洲教育的安哥拉人。尽管他们对土著非洲人的处境有时也表示同情，但并不真正代表非洲人，因此其运动的成效不大。然而，他们的近代化斗争方式以及抨击葡萄牙殖民统治、谋求安哥拉自治甚至摆脱葡萄牙统治的思想，客观上影响了土著非洲人。非洲人也开始仿效欧洲人的各种社会俱乐部和专业团体，建立自己的社团。他们的反葡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1835—1845 年本格拉附近发生了长达十多年的非洲人和混血种人的反葡暴动，其规模之大连殖民当局也无可奈何。到 19 世纪 60 年代，非洲人的反葡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当时的总督阿马拉尔害怕安哥拉全国暴动，预感到葡萄牙在安哥拉要遭到法国在海地的同样命运。安哥拉土著非洲人的觉醒已初步孕育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为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十六至十八世纪刚果河流域诸国

刚果河流域是指大西洋与坦噶尼喀湖、博木河与卢瓦普拉河之间的中非热带森林地区。这里雨水充沛，可耕地资源丰富，住着班图人的许多分支：巴刚果人、卢巴人、库巴人、隆达人、姆崩杜人等等。自 14 世纪出现刚果王国以后，到 16 世纪初期，各支班图人大都已经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有的还建立了国家，如卢巴王国、库巴王国、隆达王国等。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往来频繁，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和产品数量与种类的增加。到 18 世纪末期以后，由于奴隶贸易的步步侵蚀和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掠奴战争以及争夺王位的内讧频频发生，各王国逐渐走向衰落。

一、刚果王国的盛衰

刚果王国在进入 16 世纪以后，仍是刚果河流域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王国版图辽阔，下辖八个省：沿海地区的索约省、姆邦巴省；北部的恩松迪省；南部的温博省、旺杜省、姆庞古省、姆巴塔省和姆庞巴省。另外，北方的罗安果王国和南方的当博、马坦巴、恩东戈等王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刚果王国的宗主权，经常向它纳贡。17 世纪，当刚果王国处于鼎盛时期时，西至大西洋沿岸、东达宽果河、北抵尼阿底河、南迄宽扎河，几乎都在它的控制之下。

随着王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国家机构也相应地建立和完善起来。整个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称姆维西刚果）手里。国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兼领最高司法权，根据刚果习惯法，死刑往往由国王裁决。各省的省督和中央高级官吏由国王任命。但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他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能随意转让王国的土地，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必须征询贵族会议的意见。国王临终时，无权指定继承人，而须由贵族会议从国王嫔妃之子中选出。因为国王的正妻来自姆巴塔省的恩萨库劳家族，为了避免一族的势力过分强大，刚果传统习惯规定，王位候选人只能从前王的嫔妃之子中产生，她们一般是中央坎达（氏族）的成员，或是国王的近亲和享有姆维西刚果称号的姐妹。

辅佐国王的中央高级官吏包括：处理贵族之间纠纷案件的司法官“凡戈凡戈”；负责统领军队的指挥官“马卡卡”；一名司库和二名税收官。到 17 世纪中期，这些官职大都变成某些家族世袭的职位。国家的常设武装力量是国王卫队，它由四名军官指挥，驻扎首都，以保卫国王和贵族的安全。除卫队外，刚果王国没有一支全国统一的常备军，当国王决定要打仗时，由“马卡卡”负责传令给各地贵族和省督，让他们在所辖地区征集军队，并带到指定集合地点。17 世纪时，一位葡萄牙人的报告提到刚果国王一次能征集到约八万人的军队。

贵族会议（称“勒·姆班达”，ne mbanda）是刚果王国当时最重要的一

对刚果王国辖省的数目说法不一。本文根据 AnneHilton, The Kingdom of Kongo (《刚果王国》), Oxford 1985, pp33-34.

巴兹尔·戴维逊：《黑母亲》，三联书店 1965 年，第 119 页。

个常设机构，它由 12 名成员组成，包括 8 名来自王国中心地区一些大氏族里的首领和 4 名已故国王的妻子、婶母或姐妹。他们负责协助和监督国王处理国家重要事务，至少在理论上，宣战、官员的任免、道路的开通或关闭，都要经过贵族会议的同意。国王作出的一些重大决定，也由贵族会议负责监督实施。

国王在各地的代理人是各省省督。他们担负三个重要职责：在军事方面，负责为国王征集军队，因而有军事首领之称；在经济上，负责为国王征收贡物和管理商道，贡物数量不定，当国王力量十分强大且风调雨顺的时候，省督上交的东西较多，相反则较少；在司法上，负责审理民间纠纷，以国王的名义作出判决。为防止省督权力过大，构成对王位的威胁，每位国王在上台之初，便从自己的亲信或亲属中选派新省督；平时，鼓励省督把子女送到首都接受教育。每隔三年的 7 月 25 日，各省省督要带大量礼品来首都觐见一次，以示效忠。另外，国王还经常向各省派出特使，对省督的政绩进行考察。

省以下的行政单位是姆维拉和坎达。前者由若干个互相通婚的坎达组成，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其首领为部落酋长，管辖几个甚至数十个自然村落。在 15—17 世纪到过刚果的欧洲人，一般把这一层行政组织称为县或区，实际上，这是套用了当时欧洲行政机构的名称，二者并不相同。姆维拉与县或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奠基于血缘关系之上，部落酋长选自最强大的氏族酋长，不是省督直接指派的行政官员；而欧洲在县或区是按地域划分的，其行政长官或由上级任命，或由本地推举上报批准，他们不一定与本地有血缘关系。坎达（欧洲人称为村）由若干个血缘亲密的姆武穆（支系）组成，姆武穆内则含有若干对偶婚性质的家庭，它们大多数实行一夫多妻制，自 16 世纪基督教在刚果传播后才有少数教徒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

姆维拉和坎达酋长的一个主要行政职能是向本族人征收贡品，收齐后交给省督。各省省督除留下一部分作为己用外，余者送往首都。贡品包括奴隶、象牙、棕榈纤维布、盐和皮革等，通常是各地特产。这种进贡制度在刚果人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象金字塔一样，从地主到中央层层上贡。王室在收到贡品后，一般只留下一部分，大多数是被国王赏赐给下面的大臣，以及作为回报，给其他省督带回去，省督再如法炮制。如沿海省份进贡盐、贝壳、干鱼等物品，国王则赏赐给他们较为缺乏的淡酒、粮食和兽皮。因此，刚果的进贡制除表示政治上的效忠服从外，还起到了一种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的商业功能，无形中建立了一个商业贸易网络。刚果国王通过控制这个网络以及某些紧缺物品，如恩赞布贝壳、精美的棕榈布、尤其是后来的欧洲舶来品，增强了自己在臣民中的威信。除此之外，对于某些人来说，进贡还有依附目的。置身于别人的保护之下，“对贫穷、孤立和被不安全包围的居民们来说，依附一个较大的、较安全的团体是十分重要的”。相反，一个集团或个人如果没有交纳足够的物品，往往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行政官员（包括省督）有被革职的危险，普通百姓则可能被罚为奴隶。直到 18 世纪，刚果王国的财政收入和对它族的统治权都是通过纳贡实现的。

姆维拉和坎达起到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分配土地。在刚果王国，土地私有权一直未被普遍确立。土地最高所有权掌握在姆维西刚果，即贵族集团手里，由他们负责给姆维拉划分土地。每个姆维拉都拥有大片土地，包括现耕

地、休耕地，也有荒地和山林。姆维拉酋长对全部土地负有管理责任，如维护部落土地的完整性，调整各坎达之间的土地纠纷，有权决定把山林、荒地交给外来氏族使用。各坎达的酋长则负责把本氏族的土地划分给姆武穆。姆武穆的首领再把它划成小块，分配给成年男女成员耕种。每隔一定时期，坎达的酋长和姆武穆的首领都要重新划分一次土地。至于狩猎的森林则属于整个姆维拉，不划分使用区域。此外，在刚果王国的少数省份里，部分土地还实行氏族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制度。

贵族土地私有制作为一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 16 世纪已初具规模。当时有三种形式：一是国王的封地，即由国王分封给各省省督的土地。封地上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和全部收入归省督。有时省督还把封地再分封给下属贵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二是一般贵族的私有庄园，通常是在职省督利用权力蚕食、肢解某些部落的公有土地，或者到森林和荒原中开辟一块土地，以传给后代和其他旁系亲属而形成的。三是国王赏地。大约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刚果国王常常把一些土地连同上面的村落和居民赏赐给他喜欢的贵族或客人，这类村庄被称为“金甘古”，意即“献出的村庄”。许多史料表明，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和省督、贵族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部落公有土地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贵族私有土地。例如在姆邦巴省，16 世纪末只有一块为历届省督所有的国王封地，但 100 年后，佩姆巴、先鲍、列比塔和布姆比等四个部落的土地都被贵族占有，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1/3 左右。

伴随着这两种土地所有制，在刚果王国出现了两种奴隶制并存的局面：一种是在广大部落氏族组织中流行的家长奴隶制（一译父权奴隶制）；另一种是在贵族封地、庄园里初步发展起来的大奴隶制（一称劳动奴隶制）。

家长奴隶制通常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在古代希腊、罗马很快转化为大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的一种典型形态。但是，在刚果王国，家长奴隶制几乎与该王国共始终，存在的时间很长。在刚果许多地区，家长奴隶主要是债务奴、因穷困所迫而投靠其他氏族的“自愿”奴隶和战俘奴隶。他们与主人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兼为主人做家务。劳动果实除了留下糊口以外，其余上交给主人。主人有义务向奴隶提供工具、衣物和住所，以及为成年奴隶完婚、建立家庭。当奴隶犯罪受到处罚时，主人要代为支付赔偿。同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相比，刚果家长奴隶制下的奴隶受到的剥削较轻，他们同主人在生活方面悬殊也不是很大。主人称呼奴隶为“巴纳”（Bana，意为“孩子”），奴隶称呼主人为塔塔（Tata，意为“父亲”）。根据传统习俗，如果奴隶没有犯罪，主人不可以把他们卖掉。平时，这些奴隶在衣食住行方面同自由民相差无几，只有当他们同主人说话而下跪时才显示出他们的奴隶身份。主人及其家眷也要下田干活，因此，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靠剥削为生，奴隶也没有承担主人家里的全部劳动。另外，刚果家长奴隶的地位变动性较大，赢得主人欢心而受到赏识的奴隶可以摆脱奴隶身份，有的甚至成为主人的代理人，单独出去经商或替主人办事。

刚果大奴隶制是到 16 世纪晚期随着贵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加深，在家长奴隶制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当时，在首都圣萨尔瓦多和索约省府集中了大批奴隶。据统计，在 17 世纪上半期，圣萨尔瓦多有约 6—7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他们负责供应住在首都 9000—12000 名贵族和奴

隶侍从的粮食。也有许多奴隶在国王的矿山里采掘金和铜，或充当国王的卫兵。在阿尔瓦罗二世统治时期（1587—1614年），大约有16000—20000名奴隶卫兵，他们由4名刚果贵族统领，驻扎在首都和其他战略要地，担负守护任务。在贵族封地和私人庄园里，有众多奴隶在划好的地块上替主人耕种。所有的农活，除了开垦荒地外都是由女奴隶完成的，而男奴隶一般从事各种手工业、为主人建房和充当搬运夫等。这些奴隶的生活非常不稳定，稍有使主人不满意之处，主人就会收回土地，甚至把他们卖掉。

国王和贵族获得奴隶的渠道包括地方酋长和省督的进贡，以及通过战争掳掠异族人为奴。许多史料表明，在非洲以掠奴为目的而发动战争，是葡萄牙等欧洲人贩卖奴隶的结果。16世纪以前，非洲内陆各地尚未出现掠奴战争，只是在此以后，随着美洲大陆的开发、奴隶需求量的飞涨，欧洲奴隶贩子不断云集中、西非沿海港口，用枪枝、烈性酒等物品引诱某些非洲人出卖奴隶给他们。刚果王国也不例外，为了获得大批欧洲商品，刚果国王和贵族在把本族罪奴卖掉以后，只能通过向外发动战争而重新获得奴隶去交换，当时主要是向东北部的提奥人发动袭击。当然，也有许多奴隶被留下来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一般说来，战俘奴隶的处境比较悲惨。他们劳动强度高，动辄被卖往他乡，而且他们都身带奴隶的屈辱标记，如穿透鼻孔、割伤耳朵、烙铁烫印等，甚至出现以异族奴隶殉葬的惨景。

这种占有大量奴隶、以奴隶劳动为目的的大奴隶制，尽管是家长奴隶制的发展趋势，但在16—18世纪的刚果尚未构成剥削的主导形式。广大部落的家长奴隶制仍然较为普遍，且奴隶劳动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据估计，在17世纪，整个刚果王国的奴隶总数约十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5。可是，除掉奴隶侍从和卫兵以及准备卖往海外的奴隶，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奴隶并不多，社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刚果本族的下层“自由民”。刚果奴隶制总体上的不发达性，在表面上似乎是由于当时部落拥有土地占优势的结果，实际上是由刚果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决定的。

刚果族是一个农业民族，种植高粱、谷子、薯芋和豆类等农作物。在农业生产中，男女有严格的分工，成年男子负责清理地里的灌木和开垦荒地，其余从翻地、播种、管理到收割的全部农活都由妇女承担。他们每年种植两季作物：9月底雨季开始后进行一次播种，12月份收获；12月底和1月份再次播种，4月底第二次收获。农业生产工具包括锄、刀、斧、钩镰等，妇女使用一种短柄手锄翻地，她们尚未掌握用犁技术。为了恢复地力，刚果人实行土地休耕制，休耕时间一般为三至五年。不合理的分工和较原始的生产工具，造成这里的农业产量一直不高，常常不能维持生存，因此，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打猎、捕鱼和采集在刚果人日常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

在手工业方面，一些主要的手工业项目已同农业分离，成为独立的职业，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奴隶制的变形，非洲奴隶制度史》), Cambridge 1983, p.123.

Hilton, *op.cit.*, p.85.

参阅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页。

Lovejoy, *op.cit.*, p.123.

John Thornton, *Demography and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Kongo, 1550-1750* (《刚果王国的人口统计和历史》), in *Journal History of Africa* 1977, no.4, p.526.

其中包括冶铁业、制陶业、织布业和沿海地区的制盐业等。冶铁业是刚果人中最古老、也是最受人尊敬的一项手工业，铁匠往往同时兼任祭司。在一般情况下，从采矿、冶炼到锻打成产品都是一个人完成的，缺乏进一步分工。产品有锄、刀、斧、钩镰等劳动工具，以及箭头、短矛、投枪、飞刀等武器和其他装饰品。在刚果人中分布最广泛的手工项目是织布业，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他们首先采集一些树木，特别是棕榈树的树皮和树叶，经过加工，抽出纤维，然后在地上钉两根木棍，中间连上一根木棍作横梁，通过横梁上紧经线，再将纬线从中往返穿织。这种织布方法比较原始，产量也很低。手艺高超的工匠织出的精美纺织品经过染色后，便成了国王和贵族的奢侈品，或作为货币使用。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首都和各省省府都有大的交易市场，地方上则有众多的集市。在每年5—9月的干旱无雨季节（人们称之为“金班加拉”，Kimbangala），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村民们便纷纷把以前的收获物拿到集市上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東西。一些贵族、酋长还组织长途商队到周邻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商队的人数从十几人到数百人不等，其货物全靠人力搬运，背负、头顶或肩抬。当时刚果人的贸易主要是实物交换，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有时也用产自罗安达岛的“恩赞布”贝壳作为货币，在东北部则用棕榈布作为货币，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和质量。以金银为形式的等价物尚未形成，那种专门从事货物交换的商人阶层也没有出现。

16—18世纪刚果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说明，他们已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实现了农业、手工业的分离，正处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前夜，奴隶制虽已初步形成，但尚未成为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性质应属于早期奴隶制社会阶段，有待于向更高阶段发展。遗憾的是，葡萄牙人的入侵和长期的奴隶贸易以及内乱，最终瓦解了刚果王国，从而打断了刚果人正常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

1483年，著名航海家迪亚戈·加奥率领一支葡萄牙船队从埃尔米纳来到刚果河口，同刚果王国的臣民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在后来1485—1486年的航行中，加奥深入刚果内陆，访问了都城，并抓了一些人质带回葡萄牙。这些人质在里斯本改信基督教，接受西方教育，后来成为葡萄牙同刚果交往中的首批译员。1491年，他们随葡萄牙船队返回刚果。同年5月，刚果国王恩津加·恩库武在首都接待了他们，并接受了葡萄牙传教士的洗礼，改信基督教。1506年，恩库武去世，他的儿子恩津加·姆邦巴接受洗礼（1491年），取教名阿丰索，在葡萄牙人帮助下，击败同父异母兄弟姆潘祖·基蒂玛而登基，称阿丰索一世。阿丰索在位约40年（1506—1543年），他为刚果王国在16世纪上半期的强盛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刚果历代国王中，他是最受刚果人民尊敬的一个。迟至19世纪，一个葡萄牙传教士还这样写道：“每个刚果土著都知道三个国王的名字，那就是今上、前王和阿丰索的名字”。

在阿丰索统治初期，他曾希望利用葡萄牙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对国家进行一番改革，发展对外贸易，使刚果王国强盛起来。为此，他加强了与葡

关于刚果王国的社会性质，尚有原始社会论和封建社会论两种说法。参见王忠林：《巴刚果族传统社会性质初探》，《亚非问题研究》第2期。

戴维逊：前引书，第106页。

牙的联系，在书信中同葡国王曼努埃尔以兄弟相称；一有机会就把刚果贵族子弟（包括他儿子唐恩里克）送到葡萄牙去受教育。他本人也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葡萄牙律法，了解欧洲宫廷中的礼仪和等级制度；向葡国王要求增派传教士和各种技术人员，帮助修建教堂和传教。1526年刚果疾病流行，阿丰索又向葡萄牙要求医疗援助。在阿丰索的一再要求下，葡萄牙国王向刚果断断续续派了一些传教士和工匠，在首都和一些省府修建了教堂，但对于选派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等要求则以沉默表示反对。

应当说，在阿丰索一世与葡萄牙人交往的初期，双方的确存在过真正合作的希望，虽说是短暂的、若隐若现的希望，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互利平等和比较友好的。因为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葡萄牙对刚果还不甚了解，对于刚果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感到惊奇。这个时期葡萄牙在刚果的主要利益是经商，而不是殖民扩张和贩运奴隶，他们在这里购买棕榈布、象牙、染料木和铜等，运往西非销售，或运回国内牟取暴利。派往刚果的葡萄牙传教士，除了传播基督教、教授葡萄牙文以外，兴趣也主要在经商方面。1512年，葡王曼努埃尔向刚果派了一名特使，临行时曾对其使命作了详尽的指示。该指示共分四个部分，头两部分规定葡萄牙人应帮助刚果国王改善行政制度，采用葡萄牙的法律和战争观念，建筑教堂，教授葡萄牙的宫廷礼仪；后两部分要刚果国王向葡萄牙船只供应货物，并责成特使收集政治、军事和商业方面的情报，勘察一条横贯非洲通往埃塞俄比亚的道路。

刚果与葡萄牙这段平等互利关系维持的时间不长，它很快就被另一种潜流所冲破，这就是葡萄牙传教士的日益堕落，以及他们勾结圣多美岛上的葡萄牙殖民者从事奴隶贩卖和其他走私贸易对刚果王国的破坏作用。

第一批葡萄牙传教士是在1491年来到刚果的，有史可查的另外两次是在1508年和1512年。他们奉葡萄牙国王之命，首先要使圣萨尔瓦多的贵族改变传统信仰，然后再到各省传教。但由于这些传教士的道德水平都很低，他们来刚果后，经商的兴趣很快超过了传教。为了赚取钱财，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把阿丰索送给他们的家仆都卖掉了；他们拥有私人住邸、姘妇，还有许多私生子女。在刚果首都形成了一个方圆一英里的葡萄牙人居住区，他们在那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除此之外，有些传教士还利用主教区设在圣多美岛，经常去那里同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结，进行违禁贸易活动。

圣多美岛距非洲大陆西海岸约200哩，是刚果与葡萄牙交往的一个重要中转站。1490年，葡萄牙人开始在该岛定居，最初的居民是从葡萄牙驱逐出来的各种罪犯，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许多甘蔗种植园。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岛上葡萄牙总督和种植园主便设法在邻近的刚果王国沿海省份购买奴隶，兼做其他贸易，其中大部分奴隶是由传教士经纪人提供的。

葡萄牙传教士和殖民者从事的这种避开刚果国王的私人贸易，严重减少了国家收入，使国家失去了对贸易的垄断，以前通过进贡和回赠建立的贸易网络，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主从关系，现在遭到破坏。沿海省督和地方酋长通过与圣多美葡萄牙殖民者的直接交往，获得了欧洲商品和枪枝弹药，从而加

Roland Oliver, *The African Middle Ages, 1400 - 1800* (《非洲中世纪》), Cambridge 1981, p.157.

戴维逊：前引书，第108页。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8页。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页。

强了自身的势力，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慑力量。1526年，阿丰索在给葡国王约翰三世的一封信中抱怨道：“贵国代理商与官员放纵获准前来敝国的水手和商人，听任他们开设店铺，出售敝国禁售之多种商品杂货，使此种商品在敝国及各领地充斥于世，致令原本听命于我之诸侯多自恃较我们富足而抗命不遵。”愈益扩大的奴隶贸易也使刚果王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从1514年起，圣多美岛的葡萄牙商人就在刚果王国腹地掠夺人口，甚至把王室成员和贵族抓走。阿丰索在给约翰三世的信中说：葡萄牙“商人每日掳我臣民，内有本地人，敝国贵族、诸侯与亲戚之子弟……他们掳人以之出售。陛下，此辈胡作非为，放纵无度，已令敝国人口锐减”。对于这种局面，阿丰索曾设想了一些解决办法，如要求葡国王关闭在刚果首都的商站；从王宫里任命三名官员去沿海检查被白人买去的奴隶是否为允许出卖的战俘；力图说服曼努埃尔让他有一条自己的船，以便摆脱圣多美的盘剥，与里斯本直接来往。有段时期，阿丰索甚至想断绝同葡萄牙的贸易关系。不过，在阿丰索在世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地方与中央直接对抗的事件。但在他去世不久，即在1556年，刚果军队便同臣属的恩哥拉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刚果军队遭到惨败。这仅仅是刚果内讧连绵不断、国家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不祥标志。

1545年，阿丰索的外孙迪奥戈（1545—1561年在位）继位，他继承了阿丰索利用大西洋贸易和基督教加强王权的政策，并主张传教时把基督教教义与刚果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逐步废除一夫多妻制。迪奥戈的政策引起在刚果传教的耶稣会士的不满，他们与迪奥戈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密谋把他推翻。1555年，迪奥戈成功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并将试图政变的传教士驱逐出境。

在迪奥戈继任者博尔拉多（1561—1567年在位）时期，刚果王国开始遭受贾加人的入侵，博尔拉多本人在抵抗中阵亡。1568年，贾加人为了抢劫奴隶、粮食和直接同欧洲商人建立联系，重新攻入刚果境内，次年占领和洗劫了圣萨尔瓦多。国王阿尔瓦罗（1568—1587年在位）被迫率领大臣逃到刚果河下游的一个岛上避难，并向葡萄牙王室请求紧急援助。1571年，葡萄牙派出一支约600人的军队，会同刚果军队，用了一年半时间终于把贾加人赶出境外。1574年，阿尔瓦罗恢复了王位。但是，刚果国王的威信此时已大大降低，还时常受到葡萄牙人的牵制。由于大批葡萄牙商人和士兵的定居，在刚果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称卢索—非洲人，他们住在建有篱笆的庭院里，娶当地妇女为妻妾，购买奴隶侍从，经济实力雄厚。这些人同刚果国王既有矛盾，又相互利用。国王需要他们的贡礼、赋税和罚金，作为自己收入的一大来源，因此千方百计力图控制他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和各地的直接贸易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卢索—非洲人为了四处经商和长途贩运的安全，以及得到战俘和罪犯作为奴隶出卖，他们也需要国王的庇护和帮助，但他们反对国王的贸易垄断，力图与各地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1622年，刚果同葡萄牙在非洲的新殖民地——安哥拉发生了边界战争，刚果军队战败。这场战争结束了自阿尔瓦罗复位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稳定时期，王国内部为争夺王位的派系斗争重新爆发，从1622年到1641年先后产

戴维逊：前引书，第126页。

戴维逊：前引书，第126页。

黑白混血种人。

生了六位国王：彼得罗二世(1622—1624年在位)、加西亚一世(1624—1626年在位)、安博罗西奥一世(1626—1631年在位)、阿尔瓦罗四世(1631—1636年在位)、阿尔瓦罗五世(1636年在位)和阿尔瓦罗六世(1636—1641年在位)。刚果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在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者通过物质引诱等手段，竭力把刚果王国南方省份的一些地方首领拉到自己的贸易网中，使他们臣服葡属安哥拉总督。刚果王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17世纪上半期，荷兰作为一个商业和贩奴大国，也积极插足非洲。1641年8月，一支约2000人的荷兰军队占领了葡萄牙在安哥拉殖民地的首府罗安达城。荷兰取代了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后，刚果王国在南部的统治危机暂时得到缓和。同年，加西亚登上刚果王位，称加西亚二世，他一直统治到1661年。这段时期成了刚果王国实际统一的最后一个阶段。1642年8月，加西亚同荷兰正式结成同盟，联合打击葡萄牙在中非地区残存的殖民军，但效果不大。

1648年8月，萨尔瓦多·科里亚率领1200名葡萄牙士兵在卢安达登陆。他们会同留在这里继续抵抗荷兰人的残部，击败了荷兰军队，重新控制了安哥拉殖民地。为报复刚果人与荷兰结盟，同年10月，他们向刚果王国宣战，首先赶走了加西亚任命的卢安达岛总督，切断了刚果王国“恩赞布”贝壳的来源；继而洗劫了恩东布等地区，杀死了数千名刚果人，并把许多俘虏卖为奴隶。1649年4月，加西亚被迫向葡萄牙屈服，在罗安达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规定把丹德河以南地区划归葡管辖，只允许葡萄牙人及其船只进入刚果境内经商，并把加西亚的儿子或一名重臣送往卢安达作人质。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就此解决，葡萄牙殖民者以安哥拉为基地，不断向北扩张，以图达到获得奴隶和重要铜矿产地的目的。在安东尼奥一世统治期间(1661—1665年)，双方矛盾重新激化，最终在1665年10月爆发了安布维拉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安东尼奥共投入从各省招集的约70000名士兵，安哥拉方面有非洲籍军队7000名、“葡萄牙人”360名。刚果方面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武器简陋，主要靠剑、矛和弓箭，只有极少数贵族有滑膛枪，且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结果，刚果军队遭到惨败，死亡5000多人，包括400名刚果贵族和安东尼奥本人。

安布维拉战役在刚果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刚果王国正式崩溃。沿海的索约省宣布独立，南部的姆邦巴省则屡遭掠奴队的蹂躏。在首都圣萨尔瓦多，各派争夺王位的斗争连绵不断，都想拥立自己的代理人。到1709年，彼得罗四世在教会的帮助下才登上王位。在农村，由于葡萄牙殖民军入侵和奴隶贸易的冲击，大片土地已荒无人烟，有些部落酋长不堪忍受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勒索，或迁往更加偏僻的地方，或率领部落进行武装反抗。过去繁忙的商业和集市也因而凋零，残存的只有奴隶贸易，每年从下刚果地区输出的奴隶已上升到一万多名。就在整个刚果王国处于混乱不堪、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在刚果中部地区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安东尼运动。

大约在1700年左右，一位名叫贝特里克斯·金帕·维塔的青年妇女公开

Roland Oliver, *op.cit.*, p.163. 一说10万人，参见 Hilton, *op.cit.*, p.17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vol.4, p.340.

Hilton, *op.cit.*, p.17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340.

声称自己是先王安东尼奥的化身，以引起人们对她的注意。她用某种奇异手段使病人康复，四处宣传宗教和民族复兴，重建统一的刚果王国。对于欧洲传教士在刚果的所作所为，她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他们参与奴隶贸易，干涉王位继承，并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位出生于圣萨尔瓦多的刚果人。她还攻击传统的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号召其追随者接受一个真正非洲的救世基督教。维塔的主张受到刚果各界的支持，不到两年，安东尼运动几乎波及整个王国，成为 18 世纪初期刚果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维塔领导的安东尼运动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首先是因为当时刚果的臣民处于极端恐惧和不稳定之中，他们渴望有人能把他们解救出来，渴望一个安定的环境，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其次，维塔把这场宗教运动成功地同民族先烈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想起在安布维拉战役中被葡萄牙人杀害的刚果最后一位伟大国王安东尼奥，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由于这场宗教运动对欧洲传教士和传统政治势力是个严重威胁，因而他们很快联合起来进行镇压。1706 年初，维塔不幸被捕，同年 7 月 2 日被彼得罗和方济各会以“伪装圣人罪”处以火刑，安东尼运动不久被平息下去。其后，彼得罗移居圣萨尔瓦多，1709 年在基督教会帮助下正式登上王位，称彼得罗四世。

新王上台并没有重振昔日刚果王国的雄风。刚果军队在安布维拉战役遭受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在整个 18 世纪中，没有一位国王能够确立自己的权威。收入的减少，对欧洲商品和枪支垄断的丧失，使王权日益衰落；相反，各省省督和地方首领的力量却日益增强，王国统一的观念逐渐消失，绑架奴隶和掠奴战争也达到高潮。到 1816 年，英国探险家塔克溯刚果河深入中非内陆时，在原刚果王国的疆域里只存在众多独立的小酋长国，他们自称属于一个神话般的君主，圣萨尔瓦多已成了一个非常小的居民点。

二、库巴王国

库巴王国，亦称布尚戈王国，是刚果河流域著名的古国之一，其疆域北至桑库鲁河、西至开赛河、南达卢卢阿河，处于热带森林和热带草原接壤的地方。

根据库巴人的口头传说，库巴人最初生活在刚果王国境内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打猎、捕鱼和采集为生。大约在 16 世纪中期，由于贾加人的入侵和自身人口的增长，他们开始向东迁移，定居在今刚果共和国的西南部，当时人口约有 7 万人。他们在这里进一步发展了自身文化，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农业日益受到重视，打猎和捕鱼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的建房技术、食物储藏、工具制造和手工产品，很快远远超过了邻近的勒莱人。在村庄的基础上，库巴人建立了有组织的集市，流通媒介起初是方块酒椰纤维布和贝壳，后来改用珠子和铜棒。聚集财富的多少和生产能力的强弱，是库巴人确立个人威望的主要依据。至 16 世纪末，库巴人已发展成一个拥有 18 个部落的联盟，其中以中部的布尚戈部落最为强大，由该部落的酋长担任

John Thornton, op.cit., p.524.

J.Vansina, Recording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Bakuba (《巴库巴口传史料》),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 (1960), p.257.

部落联盟的首领，负责从其他部落征收贡品和领导征服周邻地区的战争，某些芒戈人、卢卢阿人和勒莱人的部落先后被吞并或被逐出。库巴王国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1625年，夏阿姆·姆布尔·恩贡格担任了库巴人首领，在他统治期间（1625—1640年），库巴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传说，恩贡格在任库巴国王之前是一位经常来往于库巴和刚果之间的商人，由于他见多识广，赢得了库巴人的信任而被推上王位。

恩贡格即位后，很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引进了玉米、烟草、木薯和豆类作物的种植方法，促进了农业发展，使库巴人定居下来，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后来玉米竟成了库巴人的主食。他还使人民掌握了用棕榈纤维织布的技术。为了补充农业劳力的不足，恩贡格把在对外战争中抓获的俘虏集中安置在一起，组成奴隶村，由国家派专人管理。著名的库巴雕塑艺术，据说也是恩贡格传授给臣民的，他本人的塑像至今仍保存在伦敦博物馆，是中部非洲留传下来的最古老的艺术品之一。在军事方面，他建立了兵役制，组织了一支青年卫队，并把一些年青力壮的战俘奴隶整编成国家常备军，用于扩大疆域；同时，规定禁止使用传统的飞刀，改用标枪和箭作为武器。在政治方面，他采取了加强王权的措施：要求所有贵族住在王国都城；创设许多新官职，由国王最信任的王子们担任；打破传统的王位由侄子继承的习惯，改为世袭制，国王候选人从其子女中选出；发展了宫廷礼仪，加强了国王的神秘感，规定国王的脚不能触地，吃饭时不能有女人在面前，打喷嚏或咳嗽时周围的侍臣必须夸张地做出同样的动作。由于国王是全族力量和幸福的化身，因而在战时不能统率军队，以免受伤流血；国王也不能病死、老死，只能在他寿终前把他掐死。“从夏阿姆以后，国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

恩贡格的改革在库巴王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加速了库巴人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促进了库巴生产力的发展，王国的统治机构也趋于完善。当时辅佐国王的一个重要机构是枢密院，它由六名高级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接受贡物的国库大臣和负责审理使用利刃伤人的法官（称“尼比托”）；另外四名高级官员兼任王国四个省的省督，他们的职称分别为“基米康布”（首相兼大法官）、“特希卡拉”、“埃宠丘拉”和“尼昂加”。枢密院成员选自王室的姆巴拉氏族，王国其他氏族也可以在宫廷中派驻代表，阐述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王太后和国王的姐妹在国家事务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王太后的权力仅次于国王，她有权决定国王的最终候选人。

在恩贡格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都曾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如科特·姆博威克一世征服了桑库鲁河沿岸的许多村庄；科特·恩斯向西南部的卡邦巴部落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些战争使库巴王国的战俘奴隶激增，他们被用于农业和经济活动中。至于库巴人当时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奴隶（如常见的债务奴、契约奴）以及家庭里是否存在奴隶，限于现有材料尚不能肯定，不过，根据库巴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推断，到17世纪初大概都已经出现了，相传恩贡格的母亲就是一名奴隶。到19世纪末，库巴王国中的奴隶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0%左右，他们主要集中在首都附近。大多数家庭拥有奴隶1—2名，

Vansina, op.cit., p.267.

Lovejoy, op.cit., p.244.

他们主要作为丧葬中的祭品。

库巴王国的发展在 18 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当时，各户农产品的产量成倍增加，产品剩余使它同周邻各邦的贸易成为可能。库巴人与西部宽果河流域各族和东部卢拉巴河流域各族都建立了贸易关系。

19 世纪上半叶姆鲍帕·玛宾克·姆布尔统治时期，库巴王国出现了危机。一些部落开始不服布尚戈的统治，桑库鲁河流域的各部落已获得实际上的独立。在姆布尔晚年，又发生了王位继承战争，接着瘟疫流行，四位国王先后丧生。库巴王国从此走向衰落。

三、卢巴王国

卢巴王国位于今刚果共和国南部的沙巴省。根据卢巴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最初住在马尼马（阿伯特维尔西北）地区。16 世纪上半期，他们在一个半神话式的英雄孔戈洛率领下，向南迁居到洛马米河上游和卢阿拉巴河上游之间、基萨莱湖和乌彭巴湖附近。这里河湖交叉，土壤肥沃，属热带草原地区。卢巴人或以务农为生，或捕鱼、放牧，使用铁器。在孔戈洛领导下，建立了卢巴王国。

孔戈洛的生平不详，据说他原是卢巴人一个部落的首领，在迁居新地后，他用和平渗透与武力征服两种手段逐渐控制了当地居民，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对一些倔强不驯的臣民处以极刑，往往令人割去他们的鼻耳或乳房。因此，在卢巴人的传说中，孔戈洛是一个既残酷又傲慢的人，是广降甘霖的一条红色巨蛇，以彩虹形式出现于世；他还令人修建高塔，希望能重新上天。蛇和彩虹也因此成为卢巴王室的标记。

卢巴王国尚保留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在选定新王及其登基过程中，王太后起着较大作用，并且王后的母亲与国王共掌宗教大权。按卢巴人的传统，国王吃喝不能被其他人看见，还要隐瞒其他自然生理功能，被认为象神一样生存。当新国王或酋长产生时，他们要在公共广场上点燃一堆火，并一直燃烧到他们死时为止；臣属的酋长和部民则从这堆火中点燃各自的火堆，以示对统治者的效忠。卢巴王国的臣属关系还表现在各地的部民要定期向本部落酋长交纳贡品，然后再汇集到首都基腾塔，进贡给国王。

大约在 1585 年，孔戈洛被他的侄子伊伦加·姆比利杀死。姆比利登基后，不断向周邻地区进行征服活动，使卢巴王国的版图西至布希梅河（桑库鲁河上游）、北达马尼马、东到卢夫瓦河。他成了卢巴人口头传说中王国的另一奠基人。但是，在姆比利死后，卢巴王国争夺王位的斗争更加激烈，到 18 世纪晚期，先后执政的有七个国王：伊伦加·利乌、卡松龙、卡伦布路、古瓦·桑扎、姆望内·孔贝、代卡克里亚和伊伦加·松古。

1785 年，卢巴第十代国王库万布·恩贡贝继位。在他统治时期（1785—1805 年），卢巴再次出现兴盛局面，王国的疆界向东已扩展到坦噶尼喀湖的西岸。他把全国领土分成若干个省，由他自己直接统治或任命省督管辖，强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第 84 页。一说伊伦加是孔戈洛的女婿，孔戈洛是被伊伦加的儿子即他的外孙卡拉拉推翻的。参见 Oliver, op.cit., p.138.

根据中非地区一些部落口头传说里的习惯，卢巴王国的两位早期奠基人孔戈洛和伊伦加可能是两个部落或朝代的名称。

化了中央集权。省之下设区或村，其首领称“基卢卢”（kilolo），由贵族和酋长们担任，职位世袭，他们负责为国王征收贡赋。此外，还设立专门官员“姆维勒·恩坦达”（mwintanda），掌管国家土地，包括土地的分配、定期休耕和组织人开辟荒地等。在中央宫廷里，他也增设了许多官职，通常由王室成员担任，其中较高的职位有“桑加”（Sanga，首席顾问）、“特维太”（tvite，财政大臣）、“穆龙达”（munonda，负责维持宫廷内部的和谐）和“姆夫姆”（mfumu，宫廷顾问）。为了防止外族的入侵，恩贡贝在边境建立了一支防卫力量，并用封邑的办法使归附的部落对他效忠。库万布·恩贡贝后继无人，他死后王国内部重新爆发争夺王位的战争，国势再次衰落。至19世纪末，卢巴王国已分裂成若干个小酋长国。

统一的卢巴王国虽已消逝，但卢巴人的语言和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刚果河流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卢巴语言艺术奠基于赞美诗“卡萨拉”（kasala）的传统之上，有关伊伦加·卡拉拉的叙事诗已成了一项重要的艺术作品。卢巴语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和艺术加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中非许多族里广为流传，是今刚果共和国通用的四大语言之一，在沙巴省和开赛省还用于初等教育。卢巴人的雕塑也很出名，品种多样，在东部亨巴体现了柔和的自然主义风格，而在北部松吉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庄严风格，其中雕塑的精品是姆博科（mboko），一种女性小雕像，手里拿着碗、王室坐凳和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卢巴多音符乐曲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成就。

卢巴王国的社会性质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奴隶制。在卢巴王宫里，有许多被称为“下等人”的奴隶和避难者，他们受国王的保护，但其中许多人在国王死后被用作人祭。在一般村庄里也有奴隶，他们的处境可能较悲惨，在卢巴口头传说里有一首歌谣反映了他们的处境：“他们侮辱我，我忍声吞气；虽然我愤怒地想逃走，可我无法找到返回故乡、回到亲人身旁的路。”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扩张和内乱的频繁发生，战俘数量激增，卢巴奴隶制有了新发展，国王开始把战俘奴隶集中到都城附近，建立奴隶村和奴隶世系，担负耕种和守护任务。大概从这时候起卢巴参预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体制，向葡萄牙等国奴隶贩子提供奴隶。后来，卢巴与隆达、卡曾贝都成了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奴隶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损害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卢巴王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隆达帝国

隆达帝国的疆域大体包括今刚果共和国的西南部、安哥拉的东北部和赞比亚的北部地区，是在隆达王国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成的。

作为班图人的一支，隆达人于何时何地迁到刚果河流域，尚无定论。根据史料记载和隆达人的口头传说，大约在16世纪下半叶，隆达人已迁到今刚果共和国沙巴省西南的布希梅河上游地区，在紧靠卢巴王国中心地带的西部定居。他们这时已进入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开始瓦解，经济活动主要以农业为主，兼以打猎、捕鱼和采集。其社会内部已出现了劳动分工：年老体弱者留在家里织酒椰纤维布，作为给成年子女筹集娶亲的聘礼；年青男子则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vol.1, p.181.

Lovejoy, op.cit, p.127.

出去打猎和作战，并以此赢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妇女承担的社会劳动最重，要种庄稼和做家务，同时制作各种土罐子，用于贮藏和烧煮食品；未成年的孩子负责看管山羊，采集白蚁烘烤以及把鸟从高粱地里赶跑。

隆达人的社会结构较为独特。在建国前，隆达人普遍受被称为“图邦古”（tubungu）的长者们的控制。这些长老一般是大家族的首领，他们负责处理各个家庭之间土地和捕鱼权的纠纷，还拥有精神上的权力。每个长老都有自己的封号，可以传给后人，封号之间往往用亲属关系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如用“父亲”、“儿子”、“兄弟”来表示大小。在隆达人的口头传说中，一族对另一族的征服或融合有时也被说成是联姻，如地位较高或胜利的一方被说成是“丈夫”，而依附的一方则是“妻子”。因此，隆达人的这种封号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隆达人的早期历史中，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大的家族，其中最早的是雅拉·姆瓦库家族，当时有15个图邦古受制于它。隆达国的雏型开始初步形成。取代雅拉·姆瓦库家族统治地位的是金古里家族，在隆达人口头传说中，这次事件被说成是“父亲”与“儿子”为争夺棕榈油的控制权而发生的一次冲突，结果“儿子”获胜。雅拉·姆瓦库家族失势以后，先前从属它的各个家族便摆脱了纳贡的义务，有的转而依附金古里家族。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家族——卢埃吉家族，它向金古里家族挑战，双方展开了较长时间的争权斗争。大约在这个时候，东部的卢巴王国向隆达地区派出了一支狩猎队，其首领享有“希宾达·伊伦加”封号。在金古里家族与卢埃吉家族的争斗中，这支狩猎队站在卢埃吉一方。由于他们使用隆达人尚不熟悉的铁制武器和原始宗教——使狩猎显灵的符咒，金古里家族被击败。后来，这支狩猎队没有回卢巴王国，他们留下来与隆达妇女通婚，并引进了本国的某些制度，如按父系计算血统关系和继承财产、给首领增添一层神秘色彩和设置地方官员基卢卢等，加速了隆达向国家的过渡。大约到17世纪中期，统一的隆达王国正式出现。

隆达王国的首任国王雅·纳维吉，在他统治期间（1630—1660年），隆达的疆域向西扩展到开赛河，南达赞比西河上游和支流卡邦波河，东及卢瓦普拉河，成为中非地区的一个强国。为此，他赢得了后人对他的尊重，他的封号“姆旺特”（mwant，或称mwata）成了隆达历代国王们的封号，隆达王国亦称姆旺特·雅乌（MwantYav），或姆瓦塔·雅姆沃（Mwata Yamvo）。

雅·纳维吉建立的隆达国，下设若干个省，由国王任命的省督进行统治。省督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收集贡品，并负责运往首都。根据各自管辖的地区不同，各省省督有自己的封号，如“姆瓦塔”、“姆韦内”或“卡曾贝”等等。

国家最高统治者国王“姆旺特”。同库巴和卢巴国王一样，他被看成是神灵的化身，不能吸烟饮酒，也不能当着臣民进餐，只有骑在奴隶的肩膀上才能出现在臣民面前。他拥有许多显示尊贵的标志，诸如头顶一束红鸚鵡毛，颈挂珠链，胸佩勋章似的铜饰，腕套金属镯子等。每任国王登基时都要举行盛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仪式是由国王亲自点燃一堆新火，然后各省总督由此火点燃他们自己的火堆，以表示对新王的效忠。新任国王还要在卢卢阿河的东部支流卡兰古河和路易萨河之间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王府（称“穆散巴”，musumba，意为“营地”），传说第一代姆旺特就住在这里。久而久之，

这块地方实际上成了隆达王国的都城，四周由一个筑有堡垒的土墙和一条长约 30 公里的干洁的护城河围着。各个国王的“穆散巴”又单独构成一个设防的大封闭体，外面用树和木桩组成双层篱笆，里面建有许多院落，供国王及其家属居住，也有的供举行宗教仪式使用。在“穆散巴”里，还单独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王室的墓地，设专门的宗教守护人员看管。据 19 世纪来访的欧洲人记载，“穆散巴”里清洁卫生，道路很直，且设有开阔的公共广场，供集会和集市使用。

国王和各省的总督都有自己的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大刀、投掷用的短标枪和防护用的盾牌等，以及后来从奴隶贩子手中购得的少数枪支。军队用于对外扩张和捕捉俘虏。另有近卫队负责都城的治安。

隆达国王虽然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王后、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的制约。根据隆达传统习惯，王后“罗孔克莎”(Lukonkeshia，意为“众人之母”)的意见对决定王位的继承有特殊的影响，贵族会议已故国王的两个正妻的儿子中选出新的“姆旺特”时，必须征求她的同意方可登基。平时，“罗孔克莎”的权力象一个大酋长，自设一个归她管辖的朝廷，收授大臣们的贡品，她的意志不受丈夫的限制。贵族会议除了有权决定国王的人选外，还可对国家事务提出咨询性意见，并对国王的意志起牵制作用。国家的另一重要机构是民众大会，它有权批评“姆旺特”的过失，甚至将他废黜，一些重大事件也由民众大会表决决定，如向异族宣战、道路的开闭等。

国王的权力受到上述三个方面的很大影响，说明在隆达王国里原始社会的残余保留较多，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痕迹仍依稀可见。在隆达王国的早期历史中，氏族组织尚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共同女祖先的一些血缘亲属构成的氏族，依然聚族而居，氏族酋长享有祭司和司法的职权，只是增加了在本族征收贡赋的任务。隆达王国这种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是与它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在 17 和 18 世纪，农业经济在隆达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铁制工具使用较晚，并且尚不普及；手工制作包括制陶、织布、晒盐和锻打铜质制品等；集市贸易很早就已产生，而且在大西洋商业经济的影响下出现了从事长途贸易的商队，贩运诸如欧洲金属器具、巴西烈酒、烟草和亚洲的纺织品，以及当地的土特产。三次社会大分工虽然都已出现，但均未完成。他们属于定居的农业民族，可是在落后的生产工具的限制下，农产品尚不丰富，有时还需要靠打猎、采集和捕鱼补充粮食的不足。专门以手工劳动为生的手工阶层以及手工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尚未产生，直到奴隶出现后依然如此。这种特殊现象或许是隆达社会性质较难断定的一大原因。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并存，不仅在隆达人中存在，在刚果河流域的许多地区都是如此。

在隆达王国的中央朝廷里，大臣最初是一些图邦古长者。他们代表隆达人的祖先，也是贵族会议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同各个家族的首领一起，共同维持新旧统治之间的平衡。后来，随着频繁向外扩张，在朝廷里又增设了一些军事首领的职位，并按他们在战场上担任的职务，分别称为“侦察”、“侧翼”和“尾翼”。在朝廷之下，国王在各地设置的重要官员是“基卢卢”(Kilolo)，他们与传统的大酋长不同，一般与所管辖的地区没有血缘关系。在 19 世纪中期，据说有 36 名“基卢卢”向“姆瓦塔·雅姆沃”纳贡。对于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37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374.

离首都较远的行政官员，国王还派了许多王室使者进行监督，在隆达语中他们被称为“图克瓦塔”（tukwata）。这些使者实际上是国王在外地的直接代理人，兼管国家的商业，监督商队，护送外国旅行者，保护王室对某种商品的垄断以及惩罚那些逃避捐税和关税的人。

国家收入主要来自赋税、依附部落的贡品和从邻近地区抢来的财物。收税是“基卢卢”的一个重要职能。他先从自己管辖区里征收赋税，一般是实物税，再把它送给王室代理人。靠近首都的地区，通常交纳淡酒和粮食；而较远的地区则交纳盐、铜，或其他手工产品，如生产工具、武器、棕榈油和酒椰纤维制品、土罐子和篮子之类；靠近边境的地方，由于常同外族作战，便向朝廷上交一些战利品和猎物，尤其是象牙和奴隶。国王在收到各地的贡品后，除留下一部分供自己和朝中大臣消费外，其他的则回赠或赏赐给不同地区的进贡人。这样，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通过国王而进行的贸易网络。这种贸易网络对隆达政治结构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也增强了隆达国王的威信。后来，国王还把奴隶、象牙等贡品同周邻地区和欧洲商人进行物物交换，发展对外贸易。

18世纪期间，葡萄牙人和来自大西洋沿岸的非洲人并没有获得直接通过隆达势力范围的权利。他们同隆达内地和东部地区的贸易主要通过隆达臣民，或者由间接的中间人进行，如卡桑吉地区的英班加拉人。大约在18世纪上半叶后期，一支英班加拉人的商队首次抵达隆达的穆散巴。凡是外邦来的商队，通常由“图克瓦塔”把他们领到一个指定的、靠近王室都城的营地。在这里，“姆瓦塔·雅姆沃”对其所有商品首先进行挑选，挑剩下的才被允许拿到外地交换。在这种贸易中，隆达人输出奴隶、象牙、铜锭、棕榈布，换取来自安哥拉的烟草、葡萄牙的工业品、枪枝和来自印度的棉布和丝绸。当时，从非洲西海岸的罗安达到非洲东海岸的基尔瓦有一条横贯非洲的商路，而隆达人正处在这条商路的中央。

隆达王国向外输出奴隶以购买海外工业品，大约始于18世纪初。随着隆达对外贸易的扩大和美洲大陆对奴隶需求的增加，奴隶在隆达王国的输出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被卖出的奴隶大部分是战俘。当时，一族向另一族的突然袭击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卡隆维族、卡尼奥克族和开赛河中游各族中。这些袭击不同于过去旨在争夺商道、猎场控制权的战争，它完全是为了获得战俘而策划的。奴隶的另一来源产生于隆达社会内部，诸如把各种罪犯改判成奴隶、因欠交税收而沦为奴隶等。

向外输出大批奴隶，严重削弱了隆达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葡萄牙商人及其非洲代理人为了摆脱隆达国王对贸易的垄断，获得更多的奴隶和更大的利润，他们往往同隆达的一些地方首领和附属国直接交换物品、奴隶，从而破坏了隆达原有的贸易网络，使中央财政收入减少。附属国和地方首领商业财富的增加，特别是枪支占有量增多，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威信，使他们有力量同中央政权对抗，这是隆达帝国后来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奴隶人口的大量丧失，对地广人稀的隆达来说，造成劳动力更加短缺，影响了隆达国的经济发展。

隆达的奴隶除了输出以外，也有一部分留在当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这种奴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官奴，人数较为集中。根据隆达王国的内

部移民计划，奴隶被带往首都“穆散巴”周围的土地上，替国王和其他贵族耕种，收获物除上交给主人一部分外，自己也留下一些，处境比在欧洲人种植园里的奴隶要好。经过一段时间，奴隶在吸收了主人的文化、获得主人的信任以后，他们就被并入主人团体，这时候的奴隶同一般自由民的区别已经很小，在穿着、饮食方面几乎一样。另一类奴隶是贵族、酋长以及部分富裕平民家庭里的私奴，或称家庭奴隶。他们人口分散，其作用和地位大致与刚果王国的家奴相同。经过数代以后，这类奴隶一般都被主人同化，成了主人家中的一员。

隆达王国的社会阶级状况表明，16—18世纪的隆达王国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劳动在整个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以及地理环境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原始社会的残余还保留较多。隆达的奴隶制此时还属于一种初级的、不发达的奴隶制形态。

隆达文化对刚果河流域的影响是通过扩张战争实现的。从17世纪中叶隆达王国建立起，历代国王都不断向外扩张版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隆达帝国。

隆达王国的扩张最初是向西和西北。首先被征服的是位于开赛河下游的潘德族，这里距隆达首都约300公里。其后不久，隆达又在克旺果河流域的雅卡人中建立了一个傀儡王朝，在苏库族、谢吉族和霍洛族中也有一定势力。隆达向西扩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通与安哥拉和刚果西部集市的直接贸易关系。

隆达扩张的第二个方向是南部的卢拉巴河和赞比西河上游地区。隆达国王想通过这场军事行动，获得大批奴隶，更重要的是获得卢拉巴地区的铜和盐。当时，铜在中非地区的贸易中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一种新的铜质手镯作为流通媒介已开始隆达富裕阶层中使用。在被征服的族中，著名的有恩当布族，该族酋长“卡隆盖沙”（Kanongesha）后成为隆达在南部扩张势力的重要代理人。

隆达扩张的第三个方向是东面。早在隆达王国奠基者姆瓦塔·亚姆沃执政时，他便派将军穆希迪率军去控制沙巴东南部卢菲拉河东边的制盐场。穆希迪相继征服了从卢布迪河一直到卢瓦普拉河一带的各族，并指派隆达人担任他们的酋长。姆瓦塔·亚姆沃的继任者们也都不断向东派远征队。

至18世纪晚期，从克旺果河到坦噶尼喀湖西南岸，南至赞比西河流域，都处于隆达人的控制之下，直接或间接地向隆达国王称臣纳贡。隆达王国成为中非地区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帝国。

在隆达帝国建立过程中，一些远征队的首领在被占领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他们享有“卡曾贝”（首领）称号，他们建立的国家一般取名卡曾贝国。其中以姆维鲁湖南部卢瓦普拉河流域的一个卡曾贝国最出名，那里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统治者“卡曾贝”虽然在名义上是隆达的附属国，但无异于一个独立的君主，有自己的军队，并直接同欧洲商人和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控制的地区从卢拉巴河源头一直到坦噶尼喀湖，面积比母国还要大。

从19世纪初开始，隆达帝国在奴隶贸易和外族入侵的冲击下走向衰落，帝国逐步分裂瓦解。到19世纪末，隆达帝国的实际控制地区已缩小到今刚果共和国南部与安哥拉和赞比亚交界地区。

第五章 西非沿海各国和欧洲人的早期侵略

西非沿海地区是最早遭受欧洲殖民者侵略的地区，但到 18 世纪末，直接由殖民者统治的地区很小，除葡萄牙侵占几内亚沿岸以外，只有英法在塞内冈比亚建立了小块殖民地。欧洲殖民者主要盘据众多的沿海殖民据点，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

在 16—18 世纪，西非沿海广大地区，特别是塞内冈比亚、黄金海岸、沃尔特河以东、贝宁和奥约等地，生产力已达相当水平，奴隶制关系已有一定发展，因而相继出现了奥约、达荷美、阿散蒂和卡约尔等强国，总的发展趋势是各族的联合和统一。这与西非内陆在桑海帝国崩溃后趋于分裂的状况适成对照。

一、西非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

农业是西非沿海居民赖以生息的基础，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地域广阔，生态各异，社会条件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近代这一地区的耕作制度类型纷繁，主要有下列五种：(1)流动耕作制。这是一种居住地随耕地变动而迁徙的体制。人们开垦处女地或长满次生植物的土地，耕耘 2—3 年，然后迁居他处。这很可能是一种最古老的耕作制度，在近代只有极少数地区可以见到它的踪迹。(2)轮作制。这是西非使用最为广泛的耕作制度。人们在住地周围圈定耕作和休闲地段，在圈定地段上进行轮作。耕地的耕种期，短则 1—2 年，长则 3—6 年。休闲地的休闲期一般为 4—10 年。在大多数地区，休闲地上的植物是自然生长的，但也有少数地区休闲地上的植物是人工种植的。轮作制经常同林产品的经营相结合。在近代，最重要的林产品是棕榈油、柯拉果和牛油树脂。(3)持续耕作制，即连续耕种同一块土地，很少让其休闲。这种耕作制只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少数地区采用。(4)农牧结合制，即将农业和畜牧业有机地结为整体。塞内加尔河流域的一些民族主要采用这种经营方式。(5)利用河水泛滥和人工灌溉的农业。它仅限于西南沿海的沼泽地带以及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的冲积平原。广大西非沿海地区的农民正是采用这些各具特色的耕作体制，以家庭或大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使用锄、砍刀和手犁等工具，生产出主要供自身消费的薯蓣、玉米、小米、稻米、高粱、棉花、棕油及各种畜牧产品，但各地农业发展极不平衡。

在滨临大海的地区，盐碱地和沼泽地居多，农业难以发展，产品难以自给，因此沿海同内地间的粮食贸易古已有之。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沿海居民作为贸易中介，日益专注贸易，农业、渔业和制盐业等渐呈衰败景象。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各贸易中心人口日增，大批奴隶和船员在沿海停留期间需消耗食物，通过中段航程也需一定的食物储备，因而对食物的需求猛增。所需食物主要来自毗邻内地。17—18 世纪的奴隶商人巴尔博特、欣斯汤和兰多尔费等，就曾购买过大量由内地生产的薯蓣和牲畜。因此，近代内地的食物

A.G.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don 1973, pp.32—39.

E.Donnan ed.,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美洲奴隶贸易历史文件》), New York 1965, vol.4, p.80.

产量可能有所增长。狩猎在森林地区特别重要，因为这一地区缺少肉食。狩猎多在旱季进行，雨季来临，农事忙碌，狩猎活动减少。渔业最兴旺的地区是沿海和以乍得湖、尼日尔河湾为中心的内陆河湖。

矿物开采冶炼业和手工制造业是西非经济的重要领域。矿物开采冶炼业的主要部门是铁和黄金的生产。西非的黄金生产主要集中在班布克、布雷、洛比和森林地区的阿散蒂四个地区。部分黄金是用淘盘法淘洗出来的，部分黄金是从矿井中采掘的。竖井深 10 余米，斜井可长达 150 米。矿石运到地面之后，经打碎、冲洗、筛选和提炼等工序，便可得到线状或条状的黄金。这一生产过程需要采矿工、搬运工、粉碎工、冲洗工、冶炼工、工具修理工及其他人员的有机配合。西非的黄金在古代已闻名遐迩，在近代黄金生产仍保持增长势头。冶铁业的状况却完全不同。在西非，铁矿分布广泛，但藏量不多。人们从较浅的矿坑或矿井中采掘矿石，进行冶炼。各地的冶炼方法均有特色，一般是对矿石略加处理，然后放入窑内，以木炭等为燃料进行冶炼，经 2—3 天即可得到生铁。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冶铁中心。在象牙海岸的乌梅，发现了 100 座炼铁炉和上万吨炉渣。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的周围，形成了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冶铁村，村中男女皆从事铁的冶炼及制作。在加纳及其他地区也有冶铁中心。冶炼业是首先遭受舶来品打击的行业之一。在奴隶贸易的初期，贩奴船只输入了大量的铁、铜及其他金属。1677 年，前往新卡拉巴尔的一艘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船只，所载货物大部分是未加工的铁条等金属。1700 年，大帆船“非洲”号访问新卡拉巴尔，所载货物中铁条占近 60%。西非所炼生铁无力与舶来品竞争，结果不少地区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完全终止。在 16 世纪，西非用铁的大部分是本地生产的，不足部分由输入铁补充；至 19 世纪，西非用铁的大部分已由海上输入，不足部分才由本地生产的铁补充。西非铁矿的开采和冶炼显然已经衰败。

手工业的主要部门有纺织缝纫业、五金业、制陶业、建筑业和食品业等，其中纺织缝纫业最为发达。在近代，一些著名的纺织缝纫中心已相当繁荣。黄金海岸的黄金加工技艺别具一格。工匠们用黄金制作精美的项链、戒指、手镯及其他装饰品，制作宫廷使用的名贵餐具。衡金用的小砝码，呈各种几何图形或各种动物的生动形象，加工细致，雕刻精美，堪称真正的艺术品。但总的说来，手工行业的生产基本上以家庭为基础，世袭经营，规模小，资金小，人员有限，诸如制陶等部门的生产还带有业余性质。因此，外来产品的有力竞争使一些部门的生产逐渐衰落，大多数手工行业仅局限于为当地的小市场服务，难以发展。

近代西非沿海各国贸易大体可分为地方集市贸易和长途贸易两种类型。地方集市贸易的市场体系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广大乡村，定期开放的市集很多。一个地区相邻的几个市场组成一个市场圈，在 2—8 天内轮流开放。开放时间间隔的长短视圈内市场多寡而定，市场少，间隔短；市场多，间隔长。较大市场一般 2—4 天开放一次，较小市场可能 8 天才开放一次。各市场开放的时间相互衔接，同时注意地区间市场开放日的配合，以减少市场重叠开放

A.G.Hopkins, *op.cit.*, pp.44 - 46.

David Northrup, *Trade Without Rule*, 《不规则贸易》, Oxford 1978, p.168.

L.M.Pole, *Decline or Survival? Iron Production in West Africa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17—20 世纪西非的铁器生产》),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3 (1982), pp.503 - 513.

的可能性。在这种体系内，没有一个市场可以单独存在。这类市场开放的情景，15世纪的威尼斯海员卡达莫斯托曾目睹过。他说：“来自4—5英里之遥的男女，携带着各种货物在这里（指塞内加尔河流域的一处市场——引者）赶集。距这个市场较远的人就到距离较近的其他市场去。这些市场上的商品显露出这些居民的极端贫困。这些商品包括少量棉布、棉纱、豆类、油、小米、木桶、棕席及其他生活用品。”在这类集市上活动的妇女不少。市场活动的目的是相互调剂余缺，以满足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此外，这类市场还是讨论公共事务的聚会地点和信息交流的唯一场所。在市场上，人们还可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因此，人们对市场的强烈依赖是其他地区罕见的。到18世纪，在河流沿岸及一些岛屿上形成了一些新市场，地区间交汇点上的市场更趋活跃，地方市场体系有所扩大。

长途贸易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西非各生态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因此一些主要商路都是由南向北延伸的，同时也有许多东西伸展的商路干线，从而构成复杂的商路网络。商路网连接着各大贸易中心。许多贸易中心座落在不同生态区的边沿，如萨凡纳——森林地区的博纳、邦多科、贝戈、奥尼查、萨拉加和金坦波等。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包括代表国家从事贸易的官商、专门从事贸易的职业商人、将生产与销售结合起来的商人、为金钱上的特殊需要而临时经营长途贸易的商人等。商人在贸易中结成商队，商队人数多的可达2000余人，其中包括领队、向导、财会、军需、保卫、搬运、照料和驱赶牲口的人员，以及商人家属和仆从。商队沿商路缓缓行进，用货物换取所需食物及服务。一旦到达目的地，商队立即解散，商人们通过代理人推销货物，购买回程商品。这些长年奔波于崎岖险路上的商队，促成了各大地区间产品和交换的互利。通过商队的活动，在萨凡纳和森林地区之间，实现了牲畜、食盐、鱼干、甲碱、布匹同柯拉、象牙、铁器等之间的交换；森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食物、手工制品、鱼和海盐得到交流；东部和西部的产品交换也得以实现。这种长途贸易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但并未终止其发展势头。

近代西非的直接生产者包括自由民、奴隶、归顺民及其他处于依附地位的人们，其中奴隶及归顺民占有重要地位。

西非沿海地区的奴隶分成不同等级：(1)俘虏，即因战争、袭击或其他原因被抓捕为奴的人，处境最为悲惨。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徙居异地，割断同原有社会的一切联系。俘虏无任何权利，俘获者可任意处置他们，在各种有关典礼上充当牺牲的主要是这部分奴隶。(2)普通奴隶，即通过市场及其他渠道进入主人家庭，主人决定收留的奴隶。最初，他们要受到严密监视，处境与俘虏无异。但是，如果在监护期间表现良好，普通奴隶可由主人安排结婚成家，得到小块土地。他们每周为主人劳动五天左右，其余时间在小块土地上耕耘，收入归己。(3)家生奴隶，即普通奴隶所生子女。普通奴隶同家生奴隶婚配也可成为家生奴隶。家生奴隶被视作主人家庭成员，年幼时享有与主人孩子同等待遇。成年时可分得土地，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结婚和有子女之后可迁离主人住区，选择任何职业，积累自己的财富。主人不得出卖家生奴隶，但家生奴隶必须通过“送礼”等方式将部分收获物交给主人。家生奴隶死后，主人可得其全部财产，奴隶子女无财产继承权，但主人可采用赏赐等方式让家生奴隶子女继承财产。(4)被释放的奴隶。即通过金钱赎买、主人

临终释放和皈依伊斯兰教等方式获得自由的奴隶。获释奴隶可用全部时间耕耘小块土地，或从事其他职业，收入全部归己。但他们作为主人家庭的亲属或晚辈支系，仍参与主人家中的一切重大活动，同主人家庭仍保持一定联系。作为主人妻妾的奴隶，一旦生儿育女，便可成为自由人。西非奴隶地位的演变，反映了奴隶通过若干过渡阶段转变为自由人的全过程。但奴隶贸易使家生奴隶的地位受到影响，使奴隶成为自由人的机会日益减少，同化过程遭到破坏。

归顺民指归顺征服者的广大居民。随着一些政治军事强国的兴起，一系列部落、部族或国家被征服。它们的首领臣服于征服者，它们的居民便成了归顺民。归顺民基本上居于原有地区，保留原有组织，享有原有社会的一切联系和权利，征服者无权任意处置他们。因此，他们同奴隶是有区别的。但是，归顺民必须承担一定义务，如缴纳一定数量的贡赋，提供一定数量的兵源；违反征服者意志，拒绝履行义务，必定受到讨伐。在征讨中被抓获的男女老幼均被贬为奴隶。因此，他们同自由民又不相同。在阿散蒂国家的疆土内就有大批附属国和归顺民。他们必须缴纳贡税，其数量有时是固定的，按年缴纳；有时是不固定的，实际征收量以阿散蒂国家的需求为转移。贡赋品种则取决于各地的状况。产金丰富的地方，缴纳黄金；不出产黄金的地方，缴纳现金、牲畜、布匹和奴隶等。例如塞弗威每年缴纳 2000 镑，加曼每年缴纳 1000 镑，芒西每年缴纳 450 镑，萨拉加和附属国达冈巴的其他较大城镇缴纳的贡赋是奴隶 500 名、母牛 200 头、羊 400 只、棉布 400 匹、丝绵织物 200 匹等。阿散蒂人常对一些不忠的附属地区进行征讨，征讨中所获俘虏是该国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状况到 19 世纪初仍未改变。

西非沿海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极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十分明显。少数居民，特别是居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居民，仍处于前阶级社会发展阶段，保有某些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关系仍具活力，父权制大家庭仍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产不均现象已经产生，地域性的村社逐渐形成，军事首长的权力正在增长，少数富有者和上层分子使用奴隶的现象已经出现。

在西非沿海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塞内冈比亚、黄金海岸、沃尔特河以东、贝宁和奥约等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奴隶制关系已有相当发展。据估计，18 世纪末，奴隶在总人口中占相当大比例。奴隶的占有者主要是有权势者和商人，即国王、首领和贵族。他们垄断性地占有奴隶，因为只有贵族才允许经商，才能从事奴隶贸易。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富有的混

-
- J.F.AdeAjayi & Michael Crowder. ,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 New York 1972 , pp.241 - 243.
- H.A.Gemery & J.S.Hogendorn. , *The Uncommon Market* 《非同一般的贸易》 , New York 1979 , pp. 185 - 195.
- W.W.Claridge ,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hanti* (《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 , New York 1964 , vol.1 , p.228.
- W.Rodney , *African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ppression on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the Context of Atlantic Slave - Trade* (《大西洋奴隶贸易前后上几内亚沿岸非洲人奴隶制和其他社会压迫形式》) ,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 no.3 (1966) , pp.431—443.
- J.Grace , *Domestic Slavery in West Africa* 《西非家内奴隶制》 , London 1975 , pp.169 - 172 , 207.
- J.D.Fase , *Slave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Africa , c1445 - c1700* (《西非的奴隶和社会》) , in *Journal of African*

血种奴隶商人出现了。他们拥有大量奴隶，有的还拥有奴隶村镇，拥有大型的奴隶种植园和奴隶手工作坊。有权势者主要通过战争和袭击、司法和超司法程序、绑架及各种经济手段取得奴隶。奴隶被广泛用于各经济部门，在国家的政治军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一些较为发展的国家里，还有封建因素同奴隶关系交叉并存的现象。

二、奥约帝国的兴衰和达荷美王国的兴起

奥约帝国是约鲁巴人创立的国家。约鲁巴人生活在北达尼日尔河、南抵拉各斯泻湖、西邻达荷美、东至贝宁的广大地区，是今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的主要居民。他们可能是来自北部或东北部的移民同当地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约鲁巴人以氏族为基本组织单位，分成若干支系，主要有伊费、奥约、埃格巴、伊杰布、翁多、伊杰沙、奥伍和埃基提等。他们以这些支系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创建了若干小国。伊费是他们最早的居留地，也是他们创建的最早的国家。

奥约王国位处约鲁巴人居住区的最北部，与努佩和博尔努毗邻。从 16 世纪下半叶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同北方贸易的加强，奥约开始强盛。它有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奥约逐渐取得军事优势。至迟到 17 世纪初，奥约已开始向外扩张。它的骑兵向南推进，克服森林地区的各种障碍，终于使约鲁巴地区的伊格博来纳、伊杰沙、奥伍、伊费、埃基提和埃格巴等国臣服。奥约扩张的主要方向是西部和西南部，目的在于取得沿海的贸易港口，直接进行沿海贸易。至 17 世纪末，萨贝、克图、埃格巴多、韦梅和维达已为奥约征服。在 18 世纪的前几十年时，奥约同达荷美展开一系列战争，迫使达荷美称臣纳贡。这时奥约的疆域大致北达博尔古、南临大海、东抵尼日尔河、西至莫诺河，已成为领土辽阔的帝国。

奥约国家的权力掌握在“阿拉芬”（国王）及贵族手中。阿拉芬从王室成员中选举产生，拥有宗教和世俗方面的很大权力，但要受到贵族的制约。在奥约，最有权势的贵族是被称为“奥约梅西”的七大贵族，他们的发言人称“巴索龙”。七大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有统帅军队和选举阿拉芬的权利，得到秘密会社“奥格博尼”的支持。由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阿拉芬同贵族之间常有矛盾。随着领土的扩大和海外贸易的兴起，特别是奴隶贸易的发展和舶来品的涌入，争夺经济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结果，有时阿拉芬专政，贵族会议形同虚设；有时巴索龙独裁，阿拉芬成了傀儡。阿拉芬同贵族间的斗争是奥约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是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王和贵族对帝国的统治是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的。阿拉芬不定期地派出远征军巡行各地，以显示其对整个约鲁巴地区包括贝宁在内的无可争辩的主权。镇压起义和反抗的军事行动极为频繁。但是，帝国幅员辽阔，各地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奥约统治者对国家的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帝国的核心部分是地处萨凡纳地带的奥贡河流域，居住着约鲁巴人。这一地区的各属国享有较多的自主权，它们的统治机构依然保存。伊加纳、伊科伊、埃代和伊沃等国统治者都有委派高级官吏的权利。伊费仍为“约鲁巴之父”。伊费的“奥尼”（国王）仍是约鲁巴人的宗教首领和有关圣物的保管者。阿拉芬登

基时，必须从奥尼手中迎请奥兰延之剑。据传奥兰延为伊费第二代君王，他的剑是拥有最高司法权力的象征。占卜用的葫芦也必须从伊费迎请。但是，包括伊费在内的核心地区各国必须尊阿拉芬为主君，承认他的最高决策权力。他们必须向奥约赠送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盖屋顶用的葺草，它是依附和臣属的象征。赠礼时要举行盛大庆典，赠礼庆典是奥约的主要庆典之一。

在核心地区以外的各省区，由阿拉芬指派的高级官员“伊拉里”代表阿拉芬行使最高权力。伊拉里分驻各地，享受皇室成员的礼遇，神圣不可侵犯。伊拉里也可指派官员充当代理人。阿拉芬还指派被称为“阿杰莱”的官员驻于各城镇，征收捐税和贡赋，并负责将其送往京城。贡税物品的种类因地制宜，森林地带缴纳柯拉果、席子、几内亚胡椒、木柴及其他森林产品；沿海地区缴纳各种舶来品；能抓捕奴隶的地区则以俘虏纳贡。贡税数量必定不少。以伊拉里和阿杰莱为主体的行政网络规模很大。他们在各地专横跋扈，甚至凌驾于国王之上，遭到人民反对。18世纪后期，埃格巴人起义反对奥约的统治，被杀的阿杰莱达600余人。

奥约帝国的建立扩大了贸易联系，特别是同沿海的贸易。贸易的主要项目是买卖奴隶，同时也有食盐和布匹等产品的交换。阿拉达、波多诺沃和巴达格里等都是奥约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大量约鲁巴奴隶就是从这些港口输出的。奥约对沿海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十分重视，阿拉芬和贵族都力图直接控制这类贸易，并从中取得最大份额。随着贸易的发展，许多约鲁巴人移居沿海，逐渐形成若干移民集团。奥约政府对这些移民集团的首领实施监督，以保证他们为帝国的商业利益服务。随着移民的增多，约鲁巴语逐渐成为波多诺沃一带通用的商业语言。

18世纪下半叶，奥约逐渐衰落。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无休止的猎奴战争和约鲁巴各国间的内战，使奥约帝国政治动荡，经济停滞。18世纪末，经过阿比奥邓的较为稳定的统治（1770—1789）之后，奥约帝国迅速分裂瓦解。1810年，伊洛林统治者阿丰贾进军奥约，迫使阿拉芬自杀。然而，阿丰贾最终也兵败身亡，政权落入弗拉尼人玛拉姆阿利米之手。伊洛林成了独立的弗拉尼王国。弗拉尼人以伊洛林为基地，不断侵袭奥约领土，并占领和洗劫奥约城。约鲁巴各国纷纷宣告独立，阿拉芬名存实亡，奥约终被弗拉尼人征服。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约鲁巴人恢复帝国基业、重建中央权力的努力终因约鲁巴内战而成泡影。

随着奥约的衰落，达荷美成为奴隶海岸最强大的国家。

达荷美王国是继阿拉达王国之后的阿贾人的强大国家。17世纪前半叶，面对日趋衰微的国势，阿拉达统治家族内部发生争执。争执可能与奴隶贸易有关。反对奴隶贸易的一派失败了。他们在年轻的王子多阿克林领导下，移入阿拉达以北50英里的阿波美地区，开始创建新的王国。至达科多努统治时期（1625—1650），阿贾人已征服了阿波美附近的一些村庄，奠定了阿波美王国的初步基础。

1650年，达科多努之子阿奥继位。他以“乌埃格巴扎”的名讳著称于世，是阿波美王国的真正缔造者。他创建了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军队，创造了诸如夜间袭击等新的战术。他利用这支军队和战时召集起来的氏族首领的武装，广泛征讨，迫使阿波美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区臣服。乌埃格巴扎完善了王

国的组织机构。“米冈”承担首相职责，总理全国事务。“梅胡”充任王室总管，管理王室事务，包括处理王室成员的违法行为、供给国王衣食、传达国王旨意等。“扎霍西”为宫廷总监、行政长官和警察首领。“科克蓬”负责经济，主要是管理农业和土地，裁决有关财产方面的纠纷。军队左翼长官称“克波苏”，右翼长官称“加乌”，骑兵长官称“索冈”。财政由“比拿宗”负责。宗教礼宾由“阿克普罗冈”管理。这些官员大多来自自由民。乌埃格巴扎在位时还制定了一整套宫廷礼仪，宏伟壮丽的王宫这时已初具规模。

根据传说，达荷美这一名称产生于乌埃格巴扎统治时期。但是，阿波美对外征服的完成和统一的达荷美国家的诞生是在阿加贾时期。多苏·阿加贾又名加扎·特鲁多，1708年开始执政。同年，他发动对北部韦梅人的战争，并征服韦梅人的国家。由于阿拉达阻止阿波美同沿海的直接贸易，1724年，阿加贾以支持避难阿波美的阿拉达王子于萨尔复位为借口，发动了对阿拉达王国的战争。阿拉达战败，国王被杀，统一的达荷美国家初步形成。到18世纪30年代，达荷美王国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阿波美、阿拉达和维达已完全统一。但当时达荷美仍臣属于奥约帝国。阿波美对阿拉达的征服再次引起奥约的入侵。战争从1726年开始，断续地进行到18世纪40年代，双方曾先后两次订立和约。奥约承认达荷美对征服地区的控制，达荷美则继续向奥约纳贡。18世纪末，奥约国势衰败，达荷美逐渐终止纳贡。1818年盖佐即位，拒绝奥约的进贡要求，战争再起。结果，奥约战败，达荷美从此独立。

达荷美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国王通过长期战争加强了王权。与奥约的阿拉芬不同，达荷美国王不受任何政治集团的牵制或控制，可以决定王位继承人，选拔和委派官吏，并拥有最高司法权力，可以惩处高级官员。国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式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著名的女子卫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机构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部门和官员的职能不断扩大。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达荷美增设“耶沃冈”（或称“白人首领”）一职，负责管理维达，专门处理有关欧洲商人及其堡垒的事务。梅胡必须接待所有同达荷美进行贸易的外国人，并将来自维达的收入送交国库。米冈增加了管理阿拉达的职责。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采取了一些集中措施。以考黎为基础的货币输入和流通受到财政部门的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主要由国家垄断。地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受中央节制。国家对祖先崇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改革，强调祖先崇拜对国王的依赖，并统一了崇拜祖先的礼仪。这样，整个国家便呈现出高度集权的状况。

达荷美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在较大的属国里，国王都被废黜，但下级官吏一般不予更动，地方政权中村头人的权力往往还得到加强。被征服者的反抗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1732和1734年，达荷美对杰金进行了严厉讨伐。对维达和大波波及两者之间的地区的征讨接连不断，直至18世纪70年代，企图夺回王位的维达王位继承人被杀，和平才得以实现。

在达荷美经济中，奴隶贸易占很重要地位。奴隶贸易由王室控制。达荷美以其强悍的军队不断袭击邻国，将抓捕的大批人口卖作奴隶；同时还充当贸易中介，将来自北方的奴隶转运至南方各港口出售。达荷美人认为，王国全体居民都受到国王保护，是不可出卖的，因此他们一般不在国内袭掠奴隶，这在当时有利于巩固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荷美是个农业国，为保证农

业的发展，一些统治者曾反对奴隶贸易。国王阿加贾曾采取措施，鼓励因战乱而逃亡他乡的居民回归故里。他反对奴隶贸易，曾洗劫和烧毁欧洲奴隶商人在阿拉达和维达的商站，围困欧洲人的堡垒，封闭奴隶从内地进入沿海的通道，并禁止输出男性奴隶。他希望利用欧洲人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并以此为基础同欧洲人发展贸易。1725年，他派代表赴欧洲一些国家，说明达荷美不欢迎拥有贩奴船的欧洲人。他邀请欧洲人到达荷美投资，开办种植园，利用非洲人的劳力发展生产。他本人也曾将大批俘虏用于王室农场。他还邀请欧洲的缝纫工、木工和铁匠等手艺人来传授技艺。但是，欧洲人不予理睬，阿加贾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由于不输出奴隶就得不到武器及其他所需物品，就无力抵抗强邻的侵袭和扩张领土，因此在特格贝苏统治时期（1740—1774），奴隶贸易又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以阿波美艺术为中心的达荷美艺术这时已有相当发展。艺术的门类很多，形式多样，其中主要是各种木雕、着色泥土浮雕、塑像、铁制艺术品，以及津克波（御座）和雷卡德（权杖）的精心制作。这些艺术作品既是独特的达荷美文化的表现，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装饰阿波美王宫的着色泥土浮雕反映了达荷美诸王统治时的许多重大事件。这些艺术品完全可以同16—17世纪欧洲各君主国的艺术品媲美。

三、阿散蒂王国的勃兴

在阿散蒂成为强国之前，阿坎人已经建立了一些较大的国家。

阿坎人建立的最早的国家是阿丹西。阿丹西位处普拉河和奥芬河合流处的北部，创建者是奥明·埃尼姆。在埃乌拉·巴沙统治时，阿丹西强大起来，统治着邓克拉等属国。17世纪中期，阿丹西为邓克拉所灭。

邓克拉在征服阿丹西及其北邻小国之后，征服了特威福、阿辛和瓦萨、奥温和塞弗威。邓克拉及其属国盛产黄金，其首府是黄金贸易的重要中心。它还控制着内地同沿海贸易的西部通道，在埃尔米纳和海岸角的贸易中起重要作用。17世纪下半叶，邓克拉已成为黄金海岸西部最强大和最富有的阿坎人国家。

黄金海岸东部最强大的阿坎人国家是阿克瓦穆王国。阿克瓦穆人居于阿戈那和阿克拉的北部内陆。他们采用和平与武力等手段扩张领土，到18世纪初已统治着阿克拉平原、阿克瓦皮姆山区、以及克瓦户山至比里姆河彼岸的大部分平原。阿克瓦穆王国拥有比里姆河流域的黄金产地，控制着东部内陆同沿海贸易的商路，同时享有同阿克拉和奥苏的欧洲人堡垒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但是，18世纪30年代，阿克瓦穆被阿基姆人击败，失去了有利的贸易条件，影响逐渐消失。

阿基姆人分为阿布阿克瓦、科托库和波索米三个支系，居于普拉河及其支流比里姆河流域。1733年，阿基姆人联合阿戈那、奥布图、戈摩阿、阿克拉和芳蒂等，在荷兰人支持下，打败阿克瓦穆，扩大了领土，控制了黄金海岸中部。阿基姆人居住地区称“大阿坎尼”，盛产黄金。他们利用奴隶开采金矿，耕耘土地，搬运货物，同时通过阿克拉向奥苏进行海外贸易，取得所需物品，国势日甚。

创建阿散蒂国家的两个阿坎人氏族奥的科和布雷图奥曾是邓克拉的臣属，居於塔福。塔福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是通向杰内和豪萨地区的两条贸易

通道的枢纽。随着人口的自然增殖和阿丹西移民的到来，一些具有管理机构的城镇和大村庄开始涌现。至17世纪70年代，克瓦曼、朱阿本、贝克威、芒朋、科科富和恩苏塔等以城镇为中心的小邦已经形成。在这些被称为“阿曼托”的小邦中，除芒朋属布雷图奥氏族外，其余均属奥约科氏族。这些小邦仍臣服于邓克拉，向其纳贡，并将一位王室成员送交邓克拉朝廷作为人质。阿散蒂人还经常受到多马人的侵扰。为了摆脱邓克拉人的统治，排除多马人的威胁，各阿曼托小邦以克瓦曼为中心逐步实现联合和统一。克瓦曼统治者奥迪·阿肯登曾领导阿散蒂人同多马人作战。可能正是在同多马人的战争中，他为克瓦曼赢得了威望。1660年，阿肯登去世，奥比里·叶波阿继位。这时为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各小邦已自动地组成一个以叶波阿为首领、以克瓦曼为中心的邦联。它实际上是一个战时的松散联盟，联盟各邦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阿散蒂国家的创立者是奥塞·图图。他是奥比里·叶波阿的王甥，年轻时被送入邓克拉朝廷，在邓克拉王博阿·阿姆朋塞姆（1677—1692）身边服务，后逃至阿克瓦穆，得到阿克瓦穆王的宠信。奥比里·叶波阿在同多马人的战争中被杀，奥塞·图图被选为继承人，并在阿克瓦穆兵士护送下回国继位。随同前往的有克瓦米·弗林朋·安诺基。他是祀奉战神奥图图的祭司，对阿克瓦穆和邓克拉等国的政治和军事都很熟悉，在阿散蒂国家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奥塞·图图为了驱逐多马人，解除邓克拉人的威胁，他首先将松散的联盟结合为紧密的军事联盟。经过安诺基的工作，各小邦增强了团结统一的观念，愿服从奥塞·图图的指挥。奥塞·图图以阿克瓦穆军队为范例，为军官们制作了新的刀剑。军官必须宣誓血战到底。一支全民族的军队开始萌芽。奥塞·图图利用这支队伍，终于战胜多马人，统一了塔福地区。

军事上的胜利增强了奥塞·图图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为联盟发展为集中统一的联邦提供了有利条件。安诺基根据阿坎人国家的政治和组织状况，利用阿坎人的传统，加速了实现联邦的过程。他在克瓦曼、朱阿本和库马乌各种下一株库姆尼尼树，结果只有种在克瓦曼的一株存活下来。克瓦曼从此被称为“库马西”（意为“在库姆尼尼树下”），成为阿散蒂人的政治中心。他利用阿坎人的政治传统，设置了一张金凳子，并在星期五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将它从“天上”降落到奥塞·图图的膝上。他还要求与会各位著名酋长和母后献出一片指甲和一些头发，并以此制成药浆，涂抹金凳子，同时让献物人饮下。金凳子从此代表了整个阿散蒂民族的精神，成为阿散蒂人团结统一的象征和精神力量的源泉。金凳子拥有者奥塞·图图成了阿散蒂人的神圣领袖，各阿曼托首领必须对阿散蒂赫内（国王）宣誓效忠。这就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增强了联盟，使之演变为巩固的联邦国家。

邓克拉向阿散蒂征收沉重的贡税，垄断了黄金海岸东部沿海同欧洲人的贸易，阻碍了阿散蒂人从埃尔米纳和海岸角等重要港口取得食盐和武器等重要物品的供应。因此，摆脱邓克拉人的统治在阿散蒂国家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1699年，邓克拉王恩迪姆·卡加利要求阿散蒂人缴纳重金，并提出一些侮辱性要求。奥塞·图图坚决拒绝，并对邓克拉宣战。战争在邓克拉、阿基姆联军同阿散蒂、阿克瓦穆联军之间展开。邓克拉的属国离心倾向极强，或者按兵不动，或者暗地支持阿散蒂，结果邓克拉战败。1701年，邓克拉灭亡。阿散蒂人兼并了邓克拉在奥芬河左岸的全部领土，缴获了埃尔米纳堡的地租备忘录，建立了同沿海的直接贸易联系。

阿基姆是阿散蒂继续进行扩展版图的主要障碍。独立的阿散蒂国家立即转入对阿基姆的战争。阿散蒂对阿基姆的第一次远征发生在奥塞·图图当政末期，结果遭到惨败，奥塞·图图被杀，跟随出征的阿散蒂贵族几乎全部落网，数百名随行人员很少生还。但战争并未终止。18世纪30年代，奥坡库·瓦里当政时期，阿基姆被打败，其首领被杀，部分领土被兼并，几名王室成员被送到恩苏塔作为人质。阿克拉的几座欧洲人堡垒的地租备忘录落入阿散蒂人之手。阿散蒂建立了同东部沿海的直接贸易联系。阿散蒂人还征服了北方的一些国家。到18世纪80年代奥塞·科约去世之时，阿散蒂已扩展为一大帝国，它直接控制的疆土北达泰因河、南至普拉河和奥芬河、西至比亚河、东迄沃尔特河，东西长150英里，南北宽90英里。班达、加曼、达哥姆巴、阿辛、阿基姆、新邓克拉和阿克瓦穆等均臣服于阿散蒂。

阿散蒂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阿散蒂赫内”从王室成员中选出，拥有很大权力，但要受到库马西元老的牵制。元老可以废立阿散蒂赫内，有时甚至操纵国政。为增强王权，奥塞·科约执政期间（1764—1777），开始从贤能之士中选拔官员，建立由文官和警官组成的新的中央机构，对国王负责。从此之后，阿散蒂赫内的权力不断加强。阿散蒂国家允许附属国享有较大自主权。附属国一般由阿散蒂酋长管理，不派兵驻守。它们的武装力量依然存在，领土保持完整，习俗得到尊重，内部事务基本自主。附属国的酋长是“阿布列姆朋”（阿散蒂酋长议事会）的成员，有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附属国的主要义务是按要求缴纳贡品，按需要提供军队。这种政策有利于较小属国同阿散蒂的融合，但一些人口众多、民族情感强烈的附属国却因此而增强了独立倾向。阿散蒂不断发动征讨，使武装力量成为阿散蒂国家的支柱。在阿散蒂国家的经济中，黄金和奴隶贸易占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阿散蒂将购自北部市场或附属国进贡的奴隶赶运至沿海出售；在战争时期，主要依靠出售战俘获利。阿散蒂人所需的欧洲舶来品特别是军火，主要用黄金和奴隶换取。

四、卡约尔王国的崛起

沃洛夫人曾居于里奥德奥罗河流域，后迁入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之间的沿海与内地，先后成为马里和桑海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农为本，土地为村社占有，由村长和长老掌握，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同时也种植供交换现金的作物。沃洛夫人曾创建卓洛夫、瓦洛和卡约尔等强国。

卓洛夫帝国是沃洛夫人创建的第一个强大国家，但至16世纪已趋衰落。随着卓洛夫帝国的解体，瓦洛王国逐渐强盛。瓦洛王国地处塞内加尔河下游，在摆脱卓洛夫帝国的统治后，政局不稳。毗邻地区的摩尔人、塔克鲁尔人和圣路易的法国人都不断干预瓦洛内部事务。1673年，居于沙漠南部的扎瓦亚人伊玛姆纳赛尔·丁跨过塞内加尔河，侵入沃洛夫人各国。瓦洛王国在英勇抵抗之后败北，被迫接受扎瓦亚人的统治。翌年，纳赛尔·丁在同特拉扎人的战争中被杀，瓦洛王国乘机起义，打败扎瓦亚人，杀死其第二任伊玛姆卡迪·乌斯曼。1679年，瓦洛王国的“布拉克”（国王）发动全面进攻，将扎瓦亚人逐出沃洛夫各国。瓦洛成为沃洛夫人的强国。

卡约尔是继瓦洛之后兴起的国家。卡约尔地处沿海，在同欧洲人的贸易中处于极有利地位。它用奴隶、象牙、树胶和蓝靛等换取输入的武器和消费品，同时将食盐运入内地换取黄金。卡约尔“达梅耳”（国王）增加王室奴

隶数量，并从奴隶中挑选武士，组建了一支被称为“蒂多”的职业武士队伍。达梅耳以蒂多为支柱，加强中央集权。地方酋长和神职人员的独立自主权被剥夺，成了中央机关的官吏。至17世纪末，卡约尔已趋强盛。1796年，富塔托罗的阿尔马米阿布德·卡迪尔向沃洛夫人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改宗伊斯兰教，或者灭亡。同年，阿布德·卡迪尔领兵侵入沃洛夫诸国。卓洛夫和瓦洛的国王均因无力抵抗而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但卡约尔达梅耳却拒绝最后通牒，并最终打败和俘获阿尔马米。于是，卡约尔成为沃洛夫人的强国。

在卡约尔王国中，伊斯兰教和传统势力是影响政局的两大因素。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自15世纪中期以来，穆斯林就一直在沃洛夫人的宫廷中服务。他们或充当书记和顾问，或充当神学家。卡达莫斯托发现，一些黑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在首都姆布尔建立了清真寺，达梅耳阿马里还邀请卡达莫斯托观看清真寺内的祈祷。穆斯林多以贸易为业。随着贸易的发展，穆斯林在宫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并最终形成一个以神职人员“马拉布特”为首的政治派别。传统势力的主要力量是达梅耳的武士队伍和传统文化的代表格里奥特集团。到18世纪末，传统势力一直在卡约尔占居优势。穆斯林总是力图借助外部力量控制政权，因此毗邻穆斯林世界的重大变动常常引起卡约尔政局的波动。1673年，随着扎瓦亚人的入侵，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达梅耳登上王位。他在穆斯林神职人员恩迪阿伊·萨尔的指导下进行统治。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活动，达梅耳动摇。萨尔废黜这位达梅耳，自立为王，但随着扎瓦亚人的失败，萨尔终被推翻。1790年，在富塔托罗穆斯林圣战成功的鼓舞下，卡约尔穆斯林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未果，许多人被卖为奴。1796年，穆斯林利用阿尔马米入侵的形势夺取政权，但也未成功。不过，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停止，由此导致卡约尔王国的政治组织渐遭破坏，国力日趋衰弱。

卡约尔王国对西方的殖民侵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17世纪40年代，达梅耳拒绝法国第一塞内加尔公司的船舰在其领海和内河活动，甚至拘留了给船舰提供饮水和木柴的黑人工人。法国船队只好在缴纳规定的税金后迅速离去。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塞内加尔殖民地第一任代理总督安德烈·布律因擅自进入王国领土而被捕。1779年，法国利用北美独立战争的时机从英国手中夺回圣路易。一些国王前去向法国总督致敬，但卡约尔王拒绝前往，声称“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至18世纪80年代，卡约尔人已发动了三次反殖起义。

五、欧洲人的早期殖民侵略

西非沿海是西方殖民者最早侵入的地区。

1444—1445年，葡萄牙人的探险船队越过塞内加尔河口，进入西非的上几内亚。至1475年，葡人已绕过赤道，完成了对整个西非的探索。他们一边探险，一边掠夺非洲富源。他们以布匹、小五金、串珠、铁和其他金属换取象牙、黄金和奴隶，并在阿尔京等地的海域开发渔业资源，在几内亚湾的一些岛屿兴办种植园。这种掠夺性的贸易和开发可带来5—6倍的利润。葡萄牙人垄断这种利润丰厚的殖民事业达一个多世纪。但高额利润终于激起欧洲其

G.G.Beslier, Lesénégal (《塞内加尔》), Paris 1935, p.45.

G.G.Beslier, op.cit., p.87.

他国家的竞争。至 18 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等在西非的殖民角逐仍未终止。由于柯拉果在欧洲没有销路，西非胡椒无力同东印度胡椒竞争，因此列强争夺的商品除奴隶外，主要是象牙和黄金。

在西非沿海地区，大象主要分布于上几内亚的沿海和近海的一些岛屿。冈比亚河流域、努内兹河流域以及内地的高地草原都有许多大象。下几内亚的东部地区大象也很多，后来这一地区获得了象牙海岸的名称。非洲人一般采用传统方法猎捕大象。他们使用毒叉或毒矛投掷，或将大象围圈起来，用武器打死。这种捕象方法不能满足欧洲人对象牙的大量需求，但每年仍有不少象牙供应。

收购象牙的欧洲人最初主要是葡萄牙人。由于佛得角群岛和大陆沿海葡商的活动，至 16 世纪，沿海和内陆的商人已组织起来，形成象牙贸易系统，贸易趋向正规化。后来，英国人在象牙贸易中渐居首位，荷兰、法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积极参与象牙贸易。他们大多采用物物交换方法，用低廉的货物换取象牙。英国商人换取象牙的物品一般为红布、蓝布、火药和铁条等。他们在努内兹河的一个商站，每年输出象牙 30 吨。1663 年，访问塔尔索岛的一位葡萄牙传教士看到一艘英国船装载了两万余支象牙。

为满足欧洲商对象牙的需求，非洲出现了专门猎捕大象的人群。许多国王和首领建立了猎象人的村镇。专业猎象者持有国王或首领的特许证明。为追逐大象，他们常常集体居于森林中数月。欧洲人输入的武器也逐渐被用于猎象。至 18 世纪末，西非沿海地区的大象已明显减少，一些地区的大象已被灭绝。

欧洲人对黄金的追求永无止境。黄金海岸是他们为取得黄金而激烈角逐的场所。

1471 年，里斯本商人费尔兰·戈麦斯雇用的两名船长绕过西非三点角，在距今海岸角不远的地方弃舟登陆。他们发现三点角和海岸角之间长百余公里的沿海地区黄金储藏丰富，砂金贸易活跃，因而将其称为“米纳”（矿藏）。后来，人们将它称为黄金海岸。黄金海岸需要的大宗商品是金属器具、布匹衣物、串珠和奴隶。葡萄牙经济落后，国内产品难于满足这类要求，因此葡萄牙商人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贩来所需物品，采用垄断市场和不等价交换等方式，以少量货物换取大量黄金。葡萄牙人还派出远征队，强占金矿脉，使用奴隶采金。从 16 世纪初起，每年运抵葡萄牙的黄金占世界黄金产量的 1/10，价值约达 10 万英镑。此外，还有许多运金船被劫。1500—1531 年，仅被法国人劫掠的运金船就有数艘。为保护黄金贸易，葡萄牙人在黄金海岸修筑堡垒，在几内亚湾派驻舰队，在公海上建立护航制度。敢于同其他国家贸易的非洲居民都遭到征讨。这些措施有利于葡萄牙人对黄金贸易的垄断。

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商人最初只能避开葡萄牙舰队和堡垒的火力，或彼此合作突破封锁，进入黄金海岸，染指黄金贸易。但到 17 世纪 40 年代，荷兰人将葡萄牙人逐出黄金海岸，取得了黄金贸易中的优势。接着，英荷两国展开激烈争夺，黄金输出随之增长。17 世纪，阿坎人各港口每年输出的黄

W.Rodney,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 - 1800* (《上几内亚沿岸史》), Oxford 1970, pp. 154-155.

J.D.Fage,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Cambridge 1962, p.54.

金价值达 20 万英镑。18 世纪初，黄金贸易的价值已达 25 万英镑左右，其中荷兰人占 1/2，英国人占 1/3。到 18 世纪末，荷兰人在黄金贸易中的比例下降，英国人所占份额上升到 1/2。

为保护和垄断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西方殖民者在西非沿海修筑了许多堡垒和商站。

最早在西非沿海构筑堡垒的是葡萄牙人。16 世纪末，荷兰人开始在西非建立据点。17 世纪上半叶前后，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和勃兰登堡等也积极从事堡垒修筑。堡垒分布极为广泛，但最集中的地方是黄金海岸。至 18 世纪末，在长约 250 英里的黄金海岸沿海，共有大小堡垒 42 座，平均 6 英里就有一座堡垒，此外还有无数商站。随着奴隶贸易成为欧非贸易中的决定因素，堡垒和商站成了欧洲人进行奴隶贸易的主要据点。堡垒围墙周围和邻近地区逐渐变成奴隶市场。堡垒里的公司职员可以随时在这类市场上购进奴隶，既免除了深入内地的危险，又避免了因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价格波动。同时，这类市场一般都处于堡垒大炮射程之内，能保障欧洲人的安全。堡垒设有储存奴隶的地牢，较大者可储存奴隶千名，较小者可容纳一二百名奴隶。零星购进的奴隶可储存起来，运奴船一到便可运出，大大缩短了船只的周转时间。换取奴隶的货物也可存放在堡垒之中，这种堡垒贸易在 18 世纪仍很盛行，深受奴隶商人的欢迎。

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前来定居的人日益增多，堡垒周围逐渐形成市镇。这类市镇拥有由堡垒守备队和男性居民组成的武装力量，是奴隶输出和商品输入的必经之地。随着政治经济力量的增长，这类市镇逐渐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实力和影响往往超过一些毗邻国家的都城。它们一般都处于欧洲人控制之下，在一个市镇只有一家欧洲公司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埃尔米纳原为小村，至 18 世纪初已发展成有名城镇，拥有石建住宅 1200 余所，可提供战斗人员数千名。欧洲人成了市镇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有权指挥军队，有权对非洲人执行法律，并代替传统的国王确认当地首领。这类市镇是殖民扩张的基地。

随着殖民活动的开展和欧洲人的移居，在沿海社会中逐渐形成一个混血种人阶层。它的主要部分是葡非、英非和法非混血种人集团。16 世纪末，在冈比亚的所有港口城镇都有葡非混血种人集团；至 17 世纪初，他们已成为冈比亚的主要商业集团。这些混血种商人不仅拥有以商品和贸易网络为中心的经济力量，而且同非洲传统的统治者关系密切，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在贸易方面。他们依赖欧美商业资本，在奴隶贸易中起重大作用，对非洲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沿海各国的衰败是西方早期殖民侵略的又一后果。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猎奴战争连续不断，社会生产备遭破坏。西方列强为排除竞争，垄断贸易，展开了激烈的殖民争夺。为在争夺中取胜，他们总是将大量非洲居民卷入战争。为取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扩张势力范围，他们利用非洲各族间的矛盾，以堡垒及其所在市镇的力量为支柱，挑动和组织弱小邦国摧毁较强大的国家，或与强国联手欺凌弱小邦国。奴隶贸易的发展和殖民者对非洲政治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321.

Page, op.cit., p.70.

Claridge, op.cit., p.165.

干预，引起非洲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分裂和内战，导致沿海城镇、特别是堡垒和商站所在城镇的独立和分裂倾向的发展。一些古老的国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分崩离析的。

卓洛夫王国曾为一大帝国。瓦洛王国、卡约尔王国、巴奥尔王国、谢列尔人的国家，以及冈比亚河北岸马林凯人的国家恩尤米、巴迪布、尼亚尼和瓦利等，都曾处于其权力之下。葡萄牙人在同卓洛夫发展贸易的同时，极力干预其内政。15世纪80年代，比莫伊王子以其兄布尔巴比拉奥的名义统治卓洛夫。在葡萄牙人影响下，他将首府由内地迁至沿海，并同意接受葡萄牙传教士。这一政策引起王室分裂和纷争。比拉奥被杀，比莫伊被葡萄牙人带到里斯本，改宗基督教。葡萄牙以帮助比莫伊复位为由，派兵远征卓洛夫，并在塞内加尔河口修筑堡垒，以加强其在塞内冈比亚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卓洛夫的政局动荡。另一方面，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各属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独立倾向日益发展。16世纪中，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卡约尔、瓦洛及其他属国纷纷独立。强大的卓洛夫帝国终于瓦解。

阿拉达王国在欧洲人到达之时已有相当发展。沿海的大波波、小波波、维达、杰金和波多诺沃等均属王国领土。奴隶贸易引起连绵战争，摧毁了阿拉达的经济，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阿波美的建立。至17世纪末，沿海各城镇实已独立，成了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公司的工具。至18世纪初，阿拉达王国已成为以阿拉达城为中心的小国。

贝宁王国在西非中世纪史上颇有影响，17世纪上半叶疆域仍很辽阔。在沿海，拉各斯王国和瓦里王国均为其臣属；在北部，它拥有约鲁巴的大部分地区；在东部，其影响达于伊博兰；在西部，它控制翁多，伊杰布也被视作臣属。关于这一时期贝宁的繁荣情况，荷兰和英国等国的旅行家都有详尽描述。但至17世纪下半叶，贝宁已开始衰落。王室内部的纷争爆发了，中央同地方的矛盾发展了。奴隶贸易酿成的战祸，蹂躏了城市和村庄。18世纪初，欧洲旅行家看到的贝宁及其王都奥埃多已处于半毁灭状态。瓦里等属国在欧洲人的支持下已经独立。王国版图大大缩小，中央权力名存实亡。

六、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殖民地的初创

英国和法国利用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逐步将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变成殖民地。这是列强在西非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之一。

16世纪，英国商人已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沿海地区进行贸易。17世纪，英国开始组织几内亚合伙公司。1618年，在詹姆斯一世倡导下，罗伯特·里奇等30名商人组成伦敦冒险家对非贸易公司。公司勘探了冈比亚河，并在河流入海处的詹姆斯岛上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商站。几内亚贸易从此得到英国政府保护。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英国在冈比亚的活动有所扩大。1651年，国务会议将专利授予罗兰德·威尔逊和托马斯·瓦尔特等人的几内亚公司。公司派出两支考察队，逆冈比亚河而上，寻找黄金，扩大贸易。1652年，公司在宾坦建立了商站。

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英国在冈比亚逐渐取得优势。查理二世组建了显

Allen Burns, *Histor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史》), London 1963, pp.44—45.

Allen Burns, *op. cit.*, pp.44—45.

赫的皇家冒险家公司，以便为美洲的种植园输送奴隶。在此期间，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安德烈斯岛。安德烈斯岛和班珠尔岛原为库尔兰人占有，他们在岛上修筑了堡垒。1659年，库尔兰人将其在西非的财产转让给荷兰人。皇家冒险家公司的首要任务是索回荷兰人手中的英国财产，因此它占领了安德烈斯岛，并将其更名为詹姆斯岛。

1672年，英国创建皇家非洲公司。公司以詹姆斯岛为基地，同时在沿海和冈比亚河上游地区设立贸易站。这些贸易站主要分布于麦卡锡岛、巴腊康达瀑布、宾坦、班扬角和富贾雷等地。这时法国再次将贸易区扩大到冈比亚，取得冈比亚河北岸所有权，并在詹姆斯岛对岸的阿尔布雷达设立贸易站。1689年，英法战争爆发，两国互相攻占对方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商站及堡垒。但是，1697年的里斯维克和约仍维持了英国在冈比亚的优势。1698年，英国开放西非贸易，结束了公司对贸易的垄断。公司的职责是维护詹姆斯堡，负责冈比亚的防务，为此公司有权向个体商人征税。个体商人可以建立商站，扩大贸易。

175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设立对非贸易商行，控制西非的堡垒、商站和贸易，但商行要受议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这就是所谓双重领导。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利用海上优势，夺取了果雷埃等法国在塞内加尔的一些主要贸易基地。1763年的巴黎和约确认英国对塞内加尔的权利，但将果雷埃归还法国，并允许它占有阿尔布雷达。适应领土扩大的形势，英国议会於1765年通过法令，将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合并为塞内冈比亚省，成为英王管辖下的殖民地。殖民地由一名总督、一个委员会和一名首席法官治理，总部设在圣路易。冈比亚则由一名副总督管辖。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乘机占领圣路易，果雷埃的设施毁于兵燹，法国巩固了在塞内加尔的地位。塞内冈比亚省只剩下冈比亚部分。1783年，英法订立凡尔赛条约，规定圣路易、果雷埃及塞内加尔的其他堡垒和商站为法国所有，冈比亚河两岸为英国殖民地。同年，英国议会将冈比亚殖民地的管辖权交给商行执行委员会。奴隶贸易的废止，内陆探察活动的兴起，使冈比亚的地位显得重要。随着贸易的发展，贸易站已遍及冈比亚河流域。班珠尔岛上建筑了堡垒，巴瑟斯特市已发展起来。为此，1821年议会法令规定，冈比亚仍为皇家殖民地。同年，冈比亚与西非其他要塞和殖民地一起，划归塞拉利昂总督管理。

从16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商人已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地区活动，但法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塞内加尔河流域。

法国塞内加尔殖民地的基础是在黎塞留任首相时奠定的。他帮助商人在几内亚海岸建立贸易公司，授予这类公司十分广泛的权利。1626年，第一诺曼底公司的船只抵达塞内加尔地区的恩达尔岛，获得居留权，建筑了房屋，开辟了一块殖民地，并将恩达尔岛更名为圣路易。1636年，第二诺曼底公司的船只抵达塞内加尔。公司在圣路易岛上建筑了政府大楼和经理住宅等坚固的建筑物，并留下了一名经理和一些传教士。法国在塞内加尔和活动基地圣路易城开始发展起来。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先后组织了一些大的特许公司，扩大和巩固了塞内加尔殖民地。1659年，圣路易被选作大本营，修筑了堡垒，扩大了城市。1666年和1667年，法国先后从荷兰手中夺得阿尔京和果雷埃两岛。果雷埃和圣路易组成塞内加尔省，由一名总督、一名省长和一名司法监察官管理，

为法国殖民地。圣路易为省长驻蹕地。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地区的其他属地则成为附属地。

1697年，安德烈·布律任塞内加尔殖民地代总督。他从研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入手，通过武力威胁、建立“亲密关系”和传教士的教化等手段，不断扩张。他在梅迪内修筑了堡垒，在法梅累河畔修建了炮台，从而使法国势力深入苏丹内地，直到班布克。同时在阿尔布雷达、比绍和博拉马等地建立了一些商站。七年战争期间，法国丢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恢复了在塞内加尔的势力。在18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塞内加尔殖民地经历了勒加德尔·德·勒庞提尼、布夫累和布朗肖三位总督的统治。在勒庞提尼时期，法国曾打算利用镇压卡约尔人反抗的时机，吞并萨卢姆，向锡内和巴奥尔扩张，但力不从心，只能守住以圣路易和果雷埃为中心的塞内加尔殖民地。

第六章 湖区诸国的兴起和东非的社会变迁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东部非洲的沿海和内陆的社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濒临印度洋的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同南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到了10—15世纪，更发展了斯瓦希里文明，凝聚成一连串璀璨的明珠——古代东非的沿海城邦。与此同时，广大的内陆地区尚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虽然也同沿海地区有着某些接触和交流，但毕竟是分散、零星和间接的。这种接触与交流，远不足以对内陆各族人民的传统社会构成带有实质性的影响。由于迄今为止考古和文献资料的局限，人们对于古代内陆地区的情况，难以作出精详的判断。只是可以肯定地知道，到10世纪时，东非内陆广大地区已基本遍布了从西部波浪式迁徙而来的班图语各族人民。班图各族都是古代农业民族。他们的到来，使东非内陆地区不仅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成为非洲型的古代农业社会。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非洲东海岸。早期的葡萄牙殖民者，按照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殖民侵略的逻辑活动。他们对沿海城邦烧杀抢掠，实行赤裸裸的暴力劫掠。葡萄牙人破坏了历史悠久的古代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了以果阿为中心的、组成松散的东方海上殖民帝国。东非沿海城邦群，也落入这个殖民圈之中。由于这是一个单纯劫掠性的殖民圈，因而沿海地区迅速衰落。早期殖民主义势力除了在赞比西河某些地区之外，未能对东非内陆地区造成多大影响。

16—19世纪，影响和推动东非内陆各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尼洛特诸族的南下。他们进入东非内陆各地，同这里的班图各族相遇、交往、融合。尼洛特诸族的南下，呈波浪式推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其中，以罗族为代表的河湖尼洛特人迁徙波，大约在1200—1300年以后，开始对乌干达地区的班图人形成压力。尼洛特人以畜牧（如养羊）为生。他们到达新区以后，不仅带来了新的经济生活，而且成为一系列新建国家的统治阶层。另一因素是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形成。18—19世纪，由于沿海形势的变化，从东非海岸通向内陆各地的商路网，由斯瓦希里与阿拉伯商人建立起来。此时，经过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自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因而东非从内陆到沿海均被纳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殖民圈。总体看来，广大东非内陆地区由于同沿海地区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直接联系，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受到有力的推动。但与此同时，自由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触角也伸入东非内陆地区，给这里的前途投下新的阴影。

一、布尼奥罗国家的鼎盛及其衰落

17世纪初，在东非内陆的大湖地区，兴起了一个强盛一时的国家——布尼奥罗（基塔腊）。

如果按照民间传说来推算，布尼奥罗国家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以后。早期相赅续的几个王朝，因年代久远，面目已经模糊，常被赋予一种神的、

关于布尼奥罗的立国时间，学者意见尚难一致。法国考古学家戈尔儒认为它建立于10—11世纪之间，德

或者半神的性质。在这类混合着神话与传说的王朝当中，第一个是阿贝特姆布齐王朝，存在于13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据传，该王朝统治几百年之久，开国君主名叫卡卡玛。当时，布尼奥罗已相当繁荣，有相当发达的香蕉种植园业和养牛业。王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经常侵犯邻邦，掠回大量战利品。但是，阿贝特姆布齐王朝后来神秘地消失了，其末代君王伊萨扎据传也消失于地下。

继阿贝特姆布齐王朝而起的是阿巴支韦齐王朝。其开国君主是平民出身的布库库，他娶了前朝宗室之女为妻。此女前夫之子恩达呼拉后来废黜了布库库，自立为王，因而新旧王朝之间仍有血缘关系。阿巴支韦齐人以驯养长角牛著称。在这一王朝统治时期，布尼奥罗国家不仅向外侵掠，而且不断扩张。如果说前朝是为了战利品而对外用兵，那末阿巴支韦齐王朝则是为了扩大王国控制的疆域而征战。根据传说，除布库库之外，阿巴支韦齐王朝只传了三代。即恩达呼拉、穆林德瓦和瓦玛拉。

瓦玛拉本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但阿巴支韦齐王朝在他统治期间突告中断。据传当时布尼奥罗国家发生了一个非常事件，瓦玛拉邀请了一位罗族的预言家来此释疑。该预言家认为，此事乃王朝将亡之兆，国王应在大难临头前出走。瓦玛拉对此解释深信不疑，遂率领自己的追随者南迁。他们在南方建立了一些王国，如安科累、卡拉圭，等等。伊萨扎的突然消失和瓦玛拉的仓促南迁，其真相固然可能因年代久远而披上一层神秘性的云雾，但我们也可以猜测，大约是因人口膨胀、社会矛盾紧张而造成的部分人民在统治者率领下的迁徙。

瓦玛拉南迁后，预言家将其三位兄弟召来布尼奥罗，其中一个名叫卢基迪·穆普加的被立为布尼奥罗国王，建立了阿巴比托王朝；另一个名叫卡托·基麦拉的被封于布干达，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

阿巴比托王朝从卢基迪·穆普加开始，至卡巴列加为止，前后共23位国王。由于有的王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的方式，因而共合18代。由此推算，其创始期约在16世纪初年。在阿巴比托王朝统治时期，国王虽不再像前两个王朝时那样具有神性或半神性，却仍备受尊崇。国王是大群牛的所有者。这些牛绝大部分来自臣民的贡赋。

国王（称“阿巴卡玛”或“奥穆卡玛”）在一批大小酋长的辅佐下治理国家。他拥有一个顾问委员会，称“奥鲁基拉托”。顾问大臣都是比较重要的酋长，他们全由国王任命，并几乎全年都住在宫廷里。这是为了便于咨询，更便于羁縻，以防反叛。布尼奥罗的国王们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发达的专制王权与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系，他们所要求的大约只是周围藩属们对“奥穆卡玛”的尊崇与贡品。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像专制王权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拥有壮丽、豪华的宫廷。当探险家斯皮克在19世纪下半叶访问布尼奥罗宫廷

国民族学家韦斯特曼则认为它形成于14世纪初。

罗族来自苏丹南部的加扎勒地区。参见 Kenneth E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东非史》), London 1962, p.43.

Sohn N.B.Osogo, *East Africa's Peoples in the Past* (《东非各族的往昔》), Nairobi 1977, p.21.

“奥穆卡玛”意为“牛奶主人”，国王逝世称为“牛奶倒出了”。这些均表明养牛业在布尼奥罗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参见 Cornevin, *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Noire* (《黑非洲人民史》), Paris 1960, pp.546—547.

时，他的印象是：“没有什么东西比王宫和所有通向王宫的过道更脏的了”，“国王的母牛就养在他的宫墙以内，小牛居然进了房屋，而卡姆拉西（当时在位的国王）像农民一样在牛群当中走动，污泥没到脚踝，而且，一边检查那些牛，一边向那些牛吆喝”。

1700年前后，布尼奥罗国家达到它国势的极盛时代。该国的核心部分北起阿伯特湖，南至卡通加河。它的四周环绕着一连串向它称臣纳贡的附庸小国和部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方的布干古，东方的布儒利和布吉雷雷，东南方的布杜诸部，南方的安科累和布赫韦吉王国。在这个附庸圈外的那些国家，虽能大致维持其独立，却难免布尼奥罗军队的征伐。这些外圈国家包括东面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布干达和位于安科累之南的卢旺达，以及东南方向上、位于布杜之外的中等王国卡拉圭。在布尼奥罗的北方，除布干古之外是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地区。那里的居民多半以氏族为单位，甚至尚未形成部落，因而连间接统治都难以实行。但布尼奥罗的影响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一带渗透。在这些氏族当中，有的还卷入了布尼奥罗王位继承之争，并在支持这种斗争失败一方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若干布尼奥罗文化，如象征王权的鼓和贡赋制度等等。它们开始兼并别的氏族，向着建立古代王权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逐渐影响了整个北方的阿乔利地区。到18世纪末，那里已涌现了许多小的政治联合体，平均拥有8—10个氏族，俨然成为部落酋长国了。原有的各种语言也被逐渐推广的罗族语言所取代。布尼奥罗国家影响最远的地方，直到肯尼亚西部。那里的一些首领人物，也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布尼奥罗。

布尼奥罗文明的光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了它的四邻。这种影响以波浪式向远方扩散，逐渐减弱。在布尼奥罗文明的启迪下，其周边社会在17—18世纪中加快了组织化、集中化的国家形成过程。而随着周边诸社会的发展和壮大，布尼奥罗对它们的控制与影响也逐渐削弱。首先是遥远的东南方国家卡拉圭，不再受制于布尼奥罗。这个国家本在17—18世纪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湖西南方最大的国家。它的周围，也像布尼奥罗的情况那样，环绕着许多小邦，如基济巴、恰穆特瓦拉、布津加、基萨卡和卢旺达等等。其次，东方的布索加地区也摆脱了受制于布尼奥罗的运行轨道。后来，连内圈的安科累和布干达也因国势日强而与布尼奥罗屡屡冲突。布尼奥罗对它们的壮大无能为力。

布尼奥罗逐渐由盛而衰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文明程度尚处在发展较低阶段的古代国家，它只是一个松散的王权。在布尼奥罗国家实体的四周，有着一连串受其直接控制的附庸小国或部落群体。在这个内圈附庸之外，还有一个间接受其影响与制约的外圈国家或部落群体。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社会组织程度的制约，布尼奥罗对其周边地区上述那种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力必然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尼洛特人游牧遗风的影响，而布尼奥罗的行政管理松弛，对被征服者羁縻不力，很多贡赋收不上来，在经济上常常只是一付空架子。这样，随着周边社会文明化的发展，它们对布尼奥罗的反控制力必然日趋强化，并同布尼奥罗有限的控制力发生冲突。其结果，这个组织松散的王权，从外圈到内圈必然发生连锁式的崩塌。

转引自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2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vol.4，p.472.

附庸圈的崩塌，又同布尼奥罗自身固有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布尼奥罗王位继承问题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争端。这种内讧给周边地区的起义和反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有时，争夺王位的一方向附庸圈国家寻求支持，从而触发了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更加桀骜不驯，甚至称兵作乱。有时则反之，征讨反叛军事活动的失利，触发了潜伏已久的王位争夺危机。

促成布尼奥罗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它对东非沿海与内陆湖区之间商路贸易的失控有关。从地理上看，位于阿尔伯特湖东畔的布尼奥罗，直接向东穿过肯尼亚高地到达沿海的蒙巴萨和马林迪，是距离最近的理想商道。但由于居住在肯尼亚高原上的尚勇好武的牧民马赛族的阻碍，商旅视为畏途，因而从湖区通向沿海的长途商路实际上要绕一个弯道，向南经塔波拉，越过今坦桑尼亚中部而达沿海。这样一来，大部分商路贸易的经济利益就容易被南方那些原来附庸于布尼奥罗的国家、特别是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的后起之秀布干达所攫取。其结果，直接造成了布尼奥罗与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

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布尼奥罗对周边地区用兵连遭挫折，这标志其国运由盛转衰。当时，南方诸附庸国地区发生动乱，布尼奥罗自身政治上也不稳定。国王尼亚尔瓦被土瓦一世杀害。夺得王位后，土瓦一世率兵征讨反叛的卢旺达及其以西地区，也在战斗中身亡。溃败的布尼奥罗军队又遭到安科累统治者恩塔雷二世的偷袭，竟然全军覆没。土瓦一世死后，在新王温尼三世继位之前，女摄政王之夫马萨姆巴又曾企图篡夺王位。在此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布尼奥罗国家几乎无暇顾及它的周边地带。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南部地区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并在这一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称雄一时的新国家姆普罗罗。在卡哈亚·卡穆拉里和卡哈亚·鲁廷丹吉济父子两代国王的锐意经营下，姆普罗罗迅速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大国，在 18 世纪上半叶，其疆土曾从今日卢旺达之一部直抵布尼奥罗本部。当姆普罗罗瓦解后，安科累又乘机兼并，国势大增。与此同时，布干达更以横扫群雄之势崛起于湖区。

布尼奥罗国家的力量，相当程度上来自它对南部盐、铁产区的控制与影响上面。随着对南方的控制的削弱与丧失，布尼奥罗国势不断滑坡。为了求自存的需要，它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北方，企图从北方获得近代化的火器，以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南部商路已被布干达所控制，布尼奥罗与北方喀土穆来的奴隶与象牙商人建立了联系。布尼奥罗向喀土穆商人们供应大宗象牙和奴隶，用以换取枪支。国王本人就是最大的象牙所有主。据 1864 年访问布尼奥罗的萨谬尔·贝克记载，国王卡姆拉西还有价值数千英镑的未能售出的象牙。1869 年卡姆拉西死后，卡巴列加就依靠喀土穆人的武装力量，战胜了由布干达国王穆特萨支持的对卡巴吉米尔，夺得王位。但不久卡巴列加便与喀土穆人（实际上代表埃及人）闹翻。喀土穆人在布尼奥罗首都烧杀破坏，使这个湖区大国大伤元气。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戈登被埃及赫迪夫任命为苏丹赤道省总督，更对布尼奥罗造成极大威胁。

二、布干达国家的兴起

当布尼奥罗国家由于过度膨胀而对其广袤的国土逐渐失去控制的时候，一个具有新型政治体制的湖区强国却日渐崛起，这就是布干达国家。

布干达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它的居民是比较纯粹的班图人。“布”（Bu）在班图语系的卢干达语中是表示“国家”的接头字，布干达意为“干达国”或“干达人的国家”。干达人大约在15世纪迁来此地。他们作为班图人迁徙波中的后来者，与先到达这一带的班图人混合，建立起布干达国家。

根据口述传说，布干达的创立者本是布尼奥罗的王族出身。建国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干达仍是布尼奥罗的南方附庸之一。由于宫中有专司王国历史的史官，口授国史，代代相传，能够相当准确地传诵王室的世系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传说中的开国君主金图算起，至末代国王穆特萨二世为止，前后共计33个国王（称“卡巴卡”）；由于中间有几次王位承袭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因而一共是20代人。

从布干达立国起，它同布尼奥罗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阴晴不定之中。即使是在早期布干达国势尚弱的时候，它便不断同布尼奥罗发生摩擦与冲突。根据斯坦利记载的一则布干达的传说，在国王纳吉文吉（第八代卡巴卡）在位时期，布干达有一位勇敢的、神通广大的武士，名叫基巴加，有飞天的本领。当纳吉文吉同布尼奥罗人作战时，基巴加就飞到空中刺探敌情，并在敌人头上降下大石块，这则传说反映了早期布干达国家在同布尼奥罗斗争时尚处于弱势，因而寄希望于一种超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干达越来越强大。它先征服了东边的布索加，使其沦为纳贡的藩属；又向南征服了布杜；然后开始侵吞布尼奥罗南部边陲的地区。

布干达国家的明显扩张，发生在18世纪末叶。在第二十五位国王恰巴古之后，从大约1780年起，军朱和他的兄弟塞马科奇罗先后即卡巴卡位。他们成功的扩张，使布干达国势大盛。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除了布干达本身所具备的一些条件外，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布尼奥罗的行政制度不够有力，缺乏集权机制，难以控制过于广袤的国土；加之边界居民各族纷纷趁机要求摆脱布尼奥罗的羁縻，多向布干达请求援助。布干达遂迅速吞并了许多领土，甚至包括另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度安科累的土地，并进而南渡卡格腊河，使卡拉圭和基济巴（今坦桑尼亚境内）诸小邦变成自己的附庸。布尼奥罗和布干达之间形势消长的因素，可以从双方社会生产活动中寻找。布干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它可以让妇女、儿童和老人来照料土地，抽出大量青壮年男子出征作战。而布尼奥罗乃是养牛的社会，难以长期抽调大量精壮男丁从事战争。

到了国王松纳二世（1836—1860年在位）和穆特萨一世（1860—1884年在位）统治期间，布干达国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当时布干达国家的疆界，大致东起埃尔冈山，西至阿伯特湖，北接基奥加湖，南过卡格腊河。托罗和安科累均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受其制约的附庸。维多利亚湖中北部的岛屿也均在布干达王国境内。

1862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访问了正处于巅峰阶段的布干达国

Dohn N.B.Osogo, *op.cit.*, p.23.

Osogo, *op.cit.*, p.23.一说恰巴古为第二十七位国王，参见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上册，第293页。

根据非洲班图人、尼罗特人等黑人社会传统习惯，妇女不得从事放牧。

家。布干达的繁荣和富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在斯皮克眼里，进入王国境内以后，像英国驿道一样宽广和笔直的道路，穿过茂盛的草地，爬上起伏的群山，同所有邻近地区的崎岖小道形成了奇异的对照。居民的茅舍和花园也很干净、整齐，到处是一派宁静的美和井然有序的景况。当斯皮克接近首都（位于今坎帕拉附近）时，他对当地人民漂亮的衣着和外表感到惊讶。斯皮克写道：“同盛装的乌干达人比起来，我的模样显得很不好看。他们穿着整齐的树皮制的布袍，好像最好的黄色灯芯绒，褶皱笔挺，像浆过似的，外面还披上用小块羚羊皮缝成的东西作为上衣。我注意观察，它们缝合精致，英国手套工匠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头上通常戴着用相思豆串起来的头冠，上面装饰着磨得十分光亮的野猪牙、树枝做的护符，植物种子、念珠和贝壳；他们的颈项、手腕和脚踝，戴着其他木制护符，或塞满巫粉的小兽角，用细绳系住。这些细绳通常裹着蛇皮。”至于首都本身，巨大的茅屋布满了一座小山的整个山顶和周围山坡，屋顶铺得很精巧，屋子周围用乌干达大量生长的高高的黄芦苇围上篱笆。

布干达国家之所以能在湖区诸国中脱颖而出，领袖群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布干达拥有一套相当发展的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国王（卡巴卡）集全国军事、政治、财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除了掌握中央政权、统帅全国军队之外，又兼最高祭司、最高法官和全国土地的最高控制者。国王具有特殊的尊严，宫中经常燃着象征王权的圣火，只有在国王去世时才熄灭。国王死后身着树皮布服装，被保存在一种特殊的、纪念性的建筑物中。这种建筑物最初也是用泥巴与篱笆条建成的茅舍，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只有当快要损坏时才加以修整。但最后三位卡巴卡穆特萨、姆旺加和道逊·乞瓦的“纪念堂”与众不同，比较富丽堂皇，室内陈列着各种武器、鼓、木凳、珠饰、饮食器皿和逝者的其他个人用具。这一情况似乎表明，布干达国家的财力和卡巴卡的威权，从穆特萨开始是一个转变。而这一国家财力的猛增，国王对身后另一世界生活与权力的追求等种种变化，都同布干达卷入同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王死后，新王由王族和大臣们从诸王子当中选出。国王的长子一般不承袭王位，而是担任“契维瓦”，意为诸王子之长，专司监督诸王子之职。不过，这个规矩似乎也并不绝对。因为穆特萨的父王松纳就曾想将王位传给长子，而不传给穆特萨。但穆特萨最后还是当上了国王。这一事实表明，布干达的专制王权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尚未达到绝对程度，传统的遴选新王的办法仍占着上风。

同许多古代东方国家一样，布干达人创造这种专制王权，本来是为了在湖区诸国的生存竞争中用集权的力量站稳脚根、扩张疆域。然而，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结果常常造成国王的滥用权力。例如，雄才大略的穆特萨，同时又是一名残暴的君主。为了试验欧洲人展示的新式枪支的准确性，他竟下令扈从们由围观的群众当中任意挑选一名牺牲者充当活靶。

除了国王以外，整个王族也享有较大的权威。王太后和王后均享有相应的荣誉称号。卡巴卡的姐妹之一，不仅享有正式的宫衔（称“纳林尼娅”），

肯尼思·英厄姆：前引书，第8—9页。

Kenneth Ihgham, op.cit., p.46.

而且按照布干达社会的传统，被视为与卡巴卡共治国家的并肩王。这种并肩双王或同治女王的存在（尽管纳林尼娅的权力已成虚构），实际上反映了古老的军事民主制和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的存在，更赋予布干达专制王权以扭曲的形式。

在卡巴卡的亲自掌握下，布干达国家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这一行政体系带有明显的集权性质。

早期的布干达社会，也和其他班图人社会一样，经过由氏族组成最基层单位的阶段。全部土地均属各氏族所有。因而氏族首领在社会上享有重要地位。布干达国家建立之后，并没有简单地破坏这一套基层组织的形式，而是将它们沿用下来，仍作为最基层一级的行政组织。氏族的首领们现在作为该氏族的代表参加直至省一级的行政组织，成为省级委员会的成员。而省一级的大酋长们（称“萨扎”）和重要官员们（称“巴扎古”），尽管仍拥有传统的头衔，也行使一些传统的职能，但现在已是由卡巴卡直接任命的行政官员，即中央政权的派遣官吏。在氏族和省之间，还有一级小酋长。而在省级大酋长之上，则设有宰相（称“卡蒂基罗”），是国王的主要助手和顾问。

特别是第十四位国王卡特列加在位时，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卡特列加任命自己的军事将领们为驻新征服的原属布尼奥罗的地区首脑。这项改革使新被征服的地区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新征服的地区只是称臣纳贡，但政治上仍受其传统的统治者治理。这样，当征服者的控制或实力稍有减弱，这些地方极易发生反叛。改为布干达国王直接统治以后，不仅可以给布干达国家开辟更多的财源，而且为国王的忠实追随者们开辟了新的官位与晋升之仕途。这种新的官职由国王直接任命，其任期也全以国王的意愿为准。青年人如想出人头地，只要为国王效力，不靠家世荫庇，只要靠军功的积累，就能飞黄腾达。这样，新的军功官吏集团便应运而生。到17世纪末第十八位国王特班德克在位时，新贵族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国王的行动已不用征求传统的世袭贵族的意见了。到了18世纪，老贵族虽未被废黜，但在数量上已不如新贵族集团了。

19世纪，布干达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行政制度终于完成。当时，全国划分为十个省（“萨扎”），均由国王任命省长（“巴萨扎”）治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征集军队、收集赋税和征募修路的劳工等等。他们在各省虽拥有大权，俨然一方诸侯，但并非世袭，每年须有数月住在京城，一方面是参加国务会议，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尾大不掉。每省之下，又设有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其主管官吏也由国王任命。国王还不时派出官员到地方协助办理催征等事务。

在军事方面，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由于有着比较统一、有效的行政体制，布干达国家可以通过税额大致计算全国的人口，并根据人口数目来征集兵员。布干达还有一套很发达的“鼓语”，用以调动军队。各省负责维修道路，干线一般宽达四米左右，均与首都联接，便于军队的调动。在19世纪，布干达又通过深入湖区的阿拉伯人获得枪械等新式装备。穆特萨建立了一支6000人的常备军。有一次出征时，参加作战的战士竟达15000人，维多利亚湖中还有一支拥有300艘船的水师，其大船可载数百人。这些战船均由王家工场建造。当时的维多利亚湖，在一定意义上

已成为“干达湖”。

由于布干达位于大湖沿岸，境内又有数条河流，因此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有很好的条件。其南部盛产谷物和鱼类，布杜生产树皮纤维编织的布和服装；中部出产木料、芦苇和草制品。沿湖一带造船业与有关的手工业均达到相当水平。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上已使用贝币。

布干达的社会性质，尚待深入研究。苏联学者一般认为布干达已是封建社会，但在具体估计上有所不同。有的认为，19世纪下半叶封建关系成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早在18世纪布干达已开始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也有的学者主张，布干达尚处在奴隶制社会，如奥尔洛娃就明确指出：“布干达却与众不同，仍在盛行奴隶占有制”。

中国学者杨人梗认为，布干达所有制基本是不成熟的封建制。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国家全部土地属于国王，“巴汤哥尔”和“巴孔古”的土地只是大臣们职位的酬劳。虽然他们可以在这些土地上进行封建剥削，但是他们对于土地并无绝对所有权。这种非绝对的所有权一般也只限于终身而不能世传。而且，这类土地在全国只占极小一部分。布干达的主要土地占有形式是氏族公社所有制。家族领有的土地称“布塔卡”土地，居民称“巴塔卡”。布干达的农民主要是由巴塔卡组成的。布塔卡的土地已非纯粹的氏族公社公有制，而是由族长掌管，通过份地制而分给巴塔卡使用。在布塔卡土地上，族长可以利用其控制土地的权力而对巴塔卡农民进行轻微的封建剥削，但是族长对土地也并无绝对所有权，他不能把土地出让，也不能擅自把份地分给本部落以外的成员。国王可以随时征用土地。巴塔卡农民是公社居民的主体，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在耕种期享有使用份地之权。他们一旦迁出公社到别处去，就丧失原来享有的土地上的一切权利。与此同时，同其他湖区国家一样，布干达也相当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一般都是过去的战俘，大多属于王室和大小酋长所有。奴隶一般是在封建主和农民的农庄土地上干各种活，或在国王或酋长的宫廷、家内当仆役。奴隶具有宗法性质，可以同自由农结婚，他们的子女取得普通居民的权利。介于自由农和奴隶之间的，是被称为“巴科皮”的佃农，实际上是指一小部分因债务关系而被奴役的农民，他们清偿了债务就可以脱离封建主。

三、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内陆的影响

19世纪初，一个新的外来因素开始深刻影响东非内陆各族人民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就是阿曼素丹国在东非沿海的锐意经略。

原来，东非内陆广大地区虽然自古以来就与沿海地区存在着某种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但总的讲来，在18世纪以前，这种交流仍是很微弱的。东非沿海地区从纪元以来，就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各地，如阿拉伯半岛、红海、波斯湾、印度乃至远东，有着远较内陆为深的关系。东非沿海古代诸城邦的居民，大抵只同毗邻的内陆地区有所交往。向纵深的、更加遥远的内陆的联系，都是由内陆各族辗转相传的。而内陆居民也绝少长途跋涉、直接前往沿海地区。

“巴汤哥尔”是连土地上的农民一起封赐给大臣的土地，“巴孔古”是分给有公职的显贵使用的土地。
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0—471页。

沿海和内陆之间这种相对隔绝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终于由沿海地区形势的重大转变而打破。

1498年，达·伽马率葡萄牙船队在赴印度途中到达东非沿岸，开始了葡萄牙对东非沿海各城邦的殖民侵略。次年，在达·伽马从印度回航时，曾炮轰摩加迪沙。在此后十余年，葡萄牙殖民者对东非沿海城邦逐一武力征服，依仗自己船坚炮利，控制了自摩加迪沙以南直到索法拉的东非沿岸的重要城市和港口。葡萄牙控制东非沿海的目的，在于劫掠黄金、象牙，并企图在东方建立一个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殖民帝国。这个殖民帝国以印度果阿为中心，东非沿岸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590年以后，葡萄牙在俯瞰蒙巴萨海港的海岬上建立了耶稣堡，设军事指挥官统辖东非沿岸。

葡萄牙在东非沿岸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造成了东非沿海城邦的衰落。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1505年，阿尔梅达率2500名士兵和水手包围了基尔瓦，把那里的奴隶以及储存的黄金、白银和龙涎香当作战利品掳掠一空；随后又洗劫了蒙巴萨，大肆暴虐，以致男女老少甚至无辜幼儿都不免一死，抢去的战利品数量之巨简直无法言喻。遭受同样厄运的还有布腊瓦、桑给巴尔、索法拉等城邦。葡萄牙人在垄断了印度洋贸易后，破坏了古老的印度洋贸易网和传统的经济体制。例如，他们武力征服索法拉后，独占了原先运往基尔瓦和海外的黄金，给基尔瓦以致命的打击，也切断了与非洲内陆各族的联系。

葡萄牙殖民者的野蛮入侵，遭到了东非沿岸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1589年，马林迪城邦成功地击败了葡萄牙人的武装袭击，保持了独立。1631年，蒙巴萨谢赫优素福·哈桑领导人民举行反葡起义，他们在庆祝圣母升天节的集会上，刺死了耶稣堡的葡萄牙指挥官，宣布独立。进入17世纪中期后，东非各城邦纷纷与阿曼阿拉伯人联合，共同反葡。到1698年，经过长期围攻，阿曼终于占领了耶稣堡。从此以后，葡萄牙在莫桑比克以北的东非殖民势力不复存在。

在驱逐了葡萄牙人之后，阿曼素丹乘机建立起自己在东非的统治，在蒙巴萨、桑吉巴尔均派有总督和驻防军。从这时起，东非旧的沿海城邦陆续恢复，新的港口和城镇在东非滨海地带出现，如坦噶、巴加莫约、潘加尼等。这些城镇开始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它们同中世纪位于岛屿上的城邦相比，与内陆的联系更为密切。19世纪初，阿曼素丹赛义德·萨伊德征服了蒙巴萨，锐意经略东非沿海的领地，鼓励商业，大力发展同内陆的贸易。他派出许多支百人以上商队深入内陆，换取象牙等产品，贩卖奴隶。以此为始，大批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金融家那里贷得资金，组织商队，运送布匹、珠子、铜钱和枪枝弹药等迁入内地去换取象牙与奴隶。

从大的走向看，这些从沿海伸向内陆的商路可以分为三条。南路以基尔瓦为起点，中经瑶族等聚居地区，深入马拉维湖区各地，甚至越过马拉维湖区，一直进入中非铜矿产区；北路由汤加至乞力马扎罗地区；中路则从巴加莫约等地分别通往坦噶尼喀湖区各地，以及更远的腹地。其中有一条重要支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1页。

G.S.P.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东非沿岸史料选辑》), Oxford 1962, p.3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276.

线，从塔波拉折向北方，经由卡拉圭等地，直插湖区布干达和布尼奥罗诸国。塔波拉由此成为颇具规模的商业中心和贸易中转站。

由于尚勇好武的马赛人占据了肯尼亚广大地区，恩戈尼人北上引起坦桑尼亚南部地区的动乱，上述环境均不利于商队贸易，因而南北两支商路的安定与发展都受到相当的限制。只有中路比较安定和兴旺，推动了湖区诸国社会的发展。这样，在东非内陆地区呈现出中央超出南北两翼的不平衡状况。中路一线沿途各族对过境贸易均采取了鼓励态度，特别是尼亚姆维济更是保护商队、提供民佚与向导。因而中央商路从沙姆巴、戈戈、尼亚姆维济、苏库马、吉吉直到布干达，沿途各族都受到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经营的商业网的影响。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内陆各个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它使原来东非广大地区单纯内向的自然经济，逐步转变成一种锥型的、具有外向性的经济，至少是使它走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以这张商业网的主要输出口之一象牙为例，以前，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从东非内陆也向古代印度洋贸易网输出象牙，但由于主要的供应对象是东方诸国的宫廷和社会上层，需求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广大东非内陆各地人民来说，象牙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海外贸易作用，而是它在一般宗教仪式和装饰方面的用途，有的弃如敝屣，当作畜圈的围栏。那时向沿海输送的象牙，多半来自毗邻沿海的地区。即便有些来自遥远的内陆，也不是通过大规模长途贸易，而是通过短途辗转相传而获得。因此，古代东非内陆猎象一般多是偶然的、零星的活动，或者是为了获取食物，或者是为了不让象群践踏庄稼和伤害人民。有时与其称之为猎象活动，倒不如说是驱象活动更为贴切。当时，内陆各族一般均组织猎象专业队。每队大约 20 人，由受过长期、专门训练的人员参加。所以，一个青年要想成为猎象者，不仅先要获准加入专业队，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自从象牙成为一宗有利于可图的大生意以后，东非内陆的猎象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此时，从东非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输出的象牙，其主要市场已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近代欧洲。欧洲兴起一股“象牙热”，用象牙制造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从小装饰品和刷子柄、梳子柄、餐刀柄，直到钢琴琴键和台球，都盛行用象牙制作。一家餐具店，一年需购用 20 吨象牙。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家具流行以象牙精工镶嵌，刻意追求富丽堂皇。由于欧洲商人趋之若鹜，对象牙的需求陡然激增，越来越多的东非内陆人民被吸引到日益膨胀的猎象大军中来。原来的驱象—猎象活动，现在演变成一场场血腥的象群大屠杀，一种纯粹的、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业活动。特别是从沿海地区输入了近代化枪支以后，少数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可以从事这项活动，无须长时间的专业培训，更不用组织颇具规模、组织严密的队伍。这样，原先限于少数人的职业被众多人的卷入而突破，原先的猎象专业队伍纷纷趋于解体。为了贩卖象牙、牟取高利，猎象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扩展开来。人们为了追踪象群，往往突破族与族、邦与邦之间的界限，深入到以前极少去过的、遥远的内陆地区。

象牙贸易甚至影响到湖区北部。例如，在布尼奥罗北部的帕尔沃人社会中，就曾专门建立过一种名叫阿里戈的类似行会或行邦的组织。这种组织的

主要任务，就是为外面来的阿拉伯和尼亚姆维商人获取象牙。阿里戈组织甚至可以规定价格、决定新成员的征募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远征。当火器大批传入后，人们改换方式，进行单人狩猎，阿里戈行会的垄断遂被打破，组织本身也终于衰落、瓦解。在布干达，国王不仅靠攻击弱小邻邦而夺取象牙，还建立并维持了一支专门为国王提供象牙的狩猎队。可见。内陆社会在“象牙热”波及之处，从上层到下层被注入一种新的商品经济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根据其财富与能力，纷纷投入这项新兴的贸易中去。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还大大刺激了东非内陆社会的商业活动。东非当地各族人民现在不仅被商品经济的观念支配着去从事猎象等活动，而且还直接投入商业活动。原来那种短途的、辗转传递式的贸易，逐步被长途贩运所取代。这种非洲人的长途贩运活动，已成为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一部分。例如，在尼亚姆维，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青年们都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种长途贩运活动。下层群众充当脚伕、向导，而上层人士则担任商队民伕的招募人。长途贩运活动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造成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前往沿海地区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凡到过沿海的人，都被看作是见过世面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与羡慕，常常被邀请去介绍他们的一路见闻和经历。一个青年如果不运送一趟象牙到沿海，并带回那里的布匹、铜线等物品，就不能成婚。据估计，在 1890 年时，大约有 1/3 的尼亚姆维的成年男子都到过沿海地区。照此向前推算，在 1860 年代高潮时期，投入这项商业活动的人想必可能更多。在尼亚姆维的统治者和大小酋长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象牙，其中有的是狩猎所获，也有的是征收的贡品和接受的馈赠。他们的经济身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伙大大小小的象牙贸易商。所以，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从尼亚姆维组织的前往沿海地区的商队数量，已反超从沿海前往内陆的商队，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建立的商业网，随着向内陆纵深的扩展，同时也迅速地染上了浓郁的非洲本地色彩。

象牙贸易对东非内陆整个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所到之处，唤起了非洲内陆各族人民对来自欧、亚各地的商品的浓厚兴趣与需求。为了获得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非洲人不仅要深入原始密林猎取更多的象牙，还千方百计扩大自己能够提供交易的新物品品种。同时，沿海与内陆的交流，使内陆各地区之间彼此增进了认识与了解，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了互通有无的需求。例如，沿海和内陆许多地区对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阿拉伯商人和尼亚姆维当地的商人就前往内陆铁器产地，如盛产铁锄的萨姆布瓦和津扎等地，大量收购，运往其他地方和沿海一带。这一商业活动促进了内陆许多族铁器应用的推广，从而推动了生产和社会的进步。盐的贸易也是如此，由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刺激，爱德华湖区的盐产地卡特韦和基辛尼一带的食盐贸易也发展起来。这里的盐质地优良，全年均可生产，并距离铁产地较近，因而四面八方均来此交易。

除了盐、铁之外，其他农、牧、副业的产品也受到刺激。随着商队活动的急剧增长，卷入商业网的人数越来越多，商路上的行商络绎不绝。在一些重要的枢纽地点，逐渐发展成定期的贸易集散地和永久性的市场。大批人聚居于此，在座商体系的发展中寻求新的生计。一般说来，内陆的商业活动首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p.282-28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vol.5 , p.284.

先要得到商路所经过的各地的统治者的支持。因此，那些强大的国王和酋长的首府或驻节地也就最容易发展，从以往单纯的政治中心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那些强有力的国王们，如布干达的穆特萨等人，都企图垄断贸易。在他们的首都，商业中心——市场一般都紧邻着王宫。这样，一批商业意义上的市镇兴起了。例如，在尼亚姆维济广大地区，聚居千人以上的市镇如乌兰巴、伊纳拉等，渐渐如星罗棋布。塔波拉更从一个市场中心和商路枢纽一跃而成为东北内陆地区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城市，到 19 世纪下半叶，人口已逾 20000 人。东非内陆强人米兰博的据点乌连库鲁，人口也达 10000 人，另有 5000 人聚居城外。米兰博所控制的另一个较小的据点，在 1870 年代时也有居民 4000 人。内陆其他地区，如帕尔沃·查加、布干达等，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种“城市化”的早期征兆。在这些小小的商业、市场中心，各种物品的吞吐如潮水涨落。在这些地方，聚着来自卢旺达的豆类、蜂蜜和高粱，来自安科累和托洛的小米，来自布干达的干香蕉和树皮布，来自布干达和卡拉圭的咖啡，来自卢旺达、姆普罗罗和安科累的皮毛，等等。

这样，越来越多的非洲内陆人民卷入上述活动。他们不仅贩运和买卖商品，而且还直接消费商品。在那些人口逾千上万的商业中心里，聚居着商人、民伕、匠师，不仅其个人与家庭生活完全有赖于从各地聚集来的消费品，而且那些商队更需要大量的粮食及其他消费品，除了日常所需之外，还要备足长途跋涉必需携带的各种物品。例如，从尼亚姆维济到东非海岸，要经过空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和贫瘠的戈戈地区。所有上述这些需求造成了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而粮食价格的上涨则吸引着农民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大商人们自己也经营农庄，使用自己的奴隶、仆从耕种。这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将原来的沼泽地也开发为种植大米的良田。在湖区，香蕉、马铃薯、甘蔗等作物的生产也均有明显增长。

同猎取和输出象牙一起进行的，还有奴隶贸易。19 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贸易的罪恶活动从西非转向东非。西方殖民主义者这一时期在非洲东海岸进行贩奴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利用正在活跃、发展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至少，我们可以说，从奴隶贸易这一角度看，东非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在将东非内陆非洲人的商业活动变为自己网中的附庸的同时，它本身也落入了一张更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贸易网之中。

19 世纪东非的黑人奴隶贸易，仍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规模。不过，毕竟由于产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势，它比起以前的西非黑奴贸易还是小巫见大巫。在英国海军封锁、检查的制约下，不少奴隶未能远运海外，而是就地吸收。就地吸收的奴隶分为两类：一类留作家内奴隶，另一类则沦为种植业生产奴隶。这是东非奴隶贸易兴旺的一个特色。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中的奴隶贩卖活动对东非内陆地区的影响，客观地看，比西非更复杂。在总体认识——即这项贸易是一项罪恶的、破坏性的活动——的大前提下，似应区别情况，作出一个具体的分析。

在那些主要是猎奴对象的地区，奴隶贸易的作用同此前西非地区的情况一样，表现为破坏性的后果。这类地区，在东非内陆，主要是一些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坦桑尼亚东南和西南地带，以及湖区诸国的北方与西南方。猎取和买卖奴隶的活动，使这些地区动乱不已，有的甚至到了无政府状

态。从落后滑向更落后，就是这类地区恶性循环的命运。

在另一类社会，如尼亚姆维济、戈戈等，由于在猎捕和贩卖奴隶的活动中充当掠夺者，因而可以获得奴隶或贩奴的利益。特别是发展成了奴隶种植园的地区，由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商品经济反而有了增长，尤其是种植丁香等经济作物的地区。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广大内陆社会影响，还体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

在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湖区国家布尼奥罗的衰落与布干达国家的崛起，同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某种关系。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正式形成是在 19 世纪。但早在 18 世纪，它已处在酝酿、形成阶段。18 世纪末在位的国王朱与塞马科里克统治时期，布干达向南方和西方的扩张就很难讲与经济目的无涉。上述两个方向，恰好同控制基济巴和卡拉圭通往东非内陆中央商路以及控制盐湖区相吻合。布干达人对库基的扩张，也带有这种性质。它不仅仅满足于向那里征收贡赋，而是派人在库基的宫廷里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派教官培训和控制库基的军队，逐步将这个部族的经济从放牧型转变为如布干达那样的农业经济，到 18 世纪末终于将其吞并。南方另一个国家基济巴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在 19 世纪成为布干达的附庸。布干达利用基济巴为基地，进一步控制和瓦解卡拉圭等地。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布干达已成为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无争议的霸主。在促使它向这一方向扩张、争霸的诸多因素中，控制商路、获得火器、掌握象牙贸易大概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样，向西方湖区盐产地的推进，也带有这种动因。在这一方向上，姆普罗罗在 18 世纪时还相当强大，但到了 19 世纪已渐趋瓦解。相邻的安科累则颇为受益，乘机扩张，并向盐湖地带推进。究其动因，很可能也有控制通往基济巴商路的企图。这样，就构成了对布干达霸权的威胁。在国王松纳统治期间（1824—1860 年左右），布干达军队也入侵盐湖地区。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内陆各族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首先，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兴旺发展，促成了东非内陆各族人民同沿海地区人民的交往与融汇，也促成了内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融汇。大批沿海和内陆各地区的商队，沿着各条商路的干线、支线、直至山野小径，穿梭于沿途各社会的市镇和村落之间，造成了规模虽不及民族迁徙，但影响却不亚于这种迁徙的人口流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商人同内陆各社会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事业的发展，这些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们一般都要同内陆各族首领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他们大都选择居住在王宫附近，主动纳税，并不断对大小首领馈赠各种礼品，进而利用自己的财富、知识与经验帮助这些统治者与他们的内外敌人斗争。他们常常娶国王或酋长之女为妻，进入或半进入当地社会的统治集团圈。在上述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内陆各族的统治者和上层率先吸收沿海的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文明。通过上层的榜样与提倡，外来的沿海文化获得了有利的生存与传播环境。例如，伊斯兰教也伴随着来自沿海的商队深入内陆，甚至在遥远的布干达宫廷也曾一度获得成功，使国王穆特萨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倾向伊斯兰教。

人们的社会地位即社会层次序列，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在传统的东非内陆各社会中，谷物拥有者、猎人和巫医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有着很大

影响。这种社会地位的层次序列，是由传统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同沿海地区较大规模商业往来局面打开之后，人们有了通向富裕、见识与技能的许多新的机会。随着一批新的致富职业的兴起，新的社会地位序列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序列。商人集团在内陆各族社会中崛起。他们拥有华美的房屋、大量的谷物、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舶来品，特别是许多随从和近代化火器。这样，新的商业暴发户不仅拥有了财富，而且拥有了势力，成为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这个集团的兴起既然依赖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活动，他们的胸怀与目光也就自然向着沿海、向着先进的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文明。他们那令人歆羡的经历、财富和地位，自然使他们成为沿海斯瓦希里——阿拉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

随着沿海至内陆商业活动的扩大，内陆人民的生活方式、乃至消费心态和情调都在静悄悄中改变了。舶来品大受欢迎，成为内陆各族、社会各层次人民的抢手货。本地产的土布、皮毛，已让位给时髦的进口衣装、帽子、伞等等。探险家伯顿在 1860 年代到东非内陆探查时，就曾亲眼看到上述变化。在布尼奥罗北部地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已反映在其衣著上面。社会上层人士平时都喜欢穿舶来品服装。他们的妻子带着金手镯。每逢重要的场合，人人都身穿进口服装；穿当地土布衣服者，竟不得进入活动的中心地区。在布干达，国王和显宦们也爱穿外来的服装。穆特萨本人从头到脚穿一袭白色长袍。他的宰相也穿着阿拉伯服装：上等棉布的白色长袍，外面罩一袭锈金黑袍。甚至连王家侍从们都穿阿拉伯服装。东非内陆北部地区受外来影响最弱的马赛人，也用他们的皮毛交换外来的棉织品、铜圈、珠圈等等。

在建筑艺术方面，沿海的长方形房屋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圆形茅舍。这种斯瓦希里型的茅舍，逐渐在内陆地区推广开来。

第七章 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封建分裂时期

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的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地区，是古代非洲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麦罗埃和阿克苏姆文明光彩绚丽，不仅在当时声名远扬，而且垂之后世，对这一地区后来的历史进程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中世纪时期，当伊斯兰文明乘阿拉伯帝国崛起而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并向南扩展之时，这里仍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片绿洲。在东苏丹，马库拉、诺巴和阿勒瓦三个黑人基督教国家继续繁衍着自己的基督教文明，遏制伊斯兰教向南传播达数百年之久；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王国，也在赓续它千年一贯的文明，成为基督教在非洲的骄傲。

然而，从15世纪以后，两大外来因素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

一个因素是伊斯兰教势力大规模的渗透与入侵。崛起于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伊斯兰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同它南面的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明发生接触和碰撞。最初，这种接触和碰撞的媒介可能多限于流动性较强的穆斯林商人和牧民。渐渐地，随着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穆斯林世界政治、宗教斗争形势的变化，较大规模的移民集团也开始向这里转移或避匿。这种渗入与移民，自然会影响当地原有居民，使之伊斯兰化。东苏丹地区原有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同时从历史渊源上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埃及文明潮流的冲击与左右，因而更易于伊斯兰化。穆斯林王国逐步取代了基督教诸王国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居民构成、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生了从基督教文明向穆斯林文明转轨性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使伊斯兰教势力圈大大向南推移，逐渐将东、西苏丹地区伊斯兰教文明连成一片，呈带状横贯撒哈拉及其以南非洲大陆。在埃塞俄比亚，由于当地原来基督教文明发展程度较高，两种文明的撞击就必然地采取了异常激烈的形式——大规模的、以宗教为旗帜的战争。红海西岸较早建立的一些伊斯兰教邦国，如伊法特和阿达勒等，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与千年基督教王国埃塞俄比亚展开了长期、殊死的厮杀。结果是两败俱伤，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无论是东苏丹还是埃塞俄比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的冲突，同时给这片广大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居民的流动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机会。各族的流动、混杂、冲突与融合，为日后近代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初步的条件。

另一因素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渗透。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等国，以早期殖民主义的形式向这里渗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像在美洲印第安人和西非、南非一些黑人地区那样为所欲为。但通过这一段的接触与渗透，它们了解了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为以后的进一步侵略和扩张打下了基础。在某些地区，如埃塞俄比亚，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已经加深和扩大了那里各种内外矛盾与冲突。

一、伊斯兰化的东苏丹地区

13—16世纪初，东苏丹地区处于急剧变化时期。这一变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渗入、发展、直至占居统治地位。

1276年，著名的马木路克君主拜尔巴斯派兵讨伐马库拉基督教王国。从此以后，业已衰颓的马库拉王国逐渐沦为马木路克王朝的附庸。1315年，马

木路克王朝将一个改宗伊斯兰教的马库拉王子扶上王位。1317年，著名的栋古拉大教堂又被改为清真寺。这两桩事件，标志着基督教的马库拉终于蜕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这一明显变化，并不仅仅是由于马木路克挟势干预所致，而是东苏丹地区居民构成和社会状况长期变化的结果。阿拉伯人游牧部落、穆斯林商人和在埃及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者，一股股涌向南方，寻找自己发展的新天地。进入东苏丹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多数来自上埃及地区，也有一些直接来自阿拉伯半岛。他们大约在14世纪到达阿特巴拉河与青尼罗河之间；15世纪到达青、白尼罗河交汇的杰济腊地区，直至定居在散纳尔及其以南地带。另一股移民潮从偏西南下栋古拉地区，然后继续向南推移，于14世纪占领尼罗河以西至达尔富尔北部的游牧地带，饲养骆驼和羊。后来的移民集群，更越过这一地区继续南下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南部地区，在那里牧养牛群。这东西两股强大的移民潮，第一股使苏丹北部地区、特别是尼罗河第四瀑布至第六瀑布之间广大地区的原有努比亚居民受到深刻影响。在彼此接触、融合过程中，努比亚原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并且假称自己拥有著名的阿拉伯家族世系，成为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了的努比亚农民、工匠和商人。第二股则与苏丹南部地区原来居民融合，成为非洲化和苏丹化的阿拉伯人。除了上述两大股以外，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进入东苏丹地区还有一条渠道，这就是从西北非穿越撒哈拉、沿着古老的撒哈拉商路而来。

从整个东苏丹地区观察，该地区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它大致由北向南，呈渐次减弱趋势。由于移民一般都是小股进行，所以很难标明清晰的编年史。这一广大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应以最后一个基督教王国阿勒瓦的灭亡为标志。但由于上述原因，很难探究这个国家式微的详情。只是其首都苏巴的陷落，大致可判断在16世纪初期。

正当此时，一个新的居民成分——丰吉人，进入并占据了东苏丹地区历史舞台的中心，给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于丰吉人的溯源，目前各种假说扑朔迷离，难有定论。根据一些传说中的蛛丝马迹推测，这支以饲牛为业的牧人来自南方，可能是由青尼罗河上游沿河放牧，逐渐迁徙到中下游散纳尔地区。1504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伊斯兰教丰吉素丹国家。据犹太人探险家大卫·柳比尼的记载，当他于1522—1523年穿越这一地区时，丰吉开国之君阿玛拉·丹卡斯尚健在。作为黑人君王的阿玛拉，拥有一个尚不太开化的宫廷，治理着丰吉素丹国家，统治着黑人与白人。散纳尔虽已是重要的地方，但该国首都拉穆尔（或拉乌尔）则大约位于更南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测，在丰吉人到来之前，散纳尔地区已经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3, p.76.

Yusuf Fadal Hasan, The Penetration of Islam in the Eastern Sudan (《伊斯兰教在东苏丹的渗透》),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edited by I.M.Lewis, 1980, pp.113-11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40.

P.M.Holt, Funj Origins: A Critique and New Evidence (《丰吉人的起源：评论和新证据》),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1 (1963), pp.39-55.他倾向于认为丰吉人起源于加得姆-博尔努。

Robert Cornevin, 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Noire 《黑非洲人民史》, Paris 1960, pp.518-519.

据柳比尼记载，此王城距散纳尔有八天路程。p.M.Holt & M. W.Daly, A History of the Sudan (《苏丹

是阿拉伯移民与当地原有居民杂居的地方。来自青尼罗河上游某地深肤色的丰吉牧民，受到该地区较为先进的文化影响，渐渐伊斯兰化，并定居立国，成为农业民族。但在立国初期，这一新来的征服者宫廷尚处在伊斯兰化的早期阶段。

丰吉人定居、立国于散纳尔地区，显然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同早先抵达这里的阿拉伯人或半阿拉伯人移民之间，乃至同当地原来居民集团之间，肯定要经过一番疆场厮杀和折冲樽俎。据丰吉编年史和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布鲁斯的记载，1504年，阿玛拉曾在杰济腊地区同阿拉伯人首领瓦德·阿吉布作战，迫使后者归降；阿玛拉曾联合一位阿拉伯人首领阿布杜拉对当地人作战，并任命阿布杜拉为以卡利（位于尼罗河主流上，距前阿勒瓦国家首都苏巴不远）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统治者——谢赫。阿布杜拉的传说，则描述他是一位勇敢的穆斯林武士，并拥有阿拉伯高贵世系，是他击败了阿勒瓦基督教国家，并占领其首都苏巴。上述记载都表明，在丰吉人与先定居于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移民集团和当地原来居民之间，有过一个冲突与联合的过程。其大致的发展轮廓应该是：阿拉伯移民集团在羽毛丰满之际，于15、16世纪之交，灭掉了阿勒瓦基督教王国，充当了完成东苏丹地区伊斯兰化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者。然而，看来他们不敌新来的丰吉牧民的悍勇，只得向后者屈服。但丰吉人一来难以彻底驱逐或消灭阿拉伯移民集团，二来歆羡其较高的文明，三来也欲借重这支力量巩固自己新近在地区建立的统治，因而在该集团屈服之后，采取一打一拉政策，与之联合，征服当地土著，并给以北方半独立的控制之权。

在上述三大居民集团关系最终确立后，丰吉国家的统治者遂定都散纳尔。大约1616—1644年在位的君主鲁巴特，在散纳尔建立了清真寺。这表明，丰吉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迅速接受穆斯林文明，丰吉国家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非洲风格的伊斯兰教素丹国。丰吉统治阶级已居于城市，治理国家。那野蛮、蒙昧的如烟往事，业已被这个虔信古兰经的统治集团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迷失了。

在丰吉国家的北部地区，阿拉伯移民集团的首领阿吉布或阿布杜拉家族统治着大片依附于丰吉素丹的、半独立的地区。它的首府从卡利迁至哈尔法亚。

丰吉素丹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建立在多层次的、分散的附庸小邦基础之上的中央王权国家，并实行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在该国起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丰吉素丹的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区，以散纳尔为中心，向北延伸至杰济腊一带，向南则溯青尼罗河而上。素丹的官员们在那里直接征税，其中有些地方由素丹派遣王室成员管理。在杰济腊北部的尼罗河主流一带，阿布杜拉家族享有世袭谢赫的头衔，地位相当于丰吉素丹国的副王，实际上是这一大片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素丹也向这一地区派遣王室成员加以节制。在素丹和阿布杜拉家族麾下，各自又都有一些附庸小王，他们大多统辖着一些边远地区。有的直接从属于素丹，有的则是谢赫副王的附庸，通过副王间接臣属于素丹

史》），London & New York 1988，p. 29.

Holt & Daly，op.cit.，pp. 29-30.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4，p.41.

但是，非穆斯林因素仍一直保持着。如登基大典就颇不按穆斯林规矩。Holt & Daly，op. cit.，p. 32.

。这些附庸小王也是当地望族。1561—1576 年在位的素丹达金所颁布《丰吉法典》，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试图将丰吉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秩序固定下来。

丰吉素丹对各地附庸小王、特别是北方副王的宗主权，构成了素丹国家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基础。这种宗属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中央和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在这方面，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家族的问题最为突出。在开国君主阿玛拉之后，人们只知道十位君主的名字和在位年代，至于他们的事迹则鲜为人知。然而，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之子阿吉布·阿尔·卡法塔的业绩却喧宾夺主，广为流传。在第一代谢赫阿布杜拉去世以后，丰吉素丹阿玛拉二世（1557—1568 年在位）任命阿吉布·阿尔·卡法塔继其父为北方副王。谢赫阿吉布被描绘为一位杰出的穆斯林统治者。他任命法官，资助圣徒，发动圣战。17 世纪初，当丰吉素丹阿布杜拉·阿尔·卡迪尔二世倾心于基督教、并接受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苏森尼奥斯的宗主权时，阿吉布毅然起兵将其废黜，并迫使他流亡在外。这以后，直至素丹国家衰亡，阿布杜拉家族曾多次卷入国家重大的内部事务之中。

王室内部同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卡迪尔二世被阿吉布赶下台后，逃亡到距埃塞俄比亚边境不远的切格拉。王室另一成员，卡迪尔二世的兄弟阿德兰举兵反抗阿吉布，双方在 1611—1612 年激战于库吉拉。阿吉布兵败被杀，其子北逃栋古拉。然而，阿德兰获胜后，又被卡迪尔之子所废黜。

丰吉素丹国是一个穆斯林君主国。伊斯兰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当丰吉国家建立并逐步繁荣之后，吸引了许多高级宗教人士和圣徒聚集到这里。如伊德里斯教长、哈桑·瓦德·希苏纳教长，以及塔杰丁·巴哈里，等等。这些圣徒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和其他穆斯林地区，一般拥有或宣称自己拥有显赫的世系。无论是素丹朝廷，还是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家族的宫廷，都热心鼓励和欢迎他们的到来，并给予优渥的礼遇。其目的想通过这些圣徒的来临与活动，促进国家伊斯兰化，用强化的神权和伊斯兰精神、文化生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些来到丰吉的圣徒们，不仅传播伊斯兰文化，而且因其地位、影响而拥有政治上相当的权力。他们的向背往往对政局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常常在调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圣徒们也很活跃。由于这些圣徒在游牧部落中的威望，他们能够成为商路的庇护者，使之免受游牧诸部的袭击，保障商路的畅通与安全。借此机会，他们自己也直接插手商业活动，成为大商人。据记载，圣徒马贾希布就是尼罗河至苏瓦金商路的保护者。另一位圣徒、生活在 17 世纪中叶的哈苏纳教长，也是一名大牧主兼大商人，他以青尼罗河东岸为中心，将大批马匹贩往丰吉各地，甚至远销达尔富尔以西。

丰吉素丹国同许多古代国家一样，国势长消不定，难有明确、固定的边界。大致讲来，从埃塞俄比亚边境沿青尼罗河而下，直至尼罗河第三瀑布，

丰吉素丹国的中心区在青、白尼罗河之间，而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常常仅限于征收贡赋。Richard Gray,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dan, 1839-1889* (《南部苏丹史》), Oxford 1961, p.2.

素丹在丰吉称“马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p. 42-43.

迈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17 页。

丰吉国家颇依赖于从红海通往达尔富尔、瓦达伊和博尔努商路的兴旺。Gray, *op.cit.*

可以看作这个国家的中轴线。其疆土自这条轴线向东西两个方向伸展，在早期国势较强时，丰吉国家的统治者们着重向西扩张。例如，1550—1558年在位的卡迪尔一世就曾向西用兵，征服了散纳尔地区以西杰贝尔·摩亚和杰贝尔·萨卡迪两山区的土著统治者。巴迪二世（1644—1680年在位）将自己的征服战争继续向西推至白尼罗河东岸的阿莱斯（今卡瓦），并将此地作为丰吉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在平定这一地区以后，巴迪二世继续向尼罗河以西扩张。丰吉远征军穿越科尔多凡地区，一路降服了许多穆斯林小邦。

由于丰吉国家内部有许多部落、民族和被征服的小邦，国势又长消不定，因而难以对其社会性质进行简单的概括。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受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封建文明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业已阿拉伯和伊斯兰化了的统治阶级，在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中后期显然已经封建化了。他们对于自己治下的农民、牧民实行的剥削，已经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关系。但是，这种封建关系带有某种外来性。它势必要与东苏丹地区原有的社会状况，即更为落后、原始的社会状况相结合，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因此，这一非洲的伊斯兰封建文明，含有相当复杂的、其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如原始社会的残余、奴隶制占有形态等等。在丰吉国家的南部与西部广阔地区生活着许多发展水平更为低下的非洲各族黑人，使丰吉人拥有丰富的奴隶来源，因而在丰吉国家可以看到相当普遍的奴隶占有制现象。

在丰吉国家，统治阶级蓄奴不仅十分普遍，而且数量惊人。丰吉素丹本人就拥有 8000 名奴隶，他们在杰济拉肥沃的土地上为他耕种土地，放牧牲畜。有的贵族之家蓄有数百女奴。前面讲到的圣徒哈苏纳，不仅拥有奴隶卫队，而且拥有自己的奴隶村庄。不仅统治者拥有奴隶，商人、手工业者甚至丰吉的农民也有自己的奴隶。奴隶除了在家内供驱使外，还用来从事农田、牧场的生产劳动。奴隶买卖更是司空见惯。1699 年访问丰吉首都的法国医生夏尔·蓬塞，就在集市上看到身强力壮的奴隶售价 10 埃居（135 美元）。除了在国内市场上买卖奴隶外，丰吉人还将奴隶输往国外。丰吉素丹就是这种奴隶输出贸易的组织者与垄断者。每年由尼罗河上游河谷地区出发的奴隶商队，将千名以上的奴隶贩往埃及。贩奴贸易的收入，成为丰吉素丹的一项重要财源。

对外扩张战争是丰吉国家奴隶的主要来源。丰吉远征军向西征讨，就对沿途臣服的诸邦或部落征收奴隶作为贡赋。这些奴隶被安置在首都散纳尔周围专门建立的村庄，以拱卫首都。英国探险家布鲁斯曾亲身探访过这些村庄。据他记载，这些奴隶村庄不断获得新补充的奴隶。这种奴隶村庄，似乎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奴隶兵制。它的存在说明，丰吉社会的奴隶除了家内劳务与农牧业生产之外，也用于当兵。但这种奴隶村庄的奴隶“兵”，与单纯的奴隶兵（丰吉素丹国和达尔富尔国家都有这种单纯用于作战的奴隶兵，一些丰吉大商人甚至拥有自己的私家武装——奴隶卫队）有所不同。奴隶村庄的奴隶，身份上已经发生某些异化，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准军事组织体制下的隶农。由此可以看出，丰吉社会中不仅含有多种经济形态，而且还存在着奴隶村庄这种中间或过渡类型的次生经济形态。不过，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55.

“这些村庄有些在散纳尔东边，有些在西边，恰似首都之屏障。” Holt & Daly, op.cit., p.3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44.

建化是丰吉社会发展的主流，所有其他形态和次生形态都处于受封建化制约与支配的地位，并朝着封建化演进。

丰吉国家的统治者除了要防范北方副王阿布杜拉家族和其他附庸小邦与部落的反叛以外，还要注意防范自己的武士们的异动。丰吉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布鲁斯访问该国时，就看到他们兵营整齐、马匹雄壮，战士们的武器有红皮鞘的阔背大刀、纯钢锁子甲和铜盔。事实上，丰吉族武士既构成这个国家的支柱，又构成对素丹的威胁。在丰吉的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武士叛乱。一次发生在素丹巴迪三世（1692—1716年在位）时期，这次叛乱由丰吉武士的指挥官阿明·艾尔达布领导，并得到北方副王阿布杜拉与阿莱斯总督的支持。素丹巴迪三世仅仅是靠了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骑兵部队才将叛乱镇压下去。由此可以推测，此前巴迪二世的远征很可能含有这样一个目的，即通过扩张战争获得战俘奴隶或贡赋奴隶，建立村庄这种准军事组织，并组织奴隶卫队，以此对日益膨胀的丰吉武士集团的势力加以制衡。另一次叛乱爆发在巴迪三世之子安莎三世统治期间。1720年，安莎三世被他的武士和人民所废黜。新即位的素丹努尔的母亲与旧王室有亲属关系，因而这次叛乱实际上改变了丰吉素丹的世系。

在努尔的短期统治之后，其子巴迪四世继位（1724—1762年在位）。这段时间，特别是巴迪四世亲政以后，丰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巴迪四世为了巩固自己和本家族的统治，拼命打击旧王室势力，大肆屠杀旧王室世系的亲贵，并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在旧的权贵势力遭到削弱的同时，外来奴隶士兵和来自科尔多凡的避难者组成了支持新王权势力，并成为新素丹的亲信，权势日炽。在新权贵集团的支持下，1743—1744年巴迪四世一举击溃了埃塞俄比亚大军的进犯。在埃塞俄比亚远征大军长驱直入、即将兵临散纳尔城下之时，丰吉军队从其背后实行突袭，埃塞俄比亚人溃不成军，连“万王之王”的皇冠等物皆成为丰吉人的战利品。这场战争之后，丰吉素丹国威望大增。消息传遍穆斯林世界，各国使节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埃及和摩洛哥的使节还常驻散纳尔。1747年，丰吉人挟新胜之威，又派遣远征军向科尔多凡扩张。结果先败后胜，在素丹巴迪四世任命的统帅穆罕默德·阿布·里凯利克率领下，终于占领了科尔多凡中部地区，将该地变成由里凯利克管辖的丰吉素丹的附庸。里凯利克由于在新区治理有方，被誉为善良而正直的统治者。

巴迪四世对科尔多凡的征伐，一方面固然是要扩展疆土，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一军事行动，将自己信不过的武装力量发往远方，消除自己身边的威胁。然而，他对待异己的残暴手段毕竟在内部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特别是他的勒索，竟加诸驻防科尔多凡的远征军军官的家庭，终于激成兵变。1762年，在里凯利克率领下，驻科尔多凡远征军擅自回师杰济腊地区。他们的反叛，得到素丹之子纳西尔的支持。里凯利克许诺事成之后，拥立纳西尔为丰吉素丹。在兵临城下的情势下，巴迪四世终于不战而降，被罢黜、放逐，最后遭到杀害。

新素丹纳西尔不过是里凯利克手中的傀儡。出身于当地尼洛特苏丹人世系的里凯利克，这时名义上是教长兼宰相，实则为丰吉国家的摄政，统治着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16页。

迈基·贝希卡：前引书，第19页。

丰吉国家的老区与科尔多凡新区。1769年，里凯利克索性废黜了纳西尔，并将其杀害，另立其兄弟伊斯梅尔为王。

此后，在摄政里凯利克家族和素丹家族的两大集团之间屡次发生冲突，宫廷密谋、战场厮杀接连不断。斗争的结果，摄政家族虽获胜，但整个丰吉国家却遭到极大削弱，首都散纳尔和另一座大城市阿巴吉都毁于兵燹。随着频仍的内耗，丰吉国势日衰，对游牧诸族的控制也大大削弱。科尔多凡地区趁机重新摆脱了丰吉人的统治。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不仅没有伴随国势衰颓而平息，反而更加加剧起来。在压倒素丹家族集团之后，摄政家族的内部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摄政们接二连三地遭到杀害。不是死于自己的兄弟，就是死于自己的子侄。每个靠谋害别人而登台的摄政，很快又成为另一次仇杀和篡夺的对象与牺牲

。国势的衰微，为自然灾害的肆虐打开了方便之门。1809—1810年，丰吉瘟疫流行，土地荒芜，人口锐减。1813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者到达散纳尔，对这个国家的衰败情况有了清楚的了解。丰吉素丹国的衰败，更加刺激了穆罕默德·阿里扩张的野心。1821年，穆罕默德·阿里之子、埃及远征军统帅伊斯梅尔率军南下，丰吉国家仍内讧不已，根本无力组织抵抗。素丹巴迪六世率众投降。展现在伊斯梅尔·卡米尔帕夏面前的丰吉首都散纳尔，竟几乎已是一片废墟。

当丰吉国家因内争而日衰时，其周边的附庸却获得一定的发展机会。北方副王阿布杜拉的附庸贾尔（或称贾里雍）的情况就是一例。这个本是丰吉素丹的二等附庸的小邦，由于南方散纳尔等大城市的衰落，其首府申迪竟日趋重要。根据19世纪初欧洲旅行家的目睹，申迪成为四方商队汇聚之处。这里北通埃及，从那里运来欧洲货物、香料和药品等，同时运去奴隶与骆驼；南面的散纳尔地区运来黄金和奴隶，西方的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地区运来大批奴隶和阿拉伯树脂，东面则从苏瓦金海港运来印度的纺织品。丰吉国家晚期东苏丹地区经济重心北移这一现象，更加加重了这一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部先进而南部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尽管丰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一度为打破这种不平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除了丰吉国家以外，在17—18世纪，东苏丹地区还存在着两个穆斯林国家，即达尔富尔素丹国和科尔多凡素丹国。

建国于达尔富尔地区的达尔富尔素丹国，大约从1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874年。创建这个穆斯林王国的是原来居住在杰贝·马拉地区富尔人孔贾拉部落的凯拉氏族。由于杰贝·马拉地区的战略位置优越，凯拉人王朝的素丹们控制了四周平原地区的游牧诸族。这个国家除了接受来自北非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之外，还接受了西苏丹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影响。许多从西苏丹地区赴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途经达尔富尔，给当地的政治、文化发展以积极推动，同时也给这里漫长的伊斯兰化历程打下了这样的印记：达尔富尔的穆斯林社会具有更浓厚的非洲色彩，而且保留了相当多的非伊斯兰成分，即使其王室也不例外。

Holt & Daly, op.cit., p.4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p. 49.

“四十天旅程”商队经常往来于埃及和达尔富尔之间。

起初，凯拉人王朝企图向西扩张。经过一系列不甚成功的战争，他们决定掉头东向。从素丹穆罕默德·泰拉布（1756—1787年在位）开始，达尔富尔素丹国重点东向经略。由于不断的侵掠性战争，达尔富尔素丹拥有大批战俘奴隶，并成为奴隶输出国家。1800年，它每年输出5000名奴隶。

在达尔富尔的东方，是科尔多凡素丹国。该国的创立者，是同杰贝·马拉地区富尔人孔贾拉部落的另一氏族穆萨巴阿特。这个氏族或者由于自然迁徙，或者由于同凯拉氏族的冲突失利，离开杰贝·马拉地区，辗转移居科尔多凡地区，并于18世纪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科尔多凡素丹国处于丰吉国家与达尔富尔之间，在三个穆斯林王国家中间势力最弱，而且左右强邻虎视眈眈，难以发展。1747年，科尔多凡素丹国一度被丰吉人所灭。但在丰吉国家内讧势衰之际，科尔多凡又乘机复国，并与企图征服它的达尔富尔人进行了长期的抗争。战争结果，达尔富尔素丹泰拉布获胜，科尔多凡素丹哈希姆·穆萨巴维逃往散纳尔避难。科尔多凡素丹国又落入达尔富尔人手中。

泰拉布死后，宦官库拉拥立阿布德·拉赫曼继位为素丹。他是一位能干的君主，虔诚而又博学。正是在他统治时期（1787—1801年），原来不断移动的达尔富尔王都终于固定在杰贝·马拉的东面，并成为永久性的都市。素丹还大力加强对外联系，与埃及、奥斯曼帝国甚至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建立联络。1821年，穆罕默德·阿里派其女婿穆罕默德·贝伊·库斯劳南征达尔富尔。由于尼罗河地区的起义和骚乱，这次远征无功而返。这一历史机遇，使达尔富尔素丹国的凯拉人王朝得以延续至19世纪下半叶列强瓜分非洲时期。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埃塞俄比亚

1497—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远洋船队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此时，陌生的印度洋贸易网正被奥斯曼帝国以及穆斯林世界形形色色的商人集团所控制。为了打破自己在这片广袤的海域和陆地的孤立感，葡萄牙人努力在东方世界寻求盟友。于是，12世纪以来流传在欧洲的关于“约翰教长国”的故事，就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就在达·伽马远航印度前后，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开始接触，使节互访。1520年4月，当埃塞俄比亚的使节、亚美尼亚人马修从葡萄牙返回时，葡萄牙舰队也派出一支分遣舰队，由唐·罗德里格·德·利马率领，在马萨瓦港登陆。

在这支葡萄牙分遣舰队之中，有一位随军神父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他的游记，成了近代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最早的确切记载。阿尔瓦雷兹记述

J.O.Sagay & D.A.Wilson,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1800-1975* (《现代非洲史》), New York 1980, p.22.

王都称法舍尔。Holt & Daly, *op.cit.*, p.41.

拉赫曼与奥斯曼素丹互相馈赠珍贵礼品。拿破仑接到拉赫曼的信后，致书素丹，要求供应2000名16岁以上的奴隶。Holt & Daly, *op.cit.*, p.42.

Robert O.Lollins, *The Southern Sudan, 1883-1898* (《南部苏丹》), New Heaven & London 1962, pp.3-4. 库斯劳一路烧杀，破坏严重。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177-180.

了埃塞俄比亚贵族爵位的等级与称号，以及宫廷斗争的失败者被囚于平顶山监狱的情况，还记述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情况，等等。这部于1540年问世的《出使埃塞俄比亚记》，是人们了解15—16世纪埃塞俄比亚社会的重要资料来源。

阿尔瓦雷兹笔下的埃塞俄比亚，当时正处在“所罗门王朝”（1270—1855年）的统治下。埃塞俄比亚皇帝，即“万王之王”，是这个非洲古老的基督教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其下则是控制着这个高原之国各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公、贵族。这些领主们平时向“万王之王”缴纳贡赋，战时则提供军队。“万王之王”还常常聘娶地方诸侯之女，通过这种政治婚姻来维系彼此的封建统属关系和权益、地位。“万王之王”还经常率领皇室与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及护卫兵员巡行各省，总数有时达数万之众。其目的一可就食四方，以减少贡赋转输之累；二可借此机会威慑诸侯，以加强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尽管如此，由于境内地形十分复杂，交通极为不便，各地封建领主又握有兵权、财政，因而分立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仍然相当强烈。除了“万王之王”雄才大略、中央政府兵盛财足的少数时期，一般地说，各地诸侯对于“万王之王”的臣服多半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实际则处于一种割据或半割据状态。为了维系国家的大致统一，基督教会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葡萄牙人的到来与示好，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积极的响应。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国家处在被伊斯兰势力所包围和孤立的地位，境地维艰。自从红海为阿拉伯人所控制以后，伊斯兰教就随着阿拉伯商人由沿岸向内地传播开来。在达纳基尔地区和今索马里北部至绍阿地区边缘一带，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穆斯林邦国。它们同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之间不断发生着摩擦与冲突，战争连绵不绝。这种冲突以宗教为旗帜，自然包含着宗教冲突的内容。但在宗教冲突的喧嚣之下，也掩盖着利益的冲突，即沿海穆斯林商人集团向内地基督教封建主统治地区的进军。在这些穆斯林邦国当中，先后以伊法特和阿达勒两国最为狂热。到了16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埃塞俄比亚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占领了埃及的奥斯曼帝国，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积极支持红海西岸这些穆斯林邦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为了应付这一局势，德勒布纳·丹吉尔皇帝于1535年要求他的葡萄牙盟友提供火枪等先进武器。

然而，伊斯兰势力的进攻来得更快。这次进攻很快演变成一场关乎埃塞俄比亚国家和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对基督教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伊斯兰圣战，是由阿达勒的一位绰号为“格兰”（意为“左撇子”）的伊曼·艾赫迈德·伊本·伊布拉欣·加齐教长所领导的。从1527年开始，格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火器的援助下，率领大军入侵埃塞俄比亚。格兰大军一路所向披靡，深入绍阿、阿姆哈拉、拉斯塔等埃塞俄比亚腹地，1535年占领古都阿克苏姆。被劫掠欲望和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穆斯林士兵，对他们占领的地方大肆烧杀抢掠，焚毁了无数村镇和城市，甚至将沃洛地区高达130英尺的著名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也付之一炬，破坏了大批基督教建筑

和珍贵文物、工艺精品，还强迫被占领地区的广大居民改宗伊斯兰教。

“万王之王”勒布纳·丹吉尔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环境中死去。继位的加拉德沃斯皇帝（1540—1559年在位）终于得到了葡萄牙人的支援。1541年，450名葡军在马萨瓦登陆。在他们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终于在阿拉吉平顶山与阿散吉湖之间的荒野山区击伤格兰，打败入侵的穆斯林大军。格兰暂时退兵，进行整顿。在补充了900名土耳其、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火枪手和大炮之后，格兰卷土重来，并一举俘杀了葡军指挥官、著名航海家达·伽马之子唐·克里斯多夫·伽马。但加拉德沃斯皇帝亲率大军自南方兼程北上，双方决战于塔纳湖畔。穆斯林大军因格兰在激战中阵亡而溃散。埃塞俄比亚虽然闯过了民族危亡的险关，却元气大伤，大量财富被洗劫一空，人口锐减，经济严重破坏，到处一片残破景象。

加拉德沃斯乘胜利之势头，力图强化中央政权对各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同时加强教会的地位，希望以教会的力量，团结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民。此时，曾在对抗格兰的战争中支持过加拉德沃斯的葡萄牙人，依仗自己有功，竟要求“万王之王”皈依罗马天主教。遭到拒绝后，耶稣会势力被迫离开皇帝的宫廷，退入北方提格雷地区，受到当地封建统治者的保护，继续成为埃塞俄比亚的隐忧。加拉德沃斯在力拒葡萄牙人无理要求的同时，发兵入侵阿达勒，并实施报复性的破坏与劫掠。这种极端的行动，反而迫使穆斯林加强团结。他们拥立格兰之侄努尔·穆贾希德（又称努尔伊玛目），对埃塞俄比亚人进行殊死战斗，结果加拉德沃斯命丧沙场。

就在埃塞俄比亚人与沿海穆斯林诸邦两败俱伤之际，一股新的力量乘虚而入，成为埃塞俄比亚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加拉人的入侵。

加拉人属库希特人一支，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渊源，至今难以确知。早期的加拉人可能居住在东非之角的东部和东南部一带。后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达纳基尔人和索马里人的压迫，加拉人逐渐向南和向西迁移。16世纪前后，他们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肯尼亚北部的广大边陲地区。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万王之王”加拉德沃斯，还是穆斯林阿达勒国家的统治者努尔伊玛目，都对日渐壮大并逐渐北上的加拉人深怀警惕，并力图限制他们的移动。但是，在这两位统治者先后于1559年和1567年死去之后，整个南方门户大开。加拉人遂大举北移，顺利向埃塞俄比亚高原各地渗透，所到之处，夺取土地、放牧牛羊。由于加拉人处在社会发展较低阶段，没有全部族统一的组织，因而这种迁徙只是以个别或几个部落为集群分散的北移。这些移民波力度欠强，因而难以给埃塞俄比亚帝国以集中的、致命的一击，使它发生根基性的动摇。

“万王之王”加拉德沃斯身后无嗣，王室内部自然爆发了夺位之争。争夺各方彼此兵戎相见，有的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和加拉人入侵的压力，迫使埃塞俄比亚人将国家重心转移至北方的塔纳湖一带。那里农业基础较好，同时又有象牙、黄金、香料乃至奴隶的来源。

17世纪初，苏森尼奥斯（1607—1632年在位）登上“万王之王”宝座。在他统治前期，苏森尼奥斯镇压地方封建主们的分立倾向，并努力遏制加拉人的继续北移；对于已移入的加拉人，则吸收他们加入军队，并令其驻扎各省。这说明，一部分加拉人已从外来入侵因素开始转化为埃塞俄比亚的内部

因素。苏森尼奥斯的这些举措，显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617—1619年，“万王之王”已有余力派遣远征军入侵丰吉素丹国。但是，苏森尼奥斯在宗教政策上日益倾心于天主教，并于1622年正式皈依天主教，希望用这一新的宗教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其统治。这一政策，显然违反了国情。当年入援加拉德沃斯皇帝抗击格兰的葡萄牙士兵一直留居埃塞俄比亚，他们的后裔信奉天主教，享有优待，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由此渊源，葡萄牙人迁来埃塞俄比亚者日多，其中不少是耶稣会士（内有若干西班牙或其他国家的人）。一些耶稣会士，如教长奥维多和门德斯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触角。例如，门德斯就居心叵测地提出一些埃塞俄比亚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全体教徒要重新受洗；所有教堂须重新命名；在祈祷时用拉丁语取代格尔茨语；不承认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圣徒，挖掘他们的坟墓，等等。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天主教的传播来征服埃塞俄比亚。他们的活动早已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动乱，造成了埃塞俄比亚内部各社会集团间的不和。因而苏森尼奥斯大力推行天主教的活动，在旧有宗教界人士、贵族和埃塞俄比亚广大百姓当中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怨恨。它引起的冲突，使8000人丧失了生命。苏森尼奥斯的儿子法西利达斯决心结束这种动乱。他指出：“你们看到的这些躺倒在地上的死人，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你们自己的臣民，你们的同胞，有些还是你们的亲人……我们赢得的并不是一次胜利。”

在这种形势下，苏森尼奥斯于1632年被迫退位，发布公告：鉴于天主教带来的屠杀，“万王之王”决定恢复祖先的信仰，让原来的教士回到教堂，让他们建立自己的祭坛，诵读自己的祷告书，并将帝位让给法西利达斯（1632—1667年在位）。

埃塞俄比亚人广泛欢迎上述决定，当时的一首歌曲反映了这种欢庆情绪：

“埃塞俄比亚的绵羊终于自由了，
摆脱了西方的大胆的狮子，
平安地在自己的牧场上进食。
圣马可和西里尔的教义，
战胜了罗马教会的愚蠢，
欢庆吧！欢庆吧，让我们共唱阿利路亚！
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
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

“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即位后，驱逐耶稣会士，并采取严厉手段禁止天主教，清洗天主教势力，还下令禁止欧洲人入境。为了打击天主教势力，增强国家统一，法西利达斯对内决定定都冈达尔，并在那里修建了几十所修道院和教堂，对外则致力于同红海沿岸的穆斯林势力，包括奥斯曼帝国驻苏瓦金与马萨瓦的帕夏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

埃塞俄比亚同红海沿岸穆斯林势力的长期斗争，使历史悠久的红海与非洲内陆贸易大受影响。但到17世纪上半叶，由于奥斯曼帝国在红海地区势力

Jean Doress,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Elsa Coult, London 1959, p.158.

Doress, op.cit., p.159.

Greenfield, op.cit., p.61.

的滑坡和埃塞俄比亚内部政局的变化，这一贸易又有了明显的回升。在法西利达斯及其继承者约翰尼斯一世（1667—1682年在位）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埃塞俄比亚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像某些资料所讲的那样关闭；相反，印度和欧洲的商人继续经过马萨瓦港前往这个基督教王国。阿拉伯和红海沿岸的当地商人，还有来自希腊与意大利的商人，也推动着沿海对内陆高原贸易的复苏。“万王之王”甚至让这些商人充当自己的商业代理人。这些商人携带着埃塞俄比亚皇帝致印度莫卧儿大帝、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英印殖民当局，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首脑的友好的信件。法西利达斯等改善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他们甚至要求奥斯曼帝国驻红海沿岸的总督阻止欧洲传教士从沿海进入内陆，并击退敢于从海上来犯的葡萄牙武装力量。由于也门在17世纪一度强盛并扼红海南端门户，法西利达斯曾先后派遣两个使团前往，希望同也门订立反葡军事同盟。也门统治者也派高级教长回访，并企图使“万王之王”改宗伊斯兰教。结果，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酿成一场暴乱。此外，法西利达斯还鼓励同丰吉素丹国进行贸易。

总之，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的对外政策是颇有眼光的。一方面，他们根据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和东北非穆斯林诸国时势消长的客观实际，大幅度地调整了以武力对付穆斯林世界的方针，在保留宗教上的歧异的同时，努力修好国家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作出反应。另一方面，他们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的时候，又集中目标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耶稣会势力，对它们实行严格封锁，但同时却不断对荷兰人、英国人修书示好，并准许其他欧洲商人前来贸易。这一政策同17世纪中国康熙大帝的禁教和此后的闭关，以及1635年后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东方封建主义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反应。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的态度似乎比中国和日本还要松弛一些。

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两代的睦邻政策，在周围穆斯林世界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积极反响，这就为埃塞俄比亚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但他们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强化教会势力的办法，结果使基督教会势力更加膨胀，教权逐渐成为王权的威胁。教会方面发动首都暴乱以反对法西利达斯的也门政策，还因约翰尼斯一世的婚姻问题而将其革出教门。

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还锐意经营塔卡泽河以西地区。随着国家重心北移塔纳湖，冈达尔成为永久性首都，锡缅和瓦格拉等地区迅速阿姆哈拉化。

当法西利达斯等着意防范红海葡萄牙人的入侵、并努力与沿海穆斯林世界修好时，当“万王之王”同膨胀的教会势力渐渐发生摩擦与冲突时，加拉人继续自南方波浪式地涌入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他们大股进入戈贾姆，或经由绍阿抵达阿姆哈拉，前锋已渗入提格雷地区。

在法西利达斯与约翰尼斯一世统治的这半个世纪中，埃塞俄比亚一方面驱逐了欧洲早期殖民主义的势力，改善了同四周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使本国有了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过的、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在另一方面，内部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仍在聚积，加拉人大规模的渗透性迁入与这种迁徙所带来的矛盾，都在表层现象之下耗蚀着埃塞俄比亚的国力。

加拉人进入埃塞俄比亚高原之后，同高原各地原有的居民发生了自然而密切的接触。他们受到当地发展程度较高的基督教封建文明的影响，开始缓

慢地接受埃塞俄比亚文化。特别是那些较早进入绍阿和阿姆哈拉地区的加拉人，就更是如此。在越来越多的加拉人集群当中，世袭制渐渐取代了原来的选举制。不过，这一民族融合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矛盾，甚至激烈冲突的过程。这种冲突中的融合过程，鲜明地体现在“万王之王”埃雅苏的活动中。

约翰尼斯之子埃雅苏（1682—1702年在位），是冈达尔王朝（仍属所罗门世系，因定都冈达尔而称之）最后一位杰出的君主，史称埃雅苏大帝。他面对前两代人创造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及聚积下来的繁杂的内部问题，在即位伊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强化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上面。

“万王之王”在各地的驻防军——“查瓦”诸营，本是埃塞俄比亚国家与王权的重要支柱。但此时，这支武装力量已趋腐败和变质。由于长期与驻在地贵族通婚，驻防军长官们往往与地方权贵们沆瀣一气，对抗中央政权。因此，埃雅苏首先加强皇家卫队的建设。这支军队拥有专门金库，装备有较为先进的步枪和火枪，共计兵员12000人，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皇家禁卫军。对于在自己麾下服务的加拉士兵，皇帝鼓励他们阿姆哈拉化和皈依基督教，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军政高级官员。这一情况说明，加拉人已经开始作为内部因素，逐渐进入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生活。

尽管对自己手下的加拉武士颇多笼络，但对那样深入各地、雄踞一方的加拉人集团，“万王之王”仍将其视为心腹大患，不断予以打击。17世纪80年代，埃雅苏首先对居住在阿姆哈拉本部与戈贾姆边缘地区的加拉人用兵；90年代，他又数次兵伐绍阿，以便重建“万王之王”对这片基本上已被加拉人控制的地区。绍阿地区虽然仍有一些承认皇帝权威的小王国，但大都对埃雅苏的征讨抱冷漠态度。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期的接触与沟通，绍阿地区的加拉人已逐步阿姆哈拉化了。它们同毗邻的这些阿姆哈拉小王国早已化干戈为玉帛，建立了友善关系。埃雅苏终于认识了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放弃了将加拉人逐出绍阿的原定计划，任其自然发展。不过，对绍阿的用兵却也带来一个“万王之王”本人所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来自门兹地方的贵族尼古斯追随皇帝征讨绍阿，在埃雅苏大军班师回朝后依然留在当地继续活动，并建立了自己的小邦王朝。到了下一世纪。他的后裔竟已占有绍阿大部分地区。在阿斯法·沃森当政时期（1770—1808年），该邦王朝已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型的行政体制。

1704年，埃雅苏又发动了他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进兵西南的锡达莫地区。这次远征带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锡达莫地区的伊纳里亚王国，由于早先被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多次征服，已承认了中央王权的最高权威。它向中央政府缴纳为数可观的黄金作为贡赋，成为“万王之王”政权的一项重要财源。此外，伊纳里亚王国由核心地区与外围附庸组成，在锡达莫地区领袖群邦，因此它的臣服对“万王之王”更有重要意义。17世纪，加拉人开始向这一地区渗透，不仅切断了伊纳里亚王国同中央政权的通道，还侵占了该邦北部边远地带。埃雅苏的远征，不仅旨在重建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的权威，还要恢复这个重要财源。这次远征虽未能奏效，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加拉人的力量，遏制了他们北上戈贾姆等地区的势头。这次远征失利后，

西克·安德烈书：前引书，第327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559.

伊纳里亚王国和整个锡达莫地区完全落入加拉人之手，这里的原有居民逐渐被吸收进人数众多的加拉社会；与此同时，加拉人也接受了原当地王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了一批加拉人王国。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势力的增长和扩展，这些加拉王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接受伊斯兰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万王之王”埃雅苏还十分重视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致力于保持通过苏瓦金港和散纳尔地区商路的畅通。此时，丰吉素丹国已由于国内不休的动乱、统治集团内讧与游牧民族的无法无天而日益衰落。因此，埃雅苏十分重视经略帝国北部的边鄙地区。1692—1693年，他会同总督们一道发起北征。这次军事活动，使“万王之王”得以重建他对贝格姆迪尔与提格雷地区的权威。不过，埃雅苏虽然重兵在握，对提格雷当地的封建主却仍很谨慎，不去触动他们传统的既得利益与权威。实行这种政策说明，封建的埃塞俄比亚即使是在它中央王权强大的情况下，各地封建主仍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万王之王”对北方提格雷等地区的这一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在埃雅苏的号令下，实行了对海岸地区的封锁，终于迫使苏瓦金的帕夏屈服，同意促进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的贸易，并同“万王之王”分享苏瓦金港的收入（关税）。埃雅苏积极的外贸政策，引来了欧亚各地的商人。1692—1693年北征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外贸剧增。“万王之王”的商务代表出现在波斯，来自孟买的英国商人代表团也企图进入这个古老的王国。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使节也趁势渗入埃塞俄比亚。

欧洲传教士的重来，再次激起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不安与教会上层的敌视。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1706年，埃雅苏病重，教会上层与王后联手，将他杀害，并拥立其子特克拉—海马诺特（1706—1708年在位）为新的“万王之王”。

此后十数年间，埃塞俄比亚国家急剧衰落下来。“万王之王”的权威局限于首都冈达尔和邻近地区。大部分省区实际脱离了中央政权的约束，各行其是。加拉人则从四面八方进入这个国家的腹地。虚弱的王权更加依赖皇家卫队的支撑，而皇家卫队也因养尊处优和对宫廷事物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日趋腐败。宫廷大权操纵在少数权臣与皇家卫队手中。为皇帝服务的加拉人贵族更被擢升高位，掌握军政要津。他们同埃塞俄比亚教会之间矛盾日深，直至兵戎相见。斗争的结果，教会势力遭到削弱。这段时间的“万王之王”，命运也相当悲惨。特克拉—海马诺特在位仅两年即遭杀害。其叔父特沃夫洛夫继位，三载而亡。1711年，贵族们甚至一度废去所罗门王系，拥立自己的领袖约斯托斯为“万王之王”。1716年，这位篡夺者被埃雅苏的另一个儿子达维特三世所废黜。1721年，达维特三世又被毒死，他的一位兄弟、以巴卡法之名著称的瓦尔德·吉奥吉斯加冕称帝。

巴卡法在位的十年（1721—1730年），短期内结束了权臣弄权的混乱局面。他雷厉风行地将一批又一批涉嫌谋反的宫廷权贵们逮捕、处决，手段虽嫌狠辣，效果却立竿见影。在巴卡法的铁腕之下，无论职位多高的廷臣、显宦都不过是“万王之王”颐指气使的工具。为了免受腐败跋扈的皇家卫队的左右，巴卡法转而依靠当年埃雅苏部署在达莫特地区的加拉人部队，用他们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和军队骨干；同时，积极加强火枪手部队，以改进军队的技术与装备。在整顿宫廷、强化军队的基础上，巴卡法开始着手重建中央王权对各省区的控制。这一次，“万王之王”的军队重点经略塔卡泽河以东

地区。1724 年以后，先后征服了瓦格和拉斯塔等地区。

1730 年巴卡法死后，其幼子埃雅苏二世继位。由于受到加拉人部队首领的支持，这次王位的嬗替比较平静。但加拉人的势力也进一步膨胀。埃雅苏二世冲龄即位，实权掌握在其母、皇太后曼图阿布手中。曼图阿布重用他的亲戚。这个亲贵集团掌权以后，从 1741 年起不断侵犯丰吉国家，企图将后者变为埃塞俄比亚的藩属。1744 年，埃塞俄比亚大军在一次大举进犯散纳尔的战争中惨败，损失约 20000 人。为了进行报复，埃雅苏二世在 1744—1751 年对丰吉国家反复进犯，结果不仅军事上劳而无功，反而造成双方贸易的停顿。

1755 年埃雅苏二世死后，皇太后曼图阿布及其亲贵们扶埃雅苏二世的加拉族妻子所生之子埃约阿斯（1755—1769 年在位）为“万王之王”。为了争取各地封建领主对埃约阿斯的承认，曼图阿布宁肯坐视各省总督拥兵自重。例如，提格雷地区的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本是一个靠造反而爬上高位的人，由于承认埃约阿斯为“万王之王”，曼图阿布便认可他成为整个塔卡泽河以东地区的统治者。

为了强化埃约阿斯的统治，曼图阿布集团鼓励埃约阿斯母系亲属率领数以千计的瓦洛（加拉人一支）武士来到首都，并委以宫廷和政府中的高级职务。曼图阿布的本来意，是利用瓦洛武士集团这一新进势力，造成对原来朝廷中大封建主集团势力的某种制衡，使自己可以凌驾在这种均势之上。殊料后果适得其反。地方势力更加坐大，中央政权日趋异化，带有渐渐浓厚的加拉人色彩。宫廷中的均势并未出现，反而使以阿姆哈拉总督瓦达卓为首的阿姆哈拉贵族集团因不满引进大批瓦洛人而与曼图阿布集团分裂。瓦洛人集团飞扬跋扈，教会上层内部派别冲突也尖锐起来。

1766 年，“万王之王”埃约阿斯同曼图阿布集团发生冲突。埃约阿斯求助于提格雷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久怀异志的总督正中下怀，立即亲率 30000 人的大军（内有 8000 名火枪手），于 1767 年 12 月抵达首都冈达尔。曼图阿布集团不愿坐以待毙，遂于次年由曼图阿布之婿马利亚姆—巴里亚为首，企图联络阿姆哈拉人和阿高人的力量，一举废黜埃约阿斯。1768 年 10 月，埃约阿斯率领由米哈伊尔指挥的提格雷大军和由法西尔指挥的达莫特驻军同马利亚姆—巴里亚的军队展开决战。后者兵败被俘，并被处死。但在此次战后，“万王之王”埃约阿斯与米哈伊尔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由于畏惧米哈伊尔的势力与野心，埃约阿斯亲近法西尔，并命令米哈伊尔率部返回提格雷。但米哈伊尔抗命不遵，反而向法西尔展开攻击。法西尔的骑兵尽管骁勇，却不敌米哈伊尔的火枪手。战争结果，法西尔败逃达莫特，埃约阿斯也被米哈伊尔杀害。

1769 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进入了王子纷争的时代。各地封建主完全无视“万王之王”的存在。“万王之王”则沦为控制冈达尔的军阀封建主的傀儡。

埃塞俄比亚陷入无休止的军阀封建主混战之中。先是提格雷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将“万王之王”玩于股掌之上，任意废立；接着是米哈伊尔被达莫特驻军首脑法西尔与阿姆哈拉人首领哥舒联手击败；然后是哥舒与法西尔先后成为冈达尔政权的实际控制者。所有这些军阀封建主与他们任意废立的

“万王之王”，如走马灯一般在冈达尔的旋转政治舞台上出现与消失，其速度令人目眩。

在地方上，诸侯割据，各霸一方。提格雷以及塔卡泽以东广大地区仍然控制在米哈伊尔·萨胡尔家族手中。他们拥有最强的军队和行政系统。绍阿的统治者沃森—塞吉德甚至拥立了一个“万王之王”，而他绝非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其他各地封建小邦的统治者，也都全权支配着自己的领地和人民，为所欲为。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加拉人首领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所到之处，焚毁教堂，屠杀教士，并将基督徒卖为奴隶。

由于冈达尔军阀封建主与各地封建统治者之间、各地军阀封建主之间战争不断，军队的地位遂变得极端重要。所有军阀封建主的部队都脱离土地，不事生产，因而也就完全不关心生产。他们不仅蹂躏敌方的地区，而且无法无天、横行于自己领主的土地。在动乱、战祸、劫掠、杀戮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农民无法维持生产，甚至无法存活，只得弃农从军，或铤而走险，啸聚山林。

兵匪合一，盗贼遍野，经济凋蔽，人口锐减。古老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埃塞俄比亚，经历了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第八章 奥斯曼北非

当西方殖民者从非洲西、东海岸加紧侵略非洲之时，奥斯曼帝国于 16 世纪先后占领了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占领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直接用武力实现的，占领中布格里布和东马格里布则是通过巴巴罗萨海盗，同西班牙长达 60 年争夺的结果。

奥斯曼帝国沿袭了北非各国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奥斯曼素丹取代埃及国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并在北非四国派驻了土耳其近卫军和总督。为了同基督教国家抗衡，土耳其封锁了自古以来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商道，实行闭关政策。除马格里布曾有一度的海盗商业繁荣之外，奥斯曼北非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长期呈现衰落的趋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素丹的统治权已有名无实。到 18 世纪末年，奥斯曼北非四国相继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猎获物。

一、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

14 世纪中叶，土耳其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14 世纪下半叶，征服了巴尔干半岛；1453 年，又围攻君士坦丁堡，灭亡了千年来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土耳其从此由小亚细亚的一个小国，一跃成为驰骋欧亚的大帝国。16 世纪初，奥斯曼便把扩张的目光投向非洲，与亚洲毗邻的埃及首当其冲。

当时，统治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1325—1517 年）在经历 14 世纪的极盛后，正日趋衰落。从 15 世纪起，国内内讧不断，政权更替频繁，仅 1421 年一年内，就更更换了三任素丹。王公贵族互相仇视，相互倾轧，使王朝内部充满了阴谋和暗杀，被史家认为是埃及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朝代。政局的动荡，使埃及经济状况逐步恶化。15 世纪，因水利失修，农业开始衰退，手工业生产停滞，经济日渐萧条。连年不断的天灾、瘟疫，更把埃及推向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在 15 世纪末叶的一次黑死病瘟疫中，首都在三个月内就死亡 30 万人。据史家估计，在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口减少了 2/3。在外贸方面，自 15 世纪末葡人发现好望角开辟新航路后，红海的贸易地位下降，香料及中国、印度等地的产品大部分不再经过埃及港口，这使埃及的过境贸易遭到致命打击，不仅丧失了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而且国库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也由此锐减。马木路克王朝赖以搜刮和掠夺的领地，如非洲的利比亚、亚洲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其统治权也摇摇欲坠。盛极一时的马木路克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这给正处于扩张鼎盛的奥斯曼土耳其以入侵的有利时机。

1512 年，谢里姆一世继任土耳其素丹。他即位后，继续执行前任的侵略扩张政策，意欲夺取埃及在亚洲的领地，从而同竭力保住西亚统治权的埃及发生了尖锐冲突。早在 15 世纪 80—90 年代，埃土各自暗中支持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各诸侯间的争斗，到谢里姆一世时期，埃土之间的这种争夺更趋表面

土耳其攻陷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385 页。

希提：前引书，第 837 页。

化。1514年8月，谢里姆率军进攻受埃及支持的波斯；1515年，攻入波斯首都大不里士，灭亡萨法威王朝。马木路克苏丹惊呼：叙利亚北部边界的力量平衡改变了。不久，奥斯曼帝国又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面对土耳其咄咄逼人的攻势，埃及试图采取和平的策略来阻止土耳其的继续进攻。1516年，埃及苏丹甘苏·奥里派使节到谢里姆兵营，准备调解土耳其与小亚细亚小国交战双方。谢里姆拒绝了甘苏的和平建议，并下令剃掉其使节的胡须，把他逐出营地。甘苏受此侮辱后，决心与谢里姆一决雌雄。1516年8月24日，埃土两军在阿勒颇以北的达比格草原相遇。当时土耳其军队已拥有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装备精良，战术先进；而马木路克军队装备陈旧，战术落后，士气低落，在土军面前不堪一击，惨败而归。同年10月，谢里姆大军乘胜进攻大马士革，把埃及势力逐出了西亚。

1517年，新继位的埃及苏丹土曼贝伊拒绝在祈祷词中和货币上承认谢里姆一世为君主，这便成了土耳其人入侵埃及的借口。1517年1月，谢里姆一世从叙利亚攻入埃及。1月23日，双方陈兵于开罗城下，埃及军队此时士气不振、将领不和，加上武器落后，与土耳其军队力量对比悬殊。经过一天的激烈巷战，开罗终于陷落。同年4月，埃及苏丹土曼贝伊被俘处死，马木路克王朝从此灭亡。自此，埃及成为土耳其的行省之一，埃及的哈里发被剥夺了宗教领导权，土耳其苏丹自称哈里发。

由于埃及远离土耳其本土，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建立了一套与在亚洲不同的统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埃及原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土耳其在埃及任命了总督帕夏，执掌埃及政治经济及军事大权。帕夏一般任期1—3年。在地方，埃及被划分为24省（区），每省设行政长官贝伊，由帕夏任命，但仍由原马木路克担任。谢里姆一世还在埃及留驻一支5000人的土耳其近卫军，作为帕夏与马木路克的制衡力量。17世纪前，帕夏尚能有效地行使各项大权，抑制马木路克势力的膨胀，但由于帕夏从土耳其派来，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地方情况，实权渐渐旁落到马木路克手中。到17世纪中叶，帕夏和近卫军的权力日益缩小，马木路克的势力逐渐上升，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其中开罗行政长官的权力最大，甚至可以任意囚禁和废黜帕夏，没收他们的财产。在土耳其直接统治埃及的280年间，更换过100多个帕夏；在18世纪，被废黜的帕夏就达50多个。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埃及马木路克集团就曾好几次违抗苏丹的命令，拒不纳贡。阿里贝伊（1768—1773年）甚至在1769年赶走土耳其帕夏，宣布埃及独立，并僭称苏丹。虽然其政权只维持了几年，但土耳其宗主权已名存实亡。此后几十年中，各马木路克贝伊为争夺埃及政权而兵连祸结，一直到拿破仑入侵。

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埃及封建制度进一步巩固。土耳其保留了埃及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把它法律化、固定化。在确立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土地占有分三种形态，即哈斯领地、寺院领地和马木路克领地。哈斯领地是饲料地，专为帕夏、近卫军和马木路克贝伊的马匹种植饲料。寺院领地是属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4, London 1975, p.15.

在阿拉伯礼仪中，剃须被认为是最大的侮辱。

穆罕默德·艾尼斯与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页。

希提：前引书，第860页。

其地位仅次于帕夏，由当时势力最大的马木路克首领担任。

于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机关的土地，由统治者赐与或信徒馈赠，享有免税权，但原则上不准买卖。马木路克领地实行包税制度，是埃及主要土地制度，三种占有制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埃及独特的一种制度。土耳其占领埃及后，沿袭了当地普遍盛行的税制，把大批土地包租给土耳其贵族、近卫军官和当地马木路克贝伊经营管理。这些人称“穆尔塔津”（Multazim），即包税人。他们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费拉赫”，fellah）耕种，自己只负责收取租税，所征税收按一定比例上缴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主要有地税，又称国税（“米里”，milly），此外还有一种余额税，这一部分归包税人自己所有。据统计，在包税人一年所收税款中，1/5 上交中央政府，1/5 上交地方政府，其余归己。包税人还享有一块免税地（“乌西叶”），是政府赐给他个人使用的土地，作为他们负责征税的一种酬劳，但规定不准买卖。

17 世纪初，土耳其普遍采用这种制度并把它法律化，将大量官田通过招标或契约的方式承包给包税人。包税人最初主要是土耳其贵族和近卫军军官，到 18 世纪逐渐为马木路克贝伊所取代。一些政府官吏、宗教学者和贝都因部落酋长也享有包税权，总数约五六千人左右；包税权最初只限于一年或数年，后来发展成世袭制，甚至可以转让或出卖。包税人死后，其子孙只要向政府缴纳一笔款子（一般不超过包税余额的三倍），就可以继承包税权。到 18 世纪末，虽然包税地名义上还属于土耳其素丹，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包税人的私产。拥有大部分包税权的马木路克贝伊已成为占有全埃及 2/3 土地的大封建地主。

包税制采取超经济强制方式，农民遭受残酷剥削。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被束缚在村社中，村社是向包税人租地的基本单位，由政府批准的村长监督分地给农民。农民不仅要种植所分份地，而且要为包税人无偿耕种乌西叶土地。此外，他们还要受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据统计，17 世纪埃及的捐税多达 70 余种。

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工商业制度没有改变。手工业者仍组织在行会中，每个行会设一行主，其职位世袭。开罗是行会的集中地，从事手工业者达 25000 人。但这一时期规模未见扩大，且生产水平低下，一般作坊只有 2—3 名学徒。谢里姆一世入侵埃及时，曾大掠城市，劫走工匠 18000 人，使 50 多种行业不复存在，埃及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埃及的商业原来较为发达，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埃及的贸易地位随之下降。而这一时期土耳其在埃及执行的闭关政策，更使埃及的对外贸易受到致命打击。谢里姆一世统治时期，土耳其同欧洲展开了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斗争，土耳其海军控制了地中海东部。为遏制西方殖民势力渗入埃及，削弱日益增强的埃及马木路克势力，土耳其政府竭力阻挠红海贸易的恢复和发展。17 世纪末，土耳其借口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滨临红海，严禁西方船只穿越吉达港以北驶往埃及。与此同时，土耳其对埃及的进出口贸易也严加限制。这种闭关政策，给埃及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性贸易往来基本消失，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成了一个同世界贸易主流无缘的萧条地区。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诸国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发展。埃及与欧洲联系的中断，是造成埃及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闭关政策还直接加速了埃及手工业的衰落，在这一时期，中世纪很多有名的手工业中心荡然无存，像提尼斯、舍坦这样以生产上等金银丝织品

而著称的城市已不复存在。工商业的凋敝使沿海城市始终发展不起来，直到18世纪末，开罗的居民还不到50000人，亚历山大城只15000人。闭关政策的危害还表现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正是欧洲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兴起之时，由于埃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各种新思想无法传播进来，这使埃及进一步向伊斯兰一体化发展，宗教地位愈加巩固。

闭关政策到18世纪有所改变。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欧洲国家开始迫使土耳其打开向欧洲关闭的禁区。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指示加尔各答商人重新打开印度到苏伊士的商路。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埃及缔结一项条约，规定苏伊士港向来自印度的英国商人开放。继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法国也与埃及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法国对埃及的觊觎由来已久。1672年，莱布尼茨向路易十四建议进攻埃及，他说：“在那里您将得到通向伟大印度的商路。”法国商人利用其靠近埃及的优势，发展与埃及的贸易往来。马赛同亚历山大城的往来日趋频繁，当时，每年6—8月刮北风和西北风时，从马赛到亚历山大城只需航行10—12天。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正式宣告了闭关政策的终结。

土耳其近300年的统治是埃及社会停滞和衰落的时期，不仅工商业发展停滞，而且农业灌溉系统连年失修，桥梁、堤坝不时倒塌，尼罗河经常洪水泛滥，农业生产力普遍下降。在土耳其和马木路克的双重压迫下，广大埃及人民遭受残酷剥削，处境十分悲惨。连年的动乱、饥荒、鼠疫，使人口锐减。据载，在1619年的一次鼠疫中，死亡33万人；在1643年的另一次鼠疫中，有230个乡村变得一片荒凉。15世纪末，埃及总人口尚有500万，而到17世纪减至300万。这种衰退的趋势直到18世纪末才有转机。

埃及人民为反抗土耳其和马木路克的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几个世纪中，埃及人以各种方式反抗土耳其的暴政、抗议贪官污吏的盘剥，抵制各种苛捐杂税。参加反抗斗争的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群众，也有不满异族统治的伊斯兰学者和清真寺的长老。在1695年的一次饥荒后，数万饥民涌到开罗，要求政府拨粮救济，在遭到拒绝后，他们拿起木棒等武器，冲进当地富豪的粮仓，开仓分粮。两年后，为了抗议奥斯曼素丹颁布提高税率的法令，埃及各地的群众、伊斯兰长老、商人以及一部分士兵纷纷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终于迫使帕夏罢免并处死了提高税率的财政大臣，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8世纪末，开罗市民和伊斯兰学者不断掀起抗捐抗税的斗争，并提出了“我们要正义，不要暴虐，要立法”的口号。这些斗争都沉重打击了土耳其政府和马木路克的统治。

二、巴巴罗萨海盗和土耳其宗主权在东马格里布的确立

Rodger Alexander Bankier, *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 to 1801* (《第二次同盟战争》), Oxford 1964, P.27.

穆罕默德·艾尼斯和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前引书，第5页

Arthur E.p.Brome Weigull, *A History of Events in Egypt from 1798 to 1914* (《1798—1914年的埃及历史事件》), London 1915, P.6.

希提：前引书第861页。

欧麦尔·阿卜杜·阿齐兹：《阿拉伯埃及近现代史研究》(阿拉伯文)，埃及复兴出版社，第61页。

16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的侵略和统治也扩展到马格里布东部，但这并不是征服埃及的继续，其宗主权的确立与巴巴罗萨海盗密不可分。

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演变，马格里布各国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3世纪时，已初步形成了三个独立王国，即定都于突尼斯的哈夫斯国、定都特累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国和偏安非斯的马林王国。这三个王国就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雏形。到14—15世纪时，由于内讧和战乱，农业凋敝，工商业停滞，从而相继走向分裂和衰落。

马格里布的分裂局面给外部势力的入侵以可乘之机。早期殖民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向马格里布伸出了贪婪之手。1415年，葡萄牙军队占领了马格里布西北角的休达城，拉开了殖民侵略的序幕。西班牙也不甘落后。在斐迪南一世（1452—1517年）的对外政策中，入侵马格里布是首要政策。他继位后，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狂热的宗教宣传，号召新的十字军远征，企图把马格里布海盗势力赶出地中海，达到独霸地中海的目的。15世纪末，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起义，被他看成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威胁，成了西班牙远征的借口。

1497年，西班牙首先出兵占领了梅利利亚；接着，在1505年春，又对阿尔及利亚沿海港口米尔斯·克比尔发动袭击。1508年，西班牙军队夺取了奥兰地区，并把该地区两所清真寺“圣化”；1510年，又夺取了贝贾亚；同年7月，西班牙将领佩德罗·纳瓦罗攻占了黎波里，他还在阿尔及尔沿海岛屿上修筑了佩尼翁要塞，安装了大炮，把阿尔及尔城置于炮火威胁之下。在短短十年中，西班牙占据了马格里布沿海地区主要据点，并计划征服整个中马格里布。

西班牙的侵略遭到马格里布各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也引起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阿尔及尔商业贵族的极度恐慌。西班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不仅直接威胁着这些商业贵族的统治，而且也危及其切身的经济利益，他们赖以致富的海盗活动受到了遏制。西班牙建立佩尼翁要塞以后扬言要夺取阿尔及尔，更使他们感到如末日降临。他们自知无力抵抗西班牙的入侵，便求助于爱琴海的海盗首领巴巴罗萨兄弟。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势力的入侵。

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特指地中海富有传奇色彩的四个海盗兄弟。他们出身于土耳其一个普通陶工家庭，青年时代爱好航海。1504年，在老三伊勒亚斯被基督教海盗杀害后，长兄阿鲁杰开始组织人马，袭击和拦劫基督教船只。在短短几年内，他的麾下汇集了几千人马，并得到突尼斯哈夫斯王朝的支持。突尼斯为他提供生活给养和武器，并把杰尔巴岛拨给他作为据点。1512年，阿鲁杰遵哈夫斯素丹之旨，准备出兵攻打西班牙占领的贝贾亚，但遭到失败。1514年，阿鲁杰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季杰利，以此为据点同西班牙作战。反西斗争使他在马格里布赢得了巨大威望。

1516年，阿尔及尔为抵抗西班牙侵略，派人拜会阿鲁杰，请他出兵。阿鲁杰慨然允诺，立即出兵攻占了谢尔谢勒；接着，以御西入侵为由，占领了阿尔及尔。从1516年起，阿鲁杰继续西进，一举攻占了米利亚纳、麦迪亚、特内斯、摧毁了阿布德·瓦迪王朝。1518年，阿鲁杰在奥兰与西班牙交战时阵亡。其弟赫尔丁继任首领。当时赫尔丁自认势孤力单，无法与西班牙抗衡，

格拉纳达是西班牙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国家，1492年被西班牙消灭。

这四兄弟为阿鲁杰（Aruj）、赫尔丁（Khair-el-din）、伊勒亚斯（Elias）、伊斯哈克（Ishag）。

权衡得失后，乃向奥斯曼土耳其俯首称臣。土耳其刚占领埃及，正致力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唾手可得的良机。土耳其素丹谢里姆一世欣然接受赫尔丁的效忠，并赐给他贝勒贝伊的称号。自此，巴巴罗萨兄弟成了土耳其侵略马格里布的工具，他们同西班牙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土耳其和西班牙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斗争。

西土争霸长达 60 年，以土耳其占领摩洛哥以外的马格里布而告结束。赫尔丁称臣后，土耳其供给他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增派了一支 6000 人（包括 2000 炮兵、4000 步兵）的部队。赫尔丁以此为主力，从 1519 年起，开始向西班牙反攻。1521 年，赫尔丁领导的土耳其军队攻占了科洛、波尼和重镇君士坦丁，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当时，阿尔及尔城仍在西班牙佩尼翁要塞的炮火威胁之下，这是阻止赫尔丁继续进攻的一颗钉子。1529 年 5 月，赫尔丁对该要塞发动强大攻势，经过三个星期的猛烈炮击，要塞被彻底摧毁，所有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这样，依靠巴巴罗萨海盗，土耳其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但是，攻占佩尼翁并不标志着土耳其与西班牙争霸的最终胜利。1541 年 10 月，西班牙联合法国和意大利，试图反攻，给阿尔及尔以毁灭性打击。三国组成了一支 30000 多人的联合舰队，于 10 月 23 日首先抢占了阿尔及尔沿海高地并修筑了堡垒。但此时恰逢气候突变，雷电交作，三国的联合部队很快陷于混乱，赫尔丁乘机率军出击，使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经历这次惨败后，西班牙再也不敢染指阿尔及利亚了。从此，土耳其在阿尔及利亚的宗主权才得到最终确立。

土耳其征服突尼斯，是同西班牙长达 40 年拉锯战的结果。赫尔丁占领阿尔及尔后，继续执行土耳其的扩张政策，计划把马格里布东部地区也置于土耳其控制之下。1534 年 8 月，赫尔丁利用突尼斯哈夫斯王朝王位继承权之争和人民的不满，乘机攻入突尼斯。在占领比塞大和古累特后，于 8 月 18 日攻占突尼斯城，废黜素丹穆莱·哈桑，推翻了哈夫斯王朝。

土耳其的扩张激化了同西班牙的矛盾。西班牙也一向把突尼斯视为禁裔，认为突尼斯同马耳他、西西里、那不勒斯一道构成西班牙的边界，把基督教国王统治的西地中海和素丹控制的东地中海划分出来。自然，土耳其侵占突尼斯之举，被西班牙视为对自己天然权益的侵害。国王查理一世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号召各基督教王国采取严惩土耳其的行动。此时，突尼斯被推翻的哈夫斯王朝也不甘心失去既有权力，对西班牙的态度表示默许。1535 年，查理一世派 400 艘战船和一支 30000 人组成的舰队，驶过地中海，远征突尼斯。同年 7 月，西班牙军队攻占古累特和突尼斯城，重新让摩莱·哈桑素丹登基，恢复哈夫斯王朝。突尼斯承认隶属于西班牙，允许西班牙人在突尼斯享有居住、贸易和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的特权。一时间西班牙的骑士和传教士蜂涌而至，竞相从事商业和传教活动。查理一世没有在突尼斯长驻，只修筑了一些要塞和堡垒，留下少量军队。

西班牙撤走后，突尼斯很快陷于混乱，内外矛盾交错。一方面土耳其并

Beylerbey，意为贝伊之贝伊，其职位相当于总督。

Laroui, Abdallah, L'histoire du Maghreb (《马格里布史》), Paris 1976, vol. 2, p. 26.

夏尔·安德烈·朱烈安：《北非史》，第 2 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508 页。

查理一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查理五世。

Laroui Abdallah, op.cit., p.28.

不甘心失败，正积极准备再度进攻突尼斯；另一方面国内人民对摩莱·哈桑素丹依附于西班牙十分不满，南部很多地区宣布脱离他的统治。1542年，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素丹之子穆莱·哈米达起兵叛乱，废父王而自立。哈米达登基后，采取平衡政策，周旋于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试图保持有限的独立。但这并未能阻止土耳其最终占领突尼斯。从16世纪50年代初起，土耳其军队在另一海盗首领达尔古特的率领下，不断与西班牙和哈夫斯王朝军队交战，旨在实现完全占领突尼斯的计划。1556年1月，达尔古特占领加夫萨，不久攻占凯鲁万。1560年3月，杰尔巴岛西班牙驻军的30艘战舰被击沉，岛上驻军全部被歼。土耳其军队乘胜进军，于1569年击溃西班牙支持的哈米达军队，再次灭亡哈夫斯王朝。

1571年，西班牙利用奥斯曼土耳其国内危机的机会，同罗马教廷、意大利威尼斯组织反土耳其同盟。1571年10月在勒班陀海战中获胜。1573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兄弟胡安重新攻占了突尼斯城。但西班牙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第二年，土耳其大军压境，再次夺回了突尼斯。这标志着土耳其征服突尼斯的最终胜利。

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同时，土耳其以阿尔及尔为据点，继续向东进攻利比亚。土耳其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黎波里。黎波里曾被查理一世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双目”之一，1510年为西班牙占领。1530年，西班牙移交给教皇属下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十字军救护骑士团统治。1551年8月，土耳其乘当地居民不断掀起反抗之机，派海军将领西纳安帕夏率160艘战舰、12000多名士兵进攻黎波里。土耳其军队分海陆两路向黎波里发动进攻，8月18日攻占该城。不久，土耳其又征服了利比亚东部的卜雷加和南部费赞地区，把利比亚统称为“黎波里塔尼亚”。

1574年征服突尼斯后，土耳其把上述三地合并为一个“桑得亚克”（意为边区省）。但时间不长，1587年，土耳其又将其分成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黎波里塔尼亚三区，从而奠定了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三国的边界。土耳其也曾西侵摩洛哥，但遭到摩洛哥人的顽强抵抗，终未征服。这样，土耳其依靠巴巴罗萨海盗，经过近60年的征服战争，使摩洛哥以外的中马格里布和东马格里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

诚如前述，奥斯曼土耳其在马格里布确立宗主权仰赖于巴巴罗萨海盗，在与西班牙的争霸斗争中马格里布的海盗势力也不断发展壮大，16—17世纪时达到鼎盛，成为这一时期北非独特的历史现象。巴巴罗萨海盗遂成为这时北非海盗的总称。其主要活动范围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和黎波里等沿海城市。参加者主要是地中海北岸的贫苦渔民、土耳其苦役犯以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当地居民很少。他们一般打着圣战的旗号，劫掠基督教船只和岛屿，俘虏其船上人员或岛上居民作为奴隶出卖。海盗船只一般是私人装备的，且有帮会组织，得到政府的支持。海盗活动收入的10%上交政府，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海盗活动鼎盛时期，海盗船队在国内享有很大权力。比如在阿尔及利亚，海盗船队是仅次于土耳其近卫军的一支重要势力；在利比亚，

勒班陀（Lépano），今名纳夫帕克托斯（Návpaktos），位于希腊科林斯湾。

约翰·赖特：《利比亚》，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0页。

直属省称“帕夏”。

Mustagha Kraim, La Tunisie Précoloniale (《殖民地以前的突尼斯》), Tunis 1974, P.268.

则是国内主要武装力量。

历史上对北非海盗颇有争议。西方史学家把它描写得很黑暗,认为是“海上的灾难”,损害了地中海正常的贸易往来。事实上,当时的海盗活动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而他们同当时的欧洲海军也并没有本质区别。近代英国海军的前身就是海盗,英国人的势力就是依靠海盗进入地中海的。北非巴巴罗萨海盗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其活动反映了土耳其与欧洲列强特别是与西班牙争霸地中海这一事实。海盗的主要打击对象其实也是有选择的。如16世纪主要针对西班牙,而与法国互通友好,共同对付西班牙。法国最早在阿尔及尔设立领事(1564年),并在1628年与阿尔及利亚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正常的外交关系一直保持到1830年。马格里布海盗活动打击了欧洲在地中海的势力,动摇了西班牙的霸权地位,于16—17世纪称雄地中海。当时,他们在阿尔及尔一港就拥有50多艘战舰,在突尼斯也有30多艘,足见其势力之大。他们使地中海的欧洲船只闻风丧胆。一些国家为了保证商业运输安全,每年还向马格里布各国缴纳一定的贡金。直到18世纪末,美国每年还需向利比亚交纳83000美元。海盗活动还是促进当地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海盗活动收入甚丰,在1635年,的黎波里的船队就获利18万枚金币和400多名奴隶。许多城市,如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都因此而发展起来。

海盗活动一直到18世纪才衰落下去。随着欧洲的日益强盛和土耳其的逐渐衰弱,扑灭海盗活动也成为欧洲强国侵略北非的借口。

三、奥斯曼马格里布的政治演变

土耳其征服马格里布后,实行三区分治,1587年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改为三个摄政国,由土耳其任命的帕夏进行统治。三个摄政国在16—18世纪中政治演变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逐步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取得实际上的政治独立。

阿尔及利亚是土耳其最早征服的国家,1587年前由土耳其素丹委任的海盗首领贝勒贝伊进行统治。贝勒贝伊负责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务,共有八任,任期不定,土耳其素丹可随时调任。此时的阿尔及利亚基本上是军事贵族政体,土耳其近卫军及海盗舰队为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各项统治机构均不健全。

三区分治后,土耳其废贝勒贝伊一职,设帕夏,仍由土耳其任命,三年一任,由近卫军军官组成的国务会议(“迪万”,Divan)协助统治。17世纪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对行省控制的松弛,帕夏的权力逐渐削弱,土耳其近卫军则试图取而代之。1659年,近卫军推选自己的“阿加”(Agha)

Stahley Lane-Pode, *The Story of the Barbary Corsairs* (《柏柏尔人海盗的故事》), New York 1891; 希提:前引书,第852页。

夏尔-安德烈·朱烈安:前引书,第497页; Mustapha Kraim, *op.cit.*, P.268.

希提:前引书,第852页。

八任贝勒贝伊是赫尔丁(1518—1536)、阿加·哈桑(1536—1543)、帕夏哈桑(1544—1552)、萨拉赫(1552—1556)、哈桑·伊本·赫尔丁(1557—1562)、帕夏哈桑(1562—1567)、穆罕默德·伊本·萨拉赫(1567—1568)、乌勒杰·阿里(1568—1587)。

参加政事。自此，每一任新帕夏从伊斯坦布尔来上任时，先被待以盛大的欢迎仪式，随后冷落宫中。每当宣布重大决定时，必须首先尊重由近卫军组成的国务会议和阿加的意见，而且必须作如下的开场白：“我们，帕夏和阿尔及尔常胜军的国务会议。”帕夏的一些权利，诸如发放军饷、委任卡伊德、掌管本地人的诉讼权等均被剥夺，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而国务会议和阿加则掌握了实权。但他们之间争名于朝，斗争激烈，几乎无一任阿加是善始善终的。

17世纪下半叶，海盗势力在这种政权混乱局面中再度崛起，表现为“德伊”（*dey*）的设立。阿尔及利亚海盗集团与土耳其近卫军长期存在争夺权力的矛盾。1587年前，阿尔及利亚的贝勒贝伊均为海盗首领，对此土耳其近卫军十分不满，嫉妒海盗集团的权力和富有。土耳其在阿尔及利亚设国务会议后，海盗势力有所削弱并受到牵制。但由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时时觊觎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权。1671年，海盗集团利用国内混乱局面，推选自己的德伊作为总督。之后，海盗集团与近卫军达成妥协，规定德伊由海盗首领及近卫军军官任免。奥斯曼土耳其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从此不再派遣帕夏，承认德伊为帝国代表，1711年第十任德伊阿里·萨继什还被授与帕夏的称号。自此，德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无冕之王。

德伊的设立，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政权机构的确立和完善，军事贵族政体进一步确立。德伊为终身职，不世袭。其权力只在名义上受国务会议的限制，实际上是专制君主。下设司库、陆军、海军等五名大臣，由德伊任命。德伊深居简出，很少召集群臣议事，而是通过宫庭联络官发号施令。德伊把全国分为三大区，即东部省（君斯坦丁）、中部省（麦迪亚）和西部省（奥兰）。三省均由中央任命的“贝伊”（*bey*）统治。贝伊任期三年，每年向中央上缴一定的税款。各省之下设区（“乌塔纳”），各区包括若干个部落或村镇，由“卡伊德”治理。除此之外，阿尔及尔为德伊的私人领地，由德伊委派的阿加和四个卡伊德管理。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以德伊为首的军事贵族统治集团，其成份较为复杂，有土耳其近卫军官、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海盗首领以及当地阿拉伯柏柏尔人上层。他们依靠军事镇压来维持其统治，依靠海盗及横征暴敛来发财致富。但德伊的统治只在首府周围的城市较为巩固，占全国面积5/6的山区和沙漠则始终处于半独立的地位。当地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在宗教首领马拉布特的领导下，不断起来反抗，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土耳其在突尼斯的政体设置，基本上参照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由行政、军队和税收三部分组成。土耳其任命的帕夏为最高行政长官，土耳其近卫军组成的国务会议协助统治；税收则由海盗帮会和当地马赫曾部落负责，其官员称贝伊。土耳其旨在使这三种势力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使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但事与愿违，突尼斯同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在此后几个世纪中，逐步摆脱了土耳其的控制，其政权也完全突尼斯化。

16世纪末，三股势力失衡，先是近卫军左右了政局。1591年，近卫军中的下级军官不满权力分配，举行反抗，他们推选出自己的德伊参政。从此，帕夏仅仅只有象征性的意义。与此同时，贝伊的权力也在悄悄上升。由于贝伊掌握了财政及统领军队征税的大权，逐渐集全国权力于一身，成了土耳其

官吏中权倾朝野的人物。加之他注意同突尼斯当地上层结成联盟，使他在同德伊的斗争中积聚了相当的力量，能够同德伊分庭抗礼。1631年起，贝伊一职由穆拉德家族世袭，从而结束了贝伊由德伊任命的历史，标志贝伊成了突尼斯事实上的统治者。

但是，代表土耳其的迪万和德伊并不甘心权力的丧失，他们依靠土耳其近卫军，与贝伊争夺权力。自17世纪中叶起，双方的冲突时常表面化，但均以贝伊胜利而告终。其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673年。这年春天，迪万成员利用贝伊到内地远征之机，罢免了穆拉德二世贝伊挑选的德伊穆萨利，另外任命了亲土耳其贵族的哈吉·阿里·阿加为新德伊，并宣布穆拉德家族为叛教者，没收其家族财产。穆拉德二世得知后，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同迪万商谈未果后，遂于是年5月集合各部落军队，开进首府，战胜了土耳其近卫军，处死了新德伊。这次争端的胜利，使贝伊的权力达到顶峰。此后，须经贝伊同意方能任命新德伊。

贝伊和德伊的对抗持续了40年，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势力和当地势力的斗争。德伊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土耳其贵族，而穆拉德家族则更多地依靠当地人。穆拉德家族统治时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其家族统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征服突尼斯各土著部落。穆拉德之子哈穆达曾采取恩威并举的策略，使突尼斯当地的望族臣服于他，如首都突尼斯城附近的哈马家族、克夫地区的乌勒德·萨伊德家族。哈穆达每征服一地，都要安插自己家族的成员，或任命当地的显贵为卡伊德或谢赫。二是建立了一支土著部队，与近卫军相抗衡。贝伊从各部落招募“斯巴希·扎乌瓦”（意为步兵），这些士兵绝对忠于贝伊，安插在凯鲁万、克夫，比扎等重要城市，是奥贾克的前身。这支军队建立后，大大削弱了土耳其近卫军的作用。此外，穆拉德家族还规定政府官员须使用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在政府内部建立了薪金制度，设立户籍簿等。贝伊对德伊的最终胜利，使突尼斯政权进一步朝独立化发展，同时也为侯赛因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穆拉德二世后，突尼斯陷入了20年的内乱，他的儿子和兄弟为争夺贝伊的职位混战不休。这时阿尔及利亚伺机入侵，土耳其也试图重新加强统治。1702年，穆拉德家族被推翻。1705年，土耳其骑兵首领侯赛因·本·阿里利用突尼斯居民对近卫军的不满，击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入侵，夺取了政权，自立为贝伊。侯赛因·本·阿里取消了德伊这一封号，建立了侯赛因王朝。1710年，该王朝正式得到土耳其素丹的认可，突尼斯实际上已独立。它对土耳其名义上的从属地位表现为：贝伊承认素丹的宗主权，素丹则赋与贝伊家族以世袭权利；贝伊不得擅自宣战与媾和，一旦爆发圣战，突尼斯须向素丹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从1781年起，土耳其允诺突尼斯毋需继续纳贡，侯赛因王朝便开始执行独立的内外政策。

侯赛因王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贝伊独揽大权，是一国之君。下设首相、枢密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等，按贝伊颁布的法令和伊斯兰习惯法统治全国。贝伊和伊斯兰教长审理各大案件。中央以下划分为24个行政区，侯赛因王朝沿袭穆拉德家族的作法，每区由贝伊任命的卡伊德管理。卡伊德一般从皇亲国戚中选任或由当地显贵担任。他为该区军政首脑，并负责征税和审理一些小的民事纠纷，主管

侯赛因王朝一直到1957年才被推翻。

地方的一切事务。他之下分设谢赫和哈里发，负责部落或村镇的公共事务和纳税事宜。到 18 世纪阿里贝伊（1759—1782）统治时期，行政区有所增加，共有 64 个卡伊德。

土耳其在利比亚的政体设置与上述两区基本相同。1611 年，近卫军官苏莱曼·萨法尔受阿尔及利亚权力更替的影响，自封为德伊。18 世纪前，德伊一职基本上为海盗首领把持，形成了军事寡头集团，成为利比亚事实上的统治者。在 1672 年奥斯曼德伊去世后，利比亚政权陷于混乱，近卫军官和海盗首领为争夺德伊一职混战不休，政权更替频繁，从 1672 年到 1711 年 39 年间，共换了 24 个德伊。

18 世纪初，卡拉曼利家族在这种混乱局势中崛起。该家族原住在小亚细亚卡拉曼利地区，因此得名，以后迁至的黎波里定居。在奥斯曼统治时期，该家族成员占据了军队和政府要职。1711 年，艾哈迈德·卡拉曼利利用人民对“魔鬼之子”哈利勒德伊的普遍不满，依靠库鲁格利集团，起兵反叛。他占领的黎波里，推翻了哈利勒的统治，自立为德伊。

为巩固既得政权，卡拉曼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土耳其人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有一次他在家中大摆“鸿门宴”，捕杀了近 300 名土耳其近卫军军官。对不易驾驭的区，他派遣年富力强、又效忠于他的亲信去治理。为保证良好的国际环境，他还注意同欧洲领事搞好关系。他在位时，曾采取不少改革措施，如振兴经济、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引进外国工业设备、加强军事设施、发展文化教育等。卡拉曼利还完善了统治机构，中央设有内务大臣、财政大臣、司令官、大法官等职，地方分成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费赞三区进行管理。

卡拉曼利王朝存在了 120 年。1835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威胁利比亚时，土耳其才废黜卡拉曼利王朝，恢复直接统治。

四、十六至十八世纪奥斯曼马格里布三国的经济

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各国经济的发展都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土耳其入侵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三国的土地制度，除古代罗马统治过的地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带）存在个体（私人）土地所有制外，基本上是土地公有制占优势。土耳其统治三国后，加速了各种集体形式土地占有制的解体。但这种解体不是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内部因素引起，而是由土耳其的征服造成的。

在奥斯曼宗主权时代，土地名义上归土耳其素丹所有，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三国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村社集体所有，称“阿尔什”（Alch），是三国最广泛的土地占有形式。土耳其人按照自己的法律，通常把土地仍留在占有土地的阿拉伯—柏柏尔人部落手里，没有改变这种沿袭已久的土地制度。在阿尔什制度下，社员有世代使用权，但不可转让和买卖，土地实行轮耕制，并保持了定期分配的惯例。二是寺院地

Mustapha Kraim, op.Cit., P. 171.

约翰·赖特：《利比亚》，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144 页。

“库鲁格利”（Cologhli），土耳其近卫军与当地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通婚的后裔。他们身居政府要职，形成与旧式近卫军对抗的一支势力。

产,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称“哈布斯”(Habus),利比亚称“瓦克夫”(Wagf),一般由国家赐与或由信徒捐赠。寺院地产享有免税和其他特权,但不能买卖和转让。土耳其人的占领促使了寺院地产的发展。寺院地产的增加,一靠政府没收反叛者的土地;二靠私人占有者因税收负担沉重而把产权转交给寺院,不过产权转移的条件是他们继续享有终身、多半是世袭的土地使用权。三国的寺院地产占有相当的比重。突尼斯的沿海地区,寺院土地占40—50%。在利比亚,宗教势力很大,扎维亚的数量逐年增加,土地也相应增多。三是国家地产,这里有两种占有情况:一种是由德伊和贝伊领有。在阿尔及利亚,耕种德伊地的有两种佃户,一种叫“阿齐尔”,缴纳一定的货币地租;一种叫“托尼查”,缴纳实物税,负担役务。这两类佃户如果三年不耕种,土地即被收回,财产由当局转交第三者。第二种是属于土耳其近卫军贵族集团的土地,由国家分配,可以随时更换主人。一般土地肥沃,多在沿海和河谷。随着土耳其近卫军权力和地位的丧失,这些土地逐渐落到当地大封建主手中,成为私有土地。在突尼斯,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类私有土地称为“梅尔克”(melke)。梅尔克土地还因没收叛乱部落的土地而扩大。被没收的土地,大部分通过公开拍卖而落入私人手里。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的私人土地增加了150万公顷。

三国经济发展虽不平衡,但有其共同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呈带状分布。三国地理构造颇具特色,阿特拉斯山脉由西向东,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分割成沿海平原区、山区和南部草原区;利比亚则自然分成沿海平原区和沙漠地带。这种构造使三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呈现巨大的反差。在沿海地区,农业和商业都较发达,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平原和突尼斯萨赫勒地区,主要种植粮食和海枣、烟草、油橄榄树等经济作物。阿尔及利亚沿岸的采珠业十分兴盛。而在阿特拉斯山区和草原地区,则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发展落后,在沙漠地区更是一片荒凉。英国人约翰·奥格尔比1670年描写道,利比亚沙漠地带“十分荒芜,就是最优秀的农夫所培育的谷物也没有一种能在那里得到出产”。

这一时期,三国经济最有特色的是海盗商业。16—18世纪三国商业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但在16—17世纪中期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这与海盗活动密切相联。16世纪前,地中海贸易相当兴盛,但从土耳其占领伊斯坦布尔起,土耳其对欧洲实行封锁,从而影响了地中海与红海正常的贸易往来,海盗式的商业便应运而生。海盗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等沿海城市,尤以阿尔及尔贸易往来最频繁。欧洲商人出售纺织品、玻璃器皿、钢、铁、铝及其制成品、硫黄、沥青、装饰品和酒类等,马格里布则出售农产品,如粮食、羊毛、皮革、烟草、椰枣、蜡等。此外,奴隶也在贸易之列。阿尔及尔设有专门的奴隶集市,通常卖价最高的是男女青壮年和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水手、建筑师等。海盗商业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法国,同威尼斯人、英国人、荷兰人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海盗贸易的利润是可观

Mustapha Kraim, op.cit., vol. 1, p.251.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约翰·赖特:前引书,第141页。

的。例如，1635 年的黎波里船队获利达 18 万枚金币。海盗商业促进了三国沿海经济的发展。到 17 世纪中叶，阿尔及尔的居民超过 10 万人。一位英国旅行家对阿尔及尔的富裕繁荣赞赏不已，他写道：“在炎炎夏日，阿尔及尔周围的群山和谷地，全被上流名人幽居的花园和乡间别墅所装点。它们都是小巧的白色房子，掩映在各种果树和万年青丛之中。”突尼斯城也被称为“世界性城市”。商业的繁荣还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如阿尔及利亚的手工刺绣业、突尼斯的舍希亚帽的制作，均得到较大发展。宗教文化也相应繁荣起来，这一时期修建了大量清真寺和学校。

正如对北非海盗活动一样，欧洲史学家对海盗商业也颇多诘责。其实，欧洲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业也基本上是海盗商业，这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并未因海盗活动而中止。17 世纪中叶，欧洲商船只要交付一定数额的钱，便可买到在地中海的安全通行证。如在利比亚，每张通行证付 5 个意大利银币。可见，欧洲史学家的诘责并不公正。18 世纪，随着海盗活动的衰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三国的海盗商业也随之走向没落。

约翰·赖特：前引书，第 139 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145.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1800 年以来的非洲》), Cambridge 1974, p.6.

夏尔·安德烈·朱烈安：前引书，第 533 页。

舍希亚帽是一种圆筒形的红色土耳其毡帽。

第九章 摩洛哥的中兴和西苏丹的分裂

1591年摩洛哥打败桑海帝国的汤迪比战役，把16—18世纪的北非西部与西苏丹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这次战役从非洲外部条件来看，又与葡萄牙殖民者对非洲的侵略有关。第一，葡萄牙在侵占摩洛哥沿海的许多据点之后，企图建立大北非帝国，于1578年发动了“三王之战”。结果葡军大败，摩洛哥从此走向复兴。第二，殖民者在西非沿海掠夺黄金，分流了撒哈拉商道的黄金贸易，从而加剧了摩洛哥与桑海争夺黄金贸易的斗争。摩洛哥乘“三王之战”胜利余威，入侵西苏丹，灭桑海，古马里王国也在战败后瓦解，出现了西非历史上长达二百余年的政局动荡和小国林立的局面。

连年战乱使尼日尔河河曲地区一蹶不振，撒哈拉商道的重心向东转移；西苏丹内陆同沿海的商道网，因贩卖黑奴而形成。伊斯兰教随着曼迪商人的足迹，向热带森林地区扩展。18世纪下半叶，在富塔地区爆发了西非最早的伊斯兰圣战，建立了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三个伊斯兰教长国。

一、萨阿德王朝的建立和“三王之战”

在跨入16世纪之前，摩洛哥内忧外患，政局混乱，经济萧条，一片衰落景象。马林王朝（1248—1465）统治集团内部政变迭起，内战不已，到1420年已处于瓦塔斯族监护之下，1465年被取而代之。瓦塔斯王朝偏安非斯，反对其篡权的斗争遍及全国。政局的持续动荡使农业生产衰落，内外贸易停滞。除了雪茄烟以外，摩洛哥没有多少手工业品可供出口。

外部局势也极险恶。1415年葡萄牙侵占休达之后，西、葡等国不断侵入摩洛哥沿海地区。西班牙占领了摩洛哥北岸的梅利利亚和一些岛屿；葡萄牙据有休达、丹吉尔、阿尔西拉、阿泽穆尔、马扎甘、萨非、阿古兹和阿加迪尔等。葡萄牙殖民者利用这些据点骚扰沿海地区，干预内政，甚至梦想侵入内地，建立一个北非帝国。到16世纪初，已经占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土耳其人又从东面威胁着摩洛哥的独立。摩洛哥已处于西方殖民者和奥斯曼帝国的东西夹击之中。

瓦塔斯王朝没有改变马林王朝的政治方针。他们对殖民主义者妥协退让，割地求和。眼见国土沦丧、宗教感情受到凌辱的摩洛哥人民，在马拉布特领导下反对瓦塔斯王朝和殖民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各地。这一斗争最后汇集成为萨阿德人的强大运动。

萨阿德人自称是先知的后裔，12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到德腊河中游的绿洲。15世纪后半期，他们在苏斯平原建立扎维亚，举起了反侵略的圣战旗帜。1511年，他们夺回阿加迪尔之举受挫，转而先统一了摩洛哥南部，1525年占领马拉喀什，1541年收复阿加迪尔，迫使葡萄牙放弃了阿泽穆尔和萨

瓦塔斯又译瓦达西（Wattas），系马林人的一个支族。

现名贾迪达（Jaddida）。

马拉布特（Marabout）系伊斯兰教修行的圣者。

扎维亚（Zawaya），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性建筑，有清真寺，学校，有时也作为军事活动的据点。

非。穆罕默德·马赫迪利用萨阿德人反侵略斗争威望日高的有利形势，北上推翻瓦塔斯王朝，统一全国，1549年攻克梅克内斯，1550年攻克非斯。瓦塔斯末代国王阿布·哈松逃往阿尔及尔，勾结土耳其人，向非斯反扑。1553年10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向非斯推进。穆罕默德·马赫迪在塔扎附近与之遭遇，未经战斗即行撤退。1554年，奥斯曼军队进入非斯，阿布·哈松向奥斯曼素丹称臣。驻在非斯的土耳其军队骚扰居民，为所欲为，引起群众不满。四个月后，阿布·哈松以400米特卡耳黄金，换来了奥斯曼军队的撤退。穆罕默德·马赫迪乘机转入进攻，阿布·哈松被杀，他的军队溃散。1554年9月，穆罕默德·马赫迪重占非斯，瓦塔斯王朝寿终正寝，萨阿德王朝统一了全国。穆罕默德·马赫迪采用了哈里发的称号。为了远离土耳其人，他迁都马喀拉什，镇压了亲奥斯曼（过去亲瓦塔斯王朝）的马拉布特。

1557年10月，穆罕默德·马赫迪被土耳其的代理人谋杀。萨阿德王朝争夺王位的斗争立即开始，而土耳其和葡萄牙都乘机插手，企图实现各自侵占摩洛哥的目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加利卜·比拉继位后，他的三个兄弟阿卜德·穆明、阿卜德·马利克和艾哈迈德逃往特累姆森，投奔土耳其人。阿卜德·穆明被阿卜杜拉·加利卜的代理人谋杀，而阿卜德·马利克和艾哈迈德则远走伊斯坦布尔，得到奥斯曼素丹的庇护。1574年，阿卜杜拉·加利卜病死，其子穆塔瓦基勒继位。土耳其人认为，侵占整个马格里布、把摩洛哥变成其附庸的时机已经成熟，于1576年1月派军队从阿尔及尔出发，指定马利克为摩洛哥的统治者和素丹的封臣。穆塔瓦基勒的军队被打败，退往马拉喀什。3月，马利克进入非斯。马利克会说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了解世界局势。他回到非斯后，立即以丰厚的黄金馈赠土耳其人，使其撤出摩洛哥。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招募安德鲁西亚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参军，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模式训练和装备军队。被马利克军队追赶的穆塔瓦基勒则逃到了葡萄牙。

葡萄牙对失去摩洛哥沿海据点是不甘心的。塞巴斯蒂昂国王一心想重振殖民大业，建立大北非帝国。1574年，当摩洛哥政局不稳时，他亲自到休达和丹吉尔窥探虚实，回国后更热衷于十字军远征。他不听劝阻，决定亲征；在国内大力搜罗炮灰，并从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招募雇佣军。正在准备远征之时，穆塔瓦基勒向他求援。塞巴斯蒂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欣然同意。1578年，他率领2万余人，携带36尊大炮，在阿尔西拉登陆。他的对手马利克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策略，主动向内地撤退。缺乏战斗经验的塞巴斯蒂昂轻敌冒进，向克比尔堡推进，深入干燥的山区。炎热的天气、长期的行军消耗了葡军的战斗力。8月4日，马利克乘葡军疲惫不堪之际，用5万大军突然发起攻击。在克比尔堡，塞巴斯提昂、马利克和穆塔瓦基勒三支大军激战竟日。因此，历史上称克比尔会战为“三王之战”。战斗结果，相互争夺王位的两个摩洛哥国王都在战斗中死去（马利克系自然死亡），葡萄牙全军覆没，塞巴斯蒂昂淹死在马哈曾河里。在会战结束前，艾哈迈德率领一支军队投入战斗，夺得了“三王之战”的胜利果实，被拥立为摩洛哥素丹，称“曼苏尔”（al-Mansur，意为常胜）。

“三王之战”的影响是巨大的。

mithg l，又作 mitg l，1米特卡耳等于1/8盎斯。

另说10万人、3万人。

首先，葡萄牙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它失去了赖以东征西伐的军队，几百名贵族成了摩洛哥人的阶下囚。许多贵族家庭卖掉华丽的衣服、银制的餐具、耀眼的宝石，凑集一笔巨款，才把俘虏赎回。塞巴斯蒂昂死后无嗣，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不已。早就觊觎葡萄牙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以同葡萄牙王室有血缘关系为由，于1580年6月派2万大军开进里斯本，夺取了王位。菲力浦口头上要保持两个帝国的独立，实际上葡萄牙已成为西班牙的附庸。葡萄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权从此衰落了。

其次，“三王之战”对摩洛哥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次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葡萄牙对摩洛哥的威胁，也减轻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压力。曼苏尔在克比尔战役中掳获了大批欧式武器，从葡萄牙俘虏获得了大笔赎金，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曼苏尔在位（1578—1603）期间，出现了摩洛哥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繁荣景象。

二、曼苏尔的内外政策与汤迪比战役

曼苏尔有渊博的学识，被称为“哈里发中的学者，学者中的哈里发”，善于治理国事，深谙国际形势的来龙去脉，在扭转摩洛哥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中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他继承马利克重建强大军队的事业，采用土耳其人的军事组织，委托土耳其人训练由安德鲁西亚人、叛教者（基督教徒的俘虏或冒险家改信伊斯兰者）组成的自卫军。这是一支用欧洲的火器和大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他注意军事后勤，组建了负责供应、工程和通讯的部队。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辅助部队仍然使用传统武器。他依靠这支强大的部队制止了部落叛乱和马拉布特的骚动，从而保持了国内政局的长期相对稳定。

曼苏尔创造了一套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他设立“马赫曾”这一中央行政机构，受马赫曾管辖的地区称为“比拉德·马赫曾”，即政府管辖区。他指定自己的儿子担任各省的总督。被称为“比拉德·锡巴”的另一部分地区，是在理论上一度有自治权的素丹领土，实际上是独立的地区，其独立程度往往以中央政权是否强大为转移。这套行政制度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法国殖民统治确立之前。

在曼苏尔当政时，内外贸易发展起来。他打击和限制海盗活动，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商船，大量来到摩洛哥港口。摩洛哥出口雪茄、硝石，交换英国的棉布和武器，其中有优质的铸铁大炮。曼苏尔垄断硝石和雪茄的生产和贸易，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是，曼苏尔像历代的摩洛哥封建君主一样；他没有触动和变革早已存在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封建分裂的根由。他仿效历代君主，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巴迪宫，为此从欧洲请来技术专家，又从意大利进口花岗石。素丹宫廷的豪华和铺张，令欧洲国家的使节都为之咋舌。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葡萄牙的威胁已经解除，曼苏尔改善了同欧洲国家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派遣使节到马拉喀什发展贸易，甚至要求向这位豪富的统治者借款。1589年，他从西班牙人手中收回了阿尔西拉。1587年，奥斯曼在阿尔及尔废除了贝勒贝伊，代之以三年一任的帕夏统治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它们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这为摩洛哥缓解同奥斯曼的紧张关系创造了条件。

同桑海帝国的关系，在萨阿德王朝的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撒哈拉塔加扎盐场，一直延伸到图瓦特西南，接近摩洛哥边境。16世纪初桑海控制了盐场和摩洛哥到尼日尔河中游的撒哈拉商道，从食盐、黄金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由于当时欧洲对西非沿海的殖民，通过撒哈拉商道的黄金贸易量相对减少了。萨阿德王朝特别是曼苏尔当权以后，力图据有撒哈拉盐矿，控制黄金贸易，进而铸造成色更足的金杜卡特，以满足进口武器和欧洲工业品的需要。萨阿德王朝在占领马拉喀什以后，于1544年就要求桑海把塔加扎盐场转让给它。桑海国王阿斯吉亚·伊夏克一世回答说：“接受这类要求的伊夏克还未生下来。”1561年，摩洛哥军队进攻塔加扎盐场，抢劫图阿雷格人的驮盐商队，但被桑海军队赶走。当时因欧洲殖民者的威胁尚未解除，萨阿德王朝不能全力用兵于南方。“三王之战”胜利之后，曼苏尔更锐意经略南方，1578年用1000第纳乐从桑海手中获得了采盐一年的权利；1581年，他派军进攻塔加扎，破坏盐场，占领了图瓦特；次年，派使节到加奥，名为庆贺阿斯吉亚·哈吉（1582—1586）登基，实则搜集情报，探听虚实，准备发动战争。1584年，他派军占领塔加扎，却因摩洛哥军队不堪沙漠之苦和给养不济而撤离。1586年，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继位，曼苏尔再次蛮横提出要桑海割让盐场，承认摩洛哥的宗主权，又遭拒绝。外交手段失败以后，他召开了一次顾问会议，坚决主张进攻桑海。他对某些表示怀疑的顾问说：“苏丹比马格里布更富，占领它比驱逐土耳其人更有益，驱逐土耳其人费力很大，所得甚少。”尽管他也说过进攻桑海是为了使“所有伊斯兰力量归于一尊”，但经济利益的考虑显然更胜于宗教的虔诚。

曼苏尔任命朱达尔帕夏为远征军司令，1590年率军从马拉喀什出发。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在得悉摩洛哥入侵的情报后，没有及时派兵阻击，又对填塞撒哈拉沙漠中的水井、断绝敌军水源的措施犹豫不决。朱达尔得以迅速进军，于1591年2月底到达尼日尔河的卡拉巴拉。当摩洛哥军队向加奥进击时，伊夏克二世才急忙集合部队，在加奥北面50公里的汤迪比部署防御。3月13日，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迪比战役。

朱达尔的部队出发时有精兵4000名，其中有2500名使用欧式火枪的叛教者和安德鲁西亚人、1500名使用长矛的摩洛哥士兵，另有两倍于此的运输队伍。远征军约有一半死于沙漠途中，只有一半投入汤迪比战役。桑海军队由12500名骑兵和30000名步兵组成。显然，摩洛哥远征军的优势在技术，而桑海的优势在人数。桑海军队为保家卫国而战，熟悉地形，遇到挫折时可

Lansine kaba, Archers, Musketeers, and Mosquitoes: the Moroccan Invasion of the Sudan and the Songhay Resistance (1591—1612), (弓箭手, 火枪手和蚊子: 摩洛哥的侵略和桑海的抵抗),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2 (1981).

Lansine Kaba, op.cit..

J.F.Ade Ajayi & Michael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vol.1, New York 1972, p.443.

关于汤比战役的日期有两种记载:《苏丹史》(Tarikh es-Sudan)作4月12日,《费塔希史》(Tarikh al-Fattah)和其他摩洛哥与西班牙的原史资料均作3月。

此一数字,记述很不一致,本文依据《剑桥非洲史》第3卷第413—414页。

有各种估计数字,如10000、12500和18000骑兵,30000、80000和100000步兵。

以迂回到安全地带，后勤供应有保障。摩军远离家乡，水土不服，后勤供应线很长。但指挥桑海军队的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犹豫不决，且有内奸，即他的顾问阿尔发·布巴卡尔·本·兰巴尔。起初，摩洛哥军向桑海军发射火枪，伊夏克二世命令把 1000 头牛赶到两军之间，以图挡住摩洛哥军的火力，然而牛受惊回窜，踩死了许多人。两军还在激战之时，布巴卡尔劝伊夏克二世逃跑，但他和他的部将决心继续战斗。布巴卡尔再次干预，要伊夏克二世为死去的士兵对真主负责。国王被说服，同布巴卡尔一道骑马逃走。主帅突如其来的逃离，引起了一片混乱，导致全军溃散。摩洛哥人取得了汤迪比战役的胜利。

伊夏克二世逃回加奥，决定撤离首都，朱达尔的部队得以不发一枪地占领了该城。此时，伊夏克二世向朱达尔求和，表示承认摩洛哥素丹的宗主权，同意以 10 万金币和 1000 名奴隶换取摩军撤退。朱达尔同意向曼苏尔转达，并派信使回马拉喀什禀明。9 月，他自己率军进占廷巴克图，定该城为帕夏驻节地，接着又派一个军官接管杰内。杰内北面的马西纳是弗拉尼人居住区，它的统治者阿多哈马迪·阿明纳承认了摩洛哥的宗主权。

曼苏尔接到朱达尔的来信，十分恼怒，指责朱达尔滞延了对黄金产地的进攻，因为这是远征的主要目标。他拒绝了伊夏克二世求和的条款，将犹豫不决的朱达尔撤职，指派马哈茂德·本·扎冈为帕夏，指示他扑灭桑海的抵抗运动，“将其并入穆斯林共同体”。和平解决的道路被堵死，长达半个世纪的桑海人民抵抗运动开始了。

汤迪比战役对西非历史的影响甚大。随着摩洛哥占领桑海王国的核心地区，其分崩离析之势已成，原来许多依附于桑海的君侯国纷纷自立。桑海既无力驱逐摩洛哥，也无力羁縻各君侯国。至于摩洛哥人，在西苏丹各族人民看来，它是异族入侵者，不愿屈服于它的统治。摩洛哥人的政权是建立在异族征服基础上的军事专制政权，与西非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没有什么共性和连续性，也很难获得可靠的社会支柱。这样，西苏丹从加纳到马里再到桑海的大一统局面结束了。西苏丹成了摩洛哥人、桑海人、马林凯人、班巴拉人、弗拉尼人、图阿雷格人等争斗的舞台。

在摩洛哥入侵和随之而来的战乱中，西苏丹繁荣和富庶的廷巴克图、加奥和杰内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据传说，由于侵略者的狂暴，加奥在几天之内就变得空无人烟了。城市和农村灌溉系统的破坏，使整个萨赫勒地区无力抗拒 1637—1643 年的干旱，经历了一次大饥荒。萨迪写道：“摩洛哥军队到达苏丹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最受真主宠爱的富饶国家之一。到处都是片升平气象。……现在一切都变了：危险取代了安全，贫穷取代了富裕，动乱、灾难和暴行取代了宁静。在整个国土上，人们相互残杀……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和战争，使居民的生命和财富无一能够幸免。骚乱是普遍的，它到处蔓延，不断增强，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连接北非和西非的撒哈拉商道，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以其通道的是否安全为转移。摩洛哥入侵后的战乱使廷巴克图、加奥、杰内这些贸易中心衰败，降低和削弱了它们在撒哈拉商道中的作用。但是，萨赫勒地区不等于整个西非，也不等于整个西苏丹。撒哈拉商道贸易从尼日尔河曲地区向东西两侧转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4, p.154.

转引自罗伯特·罗伯特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212 页。

移，东边从豪萨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商道逐渐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西边一条从萨赫勒到桑桑丁的陆路取代了廷巴克图到杰内的水路。即使在廷巴克图和杰内，撒哈拉商道贸易也未全部丧失作用。例如，1635年在摩洛哥的英国商人向伦敦报告，他们使用骆驼商队把英国货送到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城市，换回了大量西非黄金。撒哈拉商道在17—18世纪继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但它的意义下降了。这不只是由于摩洛哥入侵后的战乱，也是欧洲殖民者侵入西非、开辟了可供选择的沿海商业城镇造成的。索林凯血统的各族商人特别是杜奥拉商人，把东西贸易（西非内陆到沿海）和南北贸易（撒哈拉商道）联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贸易网。

把摩洛哥入侵后西非的两个世纪描写为“伊斯兰教停滞和异教反动”的时代是不贴切的。汤迪比战役确实结束了西非大帝国和伊斯兰教结合的历史过程，退居登迪的“自由桑海”出现了脱离伊斯兰教而回到传统宗教的潮流，但是，应该说从17世纪起，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更为深入和扩展了。如果汤迪比战役之前信仰伊斯兰教还只限于城镇的商人和“乌拉玛”，那末在此之后伊斯兰教随着商人和“乌拉玛”离开城镇而传到农村，日益被小酋长、牧民甚至某些农民所接受。伊斯兰教和泛灵论的斗争几乎在日后兴起的许多西非国家中都能看到。从地域来讲，伊斯兰教的影响已波及到南部森林地带。

三、桑海的抵抗和灭亡

曼苏尔拒绝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的求和，表明摩洛哥要完全征服桑海。桑海人别无选择，只有坚决抵抗侵略。摩洛哥新任统帅马哈茂德立即向伊夏克二世的部队发动进攻，1591年10月14日在班巴再次打败桑海军。伊夏克二世退往萨伊地区，派出游击队袭击敌人，激励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在杰内和廷巴克图都爆发了反对侵略者的武装起义。

在廷巴克图，占领军要求居民提供木材建造独木舟，在市区拆毁民房，命令城市居民的上层每人派7—15名奴隶建筑城堡；向商人每月征收1200孙努粮食作为军饷。摩洛哥占领军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他们在卡迪奥马尔·马哈茂德·阿基特领导下，对占领军采取了不服从、不合作的政策。1591年10月，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派原廷巴克图总督潜回城里，点燃了反抗的火焰。起义者杀死27名摩洛哥士兵，把摩洛哥的卡伊德围困在城堡里，直到12月马哈茂德从前线调回精锐部队，被困者才得以解围。但廷巴克图的骚动并未停止，它一直持续到1592年10月。1593年，马哈茂德从前线返回廷巴克图，大施淫威，逮捕70名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卡迪奥马尔和卓越的学者阿赫默德·巴巴。他们被带上手镣脚铐，投进监牢，而后又被押往马拉喀什。卡迪奥马尔老死狱中。阿赫默德·巴巴于1596年获释后在马拉喀什讲学，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被流放20年之后，始准返回故乡。他一生著述甚丰，据说有700多种，可惜大多已经散失。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收藏家，藏书1600余种。为纪念这位西苏丹的著名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廷巴克图建立了阿赫默德·巴巴中心，搜集和研究他的著作。

Basil Davidson,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1000-1800* (《西非史, 1000—1800》), Longman 1970, p.261.

J-S-Trimingham,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伊斯兰教在西非》), London 1962, p.141.

孙努 (sunnu) 是个大皮袋子，每袋约装 150—180 磅。

在杰内，桑海王子的到来受到下层群众的热烈拥护，杰内重新宣布效忠于阿斯吉亚。摩洛哥赶紧派来 300 名火枪手组成的部队，镇压了起义；还派一个哈基姆作为帕夏在杰内的代表，监督杰内韦尔统治杰内，并派一支军队驻扎该镇及其附近地区。

在原桑海帝国的藩居地区弗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也发动了武装起义。图阿格雷人向具有战略意义的拉斯—马进攻，威胁廷巴克图。摩洛哥派出 3500 名火枪手，才阻止了图阿雷格骑兵的进攻。

然而，桑海宫廷没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当时伊夏克二世准备对马哈茂德发动反攻，却因内部争权而流产。桑海军队拥戴穆罕默德·加奥为阿斯吉亚，伊夏克二世逊位逃亡，1592 年 4 月被杀害于图菲纳。加奥登基，再次向摩洛哥人求和。马哈茂德答应保持加奥的安全，他遂带着 63 名随员去摩洛哥军营会见马哈茂德。但马哈茂德背弃诺言，逮捕并杀害了加奥。他的弟弟努哈被军队拥立为阿斯吉亚，退往登迪地区，继续抵抗侵略者，封锁了摩洛哥人通往产金地的道路。在争夺王位中失败的苏莱曼王子则投向摩洛哥人，被马哈茂德指定为阿斯吉亚。从此，桑海正式分裂。以登迪为中心的南桑海，是独立的桑海。又称“自由”桑海。以苏莱曼为傀儡的北桑海，是摩洛哥人的占领区。

努哈一改伊夏克二世和穆罕默德·加奥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他放弃求和，采取坚决抗战的政策；放弃与敌军作阵地战，改用游击战。库吉亚和蒂拉贝里以南的登迪地区，本是古桑海的中心。在这里，阿斯吉亚王朝同 1492 年被推翻的桑尼王朝的后裔和解，共同抗击侵略者，赋予抵抗斗争以民族运动的特征。迪登地区潮湿闷热，林木葱茏，萃萃蝇肆虐，便于桑海人进行游击战，他们经常在森林中神出鬼没伏击侵略军。相反，摩洛哥人不适应登迪的自然条件，在桑海人的打击下，人员和马匹死亡日众，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泥潭。1593 年，马哈茂德不得不放弃绥靖计划，把在科伦的前进基地交给自己的部下，只身回到廷巴克图。1594 年，摩洛哥军队撤离被围困的科伦。1595 年，马哈茂德在同忠于努哈的洪博里人的战斗中被杀死，他的头颅被送给阿斯吉亚·努哈，吊在克比的市场示众。同年 6 月在洪博里，摩洛哥军打败阿斯吉亚·努哈的军队。努哈被迫向南退却，继续不停地骚扰和打击敌人。他坚持了七年的游击战，使摩洛哥军队精疲力竭，成功地挫败了摩洛哥占领整个桑海的图谋。

努哈的继承者继续沿用游击战术，打击进犯的摩洛哥军队。1608 年阿斯吉亚·哈龙率军从登迪出发，过洪博里，奇袭马西纳对岸的村镇；次年推进到杰内附近，大败摩洛哥人，带着战利品主动撤回登迪。阿斯吉亚·达乌德执政期间（1617—1639 年），双方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并于 1630 年缔和。1639 年，得到廷巴克图帕夏支持的伊斯梅尔回到登迪，废黜了达乌德。因伊斯梅尔不甘心受制于廷巴克图帕夏，战争再起。桑海首都卢拉米被占领，但在决战中摩洛哥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对登迪的进攻。据口头传说，指挥这次战役的法里—蒙宗（伊斯梅尔之子）率领一部分桑海人撤退，长达半个世纪的抵抗运动就此结束。桑海人定居于科科罗至达戈耳一带，分裂成众多的小邦：科科罗、达戈耳、科尔马、阿约罗、果鲁奥耳、纳马罗、泰拉等

等，他们被称为“自由桑海的继承者”。桑海帝国完全分崩离析了。

四、阿尔马人政权和图阿雷格人的南侵

摩洛哥侵略军在绥靖桑海时，侵占的领土范围虽时有变化，但有效控制范围只限于南至杰内、东到加奥、西达马西纳的地区。萨阿德王朝设廷巴克图总督区治理该地。帕夏既是军队司令，也是行政首脑（总督）；另设阿明管理金库，直接对素丹负责，帕夏不准插手金库事务。素丹企图通过帕夏和阿明互相牵制，保持对廷巴克图总督区的牢固控制。例如，1595年阿明向素丹奏报帕夏侵占应归素丹的黄金，结果这位帕夏被处死，从马拉喀什派来一位新帕夏接替了他的职务。

在各地，摩洛哥人实行间接统治。在加奥有一个傀儡阿斯吉亚，在杰内指定当地的贵族担任杰内韦尔，在马西纳仍由弗拉尼人的阿多治理。但在各地大都驻扎摩洛哥军队，由卡伊德指挥。在杰内还派驻了一个哈基姆作为帕夏的代表，监督杰内韦尔。这种间接统治，是掩盖侵略者军事政权的工具。当地的统治者如稍有异动，立即遭到残酷的军事镇压。例如，1598年马西纳阿多拒绝应召前往廷巴克图，帕夏便对马西纳进行讨伐。为了避免同摩洛哥军队的正面冲突，阿多哈马迪·阿明纳撤到了迪亚拉。摩洛哥侵略军大肆杀戮、逮捕和监禁哈马迪·阿明纳的家属，并指定一个新阿多作傀儡。1599年4月，哈马迪·阿明纳联合马里王国攻打杰内，被摩洛哥军队打败，但追击弗拉尼人和马林凯人的一支侵略军被歼灭。最后双方讲和，摩洛哥人释放哈马迪·阿明纳的家属，哈马迪·阿明纳承认摩洛哥的宗主权，交纳牲畜税。1609年阿多说：“我是一个牧主，谁统治这块地方，我就是谁的仆人。”

摩洛哥对廷巴克图总督区的统治是不稳固的。远离家乡的摩洛哥侵略军，面对西苏丹的频繁战斗、大量的伤亡和艰苦的环境，厌战和不满情绪滋生蔓延。各地的军事长官（“卡伊德”）恃权坐大，不服帕夏的节制。1612年，阿里·特宁萨尼卡伊德废黜帕夏，自任该职。由此开创了一个先例，帕夏不再由马拉喀什派任，而由驻苏丹的军队选举，但阿明仍由素丹任命。1631年，阿明由帕夏直接指定，阿明不再扮演牵制帕夏的角色。1638年，阿明被军队选为帕夏，阿明与帕夏两职合一，摩洛哥丧失了对廷巴克图的一切世俗权力。1660年，帕夏不再以素丹的名义发布诏令。历史学家把这一件事视为廷巴克图与摩洛哥的最后分离。日后的统治政权被称为阿尔马人政权。

阿尔马人是留在苏丹的摩洛哥军人及其后裔。根据官方的登记册，16世纪最后10年，有23000名军人被派往苏丹，而只有500人回到摩洛哥。这些摩洛哥军人与当地妇女通婚，其后代则继承他们在军队里的职务。当1660年与摩洛哥分离以后，阿尔马人便演变成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没有改变原有的桑海时代的生产方式，而是代替旧日的贵族，占据了政治和军事要职，剥削和压迫当地黑人。1660—1750年，有86名帕夏任职，其中2位四次任职，8位统治过三次，16位两次当选。帕夏的频繁更替表明，阿尔马人的政权不稳。在这86位帕夏中，有18位是前帕夏的儿子，13个是前帕夏的孙子，

Fim Fugelstad, *A History of Niger (1850-1960)* (《尼日尔史》), Cambridge 1983, P.3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 164.

Arma系阿拉伯语Ruma(又作Rumat)的讹传,意为火枪手,故又称鲁马人。

这表明一个混血种人的世袭贵族已经形成。

这个军事贵族统治集团对城市商人和农村农牧民大肆搜刮。每当新帕夏即位，都要向商人们摊派捐款，分给拥戴他的将士。有一位帕夏在职三年，就搜刮了 12000 米特卡耳的黄金。摩洛哥入侵后，马西纳、杰内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破坏，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自然灾害降临时，更是百业凋零，饿殍遍野。即使是饥荒年代，阿尔马贵族也毫不犹豫地压榨老百姓。

阿尔马人政权不仅因其内部的争斗加剧而削弱，更由于遭到北方图阿雷格人和南方班巴拉人的攻击而趋于衰落。

在阿尔马人政权脱离摩洛哥前后，已经受到图阿雷格人的严重威胁。居住在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因其绿洲的有限资源而不断南迁至萨赫勒农业区。萨赫勒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央政权时，就能有效地阻止他们南徙；而一旦这个中央政权瓦解，他们南迁的速度就加快。马里曾迫使图阿雷格人纳贡。马里衰落以后，图阿雷格人的一部曾迁至廷巴克图附近。桑海强大时，它的统治远及塔加扎。阿尔马人政权却无力阻止图阿雷格人的南侵。

图阿雷格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有严格的阶级划分。社会上的最上层是贵族，他们是骆驼主和武士。贵族之下是附庸。附庸必须向贵族纳贡，贵族负责保护附庸。贵族和附庸都拥有奴隶。奴隶处于社会的底层。奴隶可分为两类，即家内奴隶和户外奴隶，后者的地位高于前者。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苏丹地区贩来的黑人，他们从事笨重的粗活。图阿雷格人分裂成许多相互敌对的部落。贵族部落的首长在战时是军事领袖，在平时是审判者，并可对附庸部落行使权力。除了畜牧业以外，贸易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他们用撒哈拉出产的盐交换苏丹的农产品，并向通过撒哈拉的商队征收通行税。

1654 年，居住在阿德拉尔山岳地带的伊福拉人因内部争执而分为两股：艾维利明登人和塔德米基特人。后者被迫离开阿德拉尔山区，迁徙到尼日尔河右岸，得到阿尔马人的允许，定居于此。位于加奥和班巴拉之间的摩洛哥堡垒成了艾维利明登人掠夺性袭击的目标。他们每次掠夺之后，都能迅速地退回阿德拉尔山区。阿尔马人则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周期性的讨伐。到 1680 年，艾维利明登人终于夺取了加奥，占领该地达八年之久。18 世纪初，阿尔马军事贵族的内讧加剧，争权各派引狼入室，为图阿雷格人的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1716 年，当一个卡伊德起来反对帕夏时，塔德米基特人第一次被请进廷巴克图。此后，图阿雷格人常常不请自来，抢劫廷巴克图及其周围地区。1736 年，他们截断了廷巴克图通往苏丹各地的卡巴拉渡口。1737 年，他们抢劫了一支商队，当阿尔马人部队赶到时，他们已消失在茫茫沙海中。不久，塔德米基特人酋长阿格—莫鲁猛攻阿尔马人军队，两三千阿尔马人和众多的同盟者被杀，迫使廷巴克里的商人和乌拉玛与之缔和，向其纳税。1737 年的胜利，使图阿雷格人成了从豪萨到古尔马 (Gurma, 即尼日尔河两岸) 整个塔克鲁尔地区的主人，他们结束了阿尔马人的统治，甚至迫使其纳贡。

1770—1771 年，塔德米基特人因其酋长被谋杀，攻击并包围了廷巴克图，以示报复。与此同时，艾维利明登人向帕夏统治区扩张，于 1770 年永久

—译“奴仆”。

Iwillimiden, 又作 Aulimadan 或 Wullimiden.

Tadmekket, 又作 Tadmakka 或 Tadmeka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169.

性地定居在加奥。1787年艾维利明登人军队开进廷巴克图，废除了帕夏，推翻了阿尔马人政权。

阿尔马人的政权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政权，它是摩洛哥侵略苏丹的产物。阿尔马人虽然在一个多世纪中已经完全黑人化了，但其政权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柱。在苏丹各族人民的反抗和图阿雷格人打击下，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五、班巴拉人国家的兴起

在桑海和摩洛哥军队对峙的半个世纪中，原来受制于桑海的苏丹各族纷纷崛起，建立各式各样国家，班巴拉人的塞古王国和卡尔塔王国就是其中两个较重要者。

班巴拉人居住在尼日尔河和巴尼河之间的卡拉和宾杜古，这是昔日马里帝国的两个省。统治者信伊斯兰教，班巴拉人自称班马纳人，不信伊斯兰教，崇拜精灵。桑海强盛时，两省常受桑海的侵犯，成为桑海与日趋衰落的马里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摩洛哥入侵桑海后，班巴拉人也加入了反抗摩洛哥人的行列，进攻杰内地区。

1645年，班巴拉人起来反抗卡拉和宾杜古的统治者，瓦解了马里王国的地方政权，库利巴利家族两兄弟脱颖而出。巴拉马·恩哥洛在塞古地区落户，尼亚·恩哥洛在贝勒杜古定居。这就是关于塞古和卡尔塔王国起源的传说。巴拉马·恩哥洛的后代卡拉迪安·库利巴利是个武士和猎手，精力旺盛，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率军攻打廷巴克图，当后者答应纳贡以后方才撤回。这个国家昙花一现，很快解体。直到他的长孙比汤·库利巴利执政（1712—1755年）时，才奠定了强大的塞古国家的基础。

班巴拉人的国家是以军事组织“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汤原为同龄人的团体，它超越家族和等级界线，吸收所有行过割礼的同龄男子参加。在其首领汤—蒂吉领导下，保卫村社，参加作战。比汤·库利巴利意识到需要一个同族的、结合更紧密的汤。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班巴拉人的汤，兼并了邻近的村社。汤由原先为村社服务的军事组织变成了村社的支配者和统治者，被兼并的村社的年轻人，编入他的军队，称“汤—迪昂”。比汤·库利巴利的权力扩张威胁到该地区各族酋长的地位，于是，他们请求孔城国家的援助。1739年，孔城的军队直逼塞古，但被击败，次年又战胜索林凯人。比汤·库利巴利在改革班巴拉人的传统社会时，得到了城市穆斯林商人和乌拉玛的支持，并取了一个穆斯林的名字马马里·库利巴利。

但是，同出一源的两个班巴拉国家却不能和平相处。在1753—1754年间，比汤向卡尔塔的马萨西发动进攻，把他们从贝勒杜古赶到了卡尔塔地区。马萨西家族据此向邻近地区扩张，奠定了卡尔塔王国的基础。

到18世纪中叶，塞古王国和卡尔塔王国不但在地域上已经稳定下来，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也已定形。

班巴拉人国家的基层组织是村社，叫“杜古”。杜古由几个血缘纽带相

Kulibali，又作 Koulubali，译为库卢巴利。

马马里（Mamari），是穆罕默德（Mohammed）在土语中的音转。

因苏恩萨·库利巴利（Sounsa Kulibali）与马里的凯塔王族的公主联姻而得名，意即“王族”。

连的家族组成。在村社之上是更大的地域单位，叫“卡弗”。居住在班巴拉人国家内的曼迪商人、弗拉尼人也组织在村社之内。

班巴拉人社会明显地分为几个等级。自由人是社会中最高的等级。自由人又可分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之中最显贵的当然是库利巴利和马萨西家族，他们担任国家的军政职务。平民每周要为村社劳动五天，为自己劳动两天。如他们自己不劳动，可以派儿子和奴隶去代替。最贫困的自由人，其劳动和生活的艰苦几乎与奴隶差不多。

另一个等级叫“尼亚马—卡—拉”，包括有技术的金匠（某种炼丹术）、陶器工（妇女）、皮匠、木雕工、猎人。其地位较高者是博佐和索莫诺渔民、卖宗教书刊的小贩，其地位较低者是迪利或者佣人。这个等级要担负贡纳。在战争中被俘通常被归入平民一类，允许他们从事自己专长的职业。

第三个等级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由于出身、欠债和犯罪等原因都可以沦为奴隶，但奴隶的多数来自战俘。村社有责任赎回已沦为奴隶的成员，一旦得到解放可以重新加入村社，成为自由人。在班巴拉人国家中，奴隶是一个人口不断增加的阶层，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被编入军队，一部分被卖给塞内冈比亚商站中的欧洲奴隶贩子。

被征服的地区交纳称为“迪—松戈”的贡赋。传说迪—松戈起源于汤的成员呈献给比汤—库利巴利母亲的贡品，以报答她常常替他们准备米酒。据蒙哥·帕克记载：马西纳人交纳“每年一次的贡赋给班巴拉国王，因为他们占用了土地”。

1755年，比汤·库利巴利去世，由其子巴卡里继位。巴卡里曾去杰内学过古兰经，成了穆斯林，这引起坚持传统主义的酋长们的恐惧。他们起来造反，推翻了他的统治，废除了世袭君主制度，恢复了奴隶主军事民主制，库利巴利家族全被杀害。比汤的将军们选举一人任汤—蒂吉，当选者必须按契约宣誓，如违背契约即遭废黜。1757—1765年中，有三任汤—蒂吉均被废黜。统治者的频繁更替，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削弱了塞古王国。直到1766年恩哥洛·迪亚拉继位，才扭转了这一混乱的局势。

恩哥洛·迪亚拉是比汤·库利巴利的一名奴隶，因作战勇敢而升任将军，并善于治理。他也学过古兰经，但没有成为穆斯林。当人们选他为汤·蒂吉时，他拒绝戴上王冠。他通过一场内战，迫使其他的汤—蒂昂向他宣誓效忠。他恢复了世袭君主制，规定由其子继承王位，建立了迪亚拉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恩哥洛·迪亚拉废除了疑为不忠的酋长，指派其子任省督，创建了私人卫队。他允许穆斯林商人保持自治，保证他们的经商安全。他重新向外扩张，夺回许多失去的领土，占领杰内、马西纳等地。

1790年，恩哥洛·迪亚拉死于远征莫西人的战争中，其子曼松继位。曼松在位时（1790—1808年），塞古王国达于鼎盛，其疆域北达廷巴克图，东至杰内，西达邦杜。首都塞古约有三万居民，其繁荣和规模都给蒙哥·帕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班巴拉人首都塞古...由四个紧密相连的镇组成——两个在尼日尔河北岸，叫塞古·西科罗和塞古·布；两个在尼日尔河南岸，叫塞古·索科罗和塞古·西·科罗，它们均由高大的泥墙环绕。”

Nyama-Ka-La 意即属于同一等级的人。

Mungo Park's Travels in Africa 《蒙哥·帕克非洲之行》，Edinburgh 1885，p. 169.

Mansong，又作 Mokoro Mpnzon（马库鲁·蒙宗）。

这个广阔城市的风景——河上众多的独木舟——拥挤的人群和周围农村的耕作情形——交相辉映，形成一幅文明壮丽的景色，这是我在非洲内陆难以发现的。”距塞古不远的尼日尔河港口桑桑丁，是取代昔日廷巴克图和杰内地位的重要商业城镇。北边来的摩尔商人贩来食盐、烟草和其他摩洛哥产品，交换黄金、奴隶和土布。当地商人同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的欧洲殖民者的代理商进行奴隶贸易，购买南边布雷地区的黄金。据认为，曼松在位时期，是穆斯林商人特别是桑桑丁商人们的“黄金时代”。

曼松在位期间，塞古王国同卡尔塔王国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

卡尔塔王国北迁以后，通过同迪亚瓦拉、卡索等国的战争，扩大了北部和西部的版图。卡尔塔统治者把所侵占的村庄居民沦为奴隶，将年轻人编入军队。达塞·库利巴利（约 1788—1802 在位）自认为力量已经强大，足以对塞古报一箭之仇，况且马萨西家族认为恩哥洛·迪亚拉是卡利库利家族的奴隶，是篡权者。大约 1788 年，他们插手恩哥洛·迪亚拉诸子间争夺王位的内战，1792 年袭击尼日尔河上的尼亚米纳镇。四年后蒙哥·帕克访问该镇时，当地还未恢复昔日的繁荣，近一半地区除了一堆废墟之外荡然无存。曼松击败了卡尔塔的进攻，1796 年把战争推进到卡尔塔王国境内。是年 2 月，曼松进逼卡尔塔王国首都盖穆，达塞·库利巴利撤退到设防的格丁古马。曼松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派小部队到农村掠夺粮草。4 月，因粮草耗尽，曼松退回塞古。达塞·卡利库利决定重振国威，对在危难时刻起而反对他的迪亚瓦拉和卡索进行报复性远征，所有的俘虏不是被处死就是沦为奴隶，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

经历这次战争之后，塞古王国和卡尔塔王国都开始走向衰落。

六、阿拉维王朝的建立

萨阿德王朝入侵苏丹，对摩洛哥本身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占领的初期，摩洛哥人确实从苏丹掠夺到了大量黄金。例如居住在马拉喀什的英国商人 1594 年亲眼见到 30 匹满载黄金的骡子从苏丹回来。摩洛哥史学家伊弗拉尼写道：“随着苏丹诸王国的征服，穆莱·艾哈迈德得到了那么多金子，足使妒忌者发疯，目睹者惊呆。因此，从那时起，曼苏尔给官员们的俸禄全是成色十足的金第纳尔。在他的宫廷门口，1700 名工匠日夜赶铸金第纳尔。……数不清的黄金使他赢得了‘金索丹’的称号”。第纳尔在欧洲市场也很坚挺，许多欧洲国家转而向摩洛哥借款。但是，由于苏丹各族人民的抵抗，曼苏尔想要占领黄金产地的企图并未实现。在动乱年代，通过杰内—廷巴克里流入摩洛哥的黄金日趋减少。苏丹并不是摩洛哥取之不竭的聚宝盆，相反，侵入苏丹使摩洛哥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同桑海和苏丹各族人民的连年战争，需要不断派军增援，大批精锐的部队葬身于沙漠和尼日尔河两岸。穆莱·泽丹（1603—1628 年在位）曾抱怨占领苏丹使 23000 名摩洛哥士兵丧生。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削弱了曼苏尔对国内的控制。年迈的曼苏尔一死，他的儿子们便展开了激烈的阉墙之争。结果，摩洛哥再次分裂。

Mongo Park s , op.cit , pp.153-154.

Mongo Park s , op.cit., p.18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vol.4 , pp.150-151.

穆罕默德·谢赫·马蒙在非斯被拥立为王；穆莱·泽丹在马拉喀什被立为素丹。当萨阿德王朝成员互相残杀之时，群雄蜂起，内战的火焰再次燃遍摩洛哥大地。

在众多的起义和封建割据势力之中，阿拉维人异军突起。他们10世纪初定居于塔菲拉勒绿洲，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斗争。在穆莱·穆罕默德的领导下，他们从塔菲拉勒赶走了迪拉人，1640年把土耳其人赶出了乌季达。

阿拉维王朝的真正奠基人是穆莱·雷席德。1664年，他在安加德平原战役中打败了自己的兄弟穆莱·穆罕默德；接着远征里夫，1664年进入非斯，被立为素丹。他同伊斯兰教正统派的代表结盟，反对分裂割据的地方宗教首领马拉布特，开始重新统一摩洛哥。1668年，他打败了迪拉人马拉布特的军队；1669年占领马拉喀什，大杀横行于此的舍班人；1670年占领伊利赫要塞，摧毁了苏斯的马拉布特的力量。

穆莱·伊斯梅尔（1672—1727）继其兄雷席德为素丹。他即位之初，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在塔菲拉勒有他的兄弟穆莱·哈兰，在马拉喀什和苏斯一带有他的侄子艾哈迈德·马赫拉兹，在西北地区有海盗加伊兰起兵反叛，企图夺取王位。伊斯梅尔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为了保证阿拉维王朝的长治久安，抗击外来侵略，伊斯梅尔着手精心组织一支独特的黑人军队，作为摩洛哥的主要武装力量。他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黑人集中起来。从原有黑奴的主人手中赎身，使之成为素丹的奴隶。这些黑人与当地政治派别没有血缘关系。为了使黑奴忠于素丹，要求他们向《布哈里圣训实录》起誓，因而名为“阿比德·布哈里”，意即布哈里的奴仆。起初，阿比德集中住在迈什拉·赖木勒。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军队之子”，10岁时被送往梅克内斯。男孩受五年一期的军训，学习手艺、骑术、使用长矛、火枪。女孩学习做家务，有些俊俏者还学音乐。到15岁时，男孩被分配到各团队当兵，女的则成为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婚姻要登记，所生子女到10岁时又被送到梅克内斯受训，如此嗣续不断。补充阿比德的另一个来源，是从廷巴克图帕夏区征募黑人，或者远征撒哈拉俘获黑人。例如1678年远征欣吉特就带回了2000名黑奴。到伊斯梅尔统治的末期，这支军队共达150000人，其中70000人住在迈什拉·赖木勒，25000人住在梅克内斯，其余分住全国各地城堡。由于阿比德多次参加作战，忠于素丹，1697—1698年被准许获得土地所有权，实行“军垦”。

以阿比德代替马拉布特和部落封建主的军队，保证了伊斯梅尔统治时摩洛哥较长期的稳定政局，有利于农工商业的发展。当时萨累和得土安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羊皮都在沿海城市加工后出口。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犹太商人把各种棉纱、布、绸、绒、杂货、铜、钢和武器输入摩洛哥。素丹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10%的关税，蜂蜡则抽25%。非斯是内地的货物集散地，梅克内斯是谷物、皮革和蜂蜡的主要交易市场，塔菲拉勒地区用金沙、靛青、羽毛、枣子、象牙交换自己所需要的货物。

伊斯梅尔也像其他封建君主一样，大兴土木，建造梅克内斯王城。他征发2000名基督教徒、30000名罪犯和俘虏以及各部落的服役者，修建了长达25公里的围墙、卡比拉宫和两座清真寺。卡比拉王宫由20个亭榭楼阁组成。

后来又建造了几座花园和一组宫殿。

阿拉维王朝基本继承了萨阿德王朝的外交政策。伊斯梅尔重新推行收复失地运动，1681年攻克了西班牙人占领的马穆拉，1684年从英国手中收回了丹吉尔，1689年攻克拉赖什，1691年夺回了阿尔西拉。除了葡萄牙占领的马扎甘以外，大西洋沿岸欧洲殖民者的据点已全部肃清。但是，伊斯梅尔抗击土耳其的三次战争均告败北。

伊斯梅尔也像曼苏尔一样，不断向撒哈拉和苏丹扩张。伊斯梅尔扩张的目的，除了保证撒哈拉的黄金商道安全之外，更注重保障黑奴的来源，也就是保障他所建立的阿比德·哈布里的兵源。在伊斯梅尔继位前一年，即1671年，廷巴克图帕夏的军队宣誓效忠于穆莱·雷席德。廷巴克里的阿尔马人政权虽然已经独立，但依旧为摩洛哥素丹统治的隆盛而祈祷。为了保证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和黑奴的供应，伊斯梅尔常常袭击撒哈拉的部落。但伊斯梅尔对苏丹的侵略却不是沿着曼苏尔的老路，而是在18世纪初对塞内加尔河进行远征。

七、从马里灭亡到摩洛哥远征塞内加尔河流域

到15世纪末，显赫苏丹的马里帝国已经殒落，逐步降为偏安南部的一个曼迪人王国。它的中心在尼日尔河上游巴马科以南地区，这里是忠于马里王室的马林凯人聚集区。位于尼日尔河和巴尼河之间的卡拉和宾杜古两省，是它与桑海帝国的缓冲地带，起着拱卫马里中心区的作用。它把主要精力用于向南扩张，在冈比亚河和里奥格兰德河之间建立了一个附庸国体系，即著名的卡布。这个地区是海盐和黄金产地，它通过此地发展同大西洋沿岸的贸易，以开辟新的经济来源，弥补失去尼日尔河湾商业中心的损失。马林凯族商人、农民和武士三位一体地向南扩张。据说卡布王国的建立者是桑迪亚塔的一个将军提拉马汗。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家族的起源都追溯到提拉马汗，甚至位于冈比亚河北岸的谢列尔王室也称自己的血统来自卡布王国的武士。卡布的统治者在西部代表马里政权，众多的有相当自治权的马林凯酋长国臣属于他。因此，当葡萄牙殖民者沿冈比亚河、卡萨芒斯河、里奥格兰德河上溯时，都遇见了马里政权的代表。

阿拉伯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在《非洲记行》一书中写道：马里仍然是一个富庶的王国，那里居民殷实，商品丰富，有大量的寺院、教士和教师，首都居住着约6000人，但马里并不安宁，在桑海的不断攻击之下，处境虚弱。确实，16世纪头10年西苏丹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桑海帝国对马里的不断进攻。此后，由于桑海帝国内部危机迭出，马里得到了30年的喘息机会。1540年代，阿斯吉亚伊夏克一世和阿斯吉亚达乌德又发动了对巴尼河和尼日尔河之间的马里诸省的进攻，1546年甚至攻陷马里首都，占领了七天。但是，桑海统治者认为，完全征服马里、在它的心脏地区建立统治是困难的。阿斯吉亚穆罕默德曾告诫说：“任何人也不能使一支在丛林和草原战斗的军队，避免面临崩溃和惨重伤亡。”马林凯人的腹地不仅山林起伏，而且索图巴瀑

拉赖什，即阿拉伊什（Araich）。

Leo Africanus,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非洲记行》), vol.2, Paris 1956, p.46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455.

布（位于巴马科附近），拦住了桑海人强大舰队的前驶之路。这也是马里王国得以长期偏安的原因之一。

马里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帝国时期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商业在马林凯人社会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长途贩运不再单是南北向的，主要是东西向的。即控制内陆通往大西洋的商路，把奴隶、黄金运往大西洋沿岸，把食盐等输入内地。塞内冈比亚是16—17世纪黑奴贸易的主要区域之一，马林凯商人是主要中介人之一。大西洋黑奴贸易巩固和延滞了马里固有的奴隶制度。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军事掠夺。分散居住在塞内加尔河上游和尼日尔河上游的古尔族部落，是马里掠奴的主要对象。奴隶被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奴隶住在奴隶村中，由监工管理。在商业领域，奴隶主要用于运输。奴隶也被应召入伍当兵。马里有广泛的家庭奴隶存在，他们从事家庭劳动，而且结合到家庭组织中去。奴隶们即使获得了自由，依然保持与主人的紧密联系，成为被保护人。

1591年汤迪比战役中桑海的败北，解除了马里王国北面的威胁。马里国王马哈茂德以为复兴古老帝国的机会已到，积极参加苏丹各族反对摩洛哥人的斗争。1599年4月，他与马西纳结盟，共同攻打盘踞杰内的摩洛哥军队，但遭到失败。

这次战役是马里王国复兴努力的最后一次尝试，此后它不再是尼日尔河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了。它原来的藩属纷纷脱离。17世纪40年代，卡拉和宾杜古两省的班巴拉人脱离了马里王国。1645年，末代国王马马·穆罕反叛班巴拉人，失败后退至康加巴。凯塔王朝复亡后，马里分裂成许多小酋长国。

早在17世纪20年代，冈比亚河流域的巴拉、巴迪布、尼阿尼、伍利等国也已完全脱离马里而独立。

当马里王国衰落以后，富塔贾隆的弗拉尼人在田基纳领导下，反对马里地方政权。1490年，他们攻打马里的西翼，而后向北进入富塔托罗，奠定了迪尼安凯王朝的基础。1512年，田基纳在攻打迪亚拉时被杀身亡，其子科利率领败军退回富塔托罗。科利的妻子出身马里皇族。约1534年，他攻打黄金产地班布克，但被马里击败。科利的继承者继续其扩张政策，到1600年时，富塔托罗王国已经占有塞内加尔河上游，控制了班布克产金地 and 巴芬河沿岸的商业城镇。

马里的灭亡，众多小国的兴起，为阿拉伯游牧部落哈桑族的南侵提供了机会。哈桑人原住摩洛哥南部的德腊和塔菲拉勒绿洲。从15世纪起，他们徐徐地向南渗透，越过南部撒哈拉，直达塞内加尔河。哈桑人切断道路，骚扰商队。他们形式上信奉伊斯兰教，但不履行伊斯兰教的义务，引起穆斯林的不满。纳塞尔·丁起而联合柏柏尔人的武装力量，号召举行反对哈桑人的圣战。他企图创立一个超越各族分歧的理想社会，反对哈桑武士切断道路，压迫伊斯兰教信徒。他自称“伊玛目”，任命一个大臣和四个卡迪，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1673年，他渡过塞内加尔河，侵入富塔托罗和沃洛夫人国家。他派使者去见迪尼安凯的统治者，敦促其实行改革，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否则将被宣布为敌人而赶出国境。在几次均遭拒绝以后，纳塞尔·丁的追随者侵入富塔托罗，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暴君。富塔托罗信仰伊斯兰教的弗拉尼人，在托罗贝领导下，与纳塞尔·丁合作，废除了富塔托罗谷地的酋

长，代之以穆斯林统治者。迪尼安凯国王带着家属和随从逃亡加拉姆，并与哈桑人结成了反对纳塞尔·丁的联盟。在这场战争中，哈桑人及其同盟者在南部撒哈拉和富塔托罗均取得了胜利。

纳塞尔·丁领导的圣战虽然失败，但它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河流域的传播，并对18世纪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的圣战产生了影响。哈桑人的胜利则开辟了从摩洛哥到苏丹的另一条道路。

摩洛哥素丹把哈桑人视为自己的臣民，声称对他们拥有宗主权。1678年，穆莱·伊斯梅尔率领一支远征队从苏斯进入南撒哈拉。阿拉伯部落向他称臣纳贡。根据法国资料，1718年以后，在南撒哈拉和塞内加尔河河谷出现了被称为“奥曼”的摩洛哥军队，其数量多达12000—15000人，其中还有叛教的法兰克人。他们攻击法国殖民者，拦截塞内加尔河上的船只，干涉富塔托罗的内政，插手迪尼安凯王朝各派争夺王位的斗争。1719—1720年间，特拉扎的埃米尔同摩洛哥结盟，并在摩洛哥军队的支持下反对布拉克拉人。穆莱·伊斯梅尔一度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中游，他的权威在尼日尔河湾也得到了承认，撒哈拉商道和黄金的供应一度得到了恢复。“穆莱·伊斯梅尔的黄金是那样的充裕，以致王宫门栓和厨房用具都是用纯金制成的。……那时穿越沙漠的旅行就像现在（1820年）在摩洛哥平原上，或在英国的大道上旅行一样安全。”

伊斯梅尔的继承者沿袭了他对苏丹的扩张政策。其子艾哈迈德也曾远征苏丹，也获得了“金素丹”的称号。1741—1742年，摩洛哥军队从加拉向东进击，同廷巴克图西部的图阿雷格人作战。可见，阿拉维王朝在苏丹侵占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萨阿德王朝。

八、商道的变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摩洛哥两次入侵苏丹，以及随之而来的桑海和马里的灭亡，对西苏丹地区的商道变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影响甚大。

17和18世纪西苏丹商道变迁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欧洲殖民者在西非沿海建立殖民据点，贩卖奴隶，掠夺黄金和象牙，使内陆贸易中的东西商道形成和发展起来，分流了传统的南北商道即撒哈拉商道的传统商品。撒哈拉商道在内陆贸易中仍占主要地位，但它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降低。

其二是摩洛哥占领廷巴克图、加奥和杰内，以及尼日尔河湾地区的长期战乱，使原居住在这里的曼迪商人向外迁徙，该地区失去了撒哈拉商道贸易的主干作用。正如前述，撒哈拉商道的重心向尼日尔河湾东西两侧转移。

向东，撒哈拉的食盐贸易转入豪萨人手中；塔瓦、阿加德兹、戈比尔、卡齐纳、卡诺及其他城市在撒哈拉商路中的地位更形重要。豪萨商人除经营食盐外，向北输出毛织品、皮革制品和铜铁制品。

向西，撒哈拉商道的重心绕过廷巴克图，经桑桑丁、塞古，与通往黄金和柯拉果产地的商路相联。柯拉果有两个主要贸易区。西边的在今象牙海岸境内，从上尼日尔河到伍罗杜古。这条商路的贸易由迪奥拉人操纵。马林凯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151.

迪奥拉（Dyola），在马林凯语中意为商人，此处指源于马林凯族的商人集团，他们分布甚广，父子相承。

人沿着这条商路，建立了一些商业中心，如贝拉、图巴、塞盖拉、马科诺、田格里拉、奥迭内、康康等。他们充当从北方来的行商和黄金、柯拉果产家之间的中介人。在马里灭亡之后，马林凯人武士和农民沿着迪奥拉商人的脚印，向南迁徙渗透，但他们没有到达黄金和柯拉果产区，而停留在森林边缘。东边的柯拉果和黄金贸易中心在冈贾地区，有两条商道从尼日尔河通向此地。这两条路线依黑沃尔特河分野，豪萨人和迪奥拉人在此开展激烈的竞争。迪奥拉人原在孔城、布纳和邦杜古具有很大优势。由于廷巴克图、加奥等城被占后，豪萨到北非的撒哈拉商道的繁荣刺激了豪萨对柯拉果需求的增加，因而也刺激了豪萨同冈贾地区的贸易。豪萨商人不仅垄断黑沃尔特河东边的柯拉果贸易中心萨拉加，而且在孔城、邦杜古也有不少豪萨商人。例如在孔城，豪萨商人就有一个单独的居住区——马腊巴苏。

在这 200 年间，苏丹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内陆与沿海贸易的发展。这种东西贸易是在曼迪人的原有商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殖民者在西非沿海建立殖民据点，掠夺奴隶和黄金，促使曼迪人把原有的商业触角向沿海伸展。属于曼迪语族的索林凯人、迪奥拉人、迪亚坎凯人和邦杜卡人，各在一个区域占据支配地位。

索林凯人在靠近富塔托罗的那段塞内加尔河地区，建立了加迪亚加。在其政权保护之下，索林凯穆斯林商人，在南北贸易中到桑桑丁、塞古等地，以黄金、柯拉果、小米交换食盐、牲畜和马格里布的产品；在东西贸易中则用奴隶、黄金交换海盐和欧洲人的布匹、武器。该地区的东西贸易基本上通过塞内加尔河进行，如果塞内加尔河通航受阻，则取道陆路，借助于迪亚坎凯人的贸易网。

迪亚坎凯人自称其祖先来自马西纳附近的迪亚。他们在巴芬河上的迪亚卡巴建立了商业中心，与马林凯人分享冈比亚河的贸易权益。

关于从加拉姆到迪亚卡巴的迪亚坎凯人城镇，安德烈·布律于 1698 年写道：“他们人数众多、和睦、团结，在某种程度上组成了一个共和国，对国王无所畏惧。……那里有个相当大的市镇，名叫康尤耳，全用石头筑成，大多数商人住在那里，这个市镇是伊斯兰马拉布特的首都。”

在冈比亚以南，迪奥拉人从康康等地出发，通过富塔贾隆，到上几内亚沿岸进行贸易。在通过富塔贾隆的东西贸易中，邦杜卡人也起着重要作用。邦杜卡人是弗拉尼人的一支，采用了迪亚坎凯人的方言，专门从事奴隶贸易。

东西贸易的发展，引起了穆斯林商人和乌拉玛的西迁。他们建立新的移居地，并获得了欧洲人的武器，积累了财富，成为政治上—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东西贸易穿越其境的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成为较早发生伊斯兰圣战的地区，不是偶然的。

在西非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同长途贸易的发展和商道的延伸密不可分的。伊斯兰教首次传入西苏丹就是通过撒哈拉商道。当时阿拉伯和柏柏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古加纳首都建立了居留地，也把伊斯兰教传入了加纳王国。加纳、马里和桑海三国都被认为是伊斯兰国家，但伊斯兰教的信仰者除了统治阶级之外，主要是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农村的广大农牧民和渔民都是泛灵论者。桑海和马里灭亡之后，正如前面所述，除在登迪地区的桑海人恢复了传统宗教以外，从杰内、加奥等地南逃和西迁的商人、乌拉玛把伊

伊斯兰教逐步扩展到了南方森林边缘，甚至阿散蒂国王奥塞·克瓦米也在 1780 年左右改宗了伊斯兰教。

从马里、桑海这类大国灭亡中兴起的小国，其统治者都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关系，只是深浅程度各有不同。有些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是半心半意的，力图保持伊斯兰教与传统宗教的平衡。他们没有抛弃泛灵论，而是把泛灵论糅合到伊斯兰教中去，使之成为混合伊斯兰教。前述塞古、卡尔塔王国便是如此。冈贾、莫西诸国也很类似。第一批穆斯林商人在 16 世纪已定居莫西，他们采用莫西人的语言和习俗，使伊斯兰教在莫西扩大了影响。直到 18 世纪，伊斯兰教才进入莫西宫廷。纳马杜鲁古是第一个学习过古兰经的莫西国王，并在瓦加杜古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

在曼迪人建立的小国中，伊斯兰教的圣职阶层（马拉布特、乌拉玛）拥有很大的权势。分布在冈比亚、塞内加尔的马林凯人、索林凯人、迪亚坎凯人的一些国家就是如此。例如《费塔希史》指出，康尤尔“处在卡迪和乌拉玛的政权统治之下”。

伊斯兰教扩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弗拉尼人接受伊斯兰教。弗拉尼人皈依伊斯兰教始于何时，很难确考，但《苏丹史》的作者已经提到过几个弗拉尼人乌拉玛的名字，其中的一人还是廷巴克图星期五大清真寺的伊玛姆。

到 16 世纪，弗拉尼人由西向东的迁徙已经基本完成，抵达了乍得湖畔。他们大多数是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部分定居在城镇，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弗拉尼人改宗伊斯兰教，使他们接触了来自埃及、马里格布和西亚的穆斯林世界的思想潮流，并受到了革命性的影响。他们开始考虑现实生活苦难的原因，不满分裂和动乱的社会，憧憬一个社会正义的新时代的到来，以便过和平而有秩序的生活，保障商业的繁荣和穆斯林的安全。正是这些弗拉尼人在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发动了早期的圣战，19 世纪又在豪萨和马西纳等地发动了圣战，掀起了西非的伊斯兰改革运动。

九、富塔地区的圣战

西非的伊斯兰圣战发轫于富塔邦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这个地区较早地发展了同沿海欧洲人商站的贸易，感受到欧洲殖民侵略的威胁，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较早地激化起来。

法国人不仅在塞内加尔沿海占领了圣路易、果雷埃，而且溯河而上，于 1685 年到达加拉姆，1700 年在靠近黄金产地班布克的河段，建成了圣约瑟夫堡。法国殖民者在内陆的出现引起了土著人的惊恐和愤怒。1702 年 12 月，迪亚坎凯人首次进攻圣约瑟夫堡。法军利用夜幕的掩护，仓惶逃出。12 年之后，法国人来此重建，又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击。

在冈比亚河，英国殖民者长期以来利用早期葡萄牙人的后裔作为中介人同内陆贸易，到 18 世纪时才深入内陆，直接介入内河贸易。1722 年，一支皇家非洲公司的考察队越过了冈比河上游巴腊坎达瀑布。

欧洲商人深入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上中游，主要是从事万恶的黑奴贸易。法国殖民者布律曾力图使迪亚坎凯商人相信，虽然法国人用 20 根铁棒换

I.M.Lewis,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伊斯兰教在热带非洲》), Bloomington & London 1980, p.1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218.

一名奴隶，比英国人的价格低 20 根，但把奴隶贩运到加拉姆的法国人商站路程短，周期快，比长途贩运到冈比亚沿海更赚钱。弗朗西斯·穆尔 1721 年到达冈比亚河上游，记下了贩运奴隶的惨状：奴隶贩子“从遥远的内地把他们带到这里。一路上，用皮带拴住他们的脖子，每串有三四十人，每人间隔一码左右，通常头上顶着一捆谷物或一只象牙”。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从塞内冈比亚盆地输出的奴隶每年保持在 1000—3000 人之间，大多是战俘。频繁的猎奴战争和被卖为奴隶的惨状，给各族下层群众带来的苦难，使他们渴望出现一个安定、统一的政局。

从 15 世纪迁居这一地区的弗拉尼人，处于原有各君侯国的附属地位。弗拉尼牧民在富塔贾隆高原，而苏苏和迪阿隆克农民则居住在谷地。农民的耕地为牧民的牧场所包围。和平相处的关系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由于沿海欧洲商人对皮革需求的增长，弗拉尼人的人口和牲畜的增加，造成可用的牧草短缺。弗拉尼牧民和苏苏、迪阿隆克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时有发生，关系日趋紧张。

纳塞尔·丁领导的圣战，加速了弗拉尼人的穆斯林化。富塔托罗的弗拉尼人，由于追随纳塞尔·丁反对迪尼安凯国王而遭到镇压。他们在托罗贝领导下，向南迁入人烟稀少的邦杜。约在 17 世纪 80 年代，由马利克·西领导建立了一个弗拉尼人和图库勒尔人的神权国家。马利克·西自称“伊利马尼”，即伊玛姆。他企图扩大统治范围，侵入加拉姆，但不幸战死。其子布布·马利克·西继任。1795 年，蒙哥·帕克访问邦杜时发现，这里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通行穆斯林法，各个城镇建立了少量学校，许多异教徒也像穆斯林小孩一样受教育，读古兰经，居民的生活是富裕的。

另一部分弗拉尼人，从富塔托罗越过塞内加尔河谷，迁到富塔贾隆。口头传说提到：“弗拉尼逃亡者在富塔托罗反对泛灵论者的斗争中被打败，来富塔贾隆找他们的兄弟们庇护。”这批富有战斗性的托罗贝人的到来，增加了原有弗拉尼人的力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伊斯兰教长国。1725 年富塔贾隆地区的九个弗拉尼君侯举行会议，选举阿尔发君侯为国家元首，定廷博为首都。这次会议标志富塔贾隆圣战的开始。但是，国家元首的权力受到设在圣城富古姆巴的乌拉玛会议的制约。原来的君侯国改成九个省，阿尔发只能直接管辖廷博省，其他八个省的世俗权力仍掌握在原有君侯手里。

阿尔发可能死于 1751 年，由其侄伊卜拉辛·索里继位。索里迫使非穆斯林的迪阿隆克人酋长信奉伊斯兰教，并与之结盟，进行一系列的战争。瓦苏鲁统治者建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联盟，并在 1762 年打败了侵入瓦苏鲁领土的索里的军队。接着迪阿隆凯人投向瓦苏鲁人一边，1767 年联合进攻富塔贾隆，占领了廷博，进逼圣城富古姆巴，掠夺奴隶和财富。1776 年，索里打败了瓦苏鲁和迪阿隆凯人，迫使迪阿隆凯人接受弗拉尼人的统治。

索里执政时期，还同教权与各省的弗拉尼贵族作斗争。1776 年战争的胜

弗朗西斯·穆尔：《非洲内地旅行记》，伦敦 1938 年，第 41 页，转引自小哈里·A·盖利：《冈比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53 页。

Paul E.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奴隶制的变形》，Cambridge 1983, D.58.

Mongo Parks, *op.cit.*, p.50.

Marry, L. *Islam en Guinee : Fouta Djallon* (《伊斯兰教在几内亚：富塔贾隆》)，Paire 1921, pp.36-37. Wassulu, 又作 Ouassoulou, 中文译作乌阿苏鲁。

利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被授予“阿尔马米”的称号，拥有政教双重权力。但是，他必须承认长老会议有权对内外事务提出建议，其继承人由会议批准。每省选举两三名代表出席富古姆巴的乌拉玛会议，负责征收什一税和支付圣战的费用。政教冲突依然在继续。索里决心用武力解决这一冲突，他带兵占领塞古姆巴，把那些反对他的乌拉玛会议成员处决，会议地址迁到廷博并安插自己的亲信控制乌拉玛会议。

在 1725—1776 年圣战中，富塔贾隆教长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日臻成型。阿尔马米虽然由乌拉玛会议选举，但只能在阿尔发和索里两大家族中挑选。以两大家族为首的弗拉尼贵族集团不但控制政教大权，而且还拥有众多的奴隶、牲畜和农庄。奴隶主不只是弗拉尼人，也有曼迪等族的人。例如穆罕默德·卡巴的父亲就是出身于曼迪人的奴隶主，他在距廷博不远的布巴拥有一处庄园和 140 名奴隶，生产棉花和粮食。弗拉尼人在战争中大都成了穆斯林，但大多数依然是牧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比非穆斯林居民要高一些。被征服的迪阿隆克人、坦达人和兰都玛人的村庄，变成了弗拉尼贵族的奴隶村、依附民村。依附民在本族酋长管辖下耕种土地，向弗拉尼贵族交纳农产品。富塔贾隆教长国对邻居发动掠奴战争，把俘虏变为奴隶，或者卖给欧洲奴隶贩子。

富塔贾隆圣战的成功，激励了富塔托罗的弗拉尼人。当时富塔托罗受到法国殖民者的渗透、布拉克纳人的侵略和摩洛哥军队的骚扰，内部已分裂成两个王国。从富塔贾隆学习归来的谢赫·苏莱曼·保尔针对动乱的政局，号召恢复统一和秩序，结束摩尔人的侵略，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1775—1776 年，根据苏莱曼·保尔的建议，他的追随者选举阿卜德·卡迪尔·哈马迪为阿尔马米，领导反对布拉克纳人的侵略。他打败了摩尔人，不再向布拉克纳人纳贡；并转而反对迪尼安凯王朝，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了国王；接着又击败了特拉扎酋长阿里·考里，成了塞内加尔河中上游唯一的统治力量。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他提高了向法国人征收的塞内加尔河通行税。

1796 年，阿卜德·卡迪尔开始向外扩张。向西，他进军邦杜，按自己意志废立阿尔马米，控制邦杜政权。向东，他侵入开约尔王国。开约尔在沃洛夫人建立的国家中最为强大，位于大西洋沿岸。当时阿马里·恩吉涅—恩迪拉—琼巴（1790—1809）国王（达梅耳，Dame I）在位。他不是穆斯林，但准许伊斯兰教的马拉布特在国内居住。阿卜德·卡迪尔派一个使节会见开约尔国王，要求他改宗伊斯兰教，遭到拒绝。年末，正当干季，他亲自率军侵入开约尔。沃洛夫人填塞水井，坚壁清野。富塔托罗军队整日口渴难忍，一无所获。一天，当他们正在熟睡之时，开约尔军在天明前发动突袭。阿卜德·卡迪尔被俘，全军覆灭。开约尔国王没有处死他，而判处他服三个月的苦工，三个月后才让他回国复位。

富塔托罗也像富塔贾隆一样，弗拉尼人的上层在圣战中形成一个贵族集团，他们不仅掌握政教大权，而且占有大批土地和奴隶，压迫和剥削奴隶和农民。

在 18 世纪相继发生的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的圣战，建立了西非最早的伊斯兰教长国。这三个国家互相保持着联系，并通过富塔托罗的托罗贝人同北非的穆斯林交往，把宗教激情传播到豪萨和其他西非国家，推动了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

第十章 禁止奴隶贸易和内陆探险

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后，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这是禁止奴隶贸易、内陆探险和传教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

禁止奴隶贸易、内陆探险和传教活动，作为推行西方殖民政策的有效手段，贯穿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全过程，并对非洲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它们也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大规模入侵、瓜分非洲的狂潮，非洲进入了殖民地时代。

一、西方殖民政策的转变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西方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商业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也是这个时期西方殖民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迅速积聚资金，加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不但是商业资本大力推行对非洲的殖民活动的动因，也是其殖民政策的目标。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主要表现为奴隶贸易，它为西方提供了大量极其廉价的劳动力。黑奴开发了美洲等殖民地，创造了巨额财富，从而有力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

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后，工业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工业资本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并迅速超过和压倒了商业资本，因此它们在政治上也日益排斥商业资本，成为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在经济上，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明创造不断涌现；工厂制大机器生产的确立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结合，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工业品和工业原料的供需要求都大大突破了本国市场的容量。因此，寻求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它的对外殖民政策。工业资本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着手修改商业资本所奉行的殖民政策，把控制和占领世界各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产地作为其殖民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

在非洲大陆，工业资本为推行其殖民政策而遇到了许多难题：第一，400余年的奴隶贸易的浩劫使非洲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大量外流和死亡。人力资源的巨大损耗，直接扰乱和破坏了非洲各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奴隶贩子足迹所至，村庄被焚，田园荒芜，幸存者避厄运，四出外逃，非洲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因此，只要奴隶贸易继续存在，非洲就无法成为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第二，西方各国对于占非洲大陆90%以上的内陆地区毫无了解。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了“通商（Commerce）、传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殖

民 (Colonization) ” 的方案，被称为“四 C 连祷词”。这个方案实际上被西方各国所采纳。

通商，即以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英国政府曾指示英驻桑给巴尔使节：“所有欧洲国家决心结束非洲奴隶贸易。……阿拉伯人应当顺从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放弃奴隶贸易。继续坚持只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和各种罪恶。他们应尽快从事农作和无罪的、合法的贸易。”所谓“合法贸易”，实质上是西方在自由贸易旗号下，向非洲倾售其工业品，掠夺当地的原料产品，从而摧毁非洲社会传统的经济结构，把非洲逐步纳入西方经济附庸的轨道。

传教，即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形式，瓦解非洲人民传统的宗教信仰。一位西方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皈依基督教，对非洲人而言，意味着放弃传统的服式、权力、社会组织、文化、婚姻、医学等。……其后果是使黑人从内心产生自卑感。”

文明，即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强行输入非洲西方殖民地。西方殖民者污蔑非洲传统文明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必须“尽快加以根除”。他们借口把非洲居民“引入人类更高级阶段”，通过宣传、办学和办医院等手段，对非洲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文化侵略。

殖民，这是“四 C 连祷词”中的关键词。通过通商、传教和输入西方文明等活动，西方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使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亦即西方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生产基地。

毫无疑问，“四 C 连祷词”是工业资本为推行其殖民政策而制订的具体策略，其实质是利用通商，实行对非洲的经济渗透和控制；利用传教和输入西方文明，实行对非洲的政治渗透和控制，最终把非洲变为西方殖民地。因此，“四 C”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为了实行通商，首先必须取缔奴隶贸易，于是声势浩大的禁止奴隶贸易出台了；为了传教，大批传教士涌入非洲，掀起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为了通商、传教、输入西方文明和开拓殖民地，必须打开非洲内陆地区的大门，于是内陆探险又应势而起。可见，禁止奴隶贸易、内陆探险和传教活动是西方殖民政策转变的必然产物，它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登上非洲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

二、禁止奴隶贸易

万恶的奴隶贸易自 16 世纪发端，至 18 世纪末已开始走向衰落。19 世纪初，欧美国家纷纷宣布禁止奴隶贸易。

英国议会于 1806 年 6 月通过法令宣布，从 1807 年 5 月 1 日起，绝对禁止非洲的奴隶贸易，绝对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交换与运输奴隶。

美国于 1807 年 3 月通过禁止贩卖奴隶法令，规定凡从任何外国、外地将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vol. 5，p. 490.

J.Gray：History of Zanzibar（《桑给巴尔史》），London 1962，p. 250.

E.Kendall：The End of an Era-Africa and Missionary 《非洲时代的结束与传教士》，London 1978，p.54.

Kendall，op，cit，p. 5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 5，p.489.

任何作为奴隶的人带入美国，均属非法。该法令从 18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法国早在大革命期间（1794 年 2 月），国民议会就颁布法令，宣布在法国本土及其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无偿解放黑奴。

此外，丹麦于 1792 年、瑞典于 1813 年、荷兰于 1814 年、葡萄牙于 1820 年、西班牙于 1823 年都先后宣布禁止奴隶贸易。

禁止奴隶贸易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根源。

第一，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逐渐与奴隶贸易发生矛盾，因此，奴隶贸易日益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19 世纪初，美法等国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从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制大机器生产的飞跃，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为此，工业资本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自由雇佣劳动大军和广阔的国外市场。然而，奴隶劳动力缺乏人身自由，其行动完全受奴隶主的控制与支配，因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势必直接妨碍自由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此外，奴隶由于失去自由，不但缺乏生产积极性，而且经常破坏工具、捣毁机器，因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指出，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的价格更为低廉。他举例说，耕作同样的土地，奴隶劳动的费用比雇佣劳动高五倍。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说法。至 18 世纪末，加勒比海英国的蔗糖种植园已明显表现出劣势，奴隶制糖业日益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包袱。

奴隶贸易的存在也给开发非洲带来难题。非洲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西方理想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奴隶贸易把大量非洲劳动力强行贩运海外，造成非洲人口凋零。因此，只有废除奴隶贸易，才能就地利用非洲劳动力，开发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才能使非洲成为稳定的商品销售市场。18 世纪后期，从非洲输出一船棕榈油的利润已大大高于贩运一船奴隶。这一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西方工业资本已愈来愈重视对非洲资源的开发。相比之下，奴隶贸易已呈现出败落的势头。

第二，黑人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奴隶贸易的基础，加速了它的衰亡。

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贯穿于奴隶贸易的全过程。在非洲本土，酷爱自由的非洲各族人民不甘沦为奴隶，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狠狠打击了奴隶贩子的活动。在贩奴途中，奴隶暴动屡见不鲜（参见本卷第一章）。在美洲等西方殖民地，非洲黑奴不堪忍受种植园奴隶主的虐待和摧残，经常采用怠工、破坏工具、逃亡和起义等方式进行斗争。在加勒比海地区、巴西和美国三大蓄奴区，都曾先后爆发过大规模的黑奴起义。1791 年的海地革命更把黑奴斗争推向高潮。黑奴们在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下，先后击败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于 1801 年 6 月宣布海地独立。新生的黑人共和国颁布宪法，废除奴隶制，解放了全部黑奴，海地革命是黑奴斗争的光辉典范，是第一次成功废除种植园奴隶制的伟大革命。在海地革命鼓舞下，拉丁美洲各地相继爆发规模宏大的独立战争，矛头直指殖民主义、封建制度和种植园奴隶制。独立战争胜利后，拉美不少国家先后颁布了废除和限制奴隶制的法令。

第三，西方各国废奴运动的兴起，给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以有力的冲击。

对于奴隶贸易及种植园奴隶制，西方有识之士早就发出过反对的呼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人都谴责和批判过奴隶贸易和奴隶制。18 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政治、经济形

势的变迁，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罪恶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社会各阶层中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呼声不断高涨。1772年，英国废奴主义者经过斗争，在对詹姆斯·萨默塞特案件的审理中，迫使英国最高法院宣布在国内废除奴隶制。这一胜利极大鼓舞了西方各国废奴主义者，进一步推动了废奴运动的高涨，同时也揭开了世界范围内禁止奴隶贸易运动的序幕。18世纪70—80年代，废奴主义者纷纷成立专门的组织，如英国的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协会，法国的“黑人之友”等。美国废奴主义者早在1775年就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地方性的废奴主义者团体，1794年召开了全国性的废奴主义者代表大会。西方各国废奴主义者及其组织积极活动，举行群众集会，发表鼓动演讲，出版报刊，撰写专著、文章，猛烈抨击罪恶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促进了废奴运动的广泛开展。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给方兴未艾的废奴运动输入了新的活力。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思想，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广为传播，为废奴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参加废奴运动的成份比较复杂，有教友派、福音派等宗教团体，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也有广大基层劳动群众。各种政治势力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动机也不尽一致，有的从宗教立场出发，批判其反宗教的野蛮性；有的抨击其反人道主义的罪恶；工业资产阶级企图把废奴运动纳入与商业资产阶级争夺殖民政策主导权的轨道；而广大劳动群众则把废奴运动视作反资本压迫的斗争。尽管如此，废奴主义者都把铲除奴隶贸易及奴隶制作为斗争目标，他们的斗争有力冲击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因此废奴运动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奴隶贸易由兴变衰的根本原因，而黑奴的反抗斗争和废奴运动的高涨则直接加速了奴隶贸易的消亡。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西方各国提出禁止奴隶贸易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奴隶贸易禁而不止

西方各国虽先后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奴隶贸易却迟迟禁而不止，几乎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禁止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奴隶贸易产生矛盾后的产物，但这种矛盾的形成和激化是个渐进的过程。从奴隶贸易过渡到禁止奴隶贸易，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在剥削本质上的否定，而只是对其剥削形式的否定。在工业革命初期，奴隶劳动对大机器生产仍有某种作用就是一例，其重要原因在于奴隶生产的棉花能为欧洲工业经济提供原料。美国奴隶制种植园所生产的棉花在英国棉纺工业中所占原料比重，可参见下表。

B.R.Mitchell,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不列颠历史统计摘要》), Cambridge 1962, pp.179—180.

年份	英棉消费量 (百万英镑)	英棉进口总额 (百万英镑)	从美国进口原棉数 (百万英镑)
1815	81	101	54
1820	120	152	90
1825	167	228	140
1830	248	264	211
1835	318	364	284
1840	459	592	488
1845	607	722	627
1850	588	664	493
1855	839	892	682
1860	1, 084	1, 391	1, 116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仍有赖于奴隶劳动的产品。因此，奴隶贸易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尚有生存的余地。正因如此，西方各国虽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却不同时废除奴隶制，这在客观上给奴隶贸易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这是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各国对待禁止奴隶贸易的态度大相径庭，彼此间无法统一步调，共同合作，以有效禁止奴隶贸易。这是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另一重要原因。

英国最早进入工业革命，工业化程度高于其它西方国家，因此它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占有欲显得格外强烈。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它失去了富饶的北美殖民地，这在客观上更加刺激了这种欲望。所以，英国在禁止奴隶贸易中态度比其它国家坚决。当然，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真正意图是，以此为手段向非洲渗透，竭力扩展其殖民势力，正如美国驻非洲海岸查禁奴隶贸易舰队司令斯金纳指出：“我现在确信无疑，在查禁奴隶贸易的借口下，英国……企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殖民地，以便垄断对非洲大陆的贸易。”

英国于 1772 年在本土废除了奴隶制，1807 年宣布禁止本国臣民从事奴隶贸易，1824 年确认贩奴为海盗行为，1833 年在英属殖民地废除奴隶制。与此同时，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迫使其它西方国家同时放弃奴隶贸易：

1815 年，英国以 75 万英镑的代价迫使葡萄牙签署禁止奴隶贸易条约。条约规定，葡萄牙人不得在赤道以北的非洲地区贩卖黑奴。1823 年后，葡萄牙禁止奴隶贸易。

1817 年，英国付给西班牙 40 万英镑补偿费，换取西班牙于 1820 年后放弃奴隶贸易。

1819 年，英国与葡萄牙、西班牙和巴西等国成立混合委员会。根据混合委员会协议，各成员国共同监督、查禁奴隶贸易，成员国之间享有互检权（缔约国对其它成员国有贩奴嫌疑的船只可以检查和扣留）。英国海军进驻西非海域巡查。

P.Duignan & C.clende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619—1862* (《美国和非洲奴隶贸易》), Stanford 1963, p.42.

1822 年和 1823 年，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订立禁止奴隶贸易的补充协定，即《设备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有嫌疑的贩奴船只的拦截和检查。

1830 年代，英国利用法国政局的变动，迫使七月王朝于 1831 年签署了禁止奴隶贸易条约；1833 年又订立了互检条约。

在非洲，英国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强迫非洲沿海地区的一些酋长和素丹签订禁止奴隶贸易条约。1839 年，英国海军进驻东非水域，把查禁贩奴船的活动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印度洋。

与大动干戈的英国相比，美国和法国的态度就要迟疑得多。美法虽在 19 世纪初进入工业革命，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英国，因此它们不愿迅速结束奴隶贸易，更不愿看到英国在禁止奴隶贸易名义下对非洲进行的肆意扩张。

美国于 1808 年正式禁止奴隶贸易，然而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使禁止奴隶贸易法令成为一纸空文。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 1859 年 8 月 20 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美国在颁布禁止奴隶贸易法令后，始终没有认真执行：1820 年，美国政府宣布对参与贩奴者将处以死刑，然而直至 1860 年代林肯当选，24 名被抓获的奴隶贩子居然无一伏法；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代表在参议院多次公开提出重开奴隶贸易的动议；美国政府一再拒绝签订互检条约，为美国奴隶贩子的活动大开绿灯。

法国情况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一度废除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但拿破仑上台后又重新加以恢复。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期间，法国政府多次颁布法令，重申禁止奴隶贸易：1817 年发布命令，禁止向法属殖民地输入奴隶；1818 年，国会通过立法，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奴隶贸易；1827 年，宣布对贩奴者处以罚金和流放。尽管如此，法国奴隶贩子在佛得角附近、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和东非沿海仍旧异常活跃。仅以印度洋上原法属波旁岛为例，在禁止奴隶贸易后，45000 名黑奴被走私运入该岛。1843 年后，法国在“自由劳工移民”名义下，公开恢复奴隶贸易，直至 1864 年才告结束。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软弱无力，更是迟迟不肯放弃奴隶贸易。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它们也不得不故作姿态，在表面上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暗中却顽固坚持这种罪恶活动。利文斯顿在 18 世纪 50—60 年代多次进入葡属安哥拉和葡属东非，他发现当地的奴隶贸易有增无减，“成千上万的居民在奴隶贸易中丧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尸骨处处可见”。他气愤地指出：葡萄牙政府曾许诺禁止奴隶贸易，“现在看来，这种许诺只是为了做给欧洲人看的虚伪姿态”。

禁止奴隶贸易也遭到以贩奴商人和种植园奴隶主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抵抗。这是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又一原因。

贩奴商人和种植园奴隶主不甘心失去昔日的地位和一本万利的活动，因

马克思：《北美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351—352 页。

厄斯诺·巴伯吉：《毛里求斯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50 页。

W·G·Blaikie：The Persona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利文斯顿生平》），New York 1880.p.340.

此竭力抵制禁止奴隶贸易，千方百计维持黑奴买卖。英国驻毛里求斯岛总督达林写道：“毛里求斯社会中那部分有钱有势的人们，不仅鼓励而且支持奴隶贩卖，对那些反对奴隶贩卖的人竭尽威胁之能事。司法机关则利用他们的权力和专业知识，从中保护而不是处罚干这种交易的经纪人。”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给禁止奴隶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禁止奴隶贸易期间，西方奴隶贩子的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于是走私便成为他们采用的主要方式。

在禁止奴隶贸易期间，检查、拦截贩奴船的任务主要由英国海军执行。1834—1837年间，英国海军派驻西非沿海的巡查船仅14艘；至40年代中期，即禁止奴隶贸易的全盛时期，通常也只有20来艘；在东非沿海，英国海军的巡查船更少，一般只有7—8艘。在漫长的西非和东非水域，区区几十条巡查船显然无济于事，因此奴隶贩子很容易避开巡查船的检查，进行走私贩运。一位驻西非水域的英国海军军官回忆说：“我在维达看见，那里满是奴隶。在停泊地有10艘或12艘奴隶船，稍远一点的地方停着英国巡逻舰队的1艘巡洋舰。只要奴隶贩子能看见英国的舰船，他们就不往船上装一个奴隶。”夜幕降临，奴隶贩子便把奴隶迅速装上船，然后趁夜色悄然溜走。

除一般走私外，一些奴隶贩子采用武装走私的方式。它们在贩奴船上装备了精良武器，因此一旦遭遇巡查船，就可出其不意地进行武装抵抗。一位在贩奴船上当过水手的人回忆说：一次贩奴船遇上了巡查船，船长“命令还击，12门大炮在两分钟内做好了对巡洋舰开炮的准备。战斗打响了，……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厮杀，其惨状难以用言语表达。……只用十分钟的功夫便把（英国）军用帆船给解决了”。

同普通走私及武装走私相比，悬挂美国或法国国旗进行走私更为安全可靠。英国巡查船只能检查与之签订互检条约国家的船只。美国在1860年前一直拒订此约；而法国虽在1833年与英订立了互检条约，但至1845年就中止了。因此，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巡查船无权检查美法船只。英国政府曾一再指示英国巡查船的指挥官们：“你们切不可拦截、检查或用其他方法干涉法国船只。要对你们属下下达严厉指令以坚决执行上述命令。”

显然，英国巡查船即使发现美法船只只是贩奴船，也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在贩奴船上悬挂美法国旗成了奴隶贩子活动的护身符。奴隶贩子们要取得船只的“法国籍”或“美国籍”并不困难。比如在东非活动的奴隶贩子，只消在法属殖民地（诸如印度洋的某些岛屿）购买一间小屋或几平方米土地，便可获得法国殖民当局的认可，在航行中使用法国国旗。

除走私外，西方一些国家还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形式复活奴隶贸易，法国推行的“自由劳工移民”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厄斯诺·巴伯吉：前引书，第43页。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9页。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0页。

佐伊·马什、G.W.金斯诺思：《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页。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168页。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168—169页。

R.W.Beachey：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东非奴隶贸易文选》），London 1976.p.98.

所谓“自由劳工移民”，就是打着招募自由劳工的旗号，变相贩卖黑奴。禁止奴隶贸易一度使西方殖民地劳动力短缺。为此，英国开始从英属印度出口“苦力”，在中国贩运“猪仔”；而法国则在东非推行“自由劳工移民”。由于长期遭受奴隶贸易的洗劫，东非不存在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英国首任驻桑给巴尔领事哈默顿指出：“没有出于自愿而去留尼汪（法国殖民地）的人，甚至每月可得 20 元都是如此。但如确实发现用奴隶可去赚钱的话，许多人会把他们的奴隶送去。”事实也是如此。自由劳工都在奴隶中挑选，当法国人与当地阿拉伯奴隶贩子或奴隶主在价格上达成协议后，由后者把这些黑奴带到当地法官处，当众宣布这些黑奴已获“自由”，并让法官出具证明。办完上述手续，黑奴们便作为“自由劳工”由法国人带走了。许多西方人士都直言不讳地把“自由劳工移民”称为奴隶贸易。1858 年到任的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里格比对“自由劳工移民”作了如下描述：“在桑给巴尔和沿海地区，法国船经营着最活跃的奴隶贸易。……法国船由战舰护航，奴隶被带往留尼汪和马约特岛。……眼下，这里有一只装满了奴隶的法国船，奴隶头颈上都挂着一块木牌，……法国人借口这些人不是奴隶，黑人们仅仅是破雇佣服役数年，而他们又是自愿前往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禁止奴隶贸易后，奴隶贩子的活动更具有野蛮性和残酷性。为了逃避巡查船的检查，或为了销毁罪证，奴隶贩子经常把大批活着的黑奴杀死后抛入大海。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禁止奴隶贸易期间，奴隶贩子在非洲西海岸的活动集中于上几内亚海岸、刚果和安哥拉。一位西方人士说：“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到处都停泊着奴隶船。如果说几年前，在禁止奴隶贸易以后不久，可以看到农业的某种复苏和从事一定手工业的迹象，那末如今在沿岸一带，所有这些行业又被遗弃，人们从事的只有奴隶贸易。”另一位目击者则指出：“最可怕的是，非洲人不相信白人会禁止奴隶贸易。他们深信，奴隶贸易今后将会继续下去。”有人估计，1830 年代，非洲西海岸的贩奴船多达 200 条。仅 1825—1860 年间，从非洲西海岸贩运到美洲的奴隶就达 143.6 万人。

非洲东海岸的情况更令人吃惊。禁止奴隶贸易后，当地奴隶贸易的规模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地理条件等因素，西方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以非洲西海岸为奴隶贸易中心，因此在禁止奴隶贸易时也对西海岸比较重视，巡查贩奴船的重点一直置于西海岸，对东海岸的巡查就相对放松，于是奴隶贩子乘机潜入东海岸活动。二是在西方殖民势力渗透下，东非沿海地区的阿曼素丹辖地逐步发展种植园经济，种植园对奴隶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刺激了阿拉伯奴隶贩子的猎奴活动。三是葡萄牙政府对葡属东非的奴隶贸易持纵容、支持的态度，致使当地奴隶贸易十分猖獗。

东非沿海地区的奴隶贸易以莫桑比克和桑给巴尔为中心集散地。在莫桑比克，禁止奴隶贸易期间，对巴西的黑奴输出大幅度上升。仅 1818—1830 年间，每年经莫桑比克港运往巴西的黑奴达 10000 余名。1826 年，一位英国

R.coupt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东非及其侵略者》，Oxford 1956.p.431.

Beachey, *op.cit.*, p.101.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 163 页。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 182 页。

费奇：前引书，第 226 页。

官员证实：“每年在海关登记由莫桑比克运往巴西的黑奴数为 8000—10000 名。然而，我认为实际数字还应加上 1/4 或更多些，这是瞒过海关的走私数。”

19 世纪 30 年代后，莫桑比克奴隶贸易的规模继续扩大，并一直持续到 50—60 年代（关于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参见本卷第十六章）。面对东非奴隶贸易的急聚膨胀，有人甚至认为：“照现在这种消灭人口的速度，整个国家很快会变成一片荒漠。”

关于 19 世纪禁止奴隶贸易期间从非洲输出奴隶的数量，目前尚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估计，这一时期非洲年均输出奴隶 215000 人，其中安哥拉为 29000 人，东南海岸为 15000 人，埃尔米纳以北地区为 30000 人，贝宁湾和比夫拉湾为 140000 人。也有人估计，1800—1860 年间，美国输入非洲黑奴约 300000 人；在 19 世纪头 40 年中，输入古巴的奴隶为 247058 人；1837—1850 年间，从罗安达地区输出的奴隶为 623214 人。还有人估计，自 1810 年以后，从非洲输出的奴隶总数为 195 万人。

19 世纪 60 年代后，奴隶贸易明显衰退下去，其原因主要是 1860 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后结束了本国的奴隶制，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古巴和巴西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美洲三大蓄奴区奴隶制的废除使奴隶贸易失去了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开始迅速衰亡。1889—1890 年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总决议书，标志着奴隶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其后，在局部地区还有零星的贩卖黑奴现象。但其性质和规模已不能同大西洋奴隶贸易同日而语了。

四、内陆探险的兴起及其进程

西方在开展禁止奴隶贸易的同时，对非洲发起了大规模的内陆探险。英、法、德、比等欧洲列强为了开拓商业、控制原料产地、传教和科学研究等各种目的，采用各种形式，组织和派遣各类探险队深入非洲内陆，考察当地的地理、气候、物产、人种和语言等各种情况，以填补他们对非洲内陆知识的空白。内陆探险在客观上为日后对非洲的殖民入侵和扩张准备了条件。

非洲内陆地形复杂，沙漠、沼泽、密林和瀑布纵横交错，道路崎岖难行；内陆气候恶劣，在赤道非洲气温常高达 40 以上；内陆疫病流行，如热病能致人死命；此外，内陆居民对西方殖民者十分警惕。鉴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西方殖民者很少深入内陆；即使在奴隶贸易中，他们的活动也限于沿海地区。因此，至 18 世纪末，西方对非洲内陆的了解仍停留在古罗马或中世纪阿拉伯学者著作中只字片语的水平上。富裕的马里王国及其名城廷巴克图诱发着欧洲资产阶级的发财迷梦。有人贪婪地说：当地“一切都用黄金装饰，甚至连奴隶也不例外。……倘若我们把工业品打进当地市场，立即便可获得

E.A.Alpers, *Ivory and Slaves* (《象牙和奴隶》), California 1975, p.212.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 282 页。

阿勃拉莫娃：前引书，第 203 页。

UNESCO,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5—19 世纪非洲奴隶贸易》), 1979, pp.52, 95, 253.

费奇：前引书，第 164 页。

足够的黄金”。可是，廷巴克图位于何方？没有一个欧洲人知道。在当时欧洲出版的地理书上，马里地图只画着著名马里国王穆萨的头像。尼日尔河是非洲的一条大河，但它源于何地，又流向何方？欧洲人依然承袭公元初托勒密的说法，认为尼日尔河几乎横贯非洲大陆，从埃塞俄比亚流向西非海岸。此外，闻名于世的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它来自雪山灌注的大湖，还是出自茫茫沼泽？刚果河和尼日尔河是同一条河吗？非洲内陆居住着多少居民？当地有什么物产？……这一系列令人迷惘的问题都摆在欧洲资产阶级面前。有人形象地描述欧洲对非洲内陆的无知：有关非洲内陆的地图“仍然是一片空白。地理学家们……用犹豫不决的手，在地图上标出几条未经勘察的河流和尚未核实国家”。

十分明显，要把非洲变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首先必须破除对非洲内陆的无知，打通自沿海进入内陆的交通，了解内陆地区的地形地貌、人口分布、物产资源等情况。否则，西方对非洲的殖民计划将成为泡影。

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对尼罗河上游的青尼罗河进行探险考察，揭开了内陆探险的序幕。1788年，英国成立了促进非洲内陆考察协会（简称非洲协会），把探险目标首先瞄准尼日尔河，并组织探险队进入内陆勘察。1831年，非洲协会合并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直接受政府支持，声势更加逼人。法国不甘落后，于1821年成立了巴黎地理学会。为掀起内陆探险的热潮，该学会竟以一万法郎为赏金，奖励进入廷巴克图的第一人。在这种形势下，内陆探险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内陆探险始于1769年布鲁斯的尼罗河之行，止于1876布鲁塞尔会议，历时100多年。在内陆探险中，数以百计的西方探险家或探险队进入非洲内陆，他们的活动大致可分为西非、南非东南非、东非东北非、北非四个地区。

对西非内陆的探险，主要围绕着尼日尔河进行。

英国非洲协会成立后，首先把目标放在尼日尔河。他们力图通过对尼日尔河的勘察，打开以廷巴克图为中心的苏丹市场。非洲协会成立不久就着手组织探险。首批派往尼日尔河探险的是美国人约翰·莱迪亚德和英国驻摩洛哥副领事西蒙·卢卡斯。莱迪亚德从开罗启程，前往尼日尔河；而卢卡斯则从黎波里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进入尼日尔河。两人均无佳音，莱迪亚德在开罗服药过量身亡，卢卡斯则在途中遇战无法前进而返回。

非洲协会决定改变探险路线，从西非进入尼日尔河。承担这次探险任务的是曾服役于英国驻摩洛哥领事馆及驻塞内加尔要塞的退休军官丹尼尔·霍顿。非洲协会指示霍顿，探险的任务是调查和报告尼日尔河的起源、流程、终点以及有关沿岸各族居民的状况。霍顿于1790年出发，安全抵达冈比亚。之后灾难接踵而来，先是行李毁于大火，接着手枪走火打伤了手臂和脸部，不久又染上热病。大约在1791年时，他突然死去。

当霍顿的死讯传到伦敦时，非洲协会已筹备了另一次探险。他们物色了苏格兰青年蒙哥·帕克负责这次探险。帕克出身于农场主家庭，在爱丁堡大

C.Hibbert, *Africa Explored, Europeans in the Dark Continent, 1769—1889* (《非洲探险，欧洲人在黑暗大陆》), London 1982, p.19.

Hibbert, *op.cit.*, p.19.

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此后的探险活动直接构成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内容，其性质与内陆探险已经不同。

学完成了医学专业的学习。非洲协会与帕克订立了合同，除支付佣金外，还提供 200 英镑的活动经费。协会下达的探险任务是：“确定尼日尔河的河道，可能的话，探明其源头和终点。尽最大努力访问沿河的主要城镇。”帕克临行前表示：“若我死于途中，那我心甘情愿地把希望和期待与我本人一起埋葬；若我成功地让国民进一步了解非洲地理，实现他们的期望，并打开工业的新财源和商业的新渠道，那我将接受人们的致敬。”1795 年 6 月，帕克抵达非洲，他在塞内冈比亚的比萨尼亚住了五个月，学习当地的曼迪语，然后在一名译员和一名仆人陪同下向东进发。他们途经麦迪纳和卡尔塔等地，到达贝诺思，被当地素丹囚禁了三个月。1796 年 6 月，帕克只身逃离贝诺思，向塞古方向走去。7 月 20 日，他终于见到了尼日尔河：“经过四个大村庄，在八点钟见到了塞古上方的烟雾，……我无限喜悦，这次使命的目标、梦寐以求和壮丽的尼日尔河在晨曦中波光粼粼，它像流经威斯敏斯特的泰晤士河一样宽阔，悠然东去。”帕克原计划直赴廷巴克图，但不久因染上热病，无法继续探险，只得沿原路返回，并于 1797 年回国。

帕克第一次探险证实尼日尔河的朝东流向，从而纠正了欧洲地理学界长期信奉利奥·阿非利加关于尼日尔河西流的错误说法。然而，对于尼日尔河的流程和终点，帕克仍没能揭示。他回国后表示：“关于这条大河更远的流程和最后的出口处，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当地人似乎都一无所知。……他们认为，它一直流到世界的尽头。”为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直接出面组织探险。1805 年，英国殖民部国务大臣通知帕克：“一个小型探险队将派往非洲内陆，其目的是发现和确定对于非洲土著居民和英王陛下臣民都有利的商业活动。我受英王陛下委托特通知你，英王陛下选中你来领导这次探险。……探险队应尽可能沿尼日尔河而行，并与两岸不同民族建立联系和交往，以了解当地的有关情况。”英国政府为这次探险提供了 9000 英镑经费。1805 年 3 月，帕克率由 45 人组成的探险队到达西非海岸；5 月，他们离开比萨尼亚前往塞古。沿途有 30 名队员因不适酷热气候或染上热病而死。帕克和幸存者在巴马科乘独木舟顺尼日尔河而下，直至散散丁。帕克计划自散散丁继续下漂，直抵出海口，但在布萨急滩遇难，无一生还。

拿破仑战争一度转移了人们对非洲的视线。战后，对尼日尔河的探险又重新活跃起来。1815 年，英国政府组织了两支探险队：武装陆上探险队由冈比亚走陆路赴尼日尔河；由海军军官率领的水上探险队坐船沿刚果河而上。两支探险队都中途受阻：陆上探险队在途中遭当地居民反抗，没能抵达尼日尔河；水上探险队因海军军官们先后得热病而死，而探险队船只又在下刚果河受急流所阻，无法前进。

1817 年，非洲协会决定再次改变探险路线，由北非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后进入内陆。其实早在 1798 年，非洲协会就曾派遣一位德国牧师之子弗里德里希·霍内曼扮装成阿拉伯商人，由开罗进入费赞的迈尔祖格，然后越过撒哈拉沙漠抵达博尔努，并继续前进至卡齐纳。霍内曼在卡齐纳死于赤痢。

Hibbert, op. cit., p.56.

Mungo Park's Travel in Africa, Edinburgh 1885, p.6.

Mungo Park, op.cit., p.152.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411 页。

Hibbert, op.cit., p.75.

这次，非洲协会派遣约瑟夫·里奇和乔治·莱昂沿霍内曼的路线前进。然而，里奇死于迈尔祖格，莱昂则半途折回。莱昂回国后，认为尼日尔河与尼罗河是同河异名。

1822年，英国政府派遣伍德内、克拉伯顿和德纳姆借道北非进入内陆。他们从黎波里出发，向南穿越了撒哈拉沙漠，于1823年2月3日抵达乍得湖，成为首批发现乍得湖的欧洲人。由于德纳姆认为乍得湖很可能是探险的关键所在，因此探险队沿乍得湖前往库卡。在库卡国王帮助下，他们对乍得湖区及四周城镇进行了考察，并发现了沙里河。探险途中，德纳姆与伍德内、克拉伯顿意见不和，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因此决定分头行动。德纳姆于1824年1月单独南下，他先后前往乍得湖的东端和北端，但为战事所阻，都未能如愿。伍德内和克拉伯顿于1823年底离开库卡，乘木筏走水路抵达贝拉，然后西行。伍德内于1824年1月12日在摩尔摩尔得病去世。克拉伯顿继续前进，于同年3月到达素科托帝国首都素科托，素丹贝洛热情接待了他，两人多次交谈。克拉伯顿劝说贝洛与英国建立交往，并吹嘘说：“英王有力量使你成为非洲最伟大的人物。”在克拉伯顿的游说下，贝洛同意致函英王乔治四世，并与英国建立通商关系。贝洛给克拉伯顿画了尼日尔河的草图，指出从几内亚湾的尼日尔河口溯流而上，可抵豪萨地区。克拉伯顿希望去尼日尔河，遭贝洛拒绝。于是克拉伯顿只得经卡诺返回库卡，与德纳姆会合后于1825年6月返回英国。

克拉伯顿等三人的探险带回了不少宝贵的内陆资料，但尼日尔河之谜仍未解开。1825年，克拉伯顿受政府委托，再赴非洲。同行的有20岁的仆人兰德尔以及一些海军军官、医生及其它随从人员。探险队在贝宁湾上岸后直奔巴达格里，然后折向约鲁巴。沿途大部分探险队成员忍受不了旅途艰辛及热病的袭击，先后死去。1826年7月，克拉伯顿和兰德尔抵达布萨，并向当地居民了解了帕克一行丧生的情况。从布萨渡过尼日尔河，进入卡诺。由于克拉伯顿一路患病，因此在卡诺小住二月以恢复体力。雨季过后，克拉伯顿赶往素科托，他发现贝洛的态度发生变化，已无心与英国打交道。克拉伯顿愁病交加，于1827年4月死去。

克拉伯顿死后，兰德尔计划北上取道费赞回国，但在卡诺因故改道南下，抵达巴达格里，最后搭船经好望角返回英国。

1830年，兰德尔兄弟受英国政府之命，再去非洲。他们在巴达格里附近上岸，步行到布萨。在当地酋长帮助下，他们乘独木舟顺流而下，10月25日在途中发现了尼日尔河最大的支流贝努埃河。11月16日，他们抵达布腊斯，最终证实尼日尔河河口就是欧洲商人熟知的油河河口。至此，对尼日尔河的探险告一段落。

当人们努力探索尼日尔河之谜时，法国人莫利昂于1818年探明了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的源头。

1826年，英国人莱恩受政府派遣，取道的黎波里，经由费赞，穿过撒哈拉沙漠，在一支阿拉伯商队帮助下于同年8月进入廷巴克图。但莱恩死于返回途中。

1827年，法国人勒内·卡耶扮装成阿拉伯人，从几内亚出发，在库鲁萨渡过尼日尔河，抵达杰内，然后由水路赴廷巴克图的港口卡巴拉。4月20日，

他由卡巴拉进入廷巴克图，并在城中住了数月，返回时，他穿越了撒哈拉沙漠，在丹吉尔搭船回国。卡耶回国后，绘制了一幅详尽的廷巴克图城市地图。至此，廷巴克图的秘密也被揭开了。

1850年3月，英国人理查森、德国人巴特和奥弗韦格组成的探险队从黎波里启程，跨过撒哈拉沙漠，进入内陆考察，理查森和奥弗韦格先后死于途中。巴特单独考察了卡诺、博尔努、尼日尔河中段及其支流贝努埃河、乍得湖、廷巴克图、戈戈（桑海帝国古都）和索科托等广大中苏丹和西苏丹地区，历时五年，行程一万英里。他在考察探险中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人们了解西非内陆创造了条件。巴特探险活动的完成，标志着对西非的探险已基本结束。

内陆探险的另一重要地区是南非和东南非，完成这个地区探险任务的是英国著名的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顿。

利文斯顿于1813年出生在布兰太尔一个贫穷的茶叶商家庭，童年生活贫寒，10岁进工厂当童工。在笃信基督教的双亲的影响下，他长大后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1840年，他受伦敦宣教会派遣，前往南非库罗曼传教。为了扩大传教范围，他不断深入南非内陆。1849年8月1日，他跨越卡拉哈里沙漠后发现了恩加米湖；1851年8月3日，他又发现了巨大的赞比西河。

在非洲的长期生活，使利文斯顿亲眼目击了奴隶贸易的种种罪恶。奴隶贸易不但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严重影响了他的传教活动，于是，他决心投身探险，开辟一条自沿海进入内陆的商道，用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他表示：“地理学成就的终点（即是）传教事业的起点。”从1852年起，他开始了长期的探险生活。

1853—1856年，利文斯顿进行了第一次探险。他在马科洛洛人酋长塞克勒土的帮助下，于1853年11月从巴罗策兰动身，溯赞比西河而上，抵达迪洛洛湖，然后渡过宽果河进入葡萄牙设在安哥拉内陆的第一个兵站。1854年5月，利文斯顿进入非洲西海岸城市罗安达。休息数月后，他于9月沿原路返回，并于1855年9月抵达巴罗策兰。内陆至西海岸的道路崎岖难行，不是理想的商道，因此利文斯顿计划东行。马科洛洛人再次伸出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了大量脚伕、牲口和其他物资。利文斯顿沿赞比西河东进，在利尼安提不远遇到了一个巨大瀑布，为表示对英国女王的敬意，他取名为“维多利亚瀑布”。绕过大瀑布，他继续沿赞比西河进入葡属东非，1856年5月20日终于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克利马内。这样，利文斯顿在两年多时间里自西向东横越了非洲大陆，被誉为横越非洲第一人。

利文斯顿自发的探险活动客观上迎合了英国殖民政策的需要，因此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重视。他于1856年返回英国时，受到隆重热烈欢迎，英国女王亲自接见了。英国政府支持他重赴非洲，对赞比西河流域进行勘察，并帮助他组织了探险队和提供了大量物资。外交部任命他为英国驻克利马内领事，主管东非海岸和内陆独立地区，指挥对东非和中非考察的探险队。英国政府规定探险队的任务是：“扩大已经获得的有关东非、中非的地理、矿产和农业资源的知识”，“增进对当地居民的了解”。1858年5月，探险队

罗伯特·罗特伯格：前引书，第423页。

W.G.Blaikie, op.cit., p.247.

Hibbert, op.cit., p.274.

到达赞比西河口，坐船溯河而上，在距太特 20 英里的卡布拉巴萨遇急流受阻。1859 年，利文斯顿转而勘察赞比西河支流希雷河。该河多急流，利文斯顿只得弃船而走陆路，他先后发现了奇尔瓦湖和尼亚萨湖。在勘察希雷河过程中，利文斯顿专程考察了尼亚萨湖以南的希雷高地。1862 年，他又对赞比西河的另一支流鲁伍马河进行勘察，发现该河也多急流，同样难以航船。事实证明，赞比西河无法成为理想的水上商道。1863 年，利文斯顿计划对希雷河进行深入勘察，可是刚开始行动，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的召回电。由于利文斯顿在探险过程中不断揭露和抨击葡萄牙人从事奴隶贸易的罪恶活动，葡政府十分恼火，因而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电令利文斯顿中止探险，返回英国。利文斯顿的第二次探险中途夭折。

1866 年初，利文斯顿第三次进入非洲探险。他从桑给巴尔出发，溯鲁伍马河而上，对尼亚萨湖进行勘察。接着他又折向西北，从坦噶尼喀湖西行考察了姆韦鲁湖和班韦乌卢湖。1871 年，他抵达刚果河上游的卢阿拉巴河。1871 年 10 月，利文斯顿返回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季季后，会见了专程前来寻找他的《纽约先驱报》记者斯坦利。他们两人共同对坦噶尼喀湖的考察，使利文斯顿推翻了他原先认为坦噶尼喀湖是尼罗河源头的推测。他谢绝了斯坦利希望他回国的建议，又继续对班韦乌卢湖作进一步勘查。长期艰苦的探险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3 年 5 月 1 日，他终于在班韦乌卢湖边的奇坦博村病逝。

对于东非和东北非的探险，主要围绕着寻找尼罗河源头而展开的。

最早探索尼罗河源头的是原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苏格兰人布鲁斯。1769 年，他经红海抵达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然后南行经提格雷至冈达尔。利用给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统治者腊斯·米恰尔之子哈华耶特治病的机会，布鲁斯赢得了米恰尔的信任，被任命为国王内室官员，在米恰尔的帮助下，1770 年 5 月，他前往提西萨特瀑布考察，同年 11 月，他渡过青尼罗河，抵达吉西的沼泽地带。布鲁斯认为这块沼泽地区便是尼罗河的源头。1771 年 12 月，他途经森纳尔，穿过努比亚沙漠，从开罗回国。

1840 年代中期，英国行教会的德国籍传教士克拉普夫和雷布曼受命在蒙巴萨建立传教站。为把传教活动推向内陆，1848 年，雷布曼离开蒙巴萨西行，5 月 11 日在贾加发现了白雪覆顶的乞力马扎罗山。同年 7 月，克拉普夫南行前往乌萨巴拉，年底见到了肯尼亚山，并测定了达那河。雷布曼和克拉普夫还听当地居民说，内陆有个巨大的“乌季季海”。他们的发现引起了英国国内极大的兴趣。由于英国控制埃及的形势已经明朗，因此英国政府急于找到和控制尼罗河源头，以巩固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势力。雷布曼和克拉普夫的探险为寻找尼罗河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为探明尼罗河源头，在英国外交部和皇家地理学会支持下，伯顿和斯皮克于 1856 年底专程拜访了雷布曼，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1857 年 6 月，他们向内陆进发，寻找“乌季季海”。同年 11 月，伯顿和斯皮克到达塔波拉，得知所谓“乌季季海”实际上只是几个大湖。伯顿意识到这些大湖可能与尼罗河源头有关，决定西行实地查看，1858 年 2 月 13 日，伯顿首先见到了坦噶尼喀湖。5 月，伯顿因身体不适，返回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季季休养。斯皮

布鲁斯实际上仅到达了青尼罗河源头附近，准确地说，青尼罗河源头在巴哈达尔附近的塔纳湖。因此，对于白尼罗河及其源头，布鲁斯的探险活动并没涉及。

克单独勘查，他于7月30日看见了另一大湖，他取名为维多利亚湖。斯皮克认为此湖就是尼罗河源头，他说：“我丝豪不再怀疑，正是我脚下的这个湖，孕育了那条引人入胜的河（尼罗河）。而尼罗河的发源地，早已引起众说纷纭的臆测，成为许多探险家寻访的目标。”

斯皮克回国后，宣布他已找到了尼罗河源头。结果引起争论，许多人对斯皮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为了证实维多利亚湖确是尼罗河源头，1859年5月，斯皮克受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与好友格兰特同返非洲。他俩由桑给巴尔启程经塔波拉，然后北折至卡拉圭。格兰特因腿部感染，不便行走，就留在当地养病。斯皮克继续北上，于1862年初抵达布干达，并会见了布干达国王穆特萨。7月，他继续前进，终于在7月28日看见了维多利亚湖泻入白尼罗河的瀑布。这一发现证实了他以前的说法，他高兴地说：“尼罗河老爹毫无疑问就是从维多利亚湖涌出来的，而且正如我预言的那样，这湖就是尼罗河伟大的发源地。”斯皮克把这瀑布定名为里彭瀑布。斯皮克在布尼奥罗与格兰特会合时，听当地人说，往西还有一个大湖。由于他急于返回英国，因此不再西进。1863年2月，他们在冈多科罗遇见贝克夫妇，斯皮克建议贝克去寻找那个未知的大湖。他对贝克介绍了情况，格兰特还特地绘制了一张草图。贝克夫妇越过布尼奥罗，于1864年3月14日看见了这个大湖，并取名为阿尔伯特湖。贝克沿湖勘察，发现尼罗河注入阿尔伯特湖，然后又从东端流出，因而证实阿尔伯特湖也是尼罗河的源头。至此，关于尼罗河源头的探险活动也告结束。

西方对北非比较熟悉。在内陆探险期间，欧洲探险家在北非的活动也相对薄弱些。

1791年，英国人布朗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行走300英里，穿越沙漠后抵达西瓦，之后返回开罗。以后他又两次深入北非内陆，并把探险见闻笔录成书。

1809年，瑞士青年伯克哈特从叙利亚抵达埃及，他乔装成土耳其人进入内陆，途经柏柏尔，抵达尚迪和萨瓦金。

1869—1874年，普鲁士人纳赫蒂加尔取道的黎波里，经迈尔祖克抵费赞，先后访问了瓦达伊和达尔富尔地区。他返回欧洲后，撰写了《撒哈拉和苏丹》一书，为人们了解北非提供了宝贵资料。

内陆探险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通过内陆探险，西方掌握了非洲内陆的地理、物产、人口和语言等各方面情况，这不但为西方工业资本拓宽了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也为日后垄断资本瓜分非洲准备了条件。

英国是内陆探险的主角。英国在内陆探险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它探险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从而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占有欲最强烈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陆探险实质。

在内陆探险中，数以百计的探险家进入非洲内陆活动，他们中有不少人为献身科学或为废除奴隶贸易而投身探险（如利文斯顿、巴特等）。这些探险家以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回的顽强精神，克服了气候不适、疫病折磨及旅

佐伊·马什：前引书，第109页。

佐伊·马什：前引书，第111页。

途艰辛等各种困难，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植物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为外界了解非洲作出了贡献。

应当指出，所有探险家的活动都离不开非洲人民的帮助。非洲人民为他们提供向导、脚伕、提供食品、住宿。不少非洲居民在探险中丧生。因此，没有非洲人民的帮助，探险家们将寸步难行。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探险家们的探险成果都为西方资产阶级所攫取，成为它们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内陆探险促进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深化，为传教活动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扩展了西方的殖民势力。比如，利文斯顿的探险以废除奴隶贸易和开展合法贸易为宗旨，他在赞比西河流域的探险，为“大学中非传教团”开拓了传教场所；他对尼亚萨湖区的勘察，客观上为英国资产阶级对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渗透扫清了道路。英国资产阶级踏着利文斯顿探险的足迹，于 1891 年入侵该地区，并定名为“中非保护国”，使英国在海外又增添了一处新的殖民地。

五、西方的传教活动

早在 15 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就来到非洲，他们主要在冈比亚、黄金海岸、刚果和安哥拉等地活动。17 世纪，荷兰传教士也进入开普殖民地。但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在非洲的传教活动规模有限，也没什么成效。至 18 世纪，西方在非洲的传教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对非洲的传教活动再次高涨，其规模和范围也日益扩大。基督教新老教派纷纷成立传教组织，诸如伦敦宣教会、英国行教会、浸礼会传教会和白衣神父会等。各类传教组织都积极派遣传教士进入非洲活动。

在西非，英国于塞拉利昂建立黑人遣返地后，1806 年英国行教会便向当地派出传教团。为了训练非洲籍教士，他们在那里开办了福拉湾学院，1852 年成立了塞拉利昂教区。英国行教会传教团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1850 年已扩展到拉各斯等地，1864 年又成立了尼日尔教区。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于 1841 年向斐南多波岛派出传教士，不久又进入喀麦隆。巴塞尔传教会于 1828 年开始在黄金海岸活动；1847 年，不来梅教会的传教士也加入了传教行列。美国于 1882 年向利比里亚遣送黑人后，美国浸礼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团先后派黑人传教士去当地活动。美国传教士以利比里亚为西非的传教基地，逐步扩大传教范围，并陆续进入加蓬和尼日利亚活动。

首先进入东非活动的传教士是英国行教会派出的德国籍传教士克拉普夫和雷布曼。他俩于 1846 年在蒙巴萨附近建立了东非第一个传教站，并逐步向内陆推进。1861 年，大学中非传教团进入希雷河流域，不久因当地条件艰苦而撤往桑给巴尔。1867 年，这个传教团再次进入内陆，在坦噶的后部山区设立了传教站。1868 年，圣神会在巴加莫约建立总部，开展传教活动。在东非活动的还有伦敦宣教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团。

在南非，英国占领好望角和开普殖民地后，伦敦宣教会于 1799 年派遣传教士进入当地活动。19 世纪 20 年代后，他们的传教活动向内陆推进，扩展至贝专纳和马达贝莱人地区；40 年代，利文斯顿从贝专纳越过卡拉哈里沙漠，向北进入赞比西河北岸的巴罗策兰。法国传教士在巴苏陀兰、德国传教

士在纳米比亚也开展了传教活动。

除上述地区外，在北非和中非，也有各类传教团的活动。

传教活动自 18 世纪末兴起后，发展十分迅速。至 1830 年，已有近 150 名西方传教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活动；19 世纪末，西方各类教会在非洲的工作人员已达 8000 名之多。参加传教的国家也由英国发展到法国、美国、德国和瑞士等。

应当指出，就传教本身而言，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非洲居民的抵制。正如利文斯顿指出：“非洲土著居民对基督福音不但没有任何热爱之意，反而表现出憎恨和恐惧。……似乎他们不严加防范，基督福音就会诱使他们堕落，就会腐蚀他们深深热爱的传统制度。”事实也是如此。克拉普夫在东非传教数年，但皈依基督教的非洲居民却十分有限。

令人寻味的是，传教活动的客观作用往往独立于传教本身，而传教士的主要作用也总是超越宗教领域。英国驻非洲殖民官员约翰斯顿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士犹如殖民先锋。……他们作各种试验，然后由他人获利。他们研究的成果，使商业决定是否开步。最终我们可获得足够的资料让政府决定是否接收传教士业已开始的工作。”确实，传教士的活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传教士深入内陆，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步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和物产资源等情况。他们把这些情况向外界反映，客观上为西方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关非洲内陆的宝贵情报。比如，克拉普夫在传教之余研究斯瓦希里文，并出版了第一部斯瓦希里语字典；大学中非传教团的斯蒂尔继续克拉普夫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总结了斯瓦希里语语法。他们的工作为西方掌握东非的通用语言作了开拓性工作。

在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医院等。据统计，当时非洲 90% 的学校由传教士和教会创办、管理。他们通过传教，向非洲居民灌输基督教义，程度不同地瓦解了当地的传统宗教，抑制了人们的反抗精神。他们通过办学行医，对非洲居民实行文化思想渗透，进行奴化教育。这不但为西方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且从中培养了第一批非洲籍牧师、教师、医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这批人受到欧洲方式的思想教育，成为日后西方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约鲁巴黑人克劳瑟在英国受训后返回非洲，1864 年出任尼日尔地区主教，他公开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辩解：“非洲既无知识，又无技术……去开发其巨大的资源以改善自身状况。因此，主张非洲仅为非洲人所有，实际上是让非洲继续受到忽视。……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一个民族永远也无法超越现在的状态。”这些人由于与西方殖民利益发生各种联系，因此往往追随西方殖民者，其中不少人后来充当殖民机构中的官员，成为西方殖民利益的代理人。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传教士名为传教，实则进行赤裸裸的殖民活动。他们蛮横干涉当地内政，直接插手各种事务，成为名符其实的殖民先锋。苏格兰教会曾毫不掩饰地指出：“乌干达如果没有英国传教士先去占领，那片壮

E.Kendall, op.cit., pp.47, 68.

W.G.Blaikie, op.cit., p.91.

D.W.Nab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帝国主义在东非》), London 1981, vol.1, p.12.

E.Kendall, op.cit., p.68.

R.W.July,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80, p.323.

丽河山今天一定落入阿拉伯人或法国人之手。尼亚萨兰若不是由于苏格兰教会先到达尼亚萨湖畔，这块美好的土地今天一定属于葡萄牙。若没有麦肯齐（英国传教士）为贝专纳辛苦奔走，那块秀丽的地区早就被荷兰移民并吞了。”

毫无疑问，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抱着一腔宗教热情而来。他们除传教外，在非洲内陆整理文字，开展教育，传授欧洲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些人还为废除奴隶贸易而奔走呼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受时代的局限，他们良好的愿望往往无法实现。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和埃及沦为半殖民地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打开了埃及的大门，沉重打击了统治埃及的马木路克军事封建集团。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马木路克集团可能死灰复燃的历史条件下，以穆罕默德·阿里为代表的新地主—商人集团，彻底消灭了马木路克军事封建主，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改革，意在强兵富国。这次改革同有限的对外开放结合，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设备和人材，发展农、工、商业，使19世纪初年的埃及成为中近东最有生气的国家，也是亚非最先开始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这次改革无论在埃及和非洲历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阿里王朝的封建专制和对外扩张，始终对改革的积极潮流起着逆向作用。第二次埃土战争，在列强的武力干预下，埃及遭到失败，阿里被迫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苛刻条件。从此，改革夭折，埃及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英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埃及，阿里建立的近代化工业被冲得七零八落。在阿里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埃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一、拿破仑入侵埃及和埃及闭关锁国状态的终结

18世纪末，埃及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实际上处在马木路克军事封建集团的统治之下。掌握实权的是担任全国24个（后为16个）地区行政长官的马木路克贝伊，其中势力最大者一般担任谢赫——贝莱德（Shaikh al-Balad），即开罗行政长官。奥斯曼苏丹派驻埃及的总督按理说是埃及的最高长官，但实际上已被架空，地位类似奥斯曼宫廷派来的使节。据记载，当马木路克上层集团对总督不满意时，只需派一个穿黑袍的使者去见总督，对他说一声“走开”，总督就得滚蛋。

马木路克集团对外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视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为异端；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搞得满目疮痍。当时亲身游历过埃及的法国学者沃尔尼指出：“政治混乱、社会衰败和知识停滞使18世纪最后25年成了埃及整个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马木路克贝伊们经常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伐。仅18世纪60—80年代的短短30年里，规模较大的争斗就出现了三次，共达10年之久，致使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休。他们还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仅1769年对叙利亚的战争就消耗军费2600万英镑，死了无数青壮年。马木路克头目又是埃及的大封建主，一般拥有大片名义上仍属于奥斯曼国家所有的土地，承包这些土地的税收，仅将小部分税款作为国税上缴，而把大部分占为己有。马木路克封建主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的地方竟达70多种。至18世纪末叶，土地包税制度盛行全埃及，包税权已演变为世袭权利，并可转让或出卖，使包税人实际上成了土地所有者。当时，拥有大部分包税权的马木路克封建主控制了全埃及70%的土地。

在马木路克集团的腐败统治下，埃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埃及人口

曾超过 800 万，但到 18 世纪末已不足 300 万。劳动力缺乏和灌溉系统的残破使农业遭到破坏，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有 1/3 的耕地荒废。外贸日趋衰落，昔日地中海东部的大商港亚历山大成了仅有 8000 居民的小渔镇。埃及的文化事业也停滞不前，高等教育仅限于攻读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初等教育只是背诵《古兰经》；图书十分稀有，只有极少数宗教学者才能看书写字；全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包括几乎所有的马木路克贝伊在内；许多闻名世界的历史文物年久失修，破损崩塌。

埃及人民对马木路克封建主的黑暗统治已忍无可忍，一些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抗捐抗税，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和中下层僧侣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埃及社会正酝酿着新的变革。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侵入了埃及。

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后，位于东西方交汇处的东地中海地区便成了欧洲殖民列强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扼欧亚非三洲要冲的埃及对它们特别有吸引力。18 世纪下半叶，英国和法国在埃及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随着法国国内危机日益深重而无暇外顾，英国在这场争夺中逐渐占了上风。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不但成了欧洲反法联盟的支柱，而且大肆夺占法国的海外领地，还对法国本土实施严密的封锁，英法矛盾更趋尖锐。1798 年，为了打击英国这个最危险的对手，法国督政府决定采取转守为攻的大规模出击，并将中东、印度一线作为主攻方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埃及成了这次行动的突破点。

1798 年 5 月 19 日，拿破仑率大小作战舰只 30 余艘、运输船舰 300 余艘、士兵 35000 人、水手和其他非作战人员数千人，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启程出航。6 月 10 日，法军攻占马耳他岛。7 月 1 日，法国舰队驶抵埃及亚历山大港。驻守亚历山大的埃及军队兵力单薄，武器落后，且毫无作战准备，对法国远征军略作抵抗便屈膝投降了。拿破仑在亚历山大稍事休整后，指挥大军分水陆两路向开罗推进。7 月 13 日，法军在拉赫马尼耶—舒卜拉希特地区击溃马木路克骑兵 3000 多人。接着，法国远征军溯尼罗河而上，进抵与开罗隔河相望的因巴巴，已可望见对岸开罗大清真寺的尖塔在闪闪发光。

亚历山大的失陷和拉赫马尼耶—舒卜拉希特一战的惨败，使马木路克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当时在马木路克集团中居统治地位的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急忙召集军政头目和上层长老们商议对策。经过一番争吵，会议决定由穆拉德贝伊率数万人马过河迎战法军，易卜拉欣贝伊则坐镇河东。此时，开罗城内已是群情激昂，各阶层人民纷纷捐钱赠物，要求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然而，大多数马木路克头目和显贵则忙于将家室和财产转移出开罗。以穆拉德和易卜拉欣为首的军事指挥官，既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备战，也没有仔细摸清敌情并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

7 月 21 日，在尼罗河西大金字塔群附近的开阔地上，法军和马木路克军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字塔战役。法军参战的是近 30000 名训练有素的精锐步兵，指挥官大都久经沙场，经验丰富。马木路克方面参战的是 12000 名骑兵、20000 余名步兵、数千名民兵和 30000 余名其他勤杂人员，虽然士气很高，但武器低劣，缺乏训练，根本没有与近代欧洲军队作战的任何经验。战

H.Dodwell, 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 (《现代埃及的创立者》), Oxford 1931, p.193.

此役发生在因巴巴，实应称为因巴巴战役，但人们习惯称其为金字塔战役。

斗打响后，法军组成一个个方阵，缓缓向前移动。穆拉德贝伊立即指挥骑兵发起攻击，向法军方阵猛扑过去。法军各方阵利用精良的武器，以密集的交叉火力大量杀伤马木路克骑兵。穆拉德眼看骑兵损折过半，不得不下令撤退。这时，拿破仑发出总攻击令。法军兵分三路出击，一路攻敌左翼，一路攻敌右翼，拿破仑亲率一路从中间突破。马木路克军顶不住法军的凶猛攻势，终于全线败退，大批马木路克步骑兵走投无路，被驱入尼罗河溺死。在这次战役中，马木路克方面伤亡 10000 多人，数万人溃散，仅 3000 名残兵随穆拉德逃往埃及南部，而法军仅损失 300 人。易卜拉欣见大势已去，也率部撤往叙利亚。7 月 24 日，法军乘胜占领开罗。

正当拿破仑打算继续向东进军之时，一个沉重的打击落到了法国远征军头上。8 月 1 日，滞留亚历山大的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歼灭。驻埃及的法军与本土的联系被完全切断。由于一切军需都得就地解决，拿破仑被迫推迟实行继续东进的计划，转而全力巩固埃及这一前进基地。

9 月 2 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对法宣战。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联军从海路和陆路向埃及进逼；同时，埃及人民在各地的反法斗争此起彼伏，马木路克残部也在伺机反攻。面临这样的处境，拿破仑在进行残酷镇压和疯狂掠夺的同时，也在埃及实施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

为了加强对埃及的控制，拿破仑首先着手按资产阶级的方式组建听命于法国占领军的行政机构。在法军占领的地方，都建立了临时行政会议，协助法国人管理民政事务。1798 年 10 月初，拿破仑在开罗主持召开了全埃及国务会议，开罗和全国 16 个地区均派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会。代表团包括三名宗教长老、三名商人、一名村长、一名农民和一名部落酋长。会议以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曾任爱资哈尔教长的谢尔戈维为全埃国务会议主席。拿破仑采取的这一措施在客观上有助于加强埃及的中央集权，结束长期存在的分权状态。然而，全埃国务会议本身实际上只是从属于法国当局的傀儡机构。据记载，这个国务会议的一切活动均受到法国人特别是拿破仑本人的操纵，国务会议代表只能“解答一些必要问题，以便总司令采取适当的行动”。

马木路克集团的倾覆，意味着埃及农村的包税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拿破仑按照法国革命中没收所有逃亡者土地财产的做法，宣布没收所有已死亡或逃亡在外的马木路克封建主的土地财产，废除原由他们征收的租税。此后，埃及农村中的包税制开始消亡。拿破仑还于 1798 年 9 月 16 日颁布法令，对所有私人财产进行登记，登记后发生任何变化均须申报，由法国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机构根据登记的财产调整应缴捐税的数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军费需求。以后法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税收措施也越来越带有强制性，遭到埃及人民的强烈抵制。

拿破仑在发展工业、农业、水利和恢复外贸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法国人在埃及建立了一批食品厂、弹药厂、军服厂、机械厂等，并培养了少量埃及技术工人。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拿破仑组织力量修复灌溉系统，扩大可耕地，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还积极推广欧洲式的风磨和水磨以代替落后的手推磨，提高粮食加工效率，以致后来埃及人把风力磨坊称为“波拿巴磨坊”。

拿破仑亲率技术人员考察苏伊士地峡，打算恢复这条昔日的贸易路线，并组织勘测设计苏伊士运河。法国当局的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并加强自身的战略地位，但也在埃及推广了欧洲的先进技术。

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期间，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该团由四名法国科学院院士（蒙热、贝托莱、多洛米厄、德农）和上百名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画家、音乐家、诗人、作家和建筑师等。他们在埃及进行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考古学家们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活动，特别是深入到欧洲人以前很少去的上埃及地区，发现、辨析、解释了大量珍贵文物。那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三种铭文的罗塞达刻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被认为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当然，法国人把搞到的珍贵文物统统掠为己有，而在他们被击退后，这些珍品大都又落到了英国人手中。法国专家首次对埃及的地理和地质情况作了勘察和测量，后来绘制出了第一部埃及地图集。法国学者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为后人研究尼罗河流域的生物留下了宝贵资料。法国医生也对长期以来折磨埃及农民的眼病进行了研究，在防治方面取得了进展。文学艺术家们则在各地进行研究和创作。法国科学艺术工作团的考察和研究成果后来被逐步整理出来，形成了多卷本的巨著《埃及纪事》，向世界展示了当时埃及的全貌，至今仍是研究埃及不可缺少的百科全书。埃及历史学家在揭露法国侵略者进行文化掠夺的同时，也公允地指出：虽然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失败了，“但随行的学术调查团是成功的”。

1798年8月23日，拿破仑在开罗建立了埃及研究院，由蒙热任院长，拿破仑自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四部，并附设图书馆、印刷厂、实验室。拿破仑为研究院规定的任务是：“（1）在埃及发展和普及科学；（2）探查、研究和发表关于埃及自然、工业和历史的资料；（3）对政府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一句话，是要以法国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埃及，为巩固法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服务。

尽管拿破仑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但他毕竟是侵略者，与埃及各阶层人民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将欧洲资产阶级的一些做法硬搬到埃及，自然难以奏效。而法国占领军强制推行各项措施，必然遭到埃及人民的激烈反抗，开罗人民的两次大起义便是这一反抗运动的高潮。

1798年10月20日，法国当局颁布对所有店铺和住房征收新税的法令，立即激起了开罗人民的愤怒。次日清晨，成千上万市民和城郊农民走上开罗街头，强烈抗议法国当局的这一掠夺措施。法军开罗卫戍司令迪比闻讯，立刻带领骑兵前来镇压，悍然向人群开枪射击。愤怒的示威者操起长矛、刀剑、棍棒和石块回击，当场击毙迪比，并迅速攻占了开罗大部分街区，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了起义的中心。起义群众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周密的组织，他们既没有乘胜直捣法军司令部，也没能及时发动支持起义的城外农民前来支援。这样，拿破仑得以调兵切断开罗与外界的联系，占领了城内外的制高点。22日下午2时许，法军以重炮对爱资哈尔清真寺进行疯狂轰击，将这座举世闻名的清真寺炸成断垣残瓦。随后，法军分几路围攻爱资哈尔清真寺，经过一场血战，起义军因孤立无援、弹药耗尽而失败。在镇压这次起义后，拿破仑

穆·埃·埃米尔：《埃及学的诞生和成长》，《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

G.C.Herold, Bonaparte in Egypt (《波拿巴特在埃及》), New York 1963, p.151.

在开罗实施血腥的大屠杀，并一度解散了全埃国务会议。

1798年底，英国、俄国、奥国、奥斯曼帝国等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欧洲战端又起。拿破仑率领的法国驻埃远征军成了欧陆法军的侧翼。他决定出征叙利亚，先打垮奥斯曼帝国，然后进军英属印度。1799年2月，拿破仑率法军越过西奈攻入叙利亚。3月20日，法军开始围攻地中海沿岸的战略重镇阿克。驻守该城的奥斯曼帝国军政长官吉札尔帕夏率军拼死抵抗，并得到英国陆海军和法国保王党人的大力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战，拿破仑未能攻占阿克，伤亡惨重，损折5000余名官员，同时埃及的反法斗争又频频发生，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法军撤回埃及。7月，从欧洲传来消息，法军在欧洲战场连遭挫败，丢失了意大利。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感到在埃及难以有所作为，急欲回欧陆稳定局势，一显身手。临行，他命克莱贝尔继任驻埃法军总司令。陷于困境的克莱贝尔一面继续加强对埃及的控制，一面意欲与奥斯曼帝国媾和。但由于英国从中阻挠，法土之间的和解难以真正实现，时谈时打，互有胜负。就在这样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开罗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又爆发了。

1800年3月，克莱贝尔以英国从中作梗为由，撕毁法土之间签订的协议，并以突然袭击打垮了土军。开罗人民闻讯义愤填膺，再次拿起武器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法武装斗争。起义者以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布拉格区为基地，向全城推进，并一度攻占了法军司令部。克莱贝尔急忙调集重兵向起义军发动猛攻，并千方百计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队伍。4月上旬，在克莱贝尔的威胁利诱下，一部分马木路克头目投靠法军，起义力量被削弱。4月中旬，法军援兵不断进驻开罗，克莱贝尔下令对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布拉格区展开总攻击。这时，仍留在开罗的小股土耳其军和马木路克军先后向法军投降，起义队伍中的一些上层长老也主张妥协，只有以奥马尔·麦克莱姆和穆斯塔法·巴什提利为首的中下层群众仍坚持战斗。克莱贝尔见法军在巷战中难以占上风，竟下令纵火焚烧开罗，使这座古城化为一片火海。经过最后的浴血奋战，起义群众大都牺牲在法军屠刀之下和熊熊烈火之中，起义领袖巴什提利等人壮烈牺牲，布拉格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先后陷落。到4月21日，开罗人民的第二次反法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埃及人民的反法斗争并没有停息。起义失败后不到两个月，一个痛恨法国侵略者的热血青年便刺死了屠杀埃及人民的刽子手克莱贝尔。

继任法国远征军司令的梅努还想赖在埃及，但毕竟抵挡不住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的东西夹攻，更无法扑灭埃及人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在1801年8月底被迫向英土联军投降。10月18日，梅努率最后一批法国残兵撤出埃及，法国殖民者对埃及的三年统治就此告终。

拿破仑远征军的入侵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猛烈冲击了埃及封建社会结构，结束了它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揭开了埃及社会大变革的序幕。此后几十年里，长期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开始向前迈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埃及历史学家）将拿破仑的入侵作为埃及近代史的开端。

二、埃及社会的动荡和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建立

此处系指历史上的“大叙利亚”，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

法军虽然撤走，但埃及从此却卷入了欧洲列强争霸的漩涡之中。英国军队不但进占开罗、亚历山大等主要城市，而且竭力网罗马木路克残余势力，试图长期占领埃及，以实现控制欧亚非三大洲要冲的战略目标。奥斯曼帝国与法国本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法军入侵埃及才转而与英俄等国结盟。现在法军既已撤出埃及，奥斯曼帝国便很快与法国恢复了友好关系，以强硬的姿态抵制英国对埃及的渗透。1801年末，驻埃及的土军镇压亲英的马木路克，英军公然出兵干预，双方在埃及问题上的矛盾趋于激化。

1802年3月，英法等国签订亚眠和约，实现了欧洲大陆的休战。次年3月，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强国不断施加压力之下，英军终于被迫撤出埃及。但是，英国仍继续支持马木路克中的亲英势力在埃及一些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以便为日后再次干涉埃及作好准备。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把妄图卷土重来的马木路克视为眼中钉，竭力限制、打击其势力，冀图重新在埃及确立支配地位。法国深知英国对埃及的图谋，自然不甘示弱，也千方百计在马木路克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英国在埃及展开激烈的争夺。这样，在英法对抗的背景下，土耳其军队与马木路克之间以及马木路克内部的冲突都日益激烈，致使整个埃及继续因战乱而动荡不宁。在民族危难之际，广大埃及人民迫切需要有见识，有胆略的人物来领导他们反抗侵略，结束内乱，振兴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穆罕默德·阿里登上了埃及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出生于马其顿沿海城市卡瓦拉。他早年曾经营烟草生意，后应征入伍，成了奥期曼军队的下级军官。1799年，阿里随奥斯曼军队开赴埃及，参加抗法战争。由于他能征善战，屡建功劳，很快崭露头角，步步晋升。1803年5月，他已成为驻埃及的奥斯曼军队主力之一——阿尔巴尼亚军团的指挥官，拥有6000名精锐士兵，是埃及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敏锐地察觉到，埃及人民与英法殖民者、奥斯曼宗主国以及马木路克封建军阀的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赶走侵略者，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铲除马木路克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已成为全体埃及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他决心夺取埃及政权，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能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抗衡的强大帝国。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开始凭藉手中的军队，联合各阶层人民，利用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马木路克各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需要扫除的一大障碍是那些地位比他高、影响比他大的驻埃土耳其将领。他摆出一副谦恭的姿态，一再拥立这些人为埃及总督，然后再利用马木路克的叛乱和人民的反抗，在宫廷政变中将他们推翻。接连几任总督的倒台及其心腹和部属的覆灭，几乎使所有能与阿里匹敌的土耳其将领都一一消失了，也使除阿尔巴尼亚军团以外的驻埃奥斯曼军队基本上都被打垮了。到1803年底，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统帅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在埃及已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既是能在名义上代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的唯一实力派，又与埃及人民群众、特别是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代表的爱国者建立了良好关系，还和马木路克头目们维持着暂时的联盟。

当然，穆罕默德·阿里的心腹大患还是盘根错节的马木路克势力。他对马木路克也采取了先拉后打的策略。1804年初，在他的支持下，马木路克亲法派头目巴尔底西夺取了埃及总督的宝座，并消灭了前来镇压的奥斯曼军队。此后，阿里便开始把打击矛头指向马木路克。首先，他利用马木路克内

部亲英派和亲法派的矛盾来削弱马木路克势力。1804年2月，马木路克亲英派头目埃勒弗在英国支持下向开罗进军，妄图夺取埃及的控制权。阿里便支持巴尔底西攻击埃勒弗，一举挫败了亲英派的图谋。接着，阿里便利用人民的不满来直接推翻巴尔底西。1804年3月7日，开罗人民成群结队涌上街头，反对马木路克当局的苛捐杂税。示威很快发展为暴动，一些群众手持兵器和棍棒，向总督府发起了攻击。在这紧要关头，阿里率阿尔巴尼亚军团介入冲突，宣布支持开罗人民，随即开始进攻马木路克军。巴尔底西的统治遭此致命一击，土崩瓦解。巴尔底西等马木路克头目率残部逃出开罗，窜到上埃及沙漠，以后再也没能重占开罗并控制埃及政权。

至此，埃及的控制权实际上已落入穆罕默德·阿里手中。但是，阿里觉得自己仍没有得到人民的充分理解和奥斯曼素丹的足够信任，便再次摆出谦让姿态，请亚历山大长官古尔希德帕夏出任埃及总督。一年后，古尔希德的横征暴敛又激起人民的反抗。阿里故伎重演，再次领兵站到人民一边反对古尔希德。1805年5月13日，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首的长老召开会议，宣布废黜古尔希德，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这时，阿里才表示同意担任这一职务。7月9日，奥斯曼素丹承认阿里为埃及总督，并授予他帕夏封号。这样，穆罕默德·阿里终于夺取了埃及政权。

穆罕默德·阿里上台之初，埃及正面临着英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当时，法国与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统帅的法军在欧洲大陆上连连获胜。但是，海上的优势仍在英国手中。1805年10月，由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一举歼灭了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此后，英国统治集团决心在海上对法国实行封锁，而要做到这一点，控制埃及十分重要。1806年，英国对奥斯曼素丹施加压力，要他将穆罕默德·阿里调离埃及，以便由亲英的马木路克头目埃勒弗取而代之，但没有成功。1806年底，看到法军在欧陆已处于绝对优势，为借助法国的力量对付自己的宿敌俄国，奥斯曼帝国转而与法结盟并对英俄宣战。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唯恐埃及落入法国手中，便决定出兵抢占这一战略要冲。

1807年3月20日，英将弗雷泽率6000人攻占亚历山大。穆罕默德·阿里闻讯，一度惊慌失措。不但没有立即赴援，反而试图避免与英军遭遇。但是，广大埃及人民立即动员起来，并积极投入到抗英战争之中。3月底，英军1400人进抵拉希德（即罗塞塔）城。守城军民先诱敌入城，然后发起突袭，一举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120人，获得了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开罗人民在奥马尔·麦克莱姆等人的领导下捐钱献粮，修筑工事，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4月7日，英军再次向拉希德发起进攻。守城军民顽强抵抗，使英军伤亡惨重，难以取得进展。在全民抗英卫国的潮流推动下，穆罕默德·阿里这时才下决心抗战。4月19日，阿里亲率6000名步骑兵开赴拉希德。4月21日，依靠武装群众组成的义勇军的支持，阿里在哈马德村击溃英军。英军不得不解除对拉希德的包围，退回亚历山大。两个多月后，欧洲形势又发生突变，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俄国退出反法联盟。奥斯曼帝国对拿破仑的背信弃义十分恼怒，转而靠拢英国。这样，为了与奥斯曼帝国改善关系，也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更为咄咄逼人的法国的威胁，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结束对埃及的入侵。1807年9月，英军撤离亚历山大。借助人民的力量挫败英国入侵，使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初期消除了来自外部的直接威胁，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来清除国内隐患。

在反对法英殖民侵略、推翻马木路克统治、拥立穆罕默德·阿里的过程中，长老阶层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势力迅速扩大，并开始插手和干预国内重大事务。穆罕默德·阿里深感不安，千方百计抑制和削弱长老势力。同时，由于大量原属马木路克的土地、房屋、财产转入长老们手中，他们逐渐成为骄奢淫逸的新封建主，甚至脱离了宗教事务和传统社会职责，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也为阿里打击长老阶层提供了有利条件。1809年6月，他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长老们必须在40天之内将其管理的宗教地产的证明文件交给政府查验，否则就取消其管理权。此举使许多长老因证件不合规定或没有证件而丧失了原来掌握的宗教地产，使整个长老阶层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这时，奥马尔·麦克莱姆等长老阶层的领袖们仍以为自己十分强大，完全可以迫使阿里取消这一法令。然而，他们的估计完全错了，虽然有少数靠宗教地产为生的群众走上街头闹事，但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因这一法令而起来反对阿里政权，反而对这一打击长老的措施暗暗感到高兴。阿里抓住有利时机，分化瓦解长老集团，于8月9日断然下令革除奥马尔·麦克莱姆的贵族首领职务，将其流放杜姆亚特。许多有影响的长老纷纷倒戈投靠阿里，阿里则以金钱和神职将上层长者们一一收买。此后，长老势力一落千丈，对阿里政权已不构成什么威胁。

马木路克的残余势力也仍然困扰着阿里。他们不但依旧是埃及许多土地的包税人，而且时时发动反对阿里政权的叛乱。在对付长老势力的同时，阿里也继续狠狠打击马木路克。在1809年6月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包税人拥有的乌西叶土地不再享有免税权，包税人应将包税余额的50%上缴国库。这实际上剥夺了许多身兼包税人的马木路克封建主所享有的主要特权。1811年3月1日，阿里以庆祝他的儿子图松受命统率大军出征阿拉伯半岛为名，邀请包括所有重要的马木路克头目在内的达官显贵到撒拉丁堡出席盛大的仪式和宴会。仪式进行过程中，阿里一声令下，事先埋伏好的武士们将马木路克大小头目及侍从470人杀戮殆尽，据说仅一人逃脱。这就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撒拉丁城堡屠杀事件。此后，阿里又在全国各地搜捕并处死马木路克骨干分子数千人，彻底铲除了在埃及横行几个世纪的马木路克军事封建势力。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埃及实现了数百年未有的全国统一局面，使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趋于稳固，并为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扫清了道路。

三、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

为了实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大埃及帝国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推行规模宏大的改革计划，其核心便是采取一系列高度集权的强制性措施来促进埃及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在埃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阿里首先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前面提及，1809年6月颁布的法令已废除了包税人享有的大部分特权，取消了宗教地产享有的免税权并没收了一批宗教地产。1811年撒拉丁城堡屠杀事件后，阿里下令没收马木路克封建主的包

税土地，使其归国家所有。1813年，政府顶住长老们的抗议，又将一大批宗教地产收归国有。1814年，阿里宣布彻底废除包税制，没收了全部包税领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阿里已控制埃及绝大部分耕地。虽然他将大批土地封赐给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土耳其族的达官显贵以及一些原包税人和土著官吏豪绅，但仍有约一半土地被迅速分配给无地农民，一般每个农户能分到3—5费丹的土地。与此同时，阿里将原来由包税人随意确定的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简化纳税手续。在阿里统治初期，埃及农民的纳税额要比马木路克时期低得多。由于实行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比包税时期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的同时，国家的税收上升了。埃及学者认为，包税制的消亡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埃及古老的封建土地制度开始解体。

穆罕默德·阿里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业发展的配套措施。他组织力量兴修水利，疏通旧沟渠，开挖新运河，还加固、修筑各类堤坝。其中建于1820年的著名的马哈茂德运河，将尼罗河水引至亚历山大及其周围河网地区，扩大耕地面积达数万费丹。据估计，由于兴修水利，埃及耕地的总面积扩大了约200万费丹。由于阿里注意深挖河床，并从欧洲引进水泵，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农田由过去只能在汛期受到灌溉变为可常年灌溉，农作物由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从而改变了以前土地使用效率极低的状况。阿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农作物种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生产。他引进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他利用迅速扩大的欧洲纺织业急需原料的机会，组织力量培植优质长纤维棉花。这种棉花于1821年进入英国纺织业后颇受欢迎，此后三年埃及的棉花出口便猛增了200倍。面临棉花供不应求的形势，阿里下令全国大面积种植以供出口，结果获取了大笔外汇。在他统治时期，埃及棉花的产量剧增了数百倍。阿里还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农业生产的机构，集中控制各地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和面积，对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并向一些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

由于以上这些改革措施，饱受磨难的埃及农民在阿里统治的初期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热情有较大提高。埃及农村的生产力因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埃及的人口也随之增加，1847年达到450万左右。

穆罕默德·阿里还采取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和大力发展官办工厂的方针，努力建立埃及自己的民族工业。他注重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专家，吸收资金，使埃及民族工业在初创时期便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阿里的工业政策首先着眼于增强埃及的军事实力。埃及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制硝厂、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在法国等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开罗兵工厂每月生产步枪近千枝，还能铸造24英寸的

C.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中东经济史》), Chicago 1966, p.404.

穆·艾尼斯、赛·哈拉兹：前引书，第23页。

G.Kir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中东简史》), London 1959, p.81.

J.Marlowe,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3* (《英埃关系》), London 1954, p.50.

巨炮。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占地 60 费丹，工人最多时达 8000 人。当时参观过这个造船厂的欧洲官员记叙道，该厂生产的战舰配备上百门大炮，其战斗力丝毫不比欧美各国生产的最新式战舰逊色。

纺织、造纸、玻璃、制糖、榨油、扎棉、印刷、粮食加工、靛青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快，到 1829 年已建立了近 30 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 1459 台、织布机 1215 台。据统计，到 1838 年，阿里用于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至少达 1200 万英镑。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埃及人已有 3—4 万，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 1%，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经过阿里的大力扶植，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近代民族工业已初见规模。

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埃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不但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开始大量出口。为发展商业和外贸，恢复埃及昔日所具有的欧亚非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大兴土木，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并采取措施改革货币制度。结果，开罗等城市又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上千名外国商人和商务官员常驻该城。1800 年，埃及的外贸总额仅为 26.9 万埃镑；到 1823 年，上升到 211.14 万埃镑；到 1838 年，更高达 350 万埃镑。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埃及经济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埃及国库的收入也直线上升：1798 年仅为 15.8 万埃镑，1818 年跃升至 150.2 万埃镑，1833 年超过了 242 万埃镑，到 1842 年已接近 300 万埃镑。

由于法英殖民者用枪炮打开了埃及的大门，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对外开放的特点。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又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从埃及面临的外部环境看，由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相互争斗仍对埃及形成严重威胁，所以阿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得不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法国人早就提出了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开凿运河的设想，英国建议修筑一条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铁路，但均遭阿里拒绝，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有损埃及的主权。阿里在举借外债方面也始终非常谨慎，以避免外国的经济渗透。其次，从阿里改革本身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高度的集权性来看，由于政府对工业、农业、商业和外贸实行严格的垄断式控制，外国商品和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入埃及。阿里不顾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一系列特惠条约，采取提高关税、政府包办等手段来控制进口贸易，使国内市场 and 民族工业免遭外国倾销商品的冲击。阿里虽也允许少数外国人在埃及投资办企业，但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使之难以发展。因此，在阿里时期，到埃及投资的外国人实在是微乎其微。

Issawi, op.cit., p.362.

Issawi, op.cit., p.362.

Issaw, op.cit., p.363.

Issawi, op.cit., p.405.

从 16 世纪上半叶开始，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商约，单方面给予欧洲商人许多优惠。这些条约称为“特惠条约”（Capitulation，也译为“治外法权条约”，“外侨权利”）。当欧洲列强向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进行殖民扩张时，这些条约便逐渐演变为不平等条约了。

四、穆罕默德·阿里的政治、文化、军事改革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统一全埃及虽已实现，但长期分裂和割据留给这个国家的后遗症却不是军事机器可以消除的。为此，阿里大力阔斧地改革行政制度，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阿里仿效欧美国家，建立了内阁。埃及的内阁称为国务会议，下设贸易和外交、教育、建设、工程、陆军、海军六个部（1837年后取消建设、工程两部，设立工业、财政、内务三部，改为七个部）。国务会议一般由副总督主持日常工作，但各部部长都由阿里亲自任免，重大决策也由阿里亲自定夺。阿里为标榜民主，建立了咨议会，由政府官员、宗教学者、贵族豪绅和一些其他知名人士组成，议长由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担任。这个机构每年开一次会，审议一些无关紧要的提案，实际上只有咨议权，没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其他任何权力。阿里下令把法国占领时期划分的16个行政区合并为7个省，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下设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村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村长、土地丈量员、税务员和全权证人等专职官员。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严密而完备的行政网络，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使阿里在各个领域里进行的改革能迅速显示出成效。

在文化教育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一上台就面临重要抉择：是严格限制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还是引进、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少达官显贵和宗教长老视西方的影响为洪水猛兽，力主在文化方面恢复闭关锁国政策。但阿里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要推动改革和振兴埃及，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

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尽快为自己的改革振兴计划提供专业技术干部，聘请许多外国专家来埃及讲学和传授技术，并选派大批埃及青年去欧洲留学。当时，来自欧美各国的专家纷纷应聘到埃及的工厂、学校、军队担任顾问。1813年，首批埃及青年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军事。1826年，44名埃及学生被派往西欧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学、艺术和考古。到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各国的埃及留学生已超过300人，其中不少人学成回国后在军政部门承担了重任。

此外，穆罕默德·阿里靠拿破仑带来的一台阿拉伯文印刷机起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印刷厂——布拉格印刷厂。在这之前，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书稿多为手抄本，讹误甚多，流传不广。有了印刷厂后，很多名著纷纷问世、迅速推广，使专家学者的工作和研究得到极大促进。阿里在位时期，埃及出现了都苏基、谢尔戈维、德尔威什、希哈本丁等著名学者。阿里开办的语言学院还培养出许多有才能的翻译人员，把大批西文的军事、科技、政治、文化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第一批被译成阿拉伯文出版的就有法国军事条例、拿破仑法典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最新杰作。阿里还在埃及首次创办了阿拉伯文报纸——《埃及记事》，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上这些措施，使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出现了前几个世纪所没有的繁荣景象，为埃及培养了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而在思想、技术、人才等方面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里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实行改革。他指挥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原先是有

一定战斗力的，但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军官接受封赐成了新地主，只关心如何发财致富，根本无心再过问军事事务；老兵日趋减少，来自各民族的新兵没有实战经验，平时又缺乏正规训练。除阿尔巴尼亚军团外，其他一些奥斯曼军队和埃及土著军队素质更差，装备简陋，纪律松弛，经常劫掠百姓。阿里曾试图将这些旧军队改造成欧洲式的新军，结果反而引起旧军官们的强烈反对，触发了一场军事叛乱。在平定了这场叛乱后，阿里决心改变方针，另外组建一支全新的军队。

穆罕默德·阿里十分崇尚拿破仑治军的办法，因而决定按照拿破仑的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新军。他聘任曾随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法国军官塞夫上校（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苏莱曼帕夏）为自己的军事顾问，在组建新军方面对此人言听计从。他又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请来许多军事教官，在埃及办起军官学校、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各类军事专门学校，培养出一批批新型军官。他废除了埃及传统的雇佣兵制度，开始实行征兵制，将埃及农民作为主要兵源，为新军招来了大批体格健壮、淳厚朴实的农家子弟。他按照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套办法组建和训练新军，以最新式的火炮和步枪装备军队。在组建新军过程中，他特别致力于创造一支实力雄厚的海军。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建立了两支舰队——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拥有大小战舰32艘、海军官兵2万人。同一时期，埃及陆军也迅速扩大，总兵力已超过20万人。阿里除从西欧进口武器外，主要依靠自己制造武器，使埃及军事工业飞速发展，为阿里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与经济改革一样，都是有利于巩固埃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是为阿里王朝的对外扩张服务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封建性。但是也必须看到，阿里的各项改革措施客观上使拿破仑冲开的埃及大门开得更大了，有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进入埃及，因而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成长。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存在许多缺陷，最终因若干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而遭致失败，但其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却是不容抹煞的。它推动了埃及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几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为埃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增强了埃及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埃及文化的繁荣，使19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出现了复兴局面，进而成为中东一强。它不但使埃及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实际上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大大推迟了欧洲殖民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扬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

五、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

穆罕默德·阿里进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称霸近东的大帝国，因而当改革使埃及的国力步步增强之时，他的对外扩张也逐步升级。正是这一

马克思：《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31页。

狂热的对外扩张耗费了埃及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使阿里改革的成果逐步被葬送。从 1811 年开始，阿里发动的对外战争持续不断，历时约 30 年。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 20 年（1811—1831 年），阿里打着奥斯曼苏丹的旗号实行扩张；第二阶段是后 10 年（1831—1841 年），阿里直接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妄图推倒宗主国并取而代之。

19 世纪上半叶的奥斯曼帝国已日趋衰弱，欧洲列强的瓜分阴谋从外部威胁着它，各属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则从内部动摇着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及的改革开放和独立倾向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并冀图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一种表现。奥斯曼苏丹早已看出了阿里的野心，但又无力抑制其迅速增长的势力。同时，巴尔干、西亚和北非的民族运动也使伊斯坦布尔的决策人物穷于应付，招架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苏丹便决定利用阿里的强大军事机器来镇压其他属地的民族运动，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扑灭一些地区的反抗烈火，又削弱阿里的力量。

18 世纪下半叶，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逐渐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1793 年，沙特家族的酋长开始兼任瓦哈比教派的教长，从此确立了沙特政教合一的体制。到 19 世纪初叶，沙特家族的势力已北达巴格达近郊、南抵亚丁湾，控制了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沙特家族公开宣称要由阿拉伯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瓦哈比教派则以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作为其政治主张。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对阿拉伯半岛上的造反潮流十分惊恐，多次派兵进剿，均遭失败，不得不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当时，阿里还没全面推行改革，国内问题成堆，但因素丹的要求符合自己的扩张意图，便同意出兵。1811 年 9 月，阿里派儿子图松率一万大军侵入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徒在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1803—1814 年任酋长兼教长，号称“大沙特”）率领下，以游击战术杀伤埃军，仅在绍姆谷会战中就使埃军损折 5000 余人。但图松的大军毕竟武器精良，且能不断得到增援，经过一年多苦战，终于占领了包括麦加、麦地那在内的许多重要城镇。但是，大沙特仍然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坚持抵抗，使埃及军难以巩固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率军亲征，双方又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1814 年，大沙特去世。此后，沙特家族内部一度因争夺酋长职位而发生内讧，削弱了自身；同时，继承大沙特的阿卜杜拉·本·沙特（1814—1818 年在位）又放弃了游击战术，与埃军硬拼，致使沙特军队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杀伤。1815 年，阿卜杜拉·本·沙特不得不屈膝求和。1816 年，阿卜杜拉·本·沙特率瓦哈比教徒再次发动起义，阿里派能征善战而又残酷无情的长子易卜拉欣率军讨伐，采取断水源、砍树木、焚粮草、杀百姓的野蛮手段对付起义军。1818 年 3 月，易卜拉欣在攻占了大部分起义军的据点后，开始围攻沙特家族的根据地德拉伊叶。经过半年多的残酷战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阿卜杜拉·本·沙特被迫投降，后被奥斯曼苏丹处死。埃军仅在攻克德拉伊叶的战斗中就死亡 1 万人，而在整个历时十年的战斗中估计至少死亡 10 万人。穆罕默德·阿里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了第一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易卜拉欣被苏丹任命为汉志省督，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处于埃及的统治之下。

接着，穆罕默德·阿里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埃及南面的苏丹。阿里的改革措施当时正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人力、财力的不足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持续十年的阿拉伯半岛战事又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阿里听说苏丹

遍地是金银宝石、那里的黑人又十分骁勇善战，便指望以侵占苏丹来弥补兵员、劳力的损耗和国库的亏空，一小撮马木路克盘据苏丹北部并时常侵扰埃及边境，为阿里对苏丹大动干戈提供了口实。1820年，阿里以追击马木路克残部为由，派三子伊斯梅尔率4000名士兵和24门大炮，溯尼罗河而上，侵入苏丹。由于在栋古拉的马木路克残兵闻风逃走，伊斯梅尔一枪未发便占领了该城。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当地的舍基亚部落却奋起抗击埃及入侵者。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伊斯梅尔轻易地击溃了舍基亚人。此后，伊斯梅尔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散纳尔王国挺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伊斯梅尔率军兵临散纳尔城下时，散纳尔王国末代国王巴迪打开城门向埃军投降。1821年春，阿里又派女婿穆罕默德贝伊率4000名士兵和10门大炮，穿过沙漠向达尔富尔王国挺进。1821年9月，在其都城乌拜伊德北面的拉腊，穆罕默德以先进的枪炮击溃了达尔富尔王国的军队，随即占领了乌拜伊德。两年之内，埃及军队便灭亡了苏丹两个最大的古老国家，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但是，许多苏丹中小部落的反抗并没停止。各地的反埃武装斗争仍此起彼伏，使埃及占领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伊斯梅尔本人也在苏丹部落酋长向埃军发动的一次夜袭中被烧死。为了对伊斯梅尔被杀一事进行报复，阿里一次就屠杀了约5000名无辜的老百姓。直到1824年，埃及占领军才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镇压下去，但撤入山区的苏丹部落武装进行的零星抵抗此后始终没有绝迹。阿里虽然将埃及的疆域向南推进了6000公里，却没有搞到多少金银财宝，也没有获得大量兵源和劳动力，只是使自己的改革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1821年，希腊人民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腐败的奥斯曼陆海军节节败退，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素丹马哈茂德二世被迫再次求助于埃及，并答应在埃军平定希腊后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管辖权授予穆罕默德·阿里。此时，埃及经济、军事实力由于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而大大增强，埃军对苏丹的征服又进行得较为顺利，这使阿里更加踌躇满志，便欣然同意了素丹的要求。1822年，埃军首先攻占了克里特岛。1824年7月，阿里派易卜拉欣率2万名陆军士兵和由200余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渡海赴希腊，易卜拉欣被素丹任命为希腊摩里亚半岛（即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总督。1825年2月，埃军在摩里亚南端的麦索尼登陆，随即向希腊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希腊起义军内部不团结，易卡拉欣连连取胜，到1825年底已占领了几乎整个摩里亚半岛。接着，他又率军帮助土耳其人攻克了希腊起义军长期固守的战略重镇梅索朗吉昂，破城后烧杀劫掠数日，使该城成为一片废墟。此后，希腊的古都雅典也落入土埃军手中，希腊独立运动已处于极其危难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在希腊问题上明争暗斗的英、法、俄三国，现在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形成了暂时的联盟，决定援希反土。1827年10月20日，英法俄联合舰队发动突袭，在纳瓦里诺海湾一举歼灭土埃联合舰队。阿里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埃及海军在这次海战中遭受沉重打击，其精华地中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几个月后，俄土战争爆发，英法虽没有参加俄土之间的战争，但仍热衷于干预希腊事务。法军在摩里亚半岛登陆，英国舰

并非后来统治埃及的伊斯梅尔。

Mekki Shibeika, *The Independent Sudan* (《独立的苏丹》), New York 1959, p.11.

队也在东地中海伺机采取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阿里只得下令从摩里亚撤回全部埃及军队。1828年10月，易卜拉欣率残部回到埃及。1829年，根据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希腊获得独立。入侵希腊的惨败是阿里对外扩张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为此他丧失了200艘船舰和3万名陆海军士兵，而这些正是他在改革中振兴经济、发展工业、组建新军的重要成果。

但在希腊遭受的挫折不但没有使穆罕默德·阿里放弃称霸东地中海的雄心，反而促使他更急于进行新的对外扩张，以弥补远征希腊带来的物质和威望两方面的损失。阿里曾打算与法国采取联合行动，进军马格里布，征服利比亚、突尼斯等国，但后来发现向西扩张到头来只是为法国火中取栗，而埃及可能一无所获，于是便放弃了这一计划。这样，便只剩下东北方向的叙利亚可作为阿里进一步对外扩张的目标了。叙利亚地区扼欧亚非三大洲要冲，向北可直逼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历史上曾多次处于埃及统治者控制之下。因此，阿里早就想方设法试图控制叙利亚。阿里答应出兵希腊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要获得叙利亚的管辖权。但后来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却违背诺言，只给了阿里一个克里特岛，这使阿里十分恼火。1831年10月，阿里以此为借口，派易卜拉欣率3万大军侵入叙利亚。这标志着他的对外扩张进入了直接与奥斯曼素丹抗争的阶段。此后十年，阿里的对外扩张实际上就是土埃之间的战争。

第一次土埃战争之初，埃军所向披靡，连连获胜，在半年多时间里攻占了阿里什、加沙、雅法、阿克和大马士革等重镇。奥斯曼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向北节节败退。埃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一个原因是改革中组建起来的埃及新军的战斗力远远强于奥斯曼军队，另一个原因则是早已对奥斯曼暴政深恶痛绝的叙利亚各族人民纷纷举行起义支援埃军。一些部族、教派的首领如黎巴嫩山区的统治者巴希尔·谢哈尔等人，纷纷宣布站到埃及一边，并率众配合埃及作战，以致埃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轻取了耶路撒冷、纳布卢斯、特里波里等重要城市。马哈茂德二世闻讯惊慌失措，立即宣布阿里为叛逆，并拼凑援军赶赴叙利亚。1832年7月，土埃两军在霍姆斯会战，土军再遭惨败。易卜拉欣乘胜夺取整个叙利亚北部，挥师翻越托罗斯山进入土耳其本土，并绕过亚历山大勒塔海湾攻占了土耳其西南部重镇阿达纳。素丹眼看形势危急，一面搜罗6万余人马准备迎敌，一面向欧洲列强求援。1832年底，在易卜拉欣的卓越指挥下，3万锐不可挡的埃军居然在科尼亚一举击败6万土军，随即继续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在这种形势下，想要乘机南下控制黑海的俄国宣布出兵援助素丹，6000名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英法两国深恐奥斯曼帝国落入俄国手中，便竭力向阿里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进攻。阿里尚处在犹豫不决之中，进展神速的埃军先头部队却已攻占了屈塔希亚，距离奥斯曼帝国都城只剩三天路程。走投无路的马哈茂德二世只好向阿里屈膝求和。1833年4月8日，土埃双方签订屈塔希亚协定，素丹同意恢复阿里对埃及、阿拉伯半岛、克里特岛等地的统治权，并将叙利亚和阿达纳地区归他管辖；阿里则同意从其他地方撤军，继续承认素丹的宗主权。至此，阿里不但使埃及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且已基本实现了建立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的目标。

从表面上看，阿里的对外战争胜多于负，使埃及的领土大大扩展，似乎是阿里通过改革富国强兵的结果。究其实质，为扩张王朝势力而进行的这场对外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恰恰从侧面显现出阿里改革的封建属性。正是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张，使埃及国家和人民元气大伤，动摇了阿里政权的根基。这是导致阿里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六、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后期的暴政和人民的反抗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改革措施最初给埃及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但阿里政权的封建专制特征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最终受益人不可能是埃及下层群众，而只能是以阿里为首的新地主贵族集团。阿里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又使埃及农民和城市贫民丧失了他们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的微薄利益，而且境况更趋恶化。为了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阿里政府千方百计地增加捐税的税额和种类。埃及的土地税逐年提高，1814年时每费丹土地最低税额仅5皮亚斯特左右，而到1837年则达到了38皮亚斯特。从1822年开始征收人丁税，年满12岁的男子都须缴纳。税额大体上相当于个人年收入的1/12，即一个月的收入，最高额为500皮亚斯特，最低额为15皮亚斯特，非穆斯林还得另外交8至10皮亚斯特。后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如椰枣树税、船税、关卡税、所得税、入市税、捕鱼税、牲口税、旅店税等等。以椰枣树税为例，规定农民家里每种植一棵椰枣树就要缴1.5皮亚斯特的税；1833年，国家仅椰枣树税一项收入就高达近10万埃镑。

在进行对外战争的同时，阿里也一直热衷于在国内和其他占领地区大兴土木，从而导致埃及的劳动力资源严重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里政府和各地的大地主们频繁强征农民去开挖河渠、修筑道路、建造工厂、修建宫殿乃至构筑军事工程等，使农民们被日益加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据记载，为了修筑马哈茂德运河，就先后征调了40万民工，其中12000人死于运河工地。另有材料提到，仅1825年这一年，就有35.5万人被征集去开河挖渠。对于当时总人口不过300多万的埃及来说，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阿里将埃及传统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提高埃及军队素质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战争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埃及的兵源已告枯竭，这种征兵制便演变成了抓兵制。政府甚至时常出动军队包围城镇和乡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到处围捕壮丁，将他们用铁链锁在一起，强行押往军营。到了阿里统治的后期，政府已难以抓到青壮年，便将老人和少年也强征入伍。阿里还下令在学校里开展军事训练，强征学生去当兵。

日益残暴的封建专制使埃及人民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陷入绝境。大批农民被迫弃地逃生，一些人靠乞讨维持生计，一些人流入城镇充当苦力，还有些人逃亡到荒僻地区乃至国外去寻找生路。在赋税和徭役特别苛重的下埃及地区，不少农民逃到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去谋生。在上埃及，也有约1/4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在阿里苦心建立起来的一些工厂里，一方面是劳动力奇缺，只能使用女工、童工和伤残者；另一方面是在岗的工人纷纷逃跑，工厂不得不派人四处搜捕逃走的工人。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许多工厂企业已被迫停产。为了不去当兵，许多埃及男子将自己弄成残废，一些父母竟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足搞断或将其眼睛弄瞎。一位外国旅行家描述这种惨状时写道：“乡

村中身体健全的人已属罕见，人们不是少一两颗门牙（这样就不能咬住子弹）或断一节手指，就是一目失明或双目失明，这样就可以逃避兵役。”

人们的消极抵制也时常演变为公开的武装起义。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埃及各地已不时爆发抗税抗丁的农民起义。其中在上埃及卢克索爆发的起义，就明确提出了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口号，声势十分浩大，持续一年多。到 30 年代，广大劳苦大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阿里政权的暴政。1832 年，驻汉志的埃及军队发生哗变，公开造反，阿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此次兵变平息下去。1834 年，上埃及人民举行大规模起义，反对阿里政权强迫征兵。当地驻军接连向开罗告急，致使阿里只得亲自出马督战。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等地，反对埃及占领的人民起义也接连不断。

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并未使穆罕默德·阿里改弦易辙，反而使他变本加利地实施镇压。1830 年，埃及政府颁布了惩治抗税抗丁和暴动的法令。此后，一系列此类法令接连颁布，惩罚日趋严厉。凡由于逃避服兵役而故意伤害自己躯体者，将被判终身服苦役，并由其亲属替他服兵役。凡聚众叛乱者，主犯流放苏丹五年，从犯服苦役五年，其他人鞭笞四百。不过，镇压愈烈，反抗也愈烈。到 19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在此起彼伏的人民反抗怒潮的冲击下，阿里的改革计划即使采用暴力手段和强制措施也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

七、第二次土埃战争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败

结束第一次土埃战争的屈塔希亚协定只是穆罕默德·阿里与素丹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暂时妥协，此后土埃双方都在积极地为新的较量作准备。马哈茂德二世竭力在国内推行改革，试图凭藉普鲁士教官的帮助组织一支新军；对外则进一步投靠英俄等欧洲列强，希望借助它们的力量来遏制阿里的势力。阿里除了继续扩军备战外，一再要求素丹将被占领地区的世袭统治权正式授予他；同时进一步向东扩张，派兵进入伊拉克，鼓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起来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随着欧洲列强更深地插手东方问题，土埃冲突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互相纠缠在一起，更加趋于复杂化。对于俄国来说，埃及还只是个遥远的目标，而控制黑海两海峡显然更为重要。沙皇利用俄国在第一次土埃战争末期曾出兵援土的有利条件，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与土耳其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人”。英国的战略是维护奥斯曼帝国，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牵制俄国和法国。法国一直是英国在中东的老对手，且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当英国在土埃冲突中倾向土耳其之时，法国便开始暗中支持埃及。在土埃对抗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也倾向于援土反埃，比较接近英俄两国的立场。列强的明争暗斗必然促使土埃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最终导致第二次土埃战争。

1838 年中，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向奥斯曼素丹纳贡，打算宣布埃及独立，但立即遭到英俄等国的反对。这年 8 月，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新的英土商约。该条约规定只对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外国商品征收 5% 的低关税，废除帝国

E.W.Lan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Egypt* (《现代埃及的风俗习惯》), London 1954, p.201. 所谓“东方问题”，即指欧洲列强为争夺、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进行的激烈角逐及因此导致的一系列难题。

境内的所有专卖制度，允许外国商人在帝国各地自由经商，为欧洲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进入奥斯曼帝国大开方便之门。阿里知道若埃及实施该条约，本国的民族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乃至崩溃，因此拒不承认这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埃英关系和埃土关系均急剧恶化。在英国的怂恿下，奥斯曼素丹宣布讨伐阿里，第二次土埃战争遂于 1839 年春爆发。

战争初期，土耳其一度处于优势。1839 年 4 月，土耳其陆军渡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叙利亚，土耳其海军也对叙利亚海岸展开攻击。在整个 5 月里，土军接连攻占了叙利亚东北部的许多地区，进抵战略要地阿勒颇城下。不久，军事形势发生逆转。6 月初，易卜拉欣率领的埃军开始反攻，土军锐气受挫。6 月 24 日，土埃两军在叙利亚边境的尼济勃进行决战，结果土军大败，伤亡 5000 人，被俘 10000 人。由于土军主力在此役中被打垮，埃军随即顺利地再次跨越托罗斯山脉，攻入土耳其本土。尼济勃战役后五天，即 6 月 30 日，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年仅 16 岁的阿卜杜·麦吉德继任素丹，这使土耳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7 月初，土耳其海军司令艾哈迈德·法齐率 30 艘战舰和 2 万余水兵投向埃及。新素丹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遣使去埃及求和。英、俄、奥、普、法五国闻讯后立即照会土耳其政府，提出土埃问题应由欧洲列强参与解决。但是，列强之间在土埃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分歧。英国主张只给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而法国认为应维护屈塔希亚协定，继续让埃及统治叙利亚。俄国则完全站在土耳其一边，准备出兵援土反埃，以乘机向南扩张。奥地利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引起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支持英国。普鲁士为了对付法国，也在土埃问题上倾向英国。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英国终于在联合普、奥的基础上拉拢俄国，决定撇开法国达成解决办法。1840 年 7 月 15 日，英、普、奥、俄、土五国签订伦敦条约。条约规定，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阿克省划归阿里终身管辖，埃及军队则应从其他地区撤出，归还土耳其舰队；奥斯曼素丹批准的所有协定和法令应在埃及和阿克省生效，埃及应每年向素丹纳贡；若阿里在十日内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管辖阿克省的权利；若再过十天阿里仍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统治埃及的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在阿里拒绝接受条约的情况下，五国还将对他诉诸武力。该条约公布后，法国朝野哗然，对英国表示强烈不满，有人甚至主张以武力援埃反土。

自恃有法国作靠山的穆罕默德·阿里断然拒绝接受伦敦条约。1840 年 9 月，英俄奥联合舰队炮轰贝鲁特，接着英土联军在黎巴嫩登陆。同时，奥斯曼素丹宣布革除阿里的一切职务。本来，阿里仍可凭藉数十万锐气正盛的陆海军与列强和土军周旋一番，但两个重大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一是叙利亚人民的反埃大起义。在埃及统治叙利亚的初期，由于易卜拉欣将阿里在埃及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搬到那里，曾使叙利亚的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埃及当局也开始对叙利亚人民横征暴敛，实施强行征兵制。埃及占领军还解除了各教派民兵的武装，剥夺了某些地主的包税权。这些做法不仅使被占领区的下层群众处境艰难，也严重损害了当地各教派封建主的利益，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愤怒。1834 年，巴勒斯坦农民举行反征兵起义。1838 年，叙利亚东部山区的德鲁兹派群众揭竿而起，坚持反埃斗争达一年之久。1840 年 6 月，以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为主的黎巴嫩各教派联合举行反埃武装暴动，直接配合

英土联军对黎巴嫩的进攻。利用叙利亚人民在各地纷纷起事的有利时机，英土联军于11月初攻占阿克要塞，使驻扎在叙利亚的埃及大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二是法国态度的转变。法国统治集团权衡再三，仍不敢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四强兵戎相见。10月20日，对英国持强硬立场的梯也尔内阁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宣布辞职，新任内阁总理基佐一上台便采取措施缓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这样，阿里对法国援助寄托的希望也化为泡影。穆罕默德·阿里别无选择，只好屈膝求和，答应列强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条件。此后几个月，驻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埃及军队狼狈撤回埃及。

1841年2月13日和6月1日，奥斯曼素丹颁布两道敕令，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并准许阿里管辖苏丹。但敕令对授予上述权力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如和平时期埃及军队总兵员不得超过18000人，未经素丹同意埃及不得制造战舰，埃军上校以上军衔军官的任命必须得到素丹的批准，奥斯曼帝国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均应在埃及得到实施等等。

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遭到的失败标志着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大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埃及再次降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属国，而且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由于1838年的英土商约开始在埃及实施，阿里政权对工业、农业、商业、外贸等实行的严格垄断被逐步废除。结果，一方面是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埃及市场，另一方面是埃及的农副产品和其他原料被欧洲商人廉价收购而大量流出埃及。这样，阿里通过经济改革苦心经营起来的埃及民族工业很快被冲得七零八落，大批工厂倒闭。例如，英国商号代理人直接深入内地大量廉价收购埃及棉花，收购量从1840年到1852年即增加了四倍以上。同时，英商又利用极低的进口税向埃及倾销棉织品，致使一度蓬勃发展的埃及纺织业急剧萎缩。为阿里对外扩张服务的军事工业一落千丈，闻名遐迩的亚历山大造船厂后来竟变成了一个破烂不堪的装配修理车间。在埃及农村，连年战乱、苛捐杂税、加上各类灾荒，导致大片农田荒芜。阿里政权在1840年开始实行承包制，将大批土地承包给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在阿里王朝蔽荫之下的新地主们乘机大肆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又失去了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的小块份地，埃及农村的生产力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推行的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实际上已告失败。阿里本人因难以忍受一连串沉重打击，终于精神失常，于1849年8月2日逝世。综观穆罕默德·阿里的一生，虽然他的对外扩张和暴虐统治给埃及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毕竟以铁腕推动了埃及社会前进，缔造了统一的近代埃及民族国家。

列强插手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最终失败说明，虽然西欧资本主义对马木路克埃及的冲击为阿里的上台和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殖民列强并不希望在欧亚非三大洲的要冲出现一个政治独立、经济强大而又不受它们控制的埃及帝国，因为这样一个大帝国必将取代正在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而成为列强对中东进行殖民扩张的新障碍。这正是阿里改革难以取得成功、埃及不可能真正振兴的外部根源所在。然而，外因毕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阿里封建王朝的专制性和扩张性，始终对阿里改革的积极潮流起着逆

向作用，对缓慢成长的埃及资本主义因素起着抑制作用，这正是阿里改革遭到失败的内因所在。

八、外国资本大规模渗入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

1850年以后，欧美殖民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不再满足于将埃及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开始致力于向埃及直接输出资本。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争先恐后来到了尼罗河畔，开办银行、建立公司，承包各类工程，进行土地投机。外国资本大规模渗入埃及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殖民列强为控制这块扼亚非欧三大洲战略要冲的富庶之地而进行角逐的过程，英法两国之间的争夺表现尤为激烈。

继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在位仅几个月）后统治埃及的阿巴斯（1848—1854年在位），愚蠢地将埃及遭到的厄运归咎于阿里的改革开放，下令废除一切改革措施，并试图恢复闭关自守政策。然而，外国商品的涌入和埃及原料的流出已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潮流。到了后来，阿巴斯也不得不同意外国资本直接向埃及投资。1851年7月，利用内外交困的阿巴斯急需获得支持的机会，英国与埃及签订协议，获得了在埃及修建贯彻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的特许权。1856年，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修成；两年后，这条铁路又延伸到苏伊士。英国人还在尼罗河三角洲架设了电报线。这条铁路不但促进了英国对埃及的经济渗透，而且加强了英国与印度的联系，标志着欧洲列强终于打破了自阿里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阻止外国人直接向埃及大规模投资的壁垒。

英国抢先一步控制了埃及的铁路和电信业，使法国等国既眼红又不安。野心勃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竭力兜售苏伊士运河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这条运河来排挤英国势力，进而控制埃及。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成了法国政府推行苏伊士运河计划的得力组织者。

莱塞普斯的父亲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后任法国驻埃及领事，并积极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政权。因为这一层关系，随父亲住在埃及的莱塞普斯从小就经常出入阿里宫廷，并与阿里的儿子赛德过往甚密。1832年，莱塞普斯继承父业，出任法国驻埃及副领事，后来又晋升为领事。由于长期呆在埃及，莱塞普斯一直专心研究苏伊士运河问题，并煞费苦心拟定了开凿运河的计划。1852年，已退出外交界的莱塞普斯将自己的计划呈送阿巴斯和奥斯曼帝国政府，但均未获采纳。1854年7月，阿巴斯被刺身亡，曾长期留学欧洲、亲法的赛德继位。他上台后，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政策。莱塞普斯闻讯即赶赴埃及，向老友赛德游说自己的苏伊士运河计划。缺乏深谋远虑而又急于有所建树的赛德被莱塞普斯描绘的美好图景所吸引，欣然表示接受。1854年11月，赛德与莱塞普斯签订了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租让合同。1856年1月，双方又签订了一项新的租让合同，对1854年合同作了补充和扩大。其主要内容为：授权莱塞普斯建立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租让期自运河通航之日算起为99年，在此期间公司可向通过运河之间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不超过10法郎的税金，公司在开罗和运河区之间挖一条淡水渠，把尼罗河水引向塞得港和苏伊士，河渠和河水属公司所有，无须交纳地价和地税；公司可免税进口建筑

工程所需之机器设备，并在租让期内有权无偿地开采和使用工程所需之矿藏和石料；运河工程所需的 4/5 劳工由埃及方面提供，他们的报酬由公司确定并付给；埃及每年可获得公司净利的 15%。

在处理耗资如此巨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时，赛德的态度是极其轻率的。有的记载称，对莱塞普斯单方面搞的租让合同，赛德没看就签了字，连他的司法和财政顾问们都没有审查过。因此，其中有许多条款对埃及非常不利是可想而知的。如合同规定埃及的部分土地和矿物资源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租让期内无偿地供外国承包者使用，又不作任何数量、质量和种类的限制，此后给埃及带来了巨大损失。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开始出售后，虽然莱塞普斯千方百计推销，仍有近 50% 的股份无人认购。莱塞普斯竟利用赛德给他的已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硬把股票总数的 44% 卖给埃及。赛德居然也对此默认，还借了一笔外债来付款。

1859 年 4 月，不顾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对，运河工程在塞得港正式破土动工。但由于英土阻挠租让合同中涉及劳工问题的条款实施，工程进度十分缓慢。1861 年 8 月，在英土对运河的态度因欧洲形势的发展而转变的情况下，赛德决定实施劳工法令，开始强征劳工。当年 12 月，政府就征调了 14697 人到运河工地。从 1862 年开始，采取劳工一月一轮换的办法，每月有 2 万多人被强征去运河工地服役。到了后来，由于劳工越来越难抽调，赛德竟根据莱塞普斯的建议大批裁军，让整团整营的士兵脱下军装去运河工地干活。

运河工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缺乏饮用水，伙食量少质差，传染病盛行，气候多变，劳动繁重，工资低下。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劳工病倒、致残，甚至死亡。据许多史料记载，当时工地上到处可听到病人和伤残者的呻吟，到处可见丧命者的尸体。越来越多的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而以怠工、逃跑的方式表示反抗。为此，运河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惩治方法，还将埃及警察调来镇压反抗者。

在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同时，赛德又将在埃及经办银行、航运、水电及其他一些企事业的特许权授予欧洲人，使合资和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兴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合资的埃及尼罗河航运公司和马吉德海运公司、英资埃及银行、英资莱姆勒电车公司、法资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法资埃及磨面公司等。赛德实行的引进外资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阿巴斯闭关政策的一些消极后果，有利于埃及经济的发展。但赛德不像其前任那样重视维护主权，而且处事轻率，不懂得如何引导、调节外资为埃及利益服务，而是一味迎合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需要。这样，欧洲列强便逐步加强对埃及的经济渗透，进而获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特权。

赛德于 1858 年颁布了全面改革土地制度的法令（即著名的“赛德法令”），促进了埃及农村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发展。然而，他却没有以此作为积累资金的契机，仍完全靠借外债来进行各项建设。

1863 年，赛德逝世，伊斯梅尔继任埃及总督。此人自幼留学法国，崇尚

G.Kirk, op.cit., p.82.

R.Flower, Napoleon to Nasser, the Story of Modern Egypt (《从拿破仑到纳赛尔》), London 1976, p.89.

西方文化，一心想使埃及全盘欧化。他上台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仿效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被史家们称为“欧化改革”。在政治上，他仿效西方建立了一个咨议会，但该机构毫无实权，对埃及的专制独裁统治并无制约作用。在经济上，他以更大的规模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输入埃及的外国商品和资本、流出埃及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品、以及埃及举借的外债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文化上，他大力创办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 and 世俗中小学，还派遣许多学生出国学习。

伊斯梅尔也十分重视苏伊士运河，不过又觉得运河租让合同对埃及过于不利，因而在劳工数量和土地、淡水渠的占有权利等问题上与运河公司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伊斯梅尔居然请法皇拿破仑三世来调停。法皇经过一番调查，作出了埃及政府可废除劳工法令并收回淡水渠和部分土地的占有权，但须向运河公司赔偿 8400 万法郎巨款（约相当于公司最初资本的 40% 以上）的仲裁。这时英国看到运河即将变为既成事实，决定采取“先成之，再夺之”的策略。奥斯曼政府的态度也随英国的态度而变化，希望埃及与运河公司尽快达成协议。1866 年 1 月，伊斯梅尔接受拿破仑三世的裁决。2 月 22 日，埃及与运河公司正式签订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全面合同。此后，运河工程进度加快。

1869 年 11 月 27 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 162.5 公里，河面宽 52 米，是埃及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大大有利于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埃及为开凿苏伊士运河耗费了 1680 万英镑的巨额资金，有 12 万埃及民工为这条运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当时，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受益者却不是埃及人民，而是欧洲列强。1870 年通过运河的船只为 50 万吨，1874 年增加到 200 万吨，公司的年收入高达 1200 万法郎，大部落入以法国为主的欧洲财团手中。埃及虽然在运河通航后的头几年也获得了一些利益，但与因开凿运河而欠的巨额债务相比，这些收入微不足道。后来，随着埃及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埃及对苏伊士运河享有的权利也逐步消失。苏伊士运河不但不再给埃及带来任何收入，反而使其进一步卷入列强争夺霸权的漩涡之中而不得安宁，加速了它沦为殖民地的进程。

九、埃及财政的破产和主权的消失

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和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埃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繁荣，使阿里时期初创的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推动了埃及近代化进程，同时埃及的财政状况却日趋恶化。1862 年，赛德首次向外国借款 300 多万英镑。伊斯梅尔上台后，埃及的外债总额以平均每年增加 650 万英镑的速度上升，到 1873 年已达 6800 多万英镑。由于政府为榨取民脂民膏而滥发各类债券，埃及的内债剧增。19 世纪 70 年代初，债台高筑的埃及政府已不得不用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去偿付债款利息。1875 年下半年，埃及财政已到破产边缘。为支付 11 月底到期的一笔巨额债务，伊斯梅尔竟决定出售埃及拥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英法两国闻讯都想夺得这批股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英国占了上风。1875 年 11 月 25 日，埃及将自己拥有的苏伊士

阿拉·拉费伊：《伊斯梅尔时代》，上册，开罗阿拉伯文版 1932 年，第 98—99 页。

拉费伊：前引书上册，第 107 页。

运河公司 44% 的股票（价值 4 亿法郎）全部以低价（仅 1 亿法郎）卖给英国。在掌握了这批股票后，英国在运河公司和埃及的地位大大增强。但是，埃及出卖这些股票得来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 1876 年，埃及的公私外债总额已高达 9000 多万英镑，相当于政府岁入的 10 多倍，年息为 8%，每年仅付利息一项就要耗费国家财政收入的 2/3。这年 4 月，埃及政府被迫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付债务。

埃及财政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封建官僚腐败无能，本国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奇缺，这是埃及在经济开放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在埃及这样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个人的财产与国家的财产几乎难以分清。1854 年阿巴斯被刺身亡，他的儿子继承了一笔总数达 320 万英镑的财产，而那年埃及国库的总收入不过 220 万英镑。伊斯梅尔同样将大量国家的资金用来买进股票，购置土地，为个人和亲属牟取暴利。埃及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吏们也都像总督那样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据不完全统计，1866—1874 年，埃及平均每年都要花 500—600 万埃镑进口西方的鞋帽、服装，家具、玻璃器皿等消费品。有的学者指出，除苏伊士运河外，伊斯梅尔时期埃及用于有效建设项目的钱可能还不到这个国家所借外债的 10%。由于封建官僚腐败无能，当时埃及虽已拥有少量技术和管理人员，但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对外经济交往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没有本国专家提供咨询和参与决策，而是由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员随意拍板，导致效率低、失误多，收益少、损失重的情况屡屡出现。除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轻率和失误外，又如英资承担的亚历山大港改造工程，合同上的预算为 300 万英镑，但一位英国财政专家后来私下承认，实际上只需这个数目的一半就足够了。

第二，对外经济交往的法律基础极不健全，是使埃及的经济开放政策难以顺利实施的主要原因。埃及政府消极承担奥斯曼帝国与列强签订的特惠条约遗产，给埃及带来了各种法律问题和巨大的麻烦。其表现之一是，埃及与外资所订经济合同的条款往往对埃及极为不利，缺乏现代经济契约的互惠精神。苏伊士运河租让合同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其表现之二是，外国投资者遭遇的困难和损失常常转嫁给埃及方面。如外资为主的尼罗河航运公司于 1858 年倒闭，在一些欧洲股东的压力之下，埃及政府竟用高价买下公司的全部股票，因此损失了 34 万英镑。其表现之三是，当埃及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经济纷争时，最后裁决权总不在埃及手中。如有个叫罗斯迪的外国人一直要求埃及政府赔偿他在阿里时期遭受的损失，又提不出什么证据。但由于外国领事支持此人，埃及政府不得不赔给他 400 万法郎。其表现之四是，在农产品销售、关税、金融、土地买卖、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埃及政府没有制定必要的法规对外资加以管理、引导、限制，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如当时埃

R.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世界经济中的中东》), London & New York 1981, p.123.

R.Owen, *op.cit.*, p.150.

V.Milner, *England in Egypt* (《英国在埃及》), London 1920, p.179.

Flower, *op.cit.*, p.99.

Owen, *op.cit.*, p.123.

拉·阿·巴拉维等：《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127—128 页。

及的银行大都是外国人开的，金融交往文书均用外文，使埃及人难以涉足。住在埃及的外国人可以高利借钱给埃及政府和个人，而伊斯兰教的成文法却禁止穆斯林放高利贷。这样，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活动都被外国人控制。

第三，公共工程摊子太大，缺乏统筹规划，举借外债失控，这是导致埃及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的直接因素。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外资，埃及的决策人物头脑发热。除苏伊士运河外，伊斯梅尔更是大兴土木，特别是搞了许多非生产性项目，如以欧洲的标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修建许多豪奢宫苑建筑、到沙漠里去修建温泉疗养地等，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由于在基本建设方面既无总体规划又缺乏具体的统筹安排，一些项目的作用互相抵销，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阿巴斯搞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铁路实际上是以不开凿苏伊士运河为前提的，但赛德上台后，却推行以运河为中心的交通运输发展计划。结果，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该铁路的营运量和收入一落千丈，开罗至苏伊士一段一度被迫停运。在借钱方面，埃及政府既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又不顾贷方的苛刻条件，表现得十分轻率。西方财团在本国发放贷款，利息一般只有3—4%，而给予埃及的长期贷款的利息（包括偿债基金和佣金）超过了10%，短期贷款利息最高的甚至达到20—24%。为了得到贷款，埃及政府有时还将国家税收等作为担保，并将借来的钱用于有利于欧洲财团的项目之中。

第四，没有合理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而是一味迎合外国资本的需求，日益依附于英法等国，这是埃及经济在对外开放后逐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赛德、伊斯梅尔等人虽然在改革土地制度和兴修水利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情，但一直将适应欧美市场对原料的需求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方针。结果，埃及农业走上了片面发展棉花、蔗糖等几种作物的畸形道路，而粮食生产一蹶不振，被迫大量进口粮食，且屡屡发生饥荒，造成局势动荡，民心不稳。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工业也主要是那些为欧美市场服务的行业，特别是制糖业和轧棉业，这标志着埃及民族工业已逐渐变为欧美资本的附庸。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埃及棉花出口遭受沉重打击，许多轧棉厂被迫关门，说明了这样的工业是多么脆弱。埃及统治者在发展交通运输业上花费的资金也许最多，但这一当时东方最先进的交通运输网却被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所控制，成了欧洲殖民势力向红海、印度洋、东南亚乃至中国进行扩张的中转站。埃及本身并未因跨越自己国土的交通线而受益，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陷入了列强争霸的漩涡之中。

埃及财政的破产，给殖民列强提供了进一步控制该国的有利时机。英法等国立即采取种种手段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接受债权国对埃及财政的监督。1876年5月，伊斯梅尔被迫颁布法令，成立由债权国代表组成的埃及国债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把埃及政府贷款，王室贷款和短期贷款合并为统一债务，总额为9100万英镑。英国不满足于仅在委员会中占一席之地，并认为合并债务对法国有利，因此竭力进行私下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发言权。英法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共同控制埃及的妥协方案。1876年11月，伊斯梅尔再次颁布法令，任命英国人为国家财政收入和预算的总监督、法国人为国家财政支出的总监督；同意成立由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埃及代表组成的混合管理委员会，管理亚历山大海关和全国铁路，由英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将海关和铁路收入用来偿付债务。这样，由英法两国

对埃及实行双重监督的制度便形成了。

但是，列强并不就此满足，还要求从政治上直接控制埃及。1876年，列强迫使埃及政府同意建立由英、法、德、俄、美等14国组成的混合法庭。该机构不但有权处理外侨之间及外侨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而且可以否定埃及的立法。1878年，在英法等国压力下，伊斯梅尔同意成立由英法等国控制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埃及的财政状况。最高调查委员会经过一番调查后提出报告，要求实行一系列改革，而其前提便是改组政府，让欧洲人进入内阁。同年8月，伊斯梅尔宣布任命英法的代理人努巴尔帕夏为首相。努巴尔组阁时竟然让英国人利佛斯·威尔逊当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尼埃当公共工程大臣，还任命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担任了副大臣。此后，努巴尔对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唯命是从，伊斯梅尔的权力也大受限制。埃及各级行政机构中欧籍官员激增，到1881年底已达1325人，超过政府机关官员总数的10%。埃及内阁的实权完全落入两位外国大臣手中，因此被埃及人民轻蔑地称为“欧洲人内阁”。

至此，埃及的经济命脉完全被以英法为主的外国资本所控制，国家主权也遭到列强践踏，政治上的独立已名存实亡。

J.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 1800—1956 (《现代埃及史和英埃关系》), 1965, p.114.

第十二章 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的改革

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不断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亡，这三个国家的封建上层人物有的进行了反侵略战争，有的实行了近代化改革；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侵略者展开了自发的反抗和起义。可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主客观原因，所有这些反抗和改革都遭到了失败，这三个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一、西方列强叩开大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夺取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了这一时期欧美列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于地处地中海南侧、同欧洲近在咫尺的马格里布国家，列强各有图谋。法国想完成对整个马格里布的攫取。对英国来说，马格里布国家不仅是重要的商品市场，而且可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则认为摩洛哥是它天然的一部分，占领摩洛哥是必须履行的使命。

北非三国在这一时期已经丧失了昔日同欧洲国家抗衡的力量，日益走向衰弱。

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阶级内部的武力争斗和阴谋倾轧不断，1671—1818 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 30 个德伊中，就有 14 个是在叛乱或政变中杀害他们的前任而上台的，各省的统治者形同割据。以德伊为首的统治集团，其势力所及只在沿海地区，内地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把土耳其人看成是征服者，他们在宗教团体领导下不断进行反对土耳其的斗争。18 世纪末，沿海地区的贸易逐渐衰落，加上饥荒和瘟疫，人口急剧减少，城市居民仅占居民总数（估计为 300 万人）的 5%。

突尼斯统治阶级中的土耳其人已逐渐被同化。突尼斯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但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马格里布国家中是比较高的。18 世纪末，在约占总人口 20% 的城市居民中，有 1/3 从事手工业生产。但好景不长，在欧洲廉价商品的竞争之下，当地手工产品逐渐被排挤，国内市场逐步为外国商品所占领，传统的手工业逐渐衰落。

摩洛哥在 18、19 世纪之交也已处于经济落后和政治分裂的状态。传统的宗教势力不仅支配着社会生活，而且助长了封建分散性。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 15%，他们居住的地区，名义上受素丹的管辖，实际上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控制。占总人口 85% 的柏柏尔人居住的地区也不是统一的，他们保持着传统的军事部落组织，并且始终对抗素丹。素丹的统治完全靠武力维持。统治阶级为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讧。内战、灾荒和瘟疫使许多城市几乎毁灭，人口大量减少。16 世纪初的摩洛哥约有 500 万人，到 19 世纪初只剩下 300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近代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俄文版），莫斯科 1978 年，第 69 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 58 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 32 页。

万人。1808年，城市居民只占人口总数的7—8%。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减退，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衰落。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列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发动侵略的借口是“扑灭海盗”。事实上，当时马格里布海盗已成强弩之末，海盗活动大为减少。相反，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海盗活动却依然如故。列强“扑灭海盗”这一口号，意在彻底消灭马格里布国家的海上防御力量，以便夺而占之。

1799年，美国舰队侵犯突尼斯，遭到失败后同突尼斯签订了条约，规定突尼斯不再袭击美国商船，美国则答应缴付贡款。与此同时，美国也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可是，1815年，美国又派舰队来到地中海，打败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军。于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被迫停止向美国征收贡款。次年，以英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强国在伦敦通过了“消灭海盗”计划，英荷联合舰队向阿尔及利亚发动进攻，炮轰阿尔及尔城，焚毁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军舰艇。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统治者释放了被海盗船俘获的基督教徒，并偿付了赔款。1817年，在列强的威胁下，摩洛哥苏丹也禁止海盗活动，并裁减海军。1819年，英法派特使到突尼斯，向马哈茂德贝伊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如果两个摄政国（指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对任何和平贸易采取某种对立方式，那末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欧洲列强组成反对它们的普遍同盟。”

列强的恫吓迫使贝伊默认了列强的要求。1827年，突尼斯海军参加土耳其舰队镇压希腊民族独立运动，在纳瓦里诺战役中覆灭。从此，欧洲国家同马格里布国家的海上均势被打破，三国的门户洞开，欧洲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入，列强的武装侵略接踵而至。

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

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拉开了列强吞并马格里布各国的序幕。

随着马格里布海军力量的削弱，地中海沿海地区的贸易逐渐趋于衰落。这样，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收入急剧下降。统治集团为了弥补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便大量增加税收，从而激起西部地区和卡比利亚山区农牧民的频繁起义。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更加削弱了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能力。

在西方列强中，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野心尤为强烈。法国很早就同阿尔及利亚建立了外交关系。16世纪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拉卡尔城（今艾尔卡拉）附近修建了一座法兰西堡。18世纪时，马赛的一家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粮食贸易专营权。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由于国内和军队的需要，向阿尔及利亚购置大量粮食。这样，法国便欠下了阿尔及利亚很大一笔债款。据统计，到1815年，债款总额达1380万法郎。拿破仑帝国崩溃后，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曾多次向法国提出偿还债款的问题，可是法国复辟王朝政府一直拖欠不还。与此同时，法国还利用阿尔及利亚舰队被消灭的机会，于1819年要求德伊承认它对拉卡尔附近部族的所谓宗主权，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27—28页。

Mustapha Kraim, *La Tunisie Précoloniale* 《殖民地以前的突尼斯》），Tunis 1973, p.270.

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5页。

并力图利用债务问题引起的纠纷，对阿尔及利亚发动侵略战争。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拿破仑就企图侵占阿尔及利亚，并为此进行了准备。当时，法国政府曾对阿尔及利亚沿海进行考察，绘制了军用地图，拟定了军事行动计划。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复辟王朝继续为征服阿尔及利亚作准备。

1827年4月29日，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接见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德瓦尔。会见时，侯赛因询问德瓦尔，法国政府为什么对债务问题一直不予答复。德瓦尔傲慢无礼地回答说：“我国政府将不给您文件，这就是说您的请求无效。”德瓦尔的蛮横态度使侯赛因大为恼怒，他命令德瓦尔立即离开，德瓦尔却不理睬。于是，愤怒的侯赛因顺手用扇子（一说蝇拍）朝德瓦尔的脸上打去，这就是所谓“扇击事件”。法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派海军上将科莱率领一支舰队开往阿尔及尔，要求侯赛因道歉，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法国的要求遭到侯赛因的严正拒绝。于是，法国便断绝了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开始封锁阿尔及利亚港口。到1830年初，法国国内局势日趋紧张，查理十世决定发动对阿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以战争的胜利来拯救复辟王朝。

1830年5月25日，法国舰队从土伦港出发。这支舰队共有军舰和其他船只103艘、运输船542艘、士兵37600多名，由陆军中将布尔蒙和海军中将迪佩雷率领。6月14日，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费鲁希港登陆。翌日，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毫不掩饰地宣称：“这个军事征服基于迫切要求之上，它与维持法国、甚至欧洲公共秩序有最重要和最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我们的人口过剩，和推销我们工厂的产品来交换由于我们的土壤和气候关系以致我们所没有的其他产品，必须开辟一个广泛的出口市场。”非常明显，法国的目的就是要将阿尔及利亚变为它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地。

法国侵略军登陆之后，遇到阿尔及利亚德伊军队的抵抗。德伊的军队一半是雅内萨里和正规军士兵，一半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部落的民兵。6月19日斯塔乌埃利一战，法军伤亡400多人，阿尔及利亚伤亡10000人。6月29日，法军开始进攻首都阿尔及尔，并于7月4日攻占了皇家城堡。7月5日，侯赛因被迫签订投降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布尔蒙曾保证“伊斯兰教仍得自由活动，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信仰、财产和工商业不得予以任何损害，对他们的妻子应予尊重”，但事实证明这些保证是极其虚伪的。法军占领阿尔及尔后，侯赛因于7月27日被流放，1838年死于埃及。法国侵略者抢劫了侯赛因皇宫，劫去黄金15000磅、白银22万磅，加上其他物品，总计价值达5500万法郎。

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胜利，并没有能够挽救查理十世政治上的危机。就在侵占阿尔及尔城不久，巴黎爆发革命，复辟王朝被推翻。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建立之后，继续实行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法国侵略军占领沿海地区后，继续向阿尔及利亚内地扩张。

在侵占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殖民主义者所犯下的野蛮罪行罄竹难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页。

雷蒙·巴尔勃：《阿尔及利亚真相》，《国际问题译丛》1955年第5期。

马尔塞·佩鲁东：《马格里布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0页。

杨人楩：前引书，第356页。

书。当侵略军踏上阿尔及利亚国土后，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就鼓励他们：“应该容忍更进一步压迫和屠杀土著居民，蹂躏、放火、摧毁庄稼也许是巩固地建立我们统治的唯一方法。”于是，殖民军队到处进行烧杀掳掠。陆军中尉圣阿尔诺在参战中描述法军的进展时写道：“我们沿途焚烧了一切村落、一切乡村、一切农舍。”侵略者们割去被俘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耳朵，把掳获的妇女和儿童拿去公开拍卖，或者交换马匹。仅在1832年4月6日这一天内，侵略者便屠杀了12000名阿尔及利亚居民。当时亲身参加过侵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克里斯吉安描述了这次屠杀的惨状：“遵照罗维戈总司令的训令，一团军队于1832年4月6日夜间接开了阿尔及尔城，黎明时刻突然袭击帐篷中酣睡着的部落人民，屠杀了所有这些不幸的艾尔乌菲亚人，而他们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人能够自卫。”“在这次可耻的出征归来时，我们的骑士们把人头挂在长枪的一端，……真可怕，有些女人带的镯子还戴在被砍掉下来的手腕上，耳环还挂在一块块的肉上。”经过残酷屠杀之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治。

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

法国虽然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可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几乎遍及全国。阿尔及尔附近的沿海地区最先遭到法国蹂躏，也是首先揭竿而起的地区。进攻布日伊的法军多次被击退；波尼周围的山区居民同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特里雷的贝伊虽然向法国表示臣服，但他在1830年和1831年抵抗了法军的侵略。在东部的君士坦丁，阿赫默德贝伊坚持了长期的抗战。西部和中部的社会与沿海存在着差异。这里有着享有特权的各个宗教派别，如提江尼亚派、塔伊比亚派、塔卡维亚派和卡迪尼亚派。卡迪利亚派在瓦赫兰平原有强大的影响，他们在法国入侵前就反对阿尔及利亚德伊的统治。当1832年瓦赫兰的马赫曾同法国人妥协以后，他们立即在马希丁领导下发动了圣战，成为抵抗运动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地区。

西部抗法斗争的杰出领袖是卡德尔。他生于1808年，是马斯卡拉地区哈希姆部落酋长马希丁的儿子，受过典型的穆斯林教育，精通阿拉伯文学，曾游历麦加、麦地那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文能武，生活简朴，在部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832年4月，法军侵犯马斯卡拉地区时，卡德尔就投入了圣战。同年11月22日，在哈希姆等部落人民举行的抗法誓师大会上，年仅24岁的卡德尔被推选为埃米尔，成为最高首领。他以马斯卡拉为中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法斗争。卡德尔起义军主要由农牧民组成，采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侵略者。

在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盘踞在瓦赫兰的法国侵略军头目德米歇尔不得不和卡德尔进行谈判，并于1834年2月26日签订了《瓦赫兰条约》。条约

伦当：《阿尔及利亚在极端分子的标志下》，转引自翟象乾：《法国侵略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古柏尔等：《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上卷第2册，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112页。

翟象乾：前引文。

克里斯吉安：《法属非洲》，转引马赛尔·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45页。

规定，除了沿海的三个城市外，承认卡德尔对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享有主权。德米歇尔被撤销了职务，由特雷泽尔接替，1835年，法军向卡德尔管辖地区发动进攻，又遭到惨败。仅在塔夫那战役中，法军就被打死打伤3500人。于是，法国侵略者不得不与卡德尔重开谈判。1837年5月30日，法国元帅毕若与卡德尔签订了《塔夫那条约》，除了阿尔及尔、瓦赫兰等几个沿海城市和东部地区外，法国承认卡德尔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主权。

卡德尔建立起以马斯卡拉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后，决心仿效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政治方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采取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将全国分为八个区，委派行政长官管理，严禁卖官鬻爵和营私舞弊；建立了选举产生的最高咨询会议，讨论并决定战争、和谈和税收等重大问题。在军事方面，他组成一支约2万人的常备军，每一军种穿一种特别的制服，并发放定额军饷；聘请摩洛哥、突尼斯甚至欧洲教官，严格训练这支军队。在经济方面，他重视发展生产，取消了一些部落的免税特权、降低税额，统一税收标准；规定由政府垄断对外贸易，建立军火工厂和纺织厂，生产枪炮、弹药和布匹。所有这些措施，有利于消除原来的封建分散状态，坚持长期的抗法斗争，因而得到农牧民的拥护和支持。卡德尔的改革，是19世纪非洲近代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战争条件下实施的，外有法国占领者的封锁和进犯，内有一些地方封建主的破坏，因而后来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殖民主义者签订《塔夫那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这时，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阿赫默德贝伊领导的抗法斗争声势浩大，曾消灭法军数千人。法国侵略者为了扑灭东部地区的抗法斗争烈火，在《塔夫那条约》签订后，便集中兵力进攻君士坦丁。由于阿赫默德多次拒绝卡德尔联合抗法的建议，孤军作战，于1837年10月间失败，退出君士坦丁。此后，阿赫默德在奥雷斯山区继续坚持反法斗争，于1838年战败被俘。法国侵略军在镇压了东部地区的起义之后，便掉过头来全力对付卡德尔。1839年6月，法国殖民者再次撕毁和约，重新发动进攻。卡德尔领导军民奋勇应战，并发出誓言：“我国人民只能让你们吃子弹。即使你们留在我国一百年不走，你们的一切诡计，对我们都毫无办法。”法国殖民者惊呼：“阿拉伯人都是战士，……上至80高龄的老人下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投入战斗。”在阿尔及利亚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瓦莱顾此失彼，惶恐不安。再加上炎热的气候和沼泽的瘴气，侵略军死亡众多，使法国政府不得不连年增兵。1837年，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只有42000人，1844年增至90000人。

1840年底，瓦莱因不断失败而辞职，毕若被任命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毕若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实行轻装扫荡和焦土政策，大肆毁灭农作物、畜群、水源、饲料、粮仓、武器制造厂和军火库，以断绝阿尔及利亚军队的物资供应。由于法国侵略军的兵力大大超过起义军，拥有新式武器，并且加紧收买地方封建主，因此，卡德尔起义军逐渐失利。从1841年起，起义进入困难阶段。

1841年6月，首都马斯卡拉失陷。塔格当普特、赛义达、特莱姆森、塞

徐拔：《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人民日报》1959年4月5日。

马赛尔·佩鲁东：前引书，第354页。

古柏尔等：前引书，上卷第2册，第111页。

卜杜、博加里和塔扎等地也相继被法军占领。1843年5月16日，2000名法军在奥马尔公爵率领下，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位于博加里以南160公里的卡德尔营地塔吉纳井，卡德尔退入摩洛哥境内。法国殖民者为了避免卡德尔与摩洛哥素丹联合抗法，便企图收买卡德尔，只要他愿意自动引退，法国政府将按照他的身份给予适当的生活待遇。虽然这时卡德尔的家属已为法军所俘，但他毫不在意，坚决拒绝殖民者提出的条件，继续进行斗争。

1845年春，塔伊比亚教派首领布·马扎在达赫拉山区举行起义。卡德尔立即返回阿尔及利亚，投入布马扎起义队伍，并重新被推举为起义领袖。新的起义开始后，卡德尔打了几次胜仗。1845年9月21日—22日，在西迪易卜拉欣寺院，卡德尔集军7000名，歼灭了一支法军，打死法军150人、俘获80人；接着，又包围了一支前来救援的法军，使法军只有16个人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返抵杰马要塞。卡德尔挥师东进，攻占了法军重点把守的米提贾平原。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阿尔及利亚军民的斗志，使整个起义形势一度出现转机。

可是，法国不断派兵增援，并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1846年，毕若派出18个纵队追逐卡德尔，并且组织了所谓“地狱纵队”、“死亡轻步兵”来对付起义者。根据毕若的命令，法国军官甚至相互以残暴行为竞赛，把大批的阿尔及利亚居民赶进山洞里，用烟熏死他们。卡芬雅克、佩利西埃、圣阿尔诺等人都曾经干过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在法国军队的追逐下，卡德尔再次陷入困境，于1846年7月退入摩洛哥境内。1847年，法军增加到107000人。同年4月，布·马扎战败。12月24日，卡德尔兵败被俘。殖民者起先把他关在法国罗亚尔监狱，后来又流放到叙利亚大马士革，于1883年逝世。恩格斯高度评价卡德尔，说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和大胆无畏的领袖”。

阿卜杜·卡德尔起义失败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并没有停止，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1871—1872年的起义。这次起义酝酿已久。法国殖民者的掠夺政策，使阿尔及利亚农牧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随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和亚尔萨斯、洛林两省难民的到来，土地掠夺更为变本加厉。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愿参加法国军队去为殖民者的利益卖命，而法国对普鲁士的巨额赔款也必将加重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负担。普法战争中第二帝国的垮台和巴黎公社革命，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都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起义爆发前，封建贵族首领西·哈吉·穆罕默德·毛克拉尼就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他团结30个部落，组成了一支拥有25000人的队伍。与此同时，谢赫哈达德领导的拉赫马尼亚教团也在起义发动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拉赫马尼亚教团在东部地区势力很大，它领导和影响着250个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部落，总共有60万农牧民，并组织了一支拥有10万多人的队伍。1871年初，卡比利亚地区就不断发生群众的自发斗争。人们举行抗议集会，拒绝缴纳税款，袭击殖民者，焚毁仓库，破坏通讯联系。在以比斯克腊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及内地一些地区，还成立了秘密的起义委员会（名为“舍蒂亚”）。这种组织通常由10—12人组成，它不仅没收叛教者的财产，购买武器弹药，为武装起义作准备，而且还能够对

殖民当局任命的地方官吏进行监督。还有一些法国军队中的阿尔及利亚士兵哗变，同当地居民一起袭击法军据点。总之，1871年初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3月14日，大起义在君士坦丁省卡比利亚地区爆发，毛克拉尼指挥起义军摧毁法军据点，欧洲籍移民纷纷逃入城市。巴黎公社革命消息传来后，更加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4月8日，拉赫马尼亚教团投入起义。哈达德分析了形势，认为法国政府正处于危急之中。因此，他号召穆斯林们团结起来，把侵略者赶出阿尔及利亚。毛克拉尼和哈达德结成联盟，不仅壮大了起义队伍，而且使这次在圣战旗帜下进行的抗法起义更加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

法国凡尔赛政府受到巴黎公社的牵制，无法增援远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因此，在4—5月间，起义发展十分迅速。起义军攻取城市，摧毁欧洲移民点，烧毁欧洲人的农场，夺回土地，严惩殖民官吏。由卡比利亚地区开始的起义，很快席卷整个阿尔及利亚东部，接着又波及西部，并深入南部撒哈拉地区。据统计，约有80万农牧民投入了这场斗争。

梯也尔政府派遣盖东为总督，于4月10日来到阿尔及利亚，对起义者实行残酷镇压。5月5日，毛克拉尼英勇牺牲。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政府便向阿尔及利亚大举增兵，总数达到85000人。法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起义虽然受到挫折，但仍在继续扩大。直到7月哈达德战败被俘后，起义者才失去主动权。毛克拉尼的兄弟阿赫默德·布·麦兹拉格·毛克拉尼率领余部，转战于南部撒哈拉地区。法军利用起义者兵力分散和行动缺乏联系的弱点，逐个攻占几个主要的起义中心。1872年1月20日，法军攻占了起义军的最后两个据点——图古尔特和瓦格拉，麦兹拉格·毛克拉尼被俘。

随着起义失败而来的，是法国殖民者报复性的疯狂镇压，成千上万的起义者被处死、投入监狱或者流放。参加起义的部落被夺去57.4万公顷的土地，没收了18万支枪械，并缴付赔款3600万法郎。

1871—187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大起义坚持了10个月之久，作战340次，给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这次起义可以说是封建主阶级领导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殖民主义斗争。此后，虽然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武装斗争并没有停止，但是只具有局部的性质。封建主已不能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艰苦的斗争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便由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承担了。

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和掠夺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它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基本点，即建立直接统治制度和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土地私有制。其细节虽屡经调整，但基本目标和框架一直未变。

直接统治制度在长时期内具有军事专制的特征。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初期，殖民统治大权完全掌握在法国军事统帅部手里。1834年7月22日，法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属地，设立总督府，直属陆军

大臣。总督握有军事指挥权和最高行政管理权。德鲁埃·德尔龙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此后，总督和各地的行政长官均为现役军人。1844年2月1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设立阿拉伯局。总督通过阿拉伯局征收捐税、办理案件，并监督酋长的活动。1848年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设置三个省，即阿尔及尔省、瓦赫兰省和君士坦丁省。在各省内，分别设置由文官管辖的欧洲人居住区和由军人管理的阿拉伯人区。各省虽有省长、议员，并可选举出席法国议会的议员，但是只有法国移民才能够享有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仍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正如1848年4月君士坦丁的一家法国报纸所承认的：“对法国人是法国法律，对外国人是国际法，对土著人是军事法律。”1865年7月14日，法国颁布法令，宣布穆斯林土著也是法国人。可是，他们只是法国的臣民，而不是公民。1870年9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撤消了阿拉伯局，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所谓民政体制。虽然法国政府将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权力由陆军部转移到内政部，表面上结束了军事统治，可是总督仍由军人充任。

大规模掠夺土地和向阿尔及利亚移民，是这一时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的主要之点。其目的是消灭阿尔及利亚公社土地所有制，将其转变成欧洲移民的土地私有制，从而消灭抗法运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培植一个巩固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毕若曾在法国议会叫嚷要仿效“罗马殖民的伟大榜样”，“哪里有水和肥沃的土地，哪里便应该安置移民，并不需要通知这块土地的主人”。迪迪埃则对议会说：“我们必须赶快摧毁氏族团体，因为它们领导着一切针对我们统治的反抗。”

法国殖民者侵入之前，在阿尔及利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氏族部落所有制和不分居家庭所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是罗马统治时期已归柏柏尔人拥有的土地和土耳其统治时期贝伊拍卖给土耳其人的土地。据法国人的材料，当时国有土地（“贝伊利克”）为150万公顷，寺院土地（哈布斯地产）为300万公顷，氏族部落公有土地（阿尔什地产）和不分居家庭公有土地（麦尔克地产）为800万公顷（撒哈拉绿洲内为300万公顷），而私有土地只有300万公顷。法国殖民当局掠夺阿尔及利亚人的土地，在1830年、1831年、1840年、1843年、1844年、1845年、1846年、1863年、1873年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国王敕令和议会法案。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凡是曾经抵抗过法国或通敌的阿拉伯人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2)过去属于德伊和贝伊的贝伊利克地产，正式变为法国的国有财产；同时，属于寺院财产的哈布斯地产，也被宣布为国有。(3)凡是在1830年7月1日以前无法以文件证明其所有权的无主土地，均予以没收；部落未使用的轮休地，如果没有证明文件，则认为是空闲无主地，也予以没收。阿尔及利亚人是依据伊斯兰教习惯法拥有土地的，他们当然不可能拿出正式的文件来。于是，一些原来属于氏族部落或家族公有的土地，也大批地变成了法国殖民者的财产。(4)氏族部落的土地应在各个家庭之间分配，各个不分居家庭的土地

翟象乾：前引文。

翟象乾：前引文。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8页。

马克思：前引文。

应在各个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每个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出让土地。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阿拉伯—柏柏尔人氏族部落不分居和不出让的原则，为确立土地私有制打下了基础，而法国殖民者确立土地私有制完全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一位法国议员在辩论中曾不加掩饰地指出：“只有投机者和高利贷者（指法国人）才要求你们确立私有制”。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法国殖民者掠夺了大量的土地。据统计，1850年，殖民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15万公顷，1860年为36.5万公顷，1870年达到76.5万公顷。法国殖民当局将土地出售给欧洲移民。多数买地人根本无意耕种土地，他们只是进行土地投机，低价买进，高价转卖。于是，土地成为各式各样投机分子疯狂追逐的对象。大部分土地为法国军官、资本家尤其是大公司所攫取。例如，日内瓦公司在1853年获得土地2万公顷，阿尔及利亚总公司在1864年获得10万公顷的森林，哈白拉与马克特公司在1861年得到土地2.5万公顷。法国殖民者夺去了最肥沃、水源最好的土地，经营种植园，为本国工业提供原料。

在大肆掠夺土地的同时，法国向阿尔及利亚大量移民，以便推行同化政策，加强殖民统治。在1830年法国发动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前，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籍移民还不到1000人；可是，在这以后欧洲籍移民迅速增加。据统计，1833年为7812人，1840年为27204人，1851年为131000人，1861年为200000人，1872年达到290000人。在这些移民中，法国人占半数以上。有的移民是资本家或官吏，但大量的是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此外，还有一些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犯。

土地掠夺使殖民者大发横财，却使大批阿尔及利亚农牧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牧奴，或者流入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遭受残酷剥削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处境十分悲惨。1868—1870年，阿尔及利亚发生虫灾和旱灾，加上霍乱流行，导致50万人丧生。

法国殖民者颁布一系列土地法令，其目的是通过没收和出售的办法，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转为法国移民所有，并且以破坏原来的土地公有制和确立土地私有制的手段来瓦解氏族部落组织，从而摧毁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可是，他们对土地的掠夺却引起阿尔及利亚农牧民更为激烈的抗法斗争。从长时段来看，阿尔及利亚传统土地制度和氏族部落组织的破坏，实际上摧毁了阿尔及利亚以血缘为纽带的旧社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将会引起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五、突尼斯的半殖民地化和改革

在突尼斯贝伊哈穆德统治时期（1782—1814年），雅内萨里企图依靠阿尔及利亚的支持，推翻侯赛因王朝的统治。1806年，哈穆德断绝了同阿尔及利亚名义上的附属关系，并在1806—1813年的阿突战争中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平息了国内雅内萨里的叛乱。1814年，哈穆德的继承人奥斯曼即位不久，

马克思：前引文。

杨人鞭：前引书第363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800—1918年》，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5页。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前引书，第41页；杨人鞭：前引书，第361—362页。

就在同年 12 月的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在马哈茂德（1814—1824 年）及其子西蒂·侯赛因（1824—1835 年）统治时期，政府实行的专卖制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加上欠收和瘟疫，使突尼斯的经济逐渐衰落。

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由于突尼斯丧失了海上防御力量，欧洲列强加紧对突尼斯进行侵略活动。根据 1824 年签订的条约，突尼斯给予法国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的一些特权。同年，英、意、奥等国也与突尼斯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830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使突尼斯面临更加现实的威胁。但与阿尔及利亚宿怨未消的突尼斯贝伊却采取亲痛仇快的态度，与法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规定突尼斯必须保障这些国家贸易和过境运输的自由。11 月，他还写信给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学者，劝他们放弃抗法斗争，信中说：“在阿尔及利亚偶然发生的这一切”是“神的意志”，“你们不可能击退法国军队，在现有的局势下，你们的责任是同我们联合起来，放弃只可能是自杀行动的战争。”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土耳其为了加强它在北非的地位，于 1836 年派舰队驶往突尼斯，企图建立起对突尼斯的直接统治，但遭到法国的反对。法国一方面派舰队到突尼斯海岸进行武装示威，同时向土耳其政府发出态度强硬的照会。在战争威胁面前，土耳其退缩了。法国此举并不是为了保护突尼斯的独立，而是为了把突尼斯攫为己有。1837 年，法国军队从阿尔及利亚侵入突尼斯境内，占领了若干绿洲。后因英国的反对，法国军队不得不退出。法国 1837 年的侵略使突尼斯尝到了亲痛仇快政策的苦果，切身感受到列强特别是法国侵略威胁的严重性。

海上防御力量的丧失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欧洲列强在突尼斯的政治渗透和商品倾销打开了大门。突尼斯的闭关政策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限制沿岸城市欧洲人的数量；二是实行国家垄断价格、收购和销售。例如橄榄油必须按平价卖给政府的代理商，除了日常生活需要和其他个人用途外，任何人都不得买油。但在列强的压力下，突尼斯不得不相继放弃这类政策。欧洲国家的移民在突尼斯逐渐增多，1834 年有 8000 人，1856 年增至 12000 人。他们居住在突尼斯城和沿海其他城市，开始掌握突尼斯的进出口贸易，购置房产和土地，并且享有领事裁判权。欧洲列强不仅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而且各国商品只需缴纳 3% 的进口税。于是，英国的棉织品、法国的丝绸代替了本地的土布，其他欧洲商品也充斥突尼斯市场，手工业日趋衰落。如突尼斯生产的土耳其帽曾是土耳其和北非市场的畅销货，但受到法国和奥匈同类产品排挤。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不断进行经济渗透。法国承包了修建水道、开辟道路、架设电线等工程，英国取得设立新式榨油厂的权利，意大利支持在马尔萨拉与崩角（今阿达尔角）之间敷设电缆的计划，列强之间展开了争夺租让权的激烈斗争。

沉重的税收（粮食税、人头税、橄榄树税、椰枣树税等）都压在农民的身上。城市居民虽然不纳人头税，但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其他捐税，如入城税、市场税、专利税、房捐、营业执照税、制造税等等。残酷的压迫剥削，使 19 世纪上半期的突尼斯充满尖税的阶级矛盾，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起义不断发生。

Mustapha Kraim, op.cit, pp.418, 279.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26 页。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 33 页。

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外国资本的渗透，导致经济危机和财政困难，首先表现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突尼斯的主要硬通货皮阿斯特对法郎的比价日趋疲软。在哈穆达统治时期（1782—1814年），1皮阿斯特可兑换1法郎40生丁；到马哈茂德时期（1814—1824年）只值72生丁；艾哈迈德时期（1837—1855年）下降到65生丁。为缓解财政赤字，突尼斯政府开始向外国借款，1824年获得第一次外国借款。此后，外债不断增加，1863年借款达3500万法郎。

国家主权受到的威胁，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表明旧的封建统治机制已运转不灵，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突尼斯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感到，必须在外侮内忧的形势下作出变革的抉择。西方通过近代化而强盛起来，无疑给了他们某种启示；埃及和土耳其初具近代化特征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现存的仿效榜样。这一改革是由具有革新思想的明君贤相领导的。尽管突尼斯沿海城市早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外国商品竞争之下受到了严重打击。同欧洲贸易的扩大，产生了一批新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多数是从从事中间贸易的掮客（外国公司的经纪人或政府的贸易承包人）、银钱兑换商、土地投机商。在商业资产阶级中，犹太人占有很大比重。这个阶层本身力量微弱，且与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这个特征决定他们不能担当领导近代化改革的任务，只能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到19世纪30年代，突尼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革新思潮、标榜改革的官僚集团。如1837年即位的艾哈迈德，不只是接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教育，而且还通晓外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当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时，他就预感到“欧洲投下了威胁整个马格里布的阴影”。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力主改革的官僚，如穆斯塔法、赫雷丁以及有意大利血统的吉赛普·纳佛等。从艾哈迈德开始的突尼斯改革，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艾哈迈德贝伊统治时期（1837—1855年）的改革，其特点是强兵。突尼斯的旧式军队叫“斯巴希奥贾克”（骑兵近卫军），是按土耳其军制建立的世袭军队。艾哈迈德决心按照欧洲方式改造军队。他即位后，立即以私人合同形式聘请了一些退役的法国军官，指导新军的训练。1840年，他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巴尔杜综合技术学校。1842年1月，应他之请，法国派来由科尔贝叶和吉拉尔领导的军事代表团，在突尼斯呆了13年。在法国军官的训练下，艾哈迈德建立起一支正规军，包括7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和1个轻骑兵团，总数有26000人。这支军队的编制完全仿效法国军队，甚至连军服也和法国七月王朝军队的服装差不多。此外，他还建立了一支非正规军，从事辎重运输，并担负到各地去征税的任务。艾哈迈德还向法国和意大利购买军舰，组成了一支小舰队。为了维持军队，他制定了发展工业的计划，开办军毯织造厂、面粉厂、食品厂、皮革厂、火药厂、大炮铸造厂，开采铅矿，并为此聘请法国技师和工人，向欧洲购买机器设备。他还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翻译外国书籍。

艾哈迈德的这些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政府的收入有限，无力承受巨大的开支。后来，连军饷也不能定期发放，工厂相继关闭，于是只得减少军

Mustupha Kraim, op.cit, p.136.

Miege, Ahmed Bey du Tunis, (《突尼斯的艾哈迈德贝伊》), Paris 1976, p.34.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89—90页。一说3万余人。

队。到 1853 年 1 月，步兵只保留一个团，其余全部解散；炮兵和骑兵只能留下极少数保养大炮和饲养马匹的人员。1854 年，突尼斯政府又临时招募新兵组成一支军队，派去参加土耳其对俄国的战争。这些装备极差、毫无战斗力的突尼斯士兵，由于疾病和生活困苦，在黑海地区的兵营里大批死亡。

第二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以“宪政”为名的政治改革。1855 年 5 月，艾哈迈德去世，他的堂弟穆罕默德继位（1855—1859 年在位）。由于艾哈迈德的军事改革收效甚微，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能满足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需求。于是，在商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一批革新派官僚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穆罕默德在当政之初就停止了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工作，只保留了一所巴尔杜军事学校。他亲自倡议改革粮食税，废除原来任意估产征税的办法，按播种面积定出税率；而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内容就是颁布了《基本公约》，把改革的重点从军事转向了政治领域。1857 年 9 月 9 日，穆罕默德提出了一份《基本公约》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基础。它规定，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信仰自由、在法律上和纳税上一律平等。按照《基本公约》，突尼斯政府取消了专卖制度，实行自由的贸易和企业活动，改造法庭。1858 年 8 月，成立了突尼斯城的市政议会，由 15 名议员组成，每年更换 1/3；并建立了由首相穆斯塔法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可是这项工作尚未完成，穆罕默德于 1859 年 9 月 21 日去世，由穆罕默德·萨多克继位（1859—1882 年在位）。

1861 年 1 月，宪法正式公布，并于同年 4 月 23 日起生效。1861 年宪法是突尼斯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共 13 章 114 条，第一次在专制君主之外设立了一个议会。贝伊的权力受到国务议会的制约，议会拥有权废黜贝伊。国务议会由 60 名议员组成，任期五年，每年更换 1/5。议员的 1/3 从各部大臣、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选出，其余则在知名人士中推选。行政权虽然属于贝伊和各部大臣，但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务议会，它可以反对一切危害和违反宪法的行为。宪法的实施也给司法制度带来了变化。1861 年和 1862 年，在突尼斯城和全国各地先后设立了法庭。1862 年 2 月，宣布建立突尼斯各部；3 月，颁布征兵法；4 月，规定了各部职权。

为了重新建立正规军，萨多克向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购买军服和武器装备，并制定了一部军事法典。但是，由于财政困难，军队的给养仍然无法维持。经常保持的一万名正规军不能按时换发军服和装备，军饷久拖不发。从 1862 年起，士兵开始开小差。到 1863 年 11 月，军饷已拖欠了 11 个月。于是，政府只好遣散大部分军队，保留 4000 名官兵；从 1864 年起，又减少到 3000 名以下。这些军队的服装破烂不堪，枪支都是欧洲国家用过的旧货，保养又差，无法射击，只能当作刀矛来使用，军队完全没有操练和演习，军事学校也在 1869 年正式取消了。

在改革过程中，萨多克花费了大量的金钱。1862 年，政府所欠的内债已达 2800 万法郎，可是国库的全年收入只有 1350 万法郎，只得依靠向外国借款来摆脱财政困境。1863 年，法国向突尼斯贷款 3500 万法郎（按债券票面价值共计 3934.5 万法郎），以人头税作为担保。由于回扣，佣金、利息以及官员们从中贪污，不到一年，这笔借款已损失 3/4。1865 年，法国又贷款 1500 万法郎，突尼斯用关税收入作担保。贷款的条件极为苛刻，规定 100 法郎的

贷款实际只付 72 法郎；这样，名为 1500 万法郎的贷款，突尼斯仅得 1036.5 万法郎。贷款合同规定，15 年内还清本息；因此，突尼斯政府共需偿还 2700 万法郎。由于借款大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和偿还旧债，因此欠债越积越多。到 1869 年，突尼斯的外债超过了年度预算收入的 12 倍。再加上欠收、饥馑和瘟疫，使突尼斯政府不得不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还外债。1869 年 7 月，萨多克被迫同意成立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突尼斯的代表组成国际委员会，对突尼斯的财政实行监督。这标志着突尼斯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第三阶段是赫雷丁的改革，这也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最后一次努力。由于萨多克贝伊沉迷后宫酒色，很少过问国事，国家财政破产，经济衰败，欧洲列强控制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在此艰难时刻，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赫雷丁登上了政治舞台。1870 年 1 月，他掌握了内政、外交和财政大权，1873 年 10 月出任首相。赫雷丁是突尼斯近代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为了克服经济政治危机，保卫国家独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方面，赫雷丁希望建立有权威的行政机关。他撤换了一些渎职的卡伊德，严禁卖官鬻爵、营私舞弊和侵吞国家财富。他规定了税收的方式和地方官员的薪金；并压缩国家支出，用税收的超额部分来支付利息和偿还债款。赫雷丁还整顿司法，减少内地法庭宗教法官的人数，在突尼斯城制定了警察规章制度。

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减轻农民的捐税，取消了过去欠缴的税款，并要求地方官员每年必须提出税收情况的详细报告，建立会计帐册，发给纳税人纳税收据。他将无人耕种的国有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1874 年和 1875 年颁布的有关农业的条例，规定了分成佃农的地位和义务，他们的劳动所得为扣除捐税后收成的 1/5。尽管这种剥削仍很沉重，但是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固定的法律基础之上，比起毫无限制的掠夺似乎略好一些。由于农业条例的颁行和对地方卡伊德的监督，农民负担有所减轻，耕地面积扩大。1873 年和 1874 年，突尼斯农业连续两年获得好收成，国库收入随之增加。1873—1874 年度，税收为 1200 万皮阿斯特；1874—1875 年度，税收为 1100 万皮阿斯特。为了重振日趋衰落的手工业，赫雷丁又下令制定规章，规定行会师傅与帮工之间的关系、行会会长的选举办法、工作制度以及产品的出售方法。1870—1875 年，各手工业行会都先后订立了规章制度。同时，政府还减轻了突尼斯商品的出口税。赫雷丁原来还想提高外国商品的进口税以保护本国的手工业，但由于遭到各国领事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赫雷丁在突尼斯城和沿海城市兴建和扩建学校。据 1874 年统计，突尼斯共有清真寺学堂 59 所、其他学校 27 所，共有学生 1470 名。1875 年，赫雷丁创建了萨迪基学院，开设的课程有古兰经、法语或意大利语、数学和自然科学。这所学院毕业的学生，有的被派赴欧洲继续深造，有的则充当行政官员。同年，他还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藏书数千册。印刷出版事业和医院卫生事业也受到重视，1879 年突尼斯建成了第一所欧洲式的医院。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 179、182、264 页。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 441 页，注 43。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 410 页。

让·加尼阿热：前引书，第 441 页，注 46。

在对外关系方面，赫雷丁一方面奉行亲土耳其的政策，另一方面在相互竞争的英、法、意三强之间保持均衡。他认为：“臣属于土耳其就是突尼斯独立的保证。只要土耳其帝国存在，纳贡或臣属的国家就可以放心，因为这些国家的生存牵涉到整个东方问题的解决。”¹，他还认为，只要对英、法、意三方不偏不倚，都给予同样的特权和租让权，这就能使突尼斯避免被某一强国占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大国之间的矛盾，但所求得的独立只能是形式上的。由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让步，突尼斯遭受的奴役日益加深。

赫雷丁的改革，受到法国和国内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1875年和1876年农业欠收，财政再度发生困难，更给他们以攻击的口实。法国领事鲁斯唐把突尼斯的形势说成漆黑一团，千方百计赶他下台。被缩减了宫廷开支和津贴的亲王们，同被削弱权力的卡伊德和伊斯兰教长们互相勾结，迫使赫雷丁于1877年7月22日辞职，流亡国外。赫雷丁的下台，标志着突尼斯改革的最后失败。

突尼斯改革历时40年，是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进行的。这次改革不同于历史上突尼斯封建统治阶级的调整和改良，它是在引进近代技术条件下，为摆脱民族危机、维护封建统治而进行的。它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贸易额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商业资产阶级的勃兴，对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和封建政治也产生了某种冲击。但改革并未实现强兵富国的愿望，近代化的使命没有完成，反而使国家的独立主权逐步丧失。

突尼斯改革夭折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是由具有一些模糊革新思想的明君贤相领导的，他们的阶级属性未变，因而不可能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手工业者仍然组织在封建行会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以及矗立其上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成为近代化改革的强大阻力，使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大都半途而废。军事近代化曾被视为主要目标，但到19世纪70年代，“陆军不能保卫边界”，“海军不能防止最少的敌人登陆”。所建的一批工厂，都相继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政治上虽然披上了一件立宪的外衣，但官僚机构原封未动。封建官僚从上到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艾哈迈德贝伊效仿凡尔赛宫建立了穆罕默迪亚宫，耗资几百万法郎。皇亲国戚竞相追求西方消费方式，订购欧洲高级时装和日常生活品。一些标榜为改革派的人物，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封建官僚不学无术，在工程建设上随意拍板。如法里纳海军港口因事先未经测量，建成后水浅，舰只无法进港，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就此报废。所有这一切，必然造成国库空虚和财政困难。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突尼斯只得加重对人民的压榨和向外国举债。加重人民负担，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马杰巴”），到1863年从36皮阿斯特增加到72皮阿斯特。于是，次年就爆发了阿里·本·格达赫姆领导的大起义，席卷了突尼斯大部分地区。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1866年和1868年又相继爆发了一些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而不断举借外债的结果，则使外国资本得以进一步向突尼斯渗透。他们购买土地，取得种种特权和租让权。欧洲列强从根本上说不愿看到一个独立的近代化的突尼斯出现

让·加利阿热：前引书，第408页。

让·加利阿热：前引书，第98页。

在他们身边，他们反对突尼斯走向独立的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纳入他们的殖民化轨道，使突尼斯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六、列强的侵略和摩洛哥迟到的改革

摩洛哥也像突尼斯一样，在欧洲列强侵略的威迫下，进行了挽救危亡的改革。

长期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摩洛哥实行的是闭关政策。它只开放五个港口，每个港口的欧洲移民限制在十人，欧洲商人只同政府指定的商业代理人进行买卖；政府还实行垄断贸易，贸易垄断权由素丹直接行使，规定价格和收购及销售事宜；并提高进出口关税，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和本国重要产品的出口。1852年，马扎甘和卡萨布兰卡的进出口税平均提高了20%，粗羊毛出口税每担从40盎斯提高到60盎斯。封建统治者自以为实行这种与世隔绝的政策就可以维持国家的独立，结果却更加助长了国家的封建落后性。

欧洲列强对摩洛哥的直接威胁始于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当时素丹阿卜德·拉赫曼已平息了部落叛乱，企图借机把摩洛哥的版图向东扩展，并派军占领了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些地区，包括特莱姆森。由于法国以战争相威胁，他不得不从阿尔及利亚撤军。

拉赫曼曾支持阿卜杜·卡德尔的抗法斗争，这便成了法国侵略摩洛哥的口实。1836年4月30日，法国军舰驶抵丹吉尔，要求摩洛哥停止对卡德尔的援助，遭到摩洛哥政府的拒绝。6月，法国政府派遣陆军中校弗雷德里克·德·拉律出使摩洛哥，向拉赫曼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强迫素丹接受法国的要求。但拉律的出使也未给法国带来实际的效果，摩洛哥素丹继续支持卡德尔。

1843年，阿卜杜·卡德尔抗法斗争受挫，退往摩洛哥。法国便以追击卡德尔为借口，进犯摩洛哥，1844年6月22日出兵占领乌季达。6月28日，法国向摩洛哥发出照会，除了要求解散集中在阿摩边界上的摩洛哥军队外，还要求摩洛哥驱逐卡德尔。拉赫曼拒绝了这些要求。在全国各地反法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拉赫曼向法国宣布圣战，派其子穆莱·穆罕默德率领军队50000名抵抗法国的侵略。同年8月1日，法国军舰28艘抵达丹吉尔，8月6日炮击该港。与此同时，法军从阿尔及利亚侵入摩洛哥东部地区。8月14日，在伊斯利河岸边，摩洛哥军队与法国展开激战。虽然摩洛哥士兵英勇奋战，但在法军优势火力面前损失惨重。穆莱·穆罕默德逃回非斯。8月15日，法国舰队炮轰摩加多尔，并占领该地。阿卜德·拉赫曼被迫接受和谈。法国极欲把摩洛哥变为阿尔及利亚的第四个省，可是卡德尔的抗法斗争仍牵制着法国的大量兵力，加之英国的插手，法国也只得暂时止步。

1844年9月10日，法国与摩洛哥签订丹吉尔条约，规定摩洛哥不得以任何形式援助法国的任何敌人。这不仅使阿卜杜·卡德尔失去了摩洛哥的支援，也使摩洛哥失去了可以联合进行抗法斗争的力量。丹吉尔条约签订后，法国又提出举行谈判，确定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界。双方于1845年签订边界条约，按照以前摩洛哥与土耳其非洲领土之间的分界线来确定边界。但是这条边界划分得很不明确，特别是条约中规定了法国在摩洛哥境内享有所谓追捕权，这就为法国进一步的侵略造成了可乘之机。

伊斯利河战役暴露了摩洛哥军队的无能。一位参加过该战役的法国军官说，摩洛哥军人“每个人都背着我们只有在打猎时才使用的武器”。摩洛哥同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已无力抵抗欧美列强的政治和军事压力。1836年，美摩条约签订，美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1856年12月，英摩条约和关于贸易和航海的协定签订，英国不仅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而且还得到了贸易特权；摩洛哥承认自由贸易原则，撤销专卖部门，并给予英国商人输入任何商品的权利，对英国商品关税值百抽十。

摩洛哥的衰落，给占据摩洛哥西北部沿海一些地方的老殖民主义者西班牙带来了重振雄风的希望和机会。由于休达、梅利利亚、胡塞马群岛等地不断遭到里夫部落人民的袭击，西班牙要求摩洛哥赔偿损失。1859年8月，双方签订得土安协定，确认了西班牙对梅利利亚的保护权。但里夫部落人民的反抗并未停止，得寸进尺的西班牙殖民者又向摩洛哥要求赔偿，遭到拒绝。于是，西班牙向摩洛哥宣战，封锁得土安港、丹吉尔港和阿赖什港。同年11月，西班牙以一支舰队和5万名士兵发动进攻。刚刚即位不久的素丹穆莱·穆罕默德派他的兄弟穆莱·阿巴斯和穆莱·阿赫默德率领两支军队前往迎战。由于战术不当，摩洛哥军队在1860年2月4日得土安附近的决战中失败，得土安陷落。接着，西班牙军队又进攻丹吉尔，3月23日，摩洛哥军队遭到又一次失败。穆莱·穆罕默德被迫求和。在英国的调停下，4月26日，摩洛哥同西班牙签订了得土安条约。条约规定，摩洛哥放弃休达周围地区的全部主权，将伊夫尼的渔业基地让给西班牙，赔款一亿比塞塔；在付清这笔赔款前，得土安一直由西班牙占领。此外，摩洛哥还被迫同西班牙签订了贸易条约，给予西班牙以最惠国待遇。摩洛哥为了付清赔款，不得不向英国贷款42.6万英镑，年息15%，以海关收入作抵押。

法国对英国得到的权益极为眼红，便不断向摩洛哥施加压力，1863年8月强迫摩洛哥签订条约，规定以前给予英国的一切特权也同样给予法国。法国并未以此为满足，又借口各国船只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不断遭到里夫部落人民的袭击，要求摩洛哥政府提供安全保障。1865年5月，摩洛哥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美国、荷兰、瑞典、奥地利、比利时、法国等国就确保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安全问题进行谈判。5月31日，双方在丹吉尔签订了条约，摩洛哥素丹满足了列强的要求。凡是签约各国的臣民，都可以在摩洛哥享有特权，甚至在列强的领事馆工作的摩洛哥人，或者是作为外国公司的股东、外国商行的职员或经纪人的摩洛哥人，也可以享受到这些特权，而不必服从本国的法律。

由此可见，摩洛哥的对外开放是在列强刺刀下被迫进行的，是由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随着列强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他们在摩洛哥的势力大为增强，在沿海的主要城市，列强都设立了领事馆。欧洲人在摩洛哥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从事贸易，放高利贷，购买房屋、牲畜和土地。外国商行和轮船公司在摩洛哥建立了代理机构。基督教传教士兴建教堂，并于1862年开设了第一所教会学校，教授外语、算术和簿记。不平等条约使外国商品突破了垄断贸易壁垒，源源涌入摩洛哥市场。以摩加多尔为例，糖的进口增

Bernard Augustin, *Le Maroc* (《摩洛哥》), Paris 1921, p.254.

马塞尔·佩鲁东：前引书，第411页。

长率 1846—1856 年为 12%，1856—1866 年提高到 32%。欧洲的商品倾销，使摩洛哥纺织业受到的打击最大，结果导致外贸逆差、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黄金外流。摩洛哥的金盎司，1862 年的含金量只有 1822 年的 1/2、1766 年的 1/4。赔款、外贸逆差和偿还外债本息，使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边缘。

1873 年即位的穆莱·哈桑亲眼目睹了摩洛哥衰落的全过程，他希望走改革之路。其父穆莱·穆罕默德在位期间，曾作过一些改革的尝试，力图建立本国的民族工业（例如在马拉喀什建立制糖厂、在非斯建立印刷厂等等），加强正规军，并为此购买外国工业设备和武器。穆莱·哈桑继承父志，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并团结和起用一批赞成改革的人士。

哈桑一世首先注意创建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他废除了旧的黑人世袭近卫军，实行征兵制，以补充正规部队。为了训练部队，他从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聘请军事教官，并购买外国新式武器。他还着手恢复海军，建立本国的军事工业。穆莱·哈桑建立近代化军队的目的，既是为了加强摩洛哥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是为了镇压地方封建分裂势力。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了乌季达、苏斯河和嫩河地区、塔德拉地区、塔菲拉勒地区的叛乱。

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穆莱·哈桑亲自处理政务，积极进行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他取消中间人，直接向地方征收赋税。他废除了 18 个大的卡伊德辖区，划分为 330 个小的地方行政单位，任命一些小的卡伊德去进行管理。为了革除封建机构的弊端和防止海关人员受贿，他采取发薪和定期派出监察人员的措施，并严格规定各“维齐尔”（大臣）的职责，建立监察机关，防止越权和贪污。但哈桑的行政改革没有超出封建制度自我调整的范畴。

在经济方面，穆莱·哈桑试图制止外国资本的渗透。他宣布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拒绝出让矿产承租权。鉴于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的教训，他同其父一样，拒绝外国提出的关于建设铁路、公路、桥梁和港口的建议，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容易落入外国的圈套。他制定了新的税制，规定基督教徒和以前免税的教会首领们都必须纳税。为了稳定摩洛哥的币值，他不仅实行本地货币与外国货币固定的兑换率，还在 1881 年铸造新的银里亚尔。他还发展工农业和交通运输，建立了火药厂和非斯兵工厂。兵工厂聘用了西、法、英、意、德五国技术人员，由他们管理，从欧洲进口机器。他又在丹吉尔建造新码头，改建拉巴特港，安装新式吊车；修建从非斯到梅克内斯的铁路；发展邮政事业；引种棉花和甘蔗，发展经济作物。穆莱·哈桑的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期间，摩洛哥还清了积欠西方的债务，并使国库的储备达到 6000 万杜劳。

哈桑着手文化教育的改革。1888 年，成立了一所工程师学校，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学习医学、工程和自然科学，并创办图书馆和报纸。但这些措施对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育触动不大。

穆莱·哈桑的改革没有触及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领地，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卡伊德、商人、买办大量强占和购买土地，人民群众的地位并没

Jean - Louis Miegé , Document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Marocaine au XIX^e Siè cle (《19 世纪摩洛哥社会经济史文献》) , Paris 1969 , p. 241.

马塞尔·佩鲁东：前引书，第 414 页。

有得到改善。由于通货膨胀，农民破产，骚动和起义不断发生。来自封建势力和伊斯兰教神学家的阻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哈桑都感到难以推进改革。但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看，摩洛哥的改革是一场迟到的改革。它不只是在时间上比埃及晚了 70 年、比突尼斯晚了 30 年，而是当穆莱·哈桑推行近代化改革的时候，自由资本主义已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加紧了对非洲的争夺和瓜分，他们再也不容许一个独立的近代化的摩洛哥雄踞于直布罗陀的南侧。

穆莱·哈桑执政时本想实行独立的均衡外交政策。他不单纯排外，也不仅仅依靠某一个强国，而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之周旋。1878 年，他开始同列强谈判关于特权制度的问题，试图废除外国领事的保护权。1880 年 2 月 8 日，摩洛哥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巴尔加什通知各国驻丹吉尔的公使馆，说他奉素丹穆莱·哈桑之命，宣布保护权停止生效。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列强群起反对。

同年 5 月，由英国提议，哈桑一世的代表与列强的代表在马德里举行国际会议，7 月 3 日签订了马德里公约。该条约肯定了列强的保护权，只是废除了保护权的世袭制，它规定：“所有缔约列强在外交和领事方面的保护权今后都处于平等地位，承认每一个缔约列强在保护权方面均享有最惠国待遇，承认一切外国人在摩洛哥土地上享有产业权。”马德里公约实际上意味着摩洛哥独立的结束。摩洛哥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哈桑要建立近代化独立国家的梦已经破灭。

摩洛哥近代化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其结果却是被西方殖民者及其代理人拖入了殖民地化的轨道。这说明，非洲国家要实现近代化，既要反对顽固势力退回闭关自守的老路，又要反对殖民者按西方意图和模式使之变成附属国和殖民地的道路。当时的摩洛哥还没有这样一股社会力量能承担此重任，这正是迟到的改革夭折的症结所在。

亨利·康崩：《摩洛哥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47 页。

马塞尔·佩鲁东：前引书，第 413 页。

第十三章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西非沿海各国

18世纪末至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政策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西非沿海各国在政治上激烈动荡、在经济上逐渐变动的时期。随着以资本原始积累为主要目标的殖民政策向以开拓原料和商品市场为主要目标的殖民政策的转变，占领和扩大殖民领土成为列强在西非活动的突出现象。英法等国以前一时期的沿海居留地为依托，以禁止奴隶贸易为旗帜，采用签订条约、贸易传教直至武装侵略等方式，建立和扩大了在沿海的殖民地、保护国和势力范围。塞内加尔、冈比亚、象牙海岸沿海一些地区，黄金海岸沿海、达荷美沿海一些地区，以及包括拉各斯在内的今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些地区，逐步落入列强之手。殖民统治的政治体制初见端倪。

面对西方侵略，非洲各族内部分裂动荡。一些人不顾民族利益，同殖民者携手。一些人力挽民族危亡，与殖民者英勇抗争。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西非政治中的显著特征。阿散蒂人和拉各斯人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战争，奥马尔和卡约尔人反对法国殖民侵略的战争，均属反侵略斗争中的光辉篇章。但这一时期的西非沿海各国，未能形成统治阶级变革自救的潮流。这一形势同萨凡纳地区的圣战及其变革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一时期，欧美各国掀起了遣返释奴、建立释奴殖民地的运动。18世纪末，近代黑人奴隶制度行将终结，获释奴隶的数量迅速增加，在欧美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浪乞食的黑人越来越多。获释奴隶的安置终于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摆脱释奴的困扰，欧美一些国家掀起了将他们遣送回非洲去的运动。遣返释奴的运动发轫于英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加入遣返回列。通过释奴安置，塞拉利昂殖民地产生和扩大了，利比里亚国家逐渐形成，利伯维尔殖民地随之出现。利伯维尔殖民地的建立有利于法国在加蓬的扩张。但是，由于当地非洲人不断涌入利伯维尔城区，释奴及其后裔渐被淹没，利伯维尔作为释奴殖民地的影响无足轻重。

“合法贸易”的逐渐兴起，是这一时期西非沿海经济变动的主要标志，是殖民地经济结构开始孕育的先兆。“合法贸易”是一种服务于传统政治结构的商品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洲传统社会因奴隶贸易衰落而遭受的损失，使传统政治结构得以延续。“合法贸易”的基础是西非沿海少数几种农林产品，其中包括采集自野生植物的产品。为满足“合法贸易”需求而进行的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因此，它对西非沿海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萌发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一、西非沿海各国的社会经济变动

19世纪初，欧美各国相继宣布废止奴隶贸易。西非沿海各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发生新的变动。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活动于西非沿海的大多数欧美奴隶商人在千方百计继续从事走私奴隶贸易的同时，逐渐改弦易辙，寻求新的商品贸易；得利于奴隶买卖的非洲首领和中间商也渴求从新的商品贸易中取利，以重振被削弱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这样，以商品生产和贸易为特征的所谓“合法贸易”便应时而生。

最初，欧洲人拟在西非沿海地区、特别是有欧洲人居留地的地区经营种植园，利用非洲劳工生产咖啡和棉花等产品，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欧非贸易。

但是，由于存在各种不利因素，有关试验无一成功。“合法贸易”不得不以非洲原有产品为基础，其中又以棕榈油和花生输出为大宗。棕油的大量生产和出口大约始于 19 世纪 20 年代。棕油生产分布广泛，发展迅速。至 50 年代，黄金海岸的棕油输出在出口总值中仅次于黄金，居第二位。至 70 年代，达荷美每年棕油输出的价值已达 50 万镑。约鲁巴和喀麦隆—安哥拉也生产大量棕油。但是，棕油生产的中心在尼日尔河三角洲。据不完全统计，1855 年西非沿海各地棕油输出所占份额是：向风海岸 3.5%，黄金海岸 5.5%，奴隶海岸 9%，尼日尔河三角洲 60%，喀麦隆—安哥拉 4%，“非洲”（这是原资料注明的字样，确切地区难以断定）18%。花生的主要产区最初为塞内冈比亚沿海，特别是欧洲人居留地周围，后来逐渐向内地扩展。此外，黄金的采掘、天然橡胶和柯拉果的采集以及木材砍伐也属“合法贸易”范围。与此同时，谷物等的生产有了发展。

“合法贸易”的产品主要销往欧洲。花生的主要购买者是法国。法国居民非常喜爱用橄榄油同花生油混合制作的貌似绿色大理石的肥皂，而对用棕油制作的黄色肥皂却不屑一顾，因此花生种植首先在法国属地迅速发展。在圣路易和果雷埃等花生贸易的主要中心，每年都有大量花生上市。但花生贸易的规模同棕油贸易相形见绌。棕油的主要收购者是英国。棕油是这一时期英国同西非贸易的主要产品。英国的非洲船队中有半数以上投入棕油贸易。棕油贸易主要由利物浦、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经营，并主要由这三大港口输入，而以利物浦为最。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利物浦输入的棕油占棕油输入总量的大部分。非洲的棕油输出港口多达二十几处，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老卡拉巴尔、博尼、贝宁、新卡拉巴尔和本托河等均为重要的棕油输出港口，50 年代半数以上的棕油是经由这些港口外运的。这一时期的棕油贸易呈持续上升趋势。英国从西非进口棕油的数量 1820 年为 872 吨，1830 年为 10673 吨，1840 年为 15273 吨，1850 年达 21723 吨。由于汽船的使用，1853 年的输入量更增至 31457 吨。1820—1840 年间，黄金海岸的油价上涨 10 倍。据估计，棕油贸易的利润一般为 50—100%，19 世纪 50 年代甚至可达 300%。至 19 世纪下半叶，在黄金海岸，天然橡胶的采集盛极一时。橡胶大部分输入英国。黄金海岸是大英帝国内的主要橡胶出口国之一。黄金海岸等地的柯拉果主要向北输出。沿海各地的木材则运往欧美。

“合法贸易”的组织因时不同，因地制宜。非洲人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中间商。这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重操旧业。贸易在信贷基础上进行。欧洲商人将商品借贷给中间商，中间商奔赴各地，销售商品，收购产品，再将产品运至沿海，偿还信贷。这种现象在棕油贸易中尤为明显。最初，欧洲商人的贸

Inez Sutton, *Labour i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Ghan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加纳商品化农业中的劳动力》),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4 (1983), p.467.

T.A. Osaе, S.N.Nwabara & A.T.O.Odunsi, *A Short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简史》), New York 1968, p.258.

M·Lyn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British Palm Oil Trade with West Africa* (《英国与西非棕榈油贸易的变化与持续》),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2 (1981), p.339.

M·lynn, op. cit., pp. 331 - 332, 335, 340.

Inez Sutton, op. cit., p.468.

M. Lynn op.cit., p.333.

易主要依靠随船往返的船长或商业事务负责人以货船为基地进行。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常驻沿海各地的公司代理人日益增多。他们大多驻扎于欧洲人居留地或堡垒所在地。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以废旧船体为永久性商站的制度逐渐发展。为取得贸易权，欧洲商人首先必须向有关方面交纳费用，然后才能同中间商发生贸易关系。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充当中介人的一般是大家族的首领。这种大家族由首领一人、副首领若干人以及众多的自由人和奴隶组成。家族首领组成城市会议，在国王领导下管理三角洲各城市国家。国王一般是大家族首领中的佼佼者。大家族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商业组织，拥有奴隶组成的军队和武装独木舟组成的船队。在奴隶贸易时期，这些大小参差的独木舟在军队保护下，向内地提供商品，向沿海输送奴隶，年复一年。奴隶贸易被废除后，这一贸易组织又被纳入“合法贸易”体系。正是这类中间商垄断了从欧洲人手中取得信贷的权利。信贷一般以布匹、枪支、珠子和铜条等实物支付。中间商将货物运至诸如伊博兰这类主要产油区，然后将棕油运至沿海的布腊斯、新卡拉巴尔、博尼和奥波博等最大的棕油市场。来自利物浦等地的欧洲公司就是从这些市场取得棕油的。为解决棕油贸易中的各种矛盾、控制该项贸易，国王或酋长们制订了一些本地方的贸易条规。有时他们也联合起来，对整个三角洲的贸易作出统一规定。在不少地区设立了衡平法庭，商人如违反有关规定，要受到衡平法庭的审理，受到有关方面的贸易抵制，甚至被禁止在指定地区经商。尽管如此，由于棕榈油贸易套用奴隶贸易的方法，贸易中仍然矛盾重重，极不文明。

用于“合法贸易”的各种产品的生产、包装和运输，以及与此有关的粮食等部门生产的发展，拓宽了生产领域，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商品生产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在这一时期的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中，除传统的部分自由人外，奴隶的数目增长了；随着信贷的发展，作为借贷抵押的人质及其他形式的劳动者也出现了。

外部奴隶贸易的衰落和内陆的政治变动，使西非奴隶的数量猛增。市场上奴隶充溢，价格低下，却无人问津。大量奴隶的存在威胁政治稳定，经济上也是沉重负担。正如阿散蒂王奥塞·邦苏在 1817 年所言，阿散蒂人在同加曼的战争中抓到许多俘虏，但却“生产不出像萨勒姆那么多的谷物来养活他们”。人们为如何处置这些奴隶而忧心忡忡。但随着“合法贸易”的兴起，人们发现，将奴隶用于“合法贸易”及其有关产品的生产，甚至比奴隶贸易更为有利，结果沿海地区的大批奴隶便逐渐由流通环节转入生产领域。这一时期西非沿海地区奴隶的补充，除依靠奴隶的自然增殖外，主要由北方萨凡纳地带、特别是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地区、达戈姆巴、莫西、古龙希和索科托帝国等地输入。在内地及沿海有许多奴隶市场。据 1845 年 B·D·波利尼阿估计，在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各市场上供出售的奴隶多达 6 万人。沃尔特盆地的凯特卡拉奇、布恩和恩卡米等地直至 19 世纪末仍是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来自萨拉加地区的商人将大批奴隶赶运到这些市场，供黄

G.M.McSheffrey, *Slavery, Indentured Servitude, Legitimate Trade and the Impact of Abolition in the Gold Coast, 1874 - 1901: A Reappraisal* (《再评加纳的奴隶制、契约劳役制、合法贸易及废奴运动的冲击》),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4 (1983), p.365.

Mbye Gueye, *The Slave Trade With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UNESCO,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Fif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1979, p.159.

金海岸东部各族、特别是克罗博人采购。但黄金海岸所需奴隶的主要供应者仍是阿散蒂人。达荷美沿海和尼日尔河三角洲所需奴隶也来自北方，主要是索科托帝国的西南边境地区。在索科托帝国同沿海的贸易中，奴隶仍是“大宗货物”之一。当然，并非所有奴隶均来自北方，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中可能有少数人因政治、经济及战争等原因而沦为奴隶。

随着“合法贸易”的发展和借贷体系的扩张，人质制度成为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这种状况在黄金海岸尤为典型。在黄金海岸，由于普遍缺乏借贷支付手段，而有关法制又极不健全，因此在借贷关系中通常以人质作抵押。这是贸易得以运转的基础。人质(a-wowa或ahobani，也泛指所有被奴役的阿坎人)一般是家庭中的晚辈成员，他们或被家长抵押成为人质，或被债权人抓捕成为人质。他们在法律上仍属自由人，不得买卖。他们一般与债权人同族，而非外来人，在抵押期间同家族或家庭仍保持各种联系。但实际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质的地位与奴隶逐渐趋同。由于借贷利率通常高达50—100%，人质的各种费用也得计入债务。人质劳动往往不足以抵偿债务利息，因此经济境况不佳的家庭所提供的人质便处于难以摆脱的奴隶状态。人质死亡也不能免除债务，债务人必须因此而交出新的人质。人质实为债权人的财产。至19世纪中期，出卖人质的现象日益普遍。人质成了除奴隶之外的非自由劳工的主要部分。

奴隶和人质等非自由劳工大部分属王室、官僚贵族、大家族和富商所有。据一些观察家提供的材料，几乎所有酋长和富人都拥有大量奴隶。1837年，麦克里恩给商人委员会的报告称，如果在阿散蒂及其他地区宣布解放奴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奴隶来到我们居留地。1841年呈给马登委员会的材料估计，在黄金海岸西部的商业居留地有3600人，其中1287人即36%是奴隶或人质；有的研究者认为，在黄金海岸的城镇里，奴隶和人质至少占总人口25%以上。据19世纪70年代黄金海岸解放奴隶时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在阿布阿克瓦，获得解放的奴隶或人质达万人以上。由于他们的离去，该地人口锐减。

各种产品生产的组织状况较为复杂，彼此颇有差异。棕油的生产包括油棕树的培植、油棕的采摘、棕油的制取和装储等过程，而棕油制取又包括砸碎果壳、放入洞穴或容器内发酵分解，然后蒸煮、冲碎、除去棕仁、滤去果皮和将油分离等过程，需耗费大量劳动，因此大部分棕油是采用集约劳动方式在奴隶种植园生产的。在阿散蒂首府库马西周围建起了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在阿克瓦皮姆和沃尔特盆地、特别是克罗博，油棕树的种植和棕油制取都使用奴隶及其他非自由劳工在种植园中进行。因此，在黄金海岸，许多出

Inez Sutton, *op.cit.*, p.468.

J. L. Watson ed., *Asian and African Systems of Slavery* (《亚非奴隶制度》), Oxford 1980, pp.43-72; Paul E. Lovejoy, *Planta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经济中的种植园》),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19 (1978), pp.341-368.

G.M. Mcsheffrey, *op.cit.*, p.362.

Inez Sutton, *op.cit.*, p.468.

Metcalfe,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大不列颠与加纳：加纳历史文献》), London 1964, p.155.

G.M. Mcsheffrey, *op.cit.*, p.355.

G.M. Mcsheffrey, *op.cit.*, p.356.

口的棕油都由酋长和富人的种植园生产。达荷美王室早在 18 世纪末已着手创办大型种植园，利用奴隶劳动生产棕油。奴隶贸易废止后，这类种植园仍有较大发展。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各大家族在奴隶贸易衰落之时，迅速调整经济，建起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型油棕种植园。但至 19 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的种植园经营有减少的趋势，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逐渐发展。也有部分棕油始终是由单个家庭分散生产的。在伊博兰的中心地区，棕油生产较多地依靠家族。棕油运输主要采用集约方式。棕油产区一般距海岸几十英里，道路崎岖，险阻重重，采用头顶的方法将大量棕油运抵海港，唯有依靠商队组织。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向河海港口运油的每个商队常多达 300—400 人。他们将 2—3 加仑重的油罐或油葫芦顶在头上，蹒跚前进。后来，人们将油装入木桶，采用在路上滚动木桶的方法运输，使体力消耗得以减轻。此外，西非沿海各地还采用集约方式生产粮食等。当伊博兰的中心地区种满油棕之时，伊博兰外围地区的奴隶种植园便生产薯蓣，供油棕生产者享用。19 世纪 30—40 年代，黄金海岸的阿克瓦皮姆及其他地区有许多生产商品粮食的种植园，由奴隶耕种。在黄金海岸的许多地方，使用非自由劳工生产商品粮的制度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在这类实行集约化耕作的地区，种植园主一般居于城市，成为外在种植园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长期的奴隶贸易的影响，这类种植园主逐渐抛弃了非洲传统的奴隶制观念、特别是关于同化的理论。他们视奴隶为下等人，与奴隶保持相当距离，种植园一般委托他人管理。因此，种植园奴隶的地位有恶化的趋势，有关种植园奴隶起义的事件已见诸文字。1851 年，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克瓦河上的一个种植园里就发生了“血盟人”（Blood Men）的起义。

花生生产的组织同棕油生产颇不相同。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沿海，花生种植主要依靠包括奴隶在内的外来移民，他们常被称作“纳韦泰内”（Navélenés，意为：在雨季到来的人）、“蒂利本卡”（Tillibunkas，意为“来自东部的人”）或“萨拉沃勒”（Serawoollies，意为“撒拉柯勒人”）。他们大多来自距沿海数百英里的西苏丹内地，如马里西部等。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西苏丹内陆的酋长和商人们收入锐减。为了增加收入、取得舶来品，他们引种新的作物、特别是花生。因此，最初花生生产在内地比沿海发展更快。但事实证明，将劳动力移至沿海，在毗邻欧洲人堡垒和居留地的地方种植花生，就地出售，然后将购得的货物运回内地，更为经济。因此，内地的酋长和商人便在雨季开始之前将手下的自由人和奴隶组织起来，分成小组，率领他们奔赴沿海，租佃土地，种植花生。这类季节性移民在花生种植中占极重要地位。麦克唐纳总督在 1848 年的报告中甚至认为，冈比亚河地区的花生与其说是当地居民耕种的，不如说是来自内陆的蒂利本卡和塞拉沃勒生产的；此外，卷入这股“农业热”的移民队伍中还有来自沿海城镇的释奴和非洲人，“他们虽然在城镇里每天能赚一先令，但还是乐于在雨季伊始离开殖民地，向曼丁哥人租种土地，种植花生，在年终时出售”。他们在生产中一般都使用奴隶。移民承租土地的方式不尽一致。来自内陆的酋长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276.

Ken Swindell, 'Sera woollies, Tillibunkas and Stranger Farmers: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Groundnut Farming along the Gambia River, 1845—1895' (《塞拉沃勒人、蒂利本卡人和异乡农民：冈比亚河沿岸移民花生农业》),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1 (1980), p.94.

和商人一般将承租地交自由民或奴隶耕种；有的移民则直接向沿海酋长或土地所有者租佃土地。承租人每周必须为土地所有者劳动一定时间，同时在收获后缴纳一定数量的收获物。这同奴隶耕种主人土地付出的代价极为相似。

在黄金海岸，19 世纪的黄金生产有扩大的趋势，黄金采掘主要依靠奴隶们的集约劳动。但该地区的橡胶生产却具有极其分散的特点。人们采集森林中的天然橡胶植物，然后利用零星时间，采用土法敲打制作成胶。在阿散蒂、阿克瓦皮姆、克瓦户和阿布阿克瓦等地区，大量人口参与橡胶采集、运输和加工。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自由人居多。为采集橡胶，人们奔走各地，往往在外历时数月。与此同时，在柯拉果的采集、运输和贸易中却大量使用奴隶。此外，出租奴隶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拥有数百名奴隶的商人和非洲人常将奴隶出租，收取奴隶所得的 1/2—1/3。

由于奴隶、人质及其他非自由劳工被广泛用于生产和贸易，他们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随之增长。1857 年，黄金海岸总督 B·派恩在致 H·拉布谢雷的信函中指出：“奴隶是该国的主要通货，财富的主要部分”，“奴隶制满足了我们各方面的需要”。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在黄金海岸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在许多地区引起了政治经济混乱。如阿布阿克瓦首府基比的奴隶一听说解放便大批逃亡，致使基比陷于经济困境，迫使王室远走他乡，基比从此衰败。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黄金海岸的状况是西非沿海地区的一个缩影，只是由于其他地区奴隶制的终结采取了渐进方式，因而后果不甚明显。因此，在“合法贸易”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直接导致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萌发，反而扩大了使用非自由劳工的领域，加深了西非沿海地区在经济上对外部的依赖，同时使传统的政治结构得到巩固。但是，同奴隶贸易相比，“合法贸易”无疑是个进步。

二、塞拉利昂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

18 世纪的英国拥有许多黑人奴隶，少数黑奴已获自由。1772 年发生了萨默塞特案件。J·萨默塞特随主人从美洲来到英国，但拒绝返回种植园。有关方面诉诸法律。高等法院院长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奴隶制非常可怜可恶，所以只能靠成文法来支撑，而在英国却没有这样的法律，它允许来自大洋彼岸的奴隶主拥有来自大洋彼岸的奴隶，并将其带回大洋彼岸为奴。萨默塞特案件加快了奴隶获释的进程，此后凡踏上英国土地的奴隶都成了自由人。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不少曾支持过英国的黑奴也远涉重洋来到英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由黑人的队伍。此外，还有不少处于困境中的水手。这些黑人既无职业，又无亲朋，饥寒交迫，四处流浪，人称“穷黑人”。至 18 世纪末，“穷黑人”已成为英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英国废奴主义者对“穷黑人”问题十分关注。1786 年，在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支持下，由英国商人组成的救济穷黑人委员会呼吁募集钱财，对“穷黑人”实施救济。但贫穷黑人日益增多，少许救济如杯水车薪，

G.M.Mcshaffrey, op.cit., p.353.

G.M.Mcshaffrey, op.cit., p.359.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173; Christopher Fyfe, A History of Sierraleone (《塞拉利昂史》), Oxford 1962, p.13; John E. Flint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174.

无济于事。因此，委员会向英国政府建议，将“穷黑人”遣送到非洲塞拉利昂。这一建议是根据 H·斯米思曼的计划提出的，他曾在巴纳纳岛活动过。在几位伦敦商人的支持下，他准备利用非洲劳力开办棉花种植园。可见，他的计划完全是基于商业原则。英国政府为尽快摆脱“穷黑人”问题，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给予资助。在贫穷的黑人中，也有不少人愿回归故土。他们中许多人生长在非洲，对故土山水难以忘怀；不少人未踏上过非洲的土地，但先辈们的美好回忆和神奇传说也足以激起他们对非洲的情感。因此，尽管不乏反对者，人们还是决定移向非洲。

遣返工作由救济穷黑人委员会组织。1786年10月，海军部派遣“大西洋”号，“贝利萨鲁斯”号和“弗农”号船到德普特福德装运移民。但不少人不愿遣返，委员会只得通过地方当局逮捕仍在市街乞讨的黑人，并强行将他们塞进船舱。1787年1月，前两艘船满载启航，前往普利茅斯，船队负责人汤普森上尉和炮舰“恩奥蒂鲁斯”号已在那里等候。同年4月，船队从普利茅斯出发，船上有移民411人。船队抵达加那利群岛的最大岛屿特内里费岛时，已有14人死亡。

1787年5月，在几周艰苦的航行之后，船队到达塞拉利昂河口。这里属泰姆奈人的科亚王国的版图，由一位被称为托姆王的首领管辖。6月，汤普森上尉同托姆王签订条约，以枪支弹药、铁剑、帽子、棉织品、珠子、铁条、烟草和酒等价值59磅的货物，换得一块从今蒙罗维亚政府大厦至冈比亚岛的沿海长9—10英里、纵深20英里的地段，作为居留地。根据夏普的设想，移民们应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使被奴隶贸易玷污的基督文明重放光彩。因此，他将移居地命名为“自由省”，为它草拟了暂行简章，规定了移民的组织、权利和义务。移民们登陆之后立即树起英国国旗，搭起简陋帐篷，并将居住区命名为“格兰维尔敦”，以示对夏普的尊崇；然后推举在德普特福德第一位登船的理查德·威弗为总督，同时选举了官员。一个小型的社会诞生了。

委员会管理时期的移居地未能发达兴旺。移民刚登陆，雨季便随之到来。漫长的雨季使生产和生活极为困难，且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由于农耕失败，供给用尽，许多人四处漂泊，自谋生路，居留地人口锐减。1789年，移民、奴隶商人同托姆王的继承人吉米王发生冲突。1790年，吉米王赶走移民，焚毁格兰维尔敦，居留地奄奄一息。

夏普取得伦敦一些富商的赞助，力图重建居留地。1791年，商人们组建塞拉利昂公司，接管了从泰姆亲手中换得的土地，开始了公司管辖居留地的时期。公司由伦敦的董事会领导，董事会选定了一处条件宜人的新定居点，命名为“弗里敦”。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新斯科舍人和马隆人。新斯科舍人原为美国的奴隶，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英国人释放。他们曾以不同方式帮助过英军，战后难于在独立的合众国中立足，因此英国将他们安置在美国北部的英属地新斯科舍，并许诺给予自由和土地。但是许诺未成现实，因此他们的代表前往伦敦，要求给予出路。董事会同意将他们安置在塞拉利昂。这些移民数量不少，1792年1月就有1190人到达塞拉利昂

Fyfe, op.cit., pp.19-20.

Fyfe, op.cit., p.20.

。他们许多人有文化、有技术，是移民的主要部分。马隆人是逃奴及其后裔。在牙买加，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逃离主人，进入丛山，击退政府军的攻击，过着自由人的生活。他们创建国家，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1795年，马隆人终于被政府军击败。1800年，500余名马隆人被运送到塞拉利昂。这些来自美洲、特别是北美的移民建设了弗里敦，弗里敦的城市规划和具有北美风格的建筑就是他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公司对居留地实行殖民统治。伦敦的董事会掌握决策权，执行权属董事会任命的总督和官员。移民展开了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公司从一开始在经济上就十分窘困。由于土地不宜种植出口作物，除少数人从事生计农业外，大部分人从事农耕，致使公司在农业方面几乎未获分文。在长期的奴隶贸易之后，“合法贸易”难于在短期内兴起。1793年开始的英法战争使公司船舶常遭袭击和劫掠，居留地也被洗劫，公司获利的希望彻底破灭。公司决定对每英亩土地征收一先令地租，结果引发了1800年移民的起义，给公司统治以沉重一击。不过19世纪初以前公司的统治尚能维持，这主要是由于总督Z·麦考莱（1794—1799年在任）的有效治理。但从19世纪初开始，公司财政已全靠政府津贴，无力管辖居留地。这时移民同泰姆奈人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泰姆奈人的几次进攻均被击退，并被逐出弗里敦附近的城镇。于是，移民扩张领土，占领了整个半岛，在那里扎下根来。

1807年，英国宣布废止奴隶贸易。塞拉利昂成了英国海军基地。被截获的贩奴船只被带到这里，接受混合委员会的审判，并将奴隶释放。因此，英国政府于1808年接管公司权力，塞拉利昂移民区从此成为皇家殖民地，由总督及其手下官员以英王名义进行统治。

在殖民地时期的最初几十年里，殖民地居民大致可分为移民和缉获释奴两类。移民主要由来自英国的释奴、新斯科舍人和马隆人组成，而以新斯科舍人为主。他们从事农耕者甚少，大部分人经商或在政府机关工作，有少数人成为手工匠人。由于受欧美文化熏陶，他们有文化，信奉基督教，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有明显的欧美倾向。所谓缉获释奴是指先被俘为奴，然后在反奴隶贸易中再次被俘获释而成为自由人的非洲人，他们是殖民时期塞拉利昂居民的主要来源。至1815年，殖民地已有缉获释奴6000人，其数量已远远超过移民。这些缉获释奴大多来自西非各地、特别是约鲁巴和伊博地区，也有来马拉维等东非地区的。他们大多按种族集团居于弗里敦周围的村子里，以村为单位，选举首领，形成具有非洲传统特色的互助社团。他们以农为业，由于产品价格低下，收入微薄，生活艰辛。部分缉获释奴居于弗里敦，充当欧洲人或移民的家庭仆役，或加入军队，成为兵士和勤务人员。在殖民地社会中，缉获释奴的地位最为低下，那些“黑色欧洲人”（缉获释奴对移民的称呼）见了他们总是嗤之以鼻。

但是，时光的流逝和经济的变迁使移民同缉获释奴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不少缉获释奴并不安于现状，他们流入弗里敦，或从事贸易，积累财富，或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成为同胞中的佼佼者，与移民上层逐渐融合。与此同时，移民和缉获释奴中的下层群众也在长期接触和交往中混合起来。至19世纪50年代，由欧洲人、黑人移民和缉获释奴混合而产生的克列奥尔人终于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175.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220.

成为殖民地居民的主体，在英语、葡萄牙语和一些西非语基础上形成的克列奥语(Krio)成了共同语言，欧非混合文化成为克列奥尔人文化的显著特色。克利奥尔人同毗邻的非洲人相比，文化水平较高，拥有各种专门人才，其中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和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斗争、经济管理和宗教事务等方面都具有经验。克列奥尔人的主要活动是经商，最初以木材贸易为主；至19世纪60年代，由于森林资源锐减，木材贸易衰败，植物油贸易又应运而生。此外，还有不少人专门从事传教活动。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传教活动的展开，他们在西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利比里亚共和国的形成

在19世纪初的美国，已有20多万非洲人及其后裔获得自由。如何清除这些“黑色污点”，逐渐成为美国社会街谈巷议的话题。当时美国流行着黑人和白人不能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种族主义理论，因此将黑人送回非洲便成为解决黑人问题的基本方案。废奴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一方案使黑色居民获得家园、平等和自由；南方奴隶主希望通过这一方案巩固奴隶制度；传教士们希望以此使非洲成为基督的天地；政界要人们看到的则是摆脱黑色梦魇的前景和取得在非洲的利益。1816年12月，由一些显要人物发起，在华盛顿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鉴于独立战争硝烟未散，美国政府不便直接参与殖民活动，只能根据1819年奴隶贸易法向协会提供资助，协会也只能以安置缉获释奴为名，实施在非洲建立居留地的计划。

1818年，美国殖民协会代表抵达塞拉利昂，计划在英国殖民地附近选定一处居留地，因为一些美籍非洲人同当地移民已有接触。但泰姆奈人拒绝出让土地，协会计划立即受挫。多亏一位在歇尔布罗岛经商的移民从中斡旋，协会才在该岛取得临时居留权。1820年，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数十名黑人移民在歇尔布罗岛登陆。但是，移民不应当地环境，短短几月已有许多人死亡，当地非洲人和英国商人也从中作梗，移民只得转移至弗里敦附近福拉湾暂时安身。寻找居留地的航行继续向南推进。1821年12月，协会代表E·阿伊雷斯和海军军官R·F·斯托克顿乘“鳄鱼”号轮驶抵梅苏纳多角的一处天然良港，开始就土地转让同德族人首领彼得王进行谈判。彼得洞悉移民到来的后果，他和首领们拒绝转让土地。斯托克顿使用武力威胁，彼得王终于让步。根据转让协议，转属移民的土地达13000余平方公里，而德族人所得商品的价值却微不足道。阿伊雷斯以激动的心情向协会报告说，他们仅用价值300美元的货物就购得一块价值100万美元的土地。1822年1月7日，来自福拉湾的移民在梅苏纳多角的一处海湾登陆，并在附近建起主要居民点。从这时起，移民登岸的日子被定为“先锋日”(即国庆日)。1824年，这块移居地被命名为“利比里亚”(Liberia，意为自由之邦)，主要居民点则按美国总统门罗的姓氏称“蒙罗维亚”。

1822—1839年，在利比里亚的历史上被称为初创时期。以蒙罗维亚为中心的移民区，击退了德族人的几次进攻，巩固了居留地，开始了领土扩张，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开拓。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州的殖民协会展开了独立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 18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92.

移民运动，在其毗邻地区相继建立了大巴萨、西诺埃和马里兰等移民区。殖民协会对移民实行殖民统治，移民展开了争取自治权的斗争，要求通过选举建立议会和市镇委员会。结果，1824年通过《格利宪法》，移民取得选举副代表以下各级官员的权利，但最后决定权仍属殖民协会代表。至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殖民协会除保有委任或选择总督的权利外，其余权力均由移民行使。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是艰辛的。移民们披荆斩棘，建立农场，但务农难以维生，更难以致富，因此大多数人弃农从商。一些人积累了资本，购买船舶，往返于大洋之上，航行于内河之中，成为富商。文化教育也开始起步，除公立学校外，开办了教会学校，一些人还远涉重洋求学美国。1830年，反映移民心声的报纸《利比里亚先驱》问世。

1839 - 1847年，是利比里亚史上的联邦时期。利比里亚在同英法等国的交往中困难重重。英法等国商人拒绝承认移民区官员的权威，否认他们有征税等权利，认为他们无权阻止欧洲商人同当地非洲居民的贸易。英国商人还要求利比里亚在购置沿海土地时征得他们同意。利比里亚控制当地居民的企图也遭到反抗，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各移民区的发展极不平衡，以蒙罗维亚为中心的移民区基础较为坚实，其他移民区的根基十分脆弱。不利的生存环境增强了团结意识。1839年4月1日，蒙特塞拉多、大巴萨姆和西诺埃等移民区联合，组成以蒙罗维亚为中心的利比里亚联邦。根据有关法律，联邦政府设总督一人，由美国殖民协会任命，拥有行政司法权和武装力量指挥权；设立法委员会，协助总督行使立法权。移民仍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1841年以前，总督一般由白人担任，1841年以后，具有非洲血统的移民开始被任命为总督。第一位担任总督的移民是罗伯茨。

联邦的建立增强了利比里亚的力量，但它同英国的关系却更加紧张。双方围绕土地和关税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直至相互捕捉对方船舶。英国渐生鲸吞图谋。1843年，英国政府致函美国政府，要求说明利比里亚的地位及其对利比里亚的政策。美国政府未予明确回答。罗伯茨领导的联邦立法委员会呼吁美国援助利比里亚，但美国政府有意延宕。英美的政策激发了利比里亚的独立要求。1845年，立法委员会要求美国殖民协会允许利比里亚独立。协会犹豫再三，终于在1846年同意利比里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同年，利比里亚公民投票，赞同独立。1847年7月，立法委员会通过独立决议。7月5日，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和独立宪法，制定了国旗和国徽。7月26日，利比里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利比里亚历史进入共和国时期。19世纪50年代，蒙特角和马里兰等移民区先后加入共和国。由于南方奴隶主的反对，直至1862年，美国拒不承认这个新共和国。

利比里亚的独立宪法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制定的，其政治体制也基于欧美的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原则。宪法规定，行政权属普选产生的总统，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848年初，罗伯茨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共和国的立法权归利比里亚立法会议，它由参众两院组成。司法权由最高法院行使。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出现了两党制。真正自由党（后来成为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是混血种人。他们或从事贸易，或在政府中供职，拥有相当权势，过着优裕生活。罗伯茨以后的三届总统均为共和党人。老辉格党（后来成为真正独立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具有完全非洲血统的黑人。他们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多数。由于真正自由党采取从美洲输入混血种人以壮大队伍的政策收效甚微，老辉格党在人数上的优势渐次明显。1869年，老辉格党人第一次当选

总统。1877年以后，真正独立党实际上垄断了政权。两党相互歧视。为保证混血种人的利益，共和党人执政时极力歧视和镇压独立党人，甚至只允许混血种人进入利比里亚学院。独立党人掌权后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混血种人同纯黑人居民的关系十分紧张，成为历届政府难以摆脱的难题。

利比里亚共和国的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大多数利比里亚人从事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他们贩卖沿海克鲁人生产的棕榈油，销售制作染料的木头，用廉价的欧洲商品换取非洲人的黄金和象牙。一些被称为“商业王子”的大商人在内陆拥有许多商站，他们的船只穿梭于沿海各国的口岸。许多人经商致富，在首都蒙罗维亚建起高大宅院，过着奢华生活，且有政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层。有不少人从事农耕，主要是经营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利比里亚的咖啡在19世纪享有世界盛名。部分居民从事生计农业，他们大多是社会下层群众。到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利比里亚经济衰退，财政锐减，被迫大举外债，逐渐陷于债务束缚之中。

在利比里亚及其毗邻地区，居住着瓦伊、马林凯、格雷博和克鲁等族，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强烈的民族感情。利比里亚移民不断侵占他们的土地，迫使他们背井离乡。1855年，在帕尔马斯角就有2000余格雷博人被逐出家园。在利比里亚社会中，非洲人的低下地位、沉重的捐税负担、经济机遇的差别、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及移民对非洲人的歧视，更加深了已有的沟壑。结果，移民同毗邻非洲各族的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英法等国往往插手其间，使局势更加错综。历届政府都表示民族团结和睦邻友好的愿望，但基本政策未变，和平难以实现。

独立以后，利比里亚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色日益明显。在利比里亚，缉获释奴人数不多，自初创时期以来的40年间，进入利比里亚的这类非洲人仅5722人。他们以民族集团为基础，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团体。来自美国的美国—利比里亚人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利比里亚文化同塞拉利昂的克列奥尔文化不同，它不是一种完全的混合文化，而是一种具有非洲文化因素的欧美文化。英语成为日常用语就是这一特征的重要表现。

四、黄金海岸殖民地和阿散蒂人的抗英战争

19世纪初，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海岸角、阿克拉、阿诺马博、狄克斯科夫、温尼巴、坦塔姆、科门达和普拉姆普拉姆等地据有堡垒。随着贸易的发展，碉堡周围逐渐形成城镇。这些堡垒及城镇构成英国在黄金海岸的势力范围。

1821年以前，英国黄金海岸居留地由伦敦的非洲公司管辖。公司在黄金海岸设立商人委员会，在总督领导下处理当地事务。维持堡垒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承担。在公司管辖期间，战争连绵，道路封闭，商业停滞，“合法贸易”前景暗淡。维持堡垒的开销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国内居民多有不满。因此，有舆论认为应放弃这些堡垒。但不少人认为，堡垒对于完全禁绝奴隶贸易、发展“合法贸易”是有益的。但他们反对将堡垒交由商人委员会管理，因为这些商人曾深深卷入奴隶贸易，且要求政府在禁止奴隶贸易前予以宽限，以

Osae, Nwabara & Odunsi, op. cit., p.23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93.

调整金融和贸易。

1821年5月，英国议会终于在各种调查报告基础上通过法案，决定撤销非洲公司，完全由政府接管居留地。居留地同塞拉利昂合并，由塞拉利昂总督管理，从此开始了王国政府直接管辖黄金海岸居留地的短暂时期。1824年，英国在同阿散蒂人的战争中惨败，迫使其考虑撤出黄金海岸。1826年，英国击败阿散蒂，这使商人们从胜利中看到希望，坚决反对撤离。沿海的芳蒂人也希望在同阿散蒂人的冲突中得到英国支持。这促使英国政府另作选择。

1828年，英国政府将黄金海岸管辖权交给伦敦的商人委员会，商人委员会则委托主席领导下的黄金海岸商人理事会处理日常事务。商人委员会的管理至1843年终止，历时15年。这是英国在黄金海岸扩张领土的重要时期。

1830年1月，麦克里恩被任命为商人理事会主席。他根据沿海形势，利用各方矛盾，推进领土扩张。1831年4月，在麦克里恩推动下，阿散蒂人同芳蒂人在海岸角堡签署和约。条约规定，阿散蒂王交出黄金6000盎司和2名王室青年作为未来和平的保证，作为保证的人和物应交由海岸角管理，期限6年；阿散蒂王放弃对邓克拉、阿辛和其他前臣属的宗主权，同时严禁后者对阿散蒂王的不敬言词，保证道路畅通，并对一切经营“合法贸易”的人开放，凡扰乱和破坏自由贸易者均以违背本条约罪严加惩处，同时严惩绑架、恐吓和发誓。结果，阿散蒂人被迫放弃对沿海地区的主权，英国占有了堡垒和要塞的土地，并以阿散蒂人和芳蒂人之间的仲裁者和沿海各族保护者的姿态，扩大了在沿海地区的影响。条约签署之后，麦克里恩大力插手沿海各族的司法事务，扩大英国的司法管辖权限和范围。最初，麦克里恩仅要求各酋长按非洲惯例处理英国堡垒所在地居民的犯罪行为，理事会只监督判决执行。后来，麦克里恩及理事会对毗邻邦国的司法判决及执行过程实施监督，并进而直接对沿海各邦实施司法管辖。许多酋长因犯罪而受到罚款、鞭打和讨伐的惩处，一位酋长因受鞭笞备感羞辱而自杀。至麦克里恩管辖后期，理事会已将军警派驻沿海各邦国中的所有重镇，向各有关酋长传达麦克里恩的指示和意见，监督这些指示和意见的执行，并将各地情况报告理事会。黄金海岸沿海长约150英里、纵深约80英里的广大地区，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非正式保护国。1842年，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这种领土扩张，认为理事会以几处“条件极差的要塞为基地”，“将影响扩大到沿海地区长约150英里并深入内地相当远的大片地方是很有益处的”。

为推进麦克里恩的扩张事业，1843年，英国政府接管黄金海岸的堡垒、要塞和居留地，由一名军官治理，对塞拉利昂总督负责。1850年，黄金海岸脱离塞拉利昂，建立独立的殖民政府，总督由英王任命，为黄金海岸最高长官；其行政委员会由有关官员组成，为总督咨询机构；立法委员会也由有关官员组成，在殖民大臣同意、总督批准的前提下，有权制定法律。随着管辖权的移交，英国在黄金海岸的扩张进入新阶段。

1844年3月，英国政府同沿海八个邦国的酋长签订条约，规定毗邻英国碉堡与居留地的邦国和地方的酋长承认英国的行政和司法权力；诸如绑架、谋杀、抢劫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都要受到女王司法官员和各地区酋长的审讯

Claridge, *op.cit.*, vol.1, pp.410 - 411.

Osae,Nwabara & Odunsi, *op.cit.*, p.251.

。这一条约成为英国统治黄金海岸保护国的法律依据。

1850年，丹麦人退出黄金海岸。早在17世纪丹麦人已在黄金海岸立足，到19世纪上半叶仍拥有以阿克拉的基督堡为中心的一些碉堡，并同毗邻的阿克瓦皮姆和阿基姆等酋长国建立了类似保护的关系。丹麦堡垒地处阿克拉以东沿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热带作物种植和黄金贸易的开展都十分困难，维持堡垒的花销已成政府沉重负担。因此，随着英国的扩张，丹麦人决定完全撤离。1850年3月，英国以1万英镑的代价买下了丹麦人的全部堡垒，其中主要有奥苏、凯塔、铁西、宁戈和阿达等地的堡垒，阿克瓦皮姆和阿基姆也成为英国保护地。英国势力从此扩张到阿克拉以东沿海。

1872年，英国取得荷兰所属要塞和堡垒。19世纪上半叶，荷兰曾拥有埃尔米纳、沙马、塞康弟、布特里、摩里、科曼廷、阿帕姆和阿克拉等地的碉堡。英荷两国的堡垒和保护地犬牙交错，严重阻碍英国的殖民活动。英国征收贸易税以争取财政自给的计划，因荷兰人不予合作而破产。荷兰堡垒所在地、特别是埃尔米纳，是阿散蒂人取得武器弹药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基地。在沿海的军事行动中，埃尔米纳镇居民总是阿散蒂人的可靠同盟，英国割断这一联盟的各种图谋均告失败。此外，由于阿散蒂人同芳蒂人矛盾重重，致使埃尔米纳同芳蒂人之间的战争和纠纷连绵不断，使沿海的安定受到干扰。因此，英国决心解决荷兰人的堡垒问题。1867年5月，英荷双方达成协议，以埃尔米纳附近的甜河为界，通过堡垒交换，实现各管一段。但列入交换名单的柯门达等英国堡垒所在市镇的居民不愿接受荷兰人的管辖，并最终导致埃尔米纳人同芳蒂人之间的战争。交换计划顿成泡影。1869年，英国同荷兰就荷兰将堡垒转让给英国的有关事宜进行谈判。1871年2月，英荷两国在海牙签订转让协定；翌年，互换批准书，并完成堡垒移交。整个黄金海岸沿海从此成为英国的保护地。这就为兼并阿散蒂、进占北部领土奠定了基础。

英国的扩张受到黄金海岸人民的英勇抵抗，阿散蒂人的抗英战争就是其中的光辉篇章。19世纪70年代前的黄金海岸，存在着非洲各族同殖民者的矛盾、非洲各族内部的矛盾、殖民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废止奴隶贸易之后产生的各种矛盾。阿散蒂人的抗英战争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展开的。

阿散蒂人反抗英国殖民侵略的首次战争发生于19世纪初。战争的近因是英国蛮横干预黄金海岸各族的内部事务。阿散蒂王起兵追捕作为臣属的两位西阿辛人首领克瓦库·阿普泰和克瓦多·奥迪布，兵临沿海。两位首领逃往英国阿诺马博堡，后又至英国总督驻地海岸角堡，请求庇护。英国驻黄金海岸总督托伦上校当即表示，要采用调停方式或武力手段保护他们，并立即带领海岸角堡官兵修筑工事，准备战争。阿诺马博堡指挥官怀特命令城镇进入战争状态，并派兵占领通往城镇的各险要地方，同时以调解为名争取时间，并进行威胁，声称任何武装力量如进入英军大炮射程之内，将毫不犹豫地开炮轰击。

1807年6月14日，英国组织兵力袭击阿散蒂军在埃加的一个哨所，阿散蒂人同英国人的正面冲突从此开始。战斗主要在阿诺马博堡进行。6月15日，阿散蒂军击败进攻哨所的英军，冒着英国大炮的轰击，占领阿诺马博镇，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252.

W.W.Claridge, op.cit., vol.1, p.241.

Metcalf, op.cit., pp. 6 - 7.

围困阿诺马博堡垒。堡垒守备队有官兵 29 人、大炮 10 余门，此外还有一些公司奴仆。阿散蒂军队对堡垒各大门进行多次攻击，直冲到堡垒墙根，但由于装备较差，伤亡惨重，未能攻克。阿散蒂军拟于 6 月 17 日晚实施总攻。此时堡垒中的殖民官兵已伤亡大半，指挥官怀特身中两弹，危在旦夕。守备队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士气低落，因此托伦指示堡垒悬挂白旗，停战求和。阿散蒂人接受英国的和谈要求，双方达成一项未见诸文字的临时协议：根据征服者的权利，包括海岸角及其毗邻城镇在内的所有城镇均属阿散蒂国家，英国公司可保有堡垒所在城镇的司法权，为此总督承认阿散蒂王有征收地租的权利，并愿交清所欠租金，海岸角镇居民则应向阿散蒂王纳贡。之后，总督和阿散蒂王瓜分了避居阿诺马博堡的难民，并将他们卖至美洲为奴。7 月初，阿散蒂军向东移动，10 月至温尼巴，后因天花流行而撤回库马西。

1811 年和 1814 年，阿散蒂两度进军沿海，将芳蒂族区作为一个省并入阿散蒂国家。1817 年 5 月，英国遣使库马西，在承认阿散蒂对沿海地区的领土主权的条件下，双方于 9 月签订条约，宣布和平。

英国殖民者拒不遵守 1817 年条约，遂使争端迭起。1820 年 3 月，英王代表杜波伊斯同阿散蒂王签订新约，载明英国政府同意阿散蒂王对芳蒂族领土的主权。但英国殖民当局不批准新约，并决心摧毁阿散蒂国家。他们认为，这虽然需要金钱和时日，但可使贸易稳步增长，且胜利是毫无疑问的。1822 年，总督麦卡锡到达黄金海岸，准备战争。他集中加强海岸角、阿克拉、阿诺马博和狄克斯科夫等地堡垒火力，组织和调集殖民军数百人、皇家民兵队和土著部队各数千人，并在促使荷兰人严守中立的同时，将沿海各族拉入反阿散蒂同盟。他在给巴瑟斯特的信中信心十足地称：“阿散蒂人同从阿波罗尼亚至（沃尔特河）的整个沿海居留地的联系全部被切断，他们得不到任何武器弹药的补充，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食盐）也无法获得。”

1823 年 2 月下旬，麦卡锡派兵袭击邓克瓦的阿散蒂人，结果落入伏击圈。殖民军死伤 45 人、失踪 4 人。一次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1824 年 1 月，阿散蒂军主力万余人，从西线向南推进，直趋沿海。麦卡锡率军阻遏，1 月 21 日到达恩沙曼考的邦萨索村，并在村旁的邦萨河旁集结队伍，利用俯瞰小河的山峦，以猛烈炮火封锁河面。经过激战，阿散蒂军强渡邦萨河，殖民军全线崩溃，麦卡锡丧生，许多重要的殖民官员被打死打伤或被俘。整个战斗打死殖民军官兵 187 人、打伤 92 人，土著部队的伤亡未予清查，阿散蒂军也有大批伤亡。这就是加纳史上有名的恩沙曼考战役。

阿散蒂军乘胜东进，直逼埃弗图。埃弗图地处海岸角以北，是通往海岸角的要冲，扼守此地的有英国殖民军 700 余人、土著部队 5000 余人。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埃弗图几度易手，但终被阿散蒂军占领，英国方面死 176 人、伤 677 人。阿散蒂军继续向南推进，围困海岸角。英国

Metcalf, op.cit., p. 7.

W.W.Claridge, op.cit., vol.1, p.252.

Metcaef, op.cit., pp.59 - 60, 77.

Metcalf, op. cit., p.86.

Ellis,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黄金海岸史》), ToTowa 1971, p.146.

W.W.Claridge, op.cit., vol.1, pp.352 - 354.

Ellis, op.cit., p.171.

组织殖民军和土著部队 5000 余人投入战斗。丹麦人组织土著部队数千，参加守卫海岸角，并扬言从侧翼进攻阿散蒂。6—7 月，战斗连续不断，英方伤亡 500 余人。8 月，疫病流行，部队疲惫，为防止丹麦人的袭击，阿散蒂军撤退。

1823—1824 年战争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打击，使沿海居民对英国的“保护”失去信心。为消除战争的不利影响，英国积极准备新的战争。1826 年 1 月，阿散蒂军万余人进入沿海，准备征讨阿克拉人。英国组织殖民军和土著盟军万余人，向阿散蒂军发动进攻。8 月上旬，双方在托托瓦附近展开决战。英国具有装备优势，阿散蒂人虽一度取胜，但伤亡惨重，终于败北。1831 年，交战双方签订和约，结束战争。

19 世纪 60 年代起，殖民政府开始酝酿进攻阿散蒂本土，并伺机挑起战争。1863 年，殖民者藏匿两名阿散蒂逃亡者，经多次交涉仍拒绝交出并准备战争。3 月，阿散蒂军南下；5 月，攻占阿西库马和波比库马。6 月雨季来临，阿散蒂人班师回京。1864 年，殖民政府集结军队，准备远征阿散蒂。但是，由于大雨滂沱、疫病蔓延，集结于普拉苏的殖民军只得退却。

阿散蒂人的抗英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推迟了黄金海岸殖民化的过程，成为黄金海岸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的光辉篇章，同时也鼓舞和配合了西非其他地区的反侵略斗争。

五、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扩张

这一时期，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扩张集中于拉各斯和尼日尔河下游地区。

为保护英国商人利益，进一步扩大英国势力，1849 年，比克罗夫特被任命为英国驻贝宁湾和比夫拉湾领事。他驻扎斐南多波岛，管理达荷美至喀麦隆即圣保罗角至约翰角之间的地区的有关事务。英国政府同尼日利亚从此开始了官方联系。比克罗夫特曾在非洲活动 20 年，十分熟悉非洲事务，并对一些酋长颇有影响。他十分关注拉各斯。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英国商人同约鲁巴地区的贸易，特别是棕油贸易不断增长，拉各斯作为棕油重要输出港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拉各斯又是内陆奴隶输出的重要转运中心。拉各斯的奴隶贸易使内陆的战争和奴隶买卖难于终止，使棕油等“合法贸易”难于发展，严重损害英国利益，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控制拉各斯。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拉各斯发生王位之争。拉各斯王阿基托耶被其侄科索科推翻，逃至巴达格里，请求英国援助。1851 年 11 月，比克罗夫特奉命前往拉各斯同科索科谈判，以求签订一项禁止奴隶贸易、保护英国利益的条约。谈判失败，英国转而支持阿基托耶。英军进攻拉各斯，拉各斯人英勇抗击。1851 年 12 月，在一场激战后拉各斯被英军攻克，阿基托耶复位。1852 年 1 月，英国同拉各斯及其毗邻地区的国王和酋长订立条约，规定禁止奴隶贸易，有关奴隶贩卖的一切设施必须立即拆除且禁止重建；现有奴隶必须移交英国予以释放；今后如有贩奴行为，大不列颠可用武力制止，并严厉惩处拉各斯王及酋长们。条约还鼓励“合法贸易”，拉各斯王及酋长们允许英国臣民在其领地全境自由贸易，并保证不得将任何特权和优惠权给予他国；保护传教活动，鼓励其经营产业，建筑住宅、教堂和学校，对臣民的信教活动

不得干涉和阻挠。拉各斯及其毗邻地区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1853年，英国任命坎贝尔为第一任驻拉各斯和贝宁湾领事，执掌拉各斯有关事务。同年，阿基托耶去世，多苏木被立为王。在多苏木统治期间，法国加快了扩张步伐。法国代表团企图前往拉各斯与多苏木会谈。英国政府决定捷足先登，占领拉各斯。1861年8月，英国迫使多苏木签订条约，割让拉各斯，并宣布予以占领。1862年，拉各斯及其附近地区被宣布为英国殖民地。弗里曼被任命为第一任拉各斯总督兼贝宁湾领事。1866年，拉各斯殖民地并入西非殖民地，由塞拉利昂总督统辖，在拉各斯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掌管当地事务。1874年，拉各斯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由黄金海岸总督统辖，拉各斯设副总督治理。19世纪80年代，拉各斯成为单独的总督管辖的殖民地。同时，英国不断向毗邻拉各斯的地区扩张，先后吞并巴达格里、帕尔马、勒基、奥凯奥丹、阿帕帕、伊策基里、奥格博马欣、伊杰布罗、伊特布、艾耶散、伊格贝萨、伊拉罗和科托努等地区，使约鲁巴地区成为附属于拉各斯的保护国。

英国在油河地区的扩张困难重重。英国商人已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毗邻地区展开贸易，但作为内地和沿海贸易中介的沿海居民警惕地捍卫着自己的利益，英国行政机构难于立足。1866年，英国在洛科贾设立领事馆，任命麦克劳德为领事。领事馆遭到非洲人反对和袭击。由于地处内陆，英国政府无力对它提供保护。1869年，领事馆被迫撤销。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主要依靠司法权力的扩大。为解决各方在贸易中的纠纷，在旧卡拉巴尔、新卡拉巴尔、布腊斯、奥波博、阿卡萨和贝宁河等地建立了衡平法庭。它是商人和酋长们在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各商行经理、酋长和长老组成，主席由各商行经理轮流担任。法庭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债务纠纷，规定应纳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保证公平竞争等，并制定相应条规。违反条规者，在当地国王同意的条件下予以惩处。由于这一地区以前缺少法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人逐渐将所有案件都提交衡平法庭处理，英国人的司法权力随之扩大。1854年，比克罗夫特甚至通过衡平法院废黜了博尼王佩普累。1872年，英国枢密院令，授予贝宁湾和比夫拉湾领事司法行政权，同时使衡平法庭合法化、条例化。这种权力的扩张为保护条约的签订和油河保护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六、法国在西非沿海的扩张

拿破仑战争使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基本停顿。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法国开始在非洲扩张势力。法国恢复了向达喀尔派遣移民的活动，与毗邻圣路易地区的酋长订立条约，取得土地以开办种植园。结果，在塞内加尔沿海地区，以圣路易、果雷埃、达喀尔和律菲斯克等城镇为中心，逐渐形成约有人口五万的四个殖民区。这就是19世纪初法国塞内加尔殖民地的大致版图。殖民政府设于圣路易，由法国政府委任的总督统治。殖民地居民有权选举一名代表参加法国国民议会。法律是根据巴黎发布的各种命令制定的。法国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但直至60年代中期，在殖民地总人口15万人中，取得法国公民权者仅15000人。

Alan Burns, *Histor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史》), London 1963, pp.314 - 316.

Osae, Nwabara & Odunsi, *op.cit.*, p.238.

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1854年，果雷埃单独成立殖民政府，并兼管几内亚湾沿海各法国殖民点的事务。这使塞内加尔殖民政府能致力于在塞内加尔河流域的扩张。同年，费德尔布任塞内加尔殖民地代总督，翌年升任总督，开始了法国在塞内加尔扩张的重要时期。费德尔布主张武力扩张。他沿塞内加尔河修筑堡垒、碉堡和炮台。他能调动的兵力大致为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两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排，此外还可以从阿尔及利亚调来军队。

法国向北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击败特拉扎人。特拉扎人在穆罕默德·哈比卜领导下，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下游航道及其以北地区的树胶贸易，并同法国人展开了争夺瓦洛地区的激烈斗争。他们要让法国人滚回法国去。为打败特拉扎人，费德尔布沿河修筑了波多尔、达加纳和巴克尔等碉堡，连续三次入侵特拉扎人居住区，终于击败特拉扎人，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下游以北直至卡约尔湖的地区。树胶贸易权转让法国人之手，塞内加尔河下游航线归法国掌管。

在东方，哈吉·奥马尔正擎起圣战的旗帜，赶走了塞内加尔河上游的法国人，并号召圣路易的穆斯林同法国人作斗争，影响日益扩大。奥马尔从塞内加尔河上游向中下游推进，计划将法国殖民者逐出塞内加尔。1857年4月，奥马尔开始围攻费德尔布修筑的梅迪内堡，但因久攻不下，奥马尔主动撤退（参见本卷第八章）。费德尔布扫清了向东扩张的道路。

费德尔布在向南扩张中首先兼并卡约尔。19世纪中期，法国拟敷设圣路易至达喀尔的电报线，并要求线路通过卡约尔国土。达梅耳马科杜拒绝法国人要求，法国以此为理由发动战争。费德尔布从阿尔及利亚和果雷埃等地调集殖民军2000余人侵入卡约尔。马科杜退守卡约尔东部，虽尽力收复山河，但终于失败。马迪奥迪奥被法国立为“达梅耳”，为此他将西部部分国土割让给法国。马迪奥迪奥投降法国，遭到国人反对，终于被废黜。拉特—迪奥尔继任达梅耳，他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1863—1864年，他率领卡约尔军队多次同法国殖民军激战，然后败退至毗邻的巴奥尔和卓洛夫。卡约尔被兼并，由法国政府派专员管理。

1865年，费德尔布在两任总督之后离任，此时法国已控制今塞内加尔1/3的土地。这些土地大致可分为殖民地和保护地两部分。殖民地的构成及管辖前已提及。保护地受圣路易总督统辖，由各地法国殖民官员直接管理。保护地居民称法国臣民，以与殖民地的法国公民相区别。臣民必须遵守法国法律，但某些不与法国律令相悖的传统法律和习俗仍可保留。臣民无权通过同化成为公民，不得离开居留地，且必须从事无偿劳动。

19世纪30年代，法国开始在象牙海岸扩张。这时法国商人已在此从事了几个世纪的贸易。商人们要求政府与当地首领订立条约，以实施所谓自由贸易。1838—1842年间，海军军官布埃—维约梅兹同几内亚湾沿岸一些酋长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在帕尔马斯角和象牙海岸的大巴萨姆、阿西尼等地建设设防商站的权利。1843年，法国在大巴萨姆和阿西尼等地建造筑垒商站，设立机构，遣送移民。但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和当地非洲居民的反抗，法国这一时期在象牙海岸的扩张较为缓慢。

法国重新在达荷美的扩张始于19世纪30年代末。布埃—维约梅兹根据

海军部命令，巡航几内亚湾沿海，搜集了有关达荷美的资料。1843年，布埃—维约梅兹出任塞内加尔总督，根据他的命令，法国重新占领维达的法国堡垒。堡垒始建于17世纪，18世纪下半叶由海军部管理，大革命期间实已放弃。鉴于英国对达荷美的觊觎，法国于1851年同达荷美王签订协定，规定保护法国移民，保护法国贸易，鼓励法国传教。此外，条约还载明：“为使法国炮台所属领土保持完整，在其一定范围内已建造的墙垣或房屋均需立即拆除，并由达荷美王禁止重建。”条约的签署加强了法国在维达的地位，扩大了法国在达荷美的影响。1857年，法国取得对大波波的保护权。19世纪60年代初，英法在波多诺沃展开争夺。拉各斯殖民政府图谋兼并波多诺沃，法国则通过雷吉斯商行使达荷美王德·索几倒向法国。1863年2月，法国对波多诺沃实施保护。同年8月，在相互补偿之后，英法签署协议，互相保证，对业已确定归法国保护地政府和拉各斯政府分别管辖的领地不进行任何干涉。1868年，法国同达荷美签订条约，规定“达荷美王将科托努领土连同他在地的一切权利毫无例外地毫无保留地让与法兰西皇帝陛下”。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在小波波、阿古和波多诺沃的势力。由于这时法国海军基地设于加蓬，其余地区兵力微薄，所以法国在达荷美的属地归加蓬最高指挥部管辖，由设在维达的法国领事和波多诺沃等地的副领事处理日常事务。

法兰西第二帝国在非洲的扩张勾画出法属西非殖民地的轮廓，并为法属西非殖民帝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法国在西非的扩张步伐放慢。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以前，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难于同英国匹敌。

Robert Cornevin, *Histoire du Dahomey* (《达荷美史》), Paris 1962, p.281.

Robert Cornevin, *op.cit.*, p.290.

第十四章 西非伊斯兰圣战

从 1804 年奥斯曼·登·福迪奥发动豪萨圣战开始，到 1874 年萨摩里·杜尔建立瓦苏鲁帝国为止，是西非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乍得湖到富塔高原，从尼日尔河曲到喀麦隆高原，爆发了一系列以伊斯兰圣战为旗帜的统一、改革运动，基本上结束了从 1591 年摩洛哥入侵以来小国林立、纷扰不宁的局面，形成了索科托、图库勒尔和瓦苏鲁三大国家，古老的博尔努帝国也在圣战中焕发了生机。

这 70 年，是伊斯兰教在西非迅猛扩展的时期，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为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可比拟。广大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的宣传，积极参加圣战。战争胜利之后，新政权都以伊斯兰教立国，按照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推广伊斯兰文化，程度不等地以伊斯兰的一神教思想代替了原有的多神教思想，在地域广阔、部落丛生、小国林立的西非内陆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其信徒之众多、影响之深远都是殖民者竭力推广的基督教所望尘莫及的。

历史上色彩纷呈的宗教运动，说到底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和表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无数邦国各据一方、一个民族（或部落）崇拜一个精灵（或祖先）的状况，阻碍了西非经济的发展。早已传入的伊斯兰教卡迪尼亚派和提江尼亚派的思想，为实现统一、改革旧制度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适合当地商人和弗拉尼牧民的需要，更符合正在兴起的封建主的要求。因此，在这 70 年中，大大小小的圣战连绵不断，无数的王国和小酋长国被消灭，旧的贵族统治被推翻。新建的几个伊斯兰国家，按照伊斯兰教义结合西非的实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某些国家还出现了一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这些改革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消除所有痼疾。同时，当它们还在改革和巩固圣战成果之时，殖民主义侵略已经迫在眉睫。它们最终也未能逃脱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些统一的伊斯兰大国成了抗击殖民侵略的主要力量。

一、圣战前夕的西非和豪萨

西非伊斯兰圣战是西非内陆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到 1800 年时，欧洲殖民者对西非的侵略已达三个多世纪，但所占领土却不多。除几内亚比绍和塞拉里昂的沿海地带外，欧洲人只占领了沿海的一些岛屿和据点，基本上没有侵入内陆。但罪恶的黑奴贸易却对西非所有地区都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由于欧洲枪枝、火药的输入和对黑奴需求的增加，猎奴战争和贩奴的规模日益扩大。博尔努马伊（国王）阿里 1658 年一次就抓获了 4000 多名奴隶。卡诺的一个军官在一次猎奴战争后净得几千名奴隶。反对掠卖奴隶成了圣战前西非各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欧洲殖民侵略对西非内陆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宗教问题。18 世纪下半叶，英法相继侵入埃及、占领印度、渗透到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伴随而来的是

关于这次圣战的性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称之为革命、改革、伊斯兰复兴运动者均有。

Paul E.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奴隶制度的变形》), Cambridge 1983, p. 113.

基督教的传播和它对伊斯兰教的抨击，这使伊斯兰教神学家感到了威胁。宗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先是 18 世纪中期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运动，继而是兴起于埃及、以爱资哈尔为中心的苏菲派的复兴运动。西非的宗教领袖不仅接触了中东的宗教改革思潮，而且也同样具有一种危机感。例如，早期欧洲的旅行家在撒哈拉见到穆斯林宣教师时，他们总要被问及何以英国要占领印度。临近沿海的富塔托罗地区更直接感受到亡国亡教的危险。哈吉·奥马尔在领导圣战时曾致书圣路易的伊斯兰教徒，号召他们反抗法国人：“你们，恩达尔的子民，真主不准你们同这些走狗在一起……真主说：不要同犹太人、基督教徒一起生活，谁这样生活，谁就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在索科托和马西纳的圣战胜利之初，贝洛和阿赫马德·穆罕默德都曾下令阻止基督教徒通过廷巴克图和一切他们统治的地区，认为“基督教徒访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是不断混战的根由”。

在摩洛哥入侵西苏丹、桑海帝国灭亡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非一直分裂为无数的小国，互相争战不已，无日宁息。到 18 世纪末，占领廷巴克图的阿尔马人政权已被图阿雷格人摧毁，图阿格雷人控制了尼日尔河曲地区；卡尔塔和塞古的班巴拉人王国互相争战，长期分裂；位于马西纳的弗拉尼人国家，对塞古王国俯首称臣；在沃尔特河流域东南部的莫西人国家，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却是繁荣的；登迪桑海则分裂成许多小酋长国，在西非政治舞台上已不起重大作用；豪萨城邦像过去一样依然四分五裂，相互征战；只有西法瓦王朝统治下的博尔努是一个统一的穆斯林国家，但它已经走向衰落。在早期圣战中建立的邦杜、富塔托罗、富塔贾隆三国，对西非其他地区渴望改革的弗拉尼人是一个鼓舞，这些人把富塔视为自己的故乡。

在大多数分裂的国家之中，许多统治者自称信仰伊斯兰教，实际上他们不是异教徒就是混合伊斯兰教徒。所谓混合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教传入西非各地后同传统信仰相糅合的产物。与此相对应，西非的伊斯兰教学者也分为两类。混合伊斯兰论者包括书记员、占星卜卦者、一部分宣教师，他们定居在城市，同贵族联姻，其生活与贵族相近，在宫廷中占有较高的职位，占有大量财富，赞成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宗教混合和妥协，为各国君主的统治服务。《豪萨编年史》写道：“当时，所有豪萨国王都不靠法律审判，独断专行；依附于他们的学者玛拉姆唯君命是从。”另一类伊斯兰教学者与弗拉尼和图阿雷格牧民生活在一起，到处游历，到处传教，而不与统治阶级合流，谴责所有非伊斯兰教的遗风，主张严格遵守教规。他们被称为“正统派”，这一类学者广泛地吸收了苏菲改革派的观点，主要是卡迪尼亚派和提江尼亚派的观点。

卡迪尼亚派是一个古老的伊斯兰教派别，12 世纪由西迪·穆罕默德·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创立于巴格达。15 世纪，卡迪尼亚派的一个学者马格

瓦哈比派，因其代表人物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而得名。该派主张纯洁伊斯兰教，恢复它的原教旨，统一阿拉伯半岛。苏菲意即羊毛，苏菲派因其信徒穿粗毛服、以示质朴而得名。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1800 年以来的非洲》), Cambridge 1974, p.30.
G.G.贝莉埃：《塞内加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第 188 页。恩达尔指圣路易总督 Borom Ndar。

C.C.Stewart, *Frontier Disputes and Problems of Legitimation Sokoto-Masina Relation, 1817—1837* (《边界争执和合法性问题：索科托—马西纳关系》),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VII, no.4 (197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132.

希里（卒于 1504 年），曾到阿伊尔、卡齐纳、卡诺、加奥等地传教，宣传太平盛世必将到来，并为豪萨地区培养了一批学者，他的思想对西非和豪萨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18 世纪中期，昆塔宣教师穆赫塔尔·孔蒂成为公认的卡迪尼亚派领袖，推动了该派的进一步传播。提江尼亚派是新诞生的苏菲派，由摩洛哥人阿赫默德·提江尼创立于 18 世纪末。它的观点比卡迪尼亚派更为激进。

在圣战前夕，正统派和混合伊斯兰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位于南北商道上的阿加德兹是一个著名的伊斯兰教育中心，来自西非、北非乃至中东的学者在这里讨论法律、哲学和伊斯兰世界的现实问题。在这场辩论中，正统派主张纯洁伊斯兰教，认为正统的伊斯兰教徒不能同非伊斯兰的习俗、法律妥协，任何违背教规的行为都与叛教无异，而叛教就要处以极刑。他们宣传马赫迪（救世主）即将降临苏丹，有权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混合伊斯兰教派则反对任何变革，无论采取和平的还是圣战的形式。

这场论战深深扎根于西非社会的现实。正统派抨击的不符合古兰经和教义之处，正是广大群众对贵族不满之所在。这种矛盾在豪萨城邦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尖锐。

豪萨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豪萨人、弗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豪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定居在城镇的弗拉尼人要交纳专门的市场税、人头税，甚至在伊斯兰节日还要交节日税。他们不能参加或自己专门举行传统的弗拉尼人的礼拜。生活在农村的弗拉尼牧民地位更为低下，在使用牧场和水源上受到豪萨人的多方限制，牲畜常常遭到劫掠。他们要缴纳沉重的牲口税、牧地租金和其他贡纳，替豪萨贵族放牧牲畜。不论是定居还是游牧的弗拉尼人都被视为异乡人，被排斥于豪萨人社会组织之外，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甚至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豪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使弗拉尼牧民深为不满，他们对伊斯兰正统派的宣传深表同情。圣战爆发后，他们纷纷揭竿而起，参加圣战。例如在克比北部的扎巴马，弗拉尼牧民和豪萨农民常为放牧发生流血冲突。后来，该地弗拉尼首领阿布巴克·卢杜杰率部参加了圣战。

在豪萨族内部，阶级矛盾也日趋紧张。由各邦国王、陪臣组成的统治阶级靠掠夺奴隶、税收和地产收入为生，畜有众多的奴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仅压迫和剥削异乡人和奴隶，而且勒索和剥削普通豪萨人。据《卡诺编年史》记载，卡诺国王默哈马·沙莱法·丹·达迪（1703—1731 年在位）为增加年收入，巧立七种税目，每一种都是掠夺性的，他的继承者甚至强迫玛拉姆纳税。

城镇市民和农民构成豪萨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也是强制性苛捐杂税的负担者。豪萨各邦统治者穷兵赎武，兵连祸结，使豪萨农民屡遭掠夺，统治者还要把战争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因此，豪萨农民和平民在圣战爆发后站到了反对豪萨贵族的一边。

奴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豪萨的奴隶分为家内奴隶、丘卡纳瓦和农业奴隶。丘卡纳瓦替国王和陪臣从事各种服役。农业奴隶又分为奴隶村的奴隶和小业主的奴隶。前者多为达官富豪和大玛拉姆所有，在村头监督下为主人耕

Ajayi,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New York 1972, vol. 1, p. 521.

Cucanawa 的音译，意为天生奴隶，一般是奴隶的后裔。

作土地。他们除了从事农业外，还替主人从事手工业、经商、作战。奴隶又作为祭品、礼品和商品被虐杀、转赠和买卖。但是，豪萨的奴隶制比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相对温和一些，有的奴隶主将家内奴隶视若家庭成员。丘卡纳瓦跟随国王、陪臣服役，若能得到赏识，还可获得一官半职。农业奴隶若被允许成婚，则可得到一间安身茅屋。因此，在豪萨地区，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冲突一直没有激化到爆发大规模奴隶起义的程度。

豪萨贵族掠取异乡人和穆斯林为奴，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奥斯曼在致戈比尔国王的信中，曾提出过释放穆斯林的要求。

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基础上，以奥斯曼为首的穆斯林改革派抓住有利时机，在戈比尔邦首先发动了反对豪萨贵族统治的圣战。

二、奥斯曼和豪萨圣战

豪萨圣战发难于戈比尔不是偶然的。戈比尔位于豪萨城邦的北部。桑海帝国灭亡以后，解除了北边对它的威胁。17世纪末，戈比尔联合赞法腊邦打败了克比。18世纪，它向赞法腊的优势挑战，使之一蹶不振，控制了直到赞法腊以南的大部分领土，向西扩展到阿达拉和康尼，戈比尔到18世纪下半叶成为豪萨城邦中一个强大的邦国，但内外各种矛盾成堆。它遇到了赞法腊、克比、卡诺和卡齐纳的攻击，其中与卡诺和卡齐纳的战斗最为激烈。戈比尔把卡齐纳视为主要敌人，多次对之用兵，直到圣战爆发时，双方仍在交战中。邦内统治阶级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屡起风波。混合伊斯兰教徒同以奥斯曼为首的伊斯兰改革派的争论日益尖锐。

豪萨圣战的领导人奥斯曼·登·福迪奥1754年生于戈比尔一个弗拉尼族家庭。该家族15世纪从富塔托罗迁居戈比尔。其父是弗拉尼穆斯林团体的伊玛姆。他从小随父研习古兰经，天资聪慧，笃信伊斯兰教，曾到阿加德兹学习，朝觐圣地，接触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思潮，参加了伊斯兰教的论战。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教师是杰布里·奥马尔，后者曾尖锐地抨击豪萨宫廷的混合伊斯兰教和异教徒。1774年，20岁的奥斯曼返回家乡迪格尔，开始其传教生涯。他在戈比尔、赞法腊和克比诸邦之间巡回讲经布道，呼吁人们完美准确地遵从沙里阿（即伊斯兰教法）和先知圣训，谨防怀疑论和诡辩术，要与混合伊斯兰教决裂。他以渊博的学识、切中时弊的话题，赢得了广大信徒的尊敬。其子贝洛写道：“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受他的言辞鼓舞而坚定起来。向他求教并询问有关宗教问题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玛拉姆和非玛拉姆都尊敬他。”人们纷纷拥向迪格尔，使之成了豪萨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心，逐渐形成一个以奥斯曼为首的穆斯林社会。

奥斯曼的活动引起了戈比尔统治集团的不安。约1780年，他的信徒要求戈比尔国王巴瓦·江格瓦佐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巴瓦的回答是谋杀奥斯曼，但未成功。巴瓦改变策略，邀请奥斯曼去宫廷任教师。在此之前，奥斯曼一直没有游说统治上层的打算，但在去麦加朝圣的途中接到邀请，遂改变初衷，决定从阿加德兹返回戈比尔。他在宫中，先后教授过后来继承王位的雅库布、

奥耳迭罗格：《15—19世纪的西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1页。

到麦加朝圣称大朝，到阿加德兹朝圣称小朝。

David Robinson & Douglas Smith,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非洲史料》), New York 1979, p. 132.

纳法塔和雍法。他希望巴瓦在戈比尔实施伊斯兰教法。巴瓦答应满足他的要求，承认奥斯曼领导的迪格尔穆斯林社会，允许奥斯曼在国内号召人们信仰真主，同意释放囚犯，减轻臣民的税收负担。

以巴瓦为代表的戈比尔统治阶级罗致奥斯曼等著名学者，并无改弦更张之意，只是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粉饰自己的统治。但与巴瓦的愿望相反，奥斯曼的信徒在戈比尔、克比、赞法腊进一步壮大，那些来到迪格尔的信徒带着奥斯曼的著作和宣教凭证返回故乡，组织自己的穆斯林社会。这使戈比尔统治者大为恐慌，他们在道路上设障，阻止投奔奥斯曼的人群。纳法塔继位（约 1794—1795 年）后，取消了巴瓦授予奥斯曼的传教权利，宣布：“第一，除谢胡（即谢赫，指奥斯曼）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向臣民宣教；第二，除从其父继承伊斯兰信仰者外，任何人不准成为穆斯林信仰者，均应复归其父亲和祖父的信仰；第三，今后男人不准戴穆斯林头巾，女人不准戴面纱。”

鉴于劝说统治者改信伊斯兰教的方法难于实现，奥斯曼重新转向普通老百姓，准备诉诸武力。

大约从 1789 年起，奥斯曼以苏菲派神秘主义手法，制造发动圣战的舆论。如说他在幻觉中得到了连祷权，可以替信徒向真主说情；卡迪尼亚派的创始人卡迪尔显圣，命令他继承其业绩；卡迪尔受先知之命，封他为瓦利斯的伊玛姆，赠他真主之剑，对真主的敌人拔剑相向。事后，他创作了“卡迪尔之歌”，号召信徒拿起武器，“真正武装起来才是圣训”。奥斯曼通这类神秘主义活动，积极动员信徒，准备圣战。

1802 年，奥斯曼支持雍法夺取了王位，希望他的这位学生能使国家更加伊斯兰化。但希望又成泡影。雍法以召见为名，企图用火将奥斯曼烧死，其阴谋没有得逞，他又打算将奥斯曼逐出迪格尔，使穆斯林社会群龙无首。奥斯曼回答说：“我决不背弃我的社会，我将离开你的国家，真主的土地广阔无垠”，表示了仿效穆罕默德出走的决心。1804 年，奥斯曼率领信徒撤离迪格尔，朝西北方向的古杜进发。他被穆斯林一致推举为“艾米尔·穆米宁”，意即信徒的司令，正式宣布圣战。他说：“假如我打这一仗，我可能成为比我对手更伟大的人，或者我的儿子比我对手之子更伟大的人，或者我的奴隶可能管辖他的奴隶，否则异教徒将把我们国土上扫出去。”

从 1804 年宣布圣战到 1812 年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的建立，是圣战的第一阶段，也是圣战的高潮。圣战者同豪萨各邦的统治者展开了全面武装斗争，并将其彻底击溃。

宣布圣战之后，奥斯曼的支持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古杜，投奔起义军的不仅有弗拉尼人，也有豪萨人、图阿雷格人和博尔努人。豪萨人最初只占 20%，随着起义的扩大，豪萨农民参加日众。各族牧民、农民和奴隶构成了奥斯曼起义军的主力。

奥斯曼出走之后，雍法决定以武力镇压起义，派兵追击奥斯曼。在打败

David Robinson & Douglas Smith, op.cit., p.13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36.“瓦利斯”意为圣人。

David Robinson & Douglas Smith, op.cit., p. 133.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

Robinson & Smith, op. cit., p. 155.

Roland Oliver & Anthony Atmore, op.cit., p.31.

J.D.Fage, A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史》), London 1978, p.204.

雍法对古杜的进攻之后，奥斯曼制定了圣战的战略：先夺取马坦卡和康尼井，以掩护左翼；从古杜向东南方向出击，然后向赞法腊河谷推进，并以克比井和卡诺马为支点，建立一条防线，以保障圣战军队的粮草供应，作为日后攻克戈比尔、赞法腊和克比等邦筑墙城镇的基地。简单地说，这个战略就是先占农村、后攻城市。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是他的弟弟阿卜杜拉、他的儿子贝洛和一个弗拉尼族领袖阿里玉·杰多，他们都通晓阿拉伯文的军事典籍，且各有所长，阿卜杜拉善于突袭，贝洛精于指挥骑兵作战，杰多有实战经验，精通战争艺术。同时，各地来的穆斯林首领在古杜宣誓效忠奥斯曼，领取绿色的旗帜。这些旗手回到各地发动圣战，反对各邦的贵族统治者，牵制他们围攻古杜。

圣战开始之后，在戈比尔主战场，起义军一度在 1804 年的楚恩楚阿战役和阿尔萨瓦战役中受挫，伤亡惨重。但在其他各邦，圣战进展迅速。1804 年，起义军攻陷了扎里亚，国王和大臣落荒而逃；1805 年夺取克比首府，国王逃亡奥冈古负隅顽抗。克比和扎里亚的胜利，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1805 年，贝洛指挥弗拉尼骑兵，在格万杜城下大获全胜。1806 年，起义军运用三面合击战术，击败了雍法的主要同盟者图阿雷格人和卡齐纳，使戈比尔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1807 年，圣战者攻克了卡齐纳和卡诺，王室分别逃到马拉迪和阿布贾。1808 年，起义军包围戈比尔首府阿尔卡拉瓦，双方展开决战，雍法被击毙，戈比尔覆亡。至此，豪萨的大部分地区和重镇都被攻克。圣战从豪萨的中心地区转向外围。1812 年，在圣战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奥斯曼称哈里发，建立了索科托哈里发帝国。

从帝国的建立到 19 世纪 40 年代，是豪萨圣战的余波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镇压豪萨贵族的反叛，巩固已得成果，同时向豪萨以外地区扩展。

一些豪萨旧贵族不甘心失败，在 1812 年以后相继发动叛乱。特别是在 1817 年奥斯曼逝世、贝洛继位之时，先有赞法腊的反叛，继有克比和戈比尔的叛乱，戈比尔还勾结图阿雷格人进攻索科托。所有这些叛乱均被贝洛派兵平定。据记载，贝洛统治时期共平叛 47 次，到 1830 年代才基本平定。

1812 年以后，圣战扩展到豪萨以外的地区，索科托帝国乘机扩大其统治范围。除了占领博尔努西部的四个艾米尔国之外，其主要的扩张方向是南部。

一个在博尔努受过教育的弗拉尼人马拉姆·阿达马，1806 年到索科托访问。后来他接受圣战的旗帜，回到贝努埃河，联合当地的弗拉尼人开展圣战，占领了许多小酋长国，1841 年建立了以约拉为首府的阿达马瓦埃米尔国，成为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的一部分。

1817 年，奥约北部的统治者阿芳贾在豪萨圣战的鼓舞之下，发动反对奥约国王的战争，在伊洛林自立为统治者。他向索科托求援，请了一个弗拉尼玛拉姆阿里米作顾问。阿里米之子从索科托宫廷秘密得到一面圣战旗帜，在伊洛林开展圣战，谋杀了阿芳贾，自己登上王位，伊洛林成了索科托帝国的另一个埃米尔国。

在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附近的努佩地区，一个弗拉尼人首领登多从奥斯曼那里得到了圣战的旗帜。他利用努佩王族两派争夺王位之际，夺取了政权。最后，其子奥斯曼·扎基登上王位，建立了从属于索科托帝国的努佩埃米尔国。

三、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的建立及其变革

在豪萨地区的圣战大功告成的 1812 年，奥斯曼·登·福迪奥正式称哈里发，并把帝国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设首府于索科托，由其子贝洛管辖；西部较小，设首府于格万杜，由其弟阿卜杜拉管辖。他自己则摆脱行政事务，专注学术研究。1817 年，奥斯曼逝世，贝洛继任哈里发。

在圣战过程中，豪萨的政治和经济已经开始变革。哈里发帝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继续进行，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

在圣战中建立了大约 15 个穆斯林埃米尔国和等量的小埃米尔国。这些埃米尔国是由圣战的首领代替逃亡或被推翻的豪萨城邦的国王和各地的小酋长而建立起来的。圣战前，豪萨城邦各自为政，互不相属。圣战后，这些埃米尔国成为哈里发帝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

哈里发是帝国的最高行政和司法首脑，垄断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权。各地埃米尔由哈里发任命，并签订巴亚契约。中央政府还派遣使臣，监督各埃米尔国的施政，解决各埃米尔国之间的纠纷；各埃米尔国有义务每年固定向中央政府交纳一定的税收和贡纳，战时应召出兵作战。各埃米尔国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有自己的议事会、法庭和军队，可以自己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为防止埃米尔国势力过大，在某一埃米尔逝世后，往往任命另一家族的代表继任，所以埃米尔很少父子相承者。

圣战使伊斯兰法取代了传统的习惯法。帝国设立了专门的法庭和法官，中央有哈里发法庭，各埃米尔国也有自己的法庭和法官，实行马利克派解释的伊斯兰教法，按它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埃米尔国的法庭可裁定死刑、处理土地、财产纠纷、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关系等问题。

在圣战中，多数豪萨贵族逃亡或被杀，他们的领地落入了圣战者上层手中。例如扎里亚邦的全部土地被三大家族瓜分：马拉瓦氏占有扎里亚以北的土地，阿瓦氏占有扎里亚以南的土地，阿卜德·克里姆占有西北部土地。奥斯曼家族也占有大量土地，阿卜杜拉占有的土地就在阿尔贡古地区。因此，当时人反映：“过去没有权势的人，如今都成了贵族。”索科托帝国建立后，把豪萨贵族逃亡留下的土地以及未曾开垦或抛荒的土地分封给贵族官僚，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确立了以封建领地制为主要形式的土地制度。贵族官僚再把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官僚或陪臣。有的埃米尔为防止受封者尾大不掉，禁止受封者到领地上定居，由其收税人“贾卡代”管理领地。领地分为世袭和非世袭两种。一般说来，皇族成员和中央大官僚的领地是世袭的，各埃米尔及其下属的领地不是世袭的，不能转让，也不能买卖。农奴在平时不能被出卖，但领主在把农庄分割给子女时，农奴也随之被分配或卖掉。

圣战后，自耕农阶层有所扩大。许多参加、支持圣战的非弗拉尼人得到一份土地，成为自耕农。定居的弗拉尼人和弃牧务农的弗拉尼人都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耕地上，但要交纳贡税、服兵役和徭役。少

Page,op.cit.,p.205.

baya 的译音，意为臣服，服从。

奥耳迭罗格：前引书，第 341 页。

数自由农民也拥有少量农奴或奴隶。

此外，伊斯兰清真寺也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圣战领导人反对掠奴，倡导解放奴隶。在《圣战宣言》中，奥斯曼明确宣布：把“穆斯林中的自由人沦为奴隶是非法的”，“不论其住在伊斯兰领土还是敌人领土上”，把异教徒沦为奴隶也是非法的。在圣战中，许多奴隶因参加圣战而获得了解放，有些人甚至成为奥斯曼手下的战将。帝国建立以后，许多圣战领导人获得领地，变成了贵族，奴隶成为封建领地中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因此，奥斯曼在释奴问题上变得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当他得知一个法官裁决奴隶必须继续当奴隶并交还其主人时，他说：“你参与支持不义，并企图变伊斯兰教法的论断为不义。不要用这样的恶行亵渎真主，也不要介入奴隶主和他的奴隶之间，除非他自己释放奴隶。”但是，索科托的统治者还是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措施来限制奴隶制，释放奴隶。如规定奴隶村到第二代就不再是奴隶村，而是依附于封建主的人们居住的村子，奴隶可以赎身；“如果有谁把自己奴隶的手打断，把他的眼睛打瞎，或者把女奴的头发剃光，那末，根据国王的命令，该奴隶应予释放”。艾哈迈德·阿提库(1859—1866年在位)曾命令苏勒巴人不要悬赏寻找失去的奴隶。虽然圣战使奴隶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未采取坚决措施，帝国境内仍有众多的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据巴茨估什，奴隶至少占卡诺人口的50%。布萨是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奴隶占全部人口的4/5，他们自己谋生，缴纳收入的半数给奴隶主。这些数字不尽准确，因为探险家往往把奴隶和农奴混在一起计算。

圣战在豪萨地区引起的另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伊斯兰教文化和习俗的传播。在圣战期间，为了对不识字的各族牧民进行宣传，创造了一种方言宗教诗，它用富尔德语和豪萨语写作。战后，人们继续用方言诗体写作关于神学、法学、政治学和占卜学的各种问题，使豪萨人广泛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关于生死、来世、记年和历法的观念。奥斯曼本人以及阿卜杜拉、贝洛都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写了约100部著作，既有用阿拉伯文写的《告诫兄弟们》，也有用豪萨语写的《战胜戈比尔国王雍法的凯歌》、富尔德语写的《至仁至慈的真主》(诗)。他们在创造方言文学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逐渐形成了以豪萨语为口语、以阿拉伯文字为书面语的豪萨—阿拉伯文化。

奥斯曼等人发动圣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原始的多神教，改革混合伊斯兰教，使信仰混合伊斯兰教的人复归正统的原始的伊斯兰信仰，消除异教和附加物。然而，圣战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都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奥斯曼也不要求这样。他曾说过，对普通人不要过分挑剔，不要强求他们遵守伊斯兰的习俗和礼仪。伊斯兰教政权的建立，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帝国在各埃米尔国，工商业中心和边境重镇开办伊斯兰学校，建

David Robison & Douglas Smith, *op.cit.*, p.139.该宣言可能发表于1804—1805年。

奥耳迭罗格：前引书，第200页。

奥耳迭罗格：前引书，第246页。

Lo vejay, *op.cit.*, p.195.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1页。

费奇：前引书，第291页。

S.J.Hogben A.H.M.Kirk-Greene, *The Emigrants of Northern Nigeria*(《北尼日利亚的移民》), Oxford 1968, p.382.

立清真寺，培养宣教师和穆斯林学者。贝洛鼓励游牧弗拉尼人弃牧从农，加入穆斯林社会，向他们的孩子传播伊斯兰教原理。越来越多的豪萨老百姓也改信了伊斯兰教。有人估计，殖民时期前，讲豪萨语的人一半以上是穆斯林。

四、豪萨圣战的影响

豪萨圣战结束了豪萨地区长期的政治分裂和各邦之间的战乱，开始扭转摩洛哥入侵西苏丹以来西非 200 余年的分裂趋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内战的停止，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机制的改善，促进了农工商业的发展。索科托帝国的统治者对生产也采取鼓励政策。贝洛在给卡齐纳埃米尔的指令中写道：“穆斯林领导者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注意开拓乡村、建设村庄和筑墙城镇，这是为乡村人民谋物质利益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农业政策也应该是鼓励农业劳动者和工匠人员发展（生产）。”

在农业生产方面，与粮食生产增长的同时，经济作物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种植某种作物的农庄和地区。如从马加利亚到索科托，沿途都种棉花；卡齐纳的南部种植烟草，且大部分出口到图阿雷格人地区。

索科托帝国建立以后，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工商业中心，如卡诺、卡齐纳，恢复和扩大了；新的工商业中心，如索科托、格万杜、比达、包奇、阿尔古、约拉等，逐渐崛起。克拉珀顿认为，索科托是他在非洲内陆所见过的人口最稠密的城镇。这些新旧工商业城镇，都有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在卡诺埃米尔国有 15000—20000 个染坑、50000 多名染工、数千名织工和裁缝。除纺织业外，卡诺还创造农业工具、马具、武器和饰物。索科托生产的铁器和皮革制品质量上乘。它的皮革制品输出到摩洛哥，再转输欧洲，以“摩洛哥皮革品”闻名于世。

各地的商人活跃于整个帝国境内。他们组织商队，从事各地的产品交换，并向国外出口。当时形成了两条商路，即的里波黎—卡齐纳—卡诺和几内亚湾沿岸—伊洛林—扎里亚—索科托。出口商品有布匹、皮革制品、奴隶、金属制品，进口商品除非洲其他地区生产的粮食、食盐以外，还有曼彻斯特的细白布和印花布、的里雅斯特的玻璃念珠等。

尽管圣战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索科托帝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并未破坏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村社制度。索科托帝国和各埃米尔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证明，它缺乏稳固的内聚力，不能根本改变其落后的局面，跟上世界发展的主流。

豪萨圣战的成功，使索科托帝国成了西非地区的震源。马西纳、博尔努、约鲁巴和富塔托罗地区，却在它的直接影响和干预之下，发生了圣战或变革，伊斯兰教得到了一次迅速的扩展。19 世纪的圣战者阿赫马德·b·穆罕默德、哈吉奥马尔亲身访问过圣战后的索科托帝国，萨摩里、阿尔法·莫洛、马马杜·拉米诺曾受到豪萨圣战的思想影响。同时，索科托帝国的经济发展促进

Y.B.Us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796-1903(《卡齐纳的转变》) , i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 XIX , no.3 (1978) , p.353.

P.E.Lovejoy ,Planta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经济中的种植园》) ,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fory , XIX , no.3 (1978) .

了土著穆斯林商人的崛起。他们之中一些人既是买卖人，又是伊斯兰教宣教师，他们不断把圣战的思想以及索科托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革带到西非各地。例如，1515—1516年，索科托的玛拉姆伊本·赛义德曾到费图加传教，领导当地的圣战运动。

五、博尔努的圣战

从伊德里斯·阿委马改革以来，博尔努帝国出现了长期和平繁荣的时期，一直是中苏丹的霸主。1657年继位的阿里马伊曾三次到埃及和阿拉伯旅行、朝圣。他在位时，博尔努开始由盛转衰，遭到了来自阿伊尔高原图阿雷格人和南边朱昆人的侵袭。他们曾两次包围博尔努首都恩加扎加米。其次，博尔努的属国和附庸，如津德尔和巴吉米、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不时起来反抗博尔努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博尔努本身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大多数国王庸碌无能，地方的实际权力已从贵族转到了非贵族出身的“科涅纳瓦”（Konenawa，行政官）手中。

1804年爆发的豪萨圣战震惊了千年王朝西法瓦的统治。卡诺和道腊的统治者，以其名义上的臣属国向博尔努马伊（国王）求援。艾哈迈德马伊（1793—1810年在位）派出的援军，同卡诺的军队一道被圣战者的军队击溃。卡诺、卡齐纳、扎里亚、道腊接连被圣战者夺取，博尔努帝国力图保持豪萨城邦分裂的传统政策破产了。

在博尔努本土的西部，有一些弗拉尼人的小酋长国。这些游牧的弗拉尼人虽然在本族酋长的管辖之下，但要受到卡努里人的监督，要向博尔努帝国纳贡，备受欺凌。豪萨圣战的爆发，特别是在卡诺击败马伊援军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大受鼓舞，纷纷起义。在穆克塔尔和易卜拉欣·扎基等首领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哈代贾、卡塔冈、米萨乌和贡贝等埃米尔国。穆克塔尔得到奥斯曼·登·福迪奥的授旗后，约在1808年率军攻打博尔努首都，艾哈迈德马伊不支而逃。

趁着弗拉尼人攻进首都之际，津德尔宣布独立，在萨本领导下的瓦达伊人占领了巴吉米，侵入了加涅姆。博尔努帝国受到东西两面的夹击，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卡努里贵族一筹莫展，艾哈迈德马伊被迫向博尔努的伊斯兰教学者卡拉米求援。

卡拉米像奥斯曼·登·福迪奥一样，是卡迪尼亚派的成员。其父是加涅姆人、伊斯兰学者，母亲是费赞人。他在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中心费赞受过良好的伊斯兰教育，曾在埃及和阿拉伯地区呆了很长时间。回到加涅姆后，他在家乡传教，并与加涅姆王族联姻。他在本族和苏瓦牧民中颇有影响，与乍得湖区域的阿拉伯学者情谊深笃。在加涅姆和苏瓦人的支持下，卡拉米应艾哈迈德马伊之请，率军于1809年夺回了首都，由此声名大振。

在枪战的同时，卡拉米还与奥斯曼及其子贝洛展开了舌战。他们互通信件，辩论弗拉尼人进攻博尔努的是非曲直。在奥斯曼和贝洛看来，博尔努政府允许异教习俗在人民中间存在，尤其公然援助异教的豪萨各邦国王，说明它本身就是异教主义，是圣战的对象。卡拉米争辩说，异教习俗不等于异教主义。这种异教习俗的存在是出于无知和软弱，弗拉尼人也不例外。假如把

卡拉米（al-Kanami），另作 al-Kanemi，中文又译作加涅米。

所有这类人都宣告为不信教者，这里将没有任何真心的信教者。他进一步责问：“请告诉我们，你们为何对我们作战，你们为何要奴役我们自由的人民。……我们确曾听到过谢赫（指奥斯曼·登·福迪奥）品德方面的许多事，我们读过他写的东西，这些与你们的所作所为正好相悖。”这样，卡拉米就把弗拉尼圣战者置于侵略者的地位，而他自己是为保卫博尔努自由的人民、为保卫正确解释伊斯兰教而战。

艾哈迈德死后，其子杜纳马继任马伊。他与其父一样无能。1811年，另一位弗拉尼玛拉姆易卜拉欣·扎基再次攻陷博尔努首都。杜纳马再次向卡拉米求援，并答应将一半的税收给他，由他控制博尔努的军队。卡拉米聚合支持者，击退了旗鼓相当的对手，迫使易卜拉欣·扎基退回卡塔冈。1826年，索科托哈里发的一次入侵也未奏效，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卡拉米承认了索科托对博尔努西部边境四个弗拉尼埃米尔国拥有主权，双方保持和平。

卡拉米在抵御索科托的同时，于1816—1824年间重新占领了津德尔、巴吉尔米，重建了博尔努帝国。

遵循与索科托类似的政策，卡拉米在博尔努进行了改革。他要求严格执行伊斯兰法，按教法进行审判。例如，有人因在斋月私通，被判鞭打400下而身亡；他削减了卡努里贵族的权力，起用苏瓦阿拉伯人，加强对各级行政长官的控制；培训各级官员，在半个世纪中约有2000—3000人参加学习。通过改革，博尔努的政权从以马伊为首的卡努里贵族手里转移到了以卡拉米为首的苏瓦阿拉伯人和加涅姆人手中。但是，卡拉米并未废除马伊，而始终以谢赫的名义执掌实际的权力。1814年他建筑了新首都库卡瓦。马伊和授封贵族依旧住在正式的首都，卡拉米则从库卡瓦指导和控制军政事务，正式形成二元政权，马伊成了有名无实的君王。

二元政权不可能长期共存，新旧两个统治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杜纳马两次企图赶走卡拉米，但未成功。1837年卡拉米逝世，其子奥马尔继任谢赫，两个统治集团的斗争立即尖锐起来。奥马尔减少马伊所得税收份额，进一步削减卡努里贵族的权力，终于导致了1846年的内战。

当时，津德尔发生叛变，继杜纳马为马伊的易卜拉欣乘机同瓦达伊人秘密谈判。奥马尔发觉秘谋，处死了易卜拉欣。但在卡努里贵族的支持下，瓦达伊进军博尔努本土，烧毁了库卡瓦，迫使奥马尔逃亡，扶植了一个傀儡马伊。不久，瓦达伊同奥马尔达成了交易，瓦达伊撤军，而奥马尔则承认瓦达伊对巴吉尔米和加涅姆的宗主权。奥马尔集中兵力打击卡努里贵族，新立的傀儡马伊战死，西法瓦王朝寿终正寝，博尔努帝国的权力完全为奥马尔所掌握。

六、马西纳的圣战

与博尔努一样，在尼日尔河河曲地区的马西纳、杰内、廷巴克图也受到豪萨圣战和改革的强烈震荡。豪萨的战火直接影响了豪萨地区同杰内、廷巴克图的贸易，当时控制廷巴克图的昆塔商人蒙受重大损失。马西纳地区同豪萨一样，存在着社会、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弗拉尼人早已定居河曲地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在他们的四周都是异教徒。统治马西纳的

阿多自称信仰伊斯兰教，但先是屈从于阿尔马人政权，后则向异教徒统治的塞古王国称臣纳贡，勒索和压迫本族劳动人民，容许异教习俗，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弗拉尼统治集团内部的桑加尔家族，一直与阿多所属的戴洛家族争权。豪萨圣战一爆发，立即在河曲地区引起了反响，伊本·赛义德、侯塞因·科伊塔、阿尔法·阿赫马德·阿尔法卡、阿赫马德·穆罕默德相继起而领导反对马西纳阿多和塞古王国统治的运动。有的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如伊本·赛义德；有的则与阿赫马德·穆罕默德领导的反对运动合流。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出身于桑加尔家族，约生于1775年，曾随父接受了伊斯兰教育，受到穆克塔尔·孔蒂的思想影响，成了卡迪尼亚派的成员。他领导圣战时的一个主要助手阿尔法·纳赫·塔黑尔就是孔蒂的学生。关于阿赫马德·穆罕默德的早期活动史，尽管发现了两件毛里塔里亚语的新材料，仍然疑窦丛生，歧见甚多。根据现有材料判断，他约在1805年到豪萨参加过豪萨圣战的早期阶段，师从奥斯曼·登·福迪奥，从而激发了他改革马西纳社会的决心。离开索科托以后，他定居于杰内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像奥斯曼一样，他广收门徒，讲经传道，深孚众望。杰内的统治者对此深感不安，下令驱逐他。他旋又定居于马西纳的西贝拉，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改革家，其名声广为流传，归附者日众。一位伊斯兰学者杀死阿多之子，此事成了统治者镇压运动的借口。阿多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威，而又无力单干，便求救于宗主国塞古王国。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决定率领信徒出走哈姆达拉希。1810年，他在此得到奥斯曼的令旗，宣布圣战，被信徒一致推举为埃米尔·穆米宁。

约在1816—1817年，阿赫马德·穆罕默德打败了塞古王国的军队。这一胜利，促使杰内的伊斯兰学者请他入城当权。但杰内的统治者不愿自动下台，杀死了阿赫马德·穆罕默德的代表。圣战者立即包围和夺占了杰内。随后，马西纳的桑加尔家族发动起义，推翻了阿多的统治，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夺取了马西纳王国的政权。起初，他本想定都杰内，但因杰内容易受到塞古的班巴拉人的威胁，于是建都哈姆达拉希。

在运动初期，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得到了索科托王国和廷巴克图昆塔教长的支持，团结了国内反对阿多政权和班巴拉人的各种势力。他曾与一个强有力的酋长穆罕默德·加赖乔结成联盟，共同反对阿多。在推翻阿多之后，加赖乔到处扩大地盘，我行我素。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坚持他是奉奥斯曼之命创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要加赖乔纳贡，遭到后者拒绝。于是昔日的同盟者互相火并，经三年战斗，加赖乔战败，1824—1825年逃到格万杜宫廷避难。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曾从奥斯曼得到令旗，处于索科托藩属地位。但这只是一种策略，并非他真的要臣服于索科托帝国。奥斯曼死后，阿卜杜拉和贝洛争夺索科托的控制权，于是马西纳与索科托的藩属关系破裂了。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在给贝洛的信中指出：“说到藩属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因为赛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全称为 Ahmad B.Muhammad B. Abi Bakr B.Sáid，通用名还有阿赫马杜·洛博(Ahmadu Lobbo)、谢胡·阿赫马杜(Shehu Ahmadu)、哈马德·巴里(Hamad Bari)、阿赫马杜·哈马迪·布布(Ahmadu Hammadi Bubu)。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51.

Stewart, op.cit., p.497.

宣布圣战的年代，另有1815年说、1818年说。

Mohammed Galaijo.又作 Galajio 或 Jalajo.

义德·阿卜杜拉派马利克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他说他已是埃米尔·穆米宁。但我听到的并非如此，因此我停止（称臣）。”他还质问贝洛：“你的统治（管辖权），自从前任谢赫奥斯曼死后直到现在，达到过我们这里没有？”

1821年，贝洛承认了马西纳的独立，双方关系终于正常化。

随后，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同统治廷巴克图的昆塔人的关系也恶化了。1821（或1822年），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占领了费图加。该地位于尼日尔河内三角的北端，控制着尼日尔河曲的大部分谷物贸易，而廷巴克图则依赖于尼日尔河曲的粮食供应。此举使昆塔人控制费图加的努力落空。1826年，他的一个宿敌逃到了廷巴克图避难，使他找到了进攻廷巴克图的借口。占领该城后，他建立了弗拉尼人要塞，以防图阿雷格人从北面来的侵袭。

至此，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建成了总面积约5万平方英里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其中包括两个边境城镇杰内和廷巴克图，控制了西苏丹的传统商业中心。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在政权、税收和法律方面按照伊斯兰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议事会，由40名伊斯兰学者组成；另由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和3名最高议事会成员组成枢密院。最高议事会和枢密院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如最高议事会和枢密院发生分歧，则由40名独立的伊斯兰学者作为仲裁人出席。

全国分为五个埃米尔国，由阿赫马德·穆罕默德的亲属和亲信统治。弗拉尼人桑加尔家族和卡迪尼亚派僧侣集团，构成马西纳王国的统治阶级。基层政权是村社和由几十个村社组成的区。区和大多数城镇（如马西纳、杰内等）都由他的亲属和亲信治理，他们负责收税、征兵、修路和审判。

马西纳王国建立了完善的税收制度。农民交纳收获物的1/10，富人交纳财产税，牧民交纳牲口税。国家的收入还来自罚款、被没收的财产和战利品、贡品。战利品的1/5归阿赫马德·穆罕默德本人，一份归远征军司令，一份用作赎回俘虏、帮助穷人，余额归士兵均分。

在法律和日常生活方面，马纳西王国严格按伊斯兰法规办事。禁酒、禁止跳舞和多妻的伊斯兰法规的原则，被严格执行。

1844年，阿赫马德·穆罕默德逝世，其子哈马德二世（1844—1852年在位）、其孙哈马德三世（1852—1862年在位）相继执政。1862年，马西纳为西非另一位圣战的领导者奥马尔所灭。

七、奥马尔与图库勒尔帝国

19世纪中叶，由哈吉·奥马尔领导的图库勒尔人的圣战，与奥斯曼·丹·福

C.C.Stewart, op.cit., pp.503-504.

J.D.Fage, op.cit., p.209.

J.B.Webster & A.A.Boahen,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West Africa Since 1800* (《1800年以来西非的革命年代》), London 1967, p.20.

Webster & Boahen, op.cit., p.20.

J.O.Sagay & D.A.Wilson,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1800—1975* (《非洲现代史》), New York 1978, p.25.

迪奥和阿赫马德·穆罕默德发动的豪萨和马西纳圣战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哈吉·奥马尔奉行伊斯兰教的提江尼亚派；二是不仅反对异教徒，而且直接同法国侵略者作战，成为西非反帝斗争的先驱。

当时的形势是很复杂的。在马西纳圣战胜利之后，从乍得湖到大西洋沿岸，博尔努、索科托、马西纳三大伊斯兰教国家已经实行了改革。在马西纳和大西洋之间，既有三个图库勒尔人的穆斯林教长国，即富塔贾隆、富塔托罗和富塔邦杜，也有异教徒统治的班巴拉人的卡尔塔王国和塞古王国，以及一些非伊斯兰教的马林凯人的独立的城镇和乡村。这些异教徒统治的地区形成了奥马尔进行圣战的活动舞台。法国已经牢牢地占领了塞内加尔沿海的圣·路易和戈雷埃岛，并加紧向沿海和塞内加尔河内地扩张。1822年，法国已把沃洛夫人的瓦洛王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826—1842年间，同达喀尔地区的各王国和富塔托罗教长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沿海地区只有沃洛夫人的开约尔成功地抵抗着法国殖民者。为保证对内地的树胶等资源的掠夺，法国在塞内加尔河两岸修建了波多尔、马塔姆、巴克尔和梅迪内等据点。奥马尔领导的圣战正是对法国殖民扩张的反击。

奥马尔（约1794—1864）出生于富塔托罗波多尔附近的一个图库勒尔族家庭，父亲是一名伊斯兰教教师。他的老师是阿布德·卡里姆，并由其师介绍加入提江尼亚派。1820年，奥马尔在阿布德·卡里姆伴随下赴麦加朝圣，获得“哈吉”（朝圣者）称号。朝圣期间，他在提江尼亚派一位宗教领袖西迪·穆罕默德·加利指导下潜心钻研，三年学成，经埃及回国。在埃及，他与爱资哈尔一些苏菲派教长建立了联系，考察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他在西亚北非的所见所闻，与其家乡大相径庭，增加了他回国从事改革的决心。他路过博尔努，同卡拉米进行辩论。他到索科托，读了奥斯曼和贝洛的著作，研究了他们准备和组织圣战的艺术，并娶贝洛之女为妻。

1837年离开索科托后，奥马尔多次处于逆境之中。在马西纳，奥马尔受到信奉卡迪里亚派的阿赫马德·穆罕默德的冷遇；在塞古，受到班巴拉统治集团的迫害，一度身陷囹圄。

1839—1842年，奥马尔住在富塔贾隆，并以此为基地，在曼丁果人和图库勒尔人中间游方布道，吸收他们加入提江尼亚派。提江尼亚派比在富塔和西非地区广为流行的卡迪尼亚派更为激进。奥马尔认为，卡迪尼亚派和提江尼亚派相比，不啻是以铁比金。提江尼亚派认为自己是神选的救世者，奥马尔虽然没有自称马赫迪（救世主），但他积极鼓吹过马赫迪及其千年王国的理想，他的弟子称他为马赫迪的维齐尔（首相）。提江尼亚派比卡迪尼亚派对迅速建立一个公正的伊斯兰社会负有更明确的义务，主张在必要时凭借暴力（圣战）来实现。奥马尔的圣战学说不局限于简单地发动一场宗教战争。他认为，圣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首先是“心的圣战”，即净化灵魂，同各种世俗欲念作战；其次是“经的圣战”，即布道和理想信仰的圣战；最后才是“剑的圣战”。奥马尔宣传的教义通俗易懂，仪式简化，生活上要求朴素清苦，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当时富塔各教长国经过几十年的当权，形成了一个日趋腐败的贵族统治集团，引起了广泛的不满。1846年，奥马尔到自己的家乡富塔托罗进行第一次游方布道，发出了社会改革的信息。他说：“你们的酋长压迫弱者，违背

了真主的法律。” 奥马尔在富塔地区声名远扬，许多卡迪尼亚派成员加入了提江尼亚派，对各教长国的统治阶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848年，富塔贾隆的阿尔马米把他驱逐出境。他带领弟子和支持者从富塔贾隆出走，到达富塔贾隆和班布克交界地区的丁吉拉伊。

在丁吉拉伊，奥马尔建立了“里巴特”，积极准备圣战。各地区各族各界人士纷纷聚集到这里，其中有弗拉尼和图库勒尔的宣教师、班巴拉的奴隶、法国统治下的圣路易的技术工人。他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圣战军队，以其弟子和跟他从富塔贾隆出走的老部下组成一支精锐的突击军团；新近改宗的人和征募的士兵组成步兵军团；弗拉尼人的非正规军则用作辅助部队。圣路易来的技术工人则帮他修建堡垒，修理枪枝。他用丁吉拉伊的金砂同沿海的商人交换武器弹药。据估计，奥马尔的常备军约有12000人；在某些战斗中，甚至可以投入15000—30000人的兵力。

1852年，奥马尔正式宣布发动圣战。当时，一个奴隶从“异教徒的领土”逃到了奥马尔管辖的“伊斯兰领土”，异教徒的统治者要求归还，遭到奥马尔拒绝，从而引起了冲突。奥马尔挥师北上，占领了尼日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一些班巴拉人和马林凯人的国家，如班布克，布雷等。1854年他打败了卡塔尔王国，攻占首都尼奥罗。这可能是一次佯攻，奥马尔的主要目标是塞内加尔下游河谷地区，包括他的故多富塔托罗，以便抗击正在征服这一地区的法国。

在1848年奥马尔第二次到富塔托罗游方布道时，曾表示愿同白人和平通商，只要白人在其辖区按章纳税。但法国殖民者不予理睬，继续沿塞内加尔河推进。1854年，费德尔布就任法属塞内加尔代总督，一面加紧进攻塞内加尔河北岸的特拉扎人，一面修建梅迪内堡垒。梅迪内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居民的大村庄，位于奥马尔辖区的边境，黑人酋长桑巴拉是个多神教徒，费德尔布软硬兼施，迫其接受保护，将梅迪内作为法国殖民者进攻奥马尔的桥头堡。

1857年，奥马尔率领15000人的大军攻打梅迪内。同时，他把作战计划告知特拉扎人首领穆罕默德·哈比卜，希望他坚持战斗。他又致书圣路易的伊斯兰教徒，号召他们行动起来，反抗法国殖民者。他说：“现在我已有足够的力量，我将继续战斗，直到你们的暴君向我求和，向我投降。” 围攻梅迪内的战斗从4月20日开始，直至7月费德尔布率军增援，圣战军共击毙法军16人、打伤63人。奥马尔由于缺乏攻破设防据点的武器，下令主动撤退。1859年，他又率军同法国殖民军在马塔姆和盖穆两地战斗。在保卫盖穆战役中，共击毙法军39人、击伤97人。这几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法国殖民者，显示了西非人民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力量，而奥马尔则成为西非反殖斗争的先驱而载入了史册。

1861年，奥马尔打败了塞古王国，占领了这一地区。攻打塞古王国时，他曾要求马西纳联合行动。但马西纳的统治者认为塞古王国属于卡迪尼亚派的范围，向奥马尔提出抗议，马西纳军队的一些士兵曾和异教徒的班巴拉人

J.B.Webster & A.A.Boahen, op.cit., p.2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58.

贝莉埃：前引书，第187—188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5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 p.159.

并肩反对奥马尔。他以此为借口，1862 年灭马西纳，毁其首都哈姆达拉希；1863 年，占领了古城廷巴克图。至此，他建成了以塞古——西科托为中心的图库勒尔帝国，其疆域西起塞内加尔河，东至廷巴克图，南到丁吉拉伊，北达盖穆。

奥马尔领导的圣战，也像奥斯曼·登·福迪奥和阿赫马德·穆罕默德一样，是以圣战形式出现的一场社会运动。有材料证明，奥马尔的支持者是不满意富塔各教长国贵族统治的图库勒尔人、弗拉尼人，以及受压迫最深的各族奴隶，特别是班巴拉人统治下的各族奴隶，他们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奥马尔的圣战。

奥马尔在占领廷巴克图后，班巴拉和马西纳弗拉尼人统治集团的残余，以及卡迪尼派的宣教师、昆塔的谢赫们都仍在顽固地反对他。1864 年，奥马尔在镇压马西纳贵族的叛乱中去世。他没有来得及按提江尼亚派的主张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其子阿赫马德·奥马尔继位时，图库勒尔帝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外有法国的威胁，内有原先各国贵族的反叛。但奥马尔统一西苏丹大部分地区后建立起来的图库勒尔帝国，毕竟成了阻遏法国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影响了 19 世纪 70 年代萨摩里·杜尔领导的穆斯林改革运动。

八、萨摩里和瓦苏鲁帝国

19 世纪中期发生的另一次著名的伊斯兰运动，是由萨摩里·杜尔（1830—1900）领导的马林凯族的统一和改革运动。

马里王国崩溃以后，马林凯族向尼日尔河上游迁居，其地西界富塔贾隆，东邻莫西和阿散蒂王国，南连森林地带，北接图库勒尔帝国。到 1800 年时，他们仍然分裂成几百个村镇和小酋长国。但他们都具有共同的血缘，都以马里王国的传统为荣。

在宗教信仰上，农牧民都是泛灵论者，而商人（迪奥拉人）则信仰伊斯兰教。迪奥拉人住的村镇，一般都有清真寺和学校。异教的马林凯人和伊斯兰的迪奥拉人，在几个世纪中都能相安无事，互相尊重对方的习俗。迪奥拉人穆斯林不是圣战主义者，大概他们不愿打乱他们同异教徒的商业往来。因此，他们被 19 世纪的圣战者指斥为“名义上的穆斯林”和“妥协主义者”。

在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的农牧业和商业日渐发展。迪奥拉人从事长途贩运，不仅在西非内陆做生意，而且同塞内加尔、蒙罗维亚、弗里敦的沿海非洲和欧洲商人进行贸易。迪奥拉人也是有技术的手工艺人——织工和金匠。这些迪奥拉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的村庄，随着生产的发展，慢慢变成规模不等的城镇。因此，到 19 世纪时，马林凯人出现了联合成更大的政治单位的意识，商人也觉得如此将更有利于贸易的发展。

西非的圣战和改革对马林凯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奥马尔在马林凯人地区的宣传，为萨摩里·杜尔的统一和改革打开了道路。在一个哈吉·奥马尔的门徒马马杜领导下，康康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国家。到 1850 年，锡卡索和奥迭内也已如此。萨摩里·杜尔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伊斯兰旗帜下，起而领导马林凯人的统一运动。萨摩里把自己看作是“松迪亚塔·凯塔的再生”。

马林凯人认为萨摩里好象准备“做他们 14 世纪的祖先曼萨·谟萨曾做过的事”，因而他得到了马林凯族农牧民、商人和伊斯兰圣职人员的广泛支持，奥马尔的一些门徒和一个侄子也参加了他的统一和改革运动。

萨摩里·杜尔约 1840 年生于今几内亚共和国贝拉区。他的父亲拉菲亚·杜尔是个小商贩，其谱系可以追溯到一个穆斯林商人家族。他的母亲出身于当地马林凯族的一个多神教农民家庭。萨摩里自幼跟随父亲行商，足迹遍及几内亚，可能还到过塞拉里昂、多哥、上沃尔特。他不是个伊斯兰教徒，只是到瓦苏鲁酋长国当兵之后才皈依伊斯兰教，了解哈吉·奥马尔的学说。

1868 年，托隆地区的一位酋长仰慕萨摩里的军事才能，请他去当指挥官。不久，酋长阵亡，萨摩里被推为首领。从这时起，萨摩里认为只有统一马林凯人地区，创建一个集权和有效的国家，才能克服马林凯人的软弱，使之受到周围国家的尊重。约在 1870 年，他开始用武力统一瓦苏鲁地区的各小酋长国。1873 年，他攻打康康，取得了胜利。1874 年，他采用“阿尔马米”的头衔，具有了宗教和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萨摩里定都比桑杜古，取国名为瓦苏鲁，以纪念他在瓦苏鲁开始的戎马生涯。此后，他继续征战，扩大版图。到 1886 年，瓦苏鲁帝国的面积已达 11.5 万平方英里，成为仅次于索科托（18 万平方英里）和图库勒尔（15 万平方英里）的西非第三大国。

萨摩里·杜尔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他竭力发扬民族精神，破坏旧的部落传统，把全国分为 162 个区，每十区辖 12 个左右的村；162 个区分别隶属于 10 个省。在分区和分省中，他很少顾及原来的部落和家族关系。村长按传统方法选举产生，但权力有限，审判权归村里的伊马姆；每村有一个阿尔马米的代理人，负责征兵和管理村民共同耕种的阿尔马米的农田。区长也按传统方法选举产生，但他只是一个荣誉职位，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索法”（职业军官）和卡迪手里。省的权力掌握在萨摩里亲戚和亲信手中，这些是从支持他的军官中挑选出来的。每省还有一个军事领袖和伊斯兰宣教师。瓦苏鲁帝国的这三级地方行政机构都有政治、军事和宗教三条线，而这三条线都直通阿尔马米。他是全国最高的政治、司法和宗教领袖，也是军队的总司令。阿尔马米由国务会议协助管理全国事务。国务会议由各省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袖组成。在每个省，他安插一些不同家族出身的人主持军政事务，以消除家族和部落观念。

萨摩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共有 10 个纵队，即每省一个纵队。他们驻守边疆，保卫国家。在比桑杜古，还有一支精锐的卫戍部队。在鼎盛时期，其正规军约 10000 人，骑兵约 1500 人，民兵约 20000 人。萨摩里从英属弗里敦购买欧式武器装备军队，在国内建立军械所，修理和仿造武器。这支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受到良好的训练。萨摩里秘密派遣军官到法国雇佣军塞内加尔狙击兵中受训，回国后训练部队，传授使用先进武器的方法。

萨摩里重视发展经济，他规定每个村为政府种一块田，其收成作为赋税上交。士兵实行劳武结合，垦殖戍边，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萨摩里的统一消除了许多小酋长国征收的关税，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他重

J.B.Webster & A.A.Boahen, op.cit., p.49.

一说生于 1830 年。

J.B.Webster & A.A.Boahen,op.cit.,p.47.

视发展长途贸易，用本国出产的黄金和农牧产品交换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萨摩里重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他把伊斯兰教作为巩固马林凯族统一的纽带。在每一个村镇，建立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用伊斯兰教代替祖先崇拜和精灵崇拜。他遵循古兰经的规定，每逢星期五都要走出清真寺去倾听教徒的申诉。审判按伊斯兰教法进行，在村、区和省三级都由阿尔卡利法庭审理，只有重大的案件才提交萨摩里和国务会议。他规定贵族和酋长都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伊斯兰教育，谁不遵守就要罚款。他还亲自到学校讲课，向孩子们提问题，检查他们所学的知识。

马林凯人的统一，瓦苏鲁国的建立，不仅重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且筑起了一道长期抵抗法国侵略的屏障。

第十五章 埃塞俄比亚的统一、改革和抗英战争

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代表的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第一次浪潮，在埃塞俄比亚未能像它在美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地区那样恣意得逞。在一段时期内，葡萄牙人甚至帮助这个基督教王国抵抗了伊斯兰势力大规模的入侵。葡萄牙人在埃塞俄比亚虽然没有能实行以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为特征的原始积累式的殖民侵略，但他们最终还是转化成对埃塞俄比亚社会的一股破坏力量。埃塞俄比亚民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将他们逐出。但在此后的更加闭塞的状态中，由于对内部各种不安定因素无力控制，遂使封建帝国在滑坡中走向瓦解，终于步入中央王权完全有名无实的混乱状态。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埃塞俄比亚民族面临 19 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的第二次浪潮。产业革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再次瞩目埃塞俄比亚时，这里割据混乱的状态在政治上为它的渗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经济上却不利于它搜求原料和倾销商品。

自由资本主义的侵略触角，刺激了这个闭塞孤立的非洲古国，使它警醒。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跟上了 19 世纪亚洲和北非国家的步伐，出现了西奥多二世的比较正规和完整意义上的改革。不过，就埃塞俄比亚的社会条件而言，这种近代化的努力比起其他东方国家跨度更大，因而难度也更大；即使没有外来干涉，也不会一次成功，而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许许多多的挫折。由于英国的敌视与侵略，埃塞俄比亚近代化的第一次尝试加速走向失败。然而，促成这第一次尝试的诸因素并未随改革的失败而消失。它还会以更强的势头，一次又一次地再现。

一、王子纷争时代

1769 年，冈达尔王宫里的“万王之王”埃约阿斯被提格雷地区的统治者米哈伊尔杀害。从此，埃塞俄比亚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王子纷争时代。埃塞俄比亚国家实际上已处于解体状态。“万王之王”已沦为军阀混战中控制冈达尔的大军阀封建主手中的傀儡。

杀害埃约阿斯之后，米哈伊尔一度大权在握。他依靠自己手中那支拥有火枪的提格雷大军，任意废立皇帝，翦除异己，为所欲为。但不久之后，米哈伊尔就因盟友们纷纷背叛而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被迫于 1770 年带着“万王之王”特克拉——海马诺特撤回提格雷。1771 年，加拉人和阿姆哈拉人联军在萨巴库萨战役中击败卷土重来的提格雷军，将败降的米哈伊尔放逐绍阿。特克拉——海马诺特又先后沦为阿姆哈拉的哥舒与加拉人首领法西尔的傀儡皇帝。

1775 年，法西尔被阿姆哈拉贵族联盟击败并杀死。但仅时隔三年，另一位加拉人领袖又率军攻进冈达尔，废黜了特克拉——海马诺特，扶立其兄弟特克拉——吉约吉斯为“万王之王”。1781 年，阿姆哈拉人终于打破来自达

一些西方学者将罗伯特·萨摩里·杜尔等均列为黑非洲近代化的先驱，但限于主客观条件，他们的若干变革性措施似乎仅能算作某些方面对近代化极为初步的尝试。

关于王子纷争时代（The Era of the Princes），详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4, 1975, pp.571 - 577.

莫特的这伙西方加拉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但此时中央政权控制的地盘已经很小。例如，塔卡泽以东大片地区重归于 1772 年自绍阿返回提格雷的米哈伊尔统辖。米哈伊尔死后，瓦勒德·加布里埃尔继承了其父的领地、军队和政权。

不久，另一批东方加拉人利用阿姆哈拉人内讧，卷土重来。其中有的首领已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一路烧教堂，杀教士，掠卖基督教徒为奴隶，造成不少破坏。“万王之王”特克拉·吉约吉斯企图依靠加拉人扩大自己的权势，任命加拉人为自己的卫队长和其他宫廷重臣。加拉人遂于 18 世纪 80 年代重新得势于冈达尔。特克拉—吉约吉斯势力最强时，曾一度远征绍阿。

特克拉·吉约吉斯之后，冈达尔的“万王之王”更加无权无威。中央政权所控制的范围仅及于冈达尔周围地区。各省大小封建领主都是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相厮杀，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由于冈达尔象征着中央政权，因而一直是群雄逐鹿的目标，反复遭到兵燹之灾。18 世纪下半叶到过埃塞俄比亚的英国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曾经记述了自己在这个国家所亲身见闻的血腥混战和曲折迷离的宫廷阴谋。他心有余悸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我差一点未能逃出来”，“而我一心所想的，就是如何逃出这个血流遍地的国家”。据有的记载说，1800 年左右，在埃塞俄比亚最动乱的时期，竟然同时存在着六个彼此对立的“万王之王”，以致 1805 年到达这个战乱之国的英国使者竟不知该把英王乔治三世致埃塞俄比亚皇帝的书信和礼物送交何方。19 世纪初期，北方的古格萨、南方绍阿的统治者萨海尔·塞拉西等大封建主割据称雄，局势混乱不堪。当时的编年史悲叹：

“王国何以被青年和奴隶所蔑视？
王国何以成为异教徒们的笑料？”

二、西奥多二世的改革

19 世纪上半叶，当埃塞俄比亚继续陷于内部分裂与衰落时，它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

在东北非地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通过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而迅速崛起。埃及人在陆地上沿尼罗河南下扩张，征服了东苏丹地区的丰吉素丹国等，前锋直逼埃塞俄比亚边境；在海上则沿红海西岸南下。这样，埃塞俄比亚在对“格兰”战争 300 年后，又面临着一个咄咄逼人的新的穆斯林强邻。19 世纪以来，红海商业再度趋于活跃。穆斯林商队从沿海向东北非内陆积极渗透，商队的穆斯林商人同时又是伊斯兰教的热心传播者。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基督教古国，又一次面临被伊斯兰教势力侵蚀的严重形势。

更为险恶的威胁来自产业革命后的英法等欧洲殖民列强。它们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目的，先后将触角伸向埃塞俄比亚。19 世纪 40 年代，在绍阿统治者萨尔·塞拉西的宫廷里，就有法国国王路易·腓力的代表罗歇·德里古和英国政府的代表哈里斯在活动。西方殖民列强还竞相埃塞俄比亚各

A. H. M. Jones & Elizabeth Monroe, *History of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史》), Oxford, p.127.

Jones & Monroe, *op.cit.*, p.12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575.

R. 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London, p.71.

地封建统治者直接打交道，企图利用这个国家的纷乱局势，混水摸鱼。

割据纷争和长期战乱，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外部殖民主义的渗透，也给这个文明古国一个强烈的刺激。

在埃塞俄比亚，长期流传着一个预言：一位名叫西奥多的皇帝行将出世。他将救民于水火，使埃塞俄比亚复兴。可以认为，这则古老的预言在 19 世纪得到广泛流传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既反映了当时埃塞俄比亚人民渴望早日摆脱国内混乱的局面，也曲折地反映了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具有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埃塞俄比亚民族统一和复兴的本能意志。为了结束内乱，抵御外侮，埃塞俄比亚需要一位能承担国家统一和复兴重任的人。卡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卡萨（1818—1868 年）出身於冈达尔西部边鄙一个破落封建贵族家庭，自幼丧父，母亲出身寒微，靠贩卖一种名叫科索的药材为生。他的少年时代生活相当坎坷，曾被送进塔纳湖附近的一家修道院。不久，修道院毁于战乱，卡萨遂投奔其叔父坎福侯爵。后来，戈贾姆的大封建主哥舒强行夺去坎福侯爵的领地。卡萨只得铤而走险，成为一伙带有绿林气息的地方武装的首领。

埃塞俄比亚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到卡萨这样的人身上，并非偶然。当时位居诸侯的大封建主们只顾自己家族的私利而热衷于割据，根本不管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死活，广大农民又处于完全无权和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无法过问国事。而卡萨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下层广大群众的疾苦和愿望，因而有着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抱负。所以，还在卡萨青年时代，一位见到他的欧洲旅行家就曾预言：“现在默默无闻的卡萨，总有一天将会成为整个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大公。”

卡萨的领袖才干吸引了大批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和牧民，他们纷纷投身卡萨的队伍，使之迅速壮大。这支队伍既不像封建主割据武装那样腐败，也不像一般农民武装那样只满足于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它是胸怀大志的卡萨统一和复兴埃塞俄比亚的强有力工具。最初，卡萨和他的武装主要活动在冈达尔地区。这里的统治者孟伦皇后对卡萨势力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在派兵征讨失利后，孟伦改用拉拢手段，封卡萨为登比亚地方的统治者，还将自己的孙女下嫁给他。1852 年，卡萨在同埃及人作战中失利。这次挫折一方面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必须改造的信念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因战败而遭到孟伦集团的轻蔑与侮辱使他更加发愤图强。卡萨公开同孟伦集团决裂，并先后打败孟伦皇后和她的儿子阿里公爵，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阶下囚。接着，卡萨南下戈贾姆，击败了兵强马壮的哥舒侯爵；然后再挥师北上，一举击败盘据在提格雷地区的另一个大封建主伍比侯爵。

1855 年，在荡平北方群雄之后，年仅 36 岁的卡萨在古城阿克苏姆的玛丽安·德雷斯教堂加冕称帝。为了表明自己上应天命、下得民心，卡萨自号西奥多二世。

即位之后，西奥多二世继续向南方用兵。1856 年，他南下平定了加拉人聚居地区，并在战略要地马格达拉平顶山修筑要塞；然后继续南下，与南方最强大的封建领主、绍阿的统治者海尔·马拉科特交锋，并一鼓作气平定了绍阿。海尔·马拉科特败亡，其子萨尔·马利安作为人质，被西奥多二世带回马格达拉要塞。至此，持续了近百年的王子纷争时代终告结束。埃塞俄比

亚进入了改革、统一和近代化的新时期。

西奥多二世是一位改革家。他即位伊始，就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巩固国家统一、推动国家进步的改革，企图通过改革，将古老、落后的埃塞俄比亚拖向近代文明。他清楚地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野心，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所以对改革的态度带有很大的狂热性。

在政治上，西奥多二世作出很大努力，希望打破国家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他把首都从偏安一隅、位于西北边陲的冈达尔迁往埃塞俄比亚高原东边的马格达拉。这里比较靠近国家的中心地带，更便于控制全国。西奥多二世在马格达拉修筑城堡要塞，重建了在战乱中毁弃的圣坛和教堂，并从旧都冈达尔的 44 座教堂中运来大批贵重财物和 900 多份珍贵手稿，将这里变成埃塞俄比亚新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中心。

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西奥多二世主张实行地方行政长官制。这些官员应由中央政府任免，由国家统一支付其俸禄。他还设法将行政省区划小，派遣自己的亲信和旧部前往担任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旧封建贵族长期盘据一方的局面，而代之以势力较小的、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对皇帝效忠的地方长官。用这个办法，西奥多开始培养一个以自己的军功而不是以世袭门第为荣的新贵族集团，为其强化中央王权、加强国家统一的目标服务。但由于埃塞俄比亚地方割据的长期而顽固的传统，这一措施大致只在短期和有限范围内得以实行。在当时的记载中，还有一些关于“万王之王”召集各种会议，甚至召开全国性的地方酋长和长官大会的资料。这些都证明西奥多在强化国家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西奥多在任命地方长官时，也并非任人唯亲，而是常常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情势，且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襟怀。例如，在征服绍阿以后，西奥多为了安定人心，立即任命了两名高级官员摄理绍阿政务，其中一个为绍阿王室成员，另一个则是在绍阿深孚众望，并曾效忠旧主而同“万王之王”打过仗的将军。这一任命固然带有皇帝向地方封建势力妥协的味道，却有利于南方地区大局的稳定。

军事改革可以说是西奥多二世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他近代化努力的基本支柱。早年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作战失利的痛苦经验，使西奥多清楚地看到埃塞俄比亚旧式军队的致命弱点。这种旧式军队从组织到装备都已十分陈旧，根本无法适应重振埃塞俄比亚的要求。据当时的一位英国旅行家记述，“万王之王”力图建立一支完全用滑膛枪装备起来的正规常备军，并热衷于采用欧洲式的纪律。早在 1853 年，即加冕称帝的前两年，卡萨就已经在一些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饬。后来，他又将 1000 人交给其英国顾问约翰·贝尔训练。皇帝本人还亲自参加部分军训，以示重视。此外，他还将不同省份的士兵统一编制，派自己的亲信将领指挥，划分团队，设置团长。这样，就打破了过去封建诸侯武装那种浓郁的私人色彩和地方色彩。

Jean Doress , op.cit. , p.198.

Sven Rubenson , The Survival of Ethioplian Independence (《埃塞俄比亚独立的保存》) , p.272.

Kofl Darkwah , Emperor Theodore and the Kingdom of Shoa , 1855-1865 (《西奥多二世和绍阿王国》) ,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 no.1 (1969) .p.111.

Richard Pankhurst ,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经济史》) , AdysAbeba 1968 , p.561.

军队的纪律是同给养问题密切相关的。旧式埃塞俄比亚军队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弱点，就是缺乏正规的薪饷和给养制度，军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据编年史记载，1840年8月，冈达尔发生大骚乱，士兵们闯入民宅，吃光了老百姓的粮食，因而造成了一次大饥荒，许多人死于饥馑。针对这一积弊，西奥多二世努力建立一支有正规给养和薪饷的军队。还在1856年即位之初，他就告诫士兵们不要动居民的衣物和牲畜；同时还不时发给士兵们一些钱，让他们习惯于他创立正规薪饷的意图，并命令他们购买食物，停止对农民的劫掠和骚扰。在一段时间里，西奥多的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

西奥多军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行制造近代化武器。他热心搜求欧洲匠师，并派遣本国人去给这些匠师充当助手，制造大炮，并经常关心制作进程。他从全国各地搜集黄铜，进行熔冶，经过种种努力，终于铸造成一门重达七吨的巨炮，其口径可以钻入一个人。“万王之王”宣称，大炮铸成的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经过西奥多的一番努力，在他的极盛时期，建立了一支为数达7—8万人的军队（一说达15万人，可能过于夸张）。

西奥多二世在经济上也进行了若干重要的改革。他首先致力于改革税制，废止了商业领域中的许多苛捐杂税，还下令在他统治的地区内只设三个地点征税。据19世纪60年代初的一份资料记载，皇帝还简化了商业和关税的手续。无疑，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国内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为了达到他所期望的每一个人都恢复自己祖辈的行业（商人回店铺，农民去扶犁），除了缩减商业税以外，西奥多还废除了盖巴尔制（即政府官员和军队由当地农民奉养的制度）。在他统治初期，农民有了一定的荒地开垦耕作，客观上也稍稍缓冲了土地问题。

从增加财源的角度考虑，西奥多将目光转向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特权的教会。教会是埃塞俄比亚封建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教会上层更是封建主阶级重要的一翼。修道院和教堂自古以来就占有大量土地，这些领地构成了教会财产、权力的基础。西奥多久已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他十分厌恶僧侣，指责这些人“戴着头巾，无所事事，既不作战，又不纳税，专门喜欢住在城市里同娼妓和有夫之妇鬼混”。经过反复较量，他打破了教会方面的阻力，规定教会不再单独地、直接地占有土地；其领有土地归皇帝属下的民政长官统一管理，教士的生活由国家统一安排；每一座教堂只能设两名神父和三名祭司。一位当时的佚名作者用阿姆哈拉文写的文献肯定了地产被没收的事实。这一限制教权、扩大皇权的措施，打击了教会封建主集团的势力，同时增强了西奥多政权的财力。

禁止贩卖奴隶，是西奥多二世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从阿克苏姆古国时代起，贩卖奴隶就成为埃塞俄比亚一项源远流长的生意。“阿比西尼亚奴隶”更以其尚勇好武、才干和忠诚，闻名于东方穆斯林国家，特别是印

R.Pankhurst, op.cit., p.565.

R.Pankhurst, op.cit., p.586.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 vol.5, p.75.

R.Pankhurst.op.cit., pp.523-524.

R.Pankhurst, op.cit., p.143.

R.Pankhurst, op.cit., p.143.

度德干地区。在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封建社会中，还保留着强大的奴隶制残余势力。这种奴隶贩卖与奴隶制残余的严重存在，阻碍着社会向前发展。西奥多可以说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个向这种落后的社会弊病提出认真挑战的统治者。他认为奴隶贩卖是违背基督教的道德的，因此下令废除，进而还解放了自己的奴隶。西奥多二世的这项改革是贯彻始终的。还在他加冕称帝以前，英国外交官普洛顿就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已经用严厉惩罚的手段禁止输出奴隶。称帝之后，西奥多再次宣布奴隶贩卖为非法，并声称他本人十分痛恨这种贸易。他在19世纪60年代更严厉规定：凡贩卖基督徒为奴者，一律处以砍去右手和左脚的酷刑。有一次，西奥多还从一个奴隶贩子手中使数百名奴隶获得自由，并把他们送到欧洲来的传教士那里，让传教士教给这些人有关宗教和艺术的知识。皇帝还表示，以后会送更多的解放奴隶到那里去受教育，而所有这些人的费用都将由皇帝本人支付。在西奥多那个时代，要想在埃塞比比亚完全废除奴隶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作为一位东方封建君主，能有西奥多那样的见地与行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高原之国的地理环境，尤其是许多河谷的纵横切割，使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交通十分不便。这种状况在政治上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此，西奥多对改善国内的交通状况十分重视。不过要指出的是，西奥多对改善交通条件的考虑，主要是着眼于中央王权对各地加强控制。为了能使自己的军队迅速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去平定割据势力的反叛，他决定修筑宽阔的道路。在一些欧洲顾问的帮助下，西奥多二世着手修筑连接达布拉、塔堡和冈达尔、戈贾姆和马格达拉三条大道。军队是筑路的主要力量。为了鼓舞参加筑路的士兵们的情绪，“万王之王”身先士卒。从清晨到深夜，他亲自参加劳动，搬运石头，平整土地，或者帮助填平浅谷。西奥多本人还是道路修筑工程的工程师，他亲自勘定路线，组织劳动。西奥多还特别热心向欧洲顾问们学习岩石爆破技术，并立刻将这种技术应用到筑路工程中去。

此外，西奥多二世的改革还触及到若干社会习俗方面。例如，他曾反对并试图废除一夫多妻制的陋习。

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事业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它的核心则是近代化。他企图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来改变埃塞俄比亚的落后状态，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统一。在一段时间时，这个庞大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万王之王”权威的树立和镇压盗匪的坚决措施，以前战乱时代断绝的商路一度重又畅通无阻，以前在农村集市日经常发生的洗劫与屠杀现象消除了。当时有的欧洲人记载说，在西奥

G.M.Howat, *The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 (《世界史词典》)。

19世纪中叶，埃塞俄比亚每年仍向沿海运送7000多名奴隶，参见J.O.Sagay & D.A.Wilson: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1800—1975* (《非洲现代史》)，Ibadan 1978, p.43.

Donald Crummey, *Tewodos as Reformer and Modernizer* (《西奥多：改革家和近代化人物》)，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3 (1969)。

R.Pankhurst, *op.cit.*, pp.92-93.

R.Pankhurst, *op.cit.*, p.286.

D. Crummey, *op.cit.*, p.464.

多统治的国土上，就像欧洲秩序最为良好的国家一样，盗匪已近绝迹。这话虽然夸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奥多统治初期埃塞俄比亚改革的成效。

三、英国的武装干涉与西奥多改革的失败

作为一个东方封建君主，西奥多的近代化事业里还包含着许多非近代化的因素。这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西奥多诚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但他在宗教上主张同化政策，排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非洲帝国。他的领土扩张野心，远达于包括喀土穆在内的东苏丹大部分地区，而这一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了同埃塞俄比亚完全有别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传统。为了实现自己大一统的封建帝王梦，西奥多开始对农民追征捐税，因而引起下层劳动者的不安和不满，从而摇动了自己赖以统治的根基。各地的封建主立刻抓住这一点，乘势而起，到处发动叛乱。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国内局势又一次滑向动乱。同时，“万王之王”也同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好大喜功，对改革事业越来越急于求成，不切实际，态度也越来越专横执拗。在后期间反叛的封建诸侯作战时，他常常违背初衷，纵兵烧杀，殃及百姓。例如，仅仅为了自己的顾问和朋友、英国普洛顿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被杀害，西奥多二世竟毫无理智地对有牵连的部落实行野蛮的烧杀。仅他亲口承认，就杀了1500人。到1866年，他更允许自己的军队在14个省区进行劫掠，这样就更加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西奥多二世对国家的控制权也急剧削弱，各地大封建诸侯的势力膨胀，他所控制的地盘仅局限于塔纳湖以东贝格姆迪尔和塔纳湖以南的一些地区。这片地区自然无力承担为数庞大的军队，昔日全盛时期的西奥多大军已锐减到1万人左右。

英国殖民者早已对埃塞俄比亚心存觊觎。181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索尔特就曾两次深入提格雷地区进行考察，并建议英国政府利用当时埃塞俄比亚的混乱局面，占领其沿海地区。1841年，一名英国代表同绍阿的统治者签订了友好和贸易条约。1843年，英国驻马萨瓦领事又同阿里公爵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规定了对英国商品的低额进口税，给予英国商品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免税的特权。英国人当然不希望这个东北非文明古国通过近代化改革而强盛起来，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即将通航而红海通道骤显重要的时刻。当各地反叛活动日趋激烈时，英国人竟借机取消了早先对西奥多承诺过的军火供应。西奥多被英国人食言背信的行径所激怒，加上互致外文信件上的差错所引起的误会，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万王之王”一怒之下，扣押了英国领事卡麦伦及其随员和两名传教士，后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英国遂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1867年10月，由罗伯特·内皮尔将军率领的英国远征军从印度跨海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侵略军兵力达32000人，拥有一支由2538匹马、16022头骡、5733头骆驼、7071头牛和44头大象组成的辎重队，在军队数量、装

R.Pankhurst, op.cit., p.11.

A.H.M.Jones & E.Monroe, op.cit., p.127.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 vol.5, p.75.

备等一切方面都占有压倒优势。英国侵略军在泽拉港登陆后，越过达纳基尔荒原，进入高原地区。提格雷、戈贾姆等地的封建主早就脱离了西奥多的统治，此时竟对英国侵略军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同侵略者通曲纳款。

在同英国人和平谈判的希望破灭后，为了进行最后一搏，西奥多二世下令焚毁冈达尔，将剩下的数千名军队全部集中到马格达拉平顶山要塞。1868年4月10日，双方在马格达拉展开激战。这是英军入侵埃塞俄比亚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在2000名英军士兵的攻击下，西奥多的军队迅速溃散。加拉人指挥官贝希尔又临阵叛变。4月13日，英军攻陷马格达拉，西奥多兵败自戕，宁死不屈。

西奥多二世的败亡，标志着近代埃塞俄比亚统一国家建设的第一阶段的终结。它表明，在19世纪，像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非洲国家，要想实现统一和进步的变革，不仅会遇到封建守旧力量的反抗，还会特别引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敌视与干涉。

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事业虽然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但他建立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和教会势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恢复国家和平与正常的经济生活，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西奥多败亡后，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报复性破坏。他们将埃塞俄比亚的大炮炸毁，把城堡烧掉，并劫掠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西奥多皇帝的皇冠。英国人还抓走皇后和皇子。皇后在途中病故，皇子客死英伦。

埃塞俄比亚重新陷入内乱与混战的局面。提格雷的大封建主卡萨、瓦格地地方的戈巴兹和绍阿的孟尼利克群雄逐鹿，互争雄长。不过，这三大封建集团都不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以再次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例如，提格雷的卡萨就明确表示，他只统治了提格雷，或者说埃塞俄比亚王国的三分之一。这种放眼全国的眼光就是西奥多的统一和改革的历史产物。

1872年，提格雷的卡萨击败戈巴兹，三足鼎立演化为两雄对峙。这一年，卡萨正式加冕称帝，号约翰尼斯四世。他与绍阿的孟尼利克达成妥协，划定了南北双方的势力范围。同时，两家联姻，约翰尼斯四世之子娶孟尼利克之女为妻，由此进一步调整了彼此的政治关系。

在约翰尼斯四世统治期间（1872—1889年），埃塞俄比亚面临着越来越险恶的外部国际局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加紧了他们在东非之角的扩张与争夺。

其中，英国人捷足先登。还在1867年英国侵略军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提格雷的卡萨就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据记载，甚至英国人在看到这支大军的军容和装备之后，在继续向马格达拉进兵时，都失去了原来那种趾高气扬的自信。然而，这位拥有重兵的卡萨在大敌当前时，却采取了同侵略者合作的态度。为此，内皮尔在事后赠给他12门大炮和725支步枪，作为礼物。卡萨称帝后，也一直保持着同英国人的友好关系。英国则利用这个关系，大肆向埃塞俄比亚渗透和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在约翰尼斯四世统治期间，英国的商品渐渐充斥于这个国家。英国还获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种植棉花和咖啡

R.Cornevin, HistoireDeL'Afrique (《非洲史》), Paris1966, p.204.

S.Rubenson, op.cit., p.270.

R.Greenfield, op.cit., p.86.

R.Greenfield, op.cit., p.16.

的租让合同。这些都是有损于埃塞俄比亚民族利益的。

不过，在抵抗埃及人和意大利人的入侵方面，约翰尼斯四世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875年，埃及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次进攻失败后，好大喜功的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不甘心就此止步，再次派遣其子统率两万大军，大规模侵入埃塞俄比亚。面临这一严重局势，约翰尼斯四世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并获得了包括孟尼利克统治下的绍阿在内的全国响应。1876年，双方在古拉地区激战，埃及人溃不成军，从此被迫打消染指埃塞俄比亚的妄想。

抗击埃及的战争有着双重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这次战争唤起了埃塞俄比亚民族在外敌入侵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感情，而这种民族精神仅仅在十年前英国人入侵的那场战争中还是异常微弱的。这种民族团结、保卫祖国的精神，为埃塞俄比亚近代统一国家的形成奠下又一块基石。在一定意义上，这次带有全民族色彩的抗战，可以看作是后来1895—1896年抗意卫国战争的一次演习。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不仅仅是同埃及人的冲突，因为在埃及人和伊斯梅尔的背后另有复杂的背景。自从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因列强武力威胁而失败后，埃及便一步步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埃及半殖民地化更急剧加深。就在两埃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1876年，埃及已被迫宣告财政破产，由英法两国接管了它的财政大权，实行双重监督。这样，英法殖民主义者实际上已控制了埃及。伊斯梅尔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主观上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的表现，客观上却符合英法两个殖民主义国家强化对红海地区乃至东北非的控制、确保苏伊士运河安全的战略利益。因此，约翰尼斯四世力挫埃及的入侵，客观上抵制了英法在东北非地区某种形式的扩张。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意大利加紧了对埃塞俄比亚及整个东北非地区的殖民扩张。1882年，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港口阿萨布；1885年，又进一步占领了红海上的重要港口马萨瓦；此后，更不断向内陆地区蚕食。英国为了削弱自己的主要对手法国，在东北非地区纵容意大利人的侵略活动。为此，英国还特别派遣杰拉尔德·波特去见约翰尼斯四世，要求他把沿海地带割让给意大利。约翰尼斯四世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责备英国人背离了他们以前曾允诺过的将埃及人撤出的地方交还埃塞俄比亚的诺言。在致书维多利亚女王时，约翰尼斯四世宣称：“我的士兵众多，长矛已经备好。意大利人想要战争，……让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藏在洞里躲避他们。”1887年意大利侵略军从沿海向内地蚕食时，约翰尼斯四世果然率兵北上迎敌。著名的爱国将领阿卢拉公爵还曾指挥部队歼灭意军一部，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在英国怂恿意大利侵略的形势下，面对着狼狈勾结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约翰尼斯四世坚持了民族立场。这种维护民族尊严的作为，对于促进埃塞俄比亚近代民族观念和民族感情的凝聚，无疑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由于一直面对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内部地方势力的骚动，约翰尼斯四世基本上无暇顾及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建树。他的统治时期，可以说是由不断的战争所组成的。所以约翰尼斯四世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只能是

一位“战士皇帝”。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意大利人从红海沿岸不断内侵的同时，埃塞俄比亚西部边界形势再一次发生危机。马赫迪大起义在东苏丹地区导致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封建神权国家的出现。在攻陷喀土穆、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后，其上层领袖迅速蜕化为封建主集团，对外也向埃塞俄比亚西部地区盲目扩张。兵锋所至，曾焚毁埃塞俄比亚首都冈达尔。约翰尼斯四世致书马赫迪国家的统治者，要求弭兵罢战，遭到拒绝。马赫迪起义爆发后，英国人不断鼓动约翰尼斯四世与起义者为敌。苏埃双方都为扩展疆土而冲昏了头脑。1889年，约翰尼斯四世率领大军同马赫迪作战，因重伤死在加拉巴特战场。

约翰尼斯四世阵亡后，实力最强的绍阿统治者孟尼利克即“万王之王”位，号孟尼利克二世。

第十六章 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变迁

19 世纪初至 70 年代，东非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出现了较大变迁。

在沿海地区，阿曼素丹赛义德·萨伊德铲除了以马兹鲁依家族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并基本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后，迁都桑给巴尔，东非沿海地区成为阿曼的统治重心。萨伊德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当地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19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进入东非沿海地区，力图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1856 年萨伊德去世后，西方的殖民活动进一步升级。1860—1870 年代，东非沿海地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在东非内陆，长达 300 年的民族迁徙基本结束。内陆居民的大量增加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发展。19 世纪，内陆相继出现了一批组织甚好的部落联盟和国家。内陆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沿海地区和内陆的贸易不但开通，而且日益发展起来。

一、萨伊德加强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

1807 年，赛义德·萨伊德（1791—1856 年）在阿曼的权力角逐中获胜，继任阿曼素丹。他上台之初，东非沿海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 18 世纪阿曼国内权力之争迭起，内乱不休，因而放松了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当地的一些总督和素丹乘机扩充实力，建立山头，有的甚至公开拒纳贡税，宣布独立。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除桑给巴尔、马菲亚和基尔瓦等地外，蒙巴萨、拉木群岛和奔巴岛等多处地区已脱离阿曼管辖。同时，英法等西方列强对东非沿海地区所表现出的日益浓厚的兴趣，使纷乱的形势更加复杂化。显然，任凭局势发展，萨伊德就有失去东非沿海地区的可能性。因此，他在稍事稳定了阿曼政局后，便把注意力转向东非沿海地区。

萨伊德在东非沿海地区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马兹鲁依家族。这个家族原居住在阿曼的拉斯太克和萨马依尔一带，17 世纪末，该家族成员参加了攻占蒙巴萨的战斗并被任命为首任驻蒙巴萨总督。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马兹鲁依家族一方面动员阿曼本土的族人迁居蒙巴萨，仅 18 世纪，就有 14 家马兹鲁依人迁往东非；至 19 世纪初，蒙巴萨的马兹鲁依人已相当可观。另一方面，马兹鲁依家族拉拢当地的克林迪尼部落联盟，迅速扩大统治势力。马兹鲁依家族势力的膨胀引起了阿曼方面的不安，历任素丹都力图遏制其势力的扩展。1729 年后，阿曼素丹连续两次任命非马兹鲁依家族成员为蒙巴萨总督；1740 年代，又派人暗杀了马兹鲁依人总督，然而这些措施并不奏效。自 1731 年后的一个世纪，马兹鲁依家族不但垄断了蒙巴萨总督的职位，而且不断向外扩展。18 世纪末，马兹鲁依家族的势力已北抵马林迪，南达潘加尼。1804 年，该家族公开拒绝向阿曼称臣纳贡，打出了独立的旗号。萨伊德继位后，他们于 1814 年派人送去一份带有挑衅性的“礼物”：一件铠甲、一些火药和子弹。这份“礼物”表示：如阿曼发兵攻打蒙巴萨，将遭迎头痛击。马兹鲁依家族强化武装力量，储备军火，摆出与阿曼素丹分庭抗礼的姿态。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萨伊德与马兹鲁依家族交手的第一回合在拉木群岛展开。拉木群岛主要由拉木、帕特和曼达三岛组成。早在 18 世纪中叶，马兹鲁依家族就开始向拉

木群岛渗透。帕特岛的编年史记载道：“马兹鲁依人企图占领帕特岛和拉木岛，……但眼下他们尚无力如愿，因此他们佯作友善，私下却盘算着：‘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夺取之。’”1807年，帕特岛素丹福莫马迪去世，岛上为争夺继承权而爆发内战。马兹鲁依家族趁机插手，于1810—1811年派兵支持阿哈默德一派。反对派战败，其首领弗莫罗梯被俘后囚禁于蒙巴萨，其余残存势力逃往拉木岛。蒙巴萨军队尾随追击，力图全歼。拉木岛军队在谢拉一战阻止了蒙巴萨军队的进攻，然而拉木岛素丹担心马兹鲁依家族卷土重来，只得被迫向阿曼素丹求援。萨伊德抓住时机，立即派一名总督率军进驻拉木岛。不久，帕特岛居民不满马兹鲁依家族的统治，反对派势力再次抬头，他们派代表赴阿曼请求援助。于是萨伊德发兵帕特，击败了蒙巴萨军队，并占领了该岛。在短短十余年里，萨伊德两度用兵，先占拉木，再夺帕特。1824年，他正式向拉木群岛派出总督和驻军，这表明他已完全控制了群岛。

首战告捷后，萨伊德利用有利形势继续扩大战果。1822年，他利用马兹鲁依人总督每年一度回蒙巴萨述职之机，命令阿曼驻桑给巴尔总督出其不意地率兵攻占了奔巴岛。马兹鲁依家族两次全力反击，但都无功而返。萨伊德抓住战机，直捣马兹鲁依家庭的大本营蒙巴萨。马兹鲁依家族见势不妙，竟不惜引狼入室，乞救英国提供保护，允诺向英国交纳蒙巴萨出产的一半产品，包括象牙、龟壳、面粉、牛、羊、大米和谷物等。1824年，英国殖民者欧文率军进驻蒙巴萨。英国殖民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两年后英军被迫撤出。1828年，萨伊德派军围困蒙巴萨，并于次年占领该地。在以后的十余年中，马兹鲁依家族虽几次反扑得手，但最终于1837年被彻底击溃。从此，马兹鲁依家族的势力完全覆灭了。

在围剿马兹鲁依家族的同时，萨伊德派兵前往姆里马海岸地区、布腊瓦和马尔加等地，迫使当地素丹或酋长称臣纳贡。至19世纪30年代后期，萨伊德已基本控制了北起摩加迪沙、南至德尔加多角的东非沿海地区。

为了稳固东非沿海地区的政局，萨伊德采取了各种措施。

首先，他把统治重心转移到东非沿海地区。1828年，萨伊德首次亲临东非视察；次年，他把大部分财产和家具运往桑给巴尔。1840年，他正式把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往桑给巴尔。在萨伊德统治的后半期，他虽还不时回阿曼本土，但大部分时间留在东非沿海地区。统治重心的转移，使萨伊德有更多机会了解东非沿海地区，及时处理各类问题，同时也加强了对当地总督和素丹的监督，从而强化了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

其次，萨伊德加强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武装力量。他从阿曼本土招募兵员，建立一支常规军。1840年代，这支常规军为400人（而同一时期阿曼本土的常规军才300人）。为增强军队战斗力，萨伊德从西方进口大量武器，如滑膛枪和加农炮等。仅首都桑给巴尔，就筑有炮台21座，加农炮50门。东非沿海地区濒临印度洋，海上武装力量显得格外重要。为此，萨伊德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海军。1830年代，这支海军有大船16条、小船90条，每条船

C.S.Nicholls, *The Swahili Coast;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rade on the East African Littoral, 1798-1856* (《斯瓦西利海岸；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外交和贸易》), London 1971, p.68.

C.S.Nicholls, *op.cit.*, p.132.

萨伊德在桑给巴尔的时间是1831年12月—1832年9月、1833年11月—1835年、1837年初—1839年9月、1840年12月—1851年4月、1852年12月—1854年4月。

上配备 4—74 件不等的火器。除上述武装外，若遇战事，萨伊德可武装奴隶以应急需，同时，他可向阿曼本土征集雇佣军。关于征兵人数，说法不一，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萨伊德当时的财政状况而定。大体上说，他一次可从阿曼征兵 15000—20000 名左右。

再次，萨伊德鼓励阿曼阿拉伯人移居东非沿海地区。以桑给巴尔为例，1804 年，当地仅有阿拉伯人 300 名；1819 年达 1000 名；1848 年上升到 3000 名；1856 年萨伊德去世时，已猛增到 5000 名。萨伊德引入阿曼的传统管理制度，把居住在东非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编入各部落。每逢重大决策，他必定召集阿拉伯部落酋长和部落显贵，倾听他们的意见。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的官职。因此，阿拉伯人数的增加，无疑拓宽了萨伊德统治的社会基础，加强了统治集团的力量。

二、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萨伊德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后，并没有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他袭循旧例，仍然保留了各地的素丹、酋长及传统制度。对重要城镇，他派驻总督和少量驻军。

在萨伊德统治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高踞塔顶，以斯瓦希里人为主体的农民、渔民和传统手工业者位于中层，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奴则被压在最低层。

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由阿拉伯统治集团成员和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演变而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公元前就在东非沿海地区活动，经营的主要项目是黄金、象牙、龟板和香料等。他们虽然也贩运些奴隶，但既未专营，亦非大量。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东非沿海地区后，把罪恶的奴隶贸易引入当地，揭开了东非奴隶贸易的序幕。1698 年后，葡萄牙殖民者虽然退出了德尔加多角以北的东非沿海地区，但奴隶贸易并未因此消失。法国为解决其印度洋上殖民地马斯克林群岛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于 18 世纪 20 年代渗入东非沿海，寻求黑奴来源。1776 年，法国商人莫里斯与基尔瓦素丹订约，规定每年由基尔瓦素丹供应 1000 名奴隶；条约有效期为 100 年。至 18 世纪后期，西方奴隶商人在东非沿海的活动已十分活跃。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出现了三四条船在同一地方为争购黑奴而你抢我夺的现象。奴隶供不应求，价格急骤上升，仅 70—80 年代，奴隶价格就上涨一倍。奴隶贸易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这种形势不但诱使和推动许多阿拉伯商人专营奴隶贸易，而且直接刺激了当地阿拉伯统治集团的贪欲，其中不少人积极参与、组织奴隶贸易，成为专业的阿拉伯奴隶商人。19 世纪初，西方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发起的禁止奴隶贸易也扩及东非，英国驻孟买和毛里求斯当局曾向萨伊德施加压力，迫其放弃奴隶贸易。萨伊德一度置之不理，并在给英国女王

Nicholls, op.cit., pp.256-257, 259, 262.

Nicholls, op.cit., p.265.

G.S.P.Freeman-Grenville e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东非沿海历史文选》), Oxford 1962, p.191.

维多利亚的信中表示：“废除奴隶贸易是您的愿望，……但我必须告诉您，若按此办理，这个地区将完全、彻底遭到毁灭。”然而，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萨伊德终于在1822年被迫签署了第一份禁止奴隶贸易条约，禁止阿拉伯奴隶商人向西方奴隶商出售黑奴。1822年条约使东非奴隶外销受阻，这就迫使阿拉伯奴隶商人寻找新的奴隶市场和出路。19世纪20年代末，一些奴隶商人开始创办种植园，把大量从内陆猎取的黑奴投入种植园，从事丁香、谷物和果类等产品的生产。于是，种植园主阶层形成了。显然，无论是奴隶商人或是种植园主，都是奴隶贸易的产物。

萨伊德是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总代表。他是东非最大的奴隶商人，他本人及其家族积极组织、参与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索丹提供了士兵和奴仆，每年为索丹提供了大量金钱。据估计，萨伊德每年从奴隶贸易中所获收益占其全部收入的1/4—1/2。萨伊德又是东非沿海地区最大的种植园主，本人占有种植园45座、奴隶劳动力上万人。1840年，他的种植园所生产的丁香占当地总产量的2/3；1845年占1/3。

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是官商一体，他们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如仅次于萨伊德的大奴隶商人和种植园主苏莱曼任桑给巴尔总督；马林迪地区最大的种植园主萨里姆两度担任马林迪总督，后又改任蒙巴萨总督。这个阶级又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以马林迪为例，它们占田22656英亩，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1/2以上。因此，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

以斯瓦希里人为主体的农民、渔民和传统手工业者是世代生活在东非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丝毫权力，社会地位低下。每年除向索丹交纳一定数量的税额外，还要无偿服劳役一个月（种植园兴起后，他们大多被送往种植园干活）。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大肆抢占当地农民土地；至50年代，桑给巴尔东部和西部由当地农民世代开垦耕作的沃田也被它们强行霸占。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奴大多是被奴隶商人捕猎的内陆居民，他们是奴隶贸易的牺牲品。黑奴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桑给巴尔为例，1811年黑奴占当地人口的3/4，1844年占4/5。由于非洲和阿拉伯社会传统的作用，东非沿海地区奴隶的处境比同时期的美洲奴隶要好些。他们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种植园奴隶可分得一小块土地，种菜收粮；家庭奴隶有的还外出经商，有的当铁匠、木匠和船员；奴隶积攒了钱财，可购买自己的奴隶。然而，在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冲击下，奴隶生活状况也日趋恶化。种植园主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加强了对奴隶的盘剥，超强度的劳动使大批黑奴早夭，死亡率高达22—30%。此外，奴隶只是主人的私产，随时都可能被转卖。因此，

Nicholls, op.cit., p.218.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3页。

F.Cooper, PlantationSlaveryontheEastCoastofAfrica (《东非沿海种植园奴隶制》)，Yale 1977, pp.50-51.

Cooper, op.cit., pp.50-51.

UNESCO, TheAfricanSlaveTrade fromtheFifteenthtoNineteenthCentury (《15—19世纪非洲奴隶贸易》)，Paris 1979, p.180.

Nicholls, op, cit., p.287.

Nicholls, op.cit., p.203.

黑奴们为了争取自由，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逃跑是东非沿海地区奴隶斗争的一种常用方式。尽管逃奴一旦被抓获，将重镣锁身、公开示众，但逃跑事件仍层出不穷。不少逃奴躲进山区，建立居留地，过着自由人的生活。除逃跑外，奴隶起义也时有发生。仅 1820 年代，桑给巴尔就爆发了两次奴隶起义，其中 1825 年起义坚持了三年之久，萨伊德不得不从外部召募雇佣军，并使用了放火烧林的野蛮手段，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萨伊德利用相对稳定的政局，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内外贸易。为了活跃当地商业活动，他鼓励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来东非经商。对于印度商人，他一改前任们排斥的态度，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比如，允许印度商人来去自由；允许他们享受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商品可与当地商人的商品一样，仅交纳 5% 的关税，而豁免其他一切杂税，等等。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印度商人。1819 年，桑给巴尔仅有印度人 200 名；1840 年代增加到 700 名；1850 年代末已达 5000—6000 名，超过阿拉伯人。擅长经营的印度商人在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开店设行，经商贸易，开展借贷业务，甚至承包海关。仅桑给巴尔一地，印度人开设的商店就占当地商店总数的 9/10。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商人把大量资金带入东非沿海地区，解决了当地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困难。阿拉伯商人或种植园主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印度人的金融贷款，甚至连萨伊德也不例外，他最多的一次向印商借贷达 5 万元之多。印度商人活跃了东非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

萨伊德注意开发东非自然资源。在他统治期间，传统产品的出口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以象牙为例，萨伊德一方面组织专门队伍捕杀野象，摘取象牙；另一方面则让商队深入内陆，收购内陆居民收藏的象牙。因此，在这一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象牙出口急剧上升。19 世纪初叶，当地每年出口象牙在 4—20 万磅之间浮动；至 50 年代末，已猛增到 48.86 万磅。除象牙外，椰子、龟板、和犀牛角等项目的出口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

在农业生产上，萨伊德根据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引进了甘蔗、丁香、桂皮和咖啡等经济作物。其中，丁香的經濟作用尤为引人注目。1819 年，丁香在东非沿海地区引种成功后，萨伊德首先在自己的庄园大规模试种。19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第一批收获的丁香立即被美国商人全部包购。萨伊德看到了丁香在世界市场上的前景可观，于是全力推广丁香生产。他甚至下令，每砍掉或种植一颗椰子树，必须补种三棵丁香树，违者将没收其土地。为推动丁香生产，萨伊德率先把自己的 45 座庄园改为丁香种植园，并把大批奴隶投入种植园，进行集约式生产。在这种形势下，丁香种植园发展迅速。至 19 世纪 60—70 年代，桑给巴尔岛已有丁香种植园 2296 座，奔巴岛也有 1000 座之多。丁香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迅速增加。1839—1840 年，丁香产量为 31.5 万磅，1849 年为 420 万磅，1856 年已达 500 万磅。十年时间产

Nicholls, op.cit., p.290.

N.R.Bennett, A History of the Arab State of Zanzibar (《桑给巴尔阿拉伯人国家史》), Cambridge 1978, p.37.

Nicholls, op.cit., p.291.元，系当地流通货币，约等于美元。

Z.A & J.M.Konczaek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ropical Africa (《热带非洲经济史》), London 1977, vol.1, p.224.

F.Cooper, op.cit., pp.69, 52.

量翻了四番，丁香成为东非沿海地区的又一重要产品。种植园经济很快从桑给巴尔、奔巴两岛扩散到蒙巴萨和马林迪地区，出现了大批以生产谷物和果类的种植园。1874年，马林迪每年谷物出口价达15万美元，被称为“东非的粮仓”。种植园经济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促进经济更快发展，萨伊德力图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本人对西方生产的机械产品颇感兴趣，专门收集了诸如钟表、音盒等产品，还派人赴法国学习制钟工艺。为了解西方工业生产情况，他派遣特使访问欧美。赴英特使返回后，萨伊德详细询问了有关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中心的生产管理、设备和技术等事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他曾计划建立汽轮传动的制糖厂和造船厂。然而，萨伊德发展工业的计划样样都需西方提供技术和设备，西方各国无意帮助东非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因此这类计划无一能如愿以偿。例如，为引进制糖技术，萨伊德曾求助法国人；法国方面提出了苛刻条件，要求他向法国租让土地，十年内对法国商品免税等。为引进英国制糖设备，萨伊德化了大量资金；然而英国人把设备运入桑给巴尔后，不愿提供技术，不久便扬长而去，设备缺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成了一堆废铁。建立制糖厂的计划几起几落，最终还是成为泡影。

萨伊德采取各种措施，使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对外贸易增长尤快。以对美贸易为例，1838年双方贸易总额为149590美元，1854年已达998528美元，短短16年内竟增长了5倍。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非沿海港口日益繁荣。1850年代，桑给巴尔港已有居民6—8万人，相当于邻近葡属东非首府莫桑比克人口的10倍，成为东非的经济中心和最大城市。

在政局相对稳定和经济较快发展的形势下，萨伊德力图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进而成为东非霸主。他利用阿拉伯商队的活动，向内陆渗透，其势力北抵维多利亚湖、南迄尼亚萨湖，并进入刚果盆地；他趁贝岛与马达加斯加之间发生冲突，把贝岛纳入他的势力范围。1842年，他曾向英国外交部试探，能否把领土向北扩展，越过摩加迪沙，延伸至哈丰角和伯贝拉一带。然而，由于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都隐藏着各种潜伏的危机，特别是欧洲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他充当东非霸主的计划是注定无法实现的：

首先，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都与西方殖民势力密切相关。奴隶商人在奴隶贸易的刺激下形成；种植园主则是适应西方殖民政策的变化，用奴隶劳动的产品代替奴隶出口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奴隶商人或是种植园主，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西方市场，并受西方殖民势力的制约。这种关系决定了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必然具有对内剥削黑奴、对外屈从西方殖民势力的特性。萨伊德在西方禁止奴隶贸易的压力下步步退让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据。进入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殖民势力对东非沿海地区发起了强劲的渗透。以萨伊德为首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无力抵挡，一味退让。因此，萨伊德对外扩张的势头将被完全遏制，而且东非沿海地区的独立也将遇到严重威胁。

其次，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脆弱，缺乏持久的活力，这具

UNESCO, op.cit., p.179.

Nicholls, op.cit., pp.332, 334.

Nicholls, op.cit., p.266.

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奴隶贸易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为萨伊德及奴隶商人一种植园主阶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1822年禁止奴隶贸易条约仅限制了奴隶向西方出口，并没有使东非奴隶贸易全面停止。相反，1822年后，奴隶贸易呈现急骤上升的趋势。19世纪初，东非沿海地区每年贩卖黑奴3000名；1820年代为6000名；1840年代已达15000名；在50和60年代，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原因，一是西方奴隶贩子采用走私、自由劳工移民等方式在当地继续从事奴隶贸易；二是东非沿海地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参见本卷第十章）。在这种形势下，奴隶商人的活动更加活跃。他们组织商队定期深入内陆，并在沿途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如塔波拉、乌季季等。贩奴商队到达内陆后，“煽动、有时甚至是直接帮助当地的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于是战俘便成了阿拉伯人的财产。在部落战争中，数千人被杀，或随后死于伤病和饥饿，村庄被焚毁，妇女和儿童被作为奴隶掠走”。贩奴商队足迹所至，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给内陆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极大摧残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贸易往来）与内陆有密切关系，因此，内陆的衰败必将直接导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并最终制约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二，东非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奴隶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奴隶人数不断增加。以桑给巴尔为例，1819年该岛有奴隶1.5万人，1835年为10万人，1859年已达20万人。奴隶劳动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脆弱的。随着西方禁止奴隶贸易的深入开展，东非经济必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其三，作为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其性质与同时期的美洲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有所不同，它是外部资本主义经济与当地传统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东非沿海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带有强烈的非洲传统经济的色彩。生产资料占有者仍然是传统的统治阶级（奴隶商人一种植园主阶级由传统的统治集团成员组成，它仍属传统统治阶级的范畴），奴隶作为生产者，其处境虽日益恶化，但传统地位仍没遭到完全破坏。种植园奴隶依然保存着自己的家庭经济，他们在主人分给的一小块土地上种粮种菜，自给自足。他们每周为种植园主干三天活，其余时间在自己的地里生产，其产品除维持生活外，多余部分可在当地市场出售。除此之外，种植园生产的产品仍有相当部分是以满足本地消费为前提。因此，这种种植园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成份。另一方面，东非沿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又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烙印。种植园生产的部分产品作为商品进入西方市场。以丁香为例，1859年桑给巴尔和奔巴岛生产的丁香有53%输往英、美、法、德诸国；1867—1868年虽有所下降，但还占35%。因

E.A.Alpers, *Ivory and Slaves* (《象牙和奴隶》), California 1975, pp.191-192; J.L.Liffe, *A Morde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近代史》), Cambridge 1979, p.42.

Beachey, *op.cit.*, p.21.

F.Cooper, *op.cit.*, p.56.

F.Cooper, *op.cit.*, p.62.

此，种植园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西方经济的起伏和原料价格的波动对当地种植园经济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例如，1830年代，每35磅丁香在西方市场的售价为10美元，1856年下跌至2—3美元。丁香售价急遽下降，使丁香种植园主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为追求利润，他们拼命扩大种植面积以提高产量；结果供过于求，又导致了丁香生产对西方市场的进一步依赖。必须指出，东非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虽然同时融合了非洲传统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成份，即同时糅合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从总体上分析，商品生产的规模有限，商品经济的色彩显得淡薄；相反，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显得更强劲有力。一些当时访问过东非沿海地区种植园的人这样描述：“他们的主要食品小米是自己生产的，油料是自己用芝麻和椰子榨制的，鱼很多，同时还养牛养鸡。……他们几乎不用花钱买东西。”“即便在困难的形势下，这个岛上（指桑给巴尔）最穷的种植园也能生产足够的食品和住房，以供主人和奴隶之用。”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以非洲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为前提和基础，显然，它无法成为滋生资本主义的肥田沃土，而把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入更高级的阶段。

总之，东非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是东非传统经济在奴隶贸易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渗透和冲击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因此，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大举入侵，非洲传统经济必将受到进一步腐蚀，并逐步演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最终被完全纳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的轨道。

三、东非沿海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早在19世纪初叶，英法等国就多次派人前往东非沿海活动。1820年前后，英法舰船频频游弋东非海域，勘察地形，绘制地图，收集各种情报。东非沿海地区丰富的物产，宜人的气候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西方列强垂涎三尺。英国殖民者欧文公开说：东非沿海地区“在葡萄酒上能与马德拉白葡萄酒媲美，在香料上能与马六甲香料匹敌，在棉花、咖啡、糖、油料和水果方面能同世界上任何同类产品相竞争。……这些新的资源应该为我国的商业和工业开放。”

西方以禁止奴隶贸易为名，揭开了对东非沿海地区殖民渗透的序幕。1822年，英国迫使萨伊德签署了第一份禁止奴隶贸易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可向当地派驻代表以监督条约执行情况。1824年，欧文以禁止奴隶贸易为由，率英国武装占领蒙巴萨。他沾沾自喜地说：“显而易见，这是上帝为英国统治东非作好了准备。”

1830年代，西方殖民渗透步伐加快。1833年，美国率先与萨伊德订立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英法于1839年和1844年如法炮制。上述条约内容大致相似。第一，美英法公民可在萨伊德管辖的所有港口自由出入，进行贸易，而当地官员不得在价格或其它方面进行干涉；第二，对三国商品仅征收5%的海关税，以此替代所有的进出口税、吨位税、贸易许可税、引水税等；第三，

P.Curtin, *African History* (《非洲史》), Boston-Toranton 1978, p.403.

F.Cooper, *op.cit.*, pp.97, 74.

R.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东非和它的侵略者》), Oxford 1956, p.228.

Coupland, *op.cit.*, pp.237-238.

三国政府获准在桑给巴尔开设使馆，派驻领事，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

依据条约，美、英、法领事分别于 1838 年、1841 年和 1844 年进驻桑给巴尔。在西方领事直接策划下，西方殖民渗透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西方领事上任后，大搞炮艇外交，用武力威逼萨伊德就范。法国领事曾公然说，要让萨伊德办成一件事，没有炮艇的出场是不可能的。英国领事对此大为赞同，他甚至振振有词地举例说，当英国炮艇“莉莉”号停泊在桑给巴尔港时，他与萨伊德讨论问题就容易得多了。美国领事则表示，美舰的来访能使萨伊德对美国的实力有个正确的概念。根据这种强盗逻辑，西方领事们纷纷要求本国政府定期派遣炮艇“访问”东非沿海，以炫耀武力。

除武力恫吓外，西方领事竭力拉拢当地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利用他们为西方殖民利益服务。美国领事到任后，积极培植亲美势力，在萨伊德身边形成一个亲美小集团。这个亲美集团与美领事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美领事去孟买时，也能通过萨伊德身边的译员得到所需情报。美领事利用亲美势力，勾结当地海关官员，一度几乎垄断了桑给巴尔的对外贸易。当地商人气愤地指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那末本地商人和印度商人的货物就会被海关扣留。商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出售货物，而只能卖给他们指定的人。如果美国船需要，那末应该首先满足美国人的要求。”英法领事不甘落后，各自培养亲本国的小集团和势力。亲法势力甚至把萨伊德的两个儿子卡立德和巴加什以及桑给巴尔总督苏莱曼等要人也网罗在内。

禁止奴隶贸易是西方（主要是英国）进行殖民渗透的又一手段。1822 年条约签订后，英国于 1839 年和 1845 年又两次强迫萨伊德签署进一步放弃奴隶贸易的条约。利用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英国从这些条约中捞到许多好处。比如，在查禁贩奴船的名义下，英国海军长期驻扎东非沿海水域，从而大大加强了英国在当地的殖民力量。另一方面，禁止奴隶贸易又使萨伊德的奴隶制经济大伤元气。奴隶贸易过去一直是萨伊德的重要财政来源，因而禁止奴隶贸易的深入开展使他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据萨伊德本人估计，他每年将为此损失 3.5—4 万美元，而英国政府只同意给予一次性补偿费 2000 英镑，得失差额相距甚大，使萨伊德在财政上遇到困难。在政治上，萨伊德所依赖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冲击下，日益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甚至连萨伊德的子女及家族成员也不例外）不甘忍受衰亡，全力反对禁止奴隶贸易。一位英国官员评论道：“素丹的属下对禁止奴隶法令熟视无睹，因为这些法令与他们的自身利益相抵触。”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离心力，无疑削弱了萨伊德的统治力量。为了维护其个人统治，萨伊德不得不进一步投靠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

至 1840 年代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加强，列强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它们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公开分裂东非沿海地区。以法国为例，1847 年 8 月，法国领事竟然派遣法国海军官员先后去布腊瓦和拉木等地，劝说当地素丹，让他们把这些港口卖给法国政府，但素丹们拒绝了这种要求。

萨伊德慑于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它们步步进逼的殖民

J.Gray, History of Zanzibar (《桑给巴尔史》), Oxford 1962, p.205.

Nicholls, op.cit., p.235.

Nicholls, op.cit., p.239.

J.Gray, op.cit., p.187.

渗透不敢坚决抵制。他乞求西方政府，幻想用撤换领事的方法来遏制西方的威胁。早在英国首任领事哈默顿上任不久，他就派代表赴伦敦，两年后又专函英国政府，表示对英国领事的不满，并要求英政府召其回国。萨伊德也采取同样措施，写信给美国总统，希望撤换美国领事。但萨伊德的幻想被严酷的现实一一击破，西方政府对他的呼吁置之不理或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萨伊德感到无路可走，他沮丧地表示：西方殖民势力“犹如死神的命令，我除顺从外已别无它法”。

萨伊德步步退让，西方列强得寸进尺。至 19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西方领事成了当地的太上皇。英国在当地的殖民势力最强，其领事态度也最为蛮横，他曾公开宣称：“萨伊德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权力仅仅是徒有其名而已。”当时有人评论说，英国领事实际上把萨伊德当作傀儡对待，英国外交部官员嘲笑萨伊德倒像一名英国总督。

自 19 世纪 3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这短短十几年内，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势力已逐步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在经济生活中，西方主要通过不平等条约，大量倾销西方工业品，掠走当地原料产品。据统计，1832 年 9 月—1834 年 5 月，进入桑给巴尔港的西方船只 41 条，载重量为 8000 吨；而至 1857 年，上述数字分别上升到 90 条和 27653 吨。在贸易中，西方商人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实行不等价交换，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大量西方商品充塞东非沿海地区市场，不但严重损害了当地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为把它沦为殖民地经济准备了条件。在政治生活中，西方殖民者有恃无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有的公然无视萨伊德的一再禁令，公开窜入萨伊德统治十分薄弱的姆里马海岸地区，从事殖民活动；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逍遥法外。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东非沿海地区的非洲人的主权和利益。

1851 年，一位西方人士调查后指出：“在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中间，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萨伊德去世后，继承人将由英国人来挑选，这个国家也将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历史的进程证实了这种看法。1856 年，萨伊德在自阿曼返回桑给巴尔的海路上病逝。其子马吉德在英国扶植下继任素丹。但马吉德的地位遭到了内外挑战。萨伊德第三子、阿曼素丹杜瓦因以东非沿海地区是阿曼属地为由，拒绝承认马吉德的素丹地位，并于 1859 年发兵征讨；萨伊德的另一子、长期生活在桑给巴尔的巴加什在一部分阿拉伯人支持下，与法国领事密谋后，企图举兵推翻马吉德，自立为素丹。英国见势不妙，动用武装力量，直接插手当地内政。英国军舰在海路上拦截杜瓦因军队，迫其返回阿曼；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桑给巴尔逮捕了巴加什，把他放逐到孟买。1861 年 4 月，英驻印度总督坎宁出面裁决，让东非沿海地区脱离阿曼，成为独立的桑给巴尔素丹国；它每年向阿曼素丹交纳 4 万元，作为阿曼放弃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补偿。1862 年 3 月，英法发表联合声明，接受坎宁裁决，分别承认阿曼和桑给巴尔素丹国。桑给巴尔素丹国的成立，标志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同时也宣布了东非沿海地

J.Gary , op.cit. , p.245.

Nicholls , op.cit. , p.239.

C.T.Brady , CommerceandConquestinEastAfrica (《对东非的贸易和占领》) , Salem 1950 , pp.98-99 ;

R.Couploud , op.cit. , p.316.

Nicholls , op.cit. , p.196.

区的半殖民地化。

1870年，马吉德去世，巴加什继任素丹。他上台才一年半，一场飓风横扫桑给巴尔岛，毁坏了岛上的丁香种植园和停泊在港口的素丹船队。英国政府趁其内外交困，派代表团赴桑给巴尔，提出订立全面禁止奴隶贸易条约的要求。巴加什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无力顶住英国压力，被迫订约。这个条约遭到了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顽强抵抗，各地不断出现叛乱，政局十分动荡。巴加什依靠英国军队，才平息了各地动乱。1877年，英国领事建议巴加什组织一支新军，并推荐英国军官马修斯担任教官。英国借此控制了桑给巴尔素丹国的武装力量。东非沿海地区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四、东非沿海与内陆地区

在东非内陆，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贸易的发展，商道的逐步形成（详见本卷第六章），以及恩哥尼人迁徙的渐渐中止，东非各族的动乱开始停止（详见本卷第十八章）。十九世纪上半叶，除已有的湖区国家之外，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组织。

在乌桑巴拉山区，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了香巴拉人国家，至19世纪，其领土北起乌姆巴河、南抵潘加尼、东至印度洋。在19世纪40—60年代的香巴拉国王金韦里统治时期，政府初具雏型，国王之下设有第一大臣、军队司令和国王私人卫队长等职。由于香巴拉国家的各种制度尚不完备，因此在金韦里去世后，很快分裂成若干部落联盟。

居住在桑巴拉以南的齐古阿人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有些酋长已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较著名的有伯瓦纳·赫里。

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的西部和南部的查加族，在19世纪初开始形成一些早期国家组织。1800年左右，奥龙博借助帕尔人的铁矛武装其军队，征服了四周的部落，在乞力马扎罗东部山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查加人建立国家组织的一次尝试。奥龙博建立的国家没有完整的政治制度，他死后很快解体了。

1800年左右，查加族的奥里奥人征服四邻，建立了基博肖酋长国。至19世纪中叶，这个酋长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70年代初西纳即位时，国力强盛。西纳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派遣官员去各地进行管理，任命酋长，并选派特使去各处视察，监督各级酋长和官员。

在查加族居住地区，除奥龙博、基博肖酋长国外，较著名的还有莫希酋长国。

在今坦桑尼亚中南部，居住着赫赫族。19世纪中叶后，穆尼古姆统一了该族居住的北部地区。70年代末，姆克瓦瓦继承父业，他让家族成员和亲信担任各种职务，以维护其统治。他对外征战，不断扩大疆土。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亚姆维齐人。进入19世纪后，尼亚姆维齐人建立了一些酋长国，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兰博建立的国家。米兰博是一位酋长的儿子，年轻时在恩哥尼人中生活过，熟知他们的军事组织方式。他模仿恩哥尼人组建同龄兵团，并征服了周围一些酋长国。他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塔波拉通往乌季季的商道。

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东非内陆的经济得到发展。在肯尼亚地区，吉库尤人的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分离，出现了专事制造、出售铁器和陶器的手工业者。

在坦桑尼亚，生产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铁、铜和盐成为当地贸易的主要项目；在桑巴拉地区，还出现了小羚羊皮、山羊皮和牛的定期集市。在布干达和大湖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明显提高，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产项目：布干达南部出产谷物和鱼类；布尼奥罗生产盐和布；布干达中部生产木材、芦苇和草；还有些地区生产铁器、陶器和服装等。

东非内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内陆地区间贸易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沿海和内陆的直接贸易。

19世纪前，东非沿海和内陆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虽然内陆和沿海的产品时有交流，但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内陆地区的转手贸易网而实现的。19世纪初叶，尼亚姆维齐人首先打通了自内陆至沿海的商道。1830年代，沿海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也组织商队深入内陆。于是，沿海和内陆的贸易日益发展起来。

在沿海与内陆的贸易中，内陆各族居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尼亚姆维齐人在内陆地区间贸易中一直十分活跃，早在18世纪，他们已进入乌干达和卢旺达地区；19世纪初，他们又出现在沿海地区。据口头传说，首批到达沿海地区的尼亚姆维齐人发现当地市场上象牙价格昂贵，且需求量大，于是他们返回内陆，收集象牙，并定期运往沿海市场。尼亚姆维齐人参加对沿海贸易的人数十分可观，除各地酋长、巫医、猎象者自行组织商队外，大量青年也外出充任各类商队的向导、脚伕和其它服务人员。1850年代末，尼亚姆维齐人赴沿海的商队数超过了沿海进入内陆的商队数，贸易已成为该族人民生活中重要内容。

除尼亚姆维齐人外，坎巴人也积极投入这种贸易活动。坎巴人居住在现肯尼亚的马查科斯和基图伊地区，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他们饱尝干旱和饥荒之苦，只能经常外出谋生。这使他们熟悉四邻地区，并和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1836年的大饥荒后，许多坎巴人流入靠近沿海的拉拜。在那里，他们接触了阿拉伯商人，并得知阿拉伯商人十分需要象牙，但又担心受马萨伊人的袭击，因而不敢进入肯尼亚内陆。坎巴人抓住良机，利用他们与内陆的广泛联系，从1840年代起，充当了肯尼亚内陆与沿海地区贸易的中介商，他们在肯尼亚内陆各地收购象牙及其他产品，然后贩运到沿海市场出售。至1860年代，坎巴人几乎垄断了这类贸易活动。克拉普夫于1848年指出：坎巴人商队每周抵达沿海市场，带来10500—14000磅象牙。据他统计，坎巴人商队大约由300—400人组成。

随着内陆与沿海贸易的发展，内陆各族人民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种活动。当然，大部分内陆居民与尼亚姆维齐人或坎巴人不同，他们并不直接把产品运往沿海市场，而是与来当地的内陆商人或沿海商人进行物物交易。

自1830年代起，沿海地区的阿拉伯商人或斯瓦希里商人开始日益频繁地进入内陆。1830年代末，他们进入坦噶尼喀湖区。1844年，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出现在布干达；此后，他们的足迹一直延伸到大湖地区，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商路沿途建立了贸易据点。以乌尼亚尼耶姆贝为例，这座由阿拉伯商人在1850年代建立的商业据点内居住着商人、木匠、泥水匠及其他手工业者，他们为过路商人提供仓库、食品和其它服务。阿曼素丹对进入内陆的商人和商队发放通行证，也得到内地各族统治者的保护。

在内陆与沿海的贸易中，沿海向内陆提供布匹、棉织品、念珠、铜线和火器等，而内陆则向沿海输出象牙、犀牛角、树脂和畜产品，提供发展种植

园经济的奴隶劳动力。

内陆与沿海的贸易沟通了彼此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相互了解，对东非的历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十七章 马达加斯加的统一和改革

马达加斯加岛进入 16 世纪以后，社会的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先后出现了一些奴隶制王国。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和抗击外族入侵的需要，马达加斯加逐渐统一于伊默里纳王国。在拉达马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了近代化改革，引进欧洲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腊纳瓦洛纳一世统治时期，为捍卫民族独立，成功地抵制了西方的殖民入侵。至 1863 年拉达马二世被政变推翻时止，马达加斯加经历了近代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分裂走向统一，社会生产力水平出现较大发展。

一、统一前的马达加斯加

19 世纪以前，马达加斯加岛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已建立奴隶制王国，如中部高原地区的默里纳人，西部沿岸的萨卡拉瓦人等；有的建立了部落联盟或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还有些地区仍处于原始公社阶段，如南端的牧民马哈法利人和安坦德罗伊人等。

默里纳人约在 14 世纪建立了伊默里纳王国。根据传说，在女王兰吉诺（约 1500—1520 年在位）统治时期，长子继承制被确立下来，王位世袭。她的继任者是长子安德里亚马内洛，他开始了伊默里纳历史上的安德里纳王朝时期，结束了“霍瓦”（Hova，意为平民、自由民）统治时代。在他统治下，掌握了炼铁技术，制造铁制武器，如标枪、弯刀和斧子，用它们装备和训练了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军队，彻底战胜了当地的瓦赞巴人，巩固了伊默里纳王国。此时的首都设在阿拉左腊，它实为一所村庄，修建在一座小山上，四周被壕沟和城墙环绕，仅留有一个出入口，人们每到夜晚用一块巨大的圆石滚到门前堵死。山丘上除了住房外，尚有可灌溉的水稻梯田，土地仍然按照习惯由农村公社分配。社会被分成三个等级：贵族占有大片土地和奴隶，享有免税特权，他们主要由国王的宗族成员和亲信组成；平民称为自由民，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商人；奴隶被称为“安德沃”，他们分三类：一是战俘及其后代，二是因负债、犯法而沦为奴隶的霍瓦及其后代，称“扎扎—霍瓦”，三是输入的黑奴及其后代。

在安德里亚马内洛的继任者拉兰博（约 1575—1610 年在位）统治时期，大力发展同西部地区萨卡拉瓦人的贸易，用大米、牛和奴隶为默里纳人换回了第一批武器弹药。在贸易中开始使用货币哈西那（意为“神圣化”），一个哈西那的重量相当于一粒米重的银子。由于稻米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拉兰博着手组织在平原地带种稻，修建水利工程，把河水引进稻田。为了保持门第的纯洁性，拉兰博推行贵族阶层的族内婚制度，他自己便娶了嫡系侄女为妻。王国的疆界得到扩大，从伯扎诺扎诺东面的森林到安卡腊特腊的支脉，从阿纳拉曼加到阿姆博希威塔卡腊特腊，并在阿姆博希德腊比比建立新都。据说伊默里纳王国的名称也是由拉兰博命名的，此后该国的居民便称“默里

又称拉福伊（Rafohy），参见 P.U.Mutibwa, *The Malagasy and the Europeans*（《马尔加什人和欧洲人》），Makerere 1972, P.6.

一说 1575—1615 年在位。Mutibwa, *op.cit.*, p.7.

纳”人。

拉兰博去世后，安德里安贾卡（约 1610—1630 年在位）继任为安德里纳王朝第三任国王。在位期间最辉煌的业绩是派兵占领了阿纳拉曼加，并改名为塔那那里佛（tananarivo，意为“千人地”），以纪念驻扎在这里的 1000 人的军队，随后迁都于此，这里成为伊默里纳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在他之后的统治者安德里亚戚塔卡特兰德里安纳，由于无能，被以兰德里亚马姆潘德里为首的贵族废黜，改立他的弟弟腊扎卡纳瓦郎达姆博，即安德里亚马集纳瓦洛纳（约 1670—1700 年在位，意为“神圣的领主”）。

安德里亚马集纳瓦洛纳通过组织一支独立的奴隶军队，征服中部高原地区那些不驯服的小国国王，并用联姻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伊默里纳王国的统一。但是，在其晚年又把王国分成四块，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治理。结果在他死后王国陷入内战，四个儿子及其继承人为争夺王位进行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混战，国力由此受到削弱，并常常受到四邻其他王国的攻伐。

到 18 世纪下半期，在马达加斯加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国家或酋长国。在东部，安通纪尔湾附近的扎芬德腊米左阿族在 17 世纪末建立贝希米萨拉卡王国，一度控制了安德沃兰托、大马达威、富耳普恩特和费内里夫等沿海地区，国王是腊赫纳公主与英国海盗之子腊戚米拉霍；在东南沿海的温甘德拉诺地区，16 世纪晚期安德利阿米萨拉建立了泰萨卡王国；在南部，巴拉人在 16 世纪上半期在拉巴拉塔沃科卡领导下建立了巴拉王国，至 17 世纪初，巴拉王国已控制了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在西部，萨卡拉瓦人在 17 世纪后半期建立了默纳伯和博依拉两个王国，强盛时控制了乌尼拉希河以北的整个西部地区，占全岛的一半。

默纳伯王国的创立者是安德里安达希福戚，他不断向北扩张自己的版图。1663 年派军队袭击了圣奥古斯丁湾，击败并处死了当地三名大酋长，至 1666 年向北已扩展到萨迪亚。据法国人德斯布罗瑟在 1671 年看到的情形，国王拥有 120000 头牲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人数多达 12000 人。约在 17 世纪 80 年代，安德里安达希福戚去世，王位由长子戚马龙加里福继承。次子戚马拉东那在贵族的支持下，率领一支萨卡拉瓦人军队继续向北挺进，最后征服了西北海岸，在 17 世纪末建立了博依拉王国。在萨卡拉瓦人扩张过程中，从欧洲奴隶贩子手中换来的枪枝弹药起了重要作用。早在 16 世纪初，欧洲人便来到马达加斯加西海岸贩运奴隶，此时他们用枪枝弹药换取奴隶运往巴西、加勒比地区和北美。1719 年，默纳伯国王已拥有 4000—5000 名配备滑膛枪的战士，他们的使用技能非常娴熟，竟令来此的荷兰船员大为吃惊。到 18 世纪中期，博依拉国王在沿海修建的一个要塞竟配备了 30—40 门火炮

默里纳（Merina）源于马尔加什语词根“埃里纳”（erina，突出的、高的），意为“高地人”，伊默里纳即“高地人之国”的意思。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4，p.467.

后改名为腊马罗马诺姆波，所建王国又称腊马罗马诺姆波王国。参见赖芒德·腊伯马南扎：《马达加斯加》，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31 页。

R.K.Kent，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1500—1700（《马达加斯加的早期王国》），New York 1970，p.200.

Gwyn Campbell，Madagascar and the Slave Trade，1810—1895（《马达加斯加和奴隶贸易》），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no.22（1981），p.205.

。默纳伯和博依拉两国的统治者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对欧洲人输入的枪枝严格控制，特别是禁止运往中部的伊默里纳王国，这点也许是 19 世纪以前默里纳人不如萨卡拉瓦人强大的一个原因。

萨卡拉瓦人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扩张过程中，由于在被占领区夺得大量牲畜，畜牧业在默纳伯和博依拉日益兴盛，相反，原有的混合农牧业经济却衰落下去。占有牲畜头数的多少成了衡量国王富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英国人德罗里曾在戚马龙加里福国王的畜牧场看到有成千上万头牲畜；国王的一位老牧官过着优越的生活，拥有 8000 头牲畜和 300 名奴隶。戚马龙加里福还用占有的牲畜奖励有功之臣和那些从其他地方投奔过来的人。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使萨卡拉瓦诸王国富裕一时。1741 年，荷兰奴隶贩子赫米在博依拉王国首都马罗沃依发现有数千座房子，人口非常拥挤；王宫比开普总督的城堡还要大，内有几所仓库，藏着几百个装满了各种物品的箱子和碗橱；还有一些派兵看护的房子，里面藏有枪炮、宝石、各种银器，珍贵的花瓶，以及一个由法国商人专门从中国带来给国王的御座。萨卡拉瓦人的军事扩张使西部沿海地区原有的贸易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奴隶贸易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默纳伯和博依拉的国王们不断地用战俘同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交换枪枝、布匹、彩色玻璃饰品和黄金等物品。到 18 世纪晚期，马达加斯加岛尽管被分成许多彼此独立的王国和部落联盟，但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通过联姻、迁徙、战争和交往，在语言、风俗习惯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为全岛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萨卡拉瓦人、默里纳人、马哈发利人，伯威列奥人和安塔诺西人等族虽然生活在岛上的不同地区，但他们说的是不同方言的马尔加什语。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生产部门，种植小米、芋头、白薯、香蕉、各种豆类和水稻，使用锄头和耕牛，狩猎、捕鱼和采集只是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居住的房屋基本上是尖顶长方形的草屋，坐北朝南，大门向西。在穿戴上，男人腰间缠布，外穿长袍，妇女穿紧身衣，质地有棉的和丝的，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有用芦苇叶子编织而成的。他们使用的容器包括陶器、葫芦，以及竹、木做成的桶、瓢等。他们搬运货物用肩扛，这有别于非洲许多地区用头顶物品的方法。在信仰方面，除了承认造物主扎拉巴里外，他们普遍供奉祖先神灵，社会生活方式按祖先的习惯确定，并且使用源于阿拉伯人的泥土占卜法预言吉凶。

在商业活动方面，随着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业）和冶铁业的发展，马达加斯加的内外贸易得到了发展。除了沿海地区原有的同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贸易外，内地也出现了一些定期集市和长途贩运，后者以贩运牲畜和食盐为主。局部地区还由此产生了商业城镇，如博依拉王国的马仍加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在此经商的不仅有本国的阿拉伯化的商人，还有来自东非、科摩罗以及阿拉伯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后裔。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是促进国家统一的一个内在因素。

促使马达加斯加统一的外在因素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欧洲人抵达马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vol.4 , p.46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vol.4 , p.464.

G.Grandidier , Collection des Ouvrages Anciens Concernant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古史汇编》) , Paris 1903 , vol.6 , pp.114-117.

达加斯加始于 16 世纪初。1500 年，一艘葡萄牙船在去印度的途中被风暴吹到这里。1524 年，两艘商船上的法国人在该岛登陆，被当地人击退。1540 年，葡萄牙人曾在沿岸建立商站，从事传教和奴隶贸易，1548 年被驱逐。荷兰人在 1598 年占领毛里求斯岛后，为了掳掠奴隶，也曾一度袭击马达加斯加沿岸地带。1591 年，英国船第一次驶抵马拉加斯加；1640 年左右，约有 400 名英国人企图在沿岸建立殖民地，后被歼灭。至此，在 100 多年时间里，欧洲人在马达加斯加人的抵抗下没有在岛上建立牢固的据点。但从 17 世纪中叶起，由于英、法、荷等国在印度洋上的殖民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好望角至印尼航线的开辟，欧洲前往亚洲船只日益增多，马达加斯加在东西航线上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法国率先想侵占马达加斯加，作为它向印度洋扩张的基地。1643 年，法国通过东方公司占领了南部的多凡堡，并沿着海岸向北扩张。1648 年，公司派弗拉库尔任这里的殖民总督，该人后著《马达加斯加岛史》（1658 年），为法国全面入侵马达加斯加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地图和详细的资料。1644 年东方公司改称法国东印度公司后，开始向岛上移民，屠杀土著居民，勒索贡赋。结果，激起了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武装反抗，1674 年将他们赶出多凡堡。一个世纪以后，法国试图再次占领马达加斯加，1768—1771 年莫达夫重新占领多凡堡，贝内奥斯基于 1774—1776 年在安通吉尔湾建立殖民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增强了马达加斯加人民团结御敌的意识；新式武器的输入，也为全岛迅速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马达加斯加的统一

18 世纪晚期，在内外因素的相互促进下，马达加斯加的统一已势所必然。当时存在着三股较大的统一势力，一是东部腊戚米拉霍建立的贝希米萨拉卡王国，试图从东部统一全岛；二是中部的伊默里纳王国；三是西部萨卡拉瓦人建立的诸王国。其中贝希米萨拉卡王国在 1750 年腊戚米拉霍逝世后，国家分裂，加上同博依拉王国之间屡次发生冲突，以及法国人的入侵和从事奴隶贸易，使国力受到削弱，一时无法统一全岛。萨卡拉瓦人建立的默纳伯王国和博依拉王国势力最强大，控制了整个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但是在 18 世纪后期也开始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萨卡拉瓦人建立的是一种军事国家，财富的激增靠的是征服战争中的掠夺，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一旦征服战争受挫或缺少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国王，就难免要走向衰弱。扩张势头很猛的博依拉王国在向东北部扩张时，受到了贝希米萨拉卡王国成功的抵抗，就此停止了萨卡拉瓦人的远征。从 1780 年起，博依拉王国的王位也开始由女王接任。与此同时，阿拉伯和印度穆斯林商人在宫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在 18 世纪末连国王也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削弱了萨卡拉瓦人传统宗教对王权的支持，国内离心倾向增大。此时，中部高原地区的伊默里纳王国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

在 19 世纪以前，伊默里纳王国所占的面积不足全岛的 1/20，军事力量也不如萨卡拉瓦人强大，并常常受到他们的入侵。但是，伊默里纳王国位于中部高原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从 17 世纪中叶起，这里便建立了一种

一说 1506 年。

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实行梯田集约耕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岛居领先地位。

约在 1783 年，分裂后的伊默里纳王国最东边的安博希曼加国王的侄子拉姆博阿萨拉马在平民（“霍瓦”）的支持下登上王位，取名安德里亚纳姆波伊默里纳（“伊默里纳心灵之主”），简称纳姆波伊纳（“希望者”）。他先同其他三个王国签订了为期七年的停战协定，以便从沿海购买枪枝，加强防御。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寻找宣战的借口，占领另外三国。1796 年，他占领了塔那那利佛，定都于此。经过四次战役后，他彻底征服了西南各族。到 1806 年，伊默里纳重新统一，恢复了以前的边界。接着，他又通过谈判和战争，合并了邻近的伊马莫和瓦基南卡拉特拉两个小王国，获得了自由穿过贝扎诺扎诺地区前往沿海的权利。在与西部强大的萨卡拉瓦人关系方面，他通过互相交换礼品，与博依拉王国女王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而中部的伯戚列奥人的几个主要王国则成了他的附庸。

在向外征服的同时，纳姆波伊纳也加强了自身的政权建设。首先，他强化王权，规定神圣的国王掌握最高土地所有权，领主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封地。氏族首领特别是那些拥戴他登上王位的首领成了王室顾问，但由于土地的重新划分，氏族的重要性已大大削弱。纳姆波伊纳还派遣使节去附属国，直接监督原有的国王行使管理权。未开垦的山丘和沼泽地被分配给参战的士兵，以取代过去瓜分战利品作为报偿的方法。在经济方面，国王实行土地改革，在国王管辖的六个区域里，根据人数多少平均分配稻田，定期交纳土地税；对于集市贸易，规定由国家管理，并统一了度量衡，规定了货币的交易及其使用规则；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纳姆波伊纳实行劳役制，修建排水和防洪等巨大水利工程，开发沼泽地。

纳姆波伊纳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伊默里纳王国在 19 世纪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被人们誉为“伊默里纳王国之父”。1810 年他病重弥留之际，把王国贵族和继承人拉达马叫到身边，要他完成自己未竟的统一大业。1810 年拉达马继位，称拉达马一世。早在他 16 岁时，父亲纳姆波伊纳为了训练他的作战能力，便让他率军进行远征。纳姆波伊纳去世后，各地相继发生叛乱，全国再次面临分裂的局面。拉达马迅速镇压叛乱，彻底征服了伯戚列奥人，使王位得到巩固，并为统一全岛做准备。

拉达马一世十分注意训练和强化军队。他通过同英国签订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从英国人手里得到枪枝弹药，并被承认为“马达加斯加国王”。拉达马还聘请前英国士兵哈斯蒂、法国逃兵布拉迪和罗班三人担任教官，对军队进行欧式训练。新兵从富裕者中征召，自备武器和军服。这支使用新式武器的正规军达 15000 人，他们在同使用标枪和旧式武器装备的各王国军队作战时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在统一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1822 年这支军队先攻入萨卡拉瓦人的默纳伯王国，修建了长期设防的军事据点，国王成了傀儡，并把其女儿嫁给了拉达马。翌年，拉达马亲自率领 13000 人向东攻占了沿海的塔马塔夫；接着向北进军，征服了戚亚拉那国王；1824 年，又先后征服了戚米赫蒂地区和西哈拉卡人。另一支默里纳军队征服

Gerald M. Berg Riculture and the Founding of Monarchy in Imerina (《稻谷栽培与伊默里纳君主制的建立》),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2 (1981), p.

哈斯蒂原是牙买加的黑白混血儿，后来参加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军，退役后来马达加斯加。

了塔马塔夫以南的东部沿海地区，安提莫罗人诸国王成了阶下囚。

1824年拉达马从东北部凯旋归来后，又立即转向西北的博依拉王国。此时拉瓦希妮女王已去世，她的孙子安德里安梭利由于改信伊斯兰教，在国内不得人心，所以在默里纳军队到来之前便逃走了，马仍加也失守。在西北沿海城镇进行抵抗的阿拉伯人首领大都被杀，拉达马派同父异母的兄弟拉马赖塔卡在此设军驻防。1825年，博依拉和默纳伯的酋长举行起义，但被驻守在马仍加的拉马赖塔卡击溃，叛军首领安德里安梭利逃往北部的阿诺隆桑加那，重新集结力量，翌年被彻底击溃，逃往科摩罗群岛。

1827年，拉达马派远征军前往东海岸，征服了安提莫罗王国和巴拉人北部地区，在伊胡西建立了军事据点。但是，巴拉人的大部分地区、南端马哈发利和安坦德罗依的全部、以及默纳伯和安邦古的西北部沿海地区仍然保持独立。未被征服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属未开发的荒野之地，居民好战而迁移不定，很难将其一一征服。不过这些地区对伊默纳王国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到19世纪末也被纳入统一的马达加斯加王国。

拉达马也进行了收复沿海法国殖民据点的斗争。1823年，他率领13000人的军队夺回了塔马塔夫；1825年，又出动3000人收复了多凡堡。除圣玛丽岛还留在法国人手中外，他实现了不许欧洲人占有土地的诺言。

拉达马一世继承父业，用十余年时间统一了马达加斯加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结束了伊默里纳王国被孤立在中部高原的状况，自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达加斯加王”。为巩固统一，消除各地文化上的差异，拉达马广泛实行武装移民，把伊默里纳人迁到新兼并地区，同时把一些被征服的人带回伊默里纳，建设大型工程。这个移民政策促进了马尔加什民族的最终形成。

三、早期改革活动与反殖斗争

拉达马一世在实行统一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家强盛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特别是在接触了欧洲先进的物质文明后，更加深了他改革的决心。在他统治的18年时间里，除了前述的军事改革以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均进行了改革。

在政治上，拉达马打破传统的安德里纳（贵族）、霍瓦（平民）和安德沃（奴隶）三级划分。除奴隶外，自由民被分成“密那米拉”（士兵）和“博里扎诺”（普通百姓）两大类。人们在社会中的名誉、地位不以其出身为依据，而是看他对王国作出的贡献。官职不许世袭，这充分调动了霍瓦阶层在王国统一战争中的积极性，减缓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征服地区，他对已建立王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采取军监制，仍然由原国王进行统治，但要听命于伊默里纳王国派驻的军事首领；对落后地区则完全吞并。这改变了以前以掳掠财物为目标的征服战争，巩固了已统一的地区。

为了吸收欧洲先进的技术，拉达马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允许西方传教士到马达加斯加传教，开办学校。1818年初，伦敦传教协会牧师大卫·琼斯来到塔马塔夫，两年后他与格里菲思定居在这里，开办了一所仅有三名学生的教会学校，但得到了拉达马的重视和支持。到1820年底，这里已有23所学校、2300名学生，其中1/3为女生。学校教学使用马尔加什语，但是，当时除了北部安蒂莫罗方言使用阿拉伯文字外，该语种尚无书写文字。在罗班的建议下，拉达马决定实行文字拉丁化，由琼斯负责利用英语的辅音和法

语的元音字母拼写马尔加什语，并结合当地语言的特点作了某些修改，使其简单又富有条理。至 1827 年，已有 4000 多名马达加斯加人掌握了拼写技能。《圣经》也被传教士译成马尔加什文，在当地基督教徒中传阅。拉达马一世还派遣贵族青年到英国和毛里求斯学习，最早是在 1816 年派出国王的两个兄弟。

国家经济繁荣是拉达马改革的重点和主要目的。在派往英国和毛里求斯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就是学习生产技术的。一些欧洲技术工人也被聘请到塔那那利佛，传授生产技能。其中苏格兰传教士卡梅伦传授了制土坯、肥皂、硫磺和皮革以及新的锻铁和木工技术；法国人路易·格罗建造了全木结构的绍尼埃拉那宫，该技术后被广泛模仿；1826 年卡敏斯输入了第一台织布机，发展新式纺织工业。马匹和蚕也被引入马达加斯加，自此出现了一批锡匠、木工、欧式的铁匠和织工、石匠和制革工等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拉达马还组织人修建道路，打扫和规划首都。

在对外贸易方面，拉达马变传统的奴隶输出为粮食、牲畜输出。从马达加斯加岛向外输出奴隶，初由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经营。从 16 世纪起，欧洲商人也加入贩运行列，并逐渐排挤了阿拉伯和印度奴隶贩子。到 19 世纪初期，马达加斯加奴隶通过三条路线被运往美洲、阿拉伯、印度和马斯克林群岛等地：一是越过大西洋直接运往美洲，主要是巴西；二是经过科摩罗、东北非、运往红海沿岸和波斯奴隶市场；三是直接运往印度。马达加斯加成为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奴隶贸易也一度刺激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输出奴隶阻碍了马达加斯加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的奴隶制经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特别是一些王国和地方统治者通过用奴隶交换欧洲人的武器，构成了对拉达马一世统一事业的严重威胁。为此，1817 年 10 月 23 日，拉达马同英国驻毛里求斯前任总督法夸尔签订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协定；1820 年 10 月 11 日，再次签订了同样内容的协定。拉达马一世的此项改革为马达加斯加奴隶制在 19 世纪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向外输出奴隶并没有在该岛立即停止，一些欧洲奴隶贩子转向岛的西部，即伊默里纳王国统治较弱的地方继续从事走私贩运，连法夸尔本人也暗地支持贩奴活动。直到 19 世纪末，奴隶贸易才真正被禁止。

拉达马一世的上述改革措施，是马达加斯加近代化的开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这项改革事业，由于长期征战和饮酒过度，在 1828 年 7 月 27 日病逝，终年仅 35 岁。拉达马生前未明确指定继承人，结果王后在显贵们的支持下登上了王位，称拉纳瓦洛纳一世。

拉纳瓦洛纳一世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安博希曼加诸族的首领，她们的祖父和父亲曾拥戴纳姆波印纳登上了王位。她的辅佐大臣主要是赖尼哈罗和赖尼约哈尼，以及一些霍瓦军事首领和旧贵族。新政府继续实行拉达马一世的改革政策，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此时，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法国人让·拉博德帮助下进行的。他是因乘船在东海岸遇险而于 1831 年到马达加斯加的，早年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技艺和富有智谋。1832 年，女王政府雇佣拉博德制造枪炮，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后来在曼塔索阿建立了一个工业中心。这里位于塔那那利佛东部的森林地

区，有丰富的木材、水源和铁矿资源，上千名工人在这里制造枪枝、火药、军刀、玻璃、陶器、肥皂、染料、丝织品、照明工具和各种生产工具，烧制砖、瓦、石灰、水泥，并使用了鼓风炉和机器生产。在工业中心旁边，还修建了公园、动物园和湖泊等娱乐设施，人们可以欣赏音乐和斗牛表演。在王国其他地区，开始开采铁矿、磷酸盐矿和金矿。随着手工业人数的增多，还建立了铸铁、印染、纺织和搬运等 18 种行会。此外，在离曼塔索阿不远的悬崖下，还建立了热带农业中心，包括试验田、甘蔗种植园和蔗糖厂，引进了许多新作物和牲畜，如香草、葡萄、各种水果、肉牛和美利奴绵羊等，农业和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拉博德还引进了第一辆双轮马车，在塔那那利佛山顶上为女王建筑了一座全木宫殿，其中央顶柱高达 39 米。后来，苏格兰人卡梅伦在宫殿周围砌了一道石墙，四周修建了塔楼。

在文化教育方面，拉纳瓦洛纳一世强调加强世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反对欧洲人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基督教。自拉达马一世允许基督教会自由传教以来，基督教各个教派在马达加斯加发展很快，如 1830 年在塔马塔夫一地便有 200 名狂热的基督教徒。一些王室贵族子弟出于新奇也改信基督教，抛弃了对祖先的崇拜。王国的统治基础因此面临严重威胁。1832 年，女王禁止传教士举行洗礼；1835 年，颁令禁止国人改信基督教；翌年，又将传教士驱逐出境。这项政策在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传教士的反对和指责，有些史学家甚至就此认为拉纳瓦洛纳一世实施的是“反动的政策”，是重新过闭关自守的生活。这种评论很不全面。其一，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国王，拉纳瓦洛纳一世完全有权采取措施保卫民族的独立和完整，维护国王的权威。其二，女王反对传播基督教，并不排斥和打击从事正当事业的外国人，反而高薪聘请他们参加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建设，允许他们继续通商。如拉博德被委以重任，在马达加斯加过着优裕的生活，娶了当地妇女，还先后被女王政府授予 15 枚勋章，被看成是王国显贵之一。法国人戴·拉斯泰勒和美国人马克斯分别掌管塔马塔夫和马仍加两地的对外贸易，前者还拥有一个甘蔗制酒厂。其三，女王的改革措施如果说有所收缩的话，这也是从拉达马一世统治的最后两年开始的，并非始于女王上台之时。由于废除奴隶贸易和其他开放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英国没有履行给拉达马以财政补助和帮助统一全岛的诺言，到 19 世纪 20 年代，王国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货币短缺。为此，拉达马一世从 1826 年起开始对贸易实行控制，加强民族工业的发展，减少对欧洲产品的依赖等等。因此，拉纳瓦洛纳一世实际上是继承了丈夫未竟的事业。

欧洲国家从一开始就对这个由王宫贵族选出来的女继承人抱有敌意，屡次出兵进行殖民入侵。对此，拉纳瓦洛纳一世毫不畏惧，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829 年，法国派古贝尔率六艘军舰来到马达加斯加，再度攻占塔马塔夫和重建廷廷古堡垒，企图利用女王登基伊始之机，恢复法国在岛上的殖民地。

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第 79—80 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5.p.407.

Mutibwa, op.cit., p.29.

Gwyn Campbell, The Adoption of Autarky in Imperial Madagascar, 1820—1835 (《马达加斯加帝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8 (1987), pp.406-411.

但这一企图没有得逞，在女王军队的围攻下，法军于 1831 年被迫撤出该岛。马达加斯加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为了给改革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1836 年 7 月，女王派特使前往法国和英国，向它们解释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希望缔结商业友好条约。特使在法国受到冷遇后，很快转赴伦敦。1837 年 3 月 7 日，他们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进行了交谈，后又拜见了国王威廉四世。特使们虽未能缔结成任何友好协定，但此事在马达加斯加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该国首次向外国派出正式使节。这件事本身也说明女王希望同欧洲人保持良好关系，印证了她所说的：“我这里没有敌人，在大洋的彼岸，所有人都是我的亲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

拉纳瓦洛纳一世的和平建议没有被欧洲列强所接受。1842 年，法国人在西海岸占领贝岛作为基地，对马达加斯加的西北角进行骚扰。1845 年 6 月，英法两国组织联合舰队。在凯利和罗曼—德福瑟的率领下武装入侵塔马塔夫港，炮击之后强行登陆。侵略军遭到马达加斯加军队的顽强抵抗，最终留下多具尸体登舰逃走。女王政府对此事大为震怒，下令禁止所有欧洲人入境，封锁东海岸各港，停止同欧洲人的一切贸易以及与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等岛屿的商业往来，从而切断了英法在这些岛屿上殖民地的粮食来源。在英国赔偿了 15000 美元以后，女王才准许继续通商。

法国武装入侵失败后，改为通过被女王信赖的法国人在宫廷内部策划颠覆阴谋。1857 年，朗贝尔、拉博德等人秘密策划宫廷政变，准备推翻女王政府，拥立王储腊科托上台。此事被赖尼约哈尼发觉而流产，所有欧洲人包括拉博德在内被全部驱逐出境。

拉纳瓦洛纳一世在位时期还继续和巩固马达加斯加的统一事业。在西北部，拉达马一世去世后，原博依拉国王安德里安梭利立即从科摩罗群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马仍加港，但不久被女王军队击败，只身逃往马约特岛；1832 年，他的王位被其姐姐奥安蒂戚取代，成为女王政府一位驯服的傀儡。在南部，女王四次派军远征伊孔果、塔那拉、巴拉等部落；1852 年，首相赖尼哈罗之子拉哈罗率军征服了安泰萨卡人，将其许多妇女掳为奴隶。但南部和西部有些地区仍保持独立，被统一的部分占全岛面积 3/4 以上。

1861 年 8 月 18 日，拉纳瓦洛纳一世年老病死，终年 73 岁。她在位 33 年期间，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同欧洲列强建立平等互惠关系，反对外族以任何方式的入侵活动，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完整。

四、拉达马二世的短期统治

拉纳瓦洛纳一世曾指定她与拉达马一世所生之子腊科托为王位继承人，腊科托继位后称拉达马二世。他的上台被西方人看成是“辉煌时代的开始”，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也被誉为“改革时代的人”。

腊科托在出生 13 个月时父亲就已去世，后在母亲拉纳瓦洛纳一世的宠爱下长大成人，少年时代接受了一些教会教育，其后由拉博德和朗贝尔担任他

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第 45—46 页。

W.Ellis ,Madagascar Revisited :Describing the Events of a New Reign and the Revolution which Followed(《重访马达加斯加》)，London 1867 , p.2.

Mutibwa , op.cit. , p.45.

的教师，被灌输了许多基督教知识和对法兰西帝国尤其是对拿破仑三世的崇拜。1855年当他还是王子时，就同朗贝尔签订了一个秘密文件，答应接受法国的保护，授权朗贝尔成立一个开发马达加斯加资源的公司。该文件后被称为“朗贝尔特许状”，在女王的反对下没有实施。两年后，他又参与了企图推翻女王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在女王的庇护下依然保住了王储身份。

拉达马二世在位期间（1861—1863），完全执行亲西方的政策。他的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让传教士返回马达加斯加，重新实行西方教育；二是与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以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三是吸引外国投资，开发马达加斯加的资源，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拉达马二世即位后，马上声称宗教信仰自由，邀请流亡在外的本国基督教徒和西方传教士返回。在写给旧友、英国埃利斯牧师的信中，拉达马二世告诉他：“新教徒可以在马达加斯加传授和传播他们的教义，……我将保护新教徒，不管他是欧洲人还是马尔加什人；所以如果谁杀死或伤害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我将把他抓住，根据我国法律惩罚他。”拉达马还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给罗马教皇，邀请天主教徒到马达加斯加来，并要求教皇支持他的政府。与此同时，拉达马把朗贝尔召回塔那那利佛，派他去巴黎和伦敦活动，送信给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英法殖民总督，告诉他们自己登位的消息，并颁布了保护外国人的法律，修建塔马塔夫到首都的道路。

英属毛里求斯殖民当局对拉达马二世的新政策反应最快，他们迫切需要从马达加斯加源源不断地得到粮食和牲畜。1861年10月16日，总督史蒂文森派遣的代表团在米德尔顿率领下抵达塔那那利佛，这是1829年以后西方来访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1862年1月，法国政府也派科比根到塔那那利佛。马达加斯加与英法之间恢复了官方交往。1861年9月和1862年6月，法国天主教会和英国新教教会派出的传教士分别到达塔那那利佛，恢复了在马达加斯加的传教事业。

英法两国并非希望在平等关系上同马达加斯加建立和平外交关系，而是各怀不可告人的企图。法国外交大臣在给驻马首任大使拉博德的指令中，明确强调马达加斯加的土地不得割让给其他国家，也不能接受英国的保护，法国保有对马达加斯加西北沿海的“古老权利”。法国海军官员以及在留尼汪的殖民者则力主将该岛纳入法国势力范围，在适当时机加以兼并。英国政府在给其驻马首任大使帕肯汉的指令中，强调英国希望保持马达加斯加的独立，在鼓励基督教传播的同时，反对其他国家独占该岛，对岛上的资源要共同开发。但是，拉达马二世一直受法国人的直接教育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亲法倾向。

1862年9月，拉达马二世与法国签订条约，规定法国人不受马达加斯加法律的约束，有权在马岛拥有土地和其他不动产，法国商人可以免交进出口关税；承认法国与地方酋长缔约而获得土地的特别权；法国承认拉达马二世是马达加斯加国王。1855年秘密签订的“朗贝尔特许状”，经过修改后于1862年9月被拉达马二世正式批准，决定授权给法国冒险家朗贝尔组织马达加斯

Mutibwa, op.cit., p.49.

拉纳瓦洛纳一世期间，法国与萨卡拉瓦人叛乱首领签订协定，声称对西北沿海地区实行“保护”。

Mutibwa, op.cit., p.59.

加地产工商业公司。该公司享有开发马达加斯加所有矿产的特权，可以获得木材以及沿海和內地的可耕地，可以修筑道路、水渠、广场和其他公共设施；有权征选公司需要的马达加斯加任何地方的土地，并为马达加斯加铸币；它的进出口货物免除税收，公司支付国王 10% 的纯利润。英国在得知法国获得上述特权后，立即指示其驻马大使获得类似权利。结果，在 1862 年 12 月签订了英马条约，英国如愿以偿，并获得马达加斯加东北部的武海马尔地区。

允许外国人占有土地，严重违背了马达加斯加自拉达马一世以来形成的传统；取消关税，不仅使国家丧失了一笔最主要的收入和保护本国工业的能力，而且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为此，拉达马二世引起了公愤。在对内政策方面，拉达马二世宣布废除死刑，大赦所有已被判刑的人，减少 3/4 的军事人员，禁止强迫劳动和取消传统义务，恢复基督教徒已被没收的财产，也触犯了一些上层的利益。于是，1863 年 5 月 8 日，数百个贵族和民众首领公开反对国王，首相拉哈罗和其弟军队司令赖尼莱阿里沃尼也站在反对者一边。5 月 11 日，拉达马二世被勒死，其妻被拥上王位，称拉梭赫里纳。拉达马二世实施的这些政策，由于不是朝着有利于马达加斯加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结果，不仅没有巩固自己的统治，反而在位不足三年时间便被推翻。

第十八章 祖鲁王国的兴起和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

祖鲁王国的兴起和北恩戈尼人的迁徙，是近代时期南部和东部非洲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深远。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由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祖鲁王国的崛起和姆法肯战争，在非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区域，其范围涉及南部非洲及中部和东部非洲的一部分，包括班图诸民族：祖鲁人、莱索托人、茨瓦纳人、恩德贝莱人、巴罗莱人以及马拉维、坦桑尼亚的恩戈尼人。他们大多具有大致相同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态。这些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不仅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心理和共同经济基础，而且一般都显示出同一倾向，即具有若干共同性的部落社会联合而成国家，并依靠其政治权力组织和军事技术，吸收、融化其他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恩戈尼人所创立的同龄兵团制度对南部非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恩戈尼人和苏陀人在创立民族国家及随后对殖民侵略的英勇抵抗中，都表现出了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

一、北恩戈尼人的农牧混合经济

1497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驶入绵延千里的南非东部海岸，在今庞多兰一带曾望见海滩附近有许多牲畜在游动。此时，恩戈尼人已经在今日纳塔尔一带居住了大约 10 个世纪左右。

北恩戈尼人栖居的纳塔尔是得天独厚的地区。它地处南非的东高原斜坡地带，其北部地表低平，河谷开阔；南部地表崎岖狭窄，河流辄多形成峡谷。全区雨量丰富，常年温差不大。由于地形复杂多变，在不大范围内就含有甜维尔区、酸维尔区和混交禾草区多种类型的草地。比起东高原斜坡带的其他地区，祖鲁兰是最适宜于牧耕之地：既温暖多雨，水源条件优越，又无危害人畜的萃萃蝇，是较为理想的甜维尔区。

居住在祖鲁兰的恩戈尼人主要部落有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后称斯威士）、姆塞恩瓦和夸比。这些黑人部落善于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展牧农混合经济。16—17 世纪从东海岸引进容易种植的、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可能在 1635 年以前就已开始广泛种植），更增强了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潜力。遇上好年成，非洲蜀黍加上玉米可使谷物产量增加一倍。恩戈尼人人口迅速增

祖鲁语称为“姆法肯”（Mfecane）；苏陀语称为“迪法肯”（Defaqane），又译“利法肯”。本书在德拉肯斯山以东称其为“姆法肯”；以西称为“迪法肯”；泛称用“姆法肯”。

M. Wilson & L. Thompson ed.,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o 1870 (《到 1870 年的南非史》), Oxford 1982, p.78.

维尔 Veld, 南非阿非利卡语，为草原之意，特指既未耕种过又无密林的开阔地；“甜维尔”指生长甜牧草的草原。甜维尔（Sweetveld）区生长着全年甚至干旱时期都有营养的禾草如红草，适于饲养牲畜；酸维尔（Sourveld）区的禾草在生长的早期富含营养，但生长三个月以后所含蛋白质和矿物质急剧减少，木质素和纤维素含量升高，牲畜吃了不好消化，不爱吃。

加。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恩戈尼人炼铁和锻铁技术达到相当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他们也炼铜，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手工业的分工初具规模。恩戈尼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比其邻居科伊人多得多。牲畜在交换中占重要地位，其他商品都用牛羊估价，如八头母牛可换两块十字形铜块，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的职业商人。畜产品、谷物、金属、盐及各种土特产品，构成地方内部商业网的基础。

早在 16 世纪中叶，北恩戈尼人就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1554 年，一群葡萄牙人曾见到姆福洛齐河的象牙被运往北方贩卖。到了 17 世纪，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加入德拉戈阿湾（今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湾）的贸易，对象牙的需求急遽增加。18 世纪中叶，德拉戈阿湾的海外贸易显著增长，象牙供不应求，利市百倍，葡萄牙商人已不能控制这项贸易。欧洲商人争相竞购，提高了象牙价格。德拉戈阿湾以南的北恩戈尼人住区是象牙的主要产地，也是优良的贸易区。但欧洲商人无法大批渗入内地直接经商，只限于在沿岸海港通过酋长或中间商进行。北恩戈尼人酋长手中拥有大批的牲畜、谷物、毛皮和手工制品，经济力量雄厚，有能力建立许多猎象队和运输队，控制产地货源。珠子和黄铜是从德拉戈阿湾进口的两项主要货物，用作装饰品，老少妇孺皆用，需求量颇大。靠近德拉戈阿湾通道的诸部落，兼得地理之利，长期控制着德拉戈阿湾贸易。1794 年之前由聪加人控制，其后控制权曾短期转入马普托人之手。居住在主要通道之一的蓬戈拉河两岸的恩瓜内人和恩德万德韦人，也力图控制此类贸易。于是，争夺广泛贸易控制权成为刺激各部落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动力。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部落的酋长丁吉斯瓦约，在 1809 年前曾多次到德拉戈阿湾一带旅行，眼见贸易繁盛和欧商咄咄逼人的情景，深感加强武力控制贸易的重要。他在 1809 年即位后，贩运 100 头公牛和大批象牙，到德拉戈阿湾去换取串珠和毛毯，并建立一个有 100 人做工的皮革加工工场；又组织商队运输象牙、牲畜和毛皮，向葡萄牙出口；积极发展木雕工艺，传授木雕技艺，生产牛奶盘、枕头、木制长柄勺、羹匙等，远销各地。这些有利因素使恩戈尼人酋长能够有效地维持其对象牙、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获得巨利，从而壮大其经济实力。

18 世纪末，德拉戈阿湾的象牙贸易因滥捕而骤减，牲畜出口猛增。贸易上对牲畜需求的增加，以及视牲畜（牛群）为社会和家庭财富唯一标志的传统文化心态的影响，刺激着恩戈尼人想方设法扩大畜群的规模。恩瓜内、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诸部落的中心地均位于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的分水岭地带，靠近甜维尔和酸维尔地区，全年均可放牧，饲养牛群最多。但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长期过牧现象，一度破坏了祖鲁兰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甜维尔地区受到的破坏最大。这些优良牧场一旦植被覆盖面减少，表土流失，就会滋生牲畜不爱吃的灌木刺林。根据树木年轮研究，18 世纪 90 年代纳塔尔地区的降水量达到最低点，发生了 1801—1802 年大灾荒。祖鲁兰各部落酋长竞相向所剩无几的牧场储备资源扩张。占领新资源、扩张土地的行动引起了部落战争，战争减少了人口，但并未根本解决生态危机和人口膨胀所产生的严重

在 1635 年前玉米可能已由葡萄牙海难者带到东海岸。一说从聪加人地区引进。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牛津南非史》)，vol. 1, p.109.

D.Robinson & D.Smith ed.,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非洲史料》，London 1979, p.8.

F.Cameron ed.,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图说南非史》)，Gohanesburg 1986, p.117.

问题。

祖鲁兰牧农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要求突破传统部落结构的程度。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牧地短缺的情况下，需要在大面积领土范围内集中管理和调配牧场，才能充分利用牧场潜力，使牧民可以不受狭小部落疆界的限制：春季在酸维尔高原区放牧，夏季可把畜群赶往混合禾草区，冬季则到甜维尔低草原区过冬，以提高牧场的载畜量。

18世纪末，开始了部落广泛联合、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征服。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本来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北部地区“有了可靠的农业生产，王族游动畜群就把各部落臣民紧密地凝聚在统治者的周围”。

二、祖鲁王国和斯威士兰王国的肇建

大约在16世纪中叶，恩瓜内部落（斯威士人），就居住在蓬戈拉河下游两岸平坦的沼泽地带（今莫桑比克南界内），当时叫伦吉尼人，其创建者称德拉米尼一世。伦吉尼部落成为聪加人的滕贝王国的一部分。从北方的伦吉尼部落分裂出来的新氏族往南迁徙，进入今日的纳塔尔。新氏族恩瓜内后来又分成德拉米尼和恩德万德韦两个氏族。留在北方的伦吉尼部落是伦加氏族，从中又分出赫卢比和斯威兹两部分。约1720—1730年赫卢比继其父伦加为首长后，可能因在滕贝内战中失地，遂率伦加氏族沿林坡丘陵南迁，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成为恩德万德韦的臣属。从此，伦加氏族遂一分为二，分别由赫卢比及其兄弟德拉米尼三世率领。德拉米尼三世率领的氏族定居于蓬戈拉河上游北岸（今斯威士兰王国南部）那片十分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地带；一直到德拉米尼三世之子恩格瓦尼三世即位后，他才率众从南岸回渡北岸。无论如何，斯威士人终于定居在蓬戈拉上游北岸这块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肥沃地带。恩格瓦尼三世约1750—1770年在位，他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奠定了斯威士民族的基础，建立了斯威士兰王国。斯威士人自称恩瓜内（Ngwane）就是从几个自称为（巴卡）恩格瓦尼家族的名称沿袭而来的。恩瓜内人不断扩张领土范围，逐渐征服或吞并蓬戈拉河上游北岸的几个小酋长国，包括其中的苏陀人酋长国，因此，恩瓜内人文化中糅进了不少苏陀人文化成份。

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的恩德万德韦人力量强大，雄踞一方。18世纪90年代，亚卡酋长传位于其子兹威德。兹威德精明强干，他乘德拉戈阿湾附近的滕贝王国衰亡及其继承国马普托王国力量不济之机，控制了沿海和高地之间的东西方贸易商道，聚敛财富，征服了当地酋长国库马洛、恩瓜勒尼、布塞勒齐等，威势大振。远至纳塔尔北部和斯威士兰南部的许多酋长国和王国赫卢比、恩瓜内等，都不得不向他称臣纳贡。在恩德万德韦人统治下，一些臣属国如索尚干的加扎国和兹旺曾达巴的恩克万曾尼国仍保持半自治地位。

位于姆福洛齐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酋长国，境内多河谷低地，既有适于农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1, p.7.

马特塞布拉：《斯威士兰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页。

恩戈尼人实行严格的外婚制，而属于恩戈尼语系统的恩瓜内人却宁愿实行姑表和舅表婚制，斯威士人中皇太后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恩戈尼人的传统，毋宁说是苏陀人遗风。

耕的丘陵地带，也有滋生大量猎物（尤其是大象）的低地。18世纪中叶以后，德拉戈阿湾的猎象业向姆福洛齐低地扩展，姆塞思瓦酋长国控制了低地的各个要道，从而既垄断了猎象活动，又控制了地方贸易。18世纪90年代，丁吉斯瓦约同其酋长父亲（乔伯）闹翻，愤而出走，游历各地。1809年他倦游思归时，其父已传位于其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夺回酋长宝座后，知人善用，勇于革新，在他统治下国力迅速增强。他与马普托王国结盟，进一步控制北方贸易；向西扩张，将祖鲁、布塞勒齐等酋长国置其控制之下。

19世纪初，在北恩戈尼人的部落战争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部落联合和集中的现象。昔日一个酋长国击败另一酋长国一般并不吞并后者，而只让其认输而后撤兵。如今，恩德万德韦人和姆塞思瓦人一改前例，不断通过战争征服和吞并别国，扩大疆土。适应这种需求，他们率先建立起一种同龄兵团军事制度（National age-segiments），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将各部落男青年混编在兵团中。这种同龄兵团制度几乎同时出现在班图人几个不同民族（恩戈尼人、苏陀人、茨瓦纳人）中，这一现象说明它是适应内外环境压力的产物。

南班图人中早就盛行割礼入会的习俗。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习俗演进为部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实质上是建立一种依附制度。酋长们为了便于控制各部落的同龄青年，每当酋长的一个儿子施行割礼时，部落中同龄的青年便一起去施行割礼。这些青年也就成了酋长之子未来扈从的核心和最亲近的伙伴，一生效忠于他们的首领。实行多妻制的酋长一般多子，部落的青年们便按年龄参加割礼，分属酋长诸子，自然地形成若干年龄集团。到19世纪初，随着部落广泛联合过程的进展，这个沿袭已久的割礼制度同部落的联合、集中趋势及其带来的频繁战争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割礼仪式繁复冗长，年青小伙子集中关闭一地，在四五个月内受到严酷的肉体折磨，精疲力尽，体力下降。敌对部落常乘对方在割礼期间大部分年青战士因无力自卫而发动突袭。此外，这种入会仪式使部落的同龄青年成为只忠于年青的酋长继承人的终身扈从，十分不利部落的合并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改革这种弊端丛生的旧制度已是势在必行了。

北恩戈尼人的同龄兵团制度废除了传统的繁缛割礼和入会仪式，而以加入同龄兵团、服役、参加战斗，作为少年步入社会的标志。按祖鲁人程序，允许他们戴头圈（一种成年人的光荣标志）；同龄兵团不以部落划界线，而以同一年龄作为唯一标准，被征服部落的同龄青年均以平等地位编入各年龄等级兵团。兵团成员只对国王或最高酋长效忠，而与原属部落酋长脱离隶属关系。各同龄兵团的给养供应完全依靠王室领地的收成或战利品供给，例如由属于国王或最高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肉食和奶制品；谷物的供应则靠各领地内的大批妇女从事农耕或国王向每个家族征募的剩余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国王或首领依靠垄断贸易或从事征服战争来聚敛财富和扩大畜群，因此，战士的给养状况与首领的军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这种新军事制度有利于

关于丁吉斯瓦约的游历，恩戈尼民间有多种传说。有说他曾到过开普殖民地，回乡时骑马挎枪，但都缺乏可信的根据。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324.

一种把男性少年生殖器前端包皮割去的仪式。按照这种习俗，施行割礼后的少年便步入成年人社会。

M.Fortes & E.E.Evans-Pritchard ed., Africa Political Systems (《非洲政治制度》), Oxford 1950, pp.31-32.

促使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形成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北恩戈尼人的四大酋长国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后来居上的祖鲁，都将该制度作为联合部落为国家的重要手段。

争夺土地和控制商道的斗争使战争频频发生。恩瓜内与恩德万德韦为争夺蓬戈拉河南岸的玉米地带而爆发战争。兹威德侵入恩瓜内领土，打败索布扎的军队，几乎消灭了恩瓜内国，1815年刚即位的索布扎率残众退往北方。此后，兹威德接二连三的攻击迫使索布扎躲进群山岩洞中避难，最后不得不退往今日斯威士兰中心地带因科马蒂河，在此建国。索布扎组织同龄兵团，征服当地讲恩戈尼语和苏陀语的小酋长国马塞科、佩迪等，奠定了斯威士兰王国疆土。索布扎善于吸收各方长处，他既仿效丁吉斯瓦约的同龄兵团制度，也采用归附于他的苏陀人的一些政治制度，如国王与太后两宫分权制、个人扈从制等，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灵活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在加强集权的同时，允许各地臣属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国民会议）。

在强邻窥伺下，为巩固新王国的政权，索布扎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1817年，他娶兹威德之女为正室妻子，避免与强邻再次发生冲突。后来他同更强大的祖鲁王国交往时，也同样谨小慎微，避免冲突。依靠外交途径，避免同潜在的强大敌国发生冲突，成为斯威士兰王国的立国之道，奉为圭臬。但对弱邻，它毫不犹豫发动进攻。到1820年左右，斯威士兰进入和平建国时期，索布扎迁都于乌苏图河谷地的诺克万，按照祖鲁人的军事原则进一步加强同龄兵团。其四邻成为它的进贡国，包括位于高维尔的佩迪国、低维尔的聪加酋长国和中维尔的恩戈尼人酋长国。索布扎在位21年（1815—1836），把斯威士兰建成一个强大的王国。

在南方，姆塞思瓦酋长国首先要对付的是强大的夸比酋长国。夸比人统治着姆赫拉图泽河和图盖拉河之间的地盘，在库兹瓦约统治时期国势日强，控制了整个恩戈耶地区，迫使其主要对手塞列人和图利人逃迁图盖拉河以南，其威势远及恩戈耶以西地区，祖鲁小酋长国也在其卵翼之下。1815年，夸比酋长憎恨崛起于乌姆福洛齐河间的姆塞思瓦国日益侵入其权力范围，遂故意庇护刚被丁吉斯瓦约赶下台的弟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借用马普托王国的火枪兵，击败并吞并了夸比酋长国，统一了乌姆福洛齐河流域，祖鲁人遂成为其附属国。从此，姆塞思瓦成为南方最强大国家。

恩德万德韦人自从把恩瓜内人赶到恩科马蒂河以北、称雄蓬戈拉以南地区后，逐渐往南向乌姆福洛齐河甜维尔地区扩展，与姆塞思瓦发生冲突。由于姆塞思瓦有马普托王国火枪兵的支持，兹威德始终未能切断姆塞思瓦与马普托之间沿海平原的商道。1817年，北恩戈尼人的两强发生全面冲突，双方都动员了主力。初期丁吉斯瓦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逼兹威德首府。1818年冬，双方在首府附近的姆布齐山丘进行决战。布下了公牛角阵。会战前夕，丁吉斯瓦约带一小批随从爬上一座小山，俯瞰战场，侦察地形，不幸陷入兹威德设下的埋伏，被擒处死。姆塞思瓦军队失去主帅，陷入混乱。兹威德不战而胜，把姆塞思瓦人赶过乌姆福洛齐河，几乎逼近图盖拉河。

历史给姆塞思瓦军队中的一位普通指挥官恰卡提供了机遇。恰卡出身于

高维尔（Highveld）是指草地或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地；低维尔（Lowveld）是指灌木地或海拔在600米以下的地表；中维尔（Middleveld）介于两者之间。

据传公牛角阵最早是罗兹维人和伦加人采用的阵势，北恩戈尼人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氏族——祖鲁，其父森赞康纳是个只统辖 2000 人的小酋长。童年时期，恰卡因父母的婚变而寄居于母方氏族（兰吉尼）。牧童生活和坎坷的境遇使他练就坚强勇猛的性格，他身材魁梧，胆略过人。1803 年，他离开本部落投奔姆塞思瓦酋长国，1809 年应召入伍。他勇敢善战，卓具指挥才能，屡建战功，深得丁吉斯瓦约的赏识，获得“勇士”（Sikiti）称号，升任指挥官。1816 年森赞康纳死去，其庶子西古贾纳继位。恰卡借丁吉斯瓦约的一支军队杀回本部落，从其异母兄弟手中夺得酋长宝座。恰卡以本氏族青年为主，建立了一支剽悍善战的军队。毗邻部落慑其武力，纷纷归附。一年之内，恰卡统辖的地盘从 100 平方英里扩大到 400 平方英里，军队由 500 人增加到 2000 人，并兼并了 6 个部落。丁吉斯瓦约将恰卡所统率的祖鲁军队作为姆塞思瓦禁卫军。1818 年丁吉斯瓦约被俘遭戮后，姆塞思瓦王国群龙无首，濒于瓦解。恰卡立杀新酋长，取而代之，任命亲信为姆塞思瓦各级指挥官，重建权力。

兹威德乘恰卡立足未稳，兴兵讨伐。1818 年 4 月，兹威德率 10000 人的大军侵入白乌姆福洛齐河南岸。恰卡指挥祖鲁 5000 名精兵，在格夸科利山丘击败恩德万德韦军队，但自己军队也伤亡严重。这一战役使恰卡声威大振，成为姆塞思瓦公认的国王。他乘胜利的余威出兵攻打夸比，吞并了这个祖鲁人的前宗主国。从此，祖鲁王国疆域往北扩至乌姆福洛齐河，西抵恩康得拉森林，面积达 7000 平方英里，共辖 30 个部落。1818 年末，兹威德派遣全部人马约 18000 人进犯祖鲁。面对优势的敌军，恰卡先行撤退，烧毁沿途粮草，诱敌深入，不断以小股部队夜袭侵扰敌军。当恩德万德韦军深入到图盖拉河时，因粮草不济发生饥荒，被迫仓猝退兵，抢渡姆拉图彻河。以逸代劳的恰卡抓住战机，率追兵半渡而击，疲惫不堪的敌军溃散四逃。恰卡乘胜追击，摧毁了恩德万德韦的后方基地。兹威德仅以身免，率残众逃往北方。

战胜北方强敌之后，恰卡又向富饶的图盖拉谷地和东海之滨扩展，征服了姆博、恩科洛西、塞列、图利等酋长国。祖鲁王国的版图扩大到 11500 平方英里，北至蓬戈拉河，南至图盖拉，西抵德拉肯斯山，兵员总数达 50000 人，是当时南部非洲空前强大的军队。恰卡部队连年出征，击败一个又一个酋长国和王国，100 多个部落并入了祖鲁王国。在这块原来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众多酋长国的地区崛起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辖区内数十万居民从此都被（欧洲人）称为祖鲁人。恰卡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一个新民族的形成。

三、恰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

在姆塞思瓦王国鼎盛时期，丁吉斯瓦约曾对氏族社会制度中许多早已过时的旧形式加以改革。恰卡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掌权伊始便着手进行大规模改革。

首先，恰卡将同龄兵团制度在丁吉斯瓦约改革基础上继续进行革新，一方面使它成为与班图人传统制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军事制度；另一方面又使之成为奠定王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的经济制度。恰卡彻底打破了部落界限，把所有具有战斗力的男性居民按年龄等级，每 600—1000 人组成一个兵团

(ibutho, “依布道”), 每团战士均持同一色彩和装饰的盾牌, 并分别驻屯在特定的军屯区(“埃开达”)。战士在兵团中须连续服役, 直至被允许离队结婚为止。服役期间, 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只许说以祖鲁方言为基础的恩戈尼语。恰卡将军将人分成新兵、战士、老兵三类。儿童从12岁起便接受半军事训练(侦察、运输), 18岁成为新兵接受正式军事训练, 在35岁成为退伍老兵以前不许结婚。他亲自训练一个由20岁青年组成的同龄兵团, 命名为“乌法辛巴”(意为烟雾)。采取斯巴达式的训练方法, 极其严格。经受严酷磨练的战士个个骁勇善战, 成为他的嫡系部队。经过强化的新军事制度, 更有利于培养各部落战士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恰卡效忠的信念, 从而更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地方统治者被剥夺了传统上属于他们的军队的大部分, 而剩余的军队是由已婚老兵组成的, 与国王统率的精兵相比, 战斗力悬殊。这使地方势力既无法以劣势兵力与中央抗衡, 更难兴兵作乱或率部叛离。新军事制度成为恰卡联合各被征服部落为集权国家的有效手段。

恰卡改进了武器装备和战术。南班图人以投掷长杆标枪为基础的传统作战方式, 只适于小规模战斗, 不能用于密集战斗队形进行真正的决战。恰卡首先训练同龄兵团采用新的武器装备, 每个战士配备一根短杆刺矛(“阿塞加”)和椭圆形的大盾牌, 便于进行近距离白刃战。战斗时, 战士排成密集队形, 以盾牌作掩护, 抵御敌人的箭矢和标枪, 而执短矛冲锋进行白刃战。任何战士不许将短矛当标枪投掷, 凡在战斗中失去短矛者一律被处死。其次, 恰卡根据主要武器的变更, 创造了新的战斗队形, 充分发挥公牛角阵短兵相接的威力: 中央为主力攻击力量, 排成若干密集方阵; 左右两翼辅攻, 列成向里弯曲的扩散队形。与敌接触时, 中央主力部队放慢步伐, 让两翼迅速从两侧进攻或突入敌后进行包抄, 而后中央主力跑步冲锋, 以刺矛摧毁已经投掷标枪、陷入两角夹击之中的敌人。训练有素的祖鲁战士怀有决一死战的气概, 加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 祖鲁的同龄兵团在历次战斗中几乎无往不胜。

恰卡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悉心进行改革。他削弱各部落酋长和地方首领的权力, 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由他任命的“因杜纳”(大臣)手中。因杜纳可以由中央(恰卡一人作主)任免, 也可异地调任。偏远地区的因杜纳不管辖在军屯区服役的同龄兵团战士, 只管辖那些已经年迈退伍或尚不及丁的、仍生活在家宅中的部落成员。因杜纳多出身于普通家族, 既无王裔的传统势力, 也不可能率部自立为公社或部落首领, 只能听命于恰卡。恰卡集最高的行政、司法、军事和祭司权力于一身。正是在这种新型政治制度基础上, 出现了南部非洲权力集中的军事国家的雏形。

各团分别用黑牛、白牛、花牛、黄牛的皮制造盾牌, 以资识别。祖鲁战士的服饰更别具一格, 极富色彩。成年男子头上缠一块水獭皮头巾(里边填满了灯芯草籽或干牛粪), 巾前插着一根三英尺长的羽翎, 两块猴皮从头巾下垂到两颊, 其上部缀满了剥去羽管的羽毛, 显得既轻盈又明亮。脖子上挂着一串由木片缀成的项圈, 这是勇敢的标识, 凡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则串上一木片, 串满为止。战士的手臂和腿上缠绕着公牛或母牛的尾巴。胸前交叉着两根绳子, 绳子用6英寸长半英寸宽的香猫皮和猴皮精巧地拧在一起(没解过此绳的人会以为这是从动物身上割下的、抽去椎骨的尾巴)。围在腰间的服饰是用同样方式制作的, 只是长可及膝。一件服饰通常要用上15—20张皮, 有的甚至用上50或60张皮, 价值可观。祖鲁男人服饰上的尚武表现, 在东南非洲各部落中首屈一指。Fynn, op.cit., pp.283-286.

老兵按祖鲁语称为“阿马温贝”(amawombe); 战士称为“乌杜宾德兰古”(udubintlangu)或“伊津波赫洛”(izimpohlo, 单身汉兵团); 新兵称“伊津蒂兹瓦”(izintizwa)。

祖鲁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父家长制家庭公社和同龄兵团之上。家长制家庭公社是南班图人部落社会内一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同体。每一个家庭公社聚居在一个呈圆形排列的“克腊尔”（Kraal，村寨）里。家族成员包括同一父系所繁衍的数代子孙及其妻子。南班图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家族规模比较庞大，有的包括数十个成年男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富的增加，这种多妻分房制度极易促成家庭公社内部个体家庭（家宅，homestead）的形成。家庭公社成员共同在一块由国王或最高酋长分配的土地上放牧和耕种。

祖鲁的男子一般在婚后就建立自己的家庭，娶妻的数目取决于他拥有牲畜的多少。一般正妻是由共同体（家庭公社）出彩礼娶的，其余妻妾则由他自己出牲畜购买。每个已婚男子一旦建立自己家宅，就成了间接生产者。每房妻妾及其子女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由家长分配给每房奶牛、农业份地供其使用，并给一库房供存储之用。各房内部有性别分工：农活几乎全由妇女包揽；男人放牧，男童挤奶，成年男子还负责生产的管理、监督或担负兽医、屠宰等职责。各房自给食物，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归家长所有。剩余产品的大部分由家长在各房中再分配，或用来换取更多的妻子。到各房的儿子长大后，便在各房长子率领下从原家宅中分出，另立新宅。

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加剧了恩戈尼人部落内部的贫富悬殊，成为破坏原始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那些拥有大量牲畜的富裕家庭公社往往通过牲畜借贷，使本部落的穷人在经济上依附自己，并且利用一夫多妻制的广泛亲属联系，在部落中树立家族的支配地位，成为当权家族。恩戈尼人的部落酋长虽然形式上仍由选举产生，但不属当权家族的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被选为酋长。富裕家族成为部落上层以后，其他公社成员就负有为他们放牧、耕地、盖房、修圈的义务。部落酋长拥有的畜群愈多，愈容易为自己招募扈从。由不同部落的人组成的扈从队，往往成为酋长私人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扈从制度不仅在恩戈尼人部落，而且在所有南班图人部落中都起了促成王权产生的作用。到18世纪末，牲畜财产的不平等已使恩戈尼人部落各成员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逐渐变成依附和服从的关系。

由于南班图人特殊的社会习俗。牲畜（牛群）的繁养对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班图人中，被视为社会财富主要标志的牲畜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政治权力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牲畜财富在恩戈尼社会的两种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起着奇异的沟通作用。人自身生产的生产率可以直接转化为牲畜繁殖率（男劳动力多、牧养牲畜就多；生女多，换取的彩礼——牲畜也多）；牲畜的高度繁殖率又可转化为劳动力的生产率（牲畜多，换取的妻子也多，多妻则又多子），进而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率。只要生态环境不受严重破坏，这种良性循环可能就是祖鲁王国强大和具有韧性的深刻原因。祖鲁王国通过兼并行动来控制或恢复甜维尔德地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关键一环。

G.B.Peires ed., *Before and After Shaka* (《恰卡当政前后》), Grahamstown 1983, p.43.

I.Schapera ed.,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Native of South Africa* (《西方文明和南非土著》), London 1934.p.23.

S.Marks & A.Atmore 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前工业化时代南非的经济与社会》), London 1980, p.114.

祖鲁国王权力的基础在于从每个家宅征收的剩余劳动，特别是劳动力。经过恰卡进一步改革的同龄兵团，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劳动组织。所有祖鲁成年男子都是国家军队的成员或预备成员，适龄青年从入伍到国王允许其退伍结婚，长达15—20年的时间都是为国王服务的。在王国早期（恰卡统治时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劫掠，越界劫富，带回畜群（邻国的剩余产品乃至必要的生活资料）；在王国后期，同龄兵团的主要力量用于放牧王家畜群。通过这项军事制度，国王能够征用每个男劳力的1/3的生产时间。此外，国王征收的贡赋也直接征收牲畜和兽皮等实物。许多女子隶属于王府，她们被当作一种供奉送到国王宫廷，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务劳动。这些征调来的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由国王通过权力渠道进行再分配，它既巩固了王权，又增加了国王官吏的权力，起着维护国家体制的作用。王国最显要的官员是“伊齐克胡卢”（izikhulu，封疆酋长），他们一般由王裔担任，拥有大批牲畜，富甲全国，有权从其治下区域收取贡赋。

祖鲁王国不断的领土扩张，使恰卡获得越来越多的贡赋和兵员，各权力集团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些最优良的牧地和耕地，同龄兵团的战士也分得了更多的畜群和种种给养。大量虏获品缓解了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贫民（特别是参战的贫民）往往能够得到从其他部落虏掠来的财物，发家致富。因此，祖鲁人（乃至整个北恩戈尼人）所使用的奴隶基本上来自外族的俘虏。这些共同的利益刺激着祖鲁王国的领土扩张战争持续不断地进行。但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后面可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通过兼并战争来控制 and 集中管理更大面积的土地，是恩戈尼人在同生态环境恶化所进行的斗争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用不同方式影响自然环境的一种自觉行动。显然，在辽阔的幅员上从事生产活动，可以避免那种在狭窄牧地上过份放牧而造成的资源破坏，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季节性牧场，度过地方性的旱灾。革新后的同龄兵团制度，由于对男女青年结婚年龄（成家）作了严格规定，实际上起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的作用，是对18世纪末以来祖鲁兰因人口增加和滥事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制约。因此，19世纪初祖鲁王国的形成、扩张及其各项改革，不啻是恩戈尼社会中人与人斗争以及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产物。

在统一、兼并各酋氏国的过程中，恰卡努力发展各部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鼓励贸易，互通有无，保护商路，开征商税。他主要控制两条商路：一条是通往德拉戈阿湾的东北商路，沿途各酋长国相继被征服。马普托国因善于经商并拥有熟练铁匠，能制造精致的铁矛头，备受优待，其原有商业联系也受到保护，并跻身于纳贡的盟国之列。这条商路的象牙贸易为恰卡积累了大批财富。另一条是通往纳塔尔港（今德班港）的东西向商路。纳塔尔港麋集着英商。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欧文船长勘探纳塔尔湾沿海地带后，英荷殖民者竞相觊觎这块濒临印度洋的宝地。1824年，英国商人和医生亨利·法因、詹姆士·金、法朗西斯·法韦尔等进驻纳塔尔港，深入内地收购象牙，雇黑人当搬运工。恰卡对新鲜事物很敏感，对欧洲先进技术如火器、医术尤感兴趣，乐于同欧洲人交谈，以广见闻。当时印度洋上英国货的品种和质量都大大超过葡萄牙商品，因而更受恰卡喜爱。不久，祖鲁同纳塔尔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它同德拉戈阿湾的贸易额。

1827—1828年，恰卡分兵两路，北路进攻索尚加，南路主力进攻乌姆库卢河的庞多人。英国急忙派遣萨默斯特上校率兵北上。随祖鲁军南下的英商

法因劝告恰卡不要去攻打受开普殖民政府保护的南恩戈尼人诸酋长国，以免引起英国的报复。恰卡从英国殖民军不断攻击开普殖民地境内科萨人部落的军事行动中，开始认识到白人殖民者手中的火器是对祖鲁王国的最可怕的威胁。1828年9月24日，正当军队北征未归之时，恰卡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丁刚和姆兰加尼发动宫廷政变，刺死恰卡。据说，恰卡临终最后一句话是“白人就要来了”。

丁刚在杀死同谋者姆兰加尼和北征归来的大将姆德拉卡之后，终于登上宝座。他虽是弑君者，却又是恰卡事业及其政策的继承者。他继位后面临的国外形势十分严峻。十多年来兵连祸结，对农牧业生产破坏甚巨，土地荒芜，人丁减少。部民对兵燹连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繁重不堪的军役负担感到不满，人心思定。丁刚适应当时的形势，及时宣布他将化干戈为玉帛，以月夜舞蹈代替军事演习，不再实行青年全部脱产服役制度，以便让各部落人民安居村寨，休养生息。最初几年，战事稍微减少，王国各部落的民力得到一些恢复。但祖鲁王国建国肇始，远未巩固。姆法肯战争正在德拉肯斯山以西炽烈进行（参见下文），一些酋长国首领不愿臣服祖鲁王朝统治，伺机率部离去。夸比人乘机叛离，南下进入庞多兰。1830年，索尚加的加扎王国也自行独立。丁刚为阻止祖鲁王国分崩离析，重新部署兵力，在要地驻屯重兵，保持恰卡所建立的一套军政制度，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对叛离者和拒纳贡赋的氏族贵族严惩不贷，三次派军远征德兰士瓦高原，讨伐叛离的恩德贝莱人，并诛灭夸比人首领恩奎索。他害怕其众多的异母兄弟弑君篡位，于是便滥杀无辜，只有潘达和格奎得以幸免。

19世纪30年代，丁刚面临更严重的形势。从开普殖民地北上的白人殖民者的土地扩张，日益逼近祖鲁边境；而在东部沿海纳塔尔港一带，英国殖民者所建立的据点也日益扩大，已擅自管辖2500名非洲人并收容叛离部落，形成对王国主权的威胁。1831年，作为一种威慑，丁刚发兵进攻纳塔尔港。1834年，在开普殖民地总督科尔派去的史密斯怂恿下，纳塔尔英商上书英政府，要求兼并纳塔尔沿海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带。同年，由厄伊斯率领的布尔农场主先遣队，由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区窜入纳塔尔，踏勘土地，策划移民屯垦。早在1830年前，丁刚从恩格韦尼人在乌姆塔塔河畔被英军击败一事就已看到，恰卡创立的一套作战方式和所采用的武器难以抗击骑马持枪的白人殖民者。因此，他千方百计力图取得火器和马匹来装备祖鲁军队。为了从纳塔尔港英商手中购买武器并学会使用枪支，丁刚一再忍让，极力同英商和传教士保持良好关系。1835年，丁刚任命英国传教士加德纳为纳塔尔港酋长。加德纳故意歪曲，把此项任命当作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并劝说开普总督德班把这块让与地变成英国殖民地。当地白人移民擅自把纳塔尔港更名为德班港，以纪念殖民头目德班。

四、姆法肯战争和恩戈尼人的北迁与南下

曾经被南非旧史学家大肆渲染的姆法肯战争或迪法肯战争，实质上是南部非洲国家形成时期的部落兼并战争。在南部非洲历史上，它是孕育着新国家或新民族的氏族部落社会的助产婆。

姆法肯战争的发源地在祖鲁兰。1819年，恰卡军队击败了恩德万德韦的兹威德军队。后者在北撤的过程中攻击了阿芒韦尼人（又称恩格韦尼人）的马蒂旺部落。这次攻击所产生的冲击波，后来在德拉肯斯山以西引起了“多米诺效应”：受到攻击的马图昂部落又去进攻赫卢比人；赫卢比人被迫翻越德拉肯斯山，挟其祖鲁模式的军队横冲直窜，又在山以东成了强者。它于1821年进攻苏陀人的军事行动，在德兰士瓦高原上吹响了迪法肯战争的号角。

在德拉肯斯山以东地区，1819年姆法肯战争已从祖鲁兰地区向南北方向蔓延。在南方，被恰卡军队驱赶的北坦布人，穿过纳塔尔渡乌姆齐姆库卢河，进入庞多兰，又遭到庞多人酋长法库的攻击。坦布人被打散，一部分重新迁回祖鲁兰；一部分被并入庞多人社会；其余人在马迪康领导下组成难民集团，在紧挨庞多兰的地方又建立一个巴萨酋长国。在兵荒马乱时期，庞多人自顾不暇，1824年和1828年两次遭到祖鲁军的劫掠。在后一次攻击中（1828年），祖鲁军荡平了庞多人在乌姆齐姆库卢河两岸的居住地。在法库领导下，庞多酋长国终于得到恢复，畜群也靠掠夺得到了补充，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归附。法库成为祖鲁南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股势力，它对稳定特兰斯凯以北地区的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往南迁徙的最大的北恩戈尼人难民集团是芬果人，由赫卢比人、布赫莱人、齐齐人等各部落难民组成的。他们三五成群、零零散散越过乌姆齐姆库卢河，进入南恩戈尼人居住区。起初，芬果难民进入格卡利卡兰，向当地小酋长和头人乞讨食物和住所；后来通过多种途径归附科萨人，有的通过婚姻融化于科萨人社会；有的成为科萨人扈从，获得小块土地和一些牲畜，向科萨人服役或缴纳贡赋。1836年，不满意这种寄人篱下生活的17000名芬果人涌入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区，英国殖民当局安置他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是被英国抢占的科萨人土地，这又加剧了东部边区土地关系的紧张和复杂化。芬果人多充当英国农场主雇工或雇佣军，改信基督教。

兹威德率领的恩德万德韦人在恩科马蒂河上游河谷（今斯威士兰与德兰士瓦交界处）暂时定居下来。1818年末的惨败引起内讧，兹旺根达巴和索尚加两员大将率部叛离兹威德，向恩科马蒂河下游进军。这一部分脱离恩德万德韦、往北迁徙的恩戈尼人（Nguni）后来被称为恩哥尼人（Ngoni）。他们一路征服滕贝人，并把恩亚卡人赶到德拉戈阿湾的海岛上，仅马普托人得以幸免。马普托人向恩哥尼人购买象牙，付给他们铁矛头和舶来品。恩哥尼人一度控制了德拉戈阿湾贸易。到1821年，恩哥尼人又征服了德拉戈阿湾以北的许多酋长国，1822年，其势力已远达伊尼扬巴内湾。那些后来陆续脱离兹威德的恩哥尼人在恩哈巴率领下也不断北上，加入伊尼扬巴内湾的恩哥尼人队伍。

1823年恰卡派军北上，夺走了恩哥尼人对德拉戈阿湾的贸易控制权。但湾北的索尚加仍能通过姆富莫酋长国与葡萄牙人贸易。索尚加将龙加人俘虏卖给葡萄牙人当奴隶，输往巴西或留尼旺岛的甘蔗种植园。1828年，恰卡派遣的最后一支祖鲁军再次进攻索尚加。索尚加率众北逸，与兹旺根达巴、恩哈巴的部众一起在萨韦河口落脚。不久，恩哥尼人的领袖们发生分裂，互相火并。在1831年战争中，索尚加取得胜利，兹旺根达巴和恩哈巴率众逸入内

地。索尚加采用祖鲁的军事制度，仿效其战术，力量更强。他的部众在今莫桑比克南部逐渐形成尚加内民族，这个民族讲当地聪加语而不讲恩哥尼语。索尚加建立的加扎国，包括恩哥尼人、聪加人、乔皮人等。他基本上按恰卡方式建国，以王族领地作为军政组织的中心和同龄兵团的营地；同龄兵团容纳被征服部落的青年，只是身份略低于恩哥尼人。臣服的酋长国承认索尚加的宗主权，仍保持内部自治权。索尚加于 1834 年在伊尼扬巴内、1836 年在索法拉两次击败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设在太特和塞纳的商站慑其力量强大，曾在 20 年时间里每年向加扎国缴纳贡赋。只是在索尚加死后（1858 年）王国发生内讧时期，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支一派打一派，才扩大了它的殖民势力范围。

兹旺根达巴率部众往西北迁徙，1832 年进入赞比西河以南的罗兹维王国境内，在布拉瓦约停留一个时期。1834 年，恩哥尼人在塔巴扎卡曼博击败罗兹维军队，劫掠洛米和德赫洛—德赫洛两个城镇，女将尼亚玛朱玛杀死罗兹维末代国王（“曼博”），据说津巴布韦文明即毁于此时。1835 年 11 月 20 日，兹旺根达巴在卢安瓜河与赞比西河汇流处附近的崇博渡过赞比西河北上，经马拉维湖西部地区，直到坦噶尼喀湖南岸菲帕人居住区。1845 年，兹旺根达巴死于附近的马普波。此后，恩哥尼人分裂：一支由塔韦尼率领继续北上，向维多利亚湖方向推进，到达尼亚姆韦齐，与当地融合，被称为土塔人，控制东非内陆商路；一支由祖卢·加马率领向东推进，袭击鲁伍马河流域广大地区，最后在松盖阿以北和以南定居，建立姆肖佩王国和恩杰卢王国；一支在蒙贝拉率领下在马拉维湖以西高原和谷地（后命名恩哥尼兰）定居下来，形成今日马拉维的恩哥尼人。另外一支由兹旺根达巴女婿恩瓜内率领的恩哥尼人，在渡赞比西河前就分裂出来，他们在太特和塞纳之间渡过赞比西河，又东渡希雷河，在马拉维湖以东绕一个大圈，最后在恩瓜内的继承人姆普塔率领下北上，进入坦桑尼亚，在桑盖建立王国。恩哈巴率领的部下离开罗兹维地区后，沿赞比西河西移，深入巴罗策兰（今赞比亚西南部），在那里同科洛洛人塞贝通冲突，恩哈巴淹死，部众被打散。一部分恩哥尼人跟随兹旺根达巴的合法继承人姆佩泽尼又绕回来，定居在赞比亚的东部地区詹姆森堡和马拉维的姆钦吉。今日以维多利亚湖南岸沿坦噶尼喀湖到马拉维湖南岸广大地区散居着许多恩哥尼人，这就是当年迁徙的结果。这批迁徙的恩哥尼人为数不多，但军事力量很强，从卢安瓜河到马拉维湖广阔地区的人口众多的当地人都在他们控制之下。

19 世纪上半叶，恩哥尼人行程几千公里、历时数十年的迁徙，对赞比西河以北广大地区带来了有益的影响。恩哥尼人有坚强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以及发达的畜牧业。他们的迁徙和定居行动，在客观上成为将强者和胜利者的成就及其独特文化传授给那些弱者和落伍者的一种手段。马拉维湖滨许多弱小氏族如唐加族，在恩哥尼人军事行动刺激下联合起来建立酋长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以畜牧为主的恩哥尼人与当地务农为主的居民建立了互利的交换关系，促进了内陆生产力的发展。所幸的是，恩哥尼人没有贩卖奴隶的传统，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参预奴隶贸易。他们比奴隶贩子先到马拉维湖以西地区，成为从东面渗入马拉维的瑶族奴隶贩子的巨大障碍。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与军事征服的后果相反，在文化上恩哥尼人一般接受

兹旺根达巴北渡赞比西河那一天正赶上日蚀，据此推算出其渡河的准确的日期（英国时间为 11 月 19 日）。

了居住地的语言（如马拉维语）。恩哥尼战士一般都娶当地部落的女子为妻，儿童从小说母语，反而把恩戈尼语丢了，因而出现了恩哥尼人同当地人融合后的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五、苏陀—茨瓦纳人和迪法肯战争

居住在德拉肯斯山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东缘的苏陀—茨瓦纳人，是南班图人的另一重要支系。按居住的地域划分，他们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居住在威特沃德斯兰德及其以北的称北苏陀人，以佩迪人为代表；居住在兰德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茨瓦纳人称西苏陀人，以赫鲁策人为代表；居住在卡勒登河一带和巴苏陀高地的称南苏陀人，以魁纳、福肯人为代表。

苏陀—茨瓦纳人居住的地区，尤其是茨瓦纳人居住的西部地区，均属高维尔，地势高亢，居民点分布相隔遥远，人口相对集中，雨量不稳、水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严格限制了一些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和四季牧草的旺盛生长，使这一广袤地区不少地方只适宜种植耐旱低产的非洲蜀黍和放牧数量有限的牲畜。尽管如此，德拉肯斯山以西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一些地区仍有大片宜农宜牧的肥沃地带。锄耕农业仍是生产的两大部门之一，主要种植玉米、烟草和各种瓜类（南瓜、甜瓜等）。斯托曾指出：“茨瓦纳人以挚爱农业而著称”，“早昔旅行家看到他们的巨大城镇的周围环绕着大片耕地，显示出工业的雄厚基础，都感到惊讶和钦佩”。与东部地带不同，德拉肯斯山以西地区矿产十分丰富，铜、铁、金等矿分布很广。北苏陀人熟谙开采矿藏，拥有金属财富的资源，其重要性仅次于牲畜财富。在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帕拉博鲁瓦地区，当地居民（佩迪人）以矿业为主，生产大批铜铁和金属制品，用来换取牲畜、谷物等物品，少数地区已出现制造精美陶器、金属器皿和纺织品的手工业。西苏陀人中的特哈平商人经常趁雨季到来前越过沙漠到达奥兰治河边，运来铜匙、象牙手镯、铁项圈、斧子、带倒钩的长矛、鞣制过的鹿皮、烟草等，同科伊人交换牲畜。从德兰士瓦西部有一条自西向东穿越整个高原、直到德拉戈阿湾海口的贸易商路。从西苏陀人居住区还有一条直达开普敦的商路。铜、铁、盐、烟草、象牙、牲畜和一些欧洲商品通过这些商路进行长途贩运。苏陀—茨瓦纳人通过这两条商路同欧洲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伦巴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各地酋长在通商要道或市集上开征路捐和商税。

在苏陀人中，佩迪人是最早建立集权王国的民族。他们居住在斯蒂尔普特河谷地带。这里是连接几个商路网的重要地段。锱铢必较、颇善经商的聪加商人也汇聚于此，用从内地收购来的象牙、牲畜和皮革等换取欧洲商人的珠子、黄铜和衣服。佩迪人有时也派遣自己的商队到沿海去，与德拉戈阿湾的欧洲商人直接联系。除象牙交易外，他们还将帕拉博鲁瓦出产的金属物品用来换取高维尔的农畜产品。对贸易商道的控制以及由此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促进了佩迪社会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形成。18世纪末，以马拉顿家族为核心的佩迪王国已基本建立，它拥有庞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其下包括若干臣属于马拉顿家族的酋长国，国王对属国拥有广泛权力，国王法庭是各酋长国的最高上诉法庭。国王处理土地纠纷，通过婚姻纽带（国王的姐妹和女儿嫁给各臣属酋长）加强臣属关系。酋长国下面包含若干规模不一的村社；村社

以下又包含若干拥有自治权的家族公社 (Kgoro)；正在茁壮成长的个体家庭则构成了部落社会的最小细胞。在这一系列阶梯之上高踞着佩迪国王。依靠层层隶属的牢固纽带和中央统一机构，佩迪王国在图累尔统治下政局安稳，国防巩固，在后来的迪法肯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越战越强。

与佩迪王国毗邻的文达王国，位于索特潘斯山北麓，滨临林波波河，向来被视为恩戈尼人和苏陀人的“化外之邦”。它与津巴布韦的绍纳人有深远的历史联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又受苏陀人的强烈影响。文达人开采墨西拿铜矿和索特潘斯南坡的铁矿，但冶炼和贩运金属制品则由伦巴人担任。伦巴人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大多生活在文达人或绍纳人社会里，曾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

南苏陀人主要包括福肯人、特洛科人和昆纳人，分别居住在卡利登河的东南、东北和上游河谷。这些地区原系科伊桑人住地，所以南苏陀人同科伊桑人素有交往，语言上也颇受对方影响，吸收了不少倒吸气音。近来考古发现证明，南苏陀人大概晚至 17 世纪才迁到高维尔的南缘。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高度分散。苏陀人抵达卡利登河流域后，迁徙群体便分布各地定居，有的结合成自治村社，有的成立较大的酋长国，但 50—100 人的村社是其基本形式。酋长、头人及其亲属构成村社的核心，村社允许收容一些无亲属关系的成员。酋长有权从虏获物中提成和收取贡物。其主要财富大半体现在畜群上，以牲畜贷给境况欠佳的村社社员，而把他们收容为扈从。酋长在宗教祭祀上也起主要作用。干旱气候使酋长注定扮演举足轻重的祈雨师角色，但在农事上他们也负责延请能人指导生产。村社头人遇有要事，都须同家族的长者或老人相商，或召开村民大会，村社民主制由此得以部分保持。各酋长国之间形成各式各样的隶属和依附关系。19 世纪初最大的酋长国是特洛科，拥有数千部众，其他酋长国大半很小。苏陀人喜欢分家独居，动辄率众脱离，因此小邦林立。19 世纪初，由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草场衰退，部落多在远地开辟牧场。酋长的年青儿子经常受命去管理这些牧场，他们便借此机会另建新村社。新村社远离中心，原部落鞭长莫及，新酋长大半成为独立首领。南苏陀人社会只要有剩余土地可以扩张、占用，就会不断发生分立。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其社会结构分散现象益趋严重，离心力普遍加强，因而一直未出现集权的国家。到迪法肯战争时期，南苏陀人部落成为最易遭受攻击的对象。

西苏陀人 (茨瓦纳人) 主要由赫鲁策人、北昆纳人和卡特拉人、罗朗人等组成。赫鲁策人的基地在齐勒斯特附近，18 世纪初曾是最强大的茨瓦纳人酋长国，疆土从今日勒斯滕堡到皮拉内斯贝赫。居住在赫鲁策人东北的北昆纳人于 18 世纪形成两个较大的酋长国——恩戈瓦基齐和恩戈瓦托。恩戈瓦基齐在莫勒塔统治时期 (1770—1790 年) 国势强盛，建都于石头城坎耶，18 世纪末与赫鲁策人不断发生冲突。恩戈瓦托酋长国在马西巴统治时期 (18 世纪 80 年代) 与昆纳王国发生战争，失败后迁往北方，在肖雄建都，90 年代塔瓦纳即位后又继续北迁，在恩格米兰建立新酋长国。卡特拉人分裂现象更为严重，其中一支东迁成为佩迪人 (属北苏陀人)，另一支为特洛科人分布在南高维尔和西高维尔各地区。

罗朗人是茨瓦纳人的西支，17—18 世纪在开普的西北和德兰士瓦的西

南建国，兴建了许多著名的石头城，如塔翁（首府）、迪赛康，18世纪初在塔乌统治下国势强盛。塔乌专横残暴，许多部民纷纷逃离，18世纪末建立独立的特哈平酋长国。罗朗王国本身终于分裂为四个酋长国。特哈平酋长国与周围的科伊人部落如科拉、巴拉拉有许多交往，科伊人向特哈平提供劳动力，后者则向他们提供牲畜，建立畜群。西茨瓦纳人的社会结构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酋长拥有很大权力，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又操分配土地、安排每年轮茬农活、对外贸易等大权。由若干家庭公社组成的村社（沃德 Ward）是单独行政单位，占有乡镇的一部分或单独形成乡镇，但它不是地理单位，其居民点、耕地、牧场并非互相毗连。村社的头人拥有广泛的权力，身份高贵，但最高权力仍握在酋长手中。酋长通过征收贡赋和敕命，使村社头人臣属于己。B·桑塞姆把这种酋长国说成是一种“部落庄园”，实际上它们仍是一种非洲型的村社。

茨瓦纳人酋长国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都是小国寡民。德兰士瓦西部高原辽阔、单调而贫瘠，能为居民提供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十分稀少而且雷同，茨瓦纳人只好集中居住于一些仅能养活有限人口的小块土地上，不但各酋长国规模受到限制，而且相距遥远，这些都阻碍了大王国的形成。

1790—1810年，南部非洲连年干旱，造成耕地和牧地的短缺和争夺资源斗争的加剧。到1820年，几乎所有西茨瓦纳人的酋长国都卷入连年不断的战争之中。

正在此时，来自德拉肯斯山以东的冲击波在苏陀—茨瓦纳人的众多酋长国中引起了一连串反应。如前所述，1821年恩德万德韦军队进攻居住在纳塔尔西北部的恩格韦尼人的马蒂旺酋长，迫使他率众涌向居住在德拉肯斯山麓的赫卢比人住地。赫卢比人曾替恩格韦尼人看管大批畜群，见马蒂旺人败北，便企图吞没恩格韦尼人寄看的畜群。马蒂旺发动进攻，击败赫卢比人，杀其酋长姆蒂姆克胡卢。赫卢比余众一部分南逃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加入了芬果难民队伍；一部分留在原地，在迁往纳塔尔西部以前，一度并入祖鲁王国；另一部分在姆彭加齐塔率领下，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德兰士瓦的高维尔。1822年，恩格韦尼人尾随赫卢比人之后一度占领赫卢比人原居住地区，但不久发现自己成为祖鲁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相继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高维尔地区。

与此同时，1821年，恩德贝莱人在姆齐利卡齐率领下，越过德拉肯斯山进入德兰士瓦东部。姆齐利卡齐是兹威德的外孙，属克胡马洛氏族。当恩德万德韦与祖鲁人交战时，他叛逃到祖鲁，成为恰卡手下一员大将，立过战功。其后，他因未按规定上缴足够的战利品而惹怒了恰卡，为免受惩罚，遂率部叛离，翻越德拉肯斯山西逸。

首先遭到赫卢比人攻击的是居住在德拉肯斯西麓重要隘口（今哈里史密斯一带）的特洛夸人。当时特洛夸人在女酋长曼撒蒂西统治下，她名义上代其幼子塞康耶拉摄政。赫卢比人将特洛夸人赶走。曼撒蒂西率众西迁，开始过流浪和征服生活。在此后两年中（1823—1824年），这两支敌对队伍不时相遇鏖战，但更多的是轮番劫掠卡利登上游的苏陀人公社。1823年，特洛夸人攻击莫舒舒的村寨，抢走大部分牲畜，却未能攻下其坚固的山寨堡垒，遂

继续南下，直到奥兰治河畔，因河水上涨而受阻。1824年，特洛夸人回师北上，再次围攻莫舒舒的布塔布泰堡垒长达两个月，仍未能攻克。特洛夸人在迁徙中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带上少量财物，赶着畜群，既收容沿途无家可归的流民，又不时打家劫舍，以补充给养的不足。1824年底，特洛夸人在卡利登河北岸的马拉本山筑石头城定居，塞康耶拉从其母手中接管了权力。安定的生活和牢固的防御，吸收了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前来归附。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塞康耶拉酋长国拥有14000名苏陀人、2000—3000名恩戈尼人，其疆土远抵卡利登河。特洛夸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不但顶住了战争毁灭的浪潮，而且因势利导，巩固和扩大了酋长国。

另外两支队伍都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赫卢比人再次翻越德拉肯斯山，被马蒂旺追踪。1825年，经过五天激战，赫卢比兵败，姆彭加齐塔被杀。赫卢比部落从此分别归附于恩格韦尼人、恩德贝莱人和莫舒舒部下。马蒂旺在卡利登地区称雄两年，直到1827年受到祖鲁军队再次攻击而南撤。1828年，马蒂旺率众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坦布人吁请开普殖民当局支援。恩格韦尼人受到坦布人、科萨人和殖民军组成的联军的进攻，在姆塔塔河附近的姆布霍隆波被打散，残众一部分归附莫舒舒，一部分成为芬果难民，一部分由马蒂旺率领返回祖鲁兰。不久马蒂旺被丁刚所杀，残部逃往斯威士兰。

以迪法肯为表现形式的部落兼并战争具有原始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赫卢比人、恩格尼人、特洛夸人和恩德贝莱人的劫掠队伍所经之地，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居住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之间的苏陀人公社几乎无一幸免。数以千计的居民四处逃散，或向北渡瓦尔河；或向西南在格里夸人（科伊人与白人的混血种）土地上暂获栖身之地；或进入南恩戈尼人酋长国；或迫不得已进入开普殖民地为白人农场主做工。在广大草原上，大半居民点化为废墟，畜群消失，耕地荒芜，不少地方白骨遍野。

这几支劫掠队伍的进攻，迫使德拉肯斯山以西广大地区许多酋长国的居民逃离居住地，汇入流浪、迁徙的人流。在流动过程中，他们往往既是被攻击者，同时也是攻击者。每个部落的流浪队伍，都按照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力量对比的强弱，变换地扮演强者和弱者的角色。各部落卷入迪法肯战争的最终结局不外三种：或者酋长国一败涂地而彻底瓦解，部民各奔东西；或者促进了社会政治机构的巩固和集中，在原酋长国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王国；或者跋涉长途，迁到遥远异域而重建王国，或湮没于漫长征途中。

茨瓦纳人（西苏陀人）在迪法肯战争中历遭磨难，创伤深重，大多落到第一种结局。腊策布率领的富信人和恩克哈拉汉耶率领的拉科纳人是最早一批遭到赫卢比攻击的酋长国，他们渡过瓦尔河后又去攻击茨瓦纳人。富信人依次攻击了塞勒卡——罗朗人、克加特拉人、昆纳人、赫鲁策人和恩戈瓦基齐人。拉科纳人接踵而至，同样又把这些茨瓦纳酋长国蹂躏一遍。1823年，富信人和拉科纳人联合对南茨瓦纳的特哈平人的繁荣首府迪森康发动攻击。格里夸人骑兵出动支持特哈平人，赶走了联军。拉科纳人抢渡瓦尔河，淹死许多人，拉科纳酋长国从此湮没无闻。富信人继续往北撤退，被恩德贝莱人击败。

T.Arbowsset,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Tour to the Northeast of the Colon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殖民地朔方探险旅行记事》), 1852, pp.85-86.

R.Edgecombe 认为，到1833年塞康耶拉的部民已达24000人。Cameron, op.cit., p.112.

分居在高维尔东部的塞贝通的福肯酋长国和莫勒黎的巴通酋长国，在1822年分别遭到特洛夸人和赫卢比人的攻击。两国结成同盟，联袂北渡瓦尔河，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赫鲁策人、恩戈瓦基齐人等）。1824年，莫勒黎在进攻福肯人的莫洛波河战役中被击退，但仍在莫洛波河北岸进行劫掠。1829年，鲁莽的莫勒黎攻击恩德贝勒人屡遭败北，从此失去了军事强国地位，暂栖菲利普波利斯，后返回故土。塞贝通率领的福肯人，此后以科洛洛人而著称，也屡败于恩德贝勒人。为暂避其锋，他们于1826年径直北上，进入博茨瓦纳，1827—1828年劫掠北茨瓦纳人的恩格瓦托人和塔瓦纳人。其后，为追踪恩格瓦托人，他们又进入博泰迪河，被当地饲养的大批长角牛所吸引，遂定都达乌湖（1829—1831年）。1831年，他们向恩加米湖进军，征服了塔瓦纳王国，1831—1835年在恩加米湖畔定居。虽然最强悍的苏陀人引兵西去，但茨瓦纳人诸酋长国仍未能安宁。

与此同时，1823年威名显赫的恩德贝莱人进抵瓦尔河建立基地后，旋即进攻昆纳人和茨瓦纳人诸酋长国，迫其西迁。1825年至1826年初，他们的劫掠范围远至西北的莫洛波河，罗朗人首当其冲。1827年，恩德贝莱人放弃瓦尔河基地，窜犯马加利斯堡山，进攻西部的茨瓦纳人酋长国（克加特拉特等）。1830年，赫鲁策沦为进贡国，一部分部落并入恩德贝莱社会。1832年，恩德贝莱人基地西迁到德兰士瓦西部的马里科河谷地，继续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昆纳人、恩格瓦基齐和罗朗人先后称臣纳贡，替恩德贝莱人服役，牧放畜群。茨瓦纳人的社会组织松散无力，各酋长国规模细小，散布在广袤的荒漠上，几乎未作任何努力去建立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大部分茨瓦纳酋长国在迪法肯战争中幸存下来，但衰弱不堪，几年后陆续被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轻而易举地征服。

北苏陀的佩迪人拥有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迪法肯战争中越战越强。1820年图累尔去世后，佩迪王国九个王子争位，内讧迭起，防务松弛。1822年，姆齐利卡齐率领下的恩德贝莱军队在攻击富信人之后进入斯蒂尔普特河流域，击败佩迪王国。姆齐利卡齐的众多人马盘据佩迪国土达一年之久，耗尽当地食物和牲畜资源，严重破坏了佩迪的经济基础。诸酋长国竟相争夺日见稀少的资源，使佩迪的政治机构日趋解体。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图勒尔幼子塞奎蒂，目睹山河残破、经济凋敝，毅然于1826年率众离别故土迁居他乡，重建王国。其后两年，塞奎蒂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或攻击四邻，或广结盟国收罗部众，扩大队伍。他将掠夺来的大批畜群分配给新近归附的部落，收揽人心。他与莫舒舒一样，不贪恋武力征服，重视基地建设，集中力量修筑山堡，巩固生产基地，吸引难民归附。1828年，他率众重返斯蒂尔普特河，并向索特雷斯山及其以西地区扩展，重建他在北部地区的霸主地位。到19世纪30—40年代，佩迪王国的力量和声威已超过迪法肯战前时期，使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不敢对它轻举妄动。

恩德贝莱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主要扮演攻击者的角色。姆齐利卡齐按恰卡军事制度建立起来的同龄军团勇猛善战，苏陀—茨瓦纳人望风披靡。但姆齐利卡齐却惧怕格里夸人和科拉人以火枪和骏马装备起来的骑兵。每次交锋，恩德贝莱人在火力上均居劣势，死伤狼藉，被夺走不少畜群。姆齐利卡齐只好乘夜幕下沉、敌方带着战利品撤走时，才敢发动反击，夺回畜群。1836年初，恩德贝莱在瓦尔河与侵入德兰士瓦的布尔殖民者的大迁徙队伍相遇。在以后两年中，姆齐利卡齐为捍卫黑人土地，与布尔人发生多次战斗（参见本

卷第 19 章)，互有胜负。1837 年 11 月 12 日，恩德贝莱人被迫退出马利科谷地，分两股向北撤退。第一股由首相贡德瓦纳率领的主力包括王族的妇女和小孩，经德兰士瓦北部、渡林波波河，进入津巴布韦的马托波山附近的布拉瓦约一带；姆齐利卡齐率领另一股人马取道西路，经博茨瓦纳的恩加米湖到达赞比西河南岸，而后折返南下，于 1839 年到布拉瓦约与贡德瓦纳会师。贡德瓦纳扎营于通巴尔山丘，等候姆齐利卡齐两个夏天，仍未见国王踪影，遂立其长子恩库路马纳为嗣君。姆齐利卡齐到布拉瓦约后闻讯大怒，杀贡德瓦纳及五大臣（“因杜纳”），王子恩库路马纳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疑案。

姆齐利卡齐在伊尼亚蒂建都，重建马塔贝莱王国。他发现绍纳兰地区恩哥尼人影响颇大，兹旺根达巴迁往赞比西流域后，其女将尼亚玛朱玛留在该地继续统治。姆齐利卡齐娶尼亚玛朱玛为妻，双方军队合并，两支恩戈尼人又融为一体，王国疆土扩大。姆齐利卡齐对毗邻地区恩威并重。他与东邻尚加人和睦相处，对绍纳兰人则无情吞并，将其适龄青年悉数纳入同龄兵团。各被征服民族融入北恩戈尼人后，逐渐形成马塔贝莱族。它包括三个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居民集团：北恩戈尼人（从祖鲁兰带出来的），苏陀—茨瓦纳人（从德兰士瓦高原吸收的），绍纳兰人（定居马塔贝莱兰后兼并的）。由于马塔贝莱人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域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这三个集团便逐渐形成具有不同身份的阶级：赞西集团（Zanzi）主要由讲恩戈尼语的人组成，武士和几乎全部朝廷重要官吏均从该集团中选任；恩赫拉集团（Enhla）主要由讲苏陀—茨瓦纳语的人组成；霍拉集团（HOLA）主要由绍纳兰人组成，属社会最低层，有的成员身份接近奴隶。三个等级之间严禁通婚。赞西集团的显赫地位使其他两个集团竭力模仿其语言和文化，终于使整个马塔贝莱王国采用恩戈尼的语言和文化。包括绍纳兰人在内的臣民都把自己看作是马塔贝莱人。而恩戈尼人统治者也部分接受其被征服者的文化，成为罗兹维宗教遗产的继承人。

姆齐利卡齐效法祖鲁军事制度并加以发展。在马塔贝莱王国，军队组织就是国家组织，兵团所在城镇既是军事中心，也是全体居民的行政首府。也就是说，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组织，而这样的组织正是公社以所有者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同龄兵团的成员有严格等级，既从事征伐，也从事生产。适龄入伍青年属“马采采”级，主要从事放牧畜群；在战斗中未立显著战功的战士属“马卡卡”级；已立战功并恩允结婚的战士属“曼多多”级。但曼多多级的战士结婚后，继续与兵团屯驻的城镇保持联系，仍负有随时应召、重服兵役的义务。不仅如此，他们的儿子也成为驻扎在其父所属的兵团城镇上的同龄兵团的成员。于是，兵团成员逐渐成为世袭，同龄兵团制度从原先以年龄为准绳的制度逐渐朝着类似地方酋长制的制度演化。不过，适龄青年在同龄兵团中仍处于因杜纳管辖之下，而不是在传统酋长管理之下。他们从小经受严格训练，在没有证明他们已血染枪头以前不准结婚。马塔贝莱战士与祖鲁战士一样剽悍善战，他们穿一式戎装：黑鸵鸟毛披肩，猴皮短裙，肘部、膝部和踝部都缚着白色牛尾，颈上插带翎毛，手持木柄标枪、圆头棒和牛皮盾。这支军队是林波波河以北赞比西河以南最强大军队，

恩德贝勒人北渡林波波河进入津巴布韦以后，就不再称恩德贝勒人，而改称马塔贝勒人。

一说是被秘密处死。

在 19 世纪末以前一直卓有成效地捍卫着津巴布韦国土免遭殖民势力的入侵。

塞贝通率领的科洛洛人在恩加米湖暂短定居以后，1835 年一度企图往西海岸进发，遇阻未成，便向北迁移。1835—1836 年，他们在利扬蒂（卡普里维）逗留两年，于 1836 年渡赞比西河，定居于卡富埃河与赞比西河的汇合处。不久，他们遭马塔贝莱人进攻。在科莫洛击败马塔贝莱人后，遂向西迁，沿赞比西河上游左岸上溯，进入巴罗策兰的洛兹王国地区。在新故乡，科洛洛人两次遭到尾随而来的马塔贝莱人的进攻，一次受到盘踞该地的恩哈巴部队的攻击。塞贝通教导科洛洛人在河水泛滥的平原、沼泽地区迅速学会驾驭独木舟的技术和熟悉地形的本领。依靠这两项技术优势，他们打败了恩哥尼人的所有进攻。他曾将恩哈巴部队诱入河心一座孤岛，把敌人饿得骨瘦如柴，不战而胜。恩哥尼名将恩哈巴也中计淹死于赞比西河中。

1838 年，塞贝通乘赞比亚境内的洛兹王国老王穆兰布瓦去世、诸子争位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征服该国。洛兹人一部分酋长逃往北部。塞贝通统治洛兹王国（巴罗策兰王国），施行民族和睦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他娶洛兹妇女为妻，遇事与洛兹长老协商，保留洛兹人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科洛洛文化与洛兹文化由此互相融合。塞贝通引进躯体庞大的南方牛取代赞比亚的劣种牛，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洛兹王国疆土扩展到整个汤加高原，东边远至维多利亚瀑布。1851 年利文斯敦到达洛兹王国，看到的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同年，塞贝通因伤致死，其子塞克莱图继位。他放弃了民族和睦政策，促使民族矛盾趋向尖锐。1864 年塞克莱图死后，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战。苟全于北方的洛兹王朝后裔在北部起事，推翻科洛洛人的统治，恢复旧王朝，然而“洛兹”的名称却消失了，出现的是“巴罗策王朝”，居民仍讲苏陀语方言。科洛洛人近 30 年的统治在赞比亚南方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家庭奴隶制仍是洛兹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特点。科洛洛的武士一般不劳动，而役使奴隶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大多来自贡纳或掳掠他族人民。这种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末。

六、巴苏陀王国的形成和莫舒舒一世的励精图治

在迪法肯战争中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是巴苏陀王国，它的创立者是莫舒舒（1786—1870 年）。战前，他是昆纳人在莫科特利的一个村社头人。据说，年轻时他就具有领袖的性格和远见卓识的能力，有机会受到莫纳亨人著名酋长莫洛米的直接教诲，立志要当伟大的酋长。莫舒舒所具备的素质使他在群雄逐鹿中最能适应国家形成时期苏陀社会的需要。

莫舒舒在迪法肯战争中以善于选择地形、坚持防御、屡次化险为夷而闻名遐迩，并因审时度势、运用妥协和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团结广大苏陀人而赢得声望。1823—1824 年，莫舒舒在布塔布泰两次击退了特洛夸人的进攻，

传说塞贝通要到大西洋岸的鲸湾向欧洲商人购枪。

D.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南非传教旅行和考察》), London 1858, pp.89-92.

莫洛米教导他，要成为伟大的酋长，一是权力不能靠法术得到，勇气才是法术；二要解救危难的人；三要与许多妇女结婚以扩大影响。参见埃伦伯格：前引书，第 185—187 页。

但攻守之中也暴露了该地区的弱点：地域狭窄，缺乏转圜之地，难以屯粮，致使坐受围困的部民缺粮挨饿。1824年，他率领部民南下，迁往卡利登谷地的塔巴博修。该区山顶平坦广阔，宽两英里，牧草优良，雨量适中，周围峭壁耸立，易守难攻，是极佳的天然防御堡垒。莫舒舒在此屯兵养民，凭借天险与敌周旋。守备固若金汤，从未被攻克。

莫舒舒多谋善断，对于来自德拉肯斯山以东的强悍尚武的敌人（北恩戈尼人），他极力避其锋芒，保全自己力量，并充分利用敌方矛盾，从中获利。1826年马蒂旺在卡利登河称霸，对莫舒舒勒索不已。莫舒舒熟谙地施展远交近攻、以敌制敌的策略，向远方恰卡纳贡称臣，引为奥援，并挑唆恰卡说，马蒂旺从中作梗，阻碍其向祖鲁纳贡。1827年，恰卡发兵惩罚马蒂旺，击溃其主力。同年7月，莫舒舒乘马蒂旺兵败之际，发动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解除了这股北恩戈尼人盘踞卡利登的心腹之患。莫舒舒还善于避免多方树敌，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发展力量。恩德贝莱人是最令苏陀诸部望而生畏的强敌。1831年3月姆齐利卡齐率饥饿之师进攻塔巴博修，目的是劫掠畜群以解枵腹之危。莫舒舒率军坚决堵击。苏陀人以雪崩似的落石和阵雨般的投枪，击退了恩德贝勒人的数次猛攻。损失惨重的恩德贝勒人被迫撤退。军队刚刚启动，莫舒舒派遣使者带来几头肥硕的公牛到阵前慰问。使者对恩德贝勒人说：“莫舒舒向你们致敬。他料想是饥饿把你们领到敝土，敬送贵军几头牡牛，聊供回程充饥。”这种“一笑泯恩仇”的慷慨行动，感动了恩德贝勒军队，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进攻过莫舒舒的军民。莫舒舒凭借天险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多次避免强敌袭扰，赢得宝贵时间，在塔巴博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玉米产量，繁殖牲畜，积贮剩余粮食，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在苏陀一茨瓦纳人的十几个酋长国中，只有巴苏陀酋长国在战乱中不仅保存了畜群，而且增加了牲畜数量，因而对饱受战乱之苦的班图难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在群雄割据初期，军事力量比莫舒舒强大的苏陀人酋长国数以十计，但他们都未能以武力统一诸部落。在灾荒连年、兵连祸结的时代，许多拥有实力的苏陀人酋长国几乎都变成掠夺成性的团伙，失去了成为民族凝聚核心的资格。唯有莫舒舒领导的莫科特利酋长国高举苏陀族团结的旗帜。他坚决打击那些劫掠成性的部落，在击败这些部落清理畜群时，凡发现有夺自其他部落的牲畜，便立即挑出奉还原主。他严饬部下不得无端掠夺毗邻牲畜，一有发现立即勒令交回，不得隐匿。1829年以后，莫舒舒连惩罚性的劫掠也停止了，把主要力量放在内政改革和发展生产上。这样，他在塔巴博修附近地区整顿了迪法肯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创造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正常生产的和平环境。

当群雄沉湎于报复性征伐和劫掠之时，莫舒舒广施怀柔宽宏政策，招徕了大量部民。有一个名声不好的酋长马卡勒莱投奔莫舒舒，部下大多反对接纳他。莫舒舒力排众议，主张收留他，并说：“谁也不得欺侮一个无家可归的过路人，即便他犯了错误。”莫舒舒心胸宽广，不记前仇。昆纳人一个老酋长马基瑟曾同莫舒舒为敌，屡有冒犯，后在困境中被莫舒舒属下酋长国所

G.Backhome,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Mauritius and South Africa, 1844(《访问毛里求斯和南非记事》), in Sources of African Past, p.53.

埃伦伯格：前引书，第189页。

俘。莫舒舒怨事不怨人，自己拿出 18 头牛把马基瑟赎出。1824 年，卡利登流域大饥荒，曾出现食人的悲惨景象。莫舒舒的老祖父皮特在从布塔布泰向布塔博修转移时，因年迈掉队被腊科仓的饥民掠食。后来，他们被莫舒舒部下俘获，部民要为皮特报仇，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死以祭奠老酋长，完成“洁墓”的礼仪。莫舒舒考虑到苏陀人口因战乱已经猛减，反对滥杀，但又不能违背习俗，于是便想出主意，下令杀一头牛，把牛肉剁碎贴在腊科仓人身上，算是替皮特“洁墓”而免其一死，从而保存下一批劳动力。莫舒舒这些宽宏明智的做法，给当时社会上仇杀成性的恶浊氛围注入了清新文明的气流，声望日隆。各地难民络绎不绝前来布塔博修投奔莫舒舒。巴苏陀酋长国人口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初的几百人增加到 1834 年的 25000 人，其中仅 1833—1834 年就有 12000 人从西部地区前来归附，到 1848 年增至 90000 人，1865 年已达 150000 人。卡利登流域的十几个酋长国纷纷归附莫舒舒，承认其最高宗主权。19 世纪 30 年代初，巴苏陀酋长国已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巴苏陀王国，建都塔巴博修，其疆土北自卡利登河源头、南迄北阿利瓦尔、西起塔巴恩丘、东部囊括整个莱索托高地。它所管辖的酋长国有昆纳、福肯、巴通、卡特拉、富锡、罗朗、科拉、格里夸、恩戈尼等十多个。

巴苏陀王国与各酋长国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独特的马菲萨制度（Mafisa）之上。莫舒舒王族拥有大量牲畜和卡利登河畔大片沃土。莫舒舒按马菲萨制向各酋长国提供苏陀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牲畜和土地，各酋长则依附和效忠于莫舒舒国王，并缴纳贡赋。酋长国若要解除其对巴苏陀王国的隶属关系，则必须交回所借的马菲萨牲畜和耕地。由于迪法肯战争打散了许多按血缘关系组合的旧部落格局，新酋长国多是来自各部落的难民依地缘关系重新组合而成，因而莫舒舒羁縻他们的马菲萨纽带是异常牢固的。与此同时，莫舒舒还不断以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婚姻纽带来加固诸酋长国同他个人的关系，扩大个人的影响。他娶各酋长之女为妻。1833 年他有 33 个妻子；随着王国版图的扩大，到 1864 年，他的妻子已多达 150 个。

但是，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布尔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逐渐侵入卡利登流域。巴苏陀王国既要消除群雄割据势力，又要抵抗外来殖民侵略，为此莫舒舒进行了一系列内部改革。

莫舒舒首先巩固国防，加强中央集权。当时特洛夸的塞康耶拉仍雄踞西北，不时劫掠，威胁着王国安全。1853 年，莫舒舒调集大军，彻底打垮特洛夸酋长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要害地区，莫舒舒把王国分成三大区，派王族子弟驻藩治理。1833 年，他派长子莱蔡和莫拉波偕巴黎传教士（顾问）驻守莫里贾；派其兄弟波苏理、莫哈勒镇守南边奥兰治区；自己驻守塔巴博修区，掌握中央全权。对于鞭长莫及的边远移民区，他则给予充分的自治权。为削弱地方酋长势力，莫舒舒打击巫师势力，制订《惩治巫术法》，规定将任何以巫术杀人者处死，从而使酋长无法通过巫师借刀杀人、滥施权势。

1859 年 9 月 6 日，莫舒舒公布《贸易法》，其施用范围远超出一般贸易，

P.Sanders, Moshoeshoe, Chief of Sotho (《苏陀人首领莫舒舒》), London 1975, P.70.P.Maylam, AHistoryofthe African PeopleofSouthAfrica (《南非人民史》), New york 1986, p.115.

原始的马菲萨制盛行于南班图人中，它是原始公社制度下贫富分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公社制度对贫富分化现象自我抑制的一种手段。富者（酋长等）把马菲萨牲畜租给或贷给公社贫穷社员使用（可随时收回），条件是使用者必须对所有者效忠。

实际上是一部涉外土地法。它除规定外商需经莫舒舒批准方准入境以外，明确规定禁止外国人在巴苏陀王国从事农耕和占有土地。法令庄严宣称：“凡我土地无寸土属白人所有；我亦不欲授寸土予白人，无论口头上抑或见诸条约”。巴苏陀王国严格执行以上规定，杜绝白人在王国境内占有任何土地。

其次，莫舒舒大力加强军事力量，他为此而进行的军事改革比恰卡更为彻底。他对苏陀战士的武器进行更新，把旧式的标枪、刺矛和棍棒等冷兵器换成近代火器。1830年，莫舒舒从科纳人手里获得第一批枪支，深知其威力。为获得大批枪支弹药，他让大批苏陀青年到开普殖民地做短工，用工资购买枪支带回本土。为打破殖民者1851年禁令，他鼓励武器走私，从私商那里购得大批枪支。他聘请欧洲工匠，帮助修理枪支和生产武器弹药。这几项有效的军备措施使苏陀王国火器数量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部队装备基本上近代化。为建立骑兵部队，莫舒舒引进马匹，带头勤奋学习骑射，迅速训练出一批善于骑射的苏陀骑兵。为解决马匹来源不足，莫舒舒又主持试验，培育出一种适于山地作战和运输的巴苏陀良种马。为配合骑兵作战，莫舒舒还实行战术革新。在1852年抗英战争中，巴苏陀王国仅骑兵就出动6000名。1858年同布尔人作战时，莫舒舒麾下已拥有10000名配有滑膛枪和来福枪的战士。

渴求知识的莫舒舒通过法国传教士，把欧洲文化引进巴苏陀王国。1833年，首批三名法国传教士来此，帮助建立欧式学校，创造了以拉丁字母拼写的塞苏陀书面语，许多苏陀人学会了读和写。1836年，第一部用塞苏陀语写的书籍出版。传教士教苏陀人缝制棉布衣服，建造欧式石房，种植新农作物和采用欧洲耕作方法（牛轭犁耕）和人工灌溉等。农业生产由此获得显著发展，巴苏陀农民成为出口小麦和玉米的生产者；国内仓廩充实，存粮可供数年食用。

莫舒舒励精图治的改革，增强了巴苏陀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速了它成为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在19世纪中叶的南部非洲影响深远。

G.Theal ed., *The Basutoland Records* (《巴苏陀兰档案》), vol. 2, pp. 536-537.

1851年，英国禁止在奥兰治河管辖区内向土著居民出售武器弹药。

南部非洲无野马。斑马虽属马科，产于开普山地，但不能驯为骑乘或使役。因此，苏陀人在1828年前尚未见过马。他们第一次见到人骑马，视为怪物，大感惊诧。

A. Atmore & P. Sanders, *Sotho Arms and Ammun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世纪苏陀的武器和弹药》),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4 (1971).

第十九章 南部非洲人民反抗英布殖民侵略

19 世纪上半叶，荷裔布尔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将殖民占领地逐渐扩展到南非的大部分地区。布尔人采取大迁徙——集体殖民远征的形式，英国采取有组织的系统的殖民形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他们的殖民均以牺牲非洲人为前提。非洲人丧失了广大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面对强敌入侵，非洲人不畏强暴，拼死战斗，保卫家园土地和妇孺。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时代，他们的反抗斗争——哪怕极其英勇——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压迫民族与非资本主义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双方的文化传统差别太大。非洲人不仅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上落后，而且氏族部落的传统所造成的分裂、内讧和离心力，也分散和抵销了本已有限的力量。布尔人和英国人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尽量使非洲人力量在内耗中进一步削弱，而后各个击破，在半个多世纪中，征服和兼并了祖鲁人、科萨人和苏陀人等大片国土。非洲人丧失了大片水利条件良好的肥沃土地以后，为了生存，只好到白人的农场和矿山去充当工资雇佣劳动者，或者拥挤在狭小、贫瘠的保留地中作为劳动后备军，勉强维持极度贫困的生活。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南非矿藏大发现以前，英国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新殖民地和保护国以及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对于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其经济价值都是很小的。

一、英属开普殖民地经济政治的变化

19 世纪最初几十年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产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使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英国的工业需要世界各地为它提供广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鉴于开普殖民地的特殊战略地位，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和会上，英国决定不把开普殖民地归还荷兰。此后，英国便着手将这块殖民地发展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式的商业—移民殖民地。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工业从生产军事物资迅速转入生产纺织品、刀叉餐具等民用产品。英国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创业，到处建立商业联系。在南非，英国商品靠牛车长途跋涉输入内地和东部边区；靠近海航运输输入东南沿海。英国移民居住区也从开普敦向东部边区扩展。

战后，英国 30 万复员士兵和水手拥入劳动力已经过剩的国内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为缓解这一困难，决定向开普殖民地有组织地移民。1820 年，首批移民 10000 人到达南非；1844—1847 年移民 4300 人，1857—1862 年移民 12000 人。英国在 40 年中向南非移民的人数超过荷兰在 160 年中移民人数的十倍以上。英国首批移民中的 5000 人在伊丽莎白港登陆，主要定居在楚尔费尔德地区。数千移民及其家属的定居，急遽增加了当地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1812 年，由科斯腾航运公司为运输咸牛肉而开辟的从开普到阿尔戈阿湾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货运激增，运价下降，大大促进了沿海和内地贸易的发展。从东部边区首邑赫拉夫里内特到开普敦的 600 多公里路程，如今已不必全程使用牛车，到伊丽莎白港便可由海路转运，这就形成一条以伊丽莎白港为起点、径向奥兰治河以北地区延伸的新商路。内

De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史》), Oxford 1964, 70 - 7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 362.

地出产的大批黄油不必转道开普港,可直接由伊丽莎白港直航毛里求斯。1830年,停泊该港的远航帆船已有50艘;1835年增至75艘。

19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富有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日增。以象牙制作刀叉餐具的柄、台球和钢琴键而成为时尚;以鸵鸟羽作帽饰、以珍贵毛皮作服饰,成为欧洲上层妇女的流行服装。因此,南非生产的象牙、鸵鸟羽、珍贵毛皮、犀牛角的价格上涨,直接刺激狩猎业和珍稀产品的出口猛增。开普的象牙出口值从1813年的3英镑增加到1825年的16500英镑。虽然西南开普的小麦、葡萄酒价格长期疲软,但东开普的畜产品价格一直看涨。嗜好牛肉的英国移民的增加(荷兰人爱吃猪肉),使咸牛肉销路大增。作为肥皂原料的油脂销路虽一时受进口的廉价肥皂冲击,但很快转产蜡烛,由伊丽莎白港出口,也打开了新销路。尤其是英国毛纺织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直接引起对羊毛原料成十倍的需求。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竭力将开普殖民地建成第二个羊毛产地。美利奴羊在南非饲养成功,羊毛产量1834年已达14.1万磅,1838年增至49.1万磅。自1810年起,羊毛输出逐年增加,1833年绵羊头数增至294万头,1846年羊毛出口值达295万英镑,超过肉类出口。1860年输出羊毛2500万磅。畜牧业的长期繁荣,不断吸引开普敦人口向东部边区迁移。

东部边区的地方市场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1823年,赫拉夫里内特已形成拥有1800人的市镇,楚尔费尔德地区的格雷厄姆斯敦从军事据点发展成拥有2500名居民的东南重镇;距奥兰治河仅12英里的科尔斯伯格和克拉多克也成为新的地方市场中心。形成中的地方市场增加了对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火器和弹药、牛车及其零部件、茶叶、咖啡、大米、糖、白兰地酒、亚麻布制品和节日服装等成为畅销货。行商的活动地盘越来越广阔。行商多为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他们集资三四百英镑,以地方市场为基地,带着两三辆牛车的货物,走乡串村,深入到最偏远的农场,出售各种衣料、杂货以至武器弹药;或按订单送货上门,同时收购各种畜产品、象牙、毛皮和鸵鸟羽。行商成为农场主同沿海港口之间的经济中介人。历史学家纽马克曾指出,若无行商维系着迁徙者与沿海港口的联系,就不可能出现大迁徙。

开普殖民地的这些经济变化,意味着它的经济格局已由单一经济中心渐向多个经济中心转变。随着东南沿海航运的发展和贸易中心的形成,北部地区的居住条件日益便利,越来越多的布尔农场主迁入北方。1824年,英国政府规定以奥兰治河为开普殖民地的北界,不许布尔人越界居住。1825年,许多布尔农场主不顾英国禁令,以躲避蝗灾和旱灾为名,赶着畜群涉渡奥兰治河。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数以百计的布尔农场主赶着满载家具的大篷车,阖家搬到北岸地区定居。以科尔斯伯格市镇为基地的行商,尾随向北岸迁徙的布尔农场主,维持着他们与殖民地商业网之间的联系。新的贸易中心成为开辟北部地区和向北殖民扩张的据点。但是,最初几批到奥兰治河北岸地区定居的布尔农场主并未显示要脱离开普殖民地的迹象。他们仍然认为自

一 说 1824—1825年为19317磅。D.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对南非边疆的经济影响》), Stanford 1957, p. 154.

Neumark, *op. cit.*, p. 77.

C. Sau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历史词典》), London 1983, p. 60.

D. Neumark, *op. cit.*, pp. 145 - 150.

已是英国臣民，要求殖民政府给予他们新占领的土地以法律上的承认。每年他们从北岸骑马涉河，到南岸的科尔斯伯格来缴税。

随着开普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布尔农场主逐渐分化成不同阶层，已有富裕、中等富裕、较穷和赤贫之分。富裕农场主拥有较多黑人奴隶和大量科伊仆役（或有色人仆役），资金充足。其中住在开普西区的，多经营蔬菜、水果、酿酒和谷物生产；住在东部边区的，主要从事畜牧业，也兼营种植业，一般拥有 6000—10000 头羊。中等农场主多居住在东部边区，拥有足够使用的科伊仆役，主要经营畜牧业，一般拥有 3000—6000 头羊。有的也向城镇奴隶主租赁黑人奴隶，经营种植业。较穷农场主大多住在北部边区（新区）和东部边区，没有也不使用奴隶，只拥有几个科伊仆役，缺乏土地或好地，一般只有 500 头羊或 50 头牛。赤贫农场主多是刚从西区流入的退伍军人和逃亡水手，或刚分家迁往新区、尚未占有土地的年青人。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茅屋，家具简陋，衣衫褴褛，但尚未沦为雇佣劳动力，还没有丧失获得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可能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巴罗曾生动描述过赤贫的布尔人如何当上农场主的过程：“他开始自己谋生时一无所有，通常是由他妻子的朋友借给他几头牛羊去饲养，每年下的羊羔和牛崽的一半作为利息还给债主。除衣服、茶等以外，他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须靠自给。活茬都让霍屯督人（科伊人）去干。霍屯督人除了肉（大多是羚羊肉）、马铃薯和毛皮外，不消费他任何东西。他的房子和家具都是自造的。他不需要置备各种农具。他唯一需要购置的最昂贵的东西是一辆价值 400 里克斯达勒（荷币）的牛车。他还需购买一枝毛瑟枪和少量火药、铅粒，这将给他全家（包括仆役）提供足够的野味。殖民地边区的南非小羚羊十分丰富，极易捕捉。”

南非的广阔土地可以随意占领，又有科伊人可供奴役，因而没有任何白人移民愿意去充当雇佣工人。这就是布尔人内部阶级分化长期延缓、将近 200 年时间没有分化出雇佣工人的奥秘。但是，这种任何白人殖民者均可当地主的状况，只是有利于不断再生产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十分不利于开普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英国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要将帝国的所有殖民地变成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普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和现行政策显然很不适应这种要求。因此，英国需要对这块愈益受到重视的殖民地的一些有碍其剥削当地人民的过时的社会和政策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利于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土地政策方面，英国政府作出几项新规定。第一，把传统的租地农场的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永久所有权，今后凡取得土地均需付款纳税。1832 年。英国政府宣布开普殖民地的“皇家土地”不再随便分发，一律改为公开拍卖。第二，不许英国臣民（布尔人）越出殖民地边界占有土地。1824 年规定奥兰治河为北部边界。第三，在东部边区新占领的凯河地带的土地让与，只限于英国人以及为英国当局服务而戍边的科伊混血种人。新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移民（主要是布尔人）不付报酬地随意占有大片土地，并以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吸引农业投资，以发展新兴的羊毛业（美利奴羊）。新政策遭到布尔农场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新政策意味着他们及其子孙将要为“自

己与生俱来的获得土地的权力”而付出费用。1832年盛传谣言，贫穷布尔人将丧失其租借农场。这种恐惧推动着许多贫穷布尔人涌向奥兰治河北部地区。

在劳动力政策方面，英国殖民政府于1828年发布第五十号法令（《关于改善霍屯督人以及开普其他自由的有色人种的处境》），废除了对科伊人的一些歧视性限制：取消通行证制；改革学徒制；废除限制科伊流浪人的规定；科伊人占有土地合法化。英国殖民当局越来越感到科伊人和有色人的人身依附制同开普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难以相容，它自己1809年制定的《霍屯督人条例》无异作茧自缚。新政策开放了劳动力自由市场，使科伊人为较高工资所吸引，受雇于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通常是英国新移民）。对于布尔农场主来说，新政策无异于毁掉他们所实行的农奴制的基石。他们认为在现政策下，继续维持对科伊劳动力奴役的唯一办法，是将科伊仆役带出开普殖民地，在边界以外的广大地区，不受英国干预，重新建立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合适关系。在后来的大迁徙中，他们带走了14000名科伊仆役。

1833年底，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英国在所有殖民地（包括开普殖民地）宣布，自1834年起废除奴隶制。显然，释放奴隶对于不拥有或不使用奴隶的贫穷农场主的直接影响很小；对于拥有奴隶的富裕农场主才会造成财产损失；对于使用（租赁）奴隶的中等农场主则只有劳动力的损失。但布尔农场主最感愤怒的与其说是给予奴隶自由，不如说是让奴隶同白人处于平等地位。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人人平等”，触动了渗透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布尔农场主的最敏感的神经。他们忿懑地表示：“如果让奴隶享有与基督徒平等的地位”，“我们宁愿离开”。

在其他政策上，英国逐渐以严格的统治代替荷兰的松弛的控制，并且明或暗地实行英国化。布尔人以市民议政会（有咨询权和选举权）为基础的旧政治体制，渐渐被英国专制的殖民制度所取代。以前由市民选举并向市民负责的区长、参议员和民团司令，到19世纪30年代，也均由只对总督和省督负责的英国官员所代替。30年代中期，英国在北部和东部边区所实行的政策愈益严格。1836年，鉴于科萨人拼死抵抗而英军无力死守，英政府决定退出在第六次卡弗尔战争（参见下文）中刚占领不久的阿德莱德区（凯河和凯斯卡马河之间土地），这件事引起长期企图占领这片水源良好的东部沿海走廊地带的布尔农场主的强烈抗议。同年，英国议会颁布《好望角惩罚令》，宣布开普殖民地法庭对南纬25度以南地区的一切英国臣民（包括布尔人）负有全责，将英国的管辖权远远地推广到瓦尔河以北。

极端保守的布尔农场主对英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以致心理上难以承担，竟担心这些改革将给革命打开闸门，而无地的黑人将夺回他们的农场土地。1836年第四季度，大批惶惶不安的布尔农场主涌出开普殖民地的北部边界，渡奥兰治河北去。这就是布尔人大迁徙的开始。

Walker, A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史》), London 1957, p. 187.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剑桥大英帝国史》), vol.8, p.295.

R.Oliver & Atwore, Africa Since 1800 (《1800年以来的非洲》), Cambridge 1972, pp. 60-61.

D.Robinson & D.Smith ed.,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非洲史料》), p.31.

R.Oliver & Atwore, op.cit, pp.60-61.

D.Deoum & B.Nyeko, Southern Africa Since 1800 (《1800年以来的南非》), Long man 1984, p.76.

二、布尔人大迁徙和祖鲁人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

布尔人大迁徙是一次殖民土地扩张的远征。在 1836 年以前他们已经为大迁徙作了多年的勘察和准备工作，1834—1835 年曾派出三支勘察队。在选择迁徙路径上，他们有意避开那块穿过科伊混血种人居住的格里夸敦、库鲁曼地带而进入林波波河源头的西线地区，因为那一带英国殖民政府派遣的史密斯中非探险队已经同当地酋长建立了联系。布尔人的第一支勘察队伍由比勒陀利乌斯率领进入纳米比亚；第二支由斯乔尔兹率领，经由卫斯理教会在西卡利登谷地建立的移民地，而后越过东高维尔，到达索特潘斯山；第三支由彼得·厄伊斯率领沿旧商道进入祖鲁人的纳塔尔。三支勘察队返回开普殖民地东区后，在秘密会议上报告了北方情况；适于种植庄稼的最肥沃土地是在纳塔尔；最好的牧场则在南部和东部的高维尔地区；通往纳塔尔的最好的牛车道是通过高维尔翻越德拉肯斯山中段山脉；最北部的索特潘斯是林波波河谷地最佳猎象区，象牙可通过葡萄牙港口伊尼扬巴内或洛仑索马贵斯出口。勘察队的乐观报告，激起了布尔农场主对北部黑人土地的贪欲。

1835 年，两支布尔人猎象队首途出发，一支 30 多人由特里卡特率领，另一支 49 人由范伦斯堡率领。两支队伍在奥兰治河畔会合后，分别向北进发，1836 年 4 月在瓦尔河又重会一次。范伦斯堡决定前往伊尼扬巴内，后在林波波河下游谷地被索尚加消灭。特里卡特的队伍在北部盘桓经月，于 1837—1838 年由操英语的聪加商人作向导，向洛仑索马贵斯进发。

1835 年末，波特吉特和塞里尔率领 60 个布尔人家庭从塔卡和科尔斯伯格出发，渡奥兰治河北上。1836 年中，他们一度定居在塔巴恩丘以北由巴通人酋长马夸纳管辖的土地上。波特吉特玩弄欺骗手段，以 49 头牛的低价从马夸纳酋长手中买到今奥兰治自由州北半部的土地。而后波特吉特独自带几个人骑马北上索特潘斯山，探寻前往德拉戈阿湾的道路，无功而返。在波特吉特北上之时，恩德贝莱国王姆齐利卡齐发现白人未经允许窜入其辖区，滥捕猎物，虐待居民并擅自占地。1836 年 8 月，他派兵赶走并消灭了两小股布尔人。波特吉特在瓦尔河南岸与其大队人马汇合时，发现其下属两个小分队已被恩德贝莱人消灭。10 月 16 日在维格科普，姆齐利卡齐派部将凯利皮率军围攻布尔人的牛车阵，波特吉特击退了恩德贝莱人，但丧失了所有拖挽公牛。他得到罗朗人的帮助，莫诺卡酋长赶来一批公牛把他们拉到塔巴恩丘。在这里，波特吉特与新近从赫拉夫里内特来的马里茨的队伍汇合。1836 年 12 月，两股队伍举行会议，选举波特吉特为兵团司令，马里茨为人民会议主席和法庭审判长。波特吉特利用苏陀——茨瓦纳人同恩戈尼人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格里夸人和罗朗人的支持，决定对恩德贝莱人进行报复性掠夺。1837 年 1 月 17 日破晓，以罗朗人为向导，布尔人和格里夸人等组成联合骑兵队，沿着未设防的库鲁曼路线，偷袭恩德贝莱王国的首府莫塞加。当时，恩德贝莱人大军远征在外，城寨只有老弱妇孺。波特吉特纵火烧城，屠杀居民，夺走所有牲畜。当时刚到达莫塞加设传教站的美国传教士目睹了这一切。

波特吉特同马里茨因分赃虏获品（牲畜）发生争执，又为争夺牧师职位而龃龉，濒临分裂。1837 年 6 月因雷提夫的到来，暂时避免了分裂。雷提夫原是阿尔伯尼区的兵团司令，在布尔农场主中颇有威望。当英国宣布英军撤出科萨人的阿德莱德地区后（1836 年 10 月），他辞去职务，率领 400 名布

尔人参加大迁徙队伍，并于 1837 年 2 月 2 日发表《迁徙的农场主宣言》，代表所有参加大迁徙的布尔农场主，宣告他们将迁往长久居住的国土，以维持他们与科伊奴、黑奴之间合适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布尔农场主参加了大迁徙，有上千辆牛车和四五百名布尔战士汇聚于塔巴恩丘。经过几个月筹备（4—6 月），1837 年 6 月 6 日，各路迁徙队伍聚会温堡，决定成立一个新国家——新荷兰，并通过九条宪章，计划在到达纳塔尔以后请求荷兰国王重新接纳他们为臣民。会议选举雷提夫为总督和民团总司令。但这个新荷兰国家成立不到四个月就发生裂痕。波特吉特和厄伊斯不满雷提夫派和马里茨派占据了几乎所有高级职位，并在今后去向问题上发生争执：雷提夫主张迁往尚有许多无主之地和港口的纳塔尔；波特吉特则打算去德兰士瓦；厄伊斯背弃宪章，想把自己一伙独自带进纳塔尔。

1837 年 10 月，雷提夫带领自己一部分队伍朝着进入纳塔尔的必经之道——德拉肯斯山隘口进发。波特吉特则率领一队民团去进攻恩德贝勒人，以便占领德兰士瓦。此时姆齐利卡齐正遭受来自几方面的进攻：丁刚发动对他的第二次讨伐；拥有火器装备的格里夸人又几次掠走其畜群。他计划效法塞图安，向北发展，已派凯利皮率先遣队勘察北部土地。11 月，波特吉特率 330 名布尔骑兵和 50 名罗朗人步兵对恩德贝勒人进行追击，沿途烧杀，激战九天（11 月 4—12 日），迫使恩德贝勒人退出马里科谷地。在首府卡潘失陷后，姆齐利卡齐毅然决定涉渡林波波河北上，以便赶在雨季结束之前在新土地上播种谷物。11 月 12 日，布尔人骑兵追到德瓦尔斯贝赫山顶，目睹恩德贝勒人涉渡马里科河、穿过锡夸内峡谷消失在远方。恩德贝勒人的北上，使德兰士瓦土地上失去一支最强大的捍卫力量，给布尔人的殖民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

1837 年 10 月中旬，雷提夫令大队人马暂屯德拉肯斯山隘口，自己带十数骑到纳塔尔港，就建立纳塔尔的布尔人殖民地，取得当地英国商人的支持。10 月 19 日和 11 月 8 日，他从纳塔尔港致信丁刚，要求后者让布尔人在毗邻祖鲁领土的无人地带居住。雷提夫语含威胁地说：姆齐利卡齐的不妙下场，就是行为不端的国王的下场。接着，雷提夫率 15 名骑兵窜入祖鲁首府姆冈冈德洛武，向丁刚索取土地，未果。1838 年 2 月 3 日，雷提夫率 71 名骑兵和 30 名科伊仆役再次进入祖鲁首府。他大肆夸耀布尔人如何打败恩德贝勒人。在场的英国传教士记载说，当时雷提夫一行绕城骑行，进行威胁，向空中放枪，恫吓祖鲁人。此时布尔人迁徙大军已从德拉肯斯山隘口源源开进纳塔尔的图盖拉河流域，占地建立农场。丁刚决定消灭这股不速之客，以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雷提夫要求丁刚在一份割让土地文件上画押。为了麻痹敌人，2 月 4 日丁刚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之后，他以举行战舞表演为名调动军队。2 月 6 日，在为雷提夫一行举行的送别集会上，丁刚下令祖鲁战士逮捕雷提夫及其随从，并全部处死。

2 月 16 日，祖鲁军在图盖拉河流域消灭了占领布须曼河和布劳克兰河之间土地的布尔农场主。随后几个月，祖鲁军摧毁了纳塔尔境内几乎所有的布

D.Robinson & D.Smith, *op.cit.*, p.31.

D.Robinson & D.Smith, *op*, *cit*, pp.32-33.

究竟有无这个割让土地的文件，历史学家聚讼纷纭。Cory 在《南非的兴起》一书中曾认为这个文件是伪造的。

尔人堡垒和农场。3—4 月间，德班港殖民者劫掠当地祖鲁人牲畜、妇女和儿童，丁刚命令其弟姆潘达率军焚毁德班港，英国殖民者退避船上。1838 年 4 月，祖鲁军在埃塞伦尼击败了从德兰士瓦驰援的波特吉特和厄伊斯的数百名援军，击毙厄伊斯。波特吉特退往德兰士瓦，从此不敢再同祖鲁军作战。9 月，马里茨在东部边区援军到来之前就去世了。侵入纳塔尔的布尔人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在祖鲁人不断反击下，布尔人遭受自 1835 年开始大迁徙以来最惨重的损失，3500 人中死去 350 人。布尔农场主各自逃散，溃不成军。

残存于纳塔尔的布尔农场主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一致请求开普殖民地赫拉夫里内特边区的民团司令官比勒陀利乌斯前来领导他们。11 月 20 日，比勒陀利乌斯被任命为布尔军总司令。他着手整顿民团纪律，征募 500 名精干骑兵，装备 57 辆满载弹药辎重的牛车，配备 2 门小炮。12 月 15 日，进入纳塔尔的布尔骑兵前哨与祖鲁前锋接触。比勒陀利乌斯在恩康姆河河套上摆下环形牛车阵，把几十辆牛车首尾相接，利用深邃的河水掩护背后的侧翼。布尔人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上都占有优势。他们在防守时利用牛车作为掩体，发挥枪炮的密集火力；追击时以骑兵开路，从马上射击挥砍。祖鲁军除少数人拥有火器外，绝大多数人只有刺矛和投枪。布尔人燧发枪的射程为祖鲁人投枪掷程的两倍，对密集队形杀伤力尤大。祖鲁军在军事上本有突袭和设伏的优势。12 月 16 日凌晨，祖鲁战士排成密集的公牛角阵，惊天动地呐喊着向布尔人的牛车阵发起冲锋。血战持续了两个小时。祖鲁战士轮番持矛冲锋，伤亡惨重。丁刚下令撤退。布尔骑兵纵马狂追。祖鲁军被击溃，伤亡 3000 人，鲜血染红了恩康姆河，血河因此得名。

血河战役后，布尔军乘胜进击，占领祖鲁王国首府，丁刚退往北方。布尔人利用祖鲁王国发生内讧、一些酋长反叛、姆潘达觊觎王位之机，多方拉拢收买，拼凑反丁刚的势力。1839 年 3 月，在内忧外患交逼下，丁刚被迫答应图盖拉河以南土地由布尔人占领，并赔偿 1000 头牲口和 10000 公斤象牙。丁刚返回首都，重建姆冈冈德洛武。1839 年 10 月，姆潘达率 17000 人和 27000 头牲畜叛离丁刚，投靠布尔人。1840 年 1 月 30 日，在布尔军支持下，姆潘达在姆库齐河以北的马康科击败丁刚。布尔人乘机大掠，抢走 60000 头牲口，掳掠众多黑人儿童。1840 年 2 月 18 日，姆潘达由布尔人加冕为“祖鲁王”。登上王位后，姆潘达把图盖拉河至白乌姆福洛齐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奉送布尔殖民者。祖鲁王国只剩下半壁河山，成为布尔殖民者的附属国，偏安一隅。丁刚于 1840 年在斯威士兰境内去世。

三、布尔人共和国的形成

在战胜祖鲁人以后，6000 名布尔人定居在已被征服的纳塔尔土地上，并着手建立国家。各路迁徙队伍之间矛盾重重，经过调和、妥协，终于在 1840 年 10 月达成协议，宣布成立纳塔利亚共和国，以彼得马里茨堡为首都，以荷兰国旗的颜色作为共和国国旗底色。纳塔尔立法议会名义上是所有布尔移民的最高立法机构，在德兰士瓦高原成立分会，但从一开始议会权力就只限于纳塔尔。布尔共和国在成立宣言中悍然宣称，它接管图盖拉河与乌姆福洛齐河之间的整个地区以及整个海岸和已发现或将发现的一切港口。布尔农场主

争先恐后抢占或圈占属于非洲人的土地。在 1842 年以前，各布尔人公社就占领了水牛河——图盖拉河和姆齐姆库卢河之间的所有土地。

英国对纳塔爾的态度长期犹豫不决。自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纳塔爾港（德班港）英商屡次要求英国政府兼并，英国考虑当地无利可图，曾予拒绝。布尔人占领纳塔爾最初两年，英国政府倾向于让其自行其事。但不久，荷兰和美国船只先后到达纳塔爾海岸，引起英国忧虑，担心英国海军将丧失对南非海岸的控制。而布尔人为了兼并更多土地，将纳塔爾土著居民当作多余人口强行遣送到庞多兰，引起纳塔利亞共和国同法库酋长的冲突，这便给予英国干涉的借口。1842 年 5 月，英国派史密斯上尉率英军 250 人，由庞多兰进入纳塔爾，占领德班港。布尔民团把英军围困在德班近两个月。7 月，英国援军由海路赶到纳塔爾，布军防线迅速崩溃，7 月 5 日，布尔军投降。1843 年，英国正式宣布兼并纳塔爾。近 6000 名布尔人不愿意重新接受英国统治，陆续离开纳塔爾，翻越德拉肯斯山西去高原地带。到 1848 年比勒陀利乌斯离开纳塔爾时，只有几百名布尔人留在纳塔爾，他们组成的克列普共和国同年也被并入纳塔爾殖民地。布尔人一去，英国移民就接踵而来。从此，纳塔爾成为南非讲英语居民最多的地区。英国派熟谙非洲土著事务的谢普斯通来治理纳塔爾。谢普斯通在纳塔爾推行对南非历史影响深远的土著保留地制度。1856 年，纳塔爾从开普殖民地中分立出来，成为单独殖民地，并成立了一个权力有限的代议制政府和立法议会。

波特吉特自从 1838 年 4 月被祖鲁人击败后，便决定在高维尔地带建立自己的势力。他从巴通人酋长马夸纳手中买下瓦尔河和费特河之间的土地以后，便将这些由他个人控制的土地分配给效忠于他的部下。温堡地区的其他布尔农场主拒绝接受波特吉特的统治。波特吉特撤到瓦尔河以北地区，并于 1839 年 10 月宣布他对原由姆齐利卡齐统治的土地拥有通过征服取得的所有权，这份所有权的证书由几个亲布尔人的苏陀人酋长签名画押作证。波特吉特以波切夫斯特鲁姆为其首府，成立市民委员会作为纳塔利亞共和国议会的一个分支。1844 年随着布尔人从纳塔爾撤出，他便宣告议会独立，结果导致高原地区布尔人的彻底分裂。温堡地区白莫克领导的布尔人拒绝承认波切夫斯特鲁姆的市民委员会。此后，高维尔地区的布尔人分裂为三个各自独立的殖民共同体：波切夫斯特鲁姆、温堡和南卡利登。较小的南卡利登殖民共同体由奥伯霍泽领导，向格里夸人首领亚当·科克和苏陀王国国王莫舒舒一世缴纳贡税，并宣布忠于开普殖民地英国政权。1842 年，温堡地区布尔人无视亚当·科克和莫舒舒的主权，扬言“按圣经，白人不应受黑人统治”，遂宣布奥兰治以北高草原地区独立。1844—1845 年从纳塔爾撤出的数以千计布尔人进入温堡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温堡殖民扩张的势力。布尔农场主不断蚕食格里夸人和苏陀人土地，双方屡次发生战争。

波特吉特一伙布尔人在瓦尔河以北地区继续向东北扩展，以期越过英国划定的 25 度线，并寻求一个不受英国控制的海港。他们于 1845 年在奥里赫斯塔德、1848 年在索特潘斯贝赫建立了新殖民地；1849 年又放弃奥里赫斯塔德，南迁到莱登堡。随着养羊业的兴起和人口增长，这伙布尔殖民者逐渐从德兰士瓦的周边地区向地势较高的中心地带扩展。他们的土地扩张引起与当地非洲人一系列冲突。佩迪人在塞克瓦提国王领导下同布尔人进行了长期艰

后来的皮拉内斯贝赫、马加利斯堡等城便是以这些酋长的名字命名。

苦的斗争，在卢卢丛山中维持王国的独立，1857年与莱登堡共和国划定以斯蒂尔普特河为界。文达王国同布尔殖民者的不断冲突，只是到1867年布尔人放弃了索特潘斯贝赫大部地区以后才基本结束。在西界，茨瓦纳各酋长国遭受的土地损失最大，布尔殖民者一直向西扩展到哈茨河和莫洛波河。拥有火器的茨瓦纳人坚持抵抗，挡住布尔人继续向西扩张。布尔人力图收缴茨瓦纳人武装，屡次威胁要洗劫昆纳人、克卡特拉人、胡鲁策人和罗朗人的村寨。茨瓦纳人多方搜集购买火器，并从英国传教士利文斯敦主持的传教会得到火器供应。布尔人慑于其拥有可观的火器，不敢贸然进攻，只能去攻击弱小的酋长国如科帕、恩德宗德扎等，并兼并其土地。

1849年，为了协调利益，共同镇压非洲人的抵抗，瓦尔河以北几个各行其是的布尔人集团在代德普特开会，决定成立一个统一国家，国名定为南非共和国，并组织中央议会。但统一仍停留在纸上，中央议会很少开会，出席者寥寥，各集团仍不受中央议会管辖。1852年，英国改变拒不承认布尔共和国的政策。自由党政府权衡利弊，决定让布尔人留在贫瘠的草原上，由布尔人来对付非洲人。在桑德河谈判中，德兰士瓦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各集团矛盾重重，竟派不出一个统一代表团进行谈判，比勒陀利乌斯遂以布尔人领袖身份前往谈判。桑德河谈判达成如下协定：布尔人保证英国在德兰士瓦境内自由贸易；英国则承认瓦尔河以北布尔人独立，禁止开普殖民地商人向非洲人出售火器。桑德河协定为布尔人打开了肆行兼并非洲人土地而无须顾忌英国干预的道路。1852年以后，德兰士瓦布尔人变本加厉掠夺非洲人土地和童奴，屠杀非洲人的事件层出不穷。1854年，彼德·波特吉特率兵讨伐拉拉人，封锁拉拉人避难的山洞，造成3000人被杀和饿死的惨剧。

1854年2月，英国与奥兰治（温堡）地区布尔人缔结布隆方丹协定，承认奥兰治独立，后者改名为奥兰治自由邦。

两个布尔共和国成立后，内部仍是分裂的。议会形同虚设，效率极低，所谓“国家”仅是一些名不副实的“土地共和国”。1853年比勒陀利乌斯去世后，其子马提努斯（亦称小比勒陀利乌斯）继位。小比勒陀利乌斯野心勃勃，妄图统一奥兰治河以北所有布尔人。1854年，他到温堡策动政变，企图吞并奥兰治自由邦，未成。1857年，他率民团进攻奥兰治自由邦。两支布尔人军队在犀牛河上对峙。正在此时，莱登堡共和国宣布退出南非共和国，小比勒陀利乌斯慌忙罢战撤兵，赶回德兰士瓦处理内部事务。1860年，他利用奥兰治内部矛盾，总算当选为奥兰治自由邦总统。但两国并未真正合并，仅有个共同总统。1863年，德兰士瓦几个民团司令为争夺总统宝座互相火并，小比勒陀利乌斯的地位岌岌可危，不得不辞去奥兰治总统，回北方整饬内部。同时，非洲人乘德兰士瓦内部不稳，加强反抗斗争，拒交贡赋。小比勒陀利乌斯以铁血手腕严酷镇压非洲人，显现出他是保护布尔地主的不可缺少的“强人”。在克鲁格支持下，1864年他又重新当选为总统。奥兰治自由邦则另外选举居住开普殖民地的普兰德当总统。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摇摇晃晃中终于站住了，它们面前站立着日益加强反抗的非洲人。

四、土地和劳动力问题与南非种族主义的缘起

布尔殖民者是极其贪婪的土地掠夺者。侵入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以后，无论是富裕、中等或贫穷的布尔农扬主都把新区土地当战利品，无情

地掠夺非洲人的土地。血河战役后，布尔人在图盖拉河以南擅自规定，凡在1838年12月以前进入纳塔尔的农场主，可得到两个面积为3000摩尔根土地的农场（折合15480英亩），以后进入的可得到一个同样面积的农场。凡年满18岁的布尔少年，只要缴12元登记费，就可领有土地。布尔人采取英国移民在加拿大的大面积占有土地的办法，往往十户家庭的移民就企求占有一整座城镇大小的土地。布尔农场主进驻新区后，立即忙于跑马圈地，划分地界，给地界的自然标志——小溪或山丘命名。人民议会则发给土地所有权的证明书。由于圈占土地过于广袤，有些土地在圈划之后几十年无人问津，任其荒芜。从温堡到哈里史密斯（直线距离约200公里）的奥兰治地区，仅由200个农场主领有。纳塔利亚共和国成立头两年就有250万英亩土地由254名布尔人登记领有，但实际上只有49人使用过这些土地。它们绝大部分都属于因姆法肯战乱而暂离故土的非洲人的土地。当他们返回故土时，发现家园土地已全被白人占领，无处栖身。估计1838年战乱时期，纳塔尔土地上非洲人仅剩5000—11000人；1843年大批难民返回故土，非洲人骤增至8—10万。布尔人除了把少数非洲人留作廉价劳动力供驱使外，大部分（估计包括祖鲁人近10万人）予以驱逐。1841年布尔人民议会作出决定：“为了（布尔）共同体的安全起见，完全有必要将仍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卡弗尔人安置到边远的地方”，“必须强行押送到指定地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这些祖鲁难民被驱赶到乌姆齐姆库卢河以南的庞多兰。

对于被允许留下作为劳动力储备的非洲人，布尔议会规定他们必须安分守己，承认布尔共和国至高无上的权威，服从其法令和条例，才可在特居地居住，并受布尔政权所承认或指定的酋长、头人管辖。但列为特居地的土地毫无法律保障，布尔殖民者一旦需要，便可随时收回或掉换。例如原先“给予”塔瓦纳酋长的一片较大土地，后来被任意收回，而另外更换一块小得多的、贫瘠的土地。非洲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起而反抗，夺回土地；或忍气吞声，默默忍受。

英国接管纳塔尔后，鉴于布尔人大肆圈占土地造成破坏生产、人口流失的严重后果，并为了在久经战乱的纳塔尔建立安定局面，开普殖民政府吸取了东部边区科萨人起义的教训和英国教会在当地所创造的教会保留地的经验，着手解决土著的土地问题。1846年，省督韦斯特任命一委员会，结合纳塔尔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土著保留地制度。英国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考虑保留地的设置：第一，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是白人移民获得劳动力的基本手段，只有当白人拥有过剩土地，而非洲人土地不足，从而在自己土地上无法维持整个部落人口的生存，方能迫使非洲人外出谋生，出卖劳力；第二，划给非洲人的保留地，既要使非洲人的小农庄同欧洲人农场隔开，又要使保留地分布在欧洲人农场周围，以便欧洲人就近获得劳动力；第三，不给予保留地固定的土地所有权。到1849年，按此原则已划定7个保留地，其后按教会保留地方式陆续分给非洲人。到1864年，纳塔尔已有42个保留地共200万英亩、

S. Marks & A. Atnuor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前工业化时代南非的经济与社会》), Longman 1980, p.152.

每6000英亩布尔人农场允留5户黑人家庭充作劳动力。

亨·耶内克《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特居地与保留地的不同在于，特居地内的土地白人殖民政府有权随时收回，或予以更替。

21 个教会保留地共 17.5 万英亩。保留地大多数设在图盖拉河以南，少数分布在德班以南、彼得马里茨堡以西和德拉肯斯山麓下。这是些贫瘠、缺水的土地，每个非洲人平均分给 20 英亩。英国计划把 8—10 万非洲人迁入保留地。据 1851 年谢普斯通估计，大约 2/3 的纳塔尔非洲人仍居住在保留地以外的英国皇家土地和私人土地上。

布尔农场主占领大片新土地后，劳动力缺乏成了严重问题。现成的劳动力只有随之前来的 14000 名科伊仆役和少量应予解放的奴隶，其中还有不少已逃亡到英国人治下的德班港。布尔殖民者不敢以恢复奴隶制来解决劳动力问题。早在大迁徙之初，为了不给英国以军事干涉的口实，布尔人在雷提夫发布的《迁徙者声明》中曾被迫保证不畜养奴隶。但布尔人顽固坚持种族歧视制度和前资本主义制度，长期拒不使用黑人雇工。因此，当他们一越出开普殖民地边界，便宣布废除第五十号法令，恢复 1809 年的《霍屯督法》，规定每个男性非洲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通行证为金属牌或木牌，挂在脖子上）；无通行证者一律被当作流浪汉逮捕，或移交布尔农场主当无偿劳工。在纳塔尔继续推广学徒制，实行变相的奴隶制或童奴制。纳塔利亚共和国法律规定，凡在战争中俘虏的儿童均由军事长官分配给白人农场主当学徒；此项规定后来又扩大解释为，凡由父母出于某种考虑自愿交出其子女者也照此办理。实际上，为了无偿获得学徒，布尔民团经常擅自采取军事行动，劫掠童奴。一些非洲酋长为了取得现金，也出卖儿童。斯威士人酋长常把被征服部落的儿童卖给布尔人。这种劫掠儿童当学徒（童奴）的勾当在各布尔共和国普遍实行，并延续很长时间。一个布尔农场主承认：“许多农场主简直把我们正在进行的反对祖鲁人的战争看成是一种虏掠的远征。猎获的价值很大。人们都把它视为好运气的开始。使用暴力从卡弗尔人家庭带走三四个年幼的卡弗尔男孩和女孩，以便更好地掩饰奴隶制真相，难道是不被允许的吗？”按布尔人的法律，男学徒到 25 岁、女学徒到 21 岁就不得再继续充当学徒，但他们被迫继续留在农场里为布尔人做工，仍处于农奴、半农奴的地位。布尔人占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后，少数非洲人很快成为布尔人家庭的附庸，被并入白人共同体中，处于劳役佃农地位。按规定，每个农场主可以奴役四户非洲人家庭，让他们住在农场干农活和各种杂活。这些非洲人脖子上挂块牌子，正面刻上本人姓名，背面刻写主人姓名。他们不得擅离农场，凡未得主人许可而离开农场超出马行两小时的距离，就将视为逃亡而遭到逮捕。

大部分非洲人被安置在特居地内作为白人农场的征调劳力使用。他们由酋长安排，向布尔农场主提供一年所需的劳力，报酬仅是一头小牦牛。他们还被征调去充当民团的辅助兵种，为布尔人作战。利文斯敦对征调劳力作了如下描绘：“那些表面上独立的部落必须替布尔人从事所有的田间劳动：耕耘土地，修堤开渠，同时还要自谋生计。我目睹布尔人怎样来到一个村子，像往常一样，强迫二三十名妇女到他家园子里去除草。布尔人丝毫不掩饰强迫无偿劳动的卑劣行径。他们说‘允许他们呆在我们国家，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报酬’。”

P. Maylam,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of South Africa* (《南非人民史》), New York, 1986, p. 84.
M. Wilson & L. Thompson, *op.cit.*, vol.1, p.367.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在南非的传教旅行和探险》), London

布尔人殖民地经济的种族奴役性质进一步强化了种族差别，给种族主义的滋生准备了合适的温床。1856年5月，南非共和国在勒斯滕堡召开人民议会，制定了一部巩固殖民者既得利益、排斥非洲人分享各种权利的《勒斯滕堡宪法》。它明确规定，只有白人才能享有公民权，黑人不得享有公民权，“无论在教会或在国家中都不允许有色人种同白人居民之间存在任何平等权利”。这部宪法从法律上明目张胆地规定了南非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标志着南非种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接管纳塔耳以后，需要争取非洲人的好感，以保持毗邻的开普东部边区的安定。在较长时期内，纳塔耳的英国移民很少，这促使英国人采取了有别于布尔人的土地政策和劳动力政策。英国主要通过向非洲人征收茅屋税（从1849年以后每座茅屋征税七先令），迫使黑人为获得现金缴税而去替白人做工。非洲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去充当雇工或佃农，有的在保留地内成为拥有土地的小自耕农；有的在保留地以外（即属于纳塔耳殖民地的土地上）获得土地。少数人居住12年以上，并拥有土地私有权（一般从教会购地），按纳塔耳法律尚可获得选举权。到1874年，据估计原为殖民者、教会和土地公司所有的500万英亩土地，实际上已由非洲人占有使用（只交一些地租给在外地主），形成了著名的所谓“黑点”（black spots）。1849年，由于白人农场主经营农业的失败，非洲小农生产的玉米大量输出到开普殖民地，而在纳塔耳消费的谷物，一半以上是由非洲人生产的。一些非洲农民也开始种植甘蔗和棉花。白人农场主抱怨他们竞争不过非洲小农，因为后者生产成本低，并吸收了本来会流动到白人农场的廉价劳动力。迁入纳塔耳定居的赫卢比人在从事和适应各种农业经济上所表现出的特殊能力，引起白人农场主的忌恨。纳塔耳非洲人经济的显著发展，证明南非非洲人并非不擅长于商品经济。这样，殖民者便在经济力量之外，乞求于直接的政治权力。1873年，殖民当局强迫收缴赫卢比人的枪支，兰加利巴累酋长拒绝听命。但当英军进攻时，酋长逃走，赫卢比酋长国被摧毁，牲畜被没收拍卖，土地被白人移民占领。赫卢比人富有竞争力的经济被人为地摧垮了，从此成了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其他非洲农民的商品性农业，也因受到白人殖民者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越趋不前。

纳塔耳殖民当局为解决英国甘蔗种植园主缺乏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决定仿效毛里求斯岛的办法，从印度输入契约劳工。1859年，他们同英印政府商定从印度输入劳工，契约期限为5年，10年后可允其自由往返，若愿在南非定居可授以土地；并允许输入男工时伴随一定比例的妇女。1860年11月16日，首批1388名印度劳工到达纳塔耳（其中男劳工1029人，妇女359人）；到1866年共输入6000多名；经过八年停顿后，1874年起又开始输入。许多契约劳工期满后留下定居。到1904年，纳塔耳的印度人已达10万人，1911年增至14.2万人（欧洲人为11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1%，形成印度人社区。印度人在南非同样受到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使南非种族问题更加复杂。

1858.p. 39.

S.Marks & A.Atmore.op. cit., pp. 156, 166 note 26.

M.Palmer,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s Natal (《纳塔耳印度人史》), Oxford1957, p.28.

五、科萨人捍卫家园土地的斗争

在 1799—1803 年的第三次开普—恩戈尼边界战争(通称“卡弗尔战争”)结束以后,北科萨人的格卡利卡酋长国的欣察(在凯河以东)和南科萨人的腊腊布酋长国的恩得兰比(在楚尔费尔德地区)都得到很大的增强。一心想充当南北科萨人最高酋长的盖卡,面对这东西两股势力的威胁,开始寻求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1807—1811 年,仍住在楚尔费尔德地区的布尔人或被赶走,或接受恩得兰比的管辖。英国殖民当局力图巩固其在大鱼河以西地区的统治。他们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散布流言,声称英国如果不立即派出强有力的部队,卡弗尔人(科萨人)国家将扩展到开普敦附近。

1812 年英国新任军事长官克拉多克将军决定对科萨人采取军事行动,以恢复东部边区向开普敦供应肉类的运输线。格雷厄姆指挥一支由英军、格里夸人和布尔民团组成的军队侵入楚尔费尔德地区,在 1812 年第一季度,把当地非洲居民 22000 人全部赶过大鱼河左岸。格雷厄姆在新建的村庄克拉多克和格雷厄姆斯敦之间建立一条堡垒线,以阻止非洲人越过大鱼河以西(右岸)地带。克拉多克将军把所侵占的边界线堡垒附近的土地,以 15 年租期出租给白人移民。1812 年末,由于开普敦面临法军入侵的威胁,内地英军撤走,科萨人重渡大鱼河,返回故土。1815 年欧战结束后,英军重新驻防大鱼河畔。

恩得兰比部落被赶到大鱼河左岸,失去了大鱼河以西大片土地,被迫接受盖卡统治,人心愤懑不平。1818 年,一个名叫马卡纳(又称“左撇子”)的先知,在这伙失望沮丧的西科萨人队伍中宣传:只要科萨人能够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先辈英雄就将乘万能之风回到人间,把白人从祖先土地上赶走。丧失家园的科萨人备受鼓舞。马卡纳号召所有住在大鱼河以西的西科萨人在恩得兰比旗帜下联合起来。成千上万科萨人涌入恩得兰比队伍。1818 年,由于旱灾肆虐,争夺大鱼河东岸(左岸)拥挤不堪的牧场的斗争更趋激烈。恩得兰比的部众同被英国承认为全科萨人最高酋长的盖卡的部众发生冲突。11 月,在阿马林德战役中,盖卡遭到严重失败。1819 年底,英国发动第五次开普—恩戈尼边界战争,英军越过大鱼河,进入左岸,击退恩得兰比部队,抢走 23000 多头牲畜,扶持盖卡复位。但英军刚一撤退,恩得兰比和马卡纳率众再次击败盖卡。马卡纳率万人大军渡大鱼河,围困格雷厄姆斯敦,但久攻不下。英军反扑,再次侵入大鱼河左岸,直抵凯河,烧杀掠掳,蹂躏两河之间广大地区。马卡纳被俘,囚禁在洛本岛,死于 1820 年。英国总督萨默塞特迫使盖卡割让大鱼河左岸和凯斯卡马河之间 4000 平方英里土地,将它划为中立地带,把所有科萨人赶走,由英军巡逻。盖卡投靠英国,反而落得丧失大片土地的下场,从此一蹶不振,终日酗酒,1829 年死于酒精中毒。

1829 年发生严重旱灾,许多牧场草情恶化,不适放牧。白人农场主肆无忌惮地赶着畜群涌进实际上属于科萨人土地的中立地带。1829—1833 年,殖民当局在卡特河和拉夫德莱地区之间把马可莫(盖卡之子)部落赶来赶去,使他们无法安生。殖民当局怂恿白人殖民者实行所谓报复性劫掠制度:任何白人农场主均可借口自己的牲畜丢失而肆意劫掠科萨人牲畜。这更使科萨人惶惶终日,不胜其扰。1834 年 12 月 25 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马可莫率领 12000

均以殖民军军官名字命名。

科萨人渡大鱼河进入右岸（西岸）地带，收复楚尔费尔德地区。1835年，英军渡大鱼河长驱直入科萨人居住区，远及凯河。科萨人巧妙地避免在开阔地带与英军作战，利用岩崖和丛林展开游击战。1835年4月，殖民当局与科萨人最高酋长欣察举行谈判，要求科萨人赔偿25000头牲畜和500匹马，并割让凯河和凯斯卡马河之间大片土地。欣察被扣作人质，不久被枪杀。1835年5月，英国总督德班宣布兼并这块割让土地，改名为阿德莱德省。布尔农场主欣喜欲狂，在多年征战之后终于从科萨人手中夺到了这片水源最好的东部沿海走廊地带。科萨人不甘屈服，为保卫家园拼死作战，坚守大鱼河与凯河之间土地，不时袭击开普殖民地白人定居地区。伦敦政府考虑到兼并如此大片地区超出了当时开普政府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在一年以后，即1836年10月，下令从阿德莱德地区撤退。英国殖民大臣格伦厄尔勋爵在1835年12月致德班信中承认：“卡弗尔人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这场战争。他们被一系列侵略和地方当局经常改变政策而造成的损失所激怒，除了将丧失的土地夺回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英国把17000名芬果难民迁入凯斯卡马河与大鱼河之间的佩迪堡附近，作为白人农场主的屏障。殖民当局同科萨人酋长建立补助金“条约国”关系，以保证它在布尔人大迁徙所引起的动乱中维持边区的安定。

进入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发展间接地推动着英国在开普东部边区的殖民扩张。1846年，开普殖民地美利奴羊的羊毛出口总值达295万英镑，已超过肉类出口总值。随着出口羊毛业的繁荣，农场土地价格水涨船高。优质土地越多（即饲养美利奴羊越多），意味着从售羊和生产羊毛所得的利润越高。英国人从本国圈地运动的经验中知道，只有当殖民者拥有过剩的土地而科萨人土地严重不足时，才能迫使土著出卖劳动力。因此，英国人侵占的土地总是远远超过其实际需要。对土地的贪求怂恿白人农场主寻衅闹事。1846年，仅仅为了科萨人酋长散迪勒的一个亲戚偷了农场主一把斧子，英国殖民当局便兴师动众乘机挑起第七次开普—恩戈尼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科萨人的反击战打得很出色，一度进逼到伊丽莎白港，用游击战术困扰着殖民军的供应线。但由于科萨人粮仓被殖民军烧毁，而畜群又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战区造成饥荒。到9月，科萨人不得不暂时放下武器，去收割地里庄稼。战争一直持续到1847年，英国骑兵终于把东西两支科萨人赶回到东区。

1847年，在镇压科萨人以后，新任总督史密斯采取兼并政策，把凯河到大鱼河地区统统变为英国殖民地，命名为英属卡弗拉里亚（后称西斯凯）。科萨人成为英国臣民，由英国管理。所谓英国管理，实际上是让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非洲警察来管理。警察狐假虎威，鱼肉乡里，使科萨人倍感痛苦。史密斯总督专横跋扈，倒行逆施，解除散迪勒酋长职务，代以白人行政官，更引起普遍怨恨。一个新先知姆兰杰尼预言，昔日英雄即将复活，前来帮助科萨人打败白人压迫者。1850年12月，在英属卡弗拉里亚爆发了第八次战争。在先知鼓动下，传教站的科伊农民、滕布人都站在科萨起义者一边。军屯村全被消灭。1851年英国援军赶到，仍未能取胜。1853年2月，殖民当局从布尔人中招募了几个民团，才击败了科萨人的游击队。

新任总督格雷在卡弗拉里亚新区积极推行兼并非洲人土地的政策，引进欧洲移民（1855年把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德国军团退伍官兵移屯新区），将科萨人沦为自由雇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植社会基础。科萨人不断遭受

失地和丧权辱国的痛苦，心情压抑沮丧，对现任的部落领袖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宗教领袖身上。女先知农夸斯预言，如果科萨人宰杀所有牲口并毁掉存粮，那末在预定的一天，他们的祖先将靠万能之风复活，并把白人赶下海去。上苍将供应粮食。于是，屠牲和毁粮之风迅速蔓延到西至大鱼河、东至滕布人的地区，短期内宰杀了 20 万头牲口。当夏雨普降时，狂热的农民也不去种庄稼。1857 年 2 月，饥荒开始，西斯凯地区饿死 2 万人，3 万多饥民进入开普殖民地，为得到粮食被迫去当雇工。短短八个月内，西斯凯人口从 1857 年 2 月的 104721 人减到同年 12 月的 37697 人。开普殖民地白人农场主白白得到几万名廉价劳动力。西斯凯荒无人烟的大片土地，成为格雷总督安置德国退伍大兵和爱尔兰女人的农场。科萨人元气大伤，80 年英勇斗争的成果几乎全部付诸东流，此后掩旗息鼓整整 20 年。

六、巴苏陀王国反兼并的斗争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莫舒舒通过对边陲要地酋长的一系列分封，并在 1853 年最后击败塞康耶拉，稳固地统治了以卡利登河谷为中心的大片疆土。

布尔殖民者从 30 年代初开始侵入卡利登河谷地区。到 1845 年，布尔人农场已增加到 300 家以上。初来时，他们请求莫舒舒国王允许他们暂居西卡利登河谷。后来，一部分布尔人不再往北迁徙，从栖居的牛车上搬到他们仿效苏陀人修筑的土砖屋里居住。早在 1839 年，莫舒舒就提醒布尔人，他们是作为客人居住在他的土地上。时间一久，布尔人诳说莫舒舒给他们的农场土地是作为私人产业，因而不在于其主权管辖之内。布尔农场主普遍采取粗放经营方式，依靠不断扩大土地占有面积来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因此，他们得寸进尺，不断侵吞苏陀人土地。起初莫舒舒对布尔人的殖民主义本质认识不清，一度曾与之联合对抗恩德贝勒人，并慷慨允许他们在他的土地上播种庄稼、兴建牧场；到发觉布尔人采取蚕食鲸吞手段时，才开始划定边界，同布尔人展开斗争。

莫舒舒利用开普英国殖民当局为稳定北部边区形势而施行的补助金条约国政策，于 1843 年 12 月与英国总督内皮尔签订《内皮尔条约》。条约第四项规定了巴苏陀王国的领土范围：“西面，从卡利登河与盖雷普河（奥兰治河）的汇合处至两河在布塔布特附近的源头；南面从两河汇合处起沿盖雷普河（奥兰治河）为界；北面以卡利登河以远 25—30 英里处的平行线为界。”

非洲人有权在自己土地上向布尔人征税。1845 年，英国殖民当局改变主意，妄说非洲酋长权力不能施加于白人；在白人居住地上，酋长权力应由英国派遣的驻扎官代为执行。英国殖民当局兼并了奥兰治主权国以后，1849 年 12 月，英国地方官沃登擅自更改苏陀王国边界，以所谓“沃登线”作为王国的西界，把卡利登河与奥兰治河汇流处一条 70 英里长的河间地划给布尔人。这片土地上散布着数千苏陀人居住的 40 个村寨。莫舒舒坚决捍卫苏陀王国领土，下令该地区所有苏陀人原地不动，决不开离开故土。1849 年，一个布尔农场主进占卡利登河岸 5000 摩尔根土地，仅一年就被莫舒舒战士赶走。

D.Robinson & D.Smith, op.cit., p.58.

D.Robinson & D.Smith, op.cit., p.56.

1851年6月，沃登组织英军和土著军联合进攻苏陀王国的维尔特村寨。6月30日，莫舒舒大败沃登军。英国败退塔巴恩丘，莫舒舒并未乘胜进攻英国统治下的奥兰治主权国。英国新任总督卡思卡特决定为沃登的失败雪耻，以保持英国在南非不可战胜的形象。1852年10月，卡思卡特率2500名英军抵达奥兰治主权国，向莫舒舒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三天内交出10000头牛和1000匹马。莫舒舒采取先礼后兵策略。他会见英国总督，表示和平愿望，不启战衅。但卡思卡特恃强兵压境，不予理采，继续向塔巴博修进军。12月20日，战争爆发。英军在第一天战斗中失利，伤亡颇多。莫舒舒在小胜之后，致信卡恩卡特罢兵言和。卡思卡特初战受挫，担心陷入糜饷劳师的战争泥潭，便体面地撤兵了。南非史学家锡尔曾称誉莫舒舒致卡思卡特的信为“南非从未有过的最具有策略性的文件”。

1854年英国承认奥兰治自由邦独立后，布尔人更肆无忌惮地在卡利登河谷扩张。为强迫巴苏陀王国承认沃登线，1858年1月，布尔人发动了第一次侵略巴苏陀战争。1500名布尔民团侵入塔巴博修。莫舒舒此时已拥有10000名骑兵，大部分配备毛瑟枪或来福枪。布尔人久攻不下险峻高地。莫舒舒将部队分散成游击小分队深入敌后，摧毁布尔人农场。袭扰战使布尔民团军心涣散，纷纷离队回乡救援。莫舒舒率军反击，节节取胜。奥兰治布尔人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求援。最后英国出面仲裁。面对两个布尔共和国可能联合起来作战，莫舒舒被迫签订北阿利瓦尔条约。条约肯定了北界的沃登线，在南界给苏陀王国增加了一小片领土。

莫舒舒从多年政治经验中逐渐认识到白人殖民者总是相互勾结反对黑人，于是也试图建立黑人防卫同盟。他曾派遣使节往返于索特潘斯山（佩迪、文达等国）和凯河之间进行联络，而远方酋长也常来到塔巴博修共同商讨联合行动。由于白人殖民者全面出击，非洲人各酋长国几乎同时遭受殖民扩张的威胁，因而未能创造出一种相互支援的有效方式。但莫舒舒经常向遭受布尔人威胁的非洲酋长国提供火器。

进入19世纪50—60年代后，苏陀王国进一步发展同开普殖民地的谷物和牲畜贸易，苏陀农民为出口而增产玉米和小麦。他们推广使用引进的牛耕犁耙，增加农耕土地面积；大量使用牛车作为向市场运送粮食的工具；以骑马代步，加快了山区之间的交通速度。他们通过走私火器，使苏陀王国配备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苏陀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粮食储备增加，人口增多。他们更加迫切需要向卡利登河右岸开辟牧场和农田。但莫舒舒国王年事渐高，精力不济，诸子为争夺王位明争暗斗，削弱了王国的凝聚力。毗邻的奥兰治自由邦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内讧减少，国力渐强。随着羊毛业发展迅速，人工灌溉的园圃制得到普遍推广，布尔人对卡利登河畔土地的争夺益趋激烈。1862年，莫舒舒建议英国派驻扎官常驻塔巴博修，以调解苏陀人和布尔人在卡利登西区的紧张关系。英国予以拒绝，重申它在1858年已承认卡利登西区的大部分土地应为布尔人所有。1865年，布尔人发动第二次战争。深受内讧折磨的苏陀人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布尔人侵入内地，烧毁农田及粮库，屠杀牲畜，制造饥荒。而驻守在卡利登谷地西北区的庶王子莫拉波又居心叵测地同布尔人单独媾和，将北部地区割给布尔人。莫舒舒为了赢得1866—1867年的收获季节时间，将部众从饥荒中拯救出来，被迫同意媾和。1866

年4月签订塔巴博修条约,苏陀王国被迫割让已被布尔人占领的农耕地区(仅留下一小块河谷耕地和大部分山区),赔偿10万头牛羊和5000匹马,允许布尔地方官驻扎塔巴博修。这是极其苛刻、置人死地的条约。

1867年收获季节结束,布尔民团刚撤走,苏陀人便重新收复失地,播种庄稼。两个企图驱赶苏陀人的布尔农场主被杀。1867年7月9日,莫舒舒致信奥兰治总统布兰德,指出这次战争原因是奥兰治布尔人要扩张领土、灭绝苏陀民族,并严正声明:布尔人“无权居住在巴苏陀兰,他们应呆在自由邦境内,除此之外无法维持双方和平”。布尔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战衅重开。布尔民团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有计划地摧毁苏陀人的粮食供应,制造饥荒。苏陀人在战斗中十分顽强。在一些山区城堡,据守阵地的十几个苏陀人一次又一次顶住500—1000名布尔人的猛烈进攻。布尔人始终未能攻下塔巴博修。但苏陀人伤亡惨重,面临着将被布尔殖民者吞并的危险。经过痛苦的权衡利弊,莫舒舒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免受布尔人吞并的唯一可行之路是寻求英国保护。英国眼见布尔军队咄咄逼人的攻势,也担心如果不立即阻遏奥兰治自由邦吞并巴苏陀王国,布尔人就将取得通往圣约翰斯港的通道,从而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威胁英国霸权的楔子,并取得同欧洲人直接联系的港口。于是,1868年3月12日,英国高级专员伍德豪斯宣布:“巴苏陀部落人民将被接受作为英国的臣民,上述部落土地将被接受作为英国的领土”,从而将巴苏陀王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英国同时宣布切断对奥兰治自由邦的武器供应,并随即向巴苏陀兰派出开普骑警部队。布尔人在长期战争中已耗尽力气,无力对英国的干预行动进行武装抵抗,遂答应停战。此后,经过棘手的谈判,1869年2月签订了第二个北阿利瓦尔条约。它划定巴苏陀与奥兰治的边界线从卡利登河源沿河而下,到亚默渡口,再往东南延伸,直到德拉肯斯堡山。这条边界比塔巴博修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稍有改善,但苏陀人仍然失去了大片最好土地——卡利登河以北30里宽的沃土地带以及卡利登与奥兰治河汇流处的三角地带。此后,苏陀人因地少人多不得不到白人占领地区从事工资劳动,以弥补土地资源收入的不足。

莫舒舒国王领导苏陀人民同布尔殖民者进行了数十年的殊死斗争,表现出非洲人反对殖民主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他们面临的敌人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单靠巴苏陀一个小国单独作战难以取胜。在当时情况下,组织整个南部非洲的黑人反对白人侵略的联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苏陀人的长远利益看,与其被吞并后在布尔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下亡国灭种,毋宁选择英国的保护,在英布矛盾的缝隙中寻求一片民族生存的天地。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拥有自己确定边界和单一语言的民族国家终于在“保护国”形式下保存下来,并使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不敢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和吞并。诚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历史在当时毕竟没有给予巴苏陀人更幸运的选择。

R.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1928. vol.1, p.166.

D.Robinson & D.Smith, op, cit, p.76.

D.Robinson & D.Smith, op, cit, p.77.

第二十章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及其殖民统治制度的初创

大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列强加紧对非洲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计划；1884—1885 年柏林会议后，列强在非洲的大角逐愈演愈烈，终于将非洲瓜分完毕。20 世纪初，非洲各国几乎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在列强瓜分非洲期间，为捍卫领土主权，非洲各族人民开展了长期而顽强的抵抗运动。除埃塞俄比亚以外，所有的抵抗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抵抗运动中所提出的主权问题，对非洲各民族的形成、对日后民族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英、法、德、意、比、葡、西在非洲着手建立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的殖民统治机构和殖民地经济制度，给非洲人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苦难。

一、列强瓜分非洲的序幕

非洲是欧洲列强入侵最早的大陆，但到 1876 年时，被侵占的领土远在其他各洲之下。据苏潘统计，当时澳洲被占领土为 100%，亚洲为 51.5%，美洲为 27.5%，而非洲仅及 10.8%。在非洲被占领土中，英国为 4.1%，法国为 2.8%，布尔人为 2.4%，西班牙为 0.8%，葡萄牙为 0.7%。这说明，在非洲殖民事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法两国。早先曾在非洲占有殖民地和殖民据点的荷兰、丹麦已经退出非洲，德国和意大利还未真正参与非洲的争夺。这些被占的领土，除阿尔及利亚和南非较大以外，多为非洲的沿海岛屿、大陆沿岸的小块殖民地和殖民据点，其中包括西班牙殖民者所占的休达、加那利群岛、西撒哈拉沿岸、费尔南多波岛和下几内亚；葡萄牙所占的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亚速尔群岛、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莫桑比克；英国占据的塞拉利昂、冈比亚、黄金海岸、拉各斯、原属荷兰的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利伯维尔（加蓬）等。这些殖民地和据点分布在非洲沿岸，像一条锁链紧缠着非洲内陆，为后来列强实行野蛮的侵略和分割提供了前进的基地。

非洲与欧洲之间仅隔着地中海，而北非一带早已卷入南欧地中海经济区，那末，为什么欧洲列强到 1876 年还只占领非洲很小一部分领土呢？

第一，这与非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欧洲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尚不足以克服这些自然障碍有关。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和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像一道防阻欧洲侵略的自然屏障；而非洲的热带病，又给欧洲殖民者从东西海岸渗透到非洲内陆造成了极大困难。据统计，1787—1850 年到西非访问和定居的欧洲人，其死亡率为 43.3%；在塞拉里昂因病死亡的英军，每年其死亡率为 48%，远高于在印度和西印度的 7.5—8.5%。就当时交通工具、技术装备和医药条件而言，欧洲殖民者还缺乏入侵非洲内陆的能力，他们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还一无所知。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奎宁的发明，自然障碍不再是不可克服的了。非洲内陆探险的进展，则为欧洲列强侵入内陆创造了便利条件（参见本卷第十章）。

亚·苏潘：《欧洲殖民地领土的扩张》，转引自《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796 页。
Philip Curtin etc., African History (《非洲史家》), Boston & Toronto 1978, p.446.

第二，这同欧洲局势并不稳定有关。1848年的革命风暴、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德意志统一运动，俄土战争，这些事件搅得欧洲动荡不宁，把列强的主要注意力吸引到欧洲本土。直到俄土战争之后，在欧洲才形成政治均势，出现和平与稳定。正是在此前后，欧洲列强力图把它们之间的冲突转移到非欧洲世界，特别是非洲。

两个新的欧洲殖民国家——德国和比利时出现在非洲舞台上，向英法发出了挑战。早在1861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写道：“海洋冲刷着我们的海岸，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汽船和电力缩短了距离。地球表面一切未占用的土地（大多数在非洲），能够成为我们行动和成功的地域。”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就积极向刚果河流域扩张，挑起了刚果河危机。统一后的德国逐步转向新政策，不仅企图在非洲取得一席之地，而且企图转移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目标，让它卷入海外领土的竞争。在新的挑战面前，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也改变了腔调。1852年，英国政府要人迪斯累里曾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而这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则提出了“英国人要从开普到开罗”的口号，这就是英国对非政策的简单表述、著名的“二C计划”的扩张蓝图。列强唯恐在瓜分非洲中落后于人，各种扩张计划相继出笼，什么“二S计划”、“赤道非洲帝国”、“条顿计划”等等。于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非洲几乎被欧洲帝国主义瓜分殆尽。

是什么力量驱使欧洲列强走上疯狂瓜分非洲道路的呢？固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非洲内陆探险的重大进展，自然条件已不再成为欧洲殖民者侵占非洲内陆的制约因素；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发现、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也增加了非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战略中的重要性。但瓜分非洲的根源不在于此，而是由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因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对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激烈争夺。茹·费里这类帝国主义政治家比那些为瓜分非洲进行辩护的社会达尔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解释更坦率、更令人信服，他说：“法国总嫌资本太多，所以大量地向国外输出，事实上这个伟大国家输出的资本是以亿万法郎计算的；我说，法国是如此富裕，有理由从这方面来考虑殖民地问题。但是，先生们，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比我上面提到的更重要得多。殖民地问题，对于由工业性质本身所决定必须大量输出产品的国家来说，是个市场问题。在欧洲各项工业遭到危机的时候，开辟一个殖民地就是开辟一个市场。”垄断资本家所要的是独占的、排他的殖民地市场（包括投资、销售和原料市场），这就是当时瓜分非洲和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自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欧美列强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了争夺世界领土的步伐。正当此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1865—1909）

R.Oliver & A.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1800年以来的非洲》), Cambridge, 1974, p.109.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R.Oliver & A.Atmore, *op.cit*, p.113.开普（Cape）、开罗（Cairo）二地均以英文字母“C”开头，“二C计划”由此得名。

指法国企图打通塞内加尔（Senegal）到索马里（Somalie）的计划。

布尔人的祖先是荷兰人，与德国同属条顿人。双方企图互相勾结，建立一个布尔人共和国和德属西南非洲的“条顿非洲”。

让·徐雷-卡纳尔：《黑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79页。

作为金融垄断组织的代理人，已着手实行征服非洲刚果河的计划。为了掩盖他的野心，187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所谓国际地理学会议。参加此会的有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葡萄牙、奥匈帝国、美国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们借口讨论“开化非洲所应当采取的最好方法”，结果是成立了国际中非考察与文化协会（通称国际非洲协会）。利奥波德在此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谈到会议的主旨在于鼓动列强对非洲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他说：“打开地球上唯一尚未进入的地区，并使之文明化，冲破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敢大胆地讲，这是一次十字军远征，而这个远征与我们这个进步时代是很相称的。”国际非洲协会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各国都成立了分会，纷纷派遣人员到非洲进行探索工作。以这次会议为标志，非洲的内陆探险就直接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联系在一起了。当时，除英、法、葡、比、德、意等国注目于非洲的殖民地争夺之外，美、俄、奥匈也想插手非洲。英国并未成立分会，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已占优势。

在利奥波德的指使下，比利时分会的活动最为积极。1878年11月，利奥波德纠集一批比利时和外国资本家，成立了所谓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筹措巨款，将它变成一个实行殖民侵略的垄断资本合股公司。1882年前后，利奥波德起用著名的非洲探险家斯坦利，来实现他和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的侵略计划。还在1878年初斯坦利刚从非洲回到马赛，就被利奥波德招到门下。斯坦利奉命重返非洲（1880—1884），去刚果河流域开辟殖民地。他率领一批冒险之徒，先去桑给巴尔，然后潜回刚果河口，溯河而上，直达刚果盆地。斯坦利一行对土著酋长威逼利诱，骗得400多项“条约”，又建立22个商站和殖民据点。借以作为国际刚果协会占有刚果盆地的依据。

然而，法国殖民军也已在布拉柴的率领下控制了刚果河北岸和河口一带。1881年底，当斯坦利回到刚果河下游时，他发现了北岸的法国国旗，那里后来建立了布拉柴维尔城。斯坦利只好在南岸安营扎寨，后来就建立了利奥波德维尔（今金沙萨）。1882年，布拉柴在刚果河下游从土著酋长手上骗得的“条约”经过法国政府批准，当地就变成了法属刚果殖民地。于是，在刚果河下游地区，不仅出现了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引起了英国和葡萄牙的争夺。1884年的英葡条约承认葡萄牙在刚果河口的主权，英国在该地区也享有商业权益。这个条约又引起法、德、比、美诸国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刚果问题在国际上的连锁反应，便成了召开一次解决非洲问题国际会议的直接理由。

到19世纪80年代初，不仅所谓刚果问题在列强间引起了危机，而且在非洲其他地区也因列强从70年代中叶以来的扩张而出现了复杂的局势，隐藏着潜在的和公开的冲突。

在南非，英国为了垄断钻石和黄金生产，加快了扩张的步伐。1871年，它吞并了钻石产区西格里夸兰；1877—1879年夺占东格里夸兰；1879年灭祖鲁王国；1877年英军突袭比勒陀利亚，宣布兼并南非共和国，但在第一次英布战争（1880—1881年）中被击败。1882年，布尔人向贝专纳扩张，引起英布之间的激烈角逐。1884年，德国宣布兼并西南非洲。英国对此极为不安，担心德国人和布尔人的进一步扩张，会使两者连成一片，横断英国入侵内陆

的通道。

在东非，英德矛盾亦趋尖锐。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德国逐步向英国的这一传统势力范围渗透。柏林会议前夕，德国派卡尔·彼得斯到东非，与乌萨加腊地区的酋长签订保护条约，引起了英国的警觉，双方开始了瓜分内陆的争夺。

在非洲之角，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红海南岸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就成了列强加紧争夺的目标。1883 年，法国将它早已买得的奥博克及其附近地区变为法属索马里保护国（今吉布提）。1877 年，英国同埃及签订协定，承认埃及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南至哈丰角）的统治，认为这是英国防御其他欧洲强国在亚丁对岸获得立足点的唯一保证。1884 年埃军撤出后，英、法、意等国又开始了新一轮争夺。

在北非，1882 年英军以武力镇压埃及奥拉比运动（参见本卷第二十一章），占领了埃及。在英国动武前夕，法军主力撤往突尼斯，而于 1883 年将其置于保护国地位。到柏林会议前夕，摩洛哥成了法、德、英、西争夺的重点。

在西非，德国势力早已渗入，与多哥、喀麦隆和利比里亚一直有巨额贸易往来。到 1884 年，俾斯麦派遣国际非洲协会德国分会头目纳赫蒂加尔等领军乘舰到西非，先占多哥（7 月 5 日），后占喀麦隆（7 月 15 日），强迫两地酋长接受德国保护。英国也急于抢占喀麦隆，但海威特比德国人迟到了。德国还打算侵入几内亚，为此法国提出了强烈抗议。

到 1884 年，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已遍及全非洲，到处都可见到剑拔弩张、横刀相向之势。实际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不仅是为谋求刚果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要调整有关各国的对非政策，谋求分割非洲领土的原则和方案，以消除各国间的冲突和潜在危机，继续维持列强间在欧洲脆弱的均势与平衡。

最先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是葡萄牙首相马奎斯·迪·博卡热，其目的在于解决刚果问题。因为 1884 年 6 月，由于法、德的抗议，英国国会否决了英葡条约。英国外交部曾对葡萄牙的建议加以阻难，但是葡萄牙未与英国协商，已向有关各国发出了照会。7 月初，俾斯麦谴责英葡条约，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到 1884 年 10 月，法国也同意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英国只好同意参加。

有关各国经过协商，决定由德国宰相俾斯麦充当调解人，召集各国代表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从 1884 年 11 月 15 日开始，至 1885 年 2 月 26 日结束，历时 104 天，与会国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俄国、丹麦、瑞典和挪威、卢森堡、美国、土耳其等 15 国。国际刚果协会因尚未得到承认，所以只派观察员列席会议。名义上，各国代表均有权参与决定国际非洲协会的领土划分和进一步瓜分殖民地的原则问题，但实际上，一切仍由大国操纵解决。

俾斯麦抓住英、法、比、葡等国在刚果河流域的矛盾，以调解人和会议东道主的身份，为德国在非洲的扩张铺垫基石。他在柏林会议开幕词中说：“召开本次会议的帝国政府相信，所有受到邀请的政府都希望，通过同这一大陆内地的贸易，向居民提供学习条件，对宣传有益知识的传教会和各种事

业进行鼓励，以及准备消除奴隶制度，尤其是取缔贩卖黑人等方式，使非洲土著与文明相结合。”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隐约地道出了与会国瓜分非洲的目的。

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德、英、美等国对刚果抱有野心，但在刚果未占有领土，因而强烈主张在刚果河流域、尤其是在刚果河口地区实行自由贸易。法、葡因在刚果占有领土和权益，它们极力反对该地区实行自由贸易。

利奥波德善于审时度势，在幕后操纵谈判。他指使熟悉刚果情况而在开发刚果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比利时代表团秘书班宁多方联系；美国代表团中的国际刚果协会代理人斯坦利和桑福德在各国之间穿针引线。他们一再保证，国际刚果协会主张在刚果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因而利奥波德的计划得到了德、英、美等多数与会国的赞许和支持。这些国家认为比利时国力弱小，与其将刚果交给法、葡，还不如由利奥波德来统治更好些。这样，利奥波德在鹬蚌相争中得利。

俾斯麦在刚果问题上采取了促成法比妥协以抵制英葡结盟的策略。他听任利奥波德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在会外进行交易。起初，法国代表提出了对刚果河整个右岸以及左岸部分地区的占领要求。俾斯麦反对这一要求，英国也不同意。在德英两国的压力下，法国代表被迫撤回原议，承认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河地区的领土权利，只要求在协会可能出卖这块领土时给法国以优先购买权；协会则同意法国占有刚果河以北和以西地区，惟刚果河口除外。至于葡萄牙，协会则同意它占有刚果河口南岸，并保有北岸飞地卡奔达，但须将河口以北 36 公里地区划归协会所有。

会议期间，协会先后与英、意、奥匈、西、俄、瑞、挪、丹、比诸国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内容大致相同，即各国承认国际非洲协会对刚果的主权，但协定中并无“国际共管”的约束条件。这样，利奥波德便把刚果盆地变成了个人占有的所谓“自由邦”。

1885 年 2 月 16 日—24 日，柏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后议定书》，共计 38 条。第一章《关于在刚果河流域及其河口和周围国家自由贸易的共同声明》宣布，所有国家在以下地区享有充分的贸易自由：(1)刚果河及其盆地的整个境内，(2)自南纬 2 度 30 分线延伸至洛热河河口的大西洋海区内，(3)刚果河盆地以东延伸至印度洋，自北纬 5 度往南至赞比西河河口；同时规定，所有运至该地区的货物免缴入境税和过境税，任何在前面所标地区内享有或将享有最高权的国家不应在该地区实行垄断和享有特权。第四章《关于在刚果河航行的议定书》中规定，在刚果河及其所有河汊和支流上的航行，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应该是完全自由的。这些条款表明，列强承认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无非是沿用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旗帜，先向非洲的心脏部位开刀，力图将中部非洲（从大西洋岸边直至印度洋沿岸地区）分割肢解。

柏林会议集中讨论了进一步瓜分非洲的原则，即《在非洲大陆沿岸地区占据的领土被认为有效而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的共同声明》。第六章载明：“今后占据在其领土以外的非洲大陆沿岸地区某领土的国家或迄今没有这类领土而即将获得这种领土的国家，应该向本议定书的签字国呈送与此有关的

王绳祖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第 265 页。

参见《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第 81—104 页。

相应的文件和声明，以便使后者在必要时有可能申述自己的要求”。同时，在各自占领的地区，“确保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的既得权利”，“保护贸易和过境自由的永久权”。这就是列强彼此瓜分并互相承认其占领非洲领土的原则，即所谓“有效占领”原则。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特征。但是列强之间的瓜分，又是按它们各自的实力来确定的。

柏林会议是一次赤裸裸地瓜分非洲的会议，它标志着瓜分非洲的序幕已经结束，高潮已经到来。

二、大角逐和大抗争

1876—1884年，西方列强在非洲所占殖民地与全非洲面积的比例，已由10.8%增长到25%；而柏林会议后的15年，即到1900年时，则猛增到90.4%。在瓜分非洲的高潮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角逐，另一方面则是非洲人民的大抗争。

柏林会议之后，根据“有效占领”的原则，从纸面上瓜分非洲缔结协定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在瓜分非洲中有两类协定：一是欧洲列强同非洲的国王、酋长、首领缔结的协定，二是欧洲列强之间缔结的协定。前一类协定是后一类协定的依据和讨价还价的砝码。柏林会议一结束，俾斯麦便于1885年3月率先宣布乌萨加腊地区为德属东非，其根据就是彼得斯与当地酋长签订的协定。1886年，英德签订了第一个瓜分东非的协定，英国承认德国对上述地区的占领。

属于前一类的非—欧协定又分两种。一种是非洲当权者同所谓欧洲民间组织如探险队、贸易公司、传教会等签定的协定。在瓜分非洲期间，欧洲列强的代理人，例如斯坦利、布拉柴、纳赫蒂加尔、彼得斯、卢加德等，都以探险家、商业公司、传教会的名义，带着一小队武装，深入非洲内陆，以武力胁迫和诱骗各地的非洲首领签订各种协定。这些协定，是以含糊其辞的联盟、保护的名义，在非洲人不知真情的条件下缔结的。1888年英国和洛本古拉缔结的莫法特条约和拉德租让权就很典型（参见本卷二十八章）。欧洲列强之所以让商业公司、探险协会出面缔约，是为了减少风险和开支，一旦这些协定生效，或没有遇到其他列强的干预，便被各自的政府接管。德国东非公司、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东非公司都最终把自己的领地转交给了政府。另一种是非洲国家政府同欧洲国家政府之间缔结的协定。欧洲列强往往利用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企图加强对自己的诸侯（或附庸国）的统治，或者为使自己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或非洲邻国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诱骗他们缔结协定，将其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例如，1889年意大利同刚刚继位仅40天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签订了《永久和平友好条约》（即《乌查利条约》），并根据对第十七条的篡改，宣布埃塞俄比亚为其保护国（参见本卷第二十三章）。

这些协定以纸面上的占领变为实际的占领，一是需要以武力扑灭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这就是本时期非洲历史的主要内容——非洲人民的大抗争；二是需要根据柏林会议的议定书，得到有关国家的认可。在瓜分非洲期间，列强的代理人和特使都力图抢先奔向尚未被占领的认为有利可图的地区。这就不免造成许多磨擦和危机，例如1898年英法在苏丹的法绍达（今科多克）

横刀相向，形成所谓的法绍达危机；1893年卢加德和德尔科为抢占博尔古而造成的武装对峙，等等。但是，这些磨擦和危机终究没有发展成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当时他们可以互相以牺牲非洲人的领土主权来达到妥协。例如，1898年6月14日，英法两国订立《巴黎条约》，确认彼此侵占的领土，从而结束了在西非的争夺；1899年，双方又达成协议，法国承认苏丹西南部和白尼罗河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则确认苏丹以西的赤道非洲是法国势力范围。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我们一直忙于在地图上白种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划线，我们互相馈赠山川湖泊。我们所遇到的一点小小的障碍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列强的代表在谈判桌上以交换非洲领土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同一个民族、同一部落、同一国家被割裂，有时甚至分裂成几块，给今日独立的非洲国家遗留了无穷的后患。

不论是非—欧协定还是欧—欧协定，都是纸面上的东西。欧洲列强要实际占有他们在协定中所瓜分到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还得靠武力侵占。因此，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过程，也是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1876—1900年间，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风起云涌。凡殖民者入侵的地区都在抵抗殖民者的侵略。非洲各族人民为了保护领土主权，上至爱国的封建主、奴隶主、酋长，下至普通的农牧民、奴隶，都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反殖斗争是由爱国的君主和酋长领导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第七次阿散蒂战争、拉巴赫领导的乍得湖地区的抗法战争、萨摩里领导的瓦苏鲁国的抗法战争、格比达西领导的达荷美的抗法战争、马达加斯加的抗法战争、阿赫杜马领导的抗法斗争、索科多王国的反英斗争等。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同样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军人也参加和领导了抵抗运动，例如奥拉比领导的埃及抗英斗争。非洲的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在反帝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国家的反帝斗争就是直接在宗教领袖领导之下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形式展开的，如苏丹马赫迪运动。

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在1876—1900年间的一切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由双方的综合国力的悬殊对比所造成的。欧洲列强都已开始向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而非洲各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有的甚至尚处于无国家的原始社会。欧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当时欧洲列强都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来从事殖民战争，而非洲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常备军，大多数国家则临时动员人民参加防御和战斗。欧洲军队是用当时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例如新式的海军舰艇、连发枪、格林和马克沁机枪、重炮等等，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军队用的是传统的武器，即使从欧洲进口的武器也是老式的、不合用的旧货，只有萨摩利和孟尼利克获得了少量新式的欧洲武器。更何况在1890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列强一致同意，不向非洲出售武器和弹药，至少是先进的武器和子弹。

在此期间，欧洲处于相对稳定与相对和平的时期，而非洲国家却被分裂和内部冲突所困扰，不仅各国（各族）之间有冲突，而且一国之内也有地方和中央、族与族之间的冲突。这些内部矛盾被帝国主义充分利用来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因此，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头，非洲各族人民未能显示出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15—117页。

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精神，反而使英雄史诗般的斗争变成了地方性的甚至是孤立的战斗。殖民主义者还充分利用了非洲各族之间的民族、地域和宗教矛盾，组建土著部队，以达到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目的。事实上，征服内陆的许多殖民军都由非洲人充当士兵、由少量欧洲人指挥，例如法国人组建的塞内加尔土著兵团、卢加德指挥的西非边防军、德国人组织的“奴隶雇佣兵”。北尼日利亚是由西非边防军征服的，乌班吉是由四连塞内加尔土著兵团和当地辅助军占领的。非洲人长期固守在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建立在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的均势之上，而罪恶的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更加深了这种互相敌视和互相隔离。因此，当时他们对不同部落、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侵略、杀戮可以无动于衷，而不能形成同仇敌忾的统一和团结的意识。例如，尼日利亚的蒂夫人看到基督教徒猛攻贝努埃河以北的穆斯林时，他们拍手称快，因为穆斯林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们自己遭到英国的侵略时，他们的反抗也是孤立无援的。

非洲人从战斗的实践和血泊中认识到国家主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形态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涅尼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他在告人民书中说：“敌人从海外入侵，他们破坏了我们不可侵犯的国境，并妄图消灭我们的信仰，消灭我们的祖国。……我准备采取行动，捍卫我们的国家，回击敌人。”即使在那些尚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形态的酋长们也表达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维特波伊对德国人说：“上帝在世界上建立了各种王国。所以，我知道并且相信，我愿意仍然做我的国土和人民的独立的酋长，这不是罪过。”正是列强瓜分时期非洲人民的大抗争，开始逐步形成了非洲各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它的核心便是主权意识。它不仅直接影响到20世纪初年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恢复主权的解放战争。许多当代的民族解放组织认为自己是19世纪反殖斗争的继承者。例如，安哥拉的自由战士断言，他们的民族解放战争与过去的抵抗运动一脉相通，人民群众的权力被说成是拜隆杜（Bailundu）战争的积极精神的复活。19世纪末年非洲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优秀传统，对非洲民族复兴的影响是持久的、不可估量的。

欧洲列强把非洲瓜分了，但他们争夺非洲领土的斗争并未结束，继之而来的是一轮再瓜分的斗争。根据列宁的界定，在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时候，其目标首先是小国占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非洲，英布战争和意土战争属于第一类，摩洛哥危机则属于第二类。英布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夺占了布尔人占据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意土战争则使利比亚从土耳其手中转到了意大利名下。两次摩洛哥危机，以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告终，而法国则将法属赤道非洲的一块领土转让给法属喀麦隆。到1914年，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政治独立以外，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已沦为殖民地。在非洲占有殖民领土的国家中，法国所占面积为最大，英国所占地区的人口最众（参见附图和附表）。然而，列强在大角逐中由于分赃不均，争夺并未结束。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非洲又成了帝国主义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800—1918年）》，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07页。

Adu Boahen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49.

Adu Boakened, *op.cit*, vol.7, p.5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801—802页。

列强重新瓜分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表一列强在非洲所占殖民地的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国别	殖民地面积	占非洲总面积	与本国相比
英国	9,020,920	30%	大37倍
法国	10,387,521	35%	大18.8倍
德国	2,447,018	8%	大6.8倍
意大利	2,397,206	7.9%	大7.9倍
比利时	2,345,809	7.9%	大77倍
葡萄牙	2,061,720	6.9%	大20倍
西班牙	0,330,000	1%	

表二列强在非洲各殖民地的人口单位：人

国别	所占殖民地的人口数	国别	所占殖民地的人口数
英国	51,660,000	德国	11,527,000
法国	38,500,000	葡萄牙	8,352,000
比利时	15,003,000	意大利	1,368,000

三、殖民政治制度的初创

西方列强在瓜分和侵占非洲各国的同时，便着手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机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殖民统治机构大体都已建立起来，但还有待于完善。

在瓜分非洲之前，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都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制度。直接统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废黜非洲各国原有的统治者，抛弃原有的权力机构，由欧洲官员直接把持所有政府机构，非洲人只能担任办事员之类的低级职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英国在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都是如此。在瓜分非洲高潮期间，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都广泛地在其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但是少数白人殖民者突然要统治如此广大的地区，况且非洲人民的抵抗斗争此起彼伏，这是殖民列强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间接统治制度和保护国制度应运而生。

间接统治是英国人在印度推行过的。曾在印度服役的卢加德代表英国东非公司征服乌干达时，即设想利用其固有的行政机构来治理这个国家。1890年缔结的协定保留了布干达国王（卡巴卡）的统治权，国王则承认英国东非公司至高无上的权力，英国派一名驻节长官执掌其事。当卢加德调往北尼日利亚征服该地时，他把间接统治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制度，并在全尼日利亚加以推广（参见本卷第二十五章）。间接统治制度实质上是在间接统治名义下实行直接统治，也就是说，一切被保留下来的土著首领（哈里发、素丹、埃米尔和各级酋长）不是独立的统治者，而是唯殖民列强的驻节官之命是从的附属统治者，他们在行政、司法和税收上仅有的一点权利也是殖民者赋予

的。由于间接统治制度对节省行政经费和人员、特别是分化非洲人的反殖斗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卢加德在全尼日利亚加以推行，而且德国人在喀麦隆北部、布隆迪和卢旺达也加以推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在更广的区域中得以推广。

保护国制度也是广为采用的一种殖民统治制度。埃及、桑给巴尔、巴苏陀兰、斯威士兰都被先后宣布为英国的保护国；摩洛哥、突尼斯则被宣布为法国的保护国。保护国制度同间接统治十分相似，这些保护国的军事、外交、财政、司法大权都在条约（或协定）中明确规定由宗主国掌管；两者的差异只是实行保护国制度的国家还保留着名义上的中央政权，而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方过去的统治者却变成了地方一级的土著官员。保留下来的中央政权也是有名无实的。例如，确立摩洛哥保护国制度的1912年的法摩条约规定，法国常驻总专员有权代表法国政府批准和发布摩洛哥苏丹批准的一切法令。实际上，摩洛哥苏丹只是法国殖民者的傀儡。

不论欧洲列强在非洲各国推行哪一种殖民政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洲各国的政治决策和实际统治权掌握在宗主国相应的机构手里。英国早就设有管理殖民地事务的殖民部，但瓜分和占领非洲的事务，长期归外交部管辖；直到非洲瓜分完毕后，外交部才陆续将尼日利亚（1900年）、德圣士瓦、奥兰治、斯威士兰（1902—1903年）、尼亚萨兰（1904年）、乌干达、肯尼亚、英属索马里（1905年）、桑吉巴尔（1914年）转交殖民部管理。法国在1894年成立殖民部，但它只负责法属西非、赤道非洲、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的事务，突尼斯和摩洛哥由外交部分管，阿尔及利亚由内务部分管。德国于1907年组建殖民部，管理德属非洲事务。意大利于1912年建立殖民部，负责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事务。殖民地的事务由有关各部决定，下达给殖民地总督或总专员、总领事和驻节官执行。总督或总专员之类的殖民官员是宗主国君主或总统的代表，是各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又统率一批地方殖民地官员，或直接行使权力，或监督土著首领按殖民者的意志行事，非洲人完全被剥夺了主权。这种主权体现在军事、外交、税收、立法、司法等方面。

宗主国从占领一开始，就攫取了外交和海关大权。有的用条约或协定明文规定宗主国在外交事务上代表殖民地。他们接管殖民地的海关，或设立海关，征收海关关税。控制通货也是其主权的一个标志。宗主国着手控制殖民地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例如在尼日利亚，以1便士兑换300贝币，但在购买食物时由于面额太大，未能将贝币逐出流通领域。1908年，殖民者铸造了一种铜和锡的地方硬币，有眼，币值较小，可以购买价格较低货物，方才得以流行。又如在法属马达加斯加，通行一种五法郎的银币。

军队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部门，殖民者是依靠军队征服非洲的，征服之后在各殖民地首都和战略要地都驻有军队，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在实行间接统治制度的地区，保留了原有的少量土著军队，但它的性质已经改变，不再是一支保卫本国主权的军队了。

各宗主国的殖民政权，在本质上是维护宗主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而压迫非洲人的政权，但也各具特色。这主要是由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特点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479页。

peter 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非洲经济史), Oxford 1986, p.67.

及其殖民经验所决定的，但也受到非洲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

英国资产阶级具有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它在世界上统治过多种民族，试验过多种统治形式，从不拘于一格。其殖民统治手段狡猾和权变的特点在非洲再一次得到了体现。英国根据非洲各国的不同历史、社会和人种特点，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实施它认为最合适的政治制度。例如，它在埃及实行保护国制度，在南非联合布尔人实行一种半自治状态的联邦制度，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制度，在罗得西亚和塞拉利昂则实施直接统治。这些权变的形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英国殖民者在各该地区统治的安定，最大限度地掠夺当地的资源和剥削土著居民。但万变不离其宗，各种统治形式下的政策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帝国政府、主要是首相和殖民大臣手中，英国内阁才是最高决策机关。但各殖民地的大总督、总督对其所辖地区事务的政策可施加重大影响，不理睬“在任者”（man on the spot）的事例是罕见的，特别是罗得斯、卢加德、喀麦隆和米列尔等人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内阁和殖民部的高度重视。

英国殖民政治制度的权变和狡猾，还表现为它在许多殖民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立法机关，基本上都由高级殖民官员组成，也有几个由总督指定或选举的土著成员。把此类机构说成是“自治政府发展的胚胎”是难于令人信服的。其实，这些土著成员是为殖民统治装饰门面，欺骗非洲人，并不能决定任何政策。

与英国不同，法国在非洲的政治制度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法国一直坚持的“壮大法兰西民族”的同化理论。他们认为，法国所创造的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法国人应该把法兰西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因而主张殖民地与法国在政治、经济上完全保持一致，非洲土著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法兰西文化，最终自然同化为法国公民。为了给这种殖民主义理论披上漂亮的外衣，他们把同化的思想渊源追溯到爱尔维修、伏尔泰和卢梭等主张的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但是，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反对封建专制压迫的，与殖民主义的同化理论可谓南辕北辙。

为推行同化政策，法国在其殖民地强制推行法语，普及所谓法国生活方式。一旦土著接受了法语和法国生活方式，便可以成为法国公民，被赋予一切法国人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正如戴维逊所指出：“同化只是一种幻想”。依据1912年颁布的《入籍法》，凡任公职十年，拥有财产、受法国教育或服军役获奖者，才可以取得法国公民权。但到1918年，获得公民权者仅为24997人，其中22711名住在塞内加尔。俾斯麦不无讥讽地说：“法国殖民地是没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当时，法国殖民地总人口近4000万，而获得公民权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这些没有获得公民权的殖民地人被视为法国的“隶民”，他们担负法国公民的义务，却享受不到法国公民的权利，实际上是法国的殖民奴隶。

Ken Smith and F.J. Nothling, *Africa, North of the Limpopo* (《林波波河以北的非洲》), Pretoria 1985, p.209.

M. Crowder, *Senegal, A Study of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塞内加尔：法国同化政策研究), London 1967, p.2.

戴维逊：前引书，第100页。

Ken Smith & F.J. Nothling, *op.cit*, p.225.

专制集权和同化政策是一对孪生兄弟。法国人为了推行同化政策，坚持认为殖民地是法国的一部分，除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以外，把非洲各国的领土任意合并为几个大行政区，如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等等。这些殖民地原有的统治者被流放、关押和杀害，原有的土著制度被撇在一边。各殖民总督有权任命和更换下属官吏，殖民地的官吏都来自法国，他们在所管区域实行专制统治。

葡萄牙殖民者也奉行同化政策。他们认为，非洲殖民地是葡萄牙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葡萄牙的海外省，非洲殖民地是卢西塔尼亚文明的一部分。其同化政策早在 1761 年和 1763 年的王室法令中已有详细规定：假如莫桑比克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教养就有选举权，就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但当时还是贩卖黑奴的猖獗时期，莫桑比克人民毫无平等权利可言。葡萄牙的同化政策还带有重商主义旧政策的特点，这就是在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在瓜分非洲时期，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地急剧向内地扩张，但这一统治政策的基本特征到 20 世纪初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柏林会议后，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为时不长，但也颇具特色。它在西非的多哥和喀麦隆、东非的坦噶尼喀和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实行直接统治，通常任命军人担任总督。在卢旺达、布隆迪和布科巴（喀麦隆北部），德国人保留了原有的非洲人行政机构，德国总督通过驻扎官进行间接统治。不论是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都具有军事专制的特征。德皇委派的殖民地总督集立法、行政和军事大权于一身，直接对内阁首相负责。总督、驻扎官和各区行政长官多由军人担任，所有的战略要地都驻有军队，德军还设立“感化营”，用来惩罚反德的土著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殖民地被英、法、比等国所瓜分，因此德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对非洲产生重大影响。

1885—1908 年，刚果盆地（扎伊尔）成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并冠以“刚果自由邦”之名，实际上它毫无自由可言。利奥波德派总督进行直接统治，重要行政人员都是欧洲人（并不全是比利时人）。1908 年，刚果自由邦由比利时政府接管。

无论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其首要目的都在于保证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所以，间接统治，保护国制度与直接统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也不存在纯粹的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因为其直接统治也不能不用一些当地上层阶级分子，而间接统治下的国王或酋长们如果违反殖民当局的意志，也必遭废黜和流放。

四、殖民地经济的初步

帝国主义疯狂瓜分非洲，其根本目的是要把非洲各国变成其获得超额利润、垄断地占有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地方。他们建立各种殖民统治形式的政权，也是为着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欧洲列强把非洲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于 19 世纪初年，当时由于贩卖黑奴仍在大规模进行，也由于欧洲列强所占领土不大，因此进展缓慢。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帝国主义把非洲瓜分殆尽之后，非洲大陆才被强制纳入欧洲——东方经济圈，像中东一样成为这个经济圈的附属部分。

在大角逐的初年，帝国主义在各自占领的地区，大肆掠夺自然生长的资

源，如野生橡胶、象牙等等。但是，这些资源毕竟有限，产量迅速下降。于是，掠夺土地并建立生产出口作物的农场和种植园，遂成为殖民者早期剥削非洲人民的关键。

在占领之初，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宣布土地为宗主国所有，或者通过各种法律，让各殖民公司和欧洲移民占据大片肥沃土地。在阿尔及利亚、刚果、南非、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尼亚萨兰、肯尼亚、坦噶尼喀、喀麦隆、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殖民者占领了大片良田沃土。到 1892 年，法国大地主和公司在阿尔及利亚已占有 40.2 万公顷土地，其中 24.6 万公顷分属 114 个大农场主。在 1901 年，约有 15.1 万名男性农业工人在欧洲农场工作，占农村总人口的 13%，1914 年增加到 21 万人，其中 41% 的农业工人种植葡萄。在南非，1913 年白人占有 80% 的土地，而全部非洲土著只许占有 20% 的土地，且为贫瘠之区。在欧洲白人占有的土地上，建立了生产出口产品的农牧场。在肯尼亚白人占有的土地中，1/10 辟为种植园，栽培棉花，一部分作为牧场，其余则任其荒芜。在南罗得西亚，全部土地被宣布为英王所有，1914 年 23% 的土地划为土著保留地，约 32% 的土地让给欧洲人和欧洲人公司。白人农场主种植玉米、养牛，对外出口。在德属东非，两个大棉花种植园各占有 3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在坦噶—潘加尼地区，橡胶种植园占有 1265 公顷土地。这样，在非洲许多国家，由于殖民者掠夺土地、种植经济出口作物，形成了殖民大农场（种植园）所有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或者被驱逐到保留地，或者沦为欧洲白人的雇工和佃农。

但是，在另一些国家，特别是西非，由于非洲人的强烈反对，殖民者大规模强占土地的企图未能得逞。英国在黄金海岸曾于 1894 年抛出一项土地条例，准备把一切荒地、森林和矿藏转归英国王室所有，后因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对而作罢。1897 年，英国又颁布《公共土地法案》，企图把村与村之间尚未开垦的土地和丛林划为公共土地，又因遭到反对而告吹。最后，英国只得代之以 1900 年的租借法令，规定土地出租应由法院裁决，所租土地只能用于开矿、伐木、采集橡胶，而不能用于农业，期限不得超过 99 年。在法属西非，法国殖民者早就企图夺占非洲人的土地。1887 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塞内加尔宣布土地是殖民地财产，可以出租给欧洲人。1900 年，法国颁布法令，宣布法兰西国家是一切未占和未经营土地的所有者。1904 年，法属西非成立后颁布的法令，把全部土地分为不可出让的公地和可以出让的私产两类，总督和大总督有权处理出租事件；1906 年又公布《土地登记法》，规定土地占有者可依法申请登记，公布三个月后如无争执，土地即归申请者私有，以便为法国殖民者购置土地准备条件。但这同样遭到非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申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 年的北非》), Longman, p.280.

Peter 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非洲经济史》), Oxford 1986, p.88.

Gideon Swere,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史》), New York 1978, p. 139.

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375 页。

Peter Wickins, op.cit., p.89.

AduBoahen, 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19 世纪和 20 世纪加纳的变革》), London 1875, p.81.

上述各项法令，均引自杨人鞭：《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428 页。

请登记者为数不多。到 1915 年为止，经登记而发出的土地契据仅 1267 件，共 12000 公顷土地。1894 年法国殖民当局在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把 500 万公顷的土地租给康格公司，引起了象牙海岸人民的大起义，最后不得不取消该项租约。

西非人民的反对是殖民者未能占据当地大量土地的主要原因。此外，非洲人村社土地制度的凝固性，使欧洲种植园难于获得大量劳动力；西非气候炎热潮湿，不利于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殖民当局认识到，西非沿海有长期对外贸易的经历，只要垄断收购权，同样也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因此，在西非，除沿海小规模欧洲人种植园外，白人大规模农场（或种植园）经济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宗主国在西非地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为了把西非变成农业原料基地，他们采用市场导向，鼓励西非种植经济作物，或采用税收，行政干预强制农民改种出口作物。黄金海岸在 1879 年试种可可成功，1885 年开始出口，1911 年产量达到 8840 万磅，价值 600 万英镑，占其出口总额的 40%，跃居世界首位。尼日利亚早就生产和出口棕榈产品，英国占领后产量和出口量逐年增长，1900—1904 年间平均每年出口棕榈油 5.3 万公吨，棕榈仁 11.9 万公吨；1910—1914 年分别增加到 7.7 万公吨和 17.1 万公吨。

塞拉里昂也是以生产和出口棕榈产品为主，1913 年棕榈产品和柯拉的出口价达 137.5 万英镑。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主要种植花生，花生的出口占冈比亚出口总值的 9/10。

经济作物的发展，对村社和土地公有制起着侵蚀和破坏作用。农民的生产不再是单纯为自身的消费，而是生产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同时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和日用工业品。这种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商品愈多，村社成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村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西非各国经济作物区在被卷进世界商品交换的洪流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土地名义上仍然属于公有，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买卖、出租、侵占公地、开辟荒地据为己有的现象屡屡发生。黄金海岸的殖民当局公开承认其合法性。铁板一块的村社成员开始分化成富农、自耕农、分成制佃农、雇农、长工、短工等等。其中占优势的是自耕农和分成制佃农，他们构成了西非小农经济的主体。但是，这些小农也逃脱不了宗主国垄断资本家的剥削和控制。可可、棕榈、花生的价格、收购、运输和出口，都操纵在宗主国资本家成立的各种公司及其代理人手中。例如，世界市场的可可价格是在英国伦敦定价的。西非小农所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生产所需的资金和生产资料，依赖宗主国的公司及其代理人供应。不等价交换、高利贷是剥削小农的主要手段。

应当指出，小农经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规模和范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有限的。这里占优势的（不计南非）既不是小农经济，也不是白人农场（或种植园）经济，而是传统经济和土地所有制。

杨人楩：前引书，第 425 页。

Adu Boahen, *op.cit.*, pp.99.

Peter Wickins, *op.cit.*, p.77.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379 页。

Robert, Iyetad, *The Asanti, A Proud People*（《自豪的阿散蒂人》），1958, p.137.

在封建生产关系已很发达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殖民当局保留并充分利用原有的封建结构。他们与地主阶级狼狈为奸，发展单一出口作物，共同剥削农民。英国占领埃及后，大力发展棉花生产，削减其他作物的生产。棉花和棉籽的出口价值，由占领开始时（1882年）占全国总值的约75%上升到1914年的90%以上，其中大部分输往英国。英国资本家利用压价的办法，加紧对埃及农民的剥削，1882年，每堪他尔棉花输出价为14.28里亚尔，1897年跌至7.18里亚尔。由于大量植棉，挤占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例如，1879—1913年间，小麦的播种面积由占全国播种总面积的20.6%下降到16.9%，大麦由11.5%下降到4.8%，结果使素有“粮仓”之称的埃及不得不靠进口粮食度日。

总之，殖民者在其占领初期，使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掠夺土地，发展单一作物经济，把非洲农业引上了殖民地经济的轨道。

殖民者掠夺的另一个领域是采矿业。英、法、德等国资本家大量投资开采黄金、钻石、锡、锰和铜矿。自从南非发现钻石之后，其产量和出口量迅速增长。钻石工业在比属刚果、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安哥拉和西南非洲相继兴起。1913年，南非的钻石产量接近600万克拉，达到巅峰。西南非洲的产量1908年为38275克拉，1913年接近150万克拉。

黄金生产在非洲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也是殖民者踏上非洲大陆以来一直追逐的主要目标。在占领非洲各国之后，宗主国用近代技术装备这个古老行业，并发现了一些新的矿区。非洲黄金的主要产地是南非、南罗得西亚、黄金海岸、比属刚果、马达加斯加和坦噶尼喀，1913年其产量分别为273.7公吨、21.5公吨、11.9公吨、1.3公吨和0.4公吨。

锡的重要产地是尼日利亚，但在拉各斯——卡诺铁路建成之前，矿石的运输很困难，到1911年才超过四吨的水平。铜的主要产地是比属刚果、西南非洲和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的铜矿用近代技术开采，1911年首次出口。德国于1906年在西南非洲开采铜矿，当年出口46877马克，1913年增至792.9万马克。北罗得西亚铜矿的开采，在坎散希开其端，继而在1912年在布瓦纳——姆库布瓦作了第一次试验性生产。英国人还在尼亚萨兰开采铬矿（1906年）和石棉（1908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开采铁矿和磷酸盐。

非洲可资通航的河流里程不长，要把殖民者所需的矿产品和农产品从内地运往沿海，将开矿所需的机器设备从沿海运往内地，靠头顶运输和独木舟显然是不行的，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便是修筑铁路。当然，这不是殖民列强修铁路的唯一动因；修建某些铁路的最初动因是实现军事占领，镇压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例如：法国人修筑的科纳克里至康康的铁路和英国人修建的从埃及到苏丹的铁路。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从沿海伸向内陆的铁路都已筑成。南非是

Peter Wickins, *op.cit.*, p.78.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Helmuth Stoecker, *German Imperialism in Africa* (《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 London 1986, p.146.

petrt Wickins, *op.cit.*p.96.

Helmuth Stoecker, *op.cit.*, p.147.

修建铁路最早的地区之一，到 1912 年约有 2600 英里铁路线，大都是从海港城市开普敦、德班、东伦敦等伸向钻石和黄金产地的。随着英国向北扩张，铁路线也随之向北伸展。1897 年，以南非马弗京为起点的铁路线修到了南罗得西亚的布拉瓦约，而后又从布拉瓦约修到了煤炭产地万基，1907 年延伸到北罗得西亚的矿区布罗肯希尔，最后于 1910 年伸展到了比属刚果的伊丽莎白维尔（今卢本巴希）。在东非，英国建成了乌干达铁路；在德属东非，中央铁路从达累达萨拉姆到吉戈马于 1914 年建成，北线于 1911 年从坦噶修到了莫希。法国人修筑的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于 1906 年通车。在西非，英国人修筑的铁路有拉各斯到卡诺的铁路（1906—1911 年）、塞康第到库马西的铁路（1903 年完工）、弗里敦到彭登布的铁路（1896—1906 年）；法国人修建的有达喀尔到巴马科的铁路。在中非，比利时和英德资本合作修建了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非洲的铁路建设具有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的特征，铁路主要连接内陆的矿山、经济作物产区和海口，而不是非洲各区域的互相连接；修建铁路的设备、技术由宗主国输入，由欧洲人进行管理；而劳动力主要依赖强迫劳动，无偿征用土地，例如在达荷美（今贝宁）铁路工地劳动的达 5000 人，他们都是强制征发来的。因此，非洲的铁路建设并未带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服从于宗主国的掠夺。当然，它客观上对促进内地同沿海的联系、活跃商品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建立大型种植园经济、开发矿山、修建铁路所需要的资金，是由宗主国输入的。本来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占有投资场所，但并不是任何一块已被占领的土地都可以成为投资场所，许多地区在占领初期缺乏交通、动力和通讯设施。因此，当时欧洲资本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北非，以及东非和西非的沿海地带。投资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在 1902—1910 年间，英国输入非洲的资本虽未始终保持同等高的水平，但仍然是大量的，1914 年高达 1290 万英镑。其投资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私人投资，例如建立农场、开采黄金、钻石和铜铁等矿藏；二是殖民政府的借款，例如法属刚果 1909 年借款 2100 万法郎，1914 年借款 17100 万法郎。殖民政府的借款主要用于建设铁路、公用设施等。宗主国在殖民地相应建立了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一方面是适应融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和垄断殖民地的金融和经济命脉，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三个黄金海岸的企业家 1890 年在奥布瓦西着手开采金矿，1895 年就被斯密斯——凯德公司收购，成立了阿散蒂金矿有限公司，黄金海岸的黄金生产就被英国人垄断。到 19 世纪末，加纳人已被外籍矿业公司完全排挤于采矿业之外。

宗主国在非洲造成的这种生产布局以及他们掌握的殖民政权，为解决劳动力提供了基础。一类地区是为欧洲资本家创造利润的采矿和经济作物生产区，它占全非很小的面积，却是欧洲资本的聚集之地；另一类是面积很大、但仍保持着传统生产方式的地区，它们很少生产或者根本不生产出口作物，而为第一类地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殖民政府采取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迫使非洲人到欧洲农场、矿山和铁路建设工地劳动。一种办法是殖民当

巴兹尔·戴维逊：前引书，1989 年，第 123 页。

Peter Wickins，op.cit.，p.73.

Peter Wickins，op.cit.，p.102.

Peter Wickins，op.cit.，p.100.

局，用法令的形式规定强迫劳动的时间，例如 1899 年葡萄牙殖民者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颁布法令，规定凡 14—60 岁的土著居民每人每年必须至少服劳役 6 个月。殖民当局又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向圣多美种植园和南非金矿输送劳工。1909 年以后，从莫桑比克征发的劳工一度达 10 万人。葡萄牙政府得到的征发费是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德属东非，殖民当局规定的劳役时间，1906—1910 年为每人 180 天，1913 年提高到 240 天。在乌干达，英国殖民当局规定，每个非洲人每年必须无偿劳动 30 天。劳动力的征发一般由土著酋长负责；如果酋长抵制，殖民当局便指定他人取而代之。这便形成了所谓“效忠型酋长”。1909 年，在列入殖民当局名册的基库尤人酋长中，“似乎差不多全是通过实际行动证实自己效忠政府而不是凭借其在基库尤族社会中的地位才保住官职的”。另一种办法是征收现金税收。这一方面是保证殖民当局财政收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劳动力的长期供应。贝专纳殖民当局从 1899 年起征收茅屋税，每人每年收 10 先令，1909 年增加到 20 先令。非洲人为了缴纳现金税，被迫到欧洲人农场和矿山当苦力，或者流入西非的出口作物产区。例如许多中非和西非内陆的非洲人涌入塞内加尔、黄金海岸等经济作物产区，受雇于当地的酋长和商人，种植可可和花生，成为受保护人和流动农工。概而言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洲流动工人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是殖民者统治非洲制造出来的一个悲剧。许多流动工人往往葬身异乡。1901—1910 年间，莫桑比克在矿山劳动的流动劳工死亡率高达 67‰。

帝国主义在占领非洲初期所创建的完全依附于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体制。虽然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最终成熟，但在当时就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无数非洲人在强迫劳动中死去，许多国家的农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迁到荒漠之区的土著保留地上，原有的手工业、冶炼业进一步被摧残，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近代工业又未建立起来。但是，这一时期却是非洲社会变革的开始。千百年来因循停滞的村社组织受到冲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同时，在沿海的矿业中心，近代化的大城市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农场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已出现，非洲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一些较先进的非洲国家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使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变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在埃及、马格里布等国最先发起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组织，如埃及祖国党、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青年突尼斯运动。随后在南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相继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1912 年，南非成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阶级结构的变化，对非洲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运动的兴起都带来了一定影响。

Peter Wickins, *op.cit.*, p.75.

Peter Wickins, *op.cit.*, p.76.

戴维逊：前引书，第 113 页。

戴维逊：前引书，第 117 页。

第二十一章 埃及沦为殖民地及其民族运动的兴起

自从埃及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之后，它便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先是丧失关税自主权；接着实行双重监督制度，丧失了财政自主权；而后再成立“欧洲内阁”，欧洲人控制了政权；1882年奥拉比运动被镇压之后，英国人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埃及的独立已名存实亡，1914年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

随着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埃及人民同帝国主义及与之勾结的土耳其—契尔克斯族封建集团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82年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1906年丹沙微惨案引发的反英民族运动的高涨，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在反帝斗争中，广大农民、市民、士兵、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伊斯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日趋觉醒，他们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一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土著地主，也在一定时期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

一、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学说和埃及知识分子的改良思想

封建专制统治，使埃及人民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侵入，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灾难。

实行“双重监督”后的第一年（1877年），埃及财政收入仅950万英镑，但还外债就需750万英镑，再除去上交奥斯曼帝国的年贡等费用，用于国内的钱只剩100万英镑左右。英法两监督对此还不满意，要求“欧洲内阁”榨取更多财富，结果许多地方随意增加新捐税，甚至开始征收一年后的税，使许多农民被迫抵押土地，用押金交纳租税。这种掠夺式的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878年，上埃及发生大饥荒。当时在埃及的欧洲人报告道：“妇女儿童们长途跋涉、挨村乞讨，……死于饥饿者难以计数。”埃及工商业者处处受到外国资本的掣肘和打击，日子同样很不好过。他们手中数量不多的资本和财产，也成了“欧洲内阁”敲榨勒索的重要目标。许多商人不但要交纳日益提高的货物税，还经常被迫购买名目繁多的债券，已濒临破产的边缘。“欧洲内阁”还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地主们身上，1871年，为捞得一笔巨款以应付财政危机，伊斯梅尔曾颁布“补偿法”，规定地主只要一次付出六倍于土地年税的钱，以后便可免交土地年税的一半。出于同样目的，“欧洲内阁”现在又打算废除“补偿法”，让地主们恢复交纳全部土地年税。这一措施遭到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部分议员在议会中要求政府延长“补偿法”的有效期。

总的来看，除了少数买办资产阶级以外，埃及各阶层人民都对英法“双重监督”和“欧洲内阁”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埃及人民与封建统治集团和外国殖民势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国难当头，出路何在？埃及知识分子首先起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已出现了以留欧学生为主的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到19世纪7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相当可观，成了埃及知

弗·阿·波特金：《侵占和奴役埃及》（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第54页。

E.B.Cromer, *Modern Egypt* (《近代埃及》), London 1909, p.35.

识阶层中较为活跃的力量。埃及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商人家庭，完成学业后或经营农业、或做生意、或在企业和政府机关中供职。“双重监督”制形成后，不但从农和经商的那些人前途暗淡，当职员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每况愈下。由于大批欧洲人涌入，许多埃及知识分子被企业和行政部门排挤出来。那些保住了饭碗的人，待遇也比欧籍同僚低得多。如在政府机关中，欧籍雇员年平均薪金为 300 埃镑，而埃及雇员仅 30 埃镑。因此，埃及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他们积极宣传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如里法阿·塔赫塔维，曾去法国学习五年，1832 年回国后从事翻译、教育工作。他主持翻译了《拿破仑法典》等数百部西方著作，并研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所著《巴黎游记》阐明了立宪机构应当监督行政机构的原则。当时新式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实现君主立宪，排除列强干涉，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过，当时埃及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盲，又深受宗教思想的束缚，一时还难以理解这些主张。在唤起广大民众方面，新式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不如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中心的宗教学者们的影响大，而後者的思想武器便是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思想。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生于阿富汗，少年时代就学习语言、历史、哲学、法律、《古兰经》、圣训学、医学等，后又离家去印度学习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十分渊博。青年时代，他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的许多地方游历讲学，亲眼看到西方与东方之间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对欧洲殖民势力给东方伊斯兰国家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因此决心以启蒙教育来唤起各国穆斯林反抗列强，振兴国家。此后，他到处宣传自由，主张改革伊斯兰教，号召东方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击退西方的渗透和侵略。他还倡导学习自然科学和先进的文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方各国强盛起来。他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

1871 年，伊斯梅尔想借助贾迈勒丁的威望笼络埃及知识分子和穆斯林群众，便聘他为爱资哈尔大学教授。贾迈勒丁觉得这是实现启蒙教育计划的好机会，欣然应聘来到开罗，从此开始在埃及宣传自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他打破爱资哈尔大学只讲授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的惯例，在课堂上讲述古代伊斯兰学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贡献，还带着地球仪走上讲台，向学生们解释地球的形状。他的做法被顽固派斥为“异端”，却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教出的许多学生，如穆罕默德·阿卜杜和萨阿德·扎格卢勒，后来都成了埃及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

埃及陷入“双重监督”的半殖民地状态后，以贾迈勒丁为代表的激进的宗教学者们逐渐从课堂和清真寺走向社会，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办起了《埃及报》、《商业报》等进步报纸。贾迈勒丁的得意门生和拥护者阿卜杜·艾迪布·伊司哈格、塞利姆、奈加什等人在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宣传爱国主义，抨击英法对埃及的奴役。贾迈勒丁本人在一次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埃及人正在奴役中生活！在暴政的压迫下生活！……埃及的同胞们！如果你们有热血，就应当起来反抗！”他们讲的道理朴实易懂，还带有伊斯兰色彩，在中下层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思想中有不少内容是与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

等、博爱”的口号相一致的。而新式知识分子们也认识到，西方的民主思想若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就更易广泛传播。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革命理论与东方伊斯兰启蒙思想便在埃及逐步互相交融。为将要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大埃及人民，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年们，从贾迈勒丁等人的学说中看到了希望。许多青年学生深夜上街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革命思想，以唤起人民。阿卜杜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埃及民众思想上的深刻变化：“麻木的感情复苏了，压抑的理智觉醒了，全国到处都觉悟了，其中尤以开罗觉悟得最快。”

二、祖国党的成立和民族运动的兴起

在爱国民主思想迅速传播的条件下，一些秘密的革新组织应运而生。此类组织最早出现在军队中，因为当时埃及社会中最有组织的力量正是军队。

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起，埃及军队里的高中级职务就大都由土耳其族和契尔克斯族军官担任，埃及籍官兵很少有人能升到中级以上职位，且薪饷大大低于土、契族军官，还经常被迫去干许多与军事无关的苦役，如挖运河或耕种赫迪夫的私人田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埃籍官兵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很容易接受贾迈勒丁等人的主张。直接促使军人们组织起来的是 1875—1876 年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失利。在那次战争中，土、契族高级军官玩忽职守，外籍顾问出卖情报，致使埃及几个师被歼，许多埃及籍官兵遗尸异国，这激起了具有爱国思想的中下级军官的极大愤慨。同时，由于埃及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本已很低的军人薪饷经常被拖欠乃至克扣的情况，使军队中充满惶惶不安的情绪。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876 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一批参加过战争且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中下级军官便秘密串联，建立了一个名叫“青年埃及协会”的组织，旨在进行反对伊斯梅尔和英法殖民侵略的斗争。该协会的创建人是阿里·鲁比，但核心人物却是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 年）。

奥拉比 1841 年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札加齐格附近，8 岁就被送到爱资哈尔接受宗教教育，14 岁应征入伍。由于他机敏能干，又正赶上当时的埃及总督塞德起用一批埃籍军人，因此，升迁很快，年仅 20 岁就获得了中校军衔，成了最早升到这一级别的土著埃及人。但是，伊斯梅尔当政后在军队中变本加厉地排挤埃籍军官，使奥拉比此后 10 多年没升一级，而许多无能的土、契族军官却飞黄腾达，这使他十分痛恨专制统治下的不公正和腐败。在对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担任军需官的奥拉比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指挥不当，招致一些高级军官的嫉恨。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和鲁比等人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后来，他虽被释放复职，但已对伊斯梅尔不抱什么希望，即决定建立秘密组织。青年埃及协会的骨干分子还有阿里·法赫米、阿卜杜·阿勒·希勒米、穆罕默德·奥贝德等青年军官和一些学生、记者等。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伊斯兰启蒙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军队的中下层拥有许多支持者。

在军官们开始有组织活动后不久，一部分代表地主利益的议员和知识分子于 1878 年建立了“祖国协会”，因其活动中心在开罗附近的赫勒万，又被

称为“赫勒万协会”。该协会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谢里夫是土族大地主，拥有几千费丹土地，与赫迪夫家族有联系，受过西方教育并娶法国女子为妻。另一个核心人物穆罕默德·苏尔坦是土著埃及人，拥有上万费丹土地，是当时埃及最大的地主之一。他们都深受西方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议会中十分活跃，想在埃及实行仿效西方的改良，但并不打算搞激烈的变革。祖国协会最初的主要目标只是反对“欧洲内阁”废除“补偿法”和解散议会，后来由于贾迈勒丁和阿卜杜等人参加并引导协会的活动，才使其政治目标扩大为推翻伊斯梅尔的统治。《埃及报》和《商业报》逐步变成了协会的喉舌。

青年埃及协会在军队中有坚实的基础，而祖国协会在文职人员中影响颇大，双方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便逐渐挂上了钩。1879年，两协会终于联合起来建立了埃及最早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早期的祖国党并无严密的组织，仍是两协会松散的结合体。祖国党成立后即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响亮口号，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埃及民族国家，将矛头指向“欧洲内阁”和伊斯梅尔。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双重目标的民族主义组织登上埃及政治舞台，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三、“欧洲内阁”的垮台和伊斯梅尔被废黜

长期以来，“欧洲内阁”一直以财政困难为由克扣军饷，引起军队官兵日益强烈的不满。1879年初，首相努巴尔又以缩减开支为借口，宣布将二千余名军官转为预备役（实际上是遣散回家），并命令他们到开罗来交出武器和领取极少的欠薪。这一蛮横行径终于使广大官兵心中的怒火爆发出来，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导火线。

2月18日上午，以拉蒂夫·塞利姆少校为首的2600多名官兵聚集到内阁和财政部所在地尼罗河宫周围，高呼反对“欧洲内阁”裁减官兵、要求补发全部欠饷的口号。许多市民起初在附近看热闹，后来也加入到示威行列之中，甚至有几名议员也赶来支持军人们的举动。由于努巴尔和英籍财政大臣威尔逊拒绝考虑军人们的要求，还谩骂示威者，愤怒的军民们揪打了他们俩，并把他们关在财政部里。伊斯梅尔闻讯喜忧参半。一方面，他对“欧洲内阁”限制自己的权力日益不满，想借助军人的力量压一压努巴尔等人；另一方面，他对“造反”行动又极其恐惧。抱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他赶到财政部，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示威者提出的要求，军人和群众们这才释放了努巴尔和威尔逊。

事件发生后，伊斯梅尔一方面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还逮捕了塞利姆、奥拉比、鲁比等爱国军官，另一方面则竭力向英法施加压力，要求努巴尔辞职，恢复自己的实权。他甚至扬言，如他没有实权，就不能对维持秩序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被迫换马，同意让努巴尔辞职，但要求伊斯梅尔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努巴尔辞职只具有个人的意义，决不能改变制度及此前英法与埃及达成的所有安排；应任命亲西方人士担任新首相；英法两大臣应继续留在内阁，并拥有对任何决议的否决权。2月下旬，万民痛恨的努巴尔终于狼

Cromer, op.cit., p.76.

Cromer, op.cit., pp.87-90.

狃下台。3月中旬，著名的亲英派、伊斯梅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陶菲克出任新首相。英法两大臣不但在新内阁中留任，而且还获得了否决权。同时，被捕的军官们陆续被释放，奥拉比和鲁比均调出开罗。

虽然英法与伊斯梅尔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但埃及人民却不愿就此停步，更反对倒退，他们要继续前进。祖国党人公开指出陶菲克内阁是“第二届欧洲内阁”，号召人民继续斗争，在此前后，由英法操纵的以威尔逊为首的调查埃及财政状况的最高委员会抛出了一份报告，试图进一步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这份报告遭到埃及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契机。4月2日，325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伊斯梅尔，要求组织一个纯粹的埃及人内阁，确认内阁向议会负责的制度，并提出了一个毋需宣布国家“破产”就可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这份被称为“民族法案”的文件与威尔逊的最高调查委员会报告针锋相对，受到埃及各界的广泛支持。

伊斯梅尔虽然并不同意实行宪政，但却把“民族法案”的出现看作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4月7日，他召见各国领事，以遵从民意为名宣布解散陶菲克内阁，责成祖国党人谢里夫组阁并起草宪法，还同意英法两大臣不再留任。谢里夫随即组成完全由埃及人任大臣的民族内阁，并很快向议会提出了宪法草案。这部被称为“1879年宪法”的文件规定议会有立法权，各部大臣应对议会负责，体现了祖国党人实施宪政的主张。伊斯梅尔为了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也表示赞成这部宪法。

伊斯梅尔的一系列越轨行动，使英法等欧洲列强越来越不能容忍。4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给驻埃及总领事的信中指示：如赫迪夫继续一意孤行，英法两国政府在判断形势和采取行动方面将拥有完全的自由，以保卫它们在埃及的权益。随后，英法两总领事即把这一意思转达赫迪夫，对埃及进行露骨的威胁。德国驻埃及总领事也向伊斯梅尔提出抗议，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接着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步骤。6月19日，英法两总领事会见伊斯梅尔，正式要求他退位并离开埃及；还盛气凌人地指出：如伊斯梅尔同意这么做，就可保住一部分财产并让陶菲克继位，否则这两条都可能失去。同时，列强联合起来采取外交行动，要求奥斯曼素丹废黜伊斯梅尔，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伊斯梅尔当然也在积极行动。他派特使携大笔金银财宝赶赴伊斯坦布尔，指望再施贿赂伎俩以保住自己的宝座。

不过，在奥斯曼素丹的外交天平上，列强共同施加压力的份量要比伊斯梅尔的这些财宝重得多。6月26日，素丹正式颁布敕令废黜伊斯梅尔，命他的儿子陶菲克继任赫迪夫。当天下午，新赫迪夫继位仪式立即在开罗举行。6月30日，统治埃及17年之久的伊斯梅尔带着一笔金钱和几个王妃，乘游艇离开亚历山大，流亡意大利。

四、一八八一年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

陶菲克上台伊始，便拒绝批准伊斯梅尔曾表示愿意接受的宪法草案，使谢里夫不得不宣布辞职。9月21日，陶菲克任命前“欧洲内阁”的内务大臣里亚德为首相。此人在“欧洲内阁”时期便是镇压人民的干将，颇得英法赏识；现在大权在握，便凶相毕露地对爱国力量下手了。他下令封闭祖国党人

办的报纸，解散议会，并逮捕、囚禁和流放了大批爱国人士。德高望重的贾迈勒丁也被驱逐出境。他临行前鼓励送行的人们坚持斗争，还风趣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留下阿卜杜，这对埃及来说就足够了！”

陶菲克和里亚德对支持他们上台的英法等国百依百顺。陶菲克任命英国的贝林和法国的布里尼埃为两总监，并赋予他们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可以参加内阁会议；财政大臣每周应向两总监汇报一次，其余大臣每月汇报一次；非经英法两国政府同意，埃及方面不得解除任何一位总监的职务。这样，“双重监督”已从财政方面扩大到了政治领域，“欧洲内阁”也已死灰复燃。此后，两总监逐渐凌驾于埃及政府之上，以致他们不在埃及时，埃及政府只得频频发电报向他们请示。据记载：一次贝林将一份报告送里亚德审批，里亚德连看都不看就签了字，还厚颜无耻地说：“只要你满意，我就同意。”1880年初，陶菲克将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享有的最后一点盈利权低价出售给法国人，使埃及对运河不再拥有任何权利。这年3月，在英法两总监的策划下，成立了统盘处理埃及国债问题的清算委员会，由前“欧洲内阁”财政大臣威尔逊任主席。7月，陶菲克颁布了由清算委员会炮制的“清算法令”，该法令实际上是1879年最高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翻版。它将埃及政府的收支，埃及铁路、电报、海关的收入，以及埃及四个省的土地租税收入全部置于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使埃及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命脉完全依附于英法和其它欧洲列强。根据清算法令，最终取消了1871年的补偿法，使埃及地主们怨声载道。

祖国党人强烈谴责里亚德内阁及其后台殖民列强的倒行逆施。1879年11月4日的声明，指出埃人民不需要代表这个或那个外国影响的大臣们，要求让埃及人自己管理国家，实行振兴国家的改革。同时，由于在镇压恶浪中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军队中的进步力量更加成熟，已成为祖国党中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力，奥拉比则成了祖国党的主要领导人。这时，奥拉比已担任了开罗卫戍部队第四团的上校指挥官，处于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有利位置。另两名进步军官阿卜杜·阿勒·希勒米和阿里·法赫米分别担任了开罗第一团团团长和王宫警卫团团团长。如前所述，他俩都是青年埃及协会的早期成员。此外，奥拉比等进步军官还与内阁大臣马哈茂德·萨米·巴鲁迪建立了密切联系。此人虽出身契族，但同情祖国党的事业，主张在埃及实现宪政，曾积极参与谢里夫内阁的制宪工作，是有声望的军人政治家和学者。1880年5月，奥拉比等人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改变在薪金和提升问题上的不平等状况，取得了胜利。这对爱国力量是一个鼓舞。

1880年夏，英国驻埃及的官员们向伦敦报告道：那里“一切令人满意”，只是存在“一些污点”。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埃及国内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民族民主运动在高压下处于低潮；另一方面，祖国党人和各阶层人民决不会俯首帖耳，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正在酝酿。

里亚德内阁的陆军大臣欧斯曼·里夫基是个极端仇视民族民主运动的契尔克斯贵族，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奥拉比等爱国军官。1880年秋冬，在英法

R.Flower, From Napoleon to Nasser, The Story of Modern Egypt(《从拿破仑到纳塞尔，现代埃及史话》), London 1976, p.111.

贝林(E.Baring), 即后来统治埃及的克罗默勋爵。

Cromer, op.cit., p.171.

Cromer, op.cit., p.171.

两总监和里亚德的支持下，他以实施奥斯曼苏丹关于埃及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得超过 18000 人的敕令为由，制定了一个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的计划，矛头直指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埃籍军官，而奥拉比及其战友们更是首当其冲。

1881 年 1 月 14 日晚上，奥拉比获悉：里夫基已决定将他和希勒米解除职务，赶出军队。奥拉比、希勒米、法赫米三人经过研究，决定先发制人，联名上书，要求政府撤换陆军大臣，改革晋升制度。第二天，他们即向首相提交了请愿书。

几天后，里亚德会见了这三位上校。他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的请愿可是一件罪该绞刑的事啊！”随后又发出一连串责问：“你们想干什么？要撤换大臣吗？打算让谁来继任？”奥拉比毫不示弱，反唇相讥道：“难道埃及母亲只生了八个孩子就不再生育了吗？”（意指埃及除里亚德及其七个大臣外就无别人了吗）。里亚德气得脸色发白，只得答应研究一下。

1 月 30 日，里亚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三上校请愿一事，陶菲克亲自与会。虽然少数大臣主张达成妥协，但会议最后决定逮捕并审判他们。陶菲克亲自签署命令，召三上校 2 月 1 日到陆军部“议事”。

三位上校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在做了必要的部署后仍按时到达陆军部。他们一进门便被逮捕，随后被关押在一间办公室里。两小时过去了，三位上校仍没回来，爱国官兵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法赫米的部下穆罕默德·奥贝德少校率王宫警卫团部分官兵直扑陆军部，砸开大门冲入楼内。经过一场激烈搏斗，土契族军官四散逃窜，里夫基也跳窗溜走，爱国官兵们终于救出了三位上校。

当奥贝德和士兵簇拥着三位上校来到大街上时，军乐队高奏乐曲，闻讯赶来的军人和平民们聚集在一起，欢声雷动。接着，军民们又涌向王宫，坚决要求赫迪夫罢免里夫基。陶菲克深恐事态扩大，只得同意这一要求，并任命巴鲁迪为陆军大臣。

2 月 1 日事件使爱国军人成了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力，许多原来持观望态度的文职官员、商人和中小地主纷纷前来与奥拉比联系，对他表示支持。一些原来看不起土著军人的宗教长老和知识分子也热烈赞扬爱国官兵的革命举动。惶惶不安的陶菲克在爱国军人和里亚德之间耍弄两面手法，以便为自己在今后的较量中见风使舵留有余地。不甘心失败的里亚德处心积虑地寻找反扑机会，派出大批密探监视爱国军官和祖国党领导人。巴鲁迪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把里亚德策划的阴谋迅速告知爱国军官们。

里亚德逐渐察觉到巴鲁迪与奥拉比等人的密切联系，对他又恨又怕。8 月，里亚德要求将奥拉比等人的部队调离开罗，巴鲁迪坚决反对，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陶菲克乘机宣布撤掉巴鲁迪的职务，任命自己的亲戚达乌德·亚昆任陆军大臣。9 月 8 日，亚昆正式宣布将奥拉比所部调往亚历山大，将希勒米所部调往杜姆亚特。同时，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奥拉比等人住宅附近，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竟强行闯入奥拉比家。显然，情况十分紧急。奥拉比等人与苏尔坦等文职人员进行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9 月 9 日午后，奥拉比及其战友们率领步兵、骑兵和炮兵约四千人，汇聚到阿比丁宫前广场举行武装请愿，要求里亚德政府辞职，在埃及实行立宪

政体。成千上万的开罗市民和各地群众代表也前来声援，军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声势十分浩大。陶菲克起先还想调没有参加请愿的部队来镇压爱国军民，但没有一支部队听从他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来到广场见奥拉比等人，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英国总监科尔文和英国领事科克森频频向陶菲克示意，要他对奥拉比采取强硬措施，但陶菲克已被人民的强大力量吓得不知所措。于是，两个英国人又出来打圆场，让陶菲克回宫休息，由他们继续与奥拉比谈判。唇枪舌剑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陶菲克不得不让步，同意解散里亚德内阁，并将奥拉比等人的要求呈报伊斯坦布尔。9月14日，他任命谢里夫组阁，巴鲁迪再次出任陆军大臣。这一结局表明，在奥拉比和祖国党领导下，埃及人民又一次战胜了封建统治集团及其外国主子，将民族民主运动推向高潮。英国学者布伦特在评论9月9日事件时写道：10日早上，“所有埃及人醒来时获悉：不仅仅是一次起义，而是一场革命已经实现”。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祖国党内部激进力量与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以谢里夫和苏尔坦为代表的大地主，并不想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和“双重监督”制度，只想搞一些改良以建立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奥拉比为首的激进派，却主张摆脱外国对埃及的政治、经济控制，逐步扩大议会权力，进而废黜赫迪夫，建立民主国家。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其集中表现便是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新宪法。

英法两总监一直坚持认为，埃及议会无权讨论国家预算。谢里夫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居然顺从英法，取消了新宪法草案中议会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讨论和通过国家预算。这样，新宪法草案就背离了“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原则，不仅遭到激进派反对，也遭到保守派占上风的议会的反对。为争取时间来推销自己的主张。谢里夫竭力推迟召开议会。但在各方的要求下，议会全体会议仍于1881年12月26日召开。谢里夫又设法阻挠会议讨论预算问题，也没能得逞。大多数议员认为，偿还外债只涉及到埃及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在国家控制之下，因此议会完全有权过问。结果，谢里夫抛出的宪法草案和施政纲领都无法在议会内获得通过。这场争论显示，埃及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正在经历着新的分化和改组，民族民主运动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分道扬镳势所难免。

五、列强对埃及的争夺和干涉

埃及的局势使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列强焦虑不安，各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以研究对策，英法两国更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外交活动，试图将埃及事态的发展纳入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解决轨道。同时，欧洲大陆列强争霸的风云变幻，也时时对位处欧洲“侧翼”战略要冲的埃及产生影响。

1881年11月，积极鼓吹法英联合反德的甘必大出任法国总理兼外长。他竭力拉英国一起干涉埃及，指望通过这一招促成事实上的法英军事同盟，并使反法情绪强烈的突尼斯免受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英国本不想让法国染指埃及，但两个新因素使其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向甘必大的立场靠拢。其一，奥斯曼帝国妄图借埃及动乱恢复其对埃及控制，这使英国不安。其二，使英国资本获利的英法商约即将到期，法国国内强烈反对续订，英国

希望在埃及问题上迎合甘必大以换取续订商约。不过，英国只同意先向埃及政府发一个联合照会。1882年1月8日，英法两国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声称：“保持赫迪夫的职位是目前和将来在埃及维护良好秩序和发展普遍繁荣的唯一保证”，“两国政府密切联系，决心以共同努力反对可能威胁埃及现存秩序之一切纷扰的根源，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这个照会蛮横的语气激怒了埃及人民，也将陶菲克置于英法代理人的尴尬境地。议会内主张有权审议预算的力量迅速壮大，使谢里夫不得不辞职。2月4日，巴鲁迪出任首相，奥拉比担任陆军大臣。新内阁迫使赫迪夫批准了“基本法”（也称“革命宪法”或“1882年宪法”）。它规定内阁不向赫迪夫而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并通过全部国家预算，实际上废止了“双重监督”。新政府解雇了一批外国官吏和顾问，将300名无能的土、契族军官清除出军队，提升900名埃籍军人为军官，并授予奥拉比等人将级军衔和帕夏称号。新内阁还在司法、税收、普及教育、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方面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受到普遍欢迎。当然，反动势力不会甘心失败。4月下旬，一起得到外国支持的暗杀奥拉比等革命领导人的阴谋被揭露，包括前陆军大臣里夫基在内的参与此事的40名军官被开除军职，放逐到苏丹。英法总领事对这一处罚十分不满。在他们的怂恿下，赫迪夫公然改变了这一处罚。这种做法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一部分祖国党人公开提出了废黜陶菲克的主张。

利用上述事件，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报纸掀起了一股谩骂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恶浪，甚至宣称埃及已发生叛乱，赫迪夫被劫持，欧洲人受到威胁等等。在这之前，法国政府再次更迭，德·弗雷西内出任总理。此人认为法国在欧陆正面临德、意、奥结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调兵去干涉埃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调子逐渐降低。相反，英国的态度却日趋强硬，因为格拉斯顿政府看出，法国的退缩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占埃及的良机。5月20日，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英国舰队驶抵亚历山大港外水域。英国舰队司令西摩接到命令，允许他在必要时可率军登陆，而法国舰队指挥官则奉命避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5月25日，英法再次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蛮横地要求巴鲁迪内阁辞职，把奥拉比逐出埃及。巴鲁迪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而陶菲克却背着内阁接受了英法的要求。5月26日，巴鲁迪内阁宣布辞职以抗议赫迪夫的举动。这时，军队、议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奥拉比留任陆军大臣，陶菲克不得不表示同意。此后几个月，奥拉比作为唯一的大臣成了政府的实际首脑。

赫迪夫的一系列卖国行为表明他已堕落为英法的走卒，以奥拉比为代表的大多数祖国党人认为废黜他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以议长苏尔坦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奥拉比的主张，声称要维护赫迪夫的权威。这样，祖国党最终分裂了。陶菲克眼看自己在开罗已站不住脚，便以避暑为名，带着一伙王亲国戚逃往亚历山大。受到民族民主运动冲击的土、契族旧官僚、大地主、买办资本家，也一窝蜂拥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口号：“不

J.C.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vol.I, *A Documentary Record*, 1535-1914 (《中近东外交，第1卷，1535—1914年文件集》)，Princeton 1956, p.195.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 1800—1956 (《现代埃及史和英埃关系》)，Connecticut 1956, p.121.

要外国军队！”“舰队滚蛋！”奥拉比及其战友们着手组织军民们进行备战工作。埃及国内外的各种反奥拉比势力现在已结合在一起，试图挑起事端，为外国武装干涉制造借口。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正是一个策动动乱的理想地点。那里有众多的欧籍居民，由于受欺骗性宣传的影响，他们中部分人对埃及人民反对英法干涉的情绪日益高涨感到不安，开始以刀枪武装自己，结果使当地穆斯林与大多信奉基督教的外侨之间日趋对立。亚历山大行政长官奥马尔·鲁特非是个仇视革命的契族军官，这在奥拉比的敌人看来也是一个有利条件。6月5日，陶菲克给鲁特非写信说：“奥拉比在报纸上保证要维持公共秩序，并表示要对领事们负责。如果他成功，列强会依赖他，而看不起我们。……所以你现在要选择：或是为实现奥拉比的保证出力，或是为我服务。”几天后，恶性事端便爆发了。

6月11日下午2时，在亚历山大闹市区，一个马耳他人与一个土著阿拉伯人发生争吵，马耳他人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了阿拉伯人，随即触发了现场周围外侨与土著居民的一场械斗。鲁特非接到报告后，居然命令警察和地方法部队不得介入，也没有及时向开罗报告，致使械斗很快升级为大规模的巷战。许多商店被砸，一些街区烈火熊熊。等到奥拉比派军队赶到现场控制住事态，已有数百人丧生，伤者不计其数，死者中有50多名欧洲人，伤者中包括希腊总领事朗加贝和英国领事科克森等人。平息骚乱后，奥拉比没有彻底查清事件真相，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欧洲各国舆论立即大肆渲染亚历山大的“血腥暴行”，主张入侵埃及的言论更是连篇累牍。6月23日，英、法、德、俄、奥、意六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埃及问题。英国在会上主张以武力推翻奥拉比，法、奥、意、俄出于各自利益对此持保留态度；德国表面上持相同立场，暗中却鼓励英国单独占领埃及，以此来离间英法关系。会议最后达成协议：任何一国“不在埃及为其国民谋求其他国家得不到的领土、特权和贸易优势”。英国勉强允诺承担这一义务，但又声称保留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利。实际上，格拉斯顿政府此时已决定：“如果促成联合行动的一切机会都已消失，英国就单独行动。”

六、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武装斗争

为了对付英国入侵的威胁，奥拉比下令加固和改善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同时，亚历山大港外的英国舰队不断得到增强，到7月初已拥有战舰14艘。不过，在欧洲和突尼斯面临困难的法国政府此时已明确表示，难以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7月3日，西摩无理地要求埃及方面停止构筑工事，遭到断然拒绝。7月10日晨，他发出最后通牒，如24小时之内工程仍不停止，英舰队将开火。此时，法国舰队悄然驶离了亚历山大水域。7月11日晨，英国舰队向亚历山

Blunt, op.cit., p.237.

事件经过系根据目击者约翰·尼内先生所写回忆。参见 John Ninet, *Lettre d' Egypte, 1879 - 1882* (《埃及信函》), Paris 1979, pp.187 - 188.

波特金, 前引书, 第 176 页。

J Morley, *The life of Gladstone* (《格拉斯顿传》), London 1903, vol. 3, p.82.

大开火，埃及守军当即还击，不一会就打得一艘英舰丧失了战斗力。恼羞成怒的西摩下令对亚历山大狂轰滥炸，城内烈焰腾空而起。但市民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一片火海中来回奔跑，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第二天，战斗更趋激烈，埃军海岸炮台大部分被炸塌，官兵伤亡惨重。城内火势迅速蔓延，繁华街市已成一片瓦砾，许多缺衣少食的老百姓露宿街头，情况十分危急。为使军民免遭更大伤亡，奥拉比决定放弃亚历山大，并迅速组织全部守军和十多万平民撤离。7月13日，英军占领亚历山大，陶菲克及一大批达官显贵包括谢里夫和苏尔坦等人，先后投入英国侵略军刺刀的“保护”之下。

亚历山大北面和西面濒临地中海，南面和东面紧靠三个大湖，只有一条狭窄通道穿越三湖之间可达埃及内地，这是从亚历山大前往开罗的必经之地，该通道易守难攻。奥拉比熟知这里的地形，便率军撤到该通道尽头的库夫尔—达瓦尔地带，建立了新的阵地。但是，陶菲克却于7月13日发出命令，要奥拉比停止抵抗，立即去亚历山大听候处理。奥拉比当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于是，陶菲克下令罢免奥拉比，要求全国军民停止抗战。奥拉比及其战友们针锋相对，随即在开罗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废黜赫迪夫，授予奥拉比“埃及保卫者”的称号，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英卫国圣战。群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献物资，积极报名参军。仅在30天内，一支10万人的志愿军就组成了。8月初，英军对库夫尔—达瓦尔一线的进攻均被击退，形势正向有利于埃及军民的方向转化。

眼看速战速决的计划已经破产，英军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库夫尔—达瓦尔地区，摆出要从西面进攻开罗的架势，而以新到的精锐部队突然插入运河区，从东面直逼开罗。为实施这一方案，英军采取种种办法迷惑奥拉比，英国政府还对各国政府表示：只要埃军不在运河区设防，英军就不进入该区。同时，英国情报部门在陶菲克、苏尔坦等人的帮助下，派出奸细潜入运河两岸、开罗城内和奥拉比军中，收买贝都印酋长和抗英力量内部的动摇分子。8月中旬，被任命为英国侵埃军总司令的沃尔斯利率援军抵埃及。奥拉比开始考虑到要加强东线防御，但仍轻信英国的虚假诺言，没有果断地派兵进驻运河区。8月19日，西线英军突然攻击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奥拉比急忙调兵前去支援。当天夜里，英军主力掉头东进，直逼苏伊士运河口。次日，奥拉比终于下达进军运河的命令，但英军已抢先一步夺占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港，控制了整个运河区。沃尔斯利后来对英军早一天行动十分得意，声称：“24小时救了我们！”

奥拉比听到运河区失守的消息，立即赶到泰尔——克比尔一线部署防务。但他仍对敌人主攻方向把握不准，没有迅速将精兵强将调来东线，在泰尔——克比尔前线的埃及正规军仅一万人，其余均是未经实战训练的新兵。9月12日夜里，在埃军内部叛徒的接应下，一支英军突击队通行无阻地穿越埃军阵地，绕到埃军后方。次日拂晓，英军发动全线进攻，正面英军主力与上述穿插突击队及埃军内部叛徒里应外合，前后夹攻，致使埃军阵脚大乱。从睡梦中惊醒的埃及官兵进行了殊死抵抗，终因失去了指挥而全线败退。在血战中，埃军阵亡4000多人，受伤和被俘者不计其数。

奥拉比星夜赶回开罗，准备组织力量再战。但陶菲克收买的人此时大肆散布谣言，反对继续抵抗。奥斯曼素丹于9月6日宣布奥拉比为“叛逆者”，也使一部分人动摇。9月15日，英军兵临开罗城下，一部分议员和文武官员打开城门向英军投降，奥拉比和巴鲁迪等抗英领袖均被逮捕，轰轰烈烈的抗

英卫国战争遂告失败。

1879—1882年埃及抗英斗争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祖国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自身软弱，内部分裂，而且对西方殖民列强抱有幻想；以奥拉比为首的抗英力量对陶菲克、谢里夫、苏尔坦等人的卖国行径及敌人从内部攻破堡垒的企图缺乏认识，估计不足，因而没能采取有力措施肃清内奸；在抗英战争过程中，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军司令部在指挥上失误甚多，致使埃军在几次关键性战斗中败北；在对外政策方面，奥拉比等人没能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去牵制英国，也没能与西亚北非的其他民族解放力量形成广泛的联盟，甚至还将数万军队留驻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不但丧失了联合马赫迪运动这一天然盟友的良机，也大大削弱了自身。

然而，这一规模宏大的斗争虽然受挫，却使横行霸道的英国殖民者在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要冲遭到了迎头痛击。在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高潮的形势下，埃及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客观上为苏丹马赫迪起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极大地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和亚非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殖斗争。它还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列强在攫取殖民地、瓜分世界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埃及本国而言，1879—1882年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抗英战争唤醒了全民族，为后人树立了一面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光辉旗帜，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七、“东方暴君”克罗默统治下的埃及

英国军队虽然占领了埃及，但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却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法国当然不愿看到英国独占埃及，因此竭力要求恢复双重监督制度，并在此后22年里采取种种手段阻挠英国达到独占埃及的目标。俄、德、奥、意等国也反对英国独占埃及，要求英国尽快撤出埃及。同时，埃及人民强烈反对英国吞并埃及的企图，奥斯曼帝国则对英军长驻埃及的前景表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一再表示仍尊重确认埃及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的1840年伦敦条约，允诺尽快结束暂时占领，将英军撤出埃及。1885年，在各方压力下，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始就埃及问题进行会谈。1887年，双方签订协议，英国答应在三年内撤军，但在此期间如出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危险则可推迟撤军，而且在撤军完成后如有必要也可再派遣军队进入埃及。法、俄等国当然反对这一协议，奥斯曼素丹在列强压力下没敢批准协议，英国即乘机拖延撤军。这样，英国长期占领埃及的既成事实便形成了。不过，英国想单独控制苏伊士运河的野心在1888年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因列强反对而没能实现。

1882年10月，英国政府派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达弗林赴埃及，出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代表。他在埃及一年，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为英国统治埃及制订了基本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1883年9月，英国政府派曾任双重监督机构中英国总监的贝林出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此后他执行并发展了达弗林的政策方案，因统治埃及有功而被授予勋爵称号，改称克罗默勋爵。克罗默统治埃及达25年之久，因热衷于铁腕手段而被称为“东方暴君”。

1904年英法达成协议，英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则承认埃及为英国势力范围。

在政治方面，英国当局废除了巴鲁迪内阁颁布的 1882 年宪法，解散了议会，实施所谓的新组织法，建立了立法议会、总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立法议会由 30 名议员组成，只能对政府提交的法令和预算方案提出咨询意见，但 these 意见对政府并无约束力。总会议由 30 名立法议会议员、6 名内阁大臣和 46 名选举产生的各方代表组成，每两年开一次会，讨论国家大事，但没有任何实权。14 个省各有其省代表会议，一般由 3—8 名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每年开一次会讨论省内大事，但其决议须经政府批准方能生效。英国当局派大批英国人到埃及政府部门任职，在重要部门还有英国顾问和总监。到 1905 年，42% 的高级职位被英国人占有，埃及人只占 28%，其余 30% 为叙利亚和阿尔明尼亚人。这些英国人经常对埃及官员提出“忠告”，而这些“忠告”实际上就是必须执行的命令，因此，达弗林、克罗默的这套统治方式被称为“忠告政策”。克罗默还采取种种方法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控制，在埃军中任职的英国军官人数直线上升，到后来，副陆军大臣、埃军总司令、许多营的营长职务均由英国军官担任。

在财政经济方面，英国当局授意赫迪夫宣布取消双重监督，任命科尔文为埃及财政顾问，开始独家控制埃及财政。1885 年，在伦敦召开商讨埃及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经过讨价还价，修改了 1880 年的“清算法令”，使英国在支配埃及财政收支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904 年 11 月，法国在埃及财政问题上对英国作出进一步让步，最终撤除了阻碍英国独揽埃及财政大权的障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罗默采取种种手法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如他降低邮电、铁路的税率，刺激了这些部门的发展，使增收超过了减税带来的损失。他还下令重新丈量土地，增加土地税，大幅度提高烟草进口税。到 1890 年，埃及财政的收支已趋向平衡。英国当局在埃及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以指令性措施强行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据统计，1879 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为 49 万多费丹，而到 1913 年激增至 182 万多费丹。埃及生产的棉花几乎全部运往国外，使埃及逐步成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棉织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同时，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减少，特别是粮食产量暴跌，使埃及这个昔日的“粮仓”很快变成为粮食进口国。为了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商品控制埃及市场，克罗默以必须停止一切妨碍或减少农业生产的措施为由，竭力摧残埃及民族工业，使伊斯梅尔时代发展起来的埃及民族工业、手工业和制糖业、纺织业、木器业、榨油业、磨面业等遭受沉重打击。到 20 世纪初，西欧列强不再满足于商品输入，英法等国对埃及的直接投资达到高潮，埃及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已完全依附于西欧资本主义市场。

在文化方面，克罗默采取种种措施摧毁埃及的民族文化和阿拉伯语教育，规定从小学开始就教授英语，并吸收大批埃及上层人物的子弟到英国留学。法国、美国等国也在埃及办学校，出报纸，宣传西方文化。欧美各国的考古队继续在埃及各地大事发掘，盗走了许多珍贵文物。

到克罗默统治后期，埃及社会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除一小部分依附于殖民统治的王公贵族、大地主和买办外，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工商业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通史》), vol.7, 1985, p.70.

C.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中东经济史》), Chicago 1975, p.443.

拉西德·阿里·巴拉维、默罕穆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170 页。

者和中小地主和状况均日益恶化，由此引起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步高涨，一场新的反英民族主义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八、丹沙微惨案和埃及人民反英斗争的再起

在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和 1905—1906 年形成高潮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影响下，1906 年的埃及犹如一堆干柴欲燃的柴禾，而丹沙微惨案正好成了点燃这堆柴禾的火种。

这年 6 月 13 日，一支英国小分队途经米努夫省丹沙微村，几个军官未经村长许可便闯入村里狩猎取乐。他们践踏庄稼，胡乱射击，结果打伤了一个村民，激起了村民们的怒火，双方因此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三名埃及农民被英军枪弹击伤，三名英国军官被村民扣押，一名英国军官因中暑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英国当局闻讯后立即派出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前去镇压，将小小的丹沙微村团团围住，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了 250 多人。

克罗默决定借丹沙微事件杀一儆百，以高压措施扼制埃及的民族运动。他宣布建立一个特别法庭，由三名英国审判官和两名亲英的埃及审判官组成，首席审判官是亲英的司法大臣布特鲁斯·加利。还在此案审理前，英国当局已将其内定为“谋杀案”，决定将“凶手”判处绞刑和其他重刑，绞刑将在丹沙微村公开执行。6 月 24 日，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挑起事端的英国军官在庭上诬告丹沙微村农民蓄意谋害英国军人，精心组织的“证人”们为英国军官编造的谎言提供伪证。受审的埃及农民只有 30 分钟辩护时间，而真正目睹事件经过的村民们根本无法前来作证。6 月 27 日，法庭宣读了经克罗默批准的判决书，判处 4 个农民绞刑，其余 17 人被判处终身苦役、15 年苦役、鞭笞等重刑。6 月 28 日下午，行刑队在丹沙微村公开绞死了 4 个农民，成千群众目睹这一惨案状而失声痛哭。

丹沙微惨案激起埃及人民对克罗默暴政的无比愤恨，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反英示威，农村中更出现了反英武装斗争。连在英国控制下的埃及总会议也接连通过决议和提案，要求释放丹沙微事件中被捕人员，扩大议会权力，改变英国人控制埃及及政府部门的状况，埃及学校改用阿拉伯语授课等。

同时，克罗默处理丹沙微惨案的做法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英国在野党乘机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的埃及政策，自由党内部也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英国政府起先还竭力为克罗默撑腰，但后来在埃及反英情绪日趋高涨，英国和国际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忍痛换马。1907 年 4 月，统治埃及 25 年的克罗默终于下台，这标志着由丹沙微惨案触发的埃及反英民族运动取得了胜利。在克罗默灰溜溜地离开埃及回国之时，艾尔登·哥斯特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

九、穆斯塔法·卡米勒和新祖国党的成立

1882 年反英斗争失败后，贾迈勒丁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曾在巴黎成立了“团结会”，创办了《团结报》，继续进行反英斗争。英国当局对此十分不安，先是下令禁止《团结报》在英属地区发行，后又勾结法国政府查封了《团结报》社，并限制团结会的活动。同时，在埃及国内，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又逐步集结起来，再次展开了反对英国统

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便是他们的代表。他1874年出生于开罗的知识分子家庭，1894年以优异成绩获法国土伦学院法学士学位，此后便将全部身心投入了反英民族解放运动。卡米勒反对通过武装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主张走和平道路。在1894—1904年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争取赫迪夫阿巴斯二世（陶菲克之子）、奥斯曼苏丹和法国的同情与支持上，但屡屡受挫。1904年英法协约达成后，卡米勒终于放弃了上述努力，转而致力于在国内普及教育和宣传自己的主张。由他倡议创办的《旗帜报》猛烈抨击克罗默的殖民政策和赫迪夫的个人专权，主张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由埃及人来管理国家，并号召人民努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农业。

丹沙微惨案使以卡米勒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震惊，他们立即以笔为武器揭露英国当局的罪行。正在法国养病的卡米勒奋笔疾书，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致英国人民和文明世界书》，向欧洲舆论界披露了丹沙微事件的真相，指出英国的残暴统治是导致惨案的根源。他还抱病去伦敦发表演说，呼吁英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回到埃及后，卡米勒又四出筹款，增办了《旗帜报》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以利于更有效地向欧洲和全世界宣传埃及民族运动的主张。

哥斯特上任后，一些主张宪政的埃及人士对他寄予幻想，曾上书要求实行一些改良措施，但均遭拒绝。在克罗默统治的后期，英国当局与赫迪夫之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赫迪夫装出同情卡米勒的姿态。哥斯特到埃及后，即利用其与阿巴斯二世私交甚深的有利条件，竭力修补这一关系。赫迪夫对此感激涕零，再次表示甘当英国的驯服工具，并公开颂扬英国的殖民统治。1907年9月和12月，哥斯特操纵的埃及民族党和赫迪夫支持的埃及立宪改革党先后成立，摆出了与卡米勒等人对抗的架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卡米勒及其战友认识到必须与广大工农民众紧密结合，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将民族民主运动推动向前进；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组织，提出旗帜鲜明的斗争纲领。1907年12月27日，埃及祖国党宣告成立，卡米勒抱病参加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党的终身主席。为了区别于奥拉比的祖国党，史家往往将该党称为新祖国党。

新祖国党一成立，便提出了要求英国撤军、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农工商业等十条纲领，受到埃及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在卡米勒倡议下，祖国党还发动各界代表上书要求无罪释放丹沙微事件的被捕者，英国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要求，释放了全部被捕者。这是祖国党成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幸的是，就在一个月后，积劳成疾的卡米勒与世长逝。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参加了为卡米勒举行的隆重葬礼。

新祖国党选举穆罕默德·法里德继任党的主席。法里德1868年生于开罗，系土族贵族之子。他1887年毕业于法律学校，曾任上诉法庭副检察长等职。1893年，法里德结识卡米勒，从此成为密友，并且决心共同为埃及的民族独立斗争。法里德担任新祖国党主席后，继续坚持卡米勒制定的政纲，同时更加注意联合工农群众。1909年，在新祖国党的积极筹划下，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工会——开罗手工业工会成立。此后，在亚历山大等地相继建立类似的工会。在新祖国党和工会的组织下，埃及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并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法里德也很重视农民问题，他多次指出，应帮助农民组织家民协会，争取减轻地租，改善农民的生活。法里德在普及教育，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吸收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党的活动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

作。在法里德为首的新祖国党人的努力下，埃及民族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1908年夏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民，要求颁布宪法的请愿活动随即遍布全国各地。9月26日，赫迪夫出访回国，数千名示威者以“宪法万岁”的口号“迎接”他。11月，曾任丹沙微案件首席审判官的布特鲁斯·加利出任首相，宣布恢复限制新闻自由的出版法，在全国范围激起了又一个抗议浪潮。加利竟然出动军警镇压示威者，还下令逮捕《旗帜报》主编。1909年10月，英国妄图延长苏伊士运河租借期40年的计划被揭露，使埃及各阶层人民十分愤怒，开罗人民上街游行，高呼：“取消运河计划，打倒独裁政权！”1910年2月21日，为埃及人民深恶痛绝的刽子手加利被刺身亡。此后，英埃当局加强专制统治，并于1911年初逮捕法里德，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六个月徒刑。同时，许多新祖国党人被捕，党的机关报也被查封。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狱后的法里德与新祖国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流亡国外，新祖国党在埃及国内的活动基本陷于停顿。

1911年，哥斯特病死，前英籍埃军总司令基切纳出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此时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險日益迫近，为了加强在欧洲“侧翼”中东的地位，进一步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埃及，基切纳重新采用克罗默的铁腕统治方式，独揽一切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以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为由，于1914年12月18日宣布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已被废除，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次日，又宣布废黜正在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苏丹商谈联德反英计划的阿巴斯二世，立其叔父侯赛因·卡米勒为埃及苏丹。从此，埃及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侯赛因·卡米勒于1917年病逝后，由艾哈迈德·福阿德继任埃及苏丹。

第二十二章 苏丹马赫迪起义

19 世纪初，殖民列强对非洲的占领尚未深入内陆。对于地处内地的苏丹来说，侵略威胁来自想要掠夺黄金和奴隶的埃及。埃及在侵略小国林立、尚未统一的苏丹时，不仅进兵顺利，还建立了以掠夺为目的的行政统治。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改变了整个东北非的局势。英法为控制运河展开了争夺。埃及爆发了反对外来侵略的阿拉比起义。伊斯兰化的苏丹人民不堪奥斯曼埃及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利用埃及统治混乱之机，在马赫迪主义旗帜下，发动了大规模反外来统治的斗争。1882 年，英国镇压了阿拉比起义后，以埃及为基地，将侵略的触角伸向尼罗河上游。马赫迪起义的矛头随之从反奥埃统治为主转向反对英埃统治。老奸巨滑的英国企图以建立受自己控制的苏丹自治政府来平定苏丹人民起义，但酷爱独立自由的苏丹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马赫迪国家。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还统一了分裂的国家，整合了互相隔绝的各族，培养了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意识。

然而，英帝国主义绝对不能容忍在“2C 计划”必经之尼罗河上游和英印航线之红海沿岸出现一个独立的非洲人国家。它不但不允许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染指这一地区，而且挑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互相残杀。马赫迪起义虽然建立了国家，但它并没有彻底摧毁旧的生产关系。马赫迪国家象所有胜利后的农民起义一样很快封建化了，宗教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号召、凝聚和组织作用，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讧严重。失败已不可避免。英埃入侵以后，苏丹被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名义上实行英埃共管，实际上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一、奥斯曼埃及对苏丹的入侵与统治

1811 年，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取得政权后，想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奥斯曼帝国之外的大帝国。1811—1818 年，他入侵阿拉伯半岛，占领了东至波斯湾、南至也门的大片领土，随后即把侵略矛头指向被埃及历代统治者认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苏丹。他不仅要开疆拓土、打通由散纳尔和达尔富尔控制的尼罗河盆地通往埃及的传统商道，还要用苏丹尚勇好武、能干忠诚的黑奴充实自己的军队，要掠夺苏丹的黄金等自然资源以培植自己的国基。而促使阿里兵进苏丹的直接近因，则是要消灭逃亡栋古拉的马木路克残部。

入侵苏丹由阿里的儿子伊斯梅尔·卡米尔帕夏主持。1820 年 7 月 20 日，伊斯梅尔率军从阿斯旺出发，经过下努比亚，征服了马哈斯国。在栋古拉，马木路克被逐四散，东支准备过红海到希贾兹，被比贾部落斩杀；西支到了北非的突尼斯；北支投降阿里军队；南支逃到善迪。伊斯梅尔继续挥师南下，沿途一些小部落纷纷不战而降，唯尚武不羁的夏吉亚人英勇抵抗，但大刀和长矛终究敌挡不住大炮和火器，很快归于失败。1821 年 6 月，伊斯梅尔兵至散纳尔，芬吉人末代素丹巴迪六世投降，但梦想尽快取得奴隶和黄金的阿里

Hijaz，旧译汉志。

迈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4 页。一说逃亡的马木路克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vol.5，p.24.

急不可耐，派其婿德弗特达尔·库斯劳指挥另一支大军，于1821年4月20日从尼罗河向西南之达尔富尔进发，攻占巴腊，征服达尔富尔统治下的科尔多凡。至此，大规模的征服告一段落，奥斯曼埃及基本上控制了苏丹。第二阶段的征服主要在东部和南部，伊斯梅尔统治时基本完成。1831—32年，埃及统治者向东扩张，占领了卡萨拉。1840年3月20日，阿赫美德帕夏征服塔卡，骗取哈登多瓦，再次占领卡萨拉。1865年，奥斯曼苏丹将以前租给阿里的萨瓦金和马萨瓦割让给埃及。1869年，比较欧化的伊斯梅尔任命英国人萨缪尔·贝克统帅一支远征军，征服贾阿里，建立赤道省，贝克被任命为该省第一任省督。1873年12月，在比拉利远征军被击败后，伊斯梅尔以任命祖贝尔为总督换取了对巴赫尔·加扎勒河省的统治。1874年10月，祖贝尔从南部、阿尤布帕夏从西部围攻达尔富尔，在马拉瓦希杀死其苏丹伊卜拉欣，11月2日占领法席尔。至此，整个苏丹处于奥斯曼埃及统治之下。

奥斯曼埃及在进军途中就逐步设立了行政统治。一般来说，全苏丹由总督（胡库姆达）统治，他向开罗的阿里负责；下设由省督（穆迪尔）统治的若干省；省下设区，由省督任命的官员统治，部落酋长协助其工作。这套统治方式有四个特点：一是高度中央集权。对于埃及来说，苏丹只相当于它的一个省，所以苏丹的事务全由阿里决定。二是大量任用欧洲人充当高级官吏。省级以上官更多由欧洲人担任，但这些官吏主要为奥斯曼埃及服务，最多时达2万人，其中有曾担任赤道省省督的英国人贝克和戈登、任加扎勒河省督的意大利人盖西、任马萨瓦省督的瑞士人穆泽戈尔，戈登还担任了苏丹总督。三是带有浓厚的军事性，用军事威慑来维护政治统治。其省督和总督都是当地驻防军的司令，1881年，在喀土穆驻军7470人，在科尔多凡驻军5830人，在达尔富尔驻军4863人，在栋古拉和柏柏尔驻有4000多人，在赤道省和加扎勒河省为3000多人，在沿埃塞俄比亚各据点为5500多人。苏丹人民稍有反抗，便遭残酷镇压。库斯劳为替伊斯梅尔·卡米尔1822年10月在贾林被杀报仇，共屠杀了40000人，1823年一次竟杀死5000人。四是其目的在于使苏丹人民完全顺从奥斯曼埃及的统治，并从苏丹最大限度地榨取人力、自然和经济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掠取奴隶。阿里一再告诫入侵之奥埃军政官员说，我们不断往苏丹派兵的目的“就是要从苏丹掳回黑苏丹人”。他认为：“适合招募入伍的奴隶，具有和宝石同样的价值，甚至更有价值。”他计划从苏丹取得10万黑奴，为达此目的，有时甚至和下属做交易，即每送回3000名适合服役的苏丹黑人，就给他们增调1000人的军队。获取黑奴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战争俘虏。例如在征服杰贝勒塔比时掳回了1900名俘虏。二是武装猎获。猎奴主要在努巴山区、尼罗河上游及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进行。三是国家专卖。阿里曾颁布命令，规定奴隶贩卖商除为政府效劳外，不得在苏丹境外贩卖奴隶。他还和达尔富尔苏丹订立奴隶专卖协定。据估计，散纳尔每年向埃及输出1500名奴隶，达尔富尔每年多至6000人；善迪奴隶市场更加繁荣，生过

Defterdar，奥斯曼帝国专管税收和财政的官员。

P.M.Holt，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1881—1898（《苏丹马赫迪国家》），Oxford 1958，p.32.

迈基·希贝尔：前引书，第18页。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1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47页。

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13—15页。

天花的年轻男子值 15 美元，姑娘值 25 美元。在苏丹南部，贩奴活动更加猖獗。阿拉伯人和北方人成了唯利是图的中介人。四是代缴实物税。阿里曾允许把身强力壮的苏丹人当作实物税上缴。掳回的奴隶用途不一。身强力壮的训练充军，有较高技能者充作官员薪饷或家内使用，其余变卖出售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奥埃征服的 60 年，苏丹丧失了大量的人口，仅 1839 年在苏丹捕捉的黑奴就达到 20 万人。人口的急剧减少使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第二，难圆黄金梦。在入侵苏丹前，阿里曾听说，苏丹南部粒粒黄沙都含有金子。征服苏丹后，他陆续派专家到苏丹去分析土壤样品，他本人也亲赴苏丹视察。结果表明，苏丹仅在法祖格利地区和希布恩山区有少量黄金。懊丧之余，他转而贪婪掠夺苏丹的象牙、阿拉伯树胶、骆驼、牛、羊等。1827—1828 年大约从苏丹掠走 1270 吨树胶，1836—1837 年向埃及输出了 25000 张牛皮、6400 张山羊皮和 19600 张绵羊皮。19 世纪 70 年代，大约每年有 3000—4000 头骆驼从事来往于埃及——苏丹之间的贸易。戈登还宣布在赤道地区对象牙贸易实行政府垄断。埃及每年从垄断苏丹象牙贸易中获取商业利润就高达 400 万镑。

第三，强行征收苛捐杂税。征税有以下特点：一是重复缴纳。苏丹人民每年须缴税三次。一次上缴埃及国库，一次上缴苏丹总督，一次落入税吏和地方官吏的腰包。二是税目繁多。除规定的人丁税、牲畜税、什一税之外，还有出售谷物和牲畜的上市税（一般为售价值的 50%）、水车税（每年 7 镑）、挂旗税（4 镑）和修房税等。三是采用估税法。高额估税，不顾人民承受能力，不管天灾人祸，照例完纳。四是征法恶劣。不但实行连环保法，还在军队陪同监督下提前预征。如 1871 年，加法尔·穆兹哈尔总督在北方诸省超限度地征收了水车税，其继承者还一年征收了三年的水车税。仅 1873 年一年，埃及统治者就从苏丹人民身上搜刮了 100 万镑，相当于埃及当年政府收入的 1/10。1878 年，苏丹财政赤字累计达 32.7 万英镑，但埃及政府还规定每年上缴埃及 14.3 万英镑。沉重的赋税不但源源流入埃及国库，也填满了官员们的私囊。一个月薪二镑的政府机关文书因得到总督赏识擢升税吏，任职三年便搜刮钱财达 6 万镑。这意味着 5000 户人家被捣毁，几百万人无端被掠夺和遭鞭笞，意味着无数抗命不缴税的人被杖毙于门前。曾经人口稠密、农牧兴旺的散纳尔，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145 个村庄只剩下 599 人，大部分居民不是饿死，就是为逃税而四处流浪。

苏丹人民不甘沉沦，自奥斯曼埃及占领以来，一直进行着反抗。1822 年秋，马克·尼米尔指挥群众纵火烧死伊斯梅尔·卡米尔。1834 年，马哈斯人民在马克·巴黑特领导下掀起抗税暴动。1865 年，卡萨拉驻军中全体苏丹籍士兵发动兵变，反对残暴统治。1877 年，达尔富尔人民在拉希德领导下发动

Robert W.July,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80, p.266.

M.W.Daly, Empire on the Nile: Anglo-Egyptian Sudan (《尼罗河帝国：英埃苏丹》), Cambridge 1986, p.193.

Robert W.July, op.cit., p.274.

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370 页。

Seton Churchill, General Gordon (《戈登将军》), London 1885, p.160.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 1800—191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475 页。

Seton Churchill, op.cit., p.161.

抗税起义。……在苏丹人民不断英勇斗争的同时，伊斯兰化的苏丹社会出现了一种“马赫迪期待”，即当广大贫苦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荒淫奢华的生活深恶痛绝时，就会期待“马赫迪”降世，建立千年幸福王国，既恢复真正的教义，又把群众救出苦海。1881年，这个伟大的先知应运而生，他就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二、马赫迪大起义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1844年8月12日生于阿巴岛一个造船主家庭，后迁至卡拉里。他自幼离家，辗转拜师，研习宗教，潜心苦修。他深受穆斯林世界正在广泛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鼓舞和影响，深深同情人民疾苦，痛感伊斯兰教的腐化和堕落。据说他曾拒吃学校发的口粮，认为那是反动政府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他还在其教长为儿子举行的割礼仪式上，反对用女奴跳舞，认为这有悖原始伊斯兰教。被革出师门后，他经过痛苦的思索，决定净化宗教，拯救民族，并毅然宣布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先知——马赫迪，从而承担起变革社会现实的历史使命。

1881年6月29日，马赫迪在阿巴岛发布宣言，愤怒声讨奥斯曼埃及统治者。他说：“这些土耳其人以为王国是他们的。……他们违背了安拉的使者及众先知的教导，无视安拉的启示，篡改穆罕默德的法律，亵渎安拉的宗教，把人头税强加在你们和所有穆斯林的脖子上。……土耳其人不断抢走你们的人，将他们戴镣监禁，掳掠你们的妻儿，屠杀安拉保佑下的生灵。”他提出“宁拚千条命，不缴税一文”的战斗口号，号召人民对土耳其人进行圣战，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指导思想，在苏丹建立“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理想社会。

阿巴岛起事后，喀土穆占领当局先派人前去调查核实。8月7日派出和平使团招降，声称总督是应该服从的领导者。马赫迪义正辞严地驳斥道：“我才是伊斯兰世界应该服从的领导者，我受之于安拉的使命，谁都要服从。”软的不行，拉乌夫总督便派出助手萨乌德率军200人前去讨伐。8月12日，马赫迪率领一支由350人组成的军队、打着写有“先知的哈里发——穆罕默德·马赫迪”字样的四面大旗勇敢迎战，杀敌120名士兵和6名军官，自己伤亡仅12人。这一仗揭开了马赫迪武装大起义的序幕。

首仗大捷后，马赫迪及时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他效法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先例，把义军从政府军控制范围内的、位于尼罗河上易受水陆夹攻的阿巴岛带向卡迪尔山区。此地地势险要，政府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多是逃荒而来的农民，有利于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建立根据地。1881年12月9日，法硕达省督拉希德率领由350名士兵、70名非正规军和1000名舒卢克部落民组成的军队，想出其不意消灭马赫迪，但却钻进了义军设好的埋伏圈，全军覆没。从此马赫迪威名大振，通往卡迪尔山道路上挤满了前来投降

P.M.Holt, op.cit. (1958), p.34.

P.M.Holt, op.cit. (1958), p.47. 一说马赫迪军队为4000—5000人。参见 A.Egmont Hake, The Journal of Major—Gen.C.G.Gordon, C.B.at Khartoum (《戈登在喀土穆的日记》), London 1885, p.459.

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82页。一说拉希德率领的军队由400名正规军和1110名舒卢克部落民组成，参见 P.M.Holt (1958), cit., p.48.

的人。1882年6月7日，散纳尔省督沙拉利率军3000人前来围剿，马赫迪指挥3500人在卡迪尔全歼来敌。卡迪尔之战影响极大，群众认为这简直是个奇迹，似有神助，魔法无边。义军人数随之迅速扩大到15万。

1882年7月，英国趁法国入侵突尼斯之机，炮轰亚历山大里亚，9月攻陷开罗，击败了实际上与马赫迪起义军遥相呼应、默契配合的阿拉比运动。从此，埃及实际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苏丹也作为保护英国在埃及统治的屏障和向南扩张的必经之地而成为英国的进攻目标。同时，英国人第一次提出“必须着手解决苏丹问题”。马赫迪起义的矛头指向也从以反奥埃统治为主变成反英埃侵略。马赫迪利用阿拉比抗英之机，一方面整编义军，加强军事训练，为军事上从战略防御转向进攻准备条件；一方面大量散发信件，广遣密使，到处鼓动。起义像洪水一般蔓延全国，甚至到最遥远的穷乡僻壤，慢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好形势。

1882年9月4日，马赫迪挥师三万，正面攻击苏丹第二大城市、科尔多凡的政治经济中心乌拜伊德。但由于起义军尚不完全适应从丛林游击战向阵地攻坚战的急剧转变，结果丢下上万具尸体败归。马赫迪立即总结教训，决定围困巴腊和乌拜伊德。10月击败了来自喀土穆、由加迪尔帕夏率领的两个正规营和752名非正规军的援助。1883年1月5日，既无粮草、又无援军的巴腊守军投降。马赫迪给予宽大处理，打消了乌拜伊德守军的顾虑，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1月17日，赛义德率领乌拜伊德3500名守军投降，缴获步枪5000支、炮5门、火箭1支及大量弹药。在攻占乌拜伊德时，逐渐形成了马赫迪军队的作战模式：第一步是派密使携信件到处煽动起义，使政府军忙于镇压以分散其兵力；第二步是派兵与人民起义合流对敌，进一步消耗政府军队的战斗力；第三步是由马赫迪军队主力围打孤城，彻底战而胜之。

英埃不甘心失败。英国默许埃及政府用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埃及军队消灭马赫迪起义。1883年1月，英国军官希克斯被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9月27日，由配备机枪和大炮的12000步兵、50匹战马和5000头运输骆驼组成的大军从杜怀姆出发。马赫迪采用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断其退路的战术，于11月4日用4万人将其围在希甘，并切成三段。为了瓦解其军心，马赫迪发表《告士兵书》说：“谁投诚，谁得以平安无事，如若不相信我们，迷信你们的枪炮和火药，则必死无疑。……军中那些先亡者是你们的前车之鉴。”11月5日晨，马赫迪军队发起总攻，消灭希克斯和全部主要官员，仅250人生还。希甘大战胜利以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声势浩荡，迫使埃及在达尔富尔和巴赫尔·加扎勒的统治相继崩溃。1883年12月23日，达尔富尔总督斯拉廷投降。1884年1月15日，马赫迪军队进驻法席尔。1884年4月28日，马赫迪军队攻占代姆祖贝尔，加扎勒河省督卢普顿被俘获。英国政府被

西克·安德烈：前引书，第736页。一说是5月30日，参见P.M.Holt（1958），op.cit.，p.50.

Mekki Shibeika，British Policy in the Sudan 1882—1902（《1882—1902年英国在苏丹的政策》），Oxford 1952，p.

彭坤元：《苏丹马赫迪起义》，《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667页。一说是7000名步兵、500名骑兵、400名非正规军、2000名随从、5500头骆驼，P.M.Holt（1958），op.cit.，p.63.另一说是7000名步兵、500名骑兵、400名非正规军、10门山炮、1000名穿胸甲的兵、2000名随从、5500头骆驼，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192页。又一说是10000人、4门克虏伯野战炮，10门山炮、6挺诺顿菲尔特机枪、500匹战马、5500头骆驼。A.Egmont Hake，op.cit.，p.502.

迫改变策略，命令埃及军队撤出苏丹。马赫迪在苏丹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威望大增，希贾兹、印度、突尼斯、摩洛哥都派代表团前来拜访，祝贺其胜利，倾听其教诲。

1884年1月4日，英国政府向驻埃及总领事巴林发出撤退命令。1月16日，埃及政府命令喀土穆当局执行。几乎同时，戈登从伦敦出发，于1月25日到开罗与赫迪夫会晤。戈登身负双重使命：一是担任苏丹总督，负责处理撤退问题；二是组织一个苏丹自治政府。2月18日，戈登到达喀土穆。他宣布撤走军队，赋税减收一半，允许拥有奴隶，还将旧税册、皮鞭和笞跖等刑具抬到广场当众烧毁，企图平息人民的愤怒。这纯属惺惺作态，因为他在致巴林爵士的信中建议：“如果要维持埃及的平静，一定要摧毁马赫迪。……现在可能是比较容易摧毁的时候。”他要求派印度军队前往摧毁马赫迪。与此同时，戈登还宣布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他认为：“在苏丹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能阻止马赫迪势力的扩张。”在启用奴隶贩子祖贝尔被批准后，他挑选了三个核心人物，即大封建主、舒克里亚部落酋长阿瓦德·克里姆·阿布·辛贝伊，大奴隶贩子赛义德·侯赛因·贾迈比贝伊及伊十拉欣·法齐贝伊。同时，戈登修书马赫迪，委任他为科尔多凡的苏丹，并送去一份委任状和一套官服。3月5日，马赫迪回信驳斥说：“我是众所期待的、当地无愧的马赫迪，是先知的继承人，我无需接受你委以的科尔多凡苏丹之位。……安拉已晓谕我，与我为敌者，安拉必诛之。”他还派人送一套苦修僧的军服给戈登，劝他改宗伊斯兰教。戈登的阴谋破产了。马赫迪派出大将奥斯曼·迪克纳，1884年2月5日在辛卡特击败贝克的3700名救援军，歼敌800人，其中欧籍军官11名，这就切断了从喀土穆到萨瓦金的交通线；3月12日切断喀土穆通往埃及的电话线，4月27日攻占柏柏尔。这样，喀土穆与外界联系的两条主要通道都被堵死，完成了打援围城的战略部署。

英国政府见撤退不成，就在8月5日决定派出救援军，并给埃及贷款30万英镑作为战费。1885年1月8日，沃尔斯利的沙漠纵队从库尔提出发。马赫迪决定先发制人，抢在援军到来之前攻下喀土穆。1885年1月5日，马赫迪军队攻下喀土穆之外围重镇恩图曼要塞。马赫迪给戈登发出敦促投降书。戈登困坐愁城，惶惶不可终日，但仍负隅顽抗。1月26日，马赫迪命令发起总攻。戈登被愤怒的马赫迪战士矛刺身亡。这个双手沾满苏丹、中国及其他亚非国家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月28日，援军到达青、白尼罗河交汇处，但为时已晚。1月30日，马赫迪胜利入城。

到1885年夏天，起义军又连续攻克了栋古拉、卡萨拉、散纳尔等重要地区，解放了除红海港口萨瓦金以外的全部苏丹领土，建立起一个统一、独立的苏丹国家，定都恩图曼。但不幸的是，马赫迪6月22日病逝。其未竟的事业由他的亲密助手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来完成。

为什么在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年代，马赫迪起义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

第一、正义的战争必胜。起义是由于奥埃的野蛮征服和残酷统治引起的，

Cromer, op.cit., pp.487-488.

P.M.Holt, A History of Sudan (《苏丹史》), Logman 1988, p.94.

Allen, Gordon (《戈登》), London 1935, p.118.

王彤；《从反埃到反英的马赫迪起义》，《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

起义的矛头是指向奥埃和英埃统治者的，所以，苏丹人民称马赫迪为“独立之父”。同时，这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还具有要求平等的社会经济内容。就连戈登在 1884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人民反对我们，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呢？他们不要战争，但他们几乎都不愿把谷物卖给我们。”“根据我所看到的来判断，……我认为这不只是由于一般的宗教狂热，……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有关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像是要在宗教旗帜下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这场斗争不仅是反对外来统治、反对殖民压迫，也是反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要求变革的斗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踊跃参战，誓将敌人赶出去。

第二、结成了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马赫迪的队伍成份复杂。对马赫迪无比虔诚的信徒完全为革新伊斯兰教而来，因此，其中既有贫苦的流浪汉，也有愤世嫉俗的部落酋长及各派教长。他们的宗教信仰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驱除奥埃和英埃异教徒，按原始伊斯兰教重新改造社会。其次是对奥埃统治不满的人，他们多是尼罗河上的船工及垦殖的农民和破了产的中小商人。这些人或不堪重税，或难以与欧商竞争，经济上的损害使之产生仇外情绪。再次是南方游牧民，他们主要是不愿被埃及人掳掠去当兵，受到了马赫迪军事胜利的影响而投身起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丹几乎每个阶层都参加了起义，虽然其作战目的不尽相同，但都走到马赫迪大旗之下，共同为驱除异教徒而斗争。

第三、起义时机适当。马赫迪起义之时，英国的执政党是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1880—1885），他们是殖民扩张中的温和派，主张用英国实行幕后操纵的办法即半殖民地形式扩大英国势力范围。格莱斯顿曾打算尽早撤出埃及，不想变埃及为保护国，而苏丹一直是列于埃及之后考虑的。因此，马赫迪起义之时正是英国放松控制之时，同时埃及正处于阿拉比运动高潮期间，自顾不暇。正如希贝卡所说：“一个国家，在国内经济上有着种种纷杂的问题，在其军队的各级军官中又酝酿着兵变，随着外国占领而出现的更为复杂的种种问题，加上统治一个难以驾驭的庞大帝国的种种复杂的问题——象这样一个国家，当宗教在东方还是最强大的统一力量的时代，是无法指望把一个宗教运动镇压下去的。”

第四、精湛的指挥艺术。马赫迪在短短的四年起义中运用了多种战略战术，充分显示出他高超的军事才干。当敌强我弱时，他实行战略转移，建立根据地，养精蓄锐；在强弱易势之时，他及时从战略防御转向进攻。随着战局的发展，他指导军队从惯用的游击运动战转向攻坚阵地战；还把攻心为上的宣传战和拚死决斗的肉搏战结合使用，创造性地形成了点面结合的作战模式。在具体战斗中，他们时而使用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的战术，时而使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所有这些都收到明显的效果。政府军被牵着鼻子走，处处被动，到处挨打。

第五、宗教的历史作用。马赫迪起义时，苏丹正流行泛伊斯兰主义。马赫迪用宗教思想武装群众，使之焕发出超人的力量；而原有的宗教组织则为起义军提供了斗争的组织系统，马赫迪广发信件就是利用了教会组织；对起

A.Egmont Hake, op.cit., pp.74, 78.

Robinson &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非洲的维多利亚时代》), Macmillan 1961, p.122.
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 57 页。

义领袖的神化也有利于义军的团结。马赫迪起义利用宗教不但打击了西方列强，而且加强了各部落、各民族的团结，培育了统一的民族意识，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哈里发统治下的马赫迪国家

马赫迪国家由马赫迪创立，在烈火中诞生。哈里发继位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它。

马赫迪在世时，将其手下的三员大将分别封为先知手下三位哈里发的继承人。阿卜杜拉为贝克哈里发继承人，希卢为乌玛尔哈里发的继承人，其亲戚沙里夫为阿里哈里发之继承人。其中阿卜杜拉指挥最大的黑旗师，沙里夫指挥红旗师。马赫迪在世时曾告诫其亲戚说：“阿卜杜拉就是我的无可置疑的继承人”，甚至还公开耻笑其亲属要继位的想法是愚昧的和落后的。马赫迪去世后，阿卜杜拉继位，与沙里夫的矛盾愈演愈烈，其各自所在部落塔伊沙和阿卜拉弗的斗争也逐渐升级。为了集中权力，1886年4—5月间，阿卜杜拉迫使两个低级哈里发放弃自己的卫队和军队，由在首都的黑旗师总指挥、其弟雅果卜统帅。同时，阿卜杜拉大量调动、撤换自己不信任的高级官吏。马赫迪死后一年，他任命的省督仅有两人仍在位。这种排除异己、任人唯亲的做法激怒了反对派。他们集中兵力，针锋相对。1885年8月，哈里发将加迪尔调离乌拜伊德，并派他平定努巴山区叛乱。12月20日被叛军杀死。1886年4月，哈里发派其心腹大将安贾率军对付准备抢占首都谷仓的哈立德，还命令安贾不要给苏莱曼管理的中央金库上缴战利品和赋税；同时派亲戚尤尼斯·迪卡姆占领富庶的杰济腊。这样就从外部排除了对首都的威胁。在首都，1886年4月26日下令逮捕了掌握经济大权、支持沙里夫的苏莱曼。这样似乎稳定了政局，但沙里夫政治上不甘心大权旁落，经济上不愿其追随者承担赋税。1886年，沙里夫以阿卜杜拉对他和马赫迪家族不敬而造反，双方发生枪战。11月25日，哈里发妥协，大赦暴乱之人，答应给沙里夫所有他该得到的荣誉，并从金库发薪给马赫迪家族。沙里夫派放下武器。七周后，沙里夫派的七个显贵被捕并送往法硕达处死。沙里夫被判入狱。沙里夫派群龙无首，遂自行消散。一波乍平，一波又起。1886年达尔富尔和加扎勒河省的里泽卡特部落在马比布领导下叛乱，哈里发派安贾将其击败。1886年11月2日，西部苏丹的卡巴比什部落之萨里赫为报杀兄之仇，与英埃政府勾结叛乱。哈里发命令科尔多凡省略阿达姆前往平定。1887年5月，萨里赫被围杀。1887年2月，伊卜拉欣企图恢复其祖先在达尔富尔的统治，1888年1月25日被击败投降。1889年2月22日，马赫迪军队与科尔多凡叛乱的朱马扎战于法席尔郊外，并取得胜利。从此，马赫迪国家领导集团才稳定下来，国内局势趋于安定。

马赫迪国家是在起义中随部落的迁徙融合、新市镇的产生、大兵团的经常调动而从原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组织逐渐演变为以地域和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国家。马赫迪留下了一个草创的国家制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571页。

P.M.Holt, op.cit. (1958), p.

P.M.Holt, op.cit. (1988), p.101.

国家以原始伊斯兰教为基础，其权力来自上帝。马赫迪是宗教、军事和行政首脑，马赫迪去世后，由阿卜杜拉继承。建国以后，马赫迪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那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对外驱逐外国势力，对内进行社会改革的群众革命运动已不复存在。马赫迪国家也像所有胜利后的农民起义一样封建化了。

首先是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战时由马赫迪和三个哈里发组成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统揽全局事务。建国后，马赫迪成为国家首脑。阿卜杜拉继位后，在中央设立各部，全国分为20个省。省分两类：一类是边界地区的军事省，省督府就是驻军司令部，下辖各地指挥官、税收官和部落贵族；另一类是非军事的都会省，省督就是税务官。随着国家的稳定，政权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重大决策由几乎每天召开的家庭会议决定，阿卜杜拉只听其弟雅果卜和儿子奥斯曼的意见。在中央各部的设立上，沿袭奥埃统治之旧制，甚至连其雇员都有1/4—1/3是旧政府的职员。在人事制度方面，任人唯亲，文官由巴卡拉人垄断，军职都由塔伊沙担任。在办事效率上，内耗严重。曾经是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战友现在变成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对手。在中央，雅果卜和奥斯曼争斗不断，以致阿卜杜拉只好在1891年用结亲的办法来维系团结。在地方，各将领争斗不休。例如，在东部埃塞俄比亚边界地区，安贾战死后，阿里和塔马勒争夺指挥权，阿卜杜拉调解无效，只好处死塔马勒以求政行令止。在阶级关系上，从哈里发到各地小小的税务官都成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他们不但掌握各级权力，还有大量收入，广大的下层群众成为他们的统治对象。不但要为大小官吏服务，还要向国家尽各种义务。阶级力量重新组合，政权封建化。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出现了，那就是1893年哈里发阿卜杜拉在恩图曼围起了王城。生活奢侈，深居简出。以前每星期五晚的舞会必出席，现每年只在四个重大节日时露面，严重脱离群众，俨然一个封建皇帝。

其次是革新经济体制和政策。马赫迪国家经济生活的理论基础是：一切战利品上缴国库，然后按需分配。起义时建立了比特马勒（即中央金库）制度。第一座金库是1881年在卡迪尔山区建立的。建国后，其理论基础发生变化，私有观念加强。金库的规模日益扩大，职能复杂，成为领导财政、工农业和内外贸易等的机构。中央金库设在恩图曼，各省设省库。其来源一是战利品，包括军用物资、金银、粮食、牲畜、地产等；二是上缴的赋税，有人头税、商品税等；三是国家专卖的利润，如奴隶贩卖、输出象牙；四是没收国家罪犯的财产。金库的支出范围也很广，主要用于宫廷生活、各级官吏薪饷、供应各级军队、开办军工厂、救济灾区等方面。后随经济发展，财政制度不断完善。1894年2月设立卫队金库，专门供应卫队。1895年2月设立哈里发私人金库，供应宫廷。以后还相继设立了军部金库和市场警察金库等。原始的中央金库改称大众金库。

在中央金库的统一领导下，苏丹的对外贸易有所发展。在北方，允许与埃及贸易，主要是谷物和布匹等。到栋古拉和柏柏尔的埃及商人不但人身受到保护，而且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货物。商人在缴税后，利润率仍非常高，布匹达100%，石油达250%，糖为300%，肥皂为400%。从1892年12月20日到1894年1月28日，苏丹向埃及出口商品价值为8297英镑，进口18429

英镑。在东都，主要通过沿海的萨瓦金和马萨瓦进行贸易。进口商品主要是走私军火、面粉、烟草、食糖等。1892年12月20日到1894年1月28日，从苏丹出口萨瓦金的商品价值为90909英镑，进口47297英镑。

马赫迪国家还建立了一套货币体制。中央金库铸造了金镑、银元和铜币，发行流通。但由于苏丹曾被奥埃征服，所以，埃镑和西班牙银币、奥地利银币也广为流通。阿卜杜拉曾多次采取措施，限制外币流通，但都收效甚微。因此，流通领域较为混乱。

马赫迪国家对农业非常重视。1890年8月，哈里发对官员们说：“所有的酋长和埃米尔都要重视增加土地种植。”然而，1888—1890年苏丹出现了罕见的全国性大旱灾，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恩图曼挤满了逃荒的人。阿德尔司库因不能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在1890年1月下狱。苏丹的手工业虽然相当落后，但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除原有的内河修造船舶作坊外，由于军事的需要，恩图曼出现了许多生产军械的马萨鞍、军服等装备的手工工场。

随着经济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占有土地，或在经商中暴发。他们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而广大无地、少地的人不但要给主人无偿劳动，还要上缴各种赋税。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的基础。

第三是建立统一的军事制度。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建国后，马赫迪军队改为正规常备军，统一编制，由总指挥统率。其基本单位是中队（100人），由拉斯米阿指挥；下设5个分队（各20人），由穆斯卡达姆指挥。军事省军队由省督指挥，由省库负责供给。都会省隶属于中央，由上面派部队维持治安，由中央金库供给。军队的装备来自设在首都的生产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工厂。军人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和教育。在改组军队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埃及人和达拉格拉人被排斥出军队，黑人士兵和阿拉伯人也被分开编排。另外，还从军队中分出有三个团的卫队，由奥斯曼统帅。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由杰济腊供应的金库。据斯拉廷说，1895年时卫队人数达9000人。

第四是建立司法制度。马赫迪起义之初，就声明使用伊斯兰法律，因此，古兰经和圣训自然是司法的基础。起义中发布的公告也随之成为必须遵守的。设在恩图曼的法院由哈里发任命的大法官主持。他有十名助手。他们不但处理首都的案例，还要处理省法院上交的案件，有时哈里发也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另外，哈里发还常派特使，到全国各地考察司法情况。各省设有省法院，由法官与省督共同主持。以后还分化出一批特殊的法庭，执行特殊的职能。如市场法庭，由法官与警察司令共同主持，负责处理市场上出现的问题。较重要的是金库法庭，处理财政案件。马赫迪国家发布的文告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声明收回外国人侵占的土地，归部落人民所有；二是对处理妇女的婚姻及其行为做了相应的规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马赫迪的理想是把纯洁了的伊斯兰教即马赫迪主义推向整个穆斯林世界，用来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办法就是圣战。马赫迪去世后，哈里发继承了这一狂热的原则。马赫迪和阿卜杜拉部曾给埃及赫迪夫、奥斯曼素丹、维多利亚女王写警告信，要求承认马赫迪国家和马赫迪主义，否则就要发动圣战。1888年，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四世向哈里发提出了联合抗击

P.M.Holt, op.cit. (1958), pp.177, 237.

P.M.Holt, op.cit. (1958), p.178.

P.M.Holt, op.cit., p.188.

欧洲殖民者的建议。1889年，孟尼利克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哈里发对此都不予回答。1895年，孟尼利克派穆斯林代表塔伊布重提修好，得到的回答是：一要官方信件；二要信奉马赫迪主义。阿杜瓦战役后，孟尼利克再提建议，哈里发仍然为那个狭隘的宗教原则所囿，但一方面，也为其诚意所动，另一方面又由于已北临英埃侵略军，于是到1879年，两国虽没正式结盟，但确实有书面的意向存在。

马赫迪军队还在东、北、南三线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在北边与埃及接壤的地区，为防止英埃反扑，马赫迪国家一直陈兵边境，双方相持三年。1889年，马赫迪军队进攻埃及，7月10日被围困在巴拉加18天，损失惨重。8月3日，两军战于图希基，埃军大获全胜。马赫迪军队北进到此结束，但埃军也迅速撤出瓦迪哈勒法以南地区。此后，马赫迪军队还偶有小规模骚扰，如1893年7月发动了对巴里斯和穆拉特的进攻，但影响不大。

在东部与埃塞俄比亚和意属厄立特里亚边界地区，主要有三个争夺点：北面是埃及军队争夺萨瓦金，中部是与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争夺卡萨拉，南部则以加达里夫为据点与埃塞俄比亚抗衡。1884年6月，英埃与埃塞俄比亚订立协定，埃塞俄比亚王同意英埃军队经埃塞俄比亚撤出加拉巴特，英埃则允许埃塞俄比亚向苏丹扩张。1887年1月，埃塞俄比亚之阿达尔率军入侵苏丹，杀死当地驻节长官阿尔巴布。1887年4月21日，哈里发急调正在科尔多凡的安贾率军东征。1888年1月9日，安贾兵分四路，席卷埃塞俄比亚西部，最远是1月23日到其古都冈达尔。1889年3月9日，双方再度开战，约翰四世亲自率军分三路进逼加拉巴特。埃军初战告捷，但皇帝中流弹身亡，其首级与皇冠、御剑都被作为战利品送回恩图曼。埃塞俄比亚国内陷于混乱。1890年意大利建立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后，欧洲人的威胁增大。1891年，英埃攻下托卡尔。1893年12月，阿里率领马赫迪军队攻入厄立特里亚，在阿戈尔达特损失惨重。1891年4月5日，英国与意大利签订协定，意大利承认英埃对苏丹之所有权。1894年7月17日，英国也允许意大利占领卡萨拉。总之，东部边界地区由于牵涉国家较多，关系复杂而处于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状况。

南部形势极为复杂。1884年5月，马赫迪军队攻下加扎勒河省后，兵进兰多，将赤道省的埃米尔赶到杜菲勒。1888年6月11日，乌玛尔·萨利赫兵进杜菲勒，两军战于拉贾夫，马赫迪军队取得胜利。但随后英、法、比都相继插手这一地区。埃米尔法德尔投降比属刚果，并被任命为比属刚果赤道省的省督。1892年末，哈里发用兵拉贾夫，1893年10月又派阿拉比·达发阿拉赫到此地，征服拉库塔到河东的地区，重建了马赫迪在赤道省的统治。1894年1月10日，马赫迪军队向南深入赞德国，直到瓦德莱，抓获法德尔。比利时不甘心失败。1894年3—11月，比属刚果对阿拉比·达尔阿拉赫镇守的赤道省发动了三次大战，比利时不得不暂时撤退。但在12月的一次战斗中，阿拉比·达发阿拉赫失败，被迫撤往拉贾夫。从此马赫迪军队在南部处于守势，直到灭亡。

G.N Sanderson, Contributions from African Sources to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in the Upper Valley of the Nile (《欧洲人在尼罗河上游竞争之非洲史料文稿》),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 no.1 (1962), p.70.

四、重新征服苏丹与法硕达危机

19 世纪 90 年代是帝国主义在非洲大角逐的年代。此时在英国执政的主要是保守党，他们攻击自由党瓦解帝国，主张更积极地扩张，要求最大程度地重建帝国。他们是殖民扩张中的激进派，不但要长期占领埃及，还要重新征服苏丹。苏丹对埃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不但控制着尼罗河的水源，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尼罗河商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大国在苏丹建立有效政权就会把埃及捏在手心里。同时，苏丹又是 2C 计划的必经之地，是隔断 2S 计划的要点。另外，英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甚嚣尘上，他们一是要为戈登报仇，二是不愿看到一个独立的马赫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而此时围绕尼罗河的外交斗争为英国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出兵机会。

英国一直认为尼罗河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决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即使在马赫迪国家独立之时，英国仍通过一系列条约保护自己的权益。1890 年 7 月 1 日，英德签订东非协定，英国建立了肯尼亚殖民地和乌干达保护国，将德国限制在上尼罗河以南。1891 年 4 月，英国与意大利订立条约，意大利承认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特殊利益。1890 年 5 月 24 日，英国与刚果自由邦订立协定，刚果承认尼罗河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总之，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外交宗旨是使其他列强远离尼罗河，而法国因在埃及事务中吃亏及 2S 计划受挫而反对这一安排。于是，新一轮的竞争与对抗开始了。

1894 年 3 月 15 日，法德签订关于喀麦隆的协议，法国获准向东自由发展。1894 年 4 月 12 日，英国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拥有从阿尔伯特湖到法硕达的所有尼罗河左岸地区。这个协定忽视了刚果自由邦和法属非洲之间关于乌班吉的争议。于是 1894 年 8 月 14 日，法比订立协定，取代了英比协定。法国重新获得对加扎勒河省的权利，从而打开了东进尼罗河的通道。在埃塞俄比亚，因为英国一贯支持意大利侵略，所以，当乌查里条约被废除以后，法国乘虚而入，不但为孟尼利克提供人力和武器援助，还得到了孟尼利克的信任。阿杜瓦战役彻底打破了尼罗河地区的力量平衡。法国的影响日盛一日。1897 年 3 月，法国派出拉加尔德使团到亚的斯亚贝巴，并宣布支持塞俄比亚进入白尼罗河右岸。同时，英国也派出罗德使团，但收效不大。法国从东西两边兵进尼罗河盆地。1895 年 11 月，法国外交部批准马尔尚可率一支远征军到尼罗河，同时利奥波德也派出远征队配合行动。给马尔尚的最后命令是 1896 年 2 月 24 日，但实际上他在 1897 年 3 月才从布拉柴维尔出发。在东面，法国和埃塞俄比亚同时派出三个代表团沿索巴特河向尼罗河进发。英国迫于法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加之阿杜瓦战役后，意大利向英国求援，要求解除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对卡萨拉意军的围攻，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兵进栋古拉，不仅要减轻对意大利的压力，还要对付法国在上尼罗河的抢先行动。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占领苏丹、保卫埃及。索尔兹伯里在内阁会议之后对克罗默说，之所以出兵栋古拉而不去卡萨拉，就是要占领苏丹。

1896 年 3 月 12 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占领栋古拉的决议。同时决定给埃及贷款 80 万英镑。3 月 18 日，国会发布进军命令。英埃联军由基切纳将军率领，其中英军 8200 人、埃及军队 17600 人、运输牲口 7000 余头、炮舰 10

艘、运输船 5 艘，还配备有新发明的马克沁机枪。马赫迪军队约有 50000 人、34000 支步枪和一些老式大炮，但比较分散。基切纳吸取希克斯和贝克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挥兵南下，一方面敷设铁路，疏理河道，慢慢推进，步步为营。

征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896 年 3—9 月，揭开了全面征服苏丹的序幕。3 月 20 日，英埃军队占领阿卡沙。6 月 7 日，双方战于法尔卡，马赫迪军队指挥伊德里斯战死，翌日马赫迪军队大本营瓦尔达陷落。8 月 23 日，双方又在哈菲尔开战，之后马赫迪军队主动撤退。9 月 23 日，栋古拉首府乌迪被占领，其他地方不战而降。第一阶段战事结束。基切纳一方面迫于尼罗河缺水和铁路尚未修好等问题，不能急于进军；一方面因英国内阁对是否继续扩大占领意见不一而回国待命。哈里发也在调整战略部署，准备放敌人进来，用优势兵力在首都将来敌击败。他急调艾哈迈德率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军队进京，积极备战。双方对峙一年多。

第二阶段从 1897 年 7 月到 1900 年结束。基切纳一边率军继续南进，一面忙于修通从瓦迪哈勒法经过努比亚沙漠到阿布哈马德的铁路。哈里发准备兵进贾林古城梅特马，但贾林部落在 1897 年 6 月 23 日勾结英军叛乱。7 月 1 日，哈里发不得不派兵将其摧毁。8 月 7 日，英军攻陷阿布哈马德。柏柏尔的驻防军被迫后撤，8 月 31 日英埃军队攻入柏柏尔，9 月 6 日正式占领。之后双方又都进行充分准备。1898 年 2 月 21 日，马赫迪军队在艾哈迈德指挥下集结北上，3 月 19 日到达阿特巴拉，4 月 8 日被英埃军队包围。在阿特巴拉之战中，马赫迪军队死 3000 人、伤 4000 多。艾哈迈德被俘，1906 年死于罗塞塔；英埃军队伤亡 510 人，其中英国人 114 人。奥斯曼·迪克纳率众逃跑。基切纳在阿特巴拉修建船坞，作为前进基地。哈里发也调动所有军队包围自己的卫队，积极布防。他先在萨巴鲁加峡谷驻防，后因供应不足，自动后撤。9 月 2 日，双方在恩图曼郊外的卡拉里激战五小时。马赫迪军队英勇奋战，拼死冲锋。英国《每日邮报》随军记者记道：“这是一支为按马赫迪主义建立和保持如此长久的巨大帝国而光荣战死的军队，他们的射手备受苦难，疲惫不堪，耗尽了弹药，仍毫无惧色地守护在黑、绿旗的周围。”但因冲不破敌人用速射机枪组成的火力网，马赫迪军队最终失败了，死 11000 人，伤 16000 人。英埃军队仅死 48 人、伤 382 人，雅果卜等将领阵亡。基切纳进入恩图曼，将马赫迪的遗体从陵墓中拉出，焚尸扬灰。马赫迪国家到此终结。投降的沙里夫被流放舒卡巴，1899 年 8 月 27 日因疑其重新策划起义而遭逮捕，后来沙里夫与马赫迪的两个儿子一起被枪决。哈里发率残部逃往科尔多凡。1899 年初，他与从东部加达里夫逃来的法迪尔汇合，共约有 5000 人。11 月 24 日，他们与温加特勋爵率领的 3700 人的军队战于乌姆迪维卡拉特，激战多时。哈里发见大势已去，遂坐在自己的羊皮服上，阿里在右，法迪尔在左，让温加特枪决，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此时，奥斯曼·迪克纳仍在东部坚持战斗，直到 1900 年 1 月才最后失败。

P.M.Holt, op.cit. (1958), p.220. 一说英埃军队失踪 487 人，死 81 人，参见 P.M.Holt & M.W.Daly, op.cit., p.112.

郑家馨、何芳川：前引书，第 374 页。

P.M.Holt (1958), op.cit., p.221. 一说死 49 人，参见 P.M.Holt & M.W.Daly, op.cit., p.112. 另一说失踪 386 人，参见 Robinson & Gallagher, op.cit., p.369.

马赫迪起义建立了煊赫一时的马赫迪国家,为什么它只维持了14年就被很快摧垮了呢?

一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马赫迪起义是非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强、持续较久的一次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它摧毁了一些原有的不合理制度,部分地发展了生产力,解放了一些受苦难的群众,这是它能够建立国家并维持14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马赫迪主义者不可能跳出封建主义的圈子,建立一个新式国家。他们像所有的农民起义胜利后一样,蜕化变质,经济上出现两极分化,官员与人民群众矛盾加剧,稍有解放的生产力又被套上了落后生产关系的桎梏;加上天灾人祸,生产力停滞不前,经济落后,这样一个国家要在强敌入侵时保持长久独立是不可能的。

二是由于连年征战,国力耗尽。马赫迪国家建立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之时。英帝国主义绝不会让它独立于自己的控制之外,千方百计要摧毁它。在经济上对它实行封锁,在军事上不但实行武器禁运,还不断骚扰,并用埃及、埃塞俄比亚军队施以强大的军事威慑。法国、比属刚果也趁火打劫,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哈里发本应在国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凝聚强大国力;对外联合另一非洲近邻埃塞俄比亚,共同抵御外侮。但实际上,国内捐税愈来愈重,引起人民不满,而且实行血缘统治,引起巴卡拉部落、阿什拉弗人的反抗,加之哈里发本人深居简出,放松了对全国的控制,将领之间不和等。这不但引爆了国内部落叛乱,而且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基础。在对外政策上,马赫迪国家一味妄自尊大,迷信圣战,既不会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不接受埃塞俄比亚多次提出的和平联合建议。虽有书面意向存在,但马赫迪的武断不但使非洲兄弟之间大动干戈,而且也使自己成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的牺牲品。当国力耗尽之时,面对英埃的侵略,马赫迪国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三是由于宗教的悲剧色彩。宗教帮助马赫迪起义获得胜利,并建立了马赫迪国家。然而,宗教并不能保证这个国家不再被外族征服。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了。”马赫迪国家正是这样。曾经用来掌握群众的马赫迪主义因其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而渐渐被群众抛弃。马赫迪战士的士气不高,缺乏以前那种狂热和激情。由于经济基础未变,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狭隘性、逆来顺受等弱点重新表现出来。军队不但缺乏团结、纪律涣散,而且由于供应不足,开始骚扰百姓,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

四是由于对手强大,战术不灵。马赫迪起义时,面对的是奥埃统治当局。他们虽然强大,但基本上同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来英国虽然加入,但其当时的政策是撤退。而当英埃重新征服苏丹时,保家卫国的马赫迪人民遇到的对手主要是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英国,交战双方已不属于同一层次,有了质的差别。而且英国此时的政策是征服、是占领。马赫迪国家真正遇到了强敌。在作战时,英埃军队吸取了以前失败的教训,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不怕拖时间,拚实力,打消耗战。马赫迪国家却沿袭诱敌深入的旧战术,不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26页注

能扬长避短，而是用自己装备差、供应不足的军队去与拥有马克沁机枪的英军一味打阵地战。哈里发任人唯亲、妒贤嫉能，使精明强干、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被捕处死。现任将领又互相掣肘，互不信任。在讨论作战计划时，艾哈迈德固执己见，不听阿卜杜拉的规劝。在指挥权上，阿里、奥斯曼和雅果卜争执不休，军令难以贯彻到底。在军队中，资历老的与年轻的将领互相不服，阿拉伯人与黑人士兵不和，皇族看不起非皇族。这种内部不和严重削弱了本来就不强大的马赫迪国家的力量。

上述各因素的合力，决定了马赫迪国家在这场卫国战争中的失败。

在英国忙于镇压马赫迪起义之时，法国也加紧了在东北非的扩张。它采取东西并进的办法。东有由法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使团。1897年12月，旁尚率团到达离法硕达100公里的地方。1898年6月22日，另一使团到达索巴特河与尼罗河交汇处，升起了法国国旗，在等待从西面前进的马尔尚不至后返回。三周后，即1898年7月10日，马尔尚率8名法国人和120名塞内加尔人士兵到达法硕达，升起了法国国旗。基切纳在攻克恩图曼后，急忙沿尼罗河南下，9月25日赶到法硕达，在同一地点升起了埃及和英国旗帜，并警告法国人说：“法国军队在法硕达和尼罗河谷地的出现被看成是对埃及政府和大不列颠权力的直接侵犯。”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法国无条件撤出，因为英国国内一致认为应占领苏丹，且基切纳手握重兵，英国海军也随时准备战斗。法国是非常虚弱的，就像他们自己所看到的：“我们除了争辩别无办法，而他们（指英国——引者注）驻有军队。”然而，法国也不甘心没捞到任何好处就撤退。经多次外交谈判毫无结果，英法剑拔弩张，准备战争。但法国毕竟实力不如英国，且受欧洲外交斗争的影响，只好在10月12日暗示准备撤退，但要求得到一个从乌班吉到尼罗河的通道。英国政府的回答是：10月24日命令海军准备战斗，预备舰队也处于战备状态。同时外交部也毫不妥协。10月底内心空虚的马尔尚私自离开法硕达。11月3日，法国政府通知法军撤离。1899年3月21日，英法共同发表声明，规定法国保有从达尔富尔到乍得湖的中苏丹，但被彻底排挤出尼罗河流域。法国既没有在尼罗河盆地取得战略据点，也没有达到拿它迫使英国在埃及问题上让步的目的。几乎使英法走向战争的法硕达危机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帝国主义瓜分东北非的完成。也最后巩固了英国在苏丹的地位。

五、一九一四年前英埃共管苏丹

马赫迪国家被消灭后，如何管理苏丹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英国既不愿赤裸裸地变苏丹为自己的殖民地，也不愿按恢复埃及赫迪夫失去的一省办事，而想采用一种形式，即成立一个表面上尊重埃及权力，实际上保护英国利益的混合形式的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原则就是1899年1月18日签订的《共管协定》。

《共管协定》规定：英国和埃及对苏丹拥有联合主权，在苏丹要同时悬

P.M.Holt & M.W.Daly, *op.cit.*, p.117.

Robinson & Gallagher, *op.cit.*, p.371.

全名是《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和赫迪夫殿下政府关于未来管理苏丹的协定》，参见迈基·希贝卡：前引书，第829—834页。

挂英国和埃及的旗帜；苏丹保留军事状态，未经英国许可，不得接纳其他国家领事。

英埃共管的中心内容是总督制。苏丹设一个总督，具有最高军事和民政统治权，由赫迪夫根据英国政府推荐而任命的英国人担任；未经英国政府同意，不得随意撤换总督。总督可以颁布和废除法律，未经总督同意，埃及法律不能在苏丹生效实施。总督之下是由埃及军队中的英国官员担任的各省省督和视察。埃及军人担任低级的行政管理职务，他们既是本地区的行政长官，又是警察局长，受英籍视察的监视。在统治者的最低层则使用顺从的苏丹土著部落酋长，并允许他们在某些规定下尽可能根据其部落习俗进行统治。总督府有三个主要的部：内务部负责管理高级官员，处理省督上报的事情；立法部负责起草条例，是总督的法律顾问；财政部负责全苏丹的预算和支出等。总督还有咨询机构——政府官员委员会，它由总提名的人士组成，只当顾问，没有执行权；1910年发展为总督委员会，由三位部长和总视察及2—4名总督提名的人士组成。

被征服后的苏丹完全失去了主权。所谓共管，也就是实际上由英国统治，埃及仅作为陪衬而已。在苏丹事务上，埃及唯英国马首是瞻。英国人认为：“任何适宜于向埃及政府提出的有关苏丹事务的意见，我们希望埃及政府都必须照办。”实际上，埃及此时完全受制于英国，不办也得办。苏丹总督受英国控制。对苏丹总督的有效控制是通过英国政府驻开罗的领事和总顾问来完成的。在苏丹总督处理事务时，开罗的英国领事有优先权。苏丹的立法受开罗的英国领事和英国控制的埃及司法部控制；其财政上的预算，特别支出和财政官员任命，都要得到英国控制的开罗政府的批准。总之，苏丹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重新征服苏丹后，共管当局着手对苏丹进行统治与开发。首先划定了苏丹的边界。1899年的英法声明，规定了苏丹与法属中苏丹的边界。1902年的英意协定，固定了苏丹与意属厄立特里亚的边界。1902年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协定，划定了苏丹与埃塞俄比亚之边界。1906年，英国与刚果自由邦商定了苏丹的西部边界。1913年，划定了苏丹与乌干达的边界。这样，苏丹的疆界就在条约规定下基本稳定。其次是修筑铁路和开通电报线。早在征服之时，从埃及到柏柏尔的铁路就已修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柏柏尔、喀土穆和乌拜伊德都用铁路连接起来，同时也接通了各大城市间的电报线。据埃及人材料记载，1900—1910年，埃及政府向苏丹贷款5414525埃镑，其中3919987埃镑用于铁路，914320埃镑用于修筑苏丹港。修铁路便于掠夺物资和运输军队，架设电报线则有利于更有效地统治全国。再次是兴修水利，种植棉花。早在奥埃统治时期，英国人就在苏丹引种棉花。英埃征服以苏丹后，便强迫人民大规模植棉。1904年，在伦敦还成立苏丹实验种植辛迪加，后改名为苏丹种植辛迪加，指导棉花生产。1911年，帝国棉花生产协会到杰济腊地区调查后，决定大量种植长绒棉。他们一方面强迫农民以1/3的土地植棉，强迫苏丹地主以每亩2先令将土地出租植棉；另一方面发行300万英镑公债，

Robert Collins & Richard Herzog, *Early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Southern Sudan* (《英国在南苏丹的早期行政管理》),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 no.1 (1961), p.128.

迈基·希贝尔：前引书，第753页。

M.W.Daly, *op.cit.*, p.195.

打算在尼罗河上游修一条水坝，并在尼罗河两岸分别修一条运河。工程于1914年开始。英埃的这些措施把苏丹纳入了单一种植的轨道。

共管初期，苏丹政府的收支迟迟不能平衡（参见下表）。

苏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单位：埃镑）

年份	收入	支出
1899	126,569	230,238
1900	156,888	331,918
1901	242,309	407,335
1902	270,226	516,945
1903	462,605	616,361
1904	579,013	628,931
1905	665,411	681,881
1906	817,921	827,961
1907	975,973	1,012,357
1908	979,343	1,163,657
1909	1042,599	1,153,519
1910	1,171,007	1,214,676
1911	1,311,218	1,350,854
1912	1,428,605	1,490,668
1913	1,654,149	1,614,007
1914	1543,549	1,531,346

然而，统治当局并不管这些，仍然残酷剥削和掠夺。苏丹棉农
苏丹主要物资输出情况

类别 单位 年份	象牙		树胶		高粱		总值
	吨	埃镑	吨	埃镑	产量吨	出口吨	埃镑
1901	15	7925	7693	178531			276,079
1902	57	34701	9900	268,878			395,321
1903	49	29826	8065	192,920			397,565
1904	64	43195	11,816	179481			389,364
1905	76	51,326	7110	113,131			309,000
1906	50	37,017	7290	96,000			264,096
1907	49	40,304	9325	154,592	248325		449,329
1908	50	39,673	10108	157271	175708	~	515938
1909	60	45,056	13,282	201,238	258,000	22,000	673,902
1910	83	60,999	13,577	217,932	212,500	32,000	977,621
1911	99	73,932	14,357	435,622	163,000	18,000	1376,958
1912	107	94,465	19,615	603,511	129,000	1,000	1,373,119
1913	125	113,236	15,129	371,528	112,000	2,000	1,185,186
1914	92	84,605	12,372	314,919	250,000	~	1,020,260

只能得到全部收成的 40%。苏丹的物资大量输出(参见下表)。到 1913 年,苏丹出口的阿拉伯树胶可满足世界需要的一半,棉花出口也增加到 2300 吨,棉籽达 4700 吨。各种农作物出口总值为 150 万英镑。苏丹变成了向英国提供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基地。

马赫迪国家消失了,但马赫迪主义信念却并未完全消失。在英埃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苏丹人民从未放弃和停止战斗。1908 年,在杰济腊地区继续传播马赫迪主义的哈布巴在图库尔村发动反政府军武装起义,杀死了两个政府官员,5 月初又奇袭卡特菲亚之政府军。在潜回恩图曼煽动起义时,哈布巴被捕,1908 年 5 月 17 日被当众绞死。他在一次审判中曾义正辞严地说:“我的愿望是,苏丹应由穆斯林根据穆罕默德法和马赫迪信条与箴言统治。我清楚,苏丹人民自己会比现政府做得更好。我毫不犹豫地,他们所谓的友谊和奉承只是伪善与谎言。我坚信,人民喜欢的是马赫迪主义而不是现政府。”1906 年,基特拉的努曼领导人民起义,杀死数名政府官员和军人,后遭到残酷镇压。南部地区的努艾尔人从 1906 年开始起义,多次与政府军血战,一直坚持到 1927 年的努艾尔人大起义。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尽管都先后失败,但它唤醒了人民,培养了反殖民、反压迫的斗争精神,为现代史上苏丹人民的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

M.W.Daly, op.cit., pp.458 - 460.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07 页。

A.Adu Boahen,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通史》), vol.7, California 1985, p.80.

第二十三章 列强瓜分非洲之角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

19世纪后30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为获得最大限度的高额利润，开始了疯狂瓜分世界的竞赛。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贯通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非洲之角的战略地位和商务价值更显重要。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插手，都想在此建立战略据点。因此，非洲之角的瓜分，不仅是殖民列强瓜分非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列强瓜分世界大格局的一个重要部分。争夺非洲之角的着眼点，包含着殖民列强对世界战略的考虑，因此，对这一地区的争夺相对来说较为激烈和复杂。

以2C计划为目标的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要确保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红海—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线，对于整个红海、印度洋西侧特别是邻近运河地区的非洲之角，尤抱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心。它一方面赤裸裸地积极抢占2C计划必经之地，另一方面又非常狡猾地怂恿自己控制的埃及积极向东非之角扩张，削弱当地人民的反抗，最后达到其坐收渔利的目的。1882年通过武力镇压阿拉比起义，英国将埃及实际上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接着借助于支持埃及镇压苏丹马赫迪起义，基本上控制了尼罗河流域。1898年法硕达事件因法国退让而平息，英国实现了自己纵贯非洲计划的北半部分。同时埃及在英国允许下，南下索马里沿海，势力一直达到哈拉尔。这样，从整个战略态势上看，英国不但逐步在内地地区造成了一个对非洲之角的隔离带，而且在争夺非洲之角的斗争中已得先机。

对非洲之角怀有野心的，除英国外，至少还有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在争夺非洲的斗争中，法国热衷于东西齐头并进，力图使自塞内加尔东进的殖民军与自索马里沿岸西进的殖民军会师中非，实现其梦寐以求的横断非洲大陆的2S计划。法硕达事件后，法国不甘心失败，依旧积极在非洲之角地区渗透扩张，建立据点，以威胁英国的海上生命线。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不甘寂寞，也竭力在东北非地区活动，力图打击英国在印度洋的势力，为它自己从中亚地区南下打通印度洋的南进战略服务。沙俄的传教团与军事考察团相继进入这一地区。意大利帝国主义发迹较晚，力量在殖民列强中最弱，当它走上世界大瓜分的餐桌时已所剩无几，因此在瓜分非洲之角的争夺中更带有某种疯狂的、不自量力的色彩。在埃及撤出非洲之角后，英国改变策略，采取一种弱邻政策，即比起咄咄逼人的劲敌法国来，英国宁愿选择意大利作为自己在非洲之角殖民扩张与统治的伙伴。因此，英国认为意大利在东非之角的渗透扩张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要求，于是对此采取默许甚至怂恿的态度。这样，列强在瓜分非洲之角时，逐步形成了英国为主角、意大利打头阵、两者联袂对付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格局。

和其他被瓜分、被掠夺的地区一样，东北非人民对列强侵略的回应是不屈不挠的反抗。在非洲之角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索马里各族人民。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经济相当落后；政治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有部落、有氏族、也有初步形成的封建国家。因此，各部落、氏族或封建国家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规模可观的战争，从而大大削弱了索马里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的力量。索马里尽管没有形成单一的政治实体，但其文化具有同一性，即都信仰伊斯兰教，它为索马里人民提供了一种传统的反抗武器——圣战；而且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索马里各族人民虽没有共同的国家观念，但产生了一种统一的家园意识。在殖民征服下有了共同

利益关系的索马里人民，一旦注入圣战的精神，那平时就尚武好勇的身躯便在神的呼唤下迸发出持久而超人的力量，其典型表现便是长达 20 年之久的哈桑大起义。

在黑非洲最早出现国家组织的埃塞俄比亚，发展了在整个非洲大陆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文明。尽管地理上的隔离和长期的对外封闭使这个封建王国变得疲软萎缩，政治、经济上都具有鲜明的割据性和分散性，但悠久的历史传统加上自西奥多以来的近代化改革，毕竟使这里的人民在面对外来威胁时能做出较高层次的反应。最弱的帝国主义国家遇上了最强的非洲国家，就理所当然地爆出了非洲之角人民反抗瓜分的另一片光华——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卫国战争。孟尼利克在保家卫国的同时，还继续了西奥多开创的近代化改革。他不但引进西方的长技，而且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设立了内阁，改善了司法制度，试图建立近代中央集权制。虽然这仅仅是模仿，是想将西方近代先进制度嫁接在尚未变化的封建主义土壤上，然而，不管他们对近代化的理解有多少局限性，其改革事业毕竟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加强了内部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抵御外国列强入侵的能力。从国际环境来看，在抗日战争中，客观上支持了埃塞俄比亚的法国、俄国寻求更大的利益；而与意大利站在一起的英国虽在感情上对埃塞俄比亚取得的巨大胜利恨之入骨，然而理智告诉他们：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既未直接威胁苏伊士—红海—印度洋航线的安全，又不直接影响 2C 计划的实施，同时还有利于压抑一下意大利的侵略气焰，保持其弱邻地位，因而得到英国的容忍。所以在非洲进入现代史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自己的抗争保持了至少是表面上受到列强承认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

一、列强瓜分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北扼红海咽喉，东南濒临印度洋，历来为东西方交通要冲。英法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对此觊觎已久。列强对非洲之角的争夺大致可以 1884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第一阶段以英国、法国、埃及的侵略为主。1827 年，英国试探性地派“塔马尔”号军舰侵入柏培拉，迫使当地哈巴尔·阿瓦尔部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1839 年，英国又用武力占领了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将其作为通往东印度的中继站。驻亚丁的英国殖民军依赖红海彼岸的北索马里供应肉类和其他物资，因此 1840 年 8 月，英国军队就侵入亚丁对岸，分别在 8 月 19 日和 9 月 3 日迫使塔朱腊和泽拉签订条约，塔朱腊素丹以 10 袋稻子卖掉了穆沙岛，泽拉总督无偿割让了奥巴特岛。

在瓜分非洲之角的斗争中，法国针锋相对，是英国的主要对手。1840 年，法国南托·博尔多斯公司派孔伯前往塔朱腊和泽拉活动。1843 年，深入到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旅行家罗竭·赫里考特代表法国与绍阿王签订了《政治和商业协定》。1859 年，还在刚刚破土动工开凿苏伊士运河之际，狡猾而又有眼光的法国殖民者就设法取得了位于达纳基尔红海沿岸的奥博克港的租借权；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孟尼利克为确保独立才转入近代化改革，参见 L.H.Gann & p.Duigan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殖民主义在非洲》)，vol.1, Cambridge 1969, p.443.

Saadia Touval, Somali Nationalism (《索马里民族主义》)，Harvard 1973, p.33.

1862年又以10000塔勒购买该港，预先在通航后的英国生命线上砸下一颗钉子。1881年，法国在奥博克开设了法国—埃塞俄比亚贸易公司。

继法国之后，意大利殖民者接踵而至，也对红海非洲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1869年，原在埃塞俄比亚活动的传教士朱塞佩·萨佩托在厄立特里亚沿海取得了阿萨布港的租借权。1870年，意大利的拉法坎勒·鲁巴蒂诺轮船公司也从当地达纳基尔人手里购买了这座港口。

梦想建立一个非洲大帝国的埃及统治者不但派军远征苏丹和赤道非洲，还追逐非洲之角的利益，发动了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甚至派兵占领远至基斯马尤的东非沿海之地。1866年，伊斯梅尔政府从奥斯曼帝国皇帝那里获得红海沿岸的萨瓦金和马萨瓦。1870年，埃及总督受奥斯曼苏丹之命，统治了从苏伊士到瓜达富伊角之沿海地区。同年，埃及派出穆罕默德·贾马尔贝伊前往索马里沿岸活动，先后在布勒哈尔和柏培拉升起了埃及的旗帜。1872年，埃及出兵攻占埃塞俄比亚北部边境地区。对埃及统治者这种追求霸业的政治任性，英国狄士累利政府采取怂恿的态度，因为埃及向外扩张就需追加军费，这就会使本来就难以平衡的财政破产，以便英国乘机控制并从扩张中获得利益；同时也可借埃及之力削弱埃塞俄比亚，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在英国暗中鼓动之下，1873年埃及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的恩涅斯莱湾，次年占领克伦。1875年，埃及兵分三路，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北部，劳夫帕夏率领的军队占领了哈拉尔，但在11月6日的贡德特战役和翌年3月7—9日的古拉战役中分别被约翰四世的部队击败。不过，埃及仍派远征军到瓜达富伊角以南的索马里海岸，并从泽拉向内地扩张。英国在控制埃及财政之后，将埃及变成了侵略非洲之角的工具。1877年英国同埃及总督签订协议，承认埃及的管辖范围向南一直延伸到哈丰角，并明确规定：“索马里海岸……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割让给任何一个外国。”这一规定表明了英国排斥其他列强染指索马里的意向。

第一阶段的征服有两个特点：一是列强都在沿海活动，尚未大规模深入内地；二是列强尚未在此建立殖民统治机构。

1884年后列强对非洲之角的瓜分进入第二阶段。1882年初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埃及成为英国殖民地。与此同时苏丹爆发的马赫迪大起义，对埃及统治者的对外扩张是一次毁灭性打击。1884年6月3日，埃及与英国、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埃及和平条约》。埃及将所占埃塞俄比亚北部土地如数归还，埃塞俄比亚可用马萨瓦港运送包括武器和弹药在内的一切商品。埃塞俄比亚的义务是协助被马赫迪军队包围在卡萨拉、阿迈迪丁和桑希特的埃及军队经埃塞俄比亚撤到马萨瓦。随后埃及军队先后撤出伯格人居住区、泽拉、柏培拉、哈拉尔等地。这样，非洲之角地区再次出现某种真空地带，帝国主义列强在此展开了疯狂的角逐。

英国迅速占领泽拉、布勒哈尔和柏培拉等沿海城镇，并在1884年7月—1885年1月间分别与伊塞·盖达布尔西、哈巴尔·加尔哈吉斯、哈巴尔·阿瓦尔和哈巴尔·托尔贾洛等族签订殖民保护条约，把殖民统治从沿海扩至内地。这些条约，一般都保证除英国政府外不将他们所居住或控制的任何领土割让、出卖或抵押给任何其他国家。同时，英国分别向柏培拉、泽拉和布勒

刘易斯：《索马里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5页。

刘易斯：前引书，第93页。

哈尔派遣三个受英国驻亚丁长官节制的副领事。1886年，英国又与上述各族签订补充条约，宣称英国政府保证各有关部族及其领土受到女王的恩泽和庇佑，重申未经英国允许各部落不得同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关系。1887年7月20日，英国通知欧洲列强，在吉布提至齐阿达港的索马里北部沿海建立英属索马里保护地。此外，英国与德国于1886年在东非划分势力范围，确认从基斯马尤到瓦尔谢克的贝纳迪尔海岸归桑给巴尔素丹管辖。1891年，英国迫使桑给巴尔素丹签订条约，实际上接管了贝纳迪尔海岸。

法国野心勃勃，立即抓住了这一进入索马里的的大好时机。阿拉比事件后，英法两国共同控制埃及的情况不复存在。法国人认为自己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于是决心在航线必经的红海地区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1884年，正当苏丹马赫迪大起义渐进高潮的时候，法国任命莱翁斯·拉加尔德为驻奥博克总督。他上任伊始，便积极扩张，先后与塔朱腊沿岸一些酋长签订条约，占领了阿利角、古贝特哈拉巴等地方。1885年，法国占领吉布提，法国的殖民统治重心也从奥博克迁至吉布提。英国对此立即作出强硬反应，宣称其索马里保护地从柏培拉起一直延伸到法国所宣布的殖民范围以内。法国充耳不闻，继续与当地部落签订“永久友好条约”。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后经过谈判，1888年法英就此缔结条约，将两国在非洲之角殖民地疆界划在泽拉与吉布提之间。1896年，法国将其在北部索马里的占领区合并为法属索马里，吉布提为其首府。

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披着同教亲善的外衣，也要在非洲之角占有一席之地。1884年，沙俄冒险家阿西诺夫以旅行为名，窜到埃塞俄比亚，为建立一个哥萨克殖民地做准备。1889年1月，阿西诺夫率领一支远征队在吉布提的萨迦诺港登陆，与法国发生冲突，俄国人全军覆没。1894年，沙俄利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冲突加剧之机，迅速派使团到埃塞俄比亚，受到孟尼利克的欢迎。1896年，沙俄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使馆。继教会使团之后的是军事使团，沙俄曾派一些军官（如阿尔塔莫诺夫上校等）到埃塞俄比亚参谋总部工作。沙俄的用心正如伊夫拉因在1896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游记》中透露的：“除了宗教领域的亲善以外，友谊可以为我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我们的国家可能在靠近印度洋的红海岸一个地点取得稳固地位。”“这样，万一需要，我们就可以在印度边境牵制英国人，保证我们的舰队通航到远东一带”。

与此同时，意大利也以阿萨布为据点继续扩张。1882年，意大利在英国压力之下承认了埃及对阿萨布以北和以南地区的统治权，以此为代价换得了英国对意大利政府正式从拉法坎勒·鲁巴蒂诺轮船公司买下阿萨布港的默认。在埃及撤出之后，英国不再限制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开始采取弱邻政策。为抵销法国的强劲势头，英国怂恿意大利挤入埃及撤出所形成的真空地带。1885年2月3日，意大利军队占领马萨瓦后向贝卢尔地区扩张，并进一步向埃塞俄比亚内地推进，1885年6月占领萨蒂，1886年11月占领瓦阿。1887年1月26日，500名意大利侵略军被20000名埃塞俄比亚军队全歼于多加利。战败的意大利不得不放弃萨蒂、瓦阿、祖拉，退回马萨瓦。1887年12月，意大利再次向内地推进，1888年1月重占萨蒂。1889年，意大利

Saadia Touval, op.cit., p.37.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1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67—768页。

A.H.M.Jones & E.Monroe, A History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史》), Oxford 1978, p.138.

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乌查里条约。意大利不但割占了埃塞俄比亚北部领土，还篡改条约，擅自宣布其为“保护国”。1890年2月，意大利宣布建立厄立特里亚殖民地，以阿斯马拉为首府。

在北部行动顺利时，意大利又对南部索马里沿海提出了领土要求。1889年2月8日，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文琴佐·菲洛纳迪迫使奥比亚部落素丹优素福·阿里签订条约，接受保护；意大利付出的代价是1800塔勒的年金。同年4月7日，当地又一大部落米朱提因素丹被迫承认意大利保护，代价是少量的年薪和部分枪支。意大利先后攫取了从基莱角到阿瓦达角、加腊德·诺加尔和从阿瓦达角到卡西姆港的领土。1889年8月3日，意大利与英国东非公司签订协定，转租到该公司从桑给巴尔素丹那里承租的贝纳迪尔海岸港口，从而使其在索马里所获地盘实际上向南大大推进。1891年，意大利在阿达莱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和由20名土著士兵组成的驻军。1892年8月12日，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波特以桑给巴尔素丹的名义，把贝纳迪尔海岸的布腊瓦、梅尔卡、摩加迪沙、瓦尔谢克等港以年租金16万卢比直接租给意大利，事实上由意大利无限期独占。至此，意大利在南部索马里沿海的占领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此为依托、以各港口城镇为据点、向内地不断深入的战略态势。1908年，意大利将南北领地合并为意属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是东北非之角的一个大国，其历代君主都认为自己国家的疆界东至大海、西到白尼罗河。孟尼利克二世在位时，国力蒸蒸日上。阿杜瓦大捷后，其国内和国际声望骤增，君权扩张意识膨胀，不断向东蚕食。这就使列强瓜分非洲之角的形势又一次因东方君主的掺合而带上特殊的色彩。

早在约翰四世统治时，身为绍阿王的孟尼利克就积极向东、向南扩张。1885—1886年占领阿鲁西，1887年占领哈拉尔。孟尼利克命令他的亲信、新占地区驻节长官马康南公爵继续向沿海地区伸展其势力，1891年秋占谢贝利河上的伊米。沿海的吉布提和泽拉地区虽然已分别为法英两国控制，但其内地的伊塞人和盖达布尔西诸部则受马康南的控制，向其纳贡。在南方，埃塞俄比亚军队沿朱巴河南下，直至卢格。同时孟尼利克与欧洲殖民者进行了大量的贸易：绍阿从意占阿萨布和法占奥博克购买军火，输出大量的象牙、牲畜、咖啡和黄金。埃塞俄比亚的这些活动都与当地索马里人和正在西进的意大利人发生冲突，它对南方和东南方的巨大压力也使埃英关系日趋紧张。1887年10月20日，正在与约翰皇帝作战的意大利为从内部削弱埃塞俄比亚，与绍阿王孟尼利克签订《和平联合条例》。意大利承认孟尼利克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并给予5000支雷明顿枪的军事援助；埃塞俄比亚则在各方面支持意大利。乌查里条约签订后，意埃关系逐渐恶化。侵埃战争失败后，双方就索马里地区之疆界进行谈判，规定从海岸到内地180英里之地带和从英属索马里边界到巴尔德腊以北、朱巴河之间的地区为意属索马里。这一模糊的规定给

乌查里是从阿姆哈拉文 Wuchale 译出；又名乌西阿利条约，乌西阿利是从意大利语 Ucciali 译出。

对埃塞俄比亚侵入索马里，国际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出于对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从沿海向内陆侵略的考虑，是“对在近邻建立殖民地的欧洲人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参见 A.Adu Boahen,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California 1985, p.82.我们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尽管客观上有防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但它无疑是以恢复昔日帝国的光荣为目的的一种封建国家的扩张行为，而且是先于欧洲人入侵的。从索马里方面来看，埃塞俄比亚无疑是侵略者。

也称《意大利—绍阿协定》。

意大利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借口。它不断向西扩充控制区域。1908年，意大利又迫使埃塞俄比亚签订条约，以300万里拉的代价获得一条从朱巴河上的多洛往北至谢贝利河的边界，正式将卢格与朱巴河、谢贝利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并入意属索马里。英国出于对整个东北非战略的考虑，竭力要与孟尼利克建立友好关系，于是在1897年派出罗德使团前往埃塞俄比亚，其目的之一便是要解决索马里海岸英国当局和埃塞俄比亚哈拉尔总督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1897年5月14日，双方达成协定，英国不但同意通过泽拉港为孟尼利克转运军火，并对由此输入埃塞俄比亚的转口货物免征关税，而且同意放弃英属索马里豪德地区的67000平方英里土地，仅保留哈尔格萨及小部分地区；同时埃塞俄比亚承认英国对英属索马里的殖民占领。在罗德使团之前，法国也闻风而动，派莱昂·拉加尔德使团与孟尼利克二世谈判。由于抗意战争中得到过法国的同情与支持，孟尼利克对法国颇有好感。双方于1897年1月29日和3月20日分别达成两个协定。法国为保持这种超过别国的友好关系，同意将法属索马里范围缩小到“万王之王”满意的程度。法国缩小了自己殖民地的面积，却扩大了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权益，取得了通商方面的许多优惠保证，并签署了修筑从吉布提通往埃塞俄比亚内地铁路的协议。

至此，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四国大致将各自在索马里的属地调整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非洲之角沿海地带形成了意大利厄立特里亚殖民地、英属保护地、法属保护地、意属保护地和埃塞俄比亚东南的索马里属地五块并立的格局，列强对非洲之角的争夺遂告基本结束。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瓜分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列强不但把它当作进一步扩张的据点，而且还着手进行治理和开发。二是殖民侵略从沿海深入到内地。殖民者所占据的已不再是某座孤城，而是大片土地。三是列强在瓜分中竞争激烈。老牌殖民国家英法决不放松对非洲之角的争夺，后起的意大利更具疯狂性，甚至连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俄也不甘落伍，加入了瓜分的行列。四是英勇的非洲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和索马里哈桑大起义。

二、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

正当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瓜分东北非地区的时候，孟尼利克于1889年继约翰四世之后，登上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的宝座，从而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近代化最关键的阶段。他之所以能对国家近代化做出超越前人的杰出贡献，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是西奥多二世改革事业的自觉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比那位先驱者站得更高，做得更自觉、更策略。

孟尼利克二世1844年生于绍阿省盖拉人地区的安哥拉拉，其父海尔·马拉科特是绍阿国王。11岁时，绍阿王国被西奥多二世所灭，他被带回马格拉达，生活在宫廷中。在西奥多二世身边，他耳濡目染，既获得了可贵的治国经验，又深受改革之风的熏陶，萌发了推进近代化的理想。他既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又汲取了西奥多二世对外犹疑软弱、内部分裂割据而终于导致改革失败的教训。西奥多二世对这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十分器重，但孟尼利克

仍然思恋故土。1865年，他秘密逃离马格拉达，在盖拉族头领沃格特夫人帮助下回到绍阿省，宣布继承王位。从重掌绍阿大权之日起，孟尼利克便以实现国家近代化为己任，励精图治。

1868年，西奥多二世兵败自杀，埃塞俄比亚陷于分裂和割据的局面。1872年1月21日提格雷的卡萨称帝，号约翰四世。此时孟尼利克的势力已有很大发展。为获得他的承认，约翰四世与他在1878年3月签订条约，规定孟尼利克对约翰四世称臣纳贡，并在国家作战时提供军队；承认孟尼利克为绍阿国王，其势力范围北到巴希洛河、西到阿贝伊、东南到阿瓦希。孟尼利克并不就此罢休，而是积极与意大利联系，扩充自己的实力。1882年，约翰四世不得不与孟尼利克重新签订条约，承认孟尼利克向东南方的征服，并用12岁的王子阿利亚·塞拉西和孟尼利克7岁的女儿扎迪图订婚的办法维持双方的政治联系。1889年3月10日，约翰四世在梅特马与苏丹马赫迪军队作战时中流弹身亡，临终前指定曼加夏继承王位，由忠诚善战的将领阿鲁拉辅佐。然而，孟尼利克却在大多数封建王公和意大利支持下，加冕为“万王之王”。

孟尼利克为防止提格雷的曼加夏重新争夺王位，希望意大利承认其为“万王之王”。意大利也认为自己在孟尼利克取得王位中有所贡献，想在其称帝后有所收获，希望通过一可靠的傀儡皇帝实现自己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于是，1888年9月意大利草拟条约初稿，经多次磋商后于1889年5月2日签订乌查里条约，全称《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永久和平友好条约》，共20条。意大利正式承认孟尼利克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并允许埃塞俄比亚从马萨瓦免税进口军火；埃塞俄比亚将提格雷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意大利，并给予其商业、工业、司法上的特许权。意大利对此并不满足。6月2日，意大利将军安东尼奥·巴尔德赛拉挥兵迅速占领克伦，8月3日占领阿斯马拉，不久又长驱直入占领哈马西安省的余部以及奥库勒—库赛伊和赛勒两省。在军事占领的同时，10月1日意大利又与埃塞俄比亚签订补充协定。意大利要求以实际占领线划定埃塞俄比亚和意属厄立特里亚的边界，而意大利为埃塞俄比亚提供400万里拉的借款，以哈拉尔关税作保，否则将哈拉尔割给意大利。

主要问题发生在乌查里条约第十七条。该条规定，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在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时，可以借助意大利国王陛下政府。意大利殖民者采用欺骗手段，将阿姆哈拉文本中的“可以”篡改为意大利文本中的“务必”。意大利在1889年10月17日单方面根据柏林会议总协定，向欧洲各国宣布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的保护国；1890年2月又将意大利文本公布在“绿皮书”

A.H.M.Jones & E.Monroe, op.cit., p.139.

意大利政府和殖民主义史学家认为，这是孟尼利克的计谋。签约之前，他要寻求意大利的帮助，取得皇位继位后，则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想签约，但又想回报意大利的支持，所以故意不发现两个文本的不同，为以后毁约留下伏笔。还有一派史学家认为，这纯属误译。意大利本来就没有变埃塞俄比亚为保护国的意图。现经多位史学家大量深入研究各方面档案材料，基本得出一致结论，即这是意大利有预谋的一次行动。参见 Sven Rubenson, The Protectorate Paragraph of the Wichale Treaty (《乌查里条约的保护条款》),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 (1964), p.243 - 283. Sven Rubenson, Professor Giglio, Antonelli and Article xv of the Treaty of Wichale (《安东尼利和乌查里条约第17条》),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3 (1966) P.445 - 457 Carlo Griglio, Article 17 of the Treaty of Ucciali (《乌查里条约第17条》),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 (1965), p.221 - 231.

中，以此换得欧洲列强的认可；同时继续向内地蚕食，1890年1月26日占领了阿杜瓦。对意大利的这种行为，欧洲国家反应不一。英国基本同意，在当时英国出版的地图上，埃塞俄比亚被描画为“意属阿比西尼亚”。法国和俄国一直同意大利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所以持反对态度。对意大利要以实际占领线划定边界这一要求，埃塞俄比亚统治集团内也意见不一。皇后泰图就曾质问孟尼利克：“约翰皇帝从不割让领土，因此而与意大利人和埃及人作战，他为这一原则战死。在这个榜样之后，你愿意卖掉自己的国家吗？难道还要人教给你历史吗？”。促使孟尼利克发现意大利阴谋的是，当孟尼利克通知欧洲列强准备在1889年11月3日加冕皇帝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答复是：“我们将把您的信件和我们的答复文本邮给我们的朋友、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孟尼利克遂让阿尔弗雷德·伊尔格对比阿、意两种文本，发现其中有诈。孟尼利克立即把这一欺骗行为通知欧洲列强，要求意大利改正其错误并晓谕欧洲各国。1890年9月27日，他又致书意大利国王，表示“由于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我在签约时说过，请意大利君主受理我国在欧洲的事务，但是我从未签订条约来限制自己必须这样做。”意大利对此非常恼火。早在这年8月，他们就认为：“战争是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唯一可能之办法”。但又假惺惺地派安东尼利于12月18日到埃塞俄比亚和解，企图迫使埃塞俄比亚承认既成事实。泰图皇后义正辞严地驳斥道：“我是一个妇人，我不喜爱战争，但比起承认这个条约来，我更喜欢战争。”“你想要其他列强把我们看作是你们的保护国，这绝对办不到！”。1891年2月12日，安东尼利灰溜溜地离开绍阿。意大利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迅速将扶植绍阿的政策变成支持提格雷之曼加夏反对孟尼利克皇帝的政策。克里斯皮说：“从现在起，就要鼓励那些觊觎王位者来反对他”，只要他“不存在了，这个帝国就会分裂成南北两半，……最后都会置于意大利的崇高保护之下”。如果这样做不能成功，那就采用“拿破仑一世的方法征服这个非洲古国”。1891年4月，孟尼利克再次写《致欧洲列强书》，指出：“如果远方的列强前来瓜分非洲，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表达了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1891年12月8日意大利与曼加夏签订条约，同意意大利兼并赛勒和奥库勒—库赛伊。面对这种情况，孟尼利克毅然在1893年2月12日最终宣布废除乌查里条约；2月27日再次通知欧洲列强：“埃塞俄比亚不需要任何国家帮助，她只受上帝的保护。”

早在孟尼利克发现条约有诈之时，他就预感到战争不可避免并积极进行了准备。一方面，他利用法俄的反意情绪，购进大批军火装备军队，并接受法俄的军事代表团，谋求国际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先后征服了阿瓦什、锡达莫、沃拉莫、咖法等地，竭力保持并增强国家统一，以便集中全部国力与意大利决一雌雄。1893年2月，意大利又派出一个代表团，携200万发子弹

L.H.Gann & P.Duiganan, op.cit., vol. 1, p.430.

L.H.Gann & P.Duignan, op.cit., p.430.

L.H.Gann & P.Duiganan, op.cit., vol.1 p.431.

L.H.Gann & p.Duignan, op.cit., vol.1, p.431.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35页。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前引书，第235页。

A.Adu Boahen ed; op.cit., vol.7, p.270.

前来谈判。孟尼利克收下了“礼品”，但付了钱。意大利这一行动客观上不但起到了给孟尼利克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且还破坏了提格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埃塞俄比亚诸侯之间的团结。曼加夏怕意大利与孟尼利克修好后自己两边都不讨好，于是干脆致书巴拉蒂里将军，宣布：“我准备承认绍阿国王孟尼利克为万王之王。”1894年6月9日，曼加夏到亚的斯亚贝巴，背负石板，跪在孟尼利克膝下请罪。孟尼利克接受并任命他为提格雷省督，镇守北疆。这样，在战争开始之前，埃塞俄比亚已基本解决了军力疲弱和国家分裂两大主要问题。其军队已拥有82000支枪、28门加农炮，具有相当的战斗能力。加之在国际上有法俄的支持，这就形成了全国基本上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

1894年12月，曼加夏在提格雷集结军队，巴拉蒂里要求其立即解散，曼加夏坚决拒绝。于是意大利军队在内部颠覆无效之后，越过马累波河不宣而战，先后在散纳夫、萨加莱蒂和亚的斯亚迪、亚的凯埃等地建立坚固据点。1895年3月，巴拉蒂里抢占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进而占领阿杜瓦。一路顺利进军，使巴拉蒂里得意忘形，他吹嘘说：如果再多给他两营士兵和几门大炮，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活捉孟尼利克，并将他装在笼子里带回罗马。在意大利侵略气焰日甚一日之时，孟尼利克没有仓促行事，而是继续做好最后决一死战的充分准备，加紧筹集军火和兵力。当意大利向孟尼利克发出最后通牒时，“万王之王”也在1895年9月17日向全国颁布了《告人民书》，指出：“敌人从海外入侵，他们侵扰了我们的国境，妄图消灭我们的信仰，破坏我们的祖国。为了爱惜我们最近几世纪遭受如此深重灾难的国家，我忍受着一切，同他们进行了长期谈判，但是敌人却象鼯鼠一样得寸进尺，……危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已忍无可忍！我要采取行动捍卫国家，抗击敌人。……大家都快跟我来参加战斗，保卫祖国，人人出力！”

诏书发布后，埃塞俄比亚人民迅速动员起来，踊跃参军、捐献粮食和衣物，还捐款200万银元。据估计，当时埃塞俄比亚全国已有一支配备10万支来福枪、由盖拉人组成的精锐骑兵和配备400门加农炮的大军。

1895年12月7日，马康南公爵率军在阿姆巴·阿拉吉击败了托塞利少校指挥的意大利军队。12月8日，埃塞俄比亚军队猛攻马卡累，马康南本人身先士卒，试图一鼓作气攻克这座坚固的要塞。埃塞俄比亚士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有的竟冲到堡下企图用锄头捣毁堡墙而壮烈牺牲。1896年1月23日，意大利军队被迫弃城撤往阿迪格拉特。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孟尼利克提出议和，意大利方面毫不妥协，坚持要满足其非份的要求。孟尼利克感叹地说：“我觉得再也不能与意大利人打交道了，从现在起，没有哪个人会认为能满足意大利人的胃口。”和谈无望，这就把一些仍持犹豫观望态度的诸侯也逼到孟尼利克一边。埃塞俄比亚各阶层都下定誓死一战的决心，整个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团结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疆场。

意大利侵略者对一个古老的非洲国家能凝聚多大的抵抗力估计不足。在本国资产阶级狂热的好战压力与鞭策下，巴拉蒂里在1896年2月29日晚贸然驱兵前进。意大利军队约有20000人，能为巴拉蒂里指挥作战的约有17700人，其中10596是欧洲人，他们装备精良，共有14519条枪、56门大炮。但埃塞俄比亚集中力量迎击来犯之敌，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其军队约有

A.Adu Boahen, op.cit., vol.7, p.4.

L.H.Gann & P.Duiganan, op.cit., p.435.

120000人，配备有80000条枪、8600名骑兵和42门大炮。侵略军既不熟悉战场地形，又缺乏精确的地图，在阿瓦洛姆向导的引领下钻进了孟尼利克设下的埋伏圈，并被分割成三块。埃军士气高昂，士兵们高呼“为了祖国！为了皇帝！为了信仰！”对敌人发起决死冲锋。意军惨败，约4000名欧洲人和2000名土著士兵战死，1428人受伤，伤亡约达参战部队总数的43%，还有1800名意大利人被俘。埃塞俄比亚共计死7000人、伤10000人，伤亡率是参战部队的14%。五个月后，意大利求和。经多轮谈判，双方终于在10月26日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意大利被迫放弃其侵占的土地，宣布废除乌查里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绝对的独立，并赔款1000万里拉。

阿杜瓦一战，在非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自汉尼拔以来非洲对欧洲取得的最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提高了孟尼利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声望。意军的惨败在欧洲引起一片哗然。意大利的克里斯皮内阁随即倒台，英国议会也出现了要求修改对埃塞俄比亚政策的呼声。西方舆论惊呼：“不敢想象，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和士兵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难。”痛定之后，意、法、英、俄等国相继与埃塞俄比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阿杜瓦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殖斗争。波兰旅行家波托基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其邻居对欧洲大国取胜后的种族骄傲和自豪”洋溢在索马里人民心中。1900年，南非还出现了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想和英勇的埃塞俄比亚人民一样，用自己的战斗捍卫民族和传统文比的独立。海地和美国的黑人都曾先后到埃塞俄比亚游历考察，寻求灵感和启发。

在帝国主义疯狂瓜分非洲的时代，非洲人民大多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为什么唯独埃塞俄比亚能取得如此壮观的胜利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第一，欧洲列强之间在对非洲大陆的瓜分和对苏伊士—红海—印度洋海上生命线的争夺上矛盾重重。出于战略考虑，英、法、意不想让任何一国独占埃塞俄比亚。孟尼利克利用了这些矛盾，趋利避害，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战争开始时，他利用法国和俄国反对意大利，甚至用意大利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反对意大利侵略。他说：“如果欧洲人来我们国家时带给我们文明，我们当非常感谢他们，但他们必须不使我们失去主权，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文明中对我们最有用的方面”。由于成功地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客观上减轻了埃塞俄比亚的抗战压力，增强了自己的抗敌实力。

第二，意大利在非洲难以倾全部国力和军力，而埃塞俄比亚可以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奋力一搏。在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已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不占优势，有些方面已处于劣势；加之其战术失误，贸然进攻，结果以疲惫之

L.H.Gann & P.Duiganan op.cit., p.437.有关阿杜瓦战役双方军队人数和伤亡数还有多种记载，典型的有：
(1)意大利军队17000人，死伤11000人，被俘4000人；埃塞俄比亚死6000人，伤10000人。参见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870—191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10页。(2)意军44500人，死8000名意大利人、4000名土著，被俘1865人。参见A.H.M.Jones & E.Monroe, op.cit., pp.144-145。(3)意军17000人中有40%以上伤亡，其中261名意大利军官、2918名意大利军士和士兵，2000名土著军人死亡，954名意大利人失踪，470名意大利人，958名土著人受伤。参见A.Adu Boahan op.cit., p.272.Richard Pankhurst,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经济史》)，Addis Ababa 1968, p.23.

A.Adu Boahan, op.cit., vol.7, p.279.

师落入那些以逸待劳的士兵组成的埋伏圈。孟尼利克在这场战役中充分展示了他知己知彼、并善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军事才能。阿杜瓦战役后，孟尼利克仍然不忘加强军事力量。1902年庆祝阿杜瓦大捷阅兵时，估计有60万部队出现——约比总兵力少10万人，其中9万是帝国正规军，所有部队都用现代化武器装备，配有步枪、机枪、加农炮。英国旅行家约翰·鲍因斯记载道，在20世纪初，“阿比西尼亚人是非洲武装得最好的土著种族，任何外来强国都不能简单地使之臣服”。

第三，最弱的帝国主义国家遇到了最强的非洲国家。意大利1871年才完成国家统一，虽发展迅速，但与老牌的英法帝国主义相比还是一个弱国。正由于它脆弱，因而在瓜分非洲时更有一种不自量力的贪婪。在侵略埃塞俄比亚时，它的这些弱点充分暴露。自身的缺陷是决定意大利失败的必然原因。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能抵挡住意大利的侵略，主要是自西奥多二世以来历代皇帝推行的近代化改革增强了它的国力，使之在非洲大陆上鹤立鸡群。而在阿杜瓦战役胜利后，埃塞俄比亚的近代化进程又进一步加快了。

三、孟尼利克领导的埃塞俄比亚近代化

埃塞俄比亚历来是封建割据，诸侯林立。孟尼利克加冕后，一方面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压服反抗者，一方面用政治联姻的办法使割据者臣服。阿杜瓦战役使孟尼利克威信大增，一些原来心怀叵测的诸侯也表示归顺，埃塞俄比亚国家达到了空前的大一统。其国家机构分三个层次，即中央、省和区。由皇帝任命的省督既是行政领导，又是法官、当地驻军司令和皇帝的朝臣。省督任命区贵族，贵族的权利是征收贡赋、召集劳动力、统帅本地军队、组织公共工程。皇帝不但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而且还宣扬君权神授。在任命官吏时，高级官员总是由皇帝信任的绍阿人担任，由绍阿人对全国进行间接统治。

1907年10月25日，孟尼利克向列强宣布，在上帝授意之下，他引进欧洲的统治体制，成立内阁。他任命纳西布·阿法为司法大臣，哈卜特·吉奥尔吉斯为军事大臣，凯特马为内务大臣，海里·吉奥尔吉斯为商业和外交大臣，穆内各塔为财政大臣，沃德·撒德克为农业大臣，马康南为公共工程大臣，马塔法里亚为王宫大臣。内阁向皇帝全权负责。为了切实维护 and 强化中央集权，孟尼利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一是加强军事控制。孟尼利克每占领一块地区，就设立被称为“克特玛斯”的驻防城镇。它设在高山顶上，控制着邻近的乡村地区。在设防城镇之间，交通方便，可以迅速集中军队。

二是司法系统化。以前皇帝是终裁，省、区对地方法庭的审理有权干预，所以有些案件就上告到皇帝那里。帝国建立后，皇帝公务繁忙，就把全国的司法分为六大区，每区派两个受理上诉案件的法官和三个法庭书记员组成新的法庭。它独立于地方行政，不受当地压力的影响，从而使司法权力集中化。

三是推行同教政策，推广基督教作为加强统一的纽带。信奉基督教的官

A.Adu Boahen, op.cit., vol.7, p.280.

Harold G.Marcus,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Menelik (《孟尼利克统治的终结》),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 4 (1970), p.572.

吏带着教士和圣经进入新征服地区，在异教徒以前祭祀的地方修建教堂。但孟尼利克对在西南穆斯林地区建基督教教堂有所限制，因为一味推行同教政策会引起伊斯兰教圣战。

四是建设新首都。1887年11月4日，孟尼利克亲自选定费尔沃哈为未来统一国家的新首都，并改名为亚的斯亚贝巴（意为“新花”）。新首都发展迅速，1902—1903年长住居民为5万人，1908—1909年为6万人，1910年已达7万。再加上3—5万临时户口，亚的斯亚贝巴已是一座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了。据估计，当吉布提铁路修到时，这座城市将有10万长住居民、5万临时户口，总人口将达15万。新首都不但规模大，而且迅速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新建首都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行动，意义深远。因为新选的都城比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任何一座都城都更加位于国家的中心，尤其是更靠近新征服的西南和广大东南地区，既便于同全国各地联系，又利于开疆拓土。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强化中央集权。1903年，来埃塞俄比亚签订商约的美国首任外交使团团团长罗伯特·斯金诺形容说：“孟尼利克创立了一个阿比西尼亚合众国”。对埃塞俄比亚政治近代化的这一评价，确有一定的道理。

近代化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在埃塞俄比亚，割据状态和多山的地形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孟尼利克继位后，于1892年首先在绍阿改革了税收制度，创立了专为维持军队给养的什一税，从而解决了军队靠随时随地掠夺农民维持给养这个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老问题。其次，他以把首都建设成国家经济中心为契机，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19世纪末，亚的斯亚贝巴已发展成为帝国境内最重要的市场。据一位西方观察者的记载，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市场上，“有来自国内每个角落的谷物、香料和胡椒，来自哈拉尔和塔纳湖的咖啡，来自青尼罗河畔的棉花，来自白尼·商加尔的黄金，来自盖拉地方的麝猫香，而盐则来自遥远北方的提格雷”，“上等的棉沙玛、黑重火、像毯子的衣服、宝石和武器、马鞍和耕犁，全部汇聚于此”。在这座总是人山人海的大市场上，大约有1.5—2万人（有的甚至估计有3—5万人）进行交易。贸易额也相当可观。每天平均卖出2头骆驼、100头驮骡、12匹走马和10只鸵鸟、25头驴、30头牛、80只山羊和60只绵羊，共计成交牲畜337头，合每年万余头。另外还有百万公斤咖啡。亚的斯亚贝巴市场不但繁荣兴旺，而且与全国各地的市场都有广泛的联系。为适应贸易日益增长的要求，1894年发行第一枚国家货币，1903—1904年在首都设立制币厂，1905年成立阿比西尼亚银行。孟尼利克曾自豪地宣布：“我们国家声誉日增，我们的

Richard Pankhurst, *Menelik and the Foundation of Addis Ababa* (《孟尼利克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建立》),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61), p.115.

这里说的临时户口，指在首都干临时工的人民，其实首都的人口更多。因为每个外地官员都必须到首都一段时间，他带3—5万随从是常有的事。1902年，一个重要的酋长带到首都的人是10—15万。参见 Richard Pankhurst (1961), *op.cit.*, p.114.

Richard Pankhurst (1961), *op.cit.*, p.115.

L.H.Gann & p.Duiganan, *op.cit.*, vol.1 p.454.

Richard Pankhurst, *op.cit.* (1988), pp.396-397.

商业繁荣”。中央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促进了经济近代化，而经济近代化又成为加速整个近代化总进程的动力。

孟尼利克还努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用成果，促进社会近代化。

第一，逐步限制和缩小奴隶贸易。早在 1878 年当孟尼利克还是绍阿王时，在一封写给意大利国王的信中就提到：“有几次征讨盖加拉人时，我的士兵一次掠取了 5000 名奴隶，另一次更掠取了 20000 名奴隶。我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并将这些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全部送回他们的故乡。”即帝位后，他更大力打击奴隶贩卖，曾下令严惩奴隶贩子。1895 年 11 月，一名穆斯林奴隶贩子被判处割去右臂和左腿的刑罚。第二年，又有记载说四名奴隶贩子被处以绞刑。据记载，罗杰城因其居民从事奴隶贩卖而被毁掉，以示惩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吉玛的奴隶市场也被下令关闭。

第二，改进国内交通状况。孟尼利克是一位筑路的热心倡导者，而且象提奥多那样以身作则，常常肩扛石头，参加筑路劳动，后来还引进了蒸汽压路机。1886 年，在阿瓦什修建了第一座桥。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厄立特里亚边境的公路，修得既宽阔又平坦。20 世纪初，又修筑了另一条从首都通往西部亚的斯阿拉姆（意为“新世界”）的公路。孟尼利克还在 1894 年 3 月 9 日开始筹建一条从吉布提首都到白尼罗河地区的铁路，虽几经周折，但最后还是修成了。公路和铁路的修筑不仅可以迅速运兵到全国各地，而且加强了各地之间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商业贸易。

第三，积极创办近代邮电事业。1892 年，孟尼利克表示赞成建立近代邮电制度。次年，他下令设计带有皇帝头像或神狮并印有阿姆哈拉文的邮票；1894 年又颁布了建立邮政制度的法令，同时命令设立邮电局。1895 年，吉布提和哈拉尔之间开始实行每周邮务。1897 年，在法国工程师帮助下，修建了从首都到哈拉尔的电话线。1902—1904 年，在意大利技师指导下，修建了从首都到阿斯马拉的电话线。1906 年，建立中央电报局。1908 年，埃塞俄比亚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邮电系统的设立不但有利于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也便利内部传递信息，加强统治。

第四，发展教育事业，启发民智，了解世界大势。1908 年，在埃及老师帮助下，修建了孟尼利克二世学校，发行了一份阿姆哈拉文报纸。1911 年还成立了国家印刷厂。孟尼利克常和外国人谈论国际形势，从英国的政党政治、英布战争、欧洲的对抗到美西战争，甚至还问到“中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什么进展？他们制造大炮吗？”为了进一步向西方学习，孟尼利克还向瑞士和俄国派遣留学生。除此之外，孟尼利克还于 1897 年建立第一座医院——俄国红十字医院。1898 年颁布告示，要求全体居民接种牛症，以防天花。1907 年在首都建立了第一座近代化旅馆。

提奥多开创的近代化在孟尼利克统治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对外取得了抗击意大利侵略的胜利，对内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但这种近代化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必然带有许多根本性的弱点。埃塞俄比亚本身是一个经历过长期战乱的、带有浓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社会，这一内部条件决定了它背着基本未受触动的封建重负进入近现代。即使孟尼利克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内阁制度，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内阁制度的功能，只想人为地把它嫁接在封建传统上，用于保持皇位和稳定。他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

一些条件，但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把商品经济作为封建经济的补充。这些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问题，因此，埃塞俄比亚在这一传统重压之下，近代化进程必然步履维艰。而国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西方殖民列强无时不以各种形式将埃塞俄比亚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政治上边缘化、经济上依附化、文化上西方化。从根本上讲，埃塞俄比亚的封建主阶级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其近代化进程必然风涛险恶。埃塞俄比亚近代化的种种弱点，将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

四、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大起义

列强瓜分非洲之角，使索马里陷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他们不但抢占最好的土地和牧场，而且重税盘剥，实行强迫劳动制度。人为的分割隔断了同族内的联系，割断了相沿成习的游牧与贸易路线。索马里社会出现一种完全由殖民者造成的退化。哈桑在《赛义德的答复》一诗中揭露了他们的暴行：“是你们，压迫他们，抢走他们的牲畜，

是你们，把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占为己有，

是你们，毁坏了他们的村落，用粪便糟踏他们的住处。

是你们，迫使他们去吃乌龟和野兽。”。帝国主义者还实行暴虐统治。

曾在 1889 年到过塔朱腊湾沿岸地区并亲眼看到法国殖民者对付索马里人的涅斯捷罗夫船长在日记中写道：“拘禁、镣铐、皮鞭——这就是欧洲人对赤手空拳的居民实行暴力的标志。……牢获与虐待威胁着每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面对殖民者这种非人的统治，酷爱自由的索马里人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游牧民族独立不羁的性格。1890 年，用长矛和镖枪武装起来的索马里人民赶走了企图在瓦尔谢克登陆的殖民者。1893 年，索马里人民在梅尔卡打死一名意大利海军中尉。意大利血腥报复，用战舰炮击这个城市。同年，基斯马尤居民打死英国东非公司代表托德，赶走其同伙。1896 年，摩加迪沙居民杀死了横行霸道的意大利殖民官吏 10 余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索马里人民反抗的规模愈来愈大，终于导致 1899 年哈桑大起义。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 1864 年 4 月 7 日出生于英属索马里杜尔巴汉特部族居住区，祖父是位教长，父亲哈桑·努尔是贫苦农民，1826 年从欧加登迁往杜尔巴汉特部族居住区。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他 7 岁便会读古兰经，19 岁即获得教长称号。为开阔视野，他离家远游，先后访问了哈拉尔、摩加迪沙、内罗毕和苏丹的科尔多凡。1894 年，哈桑朝觐麦加，亲受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的教诲，加入属于艾哈迈德兄弟会的萨里赫教派。1895 年，他返回索马里，先在柏培拉，不久即回到杜尔巴汉特传教。

促使哈桑领导起义的除了上述反殖民统治的要求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痛恨正在侵蚀索马里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基督教。据说有一次，哈桑等人在教堂附近遇到一群孩子，问一个男孩叫什么名字，那个孩子回答说“约翰”，问及他们是哪个部落的，孩子们竟然说“神甫们的部落”。哈桑

Andrzejewski & Lewis, Somali Poetry 《索马里诗集》，Oxford 1964, p.78.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下册，第 523 页。

大为震惊，对基督教殖民化毁灭穆斯林信念极为愤慨。他到处大声疾呼，索马里处于危机中。二是他游学期间便接受了穆斯林复兴主义思潮。受苏丹马赫迪起义的影响和启发，哈桑决定号召人民起来赶走异教徒，并开始筹备武装起义。

哈桑一方面赶制铁矛和弓箭，并发动募捐，以购买新式武器；另一方面又成立了索马里各族联合组成的军事指挥部，宣布违犯军令者不分部落均按军法处置，还允许妇女参军。这些措施打破了影响索马里数世纪之久的血缘界线，而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纪律把各族人民组织起来。1899年上半年，义军迅速扩大到5000人，其中4000多人有武器。1899年8月，哈桑在北部重镇布劳召开有各族、各阶层人员参加的誓师大会。他宣布自己是马赫迪，要领导索马里人民对异教徒进行圣战。9月1日，他致信英国驻沿海地区总领事，说：“你们毫无道理地压迫我们古老的宗教。……现在，你要打仗，我们奉陪；你要和平，就缴出罚金。”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哈桑为叛乱者，于是哈桑大起义爆发了。

哈桑采取高度灵活和出其不意的游击战术，用流动性强的骑兵队伍迅速控制了整个英属索马里。英国绝不允许起义蓬勃发展，但迫于英布战争在即，只得命英属索马里当局组织土著军队讨伐。1901年5月，英国派斯韦恩中校率1,700人的讨伐队对起义军实施攻击。在瓦伊拉赫德战役中，起义军被击溃。7月26日费尔迪丁战役中，起义军又遭到沉重损失，死伤1200人，被俘300人。1902年10月6日，哈桑与英军战于埃拉戈，义军再度受挫。为尽快消灭起义军，英国使用了印度军队和皇家非洲枪队。然而在1903年4月17日，哈桑利用地形巧设埋伏，打退了英殖民军司令曼宁将军发动的钳形攻势，取得了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贡布鲁山大捷。战斗异常激烈，一位英国随军记者写道：“进攻的骑兵犹如波涛滚滚，淹没了阵地前沿。他们发出‘安拉！安拉！安拉！’的呼声……（英国）来福枪坚硬的子弹根本不能阻挡这些狂热信徒的进攻”。这一仗共消灭敌军近200名，其中包括9名英国军官。1904年1月9日，双方再战于吉德巴利。义军不幸失败，哈桑率众从英属索马里退入意属索马里，并提出四点议和条件：(1)在意属索马里划出一块固定的住地；(2)继续统率自己的军队；(3)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4)经济上享有独立地位。当时，英国无法消灭义军，只得满足于把义军赶到远离自己的统治区。意大利当局因阿杜瓦战役的余悸尚未消除，害怕起义再度蔓延，于是也同意议和。1905年3月5日，哈桑在伊利格同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佩斯洛齐签订和约。起义者获得了一块北邻米朱提因素丹国、南邻奥比亚索丹国、包括诺加尔河谷和伊利格港的楔形土地，并享有到英属保护地境内放牧的权利。起义者也作出让步，答应停止对英意作战，同意接受意大利保护。

和平局面只维持了三年。哈桑利用和平协议进行休整，补充力量，力图东山再起。他一方面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到处煽动反英反意情绪；一方面用自己创作的富有激情、广为传诵的优美诗歌争取各族人民的支持。意大利殖

Robert Hess, The 'Mad Mullah' and Northern Somalial (《“疯子毛拉”与北索马里》),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5, no.3 (1964), p.419, not 12.

宁骚：《索马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武装起义》，参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四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638页。

民当局看到义军又一天天壮大起来，心中不安，于是在 1908 年对义军居住区实行经济封锁，首先破坏了伊利格协定中贸易自由的条款。同时英国也在 1908 年 1 月派遣远征队，讨伐积极援助起义军的瓦尔桑格里族。对此哈桑发出严重警告，但英意毫不理睬。哈桑忍无可忍，领导义军从伊利格重新出击，攻入米朱提因素丹国，随后打回英属索马里。

英意殖民者再次联手，策划反对哈桑的阴谋。他们勾结因哈桑不允许他与米朱提因妇女结婚而叛变的义军高级将领阿卜杜拉·沙哈里，使其出使麦加，请出哈桑的老师萨里赫来劝降。1909 年 3 月，沙哈里在伊利格发出了萨里赫给哈桑的信，指责哈桑和他的追随者“袭击群众，劫掠百姓，霸占被他们杀死的人的妻子和财产。……我不能宽恕这些行为，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教规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训令”，“必须立即改邪归正”，否则“将受到正义之惩罚。如再不悔过自新，就要断绝关系，革出师门”。这封信在起义队伍中引起了小小的混乱和分化，但起义军的力量仍然强大，足以对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构成严重威胁。1909 年 4 月，殖民政府又派温加特和斯拉廷帕夏前来劝降，悻悻而去。起义军不断出击，英国军队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于 1909 年 11 月 12 日从内地撤退，龟缩在柏培拉、泽拉等三个殖民据点。英国议员里斯说，这些事件正在影响“苏丹、尼亚萨兰、乌干达、亚丁，远远超出索马里的范围”。

英国并不甘心失败。1912 年建立了一支由 150 人组成的骆驼保安队。意大利也很担心哈桑向南攻击，于是在米朱提因部落中建立军队，一是用于直接对付哈桑起义军，二是保护贝纳迪尔海岸不受侵犯。1913 年 8 月 9 日，英国派理查德·科菲尔德率骆驼保安队向内地征讨，在杜尔马多贝被彻底击溃，科菲尔德当场毙命。伦敦报纸称这一仗为“我军在索马里遭到的一场可怕的灾难”。哈桑教长赋诗《理查德·科菲尔德之死》，记载了这场著名的战斗。1913 年 1 月，哈桑将司令部迁至塔赫勒。该城由 13 个石建堡垒组成，每堡墙厚 3.60—4.27 米，墙高 18.29 米，离城堡 500 英尺远还有 3 个 60 英尺高的望塔。哈桑准备进行长期防御战争，这标志着哈桑起义的高峰已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要全力以赴投入欧洲战场上的大厮杀，英国大体上在索马里采取守势。只是在 1915 年 2 月，殖民当局攻占了义军的西姆柏柏斯要塞，在义军外围防守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同时英国人采取的海岸封锁措施也收到效果，基本上断绝了义军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弹药的来源。为最终把欧洲人赶出索马里，哈桑积极与新即位的倾向伊斯兰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埃雅苏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得到反对英国的德国与土耳其的支持。1916 年 8 月，埃雅苏从哈拉尔派人到塔赫勒迎娶新娘，同时还专门派一名德国军械师来义军总部帮助提高军队装备，企图以此打破武器封锁。但由于遭到罕见的灾荒，整个英属索马里保护地人口死亡 1/3，所以，起义军仍然很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卷土重来，全力镇压索马里起义军。1920 年初，在意大利殖民当局的紧密配合之下，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

Robert Hess, op.cit., p.424.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下册，第 527 页。 E.R.Turton, The Impact of Mohammad Abdille Hassan in the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 (《哈桑的影响在东非保护地》)，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5, x, no.4 (1969), pp.641-657.

刘易斯：前引书，第 152 页。

英军连续发动陆、海、空联合攻势。2月1日，英军逼近塔赫勒，2月12日攻陷该地。起义军撤往欧加登地区，一面重整旧部，一面招募新兵，并于5月在法凡河上的格拉赫建立总部。英国殖民当局再次想用劝说诱降的办法平定起义。英国总督写信给哈桑，表示可以特赦。同时派出由伊萨克部落上层与宗教人士组成的使团到格拉赫，以允许他在西部建立受英国节制的一个宗教区为条件进行诱降。哈桑不但不为所动，还怒斥这些人是“命中注定愚蠢如驴”，更主动出击亲英的伊萨格人。7月，英国派3000人的军队深入欧加登。起义军再次战败，于10月底撤往埃塞俄比亚境内，在谢贝利河上的伊米重新建立新堡。12月21日哈桑因病去世，起义遂告失败。

哈桑是一位诗人和神学家。他的诗作是索马里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思想、神学宣传与实践皆出于一个崇高的目标即为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使索马里免遭基督教的破坏。在这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激情支配下，索马里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民族、部落的界限，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政治斗争。因此，哈桑又是索马里人民值得骄傲的、反对外来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象征，是最著名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

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又将哈桑锻练成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军事家。哈桑虽将许多军事的民政事务交给自己的亲信们去处理，但他并未建立起一个有着完整等级制度的神权国家，也没提出根本改变索马里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纲领。所以，他所建立的只是个人的神权领导与统治。但哈桑努力使其追随者用对事业的忠诚来代替传统的对氏族或部落的忠诚，这在索马里的历史发展上是一种崭新的境界，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据英国材料说，哈桑死于1920年11月23日；意大利材料说，死于1921年1月；哈桑的儿子宣布其父死于1920年12月21日。Robert Hess, op.cit., p.431, not 61.

第二十四章 马格里布：瓜分和反抗

在瓜分非洲的高潮时期，殖民主义制度从阿尔及利亚扩展到了整个马格里布（突尼斯 1881 年，摩洛哥 1911 年，利比亚 1912 年）。除利比亚和摩洛哥北部一小片地区为意大利和西班牙侵占以外，马格里布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鉴于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直接统治付出了很大代价，法国对马格里布的统治方式有所改变。它在突尼斯和摩洛哥都实行所谓保护国制度，即在保留这两个国家原有政权的外表下，把统治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通过操纵傀儡政权进行统治的方式和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直接统治的方式在本质上毫无二致，而且更具有欺骗性。

这一时期，在沦为殖民地较早和较发达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随着殖民势力的深入，旧的农村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形成，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以农民和山区部落民为主力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不再是反殖民斗争的唯一形式，民族运动的重心逐步向城市转移；以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组成的民族解放组织以城市为中心广泛开展活动。

在沦为殖民地稍晚（20 世纪初）的摩洛哥和利比亚，人民群众对外国入侵者展开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抵抗，他们的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得到了各国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广泛声援和支持。

一、法国侵占突尼斯

1877 年赫雷丁的去职，标志突尼斯统治阶级挽救危亡的努力宣告破产。继任首相的穆斯塔法·本·伊斯梅尔是个保守派，他废弃了赫雷丁的改革，突尼斯再度陷入混乱状态。他在政府中安插亲信，卖官鬻爵，勒索钱财。由于农业歉收，穆斯塔法一伙挥霍无度，突尼斯财政再度陷入困境，不但所欠之债无法归还，而且连官吏的薪俸也一再拖欠。在对外政策上，穆斯塔法抛弃了赫雷丁的平衡政策，执行亲法路线。

在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法国最初的竞争对手是英国。法英两国在北非早就存在着矛盾。法国一直试图从阿尔及利亚出发，建立一个东到突尼斯、西到摩洛哥、南穿撒哈拉沙漠、连接中非和西非的殖民大帝国；而英国则希望在它到印度的海路沿岸不要出现强大力量。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对突尼斯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放弃了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把注意力更多地移向地中海东部。英国希望在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时得到法国的合作，暗示以突尼斯作为补偿。1877 年，英、法、俄之间订立了一个非正式协定。根据该协定，三国都可以在“奥斯曼这个樱桃上咬一口”。英国的目标是塞浦路斯；俄国的目标是高加索山区的三个奥斯曼行省；虽然这只是一个关于中东的协定，但法国却从中看到了它可以在北非加紧行动的暗示。然而，完成了国家统一的意大利这时参加了在突尼斯的角逐，成为法国的主要对手。在意大利看来，它比法国更应该占有突尼斯。因为两国相距很近，意大利在突尼斯的侨民也比法国多。而且意大利的商业和

工业资本在突尼斯也有很强的势力，1879年进入戈莱塔港口的683艘船只中就有500多艘是意大利的。在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英国直言不讳地向法国表示它可以占领突尼斯，以换取法国对英国侵占塞浦路斯的承认，索尔兹伯里对法国全权代表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就把突尼斯拿去吧，总不能让迦太基控制在巴巴里海盗手中。”。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支持法国侵占突尼斯，希望以此来抚慰法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的伤痛，并转移它对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注意力。此外，俾斯麦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就是企图在法意关系之间打下一块不和的楔子，以便拉拢意大利。俾斯麦这一目的后来果然达到了，1881年法国侵入突尼斯后，愤怒的意大利于次年同德奥结成了三国联盟。

为了使法国可以放手在突尼斯采取行动，1879年，英国以行政改组为名，撤换了它驻突尼斯的总领事伍德。

1880年，意大利从英国人手里购买了从突尼斯首都到戈莱塔铁路，这一行动促使法国下决心尽快对突尼斯下手。对于法国来说，剩下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入侵的借口，而这个借口是不难找到的。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鲁斯唐在1880年写道：“我们每星期都能够在边境上找到一个开战的理由，就看我们怎样去利用它了。”1881年2月，法国指责居住在突阿边界的突尼斯赫鲁米尔部落侵入了阿尔及利亚。4月，法国议会通过对突尼斯采取边界行动的决定。法国拒绝了贝伊自己处理这一事件的请求，不顾意大利和国内反殖民主义者的强烈情绪，于4月24日派出两个纵队共计30000人越过突阿边界侵入突尼斯，另外一个8000人的海军陆战队也在比塞大（今宾泽特）登陆，直逼突尼斯首都。5月12日，法军进入贝伊宫殿，鲁斯唐向贝伊提出，要么退位，要么在承认突尼斯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上签字。在法国的压力下，贝伊于1881年5月12日签署了著名的《巴尔杜条约》。当时一位名叫若塞普·雷纳施的目击者对这一事件留下了一段生动的记载：

“穆罕默德·艾尔·萨迪克贝伊在法国领事的要求下同意作为布雷亚尔将军的一名听众。

将军和他的随从穿过花园，在宫殿前下了马，然后进入觐见厅。鲁斯唐先生已经在那儿等候他们。在被引见给贝伊后，军官们各自入座，布鲁亚尔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当众宣读了下面一段话：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希望通过一项善意的安排，结束目前存在的麻烦，这项安排将对贝伊陛下的尊严予以充分的保障。我有幸被选派来担负这一使命。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希望陛下继续在位，并将支持您的王朝。用任何方式损害现政权的领土完整都非法国的利益之所在。法国的唯一要求就是尽一切可能来确保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得以延续。

贝伊无可奈何地听完这项条约的十项条款，然后要求留些时间让他考虑考虑。将军平静地回答说：我要在八点钟以前得到您的答复。贝伊说他必须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 1964, vol. 22, p.55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7, p.180.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85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83.

原名《法国和突尼斯保证条约》，因订于巴尔杜，故名。

同内阁会议商量，这一点时间是不够的，将军回答说：我们必须在今天得到答复。鲁斯唐先生指出条约中所有的条款都和现在也在场的穆斯塔法首相讨论过，内阁会议已就这些条款进行过详细的辩论。因此，政府必须现在下定决心。穆罕默德·萨迪克再次表示反对。布雷亚尔将军重申他必须在当天得到答复，延长时间会违背他从共和国政府那儿接到的明确的指示。他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延长一小时，到当天晚上九点钟为止。

两小时后，条约被签定了。”

根据《巴尔杜条约》，法国表示尊重其他列强以前和突尼斯签订的条约，但以后不经法国同意，贝伊不得和任何别国签订新约；法国将管理突尼斯的财政和外交；在条约中，还没有使用“保护制”一词，法国声称它只是“暂时”占领突尼斯。

二、法国保护国制度统治下的突尼斯和突尼斯人民的斗争

巴尔杜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年，1882年10月，穆罕默德·萨迪克去世。根据突尼斯继承法，他的兄弟阿里继位。阿里于1883年6月8日和法国签订了新的协定，根据该协定，突尼斯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很快承认了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唯有奥斯曼土耳其拒不承认。虽然1910年5月19日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曾达成一项划定突尼斯和黎波里塔尼亚边界的协议，但直到1923年洛桑会议之后，土耳其才正式宣布放弃它对突尼斯宗主权的要求。

按照国际法，在法国保护下的突尼斯，其地位介于独立国和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之间。突尼斯形式上仍保留了原来的行政机构、军队、国家元首（贝伊）、国旗和国徽，仍然用它自己的法律来治理，新的法令仍然用贝伊的名义颁布。但这些都不过是法国人用来掩人耳目的摆设，实际权力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贝伊的法令必须由法国驻突总监签署后才能生效。在突尼斯政府里，外交部长由法国总监担任，军事部长由法国驻军统帅担任；其他各部部长虽然都是突尼斯人，但每个部都安插了一名法国官员，对突尼斯部长起着监视和控制作用。在比较敏感的突尼斯—利比亚边界地区，则一直由法国进行直接的军事管制。地方政府仍然由卡伊德（共有36位）领导，但由代表总监的法国民政督察加以监督，后者逐渐接管了前者的权利。

法国通过外交途径促使英意等国放弃了在突尼斯的领事裁判权，代之以法国法庭处理涉及欧洲人的案件；突尼斯人的案件继续由伊斯兰教法庭审理，但刑事案件由混合法庭审理。

保护制确立后，法国为了独揽对突尼斯的控制权，开始排斥英意在突尼斯的殖民势力。在马尔萨会议上，法国在作出了偿付英意等国债务的担保后，就提议解散由英、法、意三国共同组成的国际财政委员会，由法国单独督促突尼斯进行财政改革。为了确保独占突尼斯市场，法国试图对除法国货物外的所有别的国家进入突尼斯的货物收取高额关税，只是由于巴尔杜条约保证突尼斯与欧洲列强之间现存条约的执行，才未能很快地如愿以偿。意大利和

Magali Morsy, *North Africa, 1800-1900* (《1800-1900年的北非》) Longman 1984, p.200.

该条约全名为《法国和突尼斯调整两国关系条约》，因订于马尔萨，又称《马尔萨条约》，全文见《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3—74页。

英国曾分别在 1868 年和 1875 年同突尼斯签订关税协定，规定这两国进入突尼斯的货物仅征收其价值 8% 的关税。1896 年，意大利和突尼斯 1868 年的条约到期，法国乘机使用外交压力迫使意大利和突尼斯签订新约，接受了较高的关税。第二年，英国也接受了新的关税额。

法国表面上装出尊重突尼斯独立的样子，实际上把突尼斯看成和阿尔及利亚一样的殖民地。它霸占比塞大作为在地中海的战略基地。它还要突尼斯给它提供食品，主要是谷物、橄榄和柠檬果。法国工业和银行资本大肆掠夺突尼斯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法国的罗斯柴尔德财团掌握了矿山的大部分股份，并拥有加夫萨磷矿的开采权，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交通部门，其中包括斯法克斯—加夫萨铁路（这条铁路于 1899 年建成，专门用来运输磷矿）。到 1905 年，磷酸盐的产量达到了 521000 公吨。法国殖民当局通过颁布法令，强行夺取突尼斯土地。1885 年，法国殖民当局以重新登记土地为名，乘机强占了突尼斯大片土地。1896 年的法令宣布，一切未耕种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法国殖民当局所有。为使欧洲移民和资本公司顺利占有土地，殖民当局把土地所有权的案件转交给突双方代表组成的会审法庭审理。结果到 1892 年为止，在突尼斯总共 90 万公顷耕地中，就有 40.2 万公顷在欧洲人大地主和公司手中，其中一半多（24.6 万公顷）分属 114 家大农场。农场大都交给意大利人或突尼斯人经营管理，种植谷物、橄榄和葡萄等。1892 年后，法国人强占土地的过程继续进行，土地上原来的农民和牧民或者被迫离去，或者作为农场工人留下来。1892—1914 年间，又有大约 25 万公顷土地转变为新的农业区。

保护制建立后，突尼斯变成了法国农业和工业原料的产地。殖民者不仅掳走了大量橄榄油、水果、小麦等农畜品，而且输出了大量矿产品。1892—1901 年间，从突尼斯输出了 656669 吨铅、602833 吨锌、555885 吨铁砂、13481 吨锰、4412 吨铜矿。

法国占领突尼斯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官员、商人、资本家和大地主以及他们在突尼斯的代理人构成了社会上层，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压迫突尼斯人民；中间阶层主要由意大利人和马尔他人构成，其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但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人数加起来比法国人多好几倍，但比起突尼斯人则少得多；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是突尼斯劳动人民，他们主要是农民、破产手工业者、牧民和受雇于欧洲殖民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采矿场和其他企业的工人，殖民压迫的沉重负担大多落在他们的肩上。

突尼斯人民广泛开展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在突尼斯农村和边远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了武装斗争。巴尔杜条约刚签订，突尼斯南部和中部地区就掀起了阿里·本·哈利法领导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坚持了两年多，直到 1883 年才完全被镇压下去。在法国殖民者大规模掠夺突尼斯土地的时期，突尼斯农民奋起反抗，他们袭击移民农牧场，放火焚毁移民的房屋。

19 世纪 90 年代，在突尼斯城市里兴起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成员被称为“青年突尼斯人”，领导者是突尼斯赫尔东学院的教授巴希尔·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86.

Magali Morsy op.cit., p.291.

维·卡·达什克维奇：《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24—125 页。

法尔和阿齐兹·萨阿列等人。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场运动的目标仅限于要求和法国人权利平等、立法民主化等等，还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保护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突尼斯欧洲移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也开展起来。1905年，以萨阿列为首的青年突尼斯人和法国移民中的民主运动成员联合成立共和党，该党的目标和青年突尼斯人运动的目标大致相似。法国殖民当局在该党的法国领导人和青年突尼斯人中间进行离间。仅对法国移民的要求给予满足，共和党内的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之间产生了矛盾。1907年，该党发生分裂，以萨阿列为首的突尼斯人退出该党。同年，巴希尔·萨法尔等人组成突尼斯党，1909年从共和党退出的萨阿列派加入了该党，成为激进派。接着，突尼斯党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用法文和阿拉伯文出版《突尼斯人报》，并开始依靠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1912年，首都法资电车公司的电车碾死了一个突尼斯小孩，因而发生了反对欧洲人的群众示威游行，青年突尼斯人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这次运动。法国认为这是企图推翻其在突尼斯统治的运动，便查封青年突尼斯人的报纸，取缔突尼斯党，该党的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

由于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一度处于低潮。

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加强殖民掠夺

1870—1871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开始了欧洲人向阿尔及利亚大量移民和法国殖民主义大肆掠夺阿尔及利亚财富的新时期。

法国企图通过鼓励欧洲移民的迁入来巩固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批法国难民涌入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通过没收大量卡比尔人土地，免费提供土地设立农业中心，以安置移民。到1882年，有4000个法国家庭移居阿尔及利亚获得免费提供的347000公顷土地。此后，殖民当局仍继续向移民敞开大门。一些非法国籍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地中海各岛屿的欧洲人也接踵而来。法国对非法籍的欧洲人实行归化政策，让他们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孩子也根据《归化律》（1889年）自然获得法国国籍。由于大量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欧洲人的数量从1872年的245000人增加到580590人，占总人口的12.9%。

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在阿尔及利亚形成了两种居住区，即主要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的混合区和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公民区。前者完全处于军政当局的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市政组织；后者按照法国社区形式组织起来，由一位市长和选举产生的政务会负责。殖民当局极力帮助移民定居区的发展，却忽视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区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殖民政府的预算主要来自税收。阿尔及利亚人比欧洲移民的纳税负担要重得多，不但纳税的绝对数字大，而且纳税项目也多。除了一般的税收外，阿尔及利亚人还要交纳古兰税和各种执照费。188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提到，阿尔及利亚人纳税总数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6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65.

占税收总数的 75%。尽管大部分税款是阿尔及利亚人交纳的，但却主要被花在移民居住区。欧洲人居住区修建了宽阔的大道、带有音乐台的公园，夏天的夜晚常有乐队在公园奏乐；而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居住区，即便是申请修建一个公共喷水池的贷款也难获得批准。

殖民当局给移民以种种优惠，移民能从当局那里获得土地、贷款和其他帮助。1873 年的《瓦尼埃法令》废除了哈布斯土地和阿尔什土地不可转让的规定，这给殖民者掠夺更多的土地造成了机会。土地被分成小块，成为买卖的对象。该法令引起了土著居民的不满，滥用该法令的现象层出不穷，1890 年被停止执行。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内，欧洲人手中掌握的土地从 48 万公顷增加到 100 万公顷，每年约有 1000 多个农场易手。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阿尔及利亚人沦为欧洲人农场中的雇工。还有的农民只剩下产量极低的小块贫脊土地。移民农场的生产率和阿尔及利亚农民土地的生产率差距很大。1890 年，欧洲移民农场每公顷土地的粮食平均产量约为 3000 公斤，而同一时期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每公顷土地的产量仅约 500 公斤。

1878 年，欧洲葡萄种植业受到葡萄根瘤蚜虫害的打击，葡萄酒价格上涨。阿尔及利亚开始大量移种用于酿酒的葡萄，这一浪潮受到了殖民当局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一些专门进行葡萄种植业信贷的银行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并发展起来。葡萄种植面积由 1878 年的 15000 公顷增加到 1890 年的 110000 公顷，1903 年的 167000 公顷。但是到了 1895 年，一种抗葡萄根瘤蚜虫害的植物引种到法国南部后，法国的葡萄种植业复苏，葡萄酒价格再次下跌。原先借了大量贷款的移民农场受到了银行的控制，土地逐渐向资本主义大农场集中。

虽然法国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掠夺最初主要在农业方面，但随着欧洲移民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巩固，法国资本也开始向其他经济领域渗透。从 19 世纪 60—70 年代起，法国各银行和工业公司纷纷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分支机构。农业银行、法兰西银行在阿尔及利亚的分支机构，以及马克塔铁矿公司、海运总公司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资金雄厚的巴黎联合银行甚至给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提供贷款。

欧洲移民在法国资本向阿尔及利亚渗透的过程中表现活跃，他们参与采矿业、建筑业、运输业等部门的业务活动，并在法国公司的阿尔及利亚分支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移民还开办商业公司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移民中的上层分子成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

19 世纪末，阿尔及利亚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产生，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食品加工业和手工业。他们多半是中小资产阶级，人数不多，资金微薄，根本无法和法国资本竞争，只能勉强维持原状，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至于阿尔及利亚的手工业者，则在宗主国倾销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下不断破产。

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斗争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同化政策。第三共和国委派的第一任驻阿尔及利

Magali Morsy , op.cit. , p.285.

Magali Morsy , op.cit. , p.29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vol.7 , p.163.

亚总督盖东曾露骨地宣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是要满足移民们的合法要求”，至于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已被击败，必须接受我们的统治”。仿照法国的行政区划模式，阿尔及利亚被划分为三个郡。1881—1896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促使阿尔及利亚行政和法国行政一体化。当地的行政事务由巴黎各部分管，总督由法国政府任命，向法国议会负责。阿尔及利亚可向法国议会选举六名议员，但整个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四万人有选举权，这些人几乎全是法国人。法国议会和政府完全根据选举出来的移民议员提供的情况来制定政策，这些政策自然是有利于移民的。

作为被奴役的民族，阿尔及利亚人处处都受到歧视和压迫。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奴役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律，即《土著居民条例》。它列举了27条（后增为33条）阿尔及利亚人可被判刑的罪行，其中包括在法国官员面前态度不恭、未获许可即在阿尔及利亚旅行等等。

消除伊斯兰法律的权威、削弱穆斯林法官的影响，是法国同化政策的一部分。到1874年，穆斯林法官的数量从184个减少到了80个，他们的工作只限于处理家庭纠纷。至于涉及财产和犯罪案件，由对伊斯兰法规根本不熟悉的法国官员参照伊斯兰法规来审理。

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愚民政策，摧残当地的教育事业。在拿破仑三世时期，阿尔及利亚曾建立起一批学校；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学校的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1877年，学校的数目已从原来的36所减少到24所。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开办的学校也处处受刁难，学校的教师要由殖民当局挑选，不服从他们的人不准任教。欧洲移民曾要求关闭三所穆斯林宗教学校，理由是那里的学生在接受伊斯兰法律。

殖民者认为，阿拉伯人是一个劣等的、不可教的种族，因而对他们实施教育是无用的。当局想方设法不让阿尔及利亚儿童上学，而把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培养欧洲移民的儿童。1900年，占全国总人口85%的阿尔及利亚人中只有小学生24000人，而只占人口12.9%的欧洲人一有小学生97000人，占人口1.2%的犹太人中有小学生14800人。受过中等教育的土著人就更少了，1899年，只有86名阿尔及利亚中学生。高等教育的情况更糟，1914年以前，只有一名阿尔及利亚医生是在阿尔及利亚国内培养出来的。即便是这样，还不能消除殖民者的恐惧。反映欧洲移民者观点的《消息报》写道：“见到这么多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实在令人害怕，真不知他们长大了会干些什么？”。从精神上消灭阿尔及利亚传统文化是殖民主义者实行同化政策的一种手段。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甘心遭受奴役和掠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政权的民族斗争继续发展。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些斗争带有一些新的特点。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法令的实施，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在阿尔及利亚迅速发展，阿尔及利亚传统的村社和部落结

Magali Morsy, op.cit., p.284.

Magali Morsy op.cit., p.287.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75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67.据埃斯凯的统计，1900年土著居民入学儿童为25000名。

Magali Morsy, op.cit., pp.287-288.

构迅速解体。农民纷纷破产，失去土地；封建主投靠殖民当局，成为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帮凶。以乡村、山地和部落居民为主力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已很难开展。因此，尽管不时仍有一些零星武装起义在阿尔及利亚发生，如 1879 年的奥雷斯省沙维亚山地人民起义、1881 年的乌拉德·西迪·谢赫部落的第二次起义、1901 年和 1916 年的卡比利亚人武装起义等等，但这些起义都只有局部的性质。

另一方面，随着阿尔及利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采取畸形的殖民形式），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解放斗争的中心逐渐向城市转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尔及利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1911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人中欧洲人有 85000 人，阿尔及利亚人只有 64000 人，他们大部分是与土地还有紧密联系的非熟练工人，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活动并与第二国际有联系的社会组织主要由欧洲人组成，他们歧视和排斥阿尔及利亚籍工人。

这样，在农民破产、封建主背叛、无产阶级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解放斗争的领导权便落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最初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运动，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组织请愿和号召对当局进行消极抵抗等。1912 年，一批在北非受过宗教教育和在法国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组成青年阿尔及利亚党，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带来了活力。他们出版报纸，要求废除《土著居民条例》和禁止殖民官吏的专横跋扈，在人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的西化派，即所谓“穆斯林法国人”，主张在阿尔及利亚普及法语教育，让阿尔及利亚受法国人同化，以便吸收西方文化来挽救阿尔及利亚。针对 1912 年征募土著居民的计划，他们甚至号召接受法国公布的义务兵役法，幻想通过让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军中服役来换取法国给予阿尔及利亚人以法国公民权。他们声称：“我们一定要自愿接受义务兵役，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征募正是我们所要证明的一种信任和标志。”同时，他们继续坚持要求取消《土著居民条例》，普及教育，并要求欧洲人和穆斯林在纳税上一律平等，增加民选议会中土著的代表名额。受泛伊斯兰主义影响的另一派别，在一次大战爆发后倒向土耳其和德国，幻想依靠他们的支持摆脱法国的统治。

五、瓜分摩洛哥和两次摩洛哥危机

摩洛哥的改革受挫后，它已完全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宰割对象。英国控制了摩洛哥大部分对外贸易，并确保直布罗陀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防止法德勾结，提出了英国占领丹吉尔、德国在大西洋占领一处和几处港口的建议，以拉拢德国。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微不足道，但也想染指摩洛哥丰富的矿产，占领沿海港口，因而采取怂恿法国，防止英法结盟的方针。法国则把摩洛哥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法国占领突尼斯后，便向摩洛哥步步进逼。1900 年春，法国占领了摩洛哥通往尼日尔河的图瓦特绿洲。1900 年和 1902 年，通过两次换文，法国和意大利划分了各自在北非的势力范围，双方可以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800—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421 页。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前引书，第 76 页。

自由扩大在摩洛哥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的影响。1904年，英法签署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英国承认，法国为维持摩洛哥的秩序并提供为进行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的改革而可能需要的援助，英国将不阻挠法国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1904年10月，法国和西班牙签署了在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

德国对1904年签订的英法协定大为不满，在它看来，这个协定和俄法联盟一样，也是针对德国的。但由于当时德国在外交上处境困难，意大利不值得信赖，俄法已经结成联盟，它的较可靠的盟友奥匈帝国又忙于处理内部问题，因而在英法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个月，德国并没有急于作出反应。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法国暂时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外交地位有所削弱。同年，法国派出特别代表团去摩洛哥，提出由法国组织摩洛哥沿海港口警察部队，由法国银行团组建摩洛哥银行，并要求摩洛哥素丹把铁路和矿山租让权给予法国，法国还向素丹提出了改革方案。德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作出反击，触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5年3月底，德皇廉二世访问丹吉尔，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讲话，声称摩洛哥素丹是绝对独立的君主，在承认素丹主权的前提下，各国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权利。他表示德国将保卫它在摩洛哥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利益，同时要求摩洛哥素丹拒绝法国的改革方案。

德国坚持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法国当时已清楚地感到德国的军事优势，不愿冒和德国再次发生战争的危险，不得不接受其要求。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阿尔黑希拉斯召开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及摩洛哥等14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德国在会上并没有得到它所希望的支持。在建立摩洛哥港口警察部队、组织国家银行及摩洛哥边境地区的军火买卖等重要问题上，德国只得到奥匈帝国的支持；英国和意大利都支持法国，俄国由于急需法国的大笔贷款也坚定地站在法国一边。大多数国家接受了法国的观点，沿海港口警察部队委托给法国和西班牙负责。作为给德国的一点安慰，会议最后同意派出瑞士监察官参加警察部队工作。德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让摩洛哥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这就使法国在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也使德国有可能在条件成熟时再次提出摩洛哥问题。

阿尔黑希拉斯会议并没有捆住法国的手脚，它继续寻找借口入侵摩洛哥。1907年3月，马拉喀什城一名法国医生被害，法国以此为借口占领了摩洛哥东部的乌季达市地区。同年5月，法国人修筑卡萨布兰卡铁路时损坏了当地穆斯林墓地，几名法国建筑工人被愤怒的市民打死。法国海军于是炮轰卡萨布兰卡，随后又派军登陆占领了该地及附近地区。

法国人的步步进逼和摩洛哥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政策，使摩洛哥举国激愤，部落和山地人民拿起武器抵抗法国入侵，打击卖国的素丹政权。1908年，部落武装进逼首都非斯，素丹阿卜德·阿齐兹潜逃，其弟哈费德继位。

哈费德仍然对法国和西班牙采取妥协立场。他承认前素丹对列强的一切条约义务，1910年以摩洛哥全部关税作为担保，接受了法国一亿法郎的新贷款，使摩洛哥经济更深地受到法国控制。哈费德的卖国政策引起了新的部落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212页、218—219。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237—238页。

起义。1911年4月，部落义军围攻非斯城，哈费德向法国求援。5月，法国派出三万法军占领了非斯、梅克内斯、马拉喀什等一些城市。西班牙不甘落后，也派出舰队开往摩洛哥，登陆部队在北部各港口登陆。

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再次激化了德法矛盾，引起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7月1日，德国向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派出“豹子”号炮舰，以保护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声称，法军占领非斯已使阿尔黑西拉斯协议失效。法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对德国采取直接行动，遭到英国的拒绝。但英国警告德国，没有它的参加，它将不承认对摩洛哥的任何新的安排。德国于是向法国提出了交换看法的建议，法国接受了这一要求。德国这才摊牌，它要法国交出整个法属刚果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法国内阁7月17日拒绝了德国的条件。德国企图以战争威胁来使法国就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7月21日，格雷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认为德国的要求是过分的，德国应对它在阿加迪尔的行动作进一步的解释。与此同时，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声明：如果英国的利益“由于被忽视而受到损害……这种代价换来的和平，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劳合·乔治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国或摩洛哥事件，但他话中所含对德国的警告意味是清楚的。在英国的压力下，德国被迫退让，和平暂时得以维持。但德国感到其尊严受到了伤害。接着几周，法德之间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有两次谈判差点破裂，最后还是由于9月份德国国内出现财政危机才加速了和平解决的进程。1911年11月4日，法德双方签署《关于摩洛哥的专约》和《关于两国在赤道非洲的专约》，德国保证法国在摩洛哥“完全的行动自由”，法国则同意把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土地让给德国。1912年3月30日，法国强迫摩洛哥苏丹订立《非斯条约》，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同年11月，法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法国将摩洛哥一部分地区割让给西班牙。这样，法国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共同瓜分了摩洛哥。

六、摩洛哥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持续发展

法国在摩洛哥的保护统治基本上沿用它在突尼斯的那一套办法。摩洛哥名义上保留了苏丹和自己的一套行政体制，但实权却操在法国总监、民政监督和土著部落的军官们手里。法国总监直接管理外交和军事，有权制订法律。摩洛哥苏丹对城市里的每个帕夏和乡村里的每个卡伊德的位置提出三名候选人，再由法国总监从中挑选一人担任，被选中的大多是那些甘心情愿效忠法国殖民当局的人。帕夏、卡伊德和谢赫负责为殖民者征收赋税，他们可以给自己留下一定比例（卡伊德一般留6%、谢赫留4%）。一些部落还保留有原来选举产生的机构，但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1912年9月，非斯建立了咨询会议，管理市政事务，1914年咨询会议改为市政府。其他城市的市政府也随之建立起来。市政府成员由殖民当局任命，由法国人和当地封建主和买办代表人物共同组成。事实上，摩洛哥全国差不多都处在军事当局的管制之下。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1968, vol.12, p.138.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465—467页。

原名《法国和摩洛哥关于建立正规制度和引进必要改良措施的条约》，因订于非斯，故名。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407页。

在摩洛哥的法国公民享有各种特权，不受摩洛哥政府管辖。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官吏和公司职员，1912年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工商署，其成员通过选举产生。

殖民者在摩洛哥也像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样大肆掠夺土地。到1913年，10万公顷以上最好的土地属于外国人所有。主要的占有者是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主和阿尔及利亚的大财主们。由于外国人占有的土地太多，摩洛哥政府被迫在1914年颁布法令禁止转让村社土地。但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土地掠夺照旧进行。1916年，殖民事务委员会成立，负责把摩洛哥土地分配给法国殖民者。到1918年，欧洲人占有的土地已达17万公顷。

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遭到了摩洛哥全民族的抵抗。非斯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即1912年4月，非斯城的摩洛哥居民和驻军就发动了起义，不久被法军镇压。5月，部落起义军又打到非斯城郊，8月间还一度收复了马拉喀什。法国殖民者在8月12日废黜了越来越不易驾驭的哈费德，选择优素福来取代他。法国殖民军用新素丹的名义与起义军作战，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对付摩洛哥人民，大肆烧杀掠夺，在一些地区甚至动用大炮剿灭摩洛哥人。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摩洛哥人民仍然坚持斗争。法国侵略者遭到很大损失，仅在1912—1915年间就花费了10多亿法郎军费。法国在摩洛哥的伤亡人数连同在法军中服役的阿拉伯人在内，共达4万人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摩洛哥人民继续进行抵抗斗争。最初法国曾从摩洛哥抽调军队去德国前线，但山区部落起义声势日益浩大，建立起了不受法国统治的国中之国。法国后来不仅再也不敢从摩洛哥抽调军队，还不得不从法国国内、突尼斯和西非调来补充军队，摩洛哥实际上已成为法国的第二战场。法国报纸定期刊登来自摩洛哥前线的消息。直到大战结束后，法国才把部落起义镇压下去。

七、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意土战争 和利比亚沦为意大利殖民地

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838年，马志尼就说过：“北非必须属于意大利。”在英国控制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法国占领突尼斯的情况下，意大利人发现“自己处在地中海的死点而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意大利已把利比亚视为“喘息空间”和进一步向非洲内陆扩张的潜在基地；同时看成一个理想的殖民移居地，以解决它在19世纪后半叶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特别是落后的南部地区的人口问题。当时，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势力并不比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强大。以贸易为例，利比亚当时主要的外贸伙伴是英国。1886年，利比亚进口的1/4来自英国，仅有1/6来自意大利。为改变在利比亚的地位，意大利以鼓励移民移居利比亚、派出商人、传教士和勘探人员来利比亚活动等手段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408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408页。

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页。

约翰·赖特：《利比亚》，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1页。

Magali Morsy, op.cit., p.315.

利比亚矿产资源本来十分丰富，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土耳其政府不重视发展利比亚民族经济而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勘探和开发。意大利勘探人员在利比亚相继发现了煤、银和白垩等矿物，这些发现更刺激了意大利占领利比亚的欲望。

法国在利比亚再次成为意大利的竞争者。1881年它把突尼斯变为保护国后，就企图进一步兼并的黎波里塔里亚。但法国的这个企图遭到欧洲列强的一致反对。1887年，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签订了一系列维持地中海现状的协定，目的是想阻止法国对利比亚采取行动。意大利表面上赞成维持现状，背地里却一面加紧进行外交活动，以谋求列强在利比亚问题上支持自己；一面继续加紧对利比亚的经济渗透。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到1900年，意大利运往利比亚的货物总吨数已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四倍。罗马银行是意大利在利比亚进行经济渗透的先锋，它积极参与在利比亚的投资，1907年在的黎波里开设了在利比亚的第一家分行，三年后在班加西和其他12个城镇开设了分支机构，它还在利比亚办了一份名为《的黎波里经济学家》的刊物。1900年和1902年，意大利和法国签署协议，意大利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求，而法国则承认意大利有权扩大其对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部分的影响。意大利这时出现了一个以恩里科·卡雷蒂尼为首的新的有影响的殖民主义团体，他们竭力鼓吹意大利应吞并利比亚，并通过议会讲坛和报纸宣传其观点，他们还得到了罗马银行财政上的资助。

意大利对利比亚的野心遭到了土耳其的强烈反对。1856年的巴黎条约曾保证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878年的柏林条约和后来的海牙会议都重申了这一保证。但意大利却不顾这些保证，决心占领利比亚。

1911年9月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意大利认为这是武装入侵利比亚的绝好时机。它决定不给任何可能发生的外来干涉留有时间，于9月25日向土耳其发出了最后通牒，事前甚至没有同它的欧洲盟国商量，更没有理睬青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一再警告。四天后，意大利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谈判要求，派军侵入利比亚，很快占领了的黎波里、胡姆斯、班加西、托卜鲁克和德尔纳等地中海沿岸城市，同时派出军舰封锁海岸线以防土耳其派军增援。它还第一次派出飞机参加战斗。

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军事力量较弱，只有一个师约7000名士兵驻扎在的黎波里。但是他们得到利比亚人民主要是从内地赶来的阿拉伯和柏柏尔人部落武装，以及从昔兰尼加西部落来的塞努西教团武装力量的大力支持。土利联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10月23日的黎波里郊外战斗中，意大利遭到失败。11月在班加西郊外的三次重要战斗中，意军又败北，被迫撤回市内。德尔纳的土军得到了安瓦尔帕夏和基马尔率领的土耳其军和塞努西教团军队的增援。在托卜鲁克，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发生了两次重要遭遇战。在1912年7月17日的战斗中，意大利军队指挥官萨尔沙被杀。近东和北非各国人民也发起了声援利比亚人民的运动，给予利比亚抵抗力量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还派出自愿人员直接参加战斗。侵略军始终未能深入利比亚内地。利比亚人民抵抗侵略的顽强程度完全出乎意大利的预料，它只得不断向利比亚增派军队。

Magali Morsy, op.cit., p.315.

《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212页。

杨人梗：前引书，第385页。

到 1911 年底，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已增加到 9 万人；1911—1912 年间，用掉的战费达 8 亿里拉。

1912 年 7 月，土耳其由于面临着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反抗斗争的重新爆发和国内的动乱，被迫于 1912 年 10 月 18 日和意大利签署了洛桑和约。尽管条约并没规定意大利对利比亚享有主权，但由于土耳其允诺召回军队和交职人员，这就等于把利比亚让给了意大利。

八、利比亚人民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

洛桑和约后，利比亚人民对意大利侵略的抵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抵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中，塞努西教团起着重要作用。该教团以其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里·塞努西的名字命名，最初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土耳其统治的情绪。20 世纪头 10 年，他们在撒哈拉沙漠地区进行了多次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意大利人侵入利比亚后，塞努西教团又把矛头对准了意大利人。1913 年春，教团首领发表宣言，反对把的黎波里转让给意大利人。宣言说：“我们愤怒地拒绝任何依赖欧洲人的主张，我们永远不会自轻自贱到去考虑什么好的奴隶制与坏的奴隶制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自由人祖先的后代。我们将证明我们无愧于他们。需要我们流多少血，牺牲多少生命，我们就流多少血，牺牲多少生命，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捍卫我们的独立，世界上无论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

在阿齐兹·阿里·马斯里、法哈德贝伊、苏莱曼·巴鲁尼以及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阿卜德·卡德尔的儿子阿里帕夏等人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抗意大利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兴起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它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对利比亚的统治，争取利比亚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在洛桑和约缔结后，民族主义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裂，多数人认为该条约对利比亚有利，保证了利比亚的政治独立；以苏莱曼·巴鲁尼为首的少数人则认为，利比亚的真正独立只有在战胜意大利人后才能实现。

意大利利用土耳其军队撤退之机，向内地推进。1913 年 5 月 16 日，意军向德尔纳以南的塞努西教团的军队发动进攻，但遭到惨重失败。这是土军撤退后利比亚人和意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但意军在德尔纳、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几条战线突破了利比亚人的防线，向内地推进，到 1914 年初已占领费赞的一些绿洲。意军深入沙漠腹地，孤立驻军于各个绿洲，造成交通联络不便和供应困难，这为塞努西教团的军事反击创造了良好的时机。1914 年 8 月 26 日，在塞义德·萨菲丁的指挥下，他们歼灭了一支意军供应纵队。日后意军接二连三遭到抵抗力量的重创，不得不宣布从费赞地区撤退，龟缩于沿海几个据点。

1915 年 4 月，利比亚起义军在锡尔特地区的卡拉达比阿再次击败意大利军队。接着，塞努西教团首领和部落谢赫们在阿杰达比亚和昔兰尼加建立了政权。但是，解放运动内部的团结并不稳固，各部落的谢赫、的黎波里塔里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 449 页。

杨人樵：前引书，第 386 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 451 页。

亚的封建主与塞努西教团互相敌视。的黎波里塔里亚的拉马丹·苏韦希亚反对萨菲丁，并迫使他离开了的黎波里塔里亚。与此同时，塞努西教团内部领导人之间也出现了不和。内部的不团结极大地削弱了利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并使解放运动一度低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吃了败仗，利比亚的解放斗争再度高涨。在德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塞努西教团的军队进攻埃及的英军阵地。1916—1917年间，意大利、英国和伊德里斯举行和谈，签订协议，停止了军事行动。意大利承认昔兰尼加未被占领地区在伊德里斯·塞努西统治下实现独立。同时，伊德里斯·塞努西还和英国人达成协议，答应释放全部英国俘虏，恢复与埃及的贸易。

第二十五章 西非各国反对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斗争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西方列强瓜分西非并建立殖民统治的时期。瓜分西非是欧洲殖民者疯狂侵略和征服的血腥过程，也是西非人民为保家卫国、抗击殖民者入侵而进行前仆后继斗争的光辉历程。到20世纪初，西非已被英、法、德分割完毕。他们在各自所占的西非殖民地着手建立殖民统治和剥削制度，以实现对其西非人民的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为把西非变成农业原料附庸，也曾企图侵占大量土地，建立大种植园经济，后因殖民地人民的反对等原因而失败。他们转而采取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手段，诱导农民种植和发展出口经济作物，西非小农经济和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开始逐渐形成。西非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开始解体，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开始出现，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西非沿海地区初步兴起，西非反帝斗争跨入了新阶段。

一、法国的征服与反法斗争

普法战争的惨败迫使法国暂时中止其在西非的殖民扩张，撤出了卡约尔、卡萨芒斯等据点，保留了圣路易、达喀尔和塞内加尔河沿岸的据点。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方才恢复元气，再次掀起殖民扩张的浪潮。1885年柏林会议结束之后，法国迫不及待地力求将其在西非的殖民地与北非的殖民地连成一片，并建立从塞内加尔到索马里的法属非洲帝国。19世纪末，法国在西非的殖民侵略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从塞内加尔河中下游的法属领地向西苏丹腹地扩张；二是从几内亚湾沿海地区（主要是达荷美沿岸）的殖民据点向北推进。

塞内加尔是法国在西非的第一块殖民地。经过长期苦心经营，法国殖民势力已沿着塞内加尔河扩展到内陆地区。在一轮新的扩张中，法国殖民者遇到了卡约尔王国、图库勒尔王国和瓦苏鲁王国的英勇抗击。

卡约尔是位于佛得角半岛以东的伊斯兰王国。1862年，卡约尔的达梅耳（国王）拉特·迪奥尔领导了一场反法战争。1865年，该国为法国兼并。但在1870年，拉特·迪奥尔利用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之际恢复了卡约尔王国，次年又迫使法国总督签约承认卡约尔王国的独立地位。1881年，法国人要求拉特·迪奥尔同意法国修筑达喀尔——圣路易铁路以及提供廉价劳动力，拉特·迪奥尔认识到这将导致卡约尔独立的丧失，坚决拒绝。于是法国派兵攻打卡约尔，废黜拉特·迪奥尔。1886年，拉特·迪奥尔在袭击法国哨所时牺牲，卡约尔最终为法国所灭。

从19世纪50年代初奥马尔宣布圣战开始，图库勒尔王国便成为一支遏制法国向内陆扩张的重要力量。1864年奥马尔死后，其子阿赫马杜继承抗法斗争事业。1879年，法国议会批准了《塞内加尔—冈比亚法属领地规划》。翌年，法国海军大臣命令塞内加尔总督德利尔从凯斯到基塔设立据点，以便修筑一条连接梅迪内和巴马科的铁路。德利尔派出以加利埃尼为首的远征队，沿塞内加尔河直趋塞古，向阿赫马杜“送礼”。在1880年与加利埃尼签订的条约中，阿赫马杜否定了法国人建立保护权的条款，拒绝在王国境内排

斥其他外国商人经商的要求，只承诺给予法国最惠国待遇，同时要求法国增加军事和物质援助的数量，并在条约中包括了法国保证“永不侵犯图库勒尔人的任何领土”等内容。1881年，法国政府在拒绝批准此约后派军先后侵占基塔、巴马科等地，并进逼塞古。阿赫马杜让其子留守塞古，自己退至尼奥罗。1887年，阿赫马杜被迫与法国订立保护条约。19世纪90年代，英德两国从几内亚湾沿海迅速向内地推进，促使法国骤然加快殖民扩张步伐，再次发动对图库勒尔王国的侵略攻势。1890年，阿尔希纳纠集1500名大军向图库勒尔王国扑来，2月占领塞古。阿赫马杜领导图库勒尔军民再次开展抗法战争，袭击法军交通线，援救被俘军民。同年4月，在奥塞布古要塞，图库勒尔战士与侵略者进行巷战，最后把堡垒炸毁，和敌人同归于尽。法国人在此役中死伤数百人。此后，法军沿尼日尔河上游向东步步紧逼，迫使阿赫马杜从卡尔塔、尼奥罗一直退到马西纳。1893年马西纳失守，随后整个王国领土沦落敌手。图库勒尔人民抗法斗争在坚持12年后终于失败。1893年，阿赫马杜定居索科托，两年后病逝。

1882—1898年，萨摩里·杜尔领导瓦苏鲁王国开展了历时16年的抗法战争。正如前述，到1879年，萨摩里已把瓦苏鲁王国建设成为西非强盛的伊斯兰国家（参见本卷第14章），西邻塞拉利昂，东迄象牙海岸，北起巴马科附近，南至利比里亚边境。被称为“非洲拿破仑”的萨摩里指挥着当时西非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抗法战争中显示出非凡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才能。怀着对布雷金矿的觊觎之心，法国殖民者于1882年从巴马科侵入瓦苏鲁王国。萨摩里派军迎战，揭开了瓦苏鲁人抗法战争的序幕。

在抗法战争第一阶段（1882—1886年），萨摩里采用散兵线相继突进的战术，屡创法军。特别是在1883年4月欧雅科伏击战中，更是打得侵略军丧魂落魄，300名法军仅生还32人。1886年3月，法国人被迫与萨摩里签订《凯尼埃巴—古拉条约》，确定布雷和康加巴归属瓦苏鲁王国。一年后，法国人又与萨摩里订立《比桑杜古和约》，划定尼日尔河左岸归法国，右岸仍归瓦苏鲁王国。萨摩里深知，此约仅是敌人缓兵之计，法国意在调集力量以便卷土重来，因此他抓紧暂时的和平时机建设国家，加强战备。首先，萨摩里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把军队分成三部分：一是正规军，配备最好武器，直接抗击法军；二是东征军，向东开拓新的领土，以为退守余地；三是后备军，掩护居民安全撤退。其次，鉴于散兵线相继突进战术难以抵挡装备精良的法军，萨摩里决定改用在在水陆交叉地带突袭伏击和坚壁清野的方法以困扰和拖垮敌人。第三，萨摩里巧妙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通过弗里敦的英商购买欧式武器弹药，在比桑杜古等地开设兵工厂，修理和仿造欧式武器，并派人学习、传授欧式武器的使用方法。此外，他还注意加强粮食生产，促进自由贸易，以及向人民传授伊斯兰教教义和军事知识，增强民族意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队战斗力，缓和了财政困难。然而萨摩里也犯了一些战略性的错误，如他在1887—1888年间派军用16个月的时间围攻城防坚固的锡卡索，结果徒劳无功，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失去了原可争取的抗法斗争的同盟者。

让·徐雷·卡纳尔：《黑非洲：地理·历史·文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85—186页。

让·徐雷·卡纳尔：前引书，第187页。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125.

在与英国划定各自在西非的势力范围后，1891年，法国集中兵力进攻康康，直逼首都比桑杜古。瓦苏鲁王国抗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891—1898年）。萨摩里率军撤出比桑杜古，且战且退，进入王国东部地区，在达巴卡拉城重建国都。萨摩里在撤退中采取焦土政策，不给侵略者留下一人一物。1892年1月，法军与萨摩里军队在米洛河谷遭遇，萨摩里率军围歼法军200余人。面对侵略者围追堵截，萨摩里毫不畏惧，他慨然宣称：“你们（法国人）可以切断南面、北面和西面的通道，但东面的通道仍然向我敞开，真主的土地宽阔无垠。”他率军采用游击战、运动战与敌周旋，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常使法军疲惫不堪，叫苦不迭。1894年法国人在侵占图库勒尔王国和达荷美王国之后，调集重兵，从锡卡索、象牙海岸和比桑杜古三面围剿萨摩里军队，英国也配合法军从东面发动攻击，并禁止萨摩里从弗里敦购买军火。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下，瓦苏鲁军民仍然英勇奋战，重创敌寇。从达荷美出发的法军蒙泰伊支队在征途中屡屡受袭，原为1200人的支队到达孔城时只剩120名残兵败将，蒙泰伊本人也身负重伤。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萨摩里曾遣使与法国人和谈，但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拒绝接受法国人提出的建立保护国的条件。另外，萨摩里还派人与阿散蒂王普列姆佩联络共同进行反殖斗争事宜，但因英国殖民者阻挠而未成。1898年9月，法军偷袭盖勒莫，萨摩里不幸被俘，后被放逐加蓬。

法国殖民者为加紧征服西苏丹，又以下几内亚湾沿海的法国据点为基地向内陆渗透，遭到了贝汉津领导的达荷美人民的英勇抗击。

19世纪60—70年代，达荷美王国国王格莱莱为阻止拉各斯的英国人扩张，曾同意法国商人在科托努居住，但从未放弃对科托努的主权。1889年，法国代表巴约尔到首都阿波美，要求在科托努设卡驻兵，王储孔多太子一口拒绝，并明确表示取消法商在科托努居住的权利，禁止法国炮舰在达荷美水域航行。格莱莱去世后，孔多太子继位，称“格贝汉津·阿伊·基莱”（意为“大地所希冀的蛋，只有宇宙才能负载”）。贝汉津曾留学法国，深知法国的侵略意图，着手积极备战。他派人购买欧式步枪，组建了一支15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著名的黑人姑娘组成的禁卫军（阿霍西），还有骑兵、炮兵及一些特种兵。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堪称西非沿海诸国的一支劲旅。贝汉津即位伊始，法军便于1890年2月炮击科托努，他领导的抗法战争由此开始。3月，贝汉津率军进攻科托努的法军，并在戈多美海滨大败法国援军；4月又在波多诺伏和阿加拉河附近歼灭法军150多名。法军被迫于8月派人与贝汉津谈判。1890年10月，双方签订维达条约，法国占有波多诺伏和科托努，但每年须付2万法郎给达荷美，并承认达荷美对整个沿海地区拥有主权。休战局面并未持久，法国当局认为该约有损法国尊严，拒不批准，并拨出300万法郎的军费备战。1892年8月，一支配备军舰、大炮的法国殖民军沿韦梅河向达荷美进逼。9月，贝汉津组织敢死队在多格巴给予迎头痛击，法军损失惨重，法军司令当场毙命。在通往阿波美的道路上，达荷美军队与法军激战，歼敌740余名，以致法国人不得不承认达荷美军队“是个谁也不

O.Ikime ed., *Leadership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 (《19世纪非洲的领导者》), Longman 1974, p.59.

R.Cornevin, *Histoire du Dahomey* (《达荷美史》), Paris 1962, pp.332-333.

容怀疑的，抗战能力高强的死硬对手”。1892年11月，贝汉津率军撤出阿波美，转到北部继续抵抗，但因敌众我寡、瘟疫流行以及上层分子叛变，抗法战争连连失利。1894年1月25日，贝汉津兵败被俘，被流放马提尼克岛、阿尔及利亚等地。1894年，达荷美沦为法国保护国，两年后改为殖民地。

在遭受法国殖民侵略的西非土地上，有图库勒尔、瓦苏鲁、达荷美等这样一些统一的强大王国；而另一些地区则散布着许多原始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小酋长国、小王国。对前者，法国殖民者以绝对优势的武力予以侵占；对后者，则时常使用结盟、缔约等等欺骗手段，把它们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再予以占领。

柏林会议前后，从西非沿海出发的法国探险家、考察团骤然增多。他们绝大多数担负某种特殊使命，通过送礼、结盟，诱骗当地非洲首领在保护条约上签字画押，为法国殖民当局攫取势力范围，抢占非洲领土，或完成其侦察、联络等准备工作。19世纪最后10年，法国在尼日尔的殖民侵略显露了这些探险家的狰狞面目。1890年，法国探险家蒙泰伊从圣路易出发，次年8月12日，在乌罗盖拉迪奥代表法国同当地首领易卜拉欣·盖拉迪奥签订保护条约；24日，他又与萨伊王国杰尔马王阿卜杜签订同样的条约，规定杰尔马王同法国人结为友好同盟，并在事先未经法国政府同意之前决不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订约。探险家博德、卡泽马儒也与尼日尔一些地方首领签订了保护条约。1895—1896年，乌尔斯特考察队自巴马科沿尼日尔河而下直至布萨，侦察沿途地形。在1891—1899年间，法国殖民者与尼日尔土著首领缔结了近10个同盟条约或保护条约，使尼日尔变成了法国势力范围。

到1895年，法国把已占领的塞内加尔、法属苏丹、法属几内亚、象牙海岸合并为法属西非联邦。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分别在1904、1908和1910年并入法属西非殖民地，191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的毛里塔尼亚也于1920年并入法属西非。

二、英国的征服与反英斗争

19世纪最后25年，英国也不遗余力地投入瓜分西非的狂潮。该时期英国在西非殖民扩张的方向基本上是以几内亚湾沿海地区的原有殖民地向北面内地渗透，而人烟稠密、肥沃富饶的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则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重点地区。

英国对尼日利亚的殖民侵略由来已久。1861年拉各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领事与油河地区各土著首领签订了一些保护条约。如1884年休伊特领事与阿萨巴的国王、王后和首领们签订的条约中规定，阿萨巴接受英国保护，未经英国同意决不同任何外国和任何强国进行任何通信，缔结任何协定或条约，并保证司法、经济、行政、文化等有关事宜均按英国官员的建议行事。柏林会议刚一结束，英国便于1885年6月宣布在拉各斯到喀麦隆之间的沿海地区成立油河保护国，两年后改称尼日尔海岸保护国。但实际占领这块领土时，英国殖民者遭到油河地区和约鲁巴地区诸城邦的顽强抵抗。

让·徐雷-卡纳尔：前引书，第214页。

Edmond Séré du Rivieres, *Histoire du Niger* (《尼日尔史》), Paris 1965, p.202.

A.Burns, *Histor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史》), London 1963, pp.326-327.

伊卓族的奥波博是尼日尔河三角洲最大的棕榈油贸易中心。柏林会议后，英国威逼奥波博王贾贾接受其保护，贾贾拒不理睬，并封锁商路，关闭商站，禁止英商入境贸易。1887年7月，英国炮舰溯奥波博河而上，炮击沿岸村落。贾贾率军迎击，伊卓人抵抗英军进攻达三月之久。随后，英国人玩弄和平阴谋，建议同贾贾谈判。英国领事保证，无论接受英国建议与否，贾贾在一听完英国政府的指示后即可自由离开。然而当贾贾到会时，英国人当即予以逮捕，押往阿克拉，后又放逐西印度群岛。英国人又于1894年8月以伊策基里族的布罗赫米埃酋长纳纳“破坏贸易”、“煽动近邻诸族反英”为由，派兵入侵。纳纳率军英勇抗击，英军狼狈逃窜。9月，英军调集重兵攻占布罗赫米埃，纳纳被放逐黄金海岸。1897年1月，英国殖民者以禁止奴隶贩卖和“人祭”为旗号，派军向贝宁扑来。近2万名贝宁军民与敌浴血奋战，在格瓦拉附近两次重创英军。同年2月，得到增援的殖民军兵分三路进攻贝宁，并采取焦土战术，在付出伤亡近700人的惨重代价后终于18日占领贝宁京城。城内约2500件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青铜制品被掳掠一空，众多抵抗将领被处死，贝宁的奥巴王被放逐卡拉巴尔。

在约鲁巴城邦，英国人同样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继1865年占领阿贝奥库塔之后，英国人着手征服伊巴丹。这时伊巴丹建立了一个以它为核心的约鲁巴城邦联盟，成为抵抗英国扩张的重要力量。1877年，英国殖民者裹胁埃格巴人、伊杰布人进攻伊巴丹，但直到1886年才挫败伊巴丹的抵抗。1888年，英国胁迫奥约签订保护条约。1893年，英国答应奥约的阿拉芬恢复其原有的对约鲁巴各邦的统治权，但阿拉芬必须承认英国对全境的保护权。随后，英国人又武力镇压了拒不接受保护的伊杰布奥德和阿贝奥库塔，并于1893年与阿贝奥库塔签订条约，规定英商和传教士可在该国自由活动，英国臣民有权在该国购地建房，从事贸易，开设企业。随后英国将同样的条约强加给伊巴丹、奥约等城邦，逐渐完成了对约鲁巴地区的占领。

在英国对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的殖民侵略中，皇家尼日尔公司充当了殖民开拓的先锋。为与法德商人进行有效竞争，1879年英国退职军官戈尔迪·陶布曼将在尼日尔河一带活动的四家英国商业公司合并为联合非洲公司，三年后又改称国民非洲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其主要活动地区是尼日尔河下游，致力于阻止法德经济势力的渗透。公司在尼日尔河沿岸设立商站，深入沿岸各地勘探，诱骗当地土著首领签订保护条约，为英国的殖民占领开路。法国人也不甘示弱，赤道非洲公司、塞内加尔和非洲西海岸公司接踵来此，在法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在尼日尔河下游地区建立了32个商站，与34个英国商站相对峙。为此，国民非洲公司将其资本扩大到100万英镑作为回击。经过一场剧烈的商业争斗，1884年，两家法国公司相继破产，把从当地首领骗取的条约权力以及公司资产转归国民非洲公司。正是凭借国民非洲公司签订的一系列保护条约，英国得以在柏林会议上促使列强承认尼日尔河下游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使法德两国对尼日尔河加以国际共管的主张成为泡影。柏林会议后，英国政府急忙授权国民非洲公司完成对这片辽阔领土的有效占领。1886年7月10日，该公司获得皇家特许状，易名皇家尼日尔公司，拥有对尼日尔河下游地区的一切特权、权力以及管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全权，有权开发和经营矿场、开发林业和渔业。公司以阿萨巴为总部，建立政府机

关，设立法院，招募警察部队，以保卫、扩大和管理其领地。公司以武力胁迫和欺骗讹诈手段，到 1888 年先后与各地酋长签订 275 个保护条约，约 50 万平方英里的广阔领地被置于公司代理人执行的英国保护之下。公司的侵略不时遇到当地人民的反抗。阿萨巴、布腊斯土著居民分别于 1883 年和 1895 年举行起义，捣毁公司的商站、仓库，袭击公司成员。只是在英国殖民军的帮助下，公司才将这两次起义镇压下去。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德国人和法国人也不时染指尼日尔河中下游，皇家尼日尔公司与之展开了激烈竞争。1887 年底，德国一艘运盐船驶入尼日尔河，故意违反该公司的关税规章，船主赫尼格斯贝在努佩进行反对公司的活动，公司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运盐船也被扣留。1890 年和 1893 年，英德达成协议，划定英德两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分界线，该线起自乍得湖南岸阿达马瓦埃米尔国首都约拉以东（约拉仍属英国），直抵斐南多波岛的海岸，该线东面归德国，西面归英国。1889 年，英法通过谈判也达成协议，决定沿尼日尔河畔的萨伊到乍得湖附近的巴腊瓦一线划分英法势力范围，法国同意将该线以南一带的弗拉尼各酋长国划归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管辖。

1894 年，英法争夺又起，其目标是与达荷美相邻的博尔古地区。该年 11 月 10 日，被英国政府委以重任的弗雷德里克·卢加德与博尔古的尼基国王签约，把博尔古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几天后负有同样使命的法军德科尔上校到达时，发现英国人已捷足先登。法国便派出多支远征队在博尔古活动，并图谋夺取皇家尼日尔公司的其他领地。1897 年，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为支持皇家尼日尔公司的扩张活动，授权卢加德组建西非边防军，任命他为旅长，在北尼日利亚西部与法国对抗。随后，公司征服了努佩和伊洛林。1898 年 5—6 月，英法军队在博尔古互相对峙，剑拔弩张，终以法国退让而告终。双方于 6 月 14 日签订巴黎和约，将 1890 年划定的英法势力范围分界线又向萨伊东南推移，法国获得博尔古的尼基，英国则取得布萨和尼日尔河下游的势力范围。

到此时，皇家尼日尔公司作为殖民侵略先锋的使命业已完成。1899 年底，英政府撤销公司特许状，次年 1 月正式接管公司所占领土，其中伊达以南的领土并入尼日尔海岸保护国，改称南尼日利亚保护国；以北的公司所占领土称北尼日利亚保护国。当时北尼日利亚大部分地区仍归索科托帝国和博尔努王国统治，于是在 1900—1903 年卢加德发动一系列军事远征，交替使用血腥的暴力征服与分化瓦解、和平占领这两种手段，相继占领孔塔戈腊、包奇、约拉、博尔努西部、卡齐纳、索科托等地，完成对北尼日利亚的征服。他们自然也遇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激烈抵抗，例如 1903 年布尔米一役，来自各地的抵抗战士大败英军，歼敌 400 人，连英国总指挥也命归西天。1906 年，拉各斯殖民地并入南尼日利亚保护国。1914 年，英国将南尼日利亚保护国与北尼日利亚保护国合并组成英属尼日利亚殖民地保护国。

19—20 世纪之交，英国在西非侵略扩张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黄金海岸。1874 年，第七次阿散蒂战争使阿散蒂联邦趋于瓦解。但几十年的反殖斗争毕竟加强了阿散蒂民族统一的意识。1874 年夏秋之交孟沙·邦苏即位后，重整军队，收复失地，着手治愈战争创伤。到 1876 年，阿散蒂王国已收复部分沿海领土，停止向英国人支付赔款，并将英国驻节官逐出库马西。柏林会议结

束后，英国唯恐处于德法殖民地包围的黄金海岸落入他手，便急于合并阿散蒂王国，以独霸黄金海岸及其北部地区。1889年和1890年，英国总督格利菲斯两次派人到库马西，软硬兼施，要求阿散蒂接受英国保护，都被国王普列姆佩断然拒绝。普列姆佩明确宣称：“我们阿散蒂王国决不受这样的政策约束，阿散蒂必须保持原有的独立。”1895年，他又派遣使团前往伦敦表达王国坚持独立的严正立场。英国新任总督麦克斯威尔却奉命向普列姆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英国官员和军队进驻库马西，接受英国保护。普列姆佩予以拒绝，并将英国商人、传教士和官员驱逐出境。1896年1月，麦克斯威尔以普列姆佩不履行1874年福门纳和约为由，出动3000名殖民军进犯阿散蒂王国。1月17日，英军再次占领库马西，烧杀抢掠，并逼迫普列姆佩投降。1月20日，英国人逮捕了前来谈判的普列姆佩及其父母和8个主要酋长，先囚禁于埃尔米纳堡，后又流放塞舌尔。8月16日，英国宣布阿散蒂为英国保护国，委派英国总督统治；同年又与贝克威等部落签订保护条约，从此独立统一的阿散蒂王国不复存在。然而不屈不挠的阿散蒂人民把象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国宝——金凳子藏匿起来，坚决不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1900年，英国总督霍吉逊在库马西召开酋长会议，傲慢地宣称他是阿散蒂最高权力的代表，强迫阿散蒂人交出金凳子让他坐在上面。这无疑是对阿散蒂民族的最大侮辱。酋长们连夜秘密集会，宣誓不再忍受英国统治。三天后，义愤填膺的阿散蒂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民族大起义，史称第八次阿散蒂战争。起义由埃吉苏部落酋长的母亲雅·阿散蒂娃领导，也称雅·阿散蒂娃之战。4月25日，8000名起义者包围了英国人在库马西的一座堡垒，包括霍吉逊在内的所有英国官员、传教士和750余名驻防军被困在其中。调来的英国援军也遭到阿散蒂军民的有力阻击，损失惨重。英国人玩弄和谈花招，利用停战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方得逃出堡垒。7月上旬，英军在班塔马一带与阿散蒂军民发生激战，英军伤亡累累。10月，库马西防御设施被毁，起义者撤出库马西后分成小股与英军进行游击战。1900年12月，雅·阿散蒂娃与数十名起义将领在一次激战中不幸被俘，被流放到塞舌尔，起义终告失败。阿散蒂国被肢解为18个阿曼托，归英国总督管辖。1902年1月，阿散蒂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在此前后，英国人经过与德国人、法国人的激烈争夺，运用与土著部落缔约的手法，着手侵占了北部领土，并通过一系列英德、英法条约，确定了黄金海岸殖民地的西部、东部和北部疆界。

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在上几内亚湾的两块殖民地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也同样进行了由沿海向内陆的殖民扩张。1880年，英国借口塞拉利昂内地部落纷争威胁到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从沿海派遣了一支殖民军进入内地。从1884年起，内地的酋长在英军刺刀的威逼下与英国签订了保护条约，使英国的殖民统治扩大到内地相当一大片地区。1888年，英国将塞拉利昂沿海地区建为单独的殖民地；1896年，宣布塞拉利昂内地为英国保护地。1888年，冈比亚脱离英属塞拉利昂殖民地，正式宣布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英国殖民者逐步蚕食冈比亚河中下游两岸，以致和法国殖民势力发生冲突。1889年英法达成协议，确定沿冈比亚河两岸各宽10公里的地带为英属冈比亚领地。

三、德国的征服与反德斗争

19 世纪末，德国也与英法一起积极参与对西非的征服与瓜分。德国在西非的殖民侵略是顺着与英法扩张平行的方向，从多哥、喀麦隆沿海地区向内陆深入。

早在 19 世纪中叶前后，德国传教士、商人就已来到几内亚湾沿海地区。1882 年，活动在今多哥沿海阿内乔一带的德国商人与当地埃维族统治者签订协议，获得在阿内乔的通商权。黄金海岸的英国人也欲将殖民魔爪伸向这块地区。1883 年，英国人利用埃维族统治者格·劳森之死，企图扶植傀儡执政，而德国人则针锋相对地支持另一王位候选人。由两个列强所挑起的阿内乔内部纷争经久不息，德国以“保护德国臣民的利益和恢复秩序”为借口派兵舰前往；而英国也调兵遣将，准备保护居民不受德国蹂躏。1884 年春，俾斯麦指示德国驻突尼斯领事纳赫蒂加尔前往西非，为德国在几内亚湾尼日尔河三角洲到加蓬河口沿海一带确保几块土地。7 月 2 日，纳赫蒂加尔乘坐炮舰“海鸥”号抵达阿内乔。他通过威胁利诱逼迫洛美、巴纪达的酋长缔结保护条约，几天后又在两地升起德国国旗；7 月 5 日与多哥大酋长姆拉帕缔约，宣布多哥为德国保护国。1885 年 3 月，德英签订解决多哥西部边界问题的协议。然而东邻达荷美的法国人也对多哥地区垂涎三尺。1885 年 4 月，法军进入该地区，宣布对阿内乔实行保护，德法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同年 9 月，法军失败被逐。1885 年 12 月，德法缔结协定，法国承认德国对多哥的保护权，并确定多哥与达荷美的边界。德国在侵占多哥沿海地区后，向北推进，组织了一支由军人和旅行家组成的探险队，与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相继占领了阿提埃梅、帕利梅及其以北地区。德国殖民者的逞凶肆虐引起了多哥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其中以 1896 年南坎塞人起义和 1897—1898 年康康比人起义规模最大，但均为德国人所镇压。

1858 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团在喀麦隆的阿姆巴斯湾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欧洲人居留地维多利亚。19 世纪 70—80 年代，英国人诱骗喀麦隆许多部落酋长请求英国保护。而法国人也正在杜阿拉以南沿海地区与一些地方酋长签订保护条约。1883 年，英国内阁批准了休伊特领事的建议，决定与喀麦隆酋长们签订保护条约，限制他们在未经女王政府同意之前不得将领土让给其他列强，并派休伊特前往喀麦隆具体执行。然而在喀麦隆蓄谋已久的德国商人早就要求俾斯麦对当地实行保护，并使用贿赂送礼、甜言蜜语等手法取得土著首领的信任。德国政府自 1883 年 4 月起悄悄进行占领喀麦隆的准备。当 1884 年 7 月纳赫蒂加尔一行完成对多哥沿海的侵占之后，又驾驶“海鸥”号迅速于 7 月 11 日赶到喀麦隆，次日就与杜阿拉的地方首领阿克瓦王和贝尔王签署保护条约。7 月 14 日，纳赫蒂加尔在杜阿拉的德国商站附近升起德国国旗；不久又在喀麦隆沿海另外五个商站举行升旗仪式。当 7 月 19 日英国领事休伊特来到杜阿拉时，发现已经迟了一步。英国人一面在杜阿拉挑唆非洲土著反抗德国人，一面又在维多利亚西面和西北面地区与德国人展开一场与土著首领签订保护条约的竞赛。1885 年 7 月，德国政府任命冯·佐登为首任喀麦隆总督。由于德国人捷足先登，英国终究未能占领它长期拥有贸易优势的喀麦隆，英国商人、传教士无可奈何地相继离开。1887 年，德国占领维多利亚的英国教区。到 1888 年，德国人在沿海地区最终确定统治权，转而向腹地渗透，建立了雅温得商站。德国在向内陆的推进过程中不时遇到喀麦隆人民的坚决抵抗，仅一个小小的巴克威里族就对德国展开了为期四年（1891—1895

年)的抵抗。因此,直到19—20世纪之交,德国人方才征服雅温得和乍得湖之间的地区。在德国征服喀麦隆期间,德国与英法先后达成1886年和1893年的德英协定、1894年和1911年德法协定,划定了喀麦隆与英法各殖民地之间的边界。

这样,西方列强通过对西非人民的征服和镇压以及他们之间的争斗与妥协,到20世纪初已将西非基本分割完毕。

四、列强在西非的殖民统治制度

随着西非瓜分的基本告成,英、法、德分别在西非各自所属殖民地逐渐建立一整套各具特色的殖民统治制度。

英国先在西非采用直接统治制度。虽然1830—1845年间黄金海岸英国总督麦克利恩曾试图利用非洲统治者作为英国统治的中介人,然而阿散蒂人顽强的抗英斗争使该企图未能得逞。1874年英国建立黄金海岸殖民地时,便在当地推行直接统治。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冈比亚、塞拉利昂、拉各斯以及油河保护国等英国殖民地,当地非洲首领也因参加反殖斗争而遭废黜,由英国实行直接统治制度。在这些地方,英国总督代表英王直接统治当地居民,总督之下设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其成员多为欧洲官员、商人和传教士,非洲籍委员甚少,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欧洲官员对各地酋长严格控制。这种直接统治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推行了间接统治制度。间接统治在这里最先由一种统治手段发展为整套具有特定内涵的殖民统治制度。

北尼日利亚是英国在非洲侵占的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殖民地,由于英国在非洲同时忙于进行阿散蒂战争和英布战争,无法立即抽调足够的人员,凑集足够的财力在此建立直接统治。而且英国在当地殖民征讨中不时遇到土著居民的激烈抵抗,这迫使英国人认识到单靠少数侵略军的直接镇压难以使殖民统治长治久安。于是英国为减少军政人员、节省行政开支、有效维持殖民统治,自然以依靠当地现成的传统政权及其首领为上策。加之当时北尼日利亚的索科托帝国虽已由盛转衰,但大多数埃米尔仍承认索科托哈里发为最高政治、宗教首领,在各地均还存在着一套完整的土著政权系统和司法、税收制度,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英国可以直接利用这一整套比较完善发达的国家组织机制,实现对当地人民的间接统治。卢加德深知利用土著政权进行统治的妙处,他调到北尼日利亚后发布了一系列公告、指示和法令,对间接统治作了详尽的阐述,使之由一种单纯的统治手段发展和完善成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统治制度。

间接统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原则有四个要素:一是英国的宗主权。这是实行间接统治的前提。这种宗主权包括对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任命埃米尔和所有国家官员之权、立法权和征税权。土著统治者只有接受英国宗主权,其权势和地位才得以维持,而在北尼日利亚的英籍高级专员(后称总督)、驻节官和地区长官则分别对各级土著统治者进行监督和指导,成为英国宗主权在殖民地的具体执行者。二是土著政权。这是整个间接统治制度的基础。1907年颁布的《土著政权公告》,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北尼日利亚各级土著政权的存在,各级土著首领由英国总督任命并授予委任状和麾标。他们不得作

为独立的统治者而应作为附庸的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治理，还要宣誓效忠英王。土著政权的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征收税款、执行总督命令，负责一些地方建设，可以拥有少量警察，但不得组建军队。三是土著税收。这是间接统治制度的经济支柱。1903年和1904年先后颁布的《土著收入公告》和《土地收入公告》，规定由英国官员协助土著首领确定各村或镇应纳的年度直接税额，由土著官员负责征收，土著政权可留取所征税额的较大部分用来支付土著官员的薪水和公共建设事业费用，其余部分则上交英国殖民当局。四是土著法院。这是间接统治制度的保障。1900年颁布的《土著法院公告》授权驻扎官发给土著法院许可证，允许其对土著居民拥有司法权，实施伊斯兰法或土著习惯法，其审理受到殖民当局严密监督。其管辖权主要限于民事案件，并拥有极有限的刑事审判权。至于白人之间及白人与土著之间的各种纠纷，则由参照英国法律制度建立的高等法院和省法院审理。

在间接统治制度下，北尼日利亚各级土著首领成了英国人的傀儡，完全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在1906年萨提鲁起义中，索科托哈里发和大多数埃米尔纷纷协助英军镇压起义者。鉴于间接统治制度在北尼日利亚已达到预期效果，英国当局决定将这一行之有效、花费甚少的殖民统治制度推广到其他殖民地。1912年，卢加德出任南、北尼日利亚两地的总督，着手将该制度推广到全尼日利亚。

法国在西非殖民地也推行以同化为主要特征的直接统治制度。法国在征服西非过程中遇到由传统首领（国王、酋长等）组织和领导的西非人民的英勇抵抗。即使在镇压这些抵抗后，法国殖民者仍心有余悸。为此，法国人决定消灭可能成为反法领导力量的非洲国家和部落组织，废除传统首领的权力，委派各级官员，推行宗主国法令，直接统治土著居民。即使那些充当殖民走卒的地方酋长也往往不是原来的传统酋长，而是由法国人重新委任的忠诚于他们的非洲人。

为在西非推行同化政策，1912年，法国当局制定《入籍法》，规定凡出生在法属西非、能效忠法国或任公职十年以上、能阅读或书写法文、拥有生活资料、具备良好品质者可获得法国公民权。在非洲居民中，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土著上层符合这些条件，而绝大多数非洲人则沦为没有公民权的法国臣民。191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法国在塞内加尔的老据点达喀尔、圣路易、吕菲斯格、戈雷埃四市镇为宗主国的一部分，实行法国市政法律，全体居民及其后裔为法国公民，各镇可派一名代表进入法国下议院。到1918年法属西非获得公民权者为24997名，其中22711名住在塞内加尔。在司法制度上，除由殖民政权控制的土著法院根据伊斯兰律法或土著习惯法审理一般土著诉讼案件外，法国当局还实行速决裁判制，即根据1887年总统法令，法国殖民官员可不经法院就逮捕非洲人，任意处以各种监禁或罚金。

1895年，法国授权驻圣路易的塞内加尔法国总督兼任西非大总督，管辖其他几个法属西非领地总督。为加强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集中统治，1902年，法国设立了一个驻圣路易的独立的西非大总督，在圣路易的塞内加尔总督和其他领地总督一起受其节制。法属西非政府体制如同一个金字塔，顶端是法国总统和殖民大臣，其下便是西非大总督，代表宗主国颁布殖民地法令；第三层是各领地总督，对下属法国官员和地方酋长的更换任命负有全权；

第四层是各领地省和郡两级法国行政官员，指挥下属土著官员；最底层则为大批法国人委派的土著官员，其中许多人并非出身部落上层，而是曾在法国殖民军队服役立功者，他们充任各领地郡和村两级官员及地方酋长，成为殖民走卒。

在殖民统治初期，法国也曾实行过间接统治。这是因为当时法国扩张的速度非常迅速，致使法国当局一时难以拥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来管理如此广阔的殖民地，于是便同一些非洲土著领袖签订保护条约，只要那些土著领袖承认法国宗主权，法国便保证其政治组织、宗教、风俗习惯、制度和地方法律不受侵犯。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旦殖民统治基本稳定，法国便撕毁条约，抛弃土著首领，摧毁原有的国家和部落组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建立由法国官员直接统治的行政机构。到 20 世纪初，只有在法属极少数内地如莫西、亚登加等仍采用间接统治，保留原有的土著政权。

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则推行高度军事专制的直接统治制度。在多哥和喀麦隆分别设置由德国皇帝直接任命的德国总督，有权颁布殖民地法令、拥有最高司法权、统率军队和控制财政。两个殖民地内部在行政上划分若干区，各由隶属于总督的德国军事长官管辖。军队与警察部队驻守各个战略要地。这些部队由招募来的非洲土著编成，由德国军官指挥。依仗这些军队和警察，德国殖民者独断专行。德国当局也指定部分非洲协理员作为政府雇员，负责维持治安、征募劳工、按照德国法律审讯土著诉讼案件。殖民当局还在多哥设置“感化营”，用以惩罚那些反抗德国残暴统治的非洲人。但在喀麦隆北部的弗拉尼人诸埃米尔国，德国不得不仿效英国在北尼日利亚的做法，采用间接统治，保留原有的非洲土著政权。

五、殖民地经济结构的雏形

19—20 世纪之交，随着欧洲殖民者对西非地区实际占领的扩展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英、法、德殖民当局运用经济或超经济的手段把西非社会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变为适合于欧洲垄断资本掠夺所需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使西非逐渐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庸。

土著土地制度的演变是西非传统经济变成殖民地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建立殖民统治之初，欧洲殖民当局在西非也曾象南非等地一样直接掠夺土地，但遭到西非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1894 年和 1897 年，黄金海岸英国当局两度提出有关土地条例，试图将森林、矿产和一些荒地收归己有，均因当地人民的极力抵制而作罢。在法属西非，法国当局宣称，作为战胜国的法国有权支配非洲的土地，屡次宣布无主土地属于国家。1906 年颁布的《土地注册法令》规定，土著居民可以通过注册、领取地契而使所耕土地归其所有。但领取地契的非洲人不多，直到 1915 年，经登记而发出的地契仅 1267 件，所占土地约 12000 公顷。因此，在西非几乎没有白人大种植园存在，小种植园也不多，这是由西非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所决定的。

首先，在沦为殖民地之前，西非广大地区的土地基本上属集体公有。就尼日利亚而言，在北部弗拉尼统治者拥有土地最高所有权，并实行分封，但土地分配权由各村社酋长和族长掌握，土地由村社或家族成员共同使用；在

南部，村社或家族之上没有一个最高土地所有者，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土地的所有人，酋长或族长只是土地的托管人，习惯法禁止出售土地，即使出租或抵押也须经酋长批准及村庄、家族主要成员通过。在黄金海岸，土地是属于家族或部族的财产，部族酋长只是族有土地的保管人或经理人。至于法属西非，当地习惯法并不承认非洲统治者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土地被看成耕地者的公共财产。西非这种根深蒂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阻碍着殖民者对土著土地直接的大规模掠夺，而且西非人民为保有自己生计所系的土地，也坚决反对殖民当局的土地掠夺政策。

其次，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非沿海商品货币关系已有一定发展。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内加尔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已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欧洲商人已经开始建立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商业掠夺体系。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拉各斯出口的棕榈仁由 12000 吨增加到 36000 吨。欧洲资本家不用开办种植园，也可以继续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剥削西非人民，以获得可靠和丰厚的利润。

再次，西非炎热潮湿的气候使许多欧洲白人望而生畏，不愿前来开办种植园。这样在西非除喀麦隆外，殖民者几乎没有占有大片土地以开办大型的白人种植园。就总体而言，殖民者在西非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土地关系。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剥夺了弗拉尼统治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宣布土地和矿产的最高所有权均属于英国政府；但同时又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土著首领继续依照土著习惯法分配土地，土地转让受到严格控制。在尼日利亚南部，除从皇家尼日尔公司所取得的那部分皇室土地所有权属于英国当局外，保存村社或家族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属于全体土著居民，只是土地出租给外来人须经英国总督批准，租借期最长为 99 年。在黄金海岸殖民当局也维持旧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根据 1900 年《租借法令》，部落领袖虽可将土地出租给欧洲人，但土地出租的面积、期限和用途均有限制。唯有德属喀麦隆例外。德国殖民者先在沿海地区大规模占领土著土地，分配给欧洲大租让公司，建立在奴役非洲应募工基础上的大种植园经济。1896 年，德国当局宣布一切空地均归德国所有，次年建立了第一批大种植园，1906 年增加到 23 个，1913 年增加到 58 个。它们在 1913 年种植可可 13161 公顷、棕榈油 5044 公顷、橡胶 7177 公顷（1911 年数字）、香蕉 2164 公顷、烟草 153 公顷，共计 115147 公顷的土地。

在保留传统土著土地关系的前提下，殖民当局使用经济和超殖民地经济结构的雏形经济的权力，把西非仍然变成了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到 19 世纪末，西非地区曾猖獗一时的奴隶贸易已呈强弩之末，但在西苏丹内地家内奴隶制还广泛存在。当时尼日利亚还有上百万名奴隶，而法属西非到 1905 年尚有约 200 万名奴隶。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于是殖民当局着手废除奴隶制。1901 年，尼日利亚英国当局发布公告，规定 1901 年 4 月 1 日后出生的所有儿童均为自由人；奴隶制的存在属于非法；取消债

P.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非洲经济史》), Capetown 1986, p.15.

Lord Haily,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the British African Territories (《英属西非领地的土著管理》), London 1951, 141.

H.Stoecker ed., German Imperialism in Africa (《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 London 1986, p.162.

A.G.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经济史》), Longman 1973, p.226.

务奴隶制。但该公告对奴隶主还是作出一些让步，如不强迫奴隶主解放他的奴隶，奴隶只有在遭受主人虐待时才可向英国驻节官申诉获得解放。在黄金海岸，1874年，英国总督就宣布了内容相似的废奴条例。从1887年起，法国殖民当局曾设立了一些“自由村”，以安置那些挣脱奴役枷锁的非洲奴隶，仅在1905—1907年法属西非就有约30万奴隶获得解放。

殖民当局为促使村社农民种植出口作物，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行政措施。首先是以货币征收直接税。英、法、德当局在其各自所属的西非殖民地均按人或户对土著居民征收高额货币税，如在法属西非殖民当局要求土著居民用法国货币交纳1—3法郎的人头税。这样，过去习惯于物物交换、与货币接触甚少的非洲小农现在为获得足够的货币缴付税款，不得不种植可在市场出售的出口经济作物。其次是实行强制性行政手段。在英属西非殖民当局把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民拥有土地的必备条件。法属西非则推行以行政制裁相威胁的义务作物制，如从1908年起象牙海岸农民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可可树，否则就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再次是欧洲殖民当局为推广经济作物种植而采取各种支持、鼓励措施，包括建立试验站和苗圃、提供优良种籽和苗木、指导栽培技术、实行优惠贷款、提高收购价格等等。

到20世纪初，西非各地已初步形成以生产、出口单一经济作物为特征的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黄金海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1879年，提蒂·克瓦西从斐南多波岛带回一些可可荚，在阿库皮姆的曼蓬试种成功。此后，黄金海岸可可种植面积迅速扩大，1891年首次出口80磅，到1913年已达5.06万吨，占世界首位。尼日利亚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已呈现地区专业化趋势。棉花与花生的种植主要在北部，可可种植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以阿贝奥库塔为主的西部诸省，而油河地区仍是西非最大的棕榈产品产地。1900年，棕榈产品超过尼日利亚出口总额的80%。冈比亚则是西非的花生产地，1913年花生占冈比亚出口总值95%。花生也是塞内加尔输出的主要商品，1880—1900年间在该地区出口商品中的比例由52%增至73%。

在西非，出口经济作物主要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种植。西非欧洲资本家主要通过控制流通领域剥削土著农民。大批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马赛、波尔多和汉堡的英法德各贸易公司在西非各地操纵、垄断经济作物的收购与出售。它们一般不直接与非洲小农打交道，而是由当地的非洲人及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充当中间商，由他们将收购来的经济作物汇集沿海欧洲人商站集中输出。如在19世纪末，有20家英国商行在油河地区设立近60个商站，雇佣200名欧洲职员和约200名非洲中间商。该时期西非各地因广泛种植出口经济作物，传统的粮食作物生产面积大为缩小，不得不从海外进口粮

A.G.Hopkins, op, cit., pp.475-476.

苏勃波丁：《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1880—190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99页。

R.Duignan & L.H.Gann ed.,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殖民主义在非洲》), vol.4, Cambridge 1975, p.454.

P.Duignan & L.H.Gann, op.cit., p.455.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800—1918）》，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89页。

苏勃波丁：前引书，第55—56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下册，第531—532页。

食。当时塞内加尔每年输入印度支那大米达 1500—2000 吨。大批廉价的欧洲日用品涌入西非市场，给西非原有的手工业以致命打击，昔日著名的卡诺纺织业和塞内加尔土布业日趋衰落。欧洲垄断资本家在西非低价收购当地生产的经济作物，高价出售西非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等日用品。19 世纪末，在欧洲每吨售价为 520 法郎的棕榈油在达荷美却以 240 法郎收购，在印度支那按每吨 160 法郎收购的大米在西非售价竟达 350 法郎。欧洲资本家通过贱买贵卖的“剪刀差”，攫取超额利润。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非农村社会开始发生由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换的深刻变革，农村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日趋瓦解。首先，经济作物的种植缩短或改变了维系土地公有关系基础的休耕制和定期分配制，诸如可可树这样的长年生作物，农户可以连续种植数十年而无需休耕。这就需要小农拥有土地的长期固定使用权，而长期使用权经过登记后往往变为所有权。其次，种植出口经济作物提高了小农对土地价值的认识，土地通过出租、转让而日趋私有化。例如，19 世纪末，阿库皮姆的可可农开始向西边森林地带的部落首领购买或租借土地。他们通常集体购买一大片土地，然后按出资多少分得自己领有的一段土地。到 1914 年前，仅在阿基姆阿布库瓦一地就有约 800 平方英里土地转卖给外地人，成为可可农的私有农庄。

殖民地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欧洲资本家把西非各国变成自己的矿产原料产地。20 世纪初，英国在西非殖民地实行租借法，迫使非洲酋长把蕴藏矿产的土地全部转让给欧洲各公司。黄金海岸金矿的主要产地在塔克瓦，1878 年法商邦纳特的非洲黄金海岸公司获得了第一个租借地，开始运用科学方法采金。1900—1901 年，来此采金的欧洲矿业公司不下 300 家，它们从当地酋长那里获得约 4000 块租借地作为矿场，其中著名的阿散蒂金矿公司控制的采矿地面积竟达 2600 平方公里。欧洲租让企业挤垮了非洲人惨淡经营的采金业。到 19 世纪末，加纳人已被外籍矿业公司完全排挤出采矿业。1908 年，塞康第到塔克瓦铁路修成，大批采矿设备运入，黄金产量急剧提高，输出量由 1901 年的 6 万盎斯增至 1914 年的 40 万盎斯，成为仅次于可可的第二大出口商品。1910 年，欧洲人在黄金海岸的恩苏塔开始采掘锰矿；1914 年后每年输出锰矿石约 3 万吨。采锡业是尼日利亚采矿业的主要部门。1910 年前后，欧洲人在包奇高原开始大规模开采锡矿，到 1913 年已有 55 家企业投资 400 万英镑在此采锡。西非采矿业掌握在欧洲公司手中，土著居民往往被迫成为矿场的契约劳工。

西非殖民地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加工工业极不发达。英、法、德资本家只在沿海城镇开办了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农副产品初加工厂，如榨油厂、轧棉厂、锯木厂、碾米厂和棕榈油、椰子干、鱼类罐头加工厂等等，分别对花生、棉花、木材、粮食、棕榈产品、椰子和鱼类等各种农副产品在出口前

苏勃波丁：前引书，第 54 页。

苏勃波丁：前引书，第 59，54 页。

P.Curtin, S.Feierman, L.Thompson & J.Vansina, African History (《非洲史》), Longman 1978, p.509.

P.Wickins, op, cit., p.96.

R.Hallett, Africa Since 1875 (《1875 年以来的非洲》), London 1974, p.326.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下册，第 591 页。

R.Hallett, op.cit., p.326.

进行初步加工，而将半成品运回欧洲，变成最终产品。1880年，法国人在大巴萨姆建立象牙海岸第一家锯木厂；1890年，在塞内加尔建起拥有50名工人的当地第一家榨油厂。

为了畅通无阻地运出西非经济作物产品和矿产原料，以及征服内地、维护殖民统治的战略需要，19—20世纪之交，欧洲列强在西非修建铁路、公路与港口。鉴于铁路便于加强沿海与内地联系，能够有效提高运输效率，特别是运输军队及其设备的效率，英、法、德殖民当局均较重视铁路建设。到1913年，英属西非铁路总长1405英里，法属西非铁路总长1545英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属多哥与喀麦隆铁路总长分别达364.5公里与340公里。当时西非所有的铁路均从沿海向内地辐射，往往有着特殊的用途。如洛美到阿内乔的铁路被称为“椰子线”，此外还有“可可线”、“棉花线”、“铁矿线”、“棕榈线”。西非内地还修筑了许多通往火车站和水路码头的公路，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港口。这些近代交通运输网都控制在殖民当局手中，并建立在大量役使土著居民无偿劳动的基础上。如法属西非全境35000公里的公路敷设和维修，90%是靠抽调劳役完成的。一切铁路、港口均是借款建筑的，借款利息多由当地居民以各种捐税形式支付。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促使一批近代城市在矿区、贸易中心、铁路与公路沿线以及沿海港口兴起与发展。象牙海岸的布瓦凯（1896年）和阿比让（1903年），尼日利亚的乔斯（1903年）、迈杜古里（1907年）、埃努古（1909年）、哈尔科特港（1921年）和卡杜纳（1913年）等城市，均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非社会经济开始剧烈变化的年代，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被纳入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六、阶级关系的演变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西非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时代。随着殖民列强对西非的瓜分，非洲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传统社会统治者（酋长、封建主或奴隶主等）与被统治者（农牧民、手艺人、城镇贫民、小商贩、奴隶等）为主的矛盾逐步变成了西非各族人民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大体上，起初是传统社会的上层领导各族人民反抗殖民侵略者。但随着欧洲殖民者对西非地区政治统治的确立，原有的国家组织趋于解体，在实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原来的非洲国王、部落酋长等传统首领被废黜和放逐，殖民当局往往以一些并非出身于酋长和皇室家族的忠诚者取而代之，充当殖民机构的下属官员，成为殖民当局的忠实走狗。而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殖民当局通常保留地方上传统的首领及其权力，运用笼络和威胁的手段促使他们驯服地成为殖民统治的地方代理人。他们不仅死心塌地为殖民当局效劳，而且利用最落后的封建奴隶制剥削形式对非洲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当然也有一些传统首领良知未泯，拒绝帮助殖民者欺压本族人民，甚至积极投身

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非洲经济》（一），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6，337页。

J·D·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3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下册，第638页。

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1页。

于当地的反帝反殖斗争，1898年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便是明显一例。

经济作物的种植、私有土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非广大农村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小农阶层，并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现象在黄金海岸、尼日利亚等地最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黄金海岸的经济作物产区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和富农。富农中的许多人还经营商业与高利贷。自耕农，即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小农（可可农），拥有3—6英亩土地。他们地位极不稳定，或发财致富升为富农，或负债破产沦为租佃农。租佃农则佃耕地主或富农土地，其收成的2/3上交。被地主、富农甚至自耕农长期或临时雇佣的农工，有的领取固定的月工资，有的按日计酬或计件付酬。

西非民族资产阶级处在形成的早期阶段。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和塞内加尔等地出现了一些土著商业资产阶级，有的充当欧洲商业公司的中间商，为欧洲商人收购经济作物、推销欧洲日用品。他们逐渐在沿海城市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力图打破欧洲商业公司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有的也向工矿业投资，开办公司，但遭殖民当局和欧洲资本家的压制和排挤。例如三个茛蓂企业家于1890年在奥布瓦西开采金矿，雇佣200余名工人，不久即被英国人办的阿散蒂金矿有限公司所收买。这些土著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

西非工人阶级这时也已出现。最初的一批西非工人主要是在采矿企业、交通运输部门、建筑工地上从事雇佣劳动。在黄金海岸，他们大多是农场工人、矿工、铁路工人、船夫、裁缝、建筑工人、司机、机修工等。1900年，塞内加尔约有900名各类工种的工人（杂工不算）。

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引进、推广西方教育的结果。从19世纪起，欧洲殖民当局和教会出于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需要，在西非建立了许多进行欧式教育的学校。1827年，英国行教会在塞拉利昂创办福拉湾学院；1845年，又在巴达格里创办尼日利亚第一所学校。1857年，法国圣灵传教会在达喀尔创办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各一所。1856年和1905年，法国与英国殖民当局分别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和塞拉利昂的博城创办酋长子弟学校，其目的是培养一批为其服务的土著名流。1909年，英国当局又在黄金海岸的阿克拉设立培训师资的学院和工艺学校。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科技知识的近代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编辑、行政职员、公司雇员等，其中不少人曾到欧洲留学深造，他们逐渐聚合成一支为数可观的政治力量。这些饱尝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知识分子较早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影响，许多人成为西非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骨干。

西非沦为殖民地之后，酷爱自由的西非人民继续开展反殖武装斗争，例如1898年的塞拉利昂茅屋税战争、1903—1904年的黄金海岸北方部落暴动、1906年的尼日利亚萨提鲁起义、1907年的喀麦隆阿达马瓦圣战、1908年的象牙海岸巴乌莱人起义等等。这些斗争尽管采取中世纪的形式（如部落起义、伊斯兰圣战），是下层群众自发性的反殖斗争，但由于西非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些斗争已带有民族觉醒的特点，斗争目标主要指向残暴的殖民统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茅屋税战争。1897年，塞拉利昂英国当局宣布，自1898年起

P.Curtin, op.cit., p.509.

苏勃波丁：前引书，第80页。

在保护地征收 5—10 先令的茅屋税，由各地酋长负责征收。但不少酋长坚决反对。1898 年 2 月，洛科港东北地区有两位酋长因不肯收税而被逮捕，土著居民随即揭竿而起。在德高望重的老酋长拜伊布里赫领导下，起义者捣毁欧洲人的仓库、商站、袭击欧洲殖民者，重创前来镇压的英军。5 月，起义部队逼近弗里敦，英国赶忙从拉各斯调来援军围剿起义者。11 月，拜伊布里赫不幸被俘，后被放逐黄金海岸，众多将领悉被处死。英国总督认为，这是“非洲人政治觉醒和保护财产意识日益增强的表现”。

从西非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反殖斗争已是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

19 世纪中叶，西非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批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他们著书立说，宣传民族主义思想。詹姆斯·A.霍顿（1835—1883 年）是塞拉利昂获释奴隶之子，曾在福拉湾学院就读，后赴英国深造。他不但是位颇有造诣的非洲医生，而且通过对西非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发表了《西非国家和人民》等著作，批驳欧洲种族主义谬论，宣传爱国思想。被誉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的爱德华·W.布莱登（1832—1912 年）是西非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自从移居塞拉利昂以后，他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于 1872 年在弗里敦创办《尼格罗人报》，后又参与创办《西非记者报》、《塞拉利昂每周新闻》、《拉各斯每周记事》等报刊。他著述甚丰，先后出版了《流血中的非洲人呼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尼格罗人种》、《非洲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欧洲人到来之前的西非》等一系列著作，是系统提出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黑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以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指出近代非洲的落后不是种族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欧洲人所进行的万恶的黑奴贸易。他强调保持非洲黑人的特殊个性。他说道：“民族主义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一个有影响的地位。”布莱登倡导的“非洲个性”或“黑人传统精神”基本上包括三个因素：一是非洲人生活中的村社概念和非洲社会的和谐团结关系；二是非洲人跟自然界广泛的和谐一致；三是非洲人在宗教信仰上跟神（上帝）的广泛一致。由此他提出，“只有在非洲，黑人的天分才能如实表现。”布莱登渴望在西非建立一个以非洲文化为基础、汲取西方先进文明的非洲新国家，鼓励克里奥尔人非洲化，支持成立独立的非洲基督教会。他的思想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西非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且对西非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及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西非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1897 年，黄金海岸一些知识分子和酋长、商人建立了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其主要领导人为两位律师萨尔巴、海福德以及商人约翰逊。协会开展联合斗争，两次迫使殖民当局废除旨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公共土地法令》，随后在拉各斯和塞拉利昂分别成立了该协会的两个分会。1908 年，在反对当局征收自来水捐的群众抗议运动中，拉各斯的两位非洲医生发起成立了保卫非洲人权利民族联盟。在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和推动下，英属西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7, p.143.

R.W.July,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83, p.411.

R.W.July, op.cit., p.410.

非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的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1895年，拉各斯发生了抗征房捐和地产税的示威运动，500名群众参加游行，迫使殖民当局取消了这两项捐税。1912年，南尼日利亚又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抗议当局把北尼日利亚土地法推广到南部各省。次年，由拉各斯知识分子与阿贝奥库塔等地酋长组成的土著代表团前往伦敦抗议请愿，使该法未能实施。

摆脱欧洲传教士对基督教会的控制，建立非洲人自己领导和管理的基督教土著教会或教派，是民族运动的兴起在宗教领域的反映。1891年，在布莱登的积极推动下，一些非洲基督徒由拉各斯商人科尔领导下成立了联合非洲教会；1901年，它与1888年成立的约鲁巴独立土著浸礼会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油河地区非洲部落中出现了由布雷德领导的“以利亚第二”教派，主张农民组织起来，驱逐欧洲殖民者，结果遭到英国当局的镇压。1914年，在象牙海岸等地掀起相当规模的哈里斯运动。哈里斯是一位利比里亚黑人新教牧师，1910年因参加部落起义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创立哈里斯教派，出狱后在象牙海岸南部传教布道，宣传非洲人之间是平等的兄弟般关系，抨击殖民当局的黑暗腐败，深为非洲农民所欢迎，1913年信徒发展到12万人。后来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哈里斯也被流放。

法属西非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兴起于塞内加尔。1912年，“青年塞内加尔”在圣路易创立，领导人为沃洛夫族的贵族迪奥普，其成员多为职员、教师、翻译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这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组织，并没提出独立的要求，只是主张与宗主国的法国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支持非洲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1914年，该组织推选塞雷尔族的布莱斯·迪阿涅参加议会选举，迪阿涅以“争取我们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为口号，在该年4月16日以1910票竞选获胜，成为进入法国议会的第一位非洲人。他提出把没收的土地归还达喀尔居民，保证付给铁路工人退休金。1916年9月，他又在法国议会中为达喀尔等城市的非洲居民争得了扩大公民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塞内加尔也出现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教穆里底教团，它由沃洛夫族的一位伊斯兰教隐士阿赫马杜·班巴创建，主张保持传统教规，抵制异教徒。其信徒从乡村农民发展到城镇劳工，1895年已达5000名之多，成为塞内加尔一支重要的反法力量。法国当局对之深为忧虑，曾两次流放班巴，并迫害该教团成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非开始出现最早的工人罢工。1890年，达喀尔、圣路易铁路工人罢工。1897年，拉各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被称为西非“第一次殖民地大罢工”。同时，西非工会组织也陆续出现。1912年，南尼日利亚城市公用事业工人在拉各斯成立第一个工会。1915年，塞拉利昂出现第一个铁路工人工会。同年，黄金海岸也成立汽车司机工会，有会员近8000人。不过，此时西非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工会组织力量也比较微弱，工人运动尚处于初兴的争取经济权利斗争阶段。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

R.Hallett, op.cit., p.336.

G.W.Johnson, Jr.The Emergence of Black Politics in Senegal (《塞内加入黑人政治的兴起》), California 1971.pp.162-170.

B.Davidson, African Modern History (《现代非洲史》), London 1978, p.173.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593页。

第二十六章 刚果自由邦和法属赤道非洲

赤道非洲地区(在地理上还包括德属喀麦隆)到19世纪仍是非洲大陆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里各族社会发展程度不一,社会结构呈现多层次性,从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氏族制到较完善的封建制一应俱全。在偌大范围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经济上虽然存在精耕细作的农业和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但使用锄耕的粗放农业仍是经济的主体。

阻碍赤道非洲历史进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极为不利的自然环境。赤道非洲地区位于非洲大陆腹部,赤道横贯其中。界内热带丛林密布,气候高温多雨。这种自然环境最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第一,热带密林和星罗棋布的河流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几乎是现成的生活资料(水果、鱼类),而气候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没有发展生产的需求,也就丧失了推进生产进步的动力。第二,与充足的生活资料相反,大自然提供给这里的土壤却十分贫瘠。在高温多雨气候下形成的富铝土养料少、分化快,很不适合发展精耕细作农业,这是改进生产的极大阻力。

二是肆虐了400年的奴隶贸易所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关于奴隶贸易及其给非洲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本卷第一章已有述及。这里特别提出一点:对于19世纪中期以后进入赤道非洲地区的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将他们与欧洲奴隶贩子混为一谈。第一,他们不是单纯的贩奴者。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象牙,其次才是奴隶。第二,这些奴隶贩子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赤道非洲地区抵抗法国、比利时侵略的主要力量。对其贩奴,无疑要谴责,但对其反抗殖民侵略则应予肯定。

热带非洲人的沉重的历史负担便利了法国、比利时的入侵,也为后者推行殖民史上空前黑暗的掠夺制度——租让制提供了土壤。所谓租让制,是指殖民政府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保障,以私人大垄断资本为核心力量,为达到最大限度地掠夺天然橡胶、象牙等热带经济作物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夺占土地、实物税、强迫劳动和令人发指的惩罚制度。这种极端野蛮的掠夺制度为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却使灾难深重的赤道非洲人民又遭受了一次浩劫。

一、殖民征服前的刚果(扎伊尔)

到19世纪80年代,即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高潮到来之时,由于奴隶贸易的长期破坏和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斗争,刚果到处呈现衰败景象。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几个王国之间及王国内部兵连祸结,战乱不断。

库巴王国刚摆脱与卢巴人的战争,进入19世纪后又和安库丘人展开了绵延数十年的战争,直到比利时人入侵时还在进行。然而,王国内部却相当稳定。米柯贝·姆布雷在位30年(1810—1840),博佩·莫宾吉统治45年(1840—1885)。后者是一位杰出人物,领导库巴人顶住了外敌入侵,维护了库巴独立。

卢巴王国则陷入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境地,外有肖克韦人、耶克人和泰泰拉人相继入侵;内部统治者为了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第十一代国王代穆尚即位一年后即被杀。1892年比利时人来到时,两个王位觊觎者——卡松戈·尼昂博和其兄弟卡邦戈还在作阅墙之战。

盛极一时的隆达帝国业已分崩离析。各公国独立发展，尾大不掉，中央的控制权有名无实。帝国内部宫廷倾轧，国王频繁更替。1883年上台的尚班达一年后被杀，继位的康加普两年后被穆迪巴所杀，再传穆卡萨和基龙贝，到1896年穆特巴执政时，13年中王祚已更换6次。1885年，肖克韦人入侵，羸弱的帝国难以抵抗，大片土地被侵占。各公国内部，统治集团与当地民族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以致卡松戈酋长姆韦内·普图被当地贵族出卖给比利时人。

1869年，耶克人姆西里摆脱了隆达公国卡曾贝的控制，在本凯亚建立新国，即姆西里王国。这是一个“商业王国”。由国家垄断和贩运的主要商品有铜、象牙和奴隶。两条商业路线穿越国境，西线商队将铜丝或铜锭运往安哥拉；东路经乌季季将象牙和奴隶送往桑给巴尔。姆西里招募劳动力开采铜矿，引进铜丝加工技术，向安哥拉出口铜丝。它用赚来的钱向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购买枪支弹药，武装起一支2000人的部队，不断扩张领土。1880年，王国达到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起卢阿普拉河、西至卢阿拉巴河、北迄卢武阿河、南抵赞比西高地。在这个庞大的王国内，姆西里模仿隆达帝国旧制，建立间接统治制度。臣属的酋长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中央只派一名驻节代表，监督酋长们交纳贡赋和招募武士。这种强盛的局面昙花一现。1891年，当地被压迫民族桑加人等纷纷起义，姆西里年老体衰，王国迅速走向衰落。

在比利时人征服前的刚果，有一股势力不容忽视。这就是从事象牙和奴隶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他们在1825年后来到刚果河流域，凭着手中的枪和当地一些酋长的支持，很快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控制了刚果1/3的领土。其中最著名的商人是一个有着阿拉伯血统的班图黑人蒂波·蒂普。他拥有上千支火枪，占据了从坦噶尼喀湖到依图锐森林之间的广大地区。除蒂波·蒂普外，较大的商人还有乌季季地区的鲁马利扎和拉巴河附近的基邦热素丹。比利时人刚进入这一地区时，对他们采取怀柔 and 拉拢手段。1887年，蒂波·蒂普被任命为刚果自由邦斯坦利瀑布区的长官，其子侄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双方的关系还算稳定，但冲突不可避免。因为阿拉伯商人的强大势力是比利时扩张的最大障碍，阿拉伯商人对象牙贸易的垄断，也使比利时垂涎欲滴。1890年，斯坦利施展计谋，将蒂波·蒂普骗回桑给巴尔，从此一去不复返。

二、刚果自由邦的建立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1885年2月23日，柏林会议承认刚果自由邦为主权国。4月30日，比

实际上他原是坦桑尼亚境内尼亚姆韦齐人，随其父到加丹加。“耶克人”只是当地人对他们的称呼，意为“猎象人”。

他们主要搜集象牙，由奴隶将象牙运到东非。本文称其为商人，以示其与白人奴隶贩子的区别。

其全名为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本·朱马·本·拉加德·阿尔·马吉布。蒂波·蒂普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绰号，意为“枪声”。Leda Farrant, *Tippu Tip and the East*《蒂波·蒂普与东非》，New York, pp.11-12.

Ruth Slade, *King Leopold's Congo* (《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 Oxford 1962, pp.92-98;

正式名称为“刚果独立国”，或译“刚果自主国”，在英文文献中一般称“刚果自由邦”。参见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9页及注；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

利时议会通过法案，同意利奥波德就任刚果自由邦国王。8月1日，利奥波德通知列强，正式宣布刚果自由邦成立。

柏林会议划分了利奥波德的统治范围，但界线不明。这是因为，当时与会者对刚果的地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许多地区仍是欧洲人一无所知的空白点；加之其他列强对刚果的土地也极感兴趣，笼统圈划范围便于他们插手。法国和葡萄牙分别觊觎乌班吉和隆达，英国则企图染指加丹加。因此，利奥波德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就必须与这些对手做交易。1887年4月29日和1894年8月14日，利奥波德与法国签订了两个协定，划分了双方在乌班吉地区的边界；1891年5月，与葡萄牙订约，确定了刚果自由邦同葡属领地——卡奔达和安哥拉的边界；1894年5月12日，又同英国签订条约，划定了刚果自由邦同英属罗得西亚的界线。

在与列强谈判的同时，利奥波德组织许多支武装探险队，四面出击，对刚果自由邦圈定的范围实行有效占领。早在柏林会议前，斯坦利等殖民探险家的活动已为利奥波德攫取了刚果河下游的大片土地。因而此后的探险多是在边缘地区进行的：乌班吉—韦累河流域，开赛河—宽果河流域、加丹加及洛马米河以东地区。

1886—1892年，自由邦先后派出范热尔、巴埃和范克尔克霍文三支探险队渗入乌班吉—韦累河流域，凭借武力，迫使当地酋长签订条约，接受自由邦统治。刚果人民以部落为单位，顽强抵抗殖民者。1888年，亚科马族武士击溃范热尔纵队；1891年，布贾人大败范克尔克霍文纵队，歼灭殖民军60人。但由于各部落互不联系，各自为战，终被殖民军各个击破。

对开赛河—宽果河流域的占领由沃尔夫、维斯曼、勒马里奈尔和范德维尔德四支探险队负责。前三支在1885—1889年间考察了开赛河及其几个支流，修建了卢埃博、卢卢阿堡和卢散博等几个军事据点。后一支在1890年建立了东宽果河区。与乌班吉—韦累河地区不同，这些地区是刚果古文明中心之一，库巴、卢巴和隆达王国虽已衰弱，但仍统治着这些地区。比利时人的征服行动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其中隆达王国卡松戈的抵抗尤为顽强。1885—1900年，姆韦内·普图领导人民英勇斗争，屡败殖民军。最后，比利时人采用分化瓦解的卑鄙手段，勾结当地贵族，杀害了姆韦内·普图，征服才得以完成。

对加丹加的占领从1890年展开。年底，勒马里奈尔由卢散博据点出发，1891年4月到达姆西里首都本凯亚，向他提出接受刚果自由邦保护，遭到姆西里的坚决拒绝。4月15日，在利奥波德授意下，一批企业家成立加丹加公司，同刚果自由邦订立条约，负责占领和开发加丹加，作为交换，刚果自由邦拥有加丹加公司1/10股份。5—10月，公司相继派出斯太尔斯等率领的武装纵队。12月20日，斯太尔斯部下杀害姆西里。22日，姆西里的儿子班达被立为酋长，成为比利时人的傀儡。

洛马米河以东地区是阿拉伯人的天下。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人慑于阿拉伯人的威力，采取怀柔政策，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到80年代末，其他地区的绥靖工作接近完成，征服阿拉伯人的任务便提上日程。刚果自由邦以强大殖民军为后盾，收起怀柔政策，强征象牙税。双方矛盾激化，冲突时有发生。1892年5月，霍迪斯泰探险队悍然在里巴—里巴升起刚果自由邦

旗帜，与阿拉伯人发生武装冲突。探险队几乎全部被歼，这次交锋标志着阿拉伯战役的开始。此时，阿拉伯人拥兵 10 万，刚果自由邦只有 3500 人，阿拉伯人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在洛马米河畔恩冈杜的泰泰拉人的酋长贡戈·卢泰泰是阿拉伯人的忠实伙伴（他曾是蒂波·蒂普的奴隶）。1890 年—1892 年，卢泰泰率本族人民英勇抗击比利时人，一度还与卢巴王国的卡邦戈协同作战，屡败殖民军。但在近代化的军队面前，泰泰拉武士还是失败了。1892 年 9 月，卢泰泰投降。泰泰拉人并未屈服，在 1895、1897 和 1901 年先后举行三次起义，坚持斗争到 1908 年，沉重打击了殖民者。

早在 1886 年，鲁马利扎的军队已同刚果自由邦部队发生冲突。鲁马利扎聪明能干，善于指挥，深受战士爱戴。军队战斗力颇强，屡败刚果自由邦军队。1892 年后，刚果自由邦增调四支远征队合力围剿，经过两年血战，到 1894 年 3 月才将鲁马利扎赶至德属东非。

蒂波·蒂普虽在 1890 年返回桑给巴尔，但其主要力量仍留在刚果，包括驻守在卡松戈的塞富（蒂普之子）、斯坦利瀑布区的拉希德（蒂普之侄）、卢阿拉巴河的基邦热素丹和里巴—里巴的恩塞勒拉酋长都是他的羽翼。1892 年 5 月，恩塞勒拉一举消灭霍迪斯泰远征队。不久，塞富也在卡松戈杀死刚果自由邦驻节代表。战争全面爆发。1893 年 4 月 22 日，重镇卡松戈失守。10 月 20 日，双方在洛马米河进行决战，阿拉伯人惨败，塞富死于此役。1894 年 12 月，基邦热兵败被俘。

至此，刚果自由邦完成了对其 2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实际占领。这是一场自始至终通过无数场血战完成的真正的军事征服。

三、利奥波德制度

在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推行一种专横独断和残酷剥削的制度，史称利奥波德制度，因其臭名昭著，竟成为“残暴”的代名词。其主要内容有二：

第一，在政治上，国王极端专权。刚果自由邦的军队、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由他独掌，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由他任免，并向他一人负责。他本人则不受任何约束与限制。中央政府（设在布鲁塞尔）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外交、内政、财政三部及一个最高顾问委员会。地方政府由总督（设于 1887 年 4 月，在此之前是行政长官）统领。它包括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以及区和分区政府。总督是国王的代表。他有权任免地方官员，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命令，必要时有权中止国王的某项命令。整个行政机构的官员全由欧洲人担任。据统计，1891 年白人官员有 290 名，1897 年有 684 名，1904 年达到 1424 名（其中有 900 名比利时人）。刚果自由邦军队由直属国王的军队司令统领，包括一个教导营和若干正规连。1888 年有 8 个连，1893 年增至 16 个，1907 年达到 127 个连。军队人数由 1895 年的 4000 人增至 1905 年的 16000 人。士兵从非洲人中招募，服役期为 5—7 年。军官全由欧洲人担

一说“反奴隶主战争”，此说不妥。其一，战争主要由非洲人进行；其二，比利时人目的是征服。

R·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vol, 2, p. 419.

一说 12 年。参见 Leonard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在非洲的帝国和商业》), Loudon, pp. 311—312.

任。

第二，在经济上，推行租让制，通过私人垄断资本对刚果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这一制度以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为前提。1885年7月1日，刚果自由邦颁布法令，规定除土著土地（即法令颁布时非洲人耕种、居住及暂时休耕的土地）外，其他的土地为空地，归国家所有。1891年9月21日、10月15日和1892年5月又接连颁布三个法令，宣布国有土地上的产品属国家所有，非洲人不得利用，并明确规定自由贸易为非法。这几个法令剥夺了非洲人对自己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利奥波德推行租让制，即把大片土地连同土地的垄断经营权租给私人资本。早在1886年12月27日，以比利时大企业家蒂斯为首成立了刚果贸易和工业公司，首先得到10万公顷土地。1889年，它的子公司——刚果铁路公司因承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工程又得到大片土地，从而使公司所占土地超过100万公顷。1891年，租让制正式推行，私人垄断财团纷纷涌入刚果。加丹加公司、安特卫普公司、开赛公司、英比橡胶公司等相继获得大片租让地。利奥波德所以要推行租让制，一是考虑其财政困难。刚果自由邦不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国王得不到政府拨款；比利时大多数金融资本家对刚果自由邦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愿为风险投资枉花一分钱。利奥波德独木难支。至1885年，刚果各项事业的投入已花去他1000万法郎，1890年增至1900万法郎，这使他负债累累。二是考虑到租让制对自己最有利。作为出租者，利奥波德可以分享各公司红利。一般公司上交25%利润，个别例外。如加丹加公司因负担占领费用，只交10%利润；而刚果铁路公司则因其产品出口税被免20%，需上交利润的40%。同时，他又是最大的承租者，许多公司有他的股份（他占有英比橡胶公司、安特卫普公司50%资本），因此，股份分红又是他一大收入。据莫雷尔估计，1904—1905年，单这一项就为他带来36万英镑收入。1896年，他通过一项密令，将11.2万平方英里的好地划为王室领地。十年内，这一领地生产橡胶11354吨，获得1500万美元。租让制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利奥波德迅速摆脱财政危机，并挥霍无度。他向皇室成员发放大笔津贴；购置大批地产；修筑离宫别墅；收买报刊舆论为他宣传，美化他在刚果自由邦的统治。各租让公司也都获得巨额利润，大发其财。英比橡胶公司在六年中获纯利72万英镑，每一股的价值竟由46先令6便士增至35英镑。

刚果人民在利奥波德统治下遭受巨大灾难。当时刚果自由邦的经济收入主要靠象牙、橡胶、棕榈和花生出口。殖民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这些物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实物税。即强迫非洲居民向政府和公司交纳实物，主要是橡胶和象牙；在不产橡胶的地方，以棕榈和花生代替。税额由行政人员确定，各地不一。如蒙加拉地区，每人每月交橡胶9公斤，东方省为2—4公斤。殖民政府为鼓励多收橡胶，对税吏实行奖罚制度。据有关资料记载，税吏报酬分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是从他收集的橡胶中提取2%的佣金。若完不成税额定量，不足部分则从其佣金中扣除。收集橡胶的多少

Neal Ascherson, *The King sIncorporated* (《国王的公司》), London 1963, p.241.

1902年利奥波德成立一个秘密新闻署，专门负责对新闻界行贿。参见 Neal Ascherson, *op. cit.*, p.255.

Neal Ascherson, *op.cit.*, p.242.

Robert Harms, *The End of Red Rubber :A Reassessment*(《血染橡胶的结束：再估价》),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75).

直接与税吏的利益挂钩，促使他们随意提高税额。(2)强迫劳动。它有两种形式：一种与实物税相结合，强迫非洲人为政府和公司收割野生橡胶。1903年，殖民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土著居民每月必须为国家劳动40小时，名为人头税（又称劳动税）。地方政府常任意将这40小时的劳役折成实物税，其税额高到惊人程度。据资料记载，刚果人实际上每月要劳动20—25天才能完成定额。另一形式是各种名目的徭役，如为政府打杂当差、运送货物、修筑公共工程。后两项劳役十分沉重，往往造成大量死亡。例如，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的工人1890—1892年死亡900人，而铁路才修9公里，每一公里就有100人付出生命。服徭役的刚果人几乎是无偿劳动，所获报酬微乎其微，往往是发给一些毫无用处的物品。(3)杂税和其他负担。除实物税和各种徭役外，刚果居民还被迫承担一些额外杂税和负担，如为军队提供食宿，向殖民官员送野味、家禽。以有一百间茅屋的奔巴村为例，该村除人头税外，还要上交5头羊或猪、或50只鸡、125担木薯、15公斤玉米或花生、15公斤山薯。(4)严刑峻法。为防止非洲人怠工或反抗，殖民者制定了极其残酷的惩罚措施。他们扣押土著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迫使男子完成税额。人质集中营生活条件极差，死亡率很高。刚果人只有交足了税收，才被准许以货物赎回人质。在一般情况下，刚果居民若完不成税额，轻则处以鞭笞，重则砍手、砍足、割耳朵乃至枪杀。殖民当局常常派出武装讨伐队，窜入村寨，烧杀抢奸无恶不作。讨伐队返回时，除满载的劫掠物外，常带上一筐筐被砍下的、经烟熏烤的手臂，作为向当局邀功请赏的物证。有的殖民者闲极无聊，竟以土著为靶子，比试枪法。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殖民者竭泽而渔的掠夺，在当地造成严重的恶果。第一，天然橡胶林大面积被毁。非洲人为完成重税，被迫采用快而省事办法，将橡胶树砍下来，或者剥下橡胶的皮，这是一次性使用。而租让公司只顾眼前利益，从不培植新橡胶树。因此，橡胶林逐步趋于枯竭，产量成倍下降。以英比橡胶公司为例，1903年生产橡胶951吨，1905年便减至358吨。第二，象牙产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03年刚果自由邦输出总额为218.4万镑，其中橡胶占了190万英镑。第三，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割胶、服徭役，农业被忽视，大片土地荒芜。第四，更严重的是，土著居民人口锐减。据估计，刚果自由邦建立时有2500万人，到利奥波德统治末期，据官方的乐观估计，人口已不超过1000万。

这就是血腥的利奥波德制度。其全部内容可归结为一句话：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交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贡献出来。它混合了16世纪海盗式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和残酷以及20世纪金融资本的狡猾和贪婪，是殖民史上空前黑暗的制度。

刚果人民无法忍受这一吃人的制度，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逃入人迹罕至的密林或法属赤道非洲是广泛采取的形式。据不完全估计，至少有3万非洲

比埃尔·约阿·罗西娜·勒纹：《在刚果的托拉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6页。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2卷上册，第165页。

西克·安德烈：前引书，第167页。一说从4000万减至1550万，参见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Revised* (《非洲鸟瞰》), Oxford 1957, p.120; 又说从2500万减至1500万，参见Merk Twain, *op.cit*, p.50.

人逃离刚果自由邦辖区。许多地区的人民举起义旗，开展武装斗争。1885—1905年，刚果河下游地区爆发了不下12次起义。其中布迪亚和博瓦橡胶种植园的非洲劳工反对强迫劳动的起义一度发展到5000人。尽管这些起义在无情的镇压下都归于失败，但意义是巨大的。它揭穿了披在刚果自由邦外面的伪装，向外界暴露了它的残暴，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1890年，传教士格拉特恩·吉纳斯在英国首次披露了刚果自由邦的真相，但影响不大。进入20世纪后，国际垄断组织的矛盾激化，刚果问题开始受到各界重视。1903—1904年，英国人莫雷尔和凯斯门特发表一系列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刚果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人道主义者首先起来猛烈抨击这种极端丑恶的隐蔽的奴隶制；欧美一部分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反对这一制度；英美等国政府也对比利时施加压力。面对指责，利奥波德绞尽脑汁，负隅顽抗。1904年，他派出一个调查团，以应付国际舆论；1906年，他大批引进外资，力图堵住投资国的嘴；同时，在刚果自由邦进行一些剜肉补疮的改革。但这些措施在强大的反对浪潮面前均无效果。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刚果自由邦已经在道义上丧失了受国际承认的任何权利。国际社会一致要求结束利奥波德制度，比利时资产阶级或因没能从租让制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或因对利奥波德向外资让步不满，都认为由议会控制刚果要比国王单独控制好得多，纷纷要求政府兼并刚果自由邦。1908年8月20日，比利时议会通过由国家接管的法案。在移交之前，利奥波德急忙将23000万公顷的土地租给五家他拥有股份的私人公司。通过这一形式，他保留了大量的地产。这五家公司可都有大量外资。如上加丹加采矿联合公司，英国资本拥有50%的股份。外国垄断资本的大量涌入，为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刚果准备了条件。不管怎样，利奥波德在刚果长达24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了。刚果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死亡150—300万人。

四、比属刚果

1908年11月16日，监察官吉兰在博马市升起比利时国旗，正式宣布刚果自由邦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改称比属刚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殖民政制方面，1908年10月18日，新政府颁布《殖民地宪章》，规定刚果殖民地归国王和议会组成的宗主国当局管理，从而在法律上终止了国王的寡头政治。1910年5月10日，殖民政府又颁布一项法令，承认土著酋长对部落的管理权，但酋长要由政府任命，其任务主要是征税、招工，并协助维持治安。这实际上是一种地方的间接统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酋长的

罗贝尔·科纳万：(《刚果(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04页。—说几千人，参见Richard West, Congo (《刚果》)，Hait 1972, p.160.

A. AdnBoaheued., GeneralHistory ofAfrica(《非洲通史》)，vol.7, UNESCO 1985, p.176; T-Ranger, Aspets of General African History (《非洲通史概览》)，London 1980, pp. 247-248.

19世纪90年代末，他促使法国人将利奥波德制引入法属赤道非洲，以图找一挡箭牌。

其王室领地在1908年被收归国有，由此他得到5000万法郎赔偿金。P. Moon, J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Marmillen 1927, p. 90.

数目激增，1909 年有 1068 个，1917 年猛增到 6095 个。

新政府对臭名昭著的租让制也进行了改革。1910 年 3 月 2 日，废除垄断贸易制；5 月 2 日，取消实物税，代之以货币税。新税制包括主要税和附加税，主要税即人头税，全体居民都要缴纳；附加税主要是指妇女的装饰品。不久，又通过法令撤消 40 小时的强迫劳动法，但同时规定非洲人每月要为政府服务 16 小时。从 1911 年起，政府与各租让公司进行谈判，试图以承认公司对部分租让土地的全权占有，限制并逐步取消租让制。但这一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毫无进展。

由于刚果的象牙、橡胶资源趋于枯竭，国际市场上橡胶的价格大幅度下跌，新政府单靠这两项商品的出口已难以维持财政，因此不得不将经济转向其他方面。棕榈、可可、岩树脂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较快，出口与日俱增。棕榈仁的出口，1906—1910 年为 5436 吨，1911—1915 年为 7788 吨，1918 年猛增至 31363 吨。粮食生产也开始受到重视。1910 年，成立了一个农业局，研究土壤的开发和利用。比利时政府还采取发放无息贷款，提供补贴、免税等多项优惠政策，鼓励欧洲移民到刚果办农场，但收效不大。矿业的发展比农业更迅速。黄金、金刚石、铜和锡的产量稳步上升。矿产品的输出几乎占总输出的 75%。在采矿业中，加丹加的铜矿居首位。它主要由英比联合公司掌握。1912 年该公司生产铜 3490 吨，1914 年增加到 14042 吨。工矿业的发展带动了铁路建设的发展。1910 年，由开普经罗得西亚到加丹加的铁路修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铁路总长度已超出 1000 英里。

比利时政府采取的诸项改革措施收到了一些成效，但许多重大问题仍未解决：第一，改革的局限性很大。改头换面的强迫劳动制依旧存在。租让制甚至有所发展。1911 年，比利时政府将 187.5 万公顷的土地租给英国资本家，据说这是刚果最后一次出租土地。自由贸易制也因此大受限制。不根除租让制，自由贸易制就无法真正地实行。第二，改革完全是为了垄断财团的利益。保留租让制、强迫劳动制和垄断贸易制便说明了这一点。为了给矿业资本家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工，殖民当局在 1917 年颁布强制耕种法，规定非洲人必须在一定数量的土地上种植规定的农作物，收获物由政府收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这项政策迫使非洲人放弃徒劳无益的农业而去做工。此外，实行现金纳税制同样迫使农民弃农外出。农民大量涌入矿山、工厂，形成一支廉价劳工队伍，1916 年已达 45000 人，1922 年增至 147000 人。工人工资很低，一般每月 25—31 法郎。正是在残暴剥削非洲劳工的基础上，垄断财团拥有越来越大的势力，左右了刚果的国民经济。比利时总公司在 1908 年就已掌握刚果经济的 70%。因此，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得利的只能是这些大资本家。第三，非洲人的悲惨处境没有根本改观。繁重的赋税、徭役没有减轻；殖民官员的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现象没有改变；酋长制的恢复（这本身是对历史的反动）不过使非洲人多受一层地方恶霸的压迫，因为被任命的酋长大都是甘愿充当殖民政府鹰犬的部落败类；非洲人的社会福利建设与刚果自由邦时期一样毫无进展。以医疗业为例，1885 年有医生 2 名，1891 年有 8 名，1903

Lord Hailey , op.cit. , p.553.

Buell , op. cit. , p. 517.

Lord Hailey , op.cit. , p.751.

年为 25 名，1908 年达 30 名，到 1919 年仅有 31 名医生。这一切说明，比利时政府的改革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掠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比属刚果动员 18000 人，参加攻打喀麦隆和德属东非的战斗。但大战也给殖民地经济暂时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次机会。由于欧洲战场对原料的急需。加丹加的铜产量由 1913 年的 7400 吨猛增至 1917 年的 27500 吨。棕榈仁的出口增加近 5 倍，由 1913 年的 7200 吨升至 1918 年的 31000 吨。与此相应，输出总额猛增，1914 年为 5800 万法郎，1918 年达 18600 万法郎。而战争的全付重担都落在非洲人肩上，又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灾难。前线作战、劳役运输造成大量死亡；殖民官员以各种名目征走非洲人赖以生存的口粮，造成一些地区人为的饥荒。

五、瓜分前法属赤道非洲的社会经济状况

法属赤道非洲位于赤道南北间广阔的土地上。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首先是地区差异。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包括加蓬和中非。一直到殖民征服前，这两个地区尚处于氏族部落制度阶段。例如在萨拉人中，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各氏族互不相属，只在战时组成一个临时联盟，推举一个军事首领。战争结束，联盟即告解散。各氏族内部，土地集体占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集体渔猎，收获物由酋长分配。酋长负责调解各种纠纷，其权威来自氏族成员对他的尊敬。同龄等级在这种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把全氏族成员按性别、年龄组成多个小团体，从而形成一个稳固的金字塔式结构，有效地保证了氏族的稳定。另一类是古王国存在地区，即刚果和乍得。进入 19 世纪后，该地区已发展起较完善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组织。世袭国王是全国的最高首领，他在大贵族组成的国事会议协助下进行统治。全国划为几个省（或区），由国事会议委任的高级官员直接统治。基层政权由氏族贵族构成，他们负责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征收捐税和徭役。

法属赤道非洲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另一表现是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如未形成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之复杂，可以展示出氏族制各个阶段（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直到解体的全过程。原始森林中的俾格米人直到 20 世纪初仍处于氏族制的早期阶段，过着单纯的采集和狩猎生活。其社会结构十分简单，几代成员组成的父系大家庭是唯一的社会组织。萨拉人、恩扎卡拉人、芒基亚人等则处于氏族制的发展时期，其社会结构前面已有论述。而加蓬的姆蓬韦人，中非的阿赞德人、曼格别图人等在进入 19 世纪后，氏族制开始走向瓦解。其表现是：(1) 氏族首领专权现象日益严重，长老会议和全氏族大会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小。氏族首领职位变成世袭，拥有军事统率权、司法权和管理权。他还通过征战扩大自己的常卫队，以武力维持统治。(2) 社会分化日趋明显。以氏族首领为中心的贵族集团通过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

Buell, op, cit., p.534.

George Martelli, *Lxopnld to Lumumba : A History of the Belgian Congo, 1877—1960* (《从利奥波德到卢蒙巴——比属刚果史》), London 1962, p.194.

有人认为，俾格米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通过与班图人的交往，他们也在向生产食物过渡。Alan P.Merriam, *Congo : Background of Conflict* (《刚果：冲突的背景》), Northwestern Universty 1961, p. 20.

的特权阶层。他们使用奴隶劳动，并对平民进行剥削。如曼格别图人首领使用几百名什役和侍从。乍得和刚果的社会结构也很复杂。高居社会顶层的是封建大贵族，中间是氏族贵族，底层是自由民和奴隶。部落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奇怪地混合着。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有人认为，非洲没有单纯的奴隶制时代，封建制直接脱胎于部落制，于是三种制度便在交叉点上融合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对其社会性质的封建说提出异议，认为称之为部落封建制更为合适。

法属赤道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平衡的，但在生产活动的基本方面却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粗放型农业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劳动工具十分简陋，多为锄、刀、斧，未出现犁。其二是耕作技术原始，最普遍的是刀耕火种和轮作制。人们用刀砍火烧的办法清理土地，然后用锄挖出小洞，将玉米、高粱的种子撒入洞内，或将土拢成一个个的小土堆，种上木薯。一块土地在使用1—2年后要休耕一段时间，其长短各地不一，一般需3—4年，有的要10年甚至25年。在这里，粗放的经营方式之所以长盛不衰，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首先，由于地处热带，杂草和树丛生长很快，清理土地的工作非常繁重，因此形成了较特殊的劳动分工，男子负责清理土地，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在高温多雨条件下形成的富铝土养料少、分化快，因此土地比较贫瘠；又由于该地萃萃蝇猖獗，牛马难以饲养，所以有机肥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若过分使用地力，只会导致土壤的进一步贫瘠。因此，锄耕、烧荒和轮作制便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产物。第二、畜牧业也采用粗放的经营方法，即完全依赖天然牧场，没有或几乎没有人工饲料的补充。从事畜牧业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此为生的牧民，主要是北区的乍得和中非的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农牧结合的半游牧民。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骆驼和羊。第三，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纺织、制革、制陶和染料等行业的内部分工精细，如纺织业已达到复杂专业化水平的有纺纱工、织布工、染色工和精制工。许多产品销售到西非和北非。第四，市场的发育还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即没有货币。流行的仍是物物交换，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的发展还不能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

奴隶贸易对这一地区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加蓬和刚果地处大西洋岸，400年来一直是奴隶贸易的重灾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受大西洋奴隶贸易影响较小的乍得和中非又遭到阿拉伯奴隶贩子的直接骚扰。尚未形成国家的中非首当其冲，据统计，每年有万余名奴隶从中非送往苏丹。奴隶贸易的长期肆虐造成人口大量丧失，生产技术退化，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破坏，部落、国家之间的敌对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加蓬和中非地区向国家迈进的过程被终止，早已形成国家的刚果则在奴隶贸易的打击下迅速衰弱。刚果地区在16世纪就已形成了卢安果、安济果和恩古约几个小王国，其中巴维利人的卢安果王国是最大的一个。该王国商业十分发达，其产品纤维布、盐畅销于内地。18世纪，卢安果达到鼎盛时期，领土大大扩展，南起刚果河口、北抵利伯维尔附近的河口区、东至马云贝高原、西临大西洋。到19

巴兹尔·戴维逊：《黑母亲》，三联书店1965年，第32页。

William Allan：The African Husbandman（《非洲的农民》），Edinburgh 1965，p.3.

有人说，这种分工不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而是基于一种宗教准绳，它关系到土地的肥力和人畜的旺盛。
参见 Anne Hilton：The Kingdom of Kongo（《刚果王国》），New York 1985，p.6.

世纪后期，奴隶贸易导致王国衰落，1883年接受法国保护。乍得地区因有强大的国家组织，受奴隶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在法国人侵入时能够组织起真正的抵抗。

巴吉尔米是乍得地区康加人的国家，1522年由比尔米·代塞所创，首都设在马塞尼亚。王国建立后，一直处于与珀尔人和阿拉伯人不断的战争中。16世纪末1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国内推广。18世纪下半叶，王国达到全盛时期，统治范围向北方和东南方扩展，沙里河上游萨拉人居住区均被纳入藩属地区。跨入19世纪后，国运转衰，1806年一度被瓦达伊所灭。1807年，奥斯曼·博库·芒达（1807—1846）在西非圣战中虽恢复了国家独立，但战乱并未结束，人民起义频频发生。1870年，瓦达伊再次入侵，掠走三万工匠，手工业蒙受极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1893年，腊巴赫入侵，素丹加乌朗二世不战而逃。1897年，他与法国军官让提尔订约，将巴吉尔米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乍得地区的瓦达伊与巴吉尔米一样，位于东苏丹通往中苏丹和西苏丹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重要。它与东苏丹的达尔富尔毗邻，曾一同遭受阿拉伯游牧民族顿哲尔人的统治，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甚深，但抗拒伊斯兰教多年，直至17世纪中叶方才迅速伊斯兰化。阿布德·凯里姆（1635—1655年）以推广伊斯兰教作为统一各部落的工具，成为瓦达伊素丹，建都乌阿腊。此后100年，瓦达伊为摆脱达尔富尔控制，交战多次。乔德素丹在位时期（1747—1795年），于1752年彻底击败达尔富尔之后，曾八次南征异教徒部落，拓疆扩土，盛极一时。瓦达伊国内贵族势力强大。获得“杰尔马”、“阿吉德”，“坎卡拉克”封号的簪纓贵族拥有大片土地。到19世纪初圣战时期，由于交战频繁，瓦达伊奴隶制有所发展。乘博尔努素丹与索科托哈里发帝国交战之际，瓦达伊南下征服巴吉尔米，掠奴劫物，打开横越撒哈拉的新商道。穆罕默德·萨勒素丹（1835—1858年）对高举圣战之纛的博尔努素丹国大张挞伐，一度打败奥马尔。穆罕默德·阿里素丹在位时期（1858—1874年），每年有12000—15000人从巴吉尔米被鬻卖到瓦达伊首府阿贝歇，其中有些是奴隶、有的是自由民。素丹在全国10个区设立奴隶村。19世纪后期，瓦达伊国势渐衰，大贵族争权夺利，宫廷阴谋不断，1899—1902年王位三易其手。到法国侵入瓦达伊时，两个王位觊觎者阿西尔和社莫腊仍在酣战。1909年，法国殖民军攻克阿贝歇，1910年征服瓦达伊。

腊巴赫王国是乍得地区一个以其创建者命名的国家。腊巴赫1854年出生于喀土穆地区的一个工匠家庭，青年时代参加过苏丹祖贝尔帕夏的部队，作战勇敢，很快升为军队司令。1878年祖贝尔反英失败后，腊巴赫拒绝投降。1879年，他率领600名忠于他的军队进入中非（乌班吉沙里），试图在内地创建一个独立国家。他从当地班达人、克霍什人和丁卡人中招募战士，组成了一支40000万人的军队，其中12000人配有火枪。这支强大的军队所向披靡，1879年占领达尔库蒂；1883年击败瓦达伊；1886—1887年征服卡巴人和萨拉人；1890年在达尔库蒂组建素丹国，由其大将塞努西负责；1891年在瓦达伊击败法国克朗佩尔考察队，缴获大批精良武器，组织3000精兵进攻巴吉尔米；同年5月从巴吉尔米进军库卡瓦，征服博尔努；1897年占领巴吉尔米。至此，腊巴赫基本上统一了乍得地区（瓦达伊已表示臣服）。他定都迪

科亚，让当地贵族保存自己原有地位，建立起巩固的中央政权。这对于抵抗迫在眉睫的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是有重大意义的。

六、法国的占领与当地人民的反抗

柏林会议后，法国加快了在赤道非洲的扩张步伐。这是因为，到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国内局势日趋稳定，法德关系也得到协调，德国宰相俾斯麦希望法国远离“孚日蓝线”，因而支持法国向海外扩展。对法国来说，这是挽回十年损失的好机会。法属赤道非洲比较贫穷，当时还没有发现矿藏。但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都不愿放过这块靠近赤道的地区。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法国取得了西热带非洲广大土地上的宗主权，并划定了殖民地的边界：在西线，1894 年《法德协定》确定了与德属喀麦隆的边界，1898 年《英法协定》确定了与英属尼日利亚的界线，1900 年确定了与西属几内亚的边界；在南线，1887 年和 1894 年与利奥波德两次订约，划分了与刚果自由邦的边界；在东线，1898 年和英属东非领地划清了界线。在进行外交战的同时，法国逐步实行武装占领和绥靖行动。柏林会议后，法国接连派出武装纵队，以考察为名实行占领，以武力胁迫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接受法国统治，对于不肯就范或实行抵抗的非洲人则进行武装征服。

赤道非洲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使法国殖民者付出了巨大代价。赤道非洲的抗法斗争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类是群众自发的斗争，一类是有组织的抵抗。

群众的自发斗争多发生在刚果地区。如前所述，刚果的几个王国在 19 世纪末期已衰弱不堪，无力组织有效的抗法斗争。1880 年安济果王国、1883 年卢安果王国相继接受了法国的统治。当地人民并未屈服，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利用有利的地形，勇敢抗击法军。法国对刚果的征服主要沿着两条交通线进行：一条是从卢安果到布拉柴维尔的陆地交通线；另一条是由普尔到诺拉的河道交通线。1886 年初，马尔尚率队从海岸出发，经过与巴松迪人两年的血战，1887 年底到达布拉柴维尔。由普尔到诺拉的征程更为艰难，姆波希人、巴雅人英勇善战，法军屡遭败绩。1890 年，富尔诺纵队在诺拉被巴雅人击败，仓惶后退。增派援军后，在 1902 年和 1904 年又与巴雅人进行两年激战，终于占领了诺拉。为了占领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法军又对巴本贝人和巴科塔人发动战争，这种绥靖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尚未结束。加蓬、中非人民在氏族贵族投降后继续进行英勇抵抗。加蓬的芳族在 1886—1887 年与弗罗芒纵队多次血战。1891 年 5 月，中非人民在乌厄索地区击败富尔诺纵队，法军伤亡 50 余人。不久，在桑加河上游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又全歼克腊姆别耳纵队。

有组织的抵抗在乍得地区主要有三起。一是腊巴赫的抗法斗争。1891 年 4 月腊巴赫在坚加尔河全歼克朗佩尔纵队，标志着他抗法斗争的开始。同年 11 月，他率领军队先后击败比斯卡尔和阿尔伯拉·涅布两支纵队，使法国横贯非洲的殖民扩张计划遭到重大挫折。1899 年 5 月，布列顿纳纵队侵入乍得，但在 7 月的库诺会战中被全歼。10 月，让蒂尔纵队再攻库诺，又被打败。1900 年 4 月 21 日，让蒂尔同来自北非的拉密纵队和来自西非的梅尼埃纵队会师，

孚日是法国东北部一个省，地多森林；蓝线指森林。“孚日蓝线”是法国政客米尔·费里遗嘱中一语。

第二天与腊巴赫在富罗堡展开决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法军有数千人，并有强大的炮兵；腊巴赫有 1850 名持枪的士兵、4000 名持冷兵器士兵、600 名骑兵和三门大炮。战斗十分激烈。腊巴赫派出最优秀的射手组成密集的火网，杀伤大批法军，但终于不敌法军猛烈的炮火，富罗堡被攻占，腊巴赫阵亡。腊巴赫的儿子法达尔拉率余部继续斗争，1901 年 7 月在古吉巴战役中被击败，法达尔拉战死，腊巴赫王国瓦解。二是瓦达伊的抗法斗争。1904 年，法国宣布瓦达伊为保护国。杜莫腊在人民支持下武装了 8000—10000 人（其中 3000 人配有步枪），奋起抵抗。法军在 1909 年 6 月攻陷瓦达伊首都阿贝歇。杜莫腊坚持斗争，1910 年 1 月 5 日在马萨利会战中打死法军 186 名，11 月 8 日在多罗太村又击毙法军 101 人（包括一名中校）。法国大量增兵，1911 年 3 月终于迫使杜莫腊投降，接受法国统治。三是卡涅姆阿拉伯人的抗法斗争。1901 年底，米约上尉率队进攻比尔阿拉利据点，遭到失败，他本人被击毙。1902 年，两支法军经过苦战攻下比尔阿拉利，阿拉伯人退往博库。1913 年 11 月 27 日，双方在博库的重镇艾因加拉卡发生激战，法军伤亡 77 人，阿拉伯人被迫撤出该地。

法国殖民者一半通过欺骗，一半依靠武力，终于占领了赤道非洲这块四倍于法国的土地。1911 年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以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为前提，从法属赤道非洲割走 2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德属喀麦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又收回了这些土地。

七、法国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

法国殖民统治制度是在征服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882 年 12 月 17 日，法国政府颁布法令，设立法属刚果殖民地，下辖加蓬和刚果（刚果河以西直至大西洋地区），由刚果的创建者布拉柴负责。1902 年，法国政府又将刚果河盆地以北到乍得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划归法属刚果。1905 年，殖民政府宣布，法属刚果下辖四个地区：加蓬、中央刚果（1903 年 12 月 29 日刚果改为中央刚果）、乌班吉—沙里和乍得；1906 年，又通过一项法令将后两个地区合而为一。1910 年 1 月 15 日，殖民政府将法属刚果正式改名为法属赤道非洲，包括加蓬、中央刚果和乌班吉—沙里—乍得三个地区。至此殖民制度初步确立。法国在布拉柴维尔设一大总督，统辖三个地区。在每个殖民地设一总督，下属若干省、区和分区，由总督派官员直接统治，官员全由法国人充任。这是一种直接统治制度。但由于缺少资金和工作人员，这种制度一直未能全面推行。据统计，1908 年有行政区 17 个，1912 年增到 59 个，同期，官员数量由 107 人增加到 273 人。这一数字相对于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实在不成比例，许多地区仍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以外。有资料记载，1912 年，法国实际占领的地区为 60%，受其影响的占 20%，另有 20%完全在其控制之外。实际上，60%的数字也不符合实际。以乌班吉—沙里—乍得为例，名义上划为几个省和区，但法国人拥有的只是 18 个军事据点，其中还有一半据点因人员不够而几乎不起作用。正因如此，军事管制便成了一种普遍的替代形式。1913 年，乍得 49 个区中的 25 个、164 个分区中的 93 个处于军管之下。与此相应，殖民占领军的数量不断增加，1908 年为 3400 人，1912 年增至 7200

人，但仍捉襟见肘。

对非洲居民，法国殖民政府推行租让制，通过私人资本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法属赤道非洲地区人烟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 1.5 人，生产的橡胶、棕榈也很少，经济价值不大。殖民政府从建立伊始就入不敷出。1893—1898 年，法国在赤道非洲的财政补贴为 13512514 法郎。因此，法国政府无心经营这块花钱的殖民地。1893 年和 1894 年，通过两个秘密租让合同，政府将 13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上奥戈韦公司和奎卢—尼阿里公司，期限为 30 年。这一消息披露后，舆论哗然，法国政府以承认公司对 70 万公顷土地的全权占有为条件收回了租让权，租让制也被暂时搁置下来。不久，在利奥波德授意下，关于赤道非洲拥有丰盈财富以及刚果自由邦各租让公司大发其财的消息不断传到法国，大大刺激了法国金融资本的贪欲。他们猛烈抨击殖民政府对非洲人过于仁慈，要求推广租让制。到 1899 年 1 月，“刚果热”风靡法国，巴黎的股票持有者都盼望做一个发横财的“刚果佬”。这种侥幸发财的心理正是陷入财政困境的政府所企求的。1898 年，巴黎成立了一个土地租让管理委员会，为推行租让制作准备。1899 年 3—7 月，政府先后同 40 个公司签订租让合同，租出土地 66554000 公顷，租期 30 年。根据合同，公司享有对租让土地的全部使用权；作为交换，公司上交利润 15% 给政府。法国的“刚果佬”带着急不可耐的发财欲，一到殖民地便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疯狂掠夺当地物产。于是，贸易额直线上升，1902 年为 1270 万法郎，1903 年为 1691.6 万法郎，1904 年为 2119.3 万法郎，1907 年达到 3595 万法郎。其中，输出额由 1900 年的 7539515 法郎上升为 1910 年的 24630872 法郎。世界市场热门货橡胶和象牙占了输出额的绝对多数。如 1904 年中央刚果输出总额为 747.9 万法郎，橡胶占 50%（379.99 万法郎），象牙占 41%（300.6 万法郎）。然而，并非所有的租让公司都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财富。据 1904 年统计，只有 6 家公司赢利 2645045 法郎，另有 26 家亏损 12510219 法郎，还有 8 家公司已经破产。

虽然租让制没有满足“刚果佬”的发财欲望，但它带给非洲人民的苦难却丝毫不亚于刚果自由邦。为了大量掠夺当地的橡胶、象牙等物产，殖民政府和租让公司沆瀣一气，采取了一系列鱼肉非洲人的措施。第一，剥夺非洲人土地。1899 年，殖民政府颁布空地法令，将大片土地收归国有；以后又做了几次调整，进一步缩小非洲人的保留地。1901 年 3 月，政府规定每个土著可拥有 3—4 公顷土地，1902 年减至 2 公顷。保留地土地严重不足，扼杀了非洲人小农经济的发展。第二，实行垄断贸易制。殖民政府规定，非洲人只许将产品卖给当地公司。而这些公司在收购时往往不付现金，用从法国进口的劣质商品顶替；公司还肆意抬高这些劣货价格，有时竟超过市价的 300—500 倍。第三，采用以橡胶纳税的制度。殖民政府通过租让公司征收的人头税常被折成实物。收税时，公司代理人员经常随意折算，有时折算的橡胶定额竟超出应缴税额的 5—10 倍。第四，征收苛捐杂税。殖民政府迫使非洲人

Buell, op.cit., p.221.

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殖民地大家族中的灰姑娘”。P.T.Moon.op.cit., p.113.

Félicien Challaye, Le Congo Français (《法属刚果》), Paris 1909, pp.163-164.

Buell, op.cit., p.234.

Félicien Challaye, op.cit., p.186.

缴纳筑路税和建造哨所税，对非洲人的乐器（手鼓等）也征收娱乐捐；对产盐户课以重税，迫使非洲人到租让公司购买高价法国盐。第五，推行强迫劳动制度。这一制度在乍得最为突出。乍得气候干旱，北部多为沙漠和半沙漠，可供掠夺的物产有限，因此劳动力便成了替代品。法国在征服腊巴赫后，曾把战俘和一部分当地居民当作奴隶强行征用。1913年，法国又胁迫瓦达伊苏丹签订果兹—贝达协定，将大批居民征为劳工。这些劳工或被迫无偿地为政府服各种徭役，如修路，建桥，为军队运送货物；或被迫替公司采集橡胶、运送货物（报酬很少）。第六，为监督非洲人劳动，殖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土著法，即花样繁杂的行政、警察惩罚制度，包括扣留人质、鞭笞、砍手和讨伐等。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地的农业、手工业遭到很大摧残，人口大量减少。据统计，1911年法属赤道非洲有2000万人，1921年减至750万人。除大量死亡外，大批人口逃到比属刚果和西属几内亚。

人民无法忍受，奋起抗争。1904—1905年，各地反抗斗争纷纷展开。在曼吉阿族居住的沙里河上游和邦佐族居住的洛巴耶盆地，反抗最为激烈。他们捣毁据点，杀死殖民代理人员，将橡胶塞进被杀死的商人头颅。殖民讨伐军屡遭败绩，直到1912年才打败起义者，重新占领这个地区。

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暴行也引起国际舆论的一片斥责，但并未像对刚果自由邦的抨击那样引起轩然大波。这与法国是欧洲大陆强国的地位有关。英国曾因其商业活动受到损害，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因此，1904年，法国政府派出以布拉柴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研究改进殖民管理制度和改善土著状况的措施。几个月后，委员会返回欧洲，但调查报告如石沉大海。后来调查团成员查来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法国殖民管理制度和租让制。1906年，他在巴黎成立了法国保护土著协会。1908年，巴黎又成了一个保护土著的国际协会。通过舆论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

舆论的压力和英国的抗议，加上租让制本身的失败，迫使法国政府实行改革。1909年，它废除实物税，改行货币赋税；接着与租让公司谈判，以承认公司对部分土地的私有权为条件，收回了大片租让土地。据统计，共收回土地3100万公顷，其中800万公顷立即交还，另2300万公顷在10年后归还。到1923年，租让公司减少至11家，租让地缩减到152390平方公里。但这次改革并不象法国政府所吹嘘的那样富有成效，收回的大多是公司废弃不用的荒地，而且要到十年后才交还；土著的状况也并未得到任何改善，各种暴行继续发生。1920年，一位传教士证实：公司的武装人员将一队非洲人捆绑起来，押着他们前去收割橡胶。这些人赤身露体，被折磨得麻木无知。他们在饥饿和疾病的袭击下，像苍蝇一样倒下去。病人和孩子留在村中任其挨饿，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Lolrd Hailey, op, cit., p.121.

Buell, op.cit., p.251.

P.T.Moon, op.cit., p.115.

第二十七章 英德瓜分东非和各族人民起义

19世纪70年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在东非，一直占有殖民优势的英国遇到了德国的强劲挑战。80年代中后期，双方为抢占东非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它们既争夺又勾结，经过一番较量，于1890年签署了赫耳果兰条约，最终完成了对东非的瓜分。英国夺得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德国则占领了坦噶尼喀、卢旺达和布隆迪。

英德对各自东非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迅速激化了东非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东非各族人民为获得独立和自由，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对殖民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斗争。1905—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把东非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坦噶尼喀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滥觞。东非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德的殖民统治，在东非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英德对东非的争夺和瓜分

尽管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西方列强对东非存觊觎之心，并对东非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殖民渗透活动，但争夺和瓜分东非的斗争却主要在英德两国之间展开。英德争夺和瓜分东非的斗争经历了半个世纪，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885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或称之为英德殖民渗透阶段。

英国自19世纪20年代渗入东非，至50年代已基本控制了桑给巴尔素丹国。60年代末，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东非战略地位更显重要，为此，英国加速了对桑给巴尔素丹国的控制。1872年，英属印度汽轮航运公司开辟了每月两次的通往桑给巴尔的海上航班；1877年，英国东方电报公司铺设电缆，接通了亚丁至桑给巴尔的通讯线路。这一时期，英国与桑给巴尔的贸易量也急剧上升，成为桑给巴尔素丹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世纪70年代初，其贸易量两倍于德国、三倍于美国。70年代中后期，英国开始探索把桑给巴尔素丹国及东非其他地区变成其殖民地的可能性。1875年，在英国驻埃及领事戈登的策划下，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于11月派军队前往东非。他们在英国军官指挥下，先后占领了布腊瓦、基斯马尤等地，计划自沿海至乌干达建立一系列军事据点，实行军事占领。英埃的军事行动遭到桑给巴尔素丹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考虑到占领形势尚不成熟，下令埃及军队撤回。1877年，麦金农与桑给巴尔素丹巴加什谈判租借东非沿海地区事项。所谓租借地，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殖民地形式。但这次谈判以破裂告终。1884年7月，英国殖民者约翰斯顿潜入东非内陆，在乞力马扎罗山一带与当地酋长订立了一系列条约，旨在把这些地区纳入英国殖民势力范围。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英国在东非的殖民活动往往不以政府直接出面的形式进行，其原因一是英国在当地的殖民势力比较强大，可以通过控制、操纵桑给巴尔素丹来维护自身的殖民利益；二是英国当时尚未遇到强劲对手，政府在幕后活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交纠纷。这是一种狡猾的殖民活动方式。

德国在统一前已渗入东非沿海地区，但活动规模十分有限。19世纪60年代前，主要表现为一些德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如汉堡的一些商行在桑给巴尔开设分行，派驻代理商。60年代，德国的探险家开始深入东非内陆活动。70年代初德国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很快向帝国主义过渡。随之而起的是德国殖民势力的膨胀，垄断资本开始把眼光转向海外。1873年，德国成立了开发热带非洲协会；1876年，又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德国分会；1880年，上述两个协会合并为柏林德国非洲协会。1884年，德国一群殖民主义者又发起组织了德国殖民协会。70年代至80年代初，尽管德国垄断资本把殖民目标瞄准了非洲，但尚未采取公开的殖民入侵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德国统一不久，急于巩固普法战争后在欧陆建立的地位，因此不能把大量精力投向海外。但是，以对非洲殖民活动为宗旨的殖民组织的出现，预示了德国大规模殖民活动的开端。

在英德殖民渗透阶段，两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与当时双方实力对比相适应的是，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显得更为强劲，从而占有明显的优势，自19世纪70年代起，德国加快了渗透步伐，但尚未对英国构成威胁，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两国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

1885年3月—1886年10月，是英德争夺和瓜分东非的第二阶段，或称之为德国急剧扩张阶段。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同德国国内的狭小市场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从而有力刺激了德国垄断资本对海外殖民地的占有欲；而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日趋激化，更增加了德国抢占海外殖民地的紧迫感。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国内鼓吹对外殖民扩张的呼声甚嚣尘上。1884年初，英驻柏林大使安普西尔报告说：“由于今秋的大选临近，俾斯麦对殖民事务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因为反对派在大选中会喊出当前流行的口号：‘为德国夺取殖民地！’”事实也是如此，俾斯麦在大选前一改以往对殖民地的保守姿态，于1884年4月首先在西南非洲建立了德国在海外的第一块殖民地；10月，为加强德国在东非的殖民活动，任命罗尔夫斯为驻桑给巴尔领事；12月，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彼得斯潜入东非内陆，在乌萨加腊等地与当地酋长订立了12份条约，涉及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1885年3月，德国政府宣布把上述地区置于德国保护之下。这一事件不但标志德国开始对东非实行直接占领，同时也拉开了德国急剧扩张的序幕。

桑给巴尔索丹巴加什致电德皇，声明彼得斯所订条约无效。然而，对德国而言，巴加什的态度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英国的反应。1885年3月，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公开表示：“如果德国希望成为一个殖民强国，那末我将说：愿上帝帮助它成功。”难道英国真诚欢迎德国分享东非殖民地？当然不是。英国的态度是由它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困境所决定的。在苏丹，声势浩大的马赫迪起义使英国殖民军穷于应付而无力自拔；在埃及，英法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在阿富汗，俄国重兵压境，英俄大有一触即战之势。为避免陷入四面楚歌，英国不愿再与德国搞僵关系。然而，英国外交部官员私下认为，德国在东非的行动“是一种明显的表示，如谈不上敌意，也至少是

P.Gifford,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英德在非洲的大角逐和殖民统治》), Yale 1967, p.6.

佐伊·马什等：《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6页。

对英国的仇视”。十分清楚，德国在东非的殖民扩张从一开始就触犯了英国利益，两国矛盾由此而起，双方的冲突也将不可避免。

德国在东非首次得手后，加快步伐，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1885年4月，登哈特与维图统治者辛巴谈判后，宣布维图及其邻近地区为德国保护地。巴加什素丹再次提出抗议，德国立即使用武力迫使素丹让步。1885年8月，德国战舰驶入桑给巴尔港，并公开扬言“要让素丹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在火炮瞄准下，巴加什被迫承认德国在东非订立的所有条约，并同意让德国使用达累斯萨拉姆和潘加尼两个港口。

德国在东非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引起了英国的嫉视：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发展对于印度和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担心，德国如继续蚕食东非，“可能导致他们通向南非的东部和西部”，从而会直接损害英国在南非的利益。英国面临选择，正如英驻桑给巴尔总领事柯克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英国准备眼睁睁看着德国在东非沿海地区占有最高主权，……还是设法取得一定的妥协，借以保持我们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霍姆伍德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详尽描述了东非发展前景及其巨大的潜在商业利益，他呼吁英国成立东非协会，并向政府申请特许状，以插手东非的殖民事务。霍姆伍德的呼吁立即得到麦金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四出活动，竭力取得各界人士的支持。1885年4月底，霍姆伍德正式把计划呈报外交部。英国政府鉴于国际关系中的困境，不愿同德国发生冲突，但更不愿丧失在东非的殖民利益，因此建立特许公司确是解决上述难题的有效手段，因为特许公司既可放手进行殖民扩张，又可不让政府承担直接责任。英国政府把霍姆伍德的计划通报德国政府，德方很快作出反应，希望英国推迟计划的实施时间。为了避免在瓜分桑给巴尔素丹国时与英国发生冲突，德国还同意与英法共同组成勘界委员会，以确定桑给巴尔素丹国的疆界。

1885年6月，英、德、法三国组成勘界委员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委员会中居然没有一名桑给巴尔素丹国的代表。委员会作了三次航行勘察，但对桑给巴尔素丹国在大陆的内陆地区范围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德国为夺取内陆地区，将其内陆纵深范围限为10哩，在某些地区甚至否认素丹的统治权；桑给巴尔素丹国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因此英国主张其内陆纵深应达40哩。双方分歧颇大，勘界委员会经过几次争论，于1886年不欢而散。

德国为了扩大在东非的所得，决定利用英国与其他西方列强的矛盾。德国政府主动派代表赴伦敦谈判，德方表示，若英国在东非作出妥协，那末德国将在埃及问题上支持英国。双方经过讨价还价，于1886年10月签订了英德协定，规定桑给巴尔素丹国的领土上除沿海岛屿外，大陆的内陆地区纵深为10哩；划分英德在东非的势力范围，其界线约同现今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国界；英国承认德国占有维图，并支持德国租借达累斯萨拉姆海关。为了换取法国对英德协定的承认，英德支持法国占领科摩罗群岛。1886协定对英国

P.Gifford, op.cit., p.7.

R.Oliver, op.cit., p.371.

Gifford, op.cit., pp.4-5.

Z.Marsh & G.W.Kingsnor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东非史简编》), Cambridge 1963, pp.108-109.

来说，排除了德国独占东非的威胁，保住了大部份传统势力范围；对德国而言，协定巩固和扩大了它在东非的殖民势力范围。

1886年英德协定暂时缓和了两国自1885年3月以来的矛盾，标志着英德争夺、瓜分东非斗争的第二阶段的结束。在这个阶段，两国争夺的目标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又逐渐向内陆推进。

1886年10月—1890年6月为第三阶段，或称之为英德最终瓜分东非阶段。

1886年英德协定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争夺东非的矛盾，相反，协定签署后，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争夺。1887年，英国成立了东非协会。在政府帮助下，东非协会从巴加什素丹手中租借了与英国势力范围相对应的大陆沿海地区，租借期为50年。1888年4月，东非协会改组为英国东非公司，9月获得政府特许状。德国不甘落后，1888年，德国也成立了东非公司，并租借了德国势力范围的沿海地区。至此，东非沿海地区被瓜分完毕。

争夺内陆的斗争更为激烈。英国东非公司的目标是“夺得几乎所有的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区，……然后向坦噶尼喀湖挺进，并在该湖建立港口”。如能实现这个目标，英国在东非和南非的殖民地将连成一气，从而为二C计划的最终实施铺平道路。德国东非公司则力图占领广大内陆地区，建立对英国殖民地的包围圈，使英国殖民势力限于沿海一隅。

争夺内陆的斗争首先围绕着苏丹赤道省展开。马赫迪起义后，赤道省与外界联系中断，英德两国都力图通过援救该省总督埃明帕夏以控制其手下的武装力量，并趁势把赤道省纳入本国势力范围。英国首先成立了以麦金农为首的营救委员会，并于1889年派遣杰克逊率队出发。麦金农明确指出，此行目的是“打开直接通往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区的苏丹通道，进而在东非内陆建立据点”。德国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并在同年稍晚些时候派出魏斯曼和彼得斯分批出发。然而，英德的营救队都迟了一步，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派遣的斯坦利早于1887年底启程，沿刚果河而上，先行抵达赤道省。埃明帕夏放弃了赤道省，随斯坦利前往沿海。

英德在赤道省没有得手，于是立即把眼光转向乌干达。乌干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占领乌干达就意味着控制了尼罗河源头。1886年英德协定所划分的势力范围仅限于维多利亚湖东岸，因此乌干达的归属并没确定。德国一旦占有乌干达，便可形成对英国殖民地自维图经乌干达至坦噶尼喀的弧形包围圈，并切断英国人与尼罗河源头的联系；而英国如控制了乌干达，也即控制了尼罗河上游，这样有利于确保它在埃及的殖民利益。1889年6月，彼得斯率援救队溯塔纳河而上，抵达赤道省边界。当他获悉埃明帕夏已经离开后，立即转向乌干达境内最大的王国布干达。在布干达，由于英法传教士和阿拉伯人的活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使布干达陷于长期动乱之中。布干达国王姆旺加幻想借助外国力量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曾向先行抵达的英国援救队及杰克逊求援，但杰克逊并没有立即作出答复。彼得斯抓住时机，赶到布干达首都门戈，与姆旺加订立条约，置布干达于德国保护之下。杰克逊闻讯后火速赶回门戈，要求姆旺加废除对德条约，并重新与英订约，但遭拒绝。

Gifford, op, cit., p.18.

Gifford, op.cit., p.12.

英德在乌干达的冲突激化了两国矛盾，也给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德国精心拼凑的三皇同盟破裂后，俄国与德国宿敌法国迅速接近，俄法关系日益密切。这使德国在欧陆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英德的冲突无疑将使德国更陷孤立。为避免出现更加被动的局面，德国于 1890 年与英国谈判，对东非作了最终瓜分，并为此签署了赫耳果兰条约。条约规定，德国承认桑给巴尔为英国保护地，乌干达为英国势力范围，德国放弃维图；英国同意德国占领其沿海租借地，英国把北海的赫耳果兰岛让给德国。

赫耳果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德瓜分东非的争夺和斗争最终完成。在第三阶段中，德国的凶猛扩张已危及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国采取了毫不相让的行动，双方抢占殖民地的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场势均力敌的争夺中，两国的殖民目标已从沿海转向内陆。赫耳果兰条约的签订，使英德在东非占有殖民地的格局最终明朗化：英国占有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德国则攫取坦噶尼喀、卢旺达和布隆迪。

二、英德对各自殖民地的占领

赫耳果兰条约签订后，英德分别采取行动，实行对各自殖民地的占领。

英国在订约后四个月，宣布桑给巴尔及其所属岛屿为英国保护国。1894 年，英国东非公司交出特许状，英国政府把沿海地区接管过去，并入英属东非保护领。

英国占领乌干达化费了数年时间。1890 年 12 月，东非公司派遣卢加德前往布干达。当时布干达的形势比较复杂。早在 1840 年代末，第一批阿拉伯人就进入布干达活动，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教徒人数不断增加，在当地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迅速提高。1875 年，斯坦利抵达布干达，他呼吁西方派遣传教士赴布干达。1876 年，英国新教行教会首先派传教团进入布干达传教。同年，法国天主教白衣神父会传教团也接踵而至。于是，在布干达逐渐形成了代表阿拉伯人势力的伊斯兰教派、代表英国势力的基督教新教派和代表法国势力的天主教派。他们积极活动，扩充实力，力图控制布干达政局。1884 年 10 月，布干达国王穆特萨去世，其子姆旺加继位。姆旺加目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给本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危害，决意逐步清除西方传教士及其势力。1885 年 10 月，他下令逮捕并处死了英国的汉宁顿主教；1886 年 5 月，他在门戈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进行清洗。1888 年 9 月，姆旺加为肃清外来宗教的影响，计划恢复布干达传统宗教卢巴雷教，并把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都列入取缔之列。由于消息被泄露，上述三个教派联合起来，废黜了姆旺加，立其兄基威瓦为王，姆旺加被迫逃往维多利亚湖南岸。基威瓦上台后，由三个教派分享政权。但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伊斯兰教派为独占布干达而发动政变，废黜基威瓦，立其弟卡勒马为王，并把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驱赶出境。1889 年 10 月，天主教派与基督教新教派为重返布干达而与姆旺加携手联合，并击败了卡勒马的军队。伊斯兰教派在布尼奥罗国王支持下，虽一度打回布干达，但在 1890 年 2 月的战斗中再遭重创，只得败退布尼奥罗。姆旺加复位后，大权完全落入天主教派和基督教新教派之手，但他们都企图排斥对方，因此两派磨擦不断，矛盾日益激化。卢加德到达布干达后，基督教新教派有恃无恐，而天主教派则加紧备战，气氛十分紧张。卢加德为站稳脚跟，首先于 1890 年 12 月迫使姆旺加订约，承认英国东非公司对布干达的宗主权。1891

年5月，他率军击溃了退居布尼奥罗的伊斯兰教派的武装力量，解除了外部的威胁。接着，他率军远征，收编了原苏丹赤道省总督埃明帕夏留在当地的武装力量。除把一部份军队留在托罗——布尼奥罗边界一线外，其余均带回布干达，此举大大增强了英国在布干达的实力。英国实力的增长引起了天主教派的不安，两派对立更加尖锐。1892年1月，基督教新教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卢加德依仗军事优势击败了天主教派，而天主教派却挟持姆旺加外逃。3月末，姆旺加避开了天主教派的监督，返回门戈。天主教派失去了姆旺加，只得屈服。英国基本控制了布干达。

1894年，英国政府从东非公司手中接管了布干达，并宣布成立乌干达保护国。保护国成立后，英国继续向布干达周围地区扩张。

布索加地区有若干布索加人王国，它们以前都臣服布干达。英国早在1891年就向布索加地区渗透，并在当地建立了一些殖民据点。乌干达保护国成立后，英国殖民当局用武力征服了这些小国。1895年12月，英国与布干达订立《乌干达——乌索加协定》，规定布干达放弃对布索加的全部主权。此后，英国把布索加并入了乌干达保护国。

布尼奥罗在英国入侵前一直是个独立国家。英国为打通进入阿尔伯特湖的道路，派遣武装力量入侵布尼奥罗，并在沿途建立四个殖民据点。布尼奥罗国王卡巴累加奋起抵抗，不断袭击英国殖民军。1894年，英国依仗先进的武器装备击败卡巴累加军队，卡巴累加被迫撤离本土。英国对布尼奥罗实行了军事占领。

1896年7月，英国将布尼奥罗、布索加、安科累和托罗全部并入乌干达保护国。

1895年，英国把自沿海至奈瓦沙湖之间的地区宣布为英属东非保护国（1920年改名肯尼亚）。在这个地区，马萨伊人由于内战而削弱了力量，瘟疫的流行更使他们大伤元气，因此英国人进入内陆时并没遇到强烈抵抗。英国殖民当局对马萨伊人采取蚕食政策，逐步侵占其土地。然而，在占领吉库尤人、南迪人和基皮斯吉人的土地时，英国还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战争才得以实现。

德国于1889年10月宣布成立德属东非保护国，最初由东非公司管理。但德国的殖民占领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当地人民有力的抵抗。1891年，德国政府取消了东非公司的特许状，直接接管东非殖民地。德国对其殖民地的占领主要通过暴力行动，在镇压了各地人民的反抗后才得以实现。

三、英德对东非的殖民统治

英德瓜分和占领东非后，着手在各自殖民地建立殖民机构和各种统治制度。

1890年，冯·索台被任命为德属东非的首任总督。他上任后逐步健全殖民统治机构，先后成立了财政部、测量及农业部、司法部、卫生部和公共工程部。

德国殖民当局对德属东非各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形式。在沿海城镇及其邻近地区，各级政府由德国官员直接掌握和控制；在沿海地区和某些内陆地区，以德国人出任的地区专员为首，下设若干名“阿基达”（中层官员，通常由阿拉伯人担任），在阿基达之下又配备了许多“琼贝”（村长，一般由

非洲人担任)；在大部份内陆地区，部落酋长(有些是被保留下来的原部落酋长，有些则是由殖民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直接从属于殖民当局。上述地区的统治形式虽略有差别，但基本上属直接统治。德国官员代表殖民当局握有最高权力，殖民当局任命的一些中下层官员，如阿基达、琼贝和酋长们，虽有非洲人或阿拉伯人出任，但他们只是执行殖民当局的指令，主要任务是征税、为德国种植园提供劳动力、为公共工程征集劳工、监督农民种植当局规定的经济作物等。在德属东非的东北部高原地区，布隆迪、卢旺达和布科巴，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地区的传统统治者和社会制度在形式上被保留下来，素丹和酋长在一定范围内仍可行使某些权力，殖民当局向这些地区派驻一名驻节长官，名为顾问，实则监督素丹和各级酋长，进行间接统治。

德国的对外殖民政策同其对内政策一样，带有鲜明的军事专制的特色。

在政治上，殖民当局完全依赖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对德属东非的统治。1893—1906年间的四任总督全部来自军人。非洲居民(包括各级酋长)稍有不满或反抗，立即会遭到残酷的惩罚和镇压。彼得斯公开表示：要让非洲人“知道德国人的厉害”。他在任乞力马扎罗地区专员时，在戈戈族人地区一次就惨无人道地烧毁12座村庄。

在经济上，为把德属东非变成宗主国的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殖民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措施。

第一，强行剥夺非洲居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1895年，殖民当局宣布，德属东非的全部土地归德皇所有，当局有权出卖、出租或分配这些土地。于是，大批良田落入德国和欧洲的移民或公司之手。据统计，1907年仅萨达尼一地，德国12家大公司占田就达12.5万英亩。而分配给非洲人的土地则大多是零星和贫瘠的土地。

第二，全力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生产。德国为使东非殖民地生产其所需的农业原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做法。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吸引德国及欧洲移民迁居东非，分给大量土地，支持他们开办种植园，大规模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德国移民或公司建立的种植园，占地面积一般都较大，如最早开办的两座棉花种植园占地面积均达300平方公里。至1910年，德属东非已有橡胶种植园250座、剑麻种植园54座、棉花种植园17座。另一方面，殖民当局应用行政手段，强迫当地农民种植橡胶、剑麻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因此，德属东非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仅以剑麻为例，1905—1913年，种植面积由1390公顷增加到24750公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剑麻、橡胶和棉花已成为当地主要出口项目，1913年剑麻出口值为1030万马克，橡胶为650万马克，棉花也超过200万马克。

第三，肆意掠夺当地人力资源，为了给德国或欧洲人种植园提供大批劳动力，殖民当局实行强迫劳动制，成年居民每年需无偿服役一个月。服役者大多被送往种植园，也有部份人在铁路等公共工程工地劳动。此外，殖民当局还通过征税等手段迫使土著居民外出出卖劳动力。征收的税收名目繁多，

Oliver, op.cit., p.444.

D.W.Nad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帝国主义在东非》), London 1981, vol.I, p.23.

Gifford, op.cit., p.410.

Harlw, op.cit., pp. 152-153.

Stoecker, German Imperialism in Africa (《德帝国主义在非洲》), London 1986, pp.150-151.

如茅屋税（每年3卢比，1912年后改为人头税，税额上升至3—5卢比）、死亡税等。1891—1892年度，德属东非税收总额为145.8万马克，1895—1896年度已猛增达621.5万马克。为了交纳不断增加的税金，非洲居民或扩大经济作物生产，或外出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现金。

第四，强化对贸易的控制。德国东非公司包购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作物和其他传统产品，并垄断了大部份进出口业务。1897年，德属东非的出口仅有22%输往宗主国，而72%却经桑给巴尔转运英国和印度；至1911年，对宗主国的贸易占其出口总额的59%，而转运英国和印度的已降为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垄断资本已成为德属东非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当地传统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农业生产中传统作物生产萎缩，尤其是粮食生产，不但不能自给，反而需要进口。1913年的官方统计表明，当年的粮食进口已达504.9万马克。大量西方工业品的涌入，摧毁了当地传统手工业。对外贸易逐步脱离了传统的印度洋贸易体系，德属东非经济被纳入了殖民地经济的轨道。

在英国的东非殖民地，即桑给巴尔保护国、乌干达保护国和英属东非保护国（肯尼亚），英国所采用的殖民统治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乌干达，英国实行间接统治。曾在印度等地服役的卢加德，深受英国殖民统治技巧的熏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在我居住和目睹的众多国家中，只要有可能通过其原有的首领和习惯法来统治土著居民，英国就不会实行专制政策”。他对乌干达提出实行间接统治的设想：“关于乌干达的内政，我认为目标应该是利用固有的行政机构来治理这个国家。”1892年，卢加德用武力平息了教派争斗后，对布干达的权力作了重新分配。姆旺加仍为“卡巴卡”（国王），他由三位首席部长辅佐，基督教新教派代表任第一首席部长，天主教派任第二首席部长，伊斯兰教派任第三首席部长。各地区的酋长席位也在三个教派中重新派定，基督教新教派获得了其中大多数席位。天主教派次之，而伊斯兰教派仅得到三个酋长职务。卢加德此举为英国在布干达实行间接统治奠定了基础。1894年，英国政府从东非公司手中接管布干达，次年任命威尔逊为布干达总督。威尔逊进一步完善了布干达的间接统治制度，增设了土著法院等组织。1900年，英国专员约翰斯顿与布干达国王签署的布干达协定，最终从法律上全面确认了间接统治制度。协定规定，布干达作为乌干达保护国的一个省，其财政收入归保护国。国王每年由殖民当局支付不少于1500英镑的年薪。国王可任命一位首相、一位首席法官和一位财政部长协助其工作。国王的法庭仅审理布干达臣民的案件，无权过问外国人的纠纷，该法庭判处死刑须经英王批准后生效。整个布干达被重新划分为20个郡，郡下设乡和村。布干达设立政务会议，由3位大臣、20名郡长及国王指定的60名其他成员、6名知名人士组成，其决议经英王政府代表批准后方可实施。十分明显，协定在形式上保留了布干达的传统制度，但其实质已被

Oliver, op.cit., p.449.

Nadudere, op.cit., p. 25.

Sroecker, op. cit., p. 156.

Margery Perham, Lugard: The Years of Adventure 1858-1898 (《卢加德的冒险年代》), London 1956, p.311.

Margery Perham,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Nigeria (《尼日利亚的土著管理》), London 1962, p.36.

改造，英国殖民当局掌握了当地最高权力，国王和各级酋长实际上成了殖民当局的雇员，成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布干达的间接统治日后被推广到整个乌干达保护国。

桑给巴尔保护国也实行间接统治，但程度与乌干达有所不同。殖民当局的最高官员是英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英国政府为桑给巴尔素丹增设了首席大臣一职，但任此职的却是英国人马修斯（他还兼任素丹军队的总司令）。素丹名为国家元首，但不得过问外交、军事、司法和财政等重大事宜。素丹本人的财政支出受到限制。素丹虽可以指定其继承人，但事前必须经英国方面首肯，新素丹还应向英王宣誓效忠。因此，桑给巴尔素丹仅仅是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具摆设而已。

在肯尼亚，英国原来计划建立一整套既适合殖民者、又适合当地居民的政府机构，但这个计划在实践中碰壁，因为当地不存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系。于是，英国实行直接统治。英国专员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殖民当局设立了农业部、财政部、司法部、贸易与关税部、林业部、卫生部和公共工程部；1906年后，专员之下又成立了立法议会和行政议会（这两个议会中没有一名非洲人的代表）。肯尼亚被划为四个省，殖民当局曾在马萨伊等族中任命了一批酋长。由于这批人不具备传统的权威，英国人后来只得改变做法，从当地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或长期受殖民当局雇佣的人员中挑选。酋长由英国专员任命，并由当局支付薪水。他们主要负责征税、召集劳动力等日常事务。在酋长之下，还设有村长一职，以协助酋长工作。1907年颁布的法院条令规定部落设立长老会议，行使司法权。

无论实行间接统治或是直接统治，英国对东非各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都十分残酷。

第一，掠夺非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肯尼亚，英国殖民当局于1902年颁布了皇家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归英王所有，当局有权处理这些土地，有权把不超过1000英亩的耕田或5000英亩的牧场租让给欧洲移民，租让期为99年。1915年，英国竟把租让期延长到999年。少数白人以此霸占了大量良田。英国东非辛迪加由外交部分配到500平方公里土地；在裂谷地区，两个辛迪加和四个白人移民竟占据当地1/2的土地；在肯尼亚高地，英国人德拉梅尔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土地100万英亩。在布干达，殖民者入侵前，其全部土地属于国王，各级酋长虽从国王手中分得土地并对农民征租，但他们不享受土地所有权，也无权转让土地。1900年的布干达协议使这种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全面解体。协议规定，布干达一半土地作为英王财产，由殖民当局掌管，在另一半土地中，500平方英里作为布干达国王及王室的私产，其余的8000平方英里分配给酋长们。这不但使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用权，而且产生了一个以酋长为主体的新的地主集团。这些人大多集地主和殖民官员于一身，作为地主，他们依靠殖民当局而占有土地，并向佃农征租；作为殖民官员，他们负责替当局征税、筹集劳力、维持秩序，并从中取得报酬，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

非洲居民失去土地后，被殖民当局强行赶入所谓的土著保留地。在肯尼

Nabudere, op.cit., p.55.

起初主要是上层酋长分得土地，获地者约千余人；后来范围逐步扩大，下级酋长也分得土地。人数增加到近4000人。

亚，最早建立的是马萨伊人保留地。1904年，殖民当局与马萨伊族酋长订约，规定在乌干达铁路的南北两侧建立两个保留地，两地之间仅留一条半英里宽的通道。1908年，这条通道被关闭。1911年，英国强迫马萨伊族订立第二个协定，把南北两个保留地合并，所有马萨伊人只能在铁路以南的狭小的保留地中生活。马萨伊人一再反对，但合并还是于1913年完成。在英国的其他东非殖民地，也程度不同地采用划定保留地的做法。保留地大多土质贫瘠，连殖民当局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在这样的地方，50万英亩土地就是白给，也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欧洲人会要。”[—]

第二，强制推行单一经济作物。英国强制殖民地农民改变当地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转而生产英国所需的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例，英国垄断资本为摆脱对美棉的严重依赖，竭力在东非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为此，英国专门成立了英国棉花生产协会，并筹集了50万英镑的基金。这个协会在殖民当局配合下，把大量棉种运往乌干达等地，由当局向农民分发棉种，强迫他们种植。仅乌干达一地，1906—1915年间，棉花出口量竟增长了171倍；1918年棉花种植面积已达56000公顷。除棉花外，英国在乌干达还强行推行咖啡和橡胶生产；在肯尼亚则鼓励白人移民创办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棉花、橡胶、咖啡和剑麻；在桑给巴尔支持阿拉伯种植园主扩大丁香生产。

第三，实行强迫劳动制。在乌干达，每个成年非洲人每年须为当局无偿劳动30天；肯尼亚为24天。但实际上往往超过所规定的期限。例如，1901年，肯尼亚殖民当局发布一项法令，声称英国总督能随时动员当地非洲居民修建公路或从事其他工程，酋长在接奉命令后，有权派遣有劳动力之男子去筑路或养路，其期限由酋长根据需要决定。非洲居民如有违抗，可被判处30先令以下罚金，或一个月以下的监禁。强迫劳动制为白人移民经营的种植园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难题，也为殖民当局兴建公共工程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第四，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英国在东非殖民地不但设置众多税目，而且税额也不断提高。以肯尼亚为例，仅在麦卡柯斯地区，征税总额在1901—1902年度为8668卢比，而1912—1913年度已增加至168042卢比；在北部的卡维龙多，1901—1902年度为26000卢比，1912—1913年度已达336000卢比。

英德对东非殖民地的残暴统治和无情掠夺，使东非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经济上失去了自主，生活上失去了自由。东非社会的各类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四、东非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英德对东非的殖民占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东非各族人民顽强有力的抵抗。

英国占领布干达后，为控制通往阿尔伯特湖的通道，于1893年向布尼奥罗实行军事扩张。为了保卫独立，布尼奥罗全国团结一致，在国王卡巴累加的带领下，英勇抗击英国入侵军。1894年，英军依仗其军事优势，连连击败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前引书，第717页。

Harlow, op.cit., p.50.

布尼奥罗军队，卡巴累加被迫撤离本土，但一些酋长们仍在国内坚持抗英斗争。英国实行武装占领后，威尔逊曾派遣一名效忠英国的布干达酋长出任布尼奥罗行政长官，但遭当地人民的拒绝，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迫使英国傀儡离开布尼奥罗。英国当局恼羞成怒，力图强行恢复这一任命，并派兵弹压，放逐了 15 名布尼奥罗酋长。尽管如此，布尼奥罗人民的顽强斗志使那位布干达酋长不敢再在当地露面。

在布干达，英国控制政局后，国王姆旺加成了笼中之鸟。他不堪忍受英国官员的侮辱，逃离本国，前往布杜。英军尾随袭击布杜，姆旺加被迫逃入德属东非。在群众支持下，姆旺加组织武装力量，不断骚扰英军。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先后七次派出军队前往镇压。1899 年，姆旺加联合布尼奥罗共同抗英，不幸兵败后被放逐到基斯马尤，以后又被转至塞舌耳群岛。

在肯尼亚，反英斗争也此起彼伏。1895 年，英国当局无视穆斯林传统，安置了一名效忠英国的当地人为谢赫。这激起了人民的不满，谢赫的合法继承人穆巴拉克·本·拉希德举兵反抗，大批群众响应。起义军攻打并烧毁了沿海的一些城镇。1896 年 3 月，英国从印度调来一团士兵，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基斯马尤地区，当地居民于 1898 年攻占英军哨所，并发动起义。1900 年，起义遭镇压。次年，当地酋长又策划对英国副专员詹纳的暗杀。英国当局大举报复，打死、打伤当地居民 150 名。

南迪人自 1895 年起就开始有组织地袭击英国商队。尽管殖民当局不时派兵弹压，但南迪人无所畏惧，照样破坏铁路，拒交税金。1905 年，英国征调尼亚萨兰和乌干达的军队，以优势兵力对南迪人先后进行五次进剿。英国殖民军烧杀抢掠，南迪族酋长惨遭杀害，大批牲口被劫。

在德属东非，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1888 年，德国东非公司强迫桑给巴尔素丹把沿海地区租让给该公司后，德国人在沿海主要港口征税，并砍掉了桑给巴尔素丹国国旗。在潘加尼、巴加莫约和坦噶等地，德国人砍倒素丹旗帜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纷纷揭竿而起。起义领导人阿布希里·伊本·萨里姆是潘加尼附近的小种植园主、斯瓦希里人，他向群众大声疾呼：面对德国人的入侵，“继续保持沉默是怯懦的表现”。在他领导下，起义席卷沿海地区，德国东非公司驻沿海地区的代表被驱赶或囚禁，起义迅速向内陆扩展。齐古阿族在酋长伯瓦纳·赫里率领下投入战斗，瑶族人民也组织起来，迫使德国人撤离林迪和米金达尼，并包围了基尔瓦·基温杰的德国驻军。起义烈火也蔓延到乌散巴腊和乌萨加腊地区。1888 年末，阿布希里率义军攻打巴加莫约，接着又围困了达累斯萨拉姆。起义得到人民支持，发展到万余人，并占领了一些沿海重镇。阿布希里起义震惊了德国，1888 年 12 月，德国同英国达成协议，联合封锁海岸，后来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也参加联合行动，企图以此切断起义与外界的联系。1889 年初，德国政府任命魏斯曼少校为首任驻德属东非专员，并先后拨款 400 万马克，令他前往镇压起义。魏斯曼在埃及、莫桑比克和亚丁等地招募了上千名雇佣兵，与德国东非公司军队合在一起。1889 年 5 月，魏斯曼集中兵力剿杀沿海义军。由于德军配有当时最先进的连射炮和马克沁机枪，手持弓箭的起义军屡战败北，只得向内陆撤退。6 月，德军控制了沿海地区。为了抓获阿布希里，德

国当局竟悬赏 10000 卢比。在人民群众支持下，阿布希里继续在内陆与德军周旋，不断袭击西方商队、传教士和德国殖民据点。1889 年 12 月，阿布希里被叛徒出卖，不幸被俘，不久被绞死在巴加莫约。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赫里为保存实力，曾一度诈降。1894 年 3 月，他再度举兵，失败后逃往他乡。至 1891 年初，沿海地区的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

1891 年，居住在德属东非南部的赫赫族在酋长姆克瓦瓦的率领下，也掀起了反德斗争。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赫赫族就先后击败了恩戈尼人、尼亚姆维齐人和马萨伊人，控制了沿海通往塔波拉及以西地区的商道。赫赫人的活动成为德国进入内陆的障碍。1891 年 9 月，由泽柳斯基率领的德国殖民军发动大规模的惩罚性讨伐，力图一举征服赫赫人，结果遭姆克瓦瓦的伏击，伤亡惨重。次年，姆克瓦瓦又攻占德军的基洛萨要塞。德国殖民当局经过周密策划后，于 1894 年大举进攻赫赫族的首府卡伦加。德国人借助猛烈的炮火，在付出极大伤亡后才攻占卡伦加。姆克瓦瓦被迫撤离。在以后的四年中，他坚持游击战争，四出打击德国殖民者。德国殖民当局为抓获姆克瓦瓦，以 5000 卢比的赏金换取他的首级。姆克瓦瓦在人民支持下，始终没有放弃抗德斗争。1898 年 6 月，姆克瓦瓦不幸被德军包围，他宁死不屈，饮弹自尽。德国殖民者竟惨无人道地割下他的头颅送往柏林。

在尼亚姆维齐族居住地区，伊西凯酋长距塔拉波 50 公里处的商道旁建立要塞，阻止德国人的入侵。1892 年 6 月和 8 月，伊西凯两次痛击进犯的德国殖民军。1893 年 1 月，德军重兵围攻要塞，伊西凯不愿落入敌手，引爆火药库，全家壮烈牺牲。

除上述斗争外，沿海地区 1894 年爆发了奥马里起义，坚持了一年之久。1890 年，萨加拉族在其酋长马钦加带领下掀起反德斗争；1891—1892 年，马西图族也举行了同样的斗争。在北部地区，1892 年查加族酋长梅利领导族人奋起反德。此外，戈戈族、尼亚图鲁族和苏库马族等也同德国殖民者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在布隆迪和卢旺达，德国人也遭到了当地人民有力的抵抗。

19 世纪末东非各族人民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德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性质。这些斗争几乎波及整个东非地区，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持续至整个 90 年代，有些地区甚至延续到 20 世纪初。参加这次反抗斗争的成份比较复杂，有上层统治集团成员、各级酋长，也有基层人民群众。但斗争的领导权一般都掌握在原统治集团成员手中，这是由当时东非社会的主要矛盾——东非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过份悬殊；此外，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不协调等，也是起义斗争失败的原因。

五、马及马及起义

德国对东非殖民地实行武装占领后，实施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德属东非人民不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要忍受沉重的税收和强迫劳动，这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最终导致 1905—1907 年声势浩大的马及马及起义的爆发。

1904 年，恩加兰比一位名叫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的乡村医生自称是上帝的使者。他对群众宣传说，上帝为了把人民从德国人的暴虐下拯救出来，

派他带来了“马及马及”（斯瓦希里语 Maji 的译音，意为水）；人们只要喝下这种圣水，便可逢凶化吉，刀枪不入，使德国人的子弹失去杀伤力。他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杀死德国佬！”上帝的使者带来圣水的消息不胫而走，马图姆比人、恩金多人和恩戈尼人成群结伙前往恩加兰比。恩格瓦勒利用群众领取圣水的机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训练工作，为马及马及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基础。

1905年7月，基尔瓦·基温杰附近的一个德国种植园主强迫当地的马图姆比人延长劳动时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他们奋起反抗，公开拔掉棉苗，袭击德国种植园，赶走殖民官员，起义爆发了。

马图姆比人举事之时，恩格瓦勒尚在外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得知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派人割断了基尔瓦·基温杰通往达累斯萨拉姆的电话线，使德国人无法进行联络；他又派人赶往中部和南部地区，号召人民起义。起义烈火熊熊燃烧，迅速扩展到鲁菲季河以南地区，恩金多人、恩戈尼人和贝纳人纷纷投入战斗。有人描述说：他们“只要得到圣水，或稍稍接触了圣水，那末他们心中除充满热情外，绝不会想到死亡。战士们一旦投入战斗，立即被杀敌的激情所吞噬，……他们急于把敌人踩在脚下，而根本不留意加农炮的轰炸”。德国殖民当局对来势凶猛的起义浪潮惊恐万状，他们派兵前往镇压，并抓获了恩格瓦勒。德国殖民者对他施以酷刑，但恩格瓦勒始终威武不屈，德国人无计可施，便把他绞死了。恩格瓦勒在起义之初就壮烈就义，给起义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更激励了人民的斗志。1905年8月，起义军攻占利瓦勒要塞；半个月后，又对德军另一重要据点马亨格发起大规模进攻，迫使德军弃城而逃。在达累斯萨拉姆四周，起义军也频频出击，破坏交通线，烧毁田野里的庄稼，沉重打击了德国殖民军。

1905年底，德属东非当局一边从各地调集兵力，一边要求柏林政府增援快速部队和武器弹药。德皇威廉二世深感马及马及起义的威胁，下令派遣1000多名士兵和大量武器增援东非殖民地。德军登陆后，部署了一条长达250英里的半月形包围圈，并逐步收缩。他们沿途实行惨无人道的焦土政策，焚毁房屋庄稼，屠杀无辜百姓，估计至少有12万人惨遭杀害，起义地区一片凄惨景象。德国殖民军的疯狂镇压，使起义军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起义逐步走向低潮，1906年3月，马图姆比人的反抗基本被平息；同年底，南部地区的反德起义也被镇压；1907年初，起义的另一名著名领袖潘达遭害，起义终于失败。

马及马及起义是东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帝反殖斗争。起义烈火在短期内燃遍了从达累斯萨拉姆至基洛萨一线以南、基洛萨至马拉维湖一线以东的五、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坚持了近两年时间，打得德国殖民者丧魂落魄，一度只能龟守几个孤立的据点等待增援。德国殖民官员在起义被镇压后还惶惶不安地承认：“始终无法忘记马及马及起义。起义可能再次大规模爆发的想法充塞脑海。”马及马及起义又是东非人民借用宗教外衣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的典范。起义的发动者利用宗教形式，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组织群众，获得了很好的效果。马及马及起义还超越了部落界限，在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各族人民携手战斗。起义爆发不久，恩戈尼酋长桑吉

Gifford, op.cit., p.682.

L. H. Gann,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 - 1960 (《殖民主义在非洲》), London 1977, vol.I, p. 309.

就致函其以前的敌手、瑶族酋长马塔卡：“我们已接到上帝的旨意，所有白人都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准备对他们开战。……我原想送你一些牲口作为礼物，但眼下却无力办到。上帝旨意的战争是首位的，请你支援 100 名带枪的战士，帮助我攻打鲍马。……让我们抛却前嫌吧！”十分明显，反对德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命运唤醒了德属东非各族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独立意识，这对坦桑尼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及马及起义虽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失败了，但它显示了东非人民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德国的殖民统治。坦桑尼亚人民把这次起义视为本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的史诗，是走向“乌呼鲁”（斯瓦希里语，意为独立和自由）的动力。

第二十八章 瓜分南部非洲

南非金刚石矿的发现（1868年）和兰德金矿的发现（1884年）中间相距一二十年时间。金刚石矿的发现和开采，虽然引起南非地价的高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刺激了英国人和布尔人争夺金刚石产地的产权斗争，但并没有提高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地的经济价值。英国对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政策，从经济方面考虑较少，主要是从政治控制和战略重要性方面着眼（体现为卡纳房的联邦政策）。瓜分南部非洲是许多因素促成的。英国在瓜分南部非洲中率先行动的动机是：抢在盘据于纳米比亚的德国动手之前截断其从鲸湾向东扩张的触角；在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谷伸展以便将东西海岸的两节链条连接起来之前，为大英帝国遥望开罗向北挺进的通道，打进一个强有力的楔子；抢先夺取布尔共和国计划中向西、向东和向北扩张的几个既定目标，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带几个出海港口，以堵截布尔人从海上同荷兰、法国、德国建立直接联系。1886年以后兰德金矿的开采，迅速改变了德兰士瓦的经济面貌，从此垄断地占有德兰士瓦金矿成为唐宁街帝国主义谋士们萦绕脑际的问题。瓜分南部非洲的斗争终于导致爆发一场举世瞩目的英布战争。

一、金刚石矿的发现开始了南非一个新起点

南非矿藏大发现以前，英国在南非的两个殖民地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是世界各殖民地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其特点是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密度小；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半自给农业；贫穷，资金极端缺乏；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很缓慢。直至19世纪60年代，绝大部分布尔人经营着商品率很低的、在偏远地区还是基本自给的农牧场。非洲人因失去大部分肥沃土地，退到保留地，或维持着领土面积大大缩小的酋长国，比起白人农场主，他们所经营的农牧业的商品率更低，自给成份更大。因国内市场狭小，除个别港口和城市郊区以外，集约农业的发展步履蹒跚。白人移民迁入南非很少，开往南大西洋的欧洲移民的轮船过好望角而不入，兼程驶往遥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820—1860年，平均每年迁入南非的仅750人。整个南非越往北越落后，德兰士瓦共和国最落后，奥兰治自由州次之。德兰士瓦既无学校，更无银行，基本上没有修筑过道路，欧洲人包括荷兰人在内都不往穷地方投资。共和国财政极端拮据，而军费糜耗甚大，政府有时以分发土地作为行政开支。邮政局长用邮票发工资。1876年11月，德兰士瓦国库只剩下现金12先令6便士。奥兰治自由邦兴办羊毛业后，经济状况稍见好转，初步打破了闭塞状态。赚钱的养羊业提高了地价，对外贸易和商业得到缓慢发展，但财政收入仍然很少，1866年仅63000英镑。两个布尔共和国的农场经济都带有浓厚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色彩。

纳塔尔的经济发展比布尔共和国略显进步。它拥有与欧洲保持联系的德班港，对外资有微弱的吸引力。1850—1864年，出口值增加12倍，从1.7万英镑增至22万英镑。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在南非位居前列，是外向型经济。为出口生产和供应过往船舶的食品仍是它的经济基础。开普敦的小型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1860年拥有70个小型制造业，其中有14个制砖厂、9个供出口的腌鱼厂、7个使用蒸汽动力的面粉厂、6个蜡烛厂、6个鼻

烟作坊、5个铜铁五金厂。1850—1864年间，出口值增加4倍，从63万英镑增至259万英镑。1860年开普政府财政收入只有74万英镑，入不敷出。60年代，英国资本家开始在开普殖民地投资，兴办银行，企望能获得较高利率。但由于整个南非都还不存在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投资需求不旺，1863—1865年间31家银行中倒闭了28家。直到60年代中期，南非的经济前景仍然十分暗淡。

然而，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改写了南部非洲经济史，也使政治史遽然改观。19世纪60年代中期，塔蒂和乌姆福利河发现了金矿，1868—1869年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探宝客涌向塔蒂。富矿迅即挖空，小公司纷纷关闭。到1870年只剩拥有蒸汽抽水机的伦敦和林波波河公司有条件继续开挖深矿，公司从马塔贝莱王国新王洛本古拉手中取得了租让权。德兰士瓦共和国也迅速向塔蒂金矿伸手。1868年，它未能从马塔贝莱国王姆齐利卡齐和恩瓜托国王马琴手中获得租让地，却被英国公司捷足先登。比勒陀利乌斯总统于1868年4月擅自宣布姆齐利卡齐和马琴都是南非共和国的臣民，并要求从斯威士兰划出一条两英里宽的地带作为通向德拉戈阿湾的通道。这两项要求及随后的行动均遭英国和葡萄牙的激烈反对而告失败。不久，在德兰士瓦境内的曼科潘尼（1869年）、马拉巴斯塔德（1872年）、麦克麦克陆续发现了一些小金矿，但甫经开采，到70年代末又因战乱而停采。

方兴未艾的“黄金热”，不久就被瓦尔河流域的“钻石热”盖过了。1867年，第一颗金刚石在霍普敦被发现。1868年，在瓦尔河北岸的克勒普德勒夫特（西巴克利）附近发现大量金刚石。1870年，在南部（今日金伯利）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矿区。各地探宝客纷涌而来，雇佣当地黑人挥镐抡锄，大挖金刚石。1870年，当地一个名叫斯塔福特的商人组织白人“探宝客政府”，声称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科纳人的代表。1872年，这块昔日仅有几百名格里夸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成了举世瞩目的场所，45000人（其中白人15000人、混血种人10000人、黑人雇工20000人）聚集在狭小地段挖矿，1870—1875年平均每年挖出价值160万英镑的金刚石。到1882年，开采的金刚石总值已达2600万英镑，当年出口值就达400万英镑，为开普殖民地其他商品年出口总值的5倍。

巨大的财富引起了对这块宝地所有权的争夺。德兰士瓦布尔人、奥兰治布尔人、格里夸人酋长（沃特布尔）、特哈平人酋长、罗朗人酋长、科纳人酋长都声称对这块宝地拥有所有权。德兰士瓦总统比勒陀利乌斯声明南非共和国的西界直到库鲁曼。争执各方的边界会谈聚讼纷坛，没有达成协议。英国总督巴克利进行干预，提出将所有权问题交给纳塔尔副省督基特仲裁。1871年，基特作出仲裁认定该地区的合法所有者应是格里夸人酋长沃特布尔，而开普殖民地则是沃特布尔的合法继承人。就这样，通过强取豪夺手段，这块金刚石产地便成了英国的西格里夸兰殖民地。

最大的管状金刚石矿脉被命名为“金伯利”（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围绕金伯利矿脉形成了一座有30000人居住的帐篷和棚屋组成的城市。这些矿脉被分割成许多小方块，由3600个小矿主（探宝客）所占有。随着竞争的激烈、矿井的加深、成本的上升、投资的加大以及19世纪70年代中期（1873—1879年）的世界性商业萧条，绝大部分小矿主纷纷破产，他们把

自己的地段贱价卖给拥有百万巨资的公司。到 1885 年，3600 家小矿主只剩下 98 家。这些公司本身也按照资本集中的规律，互相兼并。英国人谢西尔·罗德斯靠承包矿井抽水工程和买卖地产等乖巧手段而致富，迅速成为南非资本家中的首富。1880 年，他以 20 万英镑资本创办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大肆收购矿山土地。1888 年，他在伦敦的罗思柴尔德财团支持下，合并另一家最大的金伯利中央矿业公司，成立德比尔斯统一矿业公司，垄断了整个金伯利的金刚石生产，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垄断组织之一，同时也把矿业组织成资本主义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工业体系。公司采取限额开采措施，规定市场出售的最高价格。企业利润倍增。

金伯利矿场需要大批劳动力、食品和燃料。黑人从南部非洲的各个保留地（主要从西斯凯、特兰斯凯和巴苏陀兰），步行到金伯利做工糊口或赚工资买枪，每月达二三千人。食物从伊丽莎白港和黑人居住区用牛车运来。南恩戈尼人和苏陀人生产各种农产品，出售给矿工和牛车夫。1873 年，仅芬果兰的芬果人就出售了 500 车的玉米和蜀黍。1875 年，芬果兰同开普殖民地的贸易额达到 15 万英镑。经商赚钱的芬果人投资买犁和牛车，扩大农业再生产；看到世界市场羊毛价格上涨，他们又买了良种羊生产羊毛。科萨人、滕布人见有利可图，群起效法。巴苏陀兰的出口贸易也很繁荣，其对外贸易额达到芬果兰的同样水平。1869 年以后，被布尔人赶到卡利登左岸山麓的苏陀人地少人多，不得不增加农业生产和输出劳动力，他们绕行奥兰治河南岸（躲过布尔人）向金伯利输送谷物和劳动力，经济逐渐繁荣起来，1875 年购置了 2700 张犁、300 辆牛车和 35000 匹马。特哈平人到矿上做工，往往在矿场工作到所得工资足够买犁和牛车时才返回故乡。1874 年，仅一家商号就卖给向金伯利供应粮食的特哈平农民 100 张犁。非洲人挣取的工资刺激了他们对欧洲商品特别是衣服的消费。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在南茨瓦纳人中间已经很少见到有人穿传统的服饰了；盾牌和刺矛也被步枪所代替。

英国殖民当局为解决矿场劳动力问题，放宽了对非洲人购买火器的限制。许多矿业资本家以支付枪支、弹药代替发放工资，吸引了包括荒僻偏远地区在内的非洲人到金伯利矿场做工。许多酋长纷纷派遣其部民到矿上做工，以便每人回乡时带回一支枪。成群结队的佩迪人、祖鲁人、聪加人步行数百里，越过布尔共和国到金伯利做工，走私运回枪械。甚至索特潘斯山的奴隶贩子见矿场有利可图也改弦易辙，不再把低维尔的聪加人当奴隶卖到德拉戈阿湾，而把他们当雇佣劳动力送往金伯利赚工资买枪，再趸回内地高价出售。从 1871—1875 年的四年半时间内，金刚石矿场售出（或付给）非洲人 40 万支枪。金刚石的发现和开采，以及伴随而来的金伯利矿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对人口的吸引，不仅对南非整个农村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也对南非整个交通及其他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数以万计的挖宝客在竞争中沉淀下来，他们中间除极少数人发财无望而离开南非外，大部分人破产以后受雇于矿业公司。许多人成为技术工人和技术员，领取高工资。这些白领工人顽固地抵制非洲人上升为技术工人和监工，坚持在工种上实行肤色歧视，以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逐渐形成一

个劳动贵族阶层。这些工人贵族与布尔农场主沆瀣一气，成为南非种族歧视的又一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金刚石矿开采后，金伯利市场上鸡蛋、肉、奶酪、元白菜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刺激着布尔农场主生产商品农作物的积极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矿山市场的供应。同时，布尔农场主也面临着农场劳动力短缺的困难。由于矿场工资比农场高数倍，自然吸引了大批黑人劳动力。一部分布尔农场主不肯提高工资，仍然企图采取超经济手段来获得劳动力，这就使其所面临的劳动力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变本加厉采取超经济手段，便越难获得劳动力。经济力量推动着另一小部分熟悉市场法则的布尔农场主逐渐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自己经营园圃，适当提高工资，吸引黑人劳动力，大批生产适销对路的农副产品供应市场，随之又将获得的较大利润用来扩大再生产，逐渐向农业资本家转化。

矿藏的发现和开采引起地价不断上涨，出现了活跃的土地买卖市场，一摩尔根土地售价从 8 先令涨到 32 先令。金矿附近的土地价格更是扶摇直上，原先仅值 350—750 英镑的一个农场，竟涨到 70000 英镑。不少农场主靠出售土地或搞土地投机发了大财。一些熟悉土地行情的大农场主也靠转手倒卖土地成了巨富。后来成为总统的克鲁格在 1855—1866 年先后买进 14 个农场，成了家财万贯的大地主。他曾以 4700 英镑买下一个 4000 摩尔根土地的农场，最后以 107700 英镑高价售出，净赚 103350 英镑。共和国总司令朱伯特利用职权廉价攫取土地，成为拥有 29 个农场、8 万英亩土地的首富。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大片地产通过薪饷、基金等形式迅速集中到以官僚为核心的大农场主和地产投机公司手中。这些骤富的、极端保守的布尔官僚拥有的巨资，大多用来购置土地，很少投资于金矿和其他工业。布尔富翁几乎清一色都是大地主。由于大片土地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布尔社会中的贫富界限不断加深，布尔农场主这个超稳定集团失衡，渐趋分裂。

大迁徙后一度缓和的阶级分化又逐渐加剧。从布尔农场主中分化出无地的拜旺纳 (Bywoner, 贫穷白人) 阶层。随着农场主家庭人口增加，分家主户，农场土地一再分割，越分越小，有的一个农场被分割为 40 人所有。分割后，有的小农场主仍采用农奴制和粗放经营方式，更难养活家口。由于国家土地大多被大农场主占有，在边界内占领非洲人的新土地越来越困难，缺地的小农场主只好去租佃大地主土地，或弃农经商，或到金矿区去搞牛车运输。随着税制的改革和收税效率的提高，以前经常逃税的小农场主陷入困境，无力缴纳现金税，索性抛弃土地远走他乡；而欠税者的土地多被政府没收。有些长期依附于大地主的垦户 (Squattes) 也被地主挤走，因为后者愈来愈多地自营有利可图的商品性农业，不愿穷人 (或穷亲戚) 继续使用自己的土地。游离出土地的拜旺纳日益增多，仅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就聚居 6205 名无地布尔人。其中许多人以牛车运输为生，到 19 世纪 90 年代铁路通车时，这种落后的运输业也被挤垮了。这些既无土地、又不愿到矿场去干粗活的白人贵族，遂沉淀到白人社会的底层，形成贫穷白人这个南非社会的特殊阶层。

S.Marks & Atmore 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 - 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前工业化时代南非的经济与社会》, Longman 1980, p.357.

Marais, *The Fall of Kruger's Republic* (《克鲁格共和国的陨落》), Oxford 1962, p. 5.

二、英布加紧殖民扩张贝专纳兰沦为保护国

一部分布尔人的日益贫困和拜旺纳的增多，开始明显地影响到布尔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和民团的战斗力。无地的布尔人无力承担军役，服役的布尔人也士气不振。这些现象引起布尔统治集团的焦虑。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为了满足地主集团对土地和货币财富的贪欲，缓和布尔社会中日趋剧烈的阶级分化，德兰士瓦共和国政府变本加厉推行土地扩张政策，一些布尔人也自行组织武装团体和政权机构（小共和国），在边界内外加紧掠夺非洲人土地。

自 1867 年后南非多处发现金刚石矿和金矿石，南非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比。英国资本家对金刚石矿和金矿极为贪婪；英国移民中的资本家和官员要求在内地兼并更多土地，建立更多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国政府则一反其半个世纪以来在南非殖民扩张政策上的慎重迟缓态度，开始采取积极扩张和吞并的步骤。于是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东西北三面边界以外的非洲人土地，成为英布殖民者竞相占领和兼并的对象。双方不断发生冲突，在几个重点地区的争夺趋于白热化。非洲人国家（包括数十个独立的酋长国）为保卫国土，英勇顽强地进行抵抗。

19 世纪 70 年代初，德兰士瓦布尔人恢复向西（茨瓦纳人领土）扩张，占领特哈平人领土，直到哈茨河（1875 年）。住在丹尼尔斯凯尔一带的特哈平人的南部土地则被英国人吞并（1878 年）。英国在西部——茨瓦纳人土地上的殖民战略是要打通并控制通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大北道路，以攫取金矿和保证金伯利矿的劳动力供应。德兰士瓦共和国则力图截断英国的这条通道，以便独占林波波河与赞比西河之间尚未被瓜分的土地。英国总督弗里尔听从传教士麦肯齐的建议，对非洲人国家广泛采取保护国形式。第一步在莫洛波河以南向特哈平酋长国和罗朗酋长国派遣边界代办（1879 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则派志愿人员进入茨瓦纳领土，建立斯泰拉兰共和国和戈申共和国，迅速向库鲁曼、弗雷堡扩张（1882—1884 年）。1884 年 4 月，英国政府接受张伯伦建议，宣布莫洛波河以南为英国的保护国，任命麦肯齐为代理专员，把戈申共和国的布尔人赶回德兰士瓦境内。罗得斯积极策划把莫洛波河以北的博茨瓦纳（贝专纳兰）殖民化，作为通往中非（赞比西流域）的“苏伊士运河”。德兰士瓦共和国试图正式兼并戈申共和国，从而威胁了大北道路的畅通。英国愤怒地作出反应，伦敦议会通过了派遣军事远征军的决定。1885 年 1 月，由沃伦将军率领的 4000 人远征军抵达贝专纳兰。

此时，贝专纳兰境内存在着八个主要王国和酋长国：恩戈瓦托王国、恩戈瓦基威酋长国、魁纳酋长国、克卡特拉酋长国、雷特酋长国、特洛克瓦酋长国、罗朗酋长国、塔瓦纳酋长国。其中恩戈瓦托王国最大，拥有占总数 1/3 的人口和 44941 平方英里的面积。恩戈瓦托人自从 40 年代击退北方马塔贝莱人的侵犯以来，一直在绍雄地区为独立而同魁纳人和马塔贝莱人进行艰苦斗争。绍雄是南方通往北方几条道路的交汇点，是象牙、鸵鸟毛交易的重要贸易区，也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中心，拥有 30000 人口，是南部非洲仅次于开普敦的最大城镇。19 世纪中叶以来，它成为各方必争之地。国王塞克

又称传教路线，英国和德国基督会传教士沿此路北上，在茨瓦纳人，马塔贝勒人中广泛传教。罗得斯则称之为“南非的苏伊士”。

高马一世的儿子卡马（1835—1923年）笃信基督教，他训练一支使用火器的骑兵，于1863年击退马塔贝莱人对绍雄的侵犯，声名鹊起。但在宗教问题上，他同父王发生冲突。卡马与其弟克加马尼在宫廷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信教派。他们着西服，识西文，崇尚基督教的婚俗（一夫一妻制），并同军火走私商维持良好关系。1865年，卡马因坚持反对在一支新建的同龄兵团中施行割礼而同父王决裂，旋即爆发了内战（1866年）。1875年以后，卡马稳固地掌握了政权，以国家教会为其坚强后盾。1881年，布尔农场主建立戈申共和国，威胁恩戈瓦托王国南疆。卡马联合魁纳、克卡特拉、恩戈瓦基威和罗朗等酋长国，组成抵抗布尔殖民者的联盟。戈申共和国的布尔民团咄咄逼人，1884年8月逼迫罗朗酋长国投降，占领大片土地。与此同时，1884年4月德国宣布对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保护，从大西洋岸向东迅速扩展，指向茨瓦纳人土地，震动了英国政府。

1885年3月，英国宣布对贝专纳兰的保护扩展到莫洛波河以北地区，直到德国的纳米比亚保护国边界（东经20度）；往北直到林波波河以北（南纬22度），包括恩戈瓦基威、魁纳和恩戈瓦托等国。同年9月30日，英国宣布把莫洛波河以南的英属贝专纳兰作为英国单独殖民地（首府设弗雷堡）；莫洛波河以北的贝专纳兰保护国（即今日博茨瓦纳共和国）仍作为保护国，归最高专员希帕德治理。1886年，希帕德建立土地委员会，划分白人农场土地和土著保留地，库鲁曼以东大部分生产用地都划给白人移民。原戈申共和国的布尔农场主从英国边境警察手中廉价购得大批土地，在警察营地建立起著名的马弗京城。莫洛波河以北，则让恩戈瓦托等国向白人移民提供边境农场土地，作为保护制下的行政费用开支。此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失意探宝客、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逃犯，蜂拥而入博茨瓦纳寻找金矿。卡马被寻求租让权的布尔和英国的冒险家、德国商人所包围，贝专纳兰的主权和领土遭受严重侵蚀。

德兰士瓦北部小金矿的开采、矿税的征收，初步改善了南非共和国的财政拮据状况。伯格斯特（1872—1877年）计划修筑连接德兰士瓦东部金矿和德拉戈阿湾之间的铁路。这条未来铁路的最便捷路线需要通过佩迪王国和斯威士兰王国国境，而莱登堡金矿和麦克麦克金矿原来都在佩迪王国境内。伯格斯特决定用武力兼并佩迪，以消除后顾之忧。1876年7月布尔民团攻陷佩迪几座山堡后，向塞库库尼国王的位于丛山中的首府发起猛攻，遭到佩迪射手的密集火力回击。8月，一支佩迪军队绕道进攻并焚烧布尔人农场。布尔民团纷纷擅离战场，回乡救援。1877年2月，双方讲和。伯格斯特吞并佩迪的计划未能实现。

然而，英国的各项兼并计划却比较顺利地取得进展。1878年，英国借口东科萨人最高酋长萨里利拒绝应召，派兵越过凯河进攻科萨人。科萨人联合滕布人，初战挫败英军。西科萨人酋长散迪勒在西斯凯也起兵抗英。第九次开普——恩戈尼战争（卡弗尔战争）全面爆发。1878年5月，英国援军赶到，以优势兵力在肯塔尼一举击败东科萨人，解除其武装，接着又击溃西科萨人。英国决定兼并凯河和姆塔塔河之间土地，1879年先行兼并东格里夸兰和芬果兰，但引起了庞多迈斯人、滕布人的起义（1880—1881年），不得不中断几年。1885年，英国再行兼并滕布兰，并对庞多兰沿海地区实行保护，控制了圣约翰斯港。1894年，英国宣布兼并庞多兰。至此，所有南恩戈尼酋长国全部丧失独立。英国在特兰斯凯实行直接殖民地统治。特兰斯凯被划分为 27

个区，派欧洲人充当中下层官员代替酋长和头人，征收茅屋税作为行政开支。从此，特兰斯凯成为南非殖民化最深的地区，教堂和教会学校遍布各地，英国人和犹太人开设的杂货铺深入穷乡僻壤。特兰斯凯成为开普殖民地最大的劳动力储备库。

在英国同两个布尔共和国争夺南部非洲殖民利益的尖锐斗争中，保守党政府（1874—1880年）深感许多棘手问题难以解决。它重新执政后，坚决推行“白人南非联邦”计划。保守党政府把实现殖民地联邦进而实现帝国联邦的计划视为解决帝国内部难题的灵丹妙药。按照英国的蓝图，作为一个殖民地联邦的南非联邦，包括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但要以开普殖民地为主宰，能够保护英国在南非贸易利益和劳动力供应，并保证其属地和臣民的安全。英国政府经过多方试探后得出结论：它必须以兼并方式代替谈判方式才能实现联邦计划。1876年9月，德兰士瓦进攻佩迪王国遭到惨败。军事挫折使布尔人对于单凭自己力量稳固统治非洲人的信心发生严重动摇，而东邻祖鲁王国在开芝瓦约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四万大军随时准备收复血河以东失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决定以兼并德兰士瓦来推动联邦计划的实现，派谢普斯通率一支由25名警察组成的警卫部队进入德兰士瓦。他向布尔统治集团指出：德兰士瓦政府的财政和军事已陷入极端混乱状态，仅靠布尔人的力量，既无法挽救财政的破产和有效控制共和国境内的非洲人，更无力对付受到强大的祖鲁人支持的佩迪王国的挑战。他提出由英国接管德兰士瓦政府，加强白人殖民力量，保证维持布尔人所施行的种族不平等政策，并明确宣称，英国无意坚持其主张：在德兰士瓦的土著应享有开普殖民地土著所享有的任何公民权利。四面楚歌、极度恐慌的布尔统治集团，觉得英国的接管将保护布尔人既得的土地利益，并挽救行将破产的财政，因而普遍赞同（或默认）英国的接管行动。伯格斯特表示：“我宁愿当一个强大政府下的警察，而不愿当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德兰士瓦布尔人就这样把共和国的独立放在银盘上送给了英国人。1877年4月，英国发表声明，德兰士瓦成为英国殖民地，任命谢普斯通爵士为行政长官。伯格斯特辞职回到开普；克鲁格、朱伯特、小比勒陀利乌斯等解甲归田。此后四年（1877—1881年），德兰士瓦共和国从非洲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英国的四年统治使布尔人大失所望，民族主义思想迅速滋长，并把开普和德兰士瓦两地的布尔人联合起来，于1880年在开普敦成立了布尔人民族主义组织——阿非利卡人协会。它在奥兰治河以北地区也吸收了大批会员，朱伯特任该组织德兰士瓦地方分会主席。1876年问世的反映布尔人民族情绪的《阿非利卡爱国者》杂志，因德兰士瓦被兼并而销路大增，订户从400户猛增至1881年的4000户。

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人反抗英布殖民者的战争

1843年英国接管纳塔尔后，祖鲁王国逐渐摆脱布尔人的羁绊，恢复独立。倚靠布尔殖民者支持登上王位的姆潘达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搞平衡，苟且偷安。在宫廷内部，潘达制造其长子开芝瓦约（1826—1884年）同庶子

Fisher, *The Transvaal and the Boers* (《德兰士瓦和布尔人》), London 1900, p. 169.

Fisher, *op.cit.*, pp.169-170.

姆布拉齐之间的矛盾，以保持自己的僭主地位。夺位之争终于在 1856 年酿成内战。1856 年 10 月，在恩东达库苏卡战役中，姆布拉齐军队遭到惨败。11 月，祖鲁人大会决定由开芝瓦约执掌国政。1872 年姆潘达死后，开芝瓦约正式登基。

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祖鲁王国西部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接壤，布尔农场主侵占了祖鲁人的克勒普河和乌得勒支土地，并蚕食血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严重威胁祖鲁人的牧业生产。在南面，英国殖民政府不断扩张，兼并南恩戈尼人土地。而在王国内部，王族分藩制度所形成的离心力一直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开芝瓦约掌权后，采取几项重大措施，保卫王国独立，巩固中央权力。他掌握了王国主要资源——畜群和火器供应来源，重建军队，恢复祖鲁人传统的同龄兵团军事制度，对青少年实行严格军事训练。他吸取血河战役（1838 年）的惨痛教训，深知刺矛和盾牌难以抵挡殖民者的枪炮弹药，不惜用大批牲畜向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购买数百支枪和大量弹药。他还派遣祖鲁青年到金伯利金刚石矿做工，用挣来的钱购买枪支带回国内；并雇用英商约翰·丹恩训练军队，教祖鲁战士骑马射击；还从德拉戈阿湾重金聘请英人修理枪械。几年内，祖鲁王国重建了一支既能使用刺矛投枪、又能操持近代火器的四万人的大军。这是南非地区空前强大的军队。

英国自从 1877 年兼并德兰士瓦共和国后，对位于通向北方走廊的祖鲁土地也存凯觐之心，这个走廊不仅是英属纳塔尔向北扩张的直接目标，而且是北方黑人劳动力进入林波波河以南地带的主要通道。英国殖民当局把日益强大的祖鲁王国视为它推行联邦政策的主要障碍之一和威胁它在南非实现稳定统治的力量，因此，把消灭祖鲁王国作为既定政策。

1878 年，开普殖民地总督弗里尔主持制定了入侵祖鲁的军事计划。同年 12 月 11 日，弗里尔向祖鲁王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祖鲁军队必须在 30 天内解除武装，接受代表英国总督的驻扎官的统治；允许英国传教士自由进出祖鲁，并以牲畜补偿被夺去土地的布尔人。对于这些无理的要求，开芝瓦约予以严正拒绝。

在限期到来以前，英军已在图盖拉河沿祖鲁边境地区部署了六个营的兵力。开芝瓦约集结 30000 人大军于首府乌伦迪附近；英军司令切尔姆斯福德调集了 13000 名英军、36 门大炮和大批土著军队。英军在长达 200 英里战线上分三路前进，直指乌伦迪。东路英军由皮尔逊上校指挥，从沿海地区渡过图盖拉河中游；西路由伍德上校指挥，由纽卡斯尔附近侵入祖鲁；中路由邓福德中校指挥，驻扎洛克浅滩，以策应切尔姆斯福德的主力。

1879 年 1 月 20 日，英军中路主力第二十四团渡伯费茨河前进 10 英里，在伊桑德卢瓦纳山的南坡扎营。祖鲁军在开芝瓦约指挥下，把主力部队调到伊桑德瓦纳附近山中。几千大军隐蔽集结，不露烟火，秩序井然，只派小股部队到山前游弋，迷惑英军，分散其注意力。英军骄傲轻敌，守备松懈，既

C. Ballard, John Dunn and Cetshwayo: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Zulu Kingdom, 1857 - 1878 (《约翰·唐和开芝瓦约：1857—1878 年祖鲁王国政治力量的物质基础》),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1 (198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South Africa (《剑桥英帝国史南非卷》), 1963, p. 486.

The Zulu War Journal of Colonel Henry Harford (《亨利·哈福德上校的祖鲁战争记事》), Pietermaritzburg

未掘壕自守，也不构筑牛车阵。1月21日，开芝瓦约派一支部队迤迤往东，引诱英军主力出营。果然，22日晨，切尔姆斯福德亲率第二十四团第二营和四门大炮尾随这支祖鲁军，营地仅留下2000人守卫。这时，埋伏在附近山中的几千名祖鲁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营区，与英军展开白刃战。待切尔姆斯福德闻讯于夜间赶回营地时，英军已被全歼。此役英军伤亡1600人（900多人被击毙），所属土著营500人被歼。祖鲁军缴获1000多支来福枪、2门大炮和50万发子弹。这是自15世纪初欧洲殖民者侵入非洲大陆以来非洲人民取得的最大战果，也是英军自1856年克里木战争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切尔姆斯福德的速胜计划受挫，英国左翼（西路）被迫匆忙退守坎布拉，右翼（东路）被围困在埃肖威，交通阻断，粮草不济。当时，开芝瓦约充分认识到英军火力的优势，决定对掘壕自守的英军进行长期围困，使其不攻自毙。这一战术对于供应极端困难、又将面临雨季的英军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可惜祖鲁一些将领求胜心切，贸然对防守严固的坎布拉英军阵地发动强攻，遭受重大损失。

英军在伊桑德卢瓦纳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议会大哗。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孤注一掷，从开普敦、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岛和英国本土调遣援军开赴纳塔尔。3月17日，英军兵力已超过2万人。6月，英军重新向北缓慢进军。开芝瓦约率部英勇阻击。6月1日，在伊蒂奥西河畔，祖鲁军突袭英军一支小分队，击毙了在英军服役的前法皇路易·波拿巴的独生子路易王子。消息传来，震动了欧洲，这次突袭被称为是“结束了欧洲一个王朝”的事件。

7月初，英军进逼祖鲁王国首府乌伦迪附近；7月4日在马拉巴提尼平原摆开一个由5000人组成的方阵。战斗打响后，英军以后膛枪组成密集的火力，和6门大炮猛烈轰击。祖鲁军绕到方阵的右翼猛攻，但其两翼和中央主力却无法逼近火力凶猛的英军方阵。后来祖鲁军又绕到方阵后方发动第二次进攻，也未能得手。此役祖鲁军伤亡2300多人。侵入首府的英军焚烧了乌伦迪和附近村寨。

此后，战争转入游击战阶段。8月28日，开芝瓦约在克瓦德瓦德村被俘，后被流放到开普敦和伦敦。英国对祖鲁战争延续8个月，损兵折将数千人，耗资500万英镑，在国内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迪斯累里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终于在1880年4月21日倒台。英军新任司令沃尔斯利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祖鲁王国分割成13个酋长国，由英国任命的酋长统治。这些酋长都是恰卡统一祖鲁以前各王族的后裔，他们争权夺利，使祖鲁陷入四分五裂的血腥内战中。

祖鲁人民怀念开芝瓦约及其统治时期的祖鲁王国，国内外出现了要求开芝瓦约复位的强烈呼声。1882年，开芝瓦约到英国，受到一部分英国人的支持。他的非凡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干得到宣扬，威望日增。英国自由党政府出于政党斗争的需要，表示要同保守党内阁的南非政策划清界限。1883年

1978, pp.16 - 31.

Invasion of Zululand (《入侵祖鲁兰》), Johannesburg 1979, p. 70.

J.J. Guy, A Note on Firearms in the Zulu Kingdom with Special Referenced to the Anglo-Zulu War 1879 (《尤与1879年英祖战争有关的祖鲁王国火器的记载》),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4 (1980).

初，开芝瓦约回到祖鲁，再次即位。但他统治的国土已大大缩小，北部已划归由英国扶植起来的齐伯布，南部靠近纳塔尔的领土也不属他管辖。英国对他严加控制，不准重建军队。1884年，齐伯布发动内战，开芝瓦约战败，流落在外，2月去世，年方15岁的长子迪尼祖路被推为继承者。1887年，日益贫弱的祖鲁王国终于被英国吞并，1897年并入纳塔尔殖民地。

与祖鲁人抗英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巴苏陀兰保护国的抗英斗争。1871年，巴苏陀兰被并入开普殖民地。苏陀人大批外出到金伯利矿做工，用工资购枪带回家乡。开普议会对黑人武装力量的加强十分恐慌，1878年通过一项《维护和平法令》，责令受开普政权管辖的非洲人均须解除武装。次年，开普总理斯普列格到巴苏陀视察，宣布南苏陀人均应按《维护和平法令》解除武装。与此同时，开普当局加倍征收捐税，引起苏陀人更大不满。缴枪的最后期限规定为1880年5月底。在苏陀人酋长中，只有莫舒舒的继承人莱蔡和乔纳森·莫纳波表示从命，其他酋长均抗命不缴。莱蔡的长子勒罗托利坚决反对缴枪，被抗英情绪高昂的群众推为最高军事领袖。1880年9月，苏陀人起义，开普英军开进巴苏陀兰镇压。在勒罗托利指挥下，巴苏陀的23000名骑兵为免蹈开芝瓦约覆辙，避免正面作战，采取游击战术，声东击西，袭扰英军驻地及其供应线。在唯一的一场正规战——卡拉巴里战役中，英军败给勒罗托利。抵抗运动扩展到东格里夸兰和特兰斯凯，庞多人、滕布人、格里夸人也加入了抗英行列。英国在漫长战线上既对付苏陀人，又要镇压南恩戈尼人，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开普政府耗费军费达480万英镑。最后，英国不得不由新到任高级专员罗宾逊宣布，苏陀人将登记枪支并取得携枪的许可，每支枪征税一镑，开普军撤出巴苏陀兰，白人不得定居巴苏陀兰。开普殖民政府的力量已不足以统治巴苏陀兰，1884年由英国政府接管，巴苏陀兰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

四、第一次英布战争和英布关系的急遽尖锐化

英国兼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三年统治，既未改善其行政管理，也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只是将德兰士瓦作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来治理。谢普斯通派开普商业银行的赫德森来监管德兰士瓦财政。赫德森以权谋私，建立私人土地公司，大搞土地投机。德兰士瓦银行破产，则以拍卖德兰士瓦国家土地来抵债，英国只给予10万英镑的财政补助，主要靠强制推行税制来取得财政收支的平衡。英国税吏要求欠税累累的布尔人补交1877年以前的欠税，引起强烈不满。英军在1879年1月伊桑德卢瓦纳战役的惨败，使布尔人看穿了英国在南非的军事实力不过如此；英国击败祖鲁后将其分割成13个小酋长国，解除了布尔人因害怕制服不了祖鲁人而依靠英国的心理负担，实际上消除了促使布尔人同意加入联邦的一个重要动力。布尔人决定以武装暴动来恢复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独立。

1880年9月巴苏陀缴枪战争爆发后，英国主力部队南下镇压，留在德兰士瓦的英军总数不超过3000人，防务空虚。12月16日，布尔人在帕尔德克拉尔举行5000人大会，宣布进行武装反抗，恢复共和国。当天升起共和国旗帜，推举克鲁格、朱伯特和小比勒陀利乌斯三人为首领。同日，战争在波切夫特鲁姆爆发。12月20日，驻莱登堡一团英军驰援比勒陀利亚，在布洛克、霍斯特斯普雷特受阻击，并被击溃。英军迅即被分割包围于比勒

陀利亚和波切夫特鲁姆。1881年1月，英军从纳塔尔驰援。英军司令科利将军率军千余西进朗峡，于1月28日和2月7日两次受到朱伯特部的阻击，科利企图从西边经马祖巴山攻下朗峡。2月26日夜，布尔人发动袭击，英军惨败，伤亡280人，科利本人在山顶被击毙。此时英国在德兰士瓦附近地区已无其他军队可以动用，又担心引起德兰士瓦境外布尔人的反抗，只好同意议和。1881年3月6日，双方签订停战协议；8月3日，签订比勒陀利亚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德兰士瓦可以建立在女王宗主权下的完全自治的政府，但英国保持三项特权：控制德兰士瓦对外关系的权力；保持对德兰士瓦同非洲部落关系的控制权；战时英军有权假道德兰士瓦。这里所规定的宗主权（Suzerainty）是一个没有现代先例的词语，不具任何精确含意。布尔人明知该条约对其限制极大，迫于形势，只好企望通过以后修改条约来取消宗主权规定。

1883年，克鲁格率一代表团到伦敦，要求修改比勒陀利亚协定，建议由德兰士瓦放弃受其保护的斯太拉兰和戈申两共和国，换取英国取消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1884年2月签订的伦敦协定取消了载有宗主权规定的《前言》，但恢复其原名的南非共和国仍受英国两方面限制：第四条规定未得英国政府同意不得与他国（除奥兰治外）订约；第六条禁止德兰士瓦兼并其国境以西和以东土地（条文注明德兰士瓦没有此类缔约权）。关于宗主权，后来发生很大争论。布尔人认为伦敦协定既已删去《前言》，就是取消了宗主权的規定，承认其完全独立；英国则坚持第四、六条的限制本身说明英国宗主权仍旧保留着。

伦敦协定墨汁未干，几个月后轰动世界的德兰士瓦境内的兰德大金矿就被发现了。兰德金矿的开采及其所生产的大量黄金，完全改变了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经济面貌，同时也急速加速了瓜分南部非洲的步伐。

五、斯威士兰王国沦为布尔人的保护国

德兰士瓦共和国统治集团自从拥有金矿的巨额收入后，财政充裕，实力增强，扩张野心随之急速膨胀。19世纪90年代，朱伯特接连率兵征服北部地区几个独立酋长国（加兰瓦、马戈巴和洛贝杜），1897年又举兵征服林波波河畔最大的文达王国。文达国王姆费富坚持奉行其父马卡多的独立自主政策，支持毗邻各酋长国抵制布尔人征税。朱伯特指挥布尔民团以重炮摧垮文达的坚固岩堡，占领其首都。姆费富不甘屈服，于1898年率部万余众北渡林波波河，重新开辟自由土地。文达在索将潘斯山区的全部国土遂被布尔人侵占。

东北地区是德兰士瓦共和国外向扩张的重点。斯威士兰王国境内尚有大片沃土，又拥有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海上交通线，历来是布尔人觊觎的头号对象。

斯威士兰王国由于惧怕强大的南邻——祖鲁王国，长期以来成为布尔人的忠实盟国。姆斯瓦蒂国王在位时期（1840—1868年），曾三次同布尔人缔结友好条约（1840、1846和1855年），1846年被迫割让象河与克罗克迪尔河之间土地（南纬24—25度）给莱登堡共和国。姆斯瓦蒂对祖鲁人的极度恐惧，竟使他轻率地将蓬戈拉河沿岸10英里宽的地带割给布尔人，作为监视祖鲁人的军事巡逻区。为了同样原因，1847年，他把首都北迁到贺贺。19

世纪 60 年代初，他乘尚加尼内战时机，将王国势力向北扩展到绍纳入地区，往西直到瓦尔河河源，1863—1864 年曾围攻洛仑索马贵斯。直到 60 年代末，斯威士兰王国一直是德拉戈湾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斯威士人在该地区掠夺聪加人为奴（“巴西利”），有的将战俘收容作家内奴隶，有的卖给布尔人当学徒，有一部分卖给葡萄牙人输往海外。1868 年姆斯瓦蒂死后，由于王位之争，国内不稳，祖鲁人越过蓬戈拉河。布尔殖民者乘机利用祖鲁人的北侵，同斯威士王国再度续盟，要求其畜群进入恩科马蒂河谷的冬季牧场放牧，并觊觎通向印度洋的科西湾。此后，由于布尔殖民者不断对王国提出领土要求，斯威士兰同布尔人的不自然的同盟关系濒于破裂。卢德翁加在位时期（1868—1874 年），布尔民团多次侵入斯威士兰国土。1879 年境内小金矿陆续发现后，白人探宝客频繁地进来探矿，索取租让权。到姆班泽尼在位时期（1874—1889 年），斯威士兰的国势岌岌可危。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伯格斯特力图迫使姆班泽尼接受布尔人的保护，以剥夺其外交上的主权。然而派到斯威士兰首都去的布尔民团却因内讧而不得不撤回国内。斯威士兰暂时得以幸免。姆班泽尼贪财好利，无视国务委员会的劝阻，大批出让租让权，有些地段重复租让多次，造成极大混乱。1889 年，他为获得 15000 英镑的收入，竟将国王私人产业的征税权也租让给英国人小谢普斯通去征收，后者大肆中饱私囊，1888 年一年只给国王 150 英镑。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斯威士兰在瓜分南非中的战略地位益形重要，英国人和布尔人争夺斯威士兰的斗争加剧。1886 年以后南非沿海未被英国兼并的唯一地区，只剩濒临科西湾的汤加兰。在汤加兰与德兰士瓦共和国之间隔着斯威士兰王国。为了占领汤加兰，布尔人必须将斯威士兰作为其主要兼并目标。1882 年巴伯顿金矿发现后，布尔人对这块宝地更是垂涎三尺，英国也增强其争夺斯威士兰的力量，双方相持不下。在 1881 年和 1884 年两次英布双边会议中，达成了互相保证斯威士兰王国独立的协议。1884 年，德兰士瓦共和国通过单方面的划界行动，吞并了斯威士兰西北部包括巴伯顿的大片领土。以总司令朱伯特为首的布尔农场主涌入斯威士兰，强占土地，瓜分冬季牧场。布尔殖民者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接管该国。1888—1889 年，布尔政府加强对王国的经济渗透，攫得了穿越斯威士兰全境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控制斯威士兰政府主要经济职能的权力（征收关税和货物税、掌握所有未分配的土地、征收皇家现金收入的权力）。实际上，斯威士兰已成为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经济附庸和非正式的保护国。与此同时，1887 年，英国抢先宣布对汤加兰的保护，截断了布尔人的通海道路。

1890 年 3 月，克鲁格总统同英国最高专员举行会晤，并向英国建议，如果英国让他在科西湾得手，占领汤加兰作为出海口，他将尊重英国在林波波河以北地区的利益，并劝阻布尔人迁徙队伍不进入马塔贝莱兰。英国提出反建议，要求德兰士瓦加入关税联盟，遭到克鲁格的拒绝。此笔政治交易虽没搞成，但双方在斯威士兰问题上取得了某些妥协：建立英布联合委员会，实行双重统治。然而，德兰士瓦的目标是独占斯威士兰，克鲁格以典型殖民主义者口吻宣称：“从历史上、地理上和行政上说，斯威士兰都是属于我们的。”英国为了促使布尔人放弃其在林波波河以北的要求，在斯威士兰问题上稍作让步，1893 年签订的协议使布尔人获得了在斯威士兰境内实施管辖、

保护和行政的权利。 1894年12月，英布签订第三次协议，同意德兰士瓦对斯威士兰实行保护，并拥有保护、治理和管辖的一切权利，而不必经由斯威士兰同意。 1895年2月，100名布尔骑警进入斯威士兰首府，斯威士兰遂成为南非共和国的保护国。布努国王成为最高酋长。 1896—1897年，斯威士人酝酿发动武装起义，朱伯特把征服文达王国的胜利之师突然调进斯威士兰，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实际上，在布尔人统治下，斯威士兰成了被兼并的殖民地，全国17000平方公里土地约有73%为白人殖民者占有。斯威士人逐渐被挤到分成34块的贫瘠的保留地上。

六、赞比西河流域的瓜分和马塔贝莱人—马绍纳人的反英起义

在姆齐利卡齐晚年，马塔贝莱兰已成为白人探宝客觊觎的地方。1866—1867年，英国人哈特利和德国人毛赫勘察了塔泰和北金山矿脉，证实当地确有黄金。1868年，在塔泰地区形成一股“淘金热”，探宝客立桩占地，到处挖掘，昔日空旷的原野散落着简陋的小屋，耸立起采矿的支架。 1868年9月姆齐利卡齐病逝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王位继承危机。按北恩戈尼人习惯，王位应由国王正妻嫡子继承，但姆齐利卡齐的嫡太子恩库路马讷在多年以前就被老王秘密处死。其余诸王蜂起争夺王位，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庶子洛本古拉。欧洲一些采矿公司如伦敦—林波波公司和南非金矿公司，都积极插手王位继承斗争，同诸大臣（“英杜纳”）勾结，密谋将他们所推崇的王子拥上王位，以便从未来国王手中获取利益。

洛本古拉在争夺王位中充分表现出他的手狠心辣的性格。1869年7月，马塔贝莱兰王国最勇敢善战的一个兵团发生哗变，拥立“假太子”珀金·沃伯克。洛本古拉残酷镇压，所有官兵均被杀戮，无一幸免。这场大屠杀虽为洛本古拉除去一个隐患，却使王国军队的战斗力蒙受难以弥补的损伤。王位继承纠纷经过一年的血雨腥风，终于1869年9月以洛本古拉胜利登基而告结束。形成僭主心理的洛本古拉不得不经常给予支持他登位的英杜纳以许多特权和财产，使国王的财产和权力受到一定削弱。洛本古拉还轻率地给予在夺位斗争中支持他的南非金矿公司以北金山采矿权，给予伦敦—林波波河公司以塔泰采矿权。当北金山和塔泰矿区的采金机器开始轰鸣、英国公司为修筑通往沙谢河的公路而占据土著土地引起马塔贝莱人的极大不满时，洛本古拉方才对他在狂热的王位争夺战中的轻率举动而深感懊恼。由于金伯利金刚石矿的发现，探宝客纷纷拥向奥兰治河畔，塔泰和北金山的金矿渐被证明储量有限，这才减轻了对马塔贝莱兰的压力。

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大陆发生的几件大事使马塔贝莱兰的地位骤形重要。1884—1886年，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在兰德开始开采；德国地质学家毛赫证明大津巴布韦的马绍纳兰就是传说中的所罗门王富饶的金矿所在地，可能会是第二个兰德。1885年柏林会议结束后，英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布尔人都争先恐后企图染指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的土地，以实现有效占领。从1886年起，布尔人同英国争夺赞比西流域的斗争急遽加剧。对英国人来说，如果让布尔人进入赞比西流域，不仅开普—开罗计划无法实现，就连南部非洲联邦也将成为泡影。

1887年7月，到达马塔贝莱兰的布尔政府两名使节终于说服洛本古拉同意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允许布尔人派遣领事。针对布尔人

的捷足先登，罗得斯立即怂恿开普政府派约翰·莫法特进入马塔贝莱兰同洛本古拉会谈。莫法特利用他同洛本古拉的交情，于1888年2月11日签订了一项条约（后称《莫法特条约》），规定未经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事先知悉和准许，洛本古拉不与外国签订协议或出让土地。不谙国际事务的洛本古拉不知道这份由英国人起草的条约已将他的国土置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1889年9月，罗得斯又派以查尔斯·拉德为首的三人组成的南非公司代表团进入马塔贝莱兰。拉德等人以花言巧语欺骗洛本古拉，谎称给予租让权只是允许他们挖一个洞。1888年10月30日，洛本古拉在租让书上画押，将其领地内的开矿权让给罗得斯；作为交换条件，将给予洛本古拉1000支枪、10万发子弹、1艘汽艇和每月100英镑。洛本古拉根据英国人告诉他的租让书内容，以为他仅仅是颁发采矿权而已，根本未涉及土地的主权。罗得斯一伙却把租让权的给予解释为主权的转让。当租让书公布后，欧洲传教士将其原文全文译给洛本古拉听，他愤慨地对担任翻译的赫姆说：“你见过变色龙捕捉蝇吗？变色龙迂回到苍蝇背后，好一阵子伏着不动；然后它又轻又慢地向前爬动，先伸出一条腿，再伸出另一条腿。最后，在挨近的时候，它突然射出舌锋，苍蝇就无影无踪了。英国就是这种变色龙，而我就是那只苍蝇。”

洛本古拉认识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马塔贝莱兰王国怀有吞并的野心，1889年1月18日，他在开普《贝专纳新闻》上刊登公开信，宣布“有关租让书的所有行动一律停止”。2月，他派两个英杜纳到伦敦去，并多次写信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申诉。

罗得斯拿到拉德租让书后，于1889年4月赶到伦敦去向英国政府申请颁发皇家特许状，以组织一个公司开发赞比亚地区。索尔兹伯里政府一心希望在林波波河以北发现第二个兰德，在赞比亚建立一个坚强的英国殖民地，并考虑到让私人公司承担该项任务能免除兼并的恶名和花费，便于1889年10月29日批准给予罗得斯的南非公司以特许状，给予它以任何类型和性质的权力，包括为实行治理和维持治安所需的权力，特许状的使用地区为从莫洛波河到中非大湖的英国势力范围。英国政府在给洛本古拉的复信中施加压力，要他只同一个英国官方承认的白人团体（英国南非公司）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洛本古拉只好喝下他自己很不情愿酿造的苦酒。

罗得斯一拿到特许状，便用特许状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武装自己。1890年1月，他迅速组织起马绍纳兰去的殖民远征军。第一批远征军打着“先锋纵队”旗号于1890年6月出发，9月12日到达马绍纳兰人居住的汉普登山以东一座小山，将它命名为索尔兹伯里（当年英国首相的名字），并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占领马绍纳兰。1891年，英国南非公司擅自宣布接收马绍纳兰的土地所有权，而后分给先锋纵队中每个殖民者3000英亩土地。以后殖民者在从林波波河到索尔兹伯里的沿线上建立若干据点，修筑堡垒，扩大占领地的面积，并陆续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洛本古拉向英国殖民者提出严重抗议：“我以前以为你们是来挖金子的，看来你们来这里是要从我手里夺走我的人民以

约翰·莫法特是以前曾在马塔贝莱兰的伊尼亚提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的儿子。罗伯特是姆齐利卡齐朋友，也是利文斯敦的岳父。约翰·莫法特从小与洛本古拉有过友好的交往，深受洛本古拉信赖。

Robert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罗得西亚史》), London 1977, p.39.

Philip Mason, The Birth of a Dilemma, the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Rhodesia (《进退两难的开始：占领和殖民罗得西亚》), Oxford 1958, p.105.

至我的国家。”南非公司对此置之不理，加紧向东扩大占领土地的军事殖民活动，与葡萄牙殖民者展开争夺马尼卡兰的斗争，企图进一步向加扎兰扩张。

加扎兰是索尚加建立的加扎王国的领土，位于今莫桑比克中部和南部。加扎王国在其建国的整个过程中与葡萄牙殖民势力进行过不断斗争，迫使葡萄牙人放弃赞比西河以南大部分普拉佐领地，只在莫桑比克沿海保持稀疏的殖民据点。1858年索尚加去世后，继承王位的马韦韦将首府南迁到林波波河河口。三年后，马韦韦因被其兄弟姆齐拉废黜而求援于斯威士人。斯威士人乘机控制了滕贝人领地和林波波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慑于斯威士人的威胁，姆齐拉于1864年弃都北迁到萨韦河左岸。到19世纪80年代斯威士人和祖鲁人力量相继衰微之后，葡萄牙人才得以对萨韦河以南的聪加人、乔皮人建立殖民统治。1884年，统治萨韦河以北地区的姆齐拉去世，葡萄牙人乘机扩展到赞比西河。继其父登上加扎王国王位的冈冈雅纳起初同意与葡萄牙人签约，承认加扎王国为葡萄牙的保护国，但不久即因争夺对沿海乔皮人的控制权而断绝同葡萄牙人的关系。1888—1889年，冈冈雅纳率6万部众离开首府塞林达山，迁往林波波河以北40英里的地方建立新都。

柏林会议后，葡萄牙加紧向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内地扩张，1889年成立莫桑比克公司，其活动范围包括马尼卡兰在内。莫桑比克公司缺乏资金，向英国商号出租采矿权。英国商号得到马尼卡酋长国酋长穆塔萨的允许，在彭哈隆加河畔开采金矿。罗得斯力图占领马尼卡兰金矿区和希雷金矿区（在今马拉维），并控制加扎兰和赞比西河航道，以打通从马绍纳兰到印度洋的通道。在先锋纵队到达索尔兹伯里之前，罗得斯就派出两批人，一批东去同穆特萨和冈冈雅纳建立联系，以取得租让权。1890年9月，南非公司从这两个非洲人首领手中取得了租让权（冈冈雅纳尚未最后批准）。另一批人由洛克纳进入巴罗策兰（今赞比亚），说服国王勒瓦尼卡签订租让书，后者正因洛本古拉从英国人手得到大批枪支而忧心忡忡。1890年6月27日，巴罗策兰租让书签订。勒瓦尼卡给予南非公司在其全部领土内的矿业独占权和商业独占权。1890年英德协定给予德属西南非洲一块伸向赞比西河的卡普里维地带，而英国则掌握了后来称为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广阔地带。同时，与罗得斯合作的约翰斯顿进入南尼亚萨兰，利用苏格兰传教会在此地长期活动的基础，宣布希雷高地为英国保护国。葡萄牙政府眼看中非地区即将全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向伦敦政府提出抗议。英国政府借口葡在非洲内地并不存在真实占领和持续不断的实际管辖，拒绝承认葡在内地拥有宗主权。英国甚至扬言要派炮舰到莫桑比克去。索尔兹伯里要求葡萄牙军队立即撤离鲁奥河东岸的希雷高地和马绍纳兰地区。1890年2月，葡政府下令葡军撤去。英葡两国政府在欧洲进行谈判，1890年11月达成临时协定，以萨韦河作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英国政府处心积虑要将拥有金矿的马尼卡兰划入英国势力范围。为此，英葡双方发生武装冲突。1891年5月，英国南非公司军队击溃了葡萄牙军队；6月签订了英葡条约，将马尼卡兰置于英国控制之下，气候良好的希雷高原地区（尼亚萨兰）归英国所有，而沼泽低地密布的希雷河以西地段至卢安瓜河的土地和加扎兰则归葡萄牙所有。葡萄牙梦寐以求在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之间建立陆桥的梦想破灭了。英德协定和英葡条约对英国极其有利，大致划定了后来成为英属尼亚萨兰（马拉维）和南罗得西亚（津巴

布韦)、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势力范围,从而打开了英国二C计划的北进通道,巩固了英国南非公司1889年以来所取得的让与权利。英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外交技巧,在瓜分南部非洲的角逐中得到了最大份额。

在马绍纳兰,英国的军事移民队伍经历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早期困难以后,到1893年已稳定下来。从贝拉和金伯利分别通往马绍纳兰的两条铁路已破土动工。永久性的砖房代替了简陋的草房。行政机构逐步建立,1891年詹姆森担任殖民地总裁。南非公司肆无忌惮违反租让书,不断干预非洲人部落内部事务,无视洛本古拉对马绍纳兰的主权,因而激化了同马塔贝莱王国的矛盾。罗得斯已经认定这个殖民地的前途:或者以武装力征服马塔贝莱王国,或者离开这块土地。詹姆森决定以武力征服,1893年8月14日拟定《志愿兵服役条件》,出最高奖赏募集志愿兵。奖赏规定:若侵占马塔贝莱成功,每人将有权在马塔贝莱的任何部分圈定6000英亩的农场和得到15份金矿份地;凡掠夺的财物半数归英国南非公司,半数在官兵中平分。在志愿兵的阅兵式后举行的礼拜会上,随军牧师西尔威斯特站在子弹箱上号召志愿部队“要把哈姆的子孙全部消灭掉”

1893年9月,英国南非公司军队由亚当斯中校任总指挥,配备2门大炮和8挺马克沁机关枪,分成南、北、中三个纵队,开始向马塔贝莱王国首都布拉瓦约进发。洛本古拉从英国人屡次干预王国内部事务的事件中,已经看到英国的意图是要以武力消灭马塔贝莱王国。他积极备战,将已派往远袭巴罗策兰的6000名军队及时调回,布置在京畿重地。洛本古拉采取伏击战术,但第一次在索马布拉森林的伏击因浓雾而中止,其后采取阻击战术,先后在尚加尼河(10月24日)和本贝齐河畔(11月1日)进行两次阻击。英国殖民军躲在牛车阵中向外发射重炮和机枪,马塔贝莱战士伤亡惨重。由于作战双方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上悬殊过大,洛本古拉下令焚毁首都向西北撤退。英国军队于11月3日进入正在燃烧的布拉瓦约,派福布斯率军追击。12月3日,英国34名前锋部队在尼杨加齐河畔遭洛本古拉袭击,全部被歼,福布斯部队退回布拉瓦约。洛本古拉继续向西北撤退,准备重整旗鼓,收复国土。不幸在他到达莫西图利亚瀑布(维多利亚瀑布)时,身染霍乱症,于1894年初去世,南非公司侵占马塔贝莱后,没收洛本古拉的所有牛群,将大部分土地划归公司所有,仅在沿瓜伊河和尚加尼河两大地区划出一片水源缺乏的贫瘠土地作为马塔贝莱人的保留地,而留在公司土地上的马塔贝莱人包括显贵家族被迫为白人殖民者劳动。公司借口牲畜均属洛本古拉所有,大量没收实际上属于部落群众所有的畜群,在20多万头牲畜中只给部落群众留下4万头。1895年,英国南非公司将其统治下的地区改称罗得西亚。

马塔贝莱人失去大部分土地和牲畜,他们的行动被置于警察管辖之下,动辄受罚。愤恨的火焰在马塔贝莱人胸中燃烧,1895—1896年又接连遇上旱灾、蝗灾和牛瘟。马塔贝莱人把这一切灾难都看成是白人统治带来的祸害。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摆脱不了这些灾祸,便把希望寄托于超自然力量。早在罗兹王国时代就存在的对姆利木的崇拜又恢复了。人们涌到马托波山去虔诚

Cecil Rhodes :His Political Life and Speeches(《罗得斯,他的政治生涯和演说》), London 1900 ,pp.416-419.

Mtshali , op.cit. , p.44.

Neil Parsons , op.cit. , p.182.

姆利木(Mlimu)也称姆瓦里(Mwari)。

朝拜。首席祭司姆克瓦提代替神预言：“如果把白人从我们祖先的土地上赶出去，我一定消灭牛疫和蝗虫，并给你们普降雨露。”1895年12月，南非公司将500名警察部队的主力调往德兰士瓦去执行詹姆森袭击任务，遭到惨败。马塔贝莱兰警察力量骤减，白人警察只剩下40名。1896年3月20日，马塔贝莱人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起义，进攻殖民者的农场、矿山和仓库。殖民者仓惶退入布拉瓦约、奎洛和贝林奎等集中的居民点，设牛车阵据守。起义者的目的是赶走白人殖民者，因此他们故意敞开布拉瓦约通往南方的道路，好让殖民者撤走。但这却给英国援军留下一条毫无阻挡的北援道路。殖民政府和南非公司调动各路军队驰援罗得西亚。5月，先期到达的3000援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焚毁即将收割的庄稼和村寨。粮食匮乏使马塔贝莱人陷入困境。英军在乌姆利萨击败马塔贝莱人主力。7月，起义军退入马托波山中利用崎岖地形和陡峭崖壁，进行游击战。这时，以马弗京为起点的铁路铺到了布拉瓦约。英国南非公司如虎添翼，更便于调集军队加强镇压。

与马塔贝莱人的斗争相呼应，马绍纳人郁积多年的对白人殖民者的愤恨也爆发为起义。英国人侵占马绍纳兰后，强征劳力，劫掠牲畜，蹂躏妇女，焚烧抗税的马绍纳茅屋，引起了马绍纳人的强烈不满。马塔贝莱人起义的消息传来后，马绍纳人于3月15日揭竿而起。起义的精神领袖是两位著名祭司卡库比和尼哈恩达。起义者首先进攻殖民者分散的农场和住宅。英国南非公司陷入南北夹攻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1896年8月21日，罗得斯扮演“和平使者”角色，进入马托波山同马塔贝莱王国的40名英杜纳举行和平谈判。他作出一些让步，答应解散南非公司军队，只留下警察，并归还一些土地，发给英杜纳薪饷，供给食物和种子。10月13日，马塔贝莱人放下武器。马绍纳人则继续坚持战斗。姆克瓦提在沙延冈贝村建立起义总部领导起义。大部分起义军退到山上花岗岩要塞中死守。英军用炸药逐个炸毁岩洞，以迫使他们投降。1897年7月，沙延冈贝村失守。一群又一群起义者从山上岩洞和峭壁中被赶下来。英军枪杀俘虏，起义首领大多被杀害。到1897年12月，起义完全沉寂下去。津巴布韦的非洲人因未能团结一致抵抗殖民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马绍纳人起义被镇压以后，英国政府加强对南罗得西亚的控制，派一名驻节长官对南非公司的统治实行监督。

到20世纪初，赞比西河流域的瓜分格局已大致确定，殖民统治机构也逐渐建立和巩固。英国占领了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西北罗得西亚和东北罗得西亚（1911年联合为北罗得西亚），共126万平方公里土地。葡萄牙占领了莫桑比克78万平方公里土地。德国在卡普利维地区插进一个楔子。英国仍然觊觎着濒临印度洋的莫桑比克，在英葡条约中写明英国拥有购买葡萄牙在非洲领地的优先权。

七、德国占领西南非洲和纳马人、赫雷罗人的反抗

旷日持久的谈判进行得异常尖锐。马塔贝莱人首席谈判代表桑马布拉纳对罗得斯说：“你们来了，进行了征服，最强者夺得了土地。我们接受你们的统治，在你们统治下生活，但不是像一条狗，如果像条狗，那不如死。”当罗得斯表示要给予马塔贝莱人土地时，一位年轻的英杜纳打断他的话，讥讽地说：“你将在我们的国土上给我们土地，你真是行善事！”罗得斯命令那年轻人放下他正端着的步枪，他答道：“我必须握着枪同你说话，我发现，如果我端着枪同你们白人说话，你们就会更注意我说的话，要不然我就会像一条挨踢的狗”。

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由于位置偏僻和大部分是缺水的荒漠地带，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一直未被欧洲列强所重视。北部的奥万博兰居住着人口最多的民族——奥万博人。奥万博人组成若干酋长国，19 世纪时其中最强大的是昆尼亚马酋长国，控制着从北方运往各酋长国的生铁原料。奥万博的铁匠沿奥卡万戈河流动为当地人铸铁锻铁，也用金属制品同南邻赫雷罗人交换食盐。赫雷罗人是姆本杜人中迁到埃扎沙盐沼以西的一支，18 世纪时，财富增长，力量加强，成为独立的酋长国。为争夺北部楚梅布铜矿和南方的畜群，他们分别同奥万博人和纳马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赫雷罗人曾长期被迫向特哈平人纳贡，直到 1820 年才有力量在离大西洋岸 200 公里的奥马鲁鲁附近击败前来索取贡赋的特哈平人。此时，赫雷罗人社会内部阶级分化已很分明，各阶层拥有牲畜的数量悬殊。牧主一般拥有千余头牛和数量更多的绵羊和山羊，有的酋长拥有万余头牛和许多羊群，最高酋长马赫雷罗拥有 25000 头牛。

而奴隶只有几头家畜，依附于主人，充当牧奴。很多肤色黧黑的达马拉人替赫雷罗贵族当牧工、猎手和铁匠。

在纳米比亚南部，奥兰治河和斯瓦科普河之间居住着纳马人。它们分成八个酋长国，为首的是克豪本酋长国，又称“红族”，由著名女王盖姆斯（1800—1835 年）领导。19 世纪，从开普殖民地区迁来了一支与纳马人同种（科伊桑）的奥兰人。这支与开普荷兰人有过长期接触的新纳马人拥有火器和马匹，强悍善战。他们的到来打破了纳米比亚各部力量的平衡。奥兰人中最强大的一支是由杰格尔·阿非利卡纳领导的部落，进入纳米比亚以后过着打家劫舍的生活。1823 年杰格尔死后，其幼子容克尔夺取权位，更加明目张胆地对邻族进行劫掠。19 世纪 30 年代初，克豪本酋长国女王盖姆斯以送给一块居住地为酬劳，请他们去赶走正在南侵的赫雷罗人。自 30 年代以来，每当干旱年份，赫雷罗人便赶着畜群南下，进入红族的贝塔尼恩牧场。盖姆斯借奥兰之手将赫雷罗人赶过阿瓦斯山，直到奥卡汉贾为止（1835 年）。赫雷罗人遭此重创，国势遽衰。从此，容克尔便在南方纳马人红族和北方赫雷罗人之间建立奥兰酋长国。1840 年建都温得和克，逐渐收敛其劫掠生活，注意发展生产，过定居生活，赫雷罗酋长将其子马赫雷罗送往温得和克为容克尔指挥雇佣军。

在容克尔经营下，温得和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1843—1844 年，容克尔修建一条从温得和克通往鲸湾的牛车道，以沟通内地与沿海的交通。各族商人（赫雷罗人、纳马人、奥兰人）以及白人辐辏温得和克，运来各地特产。白人商人以武器弹药和白兰地酒换取奥兰人的牧畜。1842 年，德国莱茵传教会代替伦敦传教会在温得和克建立传教站。德国教会势力逐渐膨胀。19 世纪 50 年代初，在奥兰治河下游谷地掀起一股开发铜矿的热潮。为此在安格拉·佩克纳修建一个小港，运输铜矿石。赫雷罗人的战俘也被运往南方开采铜矿。

1861 年容克尔去世，其子克里斯琴尔继位。同年马赫雷罗也继其父成为酋长，他统治的国度成为赫雷罗人最大的酋长国，有 23000 人，分住在 150 个村寨。马赫雷罗年轻有为、聪明能干，不久便统一了赫雷罗各酋长国，创建王国，建都奥卡汉贾。1863 年，他被推为国王，成为八万赫雷罗人的最高

首领。在 1863—1870 年中，赫雷罗人同奥兰人进行了几场血腥战争。1863 年，克里斯琴尔在战斗中被杀，杨·容克继位，继续进行战争。在长期战争中，赫雷罗人逐渐转败为胜，1869 年侵入纳马兰西部，南下吉比恩，终于迫使奥兰人在 1870 年缔结和约。马赫雷罗将赫雷罗人的游牧范围大大扩展，南至雷霍博特，东至戈巴比斯。1872 年，一支从开普殖民地北上的混血种人巴斯特占领了雷霍博特（此后他们被称为“雷霍博特人”），与赫雷罗人毗邻而居。

19 世纪 70 年代，奥兰治河下游北岸陆续发现金刚石矿。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纳米比亚越来越成为探宝客瞩目的地方。在此之前纳米比亚内地在欧洲人心目中素以极其荒凉著称，而沿海地带受本格拉寒流的影响，几乎被纳米布沙漠封锁了整个海岸。欧洲人极少涉足此地，只有捕鲸船队偶而光顾，从斯瓦科普河吸取淡水。英国的大西洋舰队也不常来，只有预感到欧洲某强国可能会来占领该处海域，他们才改变航线到这里巡弋（如 1784、1786 年）。18 世纪末，欧洲风云变幻，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于 1793 年 2 月派遣远征队，占领鲸湾和安格拉·佩克纳的两个小据点。1814 年英国正式接管开普殖民地后，不愿在纳米比亚这块毫无经济收益的地区耗资，长期未向奥兰治河下游北岸地区扩展。在各国设立的传教会中，只有德国莱茵传教会在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中进行过长期扎实的传教活动，扎下了根基。金刚石的发现促使英国对纳米比亚的保护问题重加考虑。1878 年 3 月，英国宣布吞并鲸湾及其附近地带，但英国政府仍然不愿意为保护赫雷罗人而花费行政管理费用。1880 年当赫雷罗人与纳马人的战争再起，英国便撤销了保护。

第二次纳马—赫雷罗战争仍然是由争夺牧场和盗窃牲畜引起的。奥兰人和雷霍博特人都站在纳马人一边。赫雷罗人击退了奥兰人对其本土的进攻，并将奥兰人赶出温得和克。1882 年，雷霍博特人企求和平并转到赫雷罗人一边。马赫雷罗挥兵南下，直到雷霍博特边界。1884 年，纳马人新领袖亨德里克·威特布伊率军直捣赫雷罗人首都奥卡汉贾，迫使赫雷罗人回师北方。1884 年 7 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当 1880 年纳马人侵入赫雷罗人、英国人纷纷撤退时，在纳米比亚已植下深厚根基的德国传教会固守不动，请求德国政府实行保护。1882 年，不来梅商人吕德里茨进行试探，在鲸湾以南地区以枪支向当地酋长购买沿岸一块土地。1883 年 5 月，吕德里茨又以 100 镑和 200 支枪向纳马人酋长购得安格拉—佩克纳（今吕德里茨）湾附近方圆五英里的土地。同年 8 月，又得到奥兰治河口到南纬 26 度间的海岸地带及其港口。吕德里茨要求德国政府给予保护。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俾斯麦探悉正被埃及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英国政府并不坚决反对德国获得这块不毛之地时，便于 1884 年 4 月 24 日宣布予以保护。英国政府当时非常需要德国在埃及问题上给予英国支持，便于 5 月 29 日对德国的保护予以正式同意，但英国对德国的这一让步只限于东经 20 度以西至沿海地带。7—8 月间，德国军舰“莱比锡”号在北起安哥拉南界、南至奥兰治河的沿岸地区升起德国国旗。随后，德国利用纳马人同赫雷罗人的敌对状态，向内地的达马腊兰和纳马兰乃至卡拉哈迪方向扩张。1885 年 10 月，海·戈林在奥卡汉贾同马赫雷罗签订保护条约。威特布伊拒绝签订类似条约，他致信马赫雷罗，质问：“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把土地和主权

都交到白人手中，你将为此而后悔，这将成为你的一大负担，就像你把太阳背在自己的背上一样。”英国立即对戈林条约作出反应，将贝专纳兰保护国的边界向西推进到卡拉哈迪边缘。1885年沃伦率4000英军进入贝专纳兰，就是要实现这一军事目的。

由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坚决抵抗，德国人深入内陆的时间被推迟了10年，1888年，马赫雷罗宣布废除同德人签订的条约。1890年马赫雷罗死后，其子塞缪尔同外甥尼科德默斯争夺王位。1888年，威特布伊正式接替其父为酋长，次年彻底摧毁了奥兰酋长国，容克尔被其子所枪杀。奥兰人分别投奔赫雷罗人或纳马人。1892年，纳米比亚这两个最强的民族签订和约，拒绝承认德国主权。德国卡普里维新政府决定在整个沿海地带建立德国权力。德军花费三年时间企图征服威特布伊，成效甚微。1894年，从德调来的援军到达纳米比亚，德军司令洛伊特魏因对纳马人发动突然进攻，将他们赶到荒无人烟地带。由于弹尽粮绝，9月15日，威特布伊被迫签订接受保护的协定。另一方面，洛伊特魏因利用赫雷罗人内部王位纠纷，支持易受控制的、酗酒好色的塞缪尔取得王位，从而扩大了赫雷罗人上层的裂痕。

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向纳米比亚的移民明显增多，由1891年的310名增加到1903年的2998名。这些德国移民主要是退伍军人。在新殖民地的金刚石矿尚未发现以前，他们主要从事粗放畜牧业，因而需要占领大片土地开拓牧场。殖民政府给每个移民500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部落掠夺来的。洛伊特魏因认为：“挑起土著间互相残杀，较之指望德国以大量生命和金钱来制服这些部落，虽然要更难一些，但更上算”。他支持塞缪尔取得王位，索取的报酬是由塞缪尔割让中部地区大片土地作为德国移民区，即从西部的巴门到东部的戈巴比斯一线以南地区（约南纬22.5°以南）。赫雷罗许多部落反对兼并他们的土地。东部尼科德默斯率领的部落坚持戈巴比斯以南地区是他们的放牧区。洛伊特魏因出动德军镇压，将尼科德默斯逮捕处死，东部赫雷罗人土地被全部侵占。在西部，德国人利用牛瘟蔓延时期赫雷罗人丧失大批牲畜、生计日蹙而施行用土地作抵押赊购商品的办法，从赫雷罗人手中骗取大片土地。同样通过这种赊购交易，德国人掠夺了大量牲畜。有的农民赊购一袋玉米，后来却被索债的德国人牵走8头母牛付本、2头母牛付息。只几年时间，赫雷罗人就失去2/3的土地，一半以上的牲畜也变成了德国人的财产。此外，为更有效地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牲畜，并驱使他们筑路开矿、服劳役。1898年4月，德国政府颁布法令，在纳米比亚建立保留地制度。面对德国残暴的殖民压迫与掠夺，广大非洲人蕴集着越来越猛烈的仇恨火焰。1904—1907年，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德起义。

反德大起义的序幕是1903年10月爆发的纳马人崩代尔斯瓦特部落起义。正当大部分德军调往南方进剿起义军时，塞缪尔率领赫雷罗人掀起声势浩大的抗德斗争。这次斗争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1903年7月柏林当局颁布法令，强迫赫雷罗人在一年之内向德国人追缴赊购交易中的所有欠款，这无疑是在发动了一场对赫雷罗人土地和牲畜的疯狂掠夺。二是殖民当局为铺设

N.Parsons, op.cit., p.167.

按赫雷罗人习惯，应由外甥尼科德默斯继位。

H.Stoecker ed., German Imperialism in Africa (《德国帝国主义在非洲》), London 1986, p.49.

连接斯瓦科普蒙德到温得和克的铁路，不仅蛮横要求赫雷罗人无偿出让筑路土地，甚至蓄意霸占铁路沿线两侧 10—20 公里的土地使用权。塞缪尔予以拒绝，全体赫雷罗人义愤填膺。1904 年 1 月 12 日，反德战斗终于在奥卡汉贾打响。在战斗前夕，塞缪尔在给威特布伊的信中写道：“我们与其受辱而死，与其死于监禁或其他类似情况，不如共同战死沙场。”赫雷罗各部落共 7000 余人参加起义，他们与德军展开正规阵地战。头几个月，起义军行动顺利，几次战役使德军接连惨败，杀死了 100 多个殖民者，但并不杀害德国妇孺和传教士。德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德国当局赶忙于 4 月调来 1500 名武装精良的援兵。4 月 9 日，双方在翁甘吉拉会战，德军凭借着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重机枪，打败赫雷罗军队。8 月 11 日，两军又在瓦特伯格山地决战。起义军在受到重创后开始悲壮的大迁徙。塞缪尔和一部分义军向东撤至英属贝专纳，另一些战士北撤到奥万博人地区。同时德皇又任命冯·特罗塔接替洛伊特魏因统帅德军。这位曾在中国指挥德军屠杀义和团战士的刽子手设置封锁线，截断赫雷罗人的退路。他还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令》，叫嚷要把赫雷罗人全部斩尽杀绝。甚至有些赫雷罗的酋长前来谈和时，他也残忍地下令枪决。

正当德军在纳米比亚中部迫害赫雷罗起义军余部时，1904 年 10 月 3 日，南部纳马人在威特布伊领导下再次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德国当局要求崩代尔斯瓦特人交出全部武器并接受一系列屈辱条件。纳马人对骨肉同胞遭受的侮辱极为愤慨，他们决心推翻德国殖民统治。面对队伍庞大、装备精良的德军，纳马人分成小股，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使德军疲于奔命。在斗争中，八十高龄、德高望重的老英雄威特布伊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干，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为此，特罗塔不惜重金悬赏捕获威特布伊。1905 年 10 月 29 日，威特布伊不幸在法尔格拉斯战斗中身负重伤，随即牺牲。纳马战士在雅各布·莫伦加的指挥下继续抗战，一直坚持到 1907 年 9 月。

1904—1907 年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大起义使德国殖民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起义期间，德国人伤亡至少有 2000 余人，所耗军费高达 6 亿马克。起义停止后，德国殖民者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和残酷的掠夺，80% 多的赫雷罗人和约 50% 的纳马人惨遭屠杀。昔日畜群兴旺的赫雷罗部落只剩下 15000 名饥饿的逃亡者。数以千计的被俘起义军被圈禁在鲨鱼岛上服苦役，在德国人极端恶劣的折磨下，2000 多名纳马人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就病死 860 名。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土地和牲畜悉被当局没收，分给德国移民。他们被强行赶入贫瘠荒凉的保留地，为当局修筑铁路、修建港口，成为德国人任意驱使的雇佣劳动力。德国殖民者用血淋淋的刺刀维持着在纳米比亚残暴的军事殖民统治。

第二十九章 英布战争和南非联邦

被列宁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到来的主要历史标志之一的英布战争，其起因并不是作为交战一方的布尔人要推翻民族压迫，而另一方的英国人要维护这种民族压迫；这场战争是战前两个压迫民族兼真正被压迫民族（占人口4/5的非洲人）的政策的一种手段的继续，是它们为了掠夺和垄断南非的自然资源，为攫得剥削黑人劳动力的优先权，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经济体制而发动起来的。这场战争使两个白人压迫民族在战后联合起来。南非联邦就是它们勾结的产物，它铸成了南非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极端野蛮的种族关系的模式。

一、南非以矿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历史常会捉弄人。如果伦敦协定（参见本卷第二十八章）迟几个月签订，英国也许不会在此项协定上签字，因为1884年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威特沃德斯兰德金矿（简称兰德金矿）在德兰士瓦境内发现了。它是施特拉宾兄弟在瓦尔河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非洲人废弃的矿井附近发现的。这一地区被非洲人称为果里。其地下绵延着几条硕大无比的金矿脉，最主要的一条矿脉长达30公里。1886年，从碾碎的砾岩中洗出了第一批黄金，从此开始了世界最大金矿的开采。如同金刚石矿被发现时一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后来建成的约翰内斯堡城的荒野，买地挖矿，开采黄金。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德兰士瓦政府骤然获得大笔金矿税，如获至宝，迅即宣布从鲁特普特农场到福格方丹农场之间的土地为国家金矿场，规定将其中1/10土地划归原农场主，9/10则划成小块地段出售。数以百计的小矿场纷纷成立。然而，这里的金矿并不是探宝客的乐园。矿脉深埋于几百米下的地层深处，且品位较低，从一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不到一盎司的黄金，金与矿渣之比约为1:35000。这就必须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矿井机器以及技术要求很高的氰化法才能有利可图，只有拥资丰厚的大公司才能承担。金伯利的矿业资本家将其开采钻石赚来的巨额利润投资于兰德金矿，如罗宾逊、罗得斯、拜特和巴尔纳托。海外资金则主要从英国、美国，其次从德国、法国注入兰德金矿，罗得斯购买了兰德金矿的西段地皮，1887年与拜特、拉德合伙，成立南非统一金矿公司。到1888年，已有44家金矿开工生产，拥有资金680万英镑。1889年，几家最主要的金矿公司又联合成立矿业同业公司，开始形成金矿垄断资本。19世纪90年代中期，几个最大的集团——罗得斯的矿业同业公司、罗宾逊集团、巴尔纳托集团、拜特集团等便收买或控制了因生产费用上涨而陷于破产的几百家小公司，从而完全垄断了南非黄金生产。

兰德金矿不断地从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吸收大批资金，其中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家族为最大的投资者。仅1889年一年，投入德兰士瓦采金业的资本就达1200万英镑。1890年，兰德各金矿投资总额达到2200万英镑，其中英资约占总投资的60—80%。1887年，兰德金矿生产黄金1200公斤，其后8年产量陡增51倍，到1895年已达62700公斤，1898年产量已占当年世界产

金矿发现前，该地农场在1880年仅以12条牛的价钱出售。

金总量的 27.55%。兰德金矿的黄金源源流进伦敦的英国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此时，正值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各国纷纷实行多种形式的金本位制，拥有最雄厚黄金储备的伦敦，遂成为世界金融市场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金矿的大规模开采使南非百业俱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仅金矿就雇用了近 10 万黑人工人。到处在兴修公路、铁路、沿海的港口在扩建，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矿区的新兴市场鳞次栉比。对各种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刺激了白人黑人农场的生产积极性，南非的商品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南非从几百年来基本未变的单纯农牧经济结构逐渐向以采矿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变。南非平均每年输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变化（参见下表）。

商品种类 年 份	农牧产品	钻石	黄金
1871—1875 年	800 万兰德	260 万兰德	
1881—1885 年	840 万兰德	650 万兰德	
1891—1895 年	810 万兰德	790 万兰德	1130 万兰德
1901—1905 年	880 万兰德	1160 万兰德	2440 万兰德

到 20 世纪初，钻石和黄金的输出额已占输出总额的 80.3%。矿业收入的总值已取代农牧业收入总值而占居国民收入的首位。

在矿业经济的推动下，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明显加强，工业制造业也有所发展。金矿大规模开采后，兰德地区市场重现二十多年前金伯利市场的情景：鸡蛋、肉、奶酪、元白菜等价格上涨，供不应求。黑人小农和白人农场主积极扩大商品性农牧产品的生产。在矿场附近和铁路中心，一些专门用于供应市场的谷物、蔬菜、水果和奶肉蛋等商品经济作物的专业生产地区出现了。白人农场主踊跃向银行贷款，购买农业机器，改良种子，加施化肥，提高地力。愈来愈多的布尔人农场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过渡。

矿业职工所提供的巨大市场，也促进了小型工业的迅速发展，1890 年，南非已有 530 个工厂，1904 年制造业产值达 2000 万英镑。欧裔资产阶级正在茁壮成长，其中英国血统的白人资产者多投资矿业、金融业和制造业；荷裔白人资产者多投资于农业和商业。

南非掀起修筑铁路的新热潮。从兰德通往洛伦索马贵斯港的铁路、从斯普林方丹通往德兰士瓦的东开普铁路和从开普敦通往德兰士瓦的西开普铁路相继动工，从纳塔尔也修筑了一条向德兰士瓦境内延伸的铁路。后三条干线因政治原因几经磨难延宕，终于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相继通车。联接南非矿业中心和主要港埠的铁路干线基本建成，结束了南非以牛车为基本交通工具的时代。铁路线通车里程从 1870 年的 101 公里增至 1909 年 11095 公里。

矿业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南非农业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股巨浪既冲击着白人农场主的半封建经济，也同样冲击着黑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Warwick 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南非战争》), London 1980, p.19.

其中一部分黑人矿工来自葡属莫桑比克。Wilson, Labour in the South African Gold Mines, 1911-1969 (《南非金矿的劳动力》), Cambridge 1972, p.70.

Saunders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历史词典》), London 1983, p.104.

济。黑人农民为了增加商品性农业生产，争相竞购先进农具。1894 年仅纳塔尔黑人农民用于购买农具的费用就高达 140082 英镑。开普当局曾在芬果人地区试行若干年而成效甚微的土地私有制，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得到了较快发展；到 20 世纪初，已在开普八个区、纳塔尔两个区推行土地私有制。这些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地区，农民迅速分化，加上人口增长，到 1913 年已有 20% 农民没有份地。有一个村社，59 户农家庭中仅有 28 人为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或实际上分不到份地的农民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他们或者出外当雇工，或者到白人农场去当分成制佃户。极少数黑人农民富裕起来，如农民索拉·卡利巴拥有 120 头牛、20 匹马、500 只羊、2 辆马车和 3 部犁；农民马扬戈拥有 220 头牛、44 匹马、350 只小家畜、2 辆马车和 5 部犁。这些富裕农民开始雇工，实际上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资产阶级的滥觞。

但是，南非矿业尽管产值巨大、雇工甚多、对农村冲击颇大，但毕竟未能使南非农村发生根本变化。矿业只涉及南非国民生产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其本身是靠种族主义的流动劳工制度喂肥的，因此，它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消灭南非的半封建制农业，而且还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南非黑人佃农阶层。真正具有现代经济性质的以制造工业为主的大工业，在南非尚待起步。

南非黑人保留地内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保证了大多数人对土地的集体占有，尽管人均占地不到三摩根。大部分黑人青壮年劳力需要外出作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但是，土地公有制加上牢固的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极大地抑制了村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遏制了外出的黑人劳动力与土地彻底分离的过程。大部分外出的黑人劳动力宁愿到白人农场和矿业公司所属的农场充当分成制佃农或佃户工人，因为在农场的一小块土地上既能重温他们熟悉的村居生活，又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自主权。他们使用农场主或公司一块土地，应承的条件是将收获物的一半甚至 2/3 作为地租交给农场主；或者为矿场做工；或者为农场主服两个月劳役。在后一种情况下，佃户工人在两个月时间以外还可到矿场做工挣工资，而农场主除了享受劳役地租外还可从矿场得到一笔招工费，因此招募佃户工人多多益善。除保留极少数长期佃户外，多数佃户工人在两个月劳役之外都被送往矿场。而矿场更乐意雇用这种随时可以辞退的低工资的流动劳工。矿业公司的农场实际上成为储备工人的劳动力仓库，必要时还可以征召家属中 12 岁以上的童工下矿。这种农场实际上承当了保留地的某些职能，因而可称之为扩展了的保留地。

这种分成制佃农制和佃户工人制的性质是一种半封建剥削制度，是从封建徭役制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一种过渡形态。这种剥削形态的普遍存在阻遏了南非农民与生产资料脱离的过程，延长其无产阶级化过程。20 世纪初，在南非出现了一种奇异现象：一方面资本主义矿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其产值足以与当时最发达国家的矿业产值相匹敌），土著保留地中黑人农民逐渐减少（呈现日益被消灭的假象）；而另一方面，黑人农民却换一个地方不断重新出现，而且大半是作为半封建佃农出现的。这种不正常状况既使黑人

Saunders, op.cit., p.104.

C.Bun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南非农民的兴衰》), London 1979, p.93.
据 1911 年普查，南非黑人农业人口为 3880514 人，黑人保留地面积仅 11164484 摩根，人均占地不到 3 摩根。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vol.1, New York 1928, pp.74-75.

中的农业资产阶级不能更多更快地成长，也使欧裔（特别是布尔人）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受阻，但却助长了布尔人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到 1911 年，白人农场中黑人农民高达 1827262 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桎梏下，他们的政治、经济境况不断恶化，社会地位极不稳定。

二、英布殖民者争夺殖民权益的斗争激化

兰德金矿的开采完全改变了德兰士瓦地区的经济价值。德兰士瓦政府原先挣扎于财政破产边缘，1884 年欠款 39.6 万英镑，无力偿还；1886 年，其财政收入翻了三番，到 1897 年已达 448 万英镑。1898 年，德兰士瓦金矿收入已超过向来成为南非最大收入的开普关税收入。1887—1896 年，兰德金矿产金价值 4228 万英镑。金矿投资总额在 1895 年共达 8250 万英镑，大部分为英资。德兰士瓦共和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凉贫穷的小国一跃而为令人艳羡的富国。南非的经济中心逐渐从开普转移到德兰士瓦。这意味着，在南部非洲由英国殖民地左右一切的经济地位正在被布尔人共和国所取代。

英国对德兰士瓦的政策诡谲多变。由于 1886 年以前这块高原地区穷困不堪，又不具有非占领不可的战略重要性，英国政府认为，只要布尔人不向四周扩张，英国可以容忍这个内陆国维持独立地位，让它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中自生自灭。因此，由卡纳房制订的南非联邦计划伸缩性很大。1884 年与德兰士瓦签订的伦敦协定，实际上已对它网开一面。但兰德金矿的开采和羽翼丰满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企图在南部非洲攫取更多的土地和殖民权益，对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殖民霸权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英国要将南非的政治、经济统一在大英帝国旗帜之下，首先必须让兰德金矿处于英国能加以控制的政权管理之下。英国深感其南非联邦计划的笼头已套不住德兰士瓦这匹不驯的野马，它对德兰士瓦的政策也就从迂回包围逐渐走向战争解决。

兰德金矿的丰硕收入不但消除了德兰士瓦政府财政的连年赤字，而且年年有节余。这强烈地刺激了布尔统治集团的贪欲，它加紧与英国争夺南非。北向扩张是布尔人的传统扩张方向，1887 年在马塔贝莱兰曾一度得手，但终被莫法特条约和拉德租让书所破坏。东向扩张是德兰士瓦布尔人的重点，其目标是攫得通向沿海的交通线和港湾，以便不受英国控制地与欧洲其他国家（荷兰、德国、法国）自由交往。位于祖鲁兰的圣卢西亚湾，布尔人几经折冲尊俎，似乎已经唾手可得，却于 1887 年被英国兼并。汤加兰的科西湾是通海的最后希望，英国曾以缔结关税同盟作为让与德兰士瓦修筑通往科西湾铁路的条件；1895 年英国占领汤加兰，这一线希望也成为泡影。

德兰士瓦政府不肯善罢干休，运用其雄厚的财政力量，投资修筑一条从葡属殖民地洛伦索马贵斯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简称洛—比铁路），1895 年正式通车。但英国掌握的东开普和西开普等三条铁路干线的货运量到 1894 年已达 83.2 万吨，几乎囊括了南非全部货运量。它采取降低开普铁路运价的手段，企图搞垮新开张的洛—比线。德兰士瓦政府实行价格倾斜政策，大幅度提高英资铁路在德兰士瓦境内路段的运价（吨公里运价为 2.54 便士），以示报复。开普商人决定将运往兰德的货物卸在德兰士瓦边界，从菲尔客斯德

Buell, op.cit., vol.1, p.75.

Schreuder,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对南非的争夺》), Cambridge 1980p.184.

里夫浅滩用牛车涉过瓦尔河，运往约翰内斯堡。1895年11月1日，克鲁格政府下令封锁浅滩。英国保守党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克鲁格在封滩七天后，于11月7日被迫重新开放。浅滩危机表明，英国保守党政府为捍卫其南非殖民权益而不惜诉诸战争。这一强硬姿态使以罗得斯为首的英国在南非的金融资本家和投资者备受鼓舞。

在兰德金矿和商品关税上，克鲁格政府利用国家政权与英国斗法，以攫取金矿利润的最大份额。布尔人对金矿投资甚少，绝大部分为英国的投资。因此德兰士瓦政府对金矿征收苛重的直接税和利润税，分沾金矿的巨额利润，并颁发各种特许权，攫取额外收入。1894年，它把销售炸药的垄断权给予诺贝尔托拉斯，规定每销售一箱（50磅）炸药，政府抽税5先令。这项特许权抬高了兰德矿区炸药价格，使金矿主为此在1894—1899年多付出220万英镑，布尔政府每年多得30万英镑税款。克鲁格政府恣意提高从开普殖民地向德兰士瓦进口或转口的商品关税税率，仅征收进口税每年就攫得100万英镑以上。金矿消耗的各种物资（包括工人食品）主要靠进口，金矿主为此多付出一笔巨额关税。布尔政府通过这些途径从英国金矿垄断资本家手中分享的利润十分可观，1895年德兰士瓦财政收入为354万英镑，相当于当年金矿垄断资本所得利润总和

不管英国施加什么威胁，德兰士瓦政府一一拒绝按罗得斯的条件同他结成商业联盟的建议。克鲁格手中的兰德矿权和德拉戈阿铁路这两张牌，使他稳居于主宰未来南非贸易的地位；它又不断寻求德国外交和财政支持，更使英国政府疑云满腹。罗得斯及其后台张伯伦为达到既定目标，打算以武力推翻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统治。

早在1895年初，罗得斯等一批大矿主就同约翰内斯堡的外地人改革委员会策划一场推翻布尔人的政变。他们得到新任殖民大臣张伯伦的直接支持。8月，罗得斯向张伯伦要了一块贝专纳兰边境上的狭长地带，后者明知这块土地要被用作反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基地，仍予以批准，因为前此南非高级专员罗宾逊已向他报告了罗得斯一手策划的外地人政变委员会的全部计划。罗得斯得到这些暗示，即命其心腹詹姆斯训练一支500人的突击队，准备从贝专纳兰边界打进约翰内斯堡，同该市外地政变委员会里应外合。詹姆斯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1895年12月29日奉命率478名南非公司警察向德兰士瓦共和国境内进发。尽管张伯伦鉴于国内外各方面的不利形势，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下令停止执行此项计划，但指令已来不及传到詹姆斯手中。这批亡命之徒已经突进德兰士瓦共和国。克鲁格早已洞悉英国人阴谋，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1896年1月2日，詹姆斯部队在克鲁格斯多普被包围，除134人被击毙外，其余包括詹姆斯在内全部被俘，而约翰内斯堡的政变委员会（挂牌为“改革委员会”）的64名成员也被一网打尽。一败涂地的詹姆斯袭击事件成了轰动欧洲的政治丑闻。罗得斯被迫辞去开普总理职务。张伯伦则一口咬定他事先毫不知情。

Maraise, J.S. *The Fall of Kruger's Republic* (《克鲁格共和国的殒落》), Oxford 1961, p.6.

Fisher, *Transvaal and Boer* (《德兰士瓦和布尔人》), London 1900, pp.266-267.

Leonard, C.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 1885-1895* (《关于南非政治形势的文件》), London 1903, p.87.

当时社会舆论广泛怀疑张伯伦参与了袭击的谋划，但拿不出明确的证据。直至后来张伯伦私人文件和当

德国利用这事件大做文章，其外交意图是拉拢法国和俄国，采取共同的外交行动，以结成大陆同盟，孤立英国，迫使其在殖民地问题上对德国作出让步。1896年1月4日，德皇威廉致电克鲁格，名为祝贺，实际针对英国，且语含威胁：他祝贺克鲁格在“未向友邦求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集团，重建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德皇电报使英德关系急遽恶化，尖锐地暴露出英德在殖民地、贸易、外交诸方面的全面对立，也促使英国下决心摧毁布尔共和国。

三、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的英布战争

1896—1899年间，英国人和布尔人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继续推行各自的兼并政策，但未能奏效。为了扫除障碍，双方都决心诉诸战争。在战云密布的气氛中，英国新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执行挑起战争的强硬路线，肆无忌惮地干预德兰士瓦内部事务，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个明知布尔人绝不可能接受的宗主权问题，从而消除了外交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他又在1898年5—6月的布隆方丹谈判桌上拒绝布尔代表史末资提出的解决外地人选举权问题的方案，并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布尔人则幻想在英国援军未到之时先下手为强，以武力实现其布尔非洲计划。1898年，德兰士瓦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邦共同成立联邦会议，以协调抗英行动。克鲁格政府遂于1899年10月9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后到达南非的一切军队，限48小时答复。10月10日，英国予以拒绝。11日，布尔人发动进攻。英布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先后动员了44—45万军队，其中25.6万为英国正规军，10.9万为英国志愿军，5.3万为南非英国殖民，3.1万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布尔人方面上战场的有8.8万人，其中7.3万为德兰士瓦人（4.3万）和奥兰治人（3万），男性青壮年几乎全部上阵；1.3万为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2000人为外国志愿者。英国运到南非的军事装备物资数以万吨计，动用了1027艘舰船。

英布战争持续两年半，从1899年10月11日到1902年5月31日，按战争进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99年10月11日至1900年1月。虽然英国政府早已决定以战争手段解决南非问题，但却没有意识到军事准备的紧迫性。英国情报部（当时英国迄未建立总参谋部）和英军上下都存在严重的轻敌思想。情报部的结论是：保卫南非两个殖民地的问题，就是对付二三千名布尔人的袭击，一支具有一定力量的英国步兵在骑兵和炮兵的支援下，入侵两个布尔共和国绰绰有余，英军能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开阔高原上轻而易举地击败布尔人。

时正在开普的帝国大臣鲍尔斯的文件公开披露，历史真相方才大白。本文此段叙述即根据已公布的档案材料撰写。

Dugdale ed., *German Diplomatic Documents* (《德国外交文件》), London 1928, pp.387-388.

荷裔南非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的布尔非洲计划，不仅包括德兰士瓦、奥兰治，而且囊括被英国夺去的开普、纳塔尔、贝专纳兰、罗得西亚等地。

Peter Warwick, *The South African War* (《南非战争》), Longman 1980. Wilson & L.M.Thompson,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牛津南非史》), vol.2, Oxford 1971, p.325.

英军的战略计划是，援军首先进驻开普，防止当地布尔人叛乱，而后通过三条铁路直捣比勒陀利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但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英国人的估计。布尔人全民皆兵，能迅速动员作战人员投入战斗。在战争初期，当英国援军未到之前，布尔人（3.5万人）暂时保持了对英军（2万人）的数量优势，其战略计划是集中布尔主力突袭纳塔尔，攻占德班港，取得出海口，并借初战告捷的声势鼓动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叛乱，搞乱英军后方。

战争爆发后，布尔人主动展开攻势。布军总司令朱伯特率主力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纳塔尔，直驱莱迪史密斯。10月30日罗姆巴德山一战，英军损失1272人，莱迪史密斯被包围，与德班港的联系被切断。另一支由克隆日和雷伊率领的军队进入贝专纳兰，切断英国铁路干线，包围金伯利和马弗京两城，从而切断开普地区与罗得西亚间的联系。第三支布军渡奥兰治河南下，占领开普殖民地东北地区，威胁东西开普之间的铁路线。

10月底，布勒率领的英国援军到达开普敦。得到2万援兵的英军几经努力，到11月下旬才制止住布军进攻的势头。从11月中旬到1900年1月底，布勒指挥的英军在三条战线上的反攻都遭到失败。12月11日，向金伯利进军的梅休因中将的第一步兵师在马格斯方丹遭到惨败，伤亡968人。加塔克中师的第三步兵师于12月10日向斯托姆贝格的进攻被击溃，696人被俘和失踪，使开普重陷于危险之中。援军（南非远征军）总司令布勒上将亲率主力于12月15日在科伦索发动进攻，企图强渡图盖拉河，解莱迪斯史密斯之围，结果损兵折将1138人，丢失12门大炮。一周之内英军损失2800多人，在英军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一星期”。布勒兵败辞职。12月17日，罗伯茨被任命为南非远征军总司令，克其纳为参谋长。布勒被任命继续指挥纳塔尔英军。1月底2月初，得到增援的布勒3万军队两次试图突破布军防线，均未奏效，不得不退守契维利。第一阶段战事以布勒战略计划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英军在英布战争第一阶段（长达四个月）的惨败轰动了世界。英军首先败在战术的陈旧和保守上。其密集队形的冲锋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的200多次殖民战争中为英军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在机动性很强、战术诡谲多变、火力密集凶猛的布尔人骑马步枪兵面前就屡吃大亏。布尔人在战术上占有明显优势，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尽量减少伤亡，凭借其战壕的隐蔽性，诱使英军以密集队形闯入其射程之内，从而充分发挥其现代火器（从德国、荷兰购来的毛瑟枪、机枪、速射大炮等）的杀伤力。其次，从敌对双方的军队素质来看，布尔人军队（民团）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组成的，他们为了保持从非洲人手里抢来的土地、矿藏资源和既得利益并幻想建立布尔非洲而奋勇作战，士气高昂。英国士兵对这场战争只有肤浅的认识，在远离本土的南非高原上，他们所认识的大英帝国利益并不能促使他们主动地作出英勇牺牲。平时依靠黑人劳动的布尔人经常从事游猎娱乐活动，从小掌握卓越的射击技术，几乎弹无虚发。英军则训练很差，一年仅有两个月的训练时间，且大部分花于队列训练上，骑射技术不精，不善隐蔽，反应迟钝。

第二阶段自1900年2月至1900年9月。英军连遭挫折，在帝国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为挽回颓势，英国政府倾其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对付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布尔人（指两个布尔共和国）。1900年1月，南非战场上英军增至18万，3月再增至22—25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几千匹军马运进南非增加了英军机动性。2月，罗伯茨把英军主战场从纳塔尔移到奥兰治，将主力

集结于奥兰治河以北，兵分二路（东路和北路）突入布尔共和国的心脏地区。2月16日，北路英军进入金伯利，救出了被围困数月的罗得斯，并包围了围城布军，迫使克隆日率4000人投降。东路英军于2月底3月初解莱迪斯史密斯之围。3月13日，英军占领布隆方丹。布军面临后路被截断的威胁，迫使占领开普殖民地的布军撤往德兰士瓦。布军总司令朱伯特坠马而死。继任统帅的博塔善于游击战。3月中旬，伤寒流行，英军攻势被迫中断。4月底，又一大批援军开到，英军重新发动进攻，5月17日解马弗京城之围。5月24日，英国宣布兼并奥兰治，并加紧向德兰士瓦进攻，进入约翰内斯堡，6月5日攻下比勒陀利亚。7月，纳塔尔境内英军向西进军，同北上英军主力会师。9月1日，罗伯茨宣布兼并德兰士瓦，并宣称战争结束。克鲁格总统撤到洛伦索马贵斯，从葡属港口乘坐荷舰前往欧洲求援。在欧洲，虽然他受到德意志人的狂热欢呼，但各国政府特别是已同英国达成政治交易的德国政府却表现十分冷淡。威廉二世皇帝为了躲开他，干脆跑去狩猎。

第二阶段布军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到1900年第四季度仍维持25万人，为布军的5倍。第二，布军不善攻城，所有被围的主要城市无一攻破，旷日持久的围而不破严重地分散了布军有限的兵力，到处造成英军更大的数量优势。第三，当英军转入进攻、战场移到布尔人家园时，向来纪律松懈的布尔战士的固有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不少民团自行解散回家，守卫自己的农场。第四，罗伯茨和克其纳大力整顿铁路交通，为大兵团作战开辟道路，从而使英军得以充分发挥大兵团作战长驱直入的威力。总之，到第二阶段，战争已进入了作战双方国力大较量的时刻，英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国力（充沛的兵源、钢铁产量、海上运输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阶段自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罗伯茨在比勒陀利亚庆祝战争胜利结束，1900年11月宣布两个布尔共和国改名为英属奥兰治殖民地和德兰士瓦殖民地。他自己凯旋回英，留下克其纳处理善后。但退出城市的布尔军队，已化整为零，组成小股游击队，袭击英军交通线，掠取英军给养，歼灭小股英军。布尔人游击队在德·韦特、拉·雷伊、博塔、史末资和赫佐格等人的领导下，越打越顺手。他们熟悉地形，得到居民的支持，散布在广大地区的农场成为游击队的根据地。1901年9月至1902年5月，史末资和赫佐格率领5000名骑兵，分成若干小股游击队，奔驰千里，深入英军大后方，一直推进到大西洋沿岸和开普敦近郊，迫使英国在开普地区宣布戒严。1902年3月，英军梅图安中将在离比勒陀利亚300公里地方遭到拉·雷伊指挥的游击队的包围而缴械投降，再一次震动了英国。英军打得越来越艰苦，25万大军疲于奔命。

英军司令克其纳为了早日结束战争，采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和设置集中营来对付布尔人的游击队。在游击队活动地区，英军架设铁丝网，将布尔共和国分割成若干绥靖区域，进行分区扫荡，铁丝网总长度达6000公里。绥靖区内每隔1—2公里设一木板碉堡，共设置8000座碉堡。在这些地区内，凡发现布尔农场主帮助游击队，则周围10英里内的农场、房舍一律烧毁；后来又进一步烧毁所有的农场、房舍、畜圈和庄稼（共焚毁3万座农舍），先后将12万名布尔人妇女，儿童和老人及其8万名科伊人和黑人仆役统统从

原地赶走，关进克其纳首创的集中营。集中营内瘟疫流行，营养不良，死亡率极高，1901年10月曾高达344‰，仅儿童就死了22072人。集中营的高度死亡率严重动摇了布尔军人的士气。

布尔居民人数甚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共和国总共只有居民22万人左右，战争已吞噬了其中1/7人口，他们精疲力尽，并面临着种族灭绝的危险。布尔人深感孤立。在南非1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除了开普殖民地有几万荷裔阿非利卡人支持他们以外，400万黑人的绝大部分对他们抱敌视态度。

英布战争既是英布殖民者争夺南非霸权政策的继续，也是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实行掠夺、奴役和屠杀政策的继续。布尔人在战争期间对非洲人的政策以及非洲人的反应，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反非洲人的性质和布尔人在非洲居民中极端孤立的处境。战争爆发后，布尔人立即对非洲人采取严加防范的措施。布尔政府只把56%的战斗部队调往战场，却将44%的部队留驻后方监视非洲人。普林斯洛司率重兵驻守远离前线的象河流域，镇压佩迪人的反抗，800—1000人的民团驻守斯威士兰边境，1000人的民团驻守卡利登河谷的巴苏陀边界。备受压迫的非洲人利用白人殖民者的战争来打击布尔人。在一些地区，非洲人夺回了几十年来被布尔人强占的土地；非洲佃农拒绝为布尔地主服役。1899年11月，德兰士瓦西部克卡特拉部落的三个团队围攻布尔人阵地，击毙布尔议员贝纳德。在这些团队控制的西部地区，布尔人无法穿越。1900年，塞库尼尼二世领导佩迪人完全摆脱了布尔人统治，佩迪劳役佃农纷纷反抗布尔地主。佩迪人的反抗使布尔民团不敢西渡斯蒂尔普特河进入佩迪腹地。在德兰士瓦东南地区，土地被布尔人蚕食的祖鲁人频频袭击驻守该地区的民团。库鲁西部落一支团队围攻弗赖海德民团，击毙56人，其中包括民团头目。在各战区，非洲人组织部队守卫边界，防止布尔人借道入侵。佩迪人封锁战略要冲瓦特沃河谷，阻止布尔游击队的牛车给高原上的兵团运送粮食辎重，布尔骑兵几次冲击均未能突破。布尔将领哀叹道，非洲人对布尔民团的强烈敌意和抵抗在许多地区造成令人无法承受的状况。1902年5月15日，两个布尔共和国的军方代表聚集弗里尼欣讨论和战前途，许多地区代表忧心忡忡谈到非洲人的敌意和威胁，建议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

战争旷日持久，双方精疲力尽。英军靡耗战费22000万英镑，死亡21000多人，深知难以迅速赢得战争胜利。布尔人作战能力也在迅速下降，兵力从88000人减少到22000人，战士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士气沮丧。双方都打不下去，于是开始进行和谈。

和谈持续了一年两个月，谈判的关键，一是布尔人的独立问题，二是对待非洲人问题（核心是非洲人的选举权）。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牺牲非洲人的利益，向布尔人靠拢，很快就同布尔人取得了一致意见。1901年3月7日，在由克其纳公布的米德尔堡建议中，宣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中的卡弗尔人在未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前没有选举权；即使将来给予他们选举权，

the Sahara (《撒哈拉以南非洲史》), New York 1962, p.302.

荒野上搭起的帐篷，其官方正式名称为 refuge (避难所)。

Wilson & Thompson, op.cit., vol.2, p.328.

Warwick, op.cit., p.193.

Pakenham, op.cit., p.570;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8, p.631.

也应加以限制，以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这实际上就是排除非洲人在上述两地享有选举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长期相持不下。英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兼并布尔共和国的。它寸步不让，先后五次坚决拒绝布尔人提出的维持独立的要求。布尔人这一要求的实质是坚持独自制定和执行对土著的政策。1902年5月15日，代表165个游击队的布尔代表在弗里尼欣开会，在最后时刻仍力图保持独立，而宁愿放弃兰德金矿主权，并将斯威士兰转让给英国。

几经折冲尊俎，至5月30日，60名布尔代表就是否放弃维持独立举行投票，结果以54票对6票决定接受和约最关键的一条：“布尔野战部队放下武器，缴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枪炮及战争物资，中止对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政府继续进行任何抵抗，并承认国王陛下为其合法主权者。”5月31日，英布双方在弗里尼欣正式签订和约。军事力量强大的压迫民族打败了另一个军事力量较弱的压迫民族。持续31个月的英布战争宣告结束。这项和约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两个白人民族联合统治黑人的基础。

四、南非联邦——白人殖民者勾结的产物

英布战争虽然使布尔人在大英帝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屈服，然而英国知道它要在南非维持其控制力量，必须同布尔人谋求妥协。张伯伦一再强调，南非的未来依赖于合作。战争使两个压迫民族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人口多二三倍的非洲人。这就是战后英国制定南非政策的出发点。

战后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建立由它有效控制的南非联邦。为此，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为了同布尔人修好和医治战争创伤，英国付给布尔人300万英镑作为财物的赔偿费，主要用于建设被烧毁的农场；并贷给两个殖民地3000万英镑，以建造大规模工程、设立学校、修建公路和铁路等。它花费800万英镑修建2000公里铁路，通向农业地区；建立模范农场，引进英国技术，以便为工矿和城市提供玉米、小麦、肉类和奶酪。第二，允许学校和法院可以使用阿非利卡语，作为对布尔人民族情绪的一种抚慰。第三，给予德兰士瓦（1906年）和奥兰治（1907年）以省一级的自治地位。第四，召开关税会议，扫清四个殖民地之间的关税壁垒；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也将各殖民地在经济上联成一体。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英布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矛盾有所缓和。布尔人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派主张同英国和解的政治力量，此派以博塔和史末资为首的南非党为核心。他们认为，布尔人在南非是与英国人同命运的（二者均面临着汪洋大海般的黑人），主张同所有在南非的欧洲人联合，形成一个南非民族。1906年1—2月，史末资赴伦敦，一方面表示效忠大英帝国，一方面又晓以利害关系，终于使新上台的自由党取消了布尔人强烈反对的利尔顿宪法。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自治的、亲英的南非，英国政府重新公布新宪

Newton ed., Select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Un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 (《关于南非联邦的秘密文件》), Longman, vol.1, p.205.

据1901年人口统计，英国人36.8万，布尔人49.6万，共86.4万，而非洲人中仅黑人就有349万（1904年统计数字）。

1905年制订的利尔顿宪法极力加强总督的权力而削弱殖民地议会的权力。

法，对布尔人作了让步。

1906年12月在德兰士瓦，1907年7月在奥兰治，按照新宪法举行选举，博塔组织的人民党在德兰士瓦获得了69个议席中的37席；菲舍尔的统一党在奥兰治的37个议席获得了32个席位，他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布尔人自治政府的总理。非洲人、有色人（混血种人）和亚洲人在这两地选举中按弗尼里欣和约第八条被完全排除在外，新成立的由布尔人把持下的省议会又作出剥夺非白人选举权的决议。这样，在这两个殖民地的非洲人便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在开普殖民地，绝大多数非洲人和有色人因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高限额规定而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纳塔尔殖民地，英国人所把持的议会早在1882年就剥夺了当地所有非洲人的选举权，而对有色人（包括印裔南非居民）则因印度人的长期斗争而未一笔勾销。这里的白人（主要为英裔）对维持相对的独立状态颇具信心。他们同开普殖民地的英裔移民不同，对组成南非联邦的兴趣不大，但1906年祖鲁人起义使他们改变了态度。

1905年，纳塔尔殖民地政府为解决财政拮据，决定除业已征收的茅屋税（每间6—11先令）外，另向非洲人征收每人一镑的人头税。此项税收引起非洲人普遍反对。1906年2月，下乡强行征税的税吏遭到非洲人抵制。英国派军警镇压。祖鲁人酝酿起义，一位已被殖民政府废黜的酋长班巴塔和另一位老酋长西甘南达被推举为起义领袖。班巴塔在西部库德尼山区首举义旗，南渡图盖拉河，在格雷敦地区组成数千人的起义队伍。纳塔尔白人民团兵力不足，无法单独扑灭起义，只好吁请驻德兰士瓦的英国正规军协助。麦肯齐上校率2100名英军驰援纳塔尔，迅速切断东西两支起义军的联系。6月初，祖鲁起义军在莫姆峡谷同英军展开激战，班巴塔和500多起义者英勇牺牲。此后，起义中心转移到图盖拉河以南的马蓬穆洛，波及范围更形扩大，起义人数增至7000多人。英军增援达5000人，麦肯齐挟优势兵力和武器镇压了起义。祖鲁人被杀5000多人，被捕和驱逐出境达3000人。它的悲壮失败宣告了南非历史上由酋长领导的旧式武装起义的结束。

班巴塔起义摧毁了纳塔尔白人移民想独居一隅而不加入联邦的信心。犹有余悸的纳塔尔殖民政府赶紧表示愿意同南非其他三个殖民地组成联邦，齐心合力对付非洲人。

英布战争以后南非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关税、铁路运价的一体化，为南非联邦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南非经济一片凋蔽，百废待举。英国政府决定首先帮助德兰士瓦金矿恢复和发展生产。金矿恢复的关键问题是为其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战乱期间，兰德金矿黑人工人几乎跑光。战后，英国殖民政府想方设法重新招募，但招工计划屡次落空。由于工资低、待遇差、死亡率高，非洲人拒绝到矿上做工，最多时只招到68800人，只及战前（1899年）107000人的60%。经英国政府批准，最高专员米尔纳决定从中国输入华工（参见本卷第三十二章）。华工来到后，兰德金矿业得到了奇迹般的恢复和发展。与战前最发达的1896年比较，1905年各类矿场从164个增至298个，增加63.4%；矿井比1904年增加1500个，矿产价值从

在开普殖民地，仅占人口23%的25万白人占选民人数的84%，占人口77%的非洲人和有色人仅占选民的16%。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8、9、10合辑，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8477 万美元增至 11500 万美元，增加 36.6%。1905 年，生产黄金 470 万盎司（1902 年仅 170 万盎司）。德兰士瓦矿业总会承认：“中国工人对过去两年来工业的扩展有很大贡献”。

金矿生产恢复给南非殖民政府带来了大笔财政收入，也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和营建道路及各项巨大工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充当帝国资金的作用）。在充实而稳定的货币基础上，南非经济在 1909 年以后进入了蓬勃高涨时期。1911 年，南非建成第一座炼钢炉，并建有 2400 个工厂，制造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 7%，南非再次出现工业化浪潮。

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高涨，四个殖民地在关税和铁路运价方面的矛盾急遽尖锐起来，冲突的升级有使各殖民地现存的、自成体系的商业制度濒临崩溃的危险。1903 年，由于米尔纳的干预，四方铁路的关税会议才勉强达成协议为期五年的临时协议。但矛盾并未解决。纳塔尔和开普希望提高铁路运价和关税率，以增加收入；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则希望实行低关税和低运价，以降低进口的日用品价格，达到压低矿工工资的目的。其中又插进葡属洛伦索马贵斯港口同纳塔尔开普殖民地诸港口争夺兰德矿区的商业利润和关税的竞争；莫桑比克殖民政府也以掌握着向南非输出大批流动劳工这张王牌进行要挟，更使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在这重重叠叠的矛盾之中，德兰士瓦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巨大金矿工业区是一个广阔的商品消费市场，仅非洲工人和白色工人就达到 206814 人（1912 年），每年消耗大量进口商品。如果四个殖民地仍按战前的经济体系各自发展，德兰士瓦以其特殊有利的地位对开普和纳塔尔设置关税壁垒，再将商务集中到德拉戈阿湾的商路上，其结果将是德兰士瓦独家享受兰德矿区繁荣的主要成果，而开普、纳塔尔两殖民地将陷入经济困境，逐渐丧失由于英布战争胜利而取得的经济和政治优势。

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建立四个殖民地的政治联邦、设立集权的中央政府是英国殖民政府控制局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四个殖民地（省）的财政收支（实际上是实行权益再分配），既有利于消除各种争执因素，又可统筹兼顾英布两支白人殖民势力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从而避免因经济争端而加深白人之间的不和，削弱统治非洲人的力量。可见，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实际权益的再分配是促使英布两个白人集团同意建立政治联邦的潜在动力。

当时，这两支白人殖民势力在政治上合流的必要性也益趋明朗。自 1906 年和 1907 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相继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以后，布尔人对联邦前途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荷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数量在德兰士瓦、奥兰治、开普三个殖民地均对英裔白人占居优势，由阿非利卡人组成的三个政党都已在三个殖民地选举中取得胜利，并主持了地方自治政府；他们坚信在未来成立联邦中央政府的选举中，阿非利卡人也必定会稳操胜券。

1908 年，在德班召开了有四方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制宪会议），占南非人口 4/5 的非洲人和混血种人被完全排除在会议之外。会议讨论的中

转引自张芝联：《1904—1910 年南非英属德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

Johnston, Class, Race and Gold (《阶级、种族和黄金》), London 1976, p.97.

Houghton, D.H.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南非经济》), Cape Town 1964, p.42.

本章所涉及的“阿非利卡人”均指包括布尔人在内的南非荷裔白人。

心议题之一是关于非洲人的选举权问题。经过热烈的辩论，会议最后通过的《南非法案》明确规定，联邦的所有议员均须是欧洲人后裔。英国自由党政府批准了《南非法案》。为了取得布尔人的合作，使即将成立的南非联邦成为英帝国的可靠支柱，永保绕行好望角的航线的畅通和安全，并牢固地保有帝国最大的金库——兰德金矿，英国政府脱下了它长期披在身上的“南非非洲人利益的保护者”的伪装，将非洲人的基本政治权利拿去同布尔人做政治交易。这实际上将英布战争前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推广到开普和纳塔尔地区，以法律形式肯定、扩大和巩固了布尔人的种族歧视政策。从《南非法案》通过之时起，在 122 万平方公里的南非国土上，开始了以中央联邦政府的立法和法律为基础的种族歧视的时代。

关于三个直属英王的保护国（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专纳兰）的归属问题，《南非法案》序言曾作过这样的预示：“为原来没有被包括在联邦之内的那些南非部分地区最终作为省或领地加入联邦作好准备，是有益的。”英国政府曾作出模棱两可的承诺：如果将来南非政府提出要求，可考虑把这三个保护国并入南非联邦；而在帝国答复南非联邦提出要求时，须先行征求非洲居民的意见。但在经济方面，这三块保护领地已完全汇入南非的流动劳工体系，成为南非劳动力的储存库。

1909 年 9 月，英国议会公布《南非法案》，它成为南非联邦的宪法。1910 年 5 月 31 日，即弗里尼欣和约签订八周年之际，南非联邦正式成立。

经过英布战争战败的磨难，布尔人之间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居住在四个殖民地的荷裔白人已有 60 万人，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荷兰改革教会）和语言（固执地使用和推广一种由荷兰语演化而成的阿非利卡语）；英布战争大大促进其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南非联邦的成立则使他们合并成单一国家。经历了长期演化和认同过程的荷裔移民后裔终于形成一个民族，自称阿非利卡人。

南非联邦成立后，原来各殖民地中的阿非利卡人政党很快结合成单一的政党——南非党，由博塔任主席。1910 年 9 月 15 日第一次普选中，南非党得到布尔农场主的一致支持，在全部议席（109 席）中赢得 67 席，英裔移民的主要政党——联邦党仅获得 37 席。南非党在议会中还得到南非工党（5 席）的支持。博塔的南非党组织内阁，1911 年 11 月正式成立南非联邦政府。联邦党成为反对党。按《南非法案》（即南非联邦第一部宪法）规定，从 125 万白人选民中产生的白人中央政府，开始对 425 万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人、50 万混血种人和 16.5 万印度人实行种族主义统治。

五、《土著土地法》的制订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产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即英布战争前后的二十几年间，当英国殖民者同布尔殖民者从激烈火并走向相互勾结的时候，南非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正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由于土著保留地面积狭小，人均占地不足三摩尔根，越来越多的黑人离开保留地，出外谋生。一些黑人勤奋劳动，积蓄金钱购买土地。特别是在德拉肯斯山山麓和德兰士瓦西部地带，黑人纷纷购买布尔人在英布战争中丢弃

的地产。南非土著事务委员会 1903 年提出的报告说：“土著开始购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土地，以生产供应兰德金矿区的食物。”在 1913 年以前，非洲人的部落或个人先后在保留地以外购置土地（包括王室土地）共 100 多万摩尔根（约 100 万公顷）。1904 年，德兰士瓦约有 13 万黑人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1912 年黑人的私人土地约 112.5 万英亩，约有 12.3 万黑人住在私有土地上。这些非洲人小地产散布在一两个世纪以来被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被称为洒在欧洲人土地上的“黑点”。1913 年以前，仅纳塔尔就有 144 个“黑点”。这些非洲人小农场独立经营，使用人工灌溉、犁耕，生产商品农作物，饲养细毛羊，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勤劳的非洲小农在经营水平上很快就超过穷途潦倒的白人。于是，一个不依赖白人农场和矿山而能独立经营的、比较稳定的非洲自耕农阶层，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南非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其中有些人正向富农发展。

数量更多的黑人离开保留地后，到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租佃土地，成为白人地主的对分制佃农“拜旺纳”。从 19 世纪最后 25 年起，还有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农民移居于白人地产上，成为垦户。20 世纪初，住在未被欧洲人实际占有的土地上的黑人约有 32 万。前两种黑人向白人地主租地，交纳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尽管地租苛重，黑人从对分制中获得的收入仍超过白人农场中黑人帮工的工资，也比工役佃农的生活好得多；此外，独立经营一块土地比进入矿山做工自由。所以，无地黑人和保留地出来的黑人宁可去当对分制佃农和垦户，而不愿下矿井当流动劳工或当工役佃农。20 世纪最初 10 年，对分制日益盛行，分成佃农的人数猛增。

英布战争后，布尔人中的贫穷白人也在猛增，这是被推迟的布尔农场主内部阶级分化的必然趋势。到南非联邦成立时，这一阶层的人数已增至 20—30 万人。作为南非种族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这批贫穷白人背着沉重的“肤色优越”的十字架，拒绝从事任何粗活。他们被白人大地主陆续从地产上排挤出去，拥入城市，流落街头。南非城市的白人人口从 1891 年的 217,322 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658,286 人，20 年中增加了 2 倍，其中很多就是这种贫穷白人。他们以肤色白皙自傲，而在熟练技能方面没有任何比黑人优越的地方。雇主一般宁愿雇用黑人，这样可以少付一半以上工资。这批人数众多的贫穷白人对社会的不满，构成了对现政权稳定的巨大威胁。南非白人统治集团早已无法靠军事征服取得新的土地分配给贫穷白人，借以缓和他们的利益冲突。于是，统治阶级便以“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危害白人经济生活”为借口，挑拨贫穷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把他们的不满引向对黑人的仇恨。

黑人独立经营颇为繁荣的小农场和贫穷白人涌入城市加入失业队伍，在阿非里卡人统治集团中引起一片喧嚣。实行工役租佃制的白人地主严厉抨击

D.Hobart Houghton & Dagut Jennifer,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1860-1970 (《南非经济史料》), Capetown 1972, vol.2, pp.127-129.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种族隔离史》), London 1962, p.39.

Buell, op.cit., vol.1, p.75.

S.Marks & A.Atmore 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前工业化时代的南非经济与社会》), London 1980, p.359.

Houghton & D.Hohert, op.cit., vol.2, p.203.

对分制，谴责它为“罪恶的合伙制度”，因为它侵犯了殖民早期所建立的白人和黑人的天经地义的“主仆关系”。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白人农场主认为对分制的盛行提高了农场雇工的工资，也颇为不满。这两种白人农场主都坚决要求禁止在白人土地上实行对分制。其中最刺激白人殖民者神经的是这样的警告：“白人从征服中得来的土地将通过市场而逐渐消失”。于是，当庆祝南非联邦政府成立的祝祷钟声还在回响的时候，南非社会掀起一股要求消灭欧洲人占有土地上黑人拜旺纳和自耕农、赶走黑人垦户的叫嚣。

1912年，以仇恨黑人而闻名的赫佐格被任命为土著事务部长，负责起草《土著土地法》。赫佐格主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阻止南非国土成为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相互交错的“棋盘”。他坚持认为，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土地上购买土地的唯一办法是采取种族隔离政策。隔离意味着土著要在划定的地区（保留地）建立其家园，其中相当数量的土著必须外出替白人做工，而留在保留地的土著也能发展其能力。在南非议会就《土著土地法》进行辩论时，白人议员几乎一致强调：“法令应规定欧洲人和土著两个种族基本必须分别居住于各自的地区”。南非党政府内阁的掌舵人物史末资对种族隔离政策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在我们的土地所有制度和管理形式中，我们的政策包括种族隔离”，“在土地所有权、管理形式和许多方面，我们正试图使之（不同的种族）分开”。

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著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土地；禁止采用分成制地租和货币地租；非洲人使用欧洲人农场土地只准采用工役地租，每年必须为地主服工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这是一部在欧洲人殖民史上罕见的《土著土地法》。

《土著土地法》一经公布，白人农场主立即掀起大规模驱赶黑人垦户的浪潮，强迫他们低价卖掉牲畜，在寒冬中离开他们的住处。非洲人突然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局面：他们经过几代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产（房屋、土地和畜群）如今一夜之间化为泡影。1913年冬天，在南非历史上出现了最悲惨的情景：无数黑人被赶出他们居住的土地，在凛冽的寒风中，拖儿带女外出流浪，寻找新的住处。许多人在流浪中死去；成千上万人涌入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慢慢地死去。一部分人流入莱索托和博茨瓦纳；一部分被迫回到白人农场主那里成为工役佃农；一部分卖掉畜群进入矿山、城市当工人。这样，南非联邦的《土著土地法》以其种族特权和阶级特权的双重力量，在很短时间里便在南非90%国土上消灭了黑人农民中一个较为富裕的阶层。它给南非现代史蒙上了一层异常悲惨的色彩。随着南非金矿开采而发展起来的黑非洲最早一批自耕农和佃农阶层，本来是南非最有希望成长起来的首批民族资本家，但却被《土著土地法》扼杀在摇篮中。

《土著土地法》关于限制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独立经营个体经济权利的规定，是对非洲人的一次最大的剥夺。在南非，由于种族

M.Wilson & L.Thompson ed., op.cit., vol.2, p.127.

Neame op.cit., pp.39, 41-42.

Wellington, South West Africa and its Human Issues (《西南非洲及其人文问题》), London 1967, p.350.

S.T.Plaatje,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Since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Boer Rebellion (《欧战和布尔人叛乱前后南非土著的生活》), London 1916, p.66.

特权被神圣化了，其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不但表现为一种阶级特权，而且首先表现为一种种族特权，因而它对非洲人的土地剥夺具有世界殖民史上罕见的残酷性和彻底性，带有极浓烈的种族色彩。《土著土地法》是以肤色作为剥夺黑人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理由，这给在产权上实际上早已不受法律保护的（白人）无产阶级造成一种他们仍享受法律保护的假象。这种假象极有利于白人统治阶级以黑白种族对立的威胁来缓和日趋尖锐的白人内部的阶级对抗。贫穷白人经常被煽动起来反对黑人劳动者，他们狂热地拥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在一个国度里，同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对象的黑人和白人劳动者却被隔离于互相对立的两极，这是极其可悲的。成千上万的贫穷白人在不断被送上资本主义牺牲祭坛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成为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从而实际上不自觉地给这个祭坛培奠了厚土。

由于1913年《土著土地法》严格限制了南非黑人的土地所有权的地域范围，从法权上把南非国土分成两个部分，为后来全面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奠定了基础。由于种族隔离政策一开始形成制度就深入到土地所有权的法权范畴，因而具有很大的韧性，长期存在而难以摧毁，成为南非社会内部一个极恶毒的因素。

《土著土地法》激化了南非社会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矛盾，也推动黑人民族解放斗争。

由于南非非洲人中新的经济因素关系的变动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任何地区都发生得早，加之从19世纪初以来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南非非洲人中发展迅速，早在19世纪末，南非非洲人新兴社会力量的形成就已引人注目。这股新兴力量包括雇佣工人（大多为流动工人）、自耕农、佃耕农、商人和知识分子等，其中知识分子是这股力量的先锋和中坚。英国教会最早在南非推行所谓“基督教、贸易、文明”三位一体的理论，积极在黑人和混血种人中培养能为教会和贸易服务的初级人才。但基督教会的活动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非洲人为建立不受欧洲人控制的、独立的土著教会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却培育了土著的独立精神；教会的教育却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颇具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南非设立的教会学校比非洲其他任何地区都多，南非非洲人的识字率也居于整个大陆的前列，因而在19世纪末一批非洲人知识分子已脱颖而出。第一代非洲人知识分子积极创办科萨文和祖鲁文的报纸，比较著名的有1870年创刊的《伊西吉迪米报》和1884年创刊的《因沃报》。这些报纸首先反映非洲基督徒的愿望，继而反映一般非洲人对不公平待遇和种族歧视的不满。1882年，在开普东区成立了非洲人党；1884年，在威廉斯城成立了土著选民协会，三年后（1887年）又在该城举行非洲人选民第一次代表会议，反对英国企图通过签定“真正的土地所有权”的花招而取消三万非洲人选举权的阴谋。尽管会议的政治态度极其保守，但它毕竟是非洲人打破部落界限举行的第一次各族各部落代表会议，无疑起了引路的先锋作用。这些早期活动局限于南非非洲人最富裕的上层人士，政治色彩十分温和。

英布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南非非洲人上层对英国抱有很大幻想，以为他们在英王统治下将得到公正的待遇，“文明的非洲人”将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1906—1907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省选举完全排斥了非洲

荷兰人早在17世纪下半叶就放弃了通过传教对非洲人实行怀柔的政策，而采取武力讨伐和消灭政策；19世纪以后基本上不在非洲人中传播加尔文教义。

人，引起当地非洲人的警觉，他们于 1907 年成立了德兰士瓦土著大会。《因沃报》对 1908 年德班制宪会议所表现的意向表示不安。1909 年 9 月 20 日《南非法案》草案公布，非洲人大失所望，认为它比战前反而退步了。1909 年，在布隆方丹召开了南非土著会议，要求给予他们同白人一样的公平和正义。会后代表团到伦敦请愿，殖民大臣表示无意改动任何条款。接踵而来的联邦成立、布尔人组阁、多项种族歧视法令的公布、《土著土地法》起草的酝酿……，给南非非洲人民很大的震动。他们从困惑和迷惘中开始觉醒。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人士和部分酋长酝酿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抗议组织。1912 年 1 月 8—12 日，留英回国的开业律师塞梅 在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札二世的支持下，出面召集各地土著会议和其他政治组织的几百名代表在布隆方丹举行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永久性组织，名称受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影响，称南非土著国民大会。这实际上是当时新兴社会力量同部落贵族的联盟。它以两院制议会为基础，由酋长们组成上院，平民组成下院，两院各设议长，上院议长由巴苏陀兰最高酋长莱特西二世担任。身任教师兼牧师的杜比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塞梅任总司库，秘书长由职员出身的作家普拉彻担任。大会创办机关报《人民报》，它在财政上得到斯威士兰摄政太后的资助，以英语和三种非洲语言（祖鲁语、科萨语、苏陀语）出版。

第一届南非土著国民大会没有制订纲领。直到 1917 年，第一份纲领才由年会通过生效。纲领规定，它的目的是消灭“肤色壁垒”，实行种族平等；采取合法的方式和适当措施向当局请愿，一切活动严格限制在非暴力的合法范围内；大会明确宣布：“宁愿通过符合宪法的途径而不使用暴力”其主要策略是动员舆论和争取各界潜在同情的支持。由此可见，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是一个得到酋长们支持的、由自由职业者领导的改良主义组织。早期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温和性质是同 20 世纪初南非国内的阶级状况、非洲人民族运动的水平相符合的。这个组织与广大下层群众缺少联系，而备受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国民大会仅仅将人数有限的非洲人上层分子团结和组织起来。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其内容主要是倾诉各种不满，在行动上只是表示抗议和请愿。1913 年《土著土地法》成为非洲人抗议声讨的主要目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组成代表团向南非联邦政府请愿，毫无结果；又远涉重洋到伦敦向帝国议会请愿，也空手而归。严格限于合法手段进行的斗争，在南非严酷的种族主义法令统制下，一再证明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只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和卓有声望的酋长来争取改善非洲人的社会待遇，同样是难以奏效的。

塞梅（1880—1951）是纳塔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

1923 年改称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 ANC。

Paul Maylam,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of South Africa (《南非人民史》), New York 1986, p.55.

第三十章 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地

1863年宫廷政变终止了拉达马二世的亲法卖国政策，马达加斯加从此在赖尼莱阿里沃尼为首的新贵族集团领导下，经历了2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朝着民族国家的方向迈进，遗憾的是很快被法国殖民入侵所打断。在1883年和1894年，法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最终吞并了马达加斯加及其附近岛屿。但是，马达加斯加人民不甘沦为殖民奴隶，从法国殖民者踏上岛屿的那天起，他们便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殖斗争，起义连绵不断。20世纪初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揭开了马达加斯加民族解放斗争新的一页。

一、赖尼莱阿里沃尼改革

拉达马二世被处死后，马达加斯加的王权政治发生了变化，君主专制开始让位于首相专权。继位的拉梭赫里纳被首相架空，不过她仍是马达加斯加王国的精神领袖和民族象征，任何人见到她都必须弯腰鞠躬，高唱专门的颂歌，女王每年一次的沐浴标志着一年的开始。国家大权起初掌握在首相拉哈罗手里。拉哈罗又称赖尼沃尼纳希特里尼霍尼，1852年其父赖尼哈罗去世后继承了首相职位。1864年7月14日，女王和以赖尼莱阿里沃尼为首的青年军官不满拉哈罗的专权，联合起来将其废黜，赖尼莱阿里沃尼接任首相兼军队总司令。从这时起直到1895年10月法军占领塔那那利佛，尽管马达加斯加先后经历了拉梭赫里纳（1863—1868年在位）、拉纳瓦洛纳二世（1868—1883年在位）和拉纳瓦洛纳三世（1883—1897年在位）三位女王的统治，但朝政始终掌握在赖尼莱阿里沃尼手里。他前后执政30余年（1864—1895年），在马达加斯加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赖尼莱阿里沃尼出身安德里安威拉沃家族，代表一个新贵族集团。从19世纪初拉达马一世时起，历届国王为了同具有离心倾向的各地奴隶主贵族作斗争，限制这些传统贵族的权力，有意起用一些非贵族出身的自由民（“霍瓦”），赐给他们免税领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封建官僚集团。在拉纳瓦洛纳一世统治时期，一个与安德里安威拉沃家族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把持了朝中全部重要职位，女王的宠臣赖尼哈罗任首相，此职从此便由该家族的人所世袭。

赖尼莱阿里沃尼是在国家极度困难时期出任首相的。当时，在边远地区一些旧贵族趁拉达马二世下台之机进行分裂活动；首都等地的人民起义尚未平息，广大的奴隶和劳役制下的自由民对旧制度的不满日增，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危机也日益加重，拉达马二世下台后，欧洲列强对新政府猜疑不定，特别是法国准备随时入侵马达加斯加，重建亲法政府。针对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赖尼莱阿里沃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活动。

赖尼莱阿里沃尼上台后，首先平息了首都等地的起义，镇压了边远地区旧贵族的分裂活动，并流放了企图发动政变的哥哥拉哈罗和重臣赖尼约哈里。1868年4月，拉梭赫里纳病逝，他又及时粉碎了一些贵族密谋让王子拉萨塔继位以推翻首相政权的阴谋，将王子与阴谋者流放到边远地区，立女王堂妹腊莫马为女王，史称拉纳瓦洛纳二世。首相政权得到巩固。

在内政上，赖尼莱阿里沃尼极力加强中央集权，改革从地方到中央的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全国除伊默里纳地区外，分为 27 个省，由直接向首相负责的省长管辖。省下设若干个区。中央各部的设置仿照欧洲，1881 年设立了内政、外交、国防、司法、法令、财政、工商和教育八个部，各部下设若干办事机构，配置大臣和秘书。重大事务由大臣会议讨论决定。在广大乡村，1878 年 7 月，首相开始启用由退伍军人组织的“萨凯扎姆—博希特拉”（意为乡村之友，后改称“安蒂利”，意为监视者），充当政府与人民的中间人和公民权利的监护者，负责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他们有权监督地方官吏和领主，保证中央政府各项法令的贯彻实施，并担任征税、摊派劳役等事务。1884 年 11 月，首相决定恢复村社人民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实行法制，稳定社会秩序，是赖尼莱阿里沃尼内政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从拉达马一世时起，马达加斯加的司法权一直掌握在地方贵族手里，由他们组成中央法院和各地方法院。这些人常常公开受贿，根据行贿数量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没有明确的量刑标准。从 1863 年起，为革除以前司法中的弊病，政府先后颁布了《六十八条法典》（1863 年）、《一条法典》（1868 年）和《三五条法典》（1881 年）以及零星颁布的一些法令。这些法典和法令除保留了某些原来的习惯法外，在行政、民政、司法等方面作了许多新规定。如把死刑限为一项故意杀人罪和 12 项叛国罪，放火、盗窃、贩卖人口、巫术活动等改为徒刑或罚款，用符咒害人者判刑 20 年，盗墓或未经首相批准私购武器者判刑 10 年，犯通奸罪者处 100 皮阿斯特的罚款；取消了多妻制和单方休妻制，如有违犯者处以 10 条牛和 10 个皮阿斯特的罚款；禁止肉刑，改善在押犯生活待遇；过去的连坐制也被取消。在首都设立三个不同类型的法院，各由 13 名法官组成，包括 11 名王室官员和 2 名地方贵族，由他们进行初审，然后报女王，实际上是首相作最后判决。

在军事方面，拉达马一世开始的军事改革到拉纳瓦洛纳一世时便停止了，军饷被停发，部队纪律松弛。为了使军队现代化，首相在 1876 和 1879 年先后颁布了两个关于军队的法令，大幅度削减军队中人浮于事的副官，遣返了年龄较大的士兵，并恢复两周一次的军事训练。1879 年起，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除贵族和奴隶外，凡年满 18 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为期五年，士兵每年接受一次身体检查。政府还用高薪和优厚待遇聘请英法军事教官，并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增强军队战斗力。

赖尼莱阿里沃尼还十分重视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惜花费巨资扩充教学人员和购置教材。1876 年，政府决定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规定 8—16 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鼓励欧洲传教士在城市和乡村设立学校，发展教会教育，并派人去英法留学。国内创办了女王医学院和两所医科学校，培养医务人员。至 1892 年，共培养护士 31 名，1894 年在各类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达 137000 名。政府还鼓励出版事业的发展，1882 年用英文和马尔加什文两种文字刊印了《马达加斯加时代报》。

在社会制度方面，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奴隶制被明令废除。从 19 世纪中期起，随着东非奴隶的大量输入，马达加斯加奴隶人数激增，1869 年奴隶占塔

M. Brown, *Madagascar Rediscovered: A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Independence* (《马达加斯加再发现，从早期至独立的历史》)，London 1978, pp.212, 214.

那那利佛人口总数的 2/3，他们大多集中在宫廷贵族门下，有的占有 3000 多名奴隶。奴隶处于社会最低层，他们从事采矿、冶炼、搬运、种田和充当家内奴仆等各种劳动。自由民则担任各种官职和服兵役。赖尼莱阿里沃尼此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原因，首先在于打击奴隶主旧贵族集团的势力，巩固以首相为代表的新贵族集团已获得的地位。女王拉梭赫里纳即位后，政府内部分成两派，以赖尼约哈尼为首的一派代表旧贵族利益，他们出身安得里安那阶层，看不起霍瓦出身的新贵，反对首相的现行政策，主张杜绝与欧洲人往来，禁止基督教信仰，恢复马达加斯加的传统社会。由于他们在政府中处于少数派地位，得不到女王的首肯，只得走密谋推翻现政府的道路。赖尼莱阿里沃尼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后，通过废除奴隶制、释放奴隶，彻底摧毁了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其次，自拉达马一世改革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欧洲一些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基督教文明的陆续传入，不可避免地对马达加斯加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冲击，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863 年颁布的《六十八条法典》宣布禁止一切贩奴活动，这与拉达马一世禁止把奴隶输往海外相比前进了一步。1868 年的法典又进一步规定取消债务奴隶，严禁把罪犯的妻室变为奴隶，使一些霍瓦人重新获得自由。1874 年 10 月，首相公开宣布解放 1865 年以后买来的或出生的非洲籍奴隶；释放后的奴隶取得国籍后享有与马尔加什人同等的权利；1878 年 7 月，又决定取消赎奴职业，禁止通过买卖奴隶使其子女与父母分离，违者判处终身监禁。在上述政策下，大批奴隶得到释放，1877 年约有 150000 名奴隶被释。被释放的奴隶由地方当局安置在指定的村庄里或返回故里，从事各种劳动。赖尼莱阿里沃尼的废奴措施是马达加斯加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奴隶制的彻底废除是在 1879 年法国殖民当局颁布《废奴宣言》之后。

政治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 世纪 70—80 年代，马达加斯加出现了经济繁荣。东部沿海地区从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引进咖啡和香子兰等品种，并很快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在伯威列奥和伊默里纳，定期集市的数量激增，带动了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进出口贸易。塔马塔夫、马仍加和马南扎里成为主要的外贸港口，不断向马斯克林群岛出口牲畜和粮食，向欧洲出口蜂蜡和酒椰，但进口的物品较少，包括供上层需要的服装、家俱、印花布、铁器和甜酒等。据 1888 年的不完全统计，这三个港口进口总值达 400 万法郎，出口总值为 411 万法郎。在政府的奖励下，国内手工业门类日益齐全，除制革、制鞋、锻铁、木工、制砖和肥皂等行业外，玩具业、缝纫业、首饰业也兴旺起来，1890 年建立了第一个冻肉加工厂。赖尼莱阿里沃尼还实行租让制，主要是把森林和矿山租让给外国公司，发展建筑业和采矿业。

在外交政策方面，赖尼莱阿里沃尼改变了拉达马二世的丧权卖国政策，在保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关系，实际上是在欧美列强之间寻求均衡，使他们彼此互相牵制。1863 年 11 月，他派外交使团去

Gwyn Campbell, *Slavery and Fanompoana* (《奴隶制和劳役制》),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9 (1988), p.475.

Gwyn Campbell, *Madagascar and the Slave Trade* (《马达加斯加和奴隶贸易》),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no.22 (1981), p.213.

黄丽英：《赖尼莱阿里沃尼》，载《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下册，重庆出版社，第 531 页。

英法两国,希望修订拉达马二世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经过长期谈判,1865年6月,英马条约在塔那那利佛王宫签订。条约规定英国人不得在马达加斯加享有土地所有权,双方进行平等贸易等。1868年8月,法国与马达加斯加也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此之前,1865年8月,女王同意以支付法国120万法郎的代价取消《朗贝尔特许状》,迫使法国宣布尊重马达加斯加的独立,承认女王对全岛的主权。

为了削弱和限制法国天主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势力,赖尼莱阿里沃尼在1869年2月与女王一起改信基督教新教,并与原配夫人离婚,与女王举行了基督教结婚仪式。从此,新教被定为国教,传统的偶像被烧毁,基督徒的数量剧增。1867年,马达加斯加约有27000名基督徒,主要是贵族和青年人。1869年有16000人接受了洗礼。到1890年马达加斯加全岛的教堂增加到1223所,神职人员有59615名,信徒达248108人,影响范围从伊默里纳扩展到全国各地。

赖尼莱阿里沃尼的改革是拉达马一世改革的深化,它对近代马达加斯加的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统治机器被纳入了近代轨道。尽管奴隶劳动没有被杜绝,但奴隶制已被明令废除,开始趋向衰落,整个国家朝着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间接地保证了赖尼莱阿里沃尼的较长统治,为后来的抗法斗争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在1868年虽然承认马达加斯加为独立的君主国,但始终没有放弃对该国的领土要求。1878年法国人拉博德在塔那那利佛病逝,它标志着法马关系缓和时期的结束。拉博德在马达加斯加期间(1832—1878年)曾占有大笔财富,其中有些是女王对他的赏赐,包括大片田产。拉博德死后,他在法国的两个侄子要求继承这些财富,法国政府也明确表态支持他们的要求。按当时马达加斯加的法律,土地属国王所有,不得转让,并且只有当外国人活着时才能享有在马达加斯加的财产,死后将归王室所有。因此,首相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答应提供25万法郎的补偿。双方没有为此达成协议。

1881年5月,法国船“托莱”号在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与萨卡拉瓦人从事军火走私时,同当地人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船上几名阿拉伯人被打死。法国政府借机索要6000法郎的赔款。在马达加斯加政府拒绝了这项无理要求后,法国决定发动武装侵略。

遗产纠纷和“托莱”号事件只是法国入侵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借口,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缓和法国国内的尖锐矛盾,自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政坛一直不稳,君主派与共和派争持不下。1882年邦图银行倒闭,引发了法国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失业率剧增。法国工业巨头和政客把向海外扩张看成是解决国内矛盾和发展经济的出路之一。在留尼汪岛上的法国殖民者对本国政府和舆论界的影响也是法国入侵马达加斯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留尼汪殖民地从建立起就与马达加斯加有密切联系,早年依赖后者输入奴隶以不断补充劳动力,19世纪中叶后改为依赖粮食输入。赖尼莱阿里沃尼采取的贸易垄断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5, p.416.

M.Brown, op.cit., p.211.

政策，令留尼汪法国商人极为不满，他们一直寻机鼓动政府占领马达加斯加。

赖尼莱阿里沃尼为了避免发生战争，1882年10月派了一个使团去欧洲进行外交活动，争取和平解决眼前的危机。使团由外长、女王顾问和两名翻译组成，他们首先抵达法国。在谈判中，法国提出要临时占领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直至马达加斯加政府强大到能维持当地秩序为止，后又提出为时99年的租借期。在没有得到满足后，法国粗暴地宣布马达加斯加使团不受欢迎，限令他们出境。使团转而来到英国，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阻止法国的侵略，结果也未能如愿。此时，英国正同法国就埃及控制权问题举行谈判，为了赢得法国对英国控制埃及的承认，英国不可能为马达加斯加而与法国发生新的争端；并且自1873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马达加斯加岛在英国通往东方航线上的战略地位已大大降低。随后使团又去了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企图寻求新的支持，最后均告失败。就在使团出访意大利时，国内已传来法国武装入侵的消息。

1883年5月7日，法国印度洋海军舰队总司令皮埃尔奉命炮轰贝岛附近的两个马达加斯加哨所，第一次法马战争爆发。16日，法舰驶达马仍加，威逼驻军在一小时内撤走，被拒绝后炮轰了这座港口城市，大批无辜平民遇难。6月1日，法国侵略军又来到东海岸的塔马塔夫港，向女王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要女王承认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南纬16度以北地区的保护，废除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土地的法令，向法国赔款100万法郎，并限令在八天内答复，否则将占领塔马塔夫。

此时，法国武装入侵的消息早已传到首都。女王召集卡巴里大会，号召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领土完整而战。6月7日，赖尼莱阿里沃尼发表告人民书：“我向你们宣告，我的父母生我，是要我保卫祖国，促进它的繁荣，因此我准备同你们一起战斗，使自己成为马达加斯加的堡垒。如果战争是不正义的，我们就会觉得害怕，但战争是正义的，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首都的所有法国人被限令在五天内离境。马达加斯加掀起了抗法斗争高潮。

6月10日，法国侵略军炮轰塔马塔夫后将其占领。马达加斯加驻守总督事前已率军撤到内地数英里处的法拉法蒂。这里易守难攻，四周有濠沟。他们打退了法军的数次进攻，有时还主动发起袭击。7月13日，女王拉纳瓦洛纳二世去世，22岁的公主拉扎芬德拉赫蒂继位，称拉纳瓦洛纳三世。在加冕典礼上，她表示决不割让一寸土地给外国侵略者。此时战争进入僵持状态，马达加斯加军队武器低劣，一时难以收复失地。法国殖民军原以为占领了沿海的重要港口后，马达加斯加政府会接受他们的要求，但这一梦想破灭了。1883年10月，法国指示加利贝尔上将接替病故的皮埃尔任侵略军总司令，并同马达加斯加政府举行和谈。谈判在塔马塔夫举行，法国提出将岛上西北部地区中立化，并要求马达加斯加支付巨额赔款；马达加斯加代表仅表示可以考虑出租两个小岛和赔偿100万法郎。谈判持续几个月未果。1884年3月，米奥特接替加利贝尔，他提出要赔款300万法郎，没有被马方接受。谈判宣告破裂，战争再次爆发。

同年12月，法军占领了北部的迪埃戈—苏阿雷兹港，并炮轰沿海其他地区。马尔加什人没有被敌军侵略气焰所吓倒，政府不断组织军队去前线，购

买和制造武器，更新装备，还聘请英国陆军上校迪格比·威卢比为马尔加什军队司令副官和首相军事顾问。1885年9月，马尔加什军队在法拉法蒂大败法军。12月15日，双方在塔马塔夫再次举行和谈，17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法国获得对迪埃戈—苏阿雷兹港的占有权；马达加斯加支付法国赔款1000万法郎；法国在塔那那利佛设政治特使，负责马达加斯加的外交关系；法国承认女王对全岛的统治权。条约对马达加斯加是屈辱的。在此之前，1885年8月，赖尼莱阿里沃尼曾向法国表示，愿意在割让迪埃戈—苏阿雷兹、从西北部撤走默里纳人驻军、赔款250万法郎的基础上停战。该建议之所以没有被马方谈判代表坚持，与威卢比有很大关系。当时他作为马方参加谈判的三代表之一，竭力主张接受法国的要求，尽快结束战争。法国首席谈判代表帕特里蒙涅奥在给国内的报告中称，威卢比“在这件事上为我们服务得很好，他不需任何报酬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塔马塔夫条约在塔那那利佛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尤其对法国政治特使的权力感到担忧。首相为此要求法国代表就条约内容作进一步说明。1886年1月，法国代表回信称：政治特使的作用仅限于外交关系中的政治方面，马达加斯加政府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进行商务谈判；法国占领的地区将限于迪埃戈—苏阿雷兹港和周围几英里地区。马达加斯加政府随后批准了该条约，并把信件中的内容也作为条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法国政府拒绝承认由其全权大使签署的信件。

为了筹集1000万法郎的赔款，使法国侵略军早日撤出被占领地区，1886年5月，赖尼莱阿里沃尼派威卢比去伦敦要求贷款400万美元（折合2000万法郎），其中一半支付赔款，另一半用于购买一艘军舰、各种武器弹药以及制造枪炮的机械设备。结果，伦敦银行家辛迪加集团同意贷款，条件是利率7%；在塔那那利佛建马达加斯加皇室银行；贷款将以海关关税偿还。1886年6月23日，双方签订协议。马达加斯加向英国借款遭到法国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当即宣布拒绝接受从英国借来的赔款，否认马达加斯加政府同其他国家有直接经济交往的权利。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不支持本国商人同马达加斯加达成的协议。这样，马达加斯加被迫接受了法国贴现银行提供的1500万法郎贷款，允许他们在首都设银行和征收海关关税。马达加斯加自此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一步步沦为法国殖民地。

塔马塔夫条约只是暂时满足了法国的殖民要求，带来了1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1894年10月，法国政府又一次要求马达加斯加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内容包括：由法国控制内外一切事务；马达加斯加政府未经法国同意不得与任何国家建立关系；给外国人的所有租让协定都必须经法国政治特使同意；法国有从事一切公共工程和征税、驻军权利。这实际上是要马达加斯加接受法国的殖民统治，遭到了首相的严辞拒绝。

1894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向马达加斯加派远征军的决议。远征军由杜切森率领，包括13个步兵营、1个骑兵中队、2个炮兵连和4个工兵连，共有陆军军官658名、士兵14773名，外加一个海军混合舰队。同年12月12日，法军炮轰并占领了塔马塔夫，开始了第二次法马战争。1895年1月14日，法军又占领了马仍加，从东西两面向内地进犯。马尔加什军队作

M.Brown, op.cit., p.230.

M.Brown, op.cit., p.231.

M.Brown, op.cit., p.243.

了英勇抵抗，先后在马罗沃埃（5月2日）、马埃瓦塔那那（6月9日）、察拉萨奥特拉（6月28—29日）和安德里巴（8月21—22日）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血战，但均未能挡住法军的入侵。9月30日，法军抵达首都城下，与近万名马尔加什守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法军用重炮轰开城门后，占领了离王宫不足一英里的制高点，女王被迫下令向法军投降。

1895年10月1日，杜切森与女王代表签订了停战条约，迫使马达加斯加接受法国保护，内外事务均受法国控制。女王虽暂时保住了王位，但赖尼莱阿里沃尼被罢免了首相职位，监禁在首都郊外的寓所里，1896年2月被流放到阿尔及尔，同年7月逝世。首相职位由更加年迈的赖尼戚姆巴扎菲（赖尼约哈尼之子）担任。1896年8月6日，法国议会正式宣布吞并马达加斯加，使它成为法国海外殖民地之一。

马达加斯加之所以沦为法国殖民地，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在原因，是19世纪末马达加斯加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必然结果。

首先，从外部形势看，马达加斯加是欧洲列强间肮脏交易的牺牲品。赖尼莱阿里沃尼执政以来，对欧美列强一直实行均衡政策，希望各国之间能互相牵制，以便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他没有看清欧美列强的侵略真面目。1890年8月5日，英国为了获得法国对它在桑给巴尔岛保护权的承认，与法国缔约，承认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保护。同年11月18日，德法两国也签订协议，德国承认马达加斯加应受法国的保护。而美国则采取不干涉政策。到第二次法马战争爆发时，马达加斯加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状态，法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

其次，从实力对比来看，法国与马达加斯加两国相距悬殊。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强国，军队配备了榴弹炮、75毫米口径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20次）和勒贝尔式步枪等先进武器，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侵马战争中，法国的混合舰队包括深入内地的12艘炮艇和48条机动驳船，在海面上巡逻的2艘巡洋舰、2艘护航舰、3艘炮艇和3艘运输船。相比之下，马达加斯加经过数次改革活动，虽然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和政府、军队中的人员素质都较低，广大农村还存在奴隶制残余，城市中雇佣工人阶层尚未形成，特别是军队缺乏正规训练。赖尼莱阿里沃尼在战时可指挥的45000名士兵，大多是临时征集的，少数接受过英国军官的训练；他们使用的武器也比较低劣，据英国传教士记载，在保卫首都战役中主要使用的是矛剑和刀，枪枝很少。

第三，赖尼莱阿里沃尼在执政晚期越来越专横，也采取了一些错误政策，直接影响了抗法斗争。第一次法马战争结束后，为了偿付巨额赔款，政府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发行新的金币，并把森林、矿山等资源租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需要的劳动力统一由政府提供，劳动报酬也全部归国家。为此，许多人一年中有半年以上从事无报酬劳动，甚至连政府中许多官员的工作也无报酬，他们便转而在普通百姓身上榨取钱财。农民的负担剧增，贫困潦倒的乡民只好逃离家园结伙打劫。在首相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社会秩序相当混乱，

Marovoay，马尔加什语中“许多条鳄鱼”之意，得名于该战役。战争结束后，战场上留下无数具尸体，吸引了数百条鳄鱼前来吞食。

M. Brown, op.cit., pp.243-244, 248-249.

政府不仅控制不了岛屿南部荒漠地区和西北部萨卡拉瓦人居住的地区，连中部高原地带的法哈瓦洛匪帮也平息不了。

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加剧了。赖尼莱阿里沃尼为了巩固本家族的地位，竭力从自己子女中挑选未来的首相。他的结发妻子曾给他生下 11 个儿子和 5 个女儿，但他们不是夭折就是沉湎于酒色之中。长子拉赖阿里沃尼最受宠爱，也是最初的候选继承人，不幸在打猎中被他弟弟误伤致死。其后，首相把希望寄托在次子也是酒鬼和法盲的马里阿维洛身上，1878 年任命他为驻巴黎大使，回国后被授与 16 枚勋章并任军队总司令。这引起外交大臣拉沃尼那希特里尼阿里沃等人的不满，策划了一起企图推翻首相的阴谋，事发后外交大臣被流放。1891 年马里阿维洛病死，这对年迈的首相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打击，他开始变得忧柔寡断，记忆减退。他又立外孙拉泰利费拉为继承人，这在他家族内部引起轩然大波。1893 年，他儿子拉约埃利纳联合妹婿拉贾奥纳等人策划新的政变，失败后都被流放。

赖尼莱阿里沃尼晚年不能任人唯贤还表现在战争期间的军官任命上。由于他不敢放松兵权，对那些曾表现出杰出军事才能的人，或弃而不用，或给予种种束缚。如在 1883—1885 年法拉法蒂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赖南德里阿拉姆潘德里被命令驻守原地，不准离开法拉法蒂；在 1889 年远征西南部的英雄拉马哈特拉则被架空，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相反，那些在宫廷里游说和行贿的人被委以重任，有的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就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之时，首相还给他的一个孙子授予 15 枚勋章。碌碌无为的人被重用授勋，挫伤了许多人的爱国热情。

政策的失误导致赖尼莱阿里沃尼及其政府威信下降。1895 年 5 月，在塔那那利佛的街头已出现了一些反政府的标语，甚至号召人们处死女王、首相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赖尼莱阿里沃尼无法有效地组织和发动人民起来抗战，幻想用和平手段阻止法国入侵，这是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地的主要原因。

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反殖斗争

马达加斯加人民不甘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政府与法国签订屈辱和约后不久，他们就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1895 年 11 月 22 日，一支起义军攻占了位于首都西部 40 公里的阿里沃尼马莫城，处死了投靠法国殖民者的地方官员和外国传教士，随后同前来镇压的法国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与此同时，在瓦基南卡腊特地区也爆发类似战斗。翌年 3 月底，在伊默里纳南部和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起义，其领袖是三个区的原总督（北部的拉伯扎瓦纳、东北部的拉伯扎卡和南部的赖尼伯威米萨拉卡）。在他们的领导下，起义者驱逐法国侵略者和外国传教士，恢复传统宗教信仰，拥戴马达加斯加原政府。由于起义军穿着统一的红外袍，这场起义被称为“梅纳朗巴运动”。法国殖民者在武装镇压失败后，采取焚烧村庄、毁坏稻田等措施，企图使起义者在弹尽粮绝、无处藏身的情况下自动投降。结果恰得其反，那些失去房屋和粮食的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壮大了起义力量。到 1896 年中期，起义军已控制了岛屿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塔那那利佛成了一座孤城，法国在岛上的殖民统治已岌岌可危。

1896 年 9 月底，富有殖民统治经验的加列尼被派往马达加斯加，取代镇

压起义不力的拉罗什。加列尼到位后，把法国殖民军全部集中到首都附近，对起义军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当时任内政部长的赖南德里阿拉姆潘德里和女王的叔叔拉威马莫加被指控支持起义军而遭处死。加列尼还把亲法的拉桑吉扶为首相，并胁迫女王号召人民放下武器接受法国统治。在这一切均未奏效后，加列尼于 1897 年 2 月 28 日下令取消马尔加什王朝和首相职位，把女王流放到留尼汪岛，自己为马达加斯加总督。这项措施产生了一定效果，许多忠于女王的起义军将领顿时对抗法斗争丧失了胜利信心，拉伯扎瓦纳和赖尼伯戚米萨拉卡相继投降，只有拉伯扎卡率部坚持到 1898 年初。但是在边远地区的起义一直坚持到 20 世纪初，如西南部萨卡拉瓦人梅拉博地区的起义、南部巴拉人和东南部一些部落的反征服斗争都坚持到 1904 年。

加列尼在镇压起义的同时，着手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统治体系。他把全国重新分成若干省，省下设区和县，各省的总督及其官员由当地的大酋长担任。经过稍作修改的 1881 年《三五条法典》在各地实施，但欧洲人沿用法国法律。

在经济方面，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依附于法国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岛上发行法国货币，采用法国的关税率。在新的关税制度下，马达加斯加只能从法国进口货物，而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商品将课以重税。1898 年，马达加斯加进口货总值是 2164.1 万法郎，其中法国占 1616.8 万法郎。在此之前，马达加斯加主要从英国和美国进口商品，其中每年从英国进口货物达 100 万法郎。马达加斯加输往法国的原材料价格被降低。加列尼还把马达加斯加大片良田租给法国移民，发展热带作物生产。1895 年战争结束后，一些法国士兵和留尼汪岛上的法国人移居马达加斯加，他们分别获得几十公顷至上千公顷的土地不等。至 1908 年，欧洲移民共获土地 406333 公顷左右。加列尼还鼓励发展原有的手工业，如制革、纺织、养蚕业、染色和小型冶金工业等，开办了邮政业务。为了便利塔那那利佛与沿海地区的联系，他修筑了塔那那利佛到塔马塔夫的公路，连接这两地的铁路也已开工。为了保证获得必要的劳动力，1896 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强迫劳动法令，凡 16—60 岁的男子每年必须劳动 50 天，每天工作 9 小时，一天工资为 20 生丁。

为了削弱英国人在岛上的影响，加列尼除了在经济上采取措施外，在宗教方面则压制和排挤新教，发展天主教。他把英国传教医院改为法国军人医院，将教会学院改成法庭，又把男生高级中学改成政府办公地，迫使许多英国传教士离开回国。他还特别注意控制马达加斯加的教育事业，创办的学校以职业教育为多，如勒·米尔·德·维勒学校、农业学校、医科学学校和职业学校等。初级教育由各种教会学校负责。所有这些学校均以法语为教学语言，内容以传布法国文化和推行法国人生活方式为主，力图培养法国化的知识分子。

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统治的时间有八年之久，初步建立了法国在岛上的殖民体系。他的继任者基本上遵循加列尼所定下的原则，只是更加侧重经济掠夺。1913 年，全岛的输出总额为 5600 万法郎，比 1905 年增加 125%；输

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第 92—93 页。

M.Brown, op.cit., p.255.

腊伯马南扎腊：前引书，第 103 页。

一生丁等于百分之一法郎。

出为 4600 万法郎，比 1905 年增加 200%。巨额经济利润主要落在马达加斯加·马赛公司（1897 年成立）和马达加斯加·里昂公司（1897 年成立）等几家法国大公司手里。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政策，剥夺了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降为殖民者的依附民。由于关税提高、各种物品价格上涨和肥沃良田丧失，大批农民陷于破产境地，有的沦为白人的佃农。殖民统治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不愿意忘却自己的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在 20 世纪初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把反法斗争推入新的阶段。

1913 年初，拉维洛贾奥那以《日本和日本人》为标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号召马尔加什人向日本学习，走民族自强道路，这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同年 7 月，首都医科学学校的 7 名学生建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维瓦萨”，成员很快发展到 500 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和天主教、新教的牧师。他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彼此互不了解，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殖宣传，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殖民当局以战时管制为由对维瓦萨进行残酷镇压。1915 年底，该组织的大批成员被捕，其中 8 名领导人被判处终身劳役，另外 26 名服长期劳役，200 多人遭拘留，41 名 16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关在教养院中受为期 1—5 年的教养。1915 年 2 月初，在麦那朗德拉河左岸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史称萨迪阿瓦赫运动，起义很快扩展到安帕尼赫和戚洪伯两个区。他们 10—40 人为一队，四处袭击殖民者，截断电报线，斗争持续到 1917 年。

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措施只是暂时压制了马尔加什人的独立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征调 4 万多马尔加什人服兵役，其中 80% 以上被送到欧洲战场；此外，还征调了 5535 名劳工，赴法国担任劳役。这些人在欧洲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马达加斯加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与组织作用。

拉法斯：《法国现代史》，第 386 页，转引自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04 页。

Vy, Vato, Sakelika, 在马尔加什语中指铁、石和网，意为象石头和铁一样坚强的组织。

M.Brown, op.cit., p.260.

Boiteau,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Malagache (《马尔加什民族史稿》), Paris 1958, p.305.

第三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

1884年柏林会议后，根据“有效占领”原则，列强在非洲展开了疯狂的瓜分竞赛。到1914年，非洲大陆96%的领土已被占领。英国占据了非洲最好的地区，那里自然条件优越，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程度都较高。法国占据的地域虽广，但有些是人迹罕至的沙漠，经济价值并不高。德属殖民地战略地位重要，但面积尚小。

历史进入20世纪初，垄断资本相继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确立。非洲的英布战争是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生产高度集中，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并被迅速用于生产，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严重倾斜，不平衡性加剧。继1882年德、奥、意形成三国同盟之后，随着法绍达事件的和解，英法携起手来，并在1907年形成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使世界大战和对殖民地的再瓜分不可避免。两次摩洛哥危机吹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非洲的前奏曲。

非洲被列强强行拖入了战争泥潭，不但成为两大集团在海外殖民地作战的主要战场，而且成为人力资源和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地。由非洲人组成的军队不但在本土作战，还被用于欧洲西线和中东战场；非洲民伕不但用于运送战争物资，还用于军工生产。非洲所提供的人力和物资是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火尚未全熄，原德属非洲殖民地就已被瓜分，德国完全被挤出非洲。

战争引起了非洲殖民统治方式、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战时战费大量增加和大量白人走上战场，导致殖民地行政费用和统治人才不足，于是各殖民地纷纷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迈进。战时物资的大量出口诱导非洲的生产以满足列强的需要为目的，非洲经济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依附性增强。同时由于战争期间帝国主义无暇顾及，非洲的民族经济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非洲独立的经济因素在增长。经济的发展、殖民统治方式的松动以及战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离开原来的社会组织，农民、酋长、地主阶层都发生了分化，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队伍日益壮大。战争不但促使非洲的阶级力量配备发生变化，而且非洲人的思想和社会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非洲民众进一步觉醒，在战时掀起了多次反殖民统治的浪潮。

一、非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战火乍起之时，从两大军事集团在非洲的力量对比看，同盟国明显弱于协约国。1914年8月23日，德国政府与美国驻德大使接触，要求美国劝阻协约国不要将战争扩至非洲殖民地，遭到美国和协约国的断然拒绝。德国人提出在非洲人面前不交战是根据其在非洲的弱小实力作出的决定，是出于全球争霸战略的考虑。德国人认为，大战和列强在非洲争夺的结果都将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负。在非洲占绝对优势的英法也从全球战略着眼，既要夺取其殖民地，又要切断其海上贸易。他们认为，在非洲殖民地击败德国将对全局胜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战火向非洲蔓延在所难免，非洲战场成了两大集团在海外殖民地作战的主要战场。

德属多哥保护地面积33700平方英里，当地人口1031978人，还有白人

368 人。到 1914 年，它是唯一财政上独立于德国的殖民地。它有一支由 8 个德国官员和 560 个非洲人组成的维持秩序的保安部队，而它西边的黄金海岸有英军 3000 人，东邻有法驻达荷美一个旅，实力对比悬殊，对德不利。1914 年 8 月 4 日—5 日，代理总督冯·德林分别打电报给黄金海岸和达荷美总督，要求把多哥变成中立区，均遭拒绝。

喀麦隆面积 191130 平方英里，当地人口 2648720 人，白人 1817 人。德国人在那里经营 78 个种植园，开设 266 家商业企业。德国驻扎正规军 1750 人，其中 1550 是非洲人；还有保安部队 1295 人，其中欧洲人 40 人。它西邻英属尼日利亚，东邻法属乍得等，南邻法属、比属刚果。英国在西非的军队比德国多 3 倍，1914 年总数为 8093 人，其中非洲人为 7733 人。但德军训练时间长达 5 年，素质优于英、法、比军队。

德属西南非洲是德国第二大殖民地，面积 317725 平方公里，欧洲人不超过 15000 人，德军最多时为 3140 人。英国怕德国利用西南非洲威胁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担心它成为德国舰队开往南美的中途站，危及英国在拉美的经济、政治地位。南非当局在其发展计划中也把西南非洲视为自己的第五省。而在德国以西南非洲为基地的扩张计划中，南非是主要障碍。

德属东非包括坦噶尼喀和卢旺达、布隆迪，面积 384180 平方公里，人口约 800 万，其中德国人不超过 3000 人。那里德军有 2732 人，还有可作战的保安部队 2199 人。它处在英属东非、乌干达、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比属刚果及近海的英国保护地奔巴和桑给巴尔、葡属莫桑比克包围之中。德国殖民主义者把东非建成威胁英印航线的坚实基础，曾致力于一些建设性工作。战争爆发时，德属东非总督斯可尼企图根据 1885 年柏林原则保持中立，英属东非总督贝尔维尔也希望战争远离自己的辖区。但英德政府对他们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

中东也是两大军事集团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就同盟国而言，唯一能给协约国以打击的地区是北非。德国早在战前就计划修筑“三 B”铁路，以威胁大英帝国生命线，夺取苏伊士运河，给英帝国致命一击。而英国力图以埃及为军事基地，遏制德国，进而攻占德国的盟国土耳其，建立计划已久的与

L.H.Gann & P.Duiganan, *The Rulers of German Africa* (《德属非洲的统治者》), California 1977, p.x.
Byron Farwell, *The Great War in Africa, 1914-1918* (《大战在非洲》), New York 1986, p.23. 一说是 1500 人的治安保卫队, Ajayi & Crowder, *History of West Africa* (《西非史》), vol.2, Longman 1987, p.548.

S.H.Frankel,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在非洲的投资》), London 1938, p.352.

Byron Farwell, *op.cit.*, p.34. 一说德军 2200 人，又强征 12000 名非洲人，参见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32 页。一说德军 8000 人，非洲人 7000 人，参见 C.Lucas, *The Parti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Africa* (《对非洲的瓜分与殖民》), 1922, p.178. 一说德军 2000 人，保安队 2200 人，尼日利亚军 6380 人，警察 2133 人，参见 Ajayi & Crowder, *op.cit.*, pp.550-551.

Byron Farwell, *op.cit.*, p.36.

Byron Farwell, *op.cit.*, p.75. 一说是 5000 人，参见杨人梗：《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565 页。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1973, vol.22, p.1001.

Byron Farwell, *op.cit.*, pp.109-110.

即柏林 (Berlin) 一拜占庭 (Byzantine—巴格达 (Bagdat) 铁路，因三地的字头为“B”而得名。

印度连成一片的“新月形帝国”。

从列强的全球战略看，非洲战场的战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4年8月初到11月底，此间协约国集中打击德国殖民地的战略防御能力。

在多哥，1914年8月6日，法军从达荷美西进攻陷小波波。8月8日，布莱恩特中校率英军攻入多哥南部。8月12日，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洛美。当时，卡米纳有德国在非洲最大的无线电台，它可直接与柏林和其他德属非洲殖民地联系，可通过海底电缆与南美联系，可与行驶在南大西洋上的商船和战舰保持正常联系。为此，8月18日英法组成联军，8月24—25日攻击卡米纳，德军被迫炸毁电台后撤出。同时，一支英军从黄金海岸、一支法军从达荷美分别侵入多哥北部，并由英军攻占最后一个据点延迪。8月26日，冯·德林被迫率德军投降。历时仅三周的多哥战争结束。

在喀麦隆，8月6日，一支部队从法属中央刚果出发，夺回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法国割给德国的土地。埃梅里希将军派法属赤道非洲军队入侵，占领金加。8月24日，卡特上校命令英军分三路进犯，都失败而归。8月28日，比利时向法军提供军援。英军从恩贾梅纳出击，攻占乍得湖地区德国要塞库塞里。此时，多贝尔将军到任。英法组成庞大的喀麦隆远征军，同时英国组织的福勒中队消灭了德国内陆水域力量，9月21日在莫尼河口击沉两艘德舰，建立了海岸阵地。协约国军队攻占的重点是杜阿拉，因为它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有价值极高的电台和军需库，还是中部和北部铁路的终点。9月27日，在水陆夹击下，德军毁掉电台后撤离。喀麦隆的战争从此转入内地。

在西南非洲，英政府于8月9日电令南非联邦帮助出兵进攻。南非总理博塔决定遵命，引起国内布尔人叛乱。在博塔忙于镇压时，英国海军将领、开普站指挥金——哈尔派出“沃曼”号军舰轰击沃尔维斯湾的电台和斯瓦科普蒙德的港口设施。9月19日，比夫斯上校指挥1824名南非军队在卢德立茨登陆，努金将军率2500人在脑诺斯登陆。11月28日，海军司令金——哈尔得到正式通知，南非军队将参加西南非洲作战。

在德属东非，8月8日，英国巡洋舰“阿斯特拉加”号炮轰达累斯萨拉姆和坦加，毁其无线电台。德国巡洋舰“可尼哥斯堡”号被英国三艘战船包围于达累斯萨拉姆附近。同时，福尔贝克指挥德军攻下战略要点塔维塔，它是从内地进入德属东非的门户。福尔贝克是大战期间唯一实际占领英属地的德国将领。但此时英国已完全取得了制海权，切断了德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

在埃及，大战爆发后，德国、土耳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集中5万军队，准备夺取运河，侵占埃及。英国驻埃及军队总司令约翰·麦克斯威尔实施戒严法令，宣布埃及处于军事管制的战时状态。同时，英国迅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调军，在运河地区加固阵地。首批军队12月1日抵达埃及。12月18日，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保护国，把埃及最高统治者“赫迪夫”改称“素丹”。

在第一阶段战斗中，洛美、卡米纳、杜阿拉、卢德立茨、斯瓦科普蒙德的达累斯萨拉姆、坦加等战略要点的夺取以及苏伊士运河防务加强，对德国在非洲的防御计划都是致命的打击。协约国完全取得了制海权。德军在战略上已处于劣势，它在非洲殖民地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战争的第二阶段从1914年12月一直延续到大战结束。虽然从战略上讲，非洲战场上的胜负已定，但为了防止德国以殖民地为基地进行反扑，为了在

全面胜利后分享德国殖民地，协约国决定对德国殖民地进行彻底征服。

在喀麦隆，自杜阿拉失陷后，德军退入内地。英军相继攻下雅巴希和艾得亚，1916年11月又攻陷雅温得。12月9日，德军主力在喀麦隆西南地区遭到包围。埃贝迈尔总督率领近2万人突围后撤入西属莫尼河地区，历时18个月的喀麦隆战事结束。在这场恶战中，7000名英军与11000名法比军队参加了战斗，英军伤亡4600人，法军战死2567人。据估计，民夫死亡45000人。协约军所到之处都变成了废墟，土著人和牲畜的尸体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使人窒息的腐臭。

在西南非洲，1915年2月11日，博塔镇压了阿非利卡人的叛乱后，率5万大军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博塔亲自率领从斯瓦科普蒙德登陆，东向插入西南非洲腹地；一路由德文特将军率领从阿平顿出发向西攻击温得和克；第三路则由史末资将军率领由南向北攻击。三支部队形成强大的半月形包围阵势。4月26日，史末资攻陷吉比昂。5月5日，博塔攻陷温得和克的门户、铁路中心和电台所在地卡里比布。5月12日，英军不战而取温得和克。南非军队相继北上，7月1日攻陷北方重镇奥塔维。7月9日，德军在楚梅布附近投降，西南非洲战事结束。在这场战争中，德军死亡1331人，南非共伤亡529人，被认为是非洲战场上最巧妙最成功的战役之一。

在德属东非，德军总司令福尔贝克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策略，同至少十倍于己的协约国军队周旋。1914年11月3日，英军进攻隆基多。在11月4日德英坦加之战中，英军损失惨重，伤亡817人，德军只伤亡148人。这是东非战场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役，它对双方的心理及以后的战略考虑都有很大影响。英军总司令艾特肯被解职，德属东非总督斯可尼失势。1915年底，德军极盛时有2998名欧洲士兵、11300名非洲士兵。1916年2月19日，史末资将军到达蒙巴萨，接替多里恩爵士为协约国东非战区总司令。3月5日，他兵分两路，一路攻击隆基多，进军乞力马扎罗地区之东、南部；一路进军塔维塔，占领乞力马扎罗地区之西、北部。3月13日，史末资进驻莫希。德军在转移时实行焦土政策，将不能带走的東西全部焚毁。3月底，史末资兵分三路发起全面攻势：一路由劳塞将军率领插入南部地区，克鲁威将军率军与比属刚果军队合力侵入西北角；一路由史末资亲自率领冲击汉德尼，指向达累斯萨拉姆和坦噶尼喀湖之间的重镇莫洛哥罗；一路由德文特将军率领南下攻击中部铁路。史末资还催促1916年3月9日向德国宣战的葡属非洲从东南进攻德属东非。5月，比军占领卢旺达的基加利，6月8日攻占布隆迪的基坦加，6月19日占领汉德尼。6月29日，德文特攻占得得马，7月28日攻占基戈马，8月2日攻占乌季季，8月26日占领莫洛哥罗和中部铁路，9月19日攻占塔波拉。同时，劳塞麾下的罗得西亚军队向北推进，占领俾斯马克堡和兰真堡。此时，绝大部分港口、所有的重点城市和铁路都已掌握在协约国军队手中，东非战事似已结束。1917年1月20日，史末资将指挥权交给霍斯金斯将军，后者由于不能立即消灭德军而在1917年5月被德文特取

Byron Farwell, op.cit., p.71.一说协约军伤亡3500多人。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35页。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通史》)，vol.7, California 1985, p.291.

Byron Farwell, op.cit., p.103.一说南非死113人、伤311人，参见鲁思·弗斯特：《西南非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08页。

Byron Farwell op.cit., p.193.一说非洲士兵最多时达2万多名，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32页。

代。11月25日，德军被迫南渡鲁伍马河，攻入葡属殖民地。德军前有葡军狙击，后有英军追赶，腹背受敌，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挥师北上。1918年11月11日，德军攻占北罗得西亚的卡萨马。两天后，福尔贝克获悉欧洲已经停战，遂率官兵1300人、民伕1600人投降。历时51个月的东非战事以德国失败而告终。

在埃及，协约国主动发起进攻。1915年1月，土耳其集结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5万军队，在热玛尔帕夏率领下向运河地区进逼，英军猛烈还击。土军占领运河以东的土地后，常派小股部队袭击运河西岸地区。英国在收复运河以东土地后，调埃及士兵充当炮灰扼守前沿阵地。1916年4月26日，英、法、俄三国秘密签订了未来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定。同时，英国在埃及集结了不下50万人的军队。年底，英军相继攻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埃及的西部边界，利比亚的塞努西教团在德国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下，1915年11月由艾哈迈德·谢里夫指挥攻入埃及。英军经过四个月激战，终于击败利比亚军队，打碎了同盟国企图两面夹击埃及的计划。

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协约国就瓜分了原德国殖民地。多哥东部归法国管辖，西部为英国占领区。1916年3月，英法在喀麦隆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在收回1911年割给德国的土地后，还占领了剩余土地的80%。德国在西南非洲失败后，南非实行军事接管。在德属东非，葡萄牙收回了被德国夺去的基永加湾三角洲，英国占领了整个坦噶尼喀；比利时占据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共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它们并入比属刚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洲不仅是海外殖民地的主要战场，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供应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强迫非洲人充当炮灰。法国曾计划在非洲开展“黑人百万军队运动”。非洲人或当兵，或当民伕。他们被编入“黑人团”、“土著旅”、“狙击部队”等送往前线，不但在本土作战，还被用于欧洲西线和中东战场；不但替帝国主义大战卖命，还被用于镇压各种反殖民统治的起义。非洲民伕不但用于运送战争物资、修建工事和军营，还用于军工生产；不但在非洲承担战争重任，而且在欧洲从事军事服务。据估计，战时参军的非洲人超过100万，被卷入战争的非洲人共有250万，约占非洲人口1%强。

非洲人参加军队有三种情况。一是自愿参军。有些人为了获得勇敢的荣誉，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些人则视参军为接受文明教育的好机会等，其动机各不相同，但这类人数量极少。1915—1916年法国在非洲征兵39789人，据官方统计，真正自愿的仅7—8%。二是殖民政府通过许诺诱惑非洲人入伍。法国曾宣传：“参战的奴隶一旦回来即可成为酋长”。1916年9月，法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法案，宣布塞内加尔四市的全体居民及其后裔不分出生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一律可享受法国公民权。在阿尔及利亚，1915年法国殖民当局宣布，凡自愿当兵的可得到法国公民权。列强还用高薪吸收非洲人参军。非洲人为缴纳战时繁重的苛捐杂税，找不到工作就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1800—1918》，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30页。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7, pp.292-293.

Ajayi & Crowder, op.cit., p.563.

M.E. Page, Afric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非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Macmillan 1987, p.33.

当兵。英国殖民者还欺骗兰迪人说：“战争可以抢到牲口。”三是强迫征兵。殖民者一面像猎奴那样围追活捉，一面在殖民地实行义务兵役制。1912年，法国规定非洲20—28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4年。1915年10月，法国颁布法令，以“尽义务”为名征发非洲人当兵，此年共征兵39000人。1918年1月，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实行义务兵役制，当年征兵63000多人。1915年，英属东非实行强迫服役法，18—45岁的男子都要服军役；1917年4月，这一法令扩至乌干达保护地。

征来的新兵一般编入设在沿海的培训营，用宗主国的操典简单训练3—6个月，随即编队装船运往战场。法国对非洲人军队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让他们住在封闭的地方。在战场上，法国军官靠会讲法语的非洲官员传令指挥。军队中纪律野蛮，非洲士兵随时会遭鞭打或处死。

德国在非洲的军队历来很少。战争爆发后，德国强迫非洲人入伍。德国在喀麦隆战场上作战的8800人中有7000人是非洲士兵。在东非战场上，德军中的非洲士兵最多时达20000人，超过德国军人的6.5倍，还有数百万非洲劳工为其服务。

法国早有使用非洲士兵的先例。战时在法军服役的非洲士兵达48.3万人，其中来自法属北非殖民地的26万人，来自西非殖民地的18.1万人，来自赤道非洲的2万人。在欧洲战场，战死的非洲士兵一般达20%。还有13.5万人在法国工厂做工。战时，阿尔及利亚有17.3万年轻人被征入伍，11.9万人到法国当劳工，2.5万人死于前线。突尼斯有6.5万人被征入伍，其中阵亡10500人。马达加斯加有4.5万人参战，还有5535名劳工赴法。几内亚被法国视为“安全和稳定的兵力来源地”，战时共征兵30204人，死亡率为11.7%。

英国在战时也征募了大量的非洲士兵和民伕。它在埃及募集义勇队12万人。英属东非仅肯尼亚南部就提供民伕25万人。乌干达共提供五营王室枪队和约12万民伕。尼亚萨兰提供12.5万脚伕，而其全国男劳动力只有20万人。南非非洲人被募为非战斗性劳工（种族歧视条令仍严禁黑人携枪），有3万人服务于西南非洲，1.7万人在东非，1.9万人在法国，3000多人死于劳役。在西非的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四个殖民地，英国共征集非洲人68821名。

费奇认为，在东非战场上，协约国军队中死去的非洲士兵为4000人，另

M.E.Page, op.cit., p.84.

J.F.Munro,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00-1960* (《非洲和国际经济》), London 1976, p.121.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295. 一说47万人，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43页。一说来自法属黑非洲的达16.7万人，来自马格里布的为23.6万人，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52.

K.L.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of Africa* (《非洲土著问题》), vol.2, New York 1928, p.10.

一说4.1万人，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95. 一说41355人或45863人，参见杨人梗：前引书，第606页。

Anne Summers & R.W.Johnson, *World War I Conscript and Social Change in Guinea*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和几内亚社会的变化》),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X, no.1 (1978), p.25.

观村：《埃及与英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第54页。

M.E.page, op.cit., p.138.

Ajayi & Crowder, op. cit., p.557.

有约 3 万名非洲民工丧生。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因为仅肯尼亚至少就有 4 万人死于战争。据侯奇斯分析，在 1914—1918 年的东非战争中，英国一方使用了 5 万名非洲军人，民伕超过 100 万，其中 1 万名军人死于战争或疾病，死亡率达 20%，非洲民伕死亡达 10 万名以上，死亡率为 10%。

据佩奇估计，在大战中，共有 20—25 万非洲人在欧洲、中东和非洲战场上丧生，而服务于战争的非洲士兵和劳工为 200 万，死亡率略高于 10%。这个估计也仍然偏低。有材料表明，仅埃及就有 117 万人被征集，加上后勤人员共达 250 万人，其中走上战场的为 150 万人。

非洲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是最好的士兵，他们往往被送往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作战。在后方，他们又是出色的劳动力。南非土著劳工分遣队在法国的马尔塔内维尔弹药库装卸弹药时，创下了每人 7 小时装 14 吨的纪录。拼命工作的非洲人赢得了英国军事部的良好评价。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口粮每天仅半磅米，日工资为 1—1.3 先令。生活条件也很恶劣，一支 11000 人的塞内加尔部队，有 7500 人死于严寒的袭击。

战争破坏了非洲的生态平衡和非洲人正常的生活秩序，人口大流动和传染病、灾荒大流行使非洲遭受了一场浩劫。1917—1921 年，在法属非洲的许多地方出现灾荒。在人口稀薄的加蓬，灾荒卷走了一半芳族人。1914 和 1915 年，在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军队中梅毒流行，死亡率达 34%。1917 年，乌干达至少有 1 万人死于脑炎。1918 年，大流行病席卷全非，南非黑人死亡 20 万，德属东非死亡 8 万人，乌干达死亡 2.5 万人，东非保护地死亡 5 万人。1917—1918 年，干旱和流行病使马达加斯加人死亡 10 万以上，法属西非至少死亡 12 万人，法属赤道非洲至少死亡 7 万人。灾荒和流行病使非洲人口持续下降，达荷美下降 9%，刚果和乌班吉·沙立下降 1/3，1914—1926 年喀麦隆下降 15%。全非洲人口死于流行病的约为 3—5%，准确估计为 100—150 万或 200 万，是战场上死亡人数的 8—10 倍。非洲人一方面为协约国赢得了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却使自己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其影响是极为恶劣和深远的。非洲人把这场大战和奴隶贸易看成是自己经历的两大灾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洲又是交战双方的物资供应地，这对协约国尤为重要。

为了更多地从非洲掠夺农产品和原料，殖民当局采取各种办法加强战时生产。一是设立机构指导生产。英国的帝国资源开发委员会、棉花种植委员

J.D.Fage, *History of Africa* (《非洲史》), London 1978, p.412.

K.L.Buell, *op.cit.*, vol.1, p.287.

G.W.T.Hodges, *African Manpowers Statistics For the British Forces in East Africa* (《东非英军的非洲人力统计》),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X, no.1 (1978), p.115. 一说在英国人招募的非洲人中随从与士兵的比例是 20 : 1, 75 万东非人为战争服务，其中 10 万人没有回来，士兵死亡率为 10%，随从死亡率为 20%。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667.

M.E.Page, *op.cit.*, p.14.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290 页。一说有 1200 万人被编为劳动大军，参见苏联科学院非洲史研究所：前引书，第 473 页。此说有误，因为当时埃及人口略多于 1000 万，男子壮劳力不过占其中的 3/10，参见陆庭恩：前引书，第 45 页。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58.

M.E.Page, *op.cit.*, p.16.

会等曾通过在非洲的公司调整生产。早在 1914 年 9 月，法国就成立了专门研究殖民地贸易的殖民地顾问委员会；1915 年 11 月，又成立了一个处理殖民地产品供应的机构。1917 年 6 月，法国召开殖民地会议，不但要殖民地帮助解决当时的食品危机，还要为战后的复兴提供原料；并于 8 月成立执行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二是强迫耕种。在塞拉利昂，英国专门颁发土产条例，规定非洲农民如不按标准缴税即判其犯罪。三是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如黄金海岸的可可只能在英国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下出口。四是利用垄断地位压价。1918 年，埃及政府决定以低于国际市场 1/3 的价格即每堪他尔 42 里亚尔收购全部棉花，植棉者因此损失 3200 万镑，而埃及市场的实际棉价只有 32 里亚尔，比官方牌价低 24%。特别是 1917 年德国发动潜艇战时，食品出口的价格被压至最低。五是加征出口税。1916 年，英属西非全境对可可、棕榈油和棕榈仁、花生、皮革等加征出口税。这些措施都有效地加强了列强对非洲物资的掠夺。

在农产品方面，尼日利亚输往英国的增长很快（参见下表）。

	棕榈油	棕榈仁	可可	花生
1913	83,090 吨	174,718 吨	3,621 吨	19,288 吨
1918	86,425 吨	205,167 吨	10,219 吨	57,554 吨

乌干达在 1913—1914 年出口棉花价值 317687 镑，1914—1915 年为 369000 镑，1918—1919 年达 965.951 镑。战时苏丹的谷物输出量增加了 26 倍，从 208 万吨跃为 5494.5 万吨；牛的输出增长了约 3 倍，从 1 万头增至 3.9 万头；绵羊、山羊的出口增长了 1 倍，从 9.9 万头扩大到 20.8 万头；对外贸易额从 1908 年的 50 万埃镑上升为 1919 年的 750 万埃镑。战时黄金海岸向英国出口农产品年均达 4353286 镑。战时英国从南罗得西亚进口的食用牛猛增 5 倍。埃及的出口由 1914 年的 2409.2 万镑增加到 1917 年的 4106.1 万镑。1916—1917 年，法属西非殖民地法国出口的农产品达到最高峰（参见下表）1917 年 4 月法国从非洲买的 50 万吨产品中，9/10 是本国工业缺乏的油料产品。

在矿物原料方面，1915 年，黄金海岸出口金矿 13 吨，占英帝国全部开采量的 3%，占世界采金量的 2%。尼日利亚包奇高原

	1916 年	1917 年	1918 年	1919 年总数
玉米	1500 吨	4600 吨		6100 吨
类	9600 吨	3600 吨	1300 吨	1700 吨 16200 吨
稻米	100 吨	2700 吨	800 吨	1800 吨 5400 吨
食品类	11300 吨	11100 吨	3000 吨	3500 吨 28900 吨
花生油料和				
			138700 吨	297600 吨
棕榈产品				

陆庭恩：前引书，第 38 页。

R.W.July, A History of African People (《非洲人民史》), New York 1980, p.468.

K.L.Buell, op.cit., vol, 1, p.856.

杨灏城：前引书，第 293 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55.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非洲概览》), Oxford 1938, p.1493.

锡产地战时出口 1 万吨，埃努古煤矿 1916 年采煤近 24500 吨并向英国出口。黄金海岸内乌特锰矿每年输出约 3 万吨。战时英国进口的埃及磷灰石增加 60%。法国在战时获得阿尔及利亚的铁和锌矿砂、突尼斯的铅和铁矿砂、摩洛哥的磷酸盐、马达加斯加的石墨等矿物原料数百万吨。

战争使宗主国感到，只凭本国力量难以战胜对方，因而通过一系列手段进一步把殖民地经济纳入战时生产轨道，并使其完全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协约国之所以能在大战中取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殖民地提供了足够的物资和人力。

二、战时政制经济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间，欧洲人大量撤离，非洲人奋起反抗，战费增加，行政费用不足，殖民当局根据这些变化适当调整了统治方式。战前，法比在非洲实行直接统治，战后在绝大部分殖民地逐渐推行间接统治，而在大战期间它们就已开始对殖民统治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的转型期。英国战前已在北尼日利亚试点，战时间接统治日益制度化，并向其他殖民地推广。

1914 年 1 月 1 日，英国将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南尼日利亚保护地和拉各斯殖民地合并成单一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卢加德被任命为大总督。他将自己在北尼日利亚保护地试验多年的间接统治推广到尼日利亚全境，并分别于 1914、1916、1917 年颁布《土著法院法》、《土著政权法》、《土著税收法》。这三大法令分别规定了各统治机构的职能，使间接统治制度化、合法化。《土著法院法》规定，土著法院分四级，分别从属于行政当局。它按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但英国官员有权监督司法。欧洲人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土著政权法》规定，土著政权可根据原有的形式分为三级。土著官员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秩序、征收税款、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发布的各项命令。土著政权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和制订法律的权力。这一法律使殖民地原有的统治机构统统变成了殖民当局的地方政权。《土著税收法》规定，地方政权负责征税，一部分上缴殖民当局，一部分留作土著政权的开支和土著官员的薪俸。这样就把土著统治者的经济利益与殖民者的统治利益联系起来。

在法属黑非洲，欧洲人很少。战时又有一些人走上前线，本来就不足的行政官员更显捉襟见肘。例如在广大的法属赤道非洲，1911 年只有 257 名各级行政官吏和 512 名代理人。战时许多地方常常有职无人。法国人撤离后，政府和贸易公司不得不雇佣非洲人。1916 年，政府计划为以下职位培训非洲候选人：农业监察员、邮政官员、海关官员、机械师和公共工程勘探员。安格尔凡特写道：“战时欧洲人职员短缺，因此，把土著与我们的殖民化工作比以往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必要的。”如果说以上培训的多是技术性官员的话，那末 1917 年夏大总督范·沃郎奥旺则建议培训大量的行政统治人才。他说，酋长必须由总督从享有传统权势的土著中选出人来任命，酋长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必须以行政区长官的名义行事；在任命酋长时必须确定其权利范

杨人榭：前引书，第 452 页。

Ajayi & Crowder, op.cit., p.575.

围，受任命的酋长不管准备采取任何行动，都有责任向法驻殖民地的代表报告。所有这些改革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权利日益集中在法属西非大总督手里，部落酋长都成了法国行政机关的普通官员。”也就是说，法国的宗主权不可动摇，非洲人被当作殖民统治的工具在行政、商业、司法等各个领域任职。

比利时也采用了间接统治制度。它选择一些甘心当殖民主义鹰犬的非洲人为酋长，而他们的辖区一般都很小，有的小区只能管 50 个纳税人；酋长和头人的数目激增，从 1909 年的 1068 名增至 1917 年的 6095 名。

对殖民者来说，实行间接统治大有好处。一是利用非洲传统社会的政治机构统治，既可大大减少所需的欧洲军政人员，节省大笔经费，又能达到殖民统治和掠夺的根本目的。二是转移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视线，其矛头直接对准了处于第一线的土著统治者，避免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统治的直接冲击。三是达到分而治之、长久统治的目的。殖民当局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使土著酋长站到自己一边，这就分化了土著，造成非洲人打非洲人的格局，而殖民者却居间调解，两边讨好。

从以上可以看出：间接统治是一种比直接统治更狡猾、更具欺骗性的统治形式。它在维护殖民宗主权的条件下，有意识地恢复了一些本已在分化瓦解的非洲社会旧制度如村社酋长制等，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地土著政权和行政、司法、财政等机构中的非洲代理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在客观上，间接统治也为非洲新兴民族力量的成长创造了比直接统治较为宽松的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的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既有恶化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加强了，而非洲独立的经济因素也有所增长。但总的来说，非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和商品、掠夺原料和劳动力的有利场所，非洲转化为帝国主义新一轮激烈争夺的后方基地。

第一，非洲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战前德国是热带非洲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塞拉利昂总进出口贸易的 80% 是与德国进行的。尼日利亚有 19 家德、奥匈公司。1913 年，德国购买了尼日利亚 174718 吨出口棕榈仁中的 131885 吨。战争伊始，协约国取得制海权，德国与非洲的贸易中断。占英属西非殖民地出口总值 1/3 的德国在殖民地的种植园、公司、商站和工厂被关闭，存款被冻结。法国殖民地因战时需要，商人等撤走 75%，商船吨位比战前下降一半。而英国利用其海上霸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积极扩展自己的贸易范围。英国不但排挤了德国，还削弱了法国在非洲的贸易实力。如 1914 年，法国能从冈比亚购买当地生产的 78% 花生，1912 年对英出口为 4%，1916 年上升到 48%，1919 年竟达 91%。同时美国、日本也趁机打入非洲殖民地。战时驶入西非港口的美国商船吨位显著增加。黄金海岸向美国出口的原料由 1914 年的 93200 镑增加到 1918 年的 3465600 镑，由占当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 2 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第 145 页。

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非洲概览》), Oxford 1938, p.553.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01.

A.Osuntokun, *Nigeria in the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尼日利亚》), Longman 1979, p.22.
Ajayi & Crowder, *op.cit.*, p.566.

年对外贸易总值的 2% 上升到 33%。在比属刚果著名的四大公司中，美国资本就操纵了两个，即国际刚果林业和矿业公司、美国刚果公司。美国还向摩洛哥、突尼斯、莫桑比克、南非联邦等国家输出自己的商业资本，以控制和获得自己需要的原料。总之，德国对非贸易力量剧减，英国居首，美国日益上升。

第二，金融紊乱，物价飞涨。战时非洲国家进口减少，如英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从 1913 年的 38.6 亿镑降至 1915 年的 31.3 亿镑。这引起一些基本必需品的短缺，以致供应失衡，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埃及批发价格指数从 1914 年的 94 上升到 1918 年的 212。标准英镑和法郎的购买能力下降，1918 年英镑降为 1914 年 45%，法郎降为 30%。在阿尔及利亚一些地区生活费用增加 2 倍，另一些地区达 3 倍。1914—1921 年，马达加斯加物价上涨 5 倍。殖民当局增发大量纸币。大战前夕埃及流通的纸币为 240 万镑，1918 年增加到 4360 万镑，增长了 18 倍。黄金海岸流通的货币量 1918 年是 1913 年的 5 倍。南非发行了大量小面值纸币，引起流通领域大混乱。所有这些都使非洲广大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第三，战时非洲的农业和采矿业有所发展。帝国主义在非洲推行农业单一经济作物栽培制度。1917 年 2 月 20 日，比利时在刚果实行强制耕种制。法令规定，非洲人必须在一定数量土地上种植一定的农作物。如在某些地区，凡非洲人都要种 10 亩棉花和 12 棵棕榈树，而另一些地区则须种 6 亩水稻，违抗者必判重刑。1917 年，英殖民当局迫使乌干达省通过一项法令，全体居民必须种植棉花。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诱导和强迫种植制度之下，非洲各国农业出现畸型专业化。埃及、苏丹、乌干达主要种植棉花；利比里亚和扎伊尔主要生产橡胶；法属黑非洲出产木材；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南非生产小麦；南非、贝专纳兰、南罗得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苏丹等国的肉类最为重要；英属西非的花生、棕榈产品和可可闻名于世。战时，这些作物的产量和出口都增长很快。1912 年南非农业产值为 2300 万镑，到 1917—1918 年达 5152 万镑，第一次超过矿业产值。尼日利亚可可产量 1913 年为 5000 吨，1916 年达 16000 吨，1918 年为 26000 吨，在世界可可出口中的比例由 1908 年的 0.7% 增加到 1918 年的 3.8%。黄金海岸战时可可生产量相当于战前的 3 倍，占战时全非产量的 2/3，可可可在出口总值中的比例 1914 年为 50%，1916 年达 70%。非洲可可出口量 1908—1918 年增长 2 倍，在世界可可出口总量中的比例由 1908 年的 1/4 上升到 1918 年的 2/5。乌干达 1913 年运出棉花 25841 包，占出口总值的 60% 以上，1918 年棉花种植面积为 5.6

David Killingray, *Repercussions of World War I in The Gold Coast*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黄金海岸的反响》),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X, no.1 (1978), p.43.

Peter Wickins,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非洲经济史》), Oxford 1980, p.1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xvii.

Peter Wickins, *op.cit.*, p.10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96.

M.Wilson & L.Tho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牛津南非史》), vol.2, Oxford, 1971, p.18. Lord Hailey, *op.cit.*, p.1287.

Peter Wickins, *op.cit.*, pp.108-109.

S.H.Frankel, *op.cit.*, p.274.

万公顷，增加 1/4，产量在东非殖民地名列第一，为 1460 万磅。法属西非战时花生的产量达 30 多万吨，占当时全非花生产量一半以上。

农业专业化使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商品化大大加强，也促使一些农场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过渡。但由于专业化是畸形的，所以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作物生产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指南，严重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战时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上涨，而运输能力不足，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生产国难以就地消化，于是许多农产品就烂在地里。1918 年，黄金海岸农业部长写道：“我估计，1917—1918 年的农作物，收获的可能不足 3/4，仅半数卖出。我预料，1918 年的农作物，保险一点说，到市场上的不足 3/4。”另一方面，非洲在出口作物生产过剩时又发生严重的粮食危机。素有“非洲谷仓”之称的埃及 1916 年输入价值 600 万英镑的粮食。塞内加尔战时从印度支那输入大米以解饥荒。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是非洲农业被帝国主义强行纳入种植出口作物的轨道，不以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粮食种植面积和所需的资金、物资都被削减。二是战时大量强迫征兵使耕地荒芜，荒地难以开垦，年复一年的掠夺性种植使地力损耗殆尽，不仅生产难以维系，生态环境也被严重破坏，后果是深远和严重的。三是战时欧洲对非洲粮食依赖加强，非洲产粮区都供出口，非洲自己也因用于工矿业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劳动力猛增，对商品粮需求量增大，造成粮食生产的严重供不应求。四是灾荒严重，水、旱、虫、灾此起彼伏。

战争使列强对非洲的矿业原料更加重视，其开采量和出口量大增。比属刚果的加丹加地区 1912 年铜的开采量只有 3490 吨，1914 年为 14042 吨，1918 年已超过 20000 吨，出口在 1915—1917 年增加了 2 倍。比属刚果的金刚石产量在战后不久达 23.1 万克拉。南非黄金生产在战时波动很大，1910 年占世界产量的 1/3，战后不久黄金产值达 3450 万英镑，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 1/2，全用于出口。南罗得西亚著名的铬铁矿开采量 1917 年比战前增加了 50%，其石棉开采量 1917 年为 87000 吨，是 1914 年的 117 倍，采煤量是 1914 年的 2 倍。南非 1917 年的煤产量比战前净增 200 万吨。埃及 1917 年石油开采量近 20 万吨。非洲战时矿业的产量和出口表明，一是传统的黄金和金刚石生产有波动，但由于金融混乱造成对硬通货的更大需求，所以仍有一定发展，生产的国家增多；二是适用于军工生产的重要原料如铬、铜、锰、石棉等得以迅速发展；三是燃料动力资源如煤、石油的开采有较大增长；四是发现了许多新矿，并迅速投入生产。如 1914 年黄金海岸发现锰矿，时隔两年就有首批锰矿石出口。

第四，非洲制造业发展。战争使非洲进口减少，如埃及 1914—1917 年的贸易顺差达 24026 万英镑。加之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欧洲人大量撤离，而军事订货日益增多，因此战时非洲制造业得以在夹缝中发展，主要是食品和日用品生产，老式手工业复兴，现代工业只限于在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展，如埃及

Ajayi & Crowder, *op. cit.*, p.

P.T.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 New York 1933, p.92. Lord Hailey, *op. cit.*, p.1057.

Lord Hailey, *op. cit.*, p.

A.P.Newt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剑桥不列颠帝国史》), vol.8, Cambridge 1936, p.801.

和南非。1912年南非制造业产值900万镑，到1917—1918年达5001万镑；工厂数量从1915—1916年的3638家增加到1918—1919年的5287家，使用动力从11.4万马力增加到14.8万马力，劳动力从8.9万人增至11万人。1917年，埃及糖产量约10万吨。同年，拥有2万台纺织机、560台织布机和800名工人的埃及全国纺织公司消耗原棉5万堪他尔，生产棉纱350万磅和棉布800—900万码，产量比战前增长了15—20%。在西非尤其是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油料加工业得以发展。虽然非洲的本地工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一定发展，但它仍然很脆弱。例如，埃及2/5的工业劳动力在食品生产部门，2/5在服装和织布部门，仅3万名工人受雇于现代化工厂。这些传统部门技术设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一旦战时的有利条件消失，它们就难以同西方国家的大工业产品竞争。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经济被纳入了战时轨道。战争既给经济带来了破坏，促使经济畸形发展；又使非洲外贸格局变化，使得英国可以采取国家干预手段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单一种植出口经济作物引起粮食危机，采矿业也因帝国主义战时的大量需求而迅速发展。同时战争也使非洲国家进口减少，于是替代进口工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帝国主义在强使非洲国家经济完全依附于宗主国的同时，也为非洲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惨淡经营并发展壮大，为以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非洲的社会变革

战前，殖民主义入侵虽然强行把非洲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大多数国家最基层的社会经济关系基本上原封未动，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非洲基本上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近乎停滞的稳定结构。

战时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采矿业、种植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者采取的各种超经济强制等等，促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离开原来的社会组织，传统的非洲社会结构日益松散，发生分化。

农民是非洲社会的主要力量，促使农民分化对非洲的发展至关重要。战时非洲的工业有所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化加快，它要求更多的劳动力。于是，殖民者就采用掠夺土地、征收货币税及强迫劳动制使农民脱离土地。

殖民者一踏上非洲大陆，就无时无刻不在掠夺土地。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最多，掠夺土地的情况也最严重。南非1913年《土著土地法》将占人口2/3的班图人赶进了只占全国土地面积7.3%的204块保留地，四、五口之家平均所占耕地仅0.75英亩，而且大部分为劣地。在一个保留地内，平均每225英亩土地中只有7英亩的可耕地。1917年阿尔及利亚注册土地的55%以上落入欧洲人之手，全国非洲人有一半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

M.Wilson & L.Thompson, op.cit., p.18.Lord Hailey, op.cit., p.1287.

Peter Wickins, op.cit., p.111.

Peter Wickins op.cit., p.111.当时埃及靠工业生活的工人为40万人。

C.W.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南非史：社会和经济》), Oxford 1950, p.80.

是非洲人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谋生手段。他们为饥饿所迫，只得外出做工。到 1918 年，26 万南非黑人受雇于矿业，25.5 万黑人在白人农场劳动。

战时帝国主义在非洲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德属东非有茅屋税、劳动税、人头税等，由于非洲人实行一夫多妻制，有多间茅屋，仅茅屋税一项就夺走了他们几个月的收入。其他殖民地还有宗教洗礼税、出口税、自来水税、红十字税，税种多如牛毛。这就迫使非洲人为弄到钱纳税而出卖劳动力，汇入商品经济大潮。

强迫劳动是剥夺农民的最野蛮的手段。安哥拉 1914 年通过法律，要求非洲人每年必须无偿劳动一个时期，由当地驻军执行。肯尼亚英国殖民当局规定，租用欧洲人农场主土地的非洲人家庭中，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无偿服役 180 天。在乌干达，妇女儿童也被强迫参加劳动，尤其在战时。

帝国主义采用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手段使非洲农民分化为三部分：农民、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半农民和完全脱离土地的赤贫工人。

战时非洲的无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1907 年，埃及工人为 457,451 人，1917 年达 639,929 人，1918 年达 75 万人。1918 年，南非无产阶级人数已达 48.7 万人。1916 年，比属刚果的雇工人数已过 4.5 万人。非洲工人可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他们只存在于城市的现代工厂中；一类是流动劳工，这是非洲工人队伍的主体。农民被强行分化后，一部分无产阶级化，但他们又受一些人为因素的制约，不能在工业社会中固定化。例如在南非，土著保留地制度使大多数黑人家庭可领有一块份地，他们与生产资料没有完全分离。殖民当局对保留地政策的原則是：“保留地的生产必须维持在这样的水平上，一方面不能太低，以防止流动工人再生产为一个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不能高得足以使保留地将必不可少的流动工人吸引住。”流动工人仍依托于土地，即使走出保留地，也有一部分人仍然受雇于农场或种植园。这样，他们必然与保留地酋长或种植园主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成为一种带有殖民地特点的工人阶级。从战时非洲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可以看出，第一，非洲工人阶级比民族资产阶级出现早，他们是随西方资本家在本国设厂经营而形成的。第二，非洲无产阶级队伍复杂，层次不一。如埃及工人队伍中既有埃及人，又有外籍工人；既有现代工人，又有手工业者和家庭佣人。第三，非洲工人阶级多为非熟练的季节性流动劳工。第四，非洲工人阶级不但遭受帝国主义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剥削，还要受本国资本家和封建势力或部落头人的剥削。由于他们来自不同部落，而且又是流动性的，难以团结和组织工会，所以只能听任资本家摆布。第五，非洲工人阶级遭受种族歧视。如南非黑人工人不但受资本家的歧视，还受白人工人贵族的歧视。他们所受的经济压迫和心灵创伤都是严重的，因而他们反帝反殖最坚决。

战时非洲民族资产阶级随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战争给非洲人创造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 vol.7, p.563.

杨灏城：前引书，295 页。

M.Wilson & L.Thompson op.cit., p.21. 一说南非土著工人 1914 年为 243,509 人，1915 年为 260,495 人，1918 年为 268,412 人，参见西克·安德烈：前引书，第 74 页。

N.Levy,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Cheap Labour System (《南非廉价劳工制的建立》), London 1982, p.192.

了机会。一个在法国人工厂当出纳的阿散蒂人写道：“负责工厂的欧洲人为战事被召回库马西。……工人只得留给我负责，所以我将不得不暂时充当厂主——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一是战时得以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的创办人，他们主要从事纺织、卷烟、食品等加工；二是战时因价格上涨而发财的商人，如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倒卖木材、加工烟草、获利后雇工经营；三是传统的手工作坊主，如西非的木雕作坊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雇工现象增多，经营规模扩大；四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富裕农民，在种植出口经济作物可获利的地方，他们一般雇佣2—3人，主人与家属一块参加劳动。另外，在非洲一些地区出现了殖民当局扶植起来的官僚资本家。如在南罗得西亚，英国殖民当局把没收的非洲人土地的一部分转让给非洲人上层分子，并允许他们雇佣非洲人生产。殖民当局还提供各种便利，使非洲人中的富人得到土地、资金和雇工。这些人一般都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将其产品投放市场，有些还进入国际市场。当然，这一部分人为数极少，黑人方面自不必说，即使在白人农场中真正转变为新型资本主义农场的也有限，因为现代大工业在非洲还刚起步，这直接限制了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或部落头人之间，与两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生性软弱，时而与开明派地主联合反帝反殖，时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非洲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在战时得到发展壮大。战争促使他们思考，并在参战问题上发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战时帮助宗主国，才能在战后有所要求。其典型代表是塞内加尔的迪亚涅，他到法国政府中任职，替法军征兵，并要求得到法国公民权。他们是没有民族独立意识，认同法国同化政策的温和派。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战争中得到启示，认识到这是欧洲人的战争，被强行拖入战争泥潭的非洲人应该为新世界而战，最终目的是要让宗主国退出非洲。他们是非洲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许多宗教上层分子也开始以宗教之名行反殖民统治之实，要求建立独立的非洲教会，使外来宗教本地化。经过战争洗礼的非洲知识分子成了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他们的进步思想武装了千千万万争取民族独立的非洲战士。

帝国主义战争又使非洲土著酋长发生分化。一部分酋长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威控制民族工商业或投资于土地，成为工商业资本家或农业资本家。一部分酋长受惠于殖民统治者，成为官僚资本家。一部分酋长因不愿征兵而被罢黜或剥夺，成为破落酋长。而绝大部分酋长仍然是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些人接受现代意识，愿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愿将产品投放市场，但其大量的经济成份仍属自给自足范围。也有一些酋长顽固保守，仍在老圈子里徘徊。

总之，战时随着商品经济、外国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非洲的阶级力量配备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酋长、地主阶层都发生了分化，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队伍日益壮大。但和亚洲、拉丁美洲一样，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超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主体队伍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一特点决定了在以后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将发挥巨大作用。

随着战时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非洲人的思想和社会心理也随之

发生变化。

在大战中，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域、操不同方言的非洲士兵和民伕在殖民列强逼迫下走到一起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一致性，认识到天下黑人是一家，这无疑加强了他们的团结。战争还让非洲人显示了自己的作战才能和劳动效率，使他们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战时非洲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我是一个黑人，我的祖祖辈辈也是黑人，我全身都是黑的，我为有我美丽的黑色皮肤而自豪。”

战时黑人士兵和民伕同白人的接触，使他们发现黑人白人是生来平等的。莫汉佩勒亚写道：“由于来自南非，我们关于黑白人关系的思想是凝固的，所以当一些法国人能自由地与我们混合相处时，我们感到惊诧”，“我们被白人当作有尊严的人对待。”种族隔离的思想藩篱由此出现了裂纹。同时，战争使非洲人看到了列强的虚弱，打破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们的反抗意识在升腾。迪亚涅说，大革命时的法国抵挡了一切外来侵略，而现在的法国却让刚从原始生活中脱身出来的非洲内地黑人来解救。这些话语对列强表示了明显的蔑视和不满。南非“一先令罢工”发起者玛勒拉说：“我们一定要自由，为什么我们应该是奴隶，想想我们的孩子在法国流的血。”姆万巴扎讲得更明白：“英国和白人应给我们自由，因为我们在战争中失掉了数以千计的人。”肯雅塔说：“参战的最好报答是夺取非洲人最好的土地。”

十月革命似乎让非洲人看到一线光明，他们的反抗意识出现了质的飞跃，从要求回报到争取自治再到获得独立。战时各种思潮纷纷涌入或出现于非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也随着欧洲归来的非洲人传入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以及“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等口号广为流传，泛伊斯兰主义也以其特殊的方式激励着人们去反对殖民列强。

战争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境外作战和服役使非洲人眼界大开，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形成了新的世界观。返回的非洲战士和民伕传播了白人的新观点，非洲人在20世纪20年代展现的许多自信与果断都与此有关。战争成了非洲人的启蒙师。正如菲力浦博士所指出的：“1914—1918年的经历是如此有效地唤醒了处于蒙昧世纪的肯尼亚土人。”民族觉醒为非洲人的反抗斗争做了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

四、战时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

大战期间，非洲人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有的反对殖民主义侵略，要求恢复独立；有的反对战时压迫，尤其是强迫征兵和强迫劳动；有的是战时经济紧张引起的反应；有的则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圣战。反抗斗争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上层议会斗争，如迪亚涅在法国议会为非洲人争取权利；有下层的群众起义、工人罢工；有消极的逃亡、躲避；有积极的武装斗争。参加这些反抗斗争的有农牧民、知识分子、酋长、民族资产阶级、退伍老兵，

陆庭恩：前引书，第214页。

M.E.Page, op.cit., pp.56-57.

M.E.Page, op.cit., pp.74, 65, 20.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7, p.304.

也有无产阶级。

帝国主义大量强迫征兵引起非洲人民大规模的反抗。一是消极抵抗，如逃亡、装病、自毁、蓄意不听命令等。几内亚 1918 年统计，几乎有 1/4 的非洲士兵逃亡。在桑给巴尔，人们为逃避征兵，白天躲藏，晚上睡在树上。菲勒拉上校曾说：1917 年 8 月征的豪萨兵没有一个能用，不是聋子就是瞎子或肢体不健全的人。二是武装起义，如阿尔及利亚的东奥斯、尼日利亚的埃格巴族人都掀起了反征兵起义。这引起帝国主义的惊慌，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回部分兵力，加强对非洲人的控制或放慢征兵速度。

反对殖民压迫、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于非洲近代史的一个主题。战时非洲人利用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殖民统治力量薄弱的机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一是公开的独立斗争，如 1914—1917 安哥拉到处爆发反对葡萄牙征服的战争。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抗斗争。如南非出现了埃塞俄比亚运动，宣传“上帝与黑人同在”，参加者不但拒绝纳税，还进行武装操练。这一运动波及整个南部非洲，并发展到几内亚湾沿岸国家。在乌干达，马拉基领导非洲人拒绝服从命令，抗缴土地税。在尼日利亚，“以利亚第二”布雷德领导人民不但反对欧洲轧花机，还反对欧洲人统治。在利比里亚，黑人传教士哈里斯领导人民反重税和强迫劳动制，掀起哈里斯运动。遍及尼亚萨兰、比属刚果、北罗得西亚和德属东非殖民地的望塔楼运动，提出“非洲只属于非洲人”、“将白人逐出非洲”的口号。在尼亚萨兰，约翰·奇伦布韦领导非洲浸礼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武装起义。奇伦布韦在留美时接受了泛非主义思想，相信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力。大战爆发后，他号召非洲人拒绝参战，不要替帝国主义卖命。1915 年 1 月 23 日夜，奇伦布韦领导非洲农民和农业工人袭击利文斯敦·布鲁斯庄园。但在进攻殖民统治中心布兰太尔时，他们意见不一，坐失良机，英国殖民当局乘机联合葡军合力夹击。2 月 3 日，奇伦布韦被杀，起义失败。奇伦布韦被誉为尼亚萨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他领导的起义打响了尼亚萨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枪。

战时非洲无产阶级也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尤其在南非。1915 年 9 月，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从南非工党中分裂出来，它不但提出黑白工人大联合的政治主张，还积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联系，共同推动南非的斗争。1917 年它倡议成立了非洲产业工人工会，并在《国际》上报道俄国革命，激发南非工人的斗争热情。1915 年 1 月，南非铁路工人罢工。3 月 15 日，南非白人工人在约翰内斯堡总罢工，兰德矿区非洲矿工也同时罢工。1917 年，金伯利矿区工人举行大罢工。1918 上半年，黑白工人联合反对通行证，抵制小饭馆。1918 年，非洲产业工会领导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参加者来自采矿业、市政服务业、公用事业等，人数达 10 万，斗争时间达 2 个月。约翰内斯堡市民也配合举行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当局被迫让步，提高工人工资 5%，答应改善劳动条件。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非洲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处于反帝革命时代的前夜。战时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分散了忙于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注意力。反征兵运动使帝国主义不能随心所欲地掠夺非洲人力资源。宗教反抗斗争注入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内容，在当时新的反抗斗争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仍是

广泛联系群众、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好形式。南非无产阶级的斗争虽一枝独秀，但它预示着未来，并为争取独立、自由的非洲人民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十二章 近代非洲和中国

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但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先后侵入非洲和中国以后，中非关系出现了某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使中国人同非洲的交往从原来的北非、东非渐次扩大到南部非洲以及西非、中非；昔日的船队贸易和贡使贸易遭到破坏，通过西方国家的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贸易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形式；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官方关系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由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插手的官方关系，但直接的民间往来并未中断；在此期间出现的华裔和华工构成了非洲最初的华人社会，他们与当地人民命运与共，为所在国的发展与中非友好作出了贡献。从 16 世纪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400 年间，是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同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时期，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中非交通和贸易的变迁

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的卡利库特。这不只是开辟了一条东西方的新航路，而且是 400 多年东西方新格局的起点。从此开始，欧洲殖民主义者不断用武力打开亚非国家的大门，使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时破坏了这些国家之间传统的交通、贸易和文化联系，代之由他们垄断和支配的间接贸易和文化关系。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中非友好关系的通道有两条：一是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据明史记载，正统六年（1441 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国王阿失刺福曾遣使至明，“自后不复至”，中非之间的陆路交通便就此中断了。二是南海海道，又称“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宋朝以降，海上交通已取代陆路成为中非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葡萄牙殖民者东来之后，相继占领了东非的莫桑比克、索法拉、桑给巴尔、基尔瓦、蒙巴萨等城邦、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印度沿海的果阿、第乌、达曼、孟买等地，并在 1509 年击败埃及和印度的联合舰队，控制了中非古代海上交通的印度洋一侧。1511 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1517 年入侵广东，1553 年强租澳门，控制了中非海上交通的太平洋一侧。他们霸占这些海上要津，袭击和抢劫各国商船。本来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航行的中非海上交通被葡萄牙人垄断了，中国和非洲的海上直接往来受到阻隔。《明史》记云：满刺加（马六甲）“自为佛郎机（指葡萄牙）所破，其风顿殊，商船稀至，多直诣苏门答腊。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

古代中非航路的被破坏，导致中国同东非和北非的直接贸易中断，由阿拉伯人作中介的转口贸易也一落千丈。厄梅尔·塔利布在 1625 年写道：“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34 页。

非洲同中国的间接贸易不但未曾中断，而且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展。晚明和清初的瓷器在非洲大量出土就是明证。它们分布于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圣赫勒拿等地。例如，在肯尼亚发掘出 1300 片中国瓷器，以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居多；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现了数千片明清青花瓷和彩瓷。

16—19 世纪的中非间接贸易与海上航线的变化密切相关。从 16 世纪初到 17 世纪初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葡萄牙虽然霸占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要津，但并未完全把阿拉伯商人从中介贸易中排挤出去。据 1512—1515 年在印度马六甲活动的葡萄牙人皮瑞斯记载，两地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东非基尔瓦、马林迪、摩加迪沙、蒙巴萨和埃及的商人，从这里运走大量商品，其中包括中国的瓷器。当然，葡萄牙人在中非间接贸易中起着主要作用。他们沿澳门（或南洋）—马六甲—印度—东非—好望角航线，把中国瓷器及其他产品输往非洲各地。例如，昌加米尔出土的中国瓷器是从葡萄牙人的商站卢安兹和丹巴拉尔输入的。

1611 年，荷兰人开辟了一条从好望角直达巽他海峡的新航线。这条航线也延伸到中国，成为亚非之间的主要航线之一。18 世纪谢清高附番舶到欧洲就是经由这条航线。他说：“凡大西洋各国船回祖家，必南行经噶喇叭至地问，然后转西少北行”，约一月可到毛里求斯，最后到荷兰所辖之峡山（好望角）。当时还有中国人在荷兰船上当手水，但只准他们到好望角，“别配船转，不令往其祖家（荷兰）”。

荷兰人为垄断这条避开东非沿海的航线和东西方贸易，排挤葡萄牙人，1631 年夺取毛里求斯岛，1652 年建立南非开普殖民地，作为中途补给站；同时，在亚非占领了香料主要产地——印度尼西亚，进而窥伺中国。1604、1607 和 1622 年，荷兰人三次来华贸易，均未成功。1622 年，他们侵入中国澎湖，1624 年占领台湾，进行走私贸易，抢劫中国东南沿海。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经印尼到好望角的中非贸易路线。荷兰转贩中国货物（丝绸、瓷器、棉布等），有间接和直接两种贸易形式。间接贸易是在印尼转贩中国商人的货物。明史指出：“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咬吧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直接贸易就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1762 年在广东建商站进行合法贸易。荷兰人购买的中国瓷器、丝绸中的一部分销往非洲各国。例如，毛里求斯在 1655 年曾向巴达维亚（雅加达）订购了 100 件中国粗瓷盘、50 件瓷碟、50 件大瓷碗、50 件小瓷杯。1678 年和 1681 年，有中国瓷器运到开普敦的记载。

法国人又开辟了一条从好望角经马斯克林群岛到印度至中国的航线。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 1987 年，第 15 页。

G.S.P.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r to Nineteenth Century* (《东非海岸》), Oxford 1962, p.12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剑桥非洲史》), vol.3, p.596.

《海录注》，中华书局 1955 年，第 60 页。噶喇叭，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地问，今帝汶。

王大海：《海岛逸志》。

《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马文宽、孟凡人：前引书，第 35 页。

1643年，法国占领留尼汪，1715年占领毛里求斯，从而为以马斯克林群岛为中继站的航线奠定了基础。1793年以后，法国政府规定新印度公司所属的船只每年从中国返航时应有一艘开往马斯克林群岛，供应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法国商人还以马斯克林群岛为中转站，向马达加斯加、东非沿岸转贩中国商品。例如，法国商人曾为马达加斯加隆卡拉瓦王国的国王从中国带去了贵重的花瓶、漆雕御座。

由于上述两条航线均避开了东非海岸，不仅阿拉伯商人在中非贸易中的作用进一步降低，就连葡萄牙人的主要中间商的地位也被荷兰、法国、英国所代替。19世纪初年英国相继夺占开普敦和毛里求斯以后，英国则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中间商，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参见下表）。殖民列强商业地位的变化，是与他们自身的荣辱盛衰密切相关的。

衰落达三个世纪的中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太平洋—印度洋—红海航线），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转机。1851—1856年，英国人修建了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1867年，王韬赴欧，改走红海到苏伊士，转铁道至亚历山大，再转船到欧洲。他赴欧时，苏伊士运河正在开凿，其《漫游随录》精辟地总结了近代中非交通的变迁。“昔时英人东来之海道，皆绕好望角而至中华。自咸丰年间，始由亚丁直抵红海，陆引百七十里而至地中海，计程可近数万里，诚捷径也。

毛里求斯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统计

（单位：毛里求斯卢比）

年份	从中国进口额	从香港进口额
1878	50	—
1883	67, 100	99, 360
1888	2	145, 126
1893	2, 472	123, 961
1898	245, 112	16, 764
1903	205, 928	1, 442
1908	36, 642	855
1913	144, 709	7, 586
1918	329, 163	—

于是好望角形势之雄，遂成虚设。逮至苏伊士运河一开，东西轮船均可直达，局面又一变矣。地势无常，可胜慨哉。”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通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新成为中国与北非、东非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国除出口丝绸、瓷器（因欧洲仿造成功，出口量减少）外，茶叶成了新的大宗商品。如中国1903年向埃及等地出口红茶1416担，1904年增至6209担，砖茶为38405担。但直到20世纪初，不论是海上交通还是贸易，依旧控制在西欧殖民国家特别是英国手中。

二、澳门黑奴

奥古斯特·图森：《马斯克林群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6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4, p.465.

据毛里求斯殖民地蓝皮书（1878—1938）统计。

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把黑人也贩运到亚洲和中国。16世纪初葡萄牙侵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期间，曾驱使黑人充当炮灰。明朝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 在上奏中多次提及，如1548年5月在上虞县俘虏了三名“黑鬼奴”，其中一名叫“嘛哩丁牛，三十岁，咖味哩人，被佛郎机番自幼买来”；俘虏最多的一次有46名。

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一样，也使用非洲黑奴充当侵略中国的炮灰。万历年间荷兰侵略澎湖列岛和台湾，都曾使用黑人。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和兰长技惟舟与铳耳……其役使，名乌鬼。”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广东通商口岸从事贸易，也役使黑奴，或作仆役，或搬运货物，看管仓库等等。澳门同知王衷说：“夷人（指葡萄牙人）自有黑奴搬运家私，移顿货物，实可无庸雇请者。”但当地挑夫对此不满，“竟有拦街殴夺，起衅争端”，因此他建议：“至黑奴搬运家私什物，应听该夷人自便。挑夫倘有拦阻混争，地方官出示查禁，有犯即行究处。”欧洲人也把黑奴带到了广州，在商馆内看货、守门、挑水、挑货。到19世纪初年，因各国商人来者益众，两广总督才奏请改变做法，由外商买办代为雇请中国民工干活。

在欧洲人军队和商馆中的黑人，来华均具临时性，而在澳门的黑人则为长驻。工部尚书杜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巡视澳门时指出：“黑鬼……世仆隶耳。”葡萄牙强租澳门以后，大批黑人随之而来，形成了澳门白主黑奴的局面。据薛翮《澳门记》载，那里的黑奴不仅有男的，也有女的。估计，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到18世纪中叶，黑奴在澳门者约为2000人左右，19世纪初增至3000人左右。

在澳门的黑奴，主要从事仆役和运输。他们像世界其他地方的黑奴一样，受到殖民者的残酷虐待。据载，白人“食余，倾之一器，如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黑奴男女皆衣布，无冠履”。主人还可以任意处罚他们，“若主人恶之，锢其终身，不使匹配”。

明清两朝在管理澳门事务中，先后对黑人作出了若干规定。如不准黑人进入中国内地，不准黑奴赊购货物，也不准华人收买黑人物品，违者逐出澳门；黑人犯法，由中国官宪审判，然后发回澳门由葡萄牙人处理，如果葡萄牙官吏庇匿不解，也要受到惩办。

葡萄牙人贩运黑奴到澳门持续了几百年，但中国人一直不知其来自非洲，还以为“欧罗巴人种有黔皙云”。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

朱：《鹭余杂集》，卷二、卷四。佛郎机指葡萄牙；咖味哩，係 kaffir 之对音，欧洲人对一部分南班图人的称呼。

乌鬼是对黑人的一种蔑称。

豫堃编：《粤海关志》，卷二九，《夷商四》。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参见艾周昌：《非洲黑人来华考》，《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

阮元：《广东通志》，卷三三。

印光任、张汝霖：前引书。

魏源：《海国图志》，《小西洋利未亚洲各图志》。

外开放，才知道澳门黑奴都从非洲贩来。中国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贩奴之恶俗”，指斥欧洲奴隶贩子为“匪徒”，说他们“驾船载火器，而以美酒玩物”诱贩人口，“收奴三四万口拥挤下舱，线缕桎梏，闷不通风，臭气染病”，以致造成“死者不计其数”。

欧洲殖民者侵略亚非以来，非洲黑人来华虽未中断，但他们是作为欧洲殖民者的奴隶来华而居于澳门的。中国政府明令禁止黑奴入内地，根本无所谓中国人贩卖和蓄养黑奴之事。相反，中国人也是殖民者掠卖为奴的对象。

三、从华奴到华工

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一方面把黑奴带到中国充当炮灰和仆役，另一方面又掳掠中国沿海居民为奴。葡萄牙殖民者常在广东沿海“招诱亡命，略买子女”。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彼得逊建议“遣战船，往中国海岸，尽量捕其男女幼童以归”。葡萄牙以澳门为基地，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劫掠大量华人，贩卖到异国他乡为奴，其中也有输往非洲阿尔及利亚、东非沿海、毛里求斯和南非者。1622年就有中国奴隶在阿尔及尔的记载。1638年，荷兰把一批华奴送到毛里求斯。1740年，荷兰在印尼大规模逮捕、屠杀华侨，其中一些人被贩卖到开普殖民地为奴隶。但华奴的人数每年从未超过100人。明清两朝严禁欧洲殖民者贩卖奴隶。万历年间曾明令：“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清承明制，于乾隆九年（1744）详定条例，严禁殖民者贩卖人口。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打击，欧洲殖民者贩卖华奴之事才未酿成大规模的恶行。

工业革命后，奴隶劳动不如自由劳动有利可图，这已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论证。黑奴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反抗运动，废奴运动的强大舆论压力，迫使欧美各殖民国家相继禁止奴隶贸易。于是，为种植园寻找新的劳力来源而产生了契约劳工制度，华工由此应运而生。第一批被拐骗到非洲的华工都送到昔日的奴隶种植园（农场）地区。1783年，132名华工由广州运到了毛里求斯岛，其中有19名技工；1784年，又来了12人。1810年，法夸尔任毛里求斯总督，极力鼓吹使用华工，并委托19世纪初来此的陆才新（？—1874）回国招工。五年后，他带5名工人同返毛里求斯，他成为华侨向毛里求斯移居的担保人。以私人招工形式吸引华工，看来收效不大。据1830年的人口调查，华人才26名。留尼汪是另一个实行种植园制度的印度洋岛国，也是招募华工较早的国家。1844年，法国从槟榔屿招募54名华工至此，契约期为5

徐继畲：《瀛环志略》，《阿非利加》。

《亚非利加洲志》，第2页。

阙名：《每月统纪传》。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162页。关于荷兰人掠掳华人的具体情节，可参见《东印度航海记》，第86—96页。

C·R·博克塞：《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载《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91页。

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27页。

印光任、张汝霖：前引书。

奥古斯特·图森：前引书，第285页。实际人数可能不止于此，因许多华人加入了其他亚裔人社会。

年，次年，法国商人直接从厦门招募 180 名华工至留尼汪，到 1901 年为止总共从福建招募了约 3000 人。

圣赫勒拿是大西洋上实行奴隶种植园制的一个岛国，也是招募华工较早的地区。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占有该岛的东印度公司不能再从非洲获得奴隶，劳动力供应发生问题。于是，1810 年，东印度公司驻圣赫勒拿长官委托该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代招一批中国工匠和农伕。当年非法从广州召来 100 多名华工；从 1811 年到 1815 年，每年约招来 150 人左右。1815 年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该岛。岛上大兴土木，更感劳动力不足，希望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将招工数额从 150 人左右提高到 350 人。1816 年，它招足了 350 人，以后三年每年都有 300 名左右的华工抵达圣赫勒拿。1820 年，它招募 20 名华工，被清政府查获，结果交了 1000 两银子才将华工私运到圣赫勒拿岛。1821 年，它又招 36 名。1874 年容闳访问该岛时发现，“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列强为了改变非法招工的不利局面，强迫清政府在北京增订续约，规定“凡有华民情愿出口”，“立约为凭”，清政府不得禁阻。从此，英法等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拐贩华工出洋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随着英法等殖民国家加紧对非洲的侵略，他们也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去建设港口铁路和开采矿藏。早在 1858 年，法国就从广州招募了 173 名华工到塞内加尔修筑铁路。1879 年，法国驻广州领事援引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的规定，要求准许法国商人招工。1880—1882 年，他从广州、汕头和上海招去了大批华工，这些华工都参加了达喀尔—圣路易铁道的建设。

法国占领刚果以后，决定修建海滨到布拉柴维尔的铁路。为此，法国商人在中国雷州半岛各县招募 500 余人，分批运往刚果，参加铁路建设，许多人因劳累和患病而死。

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后，立即招募华工修筑塔马塔夫—塔那那利佛公路。1896—1897 年间，他们共从中越边境招募了四批华工计 3003 人，每批工作一年，期满即行回国。1901 年，法商魏池受马达加斯加殖民政府的委托，与福建洋务局签订了《马大加司加招工合同》，拟招 1500 人赴马种植甘蔗和做“官工”，即修建公路和铁路。合同规定，三年为期，期满回同；每日做工 8 小时，每月工银 10 元，饮食、住宿和医药悉由法官办给。这可能是为非洲招募华工而签署的第一份官方合同。但在 1901 年，实际上只有 764 名华工被招至马岛，除 280 人参加修筑铁路外，其余分配到各地公共建筑部门和农业部门。修筑铁路的华工死亡率高达 76.90%。大批华工的得病和死亡，引起了家属和群众的不满，纷纷要求清政府加以营救，惩办魏池。闽侯知县仅惩办了几个替魏池招工的地痞了事，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保护华工。

德国占领坦噶尼喀以后，于 1892 年从新加坡招募 240 名华工去巴加莫

方积根：前引书，第 456 页。一说 53 人，参见《华侨志（留尼汪岛）》，台北，第 15 页。

《华侨志（留尼汪岛）》，第 17 页。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8、9、10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254—256 页。

方积根：前引书，第 392—393 页。

《中外约章新纂》，卷一。

方积根：前引书，第 404—405 页。

约；同年又从澳门、1896 年从汕头、1902 年从澳门、1907 年从新加坡为东非德国种植园公司招募了几批华工。1905 年，德国从山东招到 60 名身强力壮的中国男子，送往坦噶尼喀当警察。

刚果自由邦成立后，比利时殖民者着手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并派人到中国招工。1892 年，他们勾结澳门的葡萄牙劳工贩子，招到 542 名华工；随后又暗中派人到琼州、汕头一带招工，陆续运往比属刚果。这条铁路 1889 年开工，1898 年建成，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特别是比利时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大批筑路工人（黑人和华工）死于黄热病、尿血、赤痢、天花和中暑。1898 年，利奥波德派使臣到北京，与李鸿章签订《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刚果自由邦的招工合法化，但该条约未经批准生效。比利时殖民者招募华工之心不死，1904 年从澳门招到一批华工去修筑铁路，1906 年又从香港招了 500 余人。1911 年，比利时开始大规模开采加丹加铜矿，又打算招募华工去该地开矿。比利时驻天津总领事狄西尔写信给开滦矿务局经理那森，说：“卡坦加（即加丹加）地方大型企业因雇工困难，想要招募黄种人到那边矿上去做工，……准备和中国当局订立输出几万名华工的合同。”那森在 1912 年给狄西尔的回信中曾提出了六点建议，但此事可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成。

欧洲殖民国家招收华工赴非，最大的一次当推英国招募华工到南非开采金矿。英布战争期间，南非黄金矿区被战火波及，黑人矿工离散，战后恢复生产时顿感劳动力缺乏。英国资本家提议招募勤劳智慧、工价低廉的华工，得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认可。经清政府驻英大使与英国政府谈判，1904 年 5 月 13 日双方缔结了《保工章程》。还在谈判期间，南非矿业公司就同在华的英国公司、洋行（称大包商）签订了招工合同，由这些英国公司和洋行再找一些中国掮客（小包商），以诱骗的方法招工。《保工章程》一签订，第一批华工就于 5 月 25 日从香港启程。6 月 27 日，开滦矿务局招的第一批华工也从秦皇岛运往南非。1904—1907 年，英国总计招工 63811 人，其中从秦皇岛启程者 43258 人、天津 4139 人、烟台 14675 人、广州—香港 1741 人。

华工在德班登陆后，立即被运往兰德金矿。他们在那里受到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住的苦力宿舍由白人看守，不得擅自离开，否则就要判刑、罚款或判做苦役。按合同规定，华工只准做粗工，即爆石、打眼、扛矿石上车等，每天工作 10 小时，但矿主经常违反合同，延长工作时间，有的长达 12 小时以上。华工工资只及欧洲人同工种工资的八九分之一，而矿主还不按合同规定发给，从中多方盘剥。劳累至极的工作，奴隶般的生活，使成百成千名华工暴死异乡，仅 1904 年 5 月—1906 年 12 月就死亡 2485 人、残废 3787 人。连英国报刊也承认：“南非工价日仅二先令，其佣值廉贱若是，而又待遇苛虐。工事不竣，则必加扑责，或处以他刑。此实残酷已甚，无怪其他华

陈翰笙：前引书，第 273 页。

Rohest Cornevin, *Histoire Du Congo* (《刚果史》), 1970, p.160.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 vol.6, 1911-1912, p.924.

陈翰笙：《猪仔出洋—七百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百科知识》1979 年第 5 期。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265 页。

陈翰笙：前引书，第 252 页。

陈翰笙：前引书，第 252 页。

人之怒也。”被激怒的华工最初相约怠工，要求矿主按合同支付工资；当军警前来镇压时，怠工往往演变为罢工。例如，拥有 1300 名华工的北兰德芳汀矿曾选出 53 名领袖与矿主谈判。谈判破裂后，全体工人从 1905 年 3 月 29 日起实行三天怠工，每天爆破的石方不超过 12 英吋。矿主召来警察，逮捕并监禁了工人领袖。全体华工则团结一致举行罢工，终于迫使矿主释放了工人领袖，答应按合同支付工资。到南非的六万余名华工，三年后都陆续期满回国。

据现有资料估计，从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被招募到非洲的华工人数当在 10 万人以上。他们的足迹遍及全非，主要在南非、留尼汪、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圣赫勒拿、刚果、扎伊尔、塞内加尔等国。他们为兰德金矿生产的恢复和非洲国家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在许多国家垦荒开地，建立经济作物种植园，把中国农业的优良耕作技术传播到非洲。例如，华工在留尼汪等地试种茶叶获得成功，在南非开普种植水稻获得高产。他们和非洲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绝大部分期满回国，少数留在当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人还与非洲人结婚，在当地安家落户。

四、从《海录》到《三洲游记》

16 世纪以后，中国到非洲游历的学者、政要、商人、旅行家比古代更多，他们根据亲身见闻所写下的游记和回忆录也比古代更多。这些文献既增加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了解，也是研究近代非洲的宝贵资料。

据目前所知，游历非洲最早的中国人可能是樊守义。他于 1707 年随艾若瑟赴欧，1719 年返回，两次路过好望角，著有《身见录》，记其见闻，但极简略。1782—1795 年间，谢清高附番船出洋，后口授其见闻，成《海录》一书。书中记述了妙哩士(Maoritius, 今毛里求斯)、麻沙密纪(Mozambique, 今莫桑比克)、峡山(好望角)、散爹哩(St Helena, 今圣赫勒拿)、犍(Guinia, 今几内亚湾)等地，言简意切。例如，他说好望角“为荷所辖……舟行经此，遇风过猛，必须稍待风和而行。山亦无土人，唯荷兰及鬼奴居之”。他向中国人报道了东西非是贩奴猖獗的地区：“大小百有余国……皆为西洋所夺。又尝掠其民，贩卖各国为奴婢。”

在近代史上，介绍并亲身访问埃及最早者可能是马德新。他是中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于 1841 年从云南出发，取道缅甸、印度去麦加朝圣。1844—1845 年间，他两次访问埃及，在开罗居住半年之久。他在埃及时正值穆罕默德·阿里当政，虽然阿里改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改革的成就随处可见。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谜思尔巨城也”，亚历山大“极壮丽”，“商贾辐辏”，而埃及“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

《外交报》，第 122 期。

Luli Callinieos, *Gold and Workers, 1886-1924* (《黄金与工人》), Johannesburg 1982, pp.67-69.

樊守义作，阎宗临注：《身见录》，《山西师院学报》1959 年第 2 期。

《海录注》，卷中。

《海录注》，卷下。

他对穆罕默德·阿里评价很高，说：“王大智大勇，善治理”，“条建树，蓄货值，各种技艺由甫郎西习来。” 他已注意到埃及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对改革所起的作用。

马德新是经陆路、海路辗转到埃及的，而 1859 年到埃及的郭连城则是由海路直达苏伊士、再由苏伊士坐火车经开罗至亚历山大。他回国后，著《西游笔略》评述埃及见闻。他指出了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对东西方交通所起的作用：“前十余年，未有火车之制，凡往来客商，俱用骆驼搬运。自苏夷士至亚立山，必需十数日，且途中乏水，故大西洋之越东洋者，俱绕阿非利加洲之好望角，其程远三万里。今此国有火轮车之便，自苏夷士抵亚立山府，只须四五个时辰，故商人多出此途。” 据目前所知，郭连城可能是向中国报道埃及金字塔最早的人。他说：“加以罗城内，有最奇之古迹，状如冢，皆石为之，阔下而锐上。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长约六十丈，高约六十丈，内有古人之棺，不知何年所建。”

继郭连城之后，经此路至欧洲者有张德彝、王韬等人。此后，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赴欧洲多经苏伊士运河。因此，这一时期的游记对苏伊士运河的记载很多，对红海非洲一侧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记载也增加了。康有为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对东西交通带来的利益，提出了通则国强、塞则国弱的道理，他说：“盖通者，其人身治血脉第一法，亦活国便民兴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国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国强，民富而强。其文野、弱强、贫富之等差，即视其交通之等差为比例。” 梁启超叙述了开河经过，揭露了外国公司奴役埃及民工的情况，发出了“莫令形胜地，再见血模糊”的感慨。

有没有中国人到过非洲内陆，有没有中国人记述非洲内陆的著作？这在所有的非洲史著作和中非关系史上都未著录。但事实是，1877—1878 年间，丁廉、巴仲和、海平三人游历了东非内陆，丁廉所著《三洲游记》则是这次内陆之行的翔实记载。

丁廉是广东番禺人，巴仲和是浙江宁波人，海平是巴仲和的仆役。他们于 1877 年 4 月 11 日乘船离桑给巴尔，12 日抵罢迦毛（Bagamooyo，今译巴加莫约），经黄米河（Wami，今译瓦米河）、高高（Gogo，今译戈戈）、杜道玛（Dodoma，今译多多马）地区，北上乌苏古玛（Usukuma，今译乌苏库玛），经加拉贵（Karaguse，今译卡拉圭）而抵乌康达（Uganda，今译乌干达）。1878 年 6 月，他们折返乌季季，巴仲和染疾病死。7 月 26 日，他们离乌季季北上，行至罗杏达（Ruanda，今译卢旺达），10 月 29 日，因路途险阻，急速返回桑给巴尔，历时一年另八个月。

《三洲游记》对英德占领前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丁廉等人所访

艾周昌：前引书，第 26—27 页。谜思尔系 Misr 的对音，既指埃及，又指开罗。甫郎西，France 之音译，即法兰西。

艾周昌：前引书，第 31 页。

艾周昌：前引书，第 35 页。加以罗系开罗（cairo）的旧译。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海程道经记》。

梁启超：《饮居室专集》，第 23 卷，第 46 页。

已知《三洲游记》的版本有两种：一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一为上海书局石印本。

问的众多王国和酋长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村社是其基层单位。村社聚族而居，土地公有，族人共同劳动。例如，他记乌苏库玛时写道：“村中有一公地，上竖木杆，系铜铃百余枚。每日辰刻，社长派一人将铃球力撼之，声震阖村，男妇皆起，至公地操作。午后，球又震，始回饮食，须明复至矣。若逢雨雪，则各在家操作。别有司事者，巡察勤惰，以定赏罚。”这种村社制度不是原生的，而是次生的。《三洲游记》提供的材料表明，东非内陆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的差别。例如富人亚梅德，“其家资饶裕，可称海外金张。室中有象牙四百五十枚”，“侍从百余人”，“养牛一百五十头，肥羊四百头。余利所收，可以数万计”。关于奴隶的来源，丁廉记载了三种。第一种是罪犯：“刑罚则偷盗、奸淫、杀人之案，皆以斩决定其罪，不问轻重。如犯案之人，肯终身为事主之奴，则可恩免杀戮。”第二种为买卖：“家贫力微，生子女不能鞠养，亦来市中呼卖，其价甚廉。故奸贩之徒，往往至该国，购买子女，出售他方，获利甚巨。然虽有此风，以未闻当道为之禁止者，甚可怪也。”第三种靠掳掠：“阖村遇暴，尽为敌人掳去。”

19世纪70年代，东非内陆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景象，《三洲游记》提供了许多亲眼目睹的事实。地处平原的乌苏哥村“土地膏腴，物产饶富，所出大豆、青菜、粟麦、烟草等物，携至他方，与人交易”。山区也有相似者：“山下人烟稠密，编树成村，鸡犬桑麻，颇有桃源景象。……其地风俗纯良，土地肥沃，稻粱谷果，物产丰饶。”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撒排地方“植木棉甚多，……妇人精于纺织，日夕辛勤。所出之布，虽似粗率，然坚固异常，久用不敝”。丁廉对内陆的雕刻品称赞不已：“木椀、木叉等物，雕镂精工，真是神工鬼斧。”除了家庭手工业外，他还记载了几处官办手工工场：伽富“有铁厂一所，系国家开设，商民不得沾其利。工匠甚多，专造器皿军械”。从丁廉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东非内陆的商业有定期集市，也有坐商和行商；有短途贩运，也有长途贩卖。乌苏哥“日中为市，恃以为生”，看来是一个集市贸易镇。他们在这里请了一名翻译，名叫慧鹦，“年仅二十余岁，十二三岁时即随其父作贾远方”。当时外国和沿海的商品已渗入内陆，丁廉见到了桑给巴尔的铜器、西洋布匹、手表。当地的贸易并无通行的货币，多以物易物，或用贝币。他说骂耶姆“市尘交易，不尚银钱，以蛤壳代”。贝币还可支付佣工的工资，“乡人佣工于人，每日工值仅二壳或三壳。每三壳易一鸡，六壳易六口一日粮，二壳易包谷数十枚”。

《三洲游记》中反映最多的是东非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东非内陆的住房不论是贫民的还是王室的，均为茅屋，但差别甚大。一般老百姓的房子“皆结茅为之，高仅及肩，须偻倭鞠躬方得入门。……室内不开窗户，以故黑暗如漆”。酋长的住所“稍觉高大宽敞，上亦盖以茅龙。”王宫“参差错落，大半以香茅编盖”，“入室至一殿，虽非金碧辉煌，而轩敞特甚”。丁廉经过的地区住有东班图人、恩戈尼人、尼罗特人、斯瓦希里人、阿拉伯人，其中东班图人又分成布干达族、吉库犹族、坎巴族、尼亚姆维济族、苏库马族等等，他们在体型、肤色和民俗上均有差别。丁廉虽未能从人种学、语言学、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区分，但他直观地感到了差异。他说乌干达人“面微有黑色，性习勤，衣饰修洁，与黑蛮人异。其装束别有一致，颈中园领，尚青色，背上布衣一领如半截斗篷。胸前无钮扣，仅束一带”。在到乌苏库玛之前，

某村居民“面色黄黑者十之二三，男子全身裸赤，自顶至足。惟腰间前后掩白布一方，束以五色带，阔约三四寸，垂垂然拖下二尺许。带上系玉石等物，亦有金银者。手各有钏，颈各有圈，脚各有镯，皆以金银铜为之”。这一带的婚丧习俗是：“男女聘娶，无六礼之将，婿家只以羔羊十二头、铁锤二柄，大布数百匹或数十匹，送于妇家，以为定婚之仪。贫家力薄，则羊和布概可不送，而以弓矢、戈矛代锤。既娶入门，妇家累到婿家需索，诛求无厌，须到生子之期，则不复来索。倘来需索时，吝而不与，或未遂所欲，则妇家竟可将新妇劫去，别嫁他人。如已生子，则以血脉已通，不可为他人之妇，而婿家并得免扰矣。”至于“居丧之人，首围蕉叶一张，叶枯复易，面则抹以灰煤，杂以油漆。遥望之，黑而有光”。东班图人的发式是：“顶上之发，种种不一。有全行剃去者；有剃去顶上而留四周一圈者；有惟留脑后一丛，全皆削去者；有全留不剃，编式细辫，盘于顶上，如杞柳盘、浮屠式者。”

丁廉等人所过之地，正是东非大裂谷东、西支伸展之区。他描写了一些断层，应是最早见到东非大裂谷的中国人。

《三洲游记》的价值不只限于史学，对研究地理学、民俗学、非洲动植物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五、官方关系

在古代，中国与北非、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城邦有着长期的官方关系，但到葡萄牙东来和明清两朝实行闭关政策以后，这种直接联系被暂时割断了。随着殖民主义瓜分非洲和大量招募华工，从19世纪末年起，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当局开始同清政府发生官方接触。

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扎伊尔在“刚果自由邦”的名义下正式成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为了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为了招募华工到扎伊尔充当苦力，1885年，刚果自由邦政府照会清廷，表示愿意与中国“开通往来”。1887年春，比利时驻华公使奉利奥波德二世之命，照会清廷，要求在广州和汕头为刚果自由邦招工。清政府认为，刚果自由邦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不允许比利时政府代为招工。为此，1898年，利奥波德二世派余式尔到北京，商谈签约事宜。5月22日，在法、俄驻华使节的帮衬之下，余式尔与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其全文共两条：

“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议定中国人民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者、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人民相同。”。

该条约终因戊戌政变而未得到清政府批准生效。但毕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

根据1904年中英所订《保工章程》第六款关于清政府可以派领事官或副领事官“前赴华工所至之英属和归英保护之地，照料彼等利益、安乐”的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外交类一四三六号卷：《刚果国外交部大臣伊特倭德兴会》。

陆元鼎：《各国立约始末记》，卷十四。“动者、静者之财产”，《湘报》作“动产、不动产”。

定，清政府于1905年任命刘玉麟为首任驻南非总领事。这是近代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设领伊始，清政府就背离了保护华工权益的原则，外务部在奏请以刘玉麟为南非总领事时就提出：“所有应募华工统归管辖，随时弹压稽察，认真经理，务将该处苛待条例设法消除。”这是以弹压和保护的双重任务偷换了保护华工利益的一元任务。刘玉麟对此心领神会，他在给外务部的汇报中说：“职道一面告诫西人，事事履约办理；一面约束华工，安分工作，不准滋事”，且要对华工“恩威并施，劝惩兼用”。刘玉麟曾多次与矿方交涉，迫使矿主同意“华工病故，公司应给恤款”，并辞退监工中尤为狡狴者数人；对于华工反抗矿业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采取了“不得纠众罢工滋事的态度”。

刘玉麟赴任前，在南非的华侨受到种种虐待。开普殖民地曾颁布苛例36款，规定在开普的华人必须领取身份证（留埠纸），到期不办者受罚。此例颁布后，华人不准入开普殖民地居住，他们的选举权也被剥夺。不堪苛待的华商请求清政府设领保护。《保工章程》签订后，此等文件悉行交付刘玉麟，因此，刘玉麟还负责办理南非华侨事务。他在任内办了两件事：一是经过交涉把开普殖民地34名将被解押出境的华商全行释放；二是协助德兰士瓦的华商反对按手印。对于南非迫害华侨的苛例，他虽经辩驳，但却毫无结果。

1907年，刘玉麟奉调回国，其随员刘毅接任总领事。到1911年，在南非的华工已陆续回国，刘毅也于同年准假离任，所有南非华侨事务由美国驻德兰士瓦领事根苏拉斯代理。辛亥革命以后，刘毅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驻南非总领事。

清政府在非洲设立的第二个外交机构位于葡属莫桑比克。当时这里计有“华商四百余人，贸易有年”。后因葡萄牙殖民当局苛例百出，华商深为恐惧，他们写信给南非总领事，请求设官保护。1905年，刘玉麟报外务部，派德商费里士窝傅为驻该处副领事。1911年，刘毅回国，经中葡两国政府同意，费里士窝傅改充领事。

近代时期的中非官方关系与古代不同。古代的中非官方关系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而近代的官方关系则受制于殖民主义者。不仅扎伊尔、南非、莫桑比克的人民无权参与其事，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清政府也不能摆脱殖民者的控制。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官不是与非洲人民的合法代表打交道，而是同英国、葡萄牙殖民当局打交道。但是，中非两国人民还是冲破殖民者的阻挠，发展了自古以来的友好关系。

六、中非人民的反殖斗争互相激荡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八二号卷。

《海外华侨近状》，《外交报》第122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六号卷。

《外交报》，第122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八五号卷。

自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同遭受到殖民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压迫。他们在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中，在振兴民族的道路上，互相支援，携手共进。

早在 1661 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时，被荷兰人贩卖到台湾的黑奴就曾加入郑成功的部队，打击荷兰侵略者。这是中非人民并肩战斗的序曲。

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和非洲诸古国（如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率先进行改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冀图强兵富国，重振国威。中国主张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重视对非洲国家改革开放经验的研究。林则徐对阿里“鼓励国人习欧罗巴之技能”，致使“国势复振”大加赞赏。阿里以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用先进的方法加以训练，无疑给林则徐以启迪，他说：埃及“军伍昔强，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近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年少”，“并设铸炮局、器械局、火药局”。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上书建议铸炮造船、建设水军。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赞赏阿里改革经验的同时，也指出了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兵多饷重，赋敛烦苛”，以致“民不聊生”；二是阿里在摆脱土耳其统治、反击列强侵略的同时，激起被占领的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为西方列强的干涉提供了口实。徐继畲说：“俄罗斯以大兵入土境，名为救土，将隐图之。英吉利、佛郎西皆勒兵劝和，其酋乃还所侵地，复通贡于土耳其为外藩。”。

19 世纪末年，非洲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中国成为列强争夺和宰割的对象。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梁启超、陈天华、孙中山等都曾从民族、民主的立场出发，剖析非洲局势的发展，从非洲人民的苦难中思考中国的命运，从非洲人民的斗争中探索中国的前途。他们以唇齿相依的感情来看待非洲，孙中山说：帝国主义把非洲瓜分之后，“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邹代钧则从埃及实行双重管理制度、由英法派员治财赋而丧失独立，想到“吾华之用赫德治税务为非计”。

由于命运与共，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深表同情。孙中山对摩洛哥人民 1908 年的反法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摩民不甘与虜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奋发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摩民不畏也。”他以摩洛哥人民万众一心、英勇战斗的精神来驳斥“革命必遭瓜分”的谬论，鼓舞中国人民推进革命事业。同样，非洲人民也希望“中国自强”，“不可专信欧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非洲国家人士和华侨都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早在 1896 年，孙中山就派杨辉鸿到南非，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同盟会支部。立了

艾周昌：前引书，第 132—133 页。

徐继畲《瀛环志略麦西（埃及）》。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48 页。

艾周昌：前引书，第 118 页。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41 页。

艾周昌：前引书，第 127 页。

同盟会支部。朱印山、陈警蛮、叶浩如、张藻华等人加入同盟后，同保皇派唇枪舌战，颇为激烈。毛里求斯的华侨于 1908 年成立华人商会，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华侨还为支援祖国的革命斗争而解囊相助。

中国的先进人士一贯希望非洲人民自立自强，繁荣昌盛。早在 19 世纪中叶魏源就说过：非洲“其地之廓，人之庶”，“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

后 记

《非洲通史·近代卷》由华东师大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郑家馨主编，并合写导论。

参加本卷撰稿者，依次为徐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第一章）、魏安生（北京大学，第二章）、张谦让、李忠人（山西大学，第三章）、沐涛（华东师范大学，第四章、三十章）、罗建国（四川大学，第五、十三章）、何芳川（北京大学，第六、七、十五章）、陈万里（上海外国语学院）和陈晓红（湘潭大学）合写第八章、艾周昌（第九、十四、三十二章）、舒运国（上海师范大学，第十、二十七章）、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第十一章、二十一章）、许永璋（郑州大学，第十二章）、郑家馨（第十八、十九、二十八、二十九章）、张文淳（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十章）、包茂宏（北京大学，第二十二章）、何芳川、包茂宏（第二十三章）、赵瑞芳、于力（云南大学，第二十四章）、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第二十五章）、胡述宝（北京大学，第二十六章）、郑家馨、包茂宏（北京大学，第三十一章）。

本卷责任编辑为王少如。

